中国历史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HISTORY





政治人物

主编 徐 寒

吉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一、历代帝王

【三皇五帝】

中国最早的古史系统。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到战国时期形成几种“五帝”说；战国末始有“三皇”一词，到汉代才形成几种置在五帝前的“三皇”说。

“皇”的原意是“大”和“美”，不作名词用。战国末，因上帝的“帝”字被作为人主的称呼，遂用“皇”字来称上帝，如《楚辞》中的西皇、东皇、上皇等。时又有天皇、地皇、泰皇之名，称为“三皇”。在《周礼》、《吕氏春秋》与《庄子》中也始有指人主的“三皇五帝”，《管子》并对皇、帝、王、霸四者的不同意义作了解释，但都未实定其人名。

汉代所定的人间历史上的“三皇”有五说：①《尚书大传》为燧人、伏羲、神农。《礼·含文嘉》、《春秋命历序》亦同此说而以燧人居中。②《春秋



伏羲



神农

运斗枢》为伏羲、女娲、神农。③《礼·号谥记》为伏羲、祝融、神农。《孝经钩命决》引《礼》同此，但以祝融居末。④《白虎通》说为伏羲、神农、共工。⑤西汉末的《世经》所排古史系统，在黄帝和颛顼之间加有少昊金天氏，使战国时说的“五帝”中多了一帝。于是有人把原五帝之首的黄帝升为三皇，与伏羲、神农并列。首先是《礼·稽命徵》持此说，张衡上汉顺帝书及其后的皇甫谧《帝王世纪》亦从之。接着是伪《尚书序》宣扬此说，由于它的经书地位，从此伏羲、神农、黄帝成为中国历史中最古的三位帝王。其实上述诸说皆为西汉末以后纬书所编造的神话。

汉代仍传有天神中的三皇，西汉末纬书《春秋命历序》、《始学篇》等以三皇为天皇、地皇、人皇。道教经典中的三皇分初、中、后三组：“初三皇”还具人形（一说他们分别有十二头、十一头、九头）；“中三皇”则具人面蛇身或



少昊

龙身，分别有十三头、十一头、九头（一说以中地皇为有巢氏、中人皇为燧人氏）；“后三皇”中的“后天皇”人首蛇身，即伏羲，“后地皇”人首蛇身，即女娲，“后人皇”牛首人身，即神农。汉代画像石和帛画即多此形象。

“帝”原指天帝，人间的“五帝”一词在孟子时尚未出现，他书中只提到“三王五霸”。《荀子》中才有“五帝”一词排在“三王”前，但无人名，只在其《议兵篇》中称尧、舜、禹、汤为“四帝”。《孙子兵法》有“此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句，似亦有四帝、五帝之称（但梅尧臣谓此“帝”字系“军”之讹）。《管子》及《庄子》所屡称“三皇五帝”，也都未指实人名。其实，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记载神话和历史传说文籍中，先后出现了很多古帝或宗神名号，大抵居西边的有黄帝、炎帝以及伯夷、共工、鲧、禹、四岳、稷（弃）、高圉、太王、玄嚣、蟜极、昌意、青阳等，居东边的有太皞、少昊挚、颛顼、高阳、高辛、尧、羿、浞、浇、俊（即舜、喾）、契、冥、上甲微等，地区未明的有帝鸿氏、缙云氏、金天氏、烈山氏、陶唐氏（前二者可能在西，后三者可能在东）等，由东而西的有伯翳、非子等，本在东而一部南移的有祝融即重黎，及其后裔八姓（如季连芈姓为楚祖）等等。《庄子·胠箧》列举了古帝十二名及全书中屡次提到的其他古帝，《六韬》列举了古帝十五名，《逸周书》所列古帝多达二十六名。由于战国后期五行说逐渐建立，凡事都要凑五为成数，于是在上述许多古帝王中，遂有罗列“五帝”的必要，并出现了下列五种五帝说。

①《五帝德》所说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人。其说根据《国语·鲁语》对他们的赞誉而定。《帝系》为其编造了以黄帝为始祖的世系。《吕氏春秋》及《史记·五帝本纪》承用了此说。

②《战国策·赵策》与《易·系辞》提出的宓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五人。《庄子》、《淮南子·俶真训》及《三统历》亦承此说。《通鉴外纪》反对三皇五帝说，但其所列最早的帝王仍是此五人。

③《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载的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礼记·月令》亦同此说。王符《潜夫论》并将古代各帝王都分别纳入此五帝的血胤系统之下。

④《世经》所编排的古史系统依《十二纪》与《月令》，在黄帝与颛顼之间有少昊，郑玄注《中侯敕省图》即加少昊于第一个五帝说，谓五帝有六人，俱合于五帝座星。然东汉以来《稽命徵》等之说，把黄帝升为三皇之一，皇甫谧《帝王世纪》从之，而以少昊以下五人为五帝。于是伪《尚书序》即据以将《世经》前面三名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接着的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以其经书地位之尊，以后史

籍皆承用此说。于是这一“三皇五帝”说被奉为古代的信史。

⑤《通鉴外纪》及《路史发挥》引梁武帝萧衍画像碑述，以黄帝、少昊、颛顼、喾、尧为五帝，似是最晚的一说。但梁武帝只有《通史》六百余卷，据陈立《白虎通疏证》，以为画像碑述可能是《武梁祠堂画像碑述》之讹，则此说仍出自汉人。

至于神话中的天神，《山海经》中皆称帝，其后亦有“五帝”之称，如《楚辞·惜诵》有“令五帝”句，与“指苍天”、“戒六神”并举，是皆指神。又《晏子春秋》有“楚巫请致五帝以明君德”句，显然皆指天帝。故《史记·封禅书》载汉高祖刘邦说：“吾闻天有五帝”。即述战国末流行之说。同时有五色帝之说，秦设祭祀白、青、黄、赤四上帝祠，汉高增祀黑帝之祠。至《春秋纬·文耀钩》，五色帝始有名字：“苍帝曰灵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枢纽，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纪。”郑玄注《礼记·大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句，即引此诸名为“太微五帝”，谓“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把地上五帝说成是天上五帝所感生，提出了“感生帝”之妄说，王肃已斥其谬。



颛顼

大抵“三皇说”所指诸人，是中国祖先处史前各个不同文化阶段的象征。有巢、燧人、庖牺（伏羲）分别代表蒙昧时期的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神农代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女娲则是更早的创世纪式的神人，在神话中又和伏羲结合创造人类。“五帝说”所指诸人，主要是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盛期及其解体时实行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一些部落酋长或军事首长人物。

【盘古】

中国古代传说时期中开天辟地的神。盘古最早见于三国时徐整著的《三五历纪》。其后，题为梁任昉撰的《述异记》称盘古身体化为天地各物。《五运历年纪》（不详撰成年代或云亦徐整著）及《古小说钩沉》辑的《玄中记》亦有类似记载。

根据这些记载，天地原本浑沌得像一个鸡蛋，盘古生在其中，过了一万八千岁，然后天地开辟，阳清者（意指蛋清部分）形成了天，阴浊者（意指蛋黄部分）形成了地。随着天的增高，地的增厚，盘古也一天天增加身体长度。他的头和四肢变成五岳，血液和眼泪变成江河，眼睛变成日月，毛发变成草木；他嘘气变为风雨，声音变为雷霆，目光变为闪电；他睁眼是白天，闭目是晚上；开口为春夏，闭口为秋冬；高兴为晴天，生气为阴天，等等。《述异记》并指出，上述有关盘古的传说，或出于古说，或产生于秦汉或盛行于吴越之地，或为先儒之说；而古人为了纪念他，在南海建有盘古墓，在桂林建有盘古庙。《三五历纪》并说明盘古之后才出现三皇。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指出：盘古、槃瓠音近，槃瓠为南蛮奉为其天地开辟之祖，而后华夏人误用以为己祖。始认为中原盘古神话来自南方蛮族。但据《后汉书·南蛮传》所记，只说高辛氏有畜狗名槃瓠，因咬东辛氏敌人之功，得高辛氏女为妻，负入深山生六男六女，繁衍成为武陵蛮，并无开天辟地故事，可知槃瓠原与中原的盘古神话无关。倒是记中原神话故事的专书《山海经》中，有类似的身体各部分化为大地各物的神话，如《海外北经》有神为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息为风，身长千里。"《大荒北经》说："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类似盘古神话的原型，不过其名为烛阴或烛龙。而在《天问》中，烛龙是能照射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的神。可能在故事传说形成过程中，受了南方槃瓠神话影响，烛阴或烛龙之名才变为盘古。

【黄帝】

中国古史传说时期最早的宗祖神，华夏族形成后被公认为全族的始祖。上古时期约在姬水一带（即东起渭水西迄湟水之间今陕甘青地境的古齐家文化区域）形成的较为先进的黄帝族，即由这位杰出的始祖而得名。黄帝族和住在姜水（在今陕西岐山、武功附近注入渭水）一带的姜姓炎帝族世代互通婚姻。后黄帝族后裔中的一支进入今山西南部，创造了夏文化，遂称夏族。夏族进入中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再传就是也生息在陕西境内的姬姓的周族。周族推翻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为了追念远祖黄帝族，就用自己的姓来追呼它。



黄帝

《国语·晋语》及《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都说黄帝是少典之子。《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其国号为"有熊"。崔述《补上古考信录》指出，"公孙"是公之孙，上古时无此称；"轩辕"是指黄帝居轩辕之丘，依据居以为号，非黄帝名；"有熊"不见于传、记，不合《帝系》原意。崔述的批评是对的，但既是神话，亦不需深究其是非。值得注意的是，《易·系辞》、《世本·作篇》等各种文献都盛称黄帝时期有许多发明创造。属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有穿井、作杵臼、作弓矢、服牛乘马、作驾、作舟等？属于物质生活方面的，有制衣裳、旃冕、扉履等；精神文化方面则有作甲子、占日月、算数、调历、造律吕、笙竽、医药、文字等。其中当然有不少是黄帝以后的发明创造，但也反映了黄帝族获得的辉煌成就。

文献中记载的有关黄帝的主要故事，有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及对北方荤粥族的斗争，还讹传过一个与赤帝的阪泉之战。《战国策·秦策》记苏秦把"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与尧伐驩兜，舜伐三苗，

禹伐共工，汤伐夏，武王伐纣并称，表明这是黄帝一生中主要的战绩。据《山海经》记载，黄帝与蚩尤曾战于冀州之野，以应龙、女魃杀蚩尤。而《逸周书·尝麦篇》则载杀蚩尤于中冀。此所谓中冀、冀州，当均指涿鹿所在。夏族与蚩尤之争还反映在《尚书·吕刑》中，这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说，当有史实为背景。《五帝本纪》说黄帝“北逐荤粥”，这是他在进入冀州后，为保居住领域的安宁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黄帝与赤帝阪泉之战，可能是涿鹿之战在传说中的分化。梁玉绳《史记质疑》指出：“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是轩辕勤王之师，而非有两事，故《逸周书·史记解》称蚩尤曰阪泉氏，斯为确证。”按《水经·㶟水注》云：“涿水出涿鹿山……又东北与阪泉合……《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是阪泉与涿鹿实即一地，而蚩尤又有阪泉氏之称，可证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

黄帝族经过夏、周两代与其他各族的冲突、交往与融合，到战国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华夏族。《世本》及《大戴礼记》的《帝系》将各族的宗神和祖先编排成黄帝一系的分支，构成了完整的血缘世系。从此人们总把黄帝与炎帝并举，来表示华夏族从炎、黄开始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尧】

中国历史上传说的古帝王之一。始见于《楚辞·天问》、《国语》、《左传》等书。尧、舜禅让，是流传很广的故事。《山海经》神话中有“帝尧”之名，但



尧

在古帝世系中却没有，说明他在最早的神话传说中地位不高。但在儒、墨两家文籍中，尧是古代的圣王，儒家对他尤其推崇。《论语·泰伯》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尚书》还专门编撰了一篇《尧典》来颂扬他的政绩和德行，以及传位与舜“光被四表”的盛业。但《竹书纪年》等书则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在战国末年编成的古帝世系《帝系》篇里，尧被编为黄帝曾孙帝喾的第三子。《世本》还说“帝尧为陶唐氏”，但《吕氏春秋·古乐》历叙古帝，陶唐氏位在黄帝前，而尧则在黄帝后第三位，可知二者原非一人。《史记》沿用《世本》的说法，史籍中遂称尧为“唐尧”，与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名号一致，成了战国后期流传下来的“二帝三王”历史系统中的唐帝。另外，在《五帝德》中，尧又被编为古代“五帝”之一（见三皇五帝）。

传说时期的“帝”字指上帝，“帝某”常指某一天神，恩格斯指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帝尧就是这样一个氏族、部落的宗祖神，但也有可能为该部落一个杰出首领神化而成。就尧、舜传说故事来看，当时应属父系家长制氏族部落联盟的盛期濒临解体前的时期。

尧、舜只是军事民主制中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而不是帝王。

【舜】

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古帝王之一。从《楚辞·天问》的神话看，舜应为商代的始祖神，与商代卜辞高祖夒相当。王国维认为，“夒”形讹为“夋”，《山海经》中遂写作“帝俊”；又由声类同而作“喾”，《山海经》亦见之，则为帝俊的分化之一；又分化为舜。自郭璞以降及近代学者据“俊”“舜”音转及各种资料，已确认舜即俊。后来历史文献中“俊”已不见，唯见分化出的“舜”和“喾”，但又各演化为不同的历史人物。然在《国语·鲁语》中舜仍为商族的始祖神，与原始神话及甲骨文所载商代原始祖先资料相符合。《孟子·离娄下》说舜“东夷之人也”，《墨子·尚贤中》也说“舜耕历山”，则其为东方鸟夷族的商代始祖神是可信的。

《礼记·祭法》中商的始祖神改成喾。《帝系》中喾声名显赫地一身兼为挚、尧、商、周四族共祖，舜则降成与喾并立的颛顼世系中的一个裔孙。但在儒、墨两家学说里，尧、舜、禹却成了三代以前道德勋业最盛的前后禅让的三个圣王。尤其儒家把他们标榜为万世楷模的典型圣王，尧未能做到的举用八元、八恺，放逐四凶，及任命禹治水等盛业，都由舜来完成。人们称他为虞帝，号有虞氏，姓姚，《楚辞·离骚》且以“重华”为其名。传说舜从小受父、弟迫害，历尽磨难。后受尧识拔，摄行政务，终至膺受历数为天子，最后又南巡而身死，葬于苍梧之野。自汉以后传说他所到之处几乎遍及华夏各地。但《孟子》说他“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迁于负夏（今河南濮阳），卒于鸣条（今河南开封境）”，则一生行踪没有超出黄河下游。



舜

舜原是黄河下游东夷部落一个有名的军事首长。作为商的远祖，他处的时代与禹相同；作为东方夷族的代表，他和尧都与西方黄帝之后的夏族有过长期的交往。当时在黄河中游地区结成部落联盟，他和尧、禹先后更迭担任军事首长，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尧舜禹“三圣传授”的时代。通过他们，父系家长制氏族部落联盟完成了解体的过程（见三皇五帝）。

【禹】

西周文献《诗》、《书》中的古代天神。相传商、周族人都居住生息在他所敷布的土地上。据《楚辞·天问》记载，禹和其父鲧均为神。鲧治水失败被刑后从腹中育出了禹。禹治水成功，娶涂山氏女，生子启。后来启代益为君主，建立了夏王朝，禹遂为夏宗神。《国语·周语下》则说因禹治水有功，上帝嘉奖他使有天下，并赐姓姒，称有夏氏，

故《郑语》称之为“夏禹”。

《天问》中和鲧、禹同时提到的另一个神是共工。“共工”和“鲧”可能是同一神名的分化，而共工（鲧）是姜姓族的宗神。姜姓族即羌族，亦即当时的西戎（其族自称羌、被称戎）。禹之为夏宗神，实际是由先为西戎的宗神来的，故曾称为“戎禹”。羌族九州之戎的一支，曾步其前辈黄帝族的前进路线，东进创造了夏文化，形成了夏族。禹也由原来羌戎的宗神成为夏的宗神。夏族把自己的宗神宣扬为敷布土地、奠定山川的天神，商、周也都一致尊信。而羌戎的另一支四岳族为夏的姻亲氏族，曾协助过禹，它的宗神鲧（即共工）遂亦为夏族所尊奉。当二族宗神安放在同一祭坛时，因鲧的时间在禹前而排列在前，遂演化成父子关系，并附以动人的神话传了下来。

在春秋文献中，禹的业绩除敷土、治水之外，又增加了划分九州的传说。战国文献中，禹还被崇奉为社神。而到儒、墨两家著述中，禹和尧、舜被推崇为古代实行禅让的三个圣王。儒家编《尧典》颂扬他们，并称禹为平水土的“伯禹”；又将一篇地理名著加工成《禹贡》，作为记载他治水分州的经典。《墨子·兼爱》则宣扬他治水的盛业。还有人编造了他辛苦治水十余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禹遂成了从茫茫洪水中拯救人民的“大禹”，受舜禅位而为天子。

作为历史人物的禹，可以这样理解：他是起自西北进入中原的夏族部落的一位杰出的首领。或者后来被神化为宗神；或者以他在本族中的威望作为本族原有宗神的化身出现，承用了宗神的名字。他和东方鸟夷族部落中杰出的首领尧、舜，由于民族融合而结成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他们处的时代正是由部落联盟制的极盛走向解体的时期（见传说时期）。


大禹像

【汤】

商王朝的建立者，原为商族部落领袖。主癸之子。传说名履，又称成汤、武汤、武王、天乙。殷墟甲骨文称成或唐，亦称大乙。西周甲骨与金文称成唐。据史书记载，商族从始祖契到汤，曾先后迁居八次，至汤定居于亳。夏末自孔甲始，荒淫无度，力量渐衰，至桀时更甚。汤定居于亳，为灭夏之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汤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共同辅助国事，又陆续灭掉邻近的葛国（在今河南宁陵）以及夏的联盟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在今河南范县）、昆吾（在今河南许昌）等部落、方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成为当时的强国，而后作《汤誓》伐夏。汤与桀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桀大败，逃至南巢（在今安徽巢湖），汤放桀而归于亳。此后三千诸侯大会，汤时为诸侯，被推



汤

为天子。三让，诸侯不从，于是汤即天子之位，建立商朝。

汤建国后，鉴于夏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又作《汤诰》，要求其臣属“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否则就要“大罚殛汝”。对那些亡了国的夏民，则仍保留“夏社”，并封其后人。汤注意“以宽治民”，因此在他统治期间，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政权较为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诗·商颂·殷武》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十三年后，汤卒。因其长子太丁早殇，由次子外丙继王位。

【武丁】

商代国王。后世称作高宗。传说名昭，为盘庚弟小乙之子。年幼时，武丁曾在外行役，与“小人”一起劳作，因而较了解“稼穑之艰难”。他即王位后，提拔傅说执政。傅说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加以重用。武丁还任用甘盘为大臣，以此二人“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史记·殷本纪》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由于武丁将商王朝推向极盛，被称作“中兴之王”。

武丁在位期间，不断向西面的舌方、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以及羌方、周族等进行大规模征伐。其中对舌方作战动员的兵力，有时三千，有时甚至达五千；对鬼方用兵三年才攻克。据殷墟卜辞记载，武丁的配偶妇好还亲自率兵征伐羌方。除了“伐羌”之外，卜辞中还有许多“获羌”、“用羌”的记载，即抓获了羌人的俘虏并用作人祭的牺牲，且数字惊人。

武丁向四方连年用兵，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小方国。这些征伐战争，为王朝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死后，由其子祖庚继承王位。

【周文王】

商末西方诸侯之长。姬姓，名昌。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传说公亶父见少子季历和昌贤德，想传位给他们，季历的两兄太伯、仲雍为让位奔于荆蛮。公亶父死，季历继位，后又传位于昌。昌即位后，礼贤下士，得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臣，周国势日强。昌和九侯（或作鬼侯）、鄂侯（或作邘侯）一起，任商朝三公。商王纣杀九



周文王

侯、鄂侯，昌不满，为崇侯虎所谮，被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得释后，昌向商献洛西之地，请除炮烙酷刑，得任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

当时商朝内部矛盾剧增，政事日非，诸侯逐渐归附于周。西伯昌曾使虞（在今山西平陆北）、芮（在今陕西大荔南）两国争讼和解，更提高了威望。他在位时曾多次用兵，先伐大戎获胜，继因密须（在今甘肃灵台西南）侵犯阮（今甘肃泾川东南）、共（今甘肃泾川北）一带，出兵灭密须，使周的西北方得到巩固。随后又向东发展，战胜黎（或作鳌、耆、饥、阢）国，引起商贤臣祖伊的恐慌，告纣，但纣未加警惕。不久，周又伐邘（在今河南沁阳西北），逼近商王畿边境。最后，攻克崇国（在今陕西长安西北），并在其地修建了新都丰。西伯昌自岐邑迁都于丰，后卒于程（今陕西咸阳东北），葬在毕（今陕西咸阳东北），相传在位五十年。

西伯昌晚年，周的势力已非常强盛，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他终身没有称王。其子武王（见周武王）伐商后，始追称他为文王。

古书记载文王在被囚羑里时，因困于忧思，“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近年在岐邑所在周原发现的周人甲骨上，发现有与《易》卦有关的数字。由此看来，文王演卦之说也许有所根据。

【周武王】

周朝第一代王。姬姓，名发，周文王子。文王长子伯邑考为商王纣杀害，立发为太子。文王死后，太子发继位，将周都从丰迁到镐，即宗周（今陕西西安西南）。

武王继承文王事业，用太公、周公、召公、散宜生、太颠、闳夭等为大臣。即位第二年，观兵于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传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要求伐纣，但武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还师归周。随后，纣继续淫乱。大臣微子劝谏无效，不得已出走；比干强谏，被惨杀；箕子也被囚为奴。商朝统治阶层分崩离析。于是，武王起兵，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西方及西南方国部落，渡过盟津，与诸侯相会，并作《太誓》，谴责纣的罪恶。甲子日凌晨，周师与诸侯兵陈师于商郊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又作《牧誓》，号召决战。这时纣也发兵抵抗，进行会战。武王命太公率先犯敌，大军随即冲击，纣军纷纷倒戈叛纣。纣见大势已去，逃登鹿台（一称南单之台）自焚而死。武王进入商都，商朝灭亡（见牧野之战）。

武王灭商后，分其王畿为邶、鄘、卫，设三监（纣子禄父、管叔、蔡叔，一说管叔、蔡叔、霍叔）加以治理。继而派兵征讨商朝各地残余力量。据记载，当时共讨伐了九十九国，有六百五十二国向武王臣服。武王分封了一批宗室功臣，如太公封于齐，周公封于鲁，召公



周武王

封于燕等；还封了一些前王之后，如焦、祝、蓟、陈、杞等。

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武王在返周后选定伊水、洛水一带夏人的故居地，准备建立新的都邑，但不久病逝，未能实现计划。其子成王继位，周公辅佐，终于和召公一起建成了东都成周（今河南洛阳）。

【周宣王】

周朝第十一位王。姬姓，名静（一作靖），厉王之子。厉王时国人起义，大臣召穆公虎将太子静隐藏在自己家中，被国人包围。召公以己子代替太子，使太子得以脱身。共和十四年（前 828），厉王死于流放地彘（今山西霍县），大臣拥立静为王（见共和）。宣王即位后，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顿朝政，使已衰落的周朝一时复兴。

宣王的主要功业，是讨伐侵扰周朝的戎、狄和淮夷。宣王四年（前 824），秦仲为大夫，攻西戎，被杀。宣王又命其子秦庄公兄弟五人伐西戎，得胜。五年，宣王还曾与尹吉甫（金文作兮伯吉父）一起伐猃狁（即西戎）于彭衙（今陕西澄城西北）。尹吉甫在征猃狁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率师直攻至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迫使猃狁向西北退走。

对于侵犯江汉地区的淮夷，宣王命召穆公及卿士南仲、大师皇父、大司马程伯休父等率军讨伐，沿淮水东行，使当地大小方国中最强大的徐国服从，向周朝见。十八年，南仲派驹父、高父前往淮夷地域，各方国都迎接王命，并进献贡物。这一时期，宣王还曾命方叔率师征伐荆蛮（即楚国）。

为了巩固对南土的统治，宣王将其舅申伯徙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宣王二十二年，还继续西周早年的分封，封其弟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

宣王中兴，为时短暂。三十一年，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六年，伐条戎、奔戎，又归失败。三年后，伐申戎，虽取得胜利，同年却在千亩之战中败于姜氏之戎，丧失了调遣的南国之师。由于控制兵力的需要，宣王不得不在太原“料民”，即检数丁壮的数目。同时，周朝的内政也有所松弛。宣王在位共四十六年（前 827 ~ 前 782）。子幽王继位，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西周的覆亡。

【秦始皇】

（前 259 ~ 前 210）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十三岁即王位，三十九岁称帝，在位共三十七年。

战国末年，从诸侯割据向全国统一的趋势已日益明显。当时，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秦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和宦官嫪毐所把持。公元前 238 年，他亲理国事，平定嫪毐的叛乱，免除吕不韦的相职，令其徙处蜀郡；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部署统一全国的战略和策略。自公元前 230 年至前 221 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王政为炫耀自己统一天下的功德，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二世、

三世，以至万世，代代承袭。随后，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措施。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见云梦秦律）。所有的律令都定期向御史核对，不容许错乱和篡改。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仅迁至咸阳者即达十二万户。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十二个金人，陈列在宫殿之前。在经济上，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废止战国时代的各国货币，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堕毁旧东方各国的城郭，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为秦朝的专制主义统治制造神学根据。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



秦始皇嬴政像

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又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牵连儒生、方士四百余人，而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迫使其退往阴山以北；为防其进一步侵扰，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三十六郡增至四十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秦始皇是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每天亲自处理大量的奏章文书，不完成规定的数量，决不休息。但因刚愎自用，以刑杀为威，大臣多怕获罪，不敢指陈

他的过失。在统一六国之后，他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芾（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以秦始皇为首的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所实行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六国贵族的残余势力也乘机进行反秦活动。秦始皇于二十九年东游，途经博浪沙（今河南中牟西北）时遭刺客狙击。三十六年，陨石堕于东郡，有人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于石。次年，秦始皇巡游返至平原津得病。他自知病将不起，于是作书命在上郡监蒙恬军的长子扶苏速归咸阳送葬，并继嗣帝位。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秦始皇病死。中车府令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和丞相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赐扶苏死。秦二世胡亥即位后，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变本加厉，社会矛盾激化，终于在二世三年（前209）激起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见陈胜、吴广起义）。不久，秦朝灭亡。



秦始皇像

【秦二世胡亥】

（公元前230～前207）秦朝第二代皇帝。始皇少子。早年曾从中车府令赵高学习狱法。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帝病死，胡亥在赵高和丞相李斯的扶植下，得立为太子，并承袭帝位，称二世皇帝。

胡亥即位后，下令秦始皇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又将营造骊山墓地下机弩的工匠都活埋在墓中。他怕诸公子和大臣不服，于是与赵高密谋，更为法律，诛杀诸公子、公主二十余人和秦始皇亲信大臣蒙恬、蒙毅等，株连者不可胜数。其后，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胡亥又承袭始皇弊政，继续修治阿房宫等，并征调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遂下调郡县，以此赋敛越重，戍徭无已。二世元年（前209）七月，征发闾左戍边，终于激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反秦斗争随即席卷关东地区。秦二世变本加厉，行督责于群臣，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于是刑者相半于道，死人堆积于市。又听信赵高谗言，诛杀左丞相李斯，迫使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自杀。随即，任赵高为中丞相，听其专擅朝政，致使众叛亲离。二世三年七月，章邯、王离率领的秦军主力投降项羽，刘邦（见汉高祖刘邦）带领的起义军，攻下武关。赵高恐诛罚及身，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合谋，乘二世斋于望夷宫，诈诏发兵围宫，劫令二世自杀。

【汉高祖刘邦】



刘邦

（公元前256～前195）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字季。秦朝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公元前202年称帝，在位七年，谥号高皇帝。刘邦出身农家，早年当过亭长，为人豁达大度，不事生产。后押送刑徒去骊山服役，因途中一些刑徒陆续逃亡，他就释放其余刑徒，自己亡匿芒、砀山中。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反秦。九月，刘邦在沛县主吏萧何和狱掾曹参等人的拥戴下聚众响应，称沛公，不久投奔项梁。当项羽率领起义军和秦军主力决战巨鹿时，刘邦受楚怀王（熊心）的派遣，带领所部向关中挺进。他迫降宛城，攻占武关，于公元前206年十月进抵霸上。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项羽击溃秦军主力后，也引兵入关。听说刘邦已定关中，项羽大怒，进驻鸿门，欲攻刘邦。刘邦因兵力不敌，听从张良的意见，亲至鸿门，卑辞言好，项羽谋士范增策划在宴会上刺杀刘邦未成。之后，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刘邦不甘心亡秦的胜利果实被项羽独占，率军东出，发动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战争前期，刘邦处于劣势，屡屡败北。但他知人善任，注意纳谏，能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终于反败为胜。汉王五年冬，刘邦约韩信、彭越等人率军进围楚军于垓下。项羽率部突围，至乌江自刎。当年二月（按西汉前期以十月为岁首，同年二月在十月之后），刘邦即帝位，初建都洛阳，不久迁至长安，史称西汉。

西汉初年，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民大量流亡，土地荒芜；府库空虚，物资匮乏。刘邦即位后，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减轻田租，什五税一"与民休息"，凡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士兵复员归家，豁免其徭役；继续推行秦代按军功授田宅的制度；战争期间流亡山泽没有登记户籍的人，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抑制其社会地位，并加重其租税。这些措施对于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起了重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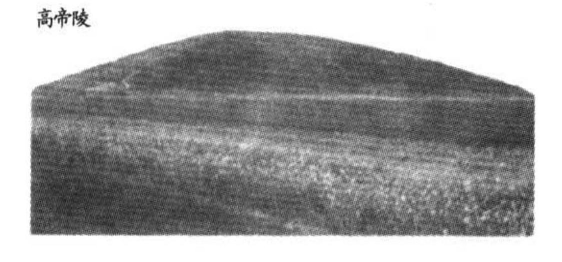
在楚汉战争中，以及战后初期，刘邦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分封韩信、英布、彭越、吴芮等七人为诸侯王。这些异姓诸侯王占据原来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域，拥有很大权力，因此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严重威胁。刘邦借口韩信等人企图谋反，将他们相继翦除，只留下一个势力最弱并可为汉、越之间缓冲的长沙王吴芮。他认为秦朝不分封子弟招致孤立败亡，于是裂土分封九个同姓诸侯王（见吴楚七国之乱），并与诸大臣刑白马为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

之。”他还接受娄敬强干弱枝的建议，把关东六国的强宗大族和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徙到关中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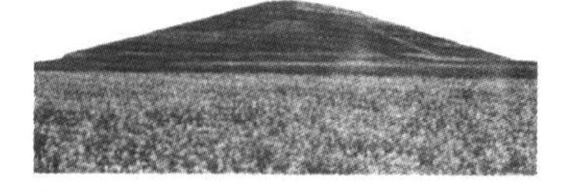
秦朝灭亡以后，漠北的匈奴乘机南下，重新占据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汉初，匈奴不断侵扰汉的边郡，高帝六年（前201），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自率兵前往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三十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陈平计谋，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脱险。此后，刘邦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鄙视儒生。在反秦起义军中，对于戴儒冠来见的人，动辄加以侮辱。称帝以后，陆贾经常向他称道《诗》、《书》，他认为自己是马上得天下，《诗》、《书》没有用处。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刘邦于是命陆贾著书论述秦失天下原因，以资借鉴。他认为早年的约法三章还不足以“御奸”，又命萧何重新制订律令，即“汉律九章”。刘邦晚年宠爱戚姬及其子赵王如意，疏远吕后，几次想废黜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惠帝）而立如意。但因大臣反对，只好作罢。高帝十二年，刘邦因讨伐英布叛乱，被流矢射中，其后病重不起。临终前，对丞相、太尉等重要职务的人选都作了妥善安排。他认为周勃重厚少文，但“安刘氏者必勃也”。后来在平定诸吕的叛乱中，周勃果然起了重大的作用。

高帝陵



吕后陵



汉高祖和吕后合葬之长陵

【汉文帝与汉景帝】

西汉文帝、景帝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汉高祖刘邦中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二十三年。汉景帝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十六年。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



汉文帝

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二十三岁。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见云梦秦律）。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



汉景帝

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动乱隐患；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合谋叛乱（见吴楚七国之乱），与此当有一定的关系。

【汉武帝刘彻】

（公元前156～前87）汉朝第五代皇帝。景帝子，初封胶东王，后立为太子，十六岁即皇帝位。在位五十四年，庙号世宗。

武帝即位时，汉王朝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已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所积累的财富有了显著增长。同时，由于吴楚七国叛乱的平定，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大为削弱（见吴楚七国之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

元朔二年（前127），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推恩令，使诸侯王得以分



汉武帝刘彻像

户邑封子弟，结果从王国里不断分出许多改由郡统辖的小侯国。随后，因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又制订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严惩仕于诸侯王的犯罪官吏，严禁朝臣外附诸侯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借口列侯所献酎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一百零六人。经过这一系列打击，诸侯王、列侯的势力日益衰落。为了加强皇权，武帝于北军置八校尉，又设期门、羽林军，大大加强了中央常备军（见南北军）。他在裁抑丞相职权的同时，不拘一格录用人才，提拔许多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士人做诗中、给事中，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又把京畿七郡之外的郡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派部刺史一人，按六条问事，考察吏治。此外，还任用一批酷吏，打击各地的不法豪强，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武帝即位不久，就着手准备对匈奴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元朔二年，卫青奉命率大军出云中，击败匈奴的楼烦王、白羊王，收复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汉置朔方郡、五原郡，并从内地移民十万到那里定居。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带兵出陇西，过焉耆山，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又越过居延泽，攻至祁连山。匈奴浑邪王率部降汉，汉政府在河西地区先后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又分兵出定襄、代郡，追击匈奴至寘颜山和翰海。匈奴经过汉军这几次打击，被迫远徙漠北，此后再无力进行严重骚扰。为了对匈奴发动攻势，汉武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即月氏）。此行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却沟通了汉与西域各族之间的经常联系。

对闽越、东瓯和南越的少数族政权，武帝利用其内部矛盾，分别加以征服，置于汉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在南越地区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儋耳、珠崖、交趾、日南、九真九郡。与此同时，武帝派唐蒙、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说服夜郎和邛、筰归附汉朝。随后又派兵攻占且兰和滇国，西南夷地区从此也成为汉的郡县。汉武帝还因朝鲜王卫右渠袭杀汉辽东东部都尉，派兵从海陆两道攻人朝鲜。卫右渠被他的大臣所杀。汉政府在卫氏统治区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由于对边境各族用兵，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加以汉政府安置流民和武帝个人的挥霍都需要巨大的开支，使得封建国家长期积累的财富趋于枯竭、财政发生危机。许多富商大贾乘国家之危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武帝除了卖武功爵和募民入粟入奴婢拜官以增加收入外，任用大盐铁商孔仅、东郭咸阳和出身商人家庭的桑弘羊，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经济统制措施，并法定货币官铸，府库岁入因而大大充实，财政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为了打击积货逐利的商贾，又颁布算缗、告缗令。在实行过程中，许多中等以上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因犯令而被告发，以至倾家荡产。

武帝初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淮泗一带连年被灾。元封二年（前109），武帝东巡，发卒数万人治河，并亲临工地督促。竣工后，黄河有几十年不再为患。由于武帝的重视，各地的水利事业也有比较大的发展，关中地区的漕渠、龙首渠、六辅渠和白渠等著名水利工程，对



无字碑

促进农业生产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思想文化领域，武帝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醉心于儒家所鼓吹的改正朔、易服色和封禅、郊祀、巡狩等礼制。中国皇帝有年号，始于武帝。他还接受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立太学、置博士弟子，令州郡举茂材、孝廉，培养和提拔了大批儒生充任各级官吏，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但他真正重用和依靠的大臣，却多是熟习儒术而又深谙刑法的人。他因为幻想长生不死，又尊礼方士，迷信鬼神。为寻求仙人，甚至将公主下嫁方士。信奉黄老学说的汲黯，曾当面揭穿他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听了十分生气，但因汲黯说的是实话，也无可奈何。

武帝晚年，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大群数千人，小群以百数。起义农民到处攻打城邑，夺取兵器，释放囚犯，处死官吏。武帝派酷吏前往镇压，但无济于事。征和二年（前91），又如巫蛊事件引起卫太子的武装叛乱，叛军和政府军在长安城内混战多日，死者数万人，卫太子兵败自杀。次年，远征匈奴的军队又几乎全军覆没。这一系列打击，使年老的武帝深悔自己过去劳民伤财。当桑弘羊建议募民屯田轮台时，他下诏拒绝，表示不再扰劳天下。后元二年（前87）武帝病死。临终前，立八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遗诏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和桑弘羊辅佐少主。刘弗陵即位为昭帝。

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统治期间，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中国开始以一个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

【汉宣帝刘询】

（公元前92～前49）西汉第七代皇帝。本名病已，字次卿。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49年在位，庙号中宗。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出生数月，适逢戾太子巫蛊事件，被关押于郡邸狱中。后遇大赦，得以恢复皇族身份。元平元年（前74）昭帝死后，因无嗣子，霍光等大臣奏请皇太后迎立刘询为帝，是年十八岁。由于他幼遭变故，倚外家史氏和暴室啬夫许广汉抚育成人，长期生活在民间，又性喜游侠，因此对百姓的疾苦和吏治得失有所了解，这对他的施政有直接影响。

宣帝即位之初，委政于霍光，地节二年（前68）霍光死后始亲政事。他着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威权。为了打破霍氏左右朝政的局面，命令群臣奏封事，以疏通下情，并规定丞相以下的百官都要奉职奏事，以考试功能。地节四年，

又借大司马霍禹谋反一事废皇后霍氏，彻底清除了霍氏的势力。

宣帝尊崇儒学，于甘露三年（前51）诏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称制临决。但他任用官吏比较注重名实相副，多数选用那些熟悉法令政策的“文法吏”，并以刑名考核臣下。当时，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吏，如司隶校尉盖宽饶，京兆尹赵广汉等都因罪被处死。太子刘奭以为持刑太深，建议重用儒生。宣帝训斥说，汉家的制度原本是“霸王道杂之”，不能单任德教。同时，为了维护封建法律的正常行使，宣帝设置了治书侍御史，审核廷尉量刑的轻重失当。地节三年增设廷尉平四人，次年又令郡国呈报狱囚被掠笞瘐死的名数，由丞相御史统计上奏皇帝；此外还蠲除了某些苛法。宣帝所采取的另一方面重要措施，就是招抚流亡，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于地节元年诏令假郡国贫民田，三年又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乡里者也“假公田，贷种、食”。此外，还屡次蠲免和削减田租、算赋、口钱以及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减天下盐价。设置常平仓以省边境转漕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元康年间由于连年丰收，谷价降至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宣帝时，西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族的关系大体上相安无事。神爵元年（前61）赵充国平息羌患，挫败了羌豪借助匈奴势力企图隔绝汉朝与西域往来通道的计划。其后，汉政府设金城属国，以安置降羌。三年，郑吉于袭破车师、迎降匈奴日逐王后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都护，废止了匈奴为奴役西域而设置的僮仆都尉，西汉王朝的政令自此颁行西域（见西域都护）。甘露二年，因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呼韩邪单于款塞称臣，原来畏服匈奴的乌孙及其西至安息诸国，也转而尊汉。以此边境晏然，徭役省减，为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宣帝统治期间“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史称中兴。但是由于西汉封建王朝积弊已深，宣帝着力推行的招抚流亡，安定民生的措施，并不足以从根本上限制贵族、地主豪富对土地的兼并，所以，随之而来的仍然是农民的破产和流亡。他在位时，胶东、渤海等地农民的反抗斗争已经发展到攻打官府劫掠列侯的程度，连宣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民多贫困、“盗贼”不止。元帝即位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使西汉王朝一蹶不振。

【汉光武帝刘秀】

（公元前6～公元57）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庙号世祖，谥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父钦曾任南顿令。

王莽末年，赤眉、绿林起义先后爆发，新莽政权呈现败亡之兆。宛人李通宣扬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地皇三年（公元22），刘秀与其兄刘縯抱着恢复刘姓统治的目的，起事于舂陵（今湖北枣阳南），发动宗族、宾客，联络附近各县的地主豪强，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武装，称为“舂陵军”。舂陵军初战不利，不久与绿林军下江兵约定“合纵”。次年二月更

始政权建立后，刘縯任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地皇四年六月，王莽命王邑、王寻率领大军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突围调集援兵，与以王凤、王常为首的留守城内的义军合击，重创莽军。昆阳之战对于绿林军入关和新莽政权的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大功，刘縯又夺取了宛城，他们的势力逐渐与农民军分庭抗礼。于是新市、平林的农民军将领劝更始帝刘玄杀掉刘縯。刘秀闻讯赶赴宛城谢罪，以此取得了农民军的信任，被封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同年九月，新莽政权覆灭。更始帝北都洛阳后，刘秀又行大司马事。不久，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次年五月诛灭称帝邯郸的王郎，封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此后，刘秀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起义军，扩充了实力，因此，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不久，刘秀派遣吴汉等袭杀更始政权的尚书谢躬，与农民军彻底决裂。建武元年（公元25）六月，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于鄗（今河北柏乡北），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汉光武帝

东汉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刘秀打败了赤眉农民军，控制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随即于建武五年先后削平了盘踞渔阳郡的彭宠、南郡的秦丰和齐地的张步；次年又剪除了盘踞江、淮的李宪、董宪、庞萌，统一了关东，后以笼络手段使河西的窦融归附。建武九年和十二年又先后平定和消灭了天水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割据安定的卢芳也于建武十六年归附，不久逃往匈奴。这样，经过十二年时间，刘秀终于削平群雄，完成了统一事业。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他鉴于西汉末年“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的教训，于是“退功臣而进文吏”，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所以当时宗室诸王和外家亲属都比较遵奉法纪，无结党营私之名。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由尚书典守机密，出纳王命，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建武六年，刘秀又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全国共并省四百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这些措施强化了皇帝的权力，达到了“总揽权纲”的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封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

与此同时，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

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如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并且罢郡国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试，一度废除了更役制度。次年又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遣散还乡，发弛刑徒屯田边境以代替征调的戍卒等等。据史书记载，光武帝统治后期“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这多少反映了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特别是自建武二年至四年，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规定民有被卖为奴婢而愿意归随父母的听其自便，奴婢主人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对于没有释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给予一定的人身保障，规定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炙伤奴婢的要依法治罪，又废除了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对于广大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帝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两千一百多万。



光武帝涉水图

光武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但是，东汉政权是建立在世家豪族的基础上的。刘秀在即位之后，就宣称要以



汉光武帝陵

“柔道”治天下。所谓“柔道”，实则就是扶植和保护世家豪族的利益。建武十五年，刘秀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针对当时“田宅逾制”和隐瞒土地户口的严重现象，下令全国检核土地户口。郡县守、令不敢触动贵戚官僚和世家豪族，反而在清查过程中“多为诈巧，不务实核”，“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结果，激起各地农民的反抗，郡国的豪强大姓也乘机作乱。对此，刘秀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对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是进行分化和镇压，对于大姓兵长，则在处死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等十几名郡守之后，即下令停止度田，向豪强地主让步。光武帝在其统治末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与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思想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制。

光武帝刘秀死于中元二年。

【汉明帝刘庄】

（公元27～75）东汉第二代皇帝。字严，庙号显宗。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四子，母为阴皇后。建武十九年（公元43）立为皇太子，中元二年（公元57）即皇帝位。

东汉光武帝统治时期，政治上相对安定，社会经济也得到一定发展。明帝即位后，一切遵奉光武制度，使这一局面得以继续。因此，明帝以及随后的章帝在位期间，史称“明章之治”。

明帝热心提倡儒学，命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等习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学”，设置“五经师”以授其业。与此同时，他也很注重刑名文法，为政苛察，总揽权柄，权不借下。他严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对贵戚功臣也多方防范。如尚书阎章因二妹为贵人，不得迁任要职，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也不允许，仅赐钱千万；功臣窦融子孙骄纵不法，永平五年（公元62）下诏诸窦为郎吏者皆携家属归故郡，后窦融长子穆，孙勋、宣皆因罪下狱，被处死。永平十四年楚王英谋反事发，被株连以至死、徙和系狱的京师贵戚和诸侯更达数千之众。

明帝在位期间，基本上消除了因王莽虐政而引起的周边少数族侵扰的威胁，使汉族和少数族的友好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永平元年，辽东太守祭彤使归顺汉朝的鲜卑首领偏何击破赤山乌桓，西自武威，东尽玄菟的塞外诸族皆来内附，边境屯兵得以省罢。永平八年，明帝又设置度辽营，并命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以监护南匈奴。十六年，窦固、耿忠等分兵四路征伐北匈奴。汉军出酒泉塞，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明帝诏置宜禾都尉，并留吏士屯田伊吾卢城。其后，窦固又以班超为假司马与从事郭恂出使西域，由是西域诸国皆遣子入侍。自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至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六十五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次年，窦固、耿秉定车师后，又奏请复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永平十二年，西南夷中的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万余户内附。至十六年，自汶山以西白狼、槃木等百余国也皆举种称臣奉贡。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

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

明帝之世，吏治比较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永平九年至十二年，由于“岁比登稔”，出现了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繁荣局面。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治汴渠完工，又消除了自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汴渠东侵之害。因此，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光武帝末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两千一百多万，至明帝末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激增至三千四百多万。永平十八年，明帝病死。

【魏武帝曹操】

（155～220）东汉末权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父曹嵩，宦官曹腾养子，虽官至太尉，仍为士族所鄙。二十岁以孝廉为郎，向以骑都尉，参与镇压颍川黄巾起义军，被命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中平六年（189），因董卓专权，逃离洛阳，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散家财，聚兵五千人，与袁绍为首的关东州郡军一起讨伐董卓。当时诸军畏卓，莫敢先进，唯操出战，董卓西逃，袁绍表操为东郡太守。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起义军攻入兖州，杀刺史刘岱，州吏拥曹操领兖州牧，率兵打败黄巾军三十余万，收其精锐为部下，号“青州兵”。在随后几年的兼并战争中，表现出杰出才能：打败袁术，攻破陶谦，平定张邈，消灭吕布，逐渐壮大成一支与袁绍相对抗的力量。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打败袁绍十万大军，乘胜追击，陆续攻占原属袁绍的冀、青、幽、并四州。十二年，又消灭曾收留袁绍二子、以辽西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为根据地的少数族乌桓势力，基本统一北方。

曹操根据毛蚧、荀彧谋划，于建安元年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作为傀儡，并迁都于许。从此，他“奉天子以令不臣”，政治上主动，号召力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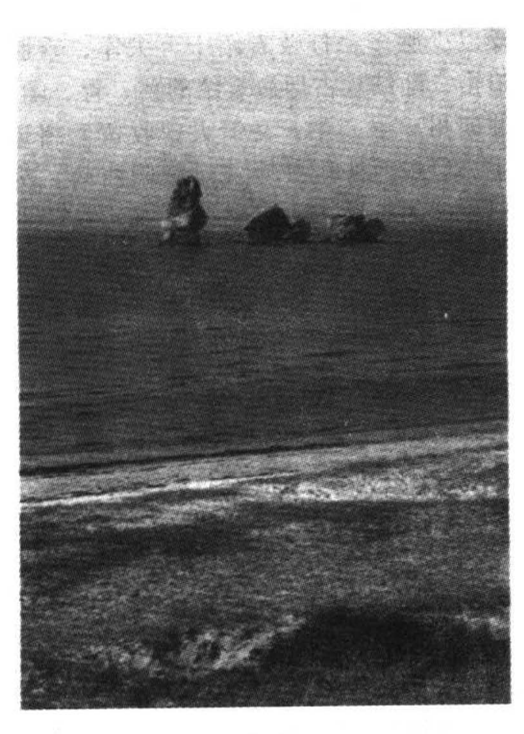
他采纳枣祇建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许多州郡，史称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从物质供应上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见曹魏屯田）。

他精通《孙子兵法》，是今存为此书作注的第一人，著有兵书十万余言。善于运用古代军事学说和战略战术，“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他多次下令求贤，要求“唯才是举”。与东汉重视德行、门第不同，只



魏武帝曹操像



碣石

要才干杰出，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出身微贱，不懂儒家经术，不仁不孝，名声卑污，他都考虑予以重用，甚至拔为大将、牧守。豪强大族率众投奔者，也极力笼络，崇以官职。因此，他又不完全否定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部下对他如不竭诚效忠，一经发觉，立即清除，毫不容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手下人才济济。

曹操“揽申、商之法术”，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强调“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在此思想指导下，他残酷镇压农民反抗。同时对豪强大族的不法行为也往往给予严厉打击。平定冀州后立即下令，加重对豪强兼并的惩罚。

建安十三年，曹操进位丞相，率军南征。荆州刘表适病卒，子琮归降。操进军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与孙权、刘备联军会战于赤壁。其时南北统一条件远未成熟。北方军队长途跋涉，不服水土，兵多疾病；荆州降军心有顾虑，未肯力战。加上曹操骄傲轻敌，在联军火攻之下大败而归（见赤壁之战）。他从此转向巩固北方的统治，镇压朝廷中异己力量包括皇后伏氏的反抗，并继续消灭北方残余割据力量。建安十六年讨平关陇地区马超、韩遂；四年以后又征降汉中的张鲁，为代汉作了充分准备。在此期间，曾数次进攻孙权、刘备，无功而还。

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公、建魏国，都于邺。魏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以下百官。三年后曹操进爵魏王，用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他名义上还为汉臣，实际上已是皇帝，子曹丕代汉，追尊魏武帝。

曹操诗歌造诣极高，所作《薤露行》、《蒿里行》、《步出夏门行》等，皆悲凉雄浑，气势磅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句传诵千古。在他奖掖、提携下，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文人，出现了著名的建安文学。

对曹操的评价历史上自来是毁誉参半。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史学界围绕曹操的功过及是否应为他翻案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集中在：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功过；统一北方的评价；他代表的是哪一社会阶层的利益。有人认为，曹操的形象受到后代学者的歪曲，而其历史功绩远远超过过失，应为其翻案。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倾向于认为曹操是一个在历史上作出过多方面贡献的杰出人物。

【魏文帝曹丕】

（187～226）三国时期魏国君主、文学家。字子桓。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魏武帝曹操次子。东汉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太子。延康元年（220），曹操死，继位为丞相、魏王。当年十月，迫汉帝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魏，改元黄初，将都城由许昌迁至洛阳。在位七年。曹丕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与西汉用宦者充任中书不同。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在他统治之初，三公希预朝政。废除东汉以来灾异归过三公的旧习。鉴于东汉母后干政和外戚之祸，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控制藩王极严，子弟皆“不闻邦国之政”；所封王国，土地荒瘠，人口寡少，军事力量极弱，并专设官吏对他们进行监督，目的是防帝位争夺。为防统治秩序混乱，下诏敢有沿袭东汉旧习，子弟为父兄私复仇者，皆族诛；还规定除谋反大逆之外，敢行诬告，“以其罪罪之”。他又建立并推行九品中正制，力图把用人权从大族名士手中收归朝廷。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魏国统治。他曾三次亲自统军伐吴，因条件不成熟，皆无功而还。

曹丕爱好文学，并有相当的成就。写下《燕歌行》等中国较早的优秀七言诗。所著《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昭烈帝刘备】

（161～223）三国时期汉国（习称蜀国）开国君主。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朝皇室疏宗。早年丧父，家孤贫，与母以贩履织席为业，好交结豪侠。汉灵帝末年，黄巾起义军起，他聚徒众，从官府进行镇压有功，除安喜尉。因与郡督邮冲突，弃官亡命。后投靠中郎将公孙瓒，为别部司马，数有战功，领平原国相。徐州牧陶谦为曹操所攻，备率兵相救，陶谦死，刘备据其遗命，代为徐州牧。与盘踞寿春的袁术相拒，为另一军阀吕布所乘，败归曹操。操荐为豫州牧，进位左将军，很为曹操看重。因与汉献帝舅董承谋杀操事泄，逃至徐州，杀刺史车胄，统众数万人。建安五年（200），被曹操击破，弃妻与子，往依袁绍，极受尊重。官渡之战后南奔刘表，刘表始以上宾礼待之，使屯新野，后因刘备声望日高，荆州豪杰归者日多，于是对他有所防备。曹操北征乌桓，刘备建议袭取曹操根据地许都（今河南许昌东）。刘表未采纳。十三年，曹操南伐，刘表卒，子刘琮降。刘备逃至夏口，采纳诸葛亮之议，与孙权联合，大败曹操于赤壁（见赤壁之战）。又南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据有荆州之地。十六年，率军数万人应益州牧刘璋之请，西入蜀。原为共同制御张鲁，抵抗曹操，后两人失和，刘备攻下成都，推翻刘璋统治，夺得益州。二十四年，击斩曹操大将夏侯渊，曹操率军亲征，无功而还。刘备遂占领汉中，为汉中王。同年，关羽被杀，荆州为孙权夺去。蜀国规模自此基本确定。



刘备

刘备知人善任，有名将关羽、张飞为左右手；自得诸葛亮，信任专一，言听计从，措施得宜，故能在地狭民少的蜀地，开创与魏、吴鼎立局面。221 年刘备称帝，国号汉，都成都。当年，兴师伐吴，欲报杀关羽、夺荆州之仇。孙权遣使求和，不许。次年，两军决战于夷陵（见夷陵之战）。因战略错误，且相持七八月，蜀军疲惫，士气低落，为吴国大将陆逊所败，损失惨重。刘备逃归白帝城，第二年病重，托孤于丞相诸葛亮，不久，卒于永安宫，谥昭烈帝。

【孙坚】

（155～191）东汉末著名将领。吴大帝孙权之父。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少为吴郡司马，参与平定会稽地区以许昌为首的暴动。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孙坚率千余人，追随右中郎将朱儁至河南镇压，任佐军司马。汝、颍黄巾军退守宛城（今河南南阳），汉军合围，孙坚率众先登，城被攻破。后升议郎、长沙太守，又镇压当地区星等起义。积军功封乌程侯。董卓专权，孙坚兼并荆州刺史和南阳太守两支势力，与袁术合军。术推荐孙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屯于鲁阳（今河南鲁山）。坚率军讨伐董卓，善于用人，多次取胜，为卓所惧。董卓欲与孙坚和亲，并许任孙坚子弟为刺史、牧守等，孙坚拒绝。初平元年（190），董卓胁迫汉献帝仓猝徙都长安，并焚烧洛阳。次年，孙坚于洛阳城外战败董卓，攻克洛阳，击走吕布，得汉帝所遗传国玺。当年奉袁术命，率军征荆州刘表，为表部将黄祖兵士射死。

【孙策】

（175～200）东汉末军阀，三国时期吴国的奠基者。吴大帝孙权之兄。字伯符，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少居江淮间，结交士大夫，颇有声誉。父孙坚死，兴平元年（194），至寿春从袁术，不得志。二年，乃托辞率其父所遗千余兵南渡江，进攻扬州刺史刘繇、会稽太守王朗诸部。孙策善于用人，军纪严明，沿途无犯，得到周瑜及其他豪族支持，所向皆破。先后攻占吴（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等郡。建安二年（197），袁术称帝，策与之决裂并接受汉朝参与讨伐袁术的诏令，以明汉将军领会稽太守。三年，拜讨逆将军，封吴侯。四年，袁术死。孙策率军攻庐江太守刘勋，得袁术、刘勋残部两万余人，领庐江郡（今安徽庐江西南），得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于是统一江南，为孙氏割据江东奠定了基础。此时北方袁绍势力正强，曹操通过子女联姻，辟除和察举策诸弟，对他极力拉拢。正当孙策欲渡江北进，继续扩大势力时，被仇家刺死，临终前嘱孙权继承其业。

【吴大帝孙权】

（182～252）三国时期吴国开国君主、政治家。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黄龙元年（229）至神凤元年（252）在位，谥大皇帝。父孙坚。孙权少察孝廉，举茂才，行奉义校尉。跟随其兄孙策征讨江东。汉建安五年（200）孙策死，继统江东地区，得到张昭、周瑜、程普等人辅助，他广揽人才，鲁肃、诸葛瑾等为其宾客。建安十三年，曹操夺取荆州，沿江而下，孙权摈弃群臣归降之议，任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各领万人，联合刘备，组成孙刘联军，大破曹军于赤壁。孙权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后，依靠长江天险，多次击退北方曹魏进攻。曹丕代汉建魏，孙权表面臣服称藩，争取时间巩固政权基础。魏黄初二年（221），接受魏封号，称吴王于武昌（今湖北鄂州）。黄龙元年称帝，建都武昌，后迁建业（今江苏南京），先后统治江东五十多年。通过消灭各支割据势力，平定、降服少数族山越，所辖由江东扩展到相当于今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的广大地区。汉末以来，这些地区处于分裂状态，自此重归统一，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

为维护吴国鼎立之业，孙权接受鲁肃建议，采取联合蜀汉，共御曹魏的基本方针。其后因夺取荆州，杀死关羽，双方失和，刘备率军复仇，爆发夷陵之战，大败刘备。但由于抗击曹魏的需要，吴蜀同盟重新恢复。在长时期内，他不为谣传所动，坚信蜀汉不致背盟。吴、蜀的长期和好，牵制了曹魏的进攻。

孙权信用渡江南来的豪族势力，同时对确有才干而出身贫贱的寒族也不拘一格，注意拔擢。后来，又根据南方特点，逐渐和江东，特别是吴郡的豪族地主紧密结合，委以高官要职，极力笼络。这些豪族地主处于太湖流域经济发达地区，势力强大，根深蒂固，看到孙权能保护自己利益，也对他委诚效忠，全力支持。

孙权通过保护私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来发展经济，征伐山越掠夺来的一部分“生口”赐给世家豪族大地主和功臣当作部曲、佃客。允许将世袭领兵，其佃客免除徭役、兵役。称为复客制度。在劳动力紧张的太湖流域，这是与豪族地主妥协，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孙权大权独揽，用法严峻。为防止影响政事，禁止地方长官擅去官奔丧，违者处死。晚年，吴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太子和与鲁王霸相互攻讦，朝臣也分为两派，酝酿着统治的严重危机。



孙权像

他断然废太子和，杀鲁王霸，用严刑峻法处置一批朝臣，另立子亮为太子，矛盾得以缓和。

【晋武帝司马炎】

（236～290）晋朝的开国皇帝。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司马昭长子。在位二十五年。曹魏末年，祖司马懿、伯司马师、父司马昭相继控制朝政。魏咸熙二年（265）司马炎为相国、晋王，同年十二月代魏称帝，建立晋朝。太康元年（280）灭吴，统一全国。在位期间，惩曹魏无屏藩以致孤立而亡，封同姓诸王，以郡为国，置军士，分润租调而不治吏民，希望互相维系，拱卫中央。灭吴后，裁减州郡士兵。但诸王拥有军队，有的又出镇州郡，总绾军民，以致司马炎死后，形成割据局面，爆发八王之乱，而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乘机起兵，全国重又分裂。

西晋统一全国后，司马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屡次责令郡县官劝课农桑，并严禁私募佃客。又招募原吴、蜀地区人民北来，充实北方。废屯田制，使屯田民成为州郡编户。太康元年，颁行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见占田课田制、户调）。三年，西晋户数上升到三百七十余万，比初行占田制时增加了二分之一。太康年间（280～289）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司马炎鉴于曹魏末期为政严刻，风俗颓废，生活豪奢，乃“矫以仁俭”，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免逋债宿负，诏郡国守相巡行属县，并能容纳直言。还重视法律，亲自向百姓讲解贾充等人所上刊修律令，并亲身听讼录囚。但灭吴后，逐渐怠惰政事，荒淫无度，掖庭将近万人。统治者贪暴奢侈，上行下效，司马炎去世不久，政局即已不可收拾。

【晋元帝司马睿】

（276～322）东晋的开国皇帝。字景文。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司马懿曾孙，司马觐之子。在位六年。十五岁嗣琅邪王位。八王之乱后期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越以其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汉主刘渊举兵后，中原局势恶化，司马睿用王导之谋，请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朝廷遂于永嘉元年（307）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九月南下。他在王导、王敦辅助下，优礼当地士族，压平叛乱，惨淡经营，始得在江南立足。建兴四年（316）汉刘曜陷长安，俘愍帝。西晋亡。次年三月，司马睿即晋王位，始建国，改元建武。他广辟掾属以为辅佐，有“百六掾”之称。六月，孤悬在北方的晋地方长官刘琨、段匹磾、刘翰等汉、胡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司马睿于



司马睿

318年即皇帝位，改元太兴，据有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珠江流域地区，史称东晋。东晋初年政治上由王导主持，军事上依靠王敦，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司马睿对大权旁落不满，引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为心腹，企图排斥王氏权势。素有野心的王敦于永昌元年（322）以诛刘隗为名，在武昌起兵，直扑石头城（即建康）。王导为保全王氏家族利益，暗助王敦。王敦攻入建康，杀戴渊等，刘隗投奔石勒。同年闰十一月，晋元帝忧愤病逝。

【张轨】

（255～314）西晋凉州刺史。十六国时期前凉建立者张寔之父。字士彦。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家世儒学，少年时受张华器重，在洛阳任散骑常侍。永宁元年（301）出任凉州刺史，在州兴办学校，安抚人民，击败入侵的鲜卑族。西晋以来河西荒残，缣布代替钱币，人民不便。张轨时经济恢复，又用五铢钱。从此钱币流通，人赖其利。西晋末年，中原大乱以后，凉州比较安定，流移人士纷纷来此避难。他效忠西晋皇室司马氏，几次派兵到洛阳，意在保卫京都，匡扶王室。愍帝入关后，又派步骑两万到长安。张轨的后裔保据河西六十余年，俨然独立，但始终尊奉东晋王朝，几次通过成汉、苻秦控制地区，与江东联系。376年苻坚灭前凉，前凉主张天锡被俘。肥水之战苻坚败后，张天锡乘机渡江回到东晋，为十六国君主亡国后惟一投附江南者。张氏政权在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给以后河西地方若干以凉为名的政权奠定了基础。

【李雄】

（274～334）十六国时期成国建立者。字仲儁。巴賨（见賨）豪强领袖李特第三子。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人，后迁略阳（今甘肃天水东北）。李特率流民起义，以雄为前将军。303年，李特被益州刺史罗尚击杀。继任者李流旋亦病故，雄以大都督名义继续领导流民作战，驱逐罗尚，攻占成都，304年称成都王，建元建兴。以范长生为谋主。306年即皇帝位，国号大成。在位三十年。李氏封建政权在六郡流民反晋斗争中建立，史称“为国无威仪，官无禄秩，班序不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但李雄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并兴文教，立学官，简行约法，政治较为清明。注意发展生产，赋役较轻，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者减半；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多次遣使东晋朝贡，遣将开拓疆域。死后由兄荡之子班继位，为其子李期所杀，而李期复为李特弟骧之子李寿所杀，改国号为汉，政治紊乱，于347年被东晋桓温所灭（见秦雍六郡流民起义、成汉）。

【刘渊】

（？～310）十六国时期汉国建立者。字元海。新兴（今山西忻县）匈奴族人。在位七年。谥光文皇帝，庙号高祖。匈奴族酋长，归附汉朝后，自谓是汉朝外孙，故冒姓刘。祖父於扶罗，为南匈奴单于；父豹，为左贤王。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渊少读

诗书，尤好《左传》及《孙子兵法》，汉化较深。魏咸熙时作为任子留在洛阳。父卒，继任左部帅，晋太康十年（289）任北部都尉，后为五部大都督，颇能团结匈奴五部部众。八王之乱时，他说动成都王颖命他返回并州（今山西），调发五部之众协助成都王参加内战，被任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他到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利用北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起兵反晋，称大单于，不久领众五万，建庭离石。304年十月于左国城称汉王，建国号曰汉，任刘宜为丞相。刘渊屡次击败晋军进讨，但败于并州刺史刘琨。后依侍中刘殷、王育之谋，命将四出，进据河东，攻克蒲坂（今山西夏县西南）、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王弥、石勒、汲桑、鲜卑陆逐延相继率部归降，声势大振。308年即皇帝位，建都平阳。两年后病死，刘和嗣位。

【刘聪】

（？～318）十六国时期汉国皇帝。一名载，字玄明。匈奴族。新兴（今山西忻县）人。在位九年。谥昭武皇帝，庙号烈宗。刘渊第四子，少好学，工书法，能诗文，善武事。累官至右积弩将军，参前锋战事。刘渊为北单于，以聪为右贤王。310年，刘渊病笃，以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掌握军政大权。刘渊死后，他杀兄刘和夺取皇位，改元光兴。立弟义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又以子粲为河内王、任使持节、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刘聪遣族弟刘曜、大将王弥率众四万出洛阳，周旋于梁、陈、汝、颍之间，攻占堡壁。311年石勒于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全歼西晋军。同年夏，派刘曜、王弥克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因此时正值西晋永嘉五年（311），史称永嘉之乱。316年，刘聪又遣刘曜攻破长安，俘晋愍帝司马邺，西晋灭亡，中原地区均归汉统治。刘聪沉湎酒色，游猎无度，广建宫殿，生产荒废，人民逃离，因连年战争所统属的各将领形成割据势力。刘聪时汉所统辖地区实际上东止于太行山，南未越过嵩山、洛水，西到陇坻，北不出汾水、晋阳。在其直接控制地区实行胡、汉分治政策（见汉）。以子刘粲为相国，总理军国大事。318年病卒，太子粲嗣位，不久即为匈奴贵族靳準所杀。刘曜自长安赴之，遣兵汉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族灭靳氏，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

（？～328）十六国时期前赵皇帝。字永明。匈奴族。新兴（今山西忻县）人。刘渊族子。318年自立为皇帝，次年，改国号汉为赵，定都长安，史称前赵。在位十一年。刘曜勇武过人，早年深受汉文化影响，喜谈兵书，曾被刘聪誉为刘秀（即汉光武帝刘秀）、曹操（即魏武帝曹操）一流人物。刘聪在位时，任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镇长安。318年，匈奴贵族靳準杀刚继位的刘粲，自立为汉天王。刘曜闻变，自长安赴之，遣兵至平阳族灭靳氏，自立为皇帝。即位后，任用汉人士族，设立太学、小学。汉族大臣对他残暴奢侈的规劝，有时也能听从、改正。关中、陇右各少数

族杂居，刘曜继承刘渊以来统治胡汉的双重体制，设单于台于渭城（今陕西咸阳），任命其子刘胤为大单于，置左右贤王以下官位以胡、羯、氐、羌、鲜卑各族酋豪充任。刘曜沉湎酒色，末年尤甚。在他统治期间，各族人民多次起义反抗，参加者一次多达氐、羌十余万落或羌、氐、巴、羯三十余万人。他在镇压起义以后，或扣留质任，或大量移民于长安，多时一次达二十余万口。前赵国境西有前凉张氏，南有仇池杨氏和成汉李氏，北、东两面是后赵石氏。张氏兵力不强，保境自守，称藩于刘曜，李氏远据巴蜀，刘曜力所不及，也不能对关中构成威胁。仇池地方虽小，而易守难攻。虽被刘曜一度占领，终为杨氏收复。刘曜扩张势力，主要东向与石氏激烈争斗，互有胜负。328 年，刘曜攻打洛阳，在大败石虎之后，骄傲轻敌，饮酒沉醉，不能指挥战斗，为石勒所俘虏，不久被杀。

【石勒】

（274～333）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字世龙，原名匐勒。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人，羯族。319 年称赵王。西晋羯族的来源，一说是服属于匈奴随之入塞的羌渠部后裔；一说来自中亚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羯人高鼻深目多须，信奉祆教。石勒父祖都是羯人部落的小帅。

西晋时杂居内地的各少数族往往受汉族地主豪强的奴役压迫。石勒青年时期曾从事耕田、沤麻等农业活动，又在荒年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枷押山东出卖。被主人放免后，因善于相马，结识马牧帅汲桑。305 年，他和汲桑率领牧人，乘苑马数百骑，投奔起兵于赵魏的公师藩。公师藩失败，汲桑释放郡县系囚，招聚山泽亡命，自号大将军。石勒原有一小队胡族为主的部下，号称“十八骑”。这时胡汉各族归附他的日益增多。汲桑以石勒为前锋，攻下邺城，杀司马腾。汲桑失败，307 年，石勒率部投汉主刘渊。刘渊、刘聪向山东、河北扩张，主要依靠石勒兵力。南阳一带的雍州流民起兵反晋，几支义军互有矛盾，其中王如联合石勒，要他攻打占据宛城的义军。310 年，石勒攻取宛城后，乘势南下襄阳，一度想保据江汉之间，但军粮不济，兵士又大半死于疫病，他便听从张宾建议，撤回北方。

311 年，晋东海王越率领包括“名将劲卒”的二十余万人在自洛阳进攻石勒的途中病死，大军东归，石勒追击，及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全歼晋军。被司马越调集在军中的朝臣贵族多人被杀，其中有认为儿童时代的石勒已经“声视有奇志”而拟加害于他的王衍。同年，石勒会合刘曜、王弥，攻破洛阳，怀帝被俘。他又遣军攻豫州诸郡，游骑临江而还。遂屯军葛陂（在今河南新蔡），修造壁垒，种田造船，筹划进攻东晋。312 年春，东晋在寿春聚集大军，严加戒备。当时大雨三月不止，石勒军中饥疫，死者达三分之二。张宾建议放弃南下计划，并指出，石勒转战南北，“流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他认为“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选择其一，广聚粮储，则“王业可图”。石勒依张宾之策，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作为据点，逐步统一黄河以北大

部地区。

石勒先结好于晋并州刺史刘琨，消灭幽州刺史王浚，然后逼走刘琨，消灭幽州的鲜卑段氏，攻下冀州郡县；击败各地抵抗胡族统治的流民队伍，于是到321年，幽、并、冀三州皆归石氏。323年破曹嶷，取青州。328年在洛阳大败前赵军，俘刘曜，并有关陇。中原地区，除辽东慕容氏、河西张氏外，都统一于石氏。330年，改称赵天王，行皇帝事，同年又改称皇帝。当年，赵军浮海攻东晋东南诸县，直至娄县（今江苏昆山东北）、武进（今江苏常州）一带。

石勒出身低微，早年饱经忧患。他富于军事才能，政治上也颇有识度，自比在刘邦（即汉高祖刘邦）、刘秀（即汉光武帝刘秀）之间，鄙视曹操（即魏武帝曹操）、司马懿欺负孤儿寡妇以取天下。儒生读《汉书》给他听，读到郦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人时，石勒大惊，说这样何以能统一天下。当听到张良劝阻，才连忙说“赖有此耳”。石勒胸襟开阔，不念旧恶。少数族统治者忌讳胡字，法令甚严，但他并不对无意中触犯的人加以惩罚，还依靠汉族士人巩固其统治。主要参谋张宾就是汉人。他攻下冀州郡县堡壁后，搜罗“衣冠人物”，组成“君子营”。后赵建国后，“典定士族”，区分士庶。选拔人才的办法，大致也是沿用九品中正制。石勒往往从谏如流，对于臣下劝阻的事，有时虽不同意，也暂且停办，说是为了“成吾直臣之气也”。

石勒沿袭刘渊胡、汉分治办法，称赵王时又自号大单于，“镇抚百蛮”，任石虎为单于元辅。称赵天王后，命其子石宏为大单于。石勒禁止胡人侮慢汉人士族。兄死妻嫂是很多胡族的普遍风习，他也加以禁止，并不许在丧婚娶，以适应汉人习惯。职官大体依照晋制而有增设，如置专司胡人词讼的门臣祭酒，管理胡人出入的门生主书。攻占幽冀后，核实州郡户口，每户所课租调比西晋王朝对农民的剥削有所轻减。立国后，为节省粮食，禁止酿酒。还计划推行钱币，代替布帛交易，但未能实现。石勒注意教育，在襄国和地方设立学校。建国前，曾令采择晋代律令要点，作为暂行制度，后改用正式律令。所设官职有律学祭酒，反映对法律的重视。他虽亦残酷好杀，但所采取的上述各项措施，却是难能可贵的。

石勒病死前，遗嘱不要厚葬，告诫石弘从司马氏家族内讧中吸取教训，劝石虎学习周公、霍光辅佐幼主的先例，以免被人议论，说明他预感到死后会发生争权的动乱。

【石虎】

（295～349）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字季龙。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人，羯族。石勒从子。幼时由石勒的父亲收养，因而也被认为是石勒之弟。性残暴而骁勇，善用兵，跟随石勒屡立战功。319年，石勒称赵王、大单于，以虎为单于元辅。石勒称帝，授太尉、守尚书令，进封为王。334年，废石勒子石弘自立，称居摄赵天王，次年迁都于邺。337年改称大赵天王，349年称帝。石勒统一了的北方，政治相当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石虎利用这个条件，穷奢极侈，大兴土木，滥夺民女，和他的几个儿子一起，残酷地压迫剥削胡、汉各

族人民。在对外方面，他与辽东的前燕慕容氏、河西的前凉张氏多次作战，互有胜负。对于东晋，几次聚集舟师，大造船舰，准备浮海和渡江进攻。甚至还想灭成汉以夺取巴蜀。但石虎的暴虐统治和残酷压榨，使他征服南北敌国的野心不可能实现，境内起义不断，特别是流民乞活部队和梁犊领导的起义军，给予石虎统治巨大打击。

石虎太子石邃谋害石虎，未遂被杀，虎又立石宣为太子。石宣与弟韬争宠，杀石韬，欲谋杀石虎。事情败露，石虎杀石宣，立石世为太子。349 年石虎死，诸子争立，大臣火并。石世立三十三日，为兄石遵所杀；遵立一百八十三日，为兄石鉴所杀；鉴立一百零三日，为冉闵所杀，后赵亡。在襄国称帝的石祇，也被冉闵消灭。

【慕容廆】

(269～333) 晋朝时辽东割据政权首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鲜卑族人，慕容氏属鲜卑中部，又称白部鲜卑。廆在位约四十九年。三国时，其曾祖莫护跋率部居于辽西，父涉归时迁居于辽东北。西晋初，廆继立，逐渐发展，每岁侵扰晋辽西、昌黎边境，后归顺晋朝，为鲜卑都督。289 年迁于徙河（今辽宁锦州），294 年迁于大棘城（即棘城），自称鲜卑大单于。后教民农桑，法制与西晋相同。晋愍帝遣使任命他为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西晋末年，中原士庶或南下江东，或西投凉州张氏，一部分则徙居辽东。如河东裴嶷、右北平阳耽、广平游邃、渤海高瞻等世族多率宗族、乡里投庇。慕容廆尽力招徕，立郡以统流人，辽水流域人口激增，土地开拓，农业生产提高。东晋时，慕容廆以龙骧将军、大单于建立割据政权，委政于裴嶷等，修明刑政。押送石勒的使节到建康，以示与东晋通好，并接受东晋车骑将军、平州牧、辽东郡公官爵。其子慕容皝建立燕国，史称前燕。

【慕容皝】

(297～348) 十六国时期前燕王。字元真，小字万年。慕容廆第三子。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鲜卑族人，在位约十二年。333 年继父廆职位，东晋遥命为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等职，统治辽东。讨平鲜卑部族的内乱，杀幕容仁，337 年自称燕王，以汉人封奕为国相，击溃后赵主石虎的围攻，献捷东晋，获东晋燕王册封。342 年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344 年大破鲜卑宇文部，拓地千余里。先后败鲜卑段氏，破高句丽，袭后赵幽冀之境，将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徙于辽河流域。他招徕流民开荒垦殖，按照曹魏屯田制分成办法，“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取消慕容廆时为流人所设侨郡、县，以渤海人为兴集县，河间人为宁集县，广平、魏郡人为兴平县，东莱、北海人为育黎县，吴人为吴县，直接隶属于燕国。慕容皝汉化较深，崇尚儒学，设东庠（学校），以大臣子弟为官学生，号高门生。亲临讲授，每月考试优劣，学生达千余人。能文，著有《太上章》，又著《典诫》十五篇以教子弟。子儁继位后称帝。

【姚苌】

（330～393）十六国时期后秦的创建者。字景茂。羌族。姚弋仲第二十四子。在位约十年。357年，兄姚襄率部与前秦军战于三原，兵败被杀。姚苌领众降于前秦，为苻坚部将，累建战功。肥水战后，384年，据岭北（今陕西礼泉九嵕山以北）的北地、新平、安定等郡，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建元立国，史称后秦。羌胡十余万户归附。385年姚苌杀死苻坚，次年称帝于长安，改称常安，国号大秦。姚苌多谋略而不善于征战。386年苻坚族孙苻登自立为前秦主后，后秦原苻坚旧部氐、羌和汉人归之者十余万。其与姚苌转战相持，西北起安定（今甘肃泾川北），东南到长安，屡次大败后秦军。391年，姚苌破苻登军于长安以东，苻登又转攻安定。姚苌北行拒守，后秦不断受到苻登的攻击，政权始终未得稳定。393年姚苌死，其子姚兴继立，次年击溃苻登，灭亡前秦，消除肘腋之患，后秦才兴盛起来。

【慕容垂】

（326～396）十六国时期后燕的创建者。字道明，原名霸，字道业。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人，鲜卑族。前燕主慕容皝第五子。在位十三年。在344年击溃鲜卑宇文部和350年攻克后赵蓟城的战争中，都曾立大功。352年慕容儁称帝后，于354年封垂吴王。他先后镇信都（今河北冀县）、龙城（今辽宁朝阳）、蠡台（今河南商丘）、鲁阳（今河南鲁山）。两次任司隶校尉，首都王公贵族为之敛迹。369年，晋桓温率军攻前燕，抵枋头后撤退，慕容垂追到襄邑（今河南睢县），大败晋军，从此威名益振。大傅慕容评忌妒排挤，密谋杀害，慕容垂被迫携妻子投奔苻坚，任冠军将军等职。370年苻坚灭前燕。383年肥水之战秦军大败后，慕容垂纠合鲜卑、乌桓、丁零等各族兵力，企图复兴燕国。384年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建元立国，史称后燕。遂率军二十万围攻邺，长达年余。击退秦晋援军，夺据邺城。关东诸州背秦降燕。386年慕容垂称帝，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394年，消灭同族慕容泓在河东建立的西燕政权。拓跋珪称魏王（386）后，势力逐渐强大。燕魏关系恶化，魏联合西燕进攻后燕。395年，慕容垂派太子宝率军攻魏，大败于参合陂（在今山西阳高境）。次年，亲率军伐魏，无功而还，死于途中，后燕的大部分疆土，以后终于被魏吞并。

【乞伏国仁】

（？～388）十六国时期西秦的建立者。陇西鲜卑（一说赀虏）人，在位四年。前秦主苻坚在位时，乞伏鲜卑酋长、国仁父乞伏司繁，率部众投附苻坚，镇勇士川（又名苑川，今甘肃榆中东北）。司繁死后，他代镇其地。苻坚肥水战败，国仁召集所部，并征服、合并不附者，众至十余万。385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筑勇士城于勇士川居之，史称西秦。387年，苻登封其为苑川王。388年死。弟乾归继立，称河南王，据有凉州黄河以南之地。乾归

曾服属于后秦姚兴，409年自称秦王。

【吕光】

（338～399）十六国时期后凉的创建者。字世明，略阳郡（今甘肃天水东北）人，氐族。前秦苻坚时大尉吕婆楼之子。在位约十四年。他受王猛知遇，被推荐给苻坚，任步兵校尉、骁骑将军，在多次作战中颇有威名。382年，车师前部王和鄯善王入朝前秦，愿充向导攻打西域诸国。苻坚命吕光率兵七万和铁骑五千，进军西域，383年，秦军越过流沙三百余里，焉耆等国皆降，只有龟兹拒守。384年，吕光大破各方援军十七余万，攻下龟兹。三十余国投降，有的交出汉王朝所给节传，吕光换给苻秦的信物。因贪图龟兹富足，他本打算留居，但将士都希望东归，名僧鸠摩罗什也加劝阻，于385年，以骆驼两万余头满载掠自西域的珍宝奇玩，骏马万余匹，从龟兹回到姑臧，据有凉州。后任其子吕覆为西域大都护，率大姓子弟镇高昌。苻坚死后，386年，吕光自称凉州牧、酒泉公，建国后凉。以后又改称三河王，396年自号天王。晚年昏聩，听信谗言。儿子和外甥贪暴，臣下离叛，政治腐败混乱。399年吕光死。403年后凉为后秦所灭。

【秃发乌孤】

（？～399）十六国时期南凉的创建者。在位约三年。秃发与拓跋部同出一源，是从塞北迁移到河西地方的鲜卑人。乌孤的高祖树机能部众强盛，西晋时雄踞凉州。乌孤的部众从事农桑，以廉川堡（今青海民和西北）为中心，一度服属于后凉吕氏。397年，他与后凉决裂，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建国南凉。后夺得吕氏所属乐都、湟河，浇河诸郡（今青海乐都至同仁一带），姑臧南面的洪池岭以南的羌胡数万落都归附于秃发部。398年，乌孤称武威王，次年，从西平（今青海西宁）迁都于乐都（今属青海）。他积极规划，准备先消灭后凉吕氏势力，夺取姑臧，然后南向并吞西秦乞伏氏，北向灭北凉段氏，但未及实现。399年乌孤死。弟利鹿孤继立，401年称河西王。次年利鹿孤死，传位于弟秃发傉檀。

【秃发傉檀】

（365～415）十六国时期南凉王。鲜卑人，秃发乌孤之弟，402年南凉王秃发利鹿孤死，傉檀继位，自号凉王，定都于乐都（今属青海）。在位约十三年。403年，后秦姚兴灭后凉，据有凉州。次年，秃发傉檀诈降姚兴。406年，从后秦接受凉州刺史称号，占领姑臧。同时保持政治独立，控制武威郡以南诸郡。南凉的东南是后秦姚氏和西秦乞伏氏，东北有赫连夏，西北有北凉沮渠氏。后秦进攻傉檀，谋取姑臧，没有成功。赫连勃勃求婚于傉檀，他不许，勃勃进攻南凉，傉檀大败。与南凉紧邻而不断以兵戎相见的，是北凉和西秦。傉檀屡次败于北凉沮渠蒙逊，410年蒙逊夺取姑臧后，一再南进包围乐都。南凉连年不收，上下饥弊，傉檀为了解决困难，414年率兵向西进攻吐谷浑的乙弗部，获得牛、马、羊四十余万头。但他以为沮渠蒙逊退兵不久，西秦乞伏炽磐“名

微众寡"，又是自己的女婿，因而放松了后方的防御。乞伏炽磐乘虚进攻，十天攻下乐都，南凉灭亡。傉檀投降，年余后被炽磐毒死。

【沮渠蒙逊】

（368～433）十六国时期北凉的创建者。临松郡（今甘肃张掖南）的卢水胡人。在位约三十三年。沮渠氏的祖先曾任匈奴的左沮渠，因而以官为氏，在张掖一带世为酋豪。蒙逊涉猎书史，有谋略。两位伯父沮渠罗仇兄弟在后凉统治者璟光部下被杀后，于397年率众推段业为凉州牧，脱离后凉独立。段业任蒙逊为张掖太守。401年，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凉州牧、张掖公，建国北凉。412年，迁都于两年前从秃发傉檀手中夺取的姑臧，称河西王。421年，攻下敦煌，灭西凉李氏。约在次年占领高昌，版图扩及西域。北凉政权达到极盛时期，与刘宋交聘，输入书籍，继前凉、西凉之后，在河西保存和发扬了汉族封建文化。蒙逊死后，子茂虔（亦作牧犍）继位。439年北魏攻占姑臧，茂虔投降，与士民三万户一起被徙到平城。茂虔之弟无讳和安周率部向西转移。442年无讳据有原为北凉高昌太守阚爽控制的高昌郡，在那里延续了北凉政权。444年无讳死，安周继位。460年被柔然攻灭。

【慕容德】

（326～405）十六国时期南燕的创建者。后增一字名备德，字玄明。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人，鲜卑族。前燕主慕容皝少子。慕容暐时封范阳王，为征南将军，369年，东晋桓温率军攻前燕，德与兄慕容垂一道大败晋军于襄邑。慕容垂奔投前秦主苻坚后，德连坐免职。前秦灭前燕，他被徙到长安。肥水之战后，慕容垂称王，建后燕，都中山。慕容宝继位，以慕容德为使持节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特进、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镇邺城，总管南境。397年，魏军攻下中山，慕容宝奔龙城，后燕被截为两部分。398年，慕容德率众自邺徙滑台（今河南滑县东），自立为燕王，史称南燕。滑台处于北魏和东晋之间，南北两面受敌，南燕所能控制的不到十城，滑台还一度被魏军占领。于是慕容德东进夺取青州，400年称帝，于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建都。南燕境内豪门大族荫庇户口，影响政府的财源和兵源。慕容德下令检括，出荫户五万八千。南燕拥有步兵三十七万，铁骑五万三千。德死，兄子超继位，410年为东晋刘裕所灭。

【李暠】

（351～417）十六国时期西凉的创建者。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今甘肃通渭东北）人。在位约十八年。自汉代移居狄道，世为西州大姓。397年，段业自称凉州牧时，以暠为敦煌太守领护西胡校尉。400年，自称凉公，派兵攻下玉门以西，控制了西域，建国西凉。405年，迁都酒泉。他乘后凉吕氏灭亡之机，为敦煌土著豪右所推，"兵无血刃，坐定千里"，原以为指日可以恢复三十年前前凉张氏政权的版图，但南凉秃发傉檀占有姑臧，北凉沮渠蒙逊雄据张掖，兵力都比较强盛，不断进

攻西凉。李暠被迫与他们通和立盟，只能安抚境内，劝课农耕，以经史道德勉励自己的子弟，勉强自保。李暠两度遣使间行到建康，奉表东晋王朝，把安帝比作周天子，而以齐桓、晋文自喻。但江南、凉州相隔悬远，无从呼应支援。417 年李暠死。临终前还深憾自己才弱智浅，不能统一河西地方。421 年，西凉为北凉所灭。

【赫连勃勃】

（？～425）十六国时期夏的创建者。南匈奴后裔，刘渊的同族。在位约十九年。北魏明元帝曾改其名为屈孑，意为卑下。原为铁弗部，勃勃称王后，以为帝王“徽赫与天连”，因而改姓为赫连氏。父刘卫辰，率部服属于苻坚，屯驻代来城（今内蒙古杭锦旗东），为北魏所灭。勃勃逃亡到后秦，受到姚兴的宠遇。任为安北将军、五原公，镇朔方（今陕西延安）。407 年，勃勃自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夏。据有河套之地，南境抵三城（今陕西延安）和高平（今宁夏固原）。勃勃体格魁伟，雄略过人，而凶暴好杀。善于用兵，多次向西进攻南凉，向南进攻后秦，俘掠大量人口牲畜。413 年，营建首都，蒸土筑城，铁锥如能刺进一寸，即杀工匠一并筑入。他说自己将要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因而定城名为统万（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东晋将领刘裕灭后秦南归后，勃勃乘机南下，于 418 年攻克长安，作为南都，自称皇帝，关中郡县都投降。425 年赫连勃勃死。子赫连昌继位。427 年，北魏攻取统万，次年，赫连昌被擒。431 年夏亡。

【宋武帝刘裕】

（363～422）南朝宋王朝建立者。字德舆，小名寄奴。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在位三年。曾祖刘混东晋时渡江侨居京口，父刘翘曾为郡功曹，早亡。刘裕少贫困，以樵渔及贩履为生，曾为北府兵将领孙无终冠军府司马。隆安三年（399）任前将军刘牢之参军，随从镇压孙恩起义（见孙恩、卢循起义），累官建武将军，下邳太守。桓玄依仗父祖世资，谋夺朝政，以讨司马道子、元显为名，入建康自立为楚王，并翦除北府兵旧将领刘牢之等，提拔刘裕使镇压东南沿海的孙恩余众。刘裕对桓玄外示恭顺，内则团结北府将士伺机反抗。

桓玄逼安帝退位篡晋后，刘裕于元兴三年（404）与刘毅、何无忌、檀凭之等二十七人自京口起兵，杀镇京口的桓修，次年击溃桓玄。桓玄挟安帝退往江陵（今属湖北），后为刘毅所统率的兆府兵击垮，安帝回建康复位。刘裕以平乱功，加侍中，进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京口。义熙四年（408），以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入京辅政，独揽朝权。

占据山东地区的鲜卑慕容氏南燕政权乘东晋衰乱之际屡次侵扰东晋边境。义熙五年二月，慕容超大掠淮北，刘裕兴兵北伐。四月，率水军从建康北上，过淮河，越大岘（今山东沂水北穆陵关），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收复青、兖两州，追获慕容超，斩首建康。七年，镇压卢循起义军。八年，消灭“不能居下，终为异端”的刘毅，以及可能形成威胁的诸葛



刘裕

长民、晋朝宗室司马休之等，清除异己势力，巩固了后方。九年，西攻谯纵，收复巴蜀。十二年，后秦主姚兴病卒，子姚泓继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刘裕乘机率大军分兵四路北伐后秦，进攻关洛。途经黄河，击败北魏军，翌年进克洛阳，至潼关，命大将王镇恶直趋长安，姚泓投降，后秦亡。晋军收复长安，在少数民族统治下达百年的汉族百姓纷纷向往。这时因留在朝廷坐镇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故，刘裕怕政权旁落他人之手，便留次子刘义真镇长安，王修、王镇恶等率兵万余辅佐，自己仓猝返回建康。长安留守军内讧，夏主赫连勃勃乘机夺取关中。刘义真虽被迫撤出长安，但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直至青州已为南朝版图，江淮流域得到保障，这是祖逖、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所未能达到的。

刘裕南返后，加相国宋公九锡之命。安帝死，恭帝即位，征其人辅，封为宋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称帝，国号宋，改元永初。他在称帝前后，注意节俭，整顿东晋朝纲弛紊的局面，抑制豪强，杀奴客纵横的京口刁逵，把刁氏成万顷土地和大量家财分给贫民；以后又杀隐匿人口的余姚大族虞亮，以图限制兼并。废除一部分屯田池塞以赈百姓，禁止豪强封固山泽，继续依界土断，将定居在江南的北方侨人编户纳税服役，精简了侨州郡县。还减轻刑罚，亲自听讼，兴学校，策试诸州郡秀才。江南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发展，为元嘉年间（424～453）“氓庶繁息，余粮栖亩”的状况奠定了基础。

【宋文帝刘义隆】

（407～453）南朝宋皇帝。小字车儿。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生于京口。宋武帝刘裕第三子。在位三十年。义隆博涉经史，善隶书，深沉有谋略，但体弱多病，好猜忌。永初元年（420）封宜都王。刘裕病死后，太子义符继位（即宋少帝），因他游戏无度，不亲政事，辅政的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于景平二年（424）五月废黜刘义符，迎立当时任荆州刺史的刘义隆为帝，改元元嘉。同时由谢晦出任荆州刺史，掌握重兵。但是，义隆不能容忍大臣擅行废立，元嘉三年（426）杀徐羡之、傅亮、谢晦，从此政由己出。六年，因病由其弟彭城王义康执政。义康任司徒、录尚书事，后又加领扬州刺史，进位大将军，专总朝权，势倾天下，曾擅杀名将檀道济。十七年，义隆采取断然措施，收杀拥戴义康的领军将军刘湛等人，罢斥义康，改授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二十二年废为庶人，二十八年，北魏大军南下，隔江威胁建康，义隆怕义康在后方趁机作乱，遂下令将其诛杀。南朝王室的自相残杀由此始。自刘裕放弃关中后，北魏坐大，中原渐遭蚕食。元嘉八年，宋反

攻滑台（今河南滑县）受挫。二十七年，魏太武帝拓跋焘调动六十万大军进攻江南，亲率大军克悬瓠（今河南汝南）、项城（今河南沈丘），渡过淮河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后在宋朝军民抵抗下撤退。江北遭魏军杀掠殆尽，宋朝国力削弱。三十年，义隆为太子刘劭所杀。他在位期间，提倡文化，整顿吏治，清理户籍，重视农业生产。元嘉十七年、二十一年两次下令减轻以至免除农民积欠政府的“诸逋债”。江左自东晋义熙十一年至文帝统治末年（415～453），“役宽务简，氓庶繁息”，三十多年中相对安定，所以旧史常称“元嘉之治”。但元嘉末年，北魏军队在江淮间一进一出，江南地区经过大规模战乱，邑里萧条，版籍大坏，所谓“元嘉之治”从此结束。

【梁武帝萧衍】

南朝第三个王朝。萧衍创建。都建康。历四帝，共五十六（502～557）年。

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齐宗室，官至雍州刺史，镇襄阳。永元二年（500），萧衍之兄萧懿被齐东昏侯萧宝卷杀害，三年，萧衍乘南齐君臣互相残杀，政局极端混乱之际，自襄阳举兵东下，攻占建康，并于次年称帝。国号梁，建元天监，历史上又称萧梁。

梁朝五十六年中，萧衍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其统治具有如下特点：①优容士族。如专设谱局，改订士族百家谱；下诏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人物，特别是东晋以来湮没不显的旧族；增设官职，满足士族入仕要求。但梁世士族业已全面腐朽，在实际政务中仍须使用寒人。②宽纵皇族。如削弱典签权势，给诸王以实权，对他们的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掠也不闻不问。结果到了萧衍晚年，皇室间的相互残杀较之宋、齐两代更为残酷。③萧衍博学能文，重视思想意识上的统治。如大力提倡佛教，不顾劳民伤财，大规模兴建佛寺。创立三教同源说，调和释、儒、道三者矛盾。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卿等以成亿的钱奉赎。④以虚伪的勤俭、仁慈掩盖其残暴腐朽的统治。梁世徭役较以往更为繁重，甚至役及女丁。赋税由过去的计资改为计丁。规定每年丁男之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减半。此外每亩田还要收税米二升。他责令地方官“上献”，因而莫不竞相聚敛。梁世用法，对皇室、士族分外宽容，对劳苦大众极其严酷。民众犯法连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举家罚作苦役。人民纷纷逃亡或奋起反抗，各种规模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侯



萧衍

景之乱前夕，更是达到“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的严重地步。

梁初疆域与齐末略同，北以淮河与北魏为界。此时北魏虽日趋衰落，但由于萧衍昏庸无能，故几次对魏战争均未取得成果，反而给人民带来很大灾难。如天监四年（505）北伐，梁军装备精良，但萧衍舍良将韦叡不用，以其贪残昏懦的六弟萧宏为主帅。五年，军至洛口（今安徽怀远内），一夜风雨骤起，萧宏弃师潜逃。大军溃退，损失五万多人。十三年，萧衍不顾水工关于淮河沙土不坚，不可筑堰的警告，役使二十万军民修筑浮山堰（在今安徽凤阳境内），企图蓄淮水淹没北魏军。浮山堰果为洪水冲塌，沿淮军民十余万被吞没。当北魏在各族人民起义打击下摇摇欲坠之时，萧衍把希望寄托在南逃的北魏宗室元颢身上，命陈庆之于大通二年（528）率七千人送他北归。元颢阴谋叛梁，陈庆之孤立无援而全军覆灭。

太清元年（547），东魏大将侯景降梁，萧衍不顾朝臣反对，认为“得景则塞北可清，机会难得”，以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并派萧渊明率军五万前往支援。结果梁军在寒山堰（今江苏徐州市外）被东魏军击败，渊明被俘。不久，侯景军亦被消灭，仅得八百人进据寿春。二年八月，侯景自寿春举兵叛梁。十月，叛军在萧衍侄萧正德接应下顺利渡江，占领建康。台城（宫城）被围期间，萧衍的子孙们虽据重镇，拥强兵，均不积极驰援，反而伺机夺取帝位。三年三月，叛军攻占台城，萧衍饿死。四年，侯景立萧纲为帝（简文帝）。大宝二年（551），侯景杀萧纲，自称汉皇帝。首都建康和三吴地区遭到空前破坏。这时盘踞郢州（镇夏口，今湖北武昌）的萧纶（萧衍第六子）附北齐，盘踞襄阳的萧詧（萧衍之孙、萧统之子）附西魏，盘踞荆州的萧绎（萧衍第七子）则反复于北齐和西魏之间，此外还有盘踞益州的萧纪（萧衍第八子），他们之间展开了殊死的皇位争夺战。同年，萧绎勾结西魏灭萧纶。三年，萧绎攻灭侯景，在江陵称帝（梁元帝）。承圣二年（553），萧纪举兵东下攻江陵，西魏乘机夺取益州，萧纪亦旋被萧绎消灭。三年，萧詧勾结西魏攻破江陵，杀萧绎。西魏复占有荆州，并将江陵被俘王公以下男女数万口分给将士作奴婢，仅留一座空城让萧詧作傀儡皇帝，史称后梁。至此，梁朝疆土已丧失大半：长江下游以北沦于北齐，益州、汉中、襄阳沦于西魏，江陵实际亦为西魏控制。次年，王僧辩、陈霸先在建康立萧方智（萧绎之子）为梁王。时北齐派兵送萧渊明至建康，王僧辩畏齐，立萧渊明为帝。陈霸先袭杀王僧辩，复立萧方智为帝（梁敬帝）。太平二年（557），陈霸先称帝，建立陈朝。梁亡。

【梁元帝萧绎】

（508～554）南朝梁皇帝。字世诚，小字七符。在位三年。萧衍第七子，初封湘东郡王，后任侍中、丹阳尹。普通七年（526）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控制长江中上游。太清二年（548）侯景叛梁围建康，梁各路援军集结于建康城外有二三十万之多。而萧绎只派儿子萧方智等率军万人往救，后又派王僧辩率

舟师万人增援，次年三月，景攻破台城，王僧辩舟师尽没。不久，又命王僧辩击溃在郢州（今湖北武昌）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六兄萧纶；并向西魏称臣，袭杀益州刺史萧纪（萧衍第八子）。萧绎翦除兄弟的目的达到后，便于天正元年（552）在江陵即位称帝。年号承圣。但当时梁州、益州已并于西魏，襄阳也在西魏控制之中。江陵形势十分孤立。承圣三年九月西魏宇文泰派于谨、宇文护率军五万南攻江陵。十一月江陵城陷，萧绎被俘遭害。次年其子萧方智在建康称帝，追尊为元帝。萧绎盲一目，少聪颖，好读书，善五言诗，但性矫饰，多猜忌。藏书十四万卷，于江陵城破时自己烧毁。生平著述甚富，凡二十种，四百余卷，今仅存《金楼子》。

【陈高祖陈霸先】

（503～559）南朝陈创建者。字兴国，小字法生。在位三年。自称世居颍川（今河南许昌东），先祖在西晋永嘉时南迁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东）下若里。家世寒微，出身小吏，喜读兵书，长于军事。初随宗室新喻侯萧映至广州刺史任，为中直兵参军，招集兵马。曾镇压土著与少数民族起义，累官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太清二年（548）侯景叛梁，攻陷建康。次年七月霸先消灭与景勾结的广州刺史元景仲，十一月在始兴（今广东韶关）起兵勤王讨侯景。大宝元年（550）出大庾岭，沿赣江而下，军至南康（今江西赣州），受湘东王萧绎节制。至湓城（今江西九江）与王僧辩会师，率甲士三万、强弩五千张、舟船两千乘，东进破建康，讨灭侯景（见侯景之乱），进位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承圣三年（554）十一月，西魏陷江陵，杀梁元帝萧绎，立萧詧为梁主。霸先与王僧辩迎立晋安郡王江州刺史萧方智至建康为帝而擅朝政。四年，王僧辩又纳北齐扶植的萧渊明至建康为帝。霸先从京口起兵袭杀王僧辩，废萧渊明，拥萧方智为帝（梁敬帝），并击败北齐军。敬帝太平二年（557）霸先加九锡，进爵为陈王，十月代梁即皇帝位，国号陈，改元永定。

【陈后主陈叔宝】

（553～604）南朝陈最后一个皇帝。字元秀，小字黄奴。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东）人。在位八年。陈宣帝陈顼嫡长子。太建十四年（582），宣帝死，太子叔宝继位。在他统治时，陈的政治日趋腐败。叔宝荒于酒色，不恤政事，以江总为尚书令，不持政务，日与江总、陈暄、孔范等所谓“狎客”十余人游宴后庭，制作艳诗。又大建宫室，滥施刑罚，对于一衣带水的强大隋朝了无防备。祯明二年（588）隋以晋王杨广为元帅，率八十总管、五十一万士兵南下。叔宝恃长江天险，不以为意。翌年正月，隋军分道攻入建康，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人避入井中被俘，陈亡。隋仁寿四年（604）病卒于洛阳。

【魏道武帝拓跋珪】

（371～409）北魏王朝创建者。珪亦作涉珪，庙号太祖。鲜卑族。在位二十四年。西晋时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受封为代公，进称代王，此后拓跋部势力

日趋强大，到拓跋珪祖父什翼犍时，曾击败漠北的柔然与漠南的匈奴刘卫辰部。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正式建立代国。376年，前秦大举来攻，什翼犍死，部众离散。苻坚令刘库仁和刘卫辰分别控制代国东西两部，什翼犍幼子窟咄被俘到长安，拓跋珪随母辗转流徙于独孤部与贺兰部。

383年肥水之战后，苻秦势力瓦解，被役属的各族纷纷起兵独立。386年，拓跋珪为各部大人所推，即代王位，建元登国。同年称魏王，改国号为魏。拓跋部处在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不甚成熟阶段；拓跋珪建国后，该部出现向封建制发展趋势。

拓跋珪即位后五年之间，北面击败高车与柔然，东北面击败库莫奚，扫除了后顾之忧。南面先联合同属鲜卑族，又与他有姻亲的慕容垂所建后燕，占领了心腹之患的刘库仁、刘卫辰后裔所盘踞的地区，平定河套以南诸部，获得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离石的山胡酋长也率三千余家降附。魏国兵力强盛，财力富饶，再要发展，就必然与据有中原地带的后燕相争夺。391年，拓跋珪以慕容垂扣留其弟为借口，与后燕绝交。

拓跋珪幼年时国亡家破，饱经忧患，几乎被苻坚作为俘虏遣送长安。成人以后沉勇有智谋。395年，后燕太子慕容宝大举进攻，拓跋珪乘夜袭击燕军，在参合陂（在今山西阳高境）大胜。燕军死者万数，降者四五万，文武将吏被杀数千人。北魏获得器甲辎重、军资杂财无数。燕臣有才识者，拓跋珪皆加录用。396年，拓跋珪始建天子旌旗，同年，率四十万大军攻伐后燕，夺取并州（今山西），开始仿汉人制度建立台省，设置朝廷百官和地方的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皆用儒生担任，汉族士大夫稍有才用者都加以擢拔，为夺取中原作准备。397年，在钜鹿柏肆坞，慕容宝乘夜进攻，魏军惊散，拓跋珪不及衣冠，仓猝指挥，终于设奇阵转败为胜。同年，进军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适值甲子日，太史令说商纣王以甲子日亡，谓之疾日，兵家所忌。拓跋珪说："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终于攻占了中山。398年取邺城。除山东半岛的南燕与东北的北燕外，太行山以东的中原地区基本上归入北魏版图。

这年拓跋珪即皇帝位，追尊远祖以下二十七人皆为皇帝，制礼乐，定律令。先徙太行山以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鲜卑、高丽杂夷三十六万人，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实代国，并对内徙新民赐给耕牛，计口受田。是年从盛乐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又徙东方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两千家于平城。平城畿内之外，四方四维称为八国或八部，为鲜卑诸部所居，各置大人。八国务有大师小师，郡也立师，宗室有宗师，职能为品举人才，有如中正。399年，令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拓跋珪理解必须依靠汉族儒士，采用汉族典章制度，来统治广大地区的汉人。但是他缺乏汉文化教养，又有浓厚的民族情绪，所以对汉人非常疑忌畏惧。曾为拓跋氏立功的崔逞说到飞鸮食桑椹而声音变好，拓跋珪怀疑他有意侮慢进入中原的北人，因而赐死。封懿以应对疏慢坐废于家。鲜卑人贺狄干因久被姚氏幽闭于长安，习读经史，举止有似儒生。还朝以后，拓跋珪认为他有意摹仿

汉人，兄弟二人皆被杀。拓跋珪末年服寒食散，药性使他暴躁不安，喜怒失常。左右动辄得咎，多被他手刃而死。平定中原立过大功的常山王遵、司空庾岳、卫王仪先后被杀。拓跋珪自己也在409年被他次子清河王绍谋害而死。

【魏太武帝拓跋焘】

（408～452）北魏皇帝。鲜卑族。小字佛狸，庙号世祖。在位三十年。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孙子。泰常八年（423），十六岁的拓跋焘即位。自此，东征西伐，始光四年（427）率军进攻赫连夏，占领都城统万（今陕西靖边以北白城子），继续与夏争夺长安。神䴥三年（430）关中之地全入北魏，夏的残余势力最后被消灭。太延三年（436）攻灭北燕，向东北扩张了疆土。五年，击败北凉沮渠氏，占领河西，至此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事业。与江东的刘宋王朝对峙，形成南北朝的局面。自前凉张氏以来，河西地方文化学术比较发达，号称多士。北魏自道武帝以后，政治上使用汉族高门，汲取不少魏晋典制；吞并河西后，又有大批河西文士进入北魏统治区域，不少到平城去做官，受到重用，北魏的儒学才开始兴盛。

在向东西扩张的同时，北魏也警惕北方柔然的威胁。拓跋焘保持游牧民族部落联盟酋长的习惯，出军多自任统帅。他七次率军进攻柔然。太平真君十年（449）大败柔然，收民畜凡百余万。柔然可汗远遁，北方边塞得以安静。但保据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的氐族杨氏，却始终依违于北魏与南朝之间。拓跋焘虽几次用兵，终未能长远征服。

拓跋焘注意西域的交通。太延三年（437）派遣散骑常侍董琬、高明等多携金帛，招抚西域九国，成为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宋云、惠生出使西域的先驱。以后西域与北魏保持经常联系的，有十六国之多。

拓跋焘为人勇健，善于指挥。战阵亲犯矢石，神色自若，命将出师，违其节度者多败，因此将士畏服，为之尽力。有知人之明，常从士伍中选拔人才。赏不遗贱，罚不避贵，虽所爱之人亦不宽假。自奉俭朴，而赏赐功臣绝无吝惜。认为功臣勤劳日久，应让他们以爵归第，随时朝见饷宴，百官职务则可另简贤能。这样就保证了行政效率，使政治多少能健全发展。他还以为“文体（指文字）错谬”，下诏造新字千余，颁下远近，惜已不传。

作为一个统治广大胡汉各族人民的胡族君主，拓跋焘维护鲜卑地位，猜疑其他各族和他祖父拓跋珪相似，动辄杀戮。作战对阵时以骑蹙步，可以看出鲜卑骑兵的优越地位。围盱眙时给宋守将臧质信中说，北魏军中冲锋陷阵的都不是鲜卑人，杀死丁零与胡人士兵，可以减少常山赵郡及并州地方的麻烦；杀死氐、羌士兵，可以减少关中的麻烦。所以，宋军杀死这些斗兵，于魏国并无不利。这虽是故作激愤之言，但明显反映拓跋焘对待非鲜卑各族的态度，与苻坚兼容精神迥然不同。他倚重汉人，李顺、崔浩、李孝伯等先后掌握朝权。然而崔浩修国史详实记载魏先世事迹，可能涉及某些鲜卑习俗和隐私，有伤体面，拓跋焘不惜兴动大狱，将三朝功臣司徒崔浩处死，连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以及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

遭族灭。事后拓跋焘说“崔司徒可惜”，有后悔意。

拓跋焘追崇祖先，缅怀旧俗，是鲜卑统治者民族意识的另一表现。太平真君四年，乌洛侯国来告，拓跋祖先祭天石室尚在，拓跋焘即派人奉祭。1980年7月，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大兴安岭北段东麓发现的嘎仙洞，即此石室。壁上刻有太平真君四年七月拓跋焘派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致祭的祝文，文字较魏书记载略详，称以祖先可寒可敦配飨皇天后土。此洞的发现，证实了鲜卑族发源之地的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

拓跋焘统治时期，氐、羌、屠各，以及所谓“杂虏”、“杂人”的各族人民起义非常频繁。太平真君六年卢水胡盖吴在关中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发动的起义，声势最为浩大。盖吴建号秦地王，有众十余万，得到安定卢水胡刘超、河东蜀薛永宗的响应，拓跋焘调动强大的兵力才镇压下去（见盖吴起义）。拓跋焘受崔浩、寇谦之影响，奉道排佛。镇压盖吴过程中，在长安佛寺中发现大量兵器，认为佛寺与盖吴通谋，太平真君七年，决心废佛，诛杀僧人，焚毁经像，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经过元嘉之治的休养生息，宋文帝刘义隆开始具备北伐的条件。而北魏境内也再无后顾之忧，拓跋焘得以兵锋南向。宋军一度抵达北魏河南三镇（碻磝、滑台、虎牢），终以孤军深入，不能据有其地。十一年，魏军围悬瓠（今河南汝南），次年拓跋焘亲率大军南下，经过彭城、盱眙，直达江边的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建康震动。但魏军还不具备渡江灭亡南朝的条件，只蹂躏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在江边掠民烧屋后退军。

中常侍宗爱行为不法，诬陷太子晃的宠臣，晃忧惧而死。拓跋焘哀悼太子，宗爱惧诛，于承圣元年（452），谋杀了拓跋焘。

【魏孝文帝元宏】

（467～499）北魏皇帝。原名拓跋宏。庙号高祖。鲜卑族，在位二十九年。皇兴五年（471）献文帝拓跋弘传位给五岁的太子拓跋宏，国政由其祖母冯太后主持。曾于太和九年（485）颁行均田令（见均田制）。次年以后，元宏开始亲自草拟诏策，较多参预政事。十四年冯太后死，元宏独揽朝政。他的汉文化修养很深，十分器重出身江南高门的王肃。认为鲜卑族必须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他改变鲜卑姓氏，如改拓跋为元；禁止使用鲜卑语言和服饰；一些鲜卑贵族依高下规定为姓或族，使成为与汉族高门卢、崔、郑、王等相等的门阀；为诸弟聘娶汉族高门之女为妃；选拔人才时专重人望。

元宏因为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无漕运之路，而且僻处北边，不利于控制中原，便向南发展，十八年迁都于东汉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汉化与迁都遭到鲜卑族人的反对，太子恂反对其政策，终于被废、被杀。迁洛以后，元宏更多地亲迎中州儒士，拓跋氏宗室和代北旧人益加不满，在平城发动叛乱，被镇压下去。迁都的次年，元宏即以齐明帝萧鸾篡夺政权为借口，亲率大军南伐，从东路渡淮水向寿春进军。

他有意南临长江，但淮南三大重镇寿春、盱眙、淮阴都未攻克，只得遣使臣临江责骂萧鸾。二十一年又从西路南下攻南阳、新野，亲自率军攻悬瓠（今河南汝南），沔北大震。次年萧鸾死，元宏以礼不伐丧而退军。二十三年再从西路南伐，进到马圈城（今河南邓县北），因病班师，死于军中。

【高欢】

（496～547）东魏权臣，北齐的实际创建者。小字贺六浑。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东）人。其子高洋称帝后，追尊为高祖，谥神武。高欢的先祖因犯罪徙居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世居北边，生活习俗鲜卑化。家贫，曾任队主、函使等低级职务。北魏末年爆发六镇起义。孝昌元年（525），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西北）人杜洛周在上谷（今北京延庆）起义，高欢投其麾下，又转隶葛荣义军。在葛荣被尔朱荣镇压（528）之前，脱离义军投尔朱荣，为之画策，劝其代魏，受到宠信，任晋州刺史。葛荣失败后，部众二十万人流入并、肆两州（今山西），受以尔朱荣为首的契胡族欺凌，不断发生动乱。永安三年（530），高欢取得对他们的统帅权，率其至山东的冀、定、相诸州（今河北及河南北部），从而形成自己的军事势力和据点。

同年，尔朱荣被魏孝庄帝杀死后，尔朱氏族人世隆在洛阳拥立节闵帝，控制朝廷，尔朱兆据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尔朱天光据关中，尔朱仲远据东郡（今河南滑县东）。普泰元年（531），高欢起兵声讨尔朱氏，在信都（今河北冀县）拥立元朗为魏帝（后废帝）。永熙元年（532）夺取邺城，韩陵之战又大败内部不和的尔朱氏联军，进入洛阳，废尔朱氏和他自己所立的两个皇帝，另立孝武帝元修。高欢任大丞相、太师、世袭定州刺史，随即平定并州，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

高欢为人深沉，富于机谋。善用人，不问地位高低，唯才是举。治军严明，将士乐为效死。他常对部下的鲜卑族兵士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凌之！”对汉民又说：“鲜卑是汝作客（意为佣人），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企图以此调整胡汉人民之间的关系，使其和平相处，而为自己尽力。尔朱氏亲信斛斯椿在韩陵之战以后背叛尔朱氏，杀尔朱世隆，囚尔朱天光以献于高欢。又以反复无常而不自安，挑拨孝武帝翦除高欢。孝武帝想依靠据有关陇的宇文泰以消灭高欢，计划不成，于永熙三年逃奔长安。高欢在洛阳立孝静帝元善见，是为东魏。535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文帝元宝矩，是为西魏。东西魏皇帝，实际是高欢、宇文泰分别操纵的傀儡。

高欢统治时期，梁虽有北伐，但与东魏的关系仍以频繁通使为主。高欢害怕北方士大夫望梁朝为正朔所在而投奔江南，也无意南向扩张疆土。在少数民族方面，汾水流域的山胡（稽胡）与东魏境毗邻，威胁甚大，因而高欢决意一再用兵。天平二年（535）击灭自称天子的刘蠡升，俘其皇后、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华夷五万余户。魏分东西后，彼此抗争，一时不能像北魏那样全力抗击柔然，柔然的倾向对东西魏有举足轻重

之势。高欢娶柔然公主，表示对柔然结交求和。孝静帝即位，高欢即决定迁都于邺，主要因为洛阳西逼西魏。三年，高欢将万骑袭击西魏的夏州（今陕西横山西北白城子），擒刺史，迁其部落五千户而回。以后多次与西魏作战。四年春，攻潼关失败，大将窦泰自杀。秋，高欢又将兵二十万，从蒲津渡黄河而西，进军沙苑（今陕西大荔南），将士上下轻敌大败。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无数。西魏军一度进占洛阳。元象元年（538），东魏军与西魏军战于洛阳邙山，转败为胜，西魏军退走。连年战争，河南民多饿死。高欢命令诸州沿河津渡之处皆置仓积谷，转运以供军旅，备饥馑。又在幽、瀛、沧、青四州滨海之地煮盐，供军国之用。兴和三年（541）前后，山东连年收成较好，人民稍得苏息，但高欢西向用兵的计划始终未变。四年，高欢击西魏，连营四十里，围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遇大雪，不克而退。玉壁地当冲要，西魏军在此多次抵御了东魏进攻。武定元年（543），东魏虎牢守将叛降西魏，西魏进军到洛阳。高欢南下渡河，与宇文泰在邙山对阵，东魏军大败，高欢几乎不免。次日又战，东魏军复振，西魏军败退。四年，高欢悉举山东之众攻西魏，围攻玉壁五十余日，士卒战死病死者七万人，被迫退军。高欢智力皆困，而发病。病危时遗言以侯景为虑，告其子高澄起用慕容绍宗以制侯景。次年高欢死。

【宇文泰】

（505～556）北周的实际创建者。小字黑獭（一作黑泰）。其先出于匈奴，自后燕归魏，徙居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泰子宇文觉称帝后，追尊为太祖，谥文帝。北魏末年六镇起义中，宇文泰参加鲜于修礼和葛荣的起义军。尔朱荣镇压葛荣后，宇文泰随例迁晋阳，隶尔朱荣部将贺拔岳麾下。永安三年（530）尔朱天光、贺拔岳入关中镇压万俟丑奴起义，宇文泰从贺拔岳平定关陇。尔朱氏失败后，高欢命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宇文泰是他的有力辅佐。永熙三年（534）党于高欢的侯莫陈悦在平凉（今属甘肃平凉西南）杀死贺拔岳，宇文泰继统其军众，击败侯莫陈悦，东进据长安。魏孝武帝与高欢不睦，入关就宇文泰，任命其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次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文帝），改元大统，是为西魏，政权实际掌握在宇文泰手中。

宇文泰善于谋略和指挥。在军事上主要依靠来自北镇尤其是武川的镇人，他们以后又成为西魏、北周政治上的支柱。宇文泰与东魏多次作战，互有胜负。大统三年（537）春，东魏攻潼关，宇文泰率精锐出潼关左面的小关，攻其不备，大败东魏军，东魏大将窦泰自杀。秋间，东魏十万人进至沙苑（今陕西大荔南），宇文泰以不满万人的弱势兵力，乘东魏军轻敌不为行列，亲自鸣鼓奋战，获得大胜，俘虏七万人。西魏军曾两次进到洛阳。九年邙山之战，宇文泰率军黑夜登山进击，高欢仅而获免。次日再战，宇文泰军不利退还。西魏财力兵力都不如东魏，军事上以守势为主，如玉璧城（今山西稷山西南）曾多次抵抗东魏来攻。西魏的东境，大体与东魏以黄河为界。

为了集中力量与东魏争强，宇文泰

与柔然妥协，以巩固北边。西魏文帝娶柔然公主为皇后，并废原来的皇后为尼，最后赐死，以取悦于柔然。对于突厥，亦曾遣使通好。但宇文泰对南朝则采取攻势，先后夺取了益州和荆雍之地。废帝二年（553）他计划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而众议畏缩。只有尉迟迥认为蜀与北方隔绝一百多年，恃险自守，如以铁骑急行袭击，定无不克。宇文泰遂遣尉迟迥从散关进军，围成都五旬，取得胜利。次年，宇文泰利用梁元帝萧铎（据荆州）与萧詧（据雍州）叔侄间矛盾，和萧绎的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派于谨、宇文护率军五万进攻江陵。经过激战得胜，虏获大量财宝，又取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驱归长安。立萧詧为梁王，自襄阳徙镇江陵，成为西魏政权控制下的傀儡，史称后梁。

宇文泰注意屯田以资军国之用，同时十分关心行政效率，大统元年采纳苏绰建议进行改革。他制定了公文格式，以朱色、墨色区别财政支出与收入，定出户籍册和胪列次年课役大数的记帐制度。大统十三年的计帐残卷，在敦煌石室里保存下来。大统七年，苏绰又制定地方官必须遵守的六条诏书：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宇文泰很重视这个六条，置座右，并规定不通六条、不能造计帐者不得任地方大小长官。他建立府兵制，扩大了兵源，这一制度为隋唐所沿袭。他还曾在行台设学，命所属官员日间办公，夜晚学习。对于儒士表示尊敬，从江陵俘来的王褒、宗懔等受到礼遇，又听从庾季才的话，放免被俘为奴婢的梁人数千口。以后又命令卢辩仿照周礼更改官制，甚至政府文告也要仿先秦文体。复古的另一表现是恢复鲜卑旧姓。北魏初年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后裔在西魏大都灭绝，宇文泰于是恢复元氏为拓跋氏，已改复姓为单姓者一律复旧；而且命令汉族部将资历高者袭三十六姓，次者袭九十九姓，所将士卒也改从主将的胡姓。他们形式上成为一批胡化了的汉人。

【齐文宣帝高洋】

（529～559）北齐第一个皇帝。在位十年。字子进。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东）人。高欢次子。东魏武定七年（549），大将军高洋兄澄谋取代东魏，未及实现而死。高洋继掌朝政。次年，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同年五月，禅代称帝，国号齐，史称北齐。高洋统治时期，北齐与北周关系比较平稳，因而得以集中兵力、财力向北方和南方扩张。天保三年（552）以后连年出塞，伐库莫奚，俘获甚众。四年大败契丹，虏获十余万口，杂畜数百万头。又支持柔然攻突厥。五年击败山胡。五至六年连续大败柔然，筑长城自幽州至恒州九百余里。大量人口、牲畜的虏获有助于北齐国力的增强。南朝梁正当侯景之乱后，国势骤衰。三年，北齐兵锋南抵长江。六年，送降将、梁宗室萧渊明入建康即帝位，渊明后为陈霸先所废。齐军渡长江，占领石头城，为陈霸先击退。七年，齐军又南下，一度至建康附近。北齐疆土扩展至淮南，终与陈朝以江为界。高洋初即帝位时，比较谨慎，以法驭下，虽勋贵外戚也不宽容，政治清明，人得尽力。军国大政多独自决断，每临战阵身当矢石，所向有功。几年以后，开始以功业自傲，荒

淫酗酒，肆为暴虐。以鲜卑族自居，太子殷好学，便嫌他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想要废掉。汉族士大夫杜弼以为治国当用汉人，称鲜卑为“车马客”，高洋认为讥讽自己，不久，便杀之。北齐一代出现对魏孝文帝以来汉化政策的反动，鲜卑化占优势，与高洋很有关系。但他虽昏虐而尚能任用汉人士族，如杨愔为宰辅，“维持匡救，实有赖焉”。所以时有“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说法，北齐政权得以苟延下去。

【周武帝宇文邕】

（543～578）北周皇帝。小字祢罗突。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宇文泰第四子，生于同州（今陕西大荔）。在位十九年。武成二年（560），权臣宇文护毒死明帝宇文毓，立大司空、鲁国公宇文邕为帝，仍掌朝政。建德元年（572），宇文邕诛杀宇文护，始亲自处理国务。宇文邕生活俭朴，诸事希求超越古人，对宇文护及北齐所修过于华丽的宫殿一律焚毁，对下严酷少恩，但果断明决，耐劳苦，征伐时躬亲行阵，得士卒死力。四年，他独与齐王宇文宪等少数人划策，力排众议，决定伐齐并亲自统军，围攻金墉城（今河南洛阳），因病还师。次年又率大军伐齐，几路并进，攻克平阳（今山西临汾）。围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军事失利，自己仅而得免。其后听从宇文忻“死中求生，败中取胜”的建议，终于攻克晋阳。六年，入邺，灭北齐。齐境有北魏所俘河西人世为厮役的杂户，周境有从东魏及南朝梁江陵俘虏的良人没为奴婢，他都豁免为良人。建德二年，宇文邕确决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后。次年禁佛、道二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为历史上废佛“三武”之一。突厥强盛，目北齐、北周为在南两儿。宇文邕不得不娶突厥公主为后，灭齐之后，宣政元年（578）宇文邕率军分五道伐突厥，未成行而病死。两三年之后，杨坚灭周。

【宇文护】

（515？～572）北周权臣。小字萨保。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宇文泰之侄。早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与东魏的交战中屡建战功，又与于谨南征梁朝江陵。西魏恭帝三年（556）宇文泰死，诸子幼小，遗命宇文护掌管国家大政。护名位素卑，在于谨的支持下统理军国大事。他以宇文泰嗣子宇文觉幼弱，想乘宇文泰的权势和影响尚存时早日夺取政权，因迫使西魏恭帝禅位于周。次年，宇文觉称周天王，建立北周。护为大司马，封晋国公，旧日与宇文泰并肩的大将赵贵、独孤信对宇文护不服，宇文觉也不满他专权，图谋诛护不果，反被其先发制人，杀赵贵，令独孤信自杀。宇文觉被废黜而死。宇文护迁大冢宰（当时的宰相），并拥立宇文泰另一个儿子宇文毓（周明帝）。明帝好学有识，为宇文护所畏，武成二年（560）又被他毒死，立宇文泰四子宇文邕（周武帝），改元保定，实际大权仍由宇文护掌握。护虽性宽和而不识大体，委任非人而久专权柄，又素无戎略，两次伐齐都大败而归。诸子贪残，僚属恣纵，蠹政害民。宇文邕与弟卫王宇文直策划，于建德元年（572）杀死宇文护。

【隋文帝杨坚】

（541～604）隋朝开国皇帝。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世居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父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

杨坚十五岁时因父亲的功勋被授官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周武帝时杨坚进位大将军，袭爵隋国公，长女为太子妃。周宣帝时杨坚以皇后之父拜为上柱国、大司马。大象二年（580）五月，周宣帝死，子宇文阐（静帝）即位，年方八岁。内史上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假传遗诏，召杨坚入宫辅政。坚自为左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揽军政大权。

杨坚辅政后，为防止分封在外的北周诸王变乱，托故召武帝弟赵、陈、越、代、滕五王入长安。相州（今河南安阳南）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反叛。杨坚先后平定了三方叛乱，诛杀周室诸王，消除了禅代的阻力，于大定元年（581）二月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

隋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皇元年（581），他首先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以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改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为州县两级体制。后来又规定六品以下官员也由吏部选授，地方官员不得自用僚佐，彻底废除汉代以来为豪强士族垄断的辟举制度（见征辟）。鉴于周宣帝时刑罚严酷，“内外恐怖，人不



杨坚

自安”，开皇元年，文帝命高颎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刑律颁行，这就是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的《开皇律》。三年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隋朝刑律虽有所轻简，但隋文帝本人却性情忌刻，往往随意杀人；还在律外行法，用以镇压人民。

隋文帝采取许多经济措施以巩固其统治。开皇元年春即位时，分官牛五千头给贫人，助其生产。二年，颁布关于均田和租调的新令（见均田制、租庸调）。三年，下令将百姓成丁的年龄由十八岁推迟到二十一岁；丁男服役期限由一个月减为二十天，未被征发服役者须纳庸代役；户调绢由一匹（四丈）减为两丈。以后又规定丁男年满五十，免役收庸。这些规定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为使隐漏户口复归户籍，又采纳宰相高颎建议，实行输籍之法，由各州县根据朝廷规定的“输籍定样”划分户等，检括隐漏之民为编户，扩大剥削和征发的对象（见括户、定户）。

隋文帝十分重视仓廪的建置和漕路

的开通。开皇三年，下诏在黄河中游十三州募丁运米，在沿河的卫州（汲郡，今河南淇县东）、洛州（今河南洛阳东）、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华州（今陕西华县）设置四座转运仓，向国都大兴城递次转输关东、汾晋的粟谷。四年，又命宇文恺主持开凿大兴城至潼关的漕渠，都城太仓的储粮得以充实。五年，又采纳度支尚书长孙平建议，诏各州设置义仓（即社仓），以备灾年赈济之用。文帝创置的义仓制度是封建国家保障社会生产力的一项措施，以后沿用到清代。

开皇初年，突厥骑兵经常扰掠隋朝北方地区。隋文帝采取积极防御策略，于开皇三年派重兵分八道出击，打败突厥。突厥内部分裂为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和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两个对立势力。五年，在西突厥攻逼下，沙钵略请和于隋；后来突利之子染干（见启民可汗）亦归降，隋文帝将其部落分别安置在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和五原地区，北方暂得安宁。

隋文帝开皇前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南下灭陈统一全国准备了条件。开皇八年二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十一月，以晋王杨广为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分兵八路进攻。九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攻占陈都建康，俘陈后主陈叔宝，陈朝灭亡。西晋末年以来延续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这是隋文帝的一大历史功绩。

开皇十年，隋文帝对府兵制进行改革。令所有的军人都在州县落籍，同民户一样从事生产，士兵本人则仍保留军籍，以备征召。这一改革取消了兵民异籍制度，适应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和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

隋文帝统治的后期，国家富足强盛，编户大增，仓储的丰实为历史所仅见。

史籍记载，文帝晚年崇信佛教，“不悦儒术”，但在开皇年间他还是重视儒学对于思想统治的作用的。开皇初曾下诏天下劝学行礼。国家的图书典籍因战乱多有散失，又下诏购求遗书。他勤于政务，自奉甚俭，在封建帝王中颇不多见。但后来有了变化。开皇十三年，他在岐州（今陕西岐山）之北，营建仁寿宫，相当奢费，累死丁夫上万人。所以史籍说，隋朝的“乱亡之兆”虽然成于炀帝，但在文帝时已开其端。太子杨勇奢华任情，为他所不喜，开皇二十年废黜，另立矫为节俭的次子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七月，病中的隋文帝在杨广、杨素控制下猝然死去。据说他是被太子杨广害死的。

【隋炀帝杨广】

（569～618）隋朝第二代皇帝。隋文帝杨坚次子。一名英。开皇元年（581）封晋王。六年，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八年冬，为行军元帅统兵伐陈。灭陈后，进位太尉。他平时伪装仁孝俭朴，取得文帝及独孤皇后的欢心后，便与杨素等人阴谋夺取太子位。开皇二十年十月，文帝废杨勇，十一月，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七月文帝死，相传为杨广暗害。杨广即皇帝位，假造文帝遗诏缢杀杨勇。其弟汉王杨谅以讨杨素为名，在并州起兵，炀帝派杨素镇压，杨谅降后被幽禁而死。此后，炀帝

又毒死杨勇诸子，翦除了对自己帝位的威胁。

炀帝即位后，发展科举制，设置进士科。大业五年（609）下令进行貌阅、括户，全国务郡计帐上增加丁男二十四万多人，人口六十四万余，扩大了国家的赋役对象。同年，隋炀帝亲征，平定吐谷浑，在西北地区设置西海（治伏俟城，今青海湖之西）、河源（治赤水，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高昌王麴伯雅也到张掖朝见炀帝。炀帝命在河源郡驻兵屯田。当时，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在籍户八百九十万余，人口四千六百余万，隋朝达于极盛。

隋炀帝仗恃国力富强，骄奢淫逸，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即位后几乎每年征发重役。仁寿四年十一月，他为了开掘长堑拱卫洛阳，调发今山西、河南几十万农民；次年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二百万人；自大业元年至六年，开发各段运河，先后调发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大业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丁男一百二十万，役死者过半。总计十余年间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隋炀帝年年远出巡游，曾三游江都，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都大肆营造离宫，扰掠地方，浪掷人力物力财力，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炀帝亲征吐谷浑后，又下诏征天下兵进攻高丽。大业八年，隋军出动一百一十三万余人，败于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及平壤城（今属朝鲜）下。次年再发兵围攻辽东城。这时，在黎阳仓督运军粮的杨玄感看到“百姓苦役，天下思乱”，便乘机起兵反隋。隋炀帝被迫从辽东撤军。杨玄感败亡后，隋炀帝下令追究，共杀三万余人，流徙六千余人。十年，炀帝第三次发兵进攻高丽，因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隋王朝岌岌可危，最后只好议和收兵。

大业七年，王薄率领民众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起义，隋末农民战争终于爆发（见隋末农民起义）。杨玄感起兵后，农民起义发展为全国规模。隋炀帝妄图遏止起义力量发展，下令各地郡县、驿亭、村坞筑城堡，将民众迁往城堡中居住，于近处种田，以图控制。他不愿正视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现实，身边的佞臣也不以实情相告，谎称造反的农民“渐少”。十二年七月，隋炀帝从东都去江都。次年四月，李密率领的



隋炀帝杨广像

瓦岗军逼围东都，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历数隋炀帝十大罪状。隋炀帝在江都却越发荒淫昏乱，命王世充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每日酒色取乐；又引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预感末日将到。十四年（618）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和监门直阁裴虔通等，煽动军士进入宫中，缢杀炀帝。



李渊

【唐高祖李渊】

（566～635）唐朝的开国皇帝。字叔德。先世本为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氏。西魏宇文泰以关中为根据地，改西迁汉人的山东郡望为关陇郡望，李氏乃伪托西凉李暠之嫡裔，并改其郡望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李渊祖父李虎，西魏时官至太尉，是统领府兵的六柱国之一，且于北周宇文氏政权有佐命功，死后追封唐国公。父亲李昞，袭爵，北周时历官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

李渊生于长安，七岁时袭封唐国公。隋初，补千牛备身。母为隋文帝独孤皇后姐，故特见亲重，累转谯（今安徽亳县）、陇（今陕西陇县）、岐（今陕西凤翔）等州刺史。隋炀帝即位后，李渊任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后被召为殿内少监，迁卫尉少卿。征高丽之役，李渊督运于怀远镇（今辽宁辽河以西）。大业九年（613）杨玄感起兵，炀帝诏李渊驰移镇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兼知关右诸军事。十一年，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十三年，拜太原留守。

当时，隋末农民起义遍布全国，隋朝政权摇摇欲坠。李渊自知无力扑灭农民起义，又深晓炀帝猜忌嗜杀，政局动乱，难于自保，便与次子李世民在大业十三年五月起事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杀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并从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召回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李渊起兵后，一面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始毕可汗派兵马相助，一面召募军队，并于七月率师南下。此时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激战方酣，李渊致书于李密，卑辞推奖，麻痹对方，利用鹬蚌相争之势乘隙进取关中。十一月攻拔长安，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李渊入长安后，立炀帝孙代王侑为天子（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又以杨侑名义自加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总理万机。

次年（618）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江苏扬州）杀隋炀帝。五月，杨侑禅位，李渊称帝，改国号唐，建元武德，定都长安。立建成为太子；以世民为尚书令，封秦王；元吉封齐王。任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不久唐朝统一了全国。李渊在位时期，依据

隋文帝旧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又修订律令格式，颁布均田制及租庸调制，重建府兵制，为唐朝的职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课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础。

但武德（618～626）年间，统治集团内部充满了复杂的斗争。裴寂和刘文静都是太原起兵时的佐命元从，裴寂深得唐高祖的宠信；文静为秦王世民的心腹，自以才略功勋居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李渊借故杀了文静。秦王世民自认为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他的功业超过太子建成，但因是次子无法继承皇位；太子建成亦深知世民不甘心久居人下，是自己皇储地位的重大威胁。于是，双方展开了剧烈的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这场政争中，李渊则经常站在建成一边。太子的心腹杨文幹曾经宿卫东宫，后出任庆州都督，受建成命召募壮士送长安，以供建成发动政变时使用。武德七年（624）李渊去仁智宫避暑，有人向他揭穿这件事，李渊盛怒之下急召居守长安的太子至仁智宫谢罪，并产生了废建成、改立世民为太子的念头，但并未实现，只简单地责备其兄弟不睦而不了了之。杨文幹知道事泄，便举兵反，很快就被平定了。从此以后，建成与世民均加快了斗争的步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终于爆发了“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政变中，世民先发制人，杀建成和元吉，逼李渊立己为太子。不久，李渊退位为太上皇，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李渊退出政治舞台后过了九年的闲散失意生活，最后于贞观九年（635）死于太安宫。庙号高祖。葬于献陵。

【唐太宗李世民】

（598～649）唐朝第二代皇帝。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末，李渊先后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负责镇压今山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和防备突厥，世民随父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隋炀帝杨广对下猜忌，生杀任情，统治集团中的人常为自身的安全担心。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力量日益壮大。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为了转祸为福，化家为国，乃于大业十三年（617）在晋阳起兵，接着南攻霍邑（今山西霍县），西渡黄河，攻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太原起兵之初，李渊以长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军；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都督，统右三军。攻克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恭帝。恭帝进封李渊为唐王，以建成为唐王世子；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元吉为齐国公。义宁二年（618）世民徙封赵国公。三月，隋炀帝被杀。五月，李渊即位，国号唐，建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李渊以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立建成为皇



李世民

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在唐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世民军功甚多。他首先打败了据有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的薛举，迫使举子薛仁杲降唐；接着又打退了倚仗突厥势力南攻河东的刘武周、宋金刚；武德四年（621）又打败窦建德，消灭夏政权；同时迫使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出降，郑随之灭亡，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世民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业超过建成和元吉，但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太子建成亦知世民终不肯为人下，于是以世民为一方，以建成、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建成、元吉，逼唐高祖李渊退位，自己称帝，是为唐太宗。次年（627）改元贞观。

唐太宗即位后，慑于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力，居安思危，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他的进步性政策和措施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时代最著名的“治世”。

贞观四年（630），唐太宗遣李靖平定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九年，平定吐谷浑，俘其王慕容伏允；十四年，又派侯君集平定高昌麹氏，于其地置西州，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置安西都护府。唐太宗对东突厥降众及依附于突厥的各族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受到他们的拥戴，因而被尊为“天可汗”。十五年以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和亲于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发展了汉、藏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太宗是杰出的政治家，但毕竟具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尤其在他的晚年，缺点暴露得越来越多。亲征高丽的战争给中朝两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最后无功而还。

唐太宗最初立长子承乾为太子，后来又爱重第四子魏王泰，承乾由此产生了夺嗣之惧，企图发动政变刺杀李泰，没有成功，被废为庶人。唐太宗为防止身后发生兄弟仇杀的悲剧，贬魏王泰，改立第九子晋王治为太子，即以后的唐高宗。太宗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诫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令长孙无忌、褚遂良在其身后辅佐李治，五月，去世。葬于昭陵。

【唐高宗李治】

（628～683）唐朝第三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字为善。贞观五年（631）封晋王。七年，遥授并州都督。太宗晚年，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间发生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十七年，承乾谋杀泰未遂。事发，太宗废太子承乾，黜魏王泰，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去世，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时年二十二岁。次年（650）改元永徽。起初四五年间由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及褚遂良等掌握朝政。

太宗女高阳公主嫁房玄龄子遗爱。高宗即位，贬遗爱为房州刺史。永徽四年（653），房遗爱、荆王李元景及吴王李恪等谋反。事发，遗爱被杀，元景、恪及高阳公主等均赐死，高宗帝位由此

得到巩固。

当时朝鲜半岛分成三国：高丽、百济和新罗。六年，高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高宗遂先后派兵出击高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丽。

高宗即位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永徽六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至显庆二年（657），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

高宗即位后纳武则天入宫为昭仪，不久欲废王皇后，改立武氏为后。对此，长孙无忌及褚遂良等元老重臣表示反对。李义府、许敬宗等却迎合帝意，表示赞成；宿将李勣则奏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在李义府等人的支持下，终于在永徽六年废王皇后，立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及褚遂良等均遭贬斥，不久，无忌被迫自缢。显庆（656～661）末年，高宗患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难于操持政务，皇后武则天得以逐渐掌握朝政，朝廷内外称他们为"二圣"。从此武则天成为掌握实权的统治者，高宗处于大权旁落的地位。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去世。葬于乾陵。

【武则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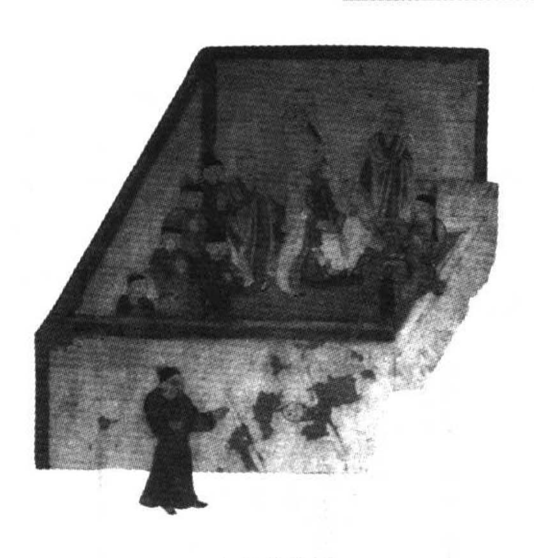
（624～705）唐高宗李治皇后，后为周则天皇帝，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父士彟，贩卖木材的大商人，隋末为鹰扬府队正，与李渊有交往，李渊晋阳起兵后，士彟从至长安，贞观（627～649）中，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母杨氏，隋室疏宗。



武则天

武则天十四岁时，唐太宗李世民召入宫为才人。太宗死后，则天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复召入宫，拜昭仪，进号宸妃，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互相谗毁。永徽六年（655）高宗欲废王氏改立武氏为皇后，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以武氏非名门令族出身而表示反对。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投高宗所好，表示赞成，李勣则对高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乃立武氏为皇后。王皇后被废不久，即与萧淑妃同被则天害死。

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自显庆（656～661）末起，乘高宗体弱多病之机，遂专国柄，威势日重。上元元年（674），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宫中称为"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中宗李显即位，则天


女尼剃度图

临朝称制。嗣圣元年（684）二月，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继续临朝称制。以武代李的趋势日见明显，于是李勣之孙徐敬业（李勣原姓徐，唐朝赐姓李）代表元老重臣势力，于这年九月以恢复庐陵王的皇位为号召，在扬州（今属江苏）起兵，但三个月即兵败被杀。垂拱四年（688）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代表宗室势力分别于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和豫州（今河南汝南）起兵，均不到一个月就被扑灭。在则天的授意下，沙门法明（或作“法朗”）进《大云经》，借佛告净光天女之语影射则天是弥勒佛降世，当以女身王国土，代唐为阎浮提主（“阎浮提”意为大千世界），大批臣民上疏劝进，则天遂于天授元年（690）称帝，国号周，并自以“曌”字为名。废睿宗为皇嗣，改东都洛阳为神都。

武则天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大肆翦除异己，打击政敌，并滥杀一些被她怀疑的大臣。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少数被贬逐，多数遭诛杀；李氏皇室及宗室诸王相继杀戮殆尽；另有“海内名士”三十六家，也以谋反的罪名而被族诛。武则天以女主的身份号令天下，执政前又无自己的心腹，执政后多疑臣民不忠于己，遂任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广事罗织，严酷逼供，奖励告密，虽然消灭了一些政敌，但也滥杀无辜。到武周政权正式建立以后，斗争趋向缓和，此风才有所收敛。

武则天为抬高武氏一族及宠臣李义府等人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士族及李唐皇族，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把武家列入第一等，并规定凡五品以上官员皆入于谱。为了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扩大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她举行殿试，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制，员外置官，破格用人。这样做虽然选拔了一批才能之士，如狄仁杰、李昭德、姚崇、宋璟及张柬之等人，但也不免使官员倍增，流于冗滥。高宗在位时，武则天曾上疏建言十二事，其中有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高宗皆略施行之。在武则天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作用及唐太宗贞观之治奠定的基础，也由于武则天沉重打击了旧士族和大贵族、大官僚集团，执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所以社会经济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人口也由三百八十万户猛增到六百一十五万户。

武则天执政前，唐朝已经俘阿史那贺鲁，平定西突厥，于其地增设濛池、崑陵二都护府，隶于安西都护。武周政权建立后，她感到整个西域过于阔远，不易管辖，遂于长安二年（702）把天山以北地区从安西都护府划出来，另置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

北破城子)。安西四镇(即碎叶、龟兹、于阗、疏勒)自垂拱二年(686)起为吐蕃所占。武则天不甘心失土，乃于长寿元年(692)遣王孝杰等大破吐蕃，恢复了四镇。

武则天非常重视著述，召学士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寮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她另有《垂拱集》、《金轮集》等著述。

但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她信图篆、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也不免滥杀无辜。官吏大增也必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她统治时期尽管社会经济有所上升，但逃户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府兵制开始走向破坏。

武则天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及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大臣吉顼等人深以嗣君之选为虑，武则天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所以接受臣下建议，于圣历元年(698)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武氏晚年宠爱男妾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神龙元年(706)正月，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暐、敬晖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诛杀二张，逼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中宗上尊号为则天大圣帝，后人因称她为“武则天”。同年十一月去世。

【唐玄宗李隆基】

(685~762)唐朝第七代皇帝。唐睿宗李旦第三子。隆基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擅长八分书，多才多艺。垂拱三年(687)封楚王。长寿二年(693)改封临淄郡王。武周长安(701~704)中历官右卫郎将、尚辇奉御。神龙元年(705)迁卫尉少卿。景龙二年(708)兼潞州别驾，加银青光禄大夫。四年入朝，遂留京师。神龙元年正月武则天被迫退位后，中宗李显即位，恢复了唐朝国号，但政柄却旁落在皇后韦氏手中。景龙四年六月中宗去世，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隆基与其姑母太平公主发动政变，诛杀韦后；武后、韦后余党略尽。少帝被迫逊位，相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隆基以除韦后功，被立为太子。延和元年(712)八月睿宗传位太子，退为太上皇。隆基即位，改元先天，是为玄宗。不久太平公主又阴谋发动宫廷政变以废玄宗，隆基密知之，乃与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人于先天二年(713)先发制人，赐太平公主死，尽诛其余党。改元开元。武、韦二后以来的动乱政局至此告终，唐朝进入了开元(713~741)至天宝(742~755)长达四十余年政局比较稳定的鼎盛阶段。

玄宗早年是一个英明果断的封建皇帝，亲身经历过复杂的斗争，深知安定升平的政局来之不易，所以即位以后，擢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姚崇提出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礼大臣等建议，玄宗基本上采纳。开元四年(716)姚崇罢相以后，玄宗又重用宰相宋璟。

璟善择人才，刑赏无私，又敢于犯颜直谏。在姚、宋执政时期赋役宽平，刑罚清省，天下富庶。此后玄宗所用诸相张嘉贞、张说、韩休及张九龄等亦堪称贤良，各有所长。玄宗在开元初年提倡节俭、毁乘舆服玩，沙汰僧尼，禁民间铸佛像写经，选京官有才识者为地方都督、刺史；以后又适应时代的变化，在行政、财政、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繁荣。时在籍人户达到一千余万，生产获得发展，民间出现粮食丰溢、布帛充盈的景象（见开元之治）。但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盛行，农民逃亡日多，社会政治危机也已经伏下。

从开元末年起，玄宗在长期升平殷富的盛世中逐渐发生变化。在政治上，他以为天下无复可忧，便深居禁中，怠问政事。自开元二十二年起，奸臣李林甫专权达十九年之久，宦官高力士亦日见重用；在对待周边各族方面，玄宗热衷于开边，对吐蕃、南诏、契丹不断发动战争，不仅恶化了民族关系，而且财政上也发生了用度不足的问题，故而又任用王鉷等聚敛之臣，对人民加紧搜



李隆基

括；同时大量扩充边军，导致了军事布局上的外重内轻，中央集权被削弱；在个人生活上，他专以声色为娱，天宝二年后宠幸杨贵妃，放纵杨氏姐妹穷奢极欲，浊乱朝政，而李林甫死后杨贵妃从祖兄杨钊（即杨国忠）又成了专权的朝臣。玄宗在腐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政治上一再受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野心家的蒙蔽，终于在天宝十四载酿成了安史之乱。

安禄山发动叛乱之后，不到两个月就占领洛阳，大约半年就攻破潼关，直逼长安。唐玄宗于天宝十五载六月急忙率从官及杨贵妃等离长安西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禁军哗变，杀杨国忠，玄宗被逼缢杀杨贵妃，军情始定。此后，太子李亨率一部分禁军北趋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七月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隆基率另一部分禁军南逃成都，后被尊为上皇天帝。至德二载，唐军在回纥援助下收复长安，玄宗由成都还长安，居兴庆宫（南内），由陈玄礼、高力士等侍卫。

宦官李辅国曾因劝肃宗即位之功而深受肃宗宠信。安史之乱平定后，他自以出身微贱，为玄宗左右所轻视，乃离间玄宗与肃宗的关系，后竟迫使玄宗迁居太极宫（西内）甘露殿，流高力士于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南），勒迫陈玄礼致仕。玄宗晚年忧郁寡欢，于宝应元年（762）建巳月（即四月）甲寅于神龙殿去世。葬于泰陵。

【唐代宗李豫】

（727～779）唐朝第九代皇帝。唐肃宗长子。初名俶，后改名豫。唐玄宗

诸孙百余人，李俶最长，颇为玄宗钟爱，立为嫡皇孙。年十五时，封广平王。安史之乱爆发，从肃宗至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至德二载（757）肃宗以俶为天下兵马元帅，以讨安史。李俶与郭子仪等率唐军，在回纥援助下，先后攻克长安、洛阳。肃宗还京师，李俶进封楚王，徙封成王。宝应元年（762）四月，肃宗病危，张皇后欲立越王係，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勒兵捕係，幽禁张皇后。肃宗死后，李辅国遂拥豫即位，次年七月改元广德。

代宗统治初期，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先后掌握兵柄，专权用事，也先后或黜或死。大历五年（770）鱼朝恩死后，代宗不再用宦官掌兵。

宝应二年正月史朝义自缢死，安史之乱结束。但藩镇割据局面继起，终代宗之世，藩镇擅代，中央已无力控制据地自雄的节度使。吐蕃乘大乱之机，尽占河西、陇右之地（今甘肃、青海一带），并进扰关中。广德元年（763）冬，吐蕃攻陷盩厔（今陕西周至），代宗出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吐蕃入长安。这时，郭子仪以关中兵马副元帅名义驻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部下只有士卒数百。郭知长安陷落，便到商州（今陕西商县）招募散兵，遣将进逼长安，迫使吐蕃退出。唐军收复长安，代宗还京师。此后唐将领仆固怀恩叛，连年引回纥、吐蕃、党项等族兵威胁关中，京师一再戒严。代宗一度欲亲征，赖郭子仪说和回纥，迫使吐蕃退出。

代宗在位时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等人整顿财政，改革漕运，增加盐利，为以后唐德宗时的税制改革准备了条件。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死。葬于元陵。

【唐德宗李适】

（742～805）唐朝第十代皇帝。唐代宗李豫长子。宝应元年（762）代宗即位。时方讨安史叛军，以适为天下兵马元帅，封鲁王，不久改封雍王。安史之乱平定后，适以元帅功拜尚书令，与郭子仪等八人图形凌烟阁。广德二年（764）立为太子。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死，适即位，次年改元建中。

德宗即位之初，颇思励精图治，减乐工，损服玩，禁止宦官受赂，罢诸处岁贡，政局为之一新。建中元年（780）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宣布废除租庸调制及一切苛杂，实行两税法，按户等征居人之税，按土地征田亩之税，每岁夏秋两征。新税制适应了土地集中、贫富不均的情况，具有进步意义。德宗亦思打击藩镇，加强中央集权。但社会、政治条件并不成熟，反而引起一场大乱，爆发了朱滔、李希烈、朱泚等人的叛乱，德宗被迫于建中四年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兴元元年（784），因李怀光叛，德宗又走梁州（今陕西汉中）。最后，朝廷虽平定朱泚、李怀光、李希烈等之乱，但对其余叛镇只得以姑息让步换取乱事的结束。此后，德宗对强藩巨镇的父死子代、据地称雄，再也无可奈何。

德宗性猜忌，无力解决朝臣中的矛盾。终其一朝，刘晏、杨炎、窦参、陆贽、裴延龄等大臣之间倾轧不已，政局混乱。此外，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两人深受信任，分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使宦官掌握禁军，势力进一步猖獗。

【唐宪宗李纯】

（778～820）唐朝第十二代皇帝。唐顺宗李诵长子。初名淳。贞元四年（788）封广陵郡王。二十一年初，顺宗即位，重用王伾、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进行政治改革，抑损宦官势力。宦官俱文珍等对此大为不满，谋夺朝柄，乃于三月逼顺宗立淳为太子，改名纯。八月，顺宗在文珍与节度使韦皋、裴均及严绶等人逼迫下内禅，改元永贞（见二王八司马）。李纯即位，次年正月，改元元和。

宪宗是唐朝后期较有作为的皇帝，其政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上有所改革，二是暂时平定了一些藩镇。

唐德宗时各地赋税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项，其中留州、送使两项降省估（中央政府规定的价格）就实估（市价）折算纳税（见折估）。由于户税以钱定税，实估很低，所以纳税者的负担成倍加重。针对这一情况，宪宗采纳裴垍的建议，于元和三年（808）宣布一切按省估折纳赋税，还规定观察使须先征用所治州之税，不足时方可征所属其余州之税，江淮一带的人民由此稍得苏息。四年，采纳李绛、白居易等人的建议，下诏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止南方掠卖奴婢。以后又用李绛之议于振武军（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开营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十余万斛，岁省军费二十余万缗。六年，采纳宰相李吉甫之言，并省内外官八百零八员、诸司流外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上述措施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李纯

在打击藩镇方面，元和元年，平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之乱，讨平夏绥留后杨惠琳。二年，遣兵讨平镇海节度使李锜。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兴归命。十二年，讨平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十三年，发五道兵讨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次年，李师道为部将刘悟所杀。唐宪宗少年时即钦慕贞观、开元时期的政治局面，有志恢复，故即位后利用德宗以来积蓄的财力，重用主张裁抑藩镇的大臣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与裴度等人，坚主用兵，遂能取得一定的胜利，被后人誉为唐代的“中兴之主”。

为了削弱藩镇势力，改变节帅尾大不掉的积患，宪宗还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均就军中任命；元和二年，以左金吾大将军范希朝出任朔方、灵盐节度使，以革旧弊；分割强镇之州县，以少其力，如讨平刘辟后分西川六州隶东川；讨平淄青李师道后以其地为淄青、兖海、郓濮三道，分置节度使；元和十四年，又诏诸道节度使、都团练使、都防御使及经略使所属支郡兵马均归刺史统领，以分方镇兵权。

宪宗虽亦力图革除河北藩镇节帅世袭之弊，但其志终未遂。此外，讨伐成

德节度使王承宗的战争亦未能取胜，当时彻底消除藩镇割据的条件尚不成熟，宪宗个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不过经其削藩，藩镇的势力确实暂时有所削弱。

元和时期连年用兵，耗尽了德宗以来的贮积，宪宗因而重用李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征课所入多于理财名臣刘晏掌财之日。加之平吴元济后，宪宗渐骄侈，财利之臣岁进羡余。在此情况下，劳动人民的负担沉重，逃户遍于各地。

宪宗是由宦官拥立的，因此不抑宦官。他晚年好神仙，求天下方士为他合长生药，而多服金丹性转躁急，左右宦官往往获罪。元和十五年正月，宪宗为宦官陈弘志（一作弘庆）等人谋杀。宦官梁守谦等拥立太子李恒，是为穆宗。

【唐武宗李炎】

（814～846）唐朝第十六代皇帝。唐穆宗李恒第五子，文宗之弟。本名瀍。长庆元年（821）封颍王。文宗曾立鲁王李永为太子，后李永暴死，乃另立陈王李成美为太子。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疾甚，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稜引杨嗣复与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监国。另一派宦官神策中尉仇士良及鱼弘志认为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矫诏立李瀍为皇太弟，废太子，仍为陈王。同月文宗去世，李瀍即位。次年改元会昌。

自唐宪宗以后，朝廷大臣逐渐分成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和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互相排挤，倾轧不已。杨嗣复与李珏均系牛党成员，故武宗即位后，即贬逐牛党，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拜相。以后，李党陈夷行、李让夷等亦先后登相位，一时形成李党独掌朝柄的局面。武宗对宦官亦稍加挫抑，甚至连拥立武宗的大宦官仇士良亦不免被迫致仕。

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最主要的业绩是平定泽潞镇（今山西长治）。会昌三年（843），泽潞镇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谋擅袭位。李德裕认为泽潞镇地处腹心之地，不同河北三镇，坚决主张用兵。武宗采纳其谋，命诸道出兵征讨。次年，刘稹为部下所杀，泽潞平。当时唐朝的财力、军力比宪宗时更为薄弱，武宗只能平定泽潞一镇。其打击藩镇的成就，已不能与唐宪宗时同日而语了。

武宗时的另一项重大政治措施是打击佛教寺院。唐朝后期佛寺日增，僧尼益众；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又有免税特权，成为逃避课役者的藏身之地；在社会上因钱币不足而大闹钱荒的时候，佛寺中却大量以铜铸佛像，加剧了钱荒的严重程度。由于上述原因，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会昌五年下令废佛。除长安、洛阳及诸道保留规定的少数佛寺外，其余的寺院一律拆毁，共计毁大中型寺院四千六百余所、小庙宇（招提、兰若）四万多处；勒令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还俗充两税户，解放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充两税户，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顷”疑为“亩”之讹）。武宗废佛是号称佛教“三武之祸”（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及唐武宗）中的最后一次（见会昌废佛）。

武宗异常崇信道教。他听信道士们所谓唐以“土”德，宜火不宜水之言，在临死前改名为“炎”。晚年服用方士所炼的金丹。但性格急躁，疾久未平。会昌六年三月，病危，诸宦官以皇子年幼，乃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是月武宗去世。葬于端陵。

【后梁太祖朱晃】

(852~912)唐末黄巢起义军叛将，后梁王朝的开国皇帝。初名朱温。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朱温幼时，随母在萧县刘崇家当佣工。后参加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随军入长安。唐中和二年(882)正月，黄巢以朱温为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同年九月朱温叛变，降于唐河中节度使(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僖宗任命朱温为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次年，改宣武军节度使(今河南开封)，加东北面都招讨使。四年，全忠与李克用等联兵镇压黄巢起义军。以后十余年间，朱全忠凭借汴州(今河南开封)优越的地理条件，逐步吞并割据中原和河北地区的藩镇。天复元年(901)被封为梁王。同年，宰相崔胤召全忠入关，谋诛宦官，宦官劫唐昭宗到凤翔(今属陕西)，依靠节度使李茂贞。全忠攻凤翔，茂贞屡败。天复三年，茂贞势蹙，被迫杀死劫迁昭宗的宦官，送昭宗出城。昭宗还长安后，全忠尽诛宦官，废神策军，从此昭宗为全忠控制，天祐元年(904)，全忠迫昭宗迁洛阳，随即遣人杀之，立其子李柷(哀帝)。后又贬杀宰相独孤损等朝官三十余人。四年，全忠废李柷称帝，改名晃，是为后梁太祖。都开封(后曾一度迁都洛阳)，国号梁，史称后梁。改元开平。

朱温在称帝前，对农业生产就比较重视，曾任张全义为河南尹，以恢复洛阳地区的生产。开平二年(908)，令诸州灭蝗以利农桑。三年，又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禁州县猾吏"广敛贪求"，对唐朝积弊有所改革。但他与据有太原的沙陀贵族李克用、李存勗父子连年征战，损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物，逐渐丧失军事上的优势。他生性残暴，滥行诛戮。晚年，因皇位继承人未定，皇室内部矛盾尖锐。乾化二年(912)，为次子朱友珪所杀。

【后唐庄宗李存勗】

(886~926)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沙陀部人。唐光启元年十二月二十二(886年1月30日)生。小字亚子，时人或谓之亚次。晓音律，善骑射。祖朱邪赤心，被唐懿宗赐姓名为李国昌。父李克用，被封晋王，据太原，与朱温相攻达二十余年。

唐哀帝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建后梁，晋仍用唐天祐年号。五年，克用死，临终以三矢付存勗说：一矢讨据有幽州的燕王刘仁恭，一矢击契丹，一矢灭朱温。十年，存勗灭燕，杀刘仁恭、守光父子。十九年，驱逐南下的契丹兵出境。天祐二十年(923)，存勗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即帝位，是为庄宗，国号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同年，灭后梁，迁都洛阳，仍称东都。

晋与后梁争夺天下，混战十余年，特别在杨刘(今山东东阿北)、德胜(今河南濮阳)一带反复地进行争夺，双方民众都遭受严重的战祸。不过，后唐消灭河北三镇，又迫李茂贞臣服于己，比后梁更进一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同光三年(925)，庄宗发兵灭前蜀，势力扩展至长江上游。

后梁既灭，存勗遂以享乐为事。皇太后行诰令，皇后行教令，令出多门，

政治紊乱。庄宗又亲信宦官、伶官，宦官总数达千余人，作威作福；伶官景进居中用事，败政乱国。庄宗又重用租庸使孔谦，峻法厚赋，民众穷困。同光三年，诏括天下私马，大举征蜀。虽灭前蜀，而皇子继岌与枢密使郭崇韬争权，存勗又妄杀郭崇韬。当时两河大水，户口流亡者十之四五，军士乏食，危机隐伏。庄宗猜忌大将李嗣源，朝官、武将、军士都离心。四年，赵在礼反，据邺都（原魏州）。存勗派嗣源平乱，嗣源随即据汴州（今河南开封）反。伶官郭门高（即郭从谦）攻入宫城，乱兵将存勗射死。

【后晋高祖石敬瑭】

（892～942）后晋王朝的开国皇帝。沙陀部人，妻后唐贵族李嗣源女。善射，被李嗣源倚为心腹。庄宗同光四年（926），嗣源讨赵在礼，至魏州，所统亲军拥嗣源为主。嗣源采纳敬瑭建议，迅速占据汴州，不久即位，是为明宗。明宗先后以敬瑭为保义、宣武、天雄、河阳、河东节度使。长兴四年（933）明宗死。子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加敬瑭中书令，徙成德，复镇太原。次年，李从珂反，闵帝出奔，路遇敬瑭，被敬瑭扣留在卫州（今河南汲县），不久闵帝为从珂所杀。从珂即位，是为末帝。末帝猜忌敬瑭，于清泰三年（936）命敬瑭移镇天平（郓州军号）。敬瑭遂与桑维翰、刘知远（即后汉高祖刘知远）谋反，上表论末帝不当立，请立从益为明宗嗣。末帝下诏讨敬瑭。敬瑭以割地、称臣、称儿为条件，求契丹出兵相助。十一月，契丹主耶律德光立敬瑭为帝，国号晋，史称后晋。改元天福。后晋割幽蓟十六州给契丹，并每年献帛三十万匹。从此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

闰十一月，契丹、后晋兵攻克洛阳，末帝自焚死，后唐亡。天福二年（937），敬瑭迁都汴州。三年，升汴州为东京，置开封府，改洛阳为西京。他谄事契丹贵族，除割地和每年如数献绢之外，凡遇吉凶庆吊，都额外进奉金玉珍玩，契丹太后、太子、贵族、大臣，都有礼品赠送。

敬瑭在位七年，连年发生兵乱。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指斥敬瑭父事契丹，困耗中原。敬瑭发兵斩重荣，将他的头送与契丹。天福七年，吐谷浑部不愿降契丹，附于河东，契丹主因此责问敬瑭，敬瑭忧郁成疾而死。

【后周太祖郭威】

（904～954）后周王朝的开国皇帝。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少孤，依潞州人常氏（一说郭威本姓常，父卒，母改嫁郭氏，遂冒姓郭）。郭威十八岁应募从军，先后事潞州节度使李继韬、后唐庄宗李存勗、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天福十二年（947），他助刘知远建国，被任为枢密副使。乾祐元年（948）正月，知远死，子承祐继位，是为隐帝，以郭威为枢密使。三月，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永兴（今陕西西安）、凤翔（今属陕西）诸镇相继反，隐帝以郭威为统帅平定之。乾祐三年四月，郭威以枢密使出为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不久，隐帝疑忌大臣，杀死在朝大臣杨邠、史弘肇、王章，又令人杀郭威。郭威起兵南逼开

封，禁军溃散，隐帝遇害。郭威入开封，迎立知远之侄徐州节度使刘唘。刘唘还没有到开封，河北报称辽兵入侵，郭威领兵北征，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南），军士裂黄旗披郭威，拥以为帝，还军入开封。次年，郭威即位，国号周，史称后周。改元广顺，建都于开封。刘唘行至宋州被杀。

郭威在位约三年，对改革累朝弊政颇有成绩。如免除后汉所设“斗余”、“秤耗”等额外苛敛以及中唐以来地方官进奉的“羡余物色”；废止了后晋、后汉一些极残忍的刑法，规定罪人除犯反逆罪外，不得灭族及没收家产；民众与蕃人“一听私便交易”，诸州所差散从亲事官等，一齐遣散；对累朝极为严酷的盐、酒、皮革的禁令稍予放宽；对后梁太祖以来强迫沿淮诸州农民负担的“牛租”，特予免除；废除京城内无名额的僧尼寺院五十八所等。

对恢复农业生产，郭威也采取了有效措施。如：广顺元年（951）和二年，授无主田土给数十万归中原的幽州饥民，放免其差税。三年，罢营田，以田分给现佃户充永业，使编户增加三万多。又废共城稻田务，任人佃种。无主荒地听任农民耕垦为永业，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在提倡节俭、严惩贪官、严禁军队扰民等方面，郭威也推行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唐末以来极为混乱的北方社会开始走上安定的道路。显德元年（954）正月，郭威病死。

【后周世宗柴荣】

（921～959）后周第二代皇帝。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后周太祖郭威的内侄和养子。柴荣善骑射，略通书史黄老。曾随大商人颉跌氏贩茶江陵，对社会积弊有所体验。显德元年（954）继郭威为帝，对军事、政治、经济继续进行整顿。军事上，在显德元年对北汉作战中，他严明军纪，赏有功，斩临阵退却的大将樊爱能、何徽等；此后检阅禁军，裁汰老弱，选留精锐，又募天下壮士，选取优异，强化中央禁军。政治上，他严禁贪污，惩治失职官吏。经济上，停废敕额（朝廷给予寺名）外的寺院，禁私度僧尼，收购民间铜器佛像铸钱；招民开垦逃户荒田；颁《均田图》，均定河南等地六十州租赋，废除曲阜孔氏的免税特权。此外，还扩建京城开封，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订刑律和历法，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遗书，雕印古籍等。显德二年起，伐后蜀，收秦（今甘肃秦安北）、凤（今陕西凤县东）、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此后又三次亲征南唐，至显德五年，得南唐江北、淮南十四州。六年，北伐辽，收复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易（今河北易县）三州及瓦桥（在今河北雄县）、益津（在今河北霸州）、淤口（在今河北霸州东信安镇）三关。六年五月，柴荣正欲乘胜进取幽州，却因病不得不班师回开封。同年六月死。

世宗柴荣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成就，为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前蜀高祖王建】

（847～918）前蜀国的建立者。字光图。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人，一

作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西）人。王建少年时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生，乡里人叫他“贼王八”。后投忠武军（治许州，今河南许昌）。黄巢起义军进攻长安时，僖宗逃奔成都，监军杨复光分忠武军八千人为八都，以镇压起义军，王建与鹿晏弘等各为一都头。中和四年（884），王建等五都头率兵入蜀，被号为“随驾五都”，归宦官田令孜指挥。令孜认王建等为养子。僖宗还长安，王建等分典神策军。光启二年（886）由于藩镇作乱，僖宗再奔兴元，王建为清道斩斫使。后宦官杨复恭代田令孜掌禁军，疑王建，出之为壁州（一作利州）刺史。王建招集溪洞酋豪，组织了一支八千人的队伍，逐步扩大地盘。光启三年，他弃阆州（今四川阆中）西赴成都，与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陈敬瑄相攻，逐步占领成都西、南诸州。大顺二年（891），攻占成都，囚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及田令孜。乾宁四年（897），破梓州（东川节度使治所），占有东西两川之地。天复二年（902）取山南西道（治兴元，今陕西汉中）。三年，唐封王建为蜀王。王建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割据蜀地的基础稳固。后梁开平元年（907），王建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

武成二年（909），王建颁《永昌历》。永平五年（915）取秦、凤、成、阶四州，扩境至大散关。天汉元年（917），改国号为汉。光天元年（918），复国号为蜀。当时中原战乱，文士多奔于蜀，王建目不知书而喜与文士谈论。前蜀建立后没有大规模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光天元年王建卒。

【南唐前主李昪】

（888～943）南唐国的建立者。字正伦，小字彭奴。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人，一作徐州（今属江苏）人。少孤，战乱中为杨行密所收养。后为行密大将徐温养子，因姓徐名知诰。

唐末，吴主杨行密据淮南。徐知诰从徐温攻伐，以功拜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知诰接待人士，劝课农桑，修整城壁，府库充实。天祐十二年（后梁贞明元年，915）徐温封齐国公。后来，他迁知诰为润州刺史，以亲子徐知训留扬州，掌握朝政。贞明四年（918），知训为朱瑾所杀，徐温以知诰代知训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居广陵（今江苏扬州）。那时徐温在金陵，知诰除军政大事须禀命以外，一般政务即由自己决定。时称知诰为政事仆射。知诰筑延宾亭以招徕四方人士，改革一些弊政，缓征积欠赋税，借以收揽人心。武义二年（920）杨溥立，徐知诰累迁侍中、中书令、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封齐王。

吴天祚三年（937）十月，知诰废杨溥，自称皇帝，建都金陵，国号大齐，年号昪元。次年，自称唐玄宗子永王璘（一云唐宪宗子建王恪）之裔，复姓李，改名昪，国号大唐，史称南唐。

李昪自管理吴国政事以来，兴利除害，又与吴越约和，休兵息戈，在比较安定的条件下，生产迅速发展，不到十年，江淮间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繁盛景象。他建学馆于庐山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后来成为历代有名的书院。昪元七年（943）卒。

【吴越王钱镠】

(852～932) 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的建立者。字具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北)人。

钱镠少年时曾贩私盐。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浙西镇遏使王郢起兵反抗朝廷，临安石镜镇将董昌招募乡兵，钱镠投充偏将，从破王郢。六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南下到临安，他领兵狙击。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高骈赞赏之，遂即推荐董昌为杭州(今属浙江)刺史，以钱镠为都知兵马使。中和二年(882)后，浙东(今浙江绍兴)观察使刘汉宏谋取浙西，与董昌互攻数年。光启二年(886)，董昌采纳钱镠建议，全军渡江进击，消灭了刘汉宏之众，占领越州(今浙江绍兴)，平定浙东。三年，唐以董昌为越州观察使，钱镠为杭州刺史。自此，董昌和钱镠分据浙东、西。

当时，孙儒、杨行密与钱镠争夺润(今江苏镇江)、常(今属江苏)、苏(今属江苏)诸州，这一带处于混战状态。大顺二年(891)，钱、杨联合，钱镠占领了苏州。景福元年(892)合兵，败孙儒于宣州(今安徽宣城)。景福二年，唐以董昌为威胜军(赵州军号)节度使，钱镠为镇海军(今江苏镇江)节度使。

乾宁二年(895)，董昌自称罗平国皇帝，改元顺天。钱镠发兵进攻，三年，攻占越州，杀董昌。唐以钱镠为镇海、镇东(威胜改名)两镇节度使，兼有浙东、西之地。

钱镠势力强大时占地十一州。其子孙又占福州(今属福建)，置秀州(今浙江嘉兴)，共十三州。天复二年(902)唐封钱镠为越王。天祐元年(904)又封他为吴王。开平元年(907)后梁封钱镠为吴越国王。自唐末起，钱镠绕道向中原政权供奉无缺。后梁贞明四年(918)，吴取虔州(今江西赣州)，钱镠改由海路入贡汴、洛。

钱镠晚年敬礼文士，吴越境内的文化有所发展。他在位期间，筑捍海石塘，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潮水内灌。在太湖流域兴修水利，境内河浦，都造有堰闸，以时蓄泄，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这些措施，有利于境内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开拓杭州城郭，大兴土木，悉起台榭，有“地上天宫”之称。后唐长兴三年(932)卒。

【辽太祖耶律亿】

(872～926) 辽朝的创立者。契丹名阿保机，字啜里只。出身迭剌部的显贵家族。这个家族拥有世选本部夷离堇的特权。高祖耶律耨里思、曾祖耶律萨剌德、祖耶律匀德实、父耶律撒剌的世为遥辇氏部落联盟的夷里堇，执掌军事。9世纪末，耶律亿任遥辇氏痕德堇可汗的挞马狘沙里(扈卫官)，率领挞马部(扈卫队)战胜了近邻诸小部，并击溃以蒲古只为首杀害于越(联盟执政者)耶律释鲁的部落豪强。901年，被推为迭剌部夷离堇，主管遥辇氏联盟的军事。又破室韦、乌古、女真等部，俘奚人，掠汉地，因功在903年任于越。905年，唐朝垂亡，他应晋王李克用之邀到云州(今山西大同)相会，结为兄弟，约定共讨梁王朱温和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

但终因无利可图而没有践约。907年，痕德堇可汗死，契丹贵族奉为可汗，称天皇帝（太祖）。耶律亿通汉语，任用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等有才学的汉人为谋士，并采纳韩延徽的建策，置州县，立城郭，定赋税，模仿汉地的制度来管理在战争中俘掠的大量汉人。从此，契丹社会在奴隶制成分仍占重要比重的情况下，封建制成分得以迅速发展。他建立了一支精锐而忠诚的亲军“腹心部”，讨平黑车子室韦、奚等部，尽有其地，确立了森严的仪卫制度。皇权的发展与守旧的契丹奴隶主贵族矛盾日形尖锐，其弟耶律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和于越耶律辖底发动叛乱，均被镇压。916年，耶律亿大会群臣、属部，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庙号辽太祖，建元神册，立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随后，亲征突厥、吐谷浑、党项等部，转掠代北，掳获许多人畜。神册二年（917），晋王李存勗所署新州裨将卢文进降辽。三年，任康默记为版筑使，在潢河以北营建皇都（后称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六年，诏定法律，正班爵，新州防御使王郁率部来降。辽太祖又两次亲统大军南下，肆行俘掠，均被李存勗率劲兵击退。大批降人、俘虏的迁人使辽的实力渐趋雄厚，在长城以北草原上出现了农田、村落、城廓、矿冶、作坊以及寺院与孔庙。又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在参酌旧俗的基础上，援引汉人文法，强化了皇权统治。根据契丹与汉人经济生活的不同，对部落和州县各因俗施治。由于汉人逐渐增多，朝中专设汉儿司主其事。天显元年（926），辽太祖领兵灭渤海国，七月，在归途中病死，葬祖州。

【辽太宗耶律德光】

（902～947）辽朝第二代皇帝。字德谨，契丹名尧骨（或译“耀屈之”）。辽太祖耶律亿次子。天赞元年（922）冬，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引兵掠蓟北。次年春，破平州（今河北卢龙），俘获刺史赵思温等；回师镇压聚众反辽的奚人胡逊（逊或作损），擒杀胡逊及其部属约三百人。三年，从辽太祖西征。四年冬和天显元年（926）春，从征渤海国，又讨平降而复反的府州。辽太祖死，述律皇后摄政。天显二年冬，其长兄耶律倍根据辽太祖的遗愿，率群臣请于述律后立耶律德光为帝，仍以天显为年号。时后唐国势渐盛。三年，后唐义武军节度使王都降契丹，后唐发兵围王都及铁剌于定州。次年春，城破，契丹兵大败。辽太宗对耶律倍的疑忌日增。五年，耶律倍被迫浮海奔后唐。十一年，太原军阀石敬瑭为后唐主所攻，遣使乞援于契丹，相约称儿皇帝，把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十六州（在今河北北部、北京和山西北部）割让给契丹，并每年送帛三十万匹。太宗乃亲率辽军长驱入援，败后唐兵，册石敬瑭为后晋皇帝。从此契丹的势力伸人华北平原。会同元年（938），始改革官制，官分北、南面，因俗而治，北面官以契丹旧制治契丹人，南面官以汉制治汉人。同时，整订赋税。会同三年，辽太宗把北部乌古地区肥美而近便的土地拨给五院部的瓯昆、乙习本两个石烈（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和六院部的斡纳阿剌石烈作为农田。并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五年，石敬瑭死，

子石重贵立，在给契丹的表文中称臣不称孙，两国关系恶化。七年和八年，辽太宗两次兴师伐后晋，一再受挫。但他仍坚持南进，因与述律皇后意见相左。九年，辽太宗倾师南征，后晋兵溃。次年正月，辽灭后晋，辽太宗入汴京（今河南开封），改国号契丹为辽，改元大同。在连年南征中，辽军强征中原人民的粮草，强掠中原人民的财富，使许多州县残破，中原人民纷纷起义反抗。同时，契丹族人民也死伤惨重，厌战心理逐渐滋长。辽太宗在汴京驻留不足三月，就被迫仓促北返。途中，他对侍臣说，"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四月，行至栾城病死，年四十六岁。庙号太宗，葬凤山。

【辽圣宗耶律隆绪】

（971～1031）辽朝第六代皇帝。字文殊奴，辽景宗长子。乾亨四年（982），景宗死，嗣位为皇帝，改元统和。时年十二岁，母承天皇太后奉遗诏摄政，任室昉、韩德让及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以为辅佐，和辑契丹贵族，任用汉人士大夫，积极整治弊蠹，改革法度。统和元年（983），首诏三京左右相及诸道节度使以下官吏，秉公执政，严禁非理征求，扰害于民。三年，以契丹诸役户贫乏，量加优免；六年，从乌古等部之请，把本非土产，而是靠贸易得来的贡品貂鼠皮、青鼠皮，改为只进牛马，以减轻属部的负担。八年，诏括民田，翌年通括户口，十二年均定税法。又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而明令减少。此外，还创设义仓，豁免逋赋，安辑流亡；停止民输官俸，改由内帑支付。史称统和之政，"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

统和四年，辽军大败宋北伐之师，俘获宋骁将杨继业。二十二年，圣宗奉承天皇太后深入河北，翌年十一月兵迫澶渊。宋真宗赵恒领兵亲征。双方达成和议（见澶渊之盟）。此后，辽宋间基本上保持长期的和平相处。统和十二年，圣宗任皇太妃萧氏和大将萧挞凛经略西南及西北诸部。二十一年，在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以北筑可敦城。以可敦城为镇州，又设防州、维州，以镇抚北边诸部族。

二十七年，承天皇太后死，圣宗主政。向高丽及西北诸部发动战争。次年因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王诵，擅立其从兄王询，乃大举亲征，进焚开城而还。以后连岁遣军侵掠，开泰七年（1018）大败于茶、陀二河之间。在西北，开泰元年，沿边诸部皆叛，阻卜（鞑靼）国兵进围镇州。二年乌古、敌烈部叛。太平六年（1026），辽军征甘州回鹘，失利，阻卜诸部复叛，寻被平复。开泰六年，辽军且远征喀什噶尔，声威远播于中亚。

在圣宗统治时期，辽的国力达到全盛并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①在刑法和科举等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变革。统和元年，枢密院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论处。早先契丹人与汉人相殴致死，判罪轻重不同；在承天皇太后主持下，改为同等科罚，一依汉律论处。贡举取士制度在统和六年开始实行，初行时每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取录进士一至二名，统和后期至十多人，开泰以

后则多至四五十人。②奴隶制因素削弱，封建制因素加强。统和十三年，诏诸道民户，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开泰元年，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自来年正月起，日计佣钱十文，价满则尽遣还其家。六年，驸马萧图玉擅杀无罪奴婢，被削去官职。这些都是奴隶制因素削弱的证明。在圣宗所新增置的三十四部中，如撒里葛、窈爪、耨盌爪、讹仆括、稍瓦、曷术等部，都是取诸宫及横帐大族所有的官私奴隶改置的。他们改隶各部之后，设节度使管理，籍属有司，其身份已不再是奴隶。封建化因素的增强与汉化的加深说明封建制的统治在逐渐确立。

太平十一年六月，辽圣宗死，年六十一岁，在位四十九年，庙号圣宗。他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崇信佛教和道教。他推崇诗人白居易，以契丹文翻译《白居易讽谏集》。所作曲达百余首，说明他的汉文化修养颇高。

【辽天祚帝耶律延禧】

（1075～1128）辽朝末代皇帝。字延宁，契丹名阿果。辽道宗孙。父耶律濬，道宗立为皇太子，大康三年（1077）以耶律乙辛构谗废为庶人，旋被耶律乙辛遣人刺杀。大安七年（1091），耶律延禧以皇孙受封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天下兵马大元帅。乾统元年（1101）正月，辽道宗死，耶律延禧嗣帝位（天祚皇帝）。道宗后期，“群邪并兴，谗巧竞进，贼及骨肉，皇基寝危。众正沦胥，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矣！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十分尖锐。天庆四年（1114），女真部酋长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两败辽师于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小城子）及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次年正月，阿骨打即皇帝位，建国号大金。九月，陷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天庆五年二月，渤海人古欲等反，十月御营副都统、诸行营副都部署耶律章奴反，十二月，天祚帝亲征金朝，全军溃败。六年正月，渤海高永昌据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反辽。七年二月，涞水董庞儿反。八年正月，东路诸州盗贼蜂起，四月纳葛泺人安生儿、张高儿聚众二十万起义，安生儿被杀后，张高儿亡走懿州（今辽宁阜新东北塔营子古城），与霍六哥会合。其年，山前诸路大饥，人相食。保大二年（1122）正月，金陷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天祚帝在鸳鸯泺捺钵，闻讯后急走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一带，遂乘轻骑逃入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大青山中）。在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的秦晋国王耶律淳被拥立为天锡皇帝，据有南京道等地，天祚帝所有仅沙漠以北及西南、西北路两招讨府诸番部族而已。六月，金兵击败来援的漠谟失与西夏军，天祚帝辗转逃亡于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云内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等地。四年七月，复率来投的耶律大石军与阴山谟葛失兵，出夹山，谋为恢复。耶律大石谏阻，不从，因而擅率所部北走，自立为王。天祚帝东进，与金人战于奄遏夏水，兵溃，西走。五年，至应州（今山西应县），为金兵所俘。辽亡。在位二十四年。金降封为海滨王。金天会六年（1128）死。

【西辽德宗耶律大石】

(1087～1143)西辽的创建者。字重德。契丹族人。辽太祖耶律亿八世孙。通契丹文、汉文，善骑射。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初年，曾为翰林承旨，契丹语翰林称“林牙”，故亦名“大石林牙”。历任刺史、节度使。女真族阿骨打起兵灭辽，天祚帝于保大二年(1122)自鸳鸯泊败走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大青山)。其子耶律淳留守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耶律大石与宰相李处温等在燕京拥立耶律淳为帝，号天锡皇帝。耶律淳称帝三个月病死，妻萧德妃权主朝政。不久，金兵攻陷南京，萧德妃西奔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谒天祚帝，被杀。耶律大石在居庸关抗金之役中为金军俘获，保大三年九月逃依天祚帝。天祚帝赦其擅立之罪，耶律大石心不自安。保大四年七月，天祚帝自夹山率师东伐，谋为恢复。耶律大石谏阻，不从，乃自立为王，率二百骑遁走，过黑水(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艾不盖河)，得到白达达部(汪古部)长的资助，驰至辽西北重镇镇州(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这一带本是漠北辽朝治下广大游牧部族之地，未受金兵侵扰。他便在可敦城召集边境内威武等七州和大黄室韦、乌古、敌烈、达密里、阻卜、密儿纪等十八部部众，组成新军，“有战马万匹”，设官置吏，建立了新政权，策划复兴辽朝。并向西北发展，在叶密里河(今额敏河)边建筑了一个城堡。许多突厥部族前来归顺，势力逐渐增至四万户。1130年，他再向西发展，行前致书给西州回鹘王毕勒哥(Bilga Khan)，说要假道西行赴大食，毕勒哥馈送他出境。

据波斯、阿拉伯史家记载，西辽德宗分两路西进。一路拟攻喀什噶尔，但受到挫折。主力向西经伊犁入哈剌汗所辖八剌沙衮(Bala sa ghun)境。时哈剌汗孱弱，属下割录部(Kar lu Ks)和康里部(Kanglis)叛乱，于是便向西辽德宗纳土称臣。西辽德宗乘机夺取了王位，自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同时采用突厥族称号曰“古儿汗”(Gur Khan，众汗之汗)，这就是中国史上所称“西辽”，阿拉伯史家称为“哈剌契丹”(Kara－Kitai)。康国元年(1134)，西辽德宗以八剌沙衮为都城(别称虎思斡鲁朵，意为强有力的宫帐)，傍楚河(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市东南)。哈剌汗所辖地区，原有很多屯田的契丹人居住，这使西辽德宗得以顺利地拓地立国。

西辽德宗讨平康里部的反乱，北向击败了辖戛斯。康国元年，复遣大军东征金朝，至喀什噶尔、和阗后，沿途牛马多死，被迫还师。康国四年五月，开始攻寻思干(撒马尔罕)算端(苏丹)马哈木汗(Mahmud Khan)，败之于忽毡(Khod Jend)。马哈木汗退到寻思干后，重整武备，并求援于其舅父忽儿珊(Khorassan)的塞尔柱算端桑伽儿(Sultan Sanjar)(另说是割录部要求桑伽儿北上河中)。康国八年，桑伽儿渡过阿姆河，“举兵十万”来攻，西辽德宗率契丹、突厥、汉军迎战于寻思干迤北之喀忒汪(Qatwan)。桑伽儿大败。溃退到梯尔哈木(Dirgham)山谷，全军覆没，遗尸数十里，桑伽儿与马哈木汗仅以身免。西辽德宗乘胜北攻不哈剌，并

命其将军 Erbuz（萧查剌阿不?）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沙阿即思（Atsiz）也降服做了西辽的藩属，允贡大量金币、畜产。至此，西辽的疆域已相当辽阔：东起哈密，西至咸海，北达叶尼塞河上游，南抵阿姆河，一时成为中亚一强大帝国。

康国十年，西辽德宗死。西辽至1218年为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所灭，辽朝在中亚又延续了九十四年。

【宋太祖赵匡胤】

（927～976）宋代开国皇帝。960～976年在位。年号先后为建隆、乾德、开宝。涿郡（今河北涿县）人。后周时因战功升任殿前都点检，统率禁军。959年，后周世宗柴荣病逝，继位的恭帝柴宗训只有七岁。960年正月，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国号宋，仍都开封（东京）。

宋太祖在平定李筠和李重进叛乱，稳定内部统治之后，继续进行周世宗开始的统一事业。他遵循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方针，于乾德元年（963）灭荆南和湖南，乾德三年灭后蜀，开宝四年（971）平南汉，开宝八年灭南唐。至此，除吴越、北汉和漳、泉二州外，五代十国时的各个割据政权全被消灭。

宋太祖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了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

宋太祖即位不久，就以优厚的俸禄为条件，解除了曾帮助他夺取政权的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的兵权。提拔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充当禁军将领。接着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的职务，由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司分别统领禁军，各不相属（见三衙）。并由枢密院掌管全国军队的调动、招募、廪给、训练、屯戍、拣选、迁补等军政。三衙统率禁军，但无发兵权，枢密院虽有发兵权，但不统率军队，两者互相牵制，皆听命于皇帝。宋太祖把约一半禁军部署在开封及近畿，另一半屯驻外地，使内外相维，互相制约。经常调换军队的将领，并实行更戍法，定期换防，不使将领与士兵之间、军队与某一地方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他还实行养兵政策，每遇灾荒，就大量招募破产农民当兵，以防止农民起义。

为了防止“君弱臣强”，他削弱了宰相的职权。宰相经常不止一人，在宰相之下还设参知政事若干人。另外又设置枢密使，以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设置三司使，以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为了避免再现藩镇跋扈的局面，他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取消节度使兼领附近数州（支郡）的制度，从平定荆南、湖南开始，每消灭一个割据政权，规定所属各州都归中央管辖，然后逐步将节度使从地方



赵匡胤

调到开封担任没有实职的闲官，由中央派遣文臣任知州、知府，一般是三年一任。各州（府）还设置通判，监督、牵制州（府）长官。为了选拔合格的官员，他沿袭隋唐以来的科举制，晚年还亲自在讲武殿主持考试，以后殿试成为制度，科举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乾德三年，他下令各州，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作必要开支外，其余全部上缴中央政府，调运到开封或指定地点。他还派遣使者到各地选择身强力壮、能征善战者收补禁军，使州郡兵力不能与中央抗衡。宋太祖对辽的目标是收回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见幽蓟十六州），争取用金帛赎买，在位期间与辽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对割据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的党项拓跋氏，持优容态度。

宋太祖的一系列措施，基本上结束了唐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两百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巩固了赵宋王朝的统治，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他用“分化事权”的办法防止大臣专擅，结果形成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他用兵无常帅、将从中驭的办法防止军队叛变，结果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防制“内患”上，必然采取“守内虚外”的方针。宋太祖“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必然给后世造成一系列弊政。

【宋太宗赵炅】

（939～997）北宋第二代皇帝。976～997年在位。年号为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宋太祖赵匡胤同母弟，初名匡义，太祖时改名光义，称帝后又改名炅。他采用宫廷政变的方式，



宋太宗赵光义像

取得政权。即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王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附。次年亲征太原，灭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太平兴国二年下令取消所有节度使所领支郡，各州均直属中央；继续将各地节度使调至开封，解除兵权，使节度使成为一种虚衔。他大大扩充科举取士名额，每科录取人数由太祖时的数十人猛增至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太平兴国四年和雍熙三年（986），两次攻辽，企图收复燕云十六州，都遭到失败，从此对辽采取守势。他曾用政治和军事手段企图消灭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党项拓跋部势力，也没有成功。在位后期，镇压了四川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见王小波、李顺起义）。

【宋真宗赵恒】

（968～1022）北宋第三代皇帝。997～1022年在位。年号先后为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宋太宗

赵炅之子。真宗统治时期，宋代政治制度如职官、科举等日趋完备，社会经济也有发展。景德元年（1004），辽兵大举攻宋，真宗在宰相寇准推动下，勉强北上，至前线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与辽订立澶渊之盟，每年给辽大批银绢，结为兄弟之国。为掩盖澶渊之盟的“屈辱”，真宗与宰相王钦若合谋，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伪造“天书”下降，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建玉清昭应宫等，耗费大量人力财力。

【宋仁宗赵祯】

（1010～1063）北宋第四代皇帝。1022～1063年在位。年号先后为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宋真宗赵恒之子。天圣、明道十余年间，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他在位期间，科学文化有一定发展，但各种社会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皇祐元年（1049）全国军队总数增至一百四十万，达到北宋养兵的高峰。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官员数目也超过真宗时约一倍。康定、庆历年间，西夏几次大举进犯，宋军都大败，后与西夏订立和议，每年给西夏大量银、绢、茶。对辽也屈辱求和，增纳岁币。农民起义、兵变、少数民族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为了解决统治危机，仁宗曾于庆历年间，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充执政，企图对吏治作一些整顿，史称庆历新政，但很快就取消了。仁宗懦弱无能，在位虽长达四十二年，却无所作为。



赵祯

【宋神宗赵顼】

（1048～1085）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1085年在位。年号为熙宁、元丰。宋英宗赵曙之于，继位时不满二十岁。他怀有恢复旧疆的强烈愿望，十多岁时，曾披甲去见祖母曹后；对群臣提到仁宗时辽朝趁宋西边紧张之际，兴端讹诈，便激动得落泪。继位后，即向元老重臣富弼征询治国盛强之道，试图有一番作为。但富弼要他二十年不谈兵。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君臣之间在富国强兵的总目标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神宗遂将革新的重任寄托于王安石，自熙宁二年（1069）开展了蓬勃的变法运动。熙宁年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诸如国家财政的根本好转，封建统治力量的加强，社会经济的显著发展等等，同神宗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但在变法的关键时刻，在抑制豪强、调节社会矛盾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神宗与王安石的分歧也暴露出来。神宗总是经不住豪强兼并势力及其代言人的威吓，一再表现出犹豫动摇，

因而王安石当面批评他“刚健不足”，称他的作为不过是“纸铺孙家所为”，不能压下豪强兼并势力的嚣张气焰，使变法产生更多的成效。随着分歧的扩大，王安石两次罢相，神宗亲自主持变法，用一些唯唯诺诺的庸人如王珪之流趋奉左右，不但失去熙宁年间的开明气象，而且“元丰之政多异于熙宁”，把变法引导到单纯增加财政收入和强化专制统治的道路上。国家专利制度扩大了，如部分川茶因同西北少数民族博易马匹而变为征榷，京东冶铁也成为国家的专利。征榷制扩大的结果，连变法派章惇也不得不承认它的严重性，指出：“京东铁、马，福建茶、盐，一日不去，有一日之害。”于此同时，在神宗主持下，对职官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见元丰改制）。元丰四年（1081），神宗还凭借几年来积蓄的军事力量，对西夏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是年八月，在宋夏交界的弧形线上，宋调动了熙河、秦凤等五路大军，不下四十万，运夫也有二十多万，准备一举攻占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和西平府（今宁夏灵武西南），击破西夏。由于“五路并进，而无大帅”，步调既不一致，各路又互不协同，加上领兵将官高遵裕、王中正辈的庸劣，泾原、环庆两路军屯兵于西平府城下，被西夏决七级渠冲淹，以至溃败逃散，以失败告终。宋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据有了兰州，切断西夏同河西走廊的联系，为环攻西夏造成有利态势；控扼了横山之险，给直取兴庆、西平创造了前沿阵地。为保持这一战果，神宗于元丰五年八月下令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筑城的民夫达十余万人，由鄜延路十余万蕃汉军掩护。城寨距银州二十五里，“地形险固，三面阻崖，表里山河，气象雄壮”，赐名银川寨。西夏以倾国之师来争。主持永乐城修筑和防御任务的是志大才疏不懂军事的徐禧，既不能用以逸待劳之势对来犯的西夏军以迎头痛击，又不知以重兵保护水道，遂陷于西夏军重重包围之中。城陷，徐禧、李舜举和李稷以下数万宋军民夫全部死难，噩耗传来，神宗彻夜绕床不眠，次日对辅臣痛哭失声。自此，郁闷于怀，元丰八年春病死。随后，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宋徽宗赵佶】

（1082～1135）北宋第八代皇帝。1100～1125年在位。年号先后为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宋神宗赵顼之子，哲宗赵煦之弟。他重用蔡京、王黼、童贯、高俅、朱勔、梁师成、杨戬、李彦等人，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是北宋最荒淫腐朽的皇帝。置造作局，专门制造供皇室享用的奢侈品。又设苏杭应奉局，搜括民间奇花异石，用大量船只一批批运至开封，称为花石纲。在开封用人工筑成一座周围十余里的艮岳，在山上兴建亭馆楼台，耗费巨万。设“西城括田所”，以没收荒地及户绝田为名，霸占大量民田。他迷信道教，极力抬高道教的地位，设道官阶二十六等，和政府官吏同样领取俸禄。徽宗的腐朽统治，激起了方腊、宋江等农民起义（见方腊起义）。宣和二年（1120），派人与金朝订立盟约，相约夹击辽朝。在对辽作战中，更加暴露了宋朝政治的腐败与军事的无能。宣和七年金兵灭辽后即乘胜南下攻宋。徽宗慌忙传位给太子桓（钦宗），自称太上皇。



宋徽宗赵佶像

靖康二年（1127）与钦宗同为金朝所虏，押解北上。后死于金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徽宗在艺术上有多方面的成就，能书善画，书法称“瘦金体”。

【宋高宗赵构】

（1107～1187）南宋第一代皇帝。1127～1162年在位。年号先后为建炎、绍兴。字德基，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封为康王。钦宗靖康元年（1126）春，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时，他曾以亲王身份在金营中短期为人质。当年冬，金兵再次南侵，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在河北磁州（今属河北）被守臣宗泽劝阻留下，得以免遭金兵俘虏。金兵再次包围开封时，受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宋廷令其率河北宋兵救援京师，但他移屯大名府（今属河北），继又转移到东平府（今属山东），以避敌锋。宋徽宗和钦宗为金兵俘虏北去，他于次年（1127）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代皇帝。

宋高宗是南宋初年投降派的首领。南宋政权初建，他曾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但不久即赶走李纲，同宠臣汪伯彦、黄潜善等人放弃中原，从南京应天府逃到扬州，一意享乐。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兵奔袭扬州，他狼狈渡江，经镇江府到杭州。迫于舆论压力，他不得不罢免汪伯彦、黄潜善等人。苗傅和刘正彦利用军士对朝政的不满，发动政变，杀宋高宗信用的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和一批宦官，逼迫宋高宗退位。文臣吕颐浩、张浚和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起兵“勤王”，宋高宗得以“复辟”。他继续派使臣向金朝乞降，哀诉自己逃到南方后，“所行益穷，所投日狭”，“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要求金朝统治者“见哀而赦己”，不要再向南进军。对于抗金战争却不作任何有力的部署。九月，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即率臣僚南逃。十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随后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并自明州到定海（今浙江镇海），漂泊海上，逃到温州（今属浙江）。直



赵构

到建炎四年夏金兵撤离江南后，他才又回到绍兴府（今浙江绍兴）、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等地，后将临安定为南宋的都城。

金兵暂停南侵，宋高宗便抽调精兵镇压荆湖、江西、福建等路的农民起义军和盗匪，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虽然在防御金兵方面作了一些部署，任命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只把军事部署作为乞降的筹码，始终没有收复失地的打算。他把金朝派到南宋进行诱降活动的秦桧引为亲信，任为宰相，伙同秦桧加紧进行投降活动，竭力压制岳飞等将领的抗金要求。当绍兴十年（1140）各路宋军在对金战争中节节取胜时，宋高宗担心将领功大势重、尾大不掉，又怕迎回钦宗后自己必须退位，于是下令各路宋军班师，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十一年，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向金朝表示坚决议和的决心。不久，他与秦桧制造岳飞父子谋反冤案，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遂同金朝签订了屈辱投降的绍兴和议，向金称臣纳贡，以换取金承认自己在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的统治权。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和议签订后，按金朝规定，秦桧事实上成了终身宰相，宋高宗虽对他日益猜忌，却仍纵容他专权跋扈，对主张抗战的臣僚加以排斥和打击。即使在秦桧死后，宋高宗仍委任投降派万俟卨、汤思退等人掌政，坚守对金和议条款，每年除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外，送给金统治者贺正旦、生辰等的礼物也“以巨万计”，只要金朝统治者索取玩好，宋高宗立即下令搜访送去。对其统治区的人民，却巧立名目增加搜括，使南宋的赋税名目比北宋时更多，剥削更加残酷。

绍兴三十一年秋，金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南侵，宋高宗又想再次逃离临安府。金海陵王渡江失败，被部下所杀（见采石之战）。宋高宗遣使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准备再次对金议和。宋高宗在当了三十六年皇帝以后，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以“倦勤”，想多休养为由，传位给嗣子赵昚（见宋孝宗赵昚）。他自称太上皇帝，死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

【宋孝宗赵昚】

（1127～1194）南宋第二代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宋高宗赵构无子，立为太子，1162年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即继位为帝。1162～1189年在位。年号先后为隆兴、乾道、淳熙。即位后为岳飞平反，起用张浚为枢密使，命他部署北伐。宋军虽克复宿州治所符离（今安徽宿州北），但随即溃败。隆兴二年（1164）与金订立和议（见隆兴和议），宋向金由称臣改为称侄，“岁贡”改称



赵昚

"岁币"，并减少银、绢各五万两、匹。此后训练军队，整顿财政，与金处于相持状态。宋孝宗是南宋较有作为的皇帝，统治期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有一定发展。淳熙十六年（1189）传位于太子赵惇（宋光宗），称寿皇圣帝。死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

【宋理宗赵昀】

（1205～1264）南宋第五代皇帝。1224～1264年在位。年号先后为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祐、宝祐、开庆、景定。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嘉定十七年（1224），宋宁宗赵扩病死，宰相史弥远废皇位继承人赵竑，拥立理宗，掌握朝政。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死，宋理宗亲政。次年，宋与蒙古联合灭金。在蒙古严重的军事威胁面前，理宗沉湎声色，尊崇理学，听信阎妃，重用权奸马天骥、丁大全和宦官董宋臣，致使国家政治腐败，财政经济濒于崩溃，有人在朝门上题字："檐马丁当，国势将亡。"晚年朝政又为权相贾似道把持，败亡之势已成，只因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王位，南宋才得以苟延残喘。

【西夏景宗李元昊】

（1003～1048）西夏第一代皇帝。小字嵬理，后更名曩霄，李德明长子。通汉文。年二十六岁，奉父命领兵攻破甘州回鹘，被立为皇太子。1031年，李德明死后嗣位，宋授为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辽封他为夏国王。1032年，他废弃唐、宋所赐李、赵姓氏及拓跋旧姓，改姓嵬名，自称兀卒（"青天子"之意）。1034年，建年号开运，下秃发令，臣民限期三天，违者处死；升兴州（今宁夏银川）为兴庆府，扩建宫城，修殿宇；更新官制，分立文武两班，由蕃、汉人分任，另设"专授蕃职"，限党项人充任。定服制、朝仪，官员每六日一朝，称"常参"，九日入朝，称"起居"，并下令废除唐宋的繁琐礼制，改九拜为三拜，革五音为一音。亲自主持创制西夏文；大庆二年（1037），设立夏、汉字院，建立"蕃学"（党项学），并以夏字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书籍作为教材，选拔蕃汉官僚子弟入学学习，以培养官僚后备队伍。广运二年（1035），领兵攻打住居湟水流域的吐蕃唃厮罗部，镇压散居肃（今甘肃酒泉）、瓜（今甘肃安西东）、沙（今甘肃敦煌东）三州的回鹘叛部。回师占领兰州（今属甘肃），筑城戍守，隔断吐蕃和宋朝的交通。他实行征兵制，扩充兵员，并把全国分为左右两厢，创设各地监军司，军队沿用部落组织形式，各有固定驻地，形成以首都为中心、列兵四向的兵力配置，全国可征兵额总计约五十万人。

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十月，他更名曩霄，建国号大夏，自称皇帝。进表宋朝，要求承认建国称帝的既成事实。宋朝下令削赐姓官爵、禁断互市贸易。双方随即发生战争。夏军在三年、四年、五年连续发动进攻，取得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及定川寨（今甘肃固原西北）等战役的胜利。七年，双方重新媾和。西夏景宗进誓表以夏国主称臣，宋朝同意每年给予银、绢、茶、采共二十五万五

千两、匹、斤，并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置榷场互市。

夏宋媾和，夏辽矛盾随着激化。西夏景宗与辽兴平公主婚后失和，再加这时辽境内的党项部落多叛附西夏，纠纷益形扩大。七年，辽兴宗亲率大军西征，为西夏景宗所败。从此夏、宋、辽三方鼎峙的局势形成。

在西夏内部，皇权急剧扩张，激化了和党项贵族势力的矛盾。西夏景宗实行“峻诛杀”的政策，先后镇压了一些反对势力。他夺娶太子宁凌噶妻没啰氏，号称“新皇后”。在天都山兴庆府及贺兰山等处修宫苑，纵情声色。在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正月十五，宁凌噶入宫行刺，西夏景宗受伤而死。谥武烈皇帝，庙号景宗，陵号泰陵。

【西夏毅宗李谅祚】

（1047～1067）西夏第二代皇帝。周岁即位，母没藏氏以太后称制。福圣承道四年（1056），太后死，太后兄没藏讹庞以女妻西夏毅宗，把持政权。毅宗十二岁开始参与国事。讹庞借故诛杀毅宗亲信六宅使高怀昌、毛惟正。毅宗与讹庞儿媳梁氏有私，讹庞父子密谋欲杀毅宗；梁氏告变，毅宗在大将漫咩等的支持下执杀讹庞及其家族，又杀妻没藏氏，立梁氏为后，结束了没藏氏专权的局面。他以后弟梁乙埋为国相，引用汉族士人景询等任职。他废行蕃礼，改从汉仪，并曾向宋朝请求恢复姓李，但遭到宋朝的拒绝。他调整监军司，加强军备，并控制军权，使文武互相制约。又增设汉、蕃官职，充实行政机构。不断发兵侵扰宋边。拱化五年（1067），诱杀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宋将。又企图征服河湟吐蕃，乘唃厮罗与辽失和，率兵直攻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先后收降了吐蕃首领禹臧花麻及木征等，巩固了西夏的南疆。他亲附辽朝，向辽进贡回鹘僧、金佛和《梵觉经》。拱化五年十二月死。谥昭英皇帝，庙号毅宗，陵号安陵。

【西夏崇宗李乾顺】

（1083～1139）西夏第四代皇帝。夏惠宗死，乾顺年三岁嗣位。母梁氏，乙埋女，尊为太后，与弟乙逋擅政，连年进侵宋边。乙逋骄矜跋扈，被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杀死。梁太后携崇宗率大军五十万攻宋，破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北），献宋俘于辽。宋军沿边筑寨，紧步逼攻，夏兵败退。西夏卑词求和，宋朝罢兵。永安元年（1099），梁太后死，崇宗亲政，年十七，谨事辽朝，出兵助平叛辽的拔思母部。又向辽乞婚，辽以宗室女封公主许嫁。宋童贯总领陕西六路大兵攻夏，双方互有胜败。金灭辽前夕，他曾出兵援辽，支持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后臣附于金。他爱好汉族文化，创办“国学”以传授汉学，培养官员。制定按照资格任官的法令，对文学优长者特加奖擢。曾撰《灵芝歌》，与大臣唱和，歌词刻石置于学校。西夏在他统治时期，确定君主集权的体制，结束了累朝出现的外戚贵族专政的局面。颁布等级制的官阶封号，除皇帝及帝位继承人外，分为七品，西夏政治制度日臻完备。大德五年（1139）死。谥圣文皇帝，庙号崇宗，陵号显陵。

【西夏仁宗李仁孝】

（1124～1193）西夏第五代皇帝。西夏崇宗李乾顺长子，母汉人曹氏。即位时年十六岁。他对金朝采取恭顺态度，在内政方面，重视文化教育，全国州县普设学校；在宫廷里建立皇家小学，重视宗室子弟的学习教养，还亲身参加训导；并在京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设置太学，隆重兴行“释奠礼”；在各地修建孔庙，追尊孔子为文宣帝。人庆四年（1147），立“唱名法”，开创了西夏的科举制。又成立“内学”，选名儒讲学。又设立翰林学士院，编撰国史实录。他也提倡佛教，从汉地罗致大批佛典，从高昌延请回鹘僧译经说法，并虔诚供奉来自西藏的喇嘛教徒，尊为国师，传授密法经义和轨仪。在他统治时期刻印了大量佛经，乾祐二十年（1189）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散施夏、汉《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十万卷，汉《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五万卷。大庆四年（1143），哆讹等领导蕃部人民起义，后被外戚任得敬镇压。任得敬以功任国相，仁宗被胁迫“分国”。依靠金朝的支持，他诛杀任得敬及其党羽。乾祐二十三年死。谥圣德皇帝，庙号仁宗，陵号寿陵。

【金太祖完颜旻】

（1068～1123）金朝开国皇帝。汉名旻。女真名阿骨打。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阿什河）女真完颜部人。祖父乌古迺、父劾里钵世为完颜部首领，辽授予节度使称号。叔父颇剌淑、盈歌相继击败女真诸部，组成部落联盟，任联盟长。辽乾统三年（1103），盈歌死。阿骨打长兄乌雅束任联盟长，天庆三年（1113），病死。

阿骨打参与对女真各部的战争。屡有战绩，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次年辽授为节度使。与完颜部为敌的女真纥石烈部长阿疏逃奔辽朝。完颜旻遣使去辽索要阿疏，得知辽朝内部虚弱。天庆四年，起兵反辽，集女真诸部兵于涞流河（今黑龙江与吉林省间拉林河）畔，得两千五百人，申告天地，传梃誓师。侵入辽境，射死辽将耶律谢十。十月，攻占混同江东的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小城子）；十一月又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大败辽军（见出河店之战）。乘胜分路进击，连破宾州（今吉林农安东北红石垒）、祥州（今吉林农安境）、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镇）等地。

1115年正月，完颜旻建国号金，年号“收国”，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九月，统率金兵攻克辽北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十二月，于护步答冈（今黑龙江五常以西）破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亲征大军。收国二年，乘渤海人高永昌据东京返辽之机，遣兵杀高永昌，夺取辽东半岛以东地区。同年十二月，加号大圣皇帝（太祖），次年改年号为天辅。

在完颜旻攻克宁江州后，把女真传统的猛安谋克制度，改为“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使之成为军事行政组织。皇帝设立勃极烈（相）辅政。谙版勃极烈由弟完颜晟充任；国论忽鲁勃极烈掌军事，由原部落联盟的国相（国论勃极烈）完颜撒改继任；阿买勃极烈，由完颜习不失担任；国论昃勃

极烈由弟完颜杲（斜也）担任，分理国政。以后又设国论乙室勃极烈、移赉勃极烈等职。天辅三年（1119），颁行女真文字。四年，再次率军攻辽，占领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波罗城）。与宋朝相约，夹攻辽朝，灭辽后，燕京地归宋。五年，因辽都统耶律余睹来降，得知辽国内虚实，遂下诏兴师灭辽。六年，攻占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西京（今山西大同）等地，辽天祚帝西逃夹山（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完颜旻亲自统军占领辽南京析津府（燕京，今北京），派兵追击天祚帝。七年，把掳掠一空的燕京六州按原约交与宋朝。八月，领兵返回上京。行经部堵泺西行宫，病死于途中。九月，葬于上京宫城西南。天会三年（1125），谥武元皇帝，庙号太祖。十三年，改葬和陵（后称睿陵）。贞元三年（1155），改葬于中都西南大房山。

【金太宗完颜晟】

（1075～1135）金朝第二代皇帝。女真族。女真名吴乞买。金太祖完颜旻之弟。收国元年（1115）为谙版勃极烈辅政。金太祖统军伐辽时，他留守京都，总管朝政。天辅七年（1123）八月，金太祖死，九月，继帝位（太宗），改年号天会。他继续发兵攻辽，天会三年（1125），俘辽天祚帝耶律延禧，辽亡。同年十月，命金军分两路南下侵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大同逼进太原，在太原受阻。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从平州（今河北卢龙）出发，在白河大败宋军，收降宋燕山府（今北京）守将郭药师，长驱渡河，进围宋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宋被迫请和，许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属河北）三镇，对金称侄。次年八月，又发兵两路攻宋，破开封城，俘徽、钦二帝，北宋亡。天会七年至八年，金兵追击宋高宗赵构过长江，直至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并攻入江西、湖南等路。遭到江南人民的抗击被迫北撤。金太宗的南下扩张政策，造成中原甚至江南经济的严重破坏。在山东、河南、陕西之地，立宋降臣刘豫为傀儡皇帝，国号齐，都大名（今属河北），作为金朝属邦。

金太宗在女真本土上京路一带，仍沿用女真统治制度。在新占领的辽、宋地区，采用辽宋旧制建尚书省，并开科举，考选汉、契丹等族文士参预统治。经济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女真部民原实行授田制，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二十五口，即授田四顷零四亩。天会三年，诏令每耕牛一具，赋粟一石，每谋克部自为一廪贮存，以备荒年饥馑。五年，下诏实行赋税制，规定“每牛一具，赋粟五斗”。多次下诏敦劝农功和派遣使臣到各地劝农。下令禁止内外官及宗室不得私役百姓。规定权势之家不得买贫民为奴。胁迫买者，一人偿十五人；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罪皆杖百。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落后的女真奴隶主对中原华北地区的毁灭性破坏，使奴隶制的发展有所限制。天会十三年正月，吴乞买病死，在位十三年。谥文烈皇帝，庙号太宗，葬和陵（后改称恭陵）。贞元三年（1155），改葬中都西南大房山。

【金熙宗完颜亶】

(1119～1149) 金朝皇帝。女真族。女真名合剌。金太祖完颜旻嫡长子完颜宗峻之长子。天会十年(1132),在完颜宗斡、完颜宗翰、完颜宗辅、完颜希尹等诸宗亲勋贵的支持下,受任为谙版勃极烈,确定为皇位继承人。十三年,金太宗死,即帝位(金熙宗)。

金熙宗即位前曾受学于汉人文士韩昉,能用汉文赋诗作字,喜雅歌儒服。即位以后,尤勤于汉文典籍的学习。他即位后,金朝对女真旧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废除勃极烈制度,改行辽、宋的汉官制度,设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天眷元年(1138),正式颁行官制及换官格(即将原女真、辽和宋的官职依照新制统一换授),并确定封国制度,规定百官的仪制与服色,号为"天眷新制",同时任命卢彦伦营建宫室。当年还正式颁布女真小字,较女真大字笔画简省(见女真文字),皇统五年(1145)正式行用。金熙宗时,女真贵族派系斗争激烈。完颜宗翰于金熙宗即位之初,即被罢免都元帅,完全削除兵权。天会十五年,金廷杀其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等,完颜宗翰愤郁而死。金朝遂废完颜宗翰支持的刘豫齐国傀儡政权,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天眷元年,完颜宗磐、完颜宗隽、完颜昌等把持朝政,力主对宋和议,割让河南、陕西之地,诱使宋对金称臣。天眷二年,金熙宗依靠完颜宗弼、完颜宗斡、完颜希尹等,先后杀完颜宗磐、完颜宗隽、完颜昌等人。完颜宗弼掌握金朝军政大权,于天眷三年率重兵攻宋。金军被宋将刘锜、岳飞等战败,仍于宋军班师后,夺取河南之地。完颜宗弼又奏请杀完颜希尹。皇统元年十一月,宋、金达成和议,南宋向金纳币称臣,双方划定以淮水为界。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

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熙宗在废刘豫齐国之后,置屯田军,将契丹、女真人自东北徙入中原地区,与汉人杂处。按户授予官田,使业耕种,春秋量给衣物、马匹,以资接济;若遇出军,始发给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皇统五年(1145),又颁行皇统新律,共千余条。"大抵皆依仿大宋,其间亦有创立者。"所有这些措施,对于加速金朝的封建化和接受汉文化方面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完颜宗斡、完颜宗弼等辅弼大臣死后,皇后裴满氏干预朝政。皇统二年十二月,皇太子完颜济安死,由于裴满氏的牵制,皇嗣始终无法确立。金熙宗酗酒,乘醉杀人。其弟完颜元、完颜查剌、裴满后及妃嫔多人都遭杀戮,群臣震恐。九年十二月,太祖孙、完颜宗斡子完颜亮、驸马唐括辩,寝殿小底大兴国等合谋将熙宗刺死。在位十五年。

【金海陵王完颜亮】

(1122～1161) 金朝皇帝。女真族。字元功,女真名迪古乃。金太祖完颜旻之孙,完颜宗斡次子。金熙宗朝官至右丞相兼都元帅、太保领三省事。皇统九年(1149)完颜亮与左丞相秉德、驸马唐括辩等合谋,刺杀熙宗,即皇帝位,改元天德。严厉镇压反抗的宗室官员。

先后诛杀曹国王完颜宗敏、左丞相完颜宗贤、太傅领三省事完颜宗本、判太宗正府事完颜宗美、东京留守完颜宗懿、北京留守完颜卞，以及金太宗完颜晟子孙七十余人，完颜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又杀秉德、唐括辩、大将完颜杲、撒离喝、平章政事完颜宗义、前工部尚书谋里野、御史大夫完颜宗安。在诛杀女真宗室贵族的同时，大批起用渤海、契丹、汉人人才，以扩大政权的基础，巩固统治。天德三年（1151）扩建燕京城（今北京），兴修宫室，下诏迁都。贞元元年（1153）改燕京为中都，作为金朝的都城，并将诸宗室亲族及其所属诸猛安尽数迁至中都及山东等地，以防止反乱。天德二年罢行台尚书省，又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作为中央最高的军事管理机关。三年，罢世袭万户职，以改变贵族"子孙相继"，专揽威权状况。仿中原王朝制度，设国子监以教育生员。对科举进行改革，废除金太宗以来的南、北选制和熙宗时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的办法，专以词赋取士。贞元二年复钞引法，印制交钞，与铜钱并行。正隆元年（1156）颁行正隆官制，罢中书、门下，只设尚书省，自省而下，官司有院、台、府、司、寺、监、局、署、所，各统其属，职有定位，员有常数。同时又颁行"续降制书"，补订法律，与熙宗时的皇统制并行。正隆三年，又命左丞相张浩等营建南京（今河南开封）宫室，征调各路军兵，征发军资器械，修造海船，准备南侵灭宋，统一中国。六年二月，他从中都出发南巡，六月，抵南京。这时，北边契丹诸部的反抗已风起云涌，内地人民因海陵王筹集攻宋的军备，横征暴敛，也纷起反抗。海陵王亲自督大军渡淮河，出庐州（今安徽合肥）。命工部尚书苏保衡率水师由海道直趋临安（今浙江杭州），另有西蜀道和汉南道两军以为牵制。十月，任东京留守的曹国公完颜雍（乌禄）发动叛变，称帝于辽阳。海陵王继续南进。苏保衡所领的水师出胶州湾海口，行至胶西陈家岛时，遭到宋将李宝水师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十一月，完颜亮所率大军在采石矶希图渡过长江，为宋虞允文所败（见采石之战）。他于是率兵还和州（今安徽和县），趋扬州，计划从瓜洲（今江苏扬州南）渡江。先一日，军中发生叛变，海陵王被军将完颜元宜等杀死。年四十，在位十三年。金世宗大定二年降封海陵郡王，谥炀。后又降封为海陵庶人，史称海陵王。

【金世宗完颜雍】

（1123～1189）金朝皇帝。女真族。本名乌禄，汉名完颜裒，即位后更名雍。金太祖完颜旻之孙，完颜宗辅之子。金熙宗朝封葛王，任兵部尚书。金海陵王完颜亮时，累官东京留守，改封曹国公。正隆六年（1161）海陵王兴师侵宋，西北路契丹人怨苦征兵，爆发了由撒八领导的大起义。完颜雍受命率兵镇压。十月，奉调南征的万户完颜福寿等领兵两万余在山东哗变，逃回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拥完颜雍称帝（世宗），改元大定，十二月，进据中都。世宗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崇尚儒学，究心于历代王朝的统治经验与儒家的仁政王道。他即位后，政治制度基本上仍沿用海陵王改革后的成制。继续任用海陵王时的文武官员，并极力争取女真贵族的支持。

大定二年（1162），平定契丹人移剌窝斡等起义军（见移剌窝斡起义）。二年至四年间，又一再挫败宋军，迫使宋朝在四年冬重订和议。南宋对金称侄皇帝而不再称臣，每年向金贡纳银、绢二十万两、匹；双方各守旧疆。此后的三十年内，金宋之间再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他采取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招诱流亡复业，保护和奖励发展农业生产。大定四年命张弘信等十三（一说二十四）名官员分检诸路物力，五年立诸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使既增加政府的税人，又使人民的负担能相对的合理均平。又诏令放免二税户和部分奴婢为平民，取消金银矿税，听民开采；一度下令罢诸关征收商税，恢复和增设了与南宋、西夏的榷场。这些措施对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四年诏造总计录，使朝廷通知有余不足之数，且以革去吏奸。大定年间，金朝财政充足，仓廪有余，政治局面稳定。故金朝有“小尧舜”之誉。但金世宗在实行汉制的同时，又大力推行民族压迫，维护女真旧俗，一再拘括汉人田地，分配给女真猛安谋克人户，这是他在位时的消极方面。1189年正月，病死，在位二十九年。

【金章宗完颜璟】

（1168～1208）金朝皇帝。女真族，汉名璟，女真名麻达葛。金世宗完颜雍之孙。宣孝太子完颜允恭之子。大定十八年（1178），完颜璟年十一岁，封金源郡王。以后从太子侍读进士完颜匡、徐孝美学习女真语言、女真小字及汉字经书。二十五年，太子完颜允恭病死。完颜璟以嫡孙成为世宗皇位继承人，出判中都大兴府事，又任尚书右丞相等职，参预朝政。次年，立为皇太孙。二十九年，世宗死，即帝位（章宗）。他进封诸皇叔、诸弟王爵，又减民地税十分之一，河东南、北路十分之二，下田十分之三。设置提刑司，以宣抚按察地方。于亲王府设王傅、府尉官，以限制诸王。又大兴郡学，提倡儒术。他统治时期北方蒙古、塔塔儿等游牧部族不断南下侵扰，他先后派兵征讨，大败塔塔儿部。为防御北方游牧部族的侵掠，曾在北边修建界壕。在南方，曾击退宋朝韩侂胄等的北伐，但受到巨大损失，黄河三次大决口，给金朝财政经济造成很大困难。金章宗为解脱困境，大量发行交钞。同时采用通检推排、括田等办法，以增加赋税。这些作法都不能阻止金朝走向衰落。章宗是金朝汉文化最高的一位皇帝，诗词创作甚多，又爱好书法、绘画，在朝中设立书画院，搜集散佚的书籍和书画名品，尤其推崇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书。四十一岁病死，在位十九年。

【元世祖忽必烈】

（1215～1294）元朝的创建者。庙号世祖，蒙语尊称薛禅皇帝（Sečn qahan）。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的第二子。

蒙古灭金，据有中原地区以来，习惯于游牧的蒙古贵族，把他们原有的落后制度强加于汉地，造成了政治混乱、生产破坏的恶果。这种情况，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蒙古的统治，因而需要有所改革。忽必烈为藩王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热心于学习汉文化。先后召僧海云、僧子聪（刘秉忠）、王



元世祖忽必烈像

鹗、元好问、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问以儒学治道。1251年，长兄蒙哥即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南驻爪忽都之地。先后任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屯田唐、邓，都收到积极效果。1253年，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忽必烈又在这里任诸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使关陇地区的吏治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些成效更加深了忽必烈采行汉法的认识，并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通过交相引荐，聚集在他的幕府里，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同年，忽必烈受命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灭大理国。年底，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继续经略云南诸地。1256年，命僧子聪卜地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建开平城，修筑宫室。忽必烈采行汉法的活动招致了蒙哥的不满。1257年，蒙哥遣使勾考关中、河南财赋，藩府诸臣都受罗织致罪。忽必烈采用姚枢建议，送家口前往和林，以为人质，并亲身入觐，始取得蒙哥谅解。蒙哥停止了勾考，但仍尽罢其所设置的行部、安抚、经略、宣抚、都漕诸司。1258年蒙哥兴师伐南宋，忽必烈初以足疾家居休养，后因负责东路的诸王塔察儿进攻襄、郢地区无功受谴，蒙哥授命忽必烈代总东路军。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师抵淮河，蒙哥在合州前线病逝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仍挥军自阳逻堡渡长江，围鄂州（今湖北武昌），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这时，得悉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擅自征兵，图谋汗位的消息，忽必烈立即采纳汉人儒士郝经的献计，与宋约和，轻骑北返燕京。

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推戴下，即汗位于开平，建元中统。在诏书中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提倡“文治”的政治纲领。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更改蒙古旧制，采行汉法，建立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制封建政权。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以王文统任平章政事，在各地分设十路宣抚司，任汉人儒士为使。同年五月，阿里不哥也在部分留居漠北的诸王拥戴下，称大汗于和林。忽必烈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为依托，出兵击败阿里不哥。在与阿里不哥鏖战的同时，中统三年（1262）春，益都行省李璮乘机叛乱，被忽必烈迅速镇压。这两件事都对当时的政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阿里不哥的失败意味着草原诸王保守势力受到挫折，使忽必烈能较少牵制地推行仪文制度改从汉法的基本政治纲领，而李璮的叛乱又强烈地引起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汉人诸侯的世袭制度，削弱这些家族的军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等等，一方面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可严密对汉人的防

范。此外，又在各级政权中引用色目人分掌事权，使与汉人官僚相互牵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政治意图下兴建的新王朝，其创制立法，始终着眼于在保持蒙古贵族统治特权的前提下，对旧制作必要的更改，使政权机构能大体上符合汉地的统治需要，又足以确保蒙古贵族的既得利益。

中统五年八月，忽必烈又改元为至元。经过从中统元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新王朝的各种制度大体上确立下来。至元八年（1271），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次年，确定以大都为首都，标志着新王朝的政权建设已全部完成。元朝政权在总体上是取法于中原前代王朝的体制，与中原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也保留了不少蒙古的落后旧制。因此，这个政权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作用也比较复杂。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恢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对人民的赋役剥削限制在一定的数额之内，较之前此的黑暗混乱是一大进步。忽必烈很重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等。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有些地区有所发展，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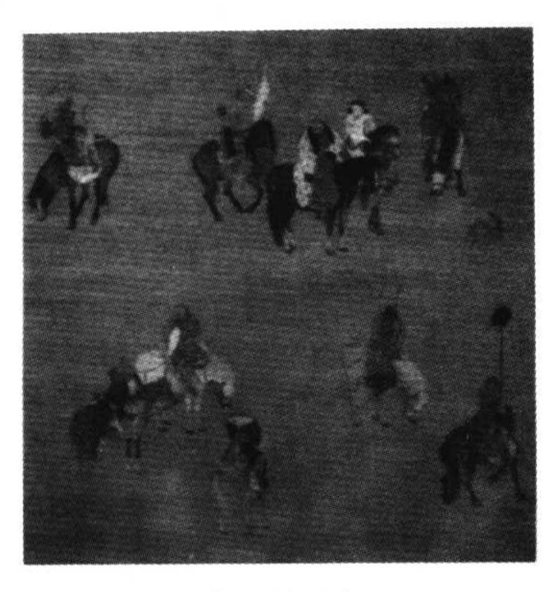
但是，这个政权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后旧制。如：分封采邑制度（投下二五户丝制）；遍及于各生产领域的驱奴制；手工业中的官工匠制度；商业中的斡脱制；贵族世袭的选举制度以及民族压迫政策等等。这些制度在元朝一代始终保留下来，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愈益激化。

在建成新王朝、稳定对北方统治的同时，忽必烈又积极着手统一南宋的战争，至元十一年，命伯颜大举伐宋。十三年，下临安，十六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发展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南北方的统一也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前景，其影响都十分深远。

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的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了发展。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这时，早年追随忽必烈，并在元王朝的创制中起过重要作用，对忽必烈具有影响的汉人官僚或逐渐被疏远，或相继谢世。忽必烈所依任的是回回人阿合马。阿合马从中统初便主管中央财政，多方搜刮，权势日重。至元十二年右丞相安童出镇西域后，阿合马独擅朝政。汉人官僚不满于阿合马所为，斗争一直很激烈。忽必烈始终左袒阿合马而逐渐疏远汉官，朝政进一步向黩武嗜利的方向发展。十九年，大都发生了王著、高和尚



元世祖忽必烈像



忽必烈出猎图

刺杀阿合马事件，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加剧。此后，忽必烈又先后任卢世荣、桑哥专理财政，都以失败告终。同期，忽必烈接连派遣军队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与爪哇，都遭到失败。外侵战争不仅给邻国造成破坏，带来痛苦，而且对本国人民也是极大的灾难，因而受到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但抗击海都、笃哇等西北诸王的侵扰和平服东北诸王乃颜叛乱，却保护了东北和西北广大边疆的安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按照蒙古的习俗，忽必烈置四斡耳朵，分属四皇后。大斡耳朵属长妻弘吉剌氏察必皇后。十八年，察必去世，继娶其妹南必为皇后。忽必烈素有足疾，晚年体弱多病，相臣常不得入见，往往通过南必奏事，因此南必皇后颇干预国政。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忽必烈病逝，年八十，在位三十五年。子十一人。第二子真金早立为皇太子，先忽必烈去世。至元三十年，始以皇太子宝授真金第三子铁穆耳（元成宗），确定为皇位继承者。

【元成宗铁穆耳】

（1265 ~ 1307）元朝第二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次子真金第三子，母弘吉剌氏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至元二年（1265）生。十年，忽必烈立真金为皇太子，二十二年真金死后，忽必烈一直未确定继承人。至元末，铁穆耳受命平乃颜余党合丹。三十年，统军镇守漠北，受皇太子宝。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去世。四月，蒙古诸王贵族召开选举皇帝的忽里台于上都。会上，铁穆耳与长兄晋王甘麻为继承皇位竞争激烈。由于其母阔阔真可敦与权臣伯颜、玉昔帖木儿等的支持，铁穆耳继帝位。建元元贞（1295 ~ 1296），后改大德（1297 ~ 1307）。铁穆耳鉴于忽必烈晚年宠信桑哥、用兵海外等错误，优礼汉人旧臣，限制诸王投下的非法活动，罢侵日本、侵安南之役，减免江南地区的一部分赋税，又令编辑整理律令。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因此，他在位前期基本上保持了守成的局面。但是，为了酬谢拥立他的诸王贵戚而滥增赏赐，很快造成国库“向之所储，散之殆尽”，“岁入之数，不支半岁”的枯竭局面，只能依靠挪用钞本来维持，导致钞币迅速贬值。在用人上，他所倾心任用的仍是伯颜（赛典赤孙）、阿里等一批色目官僚。他在位后期，因连年患病，这些色目官僚与皇后卜鲁罕内外勾结，淆乱朝政，官场中贪污因循的风气大盛。为了能建功后世，提高威望，铁穆耳又发兵征讨八百媳妇（今泰国北部等地），使西南大扰，酿成云南、贵州各族人民起义。这些举措都导致国力空虚，政治

日趋黑暗。但他在位时，元军成功地击败了海都、笃哇的侵扰，迫使察合台和窝阔台两兀鲁思的统治者息兵请和，重振大汗在西方诸汗国中的宗主地位，基本上结束了西面延续四十多年的皇室内争。大德十一年正月，铁穆耳病逝. 在位十四年。庙号成宗。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1285～1320）元朝第四代皇帝。蒙古语称普颜笃皇帝（Buyantu qahan）。元成宗铁穆耳兄答剌麻八剌次子。母弘吉剌氏答己。早年师事李孟，接受儒家思想影响。大德九年（1305）奉成宗诏出居怀州。十一年，奔成宗丧，回到大都，与丞相哈剌哈孙合谋，拥立统军北边的长兄海山（即元武宗）为帝。武宗封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卒，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帝位。他力图改变武宗时造成的财政枯竭、政制混乱的局面，罢尚书省，废至大银钞（见钞），处死武宗权臣脱虎脱、三宝奴等人，整顿朝政，减裁冗员，停止浩大的土木工程，限制诸王驸马横行害民，开始编纂律令，并在延祐元年（1314）施行科举。又在江浙、江西、河南经理田土（见延祐经理），进行田产登记，由于地主阶级的抵制和执行官吏的苛暴，引起人民反抗，这一措施终于被迫停止。在西北，任用大将床兀儿统军，连败察合台后王也先不花，从此西北边疆未再发生叛乱。但是他的统治对前朝的弊政并没有太多的改善。倖臣铁木迭儿依仗答己太后的宠信，贪赃枉法，作恶多端，仁宗虽厌恶他，终不能制裁。按照武宗即位时的盟约，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位应由武宗子和世㻋继承，但他毁约，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元英宗）为皇太子，令和世㻋出居云南，和世㻋于中途抗命，失败后避往阿尔泰山以西。这一事件，招致不少诸王和武宗旧臣的不满。延祐七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病逝。在位十年，年号皇庆（1312～1313）、延祐（1314～1320）。庙号仁宗。

【元英宗硕德八剌】

（1303～1323）元朝第九代皇帝。蒙古语称格坚皇帝（Gegehen qahan）。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长子，生于怀庆（今河南沁阳），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延祐三年（1316），立为皇太子。七年正月仁宗死，即帝位。时仁宗母答己太后任过去被仁宗罢黜的权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相互勾结，排除异己，诛杀前平章政事萧拜住、杨朵儿只，权倾朝野。硕德八剌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立太祖功臣木华黎后裔拜住为左丞相，极力抑制答己、铁木迭儿一党的势力。至治二年（1322）八、九月，铁木迭儿、答己相继去世。十月，立拜住为右丞相，表示要“励精求治”、“一新机务”。此后数月，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如张珪、吴元珪、王约、吴澄、王结、宋本、韩镛等人一时均得擢用；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这些措施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

古贵族的反对。三年八月初，尚存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阴谋发动政变，密遣心腹去漠北，约晋王也孙铁木儿为援，许以事成后立之为帝。当月五日，硕德八剌、拜住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被铁失等刺杀。史称“南坡之变”。也孙铁木儿闻讯后称帝，是为泰定帝。

【元文宗图帖睦尔】

(1304~1332) 元朝第十二代皇帝。武宗海山次子。英宗时出居海南。泰定帝时召还，封怀王，居建康，后迁江陵。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死，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在大都发动政变，谋立武宗子为帝，遣使至江陵迎接入都，道过河南，行省平章伯颜发兵护送北上。八月，梁王王禅、丞相倒剌沙等拥立泰定帝子阿剌吉八于上都，改元天顺，发兵攻大都。九月，图帖睦尔接帝位于大都，改元天历，在燕帖木儿及其所属钦察军团和一部分武宗旧部的支持下，击败王禅、倒剌沙等，取上都；接着又调兵平定了四川、云南的反对集团。武宗长子和世㻋在仁宗时被迫出走，留居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以西之地，图帖睦尔在即位诏中曾表示“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并遣使迎接和世㻋回朝。天历二年（1329），和世㻋得讯南还，在和林北即帝位，是为明宗，当明宗南行至上都附近的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张北县北）时，名义上已逊位的图帖睦尔与燕帖木儿前往迎接，伺机毒死明宗。于是图帖睦尔复于八月即位于上都。次年，改元天历。他在位期间，创建奎章阁，编修《经世大典》，封赠先儒，亲祀南郊，颇有意于兴文治。当时回回官僚集团，因倒剌沙等的失败而受到严重打击，因此色目人在朝廷上的政治势力被削弱，而钦察官僚集团则权势大增。燕帖木儿独揽相权，“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政事一决于他，甚至立太子也要先取得他的同意。燕帖木儿擅权恣纵，故吏治继续败坏，财政愈趋竭蹶，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一直很尖锐。至顺三年（1332）八月，病死。庙号文宗。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

(1320~1370) 元朝末代皇帝。蒙古语乌哈笃皇帝（Uqahatu qahan）。元明宗和世㻋长子。和世㻋被害暴死后，其弟图帖睦尔（元成宗）取得帝位，将妥欢贴睦尔徙居于高丽大青岛，一年后，又移于静江（今广西桂林）。至顺三年（1332）文宗去世，遗诏让位于明宗子，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即位，是为宁宗，在位五十三日而卒。四年六月，妥欢贴睦尔即位于上都。

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任命有拥戴之功的伯颜为中书右丞相。伯颜与左丞相唐其势（见燕铁木儿）等争权夺利，斗争激烈。元统三年（1335），伯颜以唐其势集团“私蓄异志”为名，杀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鸩死其妹皇后伯牙吾氏。于是伯颜独秉国政，专权自恣，排斥儒生，废除科举制。当时政府横征暴敛，贵族、官僚、寺院获得大量赐田，一般地主加紧兼并土地，统治集团纵情享受，挥霍浪费，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处于苦难深渊的广大劳动人民，被迫纷纷发动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震撼

着元朝的统治。妥欢贴睦尔为了加强统治，下令严禁汉人、南人私造私藏兵器和喂养马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

后至元六年（1340），妥欢贴睦尔支持脱脱逐走伯颜，起用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复科举取士，开马禁，减盐额，修辽、金、宋三史，颁《至正条格》，史称“脱脱更化”。但这些新政并没有能挽救元朝的社会危机。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导致沿河州郡灾荒连年，人民死亡过半，国库空虚。妥欢贴睦尔被迫于十年改变钞法，十一年用贾鲁修治黄河。钞法变更，导致物价上涨；修河时紧工迫，官吏乘机对百姓敲诈勒索；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终于爆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

妥欢贴睦尔对农民起义进行血腥镇压。至正十一年至十四年，主要由脱脱及其他地方长官，用中央及地方军队，甚至诸王、爱马（见投下）的军队进行镇压。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主要依靠察罕帖木儿等地主武装进行镇压。二十三年后，朱元璋势力壮大，渐次统一南方，元朝已无力对抗。与此同时，元统治集团日益腐败，内部斗争加剧。十四年，中书平章哈麻等乘脱脱出兵高邮，劾他劳师无功。妥欢贴睦尔听信谗言，贬脱脱，于是国家大权尽归哈麻、雪雪兄弟。妥欢贴睦尔更怠于政事，荒于游宴。十六年，哈麻、雪雪谋废妥欢贴睦尔，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事败被杀。其后，皇太子及其生母奇皇后仍谋废立。宫廷内分为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太子，各自分别和统军将领孛罗帖木儿或扩廓帖木儿相勾结。自至正二十四年起，两派矛盾尖锐化，北方陷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元军将领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势，互相攻伐，妥欢贴睦尔的号令已失去作用。

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开始北伐。洪武元年（1368）七月，明兵逼近大都。七月二十八日，妥欢贴睦尔率后妃太子奔上都。八月初二，徐达率明兵入大都，元亡。

洪武二年六月，明将常遇春、李忠文攻上都，妥欢贴睦尔奔应昌。次年四月，因痢疾死于应昌。庙号惠宗，明太祖朱元璋加号顺帝。

【明太祖朱元璋】

（1328～1398）明朝开国皇帝。祖籍为江苏沛县，其祖、父为生活所迫，一再迁徙，最后定居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子乡孤庄村。朱元璋幼名重八，参加农民起义军后改名元璋，字国瑞。

反元建明　朱元璋幼时曾为地主放牛。十七岁时，因父、母、兄皆死于瘟疫而孤，不得已入皇觉寺为僧。不久以行童游食于淮西一带。深受后来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彭莹玉所进行的秘密反元宣传的影响。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震撼全国的红巾军农民起义爆发。次年朱元璋投奔起义军郭子兴部。他以智勇过人，得为子兴心腹，并娶其养女马氏为妻。后继郭子兴而成为义军首领，在家乡一带逐步扩充队伍，随后克滁州、援六合、下和州，势力渐增。他以儒士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等人为谋士，并采纳了他们的以金陵（今江苏南京）为根据地以定天下和建立帝业的建议。



明太祖朱元璋像

至正十五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刘福通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号小明王，国号宋。韩林儿任命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不久，朱元璋率军断缆渡江，取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下太平（今安徽当涂），并于次年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应天。小明王升其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此后，朱元璋以应天为根据地，借东邻张士诚、西邻徐寿辉、北邻小明王等反元势力，唯南面有元军的有利形势，相继攻取常州，江阴、常熟、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地；并接受徽州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在应天屯田，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保证了军事供给和需要，安定了后方。至正十九年，小明王升其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

朱元璋消灭东南的孤立元军后，即开始与元末各割据势力展开较量。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在江东桥计败劲敌陈友谅，西入江西。二十三年他亲解小明王安丰之围，迎其往居滁州，得拜为中书右丞相。同年，与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友谅败死。二十四年，自立为吴王，建置百官，大量招纳儒士组成决策集团。二十六年，朱元璋发布声讨张士诚的檄文，次年破平江，俘张士诚。二十六年底，他又遣使迎小明王于滁州，中路沉之于江，农民起义军政权宋亡。于是朱元璋改明年为吴元年（1367）。此后，他在南征浙东方国珍、福建陈友定的同时，派出大军北伐中原，发布告北方官民的文告。文告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对北方人民反抗民族压迫颇具号召力。

在南征北伐的顺利进军中，朱元璋于吴二年正月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七月，徐达率领的北伐军逼近大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携后妃、太子仓惶出逃上都，宣告了统治中国九十八年的元朝的终结。此后，统一战役仍在继续，同年，汤和率领的南征军灭方国珍、陈友定，福建、两广尽入版图。洪武四年（1371），四川平定。十四年平云南。至二十年，山西、陕西以及东北平定，全国统一。

统治措施 朱元璋削平群雄，统一南北的同时，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着手稳固新建王朝的统治，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朱元璋在中央废中书省和丞相，政归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结束了自秦汉以来存在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加强了皇权。又改监察机构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合称“三法司”。其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

枉”。在地方废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又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都、布、按三司，分掌地方民政财政、刑法、军事，各自直属中央，改变了原行中书省长官独揽地方大权的局面。

朱元璋又创立了卫所制（见都司卫所），于全国军事重地设卫，次要地方设所，统于各地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隶属于中央的大都督府。为了削弱将领的军权，他在废丞相制的同时，又于洪武十三年废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各自掌管军籍和军政，遇有战事，皇帝亲自选官派军，战后官归将印，军回卫所，以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危及皇权。卫所还实行屯田，耕战结合，对明初生产力的恢复起了积极作用。

经元末战乱，明初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生产亟待恢复。朱元璋实行安养生息的经济政策，采取奖励垦荒，实行民屯、军屯、商屯等屯田制度，兴修水利，在全国推广桑、麻、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成功地使明初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还下令清丈土地，编制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建立里甲及粮长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封建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制度得到保障。他的限制和打击旧豪族地主、规定工匠轮班制、放松对手工业者的人身控制等政策，对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起了促进作用。

为充实官僚机构，朱元璋采取荐举、学校、科举三途并用的办法选取官吏。他重视人才的录用，曾多次命中央及各地官吏推举人才。他鉴于元代官吏贪污腐败以至亡国的教训，决意整顿吏治。甚至以剥皮囊草来惩办贪官污吏，办法之严酷为历史上所罕见。他的厉行整顿虽有一定效果，但因其性格猜忌多疑，也任意滥杀了不少无辜。

为使朱家王朝长治久安，强化皇权，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为保证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他制订了《明律》和《大诰》，还特别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充分显示出以强化封建专制帝王的权威。

明初，朱元璋还实行分封制，将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以巩固统治。由于北元回归大漠后保有相当强的军事力量，对明朝北部形成极大威胁，故朱元璋分布在北方边防线上的塞王兵力尤为雄厚，洪武后期，这些塞王已掌握边防军事指挥权，防止了军权旁落。但他的第四子朱棣（即明成祖朱棣）后来却因此夺得他的继承者建文帝的皇位（见靖难之役），这是朱元璋所始料不及的。



朱元璋像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1368～1398），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影响深远，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并奠定了明朝二百多年的统治基础。但他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发展到空前程度，以及由此对社会经济产生的阻碍作用，也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转入后期的历史特色。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卒，年七十一岁，葬于南京孝陵。永乐元年（1403）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1538）增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明成祖朱棣】

（1360～1424）明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今江苏南京）。洪武三年（1370）受封燕王。曾居凤阳，对民情颇有所知。十三年就藩北平（今北京），多次受命参预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先后死去，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七月发动靖难之役，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乐（1403～1424）。

朱棣即位之初，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朱棣在位期间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他对建文时逆命诸臣，残酷屠杀，大肆株连。永乐初，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王旧封，但当其皇位较巩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他还继续实行朱元璋的徒富民政策，以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告讦。他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衙门，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厂卫合势，发展和强化了专制统治。

朱棣十分重视经营北方，永乐初即改北平为北京，设行在六部，增设北京周围卫所，逐渐建立起北方新的政治军事中心。七年在女真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与此同时，争取与蒙古族建立友好关系。鞑靼、瓦剌各部先后接受明政府封号。八年至二十二年，朱棣亲自率兵五次北征，巩固了北部边防。七年开始了营建北京天寿山长陵，以示立足北方的决心。十四年开工修建北京宫殿，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于九年疏浚会通河，十三年凿清江浦，使运河重新畅通，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其他边疆地区的统治也得到发展。十一年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乱后，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为加强对乌斯藏（今西藏）地区的控制，朱棣派遣官吏迎番僧入京，给予封

赐，尊为帝师。他还于四年设立哈密卫，并多次派遣陈诚、李达等人赴西域（今新疆），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全国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下，朱棣对典籍的整理也比较重视，组织大批人力编修了中国古代类书之冠的《永乐大典》。

为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朝的影响，从永乐三年起，朱棣派郑和率领船队七次出使西洋，所历三十余国，成为明初盛事（见郑和下西洋）。永乐时派使臣来朝者亦达三十余国，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浡尼王和苏禄东王亲自率使臣来中国，不幸病故，分别葬于南京和德州。四年朱棣派兵征安南，次年安南内属，于其地设交阯布政使司。

永乐时全国范围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但由于国家支出过大，赋役征派繁重，使有些地区发生了农民流亡与起义，十八年山东发生的唐赛儿起义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支。

二十二年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葬于长陵，庙号太宗，嘉靖时改成祖。

【明世宗朱厚熜】

（1507～1566）明朝第十一代皇帝。宪宗之孙，兴献王朱祐杬之子。生于安陆州（在今湖北钟祥）。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嘉靖。即位之初，革除先朝蠹政，清理勋戚、宦官庄田，逮治武宗时的中官佞幸及宠臣钱宁、江彬等，裁革锦衣卫、内监旗校工役凡十余万人，朝政为之一新。但不久与杨廷和等朝臣在议兴献王尊号的问题上发生礼议之争（见大礼议），以杨廷和为首的旧朝臣受到打击，以慈寿皇太后（武宗母后）为代表的皇族、勋戚势力也被削弱，世宗总揽内外大政，皇权高度集中。他还重视内阁作用，注意裁抑宦官权力。但自大礼议后，世宗日渐腐朽，不仅滥用民力大事营建，而且迷信方士，尊尚道教，自称“真君”、“仙翁”、“帝君”等，在宫中遍设坛场，阁臣的简用也往往视撰写的“青词”是否合意而定。二十一年更移居西苑（今北京北海、中南海），一心修玄，日求长生，不问朝政，首辅严嵩专国二十年，吞没军饷，吏治败坏，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直至嘉靖末年，经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率军奋战，肃清倭寇，形势才趋于缓和。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二十九年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掠夺。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

在用人上，世宗“忽智忽愚”、“忽功忽罪”，主张收复河套的内阁首辅夏言、总督曾铣，抗倭有功的巡抚来纨、总督张经，先后遭杀害。规劝君德的太

仆寺卿杨最，弹劾严嵩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亦被杀害。四十五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痛陈时弊，世宗怒不可遏，下瑞诏狱。同年十二月四日逝。庙号世宗，谥孝肃皇帝，葬永陵。

【明神宗朱翊钧】

（1563～1620）明朝第十三代皇帝。隆庆六年（1572）六月即位，以次年为万历元年。

隆庆末年，明王朝政治腐败，财政枯竭，危机四伏。朱翊钧十岁即位，内廷倚仗慈圣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保，朝事主要依靠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张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整饬边备，治理黄河，使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所振兴。万历十年（1582）朱翊钧亲政后，追夺张居正官阶，逐步废止其改革措施，晏处深宫，留中章奏，不常视朝。又大肆兼并土地，把皇庄从北直隶扩展到南直隶长江沿岸。他溺志于财货，万历二十四年起，派遣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征商，疯狂掠夺，不断激起农民起义和城市市民阶层的反抗（见城市民变）。万历中期以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日益加深。党争与宫闱之争相互纠结。东林党支持王恭妃所生皇长子朱常洛，与神宗及齐楚浙党等在国本（见争国本）、京察（见考察）、李三才入阁、福王之国、三案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后期，神宗荒怠益甚，朝中齐楚浙党鼎立，职守尽弛，上下解体。

神宗初年比较重视军务，在张居正的影响下，曾两次亲临教场检阅军队。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间，先后赢得平定宁夏副总兵哱拜叛乱、平定播州（今贵州遵义）杨应龙叛乱和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胜利（见万历三大征）。此后即不问边计，对建州女真弄兵塞外，蚕食疆土不以为意。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老城）建立后金政权，并于四十六年攻占抚顺，挑起后金与明之间的战争。神宗则力主挞伐，次年，明军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惨败，此后明对后金取守势，无力进攻。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神宗三次下诏增派辽饷（见三饷），加重了对内地人民的剥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明史·神宗本纪》指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去世，谥孝显皇帝，葬于定陵。

【明思宗朱由检】

（1611～1644）明朝末代皇帝。明



明崇祯帝朱由检像

光宗朱常洛第五子，天启二年（1622）封为信王。七年，其兄熹宗朱由校病死，以无子，遗诏传位由检。八月即帝位，改明年为崇祯元年。天启以后，明朝统治阶级全面腐朽，社会生产凋敝，满洲后金政权日益强大，农民起义方兴未艾，思宗即位之时，明王朝正面临两面作战、腐朽衰落的严峻形势。为了挽救明朝的灭亡，他力图振作，先后起用袁崇焕、孙承宗等督守辽东，又以洪承畴、孙传庭、杨嗣昌等镇压农民起义。增派三饷，增加田赋以筹措军饷，因而加重了农民负担，又大大加深了整个社会的危机。朱由检性格多疑，刚愎自用，驭下苛刻寡恩。在位十七年中，频繁更迭阁部臣僚，诛杀督抚大吏。崇祯三年（1630）以“谋叛罪”杀抗清名将袁崇焕后，日益倚仗宦官，政治更为腐败。此后满洲贵族军队多次越过边墙深入河北、山东等地，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主力的农民起义更是日兴月盛。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攻克北京，朱由检自缢煤山（今景山），明王朝灭亡。后南明弘光朝廷上谥号为思宗，不久改谥毅宗；隆武朝廷又改谥威宗；清朝谥为怀宗，庄烈愍皇帝。



崇祯皇帝御押

【清太祖努尔哈赤】

（1559～1626）大金（后金）开国君主，清朝奠基人。满族，爱新觉罗氏。庙号太祖。初谥武皇帝。后谥高皇帝。他早年丧母，自立为生。后因生活所迫，离家从戎，投到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屡立战功。他还勤奋好学，粗通汉文，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

努尔哈赤的先祖许多人受明朝册封，担任指挥使、都督佥事、都督等官职。他的祖父觉昌安为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为建州左卫指挥。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阿台，觉昌安、塔克世也随军同往。在攻打古埒城时，明军在尼堪外兰的唆使下，误杀了觉昌安和塔克世。明廷为了报偿其祖、父的冤死，命努尔哈赤回建州袭父职，任建州左卫指挥。他离开李成梁部回到建州后，正值久经分裂割据、战乱不息的女真社会出现了要求统一的历史趋势。于是他打起为祖、父报仇的旗号，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虽初起时仅是一支兵少将寡的弱小势力，但是他经多次征战，逐步制定了一些正确的政策，因而很快成为女真诸部中最强大的力量。对内在政治上“定国政，禁悖乱，缉盗贼，法制以立”；在经济上加强“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在军事上建立一支“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部队。对外则推行“远交近攻之术”，一方面拉拢蒙古，团结朝鲜，与明朝仍然保持臣属关系，以取得明廷的信任；另一方面对邻近的女真各部，采取恩威并

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武力统一办法。这些措施推动和加速了女真各部统一的进程。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打败了仇敌尼堪外兰，攻占图伦城，首先控制了整个苏克素护部。然后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东伐西讨，南征北战，统一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全部，以及“野人”女真的大部，从而结束了自元明以来女真社会长期分裂和动乱不安的局面。这对女真社会的发展，促进东北地区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快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女真各部走向统一，人口增多，地域扩大，努尔哈赤根据需要，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方面，采取许多改革措施。万历二十七年，他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以蒙古文字母与女真语音创制满文（见蒙古文字、女真文字），称为老满文，作为本民族文字开始应用推广。四十三年，又在原有女真狩猎的“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八旗制度。把全体人民分隶各旗牛录统辖之下，成为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接着又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与八旗旗主共同佐理政务。规定五日一朝，凡事先由扎尔固齐审理，然后经理政听讼大臣审议，再交众贝勒议定，由努尔哈赤最后裁决。从而加强了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自此公开与明抗衡。天命三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统兵攻陷明抚顺、清河等地，后金由防御转入进攻，从此改变了辽东的形势。努尔哈赤开始走上和明王朝争夺全国统治权的道路。六年二月，努尔哈赤率领大军相继攻占沈阳、辽阳等七十余城，辽河以东尽为后金所有。他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由萨尔浒城迁都到辽阳，后又迁至沈阳。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实行“计丁授田”，使原来的汉族农民沦为农奴，引起汉民的反抗。十年十月，又下令实行“编丁立庄”，把汉民编入汗、贝勒的庄中，使汉人遭到更残酷的剥削。加以大量掠夺人口，任意强占财物、屠杀汉民，加深了民族矛盾。努尔哈赤对汉民政策的失误，使得后金政权常处于飘摇动荡之中，无力再向外发展。

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乘明辽东经略高第放弃关外、退守关内之机，统率大军进攻宁远（今辽宁兴城），被宁远守将袁崇焕击败，损失惨重。这是努尔哈赤对明战争以来第一次遭受挫败，他满怀忿恨返回沈阳。七月身患毒疽，八月十一日病死。在他的一生中，统一了分散割据的女真诸部，开创了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八旗制度，建立了后金地方政权，在清朝初兴时期起了重要作用，是创建清王朝的奠基人。

【清太宗皇太极】

（1592～1643）后金第二代君主，大清创建者。满族，爱新觉罗氏。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在位十七年。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在沈阳继后金汗位。次年改元天聪。他对内大力推行封建化的改革，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外相继征服了蒙古和朝鲜，并对明朝频频用兵，步步进逼，将西部边界扩张至锦州、宁远一线。十年四月改元崇德，改国号大清，正式称帝。

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外部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处境孤立。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他虽继承了汗位，但实际上是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按月分值”政务。权力分散，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虚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进封建化的改革，皇太极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打击、削弱分权势力，提高汗权。天聪四年，皇太极以阿敏弃守滦州、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遵化四城的罪名，将其终身幽禁。五年，莽古尔泰同皇太极发生口角时，竟拔刀相向。皇太极遂以“御前露刃”之罪，革去莽古尔泰大贝勒衔。至此，四大贝勒，仅剩他和代善两人。六年，皇太极终于废除了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务的旧制，改成自己南面独坐，取得了汗的独尊地位。另外，皇太极仿照明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统治机构，以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三年，建立了由满汉知识分子组成的“文馆“，职掌“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本朝政事”，为皇太极推行汉化运筹帷幄。五年，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行政事务。十年，又将“文馆”扩充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统称“内三院”，负责撰拟诏令、编纂史书、掌管和起草对外文书与敕谕、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稍后，又建立了都察院，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皇太极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在经济上，由于努尔哈赤晚年在辽东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政策，汉人纷纷逃亡和暴动，生产凋敝，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皇太极执政伊始，便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把原先努尔哈赤所推行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的政策改为每备御止给壮丁八人、牛二头，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用汉官管理，使大量汉族奴隶取得了“民户”地位，成为后金政权下的个体农民。天聪五年，皇太极颁布《离主条例》，其中规定：凡奴隶主犯有私行采猎、擅杀人命、隐匿战利品、奸污属下妇女、冒功滥荐、压制申诉等罪，许奴仆告发，准其离主。这一条例，限制了满洲贵族的某些特权，有利于奴仆争取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皇太极注意体恤民力，凡有妨农务的工程，一律不复兴筑，使百姓能“专勤南亩，以重本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皇太极像

皇太极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时，并没有放弃努尔哈赤对外进行扩张的政策。他认为要战胜明朝，首先要征服蒙古和

朝鲜，这既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又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共同对付明朝。天聪元年一月，皇太极不宣而战，命阿敏、济尔哈朗、阿济格等人，率三万大军进入朝鲜，迫使朝鲜签订《江都和约》。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又以朝鲜"屡败盟誓"，"助明害我"为由，亲率十万大军入侵朝鲜，包围南汉山城。国王李倧被迫投降，称臣纳贡，允诺与明朝断绝往来，并将王子送沈阳为人质。对蒙古，皇太极则采取"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政策。首先争取受察哈尔林丹汗欺凌的科尔沁、喀喇沁等部的归附。天聪二年，达成共同征讨林丹汗的协议。经过几次征战，林丹汗势力大衰。八年，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痘病死。九年初，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精骑一万人渡黄河西进，至托里图，俘获了林丹汗子额哲及其部众一千余户，统一了漠南蒙古。为了笼络蒙古封建上层分子，皇太极用联姻、赏赐、封王封爵、定外藩功臣袭职例、崇奉喇嘛教、与西藏僧俗头领建立联系等手段，赢得了蒙古诸部的支持和效忠。

皇太极深知满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因此，他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采取招降收买政策。天聪三年，首次考试儒生，网罗了两百名汉族知识分子。此后又多次举行考试，分别优劣，量才录用。五年，大凌河战役后，对大批降将赐以庄田、奴仆、马匹，并委以官职。天聪七八年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明朝将领纷纷自愿来投，皇太极对他们封王封侯，宠荣备至。随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将领的降顺，皇太极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

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从此全力以赴地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年秋，他命阿济格统兵入关，掠夺人畜十八万。崇德三年，又命多尔衮、岳托率军入关，攻破城池五十多处，虏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为了从正面打开山海关，自五年三月起，发动了锦州战役。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往援锦州祖大寿。皇太极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大败明军。七年二月，松山城陷，洪承畴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仅剩宁远一孤城。

八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宫中猝然病死，葬沈阳昭陵。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

【清世祖福临】

（1638～1661）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满族，爱新觉罗氏。清太宗皇太极第九子，母孝庄文皇后。年号顺治，习称顺治帝。在位十八年。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年仅六岁的福临在沈阳继帝位，由济尔哈朗、多尔衮辅政。顺治元年（1644）四月，多尔衮统兵入关，进占北京。九月，福临由济尔哈朗护送至京，诏告天下，君临全国。福临名为皇帝，而大权完全落到多尔衮手里。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在喀喇城（今河北滦平东）围猎时死去。八年正月，福临宣布亲政。不久，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讦告多尔衮生前"谋逆"。于是，诏削爵，撤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官。福临亲政时，因不晓汉文汉语，阅读诸臣奏章，茫然不解。为此，他在处理政务之余，发奋

读书，对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以及元明戏曲、话本，无不涉猎。由于受到汉文化的熏陶，逐渐领悟了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因此，他在执政期间，在维护满族贵族统治的同时，尽量利用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观念，以完善和巩固他的统治。在推行汉化方面，他既胜过他的父辈，又深刻影响到他的后代。

福临亲政之初，面临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都相当严峻。九年，李定国在华南发动强大攻势，孔有德、尼堪相继战败身亡，全国出现新的抗清高潮。十年五月，福临同大臣经过反复筹商，决定采取“抚”重于“剿”的策略；一方面向郑成功和各地抗清力量颁发诏书，宣布实行“招降弥乱”的怀柔政策；一方面重新起用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命他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洪承畴到南方后，剿抚并用，使局势逐渐好转，为日后进攻云贵，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清初因长期战乱，流民遍地，农田荒芜，不仅使清廷难以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也严重影响了它的财政收入。顺治十年，福临采纳范文程等人的建议，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十四年，又积极鼓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对地方官员制定《垦荒考成则例》，按垦荒实绩，分别予以奖惩。同年，编成《赋役全书》，颁布天下。这些措施，使濒于绝境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转机。

福临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认为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对整顿吏治甚为关注，命令督抚对属下官员务须严加甄别，并派监察御史巡视各地。对蒙蔽专擅、纵兵害民的总督、巡抚、总兵进行纠举。十一年，“大计天下”，对地方官员普遍进行甄别考核，并规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十二年，发生顾仁贪赃一案，福临极为震怒，下令杀了顾仁，并严令此后凡官员犯赃十两，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赃重者斩绞，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

为了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能，福临比较注意发挥汉官的作用。他甚至突破了各衙门中汉官不得掌印的旧制，规定“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要分别满汉”。引起满洲贵族的不满。尽管福临允许汉官拥有比过去较多的权力，但并没有摆脱满洲贵族对汉人根深蒂固的猜忌，尤其害怕汉官结党，对此他是十分敏感而又严加防范的。例如十一年宁完我弹劾大学士陈名夏“结党怀奸”，陈名夏即被处绞刑。

十四年十一月，福临接到孙可望来降的奏折，他立即封孙可望为“义王”，并命吴三桂、赵布泰、罗托统领三路大军，向贵州、云南进发。十六年春，清军进占云南省城。此时除地处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之外，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基本被平定。



顺治像

福临同耶稣会教士汤若望以及佛教高僧木陈忞、玉林琇、茆溪森的关系至为密切，所受影响极深。玉林琇曾为福临起法名“行痴”。十七年八月，福临宠爱的贵妃董鄂氏突然病死，他悲痛欲绝，命茆溪森为其削发，决心出家。经玉林琇坚决劝阻，才重新蓄发留俗。

十八年正月初七，福临因患天花，于养心殿逝世。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

【清圣祖玄烨】

(1654～1722) 清入关后第二代皇帝。姓爱新觉罗氏。顺治帝福临第三子。母佟佳氏，汉军都统佟图赖之女。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生于景仁宫。十八年，福临去世，以八岁孩稚继承皇位。改次年为康熙元年（1662）。二年二月，生母去世，由祖母博尔济特氏（孝庄文皇后）抚育。他自幼苦读，好学不倦，身体强健，骑射娴熟。十四岁



康熙像

亲政，在位六十一年，一生勤奋治国，是清代颇有作为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封建君主。

福临临终时，遗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代理国政。辅政期间，继续进行统一全国的斗争，派兵追击南明永历帝，康熙元年四月杀之于昆明。三年，派兵会同川、陕、湖广三省兵围攻鄂西坚持抗清的大顺军余部，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等战死，又捕杀浙江海上坚持抗清的张煌言，大陆上的抗清斗争基本结束，清王朝从军事、政治、经济多方面对全国的统治逐步形成。在此期间，辅政四大臣中，逐渐形成鳌拜专权跋扈，欺凌幼主，结党擅权的局面。六年，玄烨“躬亲大政”，八年五月，清除鳌拜及其同党，开始掌握实权。

完成国家统一　玄烨亲政后，先后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并粉碎了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阴谋，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三藩”都是降清的明将，吴三桂封平西王，留镇云南；尚可喜封平南王，留镇广东；耿仲明及其子死后，其孙耿精忠袭靖南王爵，留镇福建。各拥重兵、势力坐大，严重威胁清王朝的统治。康熙十二年，玄烨在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的支持下，果断地下令撤藩，令“三藩”各率所部归辽东。十一月，吴三桂举兵反，主力出贵州，掠湖南，分兵攻四川、江西，不久，尚之信（可喜子）、耿精忠、广西将军孙延龄起兵响应。玄烨毅然命将出师，进行征讨。在历时八年的平乱战争中，年轻的玄烨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他利用政治分化和军事压力迫使尚、耿二藩脱离

吴三桂，招降陕西从叛的王辅臣，同时迅速平定内蒙察哈尔右翼王子布尔尼叛乱和北京城内杨起隆反清起事以安定后方，从而使清军得以集中力量与吴三桂主力相持于湖南，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

随后，玄烨又进行了统一台湾的斗争。起用原郑芝龙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准备进军台湾。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领水师两万余人，大小战舰二百余只，一举攻占澎湖，台湾失去屏障，郑氏军事力量损失惨重，郑克塽（成功之孙，郑经之子）、刘国轩等向清军投降。玄烨支持施琅在台湾设官兵镇守的建议，否定了臣僚中弃而不守的谬见，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台湾府及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并设总兵、副将率兵驻守台、澎，使台湾重新统一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玄烨又集中力量与割据西北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展开斗争。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引兵三万越杭爱山向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发动进攻，喀尔喀各部败溃，噶尔丹以追击为名，直抵距北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玄烨决计亲征噶尔丹，以“除恶务尽”。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次亲征。三十六年噶尔丹败死，准噶尔对喀尔喀蒙古的侵扰被粉碎，喀尔喀各部得以返回原地。玄烨为加强对外蒙古地区的管理，沿袭了太宗皇太极以来的盟旗制度，采取联姻、封爵、年班、围班等措施，以密切与蒙古领主贵族的关系；特别是尊重蒙古族信仰的喇嘛教，以笼络僧俗人等和广大牧民。康熙三十年，玄烨率八旗劲旅前往多伦诺尔草原与喀尔喀蒙古诸部举行多伦会盟，把对内蒙古的较



康熙帝便装写字像

严密的管理制度推及于喀尔喀各部，这对加强北部边防，发展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玄烨也十分注意西藏、青海问题，他深知西藏为蒙古各部尊奉的黄教（见格鲁派）领袖地位的重要，对准噶尔、和硕特等部插手西藏而使其政治动荡保持警惕。五十二年，他册封班禅呼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五十七年，以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进藏击败入侵西藏的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使西藏暂时得到安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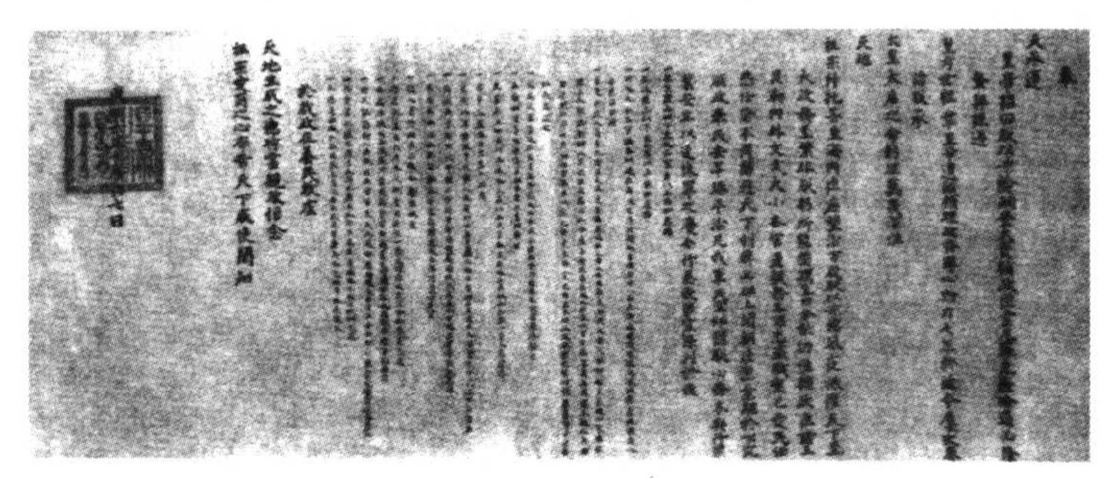
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凋敝。顺治年间奖励垦荒，但收效甚微。玄烨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为招徕垦荒，修订顺治年间的垦荒定例，由原来最高限六年起科，改为“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又规定地方官能招徕垦荒者升，

否则罢黜。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承为世业，使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以鼓励农业生产。蠲免的种类大体上有：免征荒地田赋、灾荒蠲免、普免钱粮等。玄烨在位期间，蠲免次数很多，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田赋普免一周；五十年，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这在以往的历史朝代是罕见的。五十一年二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减轻了农民负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国垦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五亿五千万亩到康熙末年超过了八亿亩，生产发展，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人口迅速增长，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

这两人勤劳任事，治河十余年大见成效。玄烨自己究心于治河历数十年，“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有时亲自进行试验。他多次视察经常泛滥的永定河，通过治理永定河取得经验。

笼络汉族官吏、士大夫知识分子

玄烨对汉族官吏、名士及一般士子，分别采取不同措施，罗致了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清初满汉官员职掌相同而品级悬殊，这种民族歧视使不少汉官心怀怨望，不能尽心为清廷效力。为了安抚汉官，玄烨一再声称“满汉皆朕之臣子”，“满汉一体”，谕令“满汉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画一”。十六年，设置南书房，命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轮流入值，以笼络汉官。十七年，命开“博学鸿儒科”，以网罗负



康熙帝亲政诏书

有盛名的硕彦鸿儒，入史馆纂修明史。又吸收大量学者编纂各种图书，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分订为六千一百余册，成为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玄烨对程朱理学尤其用力提倡，特别尊崇朱熹，在他的奖励提拔下，大批信奉程朱的“理学名臣”如李光地、魏裔介、熊赐履、汤斌、张伯行等都受到重用。这

历史上黄河经常泛滥成灾，仅康熙元年至十六年，黄河大的决口六十七次，河南、苏北广大地区深受水患之苦。玄烨十分重视对黄河的治理，将“三藩”、河务、漕运列为三大要务。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先后六次南巡视察河工，与河臣讨论治河方案。他任命靳辅为河督，识拔和重用水利技术专家陈潢协助治河。

些措施起到了收揽汉官和汉族士子人心的作用，扩大了满汉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清初一些以高风亮节相砥砺，遁迹山林不与清统治者合作的明遗民，他们的子弟或学生这时都纷纷出仕，或参与各类书籍的编纂。满族与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壁垒趋向瓦解，直至彼此融合。

清代严酷的文字狱也是从康熙朝开始的。康熙一朝大小文字狱不下十余次，其中牵连较广的大案有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文字狱是对文化思想进行严密控制的一种手段，这两件大案都是由于著作中有眷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引起的。康熙以后的雍正、乾隆两朝，文字狱次数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严，都超过以往的朝代。

抗击沙皇俄国的侵略 其时，沙俄派遣哥萨克远征军侵扰黑龙江流域已达数十年，并在中国领土上修筑尼布楚、雅克萨等城堡作为侵略据点。玄烨在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后，决心驱逐俄军，收复失地。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组织了两次收复雅克萨之战。二十四年四月，命都统彭春、副都统郎坦、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领水陆军约三千人，自黑龙江城（今爱辉）出发，进围雅克萨，俄军统领托尔布津乞降，率部六百余人撤往尼布楚。清军平毁城堡后回师。不久，沙俄侵略军重占雅克萨，次年五月，玄烨谕令萨布素等率部再次攻取雅克萨，鏖战四昼夜，击毙托尔布津，俄军困守孤城。在沙皇政府请求下，清军于二十六年夏撤围。此后，两国通过平等谈判，于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1689 年 9 月 7 日）正式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



康熙帝戎装像

一个条约。玄烨命在黑龙江重要处所建城驻兵，设置驿站，制定巡边制度，有力地保障了东北边境的安宁。

好学敏求，勤于政务 玄烨自五岁开始读书，学习勤奋。亲政后，“听政之暇，即在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举凡史乘、诸子百家、吕律、数理、佛教经论、道书，无不涉猎。九年十月，沿袭前代由经筵讲官给皇帝讲解经籍的制度，下令举行“经筵大典”，此后，无间寒暑，非有特殊情况，从不间断。十四年起，又规定在讲官进讲后，由他复讲，君臣互相讨论，从儒家经籍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他提倡文学，优容文人。

玄烨对西方自然科学也有极浓厚的兴趣。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张诚、安多等人应召为玄烨讲解自然科学。他们献给玄烨一批仪器，并为他编写了实用几何学、天文学等讲稿。玄烨对数学特别爱好，对西方医学也感到很大的兴趣。

玄烨一生勤于政务，“未明求衣，辨色视朝”，御门听政成为常朝制度。

每日清晨至乾清门听取各部院衙门官员分班启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折本，也能倾听臣下意见，鼓励各官大胆直言。有清一代封建皇权高度强化，皇帝“乾纲独断”，玄烨亲理国政，遇事反复思维，务期考虑周详，故中年以前无大失误。他注重实务，宽于御下。多次拒绝群臣疏请加上尊号。宫中用度也力崇俭约。

玄烨生子三十五人，长大成人的有二十人。康熙十四年，立皇子胤礽为皇太子，五十一年复以罪废。将近四十年中，一再废立，直到他临终前也未能解决立谁的问题，由此产生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愈演愈烈。玄烨为此心力交瘁，喜怒失常，以至于为储位之事杀戮大臣，上层统治动荡不安，玄烨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处理政务，晚年吏治趋于废弛，官场上贪风渐炽，府库多有亏空。这是他一生中一大失误。

玄烨统治时期，中国成为疆域辽阔、统一繁盛的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伸向中国的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受到遏制，开始了封建社会新的相对稳定时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应予充分肯定。玄烨的诗文，辑为御制诗文四集。

【清世宗胤禛】

（1678～1735）清入关后第三代皇帝。满族，爱新觉罗氏，清圣祖玄烨第四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继位。年号雍正，习称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庙号世宗。

清世宗年轻时跟从顾八代、徐元梦等学习经史，又与禅僧接近，稍懂佛学。曾随圣祖巡幸江南，朝佛五台山，秋狝热河（今河北承德），并奉命往祭曲阜孔庙、盛京（今辽宁沈阳）祖陵。清圣祖亲征噶尔丹，从征掌正红旗大营。康熙末年，同其他皇子争为储君。圣祖死后，他在步军统领隆科多帮助下继承帝位。世传他夺了抚远大将军胤禵的帝位，但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尚无定论。

清世宗即位时已四十五岁，加之前此的经历，使他比较了解世情，并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即位后，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雍正元年（1723），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



清世宗雍正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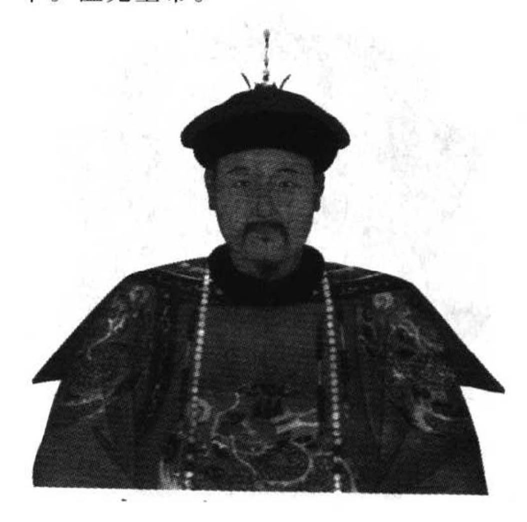
雍正尊亲之宝及印文

银的措施，以此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二年，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三年，世宗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七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锺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世宗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同年，为适应西北用兵之需，始设军机房（十午时改军机处），选亲重大臣协办军务。军机大臣只能缮述皇帝命令，本身无赞画权，因而使皇帝更加集权于一身。他还在题本、奏本之外，命督抚布按等地方大员密折奏事，以加强皇帝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旨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雍正二年，开始实行直隶巡抚李维钧提出的“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限制绅衿特权，使无论贫富力役负担比较合理。同时，为了解决人口日益增长所需粮食问题，更加严格地执行传统的重农抑末方针，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反对种植经济作物，并反对开矿和发展手工业。他注意兴修水利，除治理黄河、建筑浙江海塘外，命怡亲王胤祥在直隶开展营田水利，在宁夏修筑和疏浚水渠。与此同时，实行社会改革。雍正元年，下令削除山西、陕西乐籍，并命其他贱籍也照此办理。后来浙江绍兴惰民、安徽徽州“伴当”、宁国世仆、广东疍户、江苏常熟丐户相继开豁为良，从而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度，对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世宗在位期间还注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外交关系。雍正四年，根据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加强了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五年，清廷同俄国订立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在划定中俄边界及处理两国通商问题等方面，维护了国家主权。

清世宗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上谕八旗》。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雍正十三年，世宗卒。谥宪皇帝。



雍正皇帝像

清世宗勤于政务，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一定成效，对清代历史发展有一定贡献。但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故后世颇有争议。

【清高宗弘历】

（1711～1799）清朝入关后第四代皇帝。满族，爱新觉罗氏，为清世宗胤禛第四子。雍正十一年（1733），封和硕宝亲王，十三年八月即位，年号乾隆，习称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嘉庆元年（1796），传位第十五子颙琰（嘉庆），自为太上皇帝，仍掌军国大政，直至去世，实际统治六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

高宗在位期间，多次用兵统一疆土，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发展。即位之初，值西北用兵，又有贵州苗民起义。鉴于西北两路出师均告失利，而准噶尔内部稳定，一时难以取胜，乃暂时议和，采取守势，而专力镇压苗民起义，以号称知兵的张广泗经略苗疆。不久，苗民起义被镇压。乾隆十八年（1753）前后，准噶尔内部因争夺汗位，分崩离析。杜尔伯特部三车凌率部众六千于十八年内附。十九年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又率部众万余人内附。高宗于是年冬天自北京赶到承德，亲自接见，详询准噶尔内部情况，认为解决准噶尔部割据势力时机已经成熟，乃力排众议，在大学士傅恒等少数亲信大臣的赞助下，决定于第二年春天两路出兵伊犁，为一举荡平之计。二十年五月，两路清军进抵伊犁，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败奔乌什，为乌什维族首领霍集斯擒献清营。不久，归降清廷的阿睦尔撒纳因统治厄鲁特蒙古四部的野心未能得逞，又聚众叛乱，高宗随即派军征讨，准部割据势力乃告平定。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复以兆惠为将军，平定了南疆大小和卓之乱。随即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军政，建立起军府统治。于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各置参赞大臣，受命于将军，分统天山南北路。于南疆各城置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管理一城之事。于北疆移住满洲、锡伯、厄鲁特、绿营等军兵垦荒屯田，为久驻之计，并移民入疆，陆续建置州县以管民事。明朝以来长期割据之地，从此牢牢置于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



清高宗乾隆像

与此同时，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清初以来，西藏政局经常动荡不定。由于厄鲁特蒙古诸部信奉黄教，西藏为黄教宗主所在，而西藏内部不同集团皆需

要援引厄鲁特蒙古武力以自重，矛盾错综复杂，变乱时有发生。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勾结准噶尔发动叛乱，杀害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高宗乃派兵入藏，平定叛乱后对西藏政权结构作了一些调整，稍增驻藏大臣权力，但仍然无法控制局势。五十三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入侵西藏。五十六年复派兵入侵。乃授福康安为将军，率兵入藏将其击退。次年颁布《钦定西藏章程》，集民政、财政、军政、外交大权于驻藏大臣之手。达赖、班禅之重大决定需经驻藏大臣同意。同时规定金瓶掣签之制，并规定大贵族及蒙古贵族不得参与掣签。大活佛之继承也处于清政府监督之下。从此西藏政局方趋稳定，而中央对西藏之政令也得以贯彻执行。

对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各土司统治地区，高宗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经过两次金川之役，川西南地区也实行改土归流。

高宗在位时期，中国邻邦如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已先后沦为殖民地。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不断进行试探，北方沙皇俄国也虎视眈眈。出于自卫需要，高宗采取限制贸易、减少接触政策，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外，其他海口一律禁止贸易。高宗拒绝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提出的各项有损中国主权之要求。对沙俄也坚持原定条约之规定，多次断绝恰克图贸易以抑制其非法行动。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在国力强盛时虽可保全于一时，但却使中国更加昧于世界大势，远离世界之潮流，日渐落后。

高宗十分重视文化事业，以国家财力纂修书籍甚多。乾隆三十八年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历时十载，共收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近八万卷，大量中国古代书籍，借此得以保存，是中国最大的丛书。武英殿所刻书籍甚多，且刻印精美，又用木活字印书，称为“聚珍版”，刊布流传。他又喜爱书法字画、铭器古砚，命臣下搜罗进献。故内府所藏珍贵字画、古器、书籍甚富，于古代珍贵文物之保存颇有贡献。但高宗自以满族贵族入主中国，于前代古籍忌讳甚多，尤以明清之际记载为甚。稍涉辽事或认为于其统治不利者，多加禁毁，造成文化上之重大损失。又迭兴文字狱，常以莫须有之罪名加之于人，刑戮甚残；官吏望风生意，讦告盛行，使人们的思想受到钳制。


乾隆帝朝服像

高宗一生，武功显赫，多次进行战争。其中有加强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也有对内镇压人民起义与对邻国扩张之役。性质各不相同，战争也

有胜有败，但却自诩为十全武功。他巡游无度，土木繁兴，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官吏又借机肥私，大大加重人民负担。中期任用于敏中，官吏贪污之风渐炽。晚年又宠信和珅，吏治更趋败坏，大贪污案层出不穷，屡诛不止。加之土地高度集中，人口增殖过快，阶级矛盾日渐尖锐。民间流传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秘密宗教迅速发展。自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义以后，连续发生多次起义，最后终于爆发了长达九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

嘉庆四年正月，高宗卒。他一生诗文之作甚多，有《乐善堂诗文全集》、御制诗五集、御制文三集、御制诗文余集。

【清德宗载湉】

（1871～1908）清朝入关后第九代皇帝。满族，爱新觉罗氏。咸丰帝弟醇亲王奕譞子。年号“光绪”，习称光绪帝。庙号德宗。1875年1月（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帝病死，无子，载湉被慈禧太后立为皇帝，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889年（光绪十五年）始亲政，但朝中大权仍操在慈禧太后手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主张抵抗，派刘永福到台湾布防，下令停止继续移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并命李鸿章查察各路将领“有无畏葸纵敌情事，不得片词粉饰”。次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连续上书，请求变法，载湉受到启迪，“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7月，他发布了一道命令，列举一系列应革事项，由于慈禧太后阻挠，未能实施。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四伏，康有为再次来到北京，上书指陈时局紧迫。载湉决心变法，让奕劻给慈禧太后传话：“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于是力排众议，于1898年6月11日下“明定国事”诏书，宣布变法开始（见戊戌变法）。根据康有为及其他拥护变法臣僚的推荐，下达谕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进行变革，他破除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小臣的旧例，召见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授予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以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为推行新政，他允许士民上书言事，极力任用维新人才，打破按年资升迁、白发卿相的常规，为裁并机构，改革臃肿的官僚体制，曾多次痛斥顽固派的阻挠，并主张开懋勤殿、选拔通国英才数十人，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研时制度，通盘筹划，一时颇有维新气象，他是“百日维新”的实际决策者。但维新变法措施遭到慈禧和顽固守旧大臣的极力抗拒。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将载湉囚禁于瀛台。1900年，又因反对利用义和团向列强宣战，遭到慈禧太后斥责。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所宠珍妃被慈禧太后喝令太监投溺宫井，他则被挟逃亡西安。还京后，慈禧太后让其备位随朝，以欺天下视听。1908年11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死于宫中。

二、母仪天下

【吕后】

（? ~公元前 180）汉高祖刘邦之妻，名雉。秦时单父县（今山东单县）人。其父吕公因避仇家，移居沛县，在一次宴会上认识刘邦，遂以吕雉许配。楚汉战争开始不久，吕雉和刘邦父母被项羽俘虏，置军中以为人质。汉王四年（前 203），项羽因形势失利，被迫与刘邦讲和，吕雉和刘邦父母获释。次年，刘邦称帝，立吕雉为后。

吕雉为人有谋略而性残忍，在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高帝十年（前 197），陈豨谋反，刘邦率兵亲往平定，吕雉留守长安，听说韩信阴谋诈赦诸官徒奴发兵策应陈豨，遂与萧何商议，骗韩信入宫后处死，并夷三族。刘邦击陈豨，至邯郸，向彭越征兵。彭越称病不往，被刘邦废为庶人，徙居蜀地。吕后认为不可遗患，又指使人诬告彭越谋反，夷灭其宗族。

吕后生汉惠帝刘盈及鲁元公主。刘邦嫌刘盈柔弱，生前曾打算另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由于大臣反对，吕后又多方设法为刘盈辅翼，废立太子之事未成。刘邦死后，吕雉以惠帝年少，恐功臣不服，密谋尽诛诸将；后畏惧诸将拥有兵力，不敢下手。她毒死赵王如意，砍断戚夫人手足，挖眼熏耳，用药使之变哑，置于厕中，名曰“人彘”。对其他刘氏诸王，亦加残害。惠帝不满吕后所为，忧郁病死后，吕雉临朝称制，封侄吕台、吕产、吕禄等为王，擅权用事，排斥王陵等老臣，拔擢亲信。但其称制的八年期间，继续执行汉高祖以来与民休息的政策，奖励农耕，废除夷三族罪和妖言令等苛法。因此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残破的社会经济也得以恢复。

由于刘邦曾与诸大臣共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吕雉封诸吕为王，遭到刘氏宗室和大臣的强烈反对。她病危时告诫诸吕部署应变，命吕禄领北军，吕产居南军（见南北军），严密控制京城和皇宫的警卫。诸吕在吕后死后阴谋作乱，被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和朱虚侯刘章等迅速翦灭。



吕后像

【和熹邓皇后】

（公元80～121）东汉和帝皇后。名绥，谥熹。父训为护羌校尉，母阴氏，为光武帝皇后从弟之女。和帝永元七年（公元95）选入宫中，次年为贵人，十四年立为皇后，元兴元年（105）和帝死，邓后迎立出生始百余日的刘隆为殇帝，尊为太后，临朝称制；次年安帝继立，犹临朝政，称制凡十六年。

和帝时，宦官郑众因参与谋诛外戚窦氏，受封为鄛乡侯，这是宦官受封之始。邓后以女主临政，又将国命寄之宦官。与此同时，外戚邓氏在政治上也得到重用。虽然邓后惩于前代流弊，试图对外戚势力加以限制，但安帝时，邓骘拜大将军，兄弟受封为列侯，宾客奸猾，多干禁宪。永初元年（107）太尉徐防以“灾异”、“寇贼”策免，又开启了以“灾异”策免三公的先例，三公威权愈见低落。这些情况促使东汉王朝统治由承平渐趋衰败。加以邓后称制时期水旱连年，郡国官吏隐瞒灾情，虚报垦田，不顾百姓流亡，反而竞增户口，以致社会矛盾加深，广大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影响较大的有永初三年蔓延滨海九郡的张伯路起义等。与此同时，以羌族为主的周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日益加剧。对此，邓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以皇室苑囿和郡国公田赋予贫民，调发郡国粮食禀赡贫民，诏三辅、河内、河东等郡国修治水利，发展公私灌溉，又屡屡下诏禁奢侈，减撤宫内服御珍膳和靡丽之物。但终因积弊已深，对挽救政治腐败没有产生显著的作用。

【贾后】

（257～300）晋惠帝皇后。名南风，小名时。贾充次女。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东北）人。性酷虐多权诈，泰始八年（272）册为太子司马衷妃。永熙元年（290）衷即位（晋惠帝），立为皇后。太傅、大都督杨骏辅政擅权，立谢淑媛所生广陵王遹为皇太子。次年，贾后和楚王玮合谋，族灭杨氏及其亲党数千人，由太宰汝南王亮与太保卫瓘以录尚书事执政。惠帝痴愚，受制于贾后。贾后矫旨诏楚王玮率领北军诛锄汝南王亮、卫瓘；同时又以“矫旨”擅杀大臣的罪名杀楚王玮，从此政权落到贾后手里。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

曹魏时其父贾充任大将军司马、廷尉，为司马氏的亲信，参预代魏的密谋，晋初官至尚书令，又是外戚，颇有势力。贾后仗母舅郭彰权势，依靠族兄贾模、内侄贾谧力量，世人称为“贾、郭”。同时她拉拢名流，起用张华为司空，王戎为司徒，裴楷为中书令，裴頠为尚书仆射，专政十年（291～300）。

贾氏亲党怕太子遹秉政后贾后被诛戮，劝贾后废立。元康九年（299）十二月她诬陷太子为逆，废为庶人，幽禁于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次年三月矫旨杀害。四月，赵王伦用孙秀之谋，利用宿卫禁兵对太子被害的愤怨，起兵废贾后，囚于金墉城，旋被杀。贾谧、张华、裴頠等均被诛。永宁元年（301）正月，赵王伦废惠帝，迁于金墉城，自立为帝。自此，八王之乱由宫廷武装变乱发展为皇族争夺政权的大规模战争。

【冯太后】

（441～490）北魏文成帝皇后，太和元年（477）至十四年间一系列改革的实际主持者。谥文明。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和平六年（465）献文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太后执政，定策诛杀专权跋扈的丞相乙浑。献文帝非太后所生，听政后诛除太后内宠。皇兴五年（471）献文帝禅位于五岁的太子拓跋宏（见魏孝文帝元宏），自己仍过问大政。承明元年（476）冯太后毒死献文帝，再度临朝称制达十四年。她聪明果决，猜忌而长于权术，以重管、重罚驾御群臣，为其所用。

北魏百官原无俸禄，冯太后称制时，太和八年定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充百官俸禄。称为"班禄"。班禄以后，贪赃满一匹者处死。规定地方守宰任期按"治绩"好坏为定，不拘年限。太和九年采纳给事中李安世建议，实行均田制，使农民附着于土地，劳力得以利用，荒田得以垦辟。北魏原来没有户籍制度，由宗主管理户口，称宗主督护制。因此宗主荫庇人口甚多，往往三五十家合为一户。在九品混通制之下，赋役负担不匀，政府收入也受影响。九年或十年初，李冲建议，仿古制立党、里、邻三长，用以代替宗主督护的统治（见三长制）。定民户籍，按户征发调役，当时反对李冲建议者很多，冯太后力排众议，认为立三长则荫庇的户口可以检出，课调可有常准，决定实行。结果不仅北魏本土见效，由南朝归于北魏的淮北州郡户口，几十年间也比属南朝时大见增长。冯太后主持制定的三长制、均田制和新的租调制三者配合实行，为孝文帝迁洛以后的繁荣富庶打下了基础。

【胡太后】

（？～528）北魏宣武帝皇后，孝明帝母。谥灵。安定临泾（今甘肃泾川北）人。延昌四年（515），孝明帝即位年幼，胡太后得到妹夫宗室元叉、宦官刘腾的保护、支持而听政。正光元年（520）被元叉、刘腾幽囚。孝昌元年（525）杀元叉，再度临朝摄政。其时北魏统治危机四起，北方边镇守将和州郡官吏腐化贪污，府户、镇人积忿已久。神龟二年（519）京都羽林、虎贲由于武人待遇不平，近千人暴动。元澄、袁翻建议改革边镇用人，魏兰根建议改府户为民，胡太后都不采纳，反而实行崔亮所制停年格，按年资用人，吏治益趋腐败。胡太后迷信佛教，大建佛寺。洛阳永宁寺之壮丽，伊阙石窟寺之宏伟，都是民脂民膏凝成。其奢侈浪费导致公私穷困，民不聊生。正光四年六镇起义爆发，给北魏统治以致命打击。关中陇右以及山东、河北地方的汉族和少数族人民，随即纷纷起兵。南朝降人萧宝寅又利用时机，据关中叛乱。同时，梁朝派军北伐，孝昌二年夺取寿春，次年占领涡阳，北魏疆土日蹙。北魏军队败多胜少，拓跋氏统治岌岌可危。而胡太后还宠任嬖倖郑俨、徐纥等，政事益加腐败紊乱。胡太后害怕儿子年龄渐长，于己不利，武泰元年（528）与郑、徐合谋杀死十九岁的孝明帝，立临洮王子三岁的元钊为帝，天下哗然。当时虽镇压了一部分起义，但兵势强盛的并、肆、汾、唐、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

从并州进军洛阳，在河阴溺死胡太后及幼主，并杀诸王、高官等两千余人，实际上结束了统一的北魏政权（见尔朱氏之乱）。

【述律皇后】

（879～953）辽太祖耶律亿皇后。名月理朵，汉名平，契丹族右大部人。父婆姑，曾任阿扎割只。母耶律氏，辽太祖姑母。辽太祖即帝位号“天皇帝”，述律后号“地皇后”。神册元年（916），辽太祖西征，后方空虚，室韦部乘机来袭。她整军迎战，大胜，因而名闻西北各部。她设置精锐亲军约两万骑，号称“属珊”，意即“珍宝”。她在任用韩延徽为谋士、经略幽州、灭亡渤海等事件中都起过积极作用。辽太祖死后，天显元年（926）七月至翌年十一月间，她以皇后摄军国事，并以殉葬为借口，处死了若干可能成为政敌的臣僚，她本人亦断右腕以殉。次子耶律德光（辽太宗）嗣位后，述律后颇属意于少子耶律李胡，对辽太宗的连年南征表示不满。大同元年（947），辽太宗在南征归途中病死。群臣拥立辽太祖长子耶律倍之子耶律阮为帝，班师北归。述律后命李胡率兵堵击。耶律李胡兵败，她又亲率兵阻击于潢河。旋因贵族大臣的反对而罢兵，被黜居祖州（今内蒙古昭乌达盟林东镇西南），六年后死。

【承天皇太后】

（953～1009）辽景宗皇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生母。姓萧，名燕燕，汉名绰。辽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萧思温女。辽景宗即位，册为皇后。乾亨四年（982），辽景宗死，辽圣宗立，萧燕燕奉遗诏摄政，号承天皇太后。当时，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向背难测；辽宋之间随时可能发生战争，人心不安；圣宗年幼，前途可虑。她任韩德让和耶律斜轸参决大政于内，耶律休哥总领南面军务于外，并加强对宗室的约束和对吏民的管理，使政局渐趋稳定。注意改善契丹族和汉族的关系，在倚重契丹族官员的同时，也任用了许多汉族官员。辽国旧例，契丹人和汉人相殴致死，轻处契丹人，重处汉人，她当政时改为依汉律论断，同罪同科。从统和四年到二十二年（986～1004），辽宋交战多次，她常与圣宗亲征，史称她“习知军政，澶渊之役亲御戎车，指麾三军，赏罚信明，将士用命”。统和时期，辽的国势达到全盛，都与她的活动有密切关系。统和二十七年（1009）十二月病死。

【没藏太后】

（？～1056）西夏毅宗李谅祚生母。原为外戚大臣野利遇乞妻，西夏景宗李元昊诛杀遇乞，纳入宫中，随即被皇后野利氏黜居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戒坛院为尼，但仍为西夏景宗所亲昵。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从西夏景宗出猎，在行帐生子谅祚，就养于其兄没藏讹庞家；讹庞因得宠幸而任相国。次年，西夏景宗为太子宁凌噶刺伤，临终遗嘱传位从弟威噶尔宁。没藏讹庞与大将诸移赏都等拥立年方周岁的谅祚即帝位，尊没藏氏为太后，兄妹共专国政。没藏后崇奉佛教，役兵民数万，在兴庆府西修建承天寺，规模宏大，历时五年完工。

寺内贮藏自宋请来的大藏经，并延致回鹘高僧登坛说法。她经常带谅祚去听讲。她性好佚游，先后昵幸臣李守贵及保乞多已。福圣承道四年（1056）十月，偕保乞多已出猎贺兰山，夜归途中，为李守贵遣人狙杀。

【梁太后】

（？～1085）西夏惠宗秉常生母。西夏毅宗李谅祚死，秉常年7岁嗣位，梁太后摄政，任弟梁乙埋为国相。大安二年（1076），惠宗亲政。汉人李清建议联宋，以削弱梁氏势力。梁太后与倖臣罔萌讹等定计杀李清，囚禁惠宗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皇陵所在的水砦。拥帝势力拥兵自卫。西夏统治集团面临分裂。宋神宗赵顼发兵来攻，五路并进，梁氏家族梁乙埋、梁永能、梁格嵬、梁讫多埋等领兵抵御，尽皆溃败，形势危急。梁太后改行坚壁清野，引敌深入，抄绝饷道，聚兵歼灭的战略，击退宋军。次年，西夏又出兵攻陷了宋朝新筑的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造成宋兵员物资的巨大损失；但西夏亦因连年战争陷于疲弊，内部日益不和。梁太后命惠帝复帝位，但仍掌握实权。大安十一年，病死。

【慈禧太后】

（1835～1908）清咸丰帝奕詝之妃，同治、光绪两朝实际最高统治者。那拉氏，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父惠徵，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1852年（咸丰二年），被选入宫，封兰贵人。1854年，晋封懿嫔。



慈禧像

1856年，生皇长子载淳，晋封懿妃。次年，封懿贵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且因得咸丰帝宠幸，“时时批览各省章奏”，干预朝廷政事。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进逼北京。她随咸丰帝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次年8月，咸丰帝病死，六岁的载淳继位，年号祺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奉遗诏“赞襄政务”。她和钮祜禄氏被尊为皇太后，徽号慈禧、慈安，俗称分别为西太后、东太后。由于不满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专权，11月，她与恭亲王奕䜣等贵族官僚在北京发动宫廷政变，将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其他五人革职或遣戍，改元同治，实行两太后“垂帘听政”，自己掌握实权。史称“辛酉政变”或“祺祥政变”、“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任奕䜣为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组织的汉族地主武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回民起义，使清

王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在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中，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开办一些新式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加强深宫集权。1875年（同治十三年）1月，同治帝病死，无子。她立其四岁侄（亦系外甥）载湉为帝，年号光绪，继续与东太后“垂帘听政”。1881年（光绪七年），东太后突然死去。三年后，中法战争期间，她以奕䜣“萎靡因循”为由，免其一切职务，从而独揽朝政。

1886年，慈禧太后以办海军为名修葺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后改名为颐和园）。次年，改“垂帘听政”为“训政”。1889年，在名义上归政于光绪帝，自己退居颐和园，实际仍操纵内政和外交大权。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高官显宦长期唯其命是从，在其周围形成后党集团。1894年，在中日战争中，她支持李鸿章避战静守的方针，幻想列强出面干涉、调停，以致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8年，光绪帝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采纳了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实行变法。从6月11日至9月21日的一百多天中，颁布了几十条诏令，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对此极力反对，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废除全部维新措施，捕杀维新派谭嗣同等六人。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并制造舆论，准备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但由于一些地方督抚和外国使臣的反对，乃保留光绪皇帝称号，立端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皇储）。

当义和团运动兴起时，慈禧太后下令镇压，但并未能遏止其势，以至其发展遍及津、京地区。1900年初，慈禧太后不得不改变策略，改“剿”为“抚”，利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热情，对外宣战。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她携光绪帝



慈禧在颐和园与外国公使夫人合影

逃往西安。再次命令镇压义和团，并以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出面求和，在1901年9月与十一国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此后，为缓和国内外矛盾，消弭革命，维持统治，陆续推行“新政”，主要措施包括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举办学校等等。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死。她命立醇亲王载沣子、年仅三岁的溥仪为帝，年号宣统。次日，病死，结束了对清朝长达四十七年的统治。

三、历代名臣

【周公】

周初政治家。名旦。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称为周公。

文王死后二年，周公佐武王东伐殷至孟津。四年，他和太公望、召公奭佐武王灭殷杀纣，三分商王畿地。封纣子武庚于邶以续殷祀，封文王子管叔于鄘、蔡叔于卫防范之，名义上合称三监，以监殷民。

克殷二年后武王重病，遗命周公继位。但周公告天请代武王死，告天策文藏于金縢箱内。武王死后，“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为应付危难，立武王年幼之子诵为周成王，又自己执政称王，以致引起内部争权斗争。管、蔡也乘机散布流言，引起成王对周公的怀疑。最后成王开金縢箱，看见策文，周公才获得信任。于是管、蔡勾结武庚起兵反周。



周公像



周公庙

武庚利用时机，联络东（鄘）、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嬴）诸族共图复国，声势远比新起而内部分裂的周强大。周公和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了三监叛乱。《逸周书·作雒》说武庚北奔，管叔自杀，蔡叔被囚；周公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维（淮夷之族）九邑。《孟子·滕文公》则说其灭国五十。地居河汾之东的唐也起事策应武庚的叛乱，后为周公诛灭。这次战事是武王灭殷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王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周公于第四年回到宗周即采取两方

面政策：一是分治殷民，一是分封诸侯。《荀子·儒效》说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大抵姬、姜两族进占已开化膏腴或要冲之地，殷及其联盟各族则被赶至落后偏僻地区，造成了周初的一次民族大迁移。

为实现武王遗志，周公于执政五年时以大量殷遗民营洛邑，建东都成周，至七年告成。他请成王到新都举行首次祀典，并开始亲政，成王则请他留守洛邑。此后周公归政成王，自己留守成周，与留在宗周的召公形成“分陕而治”的局面，自陕（指陕原，即陕陌，今河南陕县西南）以东广大疆域都归周公治理。三年之后，周公老于丰，成王任命其子明保到成周负责“三事四方”。周公遗言死后愿归葬成周，但成王尊其功，留葬于宗周附近毕地与文王墓相邻。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除了把制礼作乐叙在六年有失牵强外，其余大抵是正确的。所谓制礼作乐，是指周公在整个执政期间对有关各种典章制度及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树。《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说明周公的制礼工作在历史上很有名。

【晏婴】

晏婴（? ~前500年），尊称晏子，字仲，谥平，后世又称晏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据《左传》记载，他于鲁襄公十七年（前556年）继其父晏弱为齐卿，随后历事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到景公时，由于他政绩卓著，尤其在会见晋国使者范昭和出使楚国期间都表现出超人的大智大勇，为国争了光，升为相国。接着，他又以“二桃杀三士”之计智除了威胁国君的“齐国三杰”，推荐文武全才的田穰苴接任齐国大将军，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而将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他本人也由此而被誉为一代名相，并被史家尊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另据考证，晏婴还是我国先秦时期卿大夫中力倡廉政且躬行不怠的第一人。

以民为本

在《左传》和《晏子春秋》中，都详细记载着晏婴“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多次强调：“以民为本”、“先民而后身”。鉴于此，他数十年如一日，一直以恤贫厚民、敢谏尽职而名显诸侯。

晏婴相齐之初，当年齐桓公称霸的业绩早成历史，整个国势相当衰弱，北边的燕国，西边的晋国和南边的楚国，都经常犯其边境。在国内，官家垄断着大部分山林、土地、渔盐，贵族们“宫室日更，淫乐不违”，“肆夺于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情况下，晏婴充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机智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尽最大努力去为民请愿。

有一次，乐不思政的景公问晏婴，自己能否像先祖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晏婴脱口而出：“桓公之时，特别注重选贤任能，以鲍叔、管仲为左膀右臂。可您呢？不但左倡右优，而且前面有进谗言的，后面有拍马屁的，这哪能成呢！”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话在景公内心深处引起了强烈震动。

还有一次，景公为兴建亭台而役使大批民工，虽值秋收季节也不让他们回

去。民工们心急如焚，但都敢怒不敢言，只能暗暗叫苦。晏婴对此曾专门进谏，无奈景公执迷不悟，仍然一意孤行。接着，还为了亭台的开工而举办了一个大型饮宴，并令晏婴陪侍。晏婴待酒过三巡，忧心更甚，遂即席起舞，同时唱道：

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

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惙惙矣如之何？

唱着唱着，禁不住泪流满面，一些忠臣义士也一个个随之掉下了热泪。酒酣耳热的齐景公见此情景，才震惊、醒悟，下令停止了亭台工程。

又有一次，齐景公病了。他以为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要大臣大举祈祷。晏婴又引经据典，劝他将祈祷上苍改为实行德政，去禁、毁关和薄敛减赋。也巧，景公恩准了他的奏请不久，大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从此，他对晏婴更加信任，而晏婴对他的劝谏，也更多、更及时、更直率。

有一年，阴雨连绵，齐国都城附近百姓的房子倒塌了许多，无数人无家可归，缺吃少穿，眼巴巴期待着朝廷救济。而齐景公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旧饮酒作乐，甚至派人到处去找能歌善舞的人陪酒助兴。晏婴得知后，先将自己家中的器具、粮食分给灾民，然后去见齐景公，说："现在雨水成灾，百姓饥寒交迫，而您却日夜享乐不去救灾。您的马吃着国家粮仓里的粮食，您的狗吃着一般人家经年舍不得吃的肉，您的宫女们天天都在大吃大喝，而您的百姓却在啼饥号寒。如此下去，百姓们就不愿意再拥戴您这样的国君了！"齐景公一听，连忙派人去了解灾情，发放救济物品。

此后不久，晏婴陪伴齐景公外出，见他对田野路边一具具冻饿而死的尸体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又说："当年，桓公看见饥饿的人便给粮食，看见有病的人便给钱看病，而您却对百姓冻饿而死不痛惜。如此下去，百姓就会离心离德，去拥戴别人做齐国的君主了！"齐景公这才连连认错，并下令掩埋死尸，发放粮食，减免赋税徭役。

清廉俭约

在史书中，有多处提及晏婴"食不足"、"食肉不足"、"衣食弊薄"、"乘弊车驽马"、"布衣栈车而朝"。还说他每日的正餐，吃的是糙米饭，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一天，齐景公的使者到他家正赶上他要吃饭，就把饭分了一份给使者吃，结果两个人都没吃饱。他穿的是粗布衣，即使祭祀祖先也不过将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而已；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30多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走着去。至于住的，照景公的话说，是"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

齐景公见晏婴如此清苦，便派人送给他许多钱财。前两次都被他全部退还。第三次他收了下来，将它们转赠给了贫穷的亲友和灾民。之后，他生怕景公再次恩赐，便如实向景公说明了情况，还说："作为一个大臣，将国君的恩赐用于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忠臣是不应该干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臣下就变成了一个装东西的箱子，仁者是不会干的；上对不起国君，

下对不起百姓，只干守财奴的事，聪明的官吏是不会干的。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再赏赐臣下了。”景公不解，问：“想当年，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赏的500个村庄吗？”晏婴便说出了“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的话，并“再拜而不敢受命”。

然而，景公总觉得晏婴乘坐的车子与其身份太不相称，所以仍坚持送他一辆由几匹良马驾的好车。晏婴再三谢绝，并坦诚地表示：“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怕他们奢侈浪费和行为不轨，一直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负担。我若乘坐好车，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弥漫四方。假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无法禁止了。”

接着，齐景公又利用晏婴出使他国之际，“毁其邻以益其宅”，为他新建了一处相国府。但晏婴回京之后，马上从相府搬回了原来低矮狭小的住处，同时将相国府加以改造，分配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

后来，景公还决定将富庶的平阳（今山东平阳东北）和棠邑（今山东聊城北）赏赐给晏婴。晏婴表示感激却不肯接受。他说：“以往，由于您热衷修建亭台楼阁，致使百姓精疲力尽；由于您迷恋声色犬马，致使百姓贫困不堪；由于您动不动就对邻国兴兵打仗，致使百姓性命难保。直到现在，百姓们仍在怨恨朝廷和官府。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赏赐。”景公默默点头，但又问：“难道您就不想富贵吗？”晏婴答道：“我以为，当臣下的首先要为君主，然后再为自己；先为国，再为家。至于富贵，人人所盼，我怎能例外呢！”景公说：“那么，我应赏赐您什么呢？”晏婴随即表示：“如果您能下令减免渔盐商人的税收，对农民实行‘十一税’，再减轻各类刑罚，这将是我想得到的最大赏赐，我也将永远感激不尽！”景公十分高兴，当即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

晏婴到了晚年，不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赏赐，还向齐景公提出将原来赐他的封地退回去。景公认为：在齐国历史上从未有臣老辞邑的先例，坚决不同意。但二人推来让去，最终还是晏婴说服了他，将封地全部退还，自己仅留下了一辆劣马驾着的破车。

晏婴临终之前，还谆谆告诫家人：丧事要从俭，绝不许厚葬。

忠于老妻

在《晏子春秋》中，还有多处描写晏子对其老妻忠贞不贰的篇章。

其一说的是，有一天，晏子正在房内休息，忽然有个年轻漂亮的婢女轻轻推门进来，接着眉来眼去地向他献殷勤。她见他兀然不动，又露骨地说：“奴婢本是东郭人，自愿献身于大人，终生服侍大人。”晏婴一听，顿时拉下脸来，严肃地规劝她好自为之，千万不要妄生杂念。那婢女又羞又愧，只好低下头匆匆离去。

其二说的是，有一天，齐国大夫田无宇路过晏婴家门口，见晏婴站在门外，便凑上去打招呼。这时，房内走出一位老妇人，其“发斑白，衣缁布之衣，而无里裘”，走起路来也摇摇晃晃的。田无宇待那妇人走远后，问晏婴：“刚才那位老妇人是谁啊？”晏婴说是自己的妻子。田无宇听罢大笑，说：“您位至中卿，食田七十万，为何不另娶一位妙龄阿娇，却同一个老太婆厮守在一起？”

晏婴瞧了他一眼，不屑地说："我晏婴曾听人说：'去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淫；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难道你希望我有淫乱之行，不顾于人伦而另娶，做那些倒行逆施、寡廉鲜耻的事吗?"几句话，将田无宇说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其三说的是：齐景公有位女儿，年轻貌美，想嫁给晏婴。有一天，景公借机到晏婴府上去赴宴。酒至半酣，景公见一妇人穿堂而过，便明知故问："这就是您的妻子吗?"晏婴点头称是。景公故作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这样老，这样丑!"接着又说自己有个女儿"少且姣"，愿意嫁给他做夫人。晏婴一听，马上站了起来，诚惶诚恐地表示："现在，我妻子确实又老又难看，但她和我已经生活了许多年。她年轻时，也很漂亮。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变成而今模样。我决不能辜负她!"还说："无论任何人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和难看的。我感谢主公的好意，但我万万不能从命!"说罢，俯身而拜。景公见此，也只好作罢。

在晏婴相齐期间，齐国万象更新。他兴国安邦的韬略，尤其是他那以民为本、清廉节俭以及忠于爱情的故事，一直广为流传，深得人心。以至于汉朝太史公司马迁在为他作传时，也连声赞叹："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意思是，如果晏婴还活着，哪怕让我司马迁去为他执鞭驾车，我也心甘情愿!

【管仲】

（? ~前645）春秋时齐国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亦称管敬仲。据说他早年经营商业，后从事政治活动。在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支持公子纠。小白取得君位后，不计前嫌，重用管仲；管仲亦辅佐齐桓公，施行改革。在政治上，他推行国、野分治的参国伍鄙之制，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务行其业；在经济上，实行租税改革，对井田"相地而衰征"（见先秦租税)，并采取了若干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政策。

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得到稳定和改善的基础上，管仲积极促使齐桓公采取尊王攘夷、争取与国的方针，以建立霸权。所谓"攘夷"，是对侵占华夏地区的戎、狄进行抵御。前649年，扬拒泉皋之戎入侵王室地区。此后二年，以齐为首的诸侯国派兵戍守王都。前644年，山戎伐燕，齐军救燕。前661年狄人攻邢（今河北邢台境内)，次年灭卫（今河南淇县)。其后二年，以齐为首的诸侯国恢复卫国，另建卫都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所谓"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前655年，齐军与诸侯军伐楚，迫使楚国向王室贡送蚕丝（一说为包茅)。在葵丘之会的盟辞中，有诛不孝、无得更易太子、不允许以妾为嫡妻、不得私自分封国邑等条文，目的皆在于维护周天子下的宗法制度。所谓争取与国，是运用军事、经济手段来取得中小诸侯国的支持。谭（今山东济南东)、遂（今山东肥城西南）等国曾藐视齐国，被齐灭掉。服从者来朝聘，齐取厚报。前651年，由齐国召集葵丘之会，确定诸侯国间不得筑堤防雍水来危害邻国，



管仲像

不得有意不卖给邻国粮食。

管仲的对内、对外政策，将守旧与革新结合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两重性、过渡性。但他毕竟辅佐齐桓公，建立了霸业。

【子产】

（? ~前522）春秋后期政治家，郑国执政。郑穆公之孙，名侨，亦称公孙侨。青年时即表现出远见卓识。郑简公元年（前565），其父公子发率军攻蔡，大胜，郑人皆喜。他却指出这将导致楚国来攻和晋国反击，而使夹在中间的郑国饱受战祸。两年后，公子发在贵族内讧导致的政变中被杀，郑简公亦被劫持到北宫。子产沉着机智，布署周密后始率家兵攻打北宫，遂在国人支援下平息变乱。新任执政公子嘉制订盟书，强调维护个人特权，引起贵族大臣反对。公子嘉打算强制推行，子产又力劝他焚毁盟书，平息众怒，以稳定政局。郑简公十二年，公子嘉终因专权被杀，子产得立为卿，任少正。在同霸主晋国的一系列交涉中，他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尽量维护郑国的权益。简公十八年，他随执政公孙舍之攻打陈国，也能注意军纪，遵守传统礼制。事后在向晋国献捷时，又有理有据地驳回了晋人的责难，迫使其承认郑国的战绩。为此郑简公给予子产重赏，他却只接受了与其地位相称的部分。次年，楚康王为慰抚许国率军伐郑，子产主张坚守不战，让楚军获取小利后满意而归，以换取较长期的和平。郑人照此办理，果然促成了“弭兵之盟”。简公二十三年，郑国大臣内讧，执政伯有被杀。子产严守中立，以其卓越的才能受到多数人的尊重，遂在显贵首领罕虎的支持下，出任执政。

子产治国特别注意策略，他一方面照顾大贵族的利益，团结依靠多数；一方面对个别贪暴过度的贵族断然给以惩处，以维护政府威信。他不毁乡校，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吸取有益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对于晋、楚两霸，他既遵照传统礼制谨慎奉事，不给对方寻衅的借口，又在有条件时大胆抗争，驳斥其无理苛求。他宣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反对迷信鬼神星象，却又承认贵族横死能为厉鬼，而要将其子孙立为大夫加以安抚。他被孔子称为仁人、惠人，是守旧的士大夫景仰的人物，却又“铸刑书”，公布成文法典，执行严格统制人民的“猛政”，创立加重剥削的“田洫”、“丘赋”等新制以“救世”。这说明子产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虽然力图维护传统的旧制，却不能不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从事必要的改革。子产曾指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就是说，治国必须照顾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一意孤行则不能成功。他又说：“政如农功，日

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即遇事应胸有成竹，执行中要坚持既定规划而不轻易越轨。他还注意搜罗人才，用其所长，并能广泛听取建议，择善而从。子产执政之初，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广泛斥责，但他不为所动，坚决推行。其后改革成效显著，人们又普遍歌颂他的政绩，甚至担心后继乏人。

【孙叔敖】

孙叔敖原名芳敖，字孙叔，又字艾猎，春秋楚国期思（今河南固始西北）人。其父芳贾曾任楚国司马，因反对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宰相）斗越椒叛乱，而被贼人杀害。为躲避灾祸，其母带着他逃回故乡种田度日。

据史载，孙叔敖外貌丑陋，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知识渊博，道德高尚，后来做了楚国的令尹，在就任3个月之内，就把原来的烂摊子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楚国出现了“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的一片振兴气象。

见义勇为

孙叔敖从小就有胆有识，处处为别人打算。在他还不到10岁时，有一次他在田边玩耍，看到了一条两头蛇。据传说，两头蛇是不祥之物，见者必死。所以，他一时又惊又怕。但为了不让别人再看见它，便随即捡起一旁的小木棍，竭力向蛇打去。那蛇猛地昂起头，样子十分吓人。他却就势窜上去，一脚踢在蛇头上，接着连抽三木棍，将蛇打死了。随后，又就地掘了一个坑，把它深深地埋人地下。

孙叔敖回到家里，躲在一处哭起来。母亲问其缘故，他将刚才的情况说了一遍。母亲欣慰地点了点头，说：“人常说‘有阴德者，阳报之’。德能战胜不祥，仁能消除百祸。你如此想着别人，关照别人，老天会保佑你的。所以，你不但不会死，说不定还有后福呢！”孙叔敖听罢母亲一番话，也随之破涕为笑。

此后，孙叔敖的母亲更加勤俭，节省钱米供儿子读书；而孙叔敖也求知若渴，学业突飞猛进。此事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四面八方，被越来越多的人传为美谈。

大公无私

数年后，楚国令尹虞丘子听说孙叔敖德才兼备，便微服私访，亲自考核，并确认他是位不可多得的贤才。于是，将他引荐给了楚庄王，并建议由他接替自己的职务。开始，楚庄王说什么也不答应。虞丘子说：“长久占据禄位的，是贪；不推荐贤能通达的，是虚假；不把职位让出来的，是不廉；不能做到这三点，是不忠。做臣子的不忠，君王又为什么偏要把他当作忠？”说罢，又一再表示：“臣下一定要辞职！”

楚庄王见虞丘子如此态度，也不便再说什么，只好亲自核验孙叔敖的人品和才干。他问孙叔敖治国之道，孙叔敖从容作答。二人越谈越投机，竟谈了整整一天。庄王遂提出由他执掌国政，他却推辞道：“我出身于田野农舍，骤然执掌大权，怎能让众人信服呢？大王若有意用我，就把我摆在众臣之后吧！”然而，庄王基于虞丘子的力谏和自己的当面验证，还是让他担任了令尹。

孙叔敖上任不久，虞丘子的家人犯了法。孙叔敖经过详细审讯，毅然照律

将那人判了死刑。当时，不少人都抱怨孙叔敖对不起虞丘子，而虞丘子却非常高兴地进见庄王说："臣下说孙叔敖能治国理政，执法不偏私，现在可以证实了吧！"

施惠百姓

孙叔敖为政，注重教化，倡导勤俭，致力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平时，孙叔敖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要上下和睦同心，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每逢秋冬季节，又劝导人们进山采伐竹木等林产品，然后储存起来；待春夏之际，再通过河流运出去卖钱。老百姓从中受到了实惠，自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发展经济方面，孙叔敖最大的贡献是兴修水利。首先，他在自己的家乡期思一带征调民工，排除积水，取得了良好的效益。接着，在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兴建水渠，使当地农业获得了丰收。随后，又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凿了规模宏大的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即其残存的一部分）。有关资料上说：芍陂"陂周一百二十里许"，可灌溉100万亩农田，不仅对当时的生产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惠及后世。有关专家还评述道：芍陂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最著名的水利工程。它比西门豹筑建的漳河渠早200多年；比四川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早360多年。当地人民为表达对孙叔敖的怀念和敬意，特地在陂北修建了一座"孙叔敖祠"。

此外，孙叔敖还协助楚庄王训练军队，整修武备，终于在公元前597年打败了晋国，从而成为中原霸主。

清正廉洁

孙叔敖尽管爵高、权重、禄厚，但平日只"乘栈车牝马，披羖羊之裘"，连他的妻子也"不衣帛"。他的随从见他如此俭朴，劝他说："坐新车则安全，乘肥马则行得快，穿狐裘则暖和，您应该换成新车、肥马、狐裘。"他解释道："君子穿上好衣服更加恭谦；小人穿上好衣服更加傲慢。我没有好的品德配乘新车、肥马，穿好的衣服。"

有一次，有位名士去拜见孙叔敖，问他："我听说做官做久了的，会遭到读书人的忌妒；俸禄丰厚的，百姓会怨恨他；地位尊贵的，君主会厌恶他。而今，您官久、禄厚、位尊样样俱占，却没有得罪任何人。这是为什么呢？"孙叔敖爽快地回答道："我虽然身为令尹，但从心里更谦虚；每当俸禄增加，得到我所施舍钱财的人也随之增加；地位越尊贵，待人的礼数越恭谨。正因为这一缘故，才没有得罪楚国各界人士。"

鉴于孙叔敖功勋卓著，楚庄王曾多次要赐他封地，但他每次都坚辞不受，"持廉至死"。

在孙叔敖临终之前，他还给庄王上奏章说："承蒙大王提拔，我这样一个田野农夫竟当上了令尹，可惜我无能报答您的知遇之恩。我有一子，资质太差，不配伺候大王，请让他回乡种田。"还说："晋国虽败，但目前仍是我国的劲敌，不可小视；连年兴兵攻伐，百姓度日艰难，大王要加以体恤爱护！"庄王看罢，不禁热泪盈眶，无限感慨地对人说："令尹至死不忘国家，实在难得！"

孙叔敖死后，其子孙安谨遵父训回到了家乡。由于家中一贫如洗，终日以种田、打柴维持生计。庄王最喜爱的戏子优孟听说后，将此情编成了歌谣，自己装扮成孙叔敖，演唱给庄王。庄王深

受触动，立即召见了孙安。当他见孙安衣衫褴褛，不禁泪下，问其“为何穷到如此地步?”优孟从旁答道：“这正说明孙叔敖令尹是何等公而忘私!”庄王略加思忖，便“封之寝丘（在今河南固始境内）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

【西门豹】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魏国人，他生卒年月不详，却“名闻天下，泽被后世，无绝已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他为政清廉治邺有功。

邺是当时魏国边远地区的一个县，夹在韩国和赵国之间，位于今日的河南安阳和河北临漳一带，过去一直属于战略要地。时任魏国国君的魏文侯（前424～前396年在位）是位奋发图强的君主，很注重要冲之地官吏的任用。但这里的历任县令都令他失望，致使他一度“以邺为忧”。后经人推荐，他改任西门豹做了邺县县令。

西门豹一到任，只见田地荒芜，人烟稀少，市面萧条，一片凄凉景气。于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们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地告诉他：“这都是为了给‘河伯娶妇’才闹到这步田地!”

原来，邺县境内有条漳河，因年久失修，一遇暴雨，便泛滥成灾。当时有种迷信传说，说主管漳河的水神叫河伯，他法力无边，却非常贪色。若每年夏初挑选一位漂亮的姑娘送他为妻，他就会保佑当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不然，便兴风作浪，冲毁房屋，淹没庄稼。为此，巫婆在每年春天便开始挨家挨户地选美女。一旦物色到合适的姑娘，便将她隔离在一个特殊的小院中，然后择“吉日”将她放在用芦苇编制的小船上，随水漂流，直到沉入河底。与此同时，三老、廷掾也借口为“河伯娶妇”而搜刮民财。他们每年索取的钱财多达数百万，绝大部分都进了他们和巫婆的腰包。也正因此，一般人家凡有美貌的女孩子，生怕被巫婆看中，不得不带着女儿逃亡他乡；而更多的人是承担不起乡绅摊派的“娶妇”钱，被迫离乡背井；即使还留在当地的老百姓，也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西门豹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十分气愤。他认为：要使邺县百姓安宁，生产发展，当务之急是解决“河伯娶妇”问题。他思来想去，很快就有了主意，但却不动声色地对长老们说：下次河伯娶妇时，让三老、巫婆们都参加，你们也都去，我也前去为新妇送行。

到了给河伯送媳妇那一天，西门豹亲临现场，“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主持嫁娶仪式的那位祝婆，原来是个70多岁的老妖婆，有20来个女弟子簇拥着她。她正要宣布仪式开始，西门豹突然提出要看看新娘长得怎么样。老巫婆将新娘带到他面前，他打量了一下，便对三老、巫婆和围观的百姓说：“河伯是贵神，给他找的夫人应当分外漂亮，而这个女孩子看来还稍为逊色。请大巫前去报告河伯，请他暂缓数日，待找到更理想的再送去。”说罢，没等那巫婆反映过来，已“令吏卒共抱大巫妪投入河中”。在场者顿时目瞪口呆，而西门豹却一本正经地注视着河水。等了一会，又对其随从说：“看来大巫是上了岁数，

办事不够利索，让她的弟子去催催吧！”说罢，即令属下“复以弟子一个投河中”。又等了一会，老巫没回来，小巫也没动静，西门豹又装做不耐烦的样子说：“这个弟子无能，再派个弟子去！”接着，又一个小女巫被扔进了河里。待一连投下三个小女巫之后，西门豹又表示：可能因为大巫小巫都是女的，缺乏社会经验，遂将三老也投入河中。当然，这些人也都一去不复返。于是，西门豹又显出忧愁的样子，环顾众人说：“他们杳然无音，是不是因为他们上了年纪……”话未说完，在场的乡绅官吏、里长衙役，不约而同地战战兢兢跪在了地上，“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一个劲地求“饶命”。

这时，西门豹才郑重地对众人讲：“河伯本来是并不存在的，是一些坏人平白编造出来的。他们借以盘剥百姓，坑害民女，真是罪大恶极！我恨不得将他们统统扔进河中，让他们偿还血债！”随后，又严肃警告道：今后，谁要是再提河伯娶妇，我就派他当媒人，先送他到河伯那儿去！

此后，西门豹又派兵将三老、廷掾之流从百姓那儿盘剥来的财物全部追回，如数发还给了老百姓，又将巫婆剩下的女弟子一一配人，再不许她们装神弄鬼。

西门豹清楚地知道：若想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单靠破除迷信还不够，重要的是兴修水利，消除水患。所以，他又亲自带人察看地形，发动群众在漳河两岸凿修了 12 道水渠，以便洪来疏导，旱时灌溉。从此，这一带原来遍布的盐碱地全部变成了良田，亩产比其他地区高出了 4 倍多。而这些水渠，直到 1000 多年后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当然，随着各种情势的迅速好转，当初逃荒避难的人家也都纷纷重返家园，过起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对告别贫困的百姓，西门豹又实行起“蓄积于民”的办法，免除其沉重的赋敛，使“民人以给足富”，“河内称治”。其间，魏文侯曾特地前去视察，并为那儿的欣欣向荣而大为赞赏。

【李悝】

战国初期魏国著名政治家。也作李克。有的古书中还将李克写成“里克”，或讹作“李兑”、“季充”。李悝为魏文侯到武侯时人，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守。上地在河西，故李悝经常和秦人交锋作战。桓谭以为李悝为文侯师，班固、高诱以为是文侯之相。由于先秦文献缺乏记载，故此说尚难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悝能参与机密，为文侯心腹之臣。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这些记载都表明，文侯时魏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贡献。

李悝以为“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还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有赏有罚，唯才是用，这是战国时甚为流行的法家主张，当时不少国家都因贯彻这些主张走向富强。

在经济策略方面，尽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张。他认为田地的收成和为此付出的劳动成正比，“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又认为粮贵则对士民工商不利，谷贱则伤农，善治国者必须兼顾士民工商和农民双方的

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农，每年除衣食、租税和祭祀等开支外，还亏空四百五十钱，这就是农民生活贫困和不安心于田亩的原因。他针对此情况作平籴法，即将丰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个等级，按比例向农民籴粮；把荒年也分成大饥、中饥和小饥，在大饥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籴的粮食发放给农民，其余则类推。这样可使饥岁的粮价不致猛涨，农民也不会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于能“取有余以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法经》的编订，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春秋末年，晋、郑诸国作刑鼎或刑书，以公布新的法律条文。到战国时，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出现了更多的新的成文法典。李悝“撰次诸国法”，修订出《法经》六篇，包括盗、贼、囚、捕、杂、具。盗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大盗则成为守卒，重者要处死。窥宫者和拾遗者要受膑、刖之刑，表明即使仅有侵占他人财物的动机，也仍构成犯罪行为。贼律是对有关杀人、伤人罪的处治条文，其中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囚、捕两篇是有关劾捕盗贼的律文。杂律内容包罗尤广，包括以下几类：①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②狡禁。有关盗窃符玺及议论国家法令的罪行。③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规定。④嬉禁。关于赌博的禁令。⑤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⑥金禁。有关官吏贪污受贿的禁令。如规定丞相受贿，其左右要伏诛；犀首以下受贿的要处死。具律是《法经》的总则和序例。《法经》出现后，魏国一直沿用，后由商鞅带往秦国，秦律即从《法经》脱胎而成，汉律又承袭秦律，故《法经》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李悝的著作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者有法家类《李子》三十二篇，儒家类《李克》七篇；兵权谋家《李子》十篇，也可能是李悝所作。李悝的思想和治术都属于法家范畴，故其大多数作品被列入法家类。由于他和子夏学派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有些作品不免带有几分儒家色彩，《艺文志》将其列入儒家也不为无因。以上三种著作早已亡佚，但在魏晋或隋唐时尚有零简残篇传世。如《水经注》和《文选·魏都赋》注都引有《李克书》。由于《汉书》以李悝与李克为两人，后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李悝是法家，李克是儒家。

《法经》早已不存，唯桓谭《新论》中有关于《法经》内容的简述，《晋书，刑法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新论》已亡佚，桓谭介绍《法经》的一条保留在明人董说《七国考》之中，是我们今天了解《法经》的重要依据。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法经》，夹杂了天尊、佛像等语，当是误引他书所致，故难以凭信。

【吴起】

战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曾学于曾子。后在鲁国为将军，闻魏文侯贤而去鲁至魏，武侯时为西河郡守。吴起在治术上受儒家德治的影响，如武侯曾将“山河之固”视作魏国之宝，而他则以为“在德不在险”。他还认为自己能使魏国“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

义，父子有序”。表明他对政治革新相当重视。

吴起不仅具有治国的才能，而且长于作战用兵。《韩非子》说他治军时能和士卒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故士卒乐为其用。魏惠玉时，有人认为魏国士卒能所向无敌，应归功于吴起的余教，惠王为此向吴起的后代颁发了赏田。

后来，吴起由于与武侯不和，离魏奔楚。楚悼王以起为令尹。当时，楚国的旧宗法贵族势力很强，上不利于君主，下为害于百姓，兵弱而国贫。于是吴起为悼王出谋，将传到三世时的封君子孙削籍为民，把一部分贵族放逐到荒僻之地，废掉公族中之疏远者，以改变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局面。由于“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节省开支“以奉选练之士”，楚国实力渐增，南攻百越，北并陈、蔡，以致秦和三晋都有所震动。吴起在位一年而悼王卒，一批旧贵族乘机作乱，将吴起肢解。《史记》说吴起死于悼王尸体旁，肃王继位后，即以伤害悼王尸体罪，收捕作乱贵族七十余家，并处以三族之刑。《韩非子》认为楚未能重用吴起，变革效果不大。又说吴起被杀，是因为“大臣苦法”，可见吴起的失败主要是贵族反对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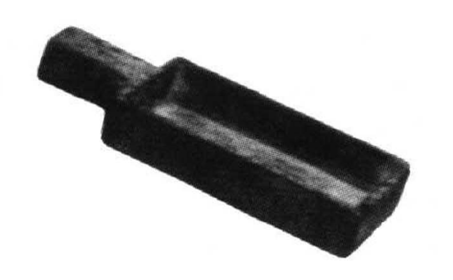
《汉书》说吴起和孙武一样，也有兵书流传下来。《韩非子》有“孙吴之略”的话，则战国时孙、吴已相提并论。司马迁还提到西汉时“吴起兵法世多有”。可见吴起的兵书在战国、西汉时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这种兵书是否真是吴起所作，尚不得而知。《汉书·艺文志》兵家类有《吴起》四十八篇，今本《吴子》当是这四十八篇中的一部分。《艺文志》杂家类有《吴子》一篇，书已佚，疑亦吴起所作。

【商鞅】

战国时秦国政治家。姓公孙，卫国贵族，又称卫鞅或公孙鞅。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座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座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闻秦孝公下令求贤，发愤图强，乃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其主要内容是：①实行连坐法。即将秦民编入什、伍之内，使其相互监督。一人犯法，同一什、伍之人不检举、告发，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告奸者则可受赏。②用法令力量迫使大家族向个体家庭转化，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③禁私斗，鼓励秦民杀敌立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



商鞅像



商鞅方升

轻重被刑。④贯彻重农抑末的策略，其具体措施是：对于努力耕作者免其徭役，对于怠于种田或因从事手工业、贾贩活动而致贫者罚为奴隶。⑤要求宗室也立军功。《史记》记："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奖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①推行县制。并小都、乡、邑为直属于中央的县。县置令、丞。全国共置三十一县（一作四十一县）。②废除井田制。《史记》有："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③统一度量衡，即平斗桶、权衡、丈尺。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印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印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於、商（今陕西商州、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商鞅相秦期间，因鞅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惠王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印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商鞅遗物，过去所发现的有铜戟、铜镦和铜方量。戟铭为"十三年，大良造之造戟"，镦上的铭文为"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方量之铭是"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十六年、十八年皆为孝公之纪年。文献记载中称商君相秦，今证之以铭文，鞅官居大良造，和国相相当，相邦之名孝公时尚未出现。

战国晚期，已有商鞅或商鞅后学的作品流传于世。《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南面》又说："说在商君之内外。"表明韩非读过商鞅的内、外篇。西汉时司马迁曾读过商君的《开塞》、《耕战》，则今本《商君书》西汉时已有之。但该书中有的篇内提到垂沙

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等，这些战役都发生于商鞅卒后几十年。可见该书有些部分是战国晚期的作品。

【苏秦】

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纵横家兴于战国后期。时群雄相争，除用武力外，还需展开外交、政治上的攻势。纵横家应运而生。他们并不专崇一种主张或观点，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定其取舍，故忽而用儒，忽而用道，构成了所谓的一纵一横。西汉时称纵横之说为“长短说”，长说、短说和一纵一横含义相同，都是说纵横之士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去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到战国晚期，因秦强六国弱已成为定局，故凡联合关东各国抗秦者即为合纵，而秦设法破坏合纵就是连横。如《战国策》就把秦和六国对立起来，并总以苏秦、张仪为合纵连横策略的代表性人物，双方各自为六国或秦的利益而进行辩护。

《汉书·艺文志》肯定了纵横家“权事制宜”的这一长处。但过分的灵活性也易流于欺诈，《史记》说六国时“谋诈用而纵衡长短之说起”，《汉书》也称其“上诈谖而弃其信”。尽管如此，纵横家在战国晚期仍受到各国君主的重视，故韩非说：“山东言纵横，未尝一日而止也。”

有关苏秦的事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等书。《史记》说他是东周洛阳人，曾到齐国受业于鬼谷先生，后出游数岁，一无所获而归。遭到家人的讥笑。于是他发愤用功，得周书《阴符》而读之，领会出如何方能投主之所好的奥秘。他先去游说周显王、秦惠王和赵肃侯，但都未成功。接着又到燕国去见燕文侯，文侯接受了他的合纵主张，并资助他车马金帛，使他能到赵、韩、魏、齐、楚几国去游说。六国经过他的劝说而联合起来，苏秦成为纵约长，“并相六国”。到燕易王时，他因得罪易王而亡齐，到齐湣王时，齐大夫嫉恨苏秦而使人刺之。他在临死前对湣王说：我死后可用叛齐之罪名而处车裂之刑，这样做以便于找出刺杀我的凶手。苏秦死后，其弟苏代、苏厉也到处游说而“名显诸侯”。

司马迁在写《苏秦传》时，发现不少有关苏秦的记载不可信，有张冠李戴之误。但他在处理苏秦的事迹时，特别在年代方面仍有不少错误。如他把苏秦最初游说赵、燕等国定在赵肃侯、燕文侯时，将其卒年定在张仪之前。经过不少学者的考订，明确了苏秦应在燕昭王、齐湣王之世活跃于六国间，与其同时的著名人物有孟尝君、李兑、周最等。苏秦先仕于燕，其主要活动是，离间齐、赵关系，以减轻齐对燕的压力。又和赵李兑共同联合五国以攻秦，后来他又离燕至齐，受到湣王的重用，但苏秦仍忠于燕，暗中为燕效劳。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劝齐攻宋，以转移齐对燕的注意力。于是燕昭王派乐毅突然出兵以攻齐，齐因措手不及而败于燕。苏秦阴与燕谋齐的活动至此而败露，齐处以车裂之刑。这在战国晚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在许多当时人著述中都有反映，如山东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本《孙子兵法·用间》，里面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话，又如《吕氏春秋·知度》，说“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这些记载表明，战国时人都知道苏秦为燕而仕齐，最后使齐亡而兴燕，但他自己也为燕而作出牺

牲。苏秦在战国晚期名声颇大，《荀子·臣道》把“齐之苏秦”和“楚之州侯”、“秦之张仪”相提并论。西汉时，苏秦仍受人称道，如《史记·邹阳传》赞扬他能成为燕的忠臣。《淮南子》也多处提到他，并肯定他有知权谋的长处。司马迁以为苏秦在“连六国从亲”的过程中，显示出他的才智过人。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苏子》三十一篇，当是苏秦作品或后人所记有关他的事迹的汇集，其中似也包括苏代、苏厉的一些游说之辞。《苏子》是纵横家类中篇幅最多的一部，可见从战国到西汉，纵横家中属于苏氏弟兄的作品或有关材料分量很多，流传也最广。汉以后该书已亡佚。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纵横家书》，其中有十一篇苏秦上燕王或赵王书，不见于《战国策》、《史记》等传世的古籍，另有两篇其部分内容见于《战国策》，这十三篇是现在了解苏秦事迹的重要新材料。

【张仪】

（？～前310）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张仪为魏人，于魏惠王时人秦。秦惠文君以为客卿。惠文君十年（前328），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今陕西东部）于秦。当年，张仪为秦相。惠文君于十三年称王，并改次年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张仪与齐、楚、魏之执政大臣在啮桑相会，随即免相。次年，张仪相于魏，更元八年，又相于秦。十二年，张仪相于楚，后又归秦。惠文王卒武王立，武王素与张仪有隙，仪于武王元年（魏襄王九年，前310）离秦去魏。据《竹书纪早》，张仪于此年五月卒于魏。

《战国策》记张仪与苏秦是相对立的一纵一横，互相著文攻讦对方，这和史实不符。后来司马迁受此影响，在《张仪列传》中将张仪和苏秦列为同时之人；甚至还说在苏秦发迹后，张仪受苏秦激励而人秦，又记张之卒在苏秦后，也均与史实不符。据考证张仪在前，苏秦在后。和张仪同时的是公孙衍、惠施、陈轸等人。苏秦是张仪死后才在政坛上初露头角的。在纵横家中张仪显然是苏秦的前辈。《史记》记张仪的年代基本正确，而把苏秦的经历提早了约三十年。张仪在当时名声颇大。《孟子，滕文公》引用景春之语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在有些人看来，张仪是能左右天下局势的大人物。《荀子·臣道》则认为他和苏秦皆巧敏佞说，善取宠于上。司马迁一方面称张仪有“言纵衡强奉”之功，一方面也说他是通于权变的“倾危之士”。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十篇，汇集了张仪的作品或和他有关的材料。此书汉以后已亡佚。在传世的战国铜兵器中，有一铜戈之上刻有“十三年相邦仪之造”和“咸阳工师”之类的铭文，当是秦惠王十三年张仪任相邦时所作。

【范雎】

（？～前255）战国时期秦昭王相。魏国人。字叔。《韩非子》及汉代石刻又作范且，或误作范睢。范雎善辩，曾欲求仕魏王，但因家贫无资，遂事魏中大夫须贾。他从须贾使齐，被诬以通齐

卖魏。归国后，魏相魏齐使人笞之几死。后受郑安平之助，易名张禄，潜随秦使王稽入秦。但《说苑·善说》篇载："张禄掌门，见孟尝君，……因为之书寄之秦王，往而大遇"，与一般说法不同。范雎至秦，上书秦昭王，得到召见。他抨击穰侯魏冉越韩、魏而攻齐刚、寿的做法，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认为韩、魏与秦接壤，在地理上有"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的重要战略地位，是秦向外兼并发展的首要目标。这些主张以后基本上被秦昭王采纳施行。范雎即被拜为客卿，谋兵事，深得昭王信用。他又进说秦昭王，指出太后擅权，"四贵"用事，恐致"卒无秦王"之危。于是昭王于四十一年（前266）下令废宣太后，逐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于关外，并拜范雎为相，封于应（今河南宝丰西南），号为应侯。范雎得志后，为报旧怨，曾在各国使者之前羞辱魏使须贾，并迫使魏齐出亡而自尽。长平之战，范雎用反间计，使赵以赵括代廉颇为将，秦将白起因而大破赵军。长平战后，范雎听信韩、赵的游说，因妒忌白起的军功，借秦昭王之命迫使白起自杀。秦围邯郸之役，范雎举荐为将的郑安平兵败降赵。随后他举荐的河东守王稽也因通诸侯之罪被诛。范雎内惭，并失去秦昭王的宠信，终举蔡泽自代，谢病辞归相印。云梦秦简《编年记》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记："王稽、张禄死。"是王稽被诛的当年，范雎亦卒。

【乐毅】

战国时名将。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魏将乐羊之后。因贤而好兵，为赵人所推举。及赵武灵王沙丘之乱，乐毅离赵至魏。后闻燕昭王立志报齐之仇而广延天下贤士，于是由魏使于燕。燕昭王待以客礼，遂委质为臣，任亚卿。燕昭王经过长期准备，欲出兵伐齐。乐毅认为齐乃霸国之余，不易独攻，乃亲自出使约赵，别遣使约楚、魏等国共伐齐。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燕悉起兵，以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又以相国印授之。于是乐毅率燕、赵、秦、韩、魏五国之师伐齐，济西一战，大破齐军。乐毅遣还诸国军队，独率燕军乘胜深入，攻下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燕昭王亲至济上劳军，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博东南），号昌国君。除莒（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外，齐七十余城先后被乐毅攻下。乐毅于整军经武的同时，还在齐地采取了一些收拢人心的政治措施。燕昭王死后，继位的惠王与乐毅有旧隙，齐将田单便乘机纵反间于燕。燕惠王误使骑劫代将而召还乐毅，乐毅畏诛，遂西奔赵，被封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号望诸君，乐毅去后，燕破军亡将，齐乘势复国。燕惠王悔惧，使人谢于乐毅，乐毅则报书于燕惠王以自明心志。是后燕复封乐毅于乐閒为昌国君，乐毅则兼为燕、赵出力，两国皆任之为客卿。后卒于赵。

【蔺相如】

临危授命

廉颇是赵国的优秀将领。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廉颇作为赵国的将领去攻打齐国，大败齐军，攻取阳晋，被任命为上卿，他以勇气过人闻名于诸侯。

蔺相如是赵国人，是赵国宦官令缪贤的门客。

赵惠文王时期，赵国得到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这件事后，派人送信给赵王，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来交换和氏璧。赵王和大将军廉颇等诸位大臣商议：想把和氏璧给秦国，又恐怕得不到秦国的十五座城，白白被欺骗；想不给，又怕秦兵前来进犯。计议未定，连寻找可以去秦国回复秦王的人，也未能找到。宦官令缪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出使秦国。"赵王问道："你怎么知道他行呢?"缪贤回答说："我曾经犯了罪，私下想逃到燕国去，我的门客蔺相如制止了我，他说：'您怎么了解燕王呢?'我对他说：'我曾经陪同大王与燕王在边境上相会，'燕王私下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你交个朋友。'我从这件事了解燕王，因此想去燕国。相如对我说：'赵国强大，燕国弱小，而您受到赵王的宠信，所以燕王想和您交朋友。如今您要逃离赵国到燕国去，燕国畏惧赵国，势必不敢收留您，反而会将您捆住交还赵国。您不如袒露着臂膊伏在刀斧旁向赵王请罪，则可侥幸获得宽免。'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幸而大王也宽赦了我。我个人认为此人是个勇士，足智多谋，可以担任使者。"当时赵王召见蔺相如，他问蔺相如说："秦王请求用十五座城交换寡人的和氏璧，可以和他交换吗?"相如说："秦国强大而赵国弱小，不能不答应。"赵王说：如果秦王拿去了我的和氏璧，却不把城邑给我，怎么办?"相如说："秦国用城邑换取和氏璧而赵国不同意，是赵国理屈。赵国把和氏璧给了秦国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则是秦国理亏。衡量这两种情况，宁可答应秦国，让秦国承担理曲的责任。"赵王问："那么谁可以出使秦国?"相如说："大王一定没有合适的人，我愿意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如果秦国把十五座城邑交给了赵国，和氏璧就留给秦国；秦国不把十五座城邑交给赵国，我一定将和氏璧完好的归还赵国。"于是，赵王便派相如带着和氏璧向西出使秦国。

不辱使命

秦王坐在章台接见相如，相如捧着和氏璧献给秦王。秦王非常高兴，把和氏璧传给妃嫔和左右近臣观赏，近臣们都高喊"万岁"。相如见秦王没有把城交换给赵国的意思，便走上前说："璧上有些斑点、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璧给相如，相如捧璧后退，靠着一根柱子，怒发冲冠，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一起商议，大臣们都说：'秦国十分贪婪，倚仗自己的强大，用空话来骗取和氏璧，交换和氏璧的城邑恐怕得不到。'议论的意见是不能把和氏璧给秦国。而我认为，平民百姓之间的往来尚且不能互相欺骗，何况是大国呢！而且因一块玉璧而使强大的秦国不高兴，这样不行。于是赵王斋戒五天，派我带着和氏璧，举行了叩拜礼，交给了我国书。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是尊重大国的威严，表示敬意。今天我来到这里，大王在偏殿行宫接见我，礼节十分简慢；拿到和氏璧，又传给妃嫔们看，以此戏弄我。我看大王没有给赵王城邑的意思，所以我再拿回玉璧。大王如果要强迫我，我的头今天就和玉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相如捧着玉璧，眼睛斜视着柱子，准备撞到柱子上去。秦王怕他撞坏玉璧，连忙道歉，请他不要那

样做，叫来负责的官员，在他图上查看，指着地图说从这里起的十五座城都给赵国。相如估计秦王不过是假装要给赵国城邑，实际上赵国是得不到的。便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闻名的珍宝，赵王畏惧秦国，不敢不把它献出来。赵王在送出玉璧时，曾斋戒五天，现在大王您也应该斋戒五天，在王宫正殿安排九宾迎接的礼仪，我才能献上玉璧。"秦王估计在这种情况下，不可强行夺取和氏璧，便答应斋戒五天，让相如在在广成宾馆住下。相如盘算秦王虽然同意斋戒，但肯定会背弃约定，不给赵国城邑，便让他的随从扮成普通百姓，把玉璧藏在怀中，从小路逃走，把玉璧还给了赵国。

秦王斋戒五天后，在王宫安排了九宾迎接的隆重典礼，派人去请赵国使者蔺相如。相如到达后，对秦王说："秦国自缪公以来的二十余位国君里，未曾有过明确遵守约定的。我惟恐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已经派人带着玉璧回国了，他走小路已经到了赵国。再说秦国强大，赵国弱小，大王派一个使者到赵国，赵国立即将玉璧送来。现在凭着秦国的强大，如果先把十五座城割让给赵国，赵国岂敢留下和氏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是杀头的罪过，我请求受下汤锅的刑罚，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商量计议。"秦王和各位大臣面面相觑，哭笑不得。侍臣想把相如拉下去杀头，秦王说："现在杀了相如，还是不能得到和氏璧，而且断绝了秦、赵之间的友好关系，不如利用这个机会厚待相如，让他回到赵国，赵王难道会因为一块玉璧的缘故欺骗秦国吗?"终于在朝廷上接见了相如，礼仪结束后，将相如送回了赵国。

相如回国后，赵王认为他是一个贤能的大夫，使赵国在诸侯面前不受欺辱，便任命相如为上大夫。秦王没有把十五座城割让给赵国，赵国最终也没有把和氏璧给秦国。

后来，秦国攻打赵国，占领了石城。第二年，再次进攻赵国，杀死了两万人。

威武慑敌

秦王派使者告诉赵王说，泰国想和赵王修好，在西河外的渑池会盟。赵王畏惧秦国，不想去。廉颇、蔺相如商议说："如果大王不去，那就显得赵国懦弱而胆怯了。"于是赵王便启程，相如随行。廉颇送到国境上，与赵王分别时说："大王此行，估计从路上行程到会见的典礼完毕后归来，应该不出三十天。如果大王三十天后未回，那么请允许立太子为国君，以断绝秦王要挟赵国的念头。"赵王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赵王与秦王会见于渑池。秦王喝酒至兴头上时，说："寡人私下里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弹奏一下瑟吧。"赵王弹了瑟。秦国的御史走上前来，记载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相聚饮酒，秦王命令赵王弹瑟。"蔺相如走上前说："赵王私下听说秦王擅长演奏秦国的音乐，请让我向秦王敬献盆缶，以互相娱乐。"秦王很生气，不答允。于是，蔺相如上前献缶，并跪下请求秦王弹奏。秦王不肯击缶。蔺相如说："五步以内，我可以和大王同归于尽了!"左右的侍臣想杀蔺相如，蔺相如瞪着眼睛呵斥他们，左右的人都被吓退。这时秦王很不高兴，为他敲了一下缶。蔺如相回头招来赵国的御史记载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敲缶。"秦国的大臣们说："请用

赵国的十五座城为秦王祝寿。”蔺相如也说：“请用秦国的咸阳为赵王祝寿。”秦王一直到宴会结束，始终不能压倒赵国。赵国也布置了大军来防备秦国。秦国不敢动武。

将相之和

会见结束后回国，因为蔺相如的功劳大，任命他为上卿，官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说：“我作为赵国的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仅仅耍弄了嘴皮子，官位却在我之上；而且蔺相如一向是低贱的人，我感到羞耻，不情愿在他之下。”扬言说：“我见到蔺相如，一定要侮辱他。”蔺相如听说后，不肯与他会面。蔺相如每当上朝时，常常借口有病，不想与廉颇争位次。不久蔺相如外出，望见廉颇，蔺相如驾车改道躲避。于是，他的门客一起劝他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戚来侍奉您，只是因为仰慕您的崇高道义。现在您与廉颇官职相同，廉颇散布了一些难听的话，而您畏惧躲避，显得非常害怕，这种事连一般的人尚且觉得羞辱，何况对于将相呢！我们没出息，请让我们告辞离去。”蔺如相坚决挽留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比秦王怎么样？”回答说：“不如秦王。”蔺相如说：“以秦的威势，而我在宫廷上呵斥他，羞辱他的大臣们，我虽然愚拙，难道单单害怕廉将军吗？只是我考虑到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进攻赵国，只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现在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把国家安危放在首位，而把私人恩怨放在后面。”廉颇听说后，袒露上身，背着荆条，让宾客带着到蔺相如府上谢罪，说：“我是个粗鄙浅薄的人，不知道将军对我宽容到这种程度！”终于彼此和好，成为生死之交。

这年，廉颇率军向东攻打齐国，打败齐国一个军。过了两年，廉颇又打齐国的几邑，攻下了它。之后三年，廉颇攻打魏国的防陵、安阳，攻下了两地。之后四年，蔺相如率军攻打齐国，到达平邑而停止。第二年，赵奢在阏与城下打败秦军。

【李斯】

（？～公元前208）秦代大臣。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人。早年为郡小吏，曾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业成就后入秦，求为丞相吕不韦舍人，后被任为郎，他劝说秦王政（即秦始皇）灭诸侯，成帝业，一统天下，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他的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诸侯，离间六国君臣。秦王十年（前237），下令驱逐六国客，李斯时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他在所上《谏逐客书》中指出，秦自缪公、孝公、惠王、昭王以来所以能国富民强，蚕食诸



李斯像

侯，皆因客卿之助，如“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应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结果，秦王取消了逐客令，李斯官复原职，后升为廷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李斯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等人共同议定了皇帝名号，以及有关的礼仪制度。他反对王绾提出的请立诸子为王的建议，坚持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得到秦始皇的赞同。此外，他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和度量衡制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齐人淳于越又提出分封子弟功臣为支辅的建议。当时，李斯任丞相，驳斥了这种意见，指出私学盛行，对法令制度“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如果不加以禁止，会影响皇帝的威望。他建议焚毁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见焚书坑儒），得到秦始皇的许可。三十七年，秦始皇病死，李斯参与赵高、胡亥的阴谋，赐始皇长子扶苏死，拥立胡亥为太子，继位为二世皇帝。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揭竿起义（见陈胜、吴广起义），秦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李斯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未能阻截吴广军西进，李斯以此受到弹劾。他为了苟全性命，阿谀求容，上书二世“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二世欣然接受，对下督责益严。于是，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此后，赵高为独揽大权，诬谄李斯与其子同陈胜、吴广暗通声气，意图谋反。二世命赵高审理。在赵高的刑讯逼供下，李斯被迫认罪，二世二年七月，具五刑，腰斩于咸阳市，并夷三族。

【吕不韦】

“奇货可居”

吕不韦（? ~前235）是阳翟（今河南濮阳西南）的大商人。在经商的来往中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家中积蓄了千金的财富。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病故。秦昭王四十二年，将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安国君的孩子有二十多个。他把最喜欢的爱姬立为正夫人，称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男孩名叫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子楚作为秦国的人质被送到赵国。秦国屡次攻打赵国，因此赵国对子楚也很不礼貌。

子楚是秦王的庶孙，送到诸侯作人质，车马财物都不充足，生活困窘，不能称心如意。吕不韦到邯郸做生意，看见于楚的状况很怜悯他，说：“这人就像奇好的货物，可以囤集赚大钱。”于是就去见子楚，对他说：“我能光大您



吕不韦像

的门庭。"子楚笑着说："你先光耀自己的门庭吧，配说什么光大我的门庭！"吕不韦您说："有所不知，我的门庭要随您的门庭而光大。"子楚心里明白吕不韦说的意思，就请他进屋同坐，和他诚恳地交谈。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立为太子。我听说安国君宠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只有华阳夫人能决定谁被过继到她膝下作为嫡子。如今您的兄弟有二十多人，您又排行居中，不被宠爱，长久地作为人质留在诸侯国中，到秦王去世，安国君即位为王时，您就没有希望和长子及朝夕在安国君面前的诸公子争太子位了。"子楚说："是的。该怎么办呢?"吕不韦说："您贫穷，又客居赵国，没有什么财物可以奉献给双亲和结交宾客。我虽然不富裕，但我愿意拿出千金为您到西边去走走，伺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您为嫡嗣子。"子楚就向吕不韦叩头说："如果真能实现您的计划，愿意把秦国分一半给您共享。"

于是吕不韦拿出五百金给子楚，作为平日的费用，结交宾客；再用五百金买了一批奇珍异宝，自己带着到西边的秦国去，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托她把珍宝都送给华阳夫人。并顺便说到了子楚如何贤能智慧，结交诸侯的宾客满天下，说子楚经常把夫人当作苍天，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华阳夫人非常高兴。吕不韦又趁机请华阳夫人的姐姐劝华阳夫人说："我听说，以姿色来伺奉人的，姿色变老了宠爱也就消失。如今夫人伺奉太子倍受宠爱，但您没有儿子，您不如在这时及早地在诸位公子中挑一个贤能孝顺的，把他立为嫡子，过继在您膝下。丈夫在世时，您的地位可以更加尊贵；丈夫去世后，过继的儿子即位为王，您的权势仍不丧失，这不就是一句话可得万世之利吗？您不在风华正茂时确立根本大计，等到姿色衰老宠爱消失时，虽然再想开口求一件事，哪里能够如愿呢？如今子楚贤能，又自知排行居中，按次序也轮不到他，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宠幸，于是他自己来归附夫人，夫人如果在这时把他选出来立为嫡子，那么您这辈子就都能宠贵于秦国了。"华阳夫人觉得有道理，就乘太子空闲的时候，不慌不忙地讲述子楚抵质到赵国后非常贤能，来往于秦赵两国的人都在称赞他。讲到这里，华阳夫人哭泣流涕地说："我有幸能被选人后宫，不幸的是没有儿子，我想把子楚立为嫡嗣子，让我终身有个依靠。"安国君答应了她，于是就给华阳夫人刻好玉符，约定将子楚立为嫡嗣子。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因此送给子楚许多食物用品，并且请吕不韦去辅助他，于是子楚在诸侯中就声誉越来越大了。

巧妙篡秦

吕不韦曾经娶了一个特别漂亮又善于舞蹈的邯郸女子，跟她同居后，吕不韦知道她怀上身孕。有一天，子楚跟吕不韦饮酒看见这位女子并喜欢上她，因此站起身来为吕不韦敬酒，请求把这个女子送给。吕不韦很生气，但想到自己已经为子楚破了家产，为了进一步笼络他，就把这个女子献给子楚。邯郸女子隐瞒自己已有的身孕，过了十二个月，生下儿子名政。于是子楚把她立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派王齮带兵包围邯郸，赵国的形势很危急，想杀掉子楚。子楚和吕不韦商量后，用金六百斤送给监守他的小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国的

军队中，终于回归秦国。赵国想杀掉子楚的夫人和儿子，子楚夫人本是赵国豪富的女儿，就跑到娘家躲藏起来，因此母子俩竟然得到活命。秦昭王五十六年，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也奉送子楚夫人及儿子政同归秦国。

志得意满

安国君只作了一年秦王就去世了，被谥为孝文王。太子子楚接替王位，就是庄襄王。庄襄王认作的母亲华阳王后称为华阳太后，亲生母夏姬尊称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任吕不韦为丞相，并且封为文信侯，给他河南洛阳十万户的赋税作俸禄。

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去世了，太子政被立为秦王，秦王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政年纪小，当了太后的母亲经常偷偷地和吕不韦私通。吕不韦的家僮多达万人。

当时，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都以礼贤下士收纳宾客而互相炫耀。吕不韦觉得秦国如此强大，这方面却不如诸侯，因此很惭愧，于是也招纳游士，优厚地款待他们，他的食客有三千人。当时各诸侯国有许多善辩的学者，如荀卿等人，著书立说传遍天下。吕不韦就让他的宾客人人动笔，著述所见所闻，将这些论著编辑为八览、六论、十纪，共二十多万字。因为这部书记述了天地万物和古今事迹，所以称为《吕氏春秋》。他把这部书公布在成阳城市场的门边，并在上面悬赏千金，邀请诸侯国的游士宾客来修改这部书，凡是能正确地增删一字的，赏赐千金。

秦王政立为始皇帝后逐渐长大，但太后还是不停地跟吕不韦私通。吕不韦恐怕事情败露自己要遭殃，就暗中找到一个名叫嫪毐的男人作他的门客，吕不韦每当在家里举行歌舞杂技表演的时候，有意让太后听说这件事，以引诱太后。太后知道了，果然想暗中得到嫪毐。吕不韦于是送上嫪毒，假装让人控告嫪毐有罪，应该治他宫刑。然后又暗中对太后说：“只要假装处理嫪毐以宫刑，就可以让他在宫内服侍你了。”于是太后私下赐给主持宫刑的官吏许多财物，让官吏假装施刑，拔掉嫪毐的胡须、眉毛变成宦官，然后送去伺候太后。太后偷偷地和嫪毐通奸，对嫪毐非常喜爱。太后有了身孕，恐怕让外人知道，就谎称占卜的结果让她去外地躲避一段时间，于是太后避开始皇帝，移宫到雍城居住，嫪毐经常随从太后，受到特别多的赏赐，国家的许多事情都让他去决定。嫪毐的家僮有数个人，那些找到门上想为嫪毐当舍人的宾客也有上千个。

始皇七年，庄襄王的母亲夏太后去世。孝文王后称华阳太后，已跟孝文王合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葬在芷阳，因此夏太后死后单独葬在杜地的东边，说是“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百年以后，我的陵墓旁就会形成一个有万户住家的城邑。”

饮鸩自尽

始皇九年，有人告发嫪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宦官，常常跟太后私通淫乱，还生了两个儿子，都被隐藏起来。嫪毐还和太后商量说：“秦王去世后，就让咱的孩子即位。”于是秦始皇把嫪毐投入监狱进行审问，了解到所有的实情，这件事牵连到相国吕不韦。九月，秦始

皇诛灭嫪毐三族，杀掉他跟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让太后彻底地搬迁到雍城居住。嫪毐的各位门客都被抄没家产搬迁到蜀地。秦始皇想诛杀相国吕不韦，但因为他辅助先王的功劳较大，还有许多宾客辩士为他说情，秦始皇不忍心将他正法。

秦始皇十年十月，免去相国吕不韦的职位。后来齐国人茅焦劝说秦始皇，秦始皇才到雍城去迎接太后，让她重新回到咸阳居住，并遣送吕不韦到他的封地河南去。

一年多以后，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纷纷到秦国来，希望拜见吕不韦。秦始皇怕吕不韦谋变，于是赐书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秦国把河南作为你的封地，食禄十万户？你跟秦国有什么亲缘，被人称为仲父？你跟你的家属都给我搬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估量自己这样受逼迫越来越重，恐怕被砍头，就喝毒酒自杀。秦始皇所忿恨的吕不韦、嫪毐都已死了，于是让嫪毐的门客从蜀地又回到咸阳。

秦始皇十九年，太后去世，谥为帝太后，跟庄襄王合葬在芷阳。

【张良】

（？～前186）西汉初年的重要谋臣。字子房。先世为战国时韩国人，祖父开地，父平。曾五世相韩。秦灭韩时，张良尚有家僮三百人。他倾全部家财寻求刺客，企图暗杀秦始皇，为韩报仇。后乘始皇东游之机，与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未遂。于是变更姓名，亡匿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曾从圯上老人学《太公兵法》。



张良像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后，张良聚众响应。不久归属刘邦，此后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他协助刘邦制订作战方略，并在政治上、策略上提出许多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对刘邦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和建立西汉王朝起了重要作用。刘邦进据咸阳时，看到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很想留居宫中，张良说刚入秦就想贪图安乐，这是"助桀为虐"。刘邦听了，立即还军霸上，因此得到秦民的拥护。项羽进入关中后，刘、项之间关系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良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的叔父项伯，使刘邦得以脱身。汉二年（前205），刘邦在彭城一战中遭到惨败，张良又建议刘邦争取英布、彭越和韩信起兵反楚，从而奠定了日后对项羽实行战略包围的基础。

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时，刘邦为了摆脱困境，曾一度想采纳郦食其的建议，复立六国之后，以牵制项羽。张良力陈其弊。刘邦顿时改变主意，这对楚汉战争以及此后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刘邦即帝位后，封张良为留侯。他劝说刘邦封旧有怨隙的雍齿，以安抚功臣的不



张良像

满情绪；力主建都关中，拥立刘盈为太子等。这些建议有助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惠帝六年病卒。谥号文成侯。

【陈平】

（？～前178）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少时喜读书，有大志，曾为乡里分肉，甚均，父老赞之，他感慨地说："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贵族也纷纷起兵，陈平往事魏王咎。不久受谗亡归项羽，随从入关破秦。刘邦还定三秦时，又间行降汉。拜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后历任亚将、护军中尉。先后参加楚汉战争和平定异姓王侯叛乱（见异姓诸侯王）诸役，成为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刘邦困守荥阳时，陈平建议捐金数万斤，离间项羽群臣，使项羽的重要谋士范增忧愤病死。高帝六年（前201）又建议刘邦伪游云梦，逮捕韩信。次年，刘邦为匈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部）七天七夜，后采纳陈平计策，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解围。陈平因功先后受封为户牖侯和曲逆侯。汉高祖死后，吕后以陈平为郎中令，傅教惠帝。惠帝六年（前189），与王陵并为左、右丞相。王陵免相后陈平徙为右丞相，但因吕后大封诸吕为王，陈平被削夺实权。吕后死，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平定诸吕之乱，迎立代王为文帝（见汉文帝刘恒）。文帝初，陈平让位周勃，徙为左丞相，因明于职守，受到文帝赞赏。不久周勃罢相，陈平专为丞相。孝文二年死。

【萧何】

（？～公元前193）西汉初年大臣。沛（今江苏沛县）人。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二世元年（前209）随同刘邦起兵，为沛丞。攻克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银财宝，萧何却忙于接收秦丞相、御史大夫府所藏的律令、图书，使刘邦得以掌握全国户口、民情和地势，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刘邦被封为汉王后，萧何劝说刘邦以巴蜀为基地，与民休息，招纳贤才，然后还定三秦，再与项羽争夺天下，并推荐韩信为大将军。楚汉战争时，萧何以丞相专任关中事，他侍从太子，为法令约束，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时，刘邦屡遭挫败，失军亡众，军无现粮，萧何及时调遣关中兵卒驰援，并转漕供给军用，保



萧何像

证了前线兵员粮饷的供应，促使战局发生了根本转机。因此，刘邦称帝后，以萧何功最高，位次第一，食邑八千户，悉封其父母兄弟十余人皆食邑。刘邦又以原订的三章约法不足以“御奸”，命萧何重新制订律令。萧何采摭秦法，酌加新律，作为《九章律》（见汉律）。高帝十一年（前196），因助吕后定计收捕淮阴侯韩信，被拜为相国。

高祖死后，萧何辅佐惠帝。他病危时，推荐曹参继任相国，卒于孝惠二年。

【曹参】

战功赫赫

平阳侯曹参（？～前190）沛县（今属江苏省）人。秦代时做沛县管理监狱的小吏，萧何则担任沛县县令的属官。他们在县里都是有名、有势力的官吏。

汉高祖刘邦初为沛公刚在沛县起兵时，曹参以侍从官的身份跟随他。曹参率军攻打胡陵、方与两县，进攻秦朝郡监的部队，大败敌军。向东攻下薛城，在薛县外城西面击败了泗水郡守的军队。再次攻打胡陵县，夺取了县城。曹参转移镇守方与，方与反叛并投降了魏国，他带兵攻下方与。丰县也反叛投降了魏国，曹参又带兵攻取丰县。（因这些战功）他被赐予第七级公大夫的爵位。在砀县东面进攻秦军部队，把这支军队打败，占领砀县、狐父及祁县的善置。又攻取下邑以西，打到虞城，袭击了秦将章邯的部队。攻取爰戚及亢父两县时，曹参最先登上城楼，爵位因此升为五大夫。向北援救东阿县的田荣，攻击章邯的军队，占领了陈县，追击章邯直至濮阳。攻下定陶，夺取临济。南下援救雍丘守军，攻击李由的部队，将其打败，斩杀了李由，俘虏了一个秦军的侦察军官，这时秦国大将章邯打败并斩杀项梁，沛公刘邦与项羽率领部队向东退去。楚怀王任命刘邦为砀郡长，统率砀郡的部队。这时刘邦遂封曹参为执帛，封号叫建成君。后来升为戚公，他所管辖的戚县，隶属于砀郡。

在这之后曹参跟随刘邦攻取东郡的守军，在城武县南面将敌军打败。在成阳城南进攻王离的部队，又在杠里再次攻击它，大败敌军。曹参追击败逃的敌军，向西追到开封，又攻击秦将赵贲的部队，将其击败，把赵贲包围在开封城中。又向西在曲遇进攻秦将杨熊的军队，打败了敌军，俘虏秦国的一个司马及一个御史。曹参这时升为执圭。他又跟随刘邦攻取阳武城，打下轘辕山、缑氏县，封锁了黄河渡口。回师进攻赵贲的部队，在尸乡北打败了敌军。向南攻取邑麦邑，在阳城东郊与秦国的南阳郡守吕齮，攻破敌军，占领宛县，俘虏了吕氏平定了南阳郡全境。随后跟随沛公向西攻打武关、峣关，夺取了这两个关隘，曹参率

军先在蓝田县南进攻秦军，夜里又在蓝田县北袭击秦军，秦军大败，于是反秦的军队打到咸阳，灭了秦朝。

项羽进入咸阳，任命沛公为汉王。汉王刘邦封曹参为建成侯。曹参跟随汉王到汉中，升任将军。又跟随汉王回师向北平定三秦，先攻取下辩、故道、雍县等城。在好畤县南进攻章平的部队，将其击败，包围好畤县，夺取了壤乡。在壤乡东面及高栎村进攻三秦的军队，打败了敌军。又将章平包围，章平从好畤突围逃走。汉军趁机进入赵贲和保内史的部队，将敌军击败。向东夺取咸阳，改名叫新城。曹参率兵看守景陵二十天，三秦派章平等人进攻曹参，曹参率师出击，大败敌军。汉王把宁秦赐给曹参作封地。曹参以将军的身份领兵在废丘包围章邯。又以中尉的身份跟随汉王东出临晋关，率兵打到河内，攻下修武县，在围津渡过黄河，向东进击，在定陶进攻龙且、项他的军队，将敌人打败。向东攻取砀县、萧县和彭城。进攻项籍的军队，汉军大败而逃。曹参仍以中尉的身份包围夺取了雍丘。这时汉王的将领王武在外黄县叛汉，程处在燕地叛汉，曹参率兵前往进击，全部将他们打败。柱天侯在衍氏城反叛汉王，曹参又前去征讨，攻取了衍氏城。在昆阳进入羽婴，追击他至叶县。回师攻取武强城，乘势打到了荥阳，曹参自汉中做将军、中尉起，跟随汉王攻打诸侯及项羽，到被项羽打败，回兵到荥阳，总计两年时间。

汉高祖二年，任命曹参为代理左丞相，带兵入关中驻扎。一个多月后，魏王豹谋反，曹参以代理左丞相的身份分别与韩信向东进兵，在东张城攻打魏王将领孙遬的部队，大败敌军。乘势攻取安邑县，俘虏了魏将王襄。在曲阳县进攻魏王，追击他到武垣县，活捉了魏王豹。夺取平阳城，捉住魏王的母亲及妻子儿女，魏王领地全部平定，一共五十二座城邑。汉王将平阳县赐给曹参作封邑。然后曹参跟随韩信在邬县东进攻赵国的相国夏说的部队，大败敌军，斩杀了夏说。韩信与曾当过常山王的张耳继续率军攻取井陉，进攻成安君陈余，而命令曹参回兵围攻正驻守在邬城中的赵国别将戚将军。戚将军突围出走，曹参追击并杀死了他。然后曹参率军到敖仓汉王的驻地。韩信已攻下赵国，做了相国，正向东进攻齐。曹参以右丞相的身份仍跟随韩信，攻克齐国的历下守军，占领临淄。又回兵平定济北郡，攻了著县、漯阴、平原、鬲县和卢县。不久跟随韩信在上假密进攻龙且的部队，大破敌军，斩杀龙且，俘虏了楚国将军周兰。平定齐国，共攻下七十多个县城。捉到曾任齐王田广的相国的田光，任留守相国的许章，以及任齐国胶东将军的田既。韩信立为齐王，率兵奔赴陈地，与汉王刘邦一起进攻项羽，曹参留下继续平定齐国那些还没降服汉的城邑。

项羽被汉军杀死后，天下平定，汉王刘邦做了皇帝，韩信迁移到楚地为楚王，齐国被设置为郡。曹参归还了汉朝相国的大印。汉高祖刘邦将长子刘肥封为齐王，而任命曹参为齐王的相国，在高祖六年曹参被赐予列侯，爵位，朝廷与诸侯对半剖分信符，以使诸侯家的爵位世世上相传，永不断绝。曹参的封邑平阳县有一万六百三十户，他被称为平阳侯，他以前所封的食邑则被免除。

曹参以齐王相国的身份攻击陈豨的将军张春的部队，打败了敌军，黥布反

叛，曹参又以齐王相国的身份跟随悼惠王率领步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合兵一起进攻黥布的部队，大败敌军。向南追击直到蕲县，回兵平定竹邑、相县、萧县和留县。

曹参的战功如下：共攻下两个国，一百二十二个县；捉到诸侯两人，相国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吏各一人。

汉孝惠帝元年，废除各诸侯国设立相国的法律，将曹参改任为齐国的丞相。曹参在齐国为相，齐有七十座城邑。当时天下刚刚平定，齐悼惠王正年富力强，曹参召来所有年长的贤人和儒士，向他们询问如何使百姓安居乐业，像齐这样的大国过去各式各样的儒士有上百之多，每个人谈的都不一样，曹参不知道如何定夺。他听说胶西县有个盖公，专门究黄老的道家学说，曹参派人带重礼去请他来。见到盖公后，盖公对曹参说，治理国家要崇尚清静无为，百姓自会安居乐业，以此类推，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道理。曹参于是搬出办公的公堂，在盖公这里住下。他的治国之术也全用黄老道家的方法，因此，他在齐为相九年，齐国人安居乐业，人们都极力称赞曹参为贤相。

一遵萧法

汉惠帝二年，萧何去世。曹参听说后，告诉属下赶快办理行装，说："我将要入朝作宰相。"过了不久，朝廷派的使者果然来召曹参入朝。曹参临走嘱咐齐国的后任丞相说："应使坏人把齐的狱市当作寄身场所，千万不要让他们扰乱百姓。"后任丞相说："治理国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吗?"曹参说："不要认为这不重要。狱市是善恶都能容纳的地方，如今您若取消了它，那些奸恶之人到哪里容身呢？无所容身，时间久了他们就会作乱。所以我预先告诫你。"

曹参当初微贱的时候，与萧何关系很好；等到后来都做了将相，互相之间有一些隔阂。待到萧何将要死时，所推重的贤明之人惟有曹参。曹参取代萧何做了汉朝的相国，处理政事没有什么改变，一概遵从萧何生前制定的规章制度。

曹参选择各郡国官吏中质朴而不善于言词的敦厚长者，很快召来任命为丞相府的办事人员。官吏中言语华丽、文辞深涩、想要追求声名荣誉的人，曹参都罢斥不用。每天晚上他都饮味道很醇厚的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及宾客们见曹参不理政事，来见他的人都想劝说他。到他家后，曹参全都让他与自己共同饮酒，片刻之后，来人想要说什么，曹参再次让他们饮酒，直至喝醉后离去，始终也没有机会开口说劝谏的话。后来大家也就习以为常。

相府的后园挨近官吏们的住家，官吏房舍中每天都饮酒唱歌。相府中的随从官吏对此非常厌恶，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就请曹参在后园游玩，听到邻家官吏醉酒的歌声，相府随从希望相国曹参将醉酒的人召来查问处理。而曹参反而取出酒，张座设席饮酒，并唱歌与其彼此呼应唱和。

曹参见到别人犯有细小过失，总是特意掩饰隐瞒，因而相府中平安无事。

曹参的儿子曹窋是中大夫。汉惠帝怪相国曹参不理政事，认为他这样做"难道不是小看我吗?"于是他对曹窋说："你回家后，试着私下里随随便便地问一下你父亲：'高帝刚去世不久，新即位的皇帝正年富力强，你做为相国，

整日饮酒，没有什么需请示奏明的事，那么凭借什么以天下为己任呢？'但你不要说出是我让你问的。”曹窋休假回家后，得机会侍奉父亲，擅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劝谏曹参。曹参非常生气，为此鞭打了曹窋二百下，说：“赶快进朝尽你的职责侍奉皇帝，天下大事不是你应该说的。”到了入朝时，惠帝责备曹参说：“为什么要惩治曹窋呢？前些天的那些话是我让他劝谏你的。”曹参摘下帽子表示道歉，并说：“陛下自己认为与高帝相比，谁更圣明英武？”惠帝说：“我怎么敢比先帝呢？”曹参又说：“陛下看我曹参与萧何相比，谁更是贤明？”惠帝说：“你看起来不如他。”曹参说：“陛下你说的很对。况且高帝与萧何平定天下，法令都已非常明确，如今陛下你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曹参我等尽职尽责，遵从既定的法令而不要有所改变，不也很好吗？”惠帝说：“你说的对。不用多说了。”

曹参做汉朝相国，前后共有三年。死后被赐予懿侯的封号。他的儿了曹窋继承了他的爵位。老百姓作歌称颂曹参说：“萧何制定了法令，明确而又齐整；曹参取代萧何，谨守其规而未有变更，以清静之法处理政事，人民安宁不乱，其乐融融。”

太史公司马迁评说：相国曹参攻城略地、野外作战的功绩所以能有这么多，是因为他与淮阴侯韩信在一起。因而等到韩信被消灭，按各位诸侯成就的战功来封赏时，唯独曹参战功最卓著。曹参身为汉朝的相国，力主清静无为，最合乎治理国家的准则。而百姓们在遭受秦朝的严刑酷法后，是曹参予以他们休养生息的机会，所以天下的人都称赞曹参的美德。

【陆贾】

（约公元前 240 ~ 前 170）汉初政论家。楚人。早年随刘邦平定天下，有辩士之称，曾任太中大夫。陆贾主要活动于汉高祖刘邦、吕后、文帝之世。他曾两次受命出使南越，说服尉佗接受汉朝所赐予的南越王印，去帝制、黄屋左纛，归附汉朝。吕后称制时，大封诸吕为王。陆贾称病免归，置田产于好畤（今陕西乾县东）。他劝说丞相陈平结交太尉周勃，联络大臣和刘氏宗室王侯，及时平定诸吕之乱，并迎立文帝。

陆贾作为政论家，为西汉王朝的封建统治提供了思想武器。刘邦即位之初，以“马上得天下”，骄矜自持，重武力，轻《诗》、《书》。陆贾向刘邦提出“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统治方略，倡导儒学，“行仁义，法先圣”，同时辅以黄老“无为而治”。他受刘邦之命，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共著书十二篇，每上奏一篇，高祖看后无不称赞，因此名其书为《新语》。《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三篇，通行本作二卷。后人称《新语》绍继孟子、荀子的学说，而开启贾谊和董仲舒的思想，成为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先声。

【周勃】

（？ ~ 前 169）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祖先为卷（今河南原阳西南）人，后徙居沛（今江苏沛县）。出身贫苦，早年以织薄曲为生，常以吹箫助人料理丧事。秦二世元年（前 209）九月，随

同刘邦起兵于沛，为中涓。在推翻秦王朝、楚汉战争和汉初平定异姓诸侯王叛乱（见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周勃所统率的部队一直担任主力，经常被配置为禁旅前锋，功勋卓著。刘邦称帝后，周勃受封为绛侯，食邑八千一百八十户，先后任太尉、相国。

周勃为人质朴，不善言词。汉高祖刘邦临死前，吕后询问丞相人选。高祖曾说，周勃重厚少文，将来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他，可以任为太尉。高祖死后，周勃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前189）任为太尉。吕后死后，诸吕秉权，危及刘姓统治。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联络朱虚侯刘章等宗室重臣，先用计谋解除了吕禄的兵权，争取了北军，又消灭了掌握南军、占据未央宫作乱的吕产，平定了诸吕之乱，并迎立代王为帝（即汉文帝刘恒），对汉初政治的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文帝即位后，周勃为右丞相，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但他不熟悉丞相职守。文帝曾询问全国一岁决狱和钱谷出入的数目，他无言以对。文帝很不满意，周勃只好称病辞职，由陈平专为丞相。不久，陈平死，周勃复为丞相。岁余，又被罢免，遣归封国。周勃怕文帝杀他，在封国时经常身穿甲胄，令家人执持兵器。有人告发他企图谋反，结果被廷尉逮捕下狱。因周勃长子胜之的妻子是文帝的女儿，加以薄昭在薄太后处疏通，才得以赦免，虽复爵邑就国，但未再受重用。文帝十一年死，谥武侯。



周勃像

【晁错】

（？～公元前154）西汉文景时代的政论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早年随张恢学申商刑名之学。以文学任太常掌故，受太常派遣，至伏生处学习今文《尚书》。旋被任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太子家令。得幸于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号称“智囊”。晁错看到匈奴侵扰日益严重、商人兼并农民土地等问题，曾先后上书言兵事和守边备塞、劝农力本等急务。他分析了西汉和匈奴兵制的特点及兵力的长短之处，提出徙民实边和入粟塞下以拜爵免罪的建议，得到汉文帝刘恒的采纳。之后，晁错由平阳侯曹窋等联名举为贤良，因对策高第，迁中大夫。他又向文帝建议削夺诸侯王权力及更定法令等，所言多能切中时弊。景帝即位后，晁错擢为内史，不久，迁为御史大夫。他受到景帝的信任，更令三十章，力主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他在《削藩策》中明确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听从他的建议，先后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印六县和

楚王戊东海郡，并决定削夺吴王濞的封地。晁错的父亲从颍川来见他，劝他不要“侵削诸侯，疏人骨肉”，以免树怨。晁错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发动叛乱（见吴楚七国之乱）。曾任吴相的爰盎（即袁盎）和外戚窦婴，与晁错素不相容，乘机建议景帝斩晁错以谢诸侯。景帝遂拜爰盎为太常使吴，并由丞相、中尉、廷尉等劾奏晁错“大逆无道”，腰斩晁错于长安东市，父母、妻子、同族无少长皆被杀。但是，这并没有平息吴楚七国之乱。

晁错的政论文章以议论犀利，分析深刻著称。《汉书·艺文志》中法家有《晁错三十一篇》，今有清代马国翰等人辑本。

【黄霸】

为官宽和

黄霸（？~前51）字次公，淮阳郡阳夏县（今河南太康）人。因身为豪桀而役使乡人被迁徙到云陵。黄霸年轻时学习法律条令，喜欢为官府当差办事。武帝末年以待诏身份出钱买官，得到候补侍郎谒者的职位，因为兄弟犯罪被弹劾罢免。后来又向沈黎郡府奉献粮食，得以候补左冯翊二百石年俸的高级卒吏。左冯翊因为黄霸是以财物换得的官职，不肯委任他要职，只让他掌管全郡钱粮的出纳。黄霸经手的财物账目清楚明白，有了廉洁公正的名声，经考核后被升补为河东均输长，又被考核为廉正官吏，升任河南太守丞。黄霸为人有很敏锐的观察判断力，思路敏捷，又熟悉法律条文，而且温和善良，肯于谦让，富于智慧，有领导才能。担任郡丞职务，处事议论无不合乎法理，顺应民心，太守很器重他。属吏百姓也都对他十分爱戴尊敬。

从武帝木年开始，刑法逐渐苛刻。昭帝即位时年纪幼小，大将军霍光主持朝政，大臣争权夺利，上官桀等人和燕王勾结阴谋作乱，霍光诛灭了他们之后，就开始遵循汉武帝的法令制度，用刑罚严格约束部下的言行，于是一般官吏争相以严刑酷法作为能干的标准，只有黄霸用宽柔平和的统治手段获得名声。

明察民情

后来汉宣帝即位。宣帝过去做为平民深知百姓被苛刻官吏逼迫困窘的情形，即位后听说黄霸执法公平，就征召他担任廷尉正，黄霸多次妥善解决疑难案件，廷尉署中同事都称许他处理公道。代理丞相长史，因为大臣们在朝廷中议论朝政时长信少府夏侯胜对皇帝诏书表示不满，黄霸明知这是大逆不敬的罪过，却随声附和而不单报，所以和夏侯胜一同被交付廷尉审理，关进监狱依法应当处死。黄霸在狱中向夏侯胜学习《尚书》，过了两个冬天，到第三年才被释放，详情记载在《夏侯胜传》中。夏侯胜出狱后，重新担任谏大夫，令左冯翊宋畸将黄霸作为贤良人材向上推荐。夏侯胜又亲口向皇帝举荐黄霸，皇帝提拔黄霸担任扬州刺史。在任三年，宣帝颁下诏书说：“皇帝诏告御史：任命以贤良高第身份出任扬州刺史的黄霸为颍川太守，品秩和二千石官员相同，在职赏赐官车顶篷，特别准许可高达一丈，别驾、主簿等主要随从的车辆也特别准许在车前轼木上安装绛色档泥板，借以表彰黄霸的德行。”

当时皇帝有意改革吏治，多次颁布广赐恩泽的诏书，但却被下面官吏隐瞒，不告诉百姓。颍川太守黄霸选择贤能的官吏，分头向百姓宣布皇帝诏命，让百姓都能了解皇帝的意图。命令驿馆、乡里的长官都要养鸡养猪，用来赡养鳏寡无依和贫穷的人。然后逐条施行教化，设立父老师帅伍长的制度，在民间颁布施行，目的在于勉励百姓去恶向善，及时从事农耕桑织，节俭开支积聚财富，种植树木蓄养牲畜，依靠农牧自给自足。这都是米粒盐粒一样细小的事情，初看起来好像有些琐碎，然而黄霸却能集中精力推广施行这些事。黄霸在接见属吏百姓时，常从闲谈话语中推导出隐含的意义，或者询问某一相干的问题，暗中和要了解的事情联系到一起，用来和正面调查相互补充参考。黄霸有一回想了解下面的情况，就选派一个年纪较大又品行廉正的官员去办，嘱咐他一定要暗中进行调查。那个官员下去后，不敢在驿馆中住宿，就在路边吃干粮充饥。飞来一只乌鸦把他带的肉叼走了。有个要到官府说事的人路过，正巧看见了这一情景，在和黄霸的交谈中偶然提到这件事。几天后，那个官员办完事情回来拜见黄霸，黄霸一见到他就迎上前去连声慰劳，说："辛苦辛苦！就在路边吃干粮，还被乌鸦把肉叼走了。"那个官员大为震惊，以为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黄霸了解得清清楚楚，所以汇报公事时对黄霸的询问丝毫不隐瞒。有鳏寡孤独的人死后无力办理丧事，乡长上书报告，黄霸详细地为他讲明处理办法，哪个地方有棵大树可以做棺材，哪个驿馆有肥猪可以用做祭品，官吏照他的话去看，果然丝毫不错。黄霸记事明白清楚到了这种程度，官吏百姓不知道他是怎么掌握这么多情况的，都把他奉为神明。坏人都离开颍川到其他郡县去了，郡中偷盗抢劫的事件一天比一天少。

黄霸为政，先用德行努力教化开导，万不得已时才施用刑罚，尽量爱护保全手下官吏的职位，不随便予以替换和处分。许县县丞上了年纪，耳朵不好使，督邮禀报说要把他打发回家，黄霸说："许丞是个廉正的官吏，虽然老了，还能够起拜送迎，维持日常工作，只不过有点耳背，有什么关系？你要好好地帮助，不要让贤能的人失望。"有人询问黄霸这样做的原因，黄霸说："多次更换手下官吏，遣送旧人迎接新人的费用以及奸恶官吏趁交接职务之机毁坏账簿偷盗财物造成的损失加在一起，公家私人都要有很大的耗费，这些耗费本应该用到百姓身上的，再说换来的新吏又未必真有才干，有的还不如旧任，换来换去平白添乱。大凡治理的原则，只要处理得实在过分的就行了。"

黄霸因为待人宽厚而内心明白，深得属吏百姓的拥护，郡中人口年年增长，治绩为天下第一。皇帝征召他进京代理京兆尹，官秩二千石。因为征发百姓修理官遭没有事先向上汇报，又因调拨给北军的骑兵马匹和人数不相符合，被弹劾缺乏战备观念，接连受到贬低官秩的处罚。皇帝诏令黄霸回到颍川太守任上，以官秩八百石的身份像从前一样治理该地。黄霸担任颍川太守前后总共八年时间，郡中更加得到治理。当时凤皇、神雀等吉祥的征兆多次在全国各地出现，而颍川地区最多。天子认为黄霸的治理始终体现出长者的风范，下诏赞扬他说："颍川太守黄霸，认真宣传贯彻皇帝诏

令的指示精神，使百姓都归向教化，和睦的兄弟、贞节的妇女以及孝子贤孙越来越多，耕田的人相互谦让田界，路上的失物也没有人拾取，孤独无靠的人得到赡养关怀，贫穷困窘的人得到救济帮助，监狱里有八年时间没有关押过犯重罪的囚犯，官吏百姓都归心于政教风化，美好的道义品行逐渐形成，黄霸可以称得上是贤人君子了。《尚书》不是说过吗？'贤能的辅佐真是太好了！'现在赐予黄霸关内侯爵位，黄金一百斤，俸禄年满二千石。"而颍川地区孝悌有操行的百姓和三老、力田等乡官都按照不同的等级被赐予爵位和丝帛。几个月后，征召黄霸为太子太傅，升任御史大夫。

封侯拜相

五凤三年，黄霸接替丙吉担任丞相，被封为建成侯，食邑六百户。黄霸的才干在于擅长治理百姓，等到担任丞相后，总揽朝廷内外大事，决定国家政策制度风采就比不上丙吉、魏相、于定国等前任了，名望成绩也比治理地方时有所降低。当时京兆尹张敞家养的鹳雀聚集飞落于丞相府中，黄霸以为是神鸟，准备报告给皇上。张敞为此向皇帝奏告黄霸说："臣私下见到丞相召请朝廷中满二千石俸禄的官员和博士一起询问各地来京呈报年度赋税收入的长吏守丞，按照为百姓兴利除害成就教人的原则分别他们的答案，有耕田者谦让田界、男女不在路上同行，道路上丢失的东西无人拾取的治绩以及大量举荐孝子悌弟贞妇的官员为一等，优先召见，举荐良民不知确切数目的为次等，不逐条推行教化的官员为末等，要叩头谢罪。丞相嘴上虽然没有说，心里是按照这个标准评判官员的。正巧臣家养的鹳雀飞落在丞相府屋上。丞相和当时在场的几百人都见到了，边地来的官吏都认识那是鹳雀，但问到他们却推脱说不认识。丞相于是打算上奏说：'我在用兴修教化的方针逐一询问上计的长吏守丞时，上天降下神雀显示报应。'后来得知鹳雀是从臣家飞来的，才打消了念头。那些来自郡国的地方官吏都在暗中笑丞相，说丞相仁慈宽厚有见识，就是有点迷信怪异新奇的事情。过去汲黯出任淮阳太守，离京上任的时候，对担任大行的李息说：'御史大夫张汤心怀奸诈奉迎上意，以权术倾压朝廷，您若不及早禀告皇帝，将和他一起获罪被杀。'李息畏惧张汤的权势，始终没敢揭发张汤。后来张汤罪行败露被处死，皇帝听说汲黯与李息的交谈，就宽恕了李息的罪过而把汲黯任诸侯王相国，因为他为国事思虑竭尽忠心。臣张敞不是胆敢诋毁丞相，实在是恐怕众大臣不敢禀告皇帝，而地方长吏守丞畏惧丞相的意旨，回去后废弃法令，各自私行以教化为政，互相攀比增加，浇薄淳厚的世风，离散朴质的民俗，共同追求虚伪不实的表面形象，有名无实，动摇社会的纲纪根本，懈怠百姓的进取精神，甚至为国家带来灾祸。假设京城先行做到百姓让地分路，道不拾遗，实际对惩治贪污端正淫风并没有多大好处，却先给天下人做了伪善的表率，固然不可以这样做，即使地方诸侯先行推广这些措施，虚伪实的名声传扬到京城，也不是一件小事。汉朝承续前代破败的基业，施行权宜通变的政策，制造规订法律条令，用来劝导善行，禁除奸伪，各项条款已经十分详细全面，用不着再加改动了。应该下令让执政大臣明白敕令地方各级官员，不得擅自推行新的教

化条令。有胆敢心怀伪诈沽名钓誉者，一定会首先受到严厉的制裁，以明正好坏善恶的界限。”皇帝赞赏地接受了张敞的建议，召集进京上计的官吏，派侍中出面把张敞的意思告诫他们，黄霸感到十分惭愧。

又有乐陵侯史高以外戚身份长期蒙受皇帝恩宠，人侍禁中，权贵势重，黄霸推荐吏高可以担任太尉。皇帝派尚书官员召见黄霸，责问他说：“太尉一职废弃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由丞相兼任，这是平息战争兴建文教的政策的体现。如果国家发生不可预知的事变，或者边疆发生战争，朕身边的大臣都可以做将帅率军队出征。广泛宣扬道德教化，顾及平常易被忽略的地方，让监狱中没有含冤受刑的囚犯，市镇中没有抢劫偷盗的坏人，这是您的职责。至于将相的人选，应该由我决定。侍中乐陵侯史高是朕的亲信近臣，朕自然知道他的才能适合干什么，您何必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推荐他呢?”尚书令传达了皇帝的旨意，黄霸摘去帽子叩头谢罪，几天以后皇帝才不予追分。黄霸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有什么请求。不过从汉朝开国以来，若论善于治理百姓的官员，还是以黄霸为首屈一指。

黄霸担任丞相五年，于甘露三年去世，追赠谥号为定侯。黄霸死后，乐陵侯史高终于担任了大司马一职。黄霸的儿子恩侯黄赏继嗣，官至关都尉。黄赏去世。儿子忠黄辅继嗣，官至卫尉，位列九卿。黄辅去世，儿子黄忠继承侯爵，到王莽时期才断绝。黄霸的子孙做到二千石一级官吏的总共有五六人。

当初黄霸年轻时，做过阳夏郡巡察盗贼的小吏，有一次和一位善于相面的人同车出去，看见一位女子，相士说：“这个女子肯定会富贵，如果不然，相书上说的话就全不可信了。”黄霸向别人打听那个女子的情况，原来是他家乡巫师的女儿。黄霸娶她为妻子，一辈子都和她生活在一起。黄霸担任丞相后全家迁居杜陵。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西汉中晚期九江郡寿春（今安徽寿县）人。曾任谷阳（今山东平阳西南）县令、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县令、零陵郡（今广西全州县西南）太守、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太守等职。由于他勤政爱民，清正廉洁，与其后的南阳太守杜诗一起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召父杜母”。

召信臣主政南阳之时，正是西汉王朝由盛趋衰之际。当时的皇帝汉元帝刘奭一天天沉醉于酒色，大小政事均委以宦官石显处理。石显及其他近臣贵戚根本不管百姓死活，只知道横征暴敛，奢侈挥霍，致使百姓怨声载道。

召信臣到达南阳后，首先深入田头林野，巡视阡陌之间，了解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倾听百姓的要求和愿望。他发现当地常因干旱而歉收，就亲自四处找水源，然后率领百姓挖渠引水，灌溉农田；为控制水量，扩大灌溉面积，他又带领百姓修筑陂塘，作堤闸数十处；为避免农忙季节用水骤增而引起纷争，他还为百姓们制订了“均水约束”，即公平用水的制度。规定各地放闸引水的顺序，并把具体条文刻在石碑上，立于路口田畔。

南阳受整个大气候的影响，奢靡之

风也十分严重。凡遇嫁女娶媳、生老病死，无不大操大办，竞相攀比，从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的人家为此而导致数年不振，甚至破产；还有的为顾一时脸面而借贷负债，最终不得不以卖儿鬻女来收场。召信臣对此风气深恶痛绝，特地发出了一个《禁止嫁娶送终奢靡令》，严格禁止这一恶习，大力倡导诸事简约。

经过召信臣数年的艰苦努力，南阳经济明显好转，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旧礼俗受到了猛烈冲击，勤劳节俭蔚然成风。

南阳是西汉时的一个大郡，也是豪强地主势力麇集之地。一些纨绔子弟和贪官污吏及各种社会渣滓勾结在一起，经常为非作歹，欺压良善。召信臣曾对他们进行过多次劝诫，对其中一些违法乱纪、鱼肉百姓者，还曾绳之以法。但他们恶习难改，一有机会又旧病复发。

有一次，召信臣正在下面视察，突然有人禀报说：前面有两伙人在闹事。他赶到现场一问，才知道一伙人是官家子弟，正在围场打猎；而另一伙是娶亲的人，他们正带着嫁妆、鼓乐队等从围场旁边经过。官家子弟说娶亲的人惊跑了野兽，要他们赔偿香獐 3 只、黄金 20 两；娶亲的人当然不肯。于是，双方就争执起来。官家子弟依仗权势，首先动手打了人；娶亲的人也达数十之众，不肯善罢甘休。召信臣立即把官家子弟中的为首者叫到一旁，将他严厉地训斥了一顿，然后派人把他们全部押回郡衙。接着，帮娶亲的人将队伍整理好，让他们速速上路，以免耽误了吉日良辰。

召信臣回到郡衙后，将几个官家子弟叫到面前，向他们反复讲明利害，劝他们赶快改恶从善；对其首要分子，还勒令他限期改正，不然将严惩不贷。随后，召信臣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又迅速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他明文规定：对那些只知游手好闲、不事农耕的府县官吏子弟，一律罢免其父兄官职；对违法乱纪、鱼肉百姓者，不但予以坚决镇压，而且对其父兄也处以刑罚。官吏们为了自身的权益和名声，不得不对家人进行严格管教。于是，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百姓也渐渐有了安全感。

日久天长，南阳郡的老百姓越来越感到召信臣像父亲对待子女那样，对待他们，关怀备至。于是，普遍称他为“召父”，是真正的“父母官”。每逢朝廷考核，召信臣也总被评为天下诸郡第一，受到朝廷多次奖励，成为朝野公认的良吏。所以，迁任河南郡（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太守不久，便升为九卿之一的少府，掌管全国山海池泽的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

召信臣担任少府的第二年，元帝死，成帝刘骜继位。刘骜比起其父来，更加荒淫无耻。他“重增赋敛，征发如雨”，不惜耗费巨资为自己修建规模巨大的陵墓。同时，他还让作恶多端的外戚王氏把持朝政，致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奴婢买卖公开合法化，数以千万计的流民辗转于道路。

为扭转时局，召信臣曾多次进谏，提出过不少医国利民的好主张。但是，一意孤行的王氏集团始终置之不理。于是，他只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一些惠民措施。

首先，他努力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奏请取消了一大批土木工程，包括皇帝极少光顾的离宫别馆的修缮扩建和铺张

陈设。接着，又奏请解散由宦官组成的皇家乐队，并提议将保卫宫馆的卫队及其兵器等削减一半。随后，又奏请取消了太官园里的温室等等。

早在召信臣担任少府前，专供皇室膳食的太官园建有一处颇具规模的温室。每到冬季，日夜生火以提高室内温度，从而保证室内蔬菜的生长。召信臣认为这实在劳民伤财，便借口生长出来的东西不合时宜，不应用来贡献皇帝，而将温室拆除了。仅此一项，每年便节省开支多达数十万。

召信臣60多岁死于任上。对他这位深受百姓拥戴的老臣，奸佞当道的西汉王朝竟无一句颂扬之词。直至20年过后，王氏集团的骨干人物王莽为了篡政，极力收买人心，才又将他抬了出来。

但是，南阳郡的吏民们却一直深深怀念着他们的“召父”，主动地为他立祠建庙，并定期祭扫敬仰。

【霍光】

（？～公元前68）西汉中期的权臣。字子孟。霍去病的异母弟。十余岁时，因霍去病的关系得任为郎，迁诸曹、侍中。去病死后，他升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供奉内廷二十余年。因任职小心谨慎，武帝以为“可属社稷”。后元二年（前87）武帝病危，立年仅八岁的弗陵为太子，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同受遗诏，辅佐少主。

昭帝刘弗陵即位后，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决断朝政。始元二年（前85）封博陆侯。其女与上官桀子安结为婚姻；安女因盖长公主的疏通，入宫为婕妤，始元四年立为皇后。上官安以此迁车骑将军，封桑乐侯。上官桀为报谢长公主恩，多次为公主嬖幸丁外人谋求官爵，均遭霍光拒绝。加以霍光以皇后外祖父的身份专制朝政，于是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同时，桑弘羊在盐铁官营等重大政策上也与霍光发生严重分歧。元凤元年（前80），上官父子、桑弘羊与觊觎帝位的燕王旦以及心怀怨望的盖长公主通谋，企图杀害霍光，废黜昭帝，立燕王为天子。由于稻田使者燕仓的告发，阴谋败露。上官父子、桑弘羊均被族诛，燕王和盖长公主自杀。从此，霍氏权倾朝廷，霍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为中郎将，云弟山为奉车都尉、侍中，掌领胡越兵。霍光的两个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子诸婿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

霍光辅佐昭帝期间，继续执行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政策，史称当时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昭帝多次下诏削减封建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的田租、口钱和更赋，以中牟苑赋予贫民，并赈贷种、食。始元六年七月，又召集贤良文学至长安会议盐铁专卖等政策（见盐铁之议）。之后，下诏“罢榷酤”和取消“令民共出马”的规定。与此同时，与匈奴也重新恢复了和亲关系。这些措施对于稳定武帝后期以来动荡不定的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凋敝的社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元平元年（前74）昭帝卒，因无嗣子，霍光以皇太后诏迎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贺因荒淫无道被废徙汉中房陵县，霍光与群臣又迎立武帝卫太子之孙刘询（即汉宣帝）。宣帝即位后，霍光继续秉政，因拥立有功，增封

至二万户，其他赏赐无数。地节二年（前68）病卒。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秉政二十年，成为西汉后期外戚专擅朝政的滥觞，同时改变了武帝之前以丞相为中心的三公执政，这是西汉封建政治体制方面的重大变化。

霍光死后，霍禹为右将军，霍山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霍氏一门尊盛，奢侈无度。加以霍光夫人毒杀宣帝许皇后事发，宣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夺霍氏权势。霍山等人策划以太后诏废宣帝而立霍禹。地节四年阴谋败露，霍云、霍山自杀，霍禹等人皆腰斩、弃市，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

【魏相】

魏相（？～前59），字弱翁，是济阴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人，后来迁到平陵。从小学习《周易》，任郡卒吏，后因对策高届榜首，任茂陵令。不久，御史大夫桑弘羊的门客诈称御史大夫住在县中的客店里，县丞没有按时去拜见，那门客愤怒地拘捕了县丞。魏相怀疑其中有诈，逮捕了那门客，审讯查处了他的罪行，按其罪行当众斩首，从此茂陵大治。

魏相后来又调任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强们都敬畏、服从他。正赶上丞相车千秋去世，以前车千秋的儿子任洛阳武库令，他一看父亲死了，而魏相治郡严格，害怕时间长了会得罪，于是自己辞职离开了。魏相派手下人去追赶挽留他，但仍不肯回来。魏相特别悔恨地说：“大将军听说武库令辞了官，一定会认为这是我因为丞相死了就不能好好地对待他的儿子。这会使当代的贵人们都非议我，这很危险啊！”武库令西行到了长安，大将军霍光果然因此责怪魏相道：“幼主刚刚即位，认为函谷关是京师的屏障，武库是精锐兵器的集中地，所以任命丞相的弟弟为关都尉，儿子为武库令。现在河南太守不深思国家大计，只看见丞相不在了就斥退他的儿子，这是多么浅薄啊！”后来有人告发魏相杀害无辜，被关押起来。从河南来京师守卫的士兵有二三千人，在路上拦住大将军，都说自愿增加一年服役以为太守赎罪。河南境内守关的老弱一万多人想进城上书，关吏报告了大将军。大将军因为武库令辞职一事感到不满，把魏相关入狱中。关押很久一直过了冬天，才赶上大赦出了狱。后又奉诏代理茂陵令，调任为扬州刺史。到任后考察郡国守相，斥退了很多人。魏相和丙吉关系很好，当时丙吉任光禄大夫，写信给魏相道：“朝廷已深知你政绩很好就要重用你了。希望你稍微慎重一些，把锋芒收敛起来。”魏相认为他说的很对，因此不再特别严厉。任郡职两年后，征为谏大夫，又受任为河南太守。

几年后，宣帝即位，征拜魏相为大司农，又调任御史大夫。四年后，大将军霍光去世，皇上思念他的功德，把他的儿子霍禹封为右将军，任命他哥哥的儿子乐平侯霍山重新掌管尚书事务。魏相通过平恩侯许伯上奏秘密奏书，道：“《春秋》中就讥讽世代作官的情况，憎恶宋三代相传为大夫的做法，到鲁李孙氏专权，都使国家危险混乱。自后元以来，做官的人不再只是王室，政事由冢宰决定。现在霍光死了，他的儿子又任大将军，他哥哥的儿子也掌握大权，众兄弟、女婿等人也很有权势，在军队中

作官。霍光的夫人显及女儿们在长信宫有名籍，有时夜里就下令开门进出，骄奢放纵，时间长了恐怕要控制不住的。应该想办法削夺他们的权力，破散他们的阴谋，以巩固万代的江山，保全功臣的世传。”按旧例上书的人都要准备两份，一份要标明为副本，掌管尚书事务的人先打开副本看，如果内容不好，就撤下来不上奏。魏相又通过许伯上奏，撤消副本的旧例以避免权臣阻隔皇帝的视听。宣帝认为他的意见很好，诏令魏相任给事中，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因为实行了这一措施，霍氏杀害许后的阴谋才被皇上知道，于是罢免了霍禹、霍云、霍山的官职，让他们回家去，亲属们都被遣发到地方任职。在这时，韦贤因为年老多病辞职，魏相于是取代他任丞相，封为高平侯，食邑八百户。后来霍氏既怨恨魏相，又害怕他，就密谋诈称太后的命令，先诱杀魏相，再废掉天子。事情败露，霍氏被灭族。宣帝开始亲自管理国家，励精图治，精选群臣，审核名实，而魏相总领百官，很合皇上的心意。

元康年间，匈奴派兵攻打汉在车师屯田的军队，没能攻下。皇上和后将军赵充国等商量，想趁着匈奴力量衰弱，出兵攻打他东边的土地，使它不敢再来骚扰西城。魏相上书进谏道：“臣听说，救乱诛暴的军队称为义兵，出兵正义的人能称王天下；敌人强加于已，不得已而起兵的，称为应兵，应兵能够取胜；为小事愤争，耐不住愤怒的，称为忿兵，忿兵一定失败；贪图别人的土地财宝的，称为贪兵，贪兵一定被击溃；依仗自己国家大，夸耀自己人马多，想向敌显示威风的，称为骄兵，骄兵一定灭亡。这五种情况，不仅仅是人事，而且是天之常道。从前匈奴曾有友好的表示，抓到汉的百姓就都送交回来，没有侵犯过境，虽然争着要在车师屯田，但这事不值得在意。现在我听说各位将军要带兵攻人匈奴国土，臣很愚昧，不知道这次出兵的名义是什么？现在边境一带很贫困，父子共用犬、羊皮来取暖，吃草木的果实充饥，常害怕活不下去，很难再兴兵作战。‘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这句话，就是说百姓以其愁苦之气，伤害了阴阳的谐和。出兵即使取胜了，还有后患，恐怕灾害的变异会从此发生。现在郡国守相有很多并不称职，风俗浅薄，水旱失时。根据今年的统计数字，子弟杀父兄、妻杀夫的，总共有二百二十二人，我认为这不是小的变异。现在左右大臣不忧虑这些，却要向远方发兵以报细小的怨仇，恐怕就是孔子说“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那种情况。希望陛下同平昌侯、东昌侯、平恩侯及有识之士仔细商议这事。”皇上听从了魏相的意见，停止了出兵。

魏相通晓《易经》，有师法，喜欢看汉朝旧事及前人的奏章，认为古今制度不同，当今的要务在于奉行旧例而已。多次列举汉兴以来国家采取的适合时宜的措施，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言论，上奏皇上请求施行，道：“臣听说明主在上，贤臣在下，则国君安乐，百姓和睦。臣相有幸任丞相，不能奉行圣明之法，推广教化，治理四方，以宣扬圣上的恩德。百姓中有很多人弃农经商，有些已有饥寒之色，成为陛下的忧患，臣相罪该万死。臣能力浅薄，不明白国家的大体和现在应该采取的政策，自始至终为百姓考虑，却没找到出

路。私下里体察先帝圣德仁慈的深厚，为天下人操劳，为百姓们考虑，有水旱灾害时忧心忡忡，给贫穷的百姓打开粮仓，赈济饥饿的百姓；派谏大夫和博士巡行天下，体察风俗，推举贤良，平反冤狱，使者往来不断。节省各种费用，减免赋税，放宽对山林湖泊的限制，严禁用粮食喂马，酿酒和囤积居奇；所以救济贫困，抚慰百姓，便利百姓的办法很完备。臣不能一一陈说，冒死奏上从前的旧例、诏书二十三件事。臣认为王法一定要以农为本而致力于积蓄，根据每年的年景来合理使用，以为灾年作好准备。没有六年的积蓄，就得说是很危急的。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东郡普遍受灾，百姓有的饿死在道路上，这是由于十千石官吏不考虑这些问题，才弄到这种地步，幸亏陛下下令救济，才使百姓死里逃生。今年收成不好，谷价暴涨，到秋天收租时仍有缺粮的人，到春天恐怕会更厉害，也没有粮食采救济他们。西羌还没有平定，军队在国外，战争接连不断，我私下里心惊胆战，应该早些做准备，希望陛下为百姓们考虑，继承先帝的盛德以安抚海内。”皇上施行了他的策略。

魏相又多次摘辑《易阴阳》和《明堂月令》两书的精要呈奏皇帝，奏表说：“臣魏相蒙恩得以充任官职，办理事务没有才干，不能宣扬广大天子的教化。近来阴阳不和，灾害不停，责任都在臣等身上。臣听《易经》上说：‘天地顺应自然规律运作，所以日月交替出现，四季依次不乱；圣王顺应自然规律施政，所以刑罚公正，百姓顺服。’天地之间的一切变化，都是由于阴阳的转换变易产生的，而阴阳变易的程度，则以太阳的运行方位为依据。大阳在冬至、夏至两个极点间来回运行，于是确立了风的节序，生成了万物秉性，各有各的范围，不能相互扰乱。东方之神太昊，按照《震》卦的方位手持圆规主管春天；南方之神炎帝，按照《离》卦的方位手持天平主管夏天；西方之神少昊，按照《兑》卦的方位手持矩尺主管秋天；北方之神亶项，按照《坎》卦的方位手持准绳主管冬天；中央之神黄帝，按照《坤》、《艮》两卦的方位手持准绳主管人间。这五位天帝所执掌的职责，各有各的时令。东方之卦不可以用来治理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用来治理北方。春天依《兑》卦治理，则会发生饥荒；秋天依《震》卦治理，则会反常开花；冬天依《离》卦治理，则会天地之闭塞不同；夏天依《坎》卦治理，则会遭到冰雹的灾害。圣明的君主恭谨地遵从上天的意旨，审慎地养育天下的百姓，所以设立羲和之官以治四时，按照时令的变化指导百姓劳作。君主的一举一动完全依照自然法则，顺应阴阳变化，就会日月光明，风调两顺，寒暑适宜，这三者得到妥善处理，就会灾害消失，五谷丰收，丝麻成尺，草木茂盛，鸟兽蕃多，百姓身强体壮，无夭亡疫病之忧。丰衣足食，无饥饿寒冷之虑。如果这样，则君主地位更加尊贵，百姓也心满意足，上下之间没有怨言，君主的政策教令都得到贯彻执行，然后礼仪谦让之风就可以兴起了。如果风雨兴起没有规律，就会使农业纺织业受到伤害；农业纺织业受到伤害，农民就会因缺衣少食而忍饥挨冻；饥寒交迫困扰生命，就会抛弃廉耻之心和做人的尊严，因此强盗坏人就产生了。臣愚陋地认为阴阳是帝王基业

的根本、天下生灵的命脉所在，自古以来圣君贤王没有不顺应阴阳变化的规律而施行政教的。天子的本文，就是指完全地取法天地之象，同时借鉴前代圣王的言行。高皇帝语录第八篇《天子所服》中说：‘令众欠臣商议天子的服饰制度，以安定天下。’相国臣萧何、御史大夫臣周昌谨和将军臣王陵、太子大傅臣叔孙通等商议：‘春夏秋冬四季天子服饰，应该参照天地的运数，顺应民意。所以从天子王侯有封土爵禄之人直到亿万普通百姓，能效法天地之变，顺应上时，使国家得到治理，自身也没有凶祸灾殃，得以寿终正寝，这就是奉承宗庙定天下最首要的礼法。臣等请求依照这样去做。命令中谒者赵尧主持春季礼仪，李舜主持夏季礼仪，兒汤主持秋季礼仪，贡禹主持冬季礼仪，四人各自负责一季。’大谒者襄章奏报皇上，皇上批复说：‘可以。’孝文帝时，在二月广施恩惠于天下，赏赐孝悌、力田和长年在外疲惫辛劳的士兵戍卒，设祠吊祭死于国事的人，举措与所处的时节不相应。御史大夫晁错当时任太子家令，上奏指出这一点。臣魏相私下念及陛下对百姓恩德极其隆厚，然而灾异之气久久不能平息，恐怕是因为陛下的诏令有些不合时令。希望陛下挑选熟读经书明晓阴阳变化的学者四人，各自主管一季的礼仪，每到一个时令，就明白指出应该做些什么，以此与阴阳变化相和谐，这是天下百姓的无上荣幸。”魏相多次说应该施行的要务，都被皇上采纳。

魏相下令各官员巡视郡国或从家里休假回到官府时，都要报告各地的异闻，如果有叛乱或风雨等灾害，郡国没有上奏的，魏相都及时上奏皇帝，当时丙吉任御史大夫，两人同心辅佐皇帝，皇帝非常倚重他们。魏相为人严厉，不如丙吉宽厚。任丞相九年，神爵三年去世，谥称宪侯。儿子魏弘继承爵位，甘露年间有罪被免除爵位，贬为关内侯。

【班超】

（公元 32 ~ 102）东汉外交家、军事家。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父班彪，兄班固。超随兄至洛阳，家贫，常为官府雇佣抄写以养家。后为兰台令史，因事免官。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 73），奉车都尉窦固伐北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有功。随后，固又遣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南道，先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适遇北匈奴也遣使者来鄯善，班超定计，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遂专心臣服于汉。窦固奏报朝廷，升超为军司马。班超复受命出使，窦固想增加他的兵员，班超辞谢，仍率原来的部下三十六人到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于阗也听从了他的命令。十七年，班超到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疏勒王兜题为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所立，非本国人，班超废除兜题，另立疏勒前王兄子忠为王，深得疏勒国人拥护。十八年，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带）、龟兹攻杀西域都护陈睦；适逢明帝去世，汉朝尽撤西域屯兵，超独留疏勒，孤立无援，龟兹、姑墨（今新疆阿克苏一带）不断前来攻击。章帝下诏命超还朝。班超回到于阗，于阗王侯等痛哭流涕，抱住班超的马脚，不让他东行，超因此复还疏勒。建初三年（公元 78），班超率疏勒、于阗等国兵大

败姑墨，想乘此平定西域，遂上疏请兵。朝廷遣假司马徐幹率兵增援超。八年，拜为将兵长史。第二年，又遣和恭等率兵受超指挥。时莎车（今新疆莎车一带）与龟兹连兵，疏勒王忠亦叛，班超设计擒杀之。章和元年（公元87），班超率于阗诸国兵大破莎车，莎车降，超威震西域。贵霜王遣使奉献，并求娶汉公主，超拒绝他的请求，因此怀怨。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贵霜王遣副王谢率兵七万越过葱岭攻超。班超坚壁清野，谢粮尽援绝，即遣使请罪，超放其生还，许其撤退，贵霜王此后不敢再侵犯汉朝。三年，龟兹、姑墨皆降，汉廷以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境。六年，超率龟兹、鄯善诸国兵讨焉耆，大破之，斩其王，为陈睦报仇。西域遂平，五十余国都遣质子臣属于汉。七年，封超为定远侯。九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抵达安息西境，未到大秦而还。十二年，班超年老，上疏请归，乃诏超还。十四年，班超到洛阳，拜射声校尉，不久去世。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平定了城郭诸国的内乱，对外抵御了强敌，人心向附，威信很高。他在西域进行军事活动，主要依靠当地兵力。为政宽简，吏士团结。自汉置西域都护以来，前后担任此职者，无人能与他的功绩相比。

【匡衡】

家贫勤学　官居高位

匡衡字稚圭，是东海郡承县（今山东枣庄南）人。父辈世代务农，但匡衡却特别喜欢读书，家中贫穷，只好靠替别人作雇工而换取生活学习的费用。匡衡治学专心致力，超过了其他的人。儒生们评价他说：“不要谈论《诗经》了，匡衡就要来；匡衡解释《诗经》，见解高明，令人愉快。”

匡衡投考甲科，因对答的文章不大切合令条的题意，而被录取为乙科之士，补太常掌故，被选调为平原郡的文学史。学者中有很多人都上书推荐匡衡，说他精通经学，当今的世上没有人能超过他，应该让他回到京师任文学史一职，后辈学生都要跟随匡衡去平原郡，匡衡不应该留在远方。事情下交给太子的师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处理，他们负责对匡衡进行考察。匡衡解答了《诗经》各篇的主旨，他的解释深刻而全面。萧望之上奏书报告说，匡衡的经学水平精深、纯熟，有儒学的师法，值得一读。汉宣帝不怎么任用儒士，仍叫匡衡回到原处的官府。然而皇太子见到了匡衡的对答文章，暗自非常欣赏他的才能。

正逢汉宣帝驾崩，元帝刚刚即位，乐陵侯史高凭借皇帝亲属的身份就任大司马车骑将军，掌管尚书署的事务，前将军萧望之作为他的副手。萧望之是有名的大儒，是汉元帝作皇太子时的师傅，有很深的感情。汉元帝信任萧望之，萧望之推荐儒生，对朝廷政事提了许多建议。史高只不过是在高位上充数，与萧望之之间有了裂痕。长安令杨兴劝史高说：“将军凭借亲戚的身份辅佐朝政，地位显贵而重要，天下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您，然而众人议论的善名”美誉并没有集中在将军身上，这是为什么呢？人们确实听到了一些说法。对将军的幕府，海内的人们没有一个不仰望的。然而所推举的人不过都是私人的门客，乳母的子弟。将军不在乎，可是只要有一个人私下里议论，这种议论就会流传遍

天下。经传上说：只因贤能的人材很难得到，所以就说事情不会等待有贤人才做；只因食物很难得到，因此便说为了吃饱不会等待食物；这是很糊涂的想法。平原郡的文学史匡衡才能智慧很高，经学水平无与伦比，但是因为朝廷里没有门路，被派往很远的地方。将军若能将他招到幕府，学士们会欣然归服于仁德。和匡衡一起讨论事情，观察他的水平、特长，向朝廷推荐，一定会成为有治国本领的人。将军用这种方法显示给众人，一定会声名流传于世。”史高采纳了扬兴的建议，提拔匡衡为议曹史，将匡衡推荐给汉元帝。元帝任命匡衡为郎中，升迁为博士，给事中。

屡次上书　代韦作相

这一时期，有日蚀地震的灾变，皇上询问这些灾变与政治上的得失有什么关系，匡衡上书说：

臣听说五帝的礼法不同，三王的教化各异，民间风俗各不相同，是因为各自遇到的时代不相同。陛下亲自身体力行，开辟了太平的道路，怜悯那些愚蠢糊涂、误犯法律的官吏及百姓，连年大赦，使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天下的大幸。然而臣私下里发现，大赦之后奸佞邪恶的行为没有衰减、停止，今天大赦，明天又会犯法，再次入狱，这大概是由于对这些人的引导没有得到效果。教养民众，是要“对他们陈示道德义理”，“对他们表明事务的好与恶”，观察他们的失误而制定相应的措施，这样就会使百姓动而和谐，静而安康。现在社会的风俗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好追逐声色，崇尚侈糜生活，廉耻的规矩淡薄，淫僻的欲望放纵，纲纪失去秩序，妻妾之家亲戚的地位超过了同姓骨肉，亲戚之间恩情淡漠，联姻的亲族之间关系紧密苟且结合，追逐利益，用身家谋取财富。这些人从根本上没有改变，虽然每年赦免他们，但刑法仍不能放在一旁不用。

臣愚蠢地认为，应当大大改变普天下的习俗。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做不到的?”朝廷是天下的根本，公卿大夫之间相互友善顺从礼法，恭敬谦让，那么百姓之间不会争斗；喜好仁义乐于施舍，下层人民就不会暴虐；崇尚义理，以节操为高尚，民众就会受到感召；宽厚温顺、和睦贤惠，民众就会相互敬爱。这四点，表明统治者为什么能够不施行威严措施而使孝化形成。为什么这样说呢？朝廷之中如果有权力之争，那么下面就会有争斗的隐患；上面有自大专横的人士，下面就会有不讲礼让的人；上面有争强好胜的臣僚，下面就会有互相伤害的心思；上面有追逐利益的大臣，下面就会有偷盗的平民；朝廷是社会的根本。现在那些无能的官吏治理社会，都不以礼让为根本，反而崇尚好强硬、暴力，有的官吏还以残酷的心理去陷害好人，使他们蒙受罪名，贪图钱财，羡慕权势，因此下面违犯法令的人越来越多，奸恶的行为不会停止，虽然有严酷的刑法，仍然不能改变这些现象。这并不是民众的天性恶劣，而是由于进行教化的失误造成的这种现象。

臣私下察考《诗经·国风》中的诗篇，“周南”“召南”所反映的地区，受到圣贤教化的影响很深，因此人民行为忠厚，不贪女色。郑庄公喜好勇武，因而国民敢于空手与猛虎搏斗。秦穆公以信义为重，因而群臣之中有许多人愿意

跟随他死去。陈夫人喜好巫术，因而百姓之中祭祀盛行。晋昭公喜好俭聚财物，因此国民都吝啬，注重积蓄。太王亲自提倡仁爱，因此邠国的习俗以诚恕为高尚。由此看来，对统治天下的人来说，崇尚什么样的道德标准要特特别慎重。现在的社会虚伪刻薄，残害他人，不懂礼让的风气已经到达顶点了。臣听说施行教化，不一定要逐家拜访，逢人劝说。贤能的人在统治的位置上，有能力的人恪尽职守，朝廷崇尚礼义，文武百官恭敬礼让。道德的推行，由内到外，从靠近自己的人开始，然后民众才知道效法什么，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向善靠拢。这样一来，百姓安宁，阴阳调和，神灵感应，吉祥的征兆就会出现。《诗经》说："商朝的京城礼俗庄重，可以仿效，是四方的中正所在；统治者高寿而且安康，可以保证我们后代的繁衍。"这是成汤之所以能够建立天下大治的统治，保全子孙，教化异地的风俗，而且使西北部的鬼方部接受怀柔的根本原因。现在的长安是天子的首都，天子亲自担任推行圣王的教化，然而这里的凡俗与远方没有什么不同，各个郡国、封国来到京城的人没有什么可以遵循效法的准则，有人见到侈糜的生活方法便加以仿效。因此，推行教化的根本，改变风俗的关键，应当首先从京城的礼俗这个中正之处开始。

臣听说天与人之间，精气相互振荡，善恶相互推动，下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天上会出现什么现象。阴阳的法则各自有所感应。太阳发生变化，静的事物便会运动；太阳被遮住光辉，明亮就将成为黑暗。各种水灾、旱灾等灾害便会接连出现。现在关东连续多年出现饥荒，百姓缺衣少食，生活贫困，甚至有的相互吃食。这都是因为百姓的赋税过多，人民所提供的东西数量太大，而官吏心安理得地搜集这些钱物，不向上报告民情而出现的后果。陛下敬畏上天的告诫，哀怜百姓，大大减少开支，削减甘泉宫、建章宫的侍卫，废除珠崖郡的建制，停止武力征伐，推行文治，准备要经历唐虞那样的兴盛局面，杜绝殷周的衰败恶政。各位见到废除珠崖郡的诏书，没有一个不感到兴奋的，大家都认为将会出现太平盛世了。应当削减宫廷的费用，省去侈糜浮华的装饰，考订制度，整治外官、亲信；接近忠诚正直的人，疏远虚信奸佞之徒；放弃郑卫之音乐，欣赏雅，颂之声；举荐才能出众的人，开辟直言进谏的路子；使品行高洁的人士显贵，昭示没有欲望的大道；观览《六艺》的旨意，观察世上的情况，了解自然的道理，通达和睦的造化，倡导仁义，匡正错误的习俗，改变人民的视线，让四海之内明明白白地都能见到本朝崇尚的道德规范，京城道德普及，美好的声誉传遍边境之外。然后广远深入的教化可以形成，礼又谦让的美德可以蔚然生成。

元帝为匡衡所上的奏疏而感到喜悦，升任他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这个时期，皇上喜好儒术和文学，对宣帝的政策做了许多改动，上疏讨论政事的人很多都被召见，这些人都认为自己得到了皇上的注意。同时，傅昭仪以及儿子定陶王受到皇上的宠爱，超过了皇后、太子。匡衡又上疏说：

臣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能否审慎自己的用心。承受天命的君王任务在于开创大业，将基业传给后世子孙，

以至无穷。接替王位的君主则要一心一意地承受祖先的功德，将其发扬光大。过去周成王继承了王位，追思文王、武王的道路，修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好的声誉荣耀都归之于两位先王，不敢居功自大。因此上天欣然享受他的祭祀，鬼神也保佐他。颂扬周成王的《诗经》篇章说："思念我的祖先，得到皇天、祖先的保佑。"是说周成王经常思念祖先的业绩，因而鬼神都保佑他的统治。

陛下的圣德像天一样覆盖着大地，像爱护儿女一样爱护每位子民，然而阴阳未能调和，奸佞邪恶的行为未能禁止，大概是因为评论朝廷大政的官员没有能够发扬光大先帝的伟大功业，反而争着进言先帝的制度不再适用，一定要更改它们。更改之后有的行不通，便又再次更改，恢复原状。这样一来，下面的人相互攻击，官吏民众无所遵循。臣私下里痛恨国家放弃已经卓有成效的事业，而去白白地为更改旧的制度而争执不休。希望陛下详细阅览祖先的功德事业，认真留意遵循祖先定下的法制，宏扬祖先的功德，以安定群臣的心。《大雅》说："怀念你的祖先，遵循祖先的德政。"孔子将这句话写在《孝经》的第一章中，这是最高尚的道德的根本。《传》说："仔细研究人们喜好什么，厌恶什么，调理性情，这样王道就可以很快实现了。"能够完全了解自己，然后才能充分理解人的本性；能够充分理解人的本性，就可以明白天地的造化。治理性情的方法，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不足。聪明通达的人要戒除过于仔细地观察；见识不广的人要戒除因视听不明而受到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戒除过于凶暴；仁爱温柔的人要戒除优柔寡断；沉静安详的人要戒除贻误时机；胸襟宽广的人要戒除疏忽大意。一定要明白应当警惕的方面，用道义来修正，然后可以达到中和的境界，使那些虚伪的人不敢结党营私、谋取官位。希望陛下警惕这些方面，以使圣德更加崇高。

臣又听说整治家庭的秩序，那么天下就可得到治理。因此《诗经》以"国风"为开始，《礼记》以"冠"、"婚"两篇为根本。以"国风"作为开篇，是要推溯人的性情的本原，进而标明人们之间的等级关系。以"冠"、"婚"为根本，是要从基础上端正礼仪，防患于未然。幸福的产生没有不是以家庭为根本的，而道的衰微，没有不是从从家庭内部开始的。因此圣明的君主一定要慎重对待嫔妃与皇后之间的关系，使嫡子长子的地位有所区别。对家庭内部实行礼法，位卑者不能超过位尊者，新来的不能排在旧有人的前面。用这种方法来统一人的情感、理顺阴阳之气。使嫡子位于尊位，而使庶子位于卑下的位置。嫡子的加冠礼在东阶上举行，加冠典礼上用美酒祝福，其他的儿子则不能与之相同。用这种方法使嫡子的地位尊贵，表明这是无可置疑的。这不是徒然地使用礼节仪式，而是从根本上明确嫡子与庶子的不同，所以用礼仪将其表示出来。圣人的一动一静、游玩、宴饮，都要使大小高低不同的事物有次序。有了这种次序，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宁，百姓会顺从教化。如果应当亲近的人被疏远，应当尊贵的人位于卑贱的地位，那么奸诈投机的人就会趁机而动，扰乱国家。因此圣人要谨慎地防止这种现象的开端出现，在它还未造成恶劣影响时禁止，不因为私人的感情损害公正的道义。陛下

圣明的道德纯正完美，没有什么要改正的，那么天下不使用刑法就可以安定。《诗》说："要治理外面的天下，先要安定内部的家庭。"《易·彖辞》说："端正家庭的秩序，天下就安定了。"

匡衡任少傅的几年之间，多次上疏陈述应当办的事情，每逢朝廷议论政事，都依据经典回答皇上的询问，言辞大多符合法度义理。皇上认为匡衡的才能可以进入公卿之位，因此任命他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匡衡代替韦玄成做了宰相，被封为乐安侯，封食邑六百户。

元帝驾崩，成帝即位。匡衡上疏请元帝谨慎地处理婚配，读经书，学习礼仪细节。奏疏说：

陛下天性孝顺，对先帝的哀悼悲伤、思念敬慕长久地留在心中，不再参加游戏射猎宴饮等娱乐活动，诚心诚意、严肃认真地遵守孝道，从始至终，不忘根本。臣私下希望虽然陛下天性孝顺，但仍然应当以圣心留意这个问题。《诗》说"无限忧伤，大病一场"，是讲周成王服丧完毕，仍在思念先帝，忧伤的心情无法平静，这是继承文王、武王的伟大基业，推崇广远深入的教化的根本。

臣又曾听老师说过："夫妻婚配，是养育生命的开始，是各种幸福的本原。"婚姻的礼仪符合规定，然后各种事物的规则形成，天命完备。孔子评论《诗》从《关雎》开始，是说位于尊贵地位的统治者就是百姓的父母，皇后的行为如果不与天地相等，那么就无法遵循上天的神明定下的准则，治理万物的不同事宜。因此《诗》说："美貌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理想配偶。"是指如果女子能够做到节操坚贞、性情贤淑，不改变她的操守，那么她的容貌仪表就不会因情感欲望而改变；她的一举一动就不会有私情的流露。这样的女子才可以作为配偶，使她位于尊贵的地位成为王室的女主人。这是法度的首要问题，是王道教化的开端，自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盛与衰败，没有不是由这个问题而引起的。希望陛下详细阅览这其中的得失兴衰的关系，巩固国家的事业的基础，选用德行完备的人，戒除声色的喜好，接近严肃自重的人，疏远有小的技能但品行不端正的人。

臣私下里观察陛下的道德纯备，专心精读《诗》、《书》，喜好音乐，没有满足。臣下我才能低下，无法辅佐美好的道义的施行，宣扬德政之音。臣听说《六经》是圣人为了统一天下人们的思想，而将善与恶归宿说明白，表明吉凶祸福，指出社会道德规范的准则，使人产不违背本性所写的著作。所以研究《六艺》的旨意，那么就可以得到人与天的理法，使其和谐，草木昆虫可以生长，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道理。《论语》、《孝经》也是关于圣人言行的要点，应当仔细研究它们的意思。

臣又听说圣明的君王自己的行为无论是动是静，还是与人应酬，都是承受了天命；处理朝廷事物，享用群臣的进贡，事事都有节制修饰，以此表明人们之间的等级关系。恭恭敬敬，是侍奉天神的态度；涮顷谦逊，是承受祖先事义的礼节；统治众人的仪表，要端正庄重，严谨谨慎；面对群臣的容颜，要慈爱和悦。举止行为，都遵循事物应有的法度，这样陛下的形象就是仁义，陛下的行动就是法则。孔子说："道德礼义可以使人尊重，容貌仪止可以使人观赏，进退

的行为可以成为法度，用这种统治他的百姓，百姓就会敬畏他、爱戴他，以他的举止为法则而效法。”《大雅》说：“恭敬慎重的仪容，是百姓仿效的准则。”诸侯们在正月时朝觐天子，天子根据道德法则，展示出端庄恭谨的仪容，演奏礼乐，用礼酒设宴，然后让诸侯们回去。那么各个诸侯国都会得到天子的恩德，蒙受教化，形成良好的风俗。今年的正月初一，陛下第一次登上正殿，亲临朝廷接受诸侯的祝贺，设置酒宴招待各路诸侯，古书上说“君子从一开始就要小心谨慎”，希望陛下注重行为的礼节，使群臣可以仰望您的高尚品德的美好光彩，以巩固国家的根基，这将是天下的最大幸事！

皇帝认真地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不久，匡衡又上奏书请求成帝在京城的南北郊举行祭天地的仪式，并撤除其他过多的祭祀坛址，详情记录在《郊祀志》中。

免为庶人　病死于家

当初，元帝在位时，中书令石显专权，从前任宰相韦玄成到匡衡都惧怕他，不敢违背他的意见。到了成帝即位不久，匡衡就与御史大夫甄谭一起上奏疏指责石显，逐条追述石显的罪恶，以及他的党羽。这样一来，司隶校尉王尊上奏疏弹劾：“匡衡、甄谭身居大臣之位，了解石显等人专权弄势，作威作福，是四海之内的危害，不及时报告，启奏对石显加以处罚，而是阿谀奉承，故意顺从，附和臣下，欺瞒主上，这不是大臣辅佐朝政所应遵守的道义。既然奏明石显等人的罪过，却不陈述自己不忠的罪过反而宣扬先皇帝任用破坏分子，罪过达到了大逆不道的程度。”皇帝发布诏书不予弹劾。匡衡恐惧惭愧，上疏请罪，并说身体有病，请求退职，呈上丞相以及乐安侯的印信。皇上回答说：“您因道德修养纯美而列位于三公，先帝委任您处理政务，一直到朕很高兴与您同心合意，希望能有所成就。现在司隶校尉王尊狂妄地诋毁，将许多不是加在您的身上，朕感到非常悲伤。刚刚下发了责问司隶的状文，您为什么心有疑虑而上书归还侯位、请求退休呢？这是要表明朕不曾明察啊。《传》不是说过吗：‘不违反礼、义的要求，何必忧虑别人讲什么话！’您要仔细考虑这件事情，集中精神，接受医药治疗，多吃东西，自己保重。”并赏赐了上等醇酒、牛肉。匡衡官复原职治理政事。成帝因为是新即位，所以褒扬优待重臣，但是群臣中很多人都拥护王尊，匡衡惶恐，心中不安，每逢发生水旱灾害，风雨不调，就连连请求退休，让出官位。皇上便在诏书安慰，不允许他辞职。

过了很久，匡衡的儿子匡昌任越骑校尉，酒醉后杀人，被逮捕入狱。越骑官属与匡昌的弟弟策划要把匡昌抢出监狱，事情败露，匡衡摘掉官帽、赤着脚请罪，天子派谒者命匡衡戴冠穿鞋。然而有官员指控匡衡在封邑之中强行侵占土地，匡衡竟然因此而被免去了官职。

当初，匡衡被封在僮的乐安乡，封界之内的土地面积总共是三千一百顷，南边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郡的地图误将闽佰标成了平陵佰。过了十几年，匡衡改封临淮郡，于是就封真正的平陵佰为封地界限，多了四百顷地。到了建元元年，这个郡才划定国界，向朝廷上报统计簿，更改修订了郡图，上报给丞相府。匡衡对平时很信任的一名官吏赵

殷说："主簿陆赐曾经担任过奏曹，熟悉了解各郡国的边界划分，让他代理召集曹椽。"第二年官署进行统计时，匡衡向赵殷询问关于国界的事："曹署想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赵殷说："陆赐认为根据上报的统计簿，让郡里改定平陵佰为封界。但耽心郡里不愿修改，可让家丞上奏书说明。"匡衡说："考虑是否应当得到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上书呢?"也不向曹署报告，听任曹署处理这件事。此后陆赐与下属一个名叫明的官员审理统计簿时说："根据旧图考察，乐安乡的南面以平陵佰为界，不依照旧图而以闽佰为界，如何解释?"郡里立即又以四百顷土地划给乐安国。匡衡派随从到僮县，收取归还的这些土地的田租一千多石谷子，收入了匡衡家中。名叫骏司隶校尉和名字叫忠的少府廷尉根据这件事上奏疏弹劾说："匡衡管辖之下的官员盗窃的财物价值达十金以上，已达到治罪的标准。《春秋》的大义规定诸侯不能在其封邑专权，而要一致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匡衡的官位在三公之列，辅佐国家政务，领导统计工作，应依据郡国的实际情况，划正国界，却在统计簿已定的情况下违背法律制度，在采邑中专权，侵占土地来增加自己的收益。陆赐和那位名叫明的人逢迎匡衡的心思，私自歪曲郡中的统计，胡乱削减郡县的封界，附庸下人，欺骗主上，擅自将土地为大臣增加利益，都违背了道德。"于是皇帝批准了这道奏疏，没有用法律治罪，将丞相免职成为平民，匡衡死在了家中。

儿子匡咸也精通经学，官位达到了九卿。家中世代有许多做博士的人。

【第五伦】

第五伦，字伯鱼，战国时期齐国田氏的后裔。西汉时，其祖父被徙之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遂以迁徙次序为姓氏。

第五伦早年曾当过乡啬夫和京兆尹的主簿，后来举孝廉，被光武帝刘秀先后任命为扶夷（今湖北武岗）县令、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太守、蜀都太守。章帝刘炟即位后，调入中央任司空，成为"三公"之一。

为民解忧

第五伦生性正直，同情百姓。无论在哪儿做官，都以为民解忧为己任。

早在他担任京兆尹主簿时，具体负责长安城内的市场交易。他认真校正秤、斗、尺等度量衡器具，严格市场管理，很少发生缺斤短两的事。即使买卖双方有时出现争执，只要他一出面，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担任会稽太守时，他发现当地素有迷信鬼神的风俗。每逢过节，民间都大量杀牛祭神，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于是，他明令禁止，违者惩处。如此一来，流行多年的歪风很快杜绝，劳苦大众无不由衷地感激。

在蜀郡太守职位上，他鉴于郡府中的属吏从官皆多豪富，有的人钱财竟达上千万。他们上下班都乘着华丽的车子，骑着高大肥壮的马，耀武扬威，神气十足。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人也都竞相摆阔气，讲排场，致使百姓叫苦连天。于是，他又毅然采取果断措施，将富户出身的官吏全部裁汰，另选清贫正直之士替代，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腐倡廉。

从此，当地不正之风渐渐消停，吏治得到明显改善。与此同时，他还认真考核每一个属吏，向上举荐了很多德才兼备者。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受到重用。如乡官云贺，曾被朝廷擢升为九江郡、沛郡太守，位居九卿一级。

刚正不阿

第五伦一身正气，凡事秉公而行，从不曲意逢迎。

汉章帝时，外戚当权。先是马皇后之兄马寥、马防、马光同时身居要职，手执大权，威震朝野；后是窦皇后之兄窦宪掌管禁军，出入朝廷，红极一时。不少仕宦之人犹如墙头草，随风摇来摆去，毫无个人主见。第五伦却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一身清白。他认为：启族过盛，应防止他们骄奢擅权，危及朝政。便屡屡上书，抨击时弊，要求抑制外戚势力。他还明确提出："对外戚可封侯以富之"，但不能"职事以任之"。结果，得罪了不少有权势的人。这些人同流合污，常常在章帝面前进谗言，致使他一度受到皇帝的冷落。但他毫不气馁，依旧刚正不阿，不入俗流。为此，时人将他同西汉时期的诤臣贡禹相媲美。

其间，第五伦的子孙们经常劝他说话办事不要太峭直，不要得罪人太多，尤其不要得罪朝中显贵。但是，他每次都"辄叱遣之"。他说：忠君爱民必须"奉公尽节，言事无所依违"；不然，就不是真正的忠臣孝子。

严于律己

第五伦虽然身居高位，俸禄优厚，但他从来不骄不奢，不淫不逸，生活十分节俭。

在他担任太守时，常常自己动手割草喂马，妻子亲自下厨房烧火做饭。每领到俸粮，除留下自己一家食用之需，全部赠送或以最低价格卖给百姓中较为贫困的人。升为司空后，他依然"不修威仪"。除上朝时乘着一辆瘦马拉的旧车外，平时穿布衣，吃糙米，徒步而行。

比起一般人来，第五伦还有一个独到之处，那就是勇于自我剖析和自我批评。有一次，有人问他：你一向尽心公事，难道就没有私情杂念了吗？他诚恳地回答道：有。并且举例说：以前，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我虽然没有接受，但每逢三公选拔人才，我心里总不能忘记那个人。尽管那人最终并没有被录用，却说明我仍然有私心。再就是：我的侄子生病时，我一夜曾去看他10来次；我的儿子生病时，有一次没能去看他，竟落得彻夜未眠。若是其他人的孩子生了病，我就不可能会这样。这不说明我还有私心么？

第五伦十分注重家教。不但要求子孙们具有真才实学，更注重他们道德品质的修养。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其子孙全都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才。其中，小儿子第五颉后来历任桂阳、庐江、南阳太守，处处政绩斐然。曾孙第五不种，在汉桓帝刘志时官至徒掾、兖州刺史，也以清正廉洁而名冠当时。

第五伦于章帝元和三年（86年）告老还乡，数年后去世，享年80多岁。

【李膺】

李膺（110～169年），字元礼，东汉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他初举考廉，历任青州刺史、渔阳太守、度辽将军和河南尹，后累官至司隶校尉，负

责纠察京师及其附近各郡。

李膺素以清正廉洁、疾恶如仇而名扬四方。在桓帝刘志延熹二年（159年），当他即将担任河南尹的消息传出后，当地正直之士和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而一些不法官吏自感不妙，纷纷自动解职而去。

李膺就任河南尹不久，听说宛陵县的世家大族羊元群在任北海郡长官时贪赃枉法，罪恶累累，甚至在他免官归乡时竟连该郡官舍厕所上的奇巧饰物也都拆下来，用车运回他的老家，不禁气愤填膺，立即上表弹劾他贪婪至极，要求朝廷查办他。羊元群得知此情，连忙用他贪污来的钱财向宦官行贿，并反咬一口，说李膺是栽赃陷害。

当时，把持朝廷20多年的外戚梁冀刚刚被铲除，朝政大权掌握在单超等5位大宦官手中。这些宦官比起外戚来，其贪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甚至还专门开辟了西苑，作为公开卖官的场所。基于此，羊元群很快便以重金买通了宦官，将李膺判为了诬告，而按照法律，诬告是要反坐的。所以，李膺遭到逮捕，被押到左校官署服苦役。

后来，由于朝臣纷纷上疏，请求桓帝赦免李膺。桓帝怕众怒难犯，才将他释放出来。

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时，桓帝最宠信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正在野王县当县令。野王县隶属河南郡，属于司隶校尉的管辖范围。由于张朔一向贪婪残暴，为所欲为，甚至以杀害孕妇为乐，被当地百姓恨之入骨，他一听说李膺拟就任司隶校尉，吓得马上辞去了县令之职，畏罪潜逃到京都洛阳张让的家中，藏匿在房柱间的夹壁墙里。李膺获悉此情，亲自率领捕吏凿开墙壁，拿下张朔。经审讯，张朔供认不讳。李膺随即定案，就地将他斩首。

接着，张让便来到桓帝面前哭诉其弟冤枉，并指控李膺未经请旨就擅杀县令，是无视王法，是欺君罔上。昏庸的桓帝听罢大怒，马上召来李膺进行责问。李膺从容地辩解道：过去，晋文公逮捕卫成公，并未事先奏请周天子批准，但《春秋》中却肯定了这件事；《礼记》中也写道，国君虽然宽宥了犯罪的同宗贵族，执法的官吏却可以不听从；孔子做鲁国司寇时，刚上任七天便杀了少正卯，而臣下上任已过十日，才刚刚斩了一个张朔，实在是办事太拖沓！还表示：我自知已闯下大祸，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歼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桓帝见他慷慨陈词，言之有理，也便没再说什么。事后，桓帝又专门找来张让，对他说：这都是你弟弟犯罪所致，跟李膺没什么关系！

从此，那些专横不法的宦官一个个夹起了尾巴，连例行的休假日都不敢轻易走出宫廷大门。桓帝感到很奇怪，问他们，他们低着脑袋小声说：害怕李校尉！

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曾创办了一所专门培养官吏的最高学府，即太学。到桓帝朝，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人都十分敬佩李膺，四处宣传“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也有意借助太学的力量，共同打击腐败的宦官集团。于是，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延熹九年（166年），有个同宦官有勾结又迷信占卜的人，名叫张成，扬言他已预卜到皇帝将要进行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去杀人。不料，这件杀人案落

在了李膺手里。李膺立即逮捕凶手，并将他斩首示众。张成怀恨在心，遂与宦官密谋后，给桓帝写了一封诬告信。其中说：李膺等人在太学里结交各地来的太学生，组织秘密党派，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有谋反的嫌疑。桓帝一见“谋反”二字，过敏的神经马上紧张起来，未经调查了解，便将李膺等200多位“党人”投入了死牢。此后，由于桓帝窦皇后的父亲窦武替李膺等人申诉，他们才获赦免；但必须离京返乡，禁锢终身。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二年，桓帝死，灵帝刘宏即位。灵帝在窦武等人的奏请下，降旨免除了对党人的禁锢令，李膺又回京做官。宦官集团惟恐惨遭报复，遂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杀死了窦武等人。随后，又杀害了李膺、范滂等100多名名士，流放了600多被禁锢者，关押了1000多名太学生。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据史载，李膺被捕前，曾有人劝他赶快逃走。他答道：“临事不怕危难，有罪不避刑罚，这是做臣子的气节。我年已六十，死生听认命运，往哪儿逃呢?”说罢，昂首挺胸，慷慨赴难。

【杨秉】

杨秉，字叔节，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著名清官杨震之子。早年，以其父为榜样，博览群书，执教讲学；40多岁后应召为官，仍以其父为榜样，为政清廉，赤诚报国。他曾历任豫、荆、徐、兖四州刺史，后来官居相位。

清正廉洁

史书上说：杨秉任刺史期间，自我要求十分严格。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不但不贪不占，甚至还“计日受俸，余禄不入私门”。意思是：他领取朝廷给他的俸禄时，也总是根据自己实际的理政天数来计算；多余的部分，上交国库，而不是据为己有。所以，他虽然为官多年，家中并不富足。

延熹三年（160年），杨秉曾在仕途上一度受挫。原因是：白马令李云由于进谏而获罪，杨秉站出来为他求情，结果受连累而被免去官职，放归故里，过了许久才被重新起用。其间，他竟穷得“并日而食”，也就是两天只能吃一天的饭。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旧洁身自好，决不接受他人馈赠。史书上记载着这么一件事：“任城故孝廉景虑赍钱百余万，就以饷秉，秉闭门距（拒）绝不受。”意思是，任城一位名叫景虑的老孝廉，拿着100多万钱送到他家，他却紧紧地关闭了大门，决不接受。

杨秉被重新起用后，更加严于律己。他平时不饮酒，吃的也只是粗茶淡饭。尤其是在当时腐败之风盛行的情况下，许多官吏都妻妾成群，而他却“早年丧妻而不复娶”。诸如此类，都被人传为美谈。

后来，有人问及杨秉为官做人的成功秘诀，他总结说：他一生“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勇于反贪

杨秉在力求廉洁的同时，坚决反对任何贪污腐化行为。

延熹五年（162年）杨秉升迁为太尉。2年后，汉桓帝刘志南巡园陵，命他随从。这时，南阳太守张彪自恃与桓

帝有旧恩，乘机大发民财，中饱私囊。杨秉听说后，立即责令荆州刺史核查，并将有关情况上报公府。当桓帝驾临南阳，其随从左右竟公开卖官鬻爵。杨秉忍无可忍，又不顾一切地上疏谏诤，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顷者道路拜除，恩加竖隶，爵由货成，化由此败。"

当时，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担任益州刺史。他倚仗其兄为皇帝近臣，极受恩宠，肆无忌惮地侵吞公款，搜刮民财，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杨秉获悉后，立即上疏劾奏，致使侯参被押解进京。当槛车行至中途，侯参畏罪自杀。杨秉闻讯后，又面君奏道：侯参贪残元恶，自取灭亡；侯览与侯参有牵连，请将他免官遣归本郡。桓帝见杨秉铁证如山，态度坚决，也只好忍痛割爱，将侯览削职为民。

除恶务尽

杨秉一向嫉恶如仇。早在他官拜光禄大夫时，见大将军梁冀以外戚专秉朝政，胡作非为，便站出来与之斗争。梁冀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当时并没有处死他；相反，却对他采取了拉拢的策略，希望他也能变为自己的党羽。杨秉审时度势，从此称病不再上朝。直至梁冀罪恶败露而遭斩，才重新走出家门。

杨秉担任河南尹期间，当时的中常侍单超之弟单匡为济阴太守。单匡听说自己的贪赃枉法罪被人弹劾，又急又怕，连忙收买了一位名叫任方的刺客，命他暗杀有关人员。不料，任方竟被官府捕获，关进了洛阳大牢。单匡生怕杨秉穷究此事，又买通狱吏，安排任方越狱逃走。杨秉得知后大怒，立即奏请朝廷将单匡逮捕归案。可惜，朝中不少大臣惧怕单超权势，致使此事不了了之。

按照汉朝规定，宦官的子弟"不得居位秉执"。但当时宦官专权，他们的子弟以及他们所举荐的人遍布全国各级官府。这些人结党营私，气焰十分嚣张。杨秉不顾杀身之祸，一举揭发检举了不法的州牧郡守五十余人。结果，这些人有的被杀，有的被免，致使"天下莫不肃然"。

杨秉还继承了其父的家风，十分注重对子孙的培育。所以，许多年过后，他的儿子杨赐及杨赐的儿子杨彪，也都官至相位。他们继承祖父、父亲留下的"清白"遗产，一个个忠君爱民，勤政廉政，被朝野公认为"辅国以忠"。

【班勇】

东汉将领。字宜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超之子，生长于西域。和帝永元十三年（101），班超遣班勇随安息使者入朝。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叛乱，以班勇为军司马，出敦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元初六年（119），敦煌太守曹宗遣行长史索班率兵屯驻伊吾（今新疆哈密一带），北匈奴与车师后部（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共同攻杀索班；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告急于汉。和熹邓皇后召班勇到朝堂与公卿会议对策，班勇以为宜置护西域副校尉于敦煌，恢复敦煌营兵三百人，另遣西域长史率五百人屯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邓后从其议，但未及遣长史出屯。至延光二年（123），始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出屯。三年，班勇开导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一带）等国，使之降附。随后班勇又发兵到车师前部（今新

疆吐鲁番一带)，击走北匈奴，并屯田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附近)。四年，班勇大破车师后部，斩其王军就，以报索班之耻。顺帝永建元年（126)，班勇发诸国兵出击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远逃，车师前后部由此得到安定。二年，班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共讨焉耆，约定同时到达的日期，张朗想独自邀功，先期赶到焉耆，焉耆降。班勇反以后期获罪，被征下狱，免官，后卒于家。东汉时，西域三通三绝，至班勇以长史重平西域，自此遂不复绝。勇在安帝末撰述西域事甚详，《后汉书·西域传》凡延光四年以前事皆勇所记。

【张禹】

少通经术

张禹（？~前5)，字子文，是河内轵地（今河南济源南）人。

到了张禹父亲这一代时，他们全家搬到了莲勺。张禹小的时候，经常跟着家人到集市上去，喜欢站在算命先生面前，看他们占卜。时间一长，他也稍稍懂了一点卜卦，别人算命时，他也常常站在旁边插话。算命先生很喜欢他，同时也为他的面相所惊奇，就对张禹的父亲说："这个小孩很聪明，可以让他学习经书，"张禹成年后，来到长安学习，他师从沛郡的施仇，学习《易》，还跟琅邪的王阳、胶东的庸生学习《论语》。学成之后，门下的弟子很多，被推举为郡文学。甘露年间，诸儒举荐张禹，皇帝令太子太傅萧望之考察张禹。张禹就《易》和《论语》的主要内容进行答辩，萧望之很满意，上奏皇帝，说张禹精通经学，并曾经过老师的系统传授，可以试用。但是，萧望之的奏书被扣住没有发，张禹便回乡担任原职。很久以后，张禹试作博士。

为帝师作丞相

初元年间，立皇太子，博士郑宽中教太子学习《尚书》，他举荐张禹，说张禹对《论语》很有研究。皇帝下诏让张禹教太子学习《论语》。由此，张禹升任光禄大夫。几年以后，出任东平内史。汉元帝去世后，汉成帝即位，征召张禹和郑宽中，因他们二人曾作过皇帝的老师，皇帝赐封他们为关内侯。郑宽中食邑八百户，张禹六百户，并拜他们二人为诸吏光禄大夫，俸禄二千石，任给事中，负责尚书事务，当时，皇帝的舅父阳平侯王凤任大将军，他辅佐朝政，独揽大权，皇帝因年轻而十分谦让，他正学习经学，并非常敬重自己的老师。这时，张禹和王凤共同掌管尚书事务，张禹总感到有些不安，他就多次上书称病，请求辞职，实际是想逃避王凤。皇帝却回复："我幼年执政，总是十分谨慎地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您是以道德为师的人，所以我把国家的大权委托给您。您为什么心存疑虑，多次请求辞职，为什么忽略、忘记了我们往日的师生友谊，而想躲避流言蜚语？我没听到过有关你的任何谣言。您就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主持国家事务。您要勤勉不懈地干下去，不要违背我的意愿。"皇帝增赐给张禹黄金一百斤，牛和上等好酒若干，并派自己的厨师去给张禹做饭，派御医给张禹看病，还派使者前去问候。张禹诚惶诚恐，又出来干事。河平四年，张禹代王商出任丞相，被封为安昌侯。

张禹当了六年丞相以后，在鸿嘉元年，他以年老体弱为由，请求辞职。皇

帝以优厚的待遇再三挽留，仍不能留住，于是，就同意了他的请求。皇帝赐给张禹安车驷马，黄金一百斤，让他仍然居住在京城，以列侯的身份在每月初一和十五这两天朝谒，赐位特进，仍以丞相之礼待他，并派了五名从事史侍奉张禹，增加四百户封邑。皇帝多次赏赐张禹，前后共计几千万钱。

奢侈甚善自处

张禹为为谨慎、忠厚，很善于理财，在家时，以种田为业。张禹富贵以后，购买田地多达四百顷，都是经过泾水、渭水灌溉的极其肥沃的上等土地。其他的产业也与此相当。张禹精通音乐，在家中穷奢极欲，他住在大宅深院中，后堂中丝竹管弦之声不绝。

张禹门下最有成就的弟子是淮阳的彭宣和沛郡的戴崇，彭宣官至大司空，戴崇官至少府九卿。彭宣对人恭敬而有节度。戴崇则平和、机智，这两个人的性情不相同。张禹内心喜欢戴崇，对彭宣则敬而远之。戴崇每次拜访张禹，都要求老师设酒宴、乐舞与弟子同乐。张禹把戴崇领列后堂喝酒、吃饭，席上有女子陪伴，有艺人弹琴奏乐，极尽欢娱，直到深夜才散。然而，彭宣来的时候，张禹在厢房接见他，和他一起讨论经义，天晚了，请彭宣吃饭，也不过只是一杯酒、一盘肉而已。彭宣从未到过张禹的后堂。彭宣和戴崇得知这些事以后，觉得各得其所。

张禹年迈之时为自己建造坟墓和庙堂，他看中了平陵的肥牛亭一带，这块地靠近汉成帝的延陵。张禹奏请皇上把这块地赐给他。皇上就把这块地赐给了他，并诏令将平陵原来的亭所迁往别处。曲阳侯王根听说此事后，进谏相争道：“这块地正是平陵昭帝寝庙衣冠出游时的必经之地，张禹身为天子师傅，却不懂得谦让，竟然要把它据为己有，还要毁坏原来的亭所，这就更加不妥当。孔子说：‘子贡，你吝惜那只羊，我则喜爱遵守礼义。’应该给张禹别处的土地。”王根虽然是皇上的舅父，但皇上对他不如对张禹敬重。王根的这些话虽然很中肯，但皇上并不听从，最后还是把肥牛亭之地赐给了张禹。从此，王根忌恨张禹得宠，多次诋毁、攻击他。皇上却更加敬重、厚待张禹。张禹每次生病，皇上都要询问他的起居、饮食情况，并且亲自去问候、看望张禹。皇上亲自拜在张禹的床边，张禹叩头感谢皇恩，并说出心里的想法：“我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喜欢这个女儿超过喜欢儿子，可她远嫁张掖太守萧咸，我太想她了，希望能把他调到附近。”皇上立即调萧咸任弘农太守。张禹的小儿子没有出来作官，在皇上去看望张禹时，张禹几次日视这个小儿子，皇上当即就在张禹的床边，拜授张禹的小儿子为黄门郎，给事中。

张禹虽然呆在家中，但因为他是位在三公之下的特进，是天子的老师，所以，每当国家要作重大的决策时，都要请他参与商议。永始、元延年间，频繁地出现日蚀、地震、很多人上书谈论应付灾难的对策，书中都谴责王氏，说是由于王氏家族的专权招致了灾变。灾变多次出现，皇上很害怕，心里也认为人们的看法是对的，但又不能肯定，于是，乘车来到了张禹家中，命令左右的人们回避，亲自询问张禹有关天变的事情，并把人们谴责王氏的奏书拿给张禹看。张禹觉得自己年迈，子孙势单力薄，况

且自己又和曲阳侯不和，害怕得罪王氏，就对皇帝说："在春秋时期共二百四十二年的时间中，曾出现过三十多次日蚀，五次地震，有的是因为诸侯相互残杀，有的是因为夷狄侵犯中原所致，灾变的原因深远莫测，所以圣人很少谈论命运，也从不谈论鬼神。人性与自然规律，从子贡之辈起就再没有听说过，何况是这些浅薄的读书人所说的话呢！陛下您应该努力治理国家来好好应付灾变，与天下有福同亨，这是经义上的意思，初学小于胡说八道采迷惑人，您不要相信他们，您要以经术作标准未判断是非。"皇上一向相信、喜爱张禹，听了张禹的话后，从此不再怀疑王氏。后来曲阳侯王根和诸王子弟听到张禹所说的话后，都很高兴，就和张禹改善了关系。张禹看见天时出现变异以及皇上龙体欠安，就挑选吉日斋戒，并把占卜用的蓍草晾在星宿之下，张禹衣冠楚楚地站着占筮。如果得到的是吉卦，他就向皇上敬献此卦；如果是凶卦，张禹就会忧心忡忡。

汉成帝去世后，张禹继续侍奉汉哀帝。建平二年逝世，谥为节侯。张禹有四个儿子，长子张宏继承侯位，官至太常，位列九卿。他的三个弟弟都是校尉散骑诸曹。

当年，张禹作太傅时，因为皇帝不能经常向自己请教有关经义的问题，就写了《论语章句》，并将此书敬献皇上。起初，鲁扶卿、夏侯胜、王阳、萧望之和韦玄成都讲授过《论语》，篇目和次序都不太一样。张禹先随事王阳，后又师从庸生。博采众长，最后，张禹超过了他们，并且获得了功名。诸儒为此而说："想要研究《论语》，就去读张禹的文章。"从此，学者多从张氏之说，其余各家学派逐渐衰落。

【邓禹】

邓禹（2～58），字仲华，南阳郡新野县（今河南新野南）人。十三岁即能朗读《诗经》，到长安去读书。当时光武帝刘秀也在长安游学，邓禹年纪虽幼，但一见刘秀，便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便和他亲近。数年后，邓禹从长安回到家中。

到刘汉起兵，更始被拥立为皇帝，豪杰多推荐邓禹，邓禹不肯跟随更始。当他听说光武屯兵河北即携杖北渡黄河，在邯郸城追上了光武。光武见到他十分高兴，对他说："我对您得有专门的委任，您远地而来，肯出仕吗?"邓禹说："不愿意。"光武说："既然是这样，您来做什么?"邓禹说："只希望您的威望仁德普盖天下，我能够尽尺寸之力，留功名于史册罢了。"光武笑，便留邓禹同住私语。邓禹对光武说："更始虽然建都在关西，但山东一带现在还未安定，赤眉军、青犊军的部属，常常可以万计，在三辅地区自立名号的势力，往往成群结聚。更始既然还没有受到挫折，也就贪图安逸享受，不亲自掌握情况，作出决断，他的各位将领都是庸人崛起，他们的希望在于掠夺钱财，争相使用威力，日夜作乐而已，并没有忠良明智，深谋远虑，想尊崇君主安定百生的人。全国分崩离析的形势已经可以见到。您虽然有辅佐的功绩，恐怕还是没有什么成就。当今的考虑，不如招揽英雄，致力于取悦民心，建立高祖那样的事业，拯救百姓的性命。凭你的智慧思考天下，天下

之大不足供你平定。”光武很高兴，便让身边的人称邓禹叫邓将军。时常召邓禹人内同住，和他一起商定计划。

等到王郎起兵，光武从蓟来到信都，派邓禹征发奔命兵，得数千人。光武帝命令邓禹亲自率领他们，分路攻取乐阳县。邓禹随光武到广阿县，光武住在城楼上，他找开地图，指示邓禹说：“天下郡国如此之多，现在才得到其中的一个县城。您从前说由我来思考天下，天下不足为我平定，根据是什么呢?”邓禹说：“现在国内混乱，百姓希望有圣明的君主，正像婴儿依恋慈母。古时那些成就大业的人，在于他仁德的厚薄，不是凭地盘的大小。”光武十分高兴。当时光武任命派遣将领，多半都向邓禹谘询，邓禹每次举荐的人，都有适当的才学，光武认为邓禹知人善任。光武又派他单独率领骑兵，与盖延等人在清阳县进击铜马军。盖延等人先到，作战不利回军保护城池，被铜马军包围。邓禹便进军与铜马交战，打败铜马，俘虏了铜马军的大将。然后随从光武帝追铜马军至蒲阳，连连胜利，俘获甚多，北州便大致平定了。

等到赤眉军向西进入武关、陆浑关，更始派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及许多将领，分别据守河东、弦农以抵抗赤眉，赤眉军大军汇集，王匡等人无法抵挡。光武料想赤眉一定要攻下长安，于是想乘赤眉、更始交战的空子兼并关中，而自己正有事于山东，收取关中的事不知该托付给谁。因为邓禹深沉有大度，所以交给他向西讨伐的计划。便授邓禹为前将军，携带节符，光武又将自己部下的二万精兵分一半给邓禹，派他向西进入武关，又让邓禹自己挑选偏裨将领以下可以一起入关作战的人。于是用韩歆为军师，李文、李青、程虑为祭酒，冯愔为积弩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邓寻为建威将军，耿䜣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率军西进。

建武元年正月，邓禹从箕关将要进人河乐，河东都尉把守箕关，不开关门。邓禹攻打十日，攻下了箕关，缴获辎重车一千多辆。接着进军包围安邑县城，攻打了几个月，不能攻下。更始大将军樊参率领几万人，越过大阳县，要进攻邓禹，邓禹派将领们在解县的南部迎战，大败樊参的军队，斩了樊参的头，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兵十余万，再次共同攻打邓禹。邓禹军作战不利，樊崇战死。适逢天已黑了，双方罢战。军师韩歆和将领们见兵力已经衰败，都劝邓禹乘黑夜撤兵离去，邓禹不听。第二天是癸女日，王匡等人认为癸亥是六甲中最后一天，不宜出兵，因此没有发动进攻，而邓禹则乘此机会整顿部队，约束兵士。第二天一早，王匡全军出动攻击邓禹，邓禹命令军中不要随便动作，到王匡军已到达军营门前，这才传令将领们擂鼓助威一起前进，大败王匡军。王匡等人都丢下部队逃走，邓禹率领轻快骑兵紧急追击，活捉了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强，把他们都杀了。缴获了节符六件，印绶五百，兵器就无法算清了，于是平定了河东郡。邓禹秉承光武的旨意任命李文为河东太守，换离所属的全部县令、县长，以此来镇守河东。这月，光武在鄗地即皇帝位，派使者携带节符任命邓禹为大司徒。诏书说：“诏令前将军邓禹：深厚真挚，既忠且孝，与朕谋划于军帐之中，决胜于

千里之外。孔子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学生日益亲爱。’杀敌将，败敌军，平定山西，功绩尤其显著。百姓不亲信，五品不规范，你作为司徒，应该谨慎地实行五常的教育，而五教的要义则在于仁爱。现在派奉车都尉授予印绶，封您为鄼侯，食邑一万户。慎重你的职事啊！”邓禹这年二十四岁。

邓禹于是率领部队渡过汾阴河，进入夏阳。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率领他的部众十万，与左冯翊兵共同在衙县阻挡邓禹，邓禹又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落荒而逃。而同时赤眉军也进入了长安。此时，更始的军队在三辅地区连遭失败，赤眉军所到之处都肆行杀戮，百姓不知道应该躲到什么地方去。听说邓禹独能乘胜克敌，行军有纪律而不残暴，于是百姓都互相提携背负望风迎接邓禹的军队，投降的人每日以千数，邓军号称百万。邓禹到了宿营的地方便停下车来，放好节符，慰劳前来的百姓，垂髫儿童，白发父老，挤满在他的车下，无不感动欢喜的。于是邓禹的名字震动关西，光武赞许他，多次写信赞美他。

将领和豪杰都劝邓禹直接进攻长安。邓禹说：“不对。我们现在虽然兵士众多，而能够作战的少，前面没有可以依仗的积蓄，后面没有人转运物资。赤眉军新近攻下长安，财富充实，锋锐不可以抵挡。不过，一群盗贼聚在一起，没有过日子的计划，尽管钱币和粮食很多，但总有意外的变故发生，哪里是能坚守一城一池的人呢！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地广大，人口稀少，粮食多，牲畜也多，我们暂时在北地休兵，用当地粮食给养军队，这样来等待赤眉的弊病暴露，如此长安便可以攻取了。”于是，率军向北到栒邑。邓禹所到之处，攻下赤眉军的配合部队一些将领的营塞，郡邑都打开城门归附。西河太守宗育派他的儿子捧着文书投降，邓禹派他前往京城。

光武帝因为关中没有平定，而邓禹又久不进兵，下令说：“司徒，是尧；亡贼，是桀。长安的官吏百姓，心神不安，没有依附，应当及时进军讨伐，镇守西京，安定百姓的心。”邓禹还是坚持从前的意见，便分派将军另外攻打上郡县各县，又征集兵员，收屯粮食，回到大要县。派冯愔、宗歆镇守栒邑。二人为争夺权柄而反目成仇，冯愔便杀了宗歆，乘势回头攻打邓禹。邓禹派使者报告光武。光武帝问使者说：“冯愔所亲爱的人是谁？”回答说：“是护军黄防。”光武料想冯愔、黄防不能长久地和平相处，早晚必会产生矛盾，于是告诉邓禹说：“捉拿冯愔的人必定是黄防了。”便派尚书宗广持节符去收降黄防。此后一个多月，黄防果然捉拿冯愔，率领他的部属来认罪，更始的将领王匡、胡殷等都前来向宗广投降，宗广和他们一道东归洛阳。到安邑。王匡等人想要逃跑，宗广将他们全杀了。冯愔到洛阳，光武宽恕，没有杀他。

建武二年春，光武派使者改封邓禹为梁侯，食邑是四个县。当时赤眉军向西逃往扶风，邓禹便向南到长安，驻军昆明池，大宴兵士。领着将领斋戒，选择吉利的日子，准备礼物祭拜高祖庙，收集十一位帝王牌位，派使者送往洛阳，接着巡视帝王园陵，派出官吏士卒在那儿守护。

邓禹率兵与延岑在蓝田交战，不能取胜，于是又转到云阳调整队伍，补充

粮草。汉中王刘嘉来投降邓禹，刘嘉的助手李宝傲慢无礼，邓禹将他杀了。李宝的弟弟收集李宝的军队攻打邓禹，杀掉邓禹的将军耿䜣。自从冯愔反叛之后，邓禹的威望稍有降低，又缺乏粮食，已经归附的人也离散而去。而赤眉军又返回长安，邓禹同赤眉交战，战败，逃走至高陵，军士饥饿，都吃枣子、野菜。光武帝于是召邓禹还军，命令说："赤眉没有粮食，自然会向东回军，我用折断的马鞭就可以打击他们，战胜赤眉不是将领们所忧虑的。不必再随便进兵。"邓禹惭愧于身受大任而功不成，多次用饥饿的士卒挑战，总是受到挫折。建武三年春，邓禹与车骑将军邓弘共同攻打赤眉军，都被赤眉打败，兵士或死或散。此事记载在《冯异传》中，邓禹只与二十四骑还归宜阳。邓禹谢罪，奉上大司徒和梁侯的印绶。光武帝诏令归还邓禹梁侯印绶。数月后，授任右将军。

延岑自东阳失败以后，便与秦丰汇合。建武四年春，又侵犯顺阳一带。光武派邓禹统率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在邓县打败延岑，追到武当，再一次将他打败。延岑逃向汉中，其兵众全都投降。

建武十三年，天下平定，所有功臣都扩大食邑，最后封邓禹为高密侯，食邑包括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光武帝认为邓禹功高，封他的弟弟邓宽为明亲侯。他的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官职都被罢免，凭特进的身份参加朝会。邓禹接纳文明，行为淳厚，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天下已定，常常要远离名位权势。他有儿子十三人，让他们各自掌握一门学问。修整门户，教养子孙，此都可以为后世效法。他的资用取自食邑，从不积累财产，光武帝更加器重他。中元元年，再度行使司徒职责，随从光武到东方视察，祭拜泰山。

显宗即皇帝位，因邓禹是先帝时代的大功臣，封他为太傅，朝见时面向东面，很被尊崇。过了一年多，卧病，显宗多次亲自前往慰问。朝廷用他的两个儿子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逝世，谥号元侯。

评论说：在变化的年代，君择臣，臣择君这特别是成就事业谋划开始的关键。邓公提着粮食，徒步而行，冒着纷乱的世态而奔赴光武，可算是知道他所要跟从聚会的人了。于是光武分部下的精兵一半给他，让他去面对山西的空隙，以致使得河山响动，怀想而来依附的人就像回归自己的家里一样。他的功业虽然没有成就，而他的道义也就张扬广大了。到他在栒邑降低了威望，在宜阳死散了士卒，一日之间夺了他的龙文朝衣，而长年在远离京都之地，尊荣与穷困交替，他依然面无二色；无论擢拔与退位，主上对他都没有猜疑。君臣之间如此美好的关系，使得后代没有谁能达到这种地步，不也是君子的韵致吗？

【杨震】

杨震（？～124）字伯起，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八世祖扬喜，在汉高祖刘邦时立过功，被封为赤泉侯。高祖杨敞，昭帝时任丞相，被封为安平侯。父亲杨宝，研习《欧阳尚书》。哀帝、平帝时，隐居教书。居摄二年，朝廷征召他和龚胜、龚舍、蒋诩一块儿去作官，他就逃到人们找不到的地方躲起来。光武帝刘秀说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建

武年间，朝廷特派公车来征召他，因为年老多病，没有去。后来死在家里。

杨震小时候很好学，拜太常桓郁为老师，学习《欧阳尚书》。他精通古代经典，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因此，许多学者称他是："关西的孔子杨伯起？"杨震有很长时间客居湖城县，几十年间，不接受州郡延聘之礼和职务的任命。许多人说杨震未老先衰，不求进取，他却更加坚定不移。后来有几只冠雀叼着三条鳝鱼，飞集到讲堂前面。都讲取过鳝鱼献给杨杨震说："蛇鳝，是卿大夫衣服上的图像。数量是三，应的是三公之数。先生从此要高升了。"这一年扬震五十岁，开始在州郡里作官。

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是一位贤士，就召他来，推荐他为茂才。经过四次提升，做了荆州刺史，又调任东莱太守。杨震到东莱郡上任时，途经昌邑县，以前他保举的荆州茂才王密在这里做县令。王密得知自己的恩师路过这里，就前来拜见杨震。夜间无人的时候，他从怀中掏出十斤黄金献给杨震。杨震对王密说："作为老朋友，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这是为什么？"王密说："夜深人静，是没有人知道的。"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听了杨震的话，王密非常惭愧地退了出去。后来杨震调到涿郡任太守，公正廉洁，不接受私人的拜访请托。子孙经常吃简单素淡的饭菜，出门步行，不坐车子。一些老朋友和长辈劝他给子孙置办产业，杨震不肯。他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为清宫的子孙，把这份家产留给子孙，不是很丰厚吗？"

元初四年，朝廷征召杨震任太仆，后又升为太常，以往选举博士，大多不靠真才实学。杨震举荐精通经典的名士陈留、杨伦等为博士，为传播发展学术作出贡献，受到学者的称赞。

永宁元年，杨震接替刘恺任司徒。第二年，邓太后去世，宫廷内受到皇帝宠幸的人开始依势横行。安帝的乳母王圣，因为哺养安帝辛勤尽力，自以为对皇帝有恩，就放肆无忌。王圣的女儿伯荣，随意出入宫廷，串通奸邪，收受贿赂。杨震给皇帝上疏说："臣听说国家政治最根本的是任用贤能的人，治理国家一定要斥退污秽之徒。过去唐尧虞舜时代，重用德高望重的贤者，流放了四个坏人，受到天下人的拥护，出现太平盛世。现在陛下您还没有完全具备作君主的九种道德，宫廷内部还充斥着受到陛下宠爱的小人。王圣出身卑贱，她赶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作了陛下的乳母。虽然她付出不少辛劳，但陛下对她的多次赏赐，已经远远超过她所应得的报答。可是她贪得无厌之心却没有止境。与外面的人相勾结，扰乱天下，给朝廷丢丑，往陛下脸上抹黑。《尚书》、《诗经》都告诫我们要警惕女人干预朝政。过去郑庄公迁就母亲的意愿，骄纵自己的弟弟，差一点给国家造成危难，后来才加以讨伐。《春秋》批评郑庄公，说他这是失教。女人和小人，亲近她（他）们，她（他）们就高兴，疏远她（他）们，她（他）们就怨恨，实在是难以教养。《易经》说：'无攸遂，在中馈。'说的是妇人不能参与政事。陛下应该迅速让乳母到宫廷外面去居住，断绝她和伯荣的来往，使她既有恩，又有德，这样对上对下都好。希望陛下断绝缠绵的私情，留心各种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谨慎地封官拜爵，减少宫内侍奉人员，减少徭役

和赋敛，使民间没有《诗经·鹤鸣》那样的叹息，使朝廷上下没有《诗经·小明》那样的悔恨，使老百姓不至发出《诗经·大东》、《诗经·小劳》那样哀怨的声音。处处向古代圣明君主学习，难道不是很美的事吗?”安帝接到杨震奏疏以后，便拿给王圣等人看，那些受到皇帝宠爱的人心里都非常仇恨他。尤其是伯荣，更加骄淫。她与已故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瑰相勾结，刘瑰于是娶她为妻，然后承袭了刘护的爵位，官位升至侍中。杨震对此极为痛恨，就又给皇帝上疏说：“臣听说高祖与群臣曾经有一个约定，不是功臣不能封地。古来的制度是父亲死了儿子继承爵位，哥哥死了弟弟继承爵位，为的是防止篡夺权位。臣见到诏书封已故朝阳侯刘护远房兄弟刘瑰承袭刘护的爵位为朝阳侯。刘护的亲弟弟刘威现在还活着。臣听说，天子有权授封，但要封给有功劳的人；诸侯有权授爵，但要授给有德的人。现在，刘瑰什么功劳也没有，也未见有什么特别的品行，只是因为他娶了王圣的女儿为妻，不仅立即作了侍中，而且还封了侯。这既没遵循既定的制度，也不符合古代经典的道理。路上的行人议论纷纷，老百姓惶恐不安。陛下应当回顾检讨一下以往做过的事情，今后按皇帝为政的规则去处理朝政。”奏疏呈上以后，皇帝不予理睬。

延光二年，杨震接替刘恺为太尉。国舅大鸿胪耿宝向杨震推荐中常侍李闰的哥哥来做官，杨震没有答应，耿宝于是亲自去看望杨震，告诉他说：“国家很器重李常·侍，皇帝想让你征举他的哥哥来做官，我只不过是传达一下皇帝的旨意罢了。”杨震说：“如果朝廷想让三府征举他宋做官，按规矩应该有尚书的批示。”于是拒绝耿宝的要求。耿宝未能如愿，怀着极大的怨恨离去。皇后的哥哥阎显任执金吾之职，他也向杨震推荐一位亲戚朋友做官，杨震又没有答应。司空刘绶听说以后，马上征举这两个人，十来天的工夫就都被提拔。由此，杨震越发受到一部分人的怨恨。

这时，皇帝诏令使者为王圣大修宅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人，进一步进行煽动。一时间朝廷里尽人皆知。杨震又上疏说：“臣听说古代的时候，种九年地，一定要储备三年的粮食。因此，尧的时候遭遇洪水，人民却没有饥饿的样子。臣考虑现在正闹灾害，而且不断扩大，老百姓没有积蓄，不能自已养活自己。加上闹虫灾，北方羌族侵犯掠夺，三边不断告急，战斗仍在继续，武器、盔甲和军粮供应不上，而大司农的府库已经空虚，恐怕这不是国家安宁的时候。臣见到诏书，说是要在津城门内，为乳母王圣修建规模宏大，而又装饰豪华的宅第。现在正是盛夏，草木庄稼生长繁茂，却要开山采石，大匠、左校、别部将作合计数十处，互相影响，耗资上亿。周广和谢恽兄弟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却依靠得宠的奸佞小人，与樊丰、王永等一起滥用权力，大摆威风，勾结州郡，排挤大臣。他们手握用人大权，逢迎意旨，从各地网罗招来贪婪而卑鄙的人，接受他们贿赂的钱财，甚至还有应该囚禁或处死的罪犯又被他们重用。黑白颠倒，清浊不分。天下人议论纷纷，都说老百姓的金钱被朝廷聚敛去了。老百姓对朝廷的不满，就是他们造成的。臣听老师说：‘国家从下面收取钱财，征发徭役，要有限度。如果老百

姓的钱财都被拿走了，他们就会产生怨恨；如果老百姓的力气都被用尽了，他们就会反叛。’心怀不满的人和反叛的人是不会再听从朝廷使用的。所以《论语》说：‘如果老百姓贫困，国君又怎么能富足呢？’希望陛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樊平、谢恽等人见杨震连续几次恳切地进谏，安帝都没有听从，觉得没什么可担心顾忌的了，便伪造了一份诏书，调发大司农的资金、粮食、木材和工匠各自修建自己的宅第、园池及其他建筑，花费了无数的钱财。

杨震借着不久以前曾经发生地震灾异，又上疏说：“臣蒙受陛下的恩泽，身居太尉之职，没有能够治理好国家，调和好阴阳，以至去年十月四日，京城发生地震。臣听老师说：‘地为阴，应该安静地承载阳。’而现在动摇的原因，是阴道太盛的缘故。地震那天是戊辰日，天干之戊，地支之辰，再加上地震，三者都属于土，位于中宫。这是陛下宫内近侍之臣的势力超过执掌国家大权的大臣的天象。

我希望陛下考虑到边疆上还不安宁，带头减省费用，若宫里的房屋墙壁有倾斜的话，先用柱子支一下，不要兴建新的建筑物，让国内的人都知道陛下政治和教化的清明，能使汉王朝的功业兴旺发达。然而陛下身边的近侍宠臣，不与陛下同心协力。他们骄奢无度，违法乱纪，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大修宅第，作威作福。大家有目共睹，路上的行人都议论纷纷。再加上去冬没有大雪，今年春天又没有下雨，大臣们都为此焦虑不安，可是朝廷不断地大兴土木，这实在是招致大旱的征兆。《尚书》说：‘君臣应该有所区别，大臣不能作威作福，享受美食。’希望陛下能振奋阳刚之气，斥退那些骄奢的大臣，堵住那些说朝廷坏话人的嘴，听从上天给陛下告诫，不要让应该属于陛下的威严和福分长期被下面的大臣使用、享受。”

杨震前后几次所上的奏疏，指陈的言辞越来越恳切，越来越尖锐，安帝已经开始对杨震产生反感。而樊丰等一帮人对杨震早已怀恨在心，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当代著名的大学者，没敢对他加以迫害。不久有一个叫赵腾的河间男子，到宫门呈上一封书信，陈述指责朝廷的过失。安帝发怒，指示抓起来审问，硬扣上一个“罔上无道”的罪名。杨震又上疏搭救赵腾，说：“臣听说尧舜时代，在朝廷门口悬挂着供进谏时击的鼓，树立着用采批评朝政的诽谤木。商周时代圣哲的君王，听到老百姓不满的怨言，反过来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这样来使自己耳聪目明，让人们畅所欲言，广泛地听到来自普通民众的意见，充分了解下层的真实情况。现在赵腾犯的是激烈指责朝廷的诽谤罪，这与持刀杀人是不同的。请求陛下减轻他的罪过，保全他的性命，以此来引导下层百姓讲话。”安帝仍不省悟，竟然将赵腾当众处死。

延光三年，赶上安帝到东方巡视泰山，樊丰等人借安帝出巡在外的机会，比着修私人宅第。杨震的部下高舒把大匠令史叫来进行调查核实，得到樊丰等人伪造的诏书，于是准备好奏疏，等安帝回来以后呈奏。樊丰等听说这件事以后又惊又怕。正巧这时太史说‘天上的星宿有逆行现象’于是一块诬告杨震，说：“自从赵腾被处死以后，杨震对陛下极为不满。况且他又是邓骘所举荐的，一直对陛下怀有愤恨之心。”等到安帝

回到京城，先住在太学，等候吉利的时刻进宫。那天夜里使派人收回杨震的太尉印信。杨震从此闭门不与外界来往。樊丰等人还是忌恨不已，就请大将军耿宝奏告安帝，说杨震作为大臣，对皇帝罢免他的太尉官职不服罪，怀恨在心。安帝便下诏书把杨震驱逐出京都，让他回自己的家乡。杨震走到城西的几阳亭时，慷慨悲叹地对他的几个儿子和门生说："死，对于士大夫来说是本分。我蒙皇帝的恩泽，身为朝廷重臣，疾恨奸臣坏人，却不能除掉他们，厌恶受宠幸的女人扰乱国家，却无法禁止，我还有什么脸面在世上活着！我死后只要一口杂木棺材，盖一个单被，只要够盖住身体就行了，不要归葬祖坟，不要搞什么祭祀活动。"然后服毒自杀，死时七十多岁。弘农太守移良秉承樊丰等人的旨意，派人在陕县扣留了杨震的灵柩，就那么露天放在大道的旁边。贬杨震的几个儿子作驿站的小职员。路上的行人都为此落泪。

一年多以后，汉顺帝即位，樊丰、周广等人被杀。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到宫门前为杨震申诉，朝廷的大臣也都称赞扬震对国家忠心耿耿。于是，顺帝下诏书提拔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赠钱一百万，按照礼节将扬震改葬在华阴潼亭。远近的人都来参加杨震的葬礼。在葬礼举行前十几天，有一只高一丈多的大鸟飞来停在杨震的灵柩之前，身体一起一伏地悲叫，眼泪把地都沾湿了，葬礼结束以后才飞走。郡守将情况报告给朝廷。当时正连续发生灾异，顺帝感到确实冤枉了杨震，于是下了一道诏书，说："已故太尉杨震，为官正直，辅助朝政，匡正时弊，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奸佞小人却像苍蝇玷污东西一样，颠倒黑白、混淆善恶，对他进行诬蔑陷害。上天发怒，屡降灾害，卜筮的结果，都是因为冤枉了太尉杨震的缘故，我的道德品行不够高，还在继续这种错误。杨太尉之死，对汉王朝来说，如同山岳崩塌，栋梁折断，损失重大。现在派太守丞用中牢之礼来祭礼他，杨太尉若在天有灵，望能享用。"当时的人用石头雕造了一座鸟像，立在墓前。

杨震被诬陷的时候，他的部下高舒也被判罪，仅免于死罪，到杨震事件平反照雪以后，高舒被拜为侍御史，后来官至荆州刺史。

杨震有五个儿子，大儿子杨牧作过富波县相。

评论说：孔子讲："遇到危险而不能帮助，要摔倒而不去搀扶，那么瞎子还要助手干什么呢？"果真要是作了辅助天子的宰相，是不能徒有虚名的。身居崇高的职位，责任重大，思虑深远。从延熹到光和年间，杨震任宰相，在权贵和歪风邪气面前刚直方正，凡事都将公道摆在自己身名的前面，可以称得上是具有王臣的节操，知道所任官职的责任规矩啊。于是连续几代德高望重，相继担任宰相，确实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呀。前代的韦贤、平当和杨震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了。

【诸葛亮】

"管乐"之才　待时而动

提起诸葛亮，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诗句），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智慧的化身，

人们景仰和崇敬他。诸葛亮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影响，这和历代统治阶级对他的推崇，小说戏剧对他的描绘和渲染是分不开的。然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和小说戏剧中塑造的诸葛亮并不完全相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又是怎样一位人物呢？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郡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人。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出生在一个门第不高的官僚地主家庭里。其父诸葛珪曾做过泰山郡丞，叔父诸葛玄和当时的豪强贵族袁术、刘表等都有往来。诸葛亮兄弟三人，哥哥诸葛瑾，弟弟诸葛均，此外还有两位姐姐。由于父亲很早去世，诸葛亮和他的兄弟、姐姐都依靠叔父诸葛玄过活。

诸葛亮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在他出生的第四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继之而来的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壮大起来的豪强地主武装之间为争夺地盘的厮杀、混战。琅琊郡属于徐州，是豪强们心目中的一块肥肉，陶谦、吕布、曹操都曾先后占据和抢夺过这块地方。徐州战乱不止，使诸葛玄一家再难安身下去。为了逃避战乱，诸葛玄带领家人，离开家乡，先投奔袁术，后又投奔荆州刘表，最后在襄阳住了下来。



诸葛亮像

诸葛亮17岁那年，叔父诸葛玄去世。诸葛亮失去了依靠，就带着弟弟诸葛均在襄阳城西20里地的隆中村，置了一点田产，盖了几间草房，开始过着他20年后在《出师表》中所说的“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一面耕种、一面读书的隐居生活。

隆中的生活，一过就是10年。这10年，诸葛亮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尤其喜欢读《申子》和《韩非子》等法家著作。诸葛亮深为春秋、战时期法家人物治世用世的理论所折服，他知道，在这动乱的时世，法家的思想，包括其治国的经验、法术是最切合、最实用的。广泛地阅读、刻苦地钻研、学习，使他获得了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

这10年，也是诸葛亮拜师、交友、增长见识、学问的过程。那时候，荆州地区相对战乱较少，中原地区的学者名士纷纷避乱至此地。比诸葛亮年长的，有大名士庞德公、号称“水镜”先生的司马徽、沔南名士黄承彦（即后来诸葛亮的岳父）等，他们都成了诸葛亮的忘年之交。这些人思虑精密，学识渊博，见解卓绝，诸葛亮虚心向他们请教，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由于司马徽的介绍，诸葛亮又拜了一位称“酆公”的汝南灵山隐士酆玖为师。酆玖熟谙韬略，深通兵法，在诸葛亮“奉事惟谨”

的精神和行为的感动下，酆玖传授了他三部兵书，这对诸葛亮日后辅佐刘备带军打仗，无疑起着极大的帮助作用。

在交往的朋友当中，也有一些青年学者，其中有日后也成为刘备重要谋士的庞德公的侄儿庞统，颍川的徐庶、石广元，汝南的孟公威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评论天下大事，抒发自己的抱负。

在读书、学习，广交朋友之余，诸葛亮也未忘怀当时政治形势。隆中的10年，政治风云变幻无常，此时曹操官渡一战，打败袁绍而统一北方；孙权继父兄基业坐领江东，和当时曹操称霸中原；坐镇荆州的刘表是一个务虚名、尚空谈，不足与谋大事的人，为豪强所吞并只是迟早的事……群雄纷争的结果，必然会出现鼎立的局面。由于诸葛亮注意研究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应对的策略方针。当和朋友谈论起现实社会形势时，他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卓有识见，因之被司马徽称之为“识时务”的“俊杰”。

立志向学，因志而成学，学以致用，是诸葛亮所一贯恪守的治学思想。那么诸葛亮的志向是什么呢？从下面两个例子可以窥见他的理想和抱负。

据《魏略》记载，有一天诸葛亮和石广元、徐庶、孟公威三位好友一起交谈，诸葛亮从容地对他们说：“诸位要是做官的话，是可以做到郡守、刺史的职位的。”三人反问诸葛亮又如何，诸葛亮只是“笑而不言”。这“笑而不言”，就已经表明了诸葛亮胸存大志。

又据《三国志》本传载，诸葛亮在高卧隆中常以管仲、乐毅自比。他认为当世既无像管仲那样的贤相，也没有像



武侯祠右前方的石牌坊

乐毅那样的名将。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政治家，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强大的诸侯国。乐毅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名将，他扶持弱燕，统帅强兵，一举下齐国70余城，使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诸葛亮以管、乐自比，有以一身兼将相自许的意思。他身处乱世，决心像管仲、乐毅一样，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要干出一番惊人的功业，他志在扫除群雄，结束分裂。

治乱世必以才智，尽其才智又必依明主才能取成，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从”，说的就是要谨慎选择可以辅佐的“明主”的意思。那诸葛亮心目中的“明主”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未遇到刘备之前，我们可以说在诸葛亮此时的思想中还没有明确具体对象，但如果联系他周围朋友对当时豪强军阀评价的言论以及日后的《隆中对》、《论光武》等文章来看，诸葛亮对选择“明主”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诸葛亮从小就受封建正统观念的熏陶，在隆中十年间系统地学习经史子集，食君禄、报君恩的忠君报国思想更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当时最有势力的军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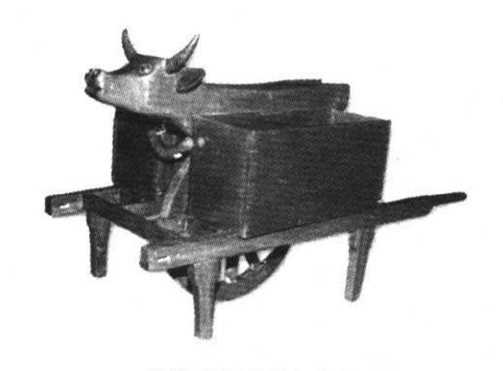
北方的曹操，此人雄才大略，影响很大，但在正统的观点看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却令人所不齿。庞统曾经跟诸葛亮谈起曹操，认为他虽是一个治世的能臣，却又是一个乱世的奸雄。像曹操这样的人，诸葛亮会认为他是“明主”而去投靠他、辅佐他，是不可能的。而实际上，在下文将要谈到的《隆中对》中，诸葛亮也是把消灭曹氏集团作为目标确定下来的。

刘表此人的行为品质，诸葛亮更是耳闻目睹，再熟悉不过了。连他的内亲黄承彦老先生都不愿出来帮助他，诸葛亮当然不会认为他是“明主”。

东吴的孙权呢？虽是位“招延俊服，聘求名士”的有作为的人物，但却野心勃勃想“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也是一位志存篡逆的野心家。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已赴江东辅佐他，而诸葛亮并没有尾随着到江东，应该说，孙权在诸葛亮的心目中，也不是一位能够为之赴汤蹈火的“明主”。

至于盘踞川蜀、以“①弱”著称的益州牧刘璋，更不值一提。

从诸葛亮撰的《论光武》一文中，我们更可以窥测到诸葛亮择主的准则。光武帝刘秀是东汉中兴之主。诸葛亮在文章中，对刘秀的“策虑深远”的作用极为欣赏，对光武君臣“谋合议同”，中兴汉室的事业极为向往。南阳郡是当年刘秀中兴的发祥地，历史能否重演呢？当今世界能否再出现如光武那样的“圣君”“明主”呢？这个问题只有等刘备出现在诸葛亮面前才能明白。



诸葛亮创制的木牛车

总而言之，隆中十年，是诸葛亮学习、增长才干的十年，也是他“待时”、“待主”的时期。这个未出茅庐的青年，正如庞德公送给他的雅号“卧龙”那样，一旦风云际会，就能腾云驾雾，大显身手，一展抱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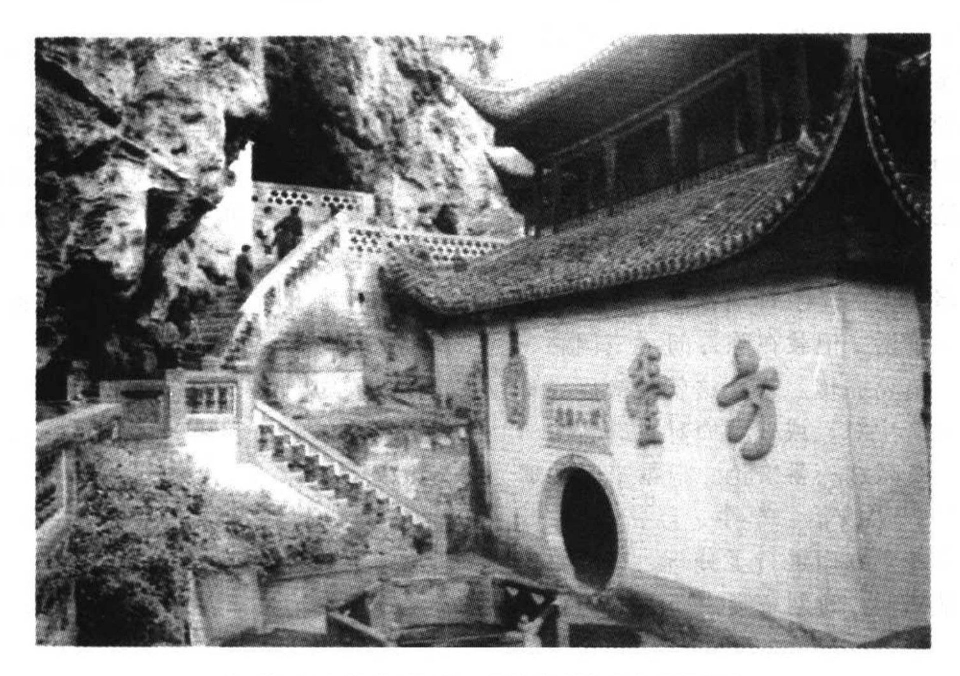
这个时机终于到来，“刘皇叔”刘备于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亲自前来隆中，拜访请教诸葛亮。

隆中之对 惊世骇俗

47岁的老将军刘备“三顾茅庐”到隆中拜访请教27岁的诸葛亮，这种真心实意虚心求教的精神着实使诸葛亮感动。刘备恳切深沉、坦露胸怀的一番话语，使诸葛亮看到了他志存复兴汉室、拨乱反正的忠肝热肠。于是诸葛亮就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地把他对早已了如指掌的天下大势的看法告诉了刘备。

他首先分析曹操和孙权：

“自从董桌入京作乱以来，各地豪杰蜂起，抢州夺郡、割据称雄的人多得数不清。经过一番较量之后，现在的局势已经比较明显，成功与失败者各自都有其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就拿曹操和袁绍相比来说，曹操名望既低，兵力又少，可他居然最后能战胜袁绍，由弱变强，这其中的道理何在？这就不仅仅是由于曹操占据有利的时势，更不是天命使然，而是由于曹操的主观努力，在于人的智谋所决定！现在曹操基本上已统



施秉阳河上游的瓮蓬洞，诸葛亮曾带兵在此歇过脚

一了北方，拥有百万大军，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处处假借汉帝的名义来对各地诸侯发号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暂时是很难同他较量、争强比胜的。

“北方的曹操是如此，南方的孙权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孙权占据江东，从他父亲孙坚，至其兄孙策到现在，已经历了三代。那里地势险要，百姓归附，加上还有一批有德行、本事的人辅佐他，他的力量绝不能低估。因此江东此地，不能希图占领。而要和曹操争夺天下，应该和孙权结成联盟，作为外援，而不能同他们为敌。”

分析完曹、孙两大集团的情况，接着诸葛亮又分析了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的情况：

“荆州这地方北依汉水，南达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冲，是一个用武的好去处。可惜现在的荆州之主是没有能力守住它的。这大概就是老天爷特意要留给将军的，将军您难道不想得到它吗？

“再看西边的益州。这也是一个地形地势相当险固之地。它幅员辽阔，有千里的肥沃土地，历来被人称为‘天府’之国。汉高祖就是凭借这块地盘取得天下、建立帝业的。然而，如今益州之主刘璋懦弱昏庸，统治无能，不注意安抚百姓。那里的有识之士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位英明之主去取代他。再加上北面汉中的张鲁时时刻刻都在窥伺着川蜀，威胁着益州。因此，益州的情形刚好和江东相反，是一个可取之地！”

谈到此处，诸葛亮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接着说：

“将军您是汉朝皇室的后裔，名声早就显播于天下，您要是能够占据荆、益二州，守住险要之地，西面和好诸戎族，南面安抚夷越各部落，对外结盟于孙权，对内则修明政治，一旦曹操内部发生变化，时机一到，您命令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城（今河南省南

阳市）、洛阳推进，将军您亲自统率益州大军出秦川（今陕西、甘肃省秦岭以北平原地带），到那时候，老百姓谁个会不但着饭食、盛着酒浆来迎接您呢？真能这样，那么统一天下的霸业就可以成功，汉朝的天下也可复兴了。”

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剖析天下形势的这一番话，记载在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隆中对》或《草庐对》的名文。

诸葛亮这一番宏论，根据当时的客观现实，从政治、军事、经济、地理、人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反复比较的基础上，为刘备提出一整套的战略方针。就实现最终的战略目标来说，就是为了达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也就是说，要使历史上再度出现“光武中兴”的局面。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占有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然后从荆、益两路出兵，构成钳形攻势，直扑两京（长安、洛阳），剿灭曹氏篡逆集团，达到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目标，但诸葛亮又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曹操集团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巨大的政治优势，暂时还不能与之正面争锋，也就是说，先不要打曹氏集团的主意，而把他搁一边。

对于江东的孙氏集团，诸葛亮提出“结好”，这是他预见天下必然会出现三分鼎立的形势而为刘备确立的一个重要策略方针。要消灭曹氏，联合孙权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策略手段。日后形势的发展，就显示了这个策略手段的巨大威力：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辉煌胜利。赤壁大战的胜利，是孙、刘两家联手抗曹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刘氏集团才有可能在荆州站稳脚跟，才有可能西进川蜀，打开蜀汉立国的壮丽局面。因此，可以说“联孙”的策略，事关蜀汉立国的根本，也是关系其盛衰存亡的基本国策。只要看看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兴兵伐吴惨遭失败等事实，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不仅如此，《隆中对》还为刘备占据荆、益以后，治荆、治益提出了一套具体的策略步骤，这就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和抚”民族政策和“内修政理”方针的提出。

“和抚”政策，是针对西南边地的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东汉末年，由于益州地区统治者暴虐残暴，特别是刘焉、刘璋父子治蜀以来，对少数民族采取横征暴敛以及征剿杀戮的残酷压迫，使得少数民族不得不起兵反抗。他们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之中，官兵来了，他们退山林，伺机出击。有时候还攻陷城池，给官府以沉重的打击。刘备要治蜀，就必须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否则内部不稳定，根据地不巩固，就谈不上向外拓展或出兵。诸葛亮把夺得荆、益与和戎抚夷一起提出来讨论，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内修政理”也是巩固内部、稳定内部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鉴于东汉末年朝政混乱、奸佞当道的沉痛教训，鉴于刘表、刘璋在荆、益统治期间的无能表现，刘备治荆、益，首先必须革除弊政，举贤授能，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隆中对》的提出，这一方面显示了诸葛亮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和政治魄力。

《隆中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27岁的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它为刘备提出了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以后刘备集团

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以后形势的发展变化，证明了诸葛亮对局势的分析，是非常符合客观现实的。

诸葛亮的精辟分析和建议，为刘备展示了光明的前景，使刘备由衷地产生敬意，司马徽和徐庶的举荐一点也没有错，诸葛亮确是了不起的一代人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好谋士、好军师。刘备诚恳地邀请诸葛亮出来辅佐自己，实现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计划，诸葛亮感激刘备的尊重和信任，慨然应允道："蒙将军不弃，我就为将军奔走效劳吧！"就这样，诸葛亮结束了十年隆中的"隐居"生活，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诸葛亮在隆中待时而动，"择主而从"，选来选去，偏偏选中了东逃西窜、寄人篱下、势单力薄的刘备，刘备难道真的是诸葛亮心目中的如刘秀那样的"中兴之主"？这情形虽然令人奇怪，但也不难理解。诸葛亮选中刘备为辅佐之主，主要原因不外有这几方面：

首先，刘备是汉室宗亲，他的奋斗目标就是兴复汉朝事业。而诸葛亮以"兴微继绝"，即兴复汉室为己任，这同刘备的目标是一致的，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士为知己者用（死）"。刘备"三顾茅庐"，一再屈尊下顾，向他虚心讨教，这使诸葛亮非常感动，他愿意为刘备这个"知己"效劳。20年后诸葛亮回顾这件事时，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再次，对刘备"宽仁有度"、"知人善任"、"折而不挠"的性格特点，诸葛亮也是有所了解的。诸葛亮认为，在刘备手下，他能够做到尊重和信任，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抱负，这也是在当时众多军阀之中，诸葛亮挑中刘备这个认为他是理想"明主"的原因之一。

诸葛亮来到刘备军中，深受刘备的器重，刘备把他当作良师益友来对待，朝夕相处，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不禁引起长期跟随刘备的关羽和张飞的不满，甚至在刘备面前发起牢骚来。刘备觉察之后，坦率而又严肃地对关、张说："诸葛孔明卓有识见，我有了他，就好像鱼儿有了水。今后你们不要再说长道短了。"这充分说明，刘备已经意识到诸葛亮对他的事业所起的作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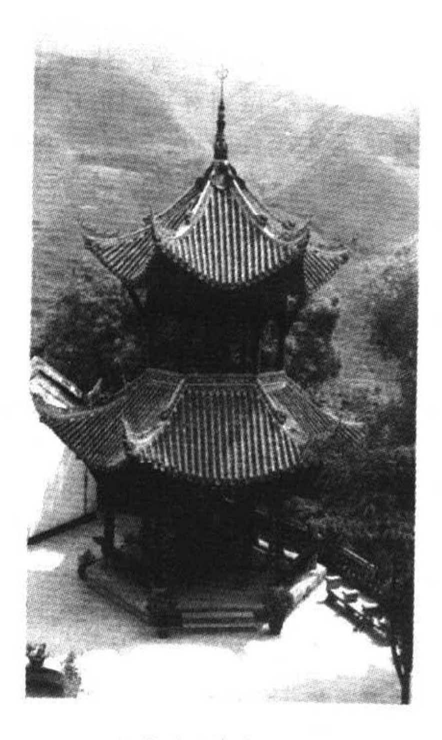
游说吴主　共同抗敌

诸葛亮出山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刘备扩大军队。当时刘备手下只有几千人马，这么少的武装力量肯定是难以抵御强敌的。诸葛亮建议把荆州一带没有户籍的游民加以选拔训练，刘备依照其办法去做，果然从中选拔了不少丁壮，使军队扩充到几万人。这支军队经诸葛亮加以训练，成为刘备开创基业的核心武装力量。

诸葛亮为刘备扩充实力，目的是相机夺取荆州，但是这些事情还来不及做，曹操的大军就压境了。

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天，曹操率军南征荆州。不久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任荆州牧，听说曹军到来，吓得不战而降。屯兵樊城的刘备，向江陵撤退时，在当阳长坂坡被曹军打得大败。刘备和诸葛亮等突围到夏口，接着又退到樊口。

在强敌曹操的进逼之下，孙权、刘



白帝城诸葛亮观星台

备双方都有联盟抗曹的愿望。孙权派鲁肃去见刘备，希望和刘备联盟。鲁肃跟着刘备退到樊口后，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情已经很紧急了，我愿亲自前往东吴，向孙将军求援。"刘备也感到形势紧迫，立即派遣诸葛亮随鲁肃去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见孙权。

孙权在柴桑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战火即将燃烧到自己身上，使他感到有同刘备联合的必要，但能否战胜曹操的进攻，他还缺乏信心，态度有些犹豫不决。

诸葛亮会见孙权后，针对孙权思想上的疑虑从分析天下大势着手，说：

"方今天下大乱，孙将军起兵占据了江东，刘将军也招募部队在汉南（汉水之南），和曹操争夺天下。现在曹操已经平定了河北，战胜了不少对手，又攻下荆州，威震四海。刘将军无力当其兵锋，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此播迁到此地。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情况。"

接着诸葛亮又故意反激孙权说：

"情况如此紧迫，我希望将军根据自己的力量，考虑相应的对策。如果能以江东之众与曹操抗衡，就应该趁早和他断绝关系，争取时间早定战、守之策；如果不能这样，为什么不投戈卸甲，向曹操投降呢？现在将军表面上服从曹操，而内心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在这紧急关头不能当机立断，恐怕大祸就要临头了。"

孙权听了，很是恼火，他万没想到诸葛亮会这么小看他，不禁生气地反唇相讥道："既然像您所说的那样，那么刘将军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

诸葛亮理直气壮地回答：

"汉初的田横，不过是齐地的一位壮士，他尚且能守义而不屈（注：田横为秦汉间田齐的宗族，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他不愿称臣，率领徒属五百余人，入居海岛；刘邦使人召请，他不从，最后自刎而死），何况刘将军是王室的后代！他的英雄才气，盖世无双，天下的士人都仰慕他，就像水归大海一样。若真的大事不成，那也只是天意，那能够屈辱投降曹操呢？"

这一来，孙权可真的是被激怒了，他再也忍耐不住，勃然变色地说："我也不能以江东之地和十万之众，受制于人，我决心抗击曹操了。"

孙权的话虽然说得很硬气，但他清楚自己一方的兵力，而刘备又刚刚在当阳吃了败仗，又有多大的能耐呢？他不禁又怀疑地对诸葛亮说："固然现在除了刘将军，没有人能够和我共同抵抗曹操。但刘将军战败之后，还能抵挡得住

曹操吗?”

针对孙权的怀疑，诸葛亮满怀信心、胸有成竹地向孙权具体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他说：

“刘将军虽然在长坂战败，但现在部下陆续归来的，以及关羽、刘琦率领的江夏之军，合共不下两万人。曹军兵力众多，但远道而来，长途跋涉，为了进行追击，一日一夜行军三百多里，早已疲惫不堪，像一支飞到尽头的箭，连穿透一层薄薄绸子的力量都没有了。况且北方人不习水战，更是曹军的一大弱点，还有，荆州的民众暂时归附曹操，那是迫于兵势，并非心服。”

最后，诸葛亮鼓励孙权说：

“现在孙将军您真能派出猛将，带领数万大军，和刘将军联合起来，同心协心作战，那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曹操兵败之后，必然向北方撤退。这样，荆州、江东不但都能安然保全，而且势力大大增强，那么天下鼎足而立局面就形成了。成败的关键，在于今日，孙将军您切不可坐失良机。”

诸葛亮的分析清楚透彻，说得孙权满心欢喜，愁眉顿展，增强了他战胜曹操的信心。但当时的孙权集团内部，主战派与主降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尤其是主降派的代表人物张昭，在曹军气势汹汹的威逼下，更是吓破了胆，力主不战而降，而当时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周瑜，他正奉命去鄱阳调集水军，不在柴桑，主降派的呼声更是甚嚣尘上，这种情形，使孙权感到无所适从。

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迅速从鄱阳召回周瑜。周瑜回来之后，力排众议，并信心十足地对孙权说：“请将军给我精兵数万，进屯夏口，我一定为将军击破曹操!”周瑜坚决抗曹的态度，感染了孙权，孙权下定决心迎击曹操。在召开江东文武大臣的会议上，他毅然抽出宝剑，砍掉奏案上的一角，斩钉截铁地说：“如敢再言迎降曹操者，与此案同!”

在此期间，由于鲁肃的引见，周瑜会见了诸葛亮。诸葛亮向周瑜提醒说：“孙将军虽然下了决心，恐怕还有反复，因为此处主张投降的势力还很大。依我之见，公瑾（周瑜字）还得再向孙将军说说，主要是把曹军兵马多寡的实际情况再说清楚明白，让孙将军放心。”

周瑜很重视诸葛亮的意见，当天夜晚即进见孙权说：“据诸葛先生了解，曹操所称 80 万水军完全是恫吓之词，实际兵马超不过 20 万，并且已是疲惫不堪，而荆州降兵，对曹操尚存狐疑之心。这样看来，曹军人数虽多，一点也不可怕。只要与刘备将军联合起来，打败曹操是没有问题的。”

周瑜一席话，更坚定了孙权抗击曹操的决心。就这样，孙、刘联合抗曹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孙、刘联盟的实现，是由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刘联盟的是双方与曹操争存亡的共同愿望。孙、吴联盟局面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鲁肃、周瑜的卓越识见。而诸葛亮在这关键时刻前往柴桑，向孙权反复陈说利害，促进了孙、刘联盟的实现、这对战争的结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出使柴桑、游说吴主这场活动中，诸葛亮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见卓识，也表现了他天才、出色的外交才能。

孙权和刘备结盟后，他们的军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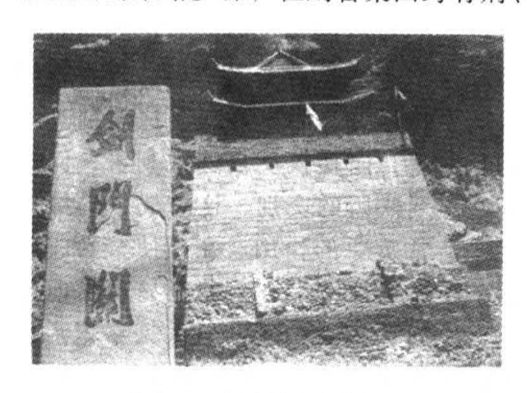
赤壁（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大败曹军。这场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诸葛亮、鲁肃、周瑜等的分析和论断是科学、英明的。诸葛亮在赤壁大战前后，还有过哪些活动，史书上没有记载，因而无法查考。但作为刘备一方的主要决策人物诸葛亮，他不可能不参与一些联军作战问题的讨论和协商，提出作战的主张和建议，比如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利用进行火攻等等，诸葛亮很可能参与了计谋。至于像《三国演义》上所描写的“舌战群儒”、“草船借箭”、“披发仗剑”、登坛借东风等等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那就完全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了。

以法治蜀　令出必行

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荆州不少地方，以后又从刘璋手中夺得益州、从曹操手中夺取汉中，力量发展非常快。此间，诸葛亮为刘备镇守后方，安抚民众，供给军备粮草以及兵源，为蜀汉政权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贡献。

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蜀汉的政事，不论大小，都由诸葛亮一手处置，实际上诸葛亮已成了蜀汉政权的主持者。

“内修政理”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策略步骤，在刘备集团跨有荆、益，诸葛亮负责治理西蜀之后，这个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来了。



剑门关为蜀大将姜维屯兵处

为了维护刘备集团在益州的统治，为了蜀汉政权的长治久安，诸葛亮首先把实行法治摆在“内修政理”的首位。这是针对益州当时“乱”的局面而采取的强有力措施。

益州原来的政治状况很不稳定。在刘焉、刘璋统治益州时期，法令松弛，政治腐败，地主豪强和官僚专横自恣，侵夺百姓，鱼肉人民，因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在公元188年，即刘焉担任益州牧之时，就曾经发生了以马相等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虽然被镇压，但阶级矛盾并没有缓和，那种“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继续纵容豪强官僚欺压、侵凌百姓的局面还是愈演愈烈。

这种严重的“乱”的局面，势必大大不利蜀汉政权的稳固；严厉打击豪强的不法行为，就是诸葛亮解决“乱”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益州地方的土著豪强，鱼肉乡里，侵夺民田，正是诸葛亮要着力打击的对象。

诸葛亮以法治蜀的思想内容，具体体现在他主持制订的《蜀科》的法典上（今佚）。在《蜀科》上的相应条文，规定了对蜀土著豪强采取抑制并打击的措施。而在实践上，诸葛亮也执法严明，依法行事，不避权贵，不徇私情，刑罚有准，轻重比较适当。如对破坏法纪的蜀中豪强彭，赉坚决镇压，毫不留情；对以私废公、放肆专权的李严、廖立等，绳之以法，该罢官的罢官，该刑罚的刑罚；对挑拨是非、妖言惑众的来敏，坚决予以革职。这些典型事迹，显示了诸葛亮执法如山、铁面无私的政治家作风。相反，对于严明奉法、法廉自持的官吏，

如蒋琬、费讳等，则大加褒扬、提拔。

正因为诸葛亮实行法治、打击豪强的政策，因而引起了地主豪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攻击诸葛亮“刑法峻急”，是不“度德量力”，吵吵嚷嚷地要诸葛亮“缓刑弛禁”。时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的蜀中代表人物法正，对诸葛亮这么雷厉风行地打击蜀中豪强也不甚理解，并且站出来替他们说话。他引用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实行宽民之治的事例，写信给诸葛亮。信中说：“从前汉高祖入关，除去秦朝严刑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老百姓，都感念高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给地方上带来恩德，就施用刑禁权威，这是很不好的。按照主、客的关系，我主认为应该多施行点恩德，把刑罚、禁令放宽些，以慰藉他们。”

法正的信，引出了诸葛亮著名的反映他的法治指导思想的文章——《答法正书》，书中这样说：

先生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代的情况是实行暴政，虐待人民，因而逼得人们不得不起来造反。针对这种情况，汉高祖采用了宽刑弛禁的办法，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对的。现在益州的情况和秦代大不相同。刘璋暗弱，自从刘焉以来，就放纵地方豪强官僚，使他们专横跋扈，任所欲为，因而德政不单，威刑不肃，君臣之道也就逐渐被破坏了。给这些官僚们以高官，宠爱他们，他们地位高了，反而不觉得可贵；服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达到顶点，他们反而傲慢无礼。这就是政治弊病的来源。现在我们以法来威胁他们，法行之后，人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恩德；限之以官爵，官爵提升之后，人们才能够知道爵位的尊贵。行法和恩宠相辅并行，上下的次序才能够维持正常，政治才能够得到清明（原文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

这封书信批评了法正看问题的片面性，批驳他生硬地套用汉高祖“宽禁省刑”的做法。诸葛亮指出：秦时跟现在不同，关东和益州的情形不一样；现在就是要严明赏罚，严格按法制办事，才能彻底纠正刘焉父子遗留下来的邪恶风气。诸葛亮在这封书信中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拒绝了法正的建议，这是很有见地的。

据《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及《伊籍传》等书记载，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还亲自撰写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法律条例，一条一款罗列分明，使蜀汉大小官员知务其所“务”、戒其所“戒”、恐其所“恐”、惧其所“惧”，使大家勤于职守，这种“先教后诛”的做法受到当地及后世众多的颂扬和称道。晋人习凿齿就赞叹地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裴注）

正因为诸葛亮赏罚分明、执法如山，因而即使被诸葛亮惩处过的人，对他还是感恩戴德，口服心服，以至当他去世以后，竟如丧考妣，痛不欲生。比如李严与廖立二人就是如此。

李严（后改名李平），是刘备临终前与诸葛亮同受遗诏辅佐刘禅、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的蜀汉高级官员。在诸葛亮北伐时，他负责供应军需物资，在军粮供应不上时，他假传圣旨要诸葛亮退兵。

这种贻误军机、弄虚作假的行为被诸葛亮发觉，上书刘禅将他免官为民，流徙梓潼郡。李严服罪之后，诸葛亮并不搞株连家人的做法，还是让他的儿子李丰照常为官，并且一直做到朱提太守的职位。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死的消息，不禁悲痛万分，情急之下，他也发病身亡。

廖立在刘备在世时就担任长沙郡太守，这个人自命不凡，口出狂言，“诽谤先帝，兹毁众臣”，肆意攻击蜀汉的朝政，指责诸葛亮，挑拨群臣不和。诸葛亮上表罢了他的官，流放到汶山郡。诸葛亮病死，廖立痛哭叹息地说：“我没有希望了，恐怕要老死在这边远地区了。”

诸葛亮的厉行法治，使蜀汉文武官员大都能兢兢业业、勤于职守，而力戒弄虚作假、干犯法纪之事，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吏治逐渐得以清明，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稳定，蜀汉的社会经济得到繁荣，而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安定。史书上记载，说是当时蜀国“道不拾遗，强不侵弱”。史书上的说法当然有夸大的地方，但在三国时期，蜀汉政府是一个较好的政府，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而诸葛亮治蜀的做法也是卓有成效的。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与诸葛亮同时代及稍后的两位人物的言论来予以证实。

一位是蜀汉官员张裔。张裔原先是刘璋的谋臣，蜀汉之时，官至益州郡太守。此人虽精明能干，但他自以为是，总认为别人不对。诸葛亮多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使他受到感动，他由衷地叹道：“诸葛亮相公正严明，赏罚不分亲疏远近，无功者不能得赏，贵势者不能免罚，这是人人奋勉的重要原因啊！”（原文见《诸葛亮文集》卷2《与张裔教》）。

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国志》作者陈寿。陈寿是西晋时代的史学家，他的父亲曾被诸葛亮判处髡刑（剃去头发）。但他在《三国志》中写诸葛亮时，还能秉持公心，去除个人恩怨的成见，以公正的史笔写道：“（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开诚心，布公道……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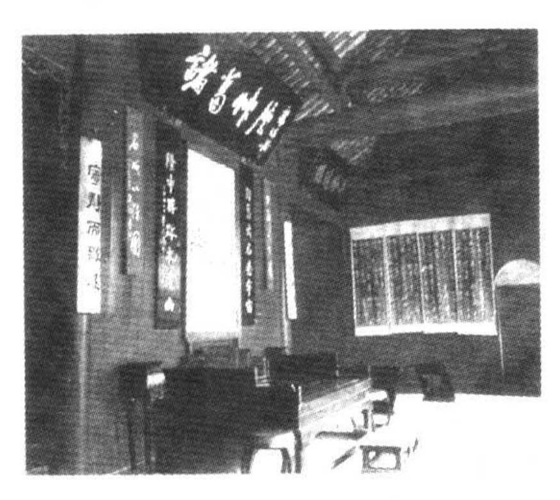
于此可见，诸葛亮用法治蜀深得人心！

举贤授能　任人唯贤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时，诸葛亮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文集》卷3）认为选用贤能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在举贤这一方面，和厉行法治一样，他做了大量艰苦和细致的工作。他选拔一些很有才能并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让他们担任郡守、都督、将军等重要职务，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诸葛亮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国志·蜀书》自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传者（包括附传）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还有庞统、法正、许靖、刘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在余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如关羽、张飞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无几了。

当然，不能说能够进《三国志·蜀



诸葛亮书房

书》传记的，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但是能够进《三国志》的，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却是个事实。这样一些人物，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们的政绩，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

如果再综合《华阳国志》、《三国志》裴注、《季汉辅臣赞》等资料来看，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了。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这一点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曹操认为“有行（道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以他要求地方举荐人才，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的“托志忠雅”，费讳的“雅性谦素，家不积财”，董允的“秉心公亮”，陈震的“忠属，老而益笃”，郭攸之的“以器业知名于时”，姜维的“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杨洪的“忠清款亮，忧公如家”，邓芝的“坚贞简亮，临官忘家”，王平的“忠勇而严整”，李恢的“公亮志业”，吕凯的“守节不回”，射援的“少有品行”等等，一批“贞亮死节之臣”。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儒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廿一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力：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的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2. 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资历出身为限。

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德才”为标准，以才干为依据，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来说，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就可以明白。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人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等，甚且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是否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

诸葛亮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出身，不计门第，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认为“亘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而他处处留心，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选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业的新人。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璋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巂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一时之间，“蛮夷皆服，颇来降附”（《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三国志·蜀书·王平传》），实践经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功曹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祗原是杨洪门下书佐，因有“才策功干”，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轶闻。据说每当朝会，何祇与杨洪平起平坐，扬洪开玩笑地对何祇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祇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一时传为美谈（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李严、杨洪、何祇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

费祎、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祎“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允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祎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

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费祎、董允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3. 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入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爱乐人物，诱纳后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再如，对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个“行义素著，乡里敬慕”的老儒生。刘备入益州时，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两耳失聪的老人了。他闭门不出，采取与刘备集团不合作的态度。诸葛亮为丞相后，用车把他请了出来，由于杜微耳聋，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对他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不责君军事，何为汲汲欲求去乎！”（《三国志·蜀书·杜微传》）最后征得他的同意，拜他为谏议大夫。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儒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向他举贤荐能。他因丞相掾，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伷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伷学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伷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4. 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贵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符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七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穷之以辞辩而现其变”，即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力；“识”，就是“咨之以计谋而现其识”，即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

“信”，就是“期之以事现其信”，即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

除了“七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查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3）。

诸葛亮举贤授能的用人之道，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举贤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养才用人之道，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重视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尽其器能”，能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等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

治军·木牛流马·八阵图

以身兼将相而自许的诸葛亮，在治国理政的同时，未尝一日不在思谋治军、用兵之道。陈寿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诸葛氏集目录》中，就有《兵要》、《军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则”、“军令十五条”，以及有关谈兵治军的论述。

治军是为了治国，这是作为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诸葛亮治军的一贯指导思想。治军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见《诸葛亮集·文集》卷3），国家的安危在于军队的强弱，这是诸葛亮高度重视武装力量建设的思想根源。

既然国家的安危系于军队的强弱上，而军队的强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取决于将帅的素质和才能，那么选择将帅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的就是对将帅选择的重要与要求之严格。诸葛亮对将帅的选择，与他治国举贤授能一样，注重德才并重。德，就是良好的道德，这里面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处事以公的原则，同时也包括爱民的思想。“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同上），意思是说，眼里如果没有老百姓，处事不考虑民众利益的将帅，他就不是国家的良辅，就没有资格当军中的主帅。才，就是要求作为将帅要精通军事，懂得谋略，善于打仗。

在蜀国，能够称得上合格的将帅，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并不多。从《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叙，以及《出师表》中所涉及的，只有将军向宠和后来担任蜀汉主帅的姜维，诸葛亮才认为他们够得上是德才并重的将帅，可见他对将领的选择要求之严。

对军事将领全面军事素质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下面的一段话中：

一个将领要审知天时与地利，更要注意人和，要关心和爱护部属；既要熟悉各种攻防兵器，擅长运用掌握，又要注重赏罚公正严明对士卒作战勇敢与否所起的作用；要洞察敌人的阴谋，善于掌握敌人的动向，要了解进军路上的险阻，何处安全，何处危险，要变被动为

主动；进军和退却，要掌时机；防守要充分部署、提高警惕，进攻要加强力量，扩大声势；攻与防，都一定要积极发挥士兵的作用；对成功和失败都要充分估计到，要争取尽量减少伤亡（原文见《诸葛亮集·文集》卷3）。

总而言之，诸葛亮强调：一个优秀的将领，一定要深谋远虑，要集思广益，切不可独断专行。

在具体治军的方法上，诸葛亮采用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办法。

所谓礼治，就是用儒家思想进行教育。诸葛亮在治国治军方面，最反对"不教而诛"。平时要重视教化，对军队要"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这就是说，要在思想上用礼义忠信的封建伦理观念武装将士们的头脑。为什么要这样做？诸葛亮解释说，从军事观点上讲，一个将帅能够"善养士卒"就可称得上是"仁"；将士如果能"以身殉国"，就是"忠"；不为利禄富贵所动摇，就是"义"；胜利了不骄傲，不居功，是"礼"；能够"奇变莫测，动应多端"，就是"智"；"赏不逾时，刑不择贵"，就是"信"。能够做到忠、义、礼、智、信的军队，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

以法治军，就是强调要以典刑、赏刑来警戒官兵。如果说礼治是务虚的话，那法治就是务实的了。在诸葛亮看来，厉行法治是军队的法宝，他说："一个作将帅的，统率着百万的军队，要使这么多人束肩敛息，躬身并足，集中注意力，连大气也不敢出，连头也不敢抬地来服从命令，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法制。"（原文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即使有"百万之师"，也是"无益于用"的。诸葛亮非常推崇先秦军事家孙武、孙膑等人，赞赏他们在治军之中执法严明的作风。他认为，将士作战立了功，就要按功劳伪大小给予奖赏，如果违犯了军法，那就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平时对他多亲近，也要依法处罚。著名的例子，就是忍痛挥泪斩马谡。马谡违犯军令，失了街亭，被处以死刑。当时蒋琬到汉中对诸葛亮说："天下未定，杀掉智能之士，岂不是很可惜吗？"诸葛亮回答："孙武之所以能够制胜天下，就是靠他严明的军法。现在刚刚和敌人交战，就因人而使军法受到破坏，怎么能够去讨贼呢？"（原文见《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裴注）可见诸葛亮对以法治军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法治对于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当第一次北伐失败时，他上疏承担责任，自贬三等。

在用"礼"与"法"治军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意对军队进行技术训练，即重习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诸葛亮集·文集》卷4）他还说："一支经过高度习练的军队，如果由一个才能不高的将帅来指挥，不见得就会失败；如果一个很有才干的将帅，统率的是一支没有训练的军队，也很难取胜。"

对军队具体的技术训练中，诸葛亮要求将士要掌握行军、作战、屯驻的要领，懂得进退攻守的次序，发挥各种兵器的效用。他还在军队中提倡互教互学的训练风气。他说："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

矣。”

正因为诸葛亮以“礼”、“法”治军，军队训练有素，阵容严整，因而蜀军的战斗力是比较高的。后人评论蜀军“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帅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著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密如鬼神，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宋·苏轼《诸葛武侯画像赞》），这些赞语，虽多溢美之辞，但纵观蜀军在历次北伐战斗中，胜多败少的情况来看，诸葛亮治军的成效应该是很卓著的。

诸葛亮在治军方面，还有值得一提的方面，这就是史传上所称的“长于巧思”。陈寿说：“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是指诸葛亮在改进兵器和运输工具方面有所创新，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兵法阵图，在军事科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弩，是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兵器。诸葛亮改进人连弩，称之为“元戎”，说是“以铁为磁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劲弩。1964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蜀汉铜弩机，证实了是经过诸葛亮改进的连弩的一种。

木牛、流马都是木制运载工具（主要用来运载粮食）。木牛是一种木制独轮车，在汉代以前就有了，汉代称之为鹿车。诸葛亮据此把它改进成“一脚四足”的木牛。木牛大体上可载一人一年的吃粮（约600多斤），每天可走20里地。在木牛的基础上，诸葛亮又加以改进，制成了流马。流马是木制四轮小车，行走的速度比木牛快，也较平稳，适合蜀国山地的运输。木牛、流马都是用人力推拉，不用铡草喂牲口，对解决蜀国向前线运输粮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八阵图就是八种阵形变化之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八阵”的名称，如《孙膑兵法》中就有“八阵”、“十阵”等篇目。诸葛亮很讲究阵法，他的八阵图就是在学习继承古代兵家的布阵之法的基础上创新出来的。诸葛亮自己曾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见《水经·江水注》）这并不是自吹自擂，在实践中，确实使魏军吃了不少苦头。

诸葛亮八阵法之详细内容，没有留传下来，后来有的书上绘制了八阵图，大多是后人的伪作。相传诸葛亮曾经聚石为八阵图，以此来训练军队。石垒八阵图的遗迹现存有三处，一在今陕西省勉县南，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南江边，一在今四川省新都县的牟弥镇。哪一处是真的，哪一处是假，尚无确论。其实不管是真是假，由于年代久远，现从遗址中也无法探究出诸葛亮八阵图的具体面貌。

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对后代影响很大。唐代的军事家李靖，在精研八阵图的基础上，又创制出六花阵法；唐代杜甫在观看奉节江边的八阵图遗址之后，写下“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诗句，来抒发对诸葛亮的怀念之情。

七擒孟获　南抚夷越

在叙述“七擒孟获”故事之前，必须介绍南中叛乱的由来。

在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辖境包括

今天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叟、青羌等多种少数民族。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对人民横征暴敛，南中各民族也深受这种暴虐统治之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东汉统治者对西南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多次反抗。虽然每一次起义和反抗，都被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斗争风云总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面对东汉时期这种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和睦方针，认为这是刘备集团占据益州后巩固内部、求得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刘备入主益州之后，先后派了“轻财果毅”的邓方和处事干练的李恢为南中地区主政长官。由于他们很好地执行了诸葛亮的“和抚”政策，注意不过重剥削压迫少数民族，约束了地方官吏和豪强的霸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缓和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蜀汉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

但是蜀汉政府的“和抚”政策，都遭到一部分蓄意制造分裂的汉族豪强地主和少数民族“夷帅”的抵制和反对，他们蠢蠢欲动，伺机发动叛乱。

就在刘备病死不久，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省晋宁县东）豪强地主雍闿乘蜀汉力量削弱的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杀死了当时的太守正昂，又抓了继任太守张裔，把他押送给东吴。此时东吴也公开声援这股叛乱势力，任命雍闿为永昌太守。东吴的插手，使南中的局势更趋复杂化。

接着，越嶲（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东南）少数民族贵族高定、牂舸（今贵州省西部）太守朱褒也跟从雍闿，起兵反叛。雍闿又拉拢当地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并制造谣言，挑拨民族关系，使不少人受欺骗而参加到叛军中去。这么一来，除永昌郡以外，叛乱几乎席卷了整个南中地区。

雍闿等人的叛乱，给蜀汉政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这一局面，诸葛亮头脑十分冷静。他一方面对南中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积极做说服争取的工作，一方面着手恢复和加强吴蜀联盟。虽然在刘备病死之前，吴蜀已经基本讲和，但相互之间并不信任，东吴向魏国称臣，且又公然支持雍闿的叛乱，更是表示了不友好的态度。为了避免蜀国两面受敌，诸葛亮感到与东吴修复和好是当务之急。只有修复和加强吴蜀之间的联盟关系，解除来自东边的威胁，才能有利于南征平叛和以后的北伐曹魏。

就在刘禅继位当年（公元 223 年），诸葛亮派了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邓芝出使东吴，经过邓芝的不懈努力，孙权终于断绝了和魏国的关系，而重新和蜀国结盟，同时派遣使臣回报蜀国，从此吴蜀正式言归于好，这种结盟的关系，一直保持到蜀汉被灭亡。

蜀天重新和好联盟，蜀汉内部经过一番整顿也已稳定。此时又传来了魏文帝曹丕兴师复征东吴的消息，这真是一个平讨叛乱的好时机。蜀汉建兴三年（公元 225 年）春天，诸葛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向南中进发。

临出发时，参军马谡前来送行，诸葛亮向他征询破敌之策，马谡建议说：

南中凭借地势险要且僻远，不服从

朝廷已经很久了，即使今天收复了他们，大军一退，他们还会继续叛乱。用兵的道理，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丞相不要专用武力，采取安抚的办法，使他们心悦诚服，从而消除后患。

马谡这一番话，甚合诸葛亮的心意，立即把它采纳，作为平南的根本策略。

蜀军分成3路前进；东路军由马忠率领，进攻牂牁郡；中路由李恢率领，进攻益州郡；诸葛亮率领西路军，直扑越嶲。蜀军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叛军根本不是对手。不久，西路军一举消灭了高定的叛军，收复了越嶲。与此同时，东路军也打败了朱褒，攻进了牂牁郡。东西两翼的叛乱武装被肃清之后，三路大军在诸葛亮指挥下，分别直捣叛乱的最后据点益州郡。

这年5月，诸葛亮率军渡过了泸水（今金沙江），进入了益州郡。此时前来与高定会合的雍闿在内讧中已被高定的部下所袭杀，孟获做了叛军的主帅。孟获在益州地区很威望，那里的少数民族和汉人都很听他的话。诸葛亮决心对这位少数民族首领采用“攻心”战术，使他心悦诚服，以改变南中时常“叛乱”的局面。于是他命令将士要生檎孟获，不准杀害。

当孟获在盘江上游（今云南省曲靖市地区一段）要和诸葛亮决一雌雄之时，第一仗就被生檎活捉。诸葛亮好言抚慰他，还布列营阵，带他参观，然后问他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怎么样?”孟获虽然被擒，但内心还是很不服气，他傲慢地回答说：“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所以打了败仗。今天承蒙赐观营阵，看起来也不外如此。若是能放我回去整兵再战，我是一定能够打败你们的。”诸葛亮听了，知道他不服，就笑着把他释放，并叫他整顿兵马，再来决战。

孟获回去集合部众，又来战斗，结果还是兵败被捉。就这样，诸葛亮对孟获一连纵擒达七次之多，在最后第七次诸葛亮释放孟获时，孟获既钦佩而又感动地说：“丞相天威，我们南人决不再造反了。”

诸葛亮降服了孟获，继续统兵南下，不久，蜀军六路大军在滇池会师，至此，叛乱全部被平定，南中战事基本胜利结束。诸葛亮对孟获“纵擒”是“攻心”政策的具体体现，是诸葛亮采用军事和政治相结合方针的胜利。在此次南征中，诸葛亮的军队纪律严明，禁止烧杀抢掠，注意搞好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在坚决打击叛军主要头目中的死硬分子的同时，争取次要而有影响的头目。正因为如此，蜀军从春天三月出兵；至秋天“遂平四郡”，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长达两、三年之久的反叛势力剪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这是与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的用兵方略分不开的。“七擒孟获”的故事，确实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平叛胜利结束，蜀军全部撤回成都。为了争取少数民族首领和蜀汉政府合作，诸葛亮尽量录用当地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让他们担任南中地区各级政府官吏。对于其中威信较高、实力较强的首领，诸葛亮还把他们带回成都，给他们很高的官职，如孟获就在蜀汉朝廷中担任了负责监察之御史中丞。诸葛亮这么做，就是为了增强民族团结，以便更好地治理南中，无疑也是对东汉以来汉人统治少数民族、实行残酷压迫的弊政

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为了便于蜀汉政府管理和控制这些地区，诸葛亮把原来叛乱地区的四个郡改为六个郡，并派一些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担任郡守。郡数增加，郡区缩小，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过大，搞分裂割据，这也是诸葛亮加强蜀汉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有力措施。

为了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发展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诸葛亮还派内地人到那里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那里的少数民族本来采用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牛耕，并学会了织锦和其他手工技艺。诸葛亮还注意在这一地区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扩大耕地面积。这样一来，那些原来居住在深山密林中，过着原始狩猎生活的少数民族，也逐渐迁居到平地，建立村落，从事农桑生产。

南中地区开发之后，给蜀汉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当地生产的金、银等矿物，以及耕牛、战马等，都源源不绝地运到蜀中，增强了蜀汉的经济力量。此外，诸葛亮还从当地少数民族中选取一批强壮男子，编成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一万多户，迁到蜀中，以补充蜀汉兵源的不足。这支军队骁勇善战，号称"飞军"，成为蜀军中的精锐力量。

诸葛亮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和抚"政策和措施，对加强祖国西南地区的统一，促进西南各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他在开发西南地区方面的功绩，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南中各族人民对诸葛亮寄予深切的怀念，从南中地区流传至今的许多生动的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五出祁山　鞠躬尽瘁

北伐曹魏，复兴汉室，统一全国，这是诸葛亮早已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奋斗目标。

西南地区的叛乱已平定，蜀汉内部也比较安定，而此时（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子曹睿（即魏明帝）即位，曹魏政局发生了变化，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的一个好时机。经过一番准备，在第二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军队，北驻汉中，伺机攻击曹魏。临行前，他向后主刘禅上了一篇奏章，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

《出师表》中，谈到了北伐的目的，表示了自己要不辜负先帝刘备的嘱托，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建议刘禅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采纳忠益之言，不要偏听偏信：要赏罚公平使宫廷内外执法如一。同时，诸葛亮在表中还推荐了许多贤能的大臣，要刘禅遇事多同这些人商量，然后施行。《出师表》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倾注了他对蜀汉政权的忠心和期望。写得挚切诚恳，感人肺腑，是后世流传久远的名篇。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率军北伐。在出兵之前，他在南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商定了进兵之策。为了迷惑曹军，诸葛亮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他命赵云、邓芝带领一支人马，进驻箕谷（今陕西省褒城县北），扬言要从斜谷道去攻打郿县（今陕西省眉县北），其实这是一支疑兵。而诸葛亮则亲自带领主力向西北去攻打祁山（今甘肃省西河县西北）。

魏明帝上了诸葛亮的当。在他得知蜀军进攻后，急令大将军曹真调动关右

诸军屯守郿县，堵截，赵云、邓芝之军。这样一束，魏国的关中兵马大部分被诸葛亮的偏军牵制在东边了。诸葛亮的主力军，兵强将勇，锐气很盛，顺利进入祁山。魏军没有防备，非常恐慌，原来属于魏国统治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相继投降，诸葛亮还在冀城收降了魏将姜维。蜀军军威大振，而魏国朝野则为之恐惧，形势对蜀军非常有利。

这一下，魏明帝坐不住了，他亲自到长安坐镇，命右将军张郃率领五万人马，抵御诸葛亮的主力部队。

诸葛亮派参军马谡为赞锋，带领军队，进驻街亭（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迎击魏军。马谡自幼善读兵书，谈起军事道理来也头头是道，在南征叛乱时，他曾为诸葛亮出过很好的建议，深得诸葛亮的器重。但他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又自以为是，既不遵照诸葛亮的部署，又不听从副将王平的劝告，把营盘扎在山上，结果被张郃围困，切断水源，蜀军大乱，被杀得大败，街亭为魏军所夺。

诸葛亮错用马谡，失街亭，不仅仅使他感到终生遗憾，而且留给了后世一个很值得借鉴的历史故事。

街亭之失，牵动全局。不久，曹真在东面又发起进攻，打败赵云、邓芝。前线失利，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所得到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又归附魏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就这样失败了。回到汉中，诸葛亮严责马谡，下令把他处死。诸葛亮和马谩交谊深，但马谡不斩又不能严明军法，因而马谡被处死之后，诸葛亮流着眼泪亲自为他祭奠，这就是后代所说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顺便提一下，在小说与戏剧中，有“空城计”的故事。说的是诸葛亮在失去街亭之后，沉着冷静，坐守空城，弹琴吓退了司马懿的兵马。其实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目的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谋。司马懿当时驻军宛城，根本不可能与诸葛亮接战。

诸葛亮按军法处死马谡，就上书后主刘禅，请求给自己降职处分。第一次北伐的失败，并没有动摇诸葛亮北伐的决心，他加紧训练军队，申明纪律，等待再次北伐的机会。

这年冬天，诸葛亮深知魏将曹真在石亭（今安徽省潜山县东北）被吴军打败，关中虚弱。于是他又趁此时机领兵数万，杀出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包围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此次北伐，遭到了魏国守将郝昭的坚决抵抗，加上陈仓城墙坚厚，蜀军围攻了20多天，未能攻下。诸葛亮眼见蜀军粮食将要吃完，又探听得魏国救兵将至，无计可施，只得主动撤兵。蜀军撤退时，魏将王双出兵追击，诸葛亮用伏兵把他杀死。

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31年）春天二月，诸葛亮再次出兵祁山，发动了第四次北伐。此时魏军西线统帅曹真病危，魏明帝把东线的司马懿调来西线对付诸葛亮的进攻。老奸巨猾的司马懿知道蜀军远来，粮食接济不便，而诸葛亮急于决战求胜的特点，采取了凭险据守、按兵不动的策略。诸葛亮见没有交战的机会，就用退兵的办法引诱敌人。司马懿只是远远跟着，并不，靠近和蜀军交锋。每到一处，总是登山挖沟，安营扎寨，待蜀军来攻，又老是不肯出战。魏军将领们都讥笑司马懿，说：“司马公畏蜀如虎，真不怕天下人笑话吗?”司马懿在众将一再请求下，不得不领兵出击。

诸葛亮派大将魏延、高翔、吴班等领兵迎击，魏军大败，损失了许多军械、辎重。

正在两军相持，形势对蜀军有利的时候，不料负责供应军粮的李平督运不力，蜀军粮食发生问题。李平又假传后主刘禅的命令，让诸葛亮退兵。诸葛亮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只好撤兵退回。司马懿派大将张郃追击，进至木门谷（今甘肃天水县西南），被埋伏在此地的蜀军万箭齐发射死。

经过三年准备的时间，到了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春天，诸葛亮第五次出兵伐魏。四月，蜀军到达渭水南岸的五丈原（今陕西省岐山南），扎下营寨。司马懿率领魏军渡过渭水，背水构筑营垒阻挡，与蜀军遥遥相对。诸葛亮此次出兵，还派了使者去东吴，约孙权东、西配合，共击魏军。殊不料吴军很快被魏军打败而退兵。

司马懿此次领兵拒敌，用的还是原来的策略：坚守不出。因为他知道蜀军粮草运输不易，时间一拖延，蜀军必定粮尽自退。诸葛亮也深知粮草问题的重要。为了解决这一运输问题，他设计创制了木牛和流马，用来运输粮草。同时，他还在渭水南岸“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让一部分军队从事农业生产，作长期同魏军作战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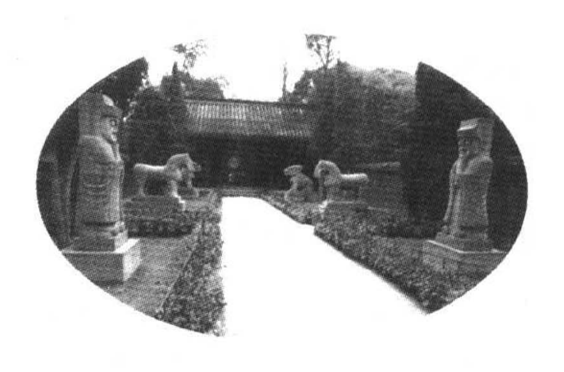
双方坚持了一百多天，此期间，蜀军多次挑战，司马懿就是坚守不出，有一次诸葛亮还派人送一套女人穿戴的衣服给司马懿，以此来羞辱、激怒他。虽然魏军将领们气得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和蜀军见一高低，但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照样还是坚壁高垒，固守不出。

由于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日夜繁忙的军机事务，加上面对欲战不能、欲退不甘心的战争局面使之心情烦闷，诸葛亮积劳成疾，终于病到了，而且病情日益严重。

后主刘禅得知诸葛亮患病的消息，马上派了尚书仆射李福来省视。李福代后主问安之后就走了。过了几天，李福又急冲冲去而复返，诸葛亮一见，就说：“我知道你返回的意思。你要问的，就是谁可接替我的职位的问题，我认为蒋公琰（琬）合适。”李福又问蒋琬之后谁可接，诸葛亮说：“费文伟（祎）合适。”当李福还想再继续问下去时，诸葛亮就不再回答了。

这年八月，诸葛亮在五丈原军营中与世长辞，死时只有54岁。

诸葛亮死后，长史杨仪、护军姜维按照诸葛亮临终前的布置，秘不发丧，整顿兵马，向汉中撤退。司马懿从当地百姓的口中得知诸葛亮已死，就率兵追赶。杨仪突然回军鸣鼓，向魏军作出冲击的样子。司马懿大吃一惊，以为诸葛亮没有死，连忙撤军回去，不敢再追。于是杨仪整队从容而退。当司马懿知道确实消息后，再出兵追击时，蜀军早已就走远了。这件事被当地百姓编成谚语说：“死诸葛吓走活仲达（司马懿字）。”



四川武侯祠

司马懿听后苦笑地说："我能料到他活着，哪能料到他死呢?"

蜀军撤退完之后，司马懿观看了蜀军的营地，只见营垒安排措置，井井有条，不禁大为赞叹道："诸葛亮真是天下少有的奇才啊!"

诸葛亮死后葬在汉中定军山下，殡仪从简，依山造墓，墓穴大小仅能容纳棺材，入殓时只穿平常人衣服，不放任何陪葬品。

诸葛亮安葬时，刘禅下诏祭奠，赠他丞相武乡侯的印信，并赐忠武侯的谥号。因而，后代就尊称诸葛亮为诸葛武侯。

世代怀念的杰出人物

在中国古代，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或军事家能像诸葛亮那样，受到了当世以及后世那么多人褒扬和赞誉。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于泰始十年(公元 274 年)上书给晋武帝司马炎，书中就提到："诸葛亮死后，蜀川之地的人民还在时时刻刻地怀念他。"(原文见《诸葛亮集·表》)晋人袁准也说："诸葛亮之死数十年了，国人歌颂、怀念他，就如同周代的人思念召公那样。"

至于后代，景仰和崇敬诸葛亮的人就更多了，他们或撰文，或吟诗，或用故事的叙述形式，或把他搬上舞台、银幕等等，来寄托他们对诸葛亮高风亮节的由衷赞叹、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的怀念之情。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就不止一次撰诗追怀诸葛亮，其《蜀相》一诗曰：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诗中对诸葛亮匡时济世的献身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对他宿志未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其《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曰：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再一次地抒发了对诸葛亮的赞扬和惋惜之情。

清末赵藩用对联形式来称赞诸葛亮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众多楹联、匾额中的代表作：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而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对诸葛亮为国家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也给予高度肯定，他在《蜀道奇》中写道：

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
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为什么能够一直受到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尊崇，享有那么高的声誉呢？为什么关于他及其故事，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地步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诸葛亮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的政治远见，他的政治才能和所取得

的成效，都是人们所公认的，就是敌对势力中的成员，也对他赞不绝口。如魏国的贲诩说："诸葛亮善治国。"（《三国志·魏书·贾诩传》）刘晔说："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同上，《刘晔传》）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再举出陈寿的《诸葛亮集·表》中对诸葛亮总评价的话语，来看看诸葛亮政治才能：

诸葛亮作为丞相，他安抚百姓，昭明法度，裁减官员，制定了非常合于时宜的政治法度；他诚心待人，发扬公道之心；对国忠心耿耿。对于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和他有仇隙，他也一定会给予奖赏；对于玩忽职守的人，即使是其亲朋好友，他也一定给予惩罚；能够老老实实交代其罪行的人，虽然罪重，他也能够得到宽待；狡辩抵赖、想掩饰罪责的人，即使罪轻，也必定遭到严惩；为善不论多细小，也会受到褒扬、奖励；作恶无论多细微，也会受到贬责。他熟通各项事务，处置事情能抓住要害、关键；对人的考察根据名位，要求做到名实相符；弄虚作假之人，是绝对得不到重用的。因而，蜀国境内的人对诸葛亮既爱戴又畏惧。他的刑法政令虽然严峻，却没有人怨恨他，这就是他出于公心、劝戒分明的缘故。诸葛亮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懂得治国的优秀人才，是和管仲、萧何差不多的杰出人物。

这种评价，并非溢美之辞。从我们上面的评价就可以看到，诸葛亮法度严明、赏罚有度、办事公正、任人唯贤，在政治上注意改革，使蜀汉政权有了清明的作风和政绩。另者，他重视生产，受抚百姓，对维护蜀汉地区的统一，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起了相当的作用。

其次，诸葛亮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刘备集团的军事力量能够由弱变强，达到和曹操、孙权集团角逐、抗衡的程度，这是与诸葛亮治军的才能和成绩密不可分的。诸葛亮精通兵法，治军有道，他重视军队的纪律和训练，注意研究和使用阵法，改进、设计、制造先进武器，等等，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许有人提出来，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他能算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说法！我们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军事才能，不能单纯以他所进行的战争是否胜利为标准。诸葛亮的北伐战争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魏、蜀两国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另外还有一些诸葛亮所不能左右、不能逆转的客观形势发展，如关羽的失荆州，刘备的伐吴的惨败。诸葛亮是尽了他最大的主观努力，矢志不移地采进行他的"复汉室"事业的，虽然未能成功而心力交瘁而死，但在历史上为他自己写下了光辉的一面。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出色的军事家资格，是不能以北伐没有成功来加以否认的。

再次，诸葛亮的个人品德、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也一直受到后世的称道。他忠于职守，艰苦奋斗，任劳任怨，尤其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为后人树立了一光辉的榜样。他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个人生活作风，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在生前给后主上表时曾谈到他的家庭和个人生活，表上说：

我原先侍奉先帝，一切家庭生活费用都靠公家供给，自己不去谋划另外的收入。现在我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子弟们的衣食之用，已经

足够了。至于我在外供职，没有其他花销，衣服、伙食等，全部是官家提供，不会再去经营其他的生计，增加任何个人收入。我死之后，一定不让家中有多余的物资，外地有多余的资产。否则就辜负陛下的恩典了。

一个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能够做到这样廉洁奉公、生活简朴，确是难能可贵的。

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值得纪念的杰出历史人物。

【毛玠】

毛玠，字孝先，东汉陈留平丘（今河南封丘东）人。年轻时任县吏，以清廉公正著称，被誉为“清公”。

汉献帝中平四年（187年），曹操广招贤才，毛玠被征任为州的治中从事（州刺史助理）。他鉴于当时东汉政权已风雨飘摇，群雄纷起，遂向曹操提出立国二策：一曰“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二曰“修耕植，蓄军资”；还表示：“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曹操敬纳其言，从此渐渐产生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和“屯田制”等重要思想。后来，曹操当了汉丞相，被封为魏公、魏王，毛玠随之官任丞相东曹掾和尚书仆射，主管官吏的选拔考核和任免。

毛玠选拔和重用官员的标准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要有真才实学，善于应对复杂的局面，妥善处理各种疑难问题；而对那些只会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式的人物，或华而不实、好做表面文章的平庸之辈，一概斥之不用。二是廉洁俭朴，不贪不占，能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办好事；而对那些业绩不明显或利用职权谋私利、搞腐败的人，一律斥之不用。三是为人正派，襟怀坦白，决不拉拉扯扯、搞个人小圈子；而对那些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甚至“另立山头”的人，坚决予以摒弃。

这一选官用官的办法很快震动了全国，并波及各个领域，从而逐渐形成了一股风：上上下下都以铺张为耻，以俭朴为荣。普天下的读书人，更以清廉的节操来勉励自己。即使是爵高、官大、禄厚的朝廷大臣，出门乘车和平时的服饰也不敢过度奢华。有些官员为标榜自己俭朴，甚至故意穿着贫寒人所穿的衣裳，乘坐着简陋无饰的车子。还有的官员上朝或赴任时，身穿朝服却徒步而行。在这样一个大气候下，富人收敛了无妄之欲，官吏不敢再有贪污受贿的念头。面对如此形势，曹操曾非常得意地对人说：“像这样，能使天下人自己要求自己，我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

据资料：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在历史上都是少有的；一直到很久以后，人们还称颂它。

毛玠在选官、用官中一向坚持原则，照制度办事，严禁任何人拉关系、走后门。即使当朝显贵来说情，他也决不含糊。

有一次，曹操的儿子时任副丞相兼五官中郎将的曹丕，亲自来到毛玠的官府，让他将自己的几个亲信眷属安排在适当的官位上。毛玠面对权势，毫无惧色，婉言拒绝了这位“大人物”的无理要求。他说：“老臣因为能恪守职责，才幸而得以免于罪戾；您刚才说的那几个人不符合升迁的范围，所以我不敢遵照您的意见办。”曹丕无奈，只好悻悻而归。

然而，毛玠在曹操选定接班人这件大事上，却是顾全大局而竭力支持曹丕的。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为确立太子曾举棋不定：他有25个儿子，长子

曹昂已经战死，次子曹丕已成老大。但由于四子、临淄侯曹植才华出众，生活简朴，曹操分外宠爱他，并打算将他作为继任者。大臣杨修、丁仪、贾逵、王凌等也都向曹操进言，劝他立曹植为太子。毛玠却秘密进谏曹操说："前不久，袁绍因为嫡庶不分，导致家破国亡。废立太子是件大事，您想不立长子曹丕而立四子曹植，这是我不愿意听到的事。"曹操听罢，颇受震动，原来的设想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后来，曹操在一次召集文武百官议事时，毛玠起身上厕所。曹操指着他的背影对大臣们说："这个人正是古人所说的国家的司直，也是我的周昌啊！"

毛玠虽然位居群臣之上，又深得曹操的信赖，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更不以权谋私。尤为可贵的是，他要求和倡导别人去做的，自己总是先做到。所以，数十年来，他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

毛玠的哥哥英年早逝，他的几个子女一直由毛玠抚养着。他对他们视同亲生，从多方面予以关怀、爱护和教育、培养。此外，毛玠对其贫困的同族人也十分关心，常常以自己的俸禄去接济他们。因此，他为官数十年，仍然"家无所余"。

曹操北征乌桓、平定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时，获得了丰盛的财物珍宝；凯旋而归后，用以大犒随征将佐。他特地精选了一幅素屏风和一张素面凭几，赏给了毛玠，并深情地对他说："卿有古代君子朴实无华、廉而奉公的美德。他人赐以金银珍玩、丝帛钱财，特赐卿简朴的古人日常器具，权当留个纪念吧！"

毛玠死后，曹操十分悲痛，又赐其棺材、器物和绢帛，还任命他的儿子毛机为郎中。

【荀彧】

离袁归曹　力荐贤士

荀彧（163～212），字文若，颍州郡颍阴（今河南许昌）人。祖父荀淑，字季和，任朗陵县县令，生活在汉顺帝、桓帝年间，在当时很有名。荀淑有八个儿子，号称八龙。荀彧的父亲荀绲，任济南相。叔父荀爽，任司空。

荀彧年轻时，南阳人何禺很赏识他，说他是"辅佐帝王的人才"。永汉元年，荀彧被单荐为孝廉，任命他为守宫令。董卓作乱，旬彧请求出任地方官吏。任命他为亢父县令，于是他弃官回到家中，对乡亲父老说："颍州是四面受敌的军事重地，天下一有变乱，就会成为兵家的要冲，应当赶快离开这里，不要久留。"乡亲们大多怀恋故土，犹豫不定，正好冀州牧的同乡韩馥派骑兵来迎接他们，却没有人跟着去，荀彧独自领家族的人迁到冀州。而这个时候袁绍已经夺得了韩馥的职位，对待荀彧用上等宾客的礼节。荀彧的弟弟荀谌及同郡的辛评、郭图，都被袁绍任用。荀彧考虑袁绍最终不能成就大业，这时曹操任奋武将军，在东郡，初平二年，荀彧离开袁绍跟随曹操。曹操非常高兴，说："你就好比是我的张子房。"任命他为司马，当时他二十九岁。这时，董卓的威势震动天下，曹操询问关于这事的意见，荀芊说："董卓残暴酷虐已经很过分了，一定会因变乱而告终，不会有所作为。"董卓派部将从关东出兵，所经过的地方大肆

掠夺，到颍川、陈留，然后回去。乡人留下没走的大多被屠杀、掠夺。第二年，曹操领兖州牧，后来任镇东将军，荀彧经常以司马的身分随从曹操。兴平元年，曹操征讨陶谦，任命荀彧掌管留守的事务。正赶上张邈、陈宫依据兖州叛乱，暗暗地迎接吕布。吕布到了兖州，张邈便派了刘翊告诉荀彧说："吕将军来帮助曹使君攻打陶谦，应当马上供给他军用物资、粮食。"众人都感到疑惑。荀彧知道张邈叛乱，马上召集部队设置防守，迅速召来东郡太守夏侯惇，然而兖州的各县城都已经响应吕布了。这时曹操率领全军进攻陶谦，留守的兵力很少，而且督战的将领与主要官员大都与张邈、陈宫勾结。夏侯惇到达后，当天夜里就杀掉谋划叛乱的几十个人，士兵们才安定下来。豫州刺史郭贡率领着几万名士兵来到城下，有人说他与吕布同谋，城里的士兵都很害怕。郭贡请求见荀彧，荀彧准备前去。夏侯惇等人说："您是一州的镇守，前往一定危险，不可以去。"荀彧说："郭贡与张邈等人，平时并没有什么勾结，现在来得很快，计划一定没有定好；趁他主意未定时劝说他，即使他不采纳我的意见，也可使他保持中立，如果先怀疑他，他就会愤怒之下制定下计划。"郭贡看到荀苄没有惧怕的意思，认为鄄城不容易攻下，于是带兵回去了，荀彧又与程昱商议，派人去劝说范县、东阿，终于保住了这三个县城，等待曹操。曹操从徐州回来，在濮阳攻打吕布，吕布向东逃走。兴平二年夏季，曹操在乘氏县驻扎，那里发生了大饥荒，人吃人。

陶谦死后，曹操想趁机夺取徐州，然后再回师平定吕布。荀彧说："过去汉高祖保住关中，光武帝占据河内，都是为了稳固根基来控制天下，进军可以战胜敌人，退守可以坚持固守，所以虽然有过窘困失败，然而最终成就了大业。将军原来是以兖州为根据地起兵的，平定了山东的战乱，百姓没有不归顺悦服的。况且黄河、济水是天下的战略要地，现在虽然残破，然而仍然易于保护自己，这就是将军的关中、河内啊，不可不先安定。现在击败了李封、薛兰，如果分出兵力向东去进攻陈宫，陈宫一定不敢顾及到西面，在这段时间内带领士兵收割已经成熟的麦子，节约粮食，积蓄谷物，一举就可以打败吕布。打败了吕布，然后向南面联结扬州，共同征讨袁术，以便控制淮水、泗水一带，如果放弃了吕布而向东进攻，兵力留多了，进攻徐州的兵力就不足；兵力留少了，那么老百姓就都去保卫城池，无法砍柴拾草。吕布乘虚入侵，残暴杀掠，民心更加害怕，只有鄄城、范城、卫县可以保全，其余的地方并非我们所有，实际上也就没有兖州了。假如徐州无法平定，将军应当回到哪里去呢？况且陶谦虽然死了，徐州仍不是容易打败的。他们鉴于往年战败的教训，将会因为害怕而联合起来，相互呼应。现在东面都已收割麦子，一定会坚壁清野来防备将军，将军进攻无法取胜，掠取又没有收获，不出十天，那么十万大军没有参加战斗就已经自己疲惫了。前次讨伐徐州，实行了威严的惩罚，那里的子弟想到父兄受到的耻辱，一定会人人自动防卫，没有投降的心思，即使是攻克下来，还是无法控制它。事情本来就有放弃这个得到那个的情况，用大换小是可以的，用安易危也是可以的，权衡一时的局势，不考虑根基是否

牢固也是可以的。现在三方面都没有利，希望将军深思熟虑。”曹操于是停止了进攻。大力收麦，重新与吕布作战，分出兵力平定了各县。吕布败走，兖州于是被平定。

建安元年，曹操击败了黄巾军。汉献帝从黄河东面回到洛阳。曹操商议迎接天子迁都许昌，有人认为山东没有平定，韩暹、杨奉刚刚把天子送到洛阳，北面与张扬联合，不可能很快控制住局面。荀彧劝曹操说：“过去晋文公迎接周襄王返回到王城，诸侯像影子一样跟随，高祖东征讨伐项羽，为义帝服丧，因此天下人归顺。自从天子流亡，将军首先倡导组织义军，只是因为山东的战乱，不能够远行到关右，然而仍然分别派遣将帅，冒着危险与朝廷联系，虽然在外面抵御暴乱，但内心仍忠于王室，这是将军匡扶天下的本来志向。现在皇帝圣驾回来，东京荒芜，义士有保存朝廷根本的想法，百姓怀念旧主而增加了哀痛的心情。应该趁这个时机，尊奉皇上顺从民众的愿望，可以达到安定的境界；主持公正使天下的英雄豪杰臣服，是总的策略；扶持正义召引天下的英俊人才，是最高的品行。天下即使有人叛乱，一定不能成为祸患，这是显而易见的。韩暹、杨奉他们怎么敢为害呢！如果不及时平定局面，各地都产生了叛离的心思，然后才去考虑它，就来不及了。”曹操于是到洛阳，迎接天子到许昌定都。天子任命曹操为大将军，进升荀彧为汉朝的侍中，代理尚书令。荀彧常在朝廷中承担重任，曹操虽然在外征战，军政大事都与荀彧一起筹划。曹操问荀彧：“谁能够代替你为我谋划？”荀彧说：“荀攸、仲繇。”先前，荀彧谈到出谋划策的人士。推荐过戏志才。戏志才死后，又椎荐了郭嘉。曹操认为荀彧会识人，他所推荐的人都很称职，只有严象任扬州刺史、韦康任凉州刺史，后来战败身亡。

自从曹操迎接汉献帝之后，袁绍内心不服。袁绍已吞并了黄河以北的地区，天下畏惧他的强大。曹操正担心东边的吕布，南面抵抗张绣的进攻，而且张绣在宛县打败了曹操的部队。袁绍更加骄横，给曹操送来书信，信中言词无理傲慢。曹操非常气愤，举止行动都与平常不同，大家都以为是与张绣作战失利的原故。钟繇向荀彧询问，荀彧说：“曹公很聪明，一定不会去追悔过去的事情，大概是有其他的忧虑。”荀彧去见曹操，问他有什么情况，曹操便将袁绍的信给荀彧看，说：“现在想要讨伐不义之人，可是兵力不能与之相敌，怎么办呢”？荀彧说：“自古以来，较量成功失败的人，如果确实有才能，虽然开始时势力弱小，但以后一定会强大；如果不是那样的人，即使很强大也容易衰弱。刘邦、项羽的存亡，就可以看出这点。现在与您争夺天下的人，只有袁绍。袁绍表面大度宽容，而内心猜忌，任用别人而又怀疑他的忠心；您明智通达不拘小节，根据才能适当任用，这种气度胜过了袁绍。袁绍处事犹豫不快，失去机会；您能够决断大事，随机应变，不守陈规，这种谋略胜过了袁绍。袁绍治理军队松弛，法令不能确立，士兵人数虽多，但实际上难以调用；您的法令明确，奖赏、惩罚一定能够实行，士兵人员虽少，但都争相拼死而战，这种武力也胜过了袁绍。袁绍凭借世袭的身分为资本，将自己装饰得很有智慧，来获取名誉，所以

士人之中缺少才能，喜好名誉的人大多去归附他；您用大仁欠德对待别人，推及诚心不虚伪美饰，自己的行为俭朴谨慎，然而奖赏有功人士没有任何吝惜，所以天下忠诚正直、努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都愿意为您效力，这是在德行上超过了袁绍。用这四方面的优势辅佐天子，扶持正义讨伐邪恶，谁敢不听从？袁绍的强大又有有什么作为呢？”曹操很高兴，荀彧说：“不先攻下吕布，黄河以北就不容易谋取。”曹操说：“是这样。我所担心的，还是怕袁绍入侵骚扰关中，勾结胡、羌，南面引诱蜀汉，这样只能凭据兖州、豫州来抵抗天下六分之五的兵力。那样将怎么办？”荀彧说：“关中将领的人数可以用十位来计算，没有人能够统一他们，惟有韩遂、马超的实力最强。他们看到山东正在争斗，必然各自拥兵保全自己。现在如果用恩惠去安抚他们，派遣使者与他们联合，相互之间即使不能维持长久的安定，但可以使您在平定山东期间他们不会有什么行动。钟繇可以担负起西边的事务。那么您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

建安三年，曹操已经打败了张绣，又在东面捉住了吕布，平定了徐州，于是与袁绍相对抗。孔融对荀彧说：“袁绍占据的地方宽广，兵力强大；田丰、许攸，是有智谋的人，替他谋划；审配、逢纪，是尽守忠诚的臣子，为他办事；颜良、文丑，勇武冠于三军，替他带兵，恐怕很难战胜袁绍啊！”荀彧说：“袁绍的士兵虽然人多然而法令不严。田丰刚直而犯主上，许攸贪婪不能自我节制。审配专横没有智谋，逢纪果断而刚愎自用，这二个人留下主持后方的事务，假如许攸违反了法律，一定不会被放过，不放过，许攸一定会叛变。颜良、文丑，只是匹夫之勇，一战便可将他们擒住。”建安五年，与袁绍连续交战，曹操保卫官渡，袁绍包围了他。曹操的军粮快要断了，写信给荀彧，商议要回到许昌来引诱袁绍。荀彧说：“现在军粮虽然不足，但还不至于楚、汉在荥阳、成皋相持时的那种地步。然而那个时候刘邦、项羽不有谁肯先撤退，先撤退的人在势力上会处于弱势。您凭借十分之一的人数，划出地盘守住，扼住敌人的咽喉使他们无法前进，已经有半年了。情况出现了衰弱的迹象，一定会有所变化。这是运用奇兵的时机，不可失掉。”曹操便没有行动。于是出兵袭击袁绍其他兵营，斩杀了袁绍的将领淳于琼等人，袁绍撤走。审配因为许攸不遵守法令，逮捕他们的妻子儿女，许攸气得背叛了袁绍；颜良、文丑临阵被杀，田丰因为直谏被杀；他们的结局都如荀苄所预料的那样。

建安六年，曹操到东平郡安民县驻军，以便获得军粮，粮食少，不足以与河北的敌军相持，想要利用袁绍刚刚被打败的时机，乘势攻打刘表。荀苄说：“现在袁绍失败，他的部下军心涣散，应当乘他们困窘之时，平定他们；可是您要离开兖州、豫州，远征长江、汉水流域，如果袁绍收集他的残余部队，乘虚进入我们的后方，那么您的大事就会完了。”曹操再次在黄河边驻军。袁绍死。曹操渡过黄河，攻击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而这时高干、郭援侵扰河东，关右动荡，钟繇率领马腾等人击败了他们。事情记在《钟繇传》。建安八年，曹操记录荀苄前前后后的功劳，上表封荀彧为万岁亭侯。建安九年，曹操攻克

了邺城，兼任冀州牧。有人劝曹操说："应当恢复古代设置的九个州，那么冀州所统辖的范围就扩大了，天下就会顺服了。"曹操准备听从这种意见。荀彧说："如果这样，那么冀州应当得到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这些地方，所夺得的大多了。前段时间您打败了袁尚，捉住了审配，海内人心震惊、害怕，一定都担心无法保住自己的土地，拥有自己的军队；现在让他们都分别归属于冀州，人心都会动摇。况且人们都说关西的各位将领要采取闭关防守的办法；现在听到您的这种打算，认为您一定依次夺取他们的权力。一旦发生变故，虽然有人坚持为善，也会转而被迫干出坏事。那么袁尚可以推迟他被灭亡的时间，袁谭也会存有二心，刘表使可保住长江、汉水之间的地盘，天下就很难得到了。希望您赶紧带兵先平定河北，然后修复原来的都城洛阳，南面逼近荆州，谴责他们不向朝廷进贡，那么天下的人都知道您的心意，人人自安。天下安定，再议论恢复古制。这才是国家长远的利益。"曹操于是放弃了这个建议。

这个时候，荀攸常常为曹操出谋划策。荀彧的兄长荀衍以监军校尉的身分驻守邺城，统领黄河以北地区的事务。曹操征讨袁尚，高干秘密谋划派兵袭击邺城，荀衍事先察觉，把他们都杀了，因功被封为列侯。曹操把女儿嫁给荀彧的长子荀恽做妻子，后来称为安阳公主。荀芇以及荀攸都地位显贵，但他们都谦虚节俭，将俸禄以及赏赐都分给宗族和相互了解的旧友，家中没有积余的财物。建安十二年，又给荀彧增加了食邑一千户，共二千户。

曹操要讨伐刘表，询问荀彧应当采用什么计策，荀彧说："现在华夏已经平定，南方已经知道处境困难了。可以公开向宛县、叶县出兵，同时从小路轻装前进，出其不意地进行偷袭。"曹操于是出发。正赶上刘表病死，曹操直奔宛县、叶县，按照荀彧的计策行动，刘表的儿子刘琮在荆州投降。

劝曹忠贞　忧郁而死

建安十七年，董昭等人称说曹操应当进爵为国公，备用九锡之物来表彰曹操的特殊功勋，秘密向荀彧征求意见。荀彧认为曹操原起义兵是为了匡扶朝廷安定国家，还着忠贞的诚心，保持着退让的实质行动，君子用道德爱人，不应当这样做。曹操因此心中无法平静。正好要去征讨孙权，上表请求派荀彧去谯县慰劳军队，因此就留下荀芇，以侍中光禄大夫的身分持节，参与丞相府的军事。曹操的军队到达濡须，荀彧留守寿春，因忧郁而死，享年五十岁，谥号敬侯。第二年，曹操终于成了魏公。

【华歆】

德行高洁　彬彬君子

华歆（？～231），字子鱼，是平原郡高唐（今山东禹城县西南）人。高唐是齐地有名的都市，士大夫无不在市里游逛。华歆做官吏，逢例假走出官署，就直接回家关上门。议论公平，始终不诋毁别人。同郡的陶丘洪也是知名人士，自认为真知灼见超过华歆。当时王芬和豪杰阴谋废黜汉灵帝（内容记载在《武帝纪》）。王芬暗中招呼华歆和陶丘洪，共同商定计策，陶丘洪打算去，华歆劝阻他道："废立是件大事，伊尹、霍光也感到难办。王芬性格疏狂而且不懂军

事，这件事必定失败，灾祸却将牵连整个家族。您不要去！”陶丘洪听从华歆的意见才没有去。后来王芬果真失败，陶丘洪才佩服。荐举为孝廉，任郎中，因病离开了官职。汉灵帝逝世，何进辅助管理朝政，征召河南郡的郑泰、颍川郡的荀修以及华歆等人。华歆到达，任命为尚书郎。董卓把天子迁徙到长安，华歆要求派出去做下郭县令，因病没有动身，于是从蓝田来到南阳。当时袁术在穰县，留住了华歆。华歆劝说袁术派军队去讨伐董卓，袁术未能采纳。华歆打算抛弃袁术离开，适逢天子派太傅金日磾安定聚集在关东，金日磾征召华歆做掾。向东来到徐州，天子下诏书立即授与豫章太守的官职，由于处理政事清静不烦琐，官吏和百姓都感激、拥戴他。后来孙策死了。曹操在官渡，上表请求天子下召华歆。孙权想不遣送，华歆对孙权说：“将军奉天子的命令，刚和曹公友好结交，名分道义尚未牢固，让我能够为将军献上一片心意，难道不是有益处吗？如今徒然留住我，这是供养无用的东西，不是将军的好计策呵。”孙权很高兴，就遣送华歆。宾客、老相识给他送行的有一千多人，赠送了数百金。华歆全不拒绝，暗中各自写上记号，到临离开时，将各种礼物全部聚齐，对各位宾客说：“本来没有拒绝各位的心思，可是接受的礼物太多。考虑到一驾车长途跋涉，将全因为怀有贵重的东西而遭受不幸，希望各位宾客为我打算。”大家才各自留下所赠送的礼物，并且钦佩他的德行。

汉侯魏相　恪尽中庸

华歆来到，授与方议郎官职，参与司空府军事谋划，入朝做尚书，调任侍中，代替荀彧任尚书令。曹操征讨孙权，上表奏请任命华歆做军师。魏国建立后，任命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授与相国官职，封为安乐乡侯。到文帝即帝位，改任司徒。华歆平素清贫，把俸禄、赏赐的物品拿去赈救、施舍给亲戚和老朋友，家里没有担石的储蓄。公卿大臣曾经一起接受赐给的没收入官府的女子，只有华歆将她们送出去嫁人，皇帝叹息，下诏书道：“司徒是国家精英、元老，负责调和阴阳、处理各种事情。如今的大官僚吃的是山珍海味，而司徒却是菜蔬素食，十分没有必要。”特别赐给皇上的衣服，并为他的妻子、儿子、男男女女都作了衣服。三公府评议：“荐举孝廉，以德行为根本，不再用考试经术来限制。”华歆认为“丧乱以来，六经没落废弛，当前的急务是保存、建立六经的研究，来崇尚王道。制订法规，是关系治乱盛衰的事。如今听任孝廉不用考试经术，恐怕学业会从此而废弛。如果有优秀卓越的人才，可以特别征召任用。只担心没有这样的人才，哪里需要担心征召不到呢？”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黄初年间，诏令公卿大臣荐举具有卓越德行的君子，华歆荐举管宁，皇帝用安车去征召他。明帝即位，进封为博平侯，增赠封邑五百户，连同过去所封的共一千三百户，调任为太尉。华歆上奏说有病，乞求辞退，把职位让给管宁。皇帝不允许。恰逢盛大的朝会，皇帝就派散骑常侍缪袭拿着手谕去责备华歆说：“我最近亲自处理各种事情，每天处理的政务十分纷繁，担心裁决得不妥当。幸亏有德行的大臣，在身边辅助我，可是您屡次称病辞退职位。衡量、选择君

主，不愿在他的朝廷里做事，抛弃荣华、俸禄，不尽到他的职责，古人里固然有这样的人，但我以为是周公、伊尹就决不会这样做。洁身自好，显示节操，如果是一般人这样做，君主是不会责备他的。希望您竭力支撑着病体参加朝会，把恩惠给予我一个人。将摆好几筵坐具，吩咐各位官员完全代理自己的职位，等待您的到来，我然后就坐。”又诏令缪袭：“等到华歆必定动身，才能回来。”华歆不得已，只好聘为理事。

太和年间，派遣曹真从子午道征伐蜀国，皇帝的车队向东出行到了许昌。华歆上奏章道：“战乱以来已经超过了二十四年，大魏承受天命，陛下以圣哲仁德应当成就像周成王、周康王那样的隆盛时代，弘扬一个时代的太平盛世，继踵三位先王的轨迹。即使有蜀、吴两个敌国凭借险阻苟延残喘，如果圣上的教化一天比一天崇高，远方的人感怀德政，将会用布幅把婴儿兜负在背上而前来归附。武力是不得已才运用的，所以一般制止，只是有时采用。我实在希望陛下首先留心治理好国家的措施，把征伐作为日后的事情。况且长途运输粮草，对作战不利；越过险阻深人敌区，不可能取得独自战胜的功绩。听说今年征发劳役，严重地损害了农桑业。治理国家的人把人民作为基础，人民把衣食作为根本。假使国内没有饥寒的灾祸，百姓没有离开乡土的念头，那么就是天下百姓的幸运了。蜀国和吴国的破绽，可以坐下来等待了。我充数当了宰相，年迈有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像犬马一样效力的生命已快到尽头，恐怕不能再侍奉皇上了，因此不敢不竭力尽到臣子的心怀，希望陛下考察裁决！”皇帝答复道：“您深刻地考虑安定国家的计策，我十分赞赏这样做。敌人依仗着险要的山川，二位先祖在前代劳苦出征，尚未能铲平，我难道敢自己夸口，声称必定消灭他们吗？各位将领认为不作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敌人不会无缘无故地烂掉，所以检阅军队以显示军威，来窥测敌人的暇隙。如果天命时运尚未来到，就象周武王那样撤回军队，借鉴从前的经验教训，我恭谨地不会忘记这些鉴戒。”当时秋雨滂沱，下诏命令曹真率领军队回来。太和五年，华歆逝世，谥号敬侯。

【王朗】

王朗（？～228），字景兴，是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县北）人。由于通晓经书，授与郎中官职，任淄丘长官。拜太尉杨赐为师，杨赐逝世，王朗抛弃官职为他服丧。荐举为孝廉，被公府征召，不去应职。徐州刺史陶谦察举王朗为茂才。当时汉皇帝在长安，关东发生战争，王朗做了陶谦的治中，和别驾赵昱等劝说陶谦道：“《春秋》的要旨，是要求诸侯无不为王事尽力。如今天子远在西京，当派遣使者去接受天子的任命。”陶谦于是派赵昱带着奏章到长安。天子赞赏他的心意，授与陶谦安东将军的官职。任命赵昱做广陵太守，王朗做会稽太守。孙策渡过长江抢占地盘。王朗的功曹虞翻认为力量不能抗拒，不如躲开他。王朗自以为自己是汉朝的官吏，应当保卫城邑，于是发兵与孙策交战，大败，渡海到东冶；孙策又追击，大败王朗。王朗于是向孙策投降。因为王朗是个优雅的书生，孙策诘问、责备之后却没有迫害。王朗虽然漂泊穷

困，朝不保夕，可是收留救济亲戚和老熟人，有多少就分给多少，做了许多好事。

曹操上表请准征召王朗，王朗从曲阿走水路辗转前往，累月成年才到达。授与谏议大夫的官职，参与司空府军事谋划。魏国刚建立时，以军祭酒的身分兼魏郡太守，升少府、奉常、大理。办案勉力宽恕，嫌疑罪犯从轻发落。钟繇明察符合法律，两人都以擅长裁定诉讼著称。

文帝即王位时，升御史大夫，封为安陵宁侯。上奏章建议鼓励人民生育和简省刑罚道："战乱以来已经三十多年，四海动荡倾覆，各地百姓死亡惨重，幸赖先王铲除贼寇，扶助抚育孤儿弱女，终于使华夏又恢复了社会秩序。聚集许多百姓，在这魏国的土地上，使得边界之内，鸡鸣狗吠，遍布四面八方，广大人民欢欣鼓舞，庆幸遇上了升平时世。如今远方的敌人尚未宾服，战争的烽烟尚未平息，如果下令免除赋役，就能够使远方的人感恩；任命好的官吏就能够宣扬德政的恩泽；全面修整道路，各地百姓兴旺，必定又超过从前而比平常世道更为富足了。《周易》谈到修饬法令，《尚书》记载善用刑罚的方法，一个人得到免刑，广大人民就会信赖官府，这就是所说的要慎重地执法判刑呵。从前曹参相国将狱市官嘱托给后任，路温舒痛恨治理监狱的官吏。治理监狱的官员按照犯人的实际情况断案，就没有含冤而死的囚犯；从事农业的壮丁能够完全挖掘土地的潜力，就没有挨饿的老百姓；穷苦老人能够从官家的谷仓得到粮食，就没有饥饿而死的尸体了；按时娶妻嫁女，男人女子就没有年长也不能婚配的怨恨了；胎中养育必定完全，孕妇就没有流产的哀伤了；刚生下的婴儿的父母必定免除劳役，那么孩子就没有不被养育而成了累赘了；长大之后才服劳役，那么幼童就没有逃离家庭的想法了；斑白头发上了年纪的人不服兵役，老人就没有困顿、死亡的祸患了。用医药来治疗他们的疾病，用宽松的徭役来使他乐于从事生产，用权威、刑罚来抑制他们的倔强，用恩惠仁慈来救济那些弱小的人，用赈济借贷来赡养那些贫穷的人，二十年之后，胜任拿起武器作战的人必定布满原野了。"

到了文帝即帝位，改任司空，进封为乐平乡侯。当时皇帝很喜欢出外游猎，有时黑夜才回宫。王朗上奏章道："帝王居住的地方，外面设置周全的警卫，里面是重重叠叠的禁门，将要出行就陈列仪仗然后走出篷帐，布置好警卫然后踏上台阶，弯弓警戒然后登上车子，清除道路上的行人然后仪仗在前头侍奉开路，列队遮挡然后车驾出动，清净宫室然后停下车驾，这一切都是用来显示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务必鉴戒谨慎遵守，这是传下来的制度。近日来皇上的车驾出外，亲自去捕捉老虎，太阳尚未升高就出发，直到深夜才回来，违背了皇帝出行要警戒、清道的永恒的法规，不是天子的最谨慎的行为呵。"文帝回答道："看了奏章，即使是魏绛引用虞舜的箴言来讽劝晋悼公，司马相如陈述猛兽来告戒汉武帝，也不能跟你的劝告相比。当今两个敌国尚未消灭，将帅远征，所以经常进入原野来演习军备。至于夜里才回宫的告戒，已经下诏书给有关部门施行。"

当初，建安末年，孙权开始派遣使

者前来，自称蕃属，同时跟刘备交战。下诏让群臣评议："应当出兵和吴国一道攻取蜀国吗?"王朗建议道："天子的军队，比华山、泰山还重，实在应当安然地闪耀出天子的声威，不动就像山岳一般。假使孙权亲自同蜀国互相对垒，长久搏斗交战，智谋、武力相等，战争不会迅速解决，必须出兵来形成他的优势，这样然后选派持重的将领，乘敌人处于作战的中途，看准时机然后行动，选择有利地形然后出击，一次行动就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不留下后事。如今孙权的军队尚未出动，就协助吴国的军队无目的地先行征伐。况且是雨水正盛的季节，不是兴师动众的时候。"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

黄初年间，鹈鹕聚集在灵芝池，下诏书让公卿大臣荐举具有独特品行的君子。王朗荐举了光禄大夫杨彪，并且声称有病，要把职位让给杨彪。皇帝于是为杨彪设置胥吏、士兵，职位在三公之下。下诏书道："朕向您寻求贤才而未得到，您却反过来声称有病，不但没有寻求到贤才，更开辟了失掉贤才的道路，增加处于高位的优秀人物的倾覆。难道是居住在宫室里说出话来不妥当，被君子所违背吗?希望您以后不要再推辞。"王朗只好就职。

孙权答应派遣儿子孙登人宫侍候，但不到来。这时天子迁徙到许昌，大规模地屯兵边境，就地开垦，打算出兵东征。王朗上奏章道："南越奉行友好政策，婴齐入朝侍候，终于当上太子，回到自己的国家做了君主。康居骄纵狡黠，内心跟言辞不相符，都护上奏建议，认为应当送儿子人朝侍候，目的是贬斥无礼的人。况且吴王刘濞的叛乱，起因是在于儿子人朝作人质；隗嚣的叛乱，也不顾及儿子。过去听说孙权说过送儿子入朝的话，可是没有送来，如今六军戒备森严，我担心大家没有弄清楚圣上的旨意，或者会说国家对孙登停留不来而愠怒，所以为了这件事起兵征讨。假使军队出发而孙登就到来，那么引起影响大，所得到的收获却极小，并不值得为了这个而庆贺。假使孙权骄傲凶狠，一点也没有送儿子人朝的意思，只是惧怕那舆论尚未顺从，心怀烦怨愁苦。我愚昧地认为应当分别诏令出征的各位将领，各自明白地奉行命令，慎重地掌握自己的部队，对外炫耀显赫的军威，在内部则广泛地开垦土地、种植庄稼，使军队像山岳一样停峙，像深渊一般安静，态势不可动摇，计谋不可测度。"这时，皇帝鉴于组成的讨伐军队已经开拔，孙权的儿子又不到，亲自率军到长江边才回来。

明帝即位，进封王朗为兰陵侯，增赠封邑五百户，与过去所封合计共一千二百户。派到邺城省视文昭皇后的陵墓，看到有的老百姓缺衣少食。当时正营建宫室，王朗上奏章道："陛下即位以来，屡次颁布施恩的诏书，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没有不欢欣鼓舞的。我不久前奉命出使到北方去，在往返的道路上，听见到众多的徭役，其中有许多是可以免除或减省的。希望陛下再次保留从早晨到午后处理政务的传统，来制定战胜敌人的策略。从前夏禹将要打算战胜大水灾、拯救天下的老百姓，所以就首先使自己的宫室低下，使自己的衣食俭朴，因而能够拥有九州，边远地区的人民也来辅助他完成事业。句践打算扩展他的疆土，在姑苏斩下夫差的脑袋，所以也节约他

自己以及家庭的费用，使自己的家庭俭朴来施思给国家，因而能够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在中原赢得声威，在华夏奠定霸业。汉代的文帝、景帝也打算发扬光大先祖的事业，增益尊崇的前人尚未完成的宏大功业，所以能够决意舍弃重金修建的楼台，穿黑色的粗丝衣服来表明节俭，宫，内减少太监并且不接受贡献，宫外简省徭役和赋税并且勉力农业和桑业，因而能够号称升平时世，几乎达到不用刑罚。汉孝武帝之所以能够发扬他的军事势力，向外开拓他的疆土，实在是文帝、景帝积贮丰足，所以能够完成伟大的功绩。霍去病只是一个具有中等才华的将领，还因为匈奴未消灭，不营造住宅。这表明周济远的就要减损近的，从事外部的就要简省内部的。从汉代初年直到它的中兴，都是在战争略为平息之后，然后凤阙巍峨耸立，德阳宫也一起落成。如今建始宫前足够用来安排官员朝会，崇华殿后足够用来安置宫内的宦官、女官，华林、天渊足够用来开设游宴，如果暂且先修建宫门外的象阙，让能够用来安排远方的人入朝进贡；修筑城池，上能够用来防止敌人攀登跨越，成为国家的险阻要塞，其余一切留待丰年。集中力量从事农业生产，演习军备，那么国内没有未婚嫁的怨女旷夫，人口滋长繁殖，人民充裕，军队强盛。敌军不来宾服前景不够光明，未有过这样的事。”调任为司徒。

当时皇子频繁丧亡，可是后宫里将生孩子而居住在侧室的妃嫔很少，王朗上奏章道：“从前周文王十五岁而生下了周武王，终于享有十个儿子的福分，来扩大姬姓的子孙。周武王已经年老才生了周成王，所以周成王很少兄弟。这两位帝王，各自建立了神圣的德政，没有人能够超过，比较他们享有的子孙之福，就不相同了。大概人的生育有早有晚，所生下的孩子有多有少。陛下既然兼有那二位圣人的德行和福分，年龄大过文王生育武王的时候了，可是在皇后居住的深宫里尚未生下像姬发那样的儿子，在众多的妃嫔居住的侧殿里也未繁殖出皇子。跟武王生成王相比，虽然还不算迟；跟文王生武王相比，就不算早了。按照《周礼》，六宫内官共一百二十人；可是各种经书常说的，都认为最多是十二个人；至于秦、汉末年，有时以千百计算了。虽然内宫人数更多，可是按时到吉馆里生孩子的却很少，表明‘众多男孩’的根本，确实在于情意专一，不只在于追求妃嫔的众多。老臣勤勤恳恳，希望国家共同享有像轩辕黄帝生二十五个儿子那样的福气，可是还比不上周文的十个儿子，因而内心烦怨愁苦。况且少年时常常因被褥舒适温暖而苦恼，被褥舒适温暖对柔弱的肌肤不利，所以难以防护身体，而容易感染疾病。假若少年时常常只让穿乱麻做絮的袍子，并且袍子不很厚，那末必定具有像金石一般坚强的体质，而寿命可以跟南山相比了。”皇帝答复道：“最忠诚的人言辞笃厚，最挚爱的人话语深沉，您既劳苦思虑，又亲手执笔顺势助成，再三表达美好的言辞，使我无比欢欣。我未立继承人，因此使您忧虑，敬纳最真诚的意见，还想倾听美好的箴规。”王朗著有《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都在世上流传。太和二年逝世。谥号成侯。

【陆逊】

初入幕僚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本名议，家中世代为江东的大家族。陆逊年少时就成了孤儿，随着从祖父庐江太守陆康住在官府。袁术与陆康有仇，将要害陆康，陆康送陆逊以及亲戚回到吴县。陆逊比陆康的儿子陆绩年长几岁，就代替陆绩照管家中事务。

孙权作了将军，陆逊二十一岁，开始在将军幕府中任职，历任东西曹令史，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同时兼管县中政务。县里连续几年大旱，陆逊打开粮仓赈济贫民，劝导督促农民种田养蚕，百姓有了依靠，当时吴、会稽、丹阳郡中有许多百姓藏了起来，陆逊向孙权陈述了应当实行的计划，请求为国家将他们都招募回来。会稽山贼的大首领潘临，长期以来成为当地的一大祸害，多少年没有促住。陆逊率领手下招募来的士兵，深入险地征讨，所到之处都被降服，部队发展到二千多人。鄱阳贼首领尤突作乱，又前去征讨。拜授陆逊为定威校尉，驻军利浦。

孙权将兄长孙策的女儿许配给陆逊为妻，多次向陆逊征求对当前大事的处理意见，陆逊建议“现在英雄各据一方，豺狼一般地相互窥望，要想战胜敌人，平定叛乱，没有大部队无法做到。然而山越强盗长期作恶，依据着深山险阻的地形。心腹地区没有平定，很难去考虑夺取远方。可以大规模出动部队，去攻取强盗的精锐兵力。”孙权采纳了他的计策，任他为帐下右都督。恰逢丹阳的匪首费栈接授了曹操授予的印章绶带，煽动山越人，替曹操作内应。孙权派陆逊征讨费栈。费栈的党羽众多，而去征讨的兵力少，陆逊便增加树立了许多牙旗，将鼓角分别布置在各处，夜间潜入山谷之间，擂鼓呐喊，向前进军，当时就使敌人溃散逃走。于是分别处理三个郡的山越民众，强壮的当兵，体弱的补充到民户，得到了精兵几万人，长期作恶的强盗被扫除，所经过的地方都加以肃清整理，回来后驻扎在芜湖。会稽太守淳于式上表说陆逊非法掠夺百姓，骚扰地方。陆逊后来去京都见孙权，谈话中，称淳于式是个好官，孙权说：“淳于式告您，而您却推荐他，为什么呢?”陆逊回答“淳于式是想养活民众，所以告我。如果我再诋毁他来扰乱主上的视听，这种做法不可提倡。”孙权说：“这确像是长者的事情，只是一般人做不到。”

袭取关羽

吕蒙假说有病回到建业，陆逊前去见他，对他说：“与关羽的边境接壤，怎么远离回到京都，后果不值得担忧吗?”吕蒙说：“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但是我病得很重。”陆逊说：“关羽夸耀自己的勇气，欺凌别人。刚刚建有大功，骄傲放纵，只想北进，没有怀疑我方，听说您生病，必定更无防备。现在出其不意，一定可以擒拿制服他。回去见到主上，应当好好谋划。”吕蒙说：“关羽一向勇猛，很难与他抗衡，况且他已经占据了荆州，恩惠威信并行，加上刚刚获得战功，胆量气势更盛，不容易打他的主意啊。”吕蒙回到建业，孙权问：“有谁可以替代你?”吕蒙回答说：“陆逊思考问题深远，才能可以负担起重任，

从他的谋虑来看，终会担当重任。而且他现在名气还不大，关羽不会顾忌他，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如果任用他，应当让他表面上韬隐，暗中观察形势，寻找机会，然后可以取胜。”孙权便召见陆逊，任命他为偏将军右都督，代替吕蒙。

陆逊到了陆口，送信给关羽说：“前些日子听说您观察时机及时行动，用纪律统率部队，用小的举动取得了大的胜利，何等伟大！敌国失败，盟国得利，我们听到消息，击节祝贺。想您将要席卷中原，共同匡扶王室。最近我以不敏之才受命来到西边，仰慕您的风采，想聆听您的良好规劝，”又说：“于禁等人被捉，远近为之欣然赞叹，认为将军的功勋足以永垂于世，虽然是过去晋文公城濮的用兵，淮阴侯攻克赵国的战略，也无法与您相比。听说徐晃等人用少量的骑兵驻在樊城附近，窥探您的动静。曹操是个狡猾的敌人，愤怒起来不顾后果，恐怕他会暗中增加兵力，以实现他的野心。虽然说军队长时间驻扎，但士气仍然很勇猛强悍。况且刚刚取胜之后，往往会轻敌，古人用兵的方法，军队打了胜仗要更加警惕，希望将军周密地制定战略方针，用以保持全胜。我是个书生，疏粗迟钝，不能胜任所承担的职务，幸喜与您这位威德卓著的将军为邻，乐于倾诉自己的见解。虽然不能适合您的策略，但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倘能明白我的仰慕之情，还望加以明察。”关羽看了陆逊的信，认为他有谦卑之心，仰仗自己之意，很放心，不再有什么猜疑。

陆逊将详情报告孙权，陈述可以擒获关羽的要点。孙权便暗中出兵西上，派陆逊与吕蒙为前锋，兵到之后马上攻克了公安、南郡。陆逊径直推进，兼任宜都太守，拜授抚边将军，封为华亭侯。刘备委任的宜都太守樊友弃郡逃跑，各城高级官吏以及蛮夷的部落酋长都投降。陆逊请求颁发金、银、铜印，为新来归附的人授予官职。这一年是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陆逊派将军李异、谢旌等人率领三千人，攻打蜀军将领詹晏、陈凤。李异带领水军、谢旌带领步兵，断绝了险要地区，一举击败了詹晏等人，活捉了陈凤。又攻打房陵太守邓浦、南乡太守郭睦，大败了他们。秭归的大姓家族文布、邓凯等人纠合了夷兵数千人，又与西蜀勾结。陆逊又派谢旌击退了文布、邓凯。文布、邓凯脱身逃走，西蜀任命他们为将军。陆逊让人引诱他们，文布带领许多人投降。前后斩杀、捕获、招降接纳的一共有万人。孙权任命陆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为娄侯。

当时荆州的士人刚回来，有人没有得到适当的安置，陆逊上疏说：“从前汉高祖登位，招揽延用英俊优异的人材；光武帝中兴，众多杰出的人物都来到朝廷，如果可以使政教昌明，任用人不一定要考虑关系的亲疏。现在荆州刚平定，人材还未显达，臣愚心耿耿，请求您普施培养提拔之恩情，让他们得以进用，然后四海之内人们引颈相望，一心想归附教化。”孙权认真采纳了他的意见。

火烧连营

黄武元年，刘备率领大部队来到西部边界，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领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人以及五万人大军抵御刘备的进攻。刘备从巫峡、建平连营到夷陵县界。建了几十个兵营，用金钱、织锦、爵位、赏赐诱惑调动了各夷蛮部

众，任用将军冯习为主将，张南为前锋，辅匡、赵融、廖淳、傅彤等人为别将，先派吴班领数千人在平地上建营寨，想以此挑动吴军应战。各位将领想去攻打他们，陆逊说："这里一定有诈，暂且观察他们如何行动。"刘备知道这条计策行不通，便带领八千伏兵，从山谷中出来。陆逊说："所以不让各位去攻打吴班，是因为我揣摩猜测其中一定有诡。"

陆逊上疏说："夷陵是要害之地，是国家的大门，虽说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失掉。失掉了夷陵就不仅损失了一个郡的地盘，荆州就令人担忧了。现在争夺此地，一定要保证成功。刘备干犯天之常理，不守自己的巢穴，却敢自己前来送死。臣虽然无才，但凭借您的神威，以顺讨逆，打退敌军，就在今日。考察刘备前前后后用兵的情形，失败多，成功少，推而论之，不足忧。臣起初担心他水陆并进，现在他却放弃了水军，只用步兵，到处结营，观察他的布置，一定没有其他变化。谨望您高枕无忧，不要为此事而挂念。"诸位将领说："进攻刘备应该在他刚进军时，现在让他进来了五六百里，相互抗衡已过七八个月，各处险要之地都有牢固的防守，攻击他们一定没有好处。"陆逊说："刘备是个狡猾的敌人，经历的事情很多，他的军队刚刚集结时，意志统一，不可去攻击。现在驻防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我们的便宜，士兵疲劳，意志沮丧，无计可施，攻击这伙敌寇，正在今日。"便先攻打一个营寨，没有得手，众将领都说："白白让士兵去送死。"陆逊说："我已知道攻破敌人的方法子。"使命令部下各拿一把茅草，用火攻战胜蜀军。一待火势起来，就率领全军同时进攻，斩杀了张南、冯习以及胡王沙摩柯等人，攻破了敌人的四十多座军营。刘备的将领杜路、刘宁等人被逼无路，请求降服。刘备登上马鞍山，手下士兵环绕保卫自己。陆逊督促各路人马四面进逼，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上万。刘备趁夜色逃走，驿站的人将逃兵丢下的铠甲担到隘口焚烧，为刘备断后，刘备才得以逃入白帝城。刘备军队的船只、器械，水军步兵的物资，一时间几乎全部损失，尸骸漂满江面，顺流而下。刘备非常惭愧、愤恨，说："我竟然被陆逊打败，受他的侮辱，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当初，孙桓分兵到夷道迎战刘备的前锋部队，被刘备包围，向陆逊求救。陆逊说："不可以"众将说："孙安东在将士中很得人心，城池牢固，储粮充足，没什么担忧的。等我的计划开始施展，即使不去救他，他也可以自然得到解救。"等到他的计策充分施行，刘备的军队果然奔逃溃散。孙桓后来见到陆逊说："先前确实怨你不来相救，直到今天，才知道您用兵自有方法啊。"

抵挡刘备的进攻时，众将领有的是孙策时的旧将，有的是公室贵戚，各自骄傲，不愿听从别人命令。陆逊按着剑洗："刘备是天下知名的人，曹操畏惧他，现在就在我们的边境，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各位都蒙受了国家的恩惠，应当和睦相处，共同消灭这个敌人，对上报答所享受的恩情，然而你们不愿听指挥，是不应该的。

我虽是个书生，但接受是主上的命令。国家之所以委屈你们来接受我的指挥，是认为我还有小小的可以称道的地方，可以忍辱负重。你们各自有自己的

职责，难道还要再推辞！军中有明确的规定，不可违反。”等到攻玻了刘备，计策大多是陆逊提出的，各位将领才服气。孙权听说了这件事，说：“您为什么当初不向我报告众将领中违反命令的人呢?”陆逊回答说：“蒙受的恩情深重，重任超过了我的才能。而且这些将领有人可以成为心腹，有人可以充当战将，有人是功臣，都是国家应当与他们共同商定大事的人。臣下虽然驽懦，私下也仰慕蔺相如、寇恂的忍让精神，来完成国家的大事。”孙权大笑称好，加任他为辅国将军，兼任荆州牧，马上改封为江陵侯。

再说刘备已住在白帝成，徐盛、潘璋、宋谦等人各自争着上表说刘备一定可以捉到，请求再去攻击刘备。孙权向陆逊询问，陆逊与朱然、骆统都认为曹丕集合了大部队，表面上说帮助吴国征讨刘备，内心实际是有奸计，慎重考虑当马上撤军回防。没过多久，魏军果出动，吴国三面受敌。

联蜀破曹

刘备不久病死，儿子刘禅继承了帝位，诸葛亮执掌政务，与孙权连合。当时的情况应该做的事情，孙权总是让陆逊告诉诸葛亮，并刻了孙权的印，放在陆逊那里。孙权每次给刘禅、诸葛亮写信，常常让陆逊看过，轻重是否合适，如果不有妥之处，便让他修改，加印封好送去。

黄武七年，孙权派鄱阳太守周鲂诱骗魏国大司马曹休，曹休果然领兵进入皖县，孙权于是召见陆逊，授予黄钺，任命他为大都督，迎击曹休。曹休已经发觉，为自己受到欺骗而感到耻辱，自恃兵马强壮、兵力雄厚，于是与陆逊交战。陆逊自己担当中路主力，命朱桓、全琮为左右两翼，三路同时推进，果敢冲击曹休的伏兵，赶跑了他们，向北追击逃跑的魏军，一直到了夹石，斩首、捕获了一万多人，牛马骡驴各种牲畜拉的车上万辆，军用物资、武器器械全部缴获。曹休回到魏国，背上生毒疮而死。各路部队整顿通过武昌，孙权让身边侍从用御盖为陆逊遮覆，进入殿门，赏赐给陆逊的东西，都是皇帝专用的上等珍品，当时没有能与他相比。孙权派陆逊回到西陵。

黄龙元年，任命陆逊为上大将军、右都护。这一年，孙权东到建业巡狩，留太子、皇子以及尚书九官在武昌，征召陆逊辅佐，同时负责荆州以及豫章、鄱阳、庐阳三个郡的事务，监督军务国事。当时建昌侯孙虑在住所的堂前修造了斗鸭栏，造得很小巧，陆逊郑重地说：“君侯应当勤奋阅读经书典籍，以使自己不断进步，用这些东西干什么?”孙虑马上将它拆毁。射声校尉孙松在公子中最受孙权喜爱，带兵不认真，军纪松弛，陆逊当着他的面用髡刑处罚了他手下的负责官员。

陆逊虽然身在朝廷之外，但心中惦念着国家的事务。上疏陈述时事说：“臣认为法律过严，下面违反的人就多。近年以来，将领、官吏的犯罪，虽然他们自身不谨慎有责任，然而天下尚未统一，应当考虑进取，小的过错应当给予宽免的恩德，来使下面的人们安心。况且应当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用人应以贤良、才能为先，除非是本质上邪恶、无法容忍的过错，请您重新任用，让他们施展才能，效尽其力。这就是圣明的君王忘记别人的过失、记住别人的功劳，

以成就王业的做法。过去汉高祖不计较陈平的过失，采用他的奇谋，终于建立了帝王大业，功垂千载。严峻的刑法，不是帝王的盛业；有惩罚而无宽恕，不是安抚远方的宏图大计。”

孙权想要派部分军队去攻取夷州和珠崖，都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上疏说：“依臣的愚见，认为天下没有平定，应当集中民力来办当前的大事。现在连年兴兵作战，兵士减员，陛下忧劳圣虑，废寝忘食，将要远征夷州，以成就大业。臣反复思考，没有见到有利之处。远行万里袭击攻打，有什么风波很难预测，战士换了水土，一定会生病，现在驱赶着士兵进入不毛之地，想要获益却受到损坏，想要得到好处反而引来灾害。再有，珠崖地势险要，民众犹如禽兽，得到那里的民众无法成就大业，没有那样的士兵不会影响兵力。现在江东已有的士兵，已经足以图谋大事，但应当积蓄力量然后再有所行动。过去桓王创业，兵力不到五百人，却开拓了大业。陛下承受天命，开拓、平定了江南。臣听说治理混乱、讨伐叛逆，靠的是武力的威慑；种田养蚕、穿衣吃饭，是百姓的根本之业，然而战事未停，百姓挨饿受冻。臣愚见认为应当使士卒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宽免他们的租税，使大家同心合力，用道义激励他们的勇敢，那么中原可以平定，九州可以统一。”孙权终于去征讨夷州，得不偿失。

到公孙渊背弃盟约，孙权想要前去征讨，陆逊上疏说：“公孙渊凭据着险要牢固的地势，扣留了我们的使节，有名马而不贡献，实在是让人愤怒。蛮夷扰乱华夏，没有受到王道的教化，流窜在荒远地区，抵抗王朝的军队，以至帝王震怒，想要亲自以万乘之尊去渡海远征，不考虑这样做的危险会陷入无法预测的境地。现在天下纷扰如云，群雄相争似虎，英雄豪杰踊跃，大张声势，互相窥探。陛下凭借神武之姿，承受天命，在乌林打败曹操，在西陵打败了刘备，在荆州活捉了关羽，这三个敌人都是当今世界的英雄豪杰，都挫伤了他们的锐气。圣明的教化安抚所及，远到万里之外百姓归服，正要荡平华夏大地，一统天下。现在不忍下小的愤怒，爆发雷霆般的大怒，违反了不置于危险境地的戒条，轻看自己的高贵身分，这是臣感到疑惑的地方。臣听说有志向行万里的人，不会中途停下脚步；想要夺取天下的人，不会着意于小事而影响大计。强大的敌人在边境，边民还没有臣服，陛下乘船远征，一定会给外敌造成可乘之机。忧患发生了才感到焦虑，后悔也来不及了。假如我方的大业成功，那么公孙渊不用征讨也会自己顺服，现在您舍不得辽东的民众和马匹，为什么偏要抛弃江东已经安稳的基业而不在乎呢？请求让六路大军停止行动，威慑强大的敌人，早日平定中原，功垂未来。”孙权采纳了他的意见。

嘉禾五年，孙权北征，派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派亲信韩扁带奏章去向孙权报告，回来时，在沔中遇到敌人，敌边巡逻时抓住了韩扁。诸葛瑾听说这个消息很害怕，写信给陆逊说：“主上已经回去，敌人捉到了韩扁，详细知道了我军的虚实。况且江水已枯，应当赶紧撤军。”陆逊没有答复，正在催促人种植蔓菁和豆子，与手下将领下棋、射覆像往常一样。诸葛瑾说：“伯言智谋多，这样做应当是有缘由的。”

亲自来见陆逊，陆逊说："敌人听说主上回去，没有什么顾虑了，一心一意对付我们，我军已防守住要害之处，手下的兵士如有不安，应当用自己的镇定来让他们安下心来，采取应变的设施，然后再撤出。现在就要撤走，敌方会认为我们害怕了，趁机前来逼攻，一定会使我们失败。"于是陆逊与诸葛瑾秘密商定计策，让诸葛瑾统率舟船，陆逊带领全部兵马，向襄阳城进发。敌人平时就惧怕陆逊，急忙掉头直赴城中。诸葛瑾于是带领船只撤出，陆逊从容整理好部队，虚张声势，步行上船，敌军不敢进犯。军队到了白围，假说驻扎下打猎，暗中派遣将军周峻、张梁等人去攻打江夏郡的新市、安陆、石阳，石阳的集市正热闹，周峻等人突然杀到，百姓都丢下东西拥进城里。城门被堵无法关上，敌军便自己杀死百姓，然后才把门关上，吴军斩首及捕获的敌人共有一千多人。对那些俘虏，一律加以保护，不让士兵对他们进行干扰和侵侮。带家属的，让他们去照料。有失去妻子儿女的，马上发给衣服食物，特别加以慰劳，派人送他们回去，很多人受到感召结伴来归附。邻县的人一心向往陆逊，江夏的功曹赵濯、刘备的将领弋阳人裴生以及夷王梅颐等人，都帅领着党羽前来归附陆逊。陆逊拿出钱财布帛，周济照顾他们。

又有魏国江夏太守逯式兼管兵马，经常在边境为害，而且与归附魏国的将军文聘的儿子文休一向不和。陆逊听说了他的情况，马上假装接到了给逯式的信后复信说："收到了你措辞诚恳的采信，知道你与文休长期结有仇怨，势不两立，想来前来归附，马上以密件将来信上报给主上，集合了人马前来相迎，应该私下里严格保密、迅速行动，再将定好的日期告诉我。"将信放在边界上，逯式的士兵得到了信拿给他看，逯式惶恐不安，于是亲自将妻子儿女送到洛阳。从此手下的官吏士卒不再信任、服从他，最终被免去官位。

嘉禾六年，中郎将周祗请允许他在鄱阳郡招募人马，此事下发到陆逊，征求处理意见。陆逊认为这个郡的民众好动，很难安定，进行召集，恐怕会变成强盗。然而周祗顽固陈述要这样做，郡民吴遽果然作乱，杀死了周祗，攻克诸县。豫章、庐陵的惯匪，同时响应吴遽，成为一伙强盗。陆逊得知了这一消息，立即去征讨，很快攻破，吴遽等人相继率部下投降，陆逊选精兵八千多人，平定了三个郡。

当时中书典校吕壹玩弄权术，作威作福，陆逊与太常潘浚都感到担忧，说到这事痛哭流涕。后来孙权杀了吕壹，很为这事而自责，事情记载在《孙权传》中。

当时谢渊等人各自陈述有利于国家的事情，想要兴利去旧，事情下交给陆逊。陆逊建议说："国家以民众为根本，强盛要依靠民众的力量，财物要由民众拿出。所谓民众殷实而国家衰弱、百姓贫穷而国家富强的情况，从来没有过。所以治理国家，得到民心就会天下大治，失掉民心则天下大乱。如果百姓得不到利益，而要让他们竭尽全力，报效国家，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诗经》中感叹道：'善于安定百姓，会受到的福禄。'请求您广施圣恩，帮助百姓，几年之内，国家的财用稍微丰足了，然后再作打算。"

任相安民

赤乌七年，陆逊接替顾雍任丞相，朝廷颁布诏书说："朕的德行不高，承天命继承帝业，天下尚未统一，奸匪到处都是，朕日日夜夜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您天资聪慧，德高望重，总领军务，辅助国家，消灾灾祸。具有超出世人的功劳的人，一定会得到光耀巨大的尊宠；有文武才能的人，一定可以承担社稷的重任。过去伊尹使商汤的事业兴盛，吕尚辅佐周武王夺取天下，在内辅佐朝政、在外统兵打仗，这两方面的能力您都兼而有之。现在任用您为宰相，派使者持节代理太常傅常授予您印绶。您要使您的美德发扬光大，修治您美好的功业，谨遵王命，安抚四方。啊！总管三公事，为百官做出榜样，能够不谨慎吗？您要自勉。原来所担任的州、都护，兼管的武昌事务都照旧。"

当初，太子孙和和鲁王孙霸各立门户，内外职务大多由官员的子弟担任。全琮向陆逊报告，陆逊认为这些子弟如果有才能，不用担心不能任用，不应当私下凭关系来求得荣誉、利益；如果才能不佳，终究要招灾祸。况且听说两宫的势力不相上下，一定会有矛盾，这是古人最忌讳的。全琮的儿子全寄，果然阿谀奉承鲁王，轻率地与太子结下了仇。陆逊写信给全琮说："你不学习金日磾，反而包庇阿寄，终于为足下家中招来灾祸了。"全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与他有了隔阂。等到太子要被废掉的议论流传，陆逊上疏陈述："太子是正统，地位应当像磐石一样牢固，鲁王是藩臣，应当使他们之间受到的宠爱有差别，彼此各自得到他们应当得到的，上下都可相安无事，"上书三四次，最后请求到京都拜见孙权，想要亲自论证嫡庶的区别，匡正得失。孙权没有允许，然而陆逊的外甥顾谭、顾承、姚信，都因为与太子关系密切，受到冤枉，被流放。太子太傅吾粲因多次与陆逊通信而坐罪，下狱死。孙权多次派遣中使来责备陆逊，陆逊愤闷而死，死时六十三岁。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

当初，暨艳提出要建造营府，陆逊劝他，认为这样一定会招来灾祸。又对诸葛恪说："在我前面的人，我一定要尊奉他们，与他们一同晋升，地位在我下面的人，就要扶助他们，现在看您盛气凌人，凌驾于尊长之上，又轻视下级，这不是平安、仁德的根基啊。"又广陵人杨竺年轻时就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陆逊说他最终会失败，劝杨竺的兄长杨穆与他分开，另立门户。他的先见就是这样。长子陆延早年夭逝，次子陆抗继承爵位。孙休当了皇帝，追封陆逊谥号为昭侯。

【张华】

少小知学学识渊博

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县）人。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这给他们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一下子张华一家人的生活就陷了极度的贫困之中。从小懂事的张华只好拿起羊鞭，以放牧羊群来度日谋生。虽说生活清苦，但张华生性好学，学而不倦。他博览群书，对于图纬方伎方面书籍阅读更是十分精细。他对于各类书籍无所不涉猎，正是由于他的刻苦勤奋，使得他学识广博。工于文辞，辞藻温丽，见识宽广且

又通达事理。

由于苦难经历，张华他从小为人就很谨慎、稳健。即便仓促遇事，他仍然会很有礼貌风度。人生旅途的艰辛，使他极富有同情心，他能见义勇为，济人之所急，胸怀宽广，善解人意。当时人们对他的城府不十分了解。

张华的才能越来越赢得乡人的赞赏和器重。乡人刘放十分欣赏张华的才干，主动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可是，在外界，张华还不是非常有名气，他著了《鷦鷯赋》，以此寄托自己的情怀，一举成名。当时著名的学者阮籍读了他的这部作品后，情不自禁地说道："这是王佐之才！"从此，他的声名更加显著。

当时正值曹魏的后期，张华所在郡守鲜于嗣推荐他当魏国的太常博士。曾十分欣赏他的同郡人卢钤向执掌朝政的司马昭作了介绍，于是张华就当上了河南尹丞。但他还没有到职，又被任命为佐著作郎，时隔不久，他又调任长史，兼中书郎。

在担任中书郎期间，经常草拟朝议表奏。他所起草的文件大多能够为朝廷采用，因此，张华在魏朝为官时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才干。

力主伐吴　声名显赫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魏禅位于晋。晋武帝司马炎任命张华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

张华博闻多见，强记默识，对四海之内的各种事物均了如指掌。对于刚建立起来的西晋王朝来说，张华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晋武帝曾向张华询问有关汉朝宫室制度以及建章宫内成千上万门户的修建情况，张华对答如流，听得人们都入神忘倦，如痴似醉。他在地上画成图样，左右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看，无一不暗暗伸出拇指，夸他是旷世的奇才。晋武帝司马炎也对他特别优厚，当时人们把张华比作春秋时齐国的宰相子产。

几年以后，张华被任命为中书令，后又加散骑常侍。在此期间，张华的母亲去世，这对于张华打击相当大，张华与母亲曾经相依为伞。回首往事，他更加悲痛，他举办了母亲的丧礼，晋武帝也下诏慰勉，同时催促他尽快到任履职。

司马炎称帝以后，决心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统一中国。灭蜀两年后，又作出伐吴的决策。当时晋武帝和羊祜商量伐吴，群臣大多认为不可以伐吴，只有张华赞成伐吴。后来，羊祜病重，武帝派张华到羊祜府上问伐吴的具体计划。等到将要大举伐吴时，以张华为度支尚书，编制漕运计划和军费预算，确定伐吴的策略。

晋军开始进攻时并未能取胜。贾充等人于是就抓住把柄，上奏皇上要求诛杀张华向天下谢罪。晋武帝说："伐吴是我的意见，张华不过和我意见相同罢了。"晋武帝不听贾充等的意见，仍就重用张华，及后伐吴的重大事情都与张华商量和策划。

公元280年，司马炎统率大军终于打败吴国，最终完成三国归晋。事后，晋武帝下诏，高度评价了张华的功绩，并给予丰厚的奖赏。诏书说："尚书、关内侯张华，以前曾和已故太傅羊祜共创伐吴大计，并主管军事，部署各方事务，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功勋。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食邑一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赐绢万

匹。"

张华因此名声更是显赫一时，成为朝廷内外人们刮目相看人物。大家都很推崇他。晋史的修撰和仪礼宪章等的制定，都交给张华，让他定夺、增补。另外，当时诏令诰命都由张华草拟，声誉日益增高，影响越来越大，朝廷上有张华担任宰相的呼声。这种迹象既是对张华政绩的认可，同时也表明了张华在政治斗争中的不祥之兆。

高标见妒　离京外放

朝廷正准备讨论征召张华为相，并要同时进封爵位。但这一切却遭到政敌的嫉妒和排挤。荀勖自以为出身世家大族，凭借晋武帝对他的厚恩，他十分妒忌寒门出身的张华。他经常寻找时机，想方设法让张华离京出任地方官职，以解除对他们的威胁。有一天，晋武帝问张华："谁可以托付后事?"张华回答："既有德行而又是至亲，没有人比得上齐王司马攸。"然而，司马攸并不是武帝意想中的人选，张华的建议有点不称武帝的心意。恰恰在此时，流言蜚语就起来了。许多妒忌的大臣都排挤张华，一再要求张华到外地任职。最后张华只得离京任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这次，他离京任职也够偏远了，直接到了北部边塞。

张华来到幽州，并没有消沉下去，他依然忠于职守。首先他着手抚慰新旧归附的人，安排流亡者的生活，抚慰北方的少数民族，从而使边陲的各族百姓都归顺晋朝。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傍海，距离幽州四千多里，历代从未归附的有二十多国也都派遣使者来朝，贡献地方土特产。他在边境地区任职其间，采取各种政策，做到安国安民，对促进生产的恢复和边境地区的安宁，产生了积极作用。于是，远方宾服，四境安宁，连年丰收，兵强马壮。

塞翁失马，安知祸福，张华此次出京为官，从另一方面看，也恰是他展现政治才干的好机会，朝廷上下对张华刮目相看，尤其是晋武帝更赞赏不已，准备征召张华回京任相。晋武帝和群臣议论此事，顺便谈论魏晋之间的事情，晋武帝问侍奉过自己的宠臣冯骓一些事情，当谈到钟会叛逆时，冯骥说："臣以为钟会叛逆的祸事其实起因于太祖（指司马昭）。"武帝闻听勃然大怒，说："你这是什么话呀!"冯氏意识到自己失言，立即脱帽谢罪说："我愚昧瞎说，罪该万死，但我的意思还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武帝说："你怎么讲!"冯氏说："我以为善于驾马的人，一定懂得六条马索伸缩的不同力量；善于为政的人，必然要明白控制官员的重要意义。所以仲由因为兼人之才而被抑制，冉求因为退让软弱而被进用，汉高祖八王因为宠幸太过而被诛灭，光武帝诸将因为能有所抑制而得到善终。不是上面有仁爱和残暴的不同，也不是下面有愚昧和智明的区别，而是对臣下抑制还是显扬，是一味给予还是有所削夺所造成的。钟会的才能和见识有限，而太祖夸奖太过，称赞他的谋略，抬高他的名望，任以要职，委以重兵，所以使钟会自以为计谋周详，功劳过人，飞扬跋扈，终于构成凶逆之罪。假使太祖用他的小聪明，而以大礼节制他，作乱之事就不会形成了。"武帝此时的神色才算松弛下来说道："确实是这样。"冯氏叩头说："陛下既然同意我的说法，应该考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要使国家再发生钟会

那样叛逆而导致覆亡的人和事。"武帝问：'现在难道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氏说："东方朔有句话说'谈何容易'，《易经》上说：'臣不缜密则会害自己。"武帝于是屏退左右说："你尽量说来。"冯氏说"陛下的谋臣中，凡是有大功于天下，海内没有不知道的，据有地方重镇，总理兵马要政的，都应该在陛下考虑之中。"

冯氏谈古论今指东道西，其实是在影射张华，据说，张华曾经在晋武帝面前指出过冯氏之兄冯恢的缺点。冯氏因此耿耿于怀，伺机打击报复。冯氏的话在武帝面前真的发挥了作用，武帝信以为然。不久，召张华为太常。因为太庙的栋梁折断，张华被免官，直到武帝去世，张华只以列侯身份朝见。

费心费力　辅助朝政

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张华被召回京师，任太子少傅，他和王戎、裴楷、和峤等俱为德高望重之人，但却被杨骏所妒，不能参与朝政。杨骏后被诛杀，皇太后也将被废黜，群臣集会于朝堂，参加议论的人都见风使舵，有的人提出"《春秋》绝文姜，现在太后自绝于宗庙，也应该废黜"。但张华对此等意见却不苟合。他认为："依夫妇之道，为父的也不能改变。皇太后不是得罪于先帝，现在因为和他父亲杨骏有牵连，不能母信天下，应该按照汉朝废赵太后为孝成后的旧规，贬太后尊号，还称武皇后，居住别宫，以顾全贵终之恩。"然而，晋惠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太后因此被废为庶人。

还有一件事，楚王司马纬受贾后密诏，杀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桀等，内外兵灾纷扰，朝廷上下一片慌乱，大家都拿不出什么好的对付办法。在这紧急关头，张华向惠帝提出了英明的决策。他说："楚王司马玮假传圣旨，擅自杀害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侍卫桀，将士因此事起乱于仓促之间，不了解情况，认为是国家的意见，所以相互跟从。现在可以派人举着画有驺虞的旗帜，告示军队解除严备，按理一定会望风披靡。"张华的建议得到惠帝的首肯，付诸实行，最后楚王司马玮果然失败。

惠帝元康元年（公元 291 年），张华因首先献计诛杀司马玮有功，朝廷拜为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但是，张华对开府仪同三司一职却坚决推辞。

张华身居要职，又遭受贾谧和贾后的妒嫉，他虽出身庶族，但文雅而有谋略，进没有威逼皇上的嫌疑，退又为众望所归。惠帝想依靠张华整顿朝纲，咨询朝政。但碍于贾后、贾充故疑而未决。去问裴颁。裴颁向来敬重张华，极表赞成。张华也尽忠匡正朝政，辅佐惠帝，在朝廷内外弥补调停，虽然处在昏主悍后之间，但他不负时望，令海内外平安无事。

张华担心贾后家族太跋扈，于是作《女史箴》以此规劝。张华的才智非凡，虽然贾后凶横忌妒，但也不得不对他敬畏三分。过了很久，进封张华为北武郡公。张华辞让十多次，诏书一再敦促，才肯接受。五年以后，公元 296 年，张华代替下邳王司马晃为司空，免去相位。

贾后谋划废愍怀太子，左卫率刘卞受太子的信任和优厚的待遇，每次集会宴饮，刘卞都参加。刘卞屡次看见贾谧骄傲，太子忿恨，形于言色，刘卞也心怀不平。刘卞就贾后谋废太子的事请教

张华，张华说：“没有听说。”刘卞说：“我是饥寒贫弱的人，得到您的提拔成全，才有今日，士感恩知己，所以把话和盘托出，那么您对我还有怀疑吗？”张华说：“倘若有这样的事，你打算怎么样呢？”刘卞说：“东宫豪杰如林，四处有精兵万人，您有阿衡的责任，如果能够收到的命令，皇太子朝见而录尚书事，废贾后于金墉城，不过两黄门之力而已。”张华说：“当今天子在上，太子为人之子，我又没有接受阿衡的任命，忽然参与做这样的事，是无君无父，而以不孝告示天下，虽然成功，还是不免有罪，况且权贵皇戚满朝，掌握权柄的人意见不一致，这样做能不发生事故么？”

惠帝在式乾殿召集群臣，拿出太子谋反手书给群臣看，没有人敢说话。只有张华谏言：“这是国家大祸。自从汉武帝以来，每当废黜正嫡，常常导致祸乱。况且现在国家建立时间不长，愿陛下三思而行，考虑周详。”尚书仆射裴颜认为应该先查出传书的人，又请比较太子字迹，不然恐有欺诈作伪。贾后从内宫拿出太子以前给惠帝的奏启十几张，众臣比较，也没有人敢说这不是太子的字迹。君臣一直议到夕阳西下尚未做出决定。贾后知道张华等决计不会废太子，因而迫不及待地自己上表请求将太子免为庶人，惠帝就同意她的意见。

张华辅佐惠帝的几年中，实在是处境艰难。朝廷上下和宫廷内外相当复杂，周旋于君臣后妃之间。又要忠正辅国，实在是费心竭力。

拒逆被害　贤名犹存

赵王司马伦当镇西将军时，骚扰关中，引起氐羌反叛，于是梁王司马肜代替他。有人对张华说：“赵王贪婪愚蠢，信用孙秀，到处扰乱而孙秀又趁机欺上瞒下，为非作歹，是个大奸雄。现在可以派遣梁王斩杀孙秀，除去赵王半边臂膀，向关右谢罪，这样做，不是也可以吗？”张华同意，梁王司马肜也同意了。孙秀的朋友冉辛从西边回来，对司马肜说：“氐羌自生反叛，不是孙秀引起的。”司马肜去关中后，孙秀幸免于死。

司马伦经回到洛阳，向贾后阿谀奉承，要求任录尚书事。后来又要求任尚书事，张华和裴颜都坚决反对。由此双方结下仇怨，司马伦和孙秀把张华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时武库起火，张华担心因此会发生政变，部署卫兵固守周围，然后开始救火，但大火凶猛，历代珍宝以及汉高祖的斩蛇剑、王莽的头颅、孔子的鞋等都付之一炬。

司马伦、孙秀准备废除贾后。孙秀让司马雅夜间告诉张华：“现今社稷面临着危险，赵王想和你共同匡辅朝廷，成霸者的事业。”张华知道孙秀等必定要做篡位夺权的事情，因此断然加以拒绝。司马雅发怒说：“刀将架在你的脖子上，你这样倔强。”说完扬长而去。当天夜里，司马伦等人开始向张华发难，诈称有诏令召见张华，于是就把他和裴颜收押在狱中。

张华也预感自己即将遭害。对张林说：“你要害忠臣吗？”张林称有诏书，并责问张华说：“你为宰相，担任天下重任，太子被废，不能为之而死，为什么？”张华说：“式乾殿议事，我曾进谏，事实都在，并不是我不谏。”张林说：“如果谏而不从，为什么不辞官？”张华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使者来到

这里，说："有诏斩公。"张华说："我是先帝老臣，赤胆忠心。我不怕死，忧虑的是王室有难，祸不可测。"于是，张华在前殿的马道南被害，夷灭三族。朝野内外无不悲痛，时年六十九岁。

张华虽然残遭杀害，但他的贤德美名被世人所怀念。张华平生喜欢有才能的人，举贤纳士从不知道疲倦，不管出身侯门或庶族，只要有一点优点和好处，他都嗟叹称道，为他们扬名。

陆机兄弟志高气盛，自以为身为吴国世家，初到洛阳，看不起中原人士。但自从见了张华，一见如故，他们钦佩张华的德望风范，像老师那样敬重他。张华被杀以后，他们曾为张华作挽辞，又作《咏德赋》以示悼念。

后来司马伦、孙秀被杀，齐王司马冏辅政，挚虞等都纷纷上书，奏请应该为张华平反昭雪，但当时在讨论此事时，也有不同意，朝廷反复议论了很久，仍未有结果。

惠帝太安二年（303），皇帝下诏为张华平反昭雪，终于使这场大冤案有了结果。

张华特别喜欢书籍，身死之后，家中没有其他多余的财产，只有文史书籍，盈儿满箧。他生前曾经搬过家，据说当时运载他的书籍就有三大车。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都根据张华的藏书加以修正。天下秘籍奇书世上罕有的，都藏在张华家中。因此博物论闻，当世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张华著有《博物志》十卷及文章若干篇，记述了山川地理、百工技艺、珍禽怪异、历史传闻以及神仙方术等方面的内容。虽然原书已佚，但后人又有所辑录，并流传于世。

【高允】

高允（390～487年），字伯恭，北魏渤海（今河北沧州）人。少时出家当和尚，不久还俗，千里投师求学。他曾做过数年郡功曹小吏，因廉洁奉公而受到嘉奖；也曾随岳平王讨伐北凉（今甘肃境内），因战功卓著而封爵。此后，官职迅速升迁，很快便被任命为著作郎、中书令兼太子师。

为民请愿

自北魏消灭了北凉，入主中原，统一北方，总算结束了十六国长期混战的局面。但战争创伤严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再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基于本民族（鲜卑族）传统观念，仍大量禁封良田以供狩猎放牧。照史书上的记载是：当时"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如此一来，当地百姓虽然免遭了战乱之苦，但仍无休养生息之地，不得不继续四处逃难。

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高允心急如焚。在一次与太武帝论政之机，他详细道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反复建议废除田禁，让百姓重返家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太武帝深以为然，遂下令"除禁田，悉以抚民"。

不久，高允又发现王室婚丧嫁娶奢侈浪费；上行下效，给百姓带来极大灾难。同时，太子也听信小人之言，营立私田，畜养鸡犬，甚至让人拿到集市上去卖。在他的影响下，王公大臣也都变着法儿与民争利，使百姓深受其害。于是，他又多次进谏，力主"简婚嫁，薄丧葬"；将太子"所在园田，分给贫下，畜产贬卖，以时收散"。

鉴于文成帝拓跋濬的大起宫室，高允也进谏劝阻。他说：“如广修宫室，斫材运土，须动员杂役丁夫数万人；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人之众”。

以上建议，几乎全都被皇帝采纳，使百姓从中受益匪浅。

舍己救人

高允为官，执义守法，犯颜直谏，曾救护了许多人才。尤其是编修《国记》案，深受时人敬仰。

太武帝时，高允奉诏与司徒崔浩同修《国记》。因崔浩公务繁忙，具体著述实际上是由高允主持的。高允基于鲜卑族刚从原始社会向封建制转化，有许多不合封建礼教之处，却并未掩饰美化，而是据实而写，结果，有些章节被人认为“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国记》修成后，崔浩将它刻石立于魏都平城的郊外大道上，公布于众。于是，大大触怒了鲜卑贵族。太武帝更为恼火，当即定为“暴扬国恶”之罪，下旨将有关人员处死、灭族。

太子为了替其老师高允开脱，决定和高允一起进见太武帝，并再三嘱咐他：至尊如有询问，你尽管顺着我的话说。待见到太武帝，太子首先奏道：高允在臣宫相处多年，为人小心谨慎。他虽与崔浩同撰《国记》，但损益褒贬，均系崔浩总裁。高允没等太子将话说完，马上据实承担了责任。太武帝大怒，决定立斩高允。太子又急忙解释道：高允这是惧怕父皇天威，一时惊惶失措，语无伦次。儿臣曾私下问过他事实真相，他已承认全系崔浩所为。高允一听，连连摇头，再三表示：这是太子哀怜他，为他乞命；事实上，太子从未问过他，他也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还强调说：臣罪当灭族，不敢妄言！太武帝见他如此表现，不由得动了心，感叹道：“临死不移，人情之所难；为臣不欺君，不愧贞臣，应赦其罪。”随后，命高允起草诏书：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但高允却“持疑不为”，又冒死为崔浩争辩。最后，经太子反复说情，只杀了崔浩及其姻亲族人，其余仅以身死。

多年后，太武帝与人谈及此事，还颇为感慨地说：当初，假如没有高允力争，要多死数千人！

恩泽多方

高允自太武帝至孝文帝，出入三省参与枢密 50 多年。太武帝与他同定律令，共商政朝；文成帝对他礼敬更甚，不呼其名而尊称“令公”。其间，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多方为百姓谋利益。

高允到了暮年，仍时时处处想着他人。

在他 96 岁那年，孝文帝派御车接他进宫。不料，途中马受惊，翻了车，使他面部 3 处受了伤。孝文帝大怒，决定将驾车的人先打 40 大板，然后斩首示众。高允却力言无恙，再三恳请孝文帝免了那人的罪过。孝文帝看在老臣的面子上，只好收回了成命。

此后不久，中黄门苏兴寿搀扶着高允行走。突然，不知道从哪儿蹿出了一条狗，把高允惊倒在雪地上。苏兴寿顿时吓得嘴唇发青、浑身打颤；而高允却一再安慰他，还让他不要将此事讲出去。

后来，有一位名叫窦瑾的大臣因坐事被杀，儿子逃亡，其妻焦氏年老无靠。窦瑾昔日的亲朋故友，惟恐受到连累，

谁也不肯救助她。高允听说后，立即让人将焦氏接回自己家，并一连养护她6年多。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野史上都有记载。

自奉清廉

在北魏官场上，贪污腐化之风盛行。而高允却自奉清廉，出污泥而不染。

在他官拜中书令时，虽蒙皇宠，却依然“家贫布衣”。文成帝曾亲自到他家视察，见其只有草屋数间，布被藏袍，厨房的灶台上仅有一点咸菜而已。不禁感叹道：古代所谓清贫之人岂有此乎！于是，一回宫立即赐帛五百匹，粟千斛。但是，高允却坚辞未受。

高允曾多次以年迈为由奏请还乡，文成帝始终没有同意，反而拜他为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又迁尚书领散骑常侍。准他乘车入殿，朝贺不拜，给了他许多优惠待遇。

高允享年98岁。这在历代名臣中，也是少有的。

【苏琼】

苏琼，字珍之，北朝时期长乐郡武强（今河北武强县）人。历仕东魏、北齐、北周，先后当过荆州刺史府的长流参军、并州刑狱参军、南清河郡太守、行台左丞和大理寺卿等，是我国历史上颇负盛名的清官之一。

平反冤狱

苏琼在任并州刑狱参军时，当地曾发生过一起特大抢劫案。有关人员审理此案时，将怀疑对象抓了十几个，并逐个严刑逼供。那些人受不了百般折磨，一个个屈打成招；被抢的失主家也进行过辨认，只是没能起获赃物。苏琼一上任，发现案情复杂，似有冤情。便明察暗访，结果查获到了真正的凶手元景融等10余人，并获得赃证。在释放当初被误指为贼的那些人时，苏琼的上司高澄无限感慨地对他们说：“你们如果不是遇上我的好参军，几乎全被冤枉死！”

苏琼在任南清河郡太守期间，零县百姓魏双成丢失了一头牛，疑是本村农民魏子宾干的，遂将他送到衙门。苏琼稍加审问，就断定魏子宾不是盗贼，并当场将他放回。魏双成不服，又上告说：“府君把贼放走，我那牛到哪里去找呢？”苏琼没理他的话，却开始了秘密巡视私访，并很快捉到了真正的偷牛犯。

从此，当地百姓家的牲畜都再也用不着精心看管。他们说：“只管放心地托付给太守。”邻郡一些富豪们为躲避盗贼，也竞相将自己的财物寄存到南清河郡界内。一旦他们遭到贼人攻击，也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的财物已寄放到苏太守那里了。”盗贼一听，也便退去。

苏琼升任大理卿后，又处理了一些关于谋反的案件。其中，使很多蒙冤者都被昭雪。时任尚书的崔昂曾私下对他说：“你若是想立功扬名，还应该想一想别的办法。如果经常为反叛的逆贼洗罪责，岂不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太轻了？”苏琼正言厉色地答道：“我所昭雪的都是被冤枉的人，从来没有放过一个反逆。”崔昂听罢，不禁羞愧难言。为时不久，京师便流传起这么一句话：“断决无疑苏珍之。”

体恤百姓

据《北齐书》，苏琼任清河太守时，

裴献伯为济州刺史，南清河郡隶属于济州。裴献伯重用刑法，很严酷；而苏琼则施行恩惠，抚育百姓，即“以义养民”。有一次，乐陵郡太守房延佑路过济州，裴献伯问起他外界有关反应，房延佑说：我“只听到讲太守善，刺史恶”。裴献伯表示：“得到百姓称赞的人并非就是至公的人。”房延佑不以为然，说：“若如此，那么汉宣帝时代被誉为良吏的黄霸、龚遂，就要成为罪人了。”后来，朝廷让各州举荐清廉、精干的官吏，裴献伯担心自己的这番话会传到苏琼耳中，以至于苏琼会说他的坏话。然而，苏琼却纵观他多年的政绩，认为他虽然重用刑法，但本意还是爱民的。所以，不但没说他的坏话，还讲了许多好话，并建议为他升级。裴献伯十分感动，其他同僚也都说苏琼公正。

苏琼的“善”，主要表现在他能够体恤百姓。

北齐文宣帝在位时，苏琼所辖管的郡发生了大水灾，老百姓断绝了粮食的有1000多家。为解燃眉之急，苏琼将郡中有粮的人家都集中一起，亲自向他们借粮来分给饥民。但州里却依旧按户来征收租赋，并追查苏琼向富粮户借粮的事。为此，郡里统管征收赋税的属吏对苏琼说：“您怜惜饥民本来是件很好的事，但恐怕会使您受到连累。”苏琼当即表示：“我一人获罪，而能救活1000户人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接着，他上表朝廷，讲明了情况。此后，州里没再来征税，也没再追查他向富粮人家借粮的事，使百姓们平平安安度过了灾年。为此，一些灾民都抚摸着孩子的头告诉他们：是苏太守救了你的命！

在苏琼上任之前有一个规定：淮河两岸间是封锁禁渡的，不准商人过河贩卖。淮南地区受灾时，苏琼经上表请示朝廷，废除了这一制度，准许淮南人到淮北买粮；后来淮北闹饥荒，他又请求允许淮北人到淮南籴粮。于是，淮河开禁，两岸的商人开始自由往来，彼此互通丰歉，使货物得以流通，两岸百姓大受其益。

苏琼还十分重视对百姓乃至属下的教育。每年春天，他都召集儒学家卫觊隆、日元凤等人到郡学讲学；还命令属下官吏在处理公务之余有计划地去听讲。时人曾就此为公事房起了个绰号，叫它“学生屋”。此外，苏琼还下令禁止百姓进行不合乎儒家规定及儒家经典的祭祀，教导百姓在结婚丧葬方面要俭朴，要合于礼仪等等。

苏琼在南清河郡为政6年，百姓受他的恩德感召，从来没有一个人到州里去告状。特别是平原郡妖贼刘黑狗以邪门歪道蛊惑人心、聚徒闹事时，苏琼郡内的百姓同那些人村落相邻，竟无一个人被牵连进去。鉴于此，州里曾前后4次上表，说苏琼政绩最佳，请求表彰、重用；朝中大臣也对他颇为赞赏，尚书辛述就称他“既直且正”。

廉洁自律

苏琼年幼时跟随做官的父亲苏备住在边境，曾晋见东荆州刺史曹芝。曹芝戏问他：“你想做官吗？”苏琼回答说：“国家设置官职，是选拔合格的人去做的，不是自己去求官做。”不少人认为，这也说明他的见识和情操。也正因此，曹芝很赏识他，待他刚刚长大成人，便任他做了刺史府的长流参军。

做官后，苏琼一直勤奋理政，廉洁

自律，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为时不久，便在刺史府内外颇有名气。

《北齐书》上说："琼清慎，不发私书"。意思是，他一向清廉谨慎，对那些托他办私事的请托信，他连拆都不拆。至于请客送礼，更是一概不沾边。破例的只有一次，就是他曾收下了别人送来的两个瓜。而收瓜的事，又一直流传到现在。

那是在他担任南清河郡太守之初，南清河郡的赵颖刚退休回家不久。赵颖曾做过乐陵郡太守，退休时已经 80 岁了。五月初，他得到了两个新成熟的甜瓜，亲自拿去送苏琼。苏琼一再谢而不收，但赵颖倚老卖老，非要他收下不可。苏琼无奈，只好将瓜留了下来。然而，他没有吃，而是把它吊在了大厅的房梁上面。没过几天，人们听说苏太守接受了赵老先生赠送的瓜，竟以为他爱吃新鲜水果，便一个个"竞送新果"。到了大厅，一看赵老先生送的瓜还高高悬在大厅之上，才明白了怎么回事，也就"相顾而去"。从此，再也没有一个人敢给他赠送任何东西。

按照当时的习惯，谁家的长辈去世，亲朋好友都送些钱物之类。再就是地方官离任时，当地同僚、下属也往往予以馈赠。在苏琼任清河郡太守的第 6 个年头，他的父亲病逝；为办理丧事和守孝，他也从此离任。可想而知，这时各类人物以各种方式赠他钱物的大有人在。而史书上记载的，却是四个字：他"一无所受"。

苏琼在担任大理寺卿时，北齐被北周灭亡。北周鉴于他的才干和威望，又起用他担任了博陵郡太守。隋朝开皇（581～600 年）初年，苏琼去世。

【王导】

结琅邪王　辅开国主

王导（276～339 年），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其祖父王览曾官拜光禄大夫，权势显赫。父亲王裁，曾任镇军司马。王导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少年时就很有见识，有很强判断能力，才气较早就流露出来。就在十四岁的时候，高士张公见了很赏识他，对他的堂兄王敦说："这个小孩，从容貌志气上看，是将相的才具。"王导世袭祖爵为即王子。不久，司空刘粯引荐他为东阁祭酒，迁秘书郎、太子舍人、尚书郎，但他都没有赴任。后来入了东海王司马越幕僚。

琅邪王司马睿未做皇帝之前，与王导一见倾心，视为莫逆之交。王导知道天下已大乱，就尽心侍奉琅邪王司马睿，暗中有复兴的志向。琅邪王在洛阳时，王导经常劝请王导任安东司马，参与军事机密和决策。王导恪尽职守，严守机密，出谋献策。琅邪王迁镇至建康，吴人不来归附，住了一个多月，无论士族还是庶人都没有堂兄王敦来找他。王导对他说："琅邪王仁德虽厚，但名望还不高，仁兄的权威已经确立，您应该对琅邪竭尽所能，予以帮助。"三月上巳之时，是水上斋戒而浴的节日，琅邪王乘轿去观看，准备了仪仗。王敦、王导以及许多名流都骑马跟随，以显示琅邪王的威望和名气。吴人纪瞻、顾荣都出身于江南望族，混在等候的人群中偷偷观看。他们看到琅邪王如此威严，心中颇觉惊惧，于是相率拜于街道旁。

对于此行的效果，王导观察得十分

细微，名士庶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都一清二楚。于是他建议司马睿礼贤下士，请江南士族的代表人物出来做官。他对琅邪王说："古时王者都以宾礼对待故老，问风俗习惯，虚心谨慎，以此招致有才德的人。况且，现在天下已乱，九州分裂，大业初创，急于得人才啊！顾荣等都是本地有声望的人，不如引见他们，以此招待一批江南人士；他们如果肯来，其他人就不成问题了。"琅邪王认为王导的建议很有道理。他也十分重视这一点。于是，琅邪王立即派遣王导亲自登门拜请贺循、顾荣，二人被精诚所感动，应命而至。影响所及，使吴人闻风而动，百姓归心。从此以后，琅邪王逐渐得到尊崇，君臣之礼开始奠定。王导在这关键时刻，可以说立了头功。

由于洛阳失陷，中原百姓避乱来到江南的人数相当多七十。王导劝琅邪王搜罗其中的贤人君子，和他们共成大事。此时荆州、扬州安然无恙，户中殷实。王导为政又务求清静，常常劝琅邪王克己厉节，安邦定国。在此创业阶段，琅邪王对王导更是言听计从。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朝野归心，号王导为"仲父"。

琅邪王曾从容地对王导说："你是我的萧何。"王导回答："以前秦王是无道之君，百姓厌弃战乱，巨奸暴虐，人心思汉，革命反正，容易成功。自魏至本朝太康年间，公卿大族以挥霍奢侈相标榜，政治教化颓废，不遵守法度，公卿士大夫都满足于安逸，让奸人有隙可乘，以至所作所为有亏事理。但是否极泰来，也是天道之常。大王刚开始建立命世的功勋，如果有志一统天下，九合诸侯，就必会出现管仲、乐毅那样的人才，岂是小小一国之臣所可比拟。愿您深思熟虑，广择良才。顾荣、贺循、纪瞻、周记等，都是南方的佼佼者，希望尽量礼遇他们，天下就能安定。"王导深知创业阶段人才的重要，司马睿也能够很虚心的采纳了王导的意见，二人相得益彰。永嘉末年，王导迁为丹阳太守，加辅国将军。

王导在给琅邪王的信说："从前魏武帝是政治上通达的主上，荀之若是功臣之最，封爵不过亭侯；仓舒是爱子之宠，赠不过别部司马。以此作为万事的法式，能不戒慎小心吗？现在监临都县，不问贤愚贵贱都加重号，动辄有鼓盖，往往互相攀比。或有人不加尊号，即以为耻辱。天官混杂，朝望颓毁。我忝荷重任，不能增崇山岭，疏通大海，而开导乱源，贪窃名位，紊乱常典。请从我开始，送回所赐鼓盖加崇之物。这样才能使雅俗区别，众望有归而不怨。"王导能申明大义，以身作则，这在乱世之中实在难得。此举感动了琅邪王。琅邪王下令说："王导德重勋高，我所深相倚重，本应该表彰且加以特殊礼遇。但他约己虚心，思尽忠诚，以身率众，应该顺从他的雅意，允许以此为开导塞流的契机。"于是，琅邪王拜王导为宁远将军，不久加振威将军。晋愍帝司马业即位，征王导为吏部郎，王导予以推辞。

琅邪王司马睿公元 317 年在建业（今南京）称帝，史称东晋，司马睿为东晋元帝。在司马睿从亲王到皇帝的过程中，王导是首辅大臣。东晋刚刚建立，王导任丞相军咨祭酒。可以说从西晋过渡到东晋的每一步，其中都留下了王导的足迹。他给予司马睿的帮助是巨大的。在创业之初，他就是如此忠诚地辅助司

马睿。

东晋首辅　总摄朝政

当时整个国家处动乱之中，东晋政权十分衰弱。此时就有不少朝臣名士对此忧心忡忡。桓彝刚过江时，看到朝廷衰弱，对周陋说："我以为中原多事故，来到此地想求活路，而国家衰弱到如此地步，如何能行呢！"他天天忧惧不乐。有一天，桓彝去拜见王导，畅谈天下时势，回来后对周陋说："刚才见到管夷吾，不再发愁了。"从此，由北方过江的人每有闲暇时，常相约到新亭宴饮，周瞻坐在中间叹气说："风景同样好，但举目却有山河之异。"大家都相视流涕而泣。只有王导勃然变色说："应当共同努力协助王室克复神州失地，为什么作楚因相对而泣呀?"听到王导的一番话，大家才默默收泪。

及后，王导已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假节，刺吏如故。王导因堂兄王敦统率六州，坚决辞去中外都督，以避嫌疑。尽管王导坚持推辞三四次，但这也为他后能独揽朝政奠定了基础。王导在推辞时说："假如太阳下同万物，百姓何以仰照!"元帝只好作罢。不久，进王导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又因王导讨伐华铁有功，受封武冈侯。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大山太守徐龛反叛时，皇帝访问可以镇抚黄河以南的人，王导举荐太子左卫率羊鉴。不料羊鉴兵败。王导上疏，主动承担责任。他说："徐龛反叛，早该天诛地灭，臣创议征讨，调举羊鉴。羊鉴昏愚懦弱而全军覆没，有司处以极刑。由于圣恩，得以保全性命。但是我接受重任，总裁枢要，使三军挫败，是我的责任。乞求贬黜，以严明朝廷纲纪。"皇帝下诏不允。不久，王导又代贺循领太子太傅。

当时，朝廷没有设置史官。王导建议立史官，于是典章图书颇具规模。这时孝怀帝太子司马铨被胡人所害，消息传来，有关衙门奏行天子三朝举表、群臣一哭的丧礼。王导认为皇太子是天子之副，普天下都有情谊，应该行三朝哀哭之礼。皇帝同意。等到刘隗得宠用权，王导就渐渐被皇帝疏远了。但他对职责范围内的事，还是谨守不变；对待宠辱之事却恬静而淡泊。有识之士的都称赞王导善于处理荣宠和简慢的关系。王导的堂兄王敦起兵造反，刘隗劝皇帝把王氏全部诛杀，大家在讨论时都认为这样处理会使大臣寒心。王导率领叔伯兄弟子侄二十多人，每天到分省待罪。皇帝认为王导向来忠节，特别归还朝服，召见他。王导叩头谢罪说："逆臣贼子，世代都有，怎能料到现在竟出在臣族!"皇帝赤足起立拉着王导的手说："茂弘，刚要托百里之命给你，为什么这样说呀!"于是下诏："王导大义灭亲，可做我任安东将军的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当时洛阳覆没，海内盼明主，群臣和四方都劝琅邪王进而为帝。这时王氏强盛，有夺取天下之心，尤其王敦忌惮琅邪王贤明，想更议另立，因王导坚决反对才作罢。王敦曾劝王导说："不听我的话，会全族覆灭。"但王导仍力持正义，王敦不能更改他的意志。正因如此，皇帝才依然信任王导。自从汉魏以来，凡是封爵的才能赐谥号。虽然位高德重，先前没有爵位的照例不能加谥号。王导上疏称"武官有爵必得谥，卿校常伯没有

爵位不能谥，这样做没有体现建立制度的本意。”皇帝听从王导的建议。

皇帝在确立太子的问题上，王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来司马睿有夺嫡的意图，以此询问王导。王导说：“立子以长，况且诏又贤能，不宜改立。”皇帝还是犹豫不决，王导日夜切谏。最后司马绍才被定为太子。

再辅明成　势倾朝野

司马绍即位，就是历史上的晋明帝。王导受遗诏辅政。解除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职务，迁司徒。王导的堂兄王敦又带病举兵进犯，王导率子弟发哀，众臣听到后，以为王敦已死，都有奋击之志。待明帝讨伐王敦，假王导节，都督诸军，领扬州刺史。平定王敦，进封王导为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疋，进位太保，司徒如故，佩剑穿鞋上殿，入朝不趋身，赞拜不报名。王导对种种封赐，坚决辞让。

司马绍死后，王导又与庾亮等同受遗诏，共同辅佐幼主司马衍，这就是晋成帝。成帝加王导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待石勒侵略阜陵，下诏加王导大司马、假黄钺，前去讨伐。讨伐之前，军队驻扎在江宁，成帝亲自到郊外为其饯行。不久，石勒败退，王导也解除了大司马的职务。当时，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到处各有义军起义，弄得晋朝廷惶惶不安。庾亮准备要征召苏峻，访问王导。王导说：“苏峻猜忌又阴险，必定不能奉诏。况且山中林薮向藏毒疾，苏峻远在江外，应该宽宏大量，不必与他计较。”庾亮非常固执，没有听从王导的意见，随后征召苏峻。不久苏峻果然发难，晋军惧败，王导人官侍奉成帝，因而王导得以原职居苏峻之右。苏峻又逼迫成帝到石头城，王导力争而没有听从。苏峻每天都来成帝前胡说八道，王导担心会发生不测之祸。这时，路永、匡术、贾宁都劝苏峻杀了王导，尽诛大臣，另树心腹。可是，苏峻素来敬重王导，不予采纳，所以路永等反而对苏峻存有异心。王导派参军袁耽暗中劝诱路永等，计划奉成帝出奔。但苏峻防御很严，计划没有成功。王导带着个儿子随路永逃往白石。

苏峻被平定后，宗庙宫室也已成为灰烬。温峤建议迁都豫章，三吴豪强则请建都会稽。两种议论相持不下，没有结果。王导说：“建康，古时的金陵，以前为帝王之乡；还有孙权刘备都说是帝王之宅。古时帝王不以丰俭迁都，假如要把卫文公的粗帛大帽帮做得更大，也不会行不通，如果不纺麻织布，那么乐土也是虚无的了。况且，北方的敌人正在伺我间隙，一旦示弱，逃窜于蛮荒，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恐怕这些不是良策。现在应该特别示以镇静，群情自然稳定。”因此，温峤等人的迁都计划没有实行，王导的决策得到皇帝和大多数朝臣的认可。由于成帝幼小，王导基本上掌握满朝上下大小政事。他的地位和威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连成帝见王导，每次都要下拜。他给王导的手诏上，还写着“惶恐言”；中书作诏，就写上“敬问”，这被当时认为是程式。后来成帝即位，王导进宫，成帝仍然起立而迎。成帝成和六年（331）冬举行烝祭，下诏归胙于王导，说：“不用下拜。”王导辞以有病不敢接受。

辅政明帝和成帝时，王导能够善于因事制宜。虽说在财政上没有什么大的效益，但支撑朝政也有富余。当时国库

空竭，库藏只有绢布几千匹，卖不出去，而国用还是不足。王导有些发愁，各朝臣都做绢布单衣，建康的士人都乐意相从，竞相仿效，绢布价格因而暴涨。王导马上叫主持其事的人卖出去，每匹贵至一金。时人都称他治国有方。公元331年，正逢大旱，王导上疏逊位。成帝下诏说："圣王当世，行动都合于遗，运用周到，所以人伦有序，万物相宜。朕担负祖宗重任，托位于王公之上，不能仰而陶冶圣人之风，俯而和洽宇宙之间，岁旱过久，百姓怨望，邦国不善，只在我一人。公体道明哲，弘大深远，功著四海，辅弼三世。维系国典于不坠，实同仲同甫之辅周。以受尊崇，更思谦退，引咎自责。本来是元首的过失，却责备宰辅，适足以增加元首的缺点。公管理各种要务，一天都不能旷缺。应该放弃谦逊的近节，遵从安邦定国的远略。门下速遣侍中敦促晓喻。"尽管皇帝如此的真诚，王导还是坚持辞让。皇帝多次下诏书请王导，王导不得已才出来继续管理朝政。石勒骑兵侵掠到历阳，王导请救征讨。皇帝给王导加大司马、假黄钺、中外诸军事，置左右长史、司马，给布万疋。不久石勒退走，解除王导大司马职务，重新转中外大都督，进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汉制罢司徒官，并于丞相府。

原先，庾亮以望重和形势所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乘机劝说庾亮举兵造反。有人劝王导密切注意防御，王导说："我和庾亮休戚相关，错误的言论，智者应该绝口不谈。如你所说，庾亮如果真来，我就辞位还第，有什么可忧惧的。"王导又给陶称写信，认为庾公是成帝元舅，应该好好侍奉他。从此谗言也就平息了。庾亮虽居外镇，但他代表朝廷执掌大权，又据上流之地，拥有强兵，因此趋炎附势之徒多去归附。王导心中不平，若遇西风刮起尘上，他就单扇遮面，慢慢地说："庾亮的尘土污人。"

汉魏以来，群臣不拜帝陵。王导由于与元帝司马睿有亲似布衣的交情，因此每有尊崇进封，都去拜陵，不胜哀戚。从此，诏命百官拜祭陵寝，这也是从王导开始的。

一生操掌大权的王导，其本人生活简朴，很少有奢华之举。家中仓库没有储存的粮食，他不穿丝织的好衣服。成帝知道后，给布万疋，以供他私人享用。王导有虚弱之症，不能坚持朝会，成帝亲自到他府第，饮酒奏乐，然后令乘轿入殿。成帝咸康五年（399），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他的丧葬极为隆重，中兴名臣之中没有一人能比得上他，谥文献。

【桓温】

桓温（312～373），字元子，龙亢（今安徽怀远）人，其父桓彝为宣城太。桓温出生不到一岁，太原温峤到他家见到了他说："这个小孩骨格清奇，可以试着让他哭一下。"听到了他的哭声，温峤惊异地说："真英雄人物呀！"由于温峤的欣赏，桓彝于是就取名为温。温峤笑着说："这样的话，以后改成我的姓吧。"桓彝后被韩晃和江播所害，其时桓温十五岁，枕戈泣血，志在复仇。到十八岁时，正赶上江播去世，江播的三个儿子在居丧，桓温拿刀进入屋里，把三个儿子都杀了，当时人们都赞誉他。

桓温豪爽有风概，相貌堂堂，面有七星，他被南康长公主选为驸马都尉，袭爵万宁男，出任琅邪太守，累迁徐州刺史。他与庾翼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庾翼向晋明帝推荐桓温说："桓温年少有雄略，希望陛下不要以平常人对待他，应该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庾翼去世以后，桓温担任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

桓温有志于在西蜀立下功勋。他看到成汉的国力衰微，永和二年（346），于是率兵西伐，正是康献太后临朝的时候，当桓温上疏启奏准备出发时，朝廷对桓温的西伐甚为担忧，认为西蜀险要偏远，而桓温兵力不多，进入敌方，恐怕凶多吉少。但最后还是准桓温西伐。当初诸葛亮在鱼复平沙上造八阵图，垒石为八行，每行相隔两丈。桓温见到后说："这是常山蛇势。"随行的文武官员都未能认出。当部队到彭模时，他命令参军周楚、孙盛守卫辎重，自去率领兵步直接扑向成都。李势派他的叔父李福及兄李权等攻打彭模，周楚等进行防御，李福退却，桓温又进攻李权等，三战三捷，蜀兵大败，从间道归往成都。桓温军队越战越勇，乘胜追击，大获全胜。桓温在西蜀停留一个月，举贤旌善受到老百姓欢迎。桓温因功进升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石李龙死后，桓温想率兵北征。他先上书请求朝廷讨论是从水路或陆路进兵为宜，时间很久都没有音讯。最后却是朝廷依靠殷浩等人来反对桓温，桓温相当忿怒，然而他很了解殷浩，并不怕他。桓温声言北伐，拜表便行，顺流而下，到了武昌，兵力已有四五万。殷浩害怕被桓温废掉。既想躲避他，又不知如何是好。简文帝司马昱当时是抚军，给桓温写信阐明社稷大计。桓温于是回军还镇，上疏向朝廷言明他的报效国家之志。他被进位太尉，桓温坚决推辞。

殷浩曾到洛阳修复园陵，耗时多年；后又出兵北伐，屡战屡败，器械全部用光。桓温进督司州，朝野对殷浩怨言叠起。于是桓温启奏免除殷浩的官职，从此内外大权归属桓温一人。桓温后又统率步骑兵四万奔赴江陵，水军从襄阳进入均口，到南乡，步兵从淅川进征关中。所到之处居民都不受侵扰，生活安宁。一路上携酒宰牛迎接桓温的有十之八九。皇帝也派侍中黄门到襄阳慰劳桓温。桓温的母亲孔氏后去世，桓温上疏解职，准备送葬宛陵。皇帝下诏不批准。赠临贺大夫人印绶，谥曰敬，派侍中吊祭，谒者监护丧事，十天之内，使者来往八次，轩盖、车马相望于道。桓温办理完丧事后回到任所上。他打算修复园陵，迁都洛阳，表疏上奏十多次，朝廷不准。桓温担任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委以专门征伐的任务。

再次北伐时，桓温从江陵出发，一路厮杀击溃羌族贵族姚襄来到平阳，桓温屯兵太极殿前，徒步进入金墉城，拜谒先帝诸陵；被侵毁的陵，他命令全部修缮，并设置陵令。然后回师京都。升平中（359），桓温改封南郡公。返回江南后，洛阳和其他被收复的土地又相继失陷。太和四年（369），桓温开始第三次北伐。他率领步骑五万人大破前燕军，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前燕得到前秦的支援，截断了晋军的粮道，桓温无奈只得退兵。桓温北伐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

破坏北伐。因此桓温的北伐大都是无功而返。桓温在北伐的过程中，数次受到朝廷以及反对派的阻挠。后来，朝廷改授他并、司，冀三州，罢免他的都督。桓温上表不受，又加他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

总督内外的桓温，已经不可能再大事运筹北伐之事了。他又上疏陈述应该做的七件事；其一，朋党结伙，私议沸腾，应该抑制这种倾向，不宜扩展；其二，人口减少，不应该还按汉时规模设郡，应该并官省职，让他们稳定地尽其职责；其三，日常事务，朝廷各司不能停废，平时的行文档案应该限定日期，不能拖延；其四，应该提倡长幼之乱，奖赏忠良公正的官吏；其五，褒贬赏罚，应该实事求是；其六，应该述遵前典，敦明学业；其七，应该选建史官，编写晋书。其他官员也有所启奏。不久，桓温加羽葆鼓吹，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他只接受鼓吹，其余的全部辞让。他又率船进军合肥，兼扬州牧、录尚书事。但朝廷又把他召回。咸安元年（373），晋简文帝司马昱即位，桓温出次中堂，自任大宰。十一月，赐桓温军队三万人，每人布一匹，米一斛，加大司马桓温为丞相，他不接受。

晋孝武帝司马曜即位，下下诏："先帝遗诏中说：'事大司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尽敬。"又派谢安征召桓温入朝辅政。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贲六十人，桓温不受。当桓温入朝时，赴山陵。孝武下诏："公勋得尊重，师保朕躬，兼有风患，其无敬。"又命尚书谢安等到新亭奉迎，百官全部拜于正道两旁。秋七月己亥日，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大司马、扬州牧、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病逝，时年六十二岁。皇太后与孝武帝亲临朝堂三日，下诏赐九命君王的礼服，又加朝服一具，金钱、衣物等无数，追赠丞相。

【谢安】

迷恋山水　无意仕途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西晋末年南迁寓居会稽。其父谢裒曾任太常。据说谢安四岁时就表露出了将相之气。谯郡的名士桓彝见到谢安后大声赞叹说："这孩子不同一般，前程不会比王导差。"童年的谢安，充分显示了他的天才和智慧。幼小的谢安就见识超群，沉静聪明，气宇不凡。到了少年，他更是卓立不群与众不同。当他去见王蒙时，与王蒙谈论很久，言谈话语，无不显出他的才气与睿智。他走以后，王蒙之子王修问："刚才的客人怎么样？"王蒙赞许道："此客议论不倦，谈锋逼人。"他天资聪颖，赢得各地名士的欣赏和赞许。当时的丞相王导也很器重他。他从小就穿梭于名士行列之间，因此早有名声。青年时代的谢安迷恋山水之间，对于仕途不感兴趣，他情趣高雅，淡泊名利。最初他辟司徒府，任佐著作郎，但他以有病为借口推辞掉了；当他寓居在会稽时，和名士王羲之及高阳许询，僧支遁交游，出外游山玩水，在家谈天说地，议论古今，咏诗作文，没有任何入世济世的意思，他喜欢生活在世外桃源中。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扬州刺史庾冰也很敬慕他，下定决心要请谢安出来做官。他屡次要求下属郡县去敦促谢安。谢安眼看没有

办法搪塞下去了，只得赴召，但一个多月后，他又告假而归。不久，谢安被征召为尚书郎和琅邪王的幕僚，他都不去就任。吏部尚书范汪荐举谢安为吏部郎，谢安还是写信谢绝。有关衙门由于谢安被征召历年不到任，上疏奏请朝廷处以“禁锢终身”，取消他入仕的资格。但谢安毫不在意。他曾经到过临安山中，静坐在石屋内，面临深谷，感到大为快意，他悠然叹道：“能这样才距离伯夷不远了!”他曾和孙绰等泛舟海上，恰巧风起浪涌，众人都很恐惧，谢安仍然吟唱不已，镇定自若。船夫以为谢安喜欢如此，就前进不止。风越来越急，谢安慢慢地说：“这种情况将怎么回去呀?”船夫听到这话，才立即转舵返回。谢安的气度宽宏，众人都是佩服。谢安纵情山水之间，每次游赏必定以歌妓相从。他前半生生活很是潇洒，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转眼间到了不惑之年。

累次征召累次不赴，谢安的举动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简文帝司马昱为相时，对谢安的认识与众不同。他说：“安石既能与人同乐，必不能不与人同忧，召他一定会来。”

四十为官　青云直上

谢万是西中郎将，总管边臣的要员，是谢安的弟弟。谢安虽然隐居自乐，名声反而比弟弟谢万还大，达到公卿宰辅的德望，在家常以礼仪规范训戒子弟。谢安的妻子看见家门富贵，而谢安却无所建树，不求进取，于是对谢安说：“丈夫不能像兄弟谢万那样么?”谢安有些伤感地说：“恐怕免不了有这么一天。”等到谢万被废黜，谢安才有仕进之意，此时他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

开始时候，征西大将军桓温主请谢安当司马，将要从新亭出发，朝士都来送行，中丞高崧和谢安开玩笑说：“你多次不遵朝旨，高卧东山，大家常常这样说，安石不肯出山，将来就和百姓一样么！百姓今天也将和你一样么!”谢安感到很惭愧，但他很快就报到了，桓温见到谢安由衷地高兴，两人谈论平生抱负，整天地欢笑。等谢安出去后，桓温问左右说：“你们能常见我有这样的客人吗?”可以看出，桓温对谢安是十分满意的。有一次，桓温去看望谢安，正巧他在梳理头发。谢安动作很迟慢，很久才完毕，叫仆人取头巾。桓温看见后，制止仆人说：“令谢司马戴帽进来。”桓温对谢安是相当尊重的。桓温准备背伐，正赶上谢万病死，谢安写信请求回家。不久，谢安被任命为吴兴太守。他为官时虽然没有什么政绩令人刮目相看，但离任后却为人所思念。不久，他征拜侍中，进礼部尚书，中护军等职。

司马昱病重之时，桓温上疏推荐谢安应当作为顾命大臣。简文文帝死后，桓温借口奔丧率兵入京，军队屯扎新亭，将颠覆晋室。桓温请谢安和王坦之去，准备在会见时伤害他们。王坦之胆小畏惧，向谢安讨教。谢安不动声色地说。”晋室的存亡，在此一行。”于是，他们去见桓温。王坦之害怕得全身出汗，倒拿手版。谢安从容就席，坐定后，对桓温说：“我听到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必在壁后埋伏人呢?”桓温笑着说：“正因为不能不这样。”他们一起谈笑很久。王坦之和谢安本来同样有名声，这次人们才知道王坦之比不上谢安。

司马曜即位时已有十几岁，但桓温威震朝野，对此情形，群臣议论纷纷，意见不一。谢安和王坦之尽忠辅翼皇帝，

终于使纷乱的局面稳定下来。桓温病危之时，示意要朝廷加自己九锡，朝廷让袁宏拟革。谢安看见后就加以删改，因此十多天没有写成。恰巧桓温去世，锡命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不久谢安任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等到中书令王坦之出任徐州刺史，诏命谢安总管中书事。这时外来侵扰接连不断，边疆战事的消息不断传来，梁州和益州相继失守，樊、邓陷入敌手，谢安却以镇定、平和的心态坐镇朝廷，以长远谋划为治理之计，推行德政。当时文武百官都尽力，形势稳定，朝廷大臣都把他和王导相比，认为文雅有过之而无不及。谢安曾和王羲之登台城，悠然畅想，有超然世外之志。王羲之对谢安说："现世事纷扰，到处都有战事；我们终日清谈，恐怕很不好吧?"谢安说："秦朝委政赵高，二世而亡，难道也是清谈造成的后果?"宫室惨遭毁坏，谢安想进行修缮。尚书令王彪之等以外寇未除为谏，谢安不听从，竟独自做出决定。宫室建成，规模庞大，耗费过多，但奇怪的是百姓没有劳怨之声。朝廷又命谢安领扬州刺史，以武装仪仗百人人殿。这时孝武帝开始亲理政事，进谢安为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谢安坚决推辞军职。当时，天气反常，连年大旱，谢安奏请兴灭继绝，寻求晋初佐命功臣的后代进行封赏。不久，谢安加司徒，后将军府中文武属官都加配司徒府职衔，谢安又推让不拜。又加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和幽州的燕国诸军事。

淝水大胜　下棋照旧

前秦统一了北方对东晋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前秦皇帝苻坚在统一北方的次年，就决定调士卒九十余万人，由苻坚的弟弟苻融率领，南下进攻东晋。前秦的军队很快攻下寿阳（今安徽省寿县)。东晋的军队抵挡不住，纷纷向朝廷告急。

原先谢安为了组织一支归中央直接指挥的得力军队，就让其侄谢募在广陵（今江苏扬州）招募来自徐、兖二州的侨人或其子孙，组成军队，并进行长期严格的训练，号为"北府兵"。北府兵的将卒都深受匈奴和羯人的仇杀之苦，因此有抵御前秦、保卫江南的决心。面对强敌压境，东晋以谢安之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以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北府兵八万迎击秦军。将军刘牢之以精兵五千人袭击梁城垒（今安徽怀远)，消灭秦军这一万五千人，掳获大批粮草器械，取得首战胜利。在射安的统帅下，晋军所到之处都打胜仗。谢安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前秦百万之师驻在淮淝之间，京城建康上下感到非常害怕。朝廷加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率军抵抗。出兵之前，谢玄去向谢安问计，谢安坦然毫无惧色，回答说："已经另外有旨。"然后沉默不语。谢玄不敢再说。于是要张玄再去请示。谢安就命令驾车去山野田庐，亲朋都来聚集，谢安和谢玄下围棋，以别墅赌胜负。谢安的棋艺平时劣于谢玄，这天谢玄恐惧，双方便旗鼓相当，谢玄胜不了谢安。谢安对他的外甥羊昙说："以别墅给你。"

晋军与前秦军在淝水东西岸互相对峙。当时，苻坚派投降的晋朝梁州刺史朱序至晋营，劝说谢石投降。谢玄乘机使谢石和苻融相约，建议秦军自淝水西岸小退，晋军愿到淝水西岸决战。苻融

企图乘晋军半渡之时，加以阻击，全歼晋军于淝水中，于是使令前秦军稍退。但是秦军内部复杂，又不愿作战，特别是汉人心向南方。因此，当前秦军接撤退命令时，以为前方被击败，于是奔逃溃散，自相践踏，死伤遍野。晋军乘势猛攻，秦军大败。当谢玄军打败苻坚后，急速派人送来喜报，此时谢安正与客人下围棋，看完信后，随手放在坐床上，一点也没有露出喜色，下棋照旧。客人问他淝水战况，他才慢慢地回答说："小儿辈已经打败贼寇了。"棋局结束，谢安回到内室，由于内心太高兴了，跨过门槛时竟连屐齿折断都不知道，此事后世传为佳话。

谢安素存统一南北之志，他一再上疏请求亲自北征，于是进都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十五州军事。谢安上疏让太保及爵位，皇帝没有允许。

怀抱未酬　心有归志

当时北伐的名将桓冲已死，荆、江二州都缺刺史，谁来担任？以谢玄的功勋和名望，应该以荆、江二州授谢玄。谢安因为父子叔侄以大功著名，恐怕权力过重，引起朝廷疑忌，另者，他又担心桓氏失去世职，桓石虔又有克复沔阳的功勋，且骁勇凶猛，在形势险要之地，最终难以控制。于是，谢安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桓石虔为豫州。这样，既以三桓占据三州，彼此不再有怨心，各得其所。谢安身为朝廷重臣，经略远瞻，使官员和功臣们互不相争，平衡各种政治势力。

牛性爱好音乐的谢安，自从他弟弟谢万死后，他十年没有听音乐。此后，对音乐的喜爱依旧，即使身居高位，也一年到头都不废音乐。王坦之写信劝喻他，他不听从，上层社会就仿效他而成为风尚。他又在土山上营造别墅，楼馆林竹很茂盛，他常携内外子侄往来游集，菜肴屡次耗费的价值百金，当世因此讥笑他，但谢安并不介意。谢安对刘牢之能否独负重任，是心存怀疑的，他又预知王昧之专一城之长必无好下场。最终，刘牢之果真以叛乱而被杀，王昧之也因为贪污受贿而身败名裂，这二事的预言都使有识之士佩服谢安的深谋远虑和先见之明。

会稽王司马道子擅权政，朝政紊乱，奸佞谄媚之人到处造谣生事，极尽煽动蛊惑之能事。谢安虽然受到朝廷的重托，但东山归隐之志始终没有改变，常常形于言色。他镇守新城时，全家都搬去，造作航行江海的装备。但他的志愿没有实现，就得了重病。他上疏朝廷请求在适宜的时候准许回归，并召儿子征虏将军谢琰解除军务，命令龙骧将军朱序进据洛阳，前锋都督谢玄镇守彭、沛，委任他总督军事，对付苻丕和慕容冲。等明年水旺时节，东西齐举夹击，孝武帝下诏遣侍中慰劳，谢安就启程返回建康。

谢安去世时，时年六十六岁。孝武帝三日临于朝堂，赐金银钱物无数。封谢安为庐陵郡公。

【高颎】

被杨坚所重用

高颎（？～607），字玄昭，又名敏。自称是渤海县（今河北省景县）人，他家族这一支很可能是北齐皇族中的一脉，是汉化了的鲜卑族。父亲高宾时从北齐叛投归北周，作了北周大司马

独孤信的幕僚，赐姓为独孤氏。

北周宰相杨坚与高颎早就相互熟悉，因为高颎是独孤信的家客，而独孤信的女儿又是杨坚的妻子。不过杨坚之所以看重高颎，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与自己私人关系密切，更重要的是看中了他的才华、及其胆识，看中了他的文武全才。高颎自小聪明能干，十七岁开始做官，参与了平定北齐的战争，立过战功，受过爵赏。杨坚赏识他，在密谋取代北周帝位之前曾派心腹人与他面谈，他欣然接受杨坚的招纳，并对杨坚说："我很愿意听从你的指使，即便你的事业不能成功，我高颎全家为之遭害，也是心甘情愿的。"于是杨坚让他在丞相府中担任司录之职，官虽不大，却很被重用。高颎这为何如此死心踏地地追随杨坚冒风险呢？其原因有两条：一是杨坚的地位虽然还不巩固，但已开始得势，很有成功的希望，二是高颎虽任职在北周，但他不是北周皇族宇文氏家族的嫡系，而是与北周的敌国北齐高氏皇族同宗，亦即为北周宇文氏的世代仇敌；不管如何有能耐，他在北周不可能有重大发展。

北周一部分官员激烈地反对杨坚。首先举兵反叛的有尉迟迥。接下来还有司马消难、王迥的叛乱，影响特别大。高颎见到这种危急情势，于是自告奋勇，甘负重任。杨坚欣然同意。高颎当即带命出发；来不及回家，只派人去向他的母亲告别。他到达军中，赏罚严明，对将官有升有黜，由此军心大振，人人欢呼。原先韦孝宽的军队停顿在沁水的西边，在大敌当面前表现出一种胆怯、观望的架势。高颎到达后，为了改变形势，他命令立即造桥渡河。他估计到敌人会从上游以火烧，于是就预先防备，使敌人的破坏未能得逞。大军既渡，他仍沿用古人破釜沉舟、背水列阵的做法，烧掉新造的桥，以示决一死战。随即深入敌境，与宇文忻、李询等人谋议，设策以破敌军。尉迟迥据守邺城，军威尚盛。那时，两军对阵打仗，旁边往往有许多老百姓观看。这次宇文忻征得高颎的同意，先带军攻入旁观者人群，由此引起旁观者人群大乱，宇文忻乘机大呼："敌人被打败了！"于是尉迟迥大军受到四万逃散人群的冲击，队伍大乱，高颎、宇文忻等挥军乘势攻入邺城，把尉迟迥打得大败。

杨坚登上皇位，正式建立隋王朝。高颎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这一职位，就是宰相的职位。隋朝建国之初，他与苏威同心协力，大小政事，文帝都是先与他们商量而后施行。因此几年之内，天下安定。

为隋治出谋略

隋朝是直接继承北周政权的，而北周的法律则繁杂苛细而不得要领。文帝下诏，要高颎、郑译、杨素、裴政等人修订法律；他们所修订的法律，不仅为隋朝所施行，而且亦为后世所袭用。苏威的父亲原在西魏任官，曾主持增加赋税，但他认为增税只是解一时之急，他临死嘱咐儿子，如以后当官，有可能的话要想法减轻税额，故苏威主张减税；他的这一意见高颎也是极为赞同。在文帝下诏检查户口、以防止偷漏赋税时，高颎又提出"输籍法"，即民间赋税皆记其数于籍账，使州县长吏不得随意增加减少。苏威关于改革地方建置的意见，与另一大臣李德林的意见发生了矛盾，但是由于高颎的支持，李德林的阻挠没有成功，才得以付之实践。高颎曾带兵

抵御过北方强族突厥。他主持办的事很多，但由于他的文稿没有保存下来，因此史书多阙载。他办事很认真，很勤恳，退朝以后，常常将一本子置于卧榻之侧，想起了什么，就记在上面，以便天明以后办理。

文帝在高颎等人的辅佐下，政局定安，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摆在王朝面前的的两大要题是：要使统治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只是注意管辖统治区域内的事是不够的，还必须北服突厥，南平陈朝；在完成征服突厥、平陈过程中，高颎的功绩尤其突出。尤其是在平陈方面，他起了重大作用。如何战胜陈朝，使南北统一起来，这是包括高颎在内的隋朝君臣所经常考虑的问题，高颎主张拢络江南朝野人士的人心，瓦解他们的斗志，一旦条件成熟，大军渡江，一鼓拿下。

开皇元年，文帝根据高颎的推荐，派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以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要他们筹划平陈之事。第二年发兵南征，以高须为总指挥，这次的出征是试探性。兵出之后，陈宣帝死讯传到，高颎以“礼不伐丧”为理由停止进攻，班师回朝。

不久，他又接受处理萧岩叛乱后带来的属民。高额还主张隋朝与陈通使以礼相待；抓到陈朝的间谍都是发给衣服，客客气气地将他们送回。文帝问高颎平陈的具体策略，高颎说：“江北地寒，收获稍晚；江南气温高，水田庄稼熟得早。在江南收获季节，我们稍稍集中兵马，扬言要出战江南。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必定要屯兵守御，这样一来他们收获的时间就被职误了。当他们集中军队时，我们就解散军队；我们反反复复地这样干，他们必定习以为常，从而麻痹大意起来，然后我们再调集军队，由于受以前的做法的迷惑，他们不会相信我们要出征。当他们犹豫之际，我们乘机渡江，登陆作战，我方因此定可一鼓取胜。况且江南土质不好，房子都是竹子茅草做的，所有积藏都不是在地窖里。我们秘密地派人过去，乘风放火；如再修复，则再烧之。这样几年下来，他们的财力自可枯竭。”杨坚按照他的设想去做，果然收到很理想的效果。平陈的战役完成于开皇九年。当时隋分三路大军，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杨素为各路元帅，而统归杨广节度。此时的高颎是晋王府长史，掌握着实际的指挥权。东路大军将领贺若弼早有准备，他卖了五六十艘旧船，造成陈军错觉，以为隋卖船，近期不会大举进攻，遂松懈了斗志。贺若弼又下令，江防军人，每接防之时，一定要到广陵（今扬州）集中，并且大张旗鼓，营房帐幕遍于田野。开始陈军看到，以为隋军要渡江，就急急忙忙准备抵御，结果发现隋军是换防，就习以为常，不加警惕了。

贺若弼又经常派兵沿江狩猎，人马喧嚣，如此反复，也使江南陈军逐渐麻痹起来。结果是贺若弼由广陵渡过长江时，陈军还不知道。与此同时，另一支军队在韩擒虎的率领下也渡江到了采石。贺若弼渡江后军容整肃，纪律严明，有个士兵自己到民间买酒喝，立即被斩首。他俘虏了陈军六千人，全部予以释放，并发给粮食，打发他们回去，并将隋朝诏书交给他们带着，要他们宣传隋朝伐陈的政策。

结果，隋军所向无敌，陈军不堪一击。隋军迅速攻入建康，抓到了后主陈

叔宝，陈朝灭亡，隋朝基本上统一了全中国。高颎在平陈之役中，主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一次宴会上，文帝说："高颎平定了江南，虞庆则使突厥降服，可以说是功勋卓著啊！"

遭疑猜而见杀

开皇末年，高颎逐渐失宠，倒楣的事一件接一件而来。这里需要提起的是高颎的冤大头文帝皇后独孤氏。此人虽不失为一位女中豪杰，然而她特别妒嫉，她把皇帝看得紧紧的，不准他接触后宫的妃嫔。尉迟迥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因为父罪被没入后宫。一次，皇帝见到了她，很是喜爱。独孤氏知道此事，愤恨至极，乘皇帝上朝的机会，将她杀死。皇帝得知大发雷霆，骑上马跑出皇宫，一下子在野地里跑了二十多里。高颎、杨素等人随后追赶，抓住皇帝的马缰苦谏。皇帝说："我贵为天子，却受到如此束缚！"高颎说："皇上你怎么能够因为一个妇女而轻易地丢开天下呢！"皇帝听了这句话，情绪稍稍和缓了些，骑在马上久久地停着不动，到了半夜才返回宫中。皇后在宫中守候着，见皇帝回来了，就边哭边磕头赔礼，高颎、杨素也从中斡旋，并且摆上宴席，痛痛快快地吃喝了一顿，才收了场。

这本来是件小事，但却给高颎日后遭祸深深地埋下了祸根。高颎本是独孤氏的家客，独孤氏与他一直来往密切；但自从他说独孤氏是一个妇女之后，她就怀恨在心，不与他来往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太子杨勇也开始失去皇帝和皇后的欢心。高颎娶了杨勇的女儿做媳妇，杨勇的失宠也就意味着高颎的失宠，所以这也关涉到他的政治生命。皇帝不喜欢太子，主要是因为他爱奢华、讲排场、声望渐高，触犯了皇帝的吝啬心与忌妒心。皇后不喜欢太子，主要是因为他爱女色和受了晋王杨广的挑拨与离间。杨勇宠爱一个姓云的女人，而他的原妃却突然死去，皇后怀疑是两人有意害死的。等到云氏独自执掌太子的家政后，皇后就更加怒不可遏。杨广得知此情，一方面自我矫饰，以博得皇后的欢心，另方面恶言中伤太子。

于是皇帝与皇后都渐渐产生了废立太子的意思。有一次，皇帝试探地问高颎说："有神灵告诉晋王妃说，晋王一定要统有天下，认为此事应如何办?"高颎一下子跪倒在地，回答道："谁长谁幼，是有次序的，这怎么能够废呢?"高颎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杨勇是长子，应该做太子，是废不得的。皇后知道高颎的主张不会改变，就想暗地里找机会来整他。不久，有一件事使高颎得罪了隋文帝。一次隋文帝要从东宫的卫士挑选一部分卫士作自己卫士，高颎以为不应这么做，他说："若尽把强壮的卫士挑选走了，恐怕东宫的保卫力量太差。"皇帝听了很不以为然，他说："我时常东跑西跑的，故需要有较强的卫士。太子呆在东宫，身边何必要有那么多壮士。重兵保卫东宫这个办法流弊极大。依我看，东宫的保卫由皇宫卫队兼管着就行了！我熟悉前朝的旧法，你不要再罗里罗嗦了。"

过不多久，高颎又一件事让皇帝皇后都不高兴了。这一年高颎的夫人死了，皇后对皇帝说："高仆射年岁已高，死掉了夫人，皇上应该帮他再娶一位。"皇帝将皇后的话告高颎，高颎婉言拒绝说："我现在已老，退朝以后，只是坐在书斋里读读佛经罢了。皇上是很爱惜

我的，至于娶妻之事，我没有这个打算。”消息传到宫内，皇帝很是高兴，但皇后却不然，她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皇帝不了解皇后的心意，就问她为什么不高兴？皇后说：“你相信高颎的话吗？你是为他娶妻，他却只想爱妾，当面欺骗你。他的一个小妾已生了一个儿子，还有一小妾正怀着孕，他不说实话，什么下朝后读读佛经，他是怕皇帝派人在他身边监督他罢了。现在他的欺诈已经败露，怎么还能够信任他呢！”开皇十八年，文帝欲出征辽东，高颎坚决不同意，而文帝却坚持要打，并派高颎为事实上的主帅，高颎只好服从。结果因为当时瘟疫流行，军队人马十之八九病死，无功而返。这件事本来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但是皇后却节外生枝，在皇帝面前中伤高颎，说“高颎本就不愿意去，你强迫他去了，我就知道准是无功而还。”

皇后的意再明白不过：高颎阳奉阴违，消极抗命。这次统军主帅名义上是汉王杨谅，高颎则掌握实际指挥权。高颎为人比较耿直，自觉责任重大，常常以大局为重，不避嫌疑。对于杨谅的意见，也多不采纳，杨谅恨透了他，返京后在皇后面前告他的状说：“儿万幸没有被高颎杀掉。”对于这些事情，文帝既不调查，也不分析，偏听偏信，对高颎更加愤愤不平。但高颎胸襟豁达，虽屡遭不幸，但处之泰然，降低为一个平民百姓，他对此不但不怨恨，反而感到高兴。母亲的教导，在培养他的这种品德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刚作宰相时，母亲就告诫他说：“你的富贵已经到了头了，剩下的就是一个砍头，你要谨慎啊！”高颎削职为民后，没有几年文帝去世，炀帝杨广即位。炀帝起用高颎为太常卿。当然，他对炀帝也是恪尽臣道，见有不正确的地方，就直言不讳。这又很快地招致炀帝对他的不满。大业三年，他以诽谤朝政罪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宇文弼、贺若弼。苏威被免官。

【房玄龄】

背隋投唐　辅助秦王

房玄龄（579～648），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出生于北周武帝元年（578），其父房彦谦，精于五经，有辞辩，在隋做过司录刺史，清廉善良，其俸禄，常周济亲友。他曾对房玄龄说：“人皆以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隋书·房彦谦传》）。房玄龄从小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经书，开皇十六年（596），“举进士，授羽骑尉，校雠秘书省。”因其学识渊博，受吏部侍郎高孝基赏识。不久，调任隰县县尉。后来，因事受连累革职，遂迁移居上郡。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率军三万，进兵关中。李渊军队横渡黄河后，兵分二路。一路由李建成驻守潼关，以防隋军救援；一路由李世民率军西进，占领渭北，逼近长安。李渊父子举兵反隋，得到人民的支持，一路势如玻竹，沿途归顺者很多。

富有政治眼光的房玄龄，眼见隋朝大势已去，下定决心投奔李渊父子。他来到渭北军门拜见李世民，正好李世民广求贤才，收纳天下英俊，两人一见故，李世民当即拜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成为他帐下的主要谋士。当年十

一月，唐军攻占隋都长安。第二年五月，李渊灭隋，做了皇帝，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政权后，以关中为基地，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

李渊任命李世民挂帅，向各个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进攻。房玄龄随同李世民转战各地，运筹帷幄，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武德六年十一月，首先消灭了陇西的割据势力薛仁果；武德三年（620）又打败了割据西北的刘武周。占领山西后，李世民继续挥师东进，进攻盘据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被围，急忙向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窦建德亲率十多万大军，火速开往洛阳，水陆并进，势不可挡。李世民让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则亲率精兵三千截击窦建德。

汜水一战，唐军大获全胜，窦建德受伤被俘。王世充眼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了唐朝。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又继续镇压了窦建德余部刘黑闼。于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间，李世民东征西讨，消灭了各种反唐势力，为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房玄龄随军出征，尽心辅助秦王，做出了卓越贡献。



房玄龄像

在唐王朝的统一战争中，唐军每攻克一城池，诸将往往把眼光盯住库里的珍贵宝物。房玄龄却不是这样做，他每到一地就首先物色人才，招人幕府，和他们结为朋友，千方百计将他们搜罗到秦王府来，这些人后来为李世民效劳，大大加强了秦王府的实力；这些人后来都能出死力帮助李世民夺得帝位。李世民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我今有龄，犹禹也。”在各地征战中，房玄龄作为秦王府的记室，撰写了不少军书、表奏，他的文章“文约理足”，又快又好，深得高祖李渊的赏识。

唐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结束后，其内部又出现了新的一场战争。

玄门当机　赢得胜利

这就是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唐王朝的创建过程中，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太原起兵、进军长安，还是东征西讨，削平群雄，他都立下赫赫战功。司马光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李世民才能出众，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房玄龄曾说他：“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竞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他的父亲李渊对李世民的才干也是赏识的。在太原起兵时，曾面许李世民：“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太子李建成虽没有像李世民那样的赫赫战功，但他自起兵太原，镇守潼关，南进长安，东出洛

阳，也立过一定的战功。再加上他位居东宫，联合其弟李元吉，其得到帝位的自然条件是相当优越的。

有锐敏政治眼光的房玄龄，对李世民兄弟之间事态的发展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十分着急，于是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实乃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资治通鉴》卷191）长孙无忌也有同样的感受和忧虑，他把房玄龄的话告诉李世民。

李世民深感忧虑，召房玄龄共同议事。房玄龄与杜如晦劝李世民尽快动手，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李世民仍犹豫不定。李建成、李元吉为了除掉李世民，首先第一步就是清除李世民身边的人，他先用收买、拉拢的办法想将秦王府的勇将谋臣拉过去，没有获得成功。继而又在李渊面前中伤、挑拨。李建成最忌恨的就是房玄龄、杜如晦。结果，李渊偏听偏信，下令把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兵犯边。按惯例，大都由李世民督军御敌。但此时，李建成却提议由李元吉和李艺出征，以阻止李世民掌握兵权。同时，李元吉还征调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前往，借此把秦府精兵抓到自己手中。事成之后他们决定再来谋杀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内弟长孙无忌、舅舅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商仪。尉迟敬德怂恿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李世民又秘密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令二人穿戴道士服潜入秦府，共同议事。

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经过周密的策划，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暗中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成功。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把军国大事完全委托给李世民处理，并立李世民为太子。接着，李世民拜房玄龄为右庶子，不久，又提升房玄龄为中书令，当上了宰相。

选贤审法　宰相之职

八月，李渊把帝位传给李世民，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号为贞观。

唐太宗即位后，对群臣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满，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唐太宗说："叔父虽首唱举兵，盖自管脱祸。乃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败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说得李神通理屈词穷，羞愧无言。贞观三年（629）二月，房玄龄改任左仆射。唐初的左右仆射就是宰相。房玄龄是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出色的高级官员被陆续荐举给朝廷。他担任宰相后，首先裁减大量的冗员。

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根据唐太宗的诏令，房玄龄在贞观初年对在职官员进行大量裁并，全国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设十道，三百余册。这是贞观初年全国性的一次重大行政改革。房玄龄不仅果断地裁去大量冗员，且能因才

授任、选贤任能。唐太宗重视选才用人，他认为“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他确定宰相的首要职责是求访贤才。他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唐太宗还下令把宰相担负的具体政务交给左右丞处理。

宰相集中精力处理大事和挑选人才。这为房玄龄选贤任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早在秦王府时，房玄龄就发现杜如晦聪明识达，有佐王之才。就向秦王李世民推荐：“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从此，李世民开始重用杜如晦。后来果然证实，杜如晦辅佐太宗，功勋卓著。

房玄龄选用人才，重才也重德，他推荐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优异。房玄龄本人则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竭心奉公，“每当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龄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当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又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甚为器重。薛收是个卓有文才的读书人，经房玄龄的推荐，为太宗任用。太宗召见，“问以经略”，薛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太宗征伐时的檄文、捷报，大多出于薛收之手。可惜薛收只活了三十三岁。唐太宗悲叹地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令处之。”房玄龄选才，不“以备取人”。张亮是个贫寒人士，“素寒贱，以农为业”，而张亮胆气不足，无将帅之才，房玄龄却只用其长，并不“以备求人”。对唐太宗任用的人，房玄龄认为不合适的，也不苟用。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要拜李纬为吏部尚书，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他语”。唐太宗明白了房玄龄的意思，便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可见房的意见在当时何等重要！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吏治清明，去冗员，对唐朝政治，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裁减大量官员，就能够为国家节省财政支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一道理唐太宗和房玄龄等是非常明白的。唐太宗和房玄龄从隋朝的灭亡吸取教训，他们深知“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弛而败矣。”他们深知，“官得其人，民去叹愁”的道理。“民去叹愁”，则阶级矛盾缓和，国家就会长治久安。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议修订法律。

鉴于隋“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灭亡”的教训，在太原起兵时，李渊父子即“布宽大之令”。入长安后，为了取得民心，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李渊称帝后，曾制定“武德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

唐太宗主张宽简刑政，审慎法令。他在贞观元年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他还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入罪即引轻条，若欲人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在文。”（《贞观政要·赦令》）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修订成的唐代法律，即《贞观律》，有四个部分，即律、令、

格、式。“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唐律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极其详密的规范。其中“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为五刑。笞刑五条，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条，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条，自徒一年，遂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条，自流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条，绞、斩。大凡二十等。”《旧唐书·刑法志》）“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令是对各种制度的规定。如《户令》是对户籍和婚姻制度的规定；《田令》是对地土制度的规定。令只规定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但不包括对于违令行为后给予的刑事制裁。唐太宗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贞观十一年正月颁下之。”（《旧唐书·刑法志》）“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是皇帝敕令的汇编，百官的职责范围。由房玄龄等在贞观十一年删定武德以来敕格七百条为《贞观格》，共有十八卷，颁行天下（《资治通鉴·唐纪十》）。“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是各种行政法规，国家机关办事的章程、条例。房玄龄等制定的《贞观律》的量刑定罪上有宽缓的方面，仅与隋律相比《贞观律》减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者七十一条。在官犯法，只夺官除名，仍同仕伍。房玄龄因旧律的刑重，“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但唐太宗哀其断毁肢体，令房玄龄等再议。王珪、萧瑀等认为改死刑为断趾，保存了生命，已放宽，而房玄龄主张再行放宽，他认为：“左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新唐书·刑法》）于是决定将断趾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房玄龄还改变了旧律中因谋反罪而兄弟连坐得俱死的法律，规定为“反叛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设。恶言犯法者，兄弟流配而已。”（《新唐书·刑法》卷五六）死刑和古代相比，几乎去掉一大半。至于削烦去蠹，变重为轻，更是不可胜记。

后来，长孙无忌对《唐律》作了具体说明，编成《唐律疏议》一书。此书是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

法与礼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两个方面，所谓“德主刑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贞现期间既重视法律的修订，也重视以礼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以礼来制约各种社会关系，而且以礼制律，刑礼相辅，“失礼之禁，著在刑法。”不忠者有罪，不孝者必诛。用法律的强制力量推行礼的道德规范，反过来，又用礼的道德来辅助法的推行。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诏令房玄龄等礼官学士修改隋礼，最后完成《贞观新礼》一百三十八篇，是唐代礼制的基础之作。

力主安抚　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房玄龄在民族政策上，显示了他深思熟虑的外交能力，他主张结好各民族，以减少冲突。贞观十六年(624)，雄踞漠北的东突厥薛延陀部实力较强，太宗曾封其酋长夷南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复无常，出尔反尔，

唐太宗派兵联合突厥的一部给以致命的打击后，真珠可汗派人来唐求婚。唐太宗虽对薛延陀并不放心，但是在以武力消灭，还是联烟这个问题上一时下不了决心。房玄龄权衔利弊，认为和亲为上策。理由是大乱之后，国家元气尚待恢复，用兵对国家不利。唐太宗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答应许以第十五个女儿新兴公主，但要求"厚纳聘礼"，亲自到灵州迎亲。真珠可汗闻知，兴高采烈，"谓其国中曰：'我本铁勒小帅，天子立我可汗，今复嫁我公主……斯亦足矣。'"（《旧唐书·北狄》卷199）从而使薛延陀部归顺了唐朝，避免了一场战争，改善了民族关系。后来，真珠可汗一时无法集得聘礼，延误了迎亲日期。唐太宗以其轻侮中国，"下诏绝其婚"。

唐初，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西半部的叫百济，中部的叫新罗，北部的叫高丽。其中以高丽最为强大，它占有汉江流域和辽东平原。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曾发兵三十万，大举进攻高丽，失败而回。隋炀帝也曾三次征高丽，结果都失败而回，并引起了农民大起义，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唐初，三国均遣使和唐朝来往。贞观十六年，高丽发生内乱，大臣盖苏文弑其君，独专国政。唐太宗想出兵以武力干预，但房玄龄以为不可。他对唐太宗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他又以历史为鉴，劝谏唐太宗："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贞观政要·征伐》）唐太宗接受了意见，便中止了这次行动。后来，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太宗派人劝说，高丽不听，于是，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他委令房玄龄筹办和运送军粮、军械，下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旧唐书·房玄龄传》）他屡次上言，提醒太宗，不要轻敌。房玄龄虽然没有强烈劝阻唐太宗东征，但他始终放心不下。唐太宗这次亲征高丽，虽然暂时取得了一些胜利，攻下了一些城池，但遇到顽强抵抗，只能屯兵广安东城下。此时正值隆冬严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于是，唐太宗决定班师回京。

对于此次征伐高丽的挫折，唐太宗耿耿于怀，他不甘心，还想举兵东征。此时房玄龄已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忧国之心、宰相之责，毅然上书，劝谏唐太宗。他说："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他引用老子的话："知足不辱，知之不殆"来劝导唐太宗。他还说："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希望唐太宗放弃"天可汗"的迷梦，不再"驱使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房玄龄认为，高丽的内乱是他们内部的事，他们并没有得罪中国，而唐王朝的出兵"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资治通鉴》卷199）唐太宗对房玄龄的恳切之言深为感动。

尽言切谏　尽职尽心

房玄龄在辅佐唐太宗时多有诤谏，他谏勿征高丽，谏勿用平庸之辈，以及谏减少民族冲突、改善民族关系方面，日后都证明他意见的正确，都收到过很好效果。房玄龄的进谏反映了他善于思谋，考虑效果的特点。

唐高祖李渊去世后，唐太宗要以汉

高祖长陵的规模为父亲建陵。而汉长陵东西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工程浩大。秘书监虞世南劝唐太宗实行薄葬，认为薄葬并非不孝，厚葬反而为亲所累。他建议造一高三仞（一仞为七尺）的陵墓，陵内器物，尽量从俭。虞世南的建议利国利民，但房玄龄考虑，唐太宗不会接受虞世南的建议。于是，他提出了以汉光武帝的陵墓规格建造，唐太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房玄龄为相，通达政事，善于谋划，尽心尽责，惟恐失误。褚遂良说："人臣之助，玄龄为最。"王珪赞誉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房玄龄治理国政，秉公守正。他始终认为："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加上他的作风忠谨谦恭，对人宽厚，对己严谨。晚年，他体弱多病，几次上表请求解除仆射职务，太宗不答应。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元）太宗又晋升房玄龄为司空。司空为三公之一，品高位尊。房玄龄又上表辞让，太宗仍不允许，并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可以看出，唐太宗是离不开他的。

总结历史　著书立说

房玄龄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唐朝初年，为了修明政治，达到天下大治，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在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前提下，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史书的总监修，开了官修史书的先河，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史馆。在总监修房玄龄的组织领导下，官修史书盛况空前。贞观期间，一共修撰史书八种，即令孤德棻和岑文本合修的《周书》、李白药修的《北齐书》姚思廉编撰的《梁书》和《陈书》、魏征编撰的《隋书》。在中国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其贡献之大，有目共睹。根据唐太宗的提议，房玄龄还开创了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个王朝。贞观十七年（643），高祖、太宗实录修成。唐太宗因房玄龄修史有功，"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病重，唐太宗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还亲临探望，当握手叙别时，不胜悲痛。七月，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岁。唐太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文昭，陪葬昭陵。

【李靖】

王佐之才　遭逢李氏

李靖（541～649），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其父李诠，是隋赵郡守。李靖，体貌魁梧秀美，通史书，有文武才略，曾对亲近的人说："大丈夫要遇主逢时，必建功立业，取得富贵。"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李靖常与他谈论兵法，韩擒虎常赞不绝口地说："可以与谈孙、吴兵法的，除了李靖还有谁呢！"李靖刚刚走入仕途之时，只任地位很低的长安县功曹，等到三十岁时，才任兵部驾部员外郎。然而他的才略却得到了吏部尚书牛弘、宰相杨素的赏识。牛弘曾赞叹说："李靖，王佐之才也！"杨素甚至有一次指着自己的座位对李靖说："卿终当坐此。"隋朝末年，李靖出任马邑（今山西朔县）郡丞，他察觉太原留守李渊正密谋起兵造反，于是他前往江都，准备向在那里巡幸的隋炀帝告发。走到长安，道路阻

塞，滞留未去。此事当时有人报告给李渊，李渊在太原起兵后，迅速攻占长安，李靖当了俘虏，记起前仇，李渊决定将李靖处死。临刑，李靖呼喊说："你李渊起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以成大业，何以私怨斩壮士？"李渊壮其言，加之秦王李世民为之说情，李靖才免于一死。从此，李靖归附李渊、李世民父子，实现了他遇主逢时的愿望。高祖武德二年，李靖奉命讨伐萧铣率军南下。萧铣是南朝梁皇室的后裔，在隋末大乱时，拥兵四十万占据长江中游地区。李靖军队受到萧铣的阻挡，无法开往夔州。高祖非常气忿，密令硖州都督许绍把李靖斩首。但许绍爱惜李靖的才干，上表请求赦免，李靖才免于一死。驻守夔州的李孝恭迎战失利。李靖率八百士卒袭冉肇则大营。继而又设伏兵于险地要塞，杀了冉肇则，俘敌五千余人。对此李渊特别高兴，对大臣们说："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然立了大功。"他还写了一道敕令给李靖，说："既往不咎，以前的事，我早就忘了。"从此之后，李渊对李靖倍加重用。武德四年（621）正月，李靖经过慎重地思考，向高祖献十策以攻取萧铣，高祖极为赞赏。于是，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李靖为行军总管，兼李孝恭长史；军队的指挥工作由李靖负责。李靖急召巴、蜀酋长子弟，量才授任，安排在左右，此举表面上是提拔重用，实际上是做为人质，稳定了巴蜀局势。九月，唐军分四路自夔州发兵浩浩荡荡而下。

当时，江水猛涨，诸将建议待水落以后再进军。李靖认为"兵贵神速，今吾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江涨，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下备，擒获萧铣在此一举，机不可失也！"李孝恭听从了李靖的意见，大军乘二千余艘战舰，顺流而下。十月，进至夷陵。萧铣的部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扎于清江。李靖认为，文士弘是名将，不可速战，应待其气衰，然后奋击。李孝恭不听李靖的意见，命李靖驻守大管，亲自率师出战，结果大败。

文士弘的军队小胜后乘机抢掠，阵势混乱。李靖立即指挥将士出击，一举打败文士弘，获战舰三百余艘，这次战役战死者近万人。打败文士弘后，李靖率精兵五千围江陵，萧铣恐惧而投降。诸将建议没收萧铣将士以及战死者财产，犒赏将士。李靖不同意，他说："王者之师，应该宣扬忠义，为萧铣战死的人，死为其主，乃是忠臣。至于归降之人，更不应惩罚，因为萧铣控制的地区，还有许多尚未归附。我们应该宽大为怀，以慰人心。"

于是，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江陵城中，人心安定。江汉地区州县闻知，纷纷归降。平定萧铣后，高祖论功行赏，授予李靖上柱国，封永安县令。十一月，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并授予"承制拜封"的特权，代表朝廷任命地方官员。李靖所到之所，招抚诸州，计得九十六州，六十余万户，岭南之地尽为唐朝所有。高祖又命李靖检校桂州（桂州）总管，镇守岭南。武德六年（62）八月，原先归附唐朝的江，淮农民起义军，在江南重新组织反唐，其领袖辅公祏自封皇帝，率兵向海州、寿阳进发。

李渊以李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元帅，带领李世勣等七总管的军队，由西、南、北三个方面，包围江淮军。武德七年三月，唐军至舒州，辅公祏部将冯慧亮、陈正通屯兵于博望山、青林山，深

垒高墙，坚壁不战，一时双方形成对峙之势。李孝恭召集诸将商议攻战之策，大多将领认为，冯慧亮拥强兵扼守，又据水陆之险，如果强攻，一时难以取胜，建议绕道直取丹阳（今南京）；丹阳一败，冯慧亮等定不战自降。李靖反对，他认为："博望诸塞尚不能攻破，公祏保据石头（指南京），岂易取战！如进攻丹阳，旬月不下，慧亮威胁吾后，使吾腹背受敌，那就危险了。"他还说："冯慧亮非不欲战，而是辅公祏授计使之持重，据险固守，拖延时间，彼之计策是使我师老兵疲。我今若攻其城以挑之，一举可破也！"

李孝恭采纳李靖的意见，以老弱士卒攻冯慧亮，冯慧亮不知是计，率军出城追之，遇到李靖率大队人马，一时之间冯慧亮被打得措手不及，遭到惨败。于是李靖率水陆大军俱进，直逼丹阳。辅公祏知前方军败，弃城而逃，在浙江武康镇被俘。江淮军彻底被镇压下去，唐朝基本上统一了全国。战争结束后，在丹阳设立了东南道行台，李靖被任为行台兵部尚书。不久，行台制度废除，设扬州大都督府，李靖当了扬州都督府长史，协助都督李孝恭治理江南。武德八年（625）八月，突厥进犯太原，才刚当了一年多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的李靖奉命北上，投入了反击东突厥的战争。李靖为行军总管，率江淮军万人驻扎太谷，诸军皆败北，李靖却打了胜仗，全师而归。

第二年四月，突厥又进犯灵州，李靖率兵抗击，在青铜峡附近展开激战，突厥被打败。不久，李靖被任命为灵州大都，担负北方的防务。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不久，唐太宗任命李靖为刑部尚书，后来，又任命为代理中书令。



李靖像

廉颇虽老　屡建战功

唐太宗是个励精图治的有作为的皇帝。对于不断扰边的东突厥他决定给予狠狠地打击。贞观三年，他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代州都督张公瑾为总管，征讨东突厥。李靖率骁骑三千从马邑直取恶阳岭，夜袭颉利可汗牙帐所在地定襄，颉利可汗大惊失色，往北逃遁碛口。

李靖不战而下定襄，唐太宗听到捷报，封李靖为代国公，赞扬李靖说："汉李陵以步卒五千抵御匈奴，然终归降于匈奴，尚青史留名；今李靖以三千轻骑攻占定襄，威震北方，古今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盟之耻。"颉利败窜铁山，派遣使者入朝谢罪，太宗知道突厥反复无常，出尔反尔，于是决定剿灭。他一面派鸿胪卿慰抚，又一面令李靖引兵打击。李靖遂定计偷袭。颉利见唐使者唐俭，心中自安，而李靖军先头部队

乘雾而行，至离其总部七里，颉利始觉察，乘马先逃。靖率大军赶到，此役斩首万余，俘男女十八万，获牲畜数十万。贞观四年（630）三月，颉利可汗被俘，强大的东突厥汗国灭亡。在灭东空厥的战争中，李靖功居第一，凯旋而回。但御史大夫萧瑀却上奏唐太宗，弹劾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宝，掳掠俱尽。"唐太宗下敕免予弹劾。李靖入宫进见，唐太宗对他大加斥责，李靖也不予置辩，唯顿首叩谢，后来，唐太宗知道上了谗言的当，就对他说："以前有人说你坏话，现在我明白自己上了当，请不要将这件事放在心里。"贞观四年八月，任命李靖为尚书右仆射，李靖担任宰相后，身居富贵，功名显赫，他为人沉稳厚道，态度恭顺，从不盛气凌人，唐太宗誉为"一代楷模"。贞观八年（634）正月，太宗命李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巡察各地，李靖为畿内道大使。

十一月，李靖以足疾辞去宰相职务。唐太宗准许了他，但给了他特殊的礼遇，病情好转时，每两三日去政事堂参加宰相会议，不久，吐谷浑犯边，唐太宗谓侍从说："李靖能复起为帅乎？"李靖闻知后，说："臣虽年老，尚可一征。"唐太宗任命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李道宗等五总管出征吐谷浑。李靖采纳侯君集建议，分兵两路，不顾缺水缺粮，穷追不舍，终于击溃吐谷浑王伏允，其子慕容顺举国投降，唐军大获全胜，凯旋而返。在这次征讨吐谷浑的战争中，盐泽道部管高甑生延误军期，李靖以军法给予惩罚。班师回京后，高甑生为报私仇，诬告李靖密反。此事不辩自明，唐太宗以诬告罪将高甑生流放边疆，但官场的险恶却给李靖的心里投下了阴影。从此，闭门不出。贞观二十三年（649）初，李靖病重，太宗曾亲往探视。五月，病死于家中，时年七十九岁。陪葬昭陵。

【杜如晦】

审时度势　待价而沽

杜如晦（586～630），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祖父杜徽曾在隋时任怀州刺史，父亲杜吒曾任隋昌州长史。少年时代的杜如晦聪明勤学，尤喜好文史，他气质英爽，以风流自命。隋大业年间，参加吏部人才选拔，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很是器重，认为他"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但又暂时叫他俯就卑职，补任为滏阳县尉。隋炀帝的残酷统治，使民怨沸腾，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先是山东邹平王薄，领导农民义军杀富济贫，攻占山东不少州县。及后，起义烈火愈烧愈旺，到大业十二年（616）农民起义的队伍已增加一百三十多支，参加人数有三四百万之众。全国有三支强大的起义队伍：河南的瓦岗军，窦建德的河北起义军和杜伏威的江淮起义军。杜如晦虽然很早就辞掉了滏阳县尉的职务，不愿为朝廷服务，但由于家世、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不可能和农民起义军走在一起。在动乱的时局中，他和房玄龄一样，密切地注意着时局的变化。隋朝统治阶级内部也高举起了反隋的大旗，隋的统治已分崩离析，摇摇欲坠。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举兵反隋。他率领其子李建成、李世民等向南

方进发，由于甚得民心，加上策略得当，次子李世民英勇有谋，因而进军神速，所向披靡，在十一月，就迅速占领了隋代的都城长安。李渊父子攻克长安后，杜如晦见大局已定，又深知李世民英勇有谋，广结天下豪士，便只身投靠了李世民。李渊进入长安以后，把隋炀帝的严刑苛禁尽皆废弃，并与民约法十二条。除对拒不投降的阴世师等十余人处死外，其余一概不问；出于策略原因，按起兵时定下的方针，李氏政权立年仅十三岁的杨侑为天子，并尊逃往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

不久，江都发生兵变，隋炀帝为其部下宇文化及所杀。李渊遂即迫使杨侑下了退位诏书，禅位于自己。李渊接帝位于太极殿，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十九岁的李世民当上了尚书令。李渊父子达到了"化家为国"的目的。李世民拜杜如晦为秦王府兵曹参军，执掌王府簿书、考课、仪卫等事务。过了不久，杜如晦被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总管府是在边塞之地设立的统率军队的机构，长史为总管府的次官。当时，秦王府的很多谋士勇将被调往外地任职，李世民对此非常忧虑。

记室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房玄龄对杜如晦的这一荐举，使李世民大吃一惊，他对房玄龄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引日唐书·杜如晦传》卷六六）李世民马上奏请高祖，将杜如晦硬留下来，仍为秦王府属官。从此，李世民把杜如晦视为心腹，常与他商议军国大事。

李渊虽然称帝，但实际上只掌握着关中和山西、巴蜀等一些地区，周围都是割据势力。如何消灭这些割据势力，统一天下，是李氏王朝面临的重要问题。李渊父子经过商议，确定了巩固关中，出兵西北，进而进占关东，收并江南，统一全国的方针政策。李渊命李世民为右元帅，率军征伐，杜如晦亦随李世民转战南北。李氏集团采用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于武德元年（618）打败了陇西割据势力薛仁果，紧接着又铲除了在凉州称帝的李轨，巩固了唐在长安以西的统治。武德三年（620）平定了盘踞晋北的刘武周。后来刘武周逃至突厥，为突厥所杀。当把关中周围的割据势力剿灭以后，李世民就决定出关东进，对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发起攻击。

王世充是李唐在关外最重要、又最难对付的对手。他原先是隋炀帝的鹰犬，曾任隋王朝的礼部尚书；用阴谋手段夺取实权，王世充后来自己当了皇帝，国



杜如晦像

号郑。他利用李世民与刘武周作战的机会，趁势攻占了唐朝的大片土地。在李世民的大举征讨中，王世充手下的名将如罗士信、秦叔宝、程志节等先后降唐，许多州县的官吏，如淆、邓、荥、汴、豫、显等州相继降唐。李世民对于归降的官吏一般都以礼相待，这就使得更多的人，纷纷脱离王世充集团，出现了“河南郡县相继来降”的局面。在李世民军队的进击下，王世充连连败退，洛阳被围。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王世充向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为隋末农民起义军的著名领袖，李世民围困王世充，使窦建德也感到震惊，他担心一旦王世充被唐军消灭，自己也会受到直接威胁，便亲自前往洛阳支援王世充。窦军来势凶猛，唐军决定调转枪口先消灭援军窦建德。于是，李世民指挥唐军扼守武牢险隘，以待战机。当窦建德军队饥倦、疲堪之时，李世民见时机已到，便突然发起攻击，“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猛冲猛杀，窦军大溃，窦建德也受伤被俘。窦建德战败后，李世民乘势于武德四年（621）集中兵力围攻洛阳。王世充眼见大势先去，就率领群臣出城投降。武牢之役是唐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战役；此次战役的胜利，决定了整个中原的形势。

李世民大胆而果断地指挥了这一战役，取得了一石二鸟之功，一举摧毁了二个强敌。因此李世民受到嘉奖。因为功勋卓著，“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又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武德五年（622），刘黑闼在河北漳南筑台告祭建德，自称大将军，公开打起反唐旗帜。不久，刘军攻占大片土地，定都洛州，自称东汉王。李世民率军攻打刘黑闼，此次战争，旷日持久，打得十分艰难。最后刘黑闼大败，逃往突厥。然而两个月后，刘黑闼又返回再战，太子李建成亲征，并采纳魏征建议，用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最后击溃刘黑闼，统一战争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李世民兄弟虽各有建树，但李世民显然取得了更大的战功。而在这方面杜如晦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他在军中运筹帷幄，对战争双方的情况判断准确，他杰出的才干，受到了军内外的赞赏。杜如晦也由此而升迁，李世民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杜如晦任大行台司勋郎中，封爵建平县南，食邑三百户。不久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文学馆是本世民为接待四方文士而开设的。十八学士中，以杜如晦为首。李世民曾令人画了十八学士图像，藏于书府。像赞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怀忠履义，身立名扬。”可见，李世民对他的礼遇之重。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后，开府置官属，又拜任杜如晦为天策府从事中郎，成为天策府的高级幕僚。

玄武事变　理政治国

李世民卓著功勋，使他的威望与日增高，权势也逐渐扩大，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也迅速增长。李世民不仅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担任尚书令的职务，居宰相之职。这在唐王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中，尤其是在李氏兄弟中间有着特殊的地位。另外，在太原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李世民礼贤下士，广求人才，收罗了一批谋臣猛将，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产生了

不满足于当秦王的野心。

然而他的哥哥李建成，位居东宫，为人宽简、仁厚，辅助李渊处理政务，在唐王朝的初创过程中，他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李世民与李建成在打天下时，两人同心协力，但到坐天下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了夺取皇位，兄弟俩变成了仇敌。统一战争结束后，李世民与李建成的斗争日趋表面化。

武德七年（642），李渊带三位皇子打猎，命他们驰射角胜，李建成乘机将一匹烈马交给李世民骑。李世民不知有诈，骑上这匹马追逐野鹿，马烈性大作，三次尥蹶子，险些把李世民掀下坐骑；武德九年（626），李建成约李世民宴饮，暗中下毒，李世民饮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中，齐王李元吉完全站在李建成一边，他和李建成经常会同后宫谮诉李世民。李渊常常偏袒太子，信以为真，要加罪于李世民，幸亏陈叔达常常进谏，李世民才幸免于难。紧接着，李元吉又密告李世民有谋反之意，要求速斩世民。不过此时李渊明智，他认为李世民有平定天下之功，谋反的证据又不足，没有下手杀害李世民。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李建成和李元吉合在一起的实力，大于李世民，况且李建成又处于太子地位，这更处于优势地位。这种形势使秦王府的僚属非常担心。

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等都认为，必须先发制人才能转危为安，他们劝李世民早下决心，尽快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保国家长治久安。当然，李建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想方设法瓦解秦王府的武将、谋士，不过这一策划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们在李渊面前诬陷房玄龄、杜如晦；李渊听信谗言，把房、杜二人驱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数万骑犯边。李建成认为瓦解、分化秦王府精兵强将的机会来了。他向李渊推荐，由李元吉代李世民出征。李元吉又请求将秦王府的名将迟尉敬德、程志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归自己使用，以增强北征实力。这一着实际上是要扼杀李世民。

李世民感到已危在旦夕，便与长孙无忌、高士廉、迟尉敬德等商讨对策，并派人密召房、杜二人进府，密商计策。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在玄武门内设下伏兵，一举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为李世民夺取皇位扫清了障碍。接着，又逼着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此时军政大权已完全落在李世民手中。李世民拜任杜如晦为左庶子，协助他处理政务。同年七月，又调任杜如晦为吏部尚书。武德九年八月，李渊让位。李世民即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改元贞观，尊李渊为太上皇。李世民做了皇帝，对群臣论功行赏，以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进封杜如晦为蔡国公，赐食邑一千三户。贞观二年（628）晋升杜如晦为检校侍中，兼吏部尚书。检校侍中，即代理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也就是宰相。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下诏授杜如晦为右仆射。诏曰：“杜如晦，识量弘恢，神采凝映，德宣内外，声溢高堂。”从此，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朝为相，为唐朝的盛世之治呕心沥血。杜如晦是宰相，又是吏部尚书，执掌着选官任能的大权，他在引荐贤才，罢除不良官吏

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杜如晦取士用人，注重实践。当时选官取士往往重言词口笔，而不察其品德。杜如晦录用人员，主张先由州郡推荐，然后考核录用。在临终前他还推荐刚正不阿的戴胄做吏部尚书。杜如晦精于理政治国，唐初的典章制度，“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国家纲纪松弛，百废待兴。杜如晦和房玄龄拨乱反正，使唐朝初期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逐渐走上正轨，贞观之治新局面的开创，与房、杜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杜如晦在朝廷，君臣关系如同鱼水，同僚之间也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唐太宗每与房玄龄商讨大事，房玄龄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两人同朝辅政，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因此《资治通鉴》称“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杜如晦用人，非常推崇诤谏之臣。他认为“天下有净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把诤臣看作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栋梁。他鄙视隋代内史诗郎虞世基，认为他身居要位，处得言之地，但他对隋炀帝的荒淫残暴，却缄口不言，无诤谏之语，“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用这样的人执掌大政就是尸位素餐。作为宰相，杜如晦以儒家的传统道德要求自己。他宽厚待人，雍容大度，他能正确对待别人的长处，发挥别人的长处。《资治通鉴》说：“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珪）、魏（征）善诤谏而房、杜让其贤，英（指李勣，封英国公）、卫（指李靖，封卫国公）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因而，杜如晦虽为有唐一代名相，但史书记述他的事迹并不多。贞观三年（629）十二月，杜如晦因病情严重辞去宰相职务。病重期间，唐太宗亲自前往探望。对杜如晦的英年早逝，唐太宗非常悲痛，废朝三日，赠司空，徙封莱国公。

【魏徵】

（580～643）唐贞观时名相，以善谏著称。字玄成。先世是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后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祖父魏彦，在北魏时曾欲删削各家《晋书》，成一家之言，未成。父亲魏长贤，是著名史学家魏收的族叔，博涉经史，北齐时为著作佐郎，欲承其父志，改撰《晋书》，后因讥刺时政，出为上党屯留令，其志未遂。

魏徵少孤，通贯书术，素怀大志，不营赀产。隋末农民起义爆发，魏徵诡为道士，以避世乱。大业十三年（617），武阳郡（即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举兵响应瓦岗军李密，以魏徵典书檄。魏徵代宝藏作启谢李密，为李密所重，召为文学参军，掌书记。后以“十策”说李密，未被采纳。武德元年（618），瓦岗军为王世充所败，魏徵随李密投奔李渊，遂为唐臣。魏徵请出使山东，李渊因署魏徵为秘书丞，东出关，先后劝降了据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的瓦岗军余部徐世勣及据守魏州的元宝藏。二年十月，魏徵在黎阳被窦建德所俘，署为夏政权的中书舍人。四年，窦建德、王世充相继为唐朝所灭，魏徵遂复归长安，任太子洗马。当时秦王李世民为争夺皇位继承权与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明争暗斗，魏劝建成亲自将兵出征刘黑闼，借机树立威信，结



魏徵像

纳豪强，作为战胜世民的政治资本，次年，随太子至河北，建议释放囚俘，分化黑闼部众，黑闼果败。九年，魏徵又劝建成早除世民，未被及时采纳。六月四日发生“玄武门之变”，建成、元吉被杀。秦王李世民获胜，不久即位，是为唐太宗。太宗素重魏徵之才能，遂化敌为我，引为太子东宫詹事府主簿，拜谏议大夫。以后相继任给事中、尚书右丞，封钜鹿县男，又除秘书监、参预朝政（即宰相）、侍中，进位左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晚年曾为太子太师。

唐太宗以虚怀纳谏著称于世，贞观一朝谏臣云集，著名的有魏徵、虞世南、王珪、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等人，其中以魏徵最为杰出。他素有胆智，忠心耿耿，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诤，前后所奏二百余事，其中大部分保留在《魏郑公谏录》和《贞观政要》两书中。贞观十一年（637）所上的《论时政疏》、《陈十思疏》（简称《十渐疏》），是他一生奏疏中最为重要者。综合所谏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举贤任能，斥佞退邪；坚持法制，力避任刑；虚怀纳谏，不责过激；偃武修文，少动干戈；善始令终，力防蜕变。魏徵所谏都是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很多错误，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不小的作用。

贞观十七年，魏徵卒。太宗十分惋惜地对朝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太宗还亲自为魏徵撰成碑文，亲书刻石。就在这一年，太宗在凌烟阁图画二十四名功臣的肖像，魏徵名列第四。太宗晚年发动亲征高丽的战争，损失巨大，受创班师，扫兴之余懊悔地说：魏徵如果在世，就不会使我有这次出征。

魏徵以家学渊源，适应唐初统治之需要，亦略有纂述。唐贞观中修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代史，魏徵总领其事，其中《隋书》由他主要负责，并亲自撰写序论。此外，他还主编《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并为萧德言等所辑《群书治要》一书作序。

【长孙无忌】

（？～659）唐太宗和唐高宗时宰相。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祖出自鲜卑拓跋部贵族。父晟，隋时名将；妹为太宗皇后。无忌虽出于军事世家，却好学，善于谋划。他从小就和李世民亲善，太原起兵后，常从世民征伐，参预机密。唐武德九年（626），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他是策划和组织者之一。贞观中，历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司空，封赵国公，与房玄龄等同为宰相。太宗

图画功臣像二十四人于凌烟阁，以无忌为首。贞观十一年（637），他谏止功臣世袭刺史的错误措施。十七年，太宗废太子承乾，但在魏王泰、晋王治、吴王恪之间立谁为太子问题上犹豫未定，无忌以母舅和元勋的地位决策立晋王。二十三年，太宗病危，他和褚遂良受遗命辅政。高宗李治即位后，他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为朝廷首相，掌握大权。永徽四年（653），发生了房遗爱（太宗婿、房玄龄子）谋反案，无忌主持审案，他借此杀死和流配诸王、公主、主婿等亲贵十余人，进一步巩固了高宗的统治。永徽六年他和褚遂良反对立武昭仪（见武则天）为皇后，未果。显庆四年（659），许敬宗迎合武后意旨，使人诬告无忌谋反，无忌被流放到黔州（今四川彭水），被迫自缢死。

贞观中，他和房玄龄主修《唐律》和《律疏》。永徽四年，《律疏》三十卷成，即现存的《唐律疏议》，由无忌领衔奏上，为东亚著称的封建法典。

【裴行俭】

（619～682）唐高宗时名臣。字守约。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隋光禄大夫裴仁基之子。高宗时官至礼部尚书，兼右卫大将军，封闻喜县公。

行俭幼以门荫补弘文生，贞观中举明经，显庆初为长安令。高宗废王皇后，立武昭仪（见武则天），行俭私下和长孙无忌、褚遂良议论，被谮，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麟德二年（665）拜安西大都护，在西域时，诸部多慕义归附。乾封初，召为司文（鸿胪）少卿。总章中，迁司列少常伯（吏部侍郎），与李敬玄、马载同掌选事十余年，甚有能名，时称“裴、李”、“裴、马”。当时承平日久，取得各种资格上吏部候选为官的人剧增，行俭和李敬玄委任员外郎张仁祎创立法规，使选任官职有一定的条例可循，为后来所承用。

行俭少时从大将军苏定方学习兵法，后来领兵出征，善于料敌决胜。他诚恳待人，获得士兵爱戴，故战多取胜。调露元年（679）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与李遮匐反叛，侵逼安西（今新疆库车）。当时行俭受命册送波斯王子泥涅师归国，途经西州时，募得万骑，便假为畋猎，以计俘都支，将吏于碎叶城为他立碑纪功。由于他“文武兼资”，高宗特授礼部尚书，兼俭校右卫大将军。同年，东突厥阿史德温傅、阿史那伏念反叛，行俭以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统兵三十万出击。开耀元年（691），以反间计逼伏念执温傅来降，余众悉平。永淳元年（682）行俭卒。

行俭善于识拔人才，军中提拔的将领如程务挺、王方翼、郭待封、黑齿常之等，都成为一代名将。

行俭著有文集二十卷，《选谱》十卷。又撰《草字杂体》及营阵、部伍、料胜负、别器能等四十六诀，今佚。

【狄仁杰】

“真大丈夫”

狄仁杰（607～700），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祖父狄孝绪，曾官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曾官夔州长史。少年时代的狄仁杰刻苦攻读，专心致学。有一次，门人被害，县吏下来调查案情，周围的人都争说与己无关，

独狄仁杰仍伏案读书，不予理睬。县吏很气愤，责问狄仁杰。狄仁杰回答说："我正在和书中的贤圣对话，哪有闲功夫和俗吏说话啊！"县吏无言以对。后来，狄仁杰以明经中举，进入仕途。明经是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科目之一。狄仁杰最初任汴州参军，不久为人所诬告，此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他召狄仁杰查问，发现狄仁杰有奇特的才能，于是举荐他当并州法曹。在并州都督府，狄仁杰以孝而著称，很受时人尊重，称"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高宗仪凤元年（676），狄仁杰上调升任掌握刑狱的大理丞。狄仁杰处理刑狱，公正果断，效率极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处理了一万七千人的案子，公平合法，没有一人上诉伸冤。时人都称他断案公正宽大。

有一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太宗昭陵上的柏树，狄仁杰判两人免官，上奏高宗，高宗非要定两人死罪不可。狄仁杰认为，罪不当死。高宗发怒说："这是使我为不孝之子，必须杀了他才是。"狄仁杰对高宗晓之以理："皇上，自古以来顶撞皇帝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并不以为然。夏桀时代也许如此，而在尧舜时期就不是这样。我庆幸生活在尧舜一样的时代，不怕皇上听不进我的劝谏。汉代的时候，有一个盗贼盗取了高祖庙堂里的玉环，汉文帝大怒，要把盗贼一家全族诛灭。盗贼交与廷尉张释之处置。张释之按法判处弃市（杀头）罪，上奏文帝，文帝大怒，斥责张释之说：'人无道以至于此，竟敢盗取先帝明器！我交付廷尉，欲判他灭族之罪，而你却拘守成法，有违我尊宗庙的原意。'张释之免冠叩头说：'法今该如此判处。今以盗宗庙而灭族，万一有一个愚民挖取了长陵上的一抔土，皇上将以何法惩治呢？'文帝终于认识到廷尉的判处是恰当的。今天依照大唐法律，权、范两人并没有犯死罪，陛下却下旨将二人处死，法令如此反复无常，以后还怎么治理国家呢？为昭陵上的一棵柏树而处死二位大臣，后世之人将如何看待陛下呢？"

唐高宗觉得狄仁杰说得有理，怒意稍为缓解，遂免了权善才、范怀义的死罪，流放岭南。据理力争，免除权、范二人死罪之事使唐高宗认识到，狄仁杰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不久便擢升他为侍御史，举劾非法，督察郡县。在侍御史任上，他不顾个人安危，不畏显贵权势，敢于勇敢地向那些恃宠用事、违法乱纪的官员展开斗争。调露元年（679），司农卿韦弘执在洛阳为高宗建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几座豪华的宫殿。特别是上阳宫濒临洛水，一里长的画廊，画梁雕栋，流光溢彩，颇具皇家豪华气派。宫殿建成后，高宗移居东都洛阳。

狄仁杰上疏劾奏韦弘执，说他建造华丽宫殿，是在引诱皇帝追求奢侈。高宗猛然醒悟，免了韦弘执的官职。左司郎中王本立，倚仗皇帝的恩宠，在朝廷目无王法，肆无忌惮，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敢顶撞他。狄仁杰利用手中的监察权力，向高宗上奏弹劾王立本的罪行。但高宗却下旨赦免了他。

狄仁杰再次上奏，他对高宗说："国家假如缺乏英才，但像王立本这样的人也不少，陛下为什么要宽大他而违反国家的法律呢？臣愿先受斥逐，为群臣之戒。"高宗见狄仁杰说得有理，只得依了狄仁杰，定了王本立的罪。满朝

文武十分佩服狄仁杰的胆量和勇气，对他肃然起敬。一次，高宗巡幸汾阳宫，狄仁杰也随行。车驾经过并州，并州长史李冲玄迷信旧俗，认为华服装过妒女祠，会遭致风雷之灾。他驱数万民夫改修驰道，以便皇帝通行。狄仁杰闻知，非常气愤，他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用回避妒女啊！"立即制止了这一愚蠢举动，命数万民工返归。唐高宗称赞狄仁杰办事果断，说他"真是大丈夫也"。弘道元年（683），高宗病逝，其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执政。第二年，武则天把中宗废为卢陵王，立幼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武则天继续临朝称制。

狄公施德政

垂拱二年（686），狄仁杰调任宁州刺史，宁州在甘肃境内，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狄仁杰到任后，体察民情，施政有方。因而使各民族和睦相处，深得民心。老百姓感其德，立碑记其政绩。

不久，右台监察使郭翰巡视陇右各地，一路所到之处，弹劾了不少贪官污吏。然而一到宁州，则面目一新，百姓安居乐业，人们纷纷称赞狄仁杰的德政。郭翰回到朝廷后，遂即向朝廷推荐狄仁杰，请求重用。不久，狄仁杰被提升为掌握工程建设的冬宫侍郎，充任江南巡抚使。吴楚一带修建很多祠庙，祭祀很滥。狄仁杰对这种做法非常厌恶，他不惮非议，一举关闭和拆毁了一千七百多所祠庙，只保留夏禹、吴大伯、季札、伍员四祠。在焚毁项羽祠时，他还写了一篇《檄告西楚霸王文》，文章大意是：崇高的名声不可假借谬误来取得，天下的帝王不能以力去争夺；顺应天命者才享有百姓拥戴的美名，背违时代者就不是明察物变的君主。垂拱四年（688），狄仁杰转任文昌右丞，出为豫州刺史。

武则天当政之初，依靠李义府、许敬宗等贬杀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杀了许多唐宗室皇戚，并且幽禁自己的亲生儿子，重用武氏家族武承嗣、武三思等人，这引起了李唐宗室的强烈不满。原先，嗣圣元年（684），柳州司马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意图匡复唐室，他以拥立庐陵王为号召，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最后被武则天镇压下去。垂拱四年，琅琊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又起兵反对武则天，但因力量悬殊很快就遭致失败。

为了尽快恢复豫州的局面，武则天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武则天为惩治李贞余党，定罪六七百家，藉没五千口。狄仁杰为此密奏武则天，认为这些人仅仅是受牵累，并非存心要作乱。狄仁杰说服了武则天，宽赦了这些人，把他们流放到丰州。这些人深感狄仁杰的活命之恩，在路过宁州时，跪拜在狄公的德政碑前，"设斋三日而后行"。到了丰州又亲手为狄仁杰立下德政碑。当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辅。张光辅的军队在豫州，到处勒索钱财，滥杀无辜。狄仁杰非常恼怒，他亲自出面制止官军的不法行为。为此，张光辅怀恨在心，回到朝廷后上奏武则天，说狄仁杰傲慢不逊。狄仁杰被调往夏州做刺史，后来又降为洛州司马。

武则天实行"武周革命"改唐为周，她抛开傀儡皇帝李旦，自己登上了皇位。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但也是一位唯才是举、任用贤能的

女政治家。天授二年（691），她重新起用狄仁杰，任命他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

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你在豫州实行善政，但也有人说你坏话，你是否想知道。狄仁杰回答说："陛下，臣不愿知道。陛下以臣为过，臣愿改正。如臣无过，臣之幸也。"武则天大为赞赏，叹曰："狄仁杰真有长者风范啊！"狄仁杰当宰相后，常在武则天左右，他看到武则天经常要处理一些小事，甚且太学生告假回乡也由武则天亲自处理。长期这样必然她处理国家大。政的精力。

狄仁杰上疏说，君王应该牢牢掌握赦免和诛杀大权，其他的一些事应该由有司处理，自己不必过问。狄仁杰劝谏武则天独揽大权，强化皇帝的专制统治。武则天对狄仁杰的建议很满意。长寿元年（692）一月，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谋反。武则天不察详情，就把做了四个月宰相的狄仁杰罢相下狱。任用酷吏，以巩固政权，是武则天的统治手段。这些酷吏专门制造所谓谋反大案。他们制造许多刑具，对被告严刑逼供。

这次，来俊臣为了诱使狄仁杰承认谋反，要他承认愿为武后的臣下就可免去他死罪。狄仁杰为了免于冤死，等待时机，他招认了谋反罪。他说："大周革了唐室的命，万物重生，我们是唐朝的旧臣，谋反确是实情。"其他几个被指控谋反的大臣，除魏元忠外，都和狄仁杰一样，全都服了罪。来俊臣见服了罪，没有用酷刑，只将被告收监。一天，判官王德寿受来俊臣指使，诱逼狄仁杰招供宰相杨执柔是同党，狄仁杰十分气愤，说："皇天后土，叫狄仁杰去干这种事情么！"说罢以头触柱，血流满地。王德寿害怕至极，不敢再说了。狄仁杰承认谋反，来俊臣等也就放松了对他看管，狄仁杰趁此机会，从狱吏那里借来笔砚，偷偷撕碎被子，写了一幅冤状，缝在棉衣里，请狱吏把棉衣送到家里。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收到棉衣，折开棉絮见到父亲所写的冤状，急忙向武则天告发。

武则天召来俊臣询问，来俊臣对武则天说，狄仁杰下狱，并未动过刑，他住的地方也很舒服，如果没有事实，他哪乱承认谋反。武则天犹疑未定，派通事舍人周綝到狄仁杰处察看。来俊臣要狄仁杰穿好朝服，会见通事舍人周綝，又假造了一份请求赐死的《谢罪表》，让周綝上交武则天。周綝核查，完全受到来俊臣的利用。

就在这关键时刻，凤阁侍郎乐思晦的儿子被武则天召见，他控告来俊臣谋害了他的父亲。他说，国家的王法为来俊臣所欺弄，任何一个亲信大臣，来俊臣都可以逼他承认谋反。听了这个才九岁小孩的话，武则天有所醒悟。他召来狄仁杰，亲自问他为什么承认谋反。狄仁杰回答说，不承认早就死于酷刑之下了，哪里还有机会向陛下辩白？武则天又问，为什么写《谢罪表》。狄仁杰告说，并无此事。武则天这才真相大白，释放了狄仁杰等七名同案人。虽然如此，武则天还是没有让他们官复原职。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同案的有的还流放到了岭南。狄仁杰当县令的彭泽县（今江西九江），是个穷地方。他一到任，亲眼看到老百姓穷苦不堪，就向武则天上疏，陈述百姓困苦，乞免租税。他在疏中说："常年纵得全熟，纳官之外，半载无粮，今总不收，将何活路？"

再度为宰相

万岁通天元年（696），北方契丹孙万荣率军攻陷冀州，杀死刺史陆宝积，屠杀官兵数千人。契丹兵进而又攻打瀛州，整个河北为之震动，人心恐慌。武则天下诏擢升彭泽县令狄仁杰为魏州（今河北魏县、大名县等地）刺史，前去平息战乱。狄仁杰上任后知道，前任刺史独孤思原因害怕契丹突然来袭，把老百姓全部迁入城里，修补城墙，巩固城防。与此做法相反，狄仁杰上任后打开城门，让老百姓出城耕作。他宣称，敌人离这里还很远，不必这样惊慌。如果敌军到来，我自有退敌制胜之策，无须烦扰百姓。

契丹听说狄仁杰到了魏州，慑于其威名，未敢冒犯，不战自退。魏州官民对狄仁杰的气势和胆略十分敬服，他们感谢狄仁杰的德政，为他立了碑。不久，狄仁杰改任幽州都督。武则天赐紫袍、龟带，并自制金字十二于袍，以表彰狄仁杰的忠心。神功元年（697），狄仁杰晋升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第二次做了宰相。复相后，狄仁杰面临第一个大问题是派兵镇守疏勒四镇。

当时王孝杰率军大破吐蕃军，夺回了西域的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郡，并在龟兹设安西都护府，派军驻防。这四镇是唐朝的西疆要塞。然而，狄仁杰认为。派兵驻戍四镇不是上策。因而他上疏朝廷，陈述用兵荒外，争不毛之地是“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可谓无益可得，无利可图，倘若一味用兵，必然耗费国家大量资财，“非但不爱民力，亦所以失天下之心也。”

狄仁杰建议，可模仿贞观年间唐太宗册封阿史思摩为可汗的做法，由他镇守四镇的旧例，封阴山贵族阿史那斛瑟为可汗，委坐四镇。这样既省了大笔开支又能达到安边的目的。武则天并没有采纳狄仁杰的意见。圣历元年（698）八月，狄仁杰再次得到提升，拜为纳言，兼右肃政御史大夫。同年，北方东突厥进犯河北，攻掠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赵州（河北赵县），杀死官兵无数。

武则天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征讨东突厥，武则天亲自送军队出征。狄仁杰率十万大军猛追，东突厥迅速逃回漠北，曾经饱受突厥驱使的百姓恐惧至极，生怕受到官兵杀害，纷纷逃匿。武则天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狄仁杰上疏武则天，请求把这些百姓一律赦冤，不加追究。他在上疏中说，这些负罪百姓“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他提醒武则天：“边远有事，还不足虑；如内地不安，就是大事了。”这是狄仁杰处理国家大事的出发点：努力淡化和消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力求国内的稳定。

武则天采纳了狄仁杰的建议，对被突厥驱使的百姓一律不问罪，许多逃匿的百姓纷纷回家。狄仁杰大量发放粮食，救济穷困百姓，百姓很快安定下来。狄仁杰还下令，严禁官兵侵扰百姓；若有违犯，定斩不赦。在狄仁杰安民做法的感召下，河北道很快安定下来。狄仁杰回朝后，被授予内史。武则天改唐为周，当上女皇帝后，萦绕在她心头的问题是：由谁来继承她的大业。唐睿宗虽是她的亲生儿子，又赐了武姓，但他毕竟是李

唐王朝的后代。如果将她的侄了武承嗣或武三思册立为太子，但两人不具备品德和才能，不可能成为贤明君主。武承嗣在武则天改唐为周后，也蠢蠢欲动，想当太子，武则天对此也犹豫不决。

狄仁杰趁此机会，想说动武则天。他说："太宗皇帝不避风霜，甘冒枪林箭雨，九死一生，方平定了天下，创立大唐基业，传给后世子孙。先帝驾崩时，把两位皇子托付给陛下。陛下现在打算把天下移交给别人，这恐怕有违天意吧！况且，姑妈与侄儿，亲娘与儿子到底谁亲？立儿子为太子，皇位由儿子继承，陛下百年之后牌位送到皇家祖庙，陪伴先帝，代代相传；皇位如由侄儿继承，我从来听说过侄儿当皇帝把姑妈牌位送到皇家祖庙去的！"狄仁杰的话说到了武则天的心坎上，她无言以对，只好说："这是我的家务事，你不要管。"但狄仁杰还是再说下去："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他还进一步启发武则天："依臣看，天意和百姓都没有厌弃唐朝。匈奴犯边，梁王武三思公开募勇士，一个多月还没有招足一千，后来庐陵王出面招募，不到十天功夫，就有五万人报名。由此可见，现在要立非庐陵王不可！"后来，鸾台侍郎王方庆、内史王及善等也提出立庐陵王为太子的建议，武则天才有些心动。狄仁杰又说服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劝武则天立庐陵王为太子。至此，武则天才下定了决心。

狄仁杰为相，先后荐举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人，有的后来当了宰相，如姚崇能够"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是唐玄宗时有的名宰相。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人才。狄仁杰说："文学蕴藉，则苏味道、李峤固可选矣。必欲取卓荦其才，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真宰相才也。"于是武则天擢升张柬之为洛州司马。

不过几日，武则天又问狄仁杰谁能当宰相。狄仁杰说，先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用。武则天说，已经用了。狄仁杰说，我推荐张柬之可做宰相，不是推荐他做司马。于是，武则天迁张柬之为秋官侍郎，不久又任命为宰相。知人善任，用其所长，是狄仁杰的用人特点。契丹部落将领李楷固、骆务整归降唐朝后，有些大臣上表要求对他们处以极刑，诛灭九族。狄仁杰则上疏请求赦免李楷固、骆务整，武则天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但赦免了他们，还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派他们率军攻打契丹残余部落。

得胜回朝，武则天非常高兴。她在庆祝平定契丹的庆功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祝贺狄仁杰说："这都是你知人之明！"狄仁杰举人，以德才为重，真正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年，武则天要每位宰相各推举尚书郎一名。狄仁杰推荐其子狄光嗣。后拜为地官员外郎，很是称职。武则天称赞他有春秋祁奚举亲的遗风。由狄仁杰举贤任能，当时人称赞他："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仁杰说："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姚崇】

三次为相

姚崇（651～721），字元之。本名



姚崇像

元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人。唐高宗永徽元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姚懿，在贞观年间曾官巂州都督。姚崇年少时不拘小节，长大后好学不倦，后经科举人任，授濮州司仓参军，不久又任司刑丞，此时正值武则天天授年间，严刑峻法横行，姚崇理案刑狱，执法公正，把很多人从冤狱中救出来。他的才能引起了上司的重视，连连晋升，不久任夏官郎中，成为兵部的一名要员。武则天是个有为的女皇帝，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姚崇。其时，契丹举兵攻陷河北数州，情况相当危急。姚崇上书提出应急对策，武则天见他的上书剖析周密，论理精到，便破格提升为兵部侍郎。武则天前期执政，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闹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姚崇直言不讳地对武则天说："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姚崇甚至以自身和全家人性命担保，恳求武则天，今后收到告发谋反状子，把它收起来，不再追究；假如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他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了很高兴，说："以前宰相什么事都表示顺从可办，使朕陷于滥施刑罚的境地，现在听到你的话，很合朕的心意。"特赏给姚崇白银千两。圣历三年(700)，武则天提升姚崇以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不久，又兼相王府长史，姚崇以母亲年老解职侍奉，下诏以相王长史侍疾。过了一个多月，复兼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姚崇建议："臣事相王（李旦），而夏官本是管理兵马的职守，臣不宜典兵马，不是臣爱惜性命，只是这样做对相王没有好处。"武则天认为姚崇的意见有道理，于是下诏尽改为春官（礼部）尚书。姚崇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当时，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倚仗武则天，横行朝中。长安四年(704)，张易之要把京城的十个和尚派往自己修造的河北定州的佛寺。

此事本来是件小事，但为了遏制张易之的气焰，姚崇就是不同意这些和尚去定州，张易之几次请求照顾，姚崇就是不答应。这一来，张易之记恨在心，暗中在武则天面前说姚崇的坏话，武则天就借突厥犯边的机会，把姚崇调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道安抚大使。虽然他还是凤阁鸾台三品，但其实已是徒有官名，并无实权。赴任前，武则天要姚崇荐举宰相人才，姚崇继狄仁杰后，再次推荐张柬之，认为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武则天才于长安四年（704）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同

凤阁鸾台平章事，做了宰相。张柬之做宰相后，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朝中跋扈横行，包藏祸心，深感不满。同时朝臣们又多次上书，要求惩治二张，更使张柬之下定决心，要收拾他们。由于武则天袒护，二张始终在宫中逍遥法外。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认为时机已到，着手谋划诛杀二张。正好姚崇正从驻地灵武回京，这无疑是来了一个好帮手，张柬之等十分高兴，经过姚崇与张柬之等密谋，率五百羽林兵，直接进入玄武门，杀死了这两个不法恶徒。随后，又对武则天施加压力，迫使武则天将帝位让给太子李显。李显复位后，以姚崇、张柬之为宰相，又因为姚崇有功，加封他为梁县侯，食邑二百户。

武则天迁居上阳宫，中宗李显率百官问候起居。王公群臣相互庆贺，唯独姚崇呜咽流泪。张柬之对姚崇说："今日岂公流泣之时，恐公祸由此始。"姚崇说："顷与公等诛杀二张，不足以言功，但奉事武后为时已久，突然离别旧主而悲泣，这是做人臣的常情，由此获罪也是心甘情愿的。"中宗李显听到姚崇的这些，便将姚崇调离京城，出任亳州刺史。

姚崇的悲泣固然有留恋君臣的私情，也由于他清醒地看到，张易之兄弟虽已被杀，武则天也已让位给太子，但中宗昏庸，武氏家族的势力很大，将来一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他不愿遭到武氏势力的暗算，因而"以一涕谢诸武而远引以出"（王夫之语）。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在中宗的支持下，削了张柬之等五人的实权，五人在流放中被害，而姚崇独得以免死。姚崇罢相后，先后在亳州、宋州、常州、越州、许州等地当刺史，远离京城，没有参与朝廷内部的斗争。此时朝廷已为武三思和韦后所掌握，中宗只是傀儡。

太子李重俊对武、韦早已积恨在心，于景龙元年（707）七月，矫发羽林军，杀死武三思及党羽十余人，昏庸的中宗在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的包围、逼迫下，发兵杀了太子李重俊。韦后和安乐公主野心越来越大，两人又再次合谋，毒死了中宗。朝中大权完全掌握在她们手中。韦后一心想走武则天的道路。然而、好梦不长。李隆基策动禁军又一次发动政变，杀死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相王李旦在儿子李隆基以及妹妹太平公主的扶持下，恢复帝位。李旦立李隆基为太子。睿宗李旦即位后，于景云元年（710）六月，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二次当了宰相。虽任宰相，但掌握朝中实际权力却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她干预朝政，也想走其母武则天的道路。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和宋璟联名上奏，建议把太平公主安置在东都洛阳，其余掌握兵权的诸王派往各州当刺史，以确保李隆基的东宫地位。昏庸的睿宗，如实将姚、宋的建议转告给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大怒，李隆基也害怕极了，为争取主动，李隆基就抢先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关系，应加严惩。于是，姚被贬为申州刺史。以后，又先后任扬州刺史，淮南按察史，在地方官任上，为官清廉公正，颇受百姓爱戴，后调任同州刺史。先天元年（712），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当时，太平公主已感到了李隆基对她的威胁，遂决定发动政变。但玄宗事先得到手下

密告，决定先发制人，于开元元年（713）七月，出动羽林军一举把太平公主的党羽消灭，太平公主也被玄宗赐死。唐玄宗是个励精图治、想使国家振兴的君主。他决定起用姚崇为相。先天二年（713），玄宗在新来驿讲武。按照旧例规定，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长官，必须到行在拜见。玄宗密召姚崇前来。姚崇到时，玄宗正在？胃河边打猎。

玄宗立即召见。玄宗问他会不会打猎，他说："少年时练习过。臣二十岁时，住在广成泽，以呼唤鹰犬追逐兽类为乐。张憬藏说臣长大后应当辅佐天子，不要自暴自弃，所以决心读书，后来才成了将相。但是少时常带了一些人打猎，老了还可以应付。"于是姚崇便和玄宗呼鹰放犬，十分熟练。玄宗十分喜欢，猎后，征求他对国事的意见。姚崇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就要拜姚崇为相。姚崇就此提出十条意见，希望得到玄宗的同意。这十项建议是姚崇针对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和经验教训提出的，是他挽救政治衰败的革新纲领。十条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治诸方面，切中时弊，急于振兴国家的唐玄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玄宗欣然表示赞同，一一采纳。在渭川，他就拜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三次当了宰相。

姚崇此时得到了玄宗的充分信任。举凡军国要事，玄宗都一一要和宰相商议。唐玄宗为姚崇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宰相张说和姚崇不和，玄宗就把张说派到地方任职当了刺史，当另一宰相刘幽求也主动调任闲职。于是，当朝的宰相只有卢怀慎和姚崇，而姚崇无疑处于支配的地方。他既掌相权，又掌军权，在开元年间是大刀阔步革故鼎新政治家和行政长官。开元初年，局势混乱，动荡不安。姚崇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他看到武后末年以来，皇亲国戚多居台省要职，诸王又掌握指挥禁军大权。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勾结朝官，迭相为乱，多次发生政变。自武则天以来，短短的八、九年间，就接连发生了五次政变。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姚崇协助玄宗，在开元二年，把诸王改任外州刺史，并规定诸王"不任以职事"，"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从此诸王只享有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大权，因而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资本。姚崇还规谏唐玄宗，"戚属不任台省"。所以，开元初没有大封皇亲国戚。王皇后之父王仁皎，仅历任将作太监、太仆卿等职，史称"仁皎不预朝政"。姚崇还设法抑制功臣权势的膨胀，把一些官高势盛，居功自傲的功臣贬到地方做州刺史，这些措施，像同釜底抽薪一样，消除了中央政局动乱的隐患，结束了多年来动荡不安的局面，姚崇"救时之相"的称誉也由此而来。

在整顿吏治方面也姚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宗以来，卖官鬻爵，官吏增多，机构庞大，全国除正员外，置员外官二个人。一些富商大贾只要花钱就可以做上官。官多俸多，国家开支人不敷出。于是，开元初年，姚崇大量裁减冗员，罢免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申明这三种官，今后如果没有政绩和战功，不经皇帝特别诏令，吏部和兵部不得录用。同时，还撤消了一些闲散诸司、监、署十余所机构。规定内外文武正员一万八千八百另五人，大大地减少了冗

员，从而也减轻了国库的负担。开元初年还规定了中央官和地方官相互的流动制度。京官有才识者，可出任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可入选京官。这样一来，长期存在的重内官轻外官的弊端就得到了纠正。

县令是地方的基层长官，长期不予重视，为避免滥用，开元四年（716），玄宗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殿试，其中成绩卓著者一人擢升，四十五人不合格，回家读书、修养。姚崇荐官取士，以品德才能为主要。他所推荐的广州都督宋璟，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是唐代的四大贤相之一。姚崇大力整顿，吏治，严格诠选制度，罢免了以前的"斜封官"。"斜封官""用钱三十万，别降墨敕除官"，因为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书，用斜封交付中书省执行而得名。任人唯贤，量材录用，是姚崇吏治的主要做法。

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未经有关部门，私自奏请玄宗，把府中的阎楚珪由录事提拔为参军，这次私自请托而任官，玄宗虽已表同意。但却遭到姚崇上疏反对。他说："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由于姚崇极力反对，据理力争，玄宗不得已收回敕命。姚崇重视用法制来约束官吏，对违法乱纪者，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一视同仁，决不宽赦。开元二年正月，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倚仗权势，欺凌百姓，受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薛王到玄宗那里求情。玄宗下令重新审查，意欲宽免。姚崇上书玄宗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由于姚崇的大力整顿，开元初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灭蝗抑佛

开元四年（716）山东等地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人们认为这是"天灾"，只好坐以待毙，只好求上天显灵禳灾，眼睁睁地"坐视食苗不敢扑"。

在满朝文武一筹莫展之际，姚崇上疏玄宗，主张应想尽办法扑杀蝗虫。他说："田地都有主人，使自救其地，不会害怕劳苦。"他提具体灭蝗措施："夜中设火，火边挖坑，且焚且塞，除之可尽。"他认为"古代有除不尽的，主要是人不用命。"当时，朝议纷纷，都"以驱蝗为不可"。姚崇力排众议，他说："庸儒拘泥于咬文嚼字，不知通变。今山东蝗虫到处成灾，再加上不断繁殖，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

为了消除唐玄宗的疑虑，坚定他灭蝗的决心，姚崇还坚决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姚崇的这一番话，坚定唐玄宗的决心。他对左右说："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扑蝗之事，敢议者死。"于是，姚崇排除了干扰，下令扑蝗。他特派遣御史，取名"扑蝗使"，分赴各地，督促扑蝗。仅汴州一地就扑获蝗虫一十四万石，而入汴渠顺流而下的不计其数。因为山东人民的奋力扑杀，"蝗虫是渐止息"，山东地区免遭了一场灭顶之灾。

唐代佛教、道教盛行，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都佞佛道并从中牟利。他们耗费巨资，大量建造佛寺、道观，占用大量土地。而这些寺院享有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服役。各地寺院纷纷度人为僧。由于佛

道人数的增多，造成国家财政日益枯竭。

开元二年（714）姚崇上疏玄宗，请求裁减和尚。他说："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他列举了历代由于只知信佛而导致身死国破的事例，说明佞佛道之不可取。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裁僧尼三万人，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玄宗还下令，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禁止铸造佛像，传写经书，禁止建，造佛寺；即使修缮旧寺，也要报请批准。这些措施无疑对抑止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开元四年（716），姚崇辞去宰相之位，朝廷授予他开府仪同之司。

虽然不在相位，但有关军国大事，玄宗还是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开元五年（717）春，玄宗将巡幸东都洛阳，太庙突然倒塌。玄宗询问身边大臣，大臣回答说："三年之丧没有满，不可以行幸。太庙圮坏的变故，是上天的教诫，陛下应停止东巡，修身养性以谢上天的谴责。"玄宗召姚崇询问此事，姚崇回答说："太庙大殿乃前秦苻坚所建，年月久远，木质腐朽，必然会倒塌。但倒塌之日与行期相合，只是巧遇。"姚崇劝玄宗，巡幸东都已准备就绪，不可误期。他主张重新建造太庙，准时东行，玄宗欣然同意。

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病危之际，还嘱子孙不要信佛，说："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并嘱薄葬："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备一副而已。"唐玄宗对姚崇的逝世，十分悲哀，下令为姚崇撰写碑文，赞誉姚崇："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翅；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

【宋璟】

勇斗张氏兄弟

宋璟（663～737），邢州南和（今属河北南河）人，生于唐高宗龙朔三年。其父玄抚，曾官卫州司户参军。宋碌自少刻苦好学，博学多识，工于文辞。为人耿介超俗，有大节。二十岁左右中进士，授上党尉，后又升任监察御史、凤阁舍人，为官正直，颇受武则天的赏识。张易之、张昌宗为武则天皇帝的内宠，有恃无恐，专横跋扈。宋璟不畏权势，不顾安危，与二张反复进行斗争。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张易之诬构宰相魏元忠，他赂贿凤阁舍人张说作伪证，要张说到御前作证，说魏元忠说过反叛的话。同为凤阁舍人的宋璟对张说说："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是名义气节，不可只图个人苟生，陷诬好人。即便因此被谪官流放，他的美德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倘有不测之祸，我准备叩请天子赦免，要死与你一起去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张说听了很受感动，廷辩时如实上奏，使魏元忠免受陷害。不久，宋璟调任御中丞。

这时武则天年事已高，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更加横行专断。朝中大臣都惧怕二张，不敢直呼其职，而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宋璟对二张毫不畏惧，二张反而有些怕他。一次，武则天大宴群臣，二张位居列卿三品，在上座。宋璟官阶六品，在下座。易之讨好宋璟，虚位作揖说："公是朝中第一人，怎么倒坐在下座？"宋璟说："我才劣位

卑，卿说我为第一，这是为什么?”天官侍郎郑善果平时对二张毕恭毕敬，问宋碌：“公怎么叫五郎为卿?”宋璟说：“以官衔而论，正当为卿，你又不是他家的奴仆家奴，那里有叫他为郎的呢?”。宋璟的话使郑善果面红耳赤，也使二张狼狈不堪。从此，张易之兄弟对宋璟更是怀恨在心，处处因事中伤宋璟，但因为武则天知其情，宋璟得以免罪。长安四年（704），二张因武则天病情日益加重，非常担忧，暗中密谋对策。此时有人发觉二张有异常举动，告发二张谋反，但武则天不予理睬；更不追问。其时，许州杨元嗣告发张昌宗召术士李弘泰看相，李弘泰说他有天子相，还劝他在定州建造佛寺，使天下归心。

因为涉及谋反大事，这次武则天派凤阁侍郎韦承庆、司刑卿崔神庆和御史中丞查明上报。韦、崔二人惧怕二张的权势，又想讨好武则天，谒力为张昌宗开脱，说张昌宗已将弘泰的话告诉皇上，不可加罪。宋璟质问说：“谋反这样大事，不是自首可以宽宥不问的，臣请交有司审理以明国法。”他还对武则天说：“易之等久蒙驱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祸从，但激于大义，虽死不悔。”武则天听后很不高兴。宰相杨再思恐怕宋璟得祸，急忙拉了宋舔出去。宋璟说：“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宋璟始终不放过二张，对武则天说：“倘不收狱，恐要为乱天下，动摇民心。”武则天没办法，只好收张易之、张昌宗人狱。过了不久，又将他们特赦放出。为了缓和矛盾，令易之兄弟到宋骤家谢罪，宋璟拒不会见，说“公事可以公办，若私下会见，法是不讲私情的。”他对二张恨得咬牙切齿，对左右的人说：“我后悔不先敲破这两个小子的脑袋而让他们为乱朝政。”宋璟对二张的斗争，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因而得到朝臣的支持。左拾遗李邕上奏武则天，说宋璟所奏，非谋自身私利，而在安定国家，然而，武则天就是不听。

为了避免矛盾，武则天派宋璟到扬州当按察，宋璟说：“审理州县案件，是监察御史的职责。”后又诏令宋璟按察幽州都督屈突仲翔。宋璟又拜辞说，“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得轻易出京。仲翔犯的是贪赃罪，如今要臣前去，必有害臣之心。”随后，又下诏为李峤副使，出使陇蜀。宋璟又辞掉这个差使，说：“陇右没有变故，臣以御史中丞为李峤之副，朝廷还无先例。”宋璟为治二张罪，三次违诏，不肯奉诏前行。本来，张易之兄弟想借宋碌出京的机会，向武则天劾奏，予以诛杀。此计不成，他们又生一计，在宋家举办婚事时，刺杀宋璟。宋璟知道了阴谋，就乘坐卑微的车躲到别处歇宿。刺杀的计划无法实现。宋璟对二张的斗争，虽然没有取得结果，但却使二张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朝臣对二张的所作所为，极为痛恨。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情加重，二张守在在武则天身边处理国事，大臣无法近前。宰相张柬之经过紧张密谋，联合禁军将领，杀死了张易之、张宗昌兄弟，迫使武则天让位于太子李显。中宗李显复位后，宋璟任吏部尚书兼谏议大夫、内供奉，随时讨论朝政得失。不久，又改任黄门侍郎。

抗拒中宗旨意

中宗是个昏庸的皇帝，不理朝政。大权掌握在皇后韦氏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手中。宋碌和武三思之间，又开展

了尖锐的斗争。神龙二年（706）京兆人韦月将上书中宗，告发武三思“秽乱宫掖”，武三思闻知后，暗使手下人将他以大逆不道治罪。中宗听信谗言，下旨处斩韦月将。

宋碌以为案情不实，请求下狱关押审理。中宗大怒，他说：“朕已决定斩首，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宋碌说：“人家告韦后与三思有私情，陛下不加过问就问斩，臣恐有人会私下议论，请查实后用刑。”中宗愈加发怒。宋碌面无惧色，说：“请陛下先将臣斩首，不然不能奉诏。”中宗无奈，才免韦月将极刑，发配岭南。后来又将他处死。不久，中宗下诏宋撩为检校并州长史，没有成行，又任为检校贝州刺史，宋骤被挤出了朝廷。贝州在河北省南部，宋碌到达时，河北暴雨成灾，百姓饥馁。武三思的封地在贝州，三思不顾百姓死活，派人向封户强征租税。出于对百姓的爱护，宋嫌抗拒交纳租税。武三思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宋嫌从贝州调到杭州、扬州做刺史，后又迁任洛州长史。当时，韦后、武三思，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太子李重俊不是韦后所生，因而引起他们的忌恨，欲废太子，立韦后女儿安乐公主为皇太女。李重俊忍无可忍，于景隆元年（707）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共谋，矫发羽林军，发动宫廷政变，杀死武三思及其同党。但昏庸的中宗，不察大局，听从韦后和安乐公主，挫败了李重俊的政变，李重俊兵败被杀。

从此，韦后和安乐公主更加有恃无恐，中宗成为傀儡。韦后一心想效法武则天做女皇。于是于景龙四年（710），将中宗毒死。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韦后眼看就要实现女皇之梦了，不料中宗的弟弟李旦的儿子李隆基联合姑母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了韦后和安乐公主。相王李旦复位。任命宋碌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他和姚崇同朝为臣，二人同心协力，辅佐睿宗，锐意改革中宗以来的弊政。中宗时期，外戚和诸公主干预朝政，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卖官鬻爵，乌烟瘴气。只要出钱三十万，不论何人都给官做。他们不经中书、门下批准，直接由皇帝降墨敕授予。当时人称为“斜封官”。这些斜封官大都是富豪商贾，他们不会理政，但搜括百姓却是心狠手辣。姚崇和宋璟上疏睿宗，请求罢免斜封官，进忠良，退不肖，当时共罢免斜封官数千人，整个朝野为之一振。宋璟还从整顿吏治制度着手，恢复三铨制度，在候选的上万人中，拴选了二千人。宋璟选拔、考核官员，不畏权贵，不徇私情，赏罚公平，为当时人所称誉。

犯颜太平公主

睿宗也是个低能的皇帝，他的妹妹太平公主，由于睿宗复位出了力，权势日重，她广交朋党，积极扩大势力，严重威胁了太子李隆基。景云二年（711），她邀集宰相于光范门内，要求更换太子李隆基，在场的人无不惊慌失色，但宋撩却镇定自若，他高声说：“东宫太子大有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王，公主乃何忽有此议!”为确保太子地位，宋璟和姚崇密报睿宗，提出三条对策。一是把宋王李成器、幽王李守礼出为刺史：二是把岐王李隆范、薛王李隆业的统领羽林军的大权交出来，由太子直接掌握。三是把太平公主及其丈夫迁往东都。李睿采纳了这三条意见，还命太子监国，凡六品以下官员及徒罪，

均由太子处置。这些措施对巩固太子的地位和势力，无疑是起作用的。

太平公主不甘心灭亡，她加紧反扑，在她的鼓动下，掀起了一股反对罢“斜封官”的浪潮，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受到极大压力，为了保存自己。他违心上奏睿宗，说姚、宋璟离间他和姑姑、兄弟之间等皇族关系。于是睿宗就罢去姚、宋宰相职务，贬宋璟为楚州刺史。

此后，调动极其频繁，先后任申州刺史，魏州、兖州、冀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最后转任广州都督。在广东，他教老百姓烧砖瓦建瓦房，把茅草屋改成了砖瓦房。当地老百姓歌颂他的功德，在他离开广州时立“遗爱碑”，纪其爱民之情。712 年，睿宗传位给太子李隆基，自己当了太上皇。

玄宗虽当了皇帝，但太平公主的势力仍然很大，仍然对她构成威胁。尤其是朝中宰相，多数依附于她。开元元年(713)，有人密告玄宗，公主将欲作乱。玄宗召集岐王李隆范、薛王李隆业和宰相郭元振等人商议，决定先发制人，调兵三百余人，一举杀死太平公主党羽，太平公主闻变逃脱，后被赐死家中。至此，宫殿内的不断的政变才告一段落。唐玄宗是个励精图治的帝王，他决心革除弊政，使国家重新复兴起来。开元之初，他任用姚崇为宰相，整顿吏治，开创了开元之治的繁荣局面；姚崇免去宰相后他又采纳姚的建议，任命宋璟做宰相。

辅佐贤主玄宗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任用宋璟为吏部尚书兼黄门监。他派宦官杨思勖前往广州迎接，宋璟态度凝远，沉默寡言，一路上竟未与杨思勖搭过一次话。杨思勖对此颇为不满，回来告诉玄宗。殊不料玄宗对宋璟的为人更加肃然起敬。宋璟为相，志在择人，因才授人，使百司各任其职。他看到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才略文采俱佳，但思想和性格上有不少毛病，宋璟感到“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于是，根据各人的才器、能力，分别拜任渝州刺史和硖州刺史。

大理卿元行冲，在人们的心目中，才行兼备，但上任之后，却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于是调其为左散骑常侍。他选拔官吏，出自公心，对人对己无一例外，对自己的亲属也不例外。他有个堂叔叫宋元超，在吏部选拔官吏时，特别说明自己是宰相宋璟的叔父，想借此得到重用。宋璟知道后，马上给吏部去一函，说宋元超表明了他和自己的关系，就不应再予任用。

宋璟的用人，不论皇亲国戚，一视同仁。岐山县令王仁琛，是玄宗称帝前的藩邸故吏，唐玄宗特降墨敕令授五品官，宋璟上疏以为不可，他说：“故旧恩私，则有大例，除官资历，非无公道。仁琛向缘旧恩，已获伏改，今若再蒙超奖，遂于诸人不类。”他请求由吏部诠选考核，按制度办事。玄宗只得听从宋璟的意见，收回成命。宋璟的宠臣太常卿姜皎，也是玄宗为藩王时的故交，在诛杀太平公主时又立过大功。玄宗对他宠遇有加。姜皎的弟弟姜晦，也沾哥哥的光，当上了吏部侍郎。宋璟为此事对玄宗说：“皎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把姜皎改任散官，放回田园，姜晦也改任为宗正

卿。为了避免朝廷大臣的独断专行，避免君王的听信谗言，他提出恢复贞观年间的对仗奏事制度的建议。贞观年间，皇帝临朝，设仪仗、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奏事，或御史弹劾百官，都对着仪仗。高宗以后，这一制度逐渐被疏废，大臣奏事多待仪仗下殿；谏官、史官退朝之后，成为密奏，所奏之事，他人不得而知，产生了许多弊病。

宋璟提议恢复对仗奏议，有利于公开和监督。唐玄宗批准了恢复这一制度："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作为宰相，宋璟敢于犯颜直谏，唐玄宗很敬畏他，常常曲从于他。开元五年（717），宋璟随同玄宗巡幸东都，路过崤谷（今河南陕县），山高路窄，难以行走。玄宗十分恼怒，要罢免河南尹李朝隐和负责旅途事务的知顿使王怡等人官职。

宋璟进谏说："陛下正当壮年，如今才开始出巡，以道路没有修好而处分二臣，这样整治，以后恐会产生弊端。"玄宗认为很有道理，就免去二人之罪。当时社会风气趋向奢华，讲求厚葬。宋璟为官，力戒此弊。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死于开元七年（719），哥哥王守一，是当朝的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玄宗为其父建造高五丈一尺的坟基。唐玄宗答应了。许多大臣虽有议论，却不敢上奏。只有宋璟无所畏惧，他和同朝宰相上疏玄宗，指出厚葬和薄葬是俭与奢的大事。俭约是美德，奢侈是大害。僭越礼法予以厚葬，前贤引以为戒，所以古人只挖墓穴埋葬而不再修坟。"

玄宗完全接受了宋璟的劝谏，按宋璟的尺寸，建造坟基。还称赞宋璟说："朕常想端正自身，以纲纪治理天下，对皇后有偏心啊！但别人感到为难，只有公等才能讲这样的话。"还特意赏给宋璟、苏颋彩绢四百匹。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和同朝宰相苏颈奏请禁恶钱。

恶钱是民间铸的私钱，铸造时掺进杂质，质量低劣。恶钱的流行，使贫者日贫，奸豪者岁增。他俩建议"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铢四累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复铸。"但因为触犯了铸钱富豪的利益，引起他们不满，他们纷纷上奏反对。于是，唐玄宗罢了宋璟、苏颋的宰相职务。宋蝶任开府仪同三司，不再握有实权。被罢相以后的宋璟，一如既往，仍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处理事务十分果断。

罢相后的第二年，玄宗任命他兼任京兆留守，并要他接替河南尹王怡处理权梁山的谋反案。宋璟对案件进行复查，发现权梁山诡称办婚事，筹集款项，县吏要贷款的人连坐。宋璟接手后，经过了解和审讯，把几个头头定了罪，其余一概不问，迅速断了案。开元十二年（724），玄宗东巡泰山，宋璟留守京师。玄宗将出发，对宋璟说："卿是国家元老，要有一段时间离别，有什么好主意告诉朕？"宋璟一一直言相告。

玄宗亲写制诰回答说："卿所进言，当书写后置放左右，进进出出可随时观看反省、以为终身之诫。"后来，宋拣兼任吏部，开元十七年（729），玄宗拜任宋撩为右丞相，玄宗在尚书省宴请百官，席间赋《三杰诗》一首，并亲自书写，赐给宋拣、张说等三人。开元二十年（732）宋蝶年已，七十三岁，年老体弱，请求辞职，退居洛阳东都私宅。开元二十五年（737）去世，享年七十

五岁，赠太尉，谥文贞。

【张九龄】

（678～740）唐玄宗开元时宰相。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北）人。一名博物，字子寿。少聪慧能文，弱冠登进士，为校书郎。又登“道侔伊吕”制科，为左拾遗。他曾上书唐玄宗李隆基，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宰相张说重其文才，称为“后出词人之冠”。开元十一年（723）被任为中书舍人。及张说罢相，受累外迁。十九年，玄宗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再迁中书侍郎。二十一年，以中书侍郎为相。他建议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遂兼河南稻田使。

时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谋废太子李瑛而立己子，遂命宫中官奴游说九龄，九龄叱退使者。玄宗欲以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张守珪为相，以朔方（今宁夏灵武南）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九龄都反对，玄宗不悦，李林甫更进谗言，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坐“举非其人”，贬为荆州长史。二十八年（740）卒。



张九龄像

初，安禄山讨奚、契丹，战败，被执送京师。九龄主张按军法处以极刑，玄宗不从。及安禄山反，玄宗奔蜀，思及此事，为之流涕，遣使至曲江祭九龄。

九龄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其《感遇》、《望月怀远》等更为千古传颂之诗。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

【刘晏】

聪颖过人　有胆有识

刘晏（715～780），字子安，生于开元三年，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出身于一般官宦家庭，祖父刘恭，曾新井县令，父亲刘知海，曾官武功县丞。刘晏从小聪慧敏智，刻苦好学，七八岁时就能熟读诗文，会写文章，有神童之誉。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到泰山封禅，百官相随而行。

当玄宗行至曹州行宫，刚十岁的小孩刘晏，给玄宗送来了他自己写的《东封书》，歌颂皇帝东封泰山。出色的文采，使玄宗大为惊奇。他命宰相张说当面测试。张说问过刘晏，果然才智过人。他赞不绝口，回奏玄宗说：“这是国家将来的好征兆啊！”于是，玄宗将刘晏带回长安，破格授予他秘书省正字的小官，负责图书文字的校勘工作。在秘书省，刘晏有机会阅读大量著作，充实自己的学问。

开元十五元（727），玄宗在勤政殿看杂技表演，有位叫王大娘的正在表演头顶百尺竿，玄宗召来刘晏，要他咏一首王大娘戴竿诗。刘晏脱口而出：

楼前百戏竞争新，
惟有长竿妙入神。
谁得绮罗翻有力，
犹得嫌轻更著人。

玄宗啧啧称道。既而又问："你做正字，正了多少字?"刘晏回答，天下字都正了，惟有"明"字还未正得，老向一边倾斜。这机智、风趣的回答，逗得玄宗及在场的人大笑不已。天宝七载，刘晏出任夏县（山西夏县）令，后来又任温县（河南温县）令。他所到之处都有为百姓谋利施惠的事迹可记下来，老百姓把这些事迹刻在石头上传示后人。天宝十四年（755）冬，安禄山起兵反唐，陷洛阳，破潼关，玄宗逃到了成都，京城长安也落入叛军手中。天宝十五年（756）七月，玄宗的儿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在战乱中，刘晏逃到了襄阳避难。

襄阳是玄宗第十子李璘的地盘，他是江陵四道的节度使，想乘此机会招兵买马，夺取皇帝宝座。他知道刘晏的才华，想让他来担任藩国里的重要职务。刘晏分析了永王李璘的情况，坚决辞谢，而接受了唐肃宗的任命，就任户部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掌管江淮地区的租庸事宜。

刘晏从襄阳赶到吴郡（苏州）上任，此时，永王正率大军反叛。刘晏劝说吴郡太守李希言奋力抵抗，刘晏又分兵把守余杭，李希言兵败后和刘晏汇合。不久，李璘兵败。在抗击李璘的叛乱中，刘晏有胆有识，立下了功劳。从此，唐肃宗对刘晏更加信任，调任刘晏为鼓原太守，后又升任陇、华二州刺史、河南尹。唐军收复长安后，刘晏于乾元二年（759）被任命为京兆尹，做了首都长安的行政长官。

京兆尹是个重要的职务，也是个很难当得长久的官。在皇帝眼皮底下做官，周围还有不少地位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王公官僚，倘若没有官场经验的人，要想在这位上周旋得开，那是很困难的。

刘晏以才能升任，一不善于应酬，二又无靠山，不久就卷入一场政治纠纷，被贬了官。司农卿严庄，因犯有通敌罪被捕入狱。刘晏作为京兆尹，就把他的住宅看管起来，加以监视。这是他职权范围的事，但却因此遭到严庄的忌恨。唐肃宗本来要严惩严庄，经不住严庄上下活动，最后不但赦免无罪，还亲自召见他。

在肃宗面前，严庄诬告刘晏有野心，功居自傲，不尊重皇上，并告诉他泄露皇帝在宫中的讲话给别人听。皇上听到这些就信以为真。加上在上元元年（760）刘晏接替第五琦，出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盐铁铸钱使，权力过大，引起宰相萧华的妒忌，也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肃宗就不加分辨，在上元二年（761）将刘晏贬为通州刺史。刘晏在通州作了半年刺史，唐肃宗去世。他的儿子李豫继位，是为代宗。

代宗即位后不到两个月，就把刘晏召回京城，官复原职，继续加以重用。宝应二年（763）正月，代宗升任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宰相，还兼度支等使。刘晏在朝廷，长期与宦官程元振交好，程元振因事获罪，

一些人就攻击刘晏与程元振关系密切。于是，第二年就罢相，改为太子宾客。两个月后，即广德二年（764）三月，刘晏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分理天下财赋。

刘晏受命后，马上着手解决京师粮食和全国财政的问题。当时正是安史之乱后，京师粮食奇缺，米价高到每斗一千钱，连宫廷膳房也没有隔夜粮，长安郊外的农民把还没有熟透的麦粒从麦穗上揉搓下来交纳，供军队用。首先，他着手整顿江淮漕运。长安是全国的首都，人口稠密，周围所产粮食已不能满足需要。每年要从东南各地调进大量粮食，安史之乱后，原漕运路线破坏，漕运不畅通，因而发生粮荒。为解决漕运线路问题，刘晏亲自到各地勘察，他顺着黄河，察看三门峡漕运遗迹，到过硖石、河阴、洛口等许多地方。在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以前的漕运经验，选取了由淮河经汴水入黄河，再由黄河转渭水到长安的运粮路线。在给宰相元载的信中，他详述了打通这条路线的好处和存在的问题，希望朝廷给予支持。

当时，元载独揽朝廷大权，无暇顾及这些具体的事，得到刘晏的报告后，立即就把整治恢复漕运的事全部委派刘晏去办。刘晏按照自己确定的漕运路线，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征集民工，疏浚河道。经过大力整治，才使久已荒废的汴水畅通，打通了漕运路线的关键一步。汴水一通，整个漕运就活了。

接着，刘晏又整顿管理，改善航运方法，改革漕运组织，大大缩短了漕运时间，使江南的粮食不断运进长安，最多的时候，一年漕运粮食达一百一十万石。保证了长安的粮食需求，稳定了粮价。当运粮首批船到达长安时，京城轰动。代宗十分高兴，派遣了军队的鼓乐队到东渭桥吹号击鼓迎接，还派使者骑马飞驰代表皇帝慰问刘晏说：“你啊，真是我的萧何！”萧何在汉楚战争中以充足的后方供应保证了刘邦的胜利，从而建立奇勋。代宗将刘晏比作萧何，可见他对漕运的重视了。随着漕运的开通，刘晏的声望越来越高，这引起了宰相常衮的嫉妒。常衮是继元载之后当宰相的，他对代宗说刘晏是有德望的老臣，应当是率领百官当他们的头，应该任命他为左仆射。实际是想夺刘晏的权。左、右仆射是尚书省的长官，但玄宗以来，左、右仆射不像唐初那样是宰相，而只是个尊位，并无实权。

代宗认为国家财政刚走上轨道，正需要刘晏这样的人发挥作用。于是在任命刘晏为左仆射的同时，仍旧兼领度支诸使，没有剥夺他手中的实权，而是继续发挥他的理财才能。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去世，唐德宗即位。有人奏请德宗要求撤换转运诸使，刘晏本人也请求辞职。但德宗没有批准，反而加任他为关内、河东的转运、盐铁及各道的青苗使。

治财治人　相得益彰

刘晏全面主持全国财赋工作，除了在改革漕运制度取得巨大成功外，他对盐政的改革也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首先，他精简盐政机构，删除冗员，清除了一批盐政机构中鱼肉百姓的盐官。除在主要产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等十地设立盐监，管理和收购食盐，又在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地设立盐

场，便于食盐的储存、分销。为了维护官盐的畅销，他还在扬州、陈许、白沙、淮西、浙西、宋州、泗州、郑滑等十三个地方设立巡院，捕缉私盐的偷运偷销，同时也兼管官盐的营销。

刘晏的部署虽然很周密，但盐商唯利是图，无利不往。一些偏远地区盐商们由于利润过低而不愿前往，因而缺盐。为了补救，刘晏设立常平盐，将官盐运到偏远地区储存起来，缺盐时把盐拿出来销售，调节市场，平抑盐价。除此之外，刘晏还在吴、越、扬、楚四地设置盐仓无数，积盐二万余石作为储备，盐产时丰时歉，有了储备，就保证了民间的需要。这些改革，使盐政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不但方便商人，还稳定了盐价。而更为主要的是使唐朝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江淮的盐利从每年四十万缗，增加到六百万缗，几乎占了国家收入的一半。刘晏不但精于理财，也精于用人。他的理财成就是和他善于用人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他选用官吏，不循资历，大胆起用新秀。在用人上，他将部下分为“士”与“吏”两类，他曾说，士子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得到提拔，所以他们把名声看得重于利益；吏员不是通过考试而得到爵禄，所以他的把实利看得重于名声。因此，刘晏把财政出纳、查办检举告发这些重要的事，全部交给士子去办，吏员只是办理文书的起草、收发而已。这无疑对于防止贪污舞弊的发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的另一位宰相是杨炎，他是前宰相元载的亲信，元载因专权骄横，被代宗治罪。当时刘晏是吏部尚书，由他负责审理元载的案子。刘晏按照代宗的授意，把元载判处死刑，元载的党羽也大部分受到贬斥，而时任礼部侍郎的杨炎也受到降职处分。

杨炎当了宰相，为了报复前仇，就处处找刘晏的岔子，甚至不择手段陷害。他先夺去了刘晏的财权，以盐铁、转运应集中户部统一管理为理由，撤消了盐铁、漕运等专使职务，解除了刘晏在财政上的职权。接着，又奏请德宗贬刘晏为忠州刺史，派人监视。建中元年（780）七月，诬陷刘晏与朱泚勾结，蓄谋作乱，德宗派宦官赐刘晏死。一代杰出的理财家就这样蒙屈而死，终年六十五岁。刘晏死后，杨炎籍没其家。登记在册的“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这样的清廉作风，在封建社会的官吏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杨炎】

元载集团中人

杨炎（727～781），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县）人。生于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其曾祖父杨大宝，曾官龙门县令。父亲杨播，进士出身，隐居不仕，玄宗曾召拜他为谏议大夫，后弃官归隐家乡。肃宗时，任命为散骑常侍，赐他“玄靖先生”的名号。杨炎就出身在这样一个以清高自命的名流之家。

杨炎清秀俊美、风度潇洒，年轻时是一名美男子，在家乡小有名气，被称为“小杨山人”。河西节度使吕崇贲慕名聘他掌管文书，从此步入仕途。有一次，河西节度使属下的神乌县令李大简，因酒醉侮辱了杨炎。杨炎把李大简反绑着手，打了二百棍，把县令打得死去活来。吕崇贲因爱惜他的才华，才没有追究这件事。安史之乱中，名将李光弼征

聘杨炎为判官，他不接受，后来唐肃宗任命他为起居舍人，他也固辞不就。不久，父亲病死，他在家服丧，住在墓边的小草房里，呼号哭泣之声不断，朝廷为此下诏旌表，从此杨炎以孝道闻名。服丧期满后，杨炎当了司勋员外郎的官，官职虽不高，但掌管官吏勋级的授予，较有实权。

代宗即位，宰相元载当权，杨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从司勋员外郎，"改兵部转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再迁吏部侍郎"。这固然和他的才能有关，他在当中书舍人时，"与常衮同时知制诰，衮长于除书，而炎善德音，自开元以来，言诏制之美者，史称常杨焉"。他起草的诏令，文辞优美，善于揣摸皇帝的旨意，受到朝野的称赞。

杨炎和宰相元载都是凤翔人。元载是个权相，他在朝廷内网罗人才，拉帮结派，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首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因而杨炎为元载所看中、所倚重，成为元载集团中重要的一员。大历十二年（777）代宗杀了元载，元党覆灭。杨炎被列为元党第一名，后因左金吾将军吴凑谏救，才幸免于难，被贬为道州司马。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去世，德宗李适即位。德宗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当太子时，已听到杨炎的名声，对杨炎撰写的《李楷洛碑》尤其欣赏，他曾把碑文贴在墙上，咏诵玩味。即位后，朝廷议用宰相，宰相崔祐甫荐杨炎有文学之才，应该得到重用。于是，同年八月，德宗把杨炎召回京师，拜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了宰相。

"两税法"创制者

杨炎当了宰相，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当时人口大量流亡，户口不断减少，政府的租税收入越来越少。特别是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给社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藩镇割据又起，割据者独占一方，将赋税据为己有而不上交朝廷，朝廷的财收入只有靠关中和江淮以南一些地区。而军费又在不断增加，国家的财政濒临崩溃。杨炎立即着手整顿财政，解救财政危机。他对德宗说："赋税财政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就像是活人的喉咙，天下的治与乱，国家的强与弱都由它决定。所以以前各朝都挑选得力的大臣去掌管。"得到皇帝的同意，他把公赋从皇帝的私库中独立出来，把管理财赋的大权，从宦官手中夺回来，由有关官署掌管。

从西汉以来，皇帝的私人经费和掌封建国家的财政经费，从来源和收支上都是有区别的。最早国家制度是，天下的财产和赋税收入都归左藏库，太府每年按春夏秋冬四季将库藏数字报告上级，由尚书省比部侍郎审核左库藏库的出入情况，这样能上下互相制约，因而没有大的损失漏洞。安史之乱后，第五琦掌财政，因京师多豪将，索取财物无节，第五琦没法禁止，便将国家公赋收入全部缴人大盈内库，以符合皇帝的意思，以避免豪将逼索。从此"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主管财赋的官吏也就不能计算库存的多少，而那些主管大盈内库的宦官却互相勾结，从中作弊，这样的状况已经二十年了。

杨炎认为，把国家财赋的重大权柄交由宦官，连主管大臣也没法知道，国家的弊端，没有比这更大了。杨炎请求皇帝把原属左藏库的赋税收入让出来归

还给府部，根据宫中每年所需花费的多少，如数供给。德宗从其奏，下诏曰："凡财赋皆归左藏库，一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以其全数闻，"建中元年（780）正月，杨炎提请德宗实行两税法，在奏议中，他说："凡各种差役的费用，每枚钱的敛收，都要先估算它的数额，然后向百姓征收，根据支出来确定征收的数量。每一人户不分主人客人，一律根据其财产多寡来决定税额的等级差别。不在乡里定居而在外行商的，在行商所在的郡县按财产三十分之一的额度交税，所掌握的度是让商人和居住者的赋税，分秋夏两次征收，因风俗或时间季节差别而有不方便的可另作调整。所有租、庸、杂徭全部省免，但是登记丁男数额的做法不废止，仍须按照过去的惯例定期向上级申报，以便官府支差。土地田亩的税额，一律以大历十四年各地的耕田之数为标准，均匀分摊征课。夏税的交纳不能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过了一年之后，遇有人户增加而赋税减轻的，以及人口散失而使租赋有失均匀的，都要报告请示长吏，而由户部尚书和度支总辖统领这件事。"德宗认为很好，诏令全国推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在当时有巨大的优越性。按各户资产、田亩征税，比之计丁征税更适合各家庭的经济承担能力，比较合理；由于将各种复杂税种，统一于按资产、田亩征收，不但统一了全国税收，而且简化了征税手续，比起过去旬输月送的频繁纳税来，既省事又便利于官府。另外，征税时间确定为夏秋两李，还可视实际情况灵活变通。这次进步的改革，体现了赋税制度的发展规律。史书记载，两税法实行以后，"天下果利之"，全国征收的税钱，由一千二百多万贯增加到三千多万贯。当时征收的税粮，也"倍增有余"。正如《通典》的作者，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杜佑所说："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也"。

害人及受害者

唐德宗执政时期，发生了两起冤案。一是建中元年杰出的理财家刘晏的被冤杀，二是财政家杨炎的被冤杀；前一起悲剧的制造者杨炎，在第二起悲剧中成了受害者。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权相元载在朝廷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杨炎是他的同党，大历十二年（777）三月，代宗逮捕了元载，命当时任吏部尚书的刘晏和御史大夫等人在禁中审理此案。元载作恶多端，他服罪被杀。杨炎也受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杀元载、贬杨炎此为代宗的旨意，但杨炎却对刘晏忌恨在心。

杨炎当了宰相后，伺机报复，建中元年（780）先罢了刘晏的转运使等职，又奏请德宗把刘晏贬为忠州刺史，最后诬告刘晏谋反。德宗不问情由，一怒之下将刘晏杀死。刘晏被害后，"天下以为冤"。杨炎心里有鬼，派心腹到各地活动，把害死刘晏的责任推到德宗身上。德宗得知杨炎胡言，怀恨在心，产生了诛杀杨炎的想法。当时和杨炎一起任宰相的卢杞是个惯会看风使舵、不学无术的小人，杨炎很瞧不起他，甚至不愿和他在政事堂共餐。不久，德宗罢免了杨炎的宰相职务，调任为左仆射。卢杞有德宗作后台，加紧了对杨炎的迫害。

先是杨炎的儿子犯贪赃受贿罪，在

审理过程中，卢想尽方法把杨炎牵连进去。最后终于找到了两条罪证，一是杨炎用宰相权势，贱买贵卖，多得了房价；二是杨炎在曲江之南有家庙一座。卢杞为陷害杨炎，故意说："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建中二年十月，德宗贬杨炎为崖州司马，在去崖州的路中，德宗赐他自缢而死，死时五十五岁。谋杀刘晏的始作俑者，最后也逃脱不了被谋杀的下场。

【李泌】

肃宗的宾友

李泌（722～789），字长源，先世为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人，后迁居京兆（今陕西长安），父李承休，官吴房令。李泌幼年聪慧好学，才智过人，博涉经史，精研《易象》，善作文，尤擅长诗。开元十六年（728），玄宗与燕国公张说观棋，李泌应召来见。张说使李泌赋"方圆动静"，张说出对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应声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时年仅七岁，人们都惊奇地认为他是"神童"。当时任中书侍郎的张九龄对他尤为喜欢，常引之卧内，呼为"小友"。长大以后，常游嵩山、华山、终南山，且笃志钻研易道，慕神仙长生不死术。

天宝中年，自嵩山上书议论政务，深受玄宗赏积，得以召见，供奉东宫，与太子李亨为"布衣交"。李亨对他礼遇甚厚，称之为先生。后因作诗讥诮杨国忠和安禄山，由此引起杨国忠对他的忌恨，被斥逐蕲春郡，从此李泌隐居在深山密林中，以琴棋诗书自娱。安史之乱爆发，东都洛阳、西京长安相继沦陷，玄宗出逃行至马嵬驿，禁卫兵哗变，杀死奸相杨国忠。玄宗逃到成都，留下太子李亨讨伐安禄山，李亨赶赴灵武，即皇帝位，这就是肃宗，李亨遥尊玄宗为太上皇。

当时在肃宗身边，文武大臣不满三十，更缺乏一个匡时救国的人才。肃宗因而想到李泌，于是派人召李泌来到灵武，不久，又得到名将郭子仪。一文一武，成为肃宗的得力助手。肃宗授李泌为右相，李泌固辞不受，愿以宾友相待，肃宗只得依从。

肃宗对李泌亲如师友，出则并马而行，寝则对床而眠，跟他太子时一样。他事无臣细都首先征询李泌的意见，可以说肃宗对李泌是言无不从；李泌实际上是朝政的决策人。李泌向肃宗提出建议：以广平王、肃宗长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诸将东征安禄山。肃宗为李泌特设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官衔，命李泌随军而行，并赐紫袍一件，李泌受命而行。临行前，他对肃宗说："不出二年，就可消灭贼寇。"李泌的理由是安禄山这些人把掠夺的子女财宝，尽运归老巢范阳（北京大兴县），因此他们没有占有四海的打算，跟随安禄山反叛的，也只有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几个骁将，中原人不过高尚等几个人，其余都是胁从。安史叛军容易发生内讧。

李泌为唐肃宗制定了消灭叛军的作战计划。首先，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使安禄山部将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忠不敢离长安，那么随从安禄山守洛阳的就只剩下一个阿史那承

庆；李肃领兵驻扶风，与郭子仪、李光弼两军分次出击，叛军来救头，就击其尾；叛军来救尾，就击其头，这样就让叛军在范阳至长安数千里的战线上，顾首失尾，疲于奔命，唐军则以逸待劳，叛军来了不和它交锋，走了就乘机追击，不攻叛军城池，不断叛军归路。第一步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拼命拖垮叛军，伺机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其次，命建宁王、肃宗的次子李倓为范阳节度使，率军治边境进攻范阳之北；命李光弼进攻范阳之南，南北夹击，攻取范阳，使叛军退留不得，处于进退两难境地，于是再命大军四面围攻，一举歼灭。李泌的二步计划是正确而又可行的，可惜肃宗虽然对其尊如师友，但却没有真正听进他的意见，因而李泌的计划就落了空。

及后，安禄山集团内部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史思明占据范阳而不听安庆绪调遣，此时，肃宗已进驻凤翔，陇右、安西、西域的兵已经到达，江、淮的庸调也运到汉中，李泌请示肃宗按他提出的二步计划用兵，派安西、西域兵顺边境进攻范阳。但唐肃宗却急于收复两京，享受做皇帝的威风，他说："现在正该攻取两京，引兵攻范阳，不是绕得太远了么?"李泌说："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加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李泌进一步阐述了进攻范阳的道理：官军的主要力量是西北守边士兵和少数民族人，他们不习惯关东的炎热暑气，如进攻两京，敌人收其余众，集中于巢穴，天热之时，官军必畏暑思归，留也留不住；叛军在老巢休整后，一定重来夺取，战争也就无休无止了。不若先取范阳，使叛军无所归，从根本上断绝了他们的退路。肃宗对李泌的正确主张不予采纳。

过不多久，肃宗把郭子仪从河东调到凤翔，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军进取长安。然而郭子仪进军不利，唐军多次战败。至德二年（757）九月，郭子仪建议借用善战的回纥兵，肃宗同意后，回纥怀仁可汗派其子叶扩率精兵四千来到凤翔。肃宗为早日攻取长安，许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此时，李泌已并不见重用，如同闲散之人一样。

由元帅李俶、副元帅郭子仪率朔方等军队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人，从凤翔出发，进取长安。大破敌军，叛将军守、田乾真率败兵逃出潼关，唐军进入长安，紧接着，又攻取了洛阳。唐肃宗虽然收复了洛阳、长安东西两京，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叛军。

安庆绪逃亡河北，占据邺郡，还拥兵六万。肃宗派郭子仪、李光弼进攻安庆绪，又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实际上成了大军的统帅。官军和叛军在邺城激战，史思明从范阳发兵十三万，支援安庆绪，结果官军大败。及后史思明杀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叛军又再度复起，出现这一局面，应该说是肃宗不采纳李泌作战计划的结果。肃宗收复长安后，召李泌入见。

李泌请求离朝廷回归故里，说自己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还说："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唐肃宗说："我与你同忧患多年，现在正好同享乐，你怎么说要走呢!"再三挽留，但李泌离意已定。最后肃宗从其所请。

至德二年（757）十月，李泌离开

朝廷到衡山稳居，肃宗命郡县为李泌建建造住宅，并按三品俸禄给予照顾。事实上李泌的离开朝廷，是为了避免杀身之祸。由于深受肃宗优宠，正受到权臣崔圆、宦官李辅国的忌恨，李泌预见到自己必定有杀身之祸，他急流勇退，就是出自这样的考虑。

代宗的亲信

肃宗驾崩，广平王李俶（即李豫）即位，是为代宗。太历三年（768），代宗派人去衡山召李泌来京师。代宗对李泌礼遇有加，赐金印紫绶，在蓬莱殿侧为之作书院，军国大事均与之商议。代宗意欲拜李泌为相，李泌还是固辞不受。李泌是道士，不食酒肉、不娶妻，讲神仙、怪异，以世外人自居。代宗要他做世俗人，食酒肉娶妻子、受禄位，但李泌还是不肯受命。代宗最后强迫李泌娶卢氏女为妻，并赐第光福里。

李泌受代宗的如此优宠，引起了宰相元载的强烈不满。元载于大历五年（770）除掉了专横的宦官鱼朝恩，博得了代宗对他特别宠任，元载也就更加骄横，弄权舞弊，无恶不作起来了。他为除掉李泌，诬陷李泌"与鱼朝恩亲善，宜知其谋"。代宗没有听信他的谗言，反而说："北军，泌之故吏，故朕使之就见亲故；朝恩之诛，泌亦预谋，卿勿以为疑。"但元载及其党羽继续寻找机会栽赃诬害李泌。

代宗对元载的作为开始反感和厌恶，他对李泌说："元载不容你，朕把你藏起来，待我除掉元载后，再请你回来。"于是拜李泌为江西判官，成为江西观察使魏少游的助手。大历十二年（777），唐代宗杀元载，籍没其家，单胡椒就有八百石，其他财产就可想而知。代宗召李泌入京，一见面就谈起元载的事。代宗说："好不容易，八年才杀这个贼，几乎不以与你见面。"李泌说："臣下有罪，早就该处置，何必容忍太过。"元载是死了，但用人问题上的斗争不会结束。李泌杰出的才能又为宰相常衮所忌。常衮建议代宗派李泌出任州刺史，使其懂得人间的利弊，然后再到朝廷做官。代宗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后来，澧州刺史缺，又借口李泌善于治理，派为澧州刺吏，又改任杭州刺史，所任政绩卓著。

德宗的宰相

代宗病逝，太子李适接位，是为德宗。德宗当太子时，在长安西郊的道教静修胜地听过李泌的讲经，受过李泌的影响。德宗即位后，国家处于纷乱状态，安史之乱虽已结束，但藩镇的叛乱，此起彼伏，从未停息过。先是成德、淄青、魏博、山南东道节度使联合反抗中央，形成四镇之乱，紧接着又发生了淮西之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于建中三年（782），自称天下都元帅，出兵对抗中央，气焰嚣张。

德宗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支援襄阳。殊料到了京城，部队发生兵变，占领了皇宫，并哄抢了皇家私库，拥戴原泾原节度使朱泚为帝，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当时幸好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领兵击败朱泚，奉天之忧方才化解。李怀光恃功逼走奸相卢杞，最后却与朱泚勾结反抗朝廷。兴元元年（784）名将李晟收复长安，朱泚逃亡被杀，德宗回到长安。在如此纷乱的情况下，德宗在长安召见杭州刺史李泌，任李泌为左散骑常侍，日值中书省，随时候对。

李泌兢兢业业，为德宗处理了一件

件军国大事。原先德宗讨伐朱泚时，曾向吐蕃求援，答应成功后将安西、北庭两镇给吐蕃。长安攻下后，德宗要实践诺言，李泌以为不可，他提出安西、北庭控制着西城五十七国和十姓突厥，它们控制着吐蕃，使之不能并兵东侵，如将两镇给予吐蕃，那么关中就危险了。李泌还提出，吐蕃援兵当时观望不前，并无功绩可言。

朝臣们都赞同李泌的意见，德宗才没有将两镇给予吐蕃。贞元元年（785）七月，陈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杀死节度使张劝，代理军务。德宗对此十分担忧，他派李泌为陈虢观察使，前往处理。德宗想派神策军护送上任，李泌以为不必要，说："陕城三面悬绝，攻之未可以岁月下，臣请以单骑入之。"德宗说："朕方大用卿，宁失陕州，不可失卿。"李泌坚持独往，他大义凛然地说："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李泌请与唐将马燧同行。临行前，通过陕州进奏官传话："朝廷正督运江淮来以赈济陈虢，若抱晖有功，则赐旌节"，消除了抱晖的敌对情绪。

李泌入陕州时，称抱晖保城有功，还对其部将进行安抚。李泌离开长安之时，德宗把参加叛乱的七十五人名单授泌，要求他诛杀。李泌不得已，只把五人送往京师，恳请赦免，其他人一概不问，抱晖逃往他乡，避免一场叛乱。贞元三年（787）六月，李泌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宰相。李泌担任宰相后，第一件事是劝谏德宗勿猜忌武将，勿加害功臣。名将李晟、马燧，对国家有大功，但功高必震主，恐遭不测。

李泌对德宗说："如果陛下加害他们，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必然愤怒而不安，内外之变必然再起。"他又当着马燧、李晟的面，对德宗说："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德宗对李泌的劝说，深有所悟，因而避免一次朝廷危机。李泌为宰相，不仅保护功臣武将，在加强中央政府权力方面也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

德宗要宰相分工："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张延赏，刑法委柳浑。"李泌表示反对，说："宰相之职，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德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在地方建设上，李泌反对大减州县官的做法。原先，德宗认为，现在户口比太平盛世减少三分之二，官员也应相应减少。李泌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现在户口虽减少，事情却比太平盛世增加十倍。李泌请求德宗批准视实际情况而定。德宗采纳了这些意见。在保证漕运畅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方面，李泌也做了不少工作。为了减少国家开支，他改革了西域人留京的供给制度，每年为国家节省下开支五十万缗。在对待太子问题上，李泌更是直言敢谏。

德宗怀疑太子有异谋，想要废弃他，另立侄儿为太子。李泌认为不可。他提醒德宗："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德宗反问："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李泌解释说："贞观时太子李承乾因谋反，太宗乃废弃。开元时，武惠妃陷害太子瑛有异谋，太子被杀，天下怨愤，此乃百代之戒，不足效法！"李泌以家族担保太子无事，但德宗就是听不进去，他叫李泌不要干涉他的家事。李泌却说："天子以四海为家。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之

失，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横冤而不言，臣罪大矣！”不久，德宗终于醒悟过来，对李泌说：“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太子的地位保住了，李泌也由此更得德宗的信任。

贞元四年（788）二月，李泌自呈衰老，亟请辞职归隐，德宗均未允许。贞元五年（789），李泌病重，推荐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窦参、太常卿董晋为相，三月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陆贽】

陆贽（754～805），字敬。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是江南望族陆氏的后代。其父陆侃曾官溧阳县令，母亲韦氏出身于关中士族。陆贽从小天资过人，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儒家忠孝节义观念对他深有影响。他出生的第二年，发生了安史之乱，乱世中百姓流离转徙，饱受战乱之苦，使他心灵受到深深的撼动。大历六年（771），十八岁的陆贽进士及第，登博学宏词科，授华州郑县尉。

当县尉当然不是陆贽的愿望，他借省母辞官而归。寿州刺史张镒颇有声望，陆贽前往谒见，叙谈三日，张镒很佩服他的才华，结为忘年交。临别时，张镒赠钱百万，说：“请给母夫人备一日膳食所需。”陆贽不肯接受，只收了新茶一串。以后，陆贽以考书判出色，授渭南县主簿。过了几年的地方小官生活，使他有机会体察民情，了解民间的疾苦。陆贽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之时是唐德宗初期。

德宗在当太子时，就已知陆贽的声名，等到即位，就召他为翰林学士，当了皇帝的参谋。德宗即位之初，在政治上颇想有一番作为，但因为措置不合适，安史之乱造成的藩镇割据的局面，并未能很好扭转过来。建中四年（783），激发了泾原兵变，叛兵攻入长安，德宗仓皇逃往奉天（陕西乾县），陆贽随德宗左右，总揽机务，调发远近兵马，奏上报下，书诏每天都有数百起。

陆贽着手起草时表面上似没有经过认真思考，待发稿时，发现叙事周详，说理透彻，人人能懂。其他承写官员忙不过，其他学士难以着笔，而陆贽却从容不迫，沛然有余。陆贽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使德宗认识到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皇上负有很大的责任。陆贽力劝德宗痛引自过，以感人心，以期“反侧之徒，革心向化”。德宗听从了陆贽的劝告，下了罪己诏。这份陆贽起草的诏书，言辞恳切，“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由于人心的归顺，叛乱的藩镇自去伪号，解兵归镇。一场政治危机很快平息下去了。论者都认为德宗能够平息割据，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陆贽的文德腹心之助。陆贽久参机要，综理政务，他深知人才的重要性。贞元七年（791），他拜任兵部侍郎，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在他主持下登第的有韩愈、李绛、崔群、王涯、裴度等人，这些人日后有的以文学成就闪耀于文坛，有的以政治才能出从而成为一代中坚，其中李绛、崔群、王涯、裴度都官至宰相。得人之盛，当时称为“龙虎榜”。后来，陆贽当了宰相以后，还改革吏部选官制度，革去许多流弊。贞元八年（792）四月，陆贽升迁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了宰相。他以天下为己任，努力实现儒家仁政的主张。

不负天子　不负所学

当时，陆贽面临的局势是十分严峻的。如何渡过难关？德宗信天不信人，他说："自古以来，国家兴衰也有天命，现今的厄运恐不是人为造成的。"陆贽却认为，凡事在人为，不在天命，他不相信在人事之外还有什么天命。陆贽进而指出，只要人把国家处理好。天降大乱的事是不会有的；如果人把国家搞乱了，天降大治也是不会有的，正如古书上说的："皆为祸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他还指出，治乱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理或生乱，乱或资理"，"多难而兴邦"，关键在于人；帝王得道则兴，过去"文王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难而恢盛业"。他希望德宗能"舍己以从众"，"违欲以遵道"，不要听天由命，要努力有所作为，天下是可以转危为安的。

陆贽根据儒家民为邦本的政治主张，认为"夫欲理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可理矣。"意思就说，治理天下，必须得民心，但得民心并不容易，不知百姓疾苦，不按民心办事，是得不到民心的。因而，帝王应该"以天下之欲为欲，以百姓之心为心"。但德宗对陆贽的话并没有认真听下去。陆贽再次上疏劝德宗节制个人欲望，使百姓安居乐业，他认为如果皇帝肆意纵欲，则百姓怨恨，国家就不会稳定。他按照儒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希望君道顺于民心。陆贽的这些议论并非泛泛而谈，而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言的。

贞元八年（792），河南、河北、江淮等四十余州发生水灾，人民财产遭到巨大损失，陆贽奏请德宗赈济灾民，但德宗以为百姓损失不大，不必要去抚恤。陆贽再次上奏德宗说："所费者财用，所得者收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陆贽考虑的是人心的背向，人心重于钱财。但德宗是个刚愎自用、文过饰非的皇帝，在患难之时对陆贽多所倚重，平乱返京以后，日益好大喜功，对刚正不阿、直言极谏的陆贽逐渐讨厌起来。贞元十年（794），班宏主持度支，去世后陆贽荐举李巽担任，德宗随口答应了，却任用裴延龄。陆贽竭力反对，他说："延龄贪暴不法，不可信用。"德宗不听。不久，裴延龄得到宠信，天下都表示愤慨，但无人敢谏说。

亲友们规劝陆贽处事不必过于认真，陆贽说："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恤其他。"陆贽挺身而出，屡次上疏极言其弊。结果反被裴延龄中伤谗毁，被罢去相职，贬为太子宾客。陆贽罢相后，裴延龄继续在德宗面前诬陷陆贽，德宗十分恼火，几乎要杀陆贽，幸亏谏议大夫阳城等竭力上奏要求赦免陆贽，才得以幸免，被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别驾。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去世，顺宗即位。同年五月，顺宗诏陆赞回京任职。

诏书还未到达忠州，陆贽就离开人间，终年五十二岁。顺宗赠兵部尚书，谥曰宣。后世称为陆宣公。陆贽一生所作的文诰、奏章，由后人编辑为文集二十二卷，称为《陆宣公翰苑集》，或称《陆宣公奏议》。这部文集是陆贽为官忠贞勤恪的记录，也是他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的集中反映；这部文集中也是陆贽忠君爱民、匡时济世的积极实践。

【李绛】

李绛（764～830），字深之。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出身于一般官宦之家，祖父李刚为官宰邑，父亲李之喜，襄州录事参掌州院庶务。德宗贞元元年，李绛中进士，登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始进入仕途。贞元末年升任监察御史。宪宗元和二年（807），以本官充任翰林学士，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不久，转任尚书主客员外郎，后转为司勋员外郎，负责审核官员勋级的授予。

元和五年（810），出任司勋郎中。

806年，唐宪宗即位，其时，李绛在朝廷已任职十余年，其政治经验日益丰富，而他的诤谏也不时引起宪宗的重视。有一次，李绛向宪宗进中兴之策。李绛说："陛下诚能正身励己，尊道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敬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去官无益于治者，则才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则怨旷销。将帅择，士卒勇矣；官师公，吏治转矣。"宪宗对李绛的这套中兴国家的思想，很感兴趣，他称赞道："美哉斯言，朕将书诸绅。"李绛面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横跋扈的局面，他企图力挽狂澜，他想方设法要削平藩镇。

元和四年（809），成都节度使王士贞死了，儿子王承宗继承。王士贞早有谋反之意，因此唐宪宗想趁此机会举兵讨伐。他征询李绛意见，李绛考虑到王士贞在成都根深蒂固，武力很难奏效，建议等待时机。

然而李绛的正确意见却遭到大宦官吐突承璀的竭力反对，吐突承璀力主讨伐，并愿亲率大军出征。宪宗以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从长安，调动二十万大军，打了一年多，损兵折将，屡战屡败。最后，只得罢兵而归。当时朝臣纷纷上疏要求严惩吐突承璀以死罪。李绛则力谏宪宗，要有功必赏，败军必诛。朝臣们强烈的请求，迫使宪宗罢去吐突承璀的神策中尉，降为军器使。宦官当权，历来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李绛痛心疾首地目睹了当朝这种衰败的现象，他发誓要与大宦官吐突承璀斗争到底。吐突承璀虽然被降职，但不久又被任命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李绛提醒宪宗："自古宦官败国者，备载方册，陛下岂得不防其渐乎！"元和五年（810）十二月，李绛面陈大宦官吐突承璀在朝中专横跋扈的种种恶劣行为，使宪宗大为光火，斥责李绛。李绛无所畏惧地说："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言之而陛下恶闻，乃陛下负臣也。"并进一步说："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李绛的话使宪宗受到感动，他对李绛说："卿尽节于朕，人所难言者，卿悉言之，使朕闻所未闻，真是忠臣。"于是改任李绛为中书舍人。由于宦官们的一再迫害，元和六年正月，李绛被罢去翰林学士，改任户部侍郎。

过去，户部每年要向天子进贡大批钱，供天子私用。李绛当了户部侍郎之后，就没再进奉了，宪宗问之，李绛回答："户都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余！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一番大道理说得宪宗无言以对。在李绛、白居易的请求下，

宪宗下诏“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李绛还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朝臣仗义执言，翰林学士白居易犯颜直谏，触怒了宪宗，要把白赶出翰林院，在李绛的劝谏下，宪宗才息怒，白居易这才保住了翰林学士的职位。宪宗于元和六年（811）十一月，拜李绛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绛当了宰相。李绛做宰相以后，致力于治国大计，常与宪宗议论治乱兴替的问题。

对玄宗一朝兴衰治乱的探讨，李绛分析道：“理生于危心，乱生于肆志。”他认为玄宗前期，能够知人事之艰难，因而当时名相仕位，前后左右，皆忠正之臣；晚期则嗜欲转炽，纵情声色，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为相，柔媚奸臣占据要津，玄宗受小人诱导，纵逸生骄，于是天下骚乱。鉴古而知今，李绛的议论是针对现实的由衷之言。当时宰相李吉甫为取悦宪宗，曾于元和七年（812）上疏，劝说宪宗“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要把宪宗引入贪图安乐的歧途。

对此，李绛认为天下并未太平，他劝谏宪宗要勤于政务，不要纵情声色。对于二李的言论，当时的宪宗比较清醒，他对左右说：“林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李绛认为“宰相职在量才授任”，他当宰相后注意选才用人。元和七年，李绛决定把京兆尹元义方出为鄜坊观察使。元义方媚事吐突承璀，宰相李吉甫就将其擢升为京兆尹。他倚仗李吉甫这个后台，就向宪宗告发李绛私其同榜进士许李同。宪宗为这件事问李绛：“人于同年固有情乎？”李绛回答：“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备位宰相，宰相职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其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于是，宪宗同意李绛的意见，把元义方调到鄜坊做观察使。

有一天宪宗告诫宰相们，不要私用亲故，宰相李吉甫、权德舆一声不吭，而李绛却认为“若避亲之嫌，使圣朝亏多美之士，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他还指出：“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李绛用人，真正做到不避亲故之嫌，不避朋党之嫌。有一次，宪宗和李绛论讨朋党问题。李绛说：“自古人君所厌恶的，就是人臣互为朋党，因而小人诬陷君子必说是朋党。”他指出，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均把他们说成朋党而加以禁锢，因而亡了国。小人常以利动，不顾忠义，那些趋利的小人，倒常为朋党。“夫圣人同迹，贤者求类，是同道也，非党也。”

李绛的朋党之论，掷地有声，是金石之言。宪宗常感到缺乏人才，无贤可任。李绛却对宪宗说，要折节下士，天下贤才才会出来。宪宗深知知人之难。李绛认为，只要“循其名，验其事”，从实践中辨别、考察，就能十中得七。李绛在宰相任职期间，在处理藩镇割据的问题上，显示了他高度的智慧和谋略，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成就。

元和七年（812），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朝廷认为这是削除藩镇割据的极好机会，于是宪宗召集宰相商议。李吉甫主张用兵，李绛预知魏博内部必然会发生内讧，因而认为对魏博大可不必用兵，使其自归朝廷。结果，不出所料，田季安死后，魏博内部发生矛盾，相互残杀。宪宗听了李绛的建议，趁此时机

火速降诏以田兴为魏博节度使。田兴有勇力，喜欢读书，在军中有一定威望。田兴喜出望外，从此归顺朝廷。

元和七年十一月，朝廷派裴度至魏博宣慰，奖给军士钱一百五十万缗，免去魏博六州百姓一年赋役。不动一兵一卒，使魏博归顺朝廷，李绛的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的谋略获得成功。李绛为宰相，对各种重大问题敢于直言上谏。他劝宪宗要勇于纳谏。他说："自古纳谏昌，拒谏亡。"由于李绛的忠直、嫉恶如仇，因此，他也常遭到不肖之徒的忌恨。元和九年（813）正月，李绛以脚疾，行动不便，辞去了宰相职务。拜礼部尚书。随后朝廷又把被贬在外的大宦官吐突承璀召进京师，任以弓箭库使、左神策中尉，于是朝廷的宦官势力大大膨胀。

元和十年（815），改任李绛为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华州刺史。以后又担任检校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元和十五年（820），宪宗为宦官所杀。宦官立穆宗为帝，成为宦官手中的傀儡，穆宗改任李绛为御史大夫，后又改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长庆四年（824）穆宗病死，敬宗即位。

敬宗也是个荒淫的皇帝。他任命李绛为尚书左仆射，后改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敬宗为宦官所杀，枢密使王守澄等拥立李昂为帝，是为文宗。文宗任李绛为太常卿，第二年改任检校司空，出为兴元户、山南西道节度使。文宗太和四年（830），南诏扰乱成都。文宗下令山南西道发兵援救，援兵还未到达成都，南诏兵全部撤退。李绛领旨遣散募兵，激起募兵的叛乱，在乱中李绛及全家被乱兵杀。终年六十七岁。

【裴度】

主削藩征淮西

裴度（765～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出身于普通官宦家庭，祖父裴有邻，曾官濮阳县令，父亲裴溆，出任过河南府渑池丞。裴度自幼饱读经史，博览群书，能诗善文。德宗贞元五年（789），中进士，登宏辞科，授校书郎。后又应制举贤良方正，对策成绩优异，被授河阴县尉。不久，升迁为监察御史。

生于动荡不安、积贫积弱年代的裴度，胸怀经济之策，负济世之才，他对当时藩镇跋扈的局面痛心疾首，对宦官当权目无朝廷极为不满。作为一个正统的封建士大夫，他决心为振兴唐王室效力。出于对国家的忠诚，他敢于抨击权贵，违抗皇帝旨意。不久被罢为河南府功曹，后又升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811）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元和七年（812），宪宗采纳宰相李绛的按兵不动，以宣抚为主的策略，使魏博镇归顺朝廷，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步射都知兵马使田兴，把割据了四十九年的魏博六镇归还朝廷。

朝廷派裴度到魏博宣慰，裴度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又宣布六州百姓免除一年赋役。裴度还向田兴晓以大义，使其竭力效忠朝廷。裴度又到魏博所属郡县宣布朝廷恩泽，因而魏博各地官民感戴皇帝。回到京城，擢升为中书舍人。元和九年，又迁任御史中丞。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领军务。以后又出兵四处劫掠、并且勾结成都节度使王承宗，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对抗唐朝廷。

唐宪宗曾发十六道兵讨伐，但各路唐军，各怀心思，指挥很难统一，旷日无功。宪宗派裴度去前线慰问，观察形势。裴度归来，极力主战。他向宪宗详细剖析了“淮西必可取之状”，并推荐将军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从而坚定了宪宗讨叛的决心。不久，李光颜果然大败淮西军。宪宗得知，称赞裴度能够知人善任。

淮西军溃败后，割据藩镇非常仇恨，他们先是行贿收买，继而公开威胁，但这都不能达到使朝廷罢兵的目的。于是，王承宗、李师道派刺客暗杀宰相武元衡和裴度。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武元衡于早朝时被害于靖安坊，头骨被刺客取去。裴度也在通化坊被刺，身中三剑，头部砍伤，因从人王义舍身救护才幸免于难。

这一暗杀事件，使京城朝野上下震动，引起强烈反响。主和派请求罢免裴度，以稳定成都、淄青两镇，兵部侍郎许孟容则奏称：“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并请以裴度为宰相，加强对藩镇的讨伐。在裴度养伤二旬后，宪宗拜任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继武元衡为宰相。裴度出任宰相以后，宪宗把军事力量都交付给他。平定淮西，成了当时首要任务。

然而，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路征讨大军都拥兵自重，互相观望不肯出力，作战常常失利。这样一来，朝中的一大批主和派官僚也有了口实，他们力主休兵之策的呼声更为高起。一次在宪宗召开的“诏群臣各献诛吴元济可否之策”的御前会议上，朝臣多言罢兵赦罪为便，翰林学士钱徽、萧俯等更为激烈。但是裴度坚持贼不可赦，挺身而出，愿意前往淮西督战，表示誓杀淮西之贼的决心。元和十二年（817）八月，裴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军（淮西镇）节度使，充淮西宣慰处置使的身份亲自来到前线，临别辞行，向宪宗立下了“军令状”：“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

八月二十七日，裴度抵达郾城（今河南郾城），慰劳各道唐军。他亲临前沿阵地，冒着炮火纷飞、随时可能献出生命的危险，观察前线战情。裴度不顾个人安危的行为，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战士个个勇气百倍。当时，唐军中都有宦官监军，主将完全为其掣肘。裴度向宪宗奏准，除去了宦官监军，使兵权专归主将，从此军中号令统一，士气高涨，每战必捷。

十月十一日，大将李愬在裴度支持下，雪夜攻克蔡州城（今河南汝南），活捉淮西军首领吴元济，淮西所属申州（今河南信阳）、光州（今河南潢川）及守兵二万余人相继投降。

蔡州收复后，李愬迎裴度入蔡州。裴度对投降士兵和当地居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不歧视他们，并以蔡卒为牙兵，侍于帐下。有人对裴度说，蔡人反叛者还非常多，不可不防。裴度笑道：“我受命为彰义军节度使，元恶就擒，蔡州人就是我的人了，又何疑呢?”裴度的宽大政策使蔡州父老为之感动。裴度还取消了吴元济父子长期以来对蔡人的禁令：禁止人们在路上交谈，禁止百姓夜间点灯；百姓有酒食往来者一律以军法论处。

裴度还奏准朝廷，免除淮西各州县两年赋税。对于官军阵亡者，裴度命下

属予以收葬，给其家衣粮五年；对战伤残废者；供应衣粮终身。对吴元济的部将，裴度采取宽大政策。当时，宦官梁守谦奉宪宗之命，带了上方宝剑去蔡州，准备全部诛杀吴元济的部将。裴度一面火速上表向宪宗请求申述，一面即刻动身到蔡州，对降将量罪加刑，少杀了很多人。元和十三年（818）二月，裴度因平定淮西之功，封晋国公，继续在朝担任宰相职务。

沉浮宦海

此时宪宗正沉溺于一时的胜利之中，他不但不乐于纳谏，还大兴土木，修筑宫殿。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和盐铁转运使程异，为了巴结、讨好皇帝，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财政大权，为宪宗建造宫室，挥霍享用，于是二人逐渐得宠，因而官运亨通，连连高升。就在这一年九月，二人同登相位。裴度深感忧虑，他上书劝谏说："异、镈二人，并无器识，陛下为满足耳目之欲，擢为宰相，天下人皆以为不妥，于陛下无益。"宪宗不听。裴度耻于与二人同列，请求辞退，宪宗又不同意。裴度最后说："臣若不退，天下谓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谓臣有负恩宠。今退既不许，言又不听"，"臣所顾惜的，是淮西已定，河北已安宁，如何处置得宜，使天下服其心。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

然而如此肝胆俱裂之语，忠诚耿直之言，并不能使宪宗有所醒悟。相反，他却认为裴度在闹朋党之争。宪宗曾意味深长地对裴度说："人臣当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朕很厌恶。"裴度听了分辨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所为邪正耳。"

宪宗对裴度这些劝谏置若罔闻。宪宗之朝，宦官把持朝政，专横跋扈，目无王法。裴度对此现象，深恶痛绝。当时五坊使杨朝汶，恃朝廷之威，强暴专横，放高利贷，拷打欠户，勒索息钱，甚且张冠李戴，胡乱逼债，逮捕无辜之人，被囚禁者近千人。对杨朝汶的这种横暴行为，裴度在宪宗面前，竭力加以弹劾。宪宗对裴度说："我正要和你论讨用兵之事，这种小事由我自己处理。"裴度回答说："用兵是小事，五坊使追捕无辜之人应是大事；兵事不理，只忧局部，而五坊使暴横，可乱整个朝廷。"

退朝后，宪宗满肚子不高兴，他责备杨朝汶说："因为你的缘故，使我羞见宰相。"盛怒之下，赐杨朝汶死罪，尽放被捕囚禁之人。元和十四年（819），宪宗派人迎佛骨到京城，在宫廷中停留之日，供人瞻奉施舍后再送佛寺，迎佛骨的做法在朝廷掀起了一股崇佛高潮。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力陈佛不足信，请求将佛骨投入水火，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宪宗认为韩愈亵渎佛骨，十分恼火，要处韩愈以极刑。裴度向宪宗申述："愈虽狂，发于忠恳，宜宽容以开言路。"于是，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来，皇甫镈诬陷裴度，裴度只得出镇外地，当了河东节度使，不再为相了。元和十五年（820），宪宗死，穆宗即位，年号长庆。

穆宗是个昏君，所用宰相几乎都是庸才，因与藩镇关系处理不当，藩镇又开始作乱，一下子朝廷和藩镇的关系也

就紧张了起来。穆宗任命裴度为镇州四面引营都招讨使。裴度受命后，即整顿军队，率领部众讨贼，攻城斩将，屡传捷报。然而朝廷动用各镇的十五万兵力，耗费大量物资，最终结果也未能平定卢龙和成德两镇。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于朝中有人破坏裴度的军事部署的缘故。

翰林学士元稹勾结宦官魏弘简，想夺取宰相职位，裴度每有论奏，元稹都加以蒙蔽。裴度在前线多次上疏揭露元稹的罪过。他指出："河北逆贼，只乱山东；朝中奸臣，必乱天下。若朝中奸臣尚在，则逆贼纵平无益。"由于裴度义正辞严，穆宗降了魏弘简的职，罢了元稹的官。但不久又不顾多数谏官的反对，罢了裴度的兵权，让他当了东都留守的闲官。长庆二年（822），裴度回到京城。在朝见穆宗时，他叙述藩镇暴乱河北，自己讨贼无功，慷慨陈词，泪流满面，当时在朝文武官员为他的忠心所感动，许多人还挥泪不止。

穆宗见裴度为众望所归，于是以裴度为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元稹同朝为相，但二人斗争更是愈演愈烈，遂于同年六月，两人同时被穆宗罢相。谏官为此奏言："裴度无罪，不当免相。"但穆宗不予采纳，裴度被降为右仆射。长庆三年（823）八月，又改任裴度为司空、山南西道节度使。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去世，太子李湛即位，是为敬宗。

敬宗年仅十六岁，韦处厚上书，劝敬宗重用裴度，他指出，裴度勋高中原，声播外夷，希望敬宗委以重任；一些朝臣也多称裴度贤，不宜弃置外地为节度使。因而敬宗多次遣使至兴元慰问裴度，密示其还朝。宝历二年（826）正月，裴度回到京城，第三次为宰相。敬宗少年即位，贪图享乐，巡游无度，又倦于政事。裴度上疏，希望敬宗能够收敛玩心，勤政务、远小人，但敬宗荒淫成性，裴度的劝谏，不起作用。敬宗性情暴躁，责打宦官，于宝历二年（826）十二月被宦官杀死。宦官拥立江王李昂为皇帝，是为文宗。唐朝晚期，宦官操纵了皇帝的生杀大权，不少皇帝被宦官所逼退位，或为宦官毒死，或为宦官所杀。此时，裴度已年老，体弱多病，他想到自己平生耿直，不怕强横，因而屡遭陷害，得罪过不少人。为避免惹祸，他在朝臣与宦官的斗争，持中立态度，不予介入；对于朝臣和宦官的斗争，他感到心灰意冷。为了避免惹祸，他上疏恳求辞去机要职务。

文宗非常器重裴度，经常派御医为他看病，派人前去慰问。文宗太和四年六月，下诏进封裴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后来，由于宰相李宗闵、牛僧孺的排斥，九月被罢相。以司徒兼侍中，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大和八年（834），裴度为东都留守，九年，兼中书令。此时，宦官更加无法无天，皇帝也无力控制。但裴度已无治理国政的打算，他在东都兴建住宅，修筑别墅，和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饮宴终日，以诗酒自娱，过着士大夫的风雅生活。开成二年（837）文宗又命裴度出任河东节度使，但他已不愿再掌兵权，以老病推辞，不过最后还是不敢抗旨而赴任。

开成三年，裴度乞病请求还东都；当年十二月，文宗诏令裴度入知政事，以中书令再次入相。

【赵普】

“黄袍加身”“杯酒释兵”

赵普（922～992），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人。生于五代后梁末帝龙德二年，当时国家动荡，群雄蜂起，各自割据为政，赵普为战乱所迫，随父赵迥高开原籍，迁居常山（今河北正定），不久又移居河南洛阳。

赵普读书不多，年轻时与赵匡胤交游，彼此引为知己。后被聘为后周的永兴军节度使刘词的幕僚，受到刘词的赏识。刘词去世时，遗表向朝廷推荐了赵普。不久，赵普又成为赵匡胤幕府中的重要人物。显德三年（956），周世宗柴荣亲征淮南。滁州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大军过淮水后，周世宗命令禁军统帅殿前都虞侯赵匡胤率部强攻，袭破清流关（今安徽滁县西北），占领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宰相范质根据刘词的推荐，奏请任命赵普为滁州军事判官，就这样赵普在滁州与赵匡胤相处了一段时间，赵普的才智受到赵匡胤的赏识。当时捕获盗匪百余人，当斩首盗案中，赵普怀疑其中有无辜的，就细心核查，又请赵匡胤亲自审讯，不少人因而得以免去死罪。由此，赵匡胤更加重视赵普的才能。

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在滁州患病时正值赵匡胤出征，赵普早晚奉侍汤药，尽心照料，弘殷因此以同宗看待他。平淮南后，赵匡胤的父亲领同州节度使时召赵普为推官；赵匡胤移镇宋州时又任赵普为掌书记，赵普已成为赵匡胤幕府中的中坚人物。屡建战功的赵匡胤，更加得到周世宗信任和器重，显德六年



赵普像

（959），被提升为殿前都点检，这个职务是总领禁军及统帅出征诸军的最高指挥官，是军队的最高的权力机构，担负着重要的军务和责任。显德六年（959）六月，周世宗柴荣去世，其儿子、年仅七岁的宗训即位，也就是龚帝。

即使有顾命大臣的辅佐，但主弱君轻之势已成现实，此种形势给掌握有禁军大权的赵匡胤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一个拥立赵匡胤做皇帝的行动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备着。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朝廷得到契丹勾结北汉大举进犯中原的消息。宰相范质、王溥未察虚实，决定派赵匡胤带军征讨。

正月初三赵匡胤整军出发，当晚宿营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驻扎之后，军中将士开始议论纷纷，军心思变。当一些将士簇拥着赵匡胤弟弟赵光义和赵普要求立赵匡胤为帝时，老谋深算的赵匡胤还想试一试军中拥立他当皇帝的呼声到底有多高，于是他就厉声说自己忠于皇帝，如果知道你们谋逆，不会宽恕你

们。然而众将士的表态十分坚决。赵普为进一步激励将士，又故意说如今外寇压境，应首先杀敌，拥立之事待凯旋归来后再议。诸将士又齐声说不可。

赵普见已水到渠成，便对诸将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于是赵普开始进行一番周密而紧张的布置：一方面提出要求约束将士，不许掠劫，保证都城人心稳定，使各方面不发生骚动；另一方面派遣军使飞驰入京，密告赵匡胤亲信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侯王审琦准备内应；又命令陈桥夜宿的将士全副武装，时刻待命。

第二天黎明，拥立之声震荡原野，赵匡胤在酒醉酣睡中猛醒。赵普、赵光义已带领武装将领破门而入，对赵匡胤说诸将无主，愿立殿前都点检为天子。并不由分说便把象征皇位的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大家跪在地上叩拜，山呼万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军队返回京城后，后周在朝百官，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便承认了现实，以宰相王溥、范质为首的百官降阶跪拜降服。赵匡胤就这样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而直接参与策划指挥这一兵变的赵普也理所当然成了开国元勋。赵匡胤取代后周后，改国号为宋，即为宋太祖，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改元建隆。赵普有辅佐拥戴大功，授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

"先南后北"战略

为了进一步稳定政权，赵普支持宋太祖对后周旧臣采取诱之以官爵的措施，使他们改奉宋朝，于是京城迅速安定。但即使如此，领兵在外的一些地方大员仍然倚仗手中重兵，据有数州权势，不甘心降宋，采取与宋对抗的行为。建隆元年（960）三月，盘踞在晋南的昭义节度使李筠，联合北汉，率先起兵反宋。宋太祖决定亲率大军出征。

赵普认为这次出征事关重大，对稳定局势、巩固宋朝初建政权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他对太祖说："陛下初登宝位，广耀神武，挫英雄之气，服天下之心，在此举矣！"并请求随太祖亲征。太祖笑道："你能胜任打仗的事么？"当大军到达荥阳时，赵普向太祖建议乘敌不备，迅速出击。

宋太祖采纳了赵普的意见，加快进军速度，一举攻克泽州城。李筠投火自焚而死，其子李守节投降宋朝。平定李筠后，赵普因功被任命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赐第宅一区。八月，扬州的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起兵反宋，宋太祖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后，于十月亲率大军出征。

出征前，宋太祖问赵普征讨扬州之策。赵普认为，李重进虽然据有地形和防御工事方面的优势，但"士卒离心"、"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太祖对赵普意见点头称是，发兵东下，进军神速，不久即包围了扬州，于十一月攻下扬州，李重进走投无路，全家投火自焚而亡。后周这两股反宋势力被赵匡胤很快镇压下去，这为赵宋王朝稳定的国内局势奠定了基础，从而在军事上又为进一步开展统一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宋朝初建时，所继承的后周疆域只不过拥有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它周围还盘踞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割踞政权。

在北方，有势力雄厚的辽国，有盘

踞太原的北汉；在南方，有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漳州等封建割据势力。

宋太祖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但究竟应当从何入手，他日夜筹思，耗尽心血。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宋太祖带着弟弟赵光义微服出访赵普，赵普见太祖冒着大风雪到自己家来，急忙添炭、烧肉，置酒款待。

赵普问："这么寒冷的深夜，陛下为什么出来？"宋太祖直截了当地说："我睡不着，一榻之外，都是他人的地方，因此来见你。"赵普说："陛下认为天下小吧？南征北讨，应该是统一时候了，愿意听您的计划。"宋太祖试探地说："我打算收太原。"太原是北汉都城，太祖的意思是采取"先北后南"的策略，从北伐开始。赵普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攻下，西北二面便由我们独力去抵挡，不如暂且等到诸国平定，太原弹丸之地，怎能逃出我们的手掌呢？"这就是赵普提出的"先南后北"的战略，太祖笑着说："我的意思也是这样，特意来试试你的。"赵普的话更使宋太祖下定了决心。

为统一天下旷日难决的战略方针就这样被君臣二人定了下来。经过一番军事上的周密准备，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开始"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在赵普的精心布置下，赵宋首先进攻南方中实力最弱的荆南和湖南，结果取得完全的胜利，这两个割据政权完全被消灭，使宋军占据极为有利的地位，争取到更大的主动权。

继而又挥师指向后蜀，作为下一步进攻目标。乾德二年（964）宋军向后蜀发起进攻，只用两个月时间就占据了成都，后蜀灭亡。不久，又于开宝三年（970），挥师征讨南汉，第二年正月，宋军直逼广州，南汉虽困兽犹斗，但在宋军强大攻势下伤亡无数，广州遂迅速被占领。及后宋又平定了岭南，南汉灭亡。开宝七年（公元 974 年），宋太祖派十万大军进攻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南唐，南唐对宋军的进攻缺乏准备，因而宋军的推进也比较顺利。过长江天险后迅速包围南唐都城金陵（今南京），经一年左右，金陵被宋军所破，南唐也灭亡。

在宋军一连串军事胜利的威逼下，南方剩下的吴越、漳州割据势力，也慑于宋军强大威力，先后降宋。至此，宋朝已经完全统一了南方。开宝九年（976）二月，群臣为庆贺平定南方的巨大胜利，一起上表要给宋太祖加尊号"一统太平"。太祖说："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坚决不同意。是年秋天，宋太祖下令征讨北汉。

正当宋军已经逼进太原城，胜利指日可待之际，宋太祖却于同年十月不幸猝然去世，征伐北汉的军事行动暂行停止。宋太祖在世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宋太宗即位后，继续实行宋太祖的大政方针，决心完成统一北方的事业。太平兴国四年（979）春，兵分四路，向北汉都城太原发起包围，并且一举成功地击败了契丹对北汉的援军。

四月，宋太宗赴太原督战，北汉坚持到五月，终于力竭城破而投降。攻取北汉的成功，再一次显示了赵普制定的"先南后北"战略方针的正确。赵普并非一味主张对外军事征伐，宋太宗灭掉北汉后，决定乘胜收复后晋石敬瑭割给

辽国的燕云十六州。

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先后两次出兵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均被辽军击退，尤其是第二次战役，宋军死伤惨重，全线崩溃。

当时赵普对出兵燕云就持反对态度，在雍熙三年上疏太宗时提出：首先，不能低估辽的实力，出兵燕云失败，就是明证；其次，太祖平息了割据势力并剥夺了最高将领的兵权，但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自立为政，酿成内患的情形足资借鉴，这是长期用兵可虑的问题。赵普认为，北征燕云是“兴不急之兵，颇涉无名之议”是在朝奸邪小人欺君的结果，要求追查兴兵主谋，对首恶者“早正刑章”。宋太祖一方面在筹划统一天下的大事，一方面又在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立起来的的宋朝会不会成为五代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建隆二年（961），宋太祖在一次召见赵普时问道：“天下自唐朝以来，数十年间仅帝王就换了八个姓氏，战争不息，生灵荼炭，这是什么缘故？我想消除这种（961）频繁的战争局面，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又有什么办法？”赵普回答说：“出现唐末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所致。要想解决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剥夺藩镇的权力，制约他们的钱谷，收取他们的精兵，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

赵普说的藩镇当然包括握有兵权的禁军宿将，这些人自五代以来常是改朝换代的主要策划者。赵普认为，对付藩镇好办法，只有使他们丧失叛乱的条件，才是惟一的好办法。太祖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于是君臣二人密谋，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兵权是藩镇赖以生存的支柱，因而“收其精兵”便成为宋太祖和赵普首先要解决的头等重要问题。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宋太祖和赵普乘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由淮南回京的时机，解除了二人所掌禁军的兵权，收归皇帝所有，改任慕容延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改任韩令坤为成德节度使。这是收兵权的第一次行动。同年七月，赵普数次向太祖提出收回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典领禁军的权力、安排其他职务的请求。

宋太祖开始有些犹豫，认为他们都是旧日故人，交情深厚，绝不会背叛。赵普提醒太祖说，我也不认为他们会背叛，不过据我了解，他们都没有统驭部下的本领，恐怕不能制服部下；倘若军中万一有人作乱，到那时他们也就不可能控制得住，只能任人摆布了。

赵普的弦外之音，太祖很明白，是担心这几员大将的部下也会重演“黄袍加身”的故剧。太祖下定了决心，要解除石守信等的兵权。

于是有一天，他在宫中摆下丰盛的酒宴，请石守信等几员大将入席饮宴。喝到兴头上时，宋太祖屏退左右，对石守信等人说，我没有你们的鼎力帮助，不会当上皇帝，你们的功劳我永世难忘。但当天子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节度使安乐自在，我从来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以后茫然不解，忙问是什么原因。太祖回答道，皇帝这个座位谁不想坐啊。石守信等人急忙跪下连连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一旦你们部下贪图

富贵，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到时就是你们不愿意，难道能摆脱得了吗？

石守信等人听了此话惊恐万状，连连叩头，请求太祖指出一条生路。太祖说，人生在世有如过眼烟云，是很短暂的，其实追求的也不过是富贵，多弄一些钱，尽情地享乐，使子孙永远不过穷日子而已。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到外地为封建大员，在那里广置良田美宅，为子孙建立永久家业。再多养一些歌儿舞女，每天歌舞升平、欢度晚年。我再和你们联姻结亲，使君臣上下无猜，相安无事，这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将领心领神会，连连叩头拜谢感恩第二天他们便相继称病，请求解职。宋太祖派人对他们抚慰一番，又赏赐很多财物，安置他们到外地去做节度使。历史上有“杯酒释兵权”之说法，指的就是赵匡胤君臣所导演的这一幕。及后收兵权的行动继续在进行。

乾德元年（963）春，对几十个异姓王以及带相印的节度使通过死亡、迁徙、告老、遥领他职等方式夺了他们的权，以文官取代其职位。开宝二年（969）十月，乘凤翔节度使王颜超及诸藩入朝之机，宋太祖在皇家后苑摆下酒宴，又通过微妙的暗示，迫使王颜超等人自动请求辞官归家养老。

在大肆剥夺诸藩、将领兵权的同时宋太祖和赵普又在国家军事体制方面进行了调整、整顿，这些措施对进一步巩固赵宋王朝的中央集权，消除悍将强藩对朝廷的威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禁军将领，权任极重，容易威胁皇权。在调整中取消了殿前都点检、殿前副点检等高级禁军将领的建制，改由职位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指挥使统辖禁军，称为“三衙”或“三司”；“三衙”只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没有调兵权。

调兵权仅属于枢密，但是枢密院又无指挥权，军队指挥必须完全听命于皇帝。征战之时由皇帝临时点将，将帅在战场上一切的军事举措，完全听命于皇帝的远地指挥，无权独立作战。征战结束后，兵归宿卫，将还本职。这样将帅就不得专其兵，兵也难附属于将帅，但皇帝却专有统帅全军的最高权力。作为直接保护皇帝安全的禁卫军，是一支重要的军队，为提高禁军素质，在赵普的策划下裁掉了禁军中的老弱病残者，选拔精壮士兵加以补充。禁军头目的任命，由皇帝确定，太祖诏命殿前侍卫二司，挑选所属士兵中的骁勇者升为上军；又命令各州选拔精壮的士兵送至京都补充禁军。禁军的素质提高了，地方军队的作用也随之削弱了。赵普对军制的精心安排、调整，的确起到了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禁军“皆以一当百”，武器精良。诸镇对自己手下的兵力决非京师之敌这一点，心里很清楚，因此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但是随之而来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中央集中兵权，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皇帝在远地遥控指挥，大大削弱了将帅的主动作战能力，从而影响了在战场上的作战效果。赵宋王朝在以后与西夏、辽、金的作战中，屡屡败绩，就是明显的例证。赵普十分清楚仅削夺藩镇的兵权，并不能彻底解决藩镇强霸一方的问题，藩镇往往兼管几个州，有经济基础，有财政来源，有司法大权，可随时委派亲信为镇将，控制州县官吏，实际上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于是他奏

请宋太祖革除这种弊病。乾德二年，朝廷下令规定各州的财政收入除留下作本地领费支出以外，其余的全部上交京师，不许藩镇任意截留地方财政收入。乾德三年（965）在全国各路设置了转运使，掌管各路财赋，节度使所属的官吏不得参与。地方司法由提点刑狱官监临，节镇不得干预。五代以来，节度使常常委派亲信为镇将，使他们与县令对抗，实际就是取代县令而自成体系。赵普决定恢复县令的权力，地方一切事务都统一由县管理，这样一来“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廓内而已”。

此举更重要的是，中央收回了以前节度使统领几州的权力，使各州直属于京师，并由中央委派文臣朝官充任知州。同时又在各州加设了通判官，与知州共同处理政务，起到了互相监督和制约的作用。为避免知州久任一地形成割据势力，又规定了“三年一易”的轮换制度。赵普采取的这些果断措施，进一步从各个方面削弱了藩镇的权势，各地节度使几乎成了没有实权的虚衔。与此相反，中央的统治权力得到极大的加强，强干弱枝的形势已经形成。“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中央和藩镇的关系和唐五代相比，已经是大不一样了。

出自对加强皇权的需要，赵普又对中央作了较大调整。在禁中设立中书，称为政事，由中书管政事；设立了枢密使专掌军事；另设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称三司）总管全国贡赋和财政。过去是由宰相总揽的行政、军事、财政大权，现在一分为三，相权大为削弱。而皇帝除统领中书省外，还统领枢密院、三司等机构，皇权极为加强。为加强中央对司法权的控制，朝廷规定，凡是要处死刑的案件——大辟案件必须录案上报刑部审核。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有效地解决了君弱臣强的内部机制，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赵普在为赵宋王朝的权力得到巩固、加强方面确是竭精殚虑，不遗余力，正由于此，宋太祖视赵普为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对赵普无不言听计从。乾德二年（964）四月，宋太祖为协助独居相位的赵普处理政务，特地设立了“参知政事”一职作为副相，并拜任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但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权力是有限的。在宋太祖时期，由于赵普的贡献极大，所以职务提升很快。建隆三年（962）出任枢密使；乾德二年（964）正月，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十四年的“股肱”

太祖视赵普为股肱，事无巨细，都要与他商议。于是赵普也更加尽心竭力，参与制定了北宋初期的所有重大决策。赵普勤于相业，不管是辅佐宋太祖或者宋太宗始终是忠贞不二。他曾多次与宋太祖、宋太宗讨论理政治国之道，他认为君主应怀有爱民之心，而且要贯彻始终。

他曾对宋太宗说：“爱民之意”，“惟始终力行之，天下幸甚。”有一次，太宗问赵普，在治国之道方面还有什么好办法，赵普答曰：“陛下恤念生民，每闻利病，无不即日施行，古圣王爱民之心止于此矣。”他还提醒宋太祖应时时刻刻把百姓放在心上。

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有一天，

宋太祖在与群臣宴饮时，忽天降大雨，开始太祖有些败兴，及后雨越下越大，太祖已经怒形于色，左右群臣怕得罪，谁也不敢吭声，惟有赵普对太祖说，这场雨对大宴并无妨碍，可对老百姓却很难得，他们都在盼雨，这场雨他们一定很高兴，实在值得庆贺，请求乐官为之奏乐。经赵普这么一说，太祖马上高兴起来，命令乐官为喜雨而奏乐。赵普还认为，治国之道应赏罚分明、大公无私，他说："帝王若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求其理，下竭其诚，驯至太平，不为难事。"他把大公无私比作大自然的天，说："天发生于春夏，杀于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长久，王者所宜法也。"赵普辅佐太祖、太宗对官吏严加选拔和考核。

他说："治国莫如用贤，用贤莫如历试，历试莫如责功，责功莫如较考。"他请求太祖对官员进行考绩，提出以后拜节度使及武官等职必须要求立有战功，对宰相以及以下的百官应每年进行考绩，以"退不肖而进贤才"，"劝奉公而修职业，各尽能"。

他还说："帝王进用良善，实助太平之理，然于采择，要在得所。"赵普选拔官吏，刚毅果断，敢于据理力争。他生平举荐过许多人，发掘过许多人才。他曾上疏太宗推荐张齐贤任宰相，说："张齐贤素蕴机，兼全德义"，有"经国之才，堪副济时之用"。他希望太宗"留居左右，历度艰难，缓急之时，堪期得力，如当重委，必立殊功"。以后张齐贤两次担任宰相，任劳任怨，工作相当出色。

赵普曾发现一个人很有才能，上奏向宋太祖推荐这个人做官。太祖看了奏章后决定不录用。但上朝时赵普又递上了同样内容的奏章，太祖大怒，把奏章撕破扔在地上，满朝文武都大惊失色，赵普面色不变，跪在地上将碎片拾了回来。隔些天，赵普将奏章碎片粘贴在旧纸上照旧奏荐。太祖终于领会过来，任用了这个人。

又有一次，许多官员当提升，太祖素来对其中一个抱有恶感，不打算给他升迁，赵普认为应升迁，坚持请求，太祖发怒说："朕决心不让他升迁，你能怎么样?"赵普说："刑罚是惩办作奸犯科的，封赏是酬劳有功绩的，从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何况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的刑赏，岂能以陛下喜怒好恶来决定。"太祖大怒，站起身来就走，赵普跟随在后。太祖进入后宫，赵普在宫门外伫立，久而不去，终于得到太祖的同意。赵普对禁军将领的选择特别精心谨慎。乾德元年（963），宋太祖要提升天雄节度使符彦卿管禁军。赵普了解符颜卿在节度使任上专横放纵，恣意不法。他认为符颜卿的名位已经很高了，不应该再授给他兵权。但太祖不听，发出了委任诏令，并不许赵普再谏。

赵普把诏令扣留在自己手里，第二天上朝还给了太祖，劝太祖要深思利害。太祖问赵普为什么对符颜卿这样疑忌，太祖认为符颜卿不会有负于自己。赵普只好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听了以后默默无言，于是中止了提升符颜卿的做法。

赵普也极为重视对法律方面的制订，建隆三年（962）朝廷决定更定刑统，命令兵部尚书窦仪主持这项工作，《宋刑统》于第二年终于完成，经赵普的斟酌修改，连目录三十一卷，计十二篇，

五百零二条。这是专属刑事法规，凡与刑名无关的敕令，另编有《建隆编敕》四卷，与《宋刑统》一起颁布天下。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权往往等于法，所谓“口含天宪”说的就皇帝的权力凌驾一切。但即使如此，赵普还努力影响和劝说太祖、太宗依法办事。

太平兴国年间有一个卖药的骗子陈利用得到了宋太宗的信任，官至郑州团练使。此人专横骄纵，目无国法，坏事干尽，还拉拢一些爪牙为其张目，朝中许多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赵普派人查清了他的恶迹，审讯时陈利用也都供认不讳并且表示服罪。赵普奏请朝廷把陈利用处斩，但太宗却下诏将其流放商州，不久又要让他回来。赵普说陈利用罪大恶极，处置如此之轻，天下何以能服，留这样的佞臣贼子有什么用？太宗反驳说，作为万乘之主，怎么就没有保护一个人的权利？赵普答道：“此人犯了十几条死罪，陛下不杀，他必然要混淆天下的法律，法应当爱惜，此人有什么可爱惜的！”太宗不得已命令陈利用在商州自裁，但随即又后悔了，急派使臣送去免死的命令，但赵普在使臣未到时就已经把这个恶棍杀了。

赵普独居相位达九年之久，朝政独断，威权日重，骄横之气也日盛，出现了刚愎自负、独裁的现象。他常在衙署座位后边，放置两口大瓮，凡是不合他意的内外表疏，就随手扔在瓮内一烧了事，为此他也得罪了不少人。赵普虽然善于举贤荐能，但也有嫉贤妒能之时。宋太祖曾夸奖过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冯瓒是当世罕有的奇士，要重用他。赵普出于妒能之心，先是把冯瓒弄到梓州去做官，又想用卑鄙的手段置冯瓒于死地，幸好宋太祖出面进行了保护，冯才幸免于难。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有一天亲临赵普的府第，见廊下放置十个瓶子，太祖问是什么，赵普回答说是刚才昊越王钱俶派人带来书信时送来的海产。太祖说：“海产必然是好东西。”即命打开，里面装的都是瓜子金。赵普诚惶诚恐地叩头说：“臣还没有拆开书信，实在不知道。”太祖叹口气说：“受之也无妨，他还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书生作主呢。”显然矛盾已经出现了。

在这以后，就有人告发赵普私购官禁的秦、陇大木材，用来扩建府第；赵普的儿子娶了枢密使李崇矩的女儿为妻，违反了宰辅大臣子女不得通婚的禁令；赵普还包庇过受贿和拒不赴任的官吏等等。太祖大怒，决定借此机会分赵普的相权，诏令参知政事轮流与赵普知印、押班、奏事。开宝六年（973）八月太祖干脆就罢了赵普的宰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诏令赵晋入朝，改任太子少保，迁太子太保，留在京都供职。在留京师的开始几年，因为中书侍郎卢多逊的诋毁，宋太宗对赵普怀有猜疑之心，赵普郁郁不得志，一直没能人相。后来赵普冲破卢多逊的障碍，积极支持宋太宗对秦王廷美（太宗弟）的斗争，才使宋太宗和赵普的关系有所改变。

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赵普被任命为司徒、兼侍中，又出任宰相。太平兴国（983）八年十月赵普又被免去宰相职务，出任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以后开封尹陈王元僖上疏太宗，推荐赵普再次人相。端拱元年

(988）二月赵普再任兼侍中，淳化元年（990）正月自己主动要求免去宰相职务，以太保兼中书令充西京留守、河南尹。以后封为梁国公，又改为许国公。

史书记载，赵普年轻时懂得官吏的事务，读书很少，当了宰相后，太祖常劝他多读书，增长学识。赵普深有领悟，他孜孜不倦，有志于学，甚至到了晚年也手不释卷。有人曾讥讽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据说他对此也默认，曾对太宗说过："昔日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其实赵普通过勤奋的学习，吸收了不少治理天下的道理和方法，又加上他善于审时度势，多谋善断，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淳化三年（992），赵普拜为太师，封魏国公，当年七月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宋太宗闻此噩耗，"凄怆之怀，不能自已"，因此辍朝五日。追赠赵普为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谥忠献。太宗并亲自撰写了神道碑以纪念他，并以八分书亲笔书写。

【王安石】

（1021～1086）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赵顼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



王安石像



王安石塑像

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的认识论路线属于唯物主义，他还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得到了发展。《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仅在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等书中还保存了若干条目。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同情民众疾苦；

晚年的诗侧重于讲究技巧，雅丽精绝，为世所称。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此外还有《字说》，系有关文字学方面的著作，仅在他人著作中残存了若干条；《熙宁奏对日录》系王安石任宰执时有关个人政治生活的亲笔记录，主要保存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无传本。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和王文公。

【寇准】

宋太宗之魏征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到（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先世曾居太原太谷（今山西太谷）昌平乡，后移住冯翊（今陕西大荔），最后迁至下邽。父亲寇湘于后晋开运年间（944～946）考中进士甲科，后应诏任魏王记室参军，因功勋卓著，被封为三国公，追赠官职至大师尚书令。寇准少时英俊豪迈，又兼勤苦功读，十四岁时，已经佳作迭出；十五岁时就能精习《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仅十九岁的寇准来到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应试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喜欢录用中年人，有人教寇准虚报年龄，寇准回答说："我刚开始求进取，怎么可欺君瞒上呢?"如实申报，结果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寇准在知成安期间，政绩卓著。他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禁止巧立名目摊派，每次遇到赋役，从不出拘捕文书只要将乡里和姓名在县衙门前公布，百姓没有敢延期的。后来他数年间屡屡升迁，作到判吏部东铨。宋太宗在位之际，时常诏命群臣直言极谏。一次，寇准上朝时正逢众官商议与契丹议和的事情。他听了之后，当即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契丹屡屡侵扰，只应加派精兵驻守，不可与之讲和，并将战和的利弊一一列出，受到太宗的重视，被提升为枢密院直学士。宋太宗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常常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也直言相告，挽衣留谏的佳话就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

一次，寇准奏事，说话不称太宗的意，太宗发怒而起，寇准拉住太宗的衣服，叫太宗仍旧坐下来，事情决定后才走。太宗息怒以后细思寇准忠直言行，十发赞赏地说："朕得到寇准，犹如唐太宗得到魏征。"淳化二年（991）春，天大旱，又闹蝗灾。宋太宗邀请近臣问时政得失，许多大臣都推说是"天意"，虚词搪塞。寇准说："《尚书·洪范》篇讲天人之间影响；大旱可以证明刑罚有所不平。"这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指责朝政。宋太宗怒容满面，站起身来进入后宫。

过了一会，宋太宗稍稍心平气和，又传命召见寇准，问他刑罚不平的情况，寇准要求把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召来由他当面评议得失。宋太宗立即宣唤二府长官王沔等人前来。寇准面对这些权要大臣，严辞指出：前不久祖吉、王淮枉法受贿的事发，祖吉得赃不多被判处死刑；而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多至 4 万，却因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的弟弟，只受到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是明显的执法不平。太宗当

即质问王沔有无其事，王沔连连叩头谢罪，于是太宗对王沔痛加斥责。从此，宋太宗更觉得寇准忠正廉，可委以大任，先后授任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等职。不久，又把用通天犀制做的两条珍贵玉带赐给寇准一条。淳化二年（991）九月，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

在任期间他与知枢密院事张逊不合，张逊也一直想找机会整寇准。淳化三年（992）夏末，寇准与另一位大臣温仲舒出郊而行，途中遇一疯人拜在他们马前呼“万岁”。当时他们并未在意。但此事却被张逊乘机抓住，唆使其心腹王宾向宋太宗告发，肆意指责寇准存有非分之想。宋太宗一看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传讯寇准，斥责他居心叵测。

寇准请温仲舒作证，张逊命王宾单独上奏。在朝廷上张逊和寇准激烈争执，唇枪舌剑，互相揭发对方的隐私，相持不下。太宗恼怒双方有失大臣体面，一怒之下，把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而贬寇准为青州（今山东益州）知州。拥立太子是寇准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宋太宗进入暮年之时，身患脚疮很重，十分痛苦，同时他也为立太子的事未能谋划决定而烦躁不安。原先曾有个叫冯拯的与别人一起上疏，表示请皇帝尽早立太子，不仅遭到了太宗的反对，而且还把他们这几个大臣贬到了岭南。从此后大家吸取教训，再没有人敢提立太子一事了。寇准虽然被贬，但没有失去太宗的信任。后来寇准奉皇帝之诏回到京城朝见太宗。等寇准行过参拜之礼后，太宗掀衣解袜给寇准看，并说：“卿怎么来得太迟？”然后就继承王位一事征求寇准的意见。

寇准不便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去商量；不能与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太宗听罢，低头想了很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说提出襄王元侃这一人选，寇准以“知子莫如父”的说法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督促太宗早下决心。立太十一事就在君臣二人的这次商谈中决定了。因协助太宗确立了太子的人选，使太宗了却了一桩心事，淳化五年（995）九月寇准拜为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八月，宋太宗任襄王元侃为开封府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此后寇准还机敏地避免了一场骨肉相恶。

太子到太庙祭告行礼回来，京城人民都聚集在道路上观看，十分高兴雀跃，说：“真是个少年天子!”太宗得知后心中不高兴，说道：“人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把我摆在什么地位呢?”寇准立刻再拜并祝贺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决策英明，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太宗入宫后说与妃等知道，宫中的人也都前来道贺。太宗再从后宫出来，邀寇准饮酒，醉得很厉害才罢。不久，寇准又加官给事中。至道年间（995～997），寇准还曾安抚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的番民骚乱。自唐代末年以来，渭水南边住着一批少数民族，古称“番民”。宋太宗晚年时，番民经常骚乱。太宗委派大臣温仲舒作秦州知府，温仲舒把番民集中到渭北，建栅栏堡楼限制他们自由进出。番民对此十分不满，酝酿寻隙滋事。温仲舒自以为事情办得漂亮，撰写奏章向朝廷报功。宋太宗读完温仲舒的奏章后不高兴，说：“古时羌戎在甲、洛一带和中原百姓杂处，蕃夷不大安分，一旦有事，将会重新困我

关中。"

他找寇准来询问。寇准回答说："唐朝的帝王注重汉、番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大臣们也主张不赏边功，终于形成边疆的安定局面，也出现了开元年间的太平盛世。而今封疆大吏贪赏邀功，轻易地制造事端矛盾，怎能不招致祸乱呢？此事不可不防！"太宗听取了他的意见，把温仲舒调往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中部），改派寇准前往渭北安抚。

寇准到了秦州，把当地番民首领招集在一起，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迅速拆除渭水北岸的栅栏、堡垒，恢复了番民的帐篷、庐舍，调解了当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此秦州境内出现安定、和平的局面，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至道二年（996），宋太宗在京师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朝中和地方的官员都得到加官进秩。寇准身为副宰相，所引荐的官员多得到地位高而职司重的台省要职，所不喜欢的或者还不了解他的才能的人，也抑低序列而升官。比如彭惟节的位次一向在冯拯之上，冯拯不服，列衔在彭惟节之上。寇准很是气愤，指斥冯拯扰乱朝廷制度，冯拯也怒不可遏地弹劾寇准擅权，并且列举出岭南任官不公平的几件事例，宋太宗对此大为不满。参知政事张洎原来与寇准的关系不错，因害怕受他的牵连，也落井下石地检举寇准诽谤朝政。

就在这时，广东转运使康戬又上告说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李昌令都是由寇准引荐升官，吕端与寇准结为至交，张洎一向曲意逢迎寇准，李昌令软弱不堪，因此寇准得以随凭个人意图扰乱法度。

宋太宗很是忿怒，责备宰相吕端，吕端也不争辩。寇准上朝时，太宗问他冯拯所讲的问题。寇准毫不相让，在朝廷上仍力争不已，还拿出中书省文书为凭，争论是非曲直。太宗斥责他在朝廷上强辩有失执政体面，但寇准仍然喋喋不休，在太宗面前大论是非曲直。太宗颇觉无可忍耐，叹息说："鼠雀还知道人意，何况是人啊！"当年七月，宋太宗贬寇准为邓州知州；次年迁任工部侍郎；后又历任河阳、同州、凤翔、开封等知州、知府。至道三年（997）宋太宗病逝，太子赵恒即位，即宋真宗。

促使真宗亲征

公元1004年七月宰相李沆去世，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并准备进一步拜他为宰相。在毕士安进殿谢恩时，真宗还就另一个宰相人选征求他的意见。毕士安推荐寇准，说他的人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真宗说："朕听说他刚愎自用。"毕士安说："寇准忘身为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受到小人的诽谤与排挤，是不奇怪的。现今天下百姓虽然安居乐业，但北部边境有辽兵骚扰，危害深重，现在正是起用寇准的时候。"真宗点头称是，于是在当年八月同时任命寇准、结士安为宰相。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二人志同道合，合作得很好。

寇准忠直不阿、嫉恶如仇，屡受奸邪小人的弹劾诬陷，多亏毕士安一一为他辩解，才得以免受真宗的怀疑。景德元年九月，辽兵人侵宋朝北部边境，派小股骑兵在深县（今河北深县）、祁县（今河北安国）一带掠夺，作战稍有不利，便引兵逃走，还来来回回似没有发动进攻的意向。

寇准得知这一军情后，认为这是敌

兵大举入侵前的惯用伎俩。当即上奏说："这是辽兵要麻痹我们，使我们不再重视，请练兵命将，选择骁锐，占据要害之地，以为防备。宋真宗采纳了寇准的建议，派遣杨延昭、杨嗣等将，分别把守边关要塞，严密监视敌人。同年十一月，辽兵果然大举南侵。辽国萧太后、辽圣宗亲统大将萧达揽，领兵二十万，进犯贝（今河北清河）、魏（今河北大名）诸地，包围了瀛州（今河北河间），兵锋直指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敌兵步步深入，朝野十分震惊。边关的告急文书有时一天要送到五封。在群情惶恐之时，寇准却十分镇定，他有意将告急文书扣留不发，饮酒谈笑自若。但有一小部分臣僚惊惶失措，忙把告急，文书转奏给宋真宗，真宗大为惊骇，召问寇准，寇准认为皇帝御驾亲赴澶州就可以很快取胜。毕士安也从旁附议，力劝真宗亲赴前敌。真宗召集群臣商讨进兵方略时，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湖南人，主张皇帝南避金陵；大臣陈尧叟是四川人，请求真宗躲往成都。真宗本来就顾虑重重，再听到这两种意见，不免动摇起来。

寇准知道是二人的计谋，佯作不知道，说："谁为陛下谋划这一计策的，其罪可诛。今陛下神武，文臣武将协力同心，若御驾亲征，贼寇自然遁逃。不然，出奇兵以破坏他们进攻的计划，以挫伤他们的锐气，一劳一逸之势已成，我当稳操胜券。怎么能丢弃宗庙让稷于不顾而幸楚、蜀边远之地？如果人心离散，贼寇乘机深入，天下还能保得住么？"宋真宗认为寇准的话有道理，便决心御驾亲征。景德元年十二月，宋真宗率军北上。

行至半路，又有人议论起南幸金陵之事，真宗又犹疑了，召来寇准商议。寇准说："目前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军民日夜盼望圣驾到来，士气倍增；如果退回去，万一士气瓦解，敌人乘虚而人，恐怕连金陵都要保不住了。"为消除宋真宗的顾虑，寇准还动员将领前来表态，终于使真宗坚定了决心，来到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这时辽兵的声势很大。寇准力排众议，坚决请求说："陛下不过河，则人更为动摇，贼寇的气焰不杀，不是取威决胜之策。况且，杨延昭、杨嗣、王超等将领已经率领精兵分屯在中山等地；李继隆、石保吉等将领也已经排开大阵迎击辽军；四方各镇赴援的将领也纷纷赶来；陛下此行万无一失，为何迟疑不进呢？"于是真宗同意渡河。真宗到达澶州北城后登上城楼检阅河北军民。边疆将士和百姓望见御盖，踊跃欢呼，辽兵见到这种情况十分惊愕，队伍不能成行。在前线，宋真宗把军事大权都交给寇准，寇准处断，号令严明，军队士气振奋。

有一天，几千名辽军骑兵进攻城，宋真宗亲自登城督战，杀死、俘虏了一大批辽兵，剩余仓皇逃走。宋辽旷日相持，宋军无懈可击，辽兵孤军深入，希望速战速决，统帅萧达揽亲自到阵前督察军情时，被北宋大将李继篊部下的威虎军首领张环用强弓劲弩射死。萧达揽一死，辽军士气大挫，宋军更受鼓舞，双方战局徒然发生变化。萧太后不敢久陷在中原战场，景德元年十二月秘密派使臣来到澶州北城，请求议和。宋真宗在战场也是卧食不宁，巴不得速速结束此役。他对辽方提出的土地要求不予同意，但同意给钱。

寇准的态度则非常坚定，不但连馈送金银之事也不同意，而且想让辽国称臣并献出幽、蓟十六州土地（幽、蓟十六州为后晋石敬塘所割让）。为此他曾向真宗提出建议，但宋真宗无心久战，推脱不忍生灵荼炭，希望早成和议。许多大臣也早想脱离干戈之地，纷纷在真宗面前进谗。有人甚至说寇准主战，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的身价。寇准万般无奈，只得忍痛放弃有利时机，同意与辽国讲和。宋真宗派亲信曹利用出使辽营，并授意只要辽方退兵，每年可赠他百万金银布帛。

寇准得知后，把曹利用召至自己帐下，严厉地叮嘱说："虽然皇上允许百万，你所谈的银两不得超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回来后我要砍你的脑袋。"曹利用到了辽营，经过严辞力争，最后以每年交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条件成约而还，双方约为兄弟盟国，辽国在结盟之后引军归。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澶州之盟后，宋辽罢兵，两国边境相对较为平静，宋真宗对寇准也更加器重，全权委托他处理朝中大政。

风风雨雨之宦途

寇准辅政，一向赏罚分明：举贤任能，破格用人；惩治邪恶，罢黜庸吏。有一次任命官员，属下拿着官吏名册，打算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之责，在于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佞不肖之徒，倘若按名册先后用人，这是一个小小官吏就可以办到的，那还要我这个宰相作什么？"由于寇准治政有方，到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给他加宫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

自从澶州结盟之后，寇准也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了。因而也给人以可乘之机；他以后在上层集团的斗争中接连走下坡路，其根源也在于此。王钦若等佞臣自从劝真宗避金陵遭到寇准痛斥之后，一直忌恨在心，如今见寇准权重朝班，更是愤愤不平，时刻伺机倾陷寇准。景德三年（1006）的一天，宋真宗会见文武百官。散朝之后寇准先自退班，宋真宗因敬慕寇准，注目远送他出朝。

这一情景被王钦若看在眼里，他对真宗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想必是他立下保卫国家的大功吧？"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出其不意地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感到惊愕，王钦若接着说："城下之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正是在大敌逼进城下而签署的盟约。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竟然订城下之盟，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这话使宋真宗是脸色大变，现出羞怒之色。

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说道："陛下想必听说过赌博的事。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倾尽其所有来作赌注，这叫作'孤注一掷'。澶渊会战时，寇准正是拿陛下来孤注一掷的，这岂不是危险吗！？"王钦若的挑拨，使宋真宗渐渐地疏远了寇准。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又失去了一位益友的帮助。

景德三年（1006）二月，真宗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贬官为刑部尚书，出任陕州（今河南陕县）知州，同王旦为相，后来，寇准又改任户部尚书，兼知天雄军。有一次萧太后派遣的使臣路过此处，见到寇准后，明知朝廷忠奸不分，使贤臣蒙屈遭贬，却佯作不知，挑拨地说："寇公德高望重，因何不在中

书省做官，却到天雄军来呢?”寇准听了此言，感慨万端。但他却不动声色、巧妙地回答：“如今朝廷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钥，非我执掌不可。”景德三年（1006）寇准罢相之后，王钦若、陈尧叟等人治国无方，惑主有术，更加上一班佞臣狼狈为奸，营私舞弊。大中祥符元年（1008），王钦若建议用封禅来“镇服四海，夸示我国”。封禅要有天瑞之应，他们合谋伪造“天书”，企图用以自欺欺人，然后就封泰山，谒孔庙，祀汾阳，尊道祖。三司使丁谓附会王钦若，奉献了《封禅祥瑞图》；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内侍刘承等则协助陈尧叟讲古典，大修宫观；林特十分工于心计，为他们搜刮财贿。这五个人沆瀣一气，吹吹拍拍，扰乱朝纲，被称为“五鬼”。宰相王旦看在眼里，气在心头，然也敢怒而不敢言。大中符七年（1014）六月，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终因罪恶昭彰被免官。宰相王旦趁机推荐寇准，把他调进京师，委任为枢密使。寇准上任后又与五鬼之一、新任三司林特势不两立，多处发生冲突。林特当时正蒙厚宠，以河北道岁输绢疋不够数，督促地方缴纳很急。寇准却在暗中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从中阻挠，还请求惩治三司长官及其属吏。

由于不能满足朝廷的奢侈费用，引起宋真宗的不满，对王旦说：“寇准性情偏激和从前一样。”王旦不敢违抗圣意，只得批评说：“寇准喜欢别人感激他的恩惠，又要人惧怕他的威望，都是当大臣所忌讳的，而寇准却反而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这是他的短处。”王旦所说的的确是事实。王旦自己不仅能容忍寇准平日的挑剔、顶撞，而且竭力保护这个刚正、贤能的事。他曾多次向真宗褒扬寇准，但僵局仍无法挽回。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寇准终于又被免职，左迁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判河南府。徙永兴军。天禧三年（1019）三月，为讨宋真宗的欢心，巡检朱能与内侍都知周怀政通谋，伪造了“天书”放在长安西南的乾佑山。

当时寇准已调往此地任永兴军长官。宋真宗很想得到所谓的“天书”，但一些大臣极言此事虚妄无稽，一再劝阻。真宗问王旦，王旦说：“当初最不信天书的是寇，准，如今天书降世，须令寇准进献，官民才能信服。”于是，真宗命周怀政晓谕寇准。寇准原先并不愿做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但由于其女婿王曙从中怂恿，完全勉为其难。

当时，有个门生鉴于朝中群小猖狂、人情险恶，况且寇准又过于刚直，日后难以免祸，于是献计说：“您走到半路假称有病，上书坚决请求补为外官，这是上策；如果在见到皇帝时立即揭发天书是假的，就可以保全平生名声，这是中策；倘若进天书而晋身为宰相，是下策。”寇准功名心重，听不进门生的劝告，宋真宗见寇准进献“天书”，自然大喜过望，亲自将他迎入禁中。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罪免相，寇准接任宰相，兼任吏部尚书。当时陕州有个隐士、诗人魏野曾就进献天书一事，写诗讽刺寇准。寇准后来也深悔莫及，曾写律诗《赠魏野处士》，在诗中对自己身陷名利不能自拔感到懊悔。真宗天禧三年（1025），南郊祭天地，进寇准为尚书左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此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参预朝政，冠准请屏去从人，奏说：“皇太子众望

所归，愿陛下念宗庙社稷之重，传以帝位，选正直振奋臣辅佐。丁谓、钱惟演都是小人，不宜辅佐少主。”真宗认为寇准说得很对。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表章，请太子监国，还打算请杨亿辅佐。后来这个计划泄露，寇准罢了太傅，封莱国公。当时周怀政惴惴不安，担心获罪，便策划谋杀大臣，请罢太后于政，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恢复寇准的相位。客省使杨崇勋等将此事报告丁谓，丁谓当夜微服乘牛车到曹利用家商议，次日上明奏闻。周怀政被处死，寇准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

真宗起初并不知道，过些天问左右说：“我好久没有见到寇准，这是怎么回事？”左右不敢回答。真宗驾崩时也说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后事，可见真宗如此椎重寇准。

远出朝廷　客死雷州

寇准到达道州贬所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身穿朝服升堂理政。公务之暇，他又专门起造了一座藏书楼，在里面放置经、史、佛、道等方面的书籍，常常在这里手不释卷地反复习诵。遇有宾客到来时，寇准热情招待，谈笑风生，经常是通宵达旦。这时的寇准，自然没有了当初庙堂显贵时的显赫际遇，但过得潇洒自如。然而，祸不单行，寇准再次遇到了麻烦。丁谓知道李迪与寇准的关系很好，担心日后大局变化以后，身为宰辅的李迪会将寇准推荐给新皇帝。于是，丁谓就勾结刘皇后，在当年四月再次把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同时又凭空捏造李迪私结朋党，也把他贬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团练使。

为把李迪驱逐出京，丁谓简直是丧心病狂，小择手段。有人觉得不忍心，对丁说：“李迪如果死在贬所，丁公如何受得了读书人的舆论！”丁谓放肆地回答：“他日好事书生记述此事，也不过写上‘天下惜之’四字而已。”为了把寇、李二人赶上绝路，丁谓又挖空心思想出一条毒计：在传达刘皇后懿旨时，故意在中使（太监）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并有意让剑穗飘在外面，使人误认是降旨赐死的样子。

李迪为人质直，一见就误以为是降旨赐死，便主动要求自裁。幸好遇到他儿子和宾客的救护，才避免了枉送性命。中使来到道州时也是如法演试。

但寇准并不是傻子。当时寇准正在和郡中下属在府内痛饮。众人见到中使到来时杀气腾腾的样子，惊慌失措，十分惶恐，寇准却神色自若地对中使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

寇准镇定自若地按规矩在院庭中进行了叩拜，然后升阶继续宴饮，直至日暮才结束。第二天冠准就打点行装。乾兴元年（1022），寇准迁到雷州（今广东海康）。此时寇准已年逾花甲。乾兴元年六月，丁谓也因伙同内侍雷允恭擅自改动建造皇帝陵墓的计划，获罪名官。及后又查出他勾结女道士刘德妙欺君罔上的罪行；两罪并罚，丁谓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司户参军。丁谓到崖州的中途要经过雷州，寇准听到丁谓到来的消息，就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在雷州边境送给丁谓，一方面借以表示自己的胸怀，另一方面将丁谓拒之于门外的意思。寇准听到家僮谋划为他报仇之事，叫他们赌博，不得出门，等丁谓走远了，才罢。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准忧

病交加，卧倒在病榻之上，他在病中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一生的志向和际遇，凄怆感人，诗题为《病中书》，诗曰

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
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
壮志销如雪，幽怀冷似冰。
郡斋风雨后，无睡对寒灯。

九月，六十三岁的寇准与世长辞。宋仁宗任命寇准为衡州司马的诏书在他死后才到达。

寇准的妻子请求允许将寇准归葬到西京洛阳，得到了批准。灵柩经荆南公安，县人都在大路上祭奠痛哭，还为寇准立庙，逢年过节祭祀。寇准没有儿子，以侄子寇随为嗣。寇准去世后十一年，恢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忠愍。仁宗皇祐四年（1052），诏令翰林学士为寇准撰《神道碑》，仁宗篆书碑额“旌忠”。

【范仲淹】

切言直谏　关心民生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先是邠州（今陕西彬县）人，以后迁到江苏吴县（今江苏吴县）定居。他生父范墉，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过武宁军节度掌书记，端拱二年（989）范仲淹就出生在徐州。他二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家境日益贫困，无法维持生活，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县）姓朱的家里。范仲淹从此改姓朱，起名说，成为朱家的人。范仲淹在朱家逐渐长大成人，他从小就有志向操守，刻苦好学。二十一岁时就读于淄州长白山麓醴悄寺、寒寺孤，环境特别艰苦，每天以粥和咸菜度日，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在读书上，学业进步很快。二十三岁时，范仲淹得知母亲改嫁朱家的身世，就感伤地挥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朱家，去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求学。应天府书院，是宋朝著名书院之一。原先是著名儒士戚同文讲学的地方，真宗大中祥符初年，应天府富户曹诚在其地修建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朝廷赐额曰“应天府书院”。书院广招学生，延师讲授，学习气氛非常浓厚，范仲淹进入书院以后，不分昼夜地苦读，读倦了，就用冷水浇头，提起精神再读。

有一次真宗朝拜亳州太清宫时路过南京，同窗都争着出去看皇帝，但范仲淹不为所动，依然全神贯注地读书。他在书院以粥度日，生活极为艰难，一位同学深表同情，给他带来一些好的饭菜，但范仲淹却婉言谢绝，说自己安于食粥已很久了，若今天享受这样的丰盛饭菜，恐怕以后吃不下粥了。

范仲淹忍受着别人不能忍受的穷苦生活，以读书作为最高的乐趣。寒窗五载苦读，使自己成为精通《六经》、善诗文、有志于报国的人才。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以其渊博的学识，一举及第，这年他正好二十七岁。中举后，朝廷授他广德军司理参军，不久改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范仲淹做官以后，便把老母接来赡养，同时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真宗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又被调任秦州西溪镇盐仓作盐税官，两年后，晋升为大理寺丞。此时，他因母亲病逝而离职服丧。

第二年，晏殊主管应天府时，听到

范仲淹的名声，便请他主持应天府书院，范仲淹作风勤谨谦恭，在当时很有威望，因此四方求学之士纷纷而至。天圣六年（1028），晏殊又推荐他为秘阁校理，荣任馆职。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年仅十三岁的仁宗即位，因不能亲政，便由刘太后垂帘决事，刘太后于是揽独大权。到了天圣七年（1029），仁宗本来可以亲政了，但刘太后仍然把皇帝当成傀儡，还准备在这一年的六十一岁寿辰接受朝拜大礼时，由仁宗亲率文武百官为刘太后上寿。

范仲淹上疏着重论述了对这件事的看法，并且说："在内宫侍奉亲人长辈，自当用家人的礼节，现在却让皇上与百官排在一起，向南朝拜太后，这种礼仪不能成为后世的礼法。"而且还上疏请刘太后把朝政大权交还仁宗，但没有得到答复。

范仲淹出任馆职是由于晏殊的举荐，晏殊被范仲淹的这种大胆举动吓坏了，怕他惹出是非牵连到自己，因而斥责范仲淹自大妄为。范仲淹很严肃地对晏殊说："我担任这种职务，经常担心自己没有尽到职务，给知心朋友丢脸。不想今天反因忠直在您此处得罪您。"晏殊不作声。接着范仲淹又给晏殊写去一封信，申述了自己犯颜直谏的道理，晏殊感到羞愧，向范仲淹道歉。

范仲淹也确实因此得罪了刘太后，任馆职不到一年不久便被贬为河州府通判，同僚好友在都门为他饯行时赞扬道："此行极为光荣。"仁宗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了右司谏。但到了年底又因进谏劝阻仁宗废郭皇后而被贬知睦州。

同僚朋友在长亭为他饯行时又赞扬



范仲淹像

道："此行尤其光荣。"第二年范仲淹又迁知苏州。景祐二年（公元 1035 年）范仲淹被召回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

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权相吕夷简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仁宗亲政后，吕夷简继续为相，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对吕夷简阁擅权专事、玩弄权术、拉拢私人、排斥异己的作法就极看不惯，在郭皇后的废立问题上就曾和吕夷简展开过斗争。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私怨，他利用郭皇后失宠机会，怂恿仁宗废掉郭皇后。范仲淹上疏认为不能这样做，但废后一事已成定议。吕夷简并命令下属不得接受有关讨论废后之事的奏疏。范仲淹见状，便率领御史和谏官到垂拱门前，伏奏皇后不当废。然后他又面对面地和吕夷简展开了激烈辩论。第二天，范仲淹等人准备在殿廷上再与吕夷简展开论争，然而，就在范仲淹等人到待漏院时，皇帝就传下诏旨，贬范仲淹知睦州。

范仲淹这次还朝，吕夷简暗中曾派人警告范仲淹，说他现在是待制侍臣，不是朝官了，不必对朝政妄加讨论。范仲淹表示议论朝政是侍臣份内的事，今

后更要恪尽职守。吕夷简知范仲淹不接受警告，便叫他去做权知开封府事。开封府是京城所在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方。吕夷简的目的是让范仲淹事物缠身，无暇议论朝政；如果一有失误，立即免职除官。然而范仲淹到开封府后，整治有方，兴革有序，只个把月时间就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吕夷简当宰辅时，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多是他的亲信，因而吏治腐败透顶。范仲淹对此极不满意。

景祐三年（公元 1036 年）范仲淹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指着图中升调次序说："这样是按次序的升迁，那样是不合次序的提拔；这样进用是公道，那样升迁是私意。况且提拔和斥退皇帝身边的近臣，凡是超过制度规定的，不应当全部都委托给宰相处置。范仲淹这些无情的揭露，使吕夷简大为恼恨，便向仁宗控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对吕夷简加给他的罪名，据理力辩，一一驳回。

但仁宗还是偏听了吕夷简的诬蔑，把范仲淹贬出知饶州。范仲淹的才干和胆识深得朝中一些大臣的赞赏，因此范仲淹这次被贬，在朝中引起强烈反响。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都出来为范仲淹说话。亲朋好友这次为他在郊外饯行时赞扬道："此行特别光荣。"范仲淹笑答说："仲淹前后已经光荣三次了。"以后他又徙知润州、越州。在这为官十多年间，范仲淹三上三下，相当部分时间是在地方官的任上度过的。他关心民间疾苦，为民排水患、修水利、开仓赈灾，作了许多益于国计民生的事，政绩卓越。范仲淹出任泰州西溪镇盐仓监官时，黄海海堤久废不治，不仅良田时被海涛冲毁，而且村舍也频遭破坏，人畜也有死伤。范仲淹毅然超越职权上书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请求修复海堤。

张纶对范仲淹建议极为赞同，便奏请以范仲淹知兴化县，主持修复海堤全部工程。有人对修复海堤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修复海堤只能防堤外海浪之灾，却不能排堤内积水之患，是得不偿失的举措，但张纶坚持认为修复海堤利大于弊。

仁宗天圣元年（1023）由范仲淹主持，这项工程开始了。但动工不久，天降特大雨雪，海面上惊涛骇浪，很多民工散失，百余人死亡，工程遭到严重破坏。反对者趁此机会旧调重弹，继续反对修复海堤，朝廷也派人下来检查要停罢这项工程。修复海堤的工程面临流产。朝廷诏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与范仲淹讨论这项工程能否继续进行，范仲淹力主继续动工，胡令仪也很支持范仲淹意见，最终这项工程没有停歇。在工程进行中，范仲淹虽因母丧而离去，但他对工程却时时刻刻关注着，他曾给张纶写信，反复申述修复海堤的好处，坚定张纶的信心。张纶接替范仲淹主持全部工程，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共修复海堤一百八十里，防止了海潮的严重灾害，使流亡于外地的二千六百余户人家重返家园，当地百姓非常感念张纶范仲淹的恩德，为二人建立祠堂，海堤名为"范公堤"。明道二年（1033），在江南路、淮南路和京东广大地区发生严重虫灾和旱灾，范仲淹奏请朝廷，派遣使臣前往灾区视察以便及时解救，但未有下文。范仲淹对朝廷这种漠视民间疾苦的行径极为气愤，他找了一个机会请问仁宗："宫中如果有半天吃不上饭，陛下应当如何？

如今几个州县没有饭吃，怎么可以置之不理！”这几句话触动了仁宗，使仁宗很难过，便派范仲淹到江淮灾区慰问。

范仲淹所到之处，开仓赈济灾民，使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得以活命。同时，禁止百姓搞荒唐的祭祀活动。他还奏请朝廷减免灾区丁口盐钱。他回到朝廷时，把饥民所食的乌味草进献给仁宗，使仁宗体察民间疾苦，力戒奢侈之心。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知苏州，正赶上暴雨成灾，苏州靠近太湖，地势低洼，积水至秋不退，民田水淹无法耕种，范仲淹急百姓之所急，不顾各种阻力，招募大量民工疏通五条河，引导太湖水注入大海，从而使苏州地区，甚至太湖周围地区解除了水涝的威胁，保障了农业生产。

军中一范　惊破敌胆

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月，西夏党项族首领赵元昊自立称帝，国号大夏。这表明赵元昊主动脱离了与宋廷的臣属关系，双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宋朝群臣对赵元昊的突然称帝，非常愤慨。大多数朝臣主张出师征讨，认为小小赵元昊，只要宋军一到，顷刻就可消灭。但是谏官吴育对当时宋、夏军事力量对比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主张出师；著作郎通判睦州张方平也对出兵表示不乐观。然而宰相张士逊等对吴育等人的意见不予理睬，他力主兴师问罪。仁宗也倾向张士逊的主张。

宝元二年（1039）六月，仁宗下诏剥夺了赵元昊的官爵，断绝双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并在边地张榜悬赏，允诺凡能擒斩赵元昊的人可授与定难军节度使的官职。宋夏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为适应打仗的需求，宋在西北边境调整了军事部署，任命夏竦知泾州，并主管泾原路军事；范雍知延州，并负责挪延路军务。

范雍是一位懦弱的人，康定元年（1040）正月，当赵元昊率军队进攻延州时，负责延州防务的范雍吓得不敢出战，紧闭城门祈求神佛保佑。他所调遣的援军在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也遭到夏军伏兵阻击，伤亡惨重。幸亏当时天降大雪夏军撤离，延州才得以避免陷入夏军之后的厄运。

仁宗为惩处三川口大败，贬了范雍的官，同年二月任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在韩琦的推荐下，同年四月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使，从南方的越州调往西北。同年五月，仁宗又任命韩琦与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管勾都部署司事，为夏竦作副手。

夏、韩、范三人在对夏攻防方面所持的策略是不尽相同的。范仲淹战略思想是侧重于守，他认为当时边塞的战备状况比内地要强得多，如果元昊率军深入，乘关中的空虚，东阻潼关，再隔两川贡赋，这可就危险了。范仲淹认为当前之上策，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复命五路修攻取之备，张其军势，分彼贼势，使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二三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闲隙，则行天讨。”

基于以防守为主的战略思想，范仲淹反对五路进讨的方针，他认为，目前兵力薄弱，没有取胜的希望，大军一旦进入沙漠，运送给养的车辆行进必定困难，而敌人的骑兵轻捷，可以前后夹击；如果再加上一天打败仗，前进不得也休

息不得，即便要喝水也要发生困难。韩琦与范仲淹对防守的策略截然相反，他积极主张向西夏进攻，认为元昊虽占据了几个州的地方，但精兵也不过四五万，其他都是老弱妇女，宋军屯有二十万重兵，若一味坚守界壕，不敢攻击敌人，这是自古没有的懦弱，如果长期守下去，第一可能丧失士气，第二会给国家财政增加更大困难。韩琦是坚决主张认为应迅速进军，速战速决的。夏竦的意见是倾向以防为主，但他认为应该服从朝廷的命令。这时朝廷上宰相是吕夷简。吕夷简主张向西夏进攻，多数朝臣也附和吕夷简的意见，仁宗也认为防守耗费时日太久，而屯兵运粮，费用太大，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困难，因而决定采用韩琦进攻之策。他命令韩琦和范仲淹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出兵。

但范仲淹坚持前议，反对出兵，他上疏仁宗，说正月起兵，正是塞外最寒冷的季节，大量军马粮草在这个时候进入山川险阻的地方，容易被夏军劫夺、击败，倘宋军的主要部队有失误，那就不仅仅是边患问题了，而是关系到朝廷的安危，大军一动，关系到成千上万人的性命，怎么能置之度外呢？庆历元年（1041）二月，韩琦得知赵元昊将进攻渭州，便召开将领会议，决定全面出兵，同时又临时招募勇士一万八千人，全部交给环庆副部署任福指挥。韩琦还为任福制定了进攻路线，要他绕到夏军背后伏击其归路。但任福及其下属将领为夏军佯败的假象所引诱，脱离了原来的行军路线，越追越远，当大军行至六盘山下好水川时，夏军突然伏兵四起，鼓声大作，宋军完全陷入包圈之中，虽然奋力拼杀，但因寡不敌众，六个多名军士战死，任福等许多将领阵亡。

这一惨败虽与任福的轻敌冒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主帅的韩琦没有客观分析宋夏军事实力，贸然向夏进攻。宋军战败后，一路上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手捧死者的旧衣和纸钱，伏在韩琦马前嚎啕大哭，韩琦也泪流满面勒住马，不能前进。范仲淹听到战败消息，连连叹息。好水川战役的失败，证明进攻的策略是错误的，同时也证明范仲淹以防守为主的策略是正确的；韩琦从血的事实中吸取了教训，仁宗和宰相吕夷简也开始认识到范仲淹的防守之策应该采纳，宋王朝上下统一了认识，这表明宋朝对夏战略的重要转变。对夏战略统一后，韩琦因好水川之败，于庆历元年（1041）四月被贬知秦州，范仲淹也因擅自与赵元昊通信劝其罢兵，并焚毁了西夏复信，被贬知耀州。但边事统帅夏竦与新派来的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陈执中不和，夏、陈两人都上表请求解除兵权，十月同时被罢官去职。朝廷又重起用韩琦、范仲淹。

庆历二年（1042）十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掌握该路军事，以韩琦、王沿、庞籍分掌秦凤路、泾原路、鄜延路军事，此次仁宗给予他们较大的军事权力，范仲淹从此更可以充分施展他的军事才能了。范仲淹对夏战略并不是一味的防守，他向朝廷提出在守策之外，也要积极进攻，但在进攻时，只能是攻其近地，不能贸然深入敌方。他的作战方针是取下一处城寨，再准备攻打另一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认为这种作战方针，比之朝取暮失，更为稳妥。基于这样的战略思想，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

施。首先是修筑城寨，建立巩固的军事基地。

范仲淹的部将种世衡，为了阻挡夏军进犯延州，在延州东北二百里的古宽州废垒上修筑城堡，这样一方面可以得到河东粮食，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延州防守，进可以进图银、夏二州，城寨全面而且稳妥。城内无水，种世衡重奖民工，凿地一百五十尺挖出泉水，最后得到了几眼井，可以满足全城的饮用，这座城堡以后也就以青漳得名。种世衡又开营田一千顷，招募商贾，贷给本钱，通贸易，畅货源，使城内不但有充分的粮食供应，而且货物充足，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同时，新立的城堡也有了联系少数民族的据点和训练前沿战士的基地。范仲淹高度肯定了种世衡的做法，他认为种世衡建立城堡的措施是成功的，有利于加强防守。

范仲淹从庆历元年（1041）正月到四月，为修筑城寨事，六次上疏。在一次上疏中，他说："若先修复城寨，是远图的眼光。请允许在二月半合兵万人，自永平寨进筑承平寨，等到承平寨毕功，又择利进筑，就可以牵制元昊东界军马，使得并力西御环庆、泾原之师。"在范仲淹积极努力下又修筑了大顺城。大顺城的原址是马铺寨，在庆州的北面，属于西夏腹地。范仲淹以最缜密的方式迅速动手，仅用十天的功夫就顺利筑成了一座城堡城，因而取名大顺。夏军发觉后，动用了三万骑兵来进攻，不能破城，他们又佯装败北。但范仲淹十分警惕，并没有追击。大顺城的建立，正好与白豹、金塘二城寨形成犄角之势，因而打通了延州与庆州之间的道路，使两州在防务上可以互相支援，在军事上极为有利。范仲淹修筑的许多城寨，大大加强了西北的防御力量，使得延州和庆州都处于得到安全保护之地。范仲淹在争取、团结羌族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力量；羌族的联络，削弱和孤立了西夏。

羌族部落散落在宋、夏边界横山一带，羌族人马精劲，善于战斗，西夏经常胁迫和利诱羌人和他们一起与宋军作战。宋对羌族也采取抚绥政策，凡归属宋朝的羌族都称之为属户或熟户，其余者叫作生羌。宋把熟户看成是一支很好的战斗力量，因此经常在羌族中征召士兵，协助宋军作战。

范仲淹对争取羌族极为重视，其部将种世衡，曾亲自到羌族部落进行慰问、周济，和羌族亲如家人，羌人得到西夏的情报也愿意告诉种世衡，种世衡也当即给以奖励，因此种世衡深得羌族信赖，羌人也愿为之效命。种世衡曾多次命羌人击退西夏侵犯，取得很大战绩。环庆路的羌属非常多，范仲淹到环庆时，得知六百多名羌族酋长受赵元昊利诱，曾为夏军攻宋作向导。范仲淹深入边界一带巡视，以朝廷名义犒赏、慰问羌族，巡视了诸羌人马，与他们订立条约，让他们在抗击元昊中发挥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强招抚羌人的工作，范仲淹特意奏请朝廷，把种世衡调到环州。种世衡调到环州后，冒着严寒冰雪，深入到汉朝官员从未到过的险地群山，对羌族进行访问招抚，这使羌人非常感动。种世衡让他们备置烽火，当西夏进犯时，以烽火相告，驱马相救。种世街就因此多次击破西夏的掠劫。羌族对种世衡十分敬服，当种世衡兵援泾原时，有几千名羌兵随从。

范仲淹对羌族部首长也以诚相见，

信而不疑，羌族酋长来见时，范仲淹常常把他们引入卧室，并且屏退守卫，和他们促膝谈心。对因战乱而丧失土地的羌族人民，羌族熟户上下、男女老少对范非常钦服，范仲淹在羌族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尊敬地称范仲淹“龙图老子”（范仲淹当时的官职是龙图直学士）。范仲淹招抚羌族工作取得很大成功，当时环庆路约有羌兵二万人，他们配合宋军，对夏作战，是一支强劲的生力军。

选拔将校、训练士兵是范仲淹带兵打仗的一个中心内容。他十分重视军队将校的作用，认为军队的战斗力是由将校所决定的；在此以前宋军将领不仅数量不足，素质也极差。范仲淹上奏仁宗，建议对将校应尽早进行选择，凡是年老病弱不能披甲上阵或没有指挥能力的要在此进行选择调离；让一批立有战功、武艺高强，有军事才能的人担任将校；经过试用后，再正式任命。

另外，范仲淹也注意培养将校，他让部下在作战之余，努力学习古今兵法，对于勇敢善战的狄青，他不但给予优厚的待遇，而且送给他一部《左氏春秋》，并告诉他：“在将不知古今，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从此狄青刻苦读书，对于秦汉以来将帅兵术了如指掌，从而成为北宋一名屡立战功的名将。对于士兵，范仲淹主张认真挑选选，严格训练。北宋招募的士兵，由于胡乱选拔，因而素质很差。范仲淹提出要淘汰弱小、选留强壮勇敢的择兵标准。北宋士兵缺乏乏训练，武艺精强者不多，遇到战事常吃败仗。所以范仲淹主张对军队加强训练，他在西北战场上将延州兵分为六将，每将三千人，分部训练，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提高前线士兵素质，范仲淹提议，在陕西本土增招士兵，因为陕西本土的士兵生长在边寨，熟悉地形，善于骑射，作战勇敢，而且能持苦耐劳，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东兵是从东部调到陕西前线的禁军，这些士兵思念故乡，不耐劳苦，廪给虽优厚，但斗志不高，保证在战争中兵员不足时，应增置较多的陕西本土士兵，以代替一部分东兵。范仲淹在战术上也尽量革除旧弊。

北宋旧的作战方式极为保守：部置官带领一万人，钤辖带领五千人，都监带领三千人，出战时，官小者在前。范仲淹认为不考虑敌人数量而出战，以官职高低为出征的先后，这是历次作战败绩的主要原因。范仲淹革除了这种呆板的作战方式，提倡根据敌兵多少，以决定出击人数的作战作风与战术机动灵活，有利于打击敌人，可以随时出击，也可以随时撤退。

在范仲淹的倡导下其他路也效法这种作战方法。于是西夏将士害怕起来，相互警告：“不要再攻延州了，现在的小范老子腹中有数千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范雍）懦弱可欺也。”范仲淹还提出总的战略方针：对付西夏大股军队要坚壁清野固守以待援兵；对付小股进牙巳的夏军则可以在险要的地方设埋伏打击，根据夏军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对策。

范仲淹还向朝廷建议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使夏军穷以应对。他申求朝廷要给将帅以“便宜从事”的权力，使他们能够根据前线复杂多变的形势，采取灵活相应的战术，以期取得战争的胜利。大量军队长期固守在西北边远之地，需要从内地远程运送大批粮草和物品，旅途

很难，耗费大量财力和民力，这已成为历来防守战略能否巩固的主要问题。范仲淹吸收汉、唐以来屯田的历史经验，又总结了种世衡在青漳城兴田的好处，因而奏请仁宗在边塞屯田。仁宗同意了他的建议，诏令陕西四路部署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转运判官兼管勾营田事。范仲淹在西北推行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得边防日益巩固，加上他和另一主将韩琦空前团结，因而元昊不敢侵犯，扭转了战争形势。西北边境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范仲淹与韩琦的名声大振，史称："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宋夏长期的战争，西夏军虽有过小胜，但得利不多；宋加强了边防，同时又进行经济封锁，西夏经济日益困难，人心浮动，朝廷内部厌战情绪不断增长，再加上辽在夏边境处暗修城堡，集结军队，有攻占西夏的意图，于是元昊不得已，只好向宋求和。宋也由于财政负担太大，困难重重，愿意尽早结束战争。双方经过议和，在庆历四年（1044）达成协议，西夏取消帝号，仍由宋封为夏国王，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恢复贸易往来。范仲淹和韩琦防御西夏的成功，使他们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骤增，朝廷也予以嘉奖，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四月将他们两人提升为枢密副使，同年八月，仁宗又下诏，拜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升为副宰相。范仲淹奉调回朝后，面临着一场比抗御西夏更为艰巨的斗争。

改革先锋　名满天下

北宋政治，弊端丛生，尤其是"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极为严重。宋太祖开国时，设官分职本有固定的数目，但以后随着征召官吏、恩荫官职、祠禄官员的日益泛滥，北宋的官吏队伍急速膨胀。仁宗天圣二年（1024），录取诸科进士竟达一千零六十七人，而且录取以后，就直接任官，两三年功夫，经科举新录用的官员竟增加一倍以上。而恩



范仲淹疏导太湖

荫得官的，那就更多了。宋代官吏不仅多，而且素质极差，办事能力很低，但官员们的待遇却特别优厚，所谓宋朝优待文官，说的就是这些官员，除正俸之外，还供给一定数量的春冬衣料，还有职钱等名目繁多的补助，国家开支不断增加，再加上皇室大兴土木，任意挥霍，政府财政日益入不敷出。而这种负担又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因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农民起义和兵变相继发生，内忧外患连年爆发，国家面临重重危机。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和腐朽的官僚政治，范仲淹力陈改革时弊。在危机面前，仁宗也感到形势严峻，“欲更天下弊事”，想摆脱困境，免掉了保守无能的宰相吕夷简和执政王举等人，重用范仲淹，并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也安排在要职上。主张革新的人在朝廷中占了优势。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今日“纲纪法度，日削月侵，宫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因而提出十项革新主张

（一）严明官吏升降制度。

（二）严格限制官僚子弟恩荫特权。

（三）严密贡举制度。

（四）选择地方长官。

（五）均公田。

（六）注重农桑。

（七）整修武备，加强京师防卫力量。

（八）推广朝廷恩泽与信义。

（九）慎重颁布命令，严肃朝廷政令。

（十）减轻徭役。

范仲淹的十项改革，是他挽救政治危机、缓解财政困难的重要措施，中心是整顿吏治。在他看来，“内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官吏贤能，“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纲纪之坏必葺”。

皇帝此时正信任和偏向范仲淹，因此全部采用了他的建议，范仲淹提出的十事，仁宗于庆历三年（公元 1043 年）十月开始，先后以诏书形式颁布全国。在庆历这一年，北宋的改革，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也实施了几件重大的举措：

庆历的改革，使腐朽的北宋暂时出现生机，使暮气沉沉的官僚机构开始发挥了较好的运行效率。

然而，庆历新政，对权贵官僚的种种特权，作了严格限制，因而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那些权贵官僚串通一气，散布流言蜚语，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更为阴险的是，他们竟伪造事实指控富弼要另立皇帝。仁宗虽然不轻信，但范仲淹和富弼却十分不安，感到新政已难以推行下去。恰巧西北有警，范仲淹请求巡视边防。庆历四年六月，派他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同年八月，富弼也出任河北宣抚使。范仲淹和富弼离开朝廷后，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更加猛烈。仁宗也于此退缩了，在庆历五年（1045 年）正月，罢范仲淹参知政事，以资政殿学士和邠州兼陕西路沿边安抚使。同年十一月，又罢陕西四路安抚使，改知邓州。富弼也贬知郓州，韩琦、欧阳修等革新人士，也先后被赶出朝廷。庆历新政就此结束。

皇祐四年（1052）正月，范仲淹徙知颍州，在赴任的途中因病在徐州逝世，终年六十四岁。仁宗悲伤不已，亲笔为他的墓碑撰额，称为“褒贤之碑”。后

谥“文正”。遗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范仲淹内心刚毅外表温和，天性极孝顺，因为母亲在世时他正贫困，后来虽然富了，但没宾客上门就绝不吃二种荤菜。妻儿的衣食，仅仅能够基本自足。但他乐于施舍，在家创办义庄，用来赡本族穷人。他博爱众人，乐于行善，很多读书人都出自他门下，即便是里巷中的平民百姓了都能说出他的名字。他去世那天，各地听到死讯的人，都为他叹息。范仲淹为政崇尚忠厚，所到各地都施有恩德，邠、庆二州的老百姓与归附宋朝的羌人，都为他画肖像，立生祠以纪念他。到去世时，羌族酋长几百人，像哭自己的父亲那样为他痛苦，斋祭了三天才散去。

【司马光】

年少聪智　有缘识庞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北宋天禧三年，其家世代贵胄，远祖是西晋皇族平献王司马孚，原籍河内（治今河南沁阳）。到北魏时传至司马阳，曾为征东大将军，死后葬在夏县涑水乡高堠里。司马光的四世祖司马林、曾祖父司马炳都是以布衣终身。直到北宋初年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才重得仕进。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晶，为兵部侍中、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出生时，司马池是在光州光山县（今河南光山）任县令，就以生地取名为光。

司马池为官清廉，富有学识，对司马光管教很严。司马光六岁时开始识字读书，七岁时就像成人一般，很严肃，听人讲《春秋左传》，十分喜爱，回来



司马光像

给家里人讲解，能讲出大意。从此手不释卷，到了不知道饥渴寒暑的地步。

有一天，司马光和一群儿童在庭园中游戏，有个儿童爬上了一只水缸，失足跌在缸里，别的儿童都一哄而散，司马光却拿起石头打破水缸，让缸里的水流出来，缸里的儿童才没有被淹死。后来在京师和洛阳一带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传布。

司马光十五岁时，已经读了不少书，他写的文章醇厚深重，人称有西汉之风。就在这一年，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即五、六品以上的大臣子弟和后人都可以补官。每三年举行一次南郊祭天大典，恩补一批），司马光恩补人仕，被授予将作监主簿。虽然做了官，司马光依然刻苦读书，仁宗赵祯宝元初年（1038）司马光在二十岁时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甲科。

进士及第以后，司马光任奉礼郎、华州判官。第二年司马池从同州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为便于奉侍双亲，请求

调任苏州判官。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由于他母亲在这一年因病去世，司马光辞官回家守丧；母亲丧尚未满服，父亲又于庆历元年（1041）病逝，这使司马光悲痛不已，在守丧的岁月里，他哀伤消瘦，遵循礼仪以读书作文来排遣自己的哀思。

四年以后，庆历四年（1044）司马光守丧期满，签书武成军判官事。司马光在二十七岁时被调到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担任过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职。在司马池的生前好友庞籍升任枢密使以后，再次推荐司马光担任了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等职；参与有关刑事、礼仪及编校书籍等工作。馆阁校勘的职务给司马光提供了阅读朝廷密阁所藏的大量图书的机会，对于他以后的史学研究与编撰有很大的帮助。太常礼院属于太常寺，常管礼仪祭祀。司马光办事认真，在任期间对朝廷不合礼法的事是毫不管客气的，宦官麦允言死，治丧时赐用一品官的仪仗，司马光奏说：‘春秋时大夫于奚因功请用诸侯的规格装饰马匹，乘坐入朝，孔子还加以责备，麦允言是陛下的亲信近臣，并无巨大功勋，而增以三公官衔，给以一品仪仗，与诸侯的规格比较，不是太过头了么！”夏竦赐谥文正，司马光奏说：“文正这个谥号是很高的美称，夏竦是什么人，可以相称吗？”司马光终于打动了仁宗，最后夏竦的谥号改赐为“文庄”。

皇祐五年（1053），庞籍涉嫌罢相，次年降为户部侍郎，出知郓州。庞籍希望司马光作为他的助手，因而举荐司马光任郓州典学，司马光感于庞提携之恩，也就随庞籍到郓州就任。一年后，庞籍改任河东路经略完抚使、知并州事，又荐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司马光又去并州任职。并州地方贫瘠，与西夏接近，西夏人经常逼进到交界的麒州城下耕田，有一定威胁。庞籍派司马光去麒州调查，司马光采纳了当地官吏意见，建议在麒州城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加强防备，并在此地雇人耕田，这样既可以避免西夏强占耕地，又可缓解河东谷贵长途运输的困难。庞籍听从司马光建议，决定在西夏聚集此地之前修成二堡，因此未等朝廷下旨意就动工了。然而，麟州官兵在这时发现西夏军队在此地集聚，守将郭恩虽勇猛，但狂妄自大，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在夜里对西夏兵突然出击，结果被夏军打败，所干之事也就一无所成。仁宗派人追查庞籍，庞籍为保护司马光，自己被贬为知青州事。司马光为此非常不安，上书引咎自责，申述修堡无过，庞籍无罪，但仁宗未加理会。六年后庞籍去世，司马光深感庞籍之恩泽，登堂拜庞籍的妻子如同自己的母亲，抚养庞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兄弟，当时人都称赞庞籍和司马光的贤德。

谏官必谏用人先德

嘉祐二年（1057），司马光离开并州，第二次进京做官，任直秘阁，后迁开封府推官，后又加修起居注。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改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司马光在担任谏官的五年当中，竭尽忠诚，恪守职责。对朝政之失误，曾上了不少奏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仅收录在《传家集》中的就有一百七十余份，而且在一些事上是一奏再奏。比如，当时的交趾进献了珍异的动物，叫做麟，司马光说：“真假不得而知，倘若是真的，不是自己到来的也不能说是祥端，希能退还给他们。”可是，由于

当朝皇帝对于司马光的意见很少采纳，这使得司马光很是不安。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就任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此时司马光感到自己只知竭忠报国，已经在朝廷上树立了一些敌人，恐怕祸及子孙，连上三状，力辞谏职，希望解除谏职，到地方去做官，朝廷只答应免去谏职。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赵顼即位，能知政事欧阳修向神宗推荐司马光，称赞他的品德淳正，学识渊博。神宗便于同年闰三月拜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辞谢，不允。四月，又升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司马光为政，关心人民疾苦，这与他长期地方做官接触下层劳动人民有关。他提倡"怀民以仁"，认为只有"利百姓"，才能"安国家"。所以，他对百姓给很多关注、同情，甚至为之请命。元丰八年（1085）九月，他在上神宗的札子中尽情地描绘了对农民的疾苦，并郑重地告诫皇帝要注意历史上官逼民反现象。治平三年（1066），陕西、河东发生严重旱灾，但朝廷没有重视，反而在此时听从佞臣之请接受上尊号，司马光对于这种朝廷漠视人民疾苦的现象非常气愤，上奏英宗说这简直是"欺蔽上天，诬罔海内"。为减少百姓负担，司马光反对英宗下诏将壮丁二十万刺手背而编为义勇军，认为陕西军队本来就不少，这样会使百姓无故加重负担。他冒被皇帝处罪的危险，连上几道奏疏，并持诏书到中书少与韩琦辩论，两人唇枪舌剑展开了一场激战。

北宋时期在用人方面存在着相当多的弊端，这也是宋代历来积贫积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司马光针对弊端提出过不少好的见解和主张。首先，他认为用人当以"德"为先。熙宁元年（1068），司马光向神宗荐举谏官时就根据这个原则提出三个具体的条件：一是"不爱富贵"，二是"顾惜名节"，三是"晓知治体"，前两条是德，后一条是才。他也反对近世以来，专尚文辞，以文辞代百能的取士方法。他认为，文辞，只能是艺能的人一个方面，不足以穷尽天下士之百能。司马光还主张选才用人应破除论资排辈、重门第的陈腐观念。治平四年（1067）五月，司马光上疏神宗，指出如果按照国家原先选御史百的资历范围规定，不但选中者不多，而且弊端不少。对于以门第高低来选择官员，司马光更是深恶痛绝，他提出只要有贤才就应推举，对于魏晋以来历代相因的"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的严重弊端，认为一个人的德才，不在于世禄与贫贱，不能以门第划分。他主张建立和健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科举制度，设十科举士；改进延访荐举和按察制度。司马光重视推荐人才，荐举过苏轼、刘恕等。当然，司马光也错举过人，他曾为此上书自责。晚年做宰相时，也信任过蔡京这样的人。

保守固执否定新法

治平四年，（1 跖 7）英宗去世，神宗即位。这位年仅 20 岁、风华正茂的皇帝很想有所作为，他欣赏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熙宁二年（1096）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提出一套急进、大胆的改革方案，成为变法的领袖，北宋很快掀起了一阵变法的浪潮，史称为"王安石变法"。

面对着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腐败局面，面对着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司马

光和王安石都从维持封建王朝的统治出发，都尽力想去“补天”，都想改革，但涉及到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方法，两人就势同水火，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分歧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老相识而且是好朋友，嘉枯年间在朝中同修起居注，神宗即位后二人又同居翰林学士之职。当时人们所称的“嘉枯四友”，就是他们俩外加吕公著和韩维。两人同为州牧判官的时候一天被包拯请到家里饮酒赏牡丹。当包拯亲自举杯劝酒时，司马光虽然平素不爱喝酒，但碍于情面，不得不勉强喝了一点，而王安石却能够坚持“终席不饮”，这种自制力使司马光后来谈起来还很佩服。司马光与王安石最大的分歧是在理财方面。

北宋中期，尽管税收比开国之初增加了几倍，但由于冗兵、冗费和冗官等庞大开支，造成了国库空虚、人不出敷的严重局面。神宗即位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财政上的巨大亏缺。他向司马光、王安石等征询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司马光主张从节约人手，他认为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注意节流，例如减少对于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等。司马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从理财上着眼。两人在神宗面前曾经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河朔旱灾，国用不足，神宗下诏让司马光与王安石一同进见，商量应对办法。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宜从亲贵近臣开始。”王安石反对说：“唐代常衮请免去政事堂宰相日常办事时饮食供应，时人认为常衮如果自觉不称职，应该辞去宰相的职位，不宜辞免禄食。况且府库空虚、国用不足，不是当世急务，所以造成不足的，是没有得到一位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也不过赋税苛重而已。”王安石说：“并不如此，善于理财者，不加赋税而可以使国用充裕。”

司马光说：“天下哪里会有这个道理？天地生产的财货百物，不在于民间，就在于官府，如夺民所有，充实官府，造成的祸患比增加赋役还要大。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刘彻的话，太史公司马迁将它写在《史记》上，是要证明桑弘羊不明事理。”二人真是唇枪剑舌，至不相让。对于市易法与均输法司马光认为是与商人争利，不利于商品流通，对于保甲法，司马光认为实行下去会使农民不安心种地。司马光对解决宋的财政危机，主张持重缓进，与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做位明显不同，他们二人曾有过形象的比喻，司马光说：“治天下有如处理房屋，破了则要修理，除了坏得很厉害是不重建的。而且重建非得要好的工匠和材料，如今两样都没有，我怕连风雨都不能挡蔽。”而王安石则认为：“治天下有如医生用药，要知道虚实热寒，当用治虚寒的方子时，纯用乌头附子也不嫌过热。”针对当时社会的严重病症，他们都开出了自己的医症药方，他们都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为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出谋划策。正如司马光对王安石说的：“我和你趋向虽然不同，但大的目标是一样的”。王安石也说，自己与司马光“商议事情时常有分歧，是因为各人的方法不同”。可见他们的分歧，最初是源于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不同，司马光思想倾向沉稳持重，虑事缜密，但传统保守是很明显的；王安石则思想活跃激进、勇于标新立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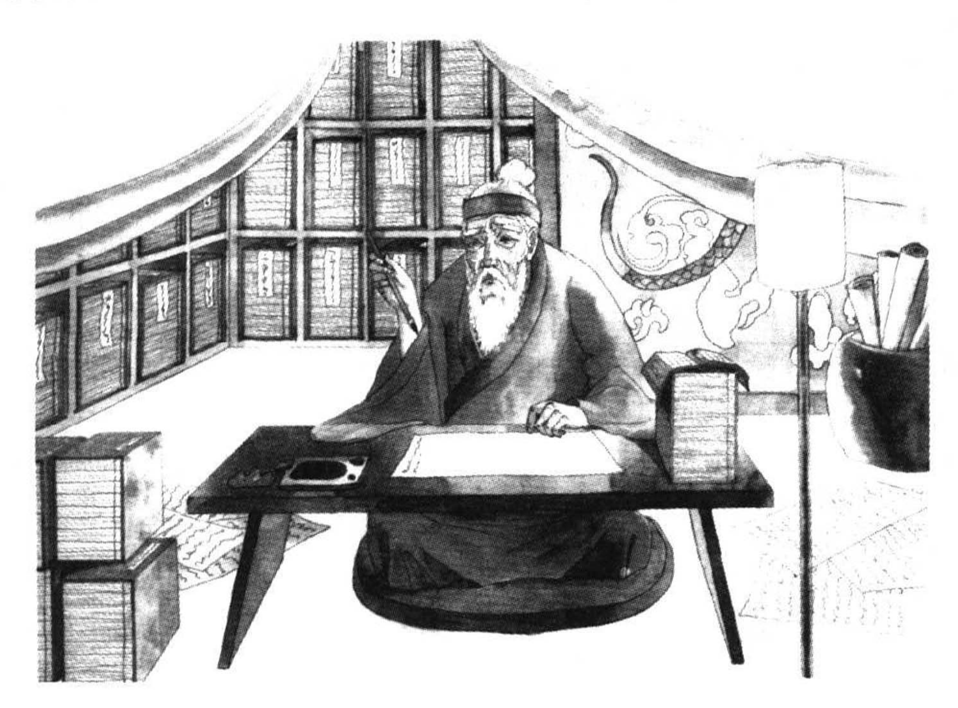
而慎重不足，在变法中有时操之过急，出现了一些失误，同时也用人不当，如对吕惠卿这样的人就缺乏全面了解、考验。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新法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很不对的，他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某些消极的方面的同时，也反对了王安石的积极方面，这就导致了他们成为政敌的原因。而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中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王安石却一点拒不接受，这种刚愎自用的态度也不对，两位本来在政治上都想有所作为的政治家都固执偏拗，使北宋的改革蒙受很大损失。

以后变法派与反对派已经势同水火，许多反对新法的辅弼大臣都被王安石赶出朝廷或主动提出辞职请求外任。司马光也被罢了翰林学士等职，又一次离开朝廷，于熙宁三年（1070）到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任地方官去了。

煌煌巨著　《通鉴》斐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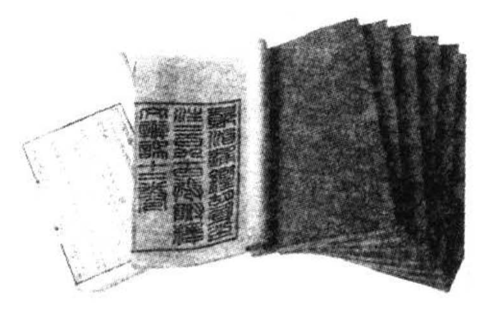
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又辞去了永兴军一职，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这是一个闲散职位。从此司马光便在洛阳住了十五年，远避朝廷党争，主编完成了《资治通鉴》。

司马光一生的主要成就，与其说在政治方面，不如说在学术方面。他的著述极多，除现存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八十卷外，还有《涑水纪闻》三十二卷，《稽古录》二十卷，《通鉴节要》六十卷等等，再加上《资治通鉴》，司马光著述之丰，在历史、文学上是少有人可与之匹敌的。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主编的辉煌巨著，共分二百九十四卷。这部编年体中国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述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此书的成就、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史学和世



《资治通鉴》书影

界史学史上都堪称不朽之作。

司马光早就想编一部简明系统的中国通史，自从他当了谏官等职以后，有了一定的条件，于是试着编了《周纪》和《秦纪》。宋英宗看了以后极为赞赏，让司马光继续编下去，并且为他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设立书局，并给他配备了助手。司马光先后选了刘恕、范祖禹等人为主要助手，司马康帮助抄校。由于具备了人员、史料这两大条件，再加上到洛阳后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这部巨著终于圆满完成了。

司马光的修书精神与毅力令人感动。为了修书，他常常拒不见客，日以继夜地工作。所参考的书之多，后人为之叹绝。据说光是草稿，就堆满了两间房子。《资治通鉴》一书凝集着司马光毕生的心血，如果从治平三年（公元 1066 年）编修《通鉴》的书局成立算起，到元丰七年（1084 年）修成为止，历时就有十九年之久；如果从嘉祐年间着手《通志》时算起，那么时间就不下三十年。英宗对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给予很大支持，英宗去世后，神宗也极为重视这一工作，他把原颍王府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赐给司马光，并“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书成后进呈给神宗，神宗特降诏奖谕司马光，称赞他“博学多闻，贯穿古今”，“成一家之书”，并厚加赏赐，所以升擢升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非常明确：“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即是总结历史经验，面对社会现实，使当朝执政者能够借鉴历史，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使北宋封建统治能够长期巩固下去。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一部供皇帝阅鉴的历史教科书。

司马光在取材上特别注意“资治”的原则。在具体编撰中，一是删长举要，便于政务繁忙的君主得以周鉴；一是专取历代政治，使群主得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对于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朝廷统治的得失成败、重要政治人物的言论和行为、不同帝王的功过是非、农业的丰歉、人民的安定流离等，都作了突出的叙述。战争的胜负多是封建王朝兴亡、盛衰的关键问题，《资治通鉴》对于重大战役的描绘详尽、具体而生动。为提醒帝王时刻警惕“官逼民反”这一封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资治通鉴》对农民大起义的记载也比较真实、具体。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中写了一百十九条史论，引前人史论九十九条，这些史论虽因吏事而发，但寓政论于其中，以帮助帝王明白事非。总之，凡是有益于治政的内容无不网罗。《资治通鉴》把史和政有机地融和为一体，体现了司马光既是政治家、又是史学家的特殊才能。

《资治通鉴》问世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封建帝王和学者的推崇和重视，宋末元初史学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

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志，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司马光既为封建社会的群臣留下了宝贵的统治经验，也为后人提供了鉴古知今的好教材，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重返朝廷　更张新法

元丰八年（公元 1085 年）三月神宗病逝，其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改元为元祐。年仅十岁的哲宗不能亲政，朝中大权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掌握。这位太后一向器重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她一上台，就派人问司马光应当先办什么，司马光说：“广开言路。”神宗临死之前曾留言让司马光和吕公著当赵煦的师傅。同年四月，司马光入朝任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司马光又升任尚书左仆射，做了宰相。这时他已经六十七岁，年迈力衰，身体多病，做宰相主持朝政虽已力不从心，但他还是兢兢业业为朝政操劳。

司马光此次执政，全力以赴地从事废除王安石新法的工作。在就任门下侍郎的第二天，他就上了《请更张新法札子》，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张”。他说：“先帝定下来的制度，行之有效的虽百世以后也不可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立的法，为害天下的，应当如同救火和救护溺水的人一样，立即更改。况太皇太后以母亲改儿子之法，并非儿子改父亲之法。”于是朝廷下令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卫法；废市易法，所储存物都予以出售，不取利息；京东铁钱和茶盐之法，都恢复如旧。十二月四日又上一份《请革弊札子》，将王安石所行新法之弊病逐一列举。为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实现，罢废新法一事能顺利进行，人相以后他向高太后进言，陆续将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出各地的官员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召回宫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逐渐回到朝中，委以要职。司马光前后几次上书，一概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变法派的蔡确被罢相出知陈州；章惇结果也被贬汝州。司马光这样粗暴地废除新法，不仅原来新法派的人物极力反对，就是原来反对变法的人也主张要慎重行事。范纯仁就曾劝司马光，对新法只要“去其太甚者可矣”，并且应当“徐徐经理，乃为得计”，如废保甲法时，对保甲当中那些武艺出众的人，就应该委派殿前司加以拣选；吕公著也认为对新法主要是纠正其弊害，不一定全面废除。但是此时司马光固执己见，根本听不进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便当一切废罢”。

从个人修养与品格方面上来说，司马光是值得称道的。他以忠信待人，自持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度，举止有礼。在洛阳每去夏县扫墓，总要去看望他的兄长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待他如严父，关心他如婴儿。从小到老，司马光从不胡乱妄言，他曾说过：“我没有过人的才能，但平生所作，没有不可以对人说的。”他为人诚恳，天下人都敬重他。他处世淡泊，没有特爱好，于学术无所不通，只是不喜欢释老之学，说：“释老的微言大义不能超过《六经》范围，它的荒诞不经，我不能相信。”他在洛阳有田三顷，妻子去世，卖田下

葬，一生布衣节食。

元祐元年（1086）八月，司马光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九月一日去世，享年六十七岁。高太后和哲宗哀痛异常，亲临其丧礼。司马光被赠为太师温国公，谥文正。都城人民也为之哀痛，前往吊唁，店铺都关上了门。岭南、封州的父老也相率来祭奠。



浙江的包公祠

【包拯】

（999～1062）北宋政治家。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历知天长县（今属安徽）、知端州（今广东高要），有政绩，迁监察御史。仁宗朝号称北宋的太平盛世，实际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很严重，庆历新政失败以后，要求改革的呼声继续高涨，包拯是其中的一员。他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贪暴、懦弱的官吏，年老的官吏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选将练兵，训练义勇以备边，抑制贵戚和宦官等的权利，轻徭薄赋，节省开支等。后曾出任东京转运使、河北都转运使，及知瀛、扬、庐等州和知江宁府等。



包拯像

至和三年（1056），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审案明察，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令行禁止。当时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包拯，称呼他“包待制”，并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此前曾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后权御史中丞，立朝刚严，数论斥权幸大臣，建言兴利除弊。又任三司使，迁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062）病逝，终年六十四岁，谥孝肃。有《包拯集》（《包孝肃公奏议》）传世。包拯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是家喻户晓的“清官”典型，南宋和金已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小说和戏曲，元剧中有大量的包公戏，后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

【脱脱】

智擒伯父大义灭亲

脱脱（1312～1355），字大用，从小聪明过人。就学后，曾向他的教师浦江硕儒吴直方请求说：“如果让脱脱整天正襟危坐而读书，不如让我每天记古

人的嘉言善行，可以终身受用。”稍长，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十五岁，为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元文宗图帖睦尔天历元年（1328），袭授成提举司迭鲁花赤。天历二年入觐，文宗很喜欢他，说：“这孩子将来必可大用。”迁内宰司丞，兼前职，五月，命为府正司丞。文宗至顺二年授虎贲、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顺帝妥欢帖睦尔元统二年（1334），又升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五月，迁中政使。六月，迁同知枢密院事。

顺帝至元元年，唐其势阴谋不轨，事发被杀，他的同党答里和刺刺等拥兵为外，脱脱选精锐和他交战，将叛军击败，并将叛军首领全部擒获上献。脱脱功拜御史中丞、虎贲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至元四年，进御史大夫仍兼前职，他任职后，大振纲纪，内外肃然，以后随帝驾从上都回来，至鸡鸣山的浑河，顺帝将狩猎于保安州，马颠蹶。脱脱劝谏说：“古代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每天和大臣、积学之士讲求为政之道，至于飞鹰走狗，不是帝王的事。”顺帝接受了他的意见，授金紫光禄大夫兼绍熙宣抚使。

当时，脱脱的伯父伯颜为中书右丞相。唐其势被诛杀后，伯颜更加无所忌惮，擅自授官封爵，赦免死罪，任用奸佞，滥杀无辜，把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钱帛随便出纳。顺帝早对他不满，忿愤不平。脱脱从小就寄养在伯颜家，常担忧他要失败，私下对父亲马札儿台说：“伯父骄纵已极，万一天子震怒，我们就要族诛了。不如在他未败之时预先图谋。”他的父亲也认为他说得对，但犹豫不决。脱脱向吴直方请教，直方说：“《左传》上就有‘大义灭亲’。大夫只知忠于国家，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呢？”当时，顺帝左右前后都是伯颜安插的亲信党羽，只有世杰班、阿鲁是顺帝的心腹，日常相处。脱脱就和二人结为至友。而钱塘杨瑀曾经事奉顺帝在即位前，这时为奎章阁广成局副使得出入于宫禁，顺帝知道他可用，每论事都使杨瑀参加。

至元五年（1339）秋，顺帝巡幸上都，伯颜这时外出应昌，脱脱和世杰班、阿鲁计划拒伯颜于东门外，但因为担心不能成功而停止。恰巧河南范孟矫诏杀省臣，事情牵连廉访使段辅。伯颜为此告诉三位大臣说，汉人不可为廉访使，并指使他们弹劾汉人官员。这时别儿怯不花任御史大夫，害怕人们因此议论自己阿附伯颜，就托疾不出，因此奏章被压了下来，伯颜催促很急，监察御史告诉脱脱。脱脱说：“别儿怯不花职位在我之上，而且是掌印官，我怎能擅自作主？”别儿怯不花听到后很害怕，就要出来办事，脱脱考虑不能阻止他出来，和吴直方商量对策。吴直方说：“这是祖宗规定的法度，决不可废，何不先对皇上说清楚。”脱脱就报告顺帝，待奏章上来，顺帝就依脱脱的话说，未同意伯颜的主张。伯颜知道出于脱脱的主意，怒气冲冲地对顺帝说：“脱脱虽然是我的侄子，但他心里只袒护汉人，必须惩治他。”顺帝说：“这都是我的意思，没有脱脱的责任。”以后，伯颜擅自贬斥宣让、威顺二王，顺帝极为忿恨，下定决心要斥逐伯颜。一日，顺帝流着眼泪向脱脱诉说+、脱脱也泣不成声，回来后和吴直方谋划。直方说：“这是关系到宗庙社稷安危的大事，不可不保密，你和皇上议论之时，左右都有谁？”脱

脱说："有阿鲁和脱脱木儿。"直方说："你的伯父有震主之威，这班人苟图利禄富贵，你们的话如被泄漏，那皇上就有危险，你也难免杀身之祸了。"一脱脱于是请二人到家，备酒奏乐，日夜不让他们出去。脱脱和世杰班、阿鲁商议，计划等伯颜入朝时把他擒。命令卫士严查出入宫门的人，凡是隐蔽之处都安置士兵。伯颜见状大惊，责备脱脱。脱脱回答说："天子所居，防御不得不这样。"伯颜因此怀疑脱脱，更加增兵自卫。

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请太子燕帖古思去柳林打猎。脱脱和世杰班、阿鲁合谋，计划以所掌握的兵力和宿卫皇宫的士兵抗拒伯颜。方法是扣留京师城门钥匙，命令亲信布列城门下，然后拒伯颜进城宣布其罪。这夜，奉顺帝到玉德殿，召集近臣汪家奴、沙刺班及省院大臣先后人见，又召杨及江西范汇人内草拟诏书，数列伯颜罪状。诏书写成时已经半夜四更，命令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贵送诏书到柳林。之后脱脱坐城门上，而伯颜也遣骑士到城下问是什么原因。脱脱说："皇上有旨只驱逐丞相一人。"伯颜所领卫兵听后都各自散走，伯颜被捕。伯颜事平定，诏以马札儿台为中书右丞相，脱脱知枢密院事，虎符、忠翊卫亲军都指挥使，提调武备寺、阿速卫千户并兼军民宣抚都总使、护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等，十月马札儿台因病辞去相位，脱脱被诏以太师衔就相国之位。

身入中书整肃朝政

至正元年，脱脱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诏告天下。脱脱把伯颜全部旧政重新更改，恢复科举选士法，复行太庙的祭祀，昭雪以前的冤案，召还宣让、厕I匝二王，使他们位居旧藩，并复阿鲁图亲王之位，他还开马禁，减少盐额，蠲除拖欠的赋税，又开经筵，挑选儒臣为皇帝讲经，脱脱被内外同声称为贤相。至三年五月，采纳参议勃罗帖木儿等的建议，在都城外开河安置闸门，放金口水，引通州船到丽正门，役使丁夫数万，但结果没有成功。

至正三年（1343），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裁官。又请修《至正条律》颁布天下。顺帝曾到宣文阁，脱脱奏说："陛下临御以来，天下无事，应该留心圣贤之学。不能听到左右有些人加以阻挠便以为经史无足以观看，他命人从秘书监取出裕宗真金所授书以进，顺帝很是高兴。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曾经养育于脱脱家，每次有病服药，脱脱必定先尝而后进服。顺帝曾巡幸驻扎在云州，遇到烈风暴雨，山洪暴发，车马人畜都漂溺，脱脱抱皇太子单骑登山，使得太子免遭灾难。至六岁回到宫中，顺帝慰抚脱脱说："你的勤劳，我不会忘记的。"脱脱于是以私财造大寿元忠国寺于健德门外，为皇太子祈福，共费钞十二万二千锭。

至正四年闰月，诸山佛寺住持请恢复僧司，但脱脱说："僧寺为郡县所苦，如坐地狱。""若恢复僧司，和地狱中复置地狱有什么不同?"这时脱脱有病，日渐羸弱，占卜者也说年月不利，于是上表辞去相位，丁顷帝不许，上表十七次才同意。下旨封郑王，食邑安丰，赏赐巨万，都拜辞不受。于是赐给松江田，并为其立稻田提领所加以管理。

至正七年（1347），别儿怯不花为右丞相，以旧怨中伤脱脱父马札儿台，

下诏徙甘肃。脱脱力请同行。在路上则检查车马户帐，吃饭则看是精是粗，到了甘肃，马札儿台安定下来。又移西域撒思地方，到黄河边，召还甘州就养。十一月，马札儿台去世。顺帝念脱脱勋劳，召还京师。

至正八年命脱脱为太傅，综理太子东宫事务。至正九年朵儿只、太平都罢相，诏脱脱再任中书右丞相，赐上等酒器、名马、外衣、玉带。脱脱既重人中书以前恩恩怨怨之事，无不一一报应。这时开端本堂，皇太子学于其中，命脱脱领端本堂事。又提调阿速、钦察二卫、内史府，宣政院、太医院事。

至正十二年五月，母蓟国夫人去世，脱脱服母丧不出，顺帝派遣近臣劝喻，以便出理政务，此时脱脱将孙良桢、龚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儿等僚属都委以心腹，大小事都与他们一起商议，有时事已施行而群臣尚不知道。吏部尚书哲笃建议重造至正交钞，脱脱信任他，诏集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院诸臣议论，都唯唯听命而已，只有祭酒吕思诚认为不能造，脱脱不高兴。终究还是变钞法，而钞却不能流通。

征讨义军遭诬身亡

黄河在白茅堤决口，又在金堤决口，方圆数千里，百姓受害；决口长迭五年，总未能堵住。脱脱用贯鲁的计划，请施工堵塞，他亲自参与这件事的决策。告诉群臣说："皇帝正当忧虑百姓，为大臣的职责所在，应当为皇上分忧。然而事情有难办的，就像病有难治的一样，自古以来黄河患就是难治的疾病，现在我一定要除去这个疾病。"别人的议论脱脱都不听，于是奏请让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河南北兵十七万充役，复筑所决堤成，使河水充人故道。工程八个月竣工。于是顺帝嘉奖他的功劳，赐世袭答剌罕之号。又敕儒臣欧阳玄制《河平碑》以记载脱脱的治河功绩。仍赐淮安路为脱脱的食邑，郡邑长吏由脱脱自行任用。

不久汝、颍之间百姓聚众开始反元，以红巾为号，襄、樊、唐、邓都起而响应。至正十一年，脱脱奏衣让他的弟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率诸卫兵十余万讨伐红巾，攻克了上蔡。接着驻兵沙河，军中忽夜惊。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费器棚匕奔汴梁，以后收散卒屯朱仙镇，朝廷以也先帖木儿兵败，诏以其他将领代替。也先帖木儿回来，仍任御史大夫。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十二人劾其丧师辱国之罪，脱脱怒，从此人们都不敢议论朝事。

至正十二年红巾军中有号称"芝麻李"的人率兵占据徐州。脱脱请求由自己领兵前去征讨，以逮鲁曾为淮南宣慰使，招募盐丁及城中矫健善走之徒，共二万人与所统兵丁一起出发。九月军队到达徐州，攻西门，红巾军出战，用铁翎箭射马首，脱脱不为所动，挥军奋击败红巾军，攻人外城廓。第二天大兵从四面八方到达，红巾军支持不住，城被攻破，芝麻李逃去。获得黄伞旗鼓，焚烧其所积聚的粮草，追檎红巾头目数千人，屠杀徐州城。顺帝遣平章政事普化等到军中命脱脱为太师，右丞相依旧，催促回朝，而以枢密院同知秃赤等进军平颍、亳。胜利回来，顺帝赏赐上等酒器、珠衣、白金、马鞍。皇太子赐宴于私第。下诏改徐州为武安州，立碑表彰脱脱功绩。

至正十三年三月，脱脱采纳左丞孙

良桢、右丞悟良哈台建议，屯田京都附近，以此二人兼大司卿，而脱脱领大司农事。西至西山，东至迁安，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二州，都引水灌溉，立法佃种，这年获得大丰收。

至正十四年，张士城占据高邮，朝廷屡次招安张士诚都不投降。下诏脱脱节制诸王诸部军队前往讨伐。罢免升赏官吏和一切民政都由他便宜行事。省台院部各司，听候选拔的官属都随军出发，统一受脱脱节制。西城、西番都发兵来相助，旌旗绵延千里，金鼓震野，声势浩大。十一月到高邮，连战连捷。张士诚势力大受挫折。此时脱脱忽然接到诏书，指责他劳师费财，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为率脱脱之兵，削去脱脱官爵，把他安置在淮南。当初，脱脱西行，别儿怯不花欲诬陷他于死地。哈麻屡次向顺帝解说，因而召还近地，脱脱很感激，把他任为中书右丞。而这时脱脱信用汝中柏，只有哈麻不为他慑服。汝中柏因此在脱脱前中伤哈麻，哈麻怀恨于心。哈麻曾和脱脱商议授皇太子册宝礼，脱脱拖而不决。脱脱将出兵，以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使辅也先帖木儿居中。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受哈麻指使，上章弹劾脱脱，接连上了三道奏章才得以准许，夺也先帖木儿御史台印，令出都门外候旨。以汪家奴为御史大夫，而脱脱也就得到安置淮南的诏命。

十二月辛亥诏书到军中，参议龚伯遂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丞相出师时，曾受密旨，一心进讨就是了。诏书暂时不宣读，一宣读大事就完了。"脱脱说："天子有诏书给我而我不从，这是和我天子对抗，君臣之义在哪里？"不听从。奉诏后，脱脱叩头而谢，说："臣最愚笨，蒙天子宠爱，委托军国重事，日夜战战兢兢，害怕不能胜任，现在能够放下此等重负，皇帝对我的恩德很深。"立即交出兵权，名马三千分赐诸将，以便各帅所属军队听从月阔察儿、雪雪节制。枢密副使哈剌答说："丞相这次去淮南，我们也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宁可死在丞相面前。"拔刀自杀。当初下诏命脱脱安置淮南，忽又有旨移置亦集乃路。至正十五年三月，台臣还认为对脱脱处理太轻，上奏列数脱脱、也先帖木儿的罪状，于是流放脱脱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流放也先帖木儿于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哈剌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查抄人官。十二月己未，哈麻矫诏派遣使者用鸩酒毒杀脱脱，死时年四十二。顺帝闻脱脱死讯，遣人到脱脱死地，换棺木、衣服而殓。

脱脱仪表雄伟，高出于千百人中，而气度恢宏，识见远大，莫测高深。有功于社稷但不自夸，位极人臣不骄傲，轻钱财，远声色，礼贤下士，皆出于天性。至于奉事君主，始终不失臣节。但他为群小迷惑，急于报私仇，正直的人对他这一做法有批评。

至正二十二年，监察御史张冲等上章为脱脱雪冤，于是下诏恢复脱脱的官爵，并发还他的家产，召他的儿子哈剌章和三宝奴还朝。而也先帖木儿已经去世，于是授哈剌章中书平章政事，封申国公，分省大同；三宝奴知枢密院事。至正二十六年，监察御史圣奴、也无、撒都失里等又说："奸邪诬陷大臣，以致临阵易将，国家军威不振和耗费钱粮从此开始，更造成盗贼横行和生灵荼炭

也从此开始。假如脱脱不死，怎么会有今日之乱呢？乞封一字王爵，定谥及加功臣之号。”朝廷认为他们的意见者是对的。但是当时正处于多事之秋，还没有来得及办而元已亡。

【李纲】

刚直不阿　直言上疏

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父李夔，官至龙图待制。李纲少年时就得到时人“自幼有大志”、“举动必于规矩法度”的好评。他二十二岁进太原读书，三十三岁中进士，徽宗政和二年（1112）授官承务郎。三十六岁，擢升至太常少卿和起居郎国史编修官。宋徽宗时的朝政完全被蔡京、王黼等人把持着。他们狼狈为奸，陷害忠食，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人民苦不堪言。言路阻塞，一般官员都缄口不言，避之惟恐不及，不敢得罪他们。然而李纲刚直不阿、不顾个人得失，多次直言上疏皇帝，抨击朝政的弊端，为民请命，要求改革，惩治奸党，但是李纲的上疏却引起了奸佞权臣的恼恨，他们罗织罪名，打击报复，把他贬为南剑州的沙县（今福建沙县）做一名管理税务的小客。

李纲的上疏道出了朝野上下正直人的心声，在国中引起了的强烈反映。他被罢官的消息传出后，各方舆论哗然。朝廷迫于压力，在徽宗宣和七年（1125）三月，不得已又恢复了李纲的太常少卿职务。就在这一年里，北宋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长白山兴起的金政权撕毁了与宋的和约，大兴进兵，向宋王朝杀来。



李纲像

力谏南逃　捍卫都城

金兵在宣和七年（1125）十月开始，分两路南下大规模攻宋，西路攻太原，东路攻燕京，及后两路大军会师合围北宋都城开封。

正当金兵日渐逼近开封之际，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束手无策，乱成一片，他们无心防守，只想逃命。宋徽宗急忙任命太子赵桓（宋钦宗）为开封牧，让他出面应付这种十分危急的局面。又下了一道“罪己诏”，假意承认自己多年来的错误，表示悔过之心。同时又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抗金的样子，并摆出与金对阵的架式，他下命令各地率师勤王，然而，事实他都时时刻刻地在想逃命。

就在此时，李纲挺身而出，他不顾安危，向朝廷献上御戎五策：“正己以收人心，听言以收士用，蓄财谷以足军储，审号令以尊国势，施惠泽以弭民怨。”李纲的“五策”就走要统治者消除与人民的对立情绪，广开言路，积蓄财物，准备军事，使上下一致，同心对

敌。接着他又提出“捍敌十策”的方案，为朝廷抗金行动提出了具体办法。鉴于当时十分危急的形势，李纲又联络了当时的宰相吴敏，他刺臂上血疏，要求徽宗让位于太子，让太子拥有实际的权力，号召天下抗金，挽救危局。徽宗早就想南下逃跑，于是就同意了禅位的意见。太子赵桓于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即位，此为宋钦宗，第二年改国号为靖康。

钦宗为帝后，李纲继续犯颜上疏，指出当前的局势是：“夷狄凭陵，中国势弱，奸邪充斥，君子道消”。请求皇帝顺应民心，消除内忧外患，增强国势。他还在抗金问题上特别警醒钦宗：“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钦宗在做太子时就对李纲有较深的印象；看了他的上书后表示了赞赏。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末，钦宗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第二年靖康元年（1126），又任命他担任了行营参谋官的职务，从此李纲以抗金重要将领的身份，站在了战争的最前线。

就在此时，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金军渡过了黄河。身为太上皇的徽宗得知消息后，连夜仓皇出逃，从开封逃往南方，当时有许多侍从百官跟随，其中还有臭名昭著的蔡京、童贯等人，并且带走了两万多宋军。徽宗等的逃跑行为在官员中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宋钦宗在宰相白时中的劝说下，抗金的决心开始动摇，准备南逃襄（湖南襄阳）、邓（河南邓县）。形势极其紧迫，李纲决定立刻赴皇宫求见钦宗奏事。李纲不顾平时宰相们议事、从官不能进朝廷的规矩，坚持进到廷殿之中，与那些企图逃跑的宰执们进行面对面的辩论。李纲严厉地指出：“听说宰辅们要拥陛下出走以避金兵，倘若如此，国家社稷就会难以保住了。太上皇之所以把皇位禅让陛下，就是为了能保住国家。而陛下却在此时丢弃国家而逃，难道是可以的吗?”李纲沉痛恳切话语使钦宗无言以对。宰相白时中对李纲说：“金人如此强大，难道能守得住吗?”李纲坚定地回答道：“天下的城池，有哪一座像京城这样坚固？这里有宗庙社稷、百官万民，如果能激励将士，安慰民心，怎么会守不住呢!”钦宗巡看四周的大臣们，让大家献计献策，找出保卫开封的办法，但在场的人包括宰相白时中在内都默不作声，只有李纲胸有成竹地在分析对付目前局势的策略。李纲认为现在要做的是整顿军中的兵马，团结人民，同心协力，坚守住京城，同时等待各地的勤王之师的到来，共同对金人反击。钦宗对李纲的分析点头称是，又问李纲谁能够做防守京城的主帅。李纲回答说：“朝廷平日以高官厚禄养着一班大臣，目的就是要他们有事的时候为国家效力，白时中、李邦彦虽然是书生出身，谙于军事，但他们身为宰相，在国家有难之时，领兵打仗、抗击敌人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直想要逃跑的白时中等人，听到要他们去挂帅上阵打仗，立刻鼓噪起来，说是李纲坚持抗击他就自能够披甲上阵。李纲当即表示，如果皇帝让他领兵守卫京城，他坚决以死报效国家！钦宗见李纲不计个人安危，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当即任命他为尚书右丞（副宰相），留守东京，统领军队抗击金兵。为了加强钦宗抗金的决心，李纲为他打了一支强心剂，他说道，四方勤王之师

不日就将到达，如果皇帝离开了京城，民心就会因此而乱。钦宗这时勉强答应了李纲的请求，表示不再南下，与广大军民一起守在京城。

然而，只过了一夜的时间，钦宗就改变了原来留守京城的主意，传令初五日出发离京南下。就在钦宗黎明乘舆在禁卫军的护卫下，悄悄即将上车出发之时，李纲走上前去厉声责问禁卫军的将士们："是誓死保卫国家，还是甘做逃兵呢?"禁卫军全体齐声答道："愿以死守卫国家!"李纲转过头来又对钦宗说："陛下昨夜已答应留在京城，今天为什么还要离京南下？另外现在六军的家属都还住在京城，他们不愿意抛下自己的亲人去南方。设想，如在南下途中离散，由谁来护卫陛下？再者，如金兵听说皇帝已出京城，立刻派人快马追及，又怎能抵御得了呢?"一番话使钦宗清醒，感到了南逃的危害和危险性，决定留在京城之中。李纲传达了这个消息，军士们欢呼万岁，其声震天动地。李纲又请钦宗登上城门接见将士，鼓舞士气，振奋军心。此时此刻，钦宗方才按下南逃的心思，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给予他一切便宜行事、负责防守京城的实权。

接受了重任的李纲，立即着手进行紧张的战备工作。他在城墙的每一面都安排有一万二千名军士把守，还准备了砖石、火油、擂木、弩等，把守城所需要的用具都准备齐全。与此同进还准备了马步军四万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一军三千人，坚持每天操练。他把前军守卫在东水门外，保护着藏有四十万石米、豆的延丰仓，后军守在城壕最浅的樊家岗附近，防止金军以此处为突破口，其他三军守在城中，作为机动部队随时听从调动。

就在李纲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一切部署完毕的时候，金军已经兵临城下。就正月初七开始，全军发动了对开封城的进攻。李纲冒着密集的弹矢，身先士卒，带令士兵积极防守。初八的夜里，全军乘坐几十条的木船沿汴河南下，企图进攻西水门，李纲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他亲自带领由两千人组成的敢死队守在城下，把一只只到达的敌船拖到岸边砸烂，一举消灭了金一百多人，使金兵士气受到挫折。李纲在打垮敌人进攻的同时，又加强了西水门的布防。双方进行了多次的攻防交战，敌几次进攻不能得逞，感到吃不下汴梁，不得不暂时撤军，派出与宋讲和的使者。

听到金兵要讲和的消息，北宋朝廷内部的投降派又开始活跃起来。对于金兵的求和，李纲准备作为使者，亲自前往敌营。之所以亲自前往，是因为他觉得此次议和十分重要，"宗社安危，在此一举"。如谈判成功，金人一定会退兵收敛；反之，金会更加过分贪求。但钦宗拒绝了李纲的请求，派了一个胆小而又窝囊的知枢密院事李棁前往。钦宗的用意非常明显，他就是怕李纲表现过分刚强，影响了他求之不得的议和，而李棁不会坏皇帝的事的，他会按钦宗的意旨办事。

李棁到了金营，那种唯唯诺诺的样子，使金人很瞧不起，他们在议和的问题上，提出了蛮不讲理的苛刻条件：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绢帛各一百万匹，马驼驴骡各以万计；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与金；让宋朝皇帝称金主为伯父，并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李棁面对金人如此蛮横的议和要求，不置

一词，竟带着一纸屈辱“和书”回到了朝廷。

包括钦宗和宰相在内的北宋的投降派，准备全部接受金人的无理条件，还要派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到金人那里去做人质。李纲面对着这屈辱的城下之盟，他的肺都要气炸了，他竭力反对接受一极其屈辱的要求。他严厉地指出：“金人索要犒师的金银币数量巨大，国家财力是不能达到的；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割地是绝对不可的，因为这是首都的屏障；另外不能让亲王和宰相去作人质，可以让一个有能力的朝臣前去。李纲还谈到，要尽量拖延时间，等待着各地勤王之师的到来，到那时再打击孤军深入的金军，使得他们不得久留。然而李纲正确的意见并不被采纳，钦宗没有同意李纲的意见，而是倒向投降派一边，完全接受了金人的无理要求。李纲见此，十分气愤，他请求辞职，却没有得到钦宗的批准。

屡沉屡浮　义为抗金

正当以钦宗为首的妥协投降派准备用金银换取苟安的时候，原来被诏的各地勤王之师约有二十万人已经陆续赶到了京城。其中马忠领导的京西兵马还在郑州与敌人开战，给予金兵沉重的打击，消息传来，令人欢欣鼓舞。此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是这样：金兵只有六万，其中精兵只有三万，宋军数倍于敌。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是很悬殊的。在军心振奋的情况下，李纲向钦宗提出把指挥各地勤王师的权力给予他，却遭到了投降派的反对，他们怕李纲握有实权、势力过大，就对钦宗提出了分散兵权的办法。于是钦宗下诏另设宣抚司，以种师道职位高而知兵事为理由，让他担任宣抚使，命姚仲平为都统制，专门管理各路援军，还把原驻城外的前、后军，归属在种、姚领导之下。这样一来，宋军就分成了两个独立的领导、指挥机构。李纲所掌的兵权微乎其微，只能指挥驻在城内的左、右、中三军。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能够打败金兵，李纲并没有去计较个人权力的得失。他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后，提出了各路军队协同作战，共同抗金的用兵之策。李纲分析道：“金兵总数少于宋军，金兵中契丹与真贵族有尖锐的矛盾，金军孤军深入，只要宋军扼守黄河渡口，断绝敌军粮食供应之路，然后在其后方进行骚扰，待其精疲力尽、粮草断绝时，再用重兵给予沉重的打击，定会取胜。此时钦宗和其他将领都赞成李纲的这一主张，决定在二月六日这一天起兵。然而姚仲平利益熏心，他为了抢头功为己有，竟然打破了原来商议好的作战计划，在二月一日先行出兵，自率万名骑兵袭击金营，在遭到了敌人的反击，几千人伤亡的情况下大败而归。

姚仲平的失败，引起了当朝宰相李彦邦为首的投降派对李纲和种师道的造谣中伤，他们向钦宗谎报，西兵勤王之师和李纲统帅的亲征行营司全部被金兵歼灭。钦宗大吃一惊，不问情由，于二月三日下令撤了李纲亲征行营使和种师道宣抚使之职。还表示与金人和好，恢复和谈，派使臣带着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向金人乞和。

李纲与种师道的罢免、宋王朝向金人割地求和，这消息一经传出，民情激愤，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数百人上书请愿，说李纲是真正的社稷之臣，而李邦彦、白时中是社稷之贼。提出要李纲复职、罢免李邦彦的宰相职务等。在强大

的舆论压力之下，钦宗不得已恢了李纲尚书右丞相的职务，李纲和种师道被召进城。

复职后的李纲，并没有去计较个人恩怨，而指挥将士加紧都城开封的各项城防措施，指挥军队英勇杀敌，宋军士气大振。金人眼看大势已去，等不得宋朝凑足金银，就狼狈撤兵了。开封城至此解围，但李纲并没有松口气。

京都暂时解围，已经逃走的太上皇宋徽宗也从南方回到了开封。但投降派并没有放松对李纲的迫害，以尚左丞耿南仲为首的一些官吏竟然诬陷李纲，说二月五日的士民请愿是李纲在背后操纵的；如果让这样的事情蔓延下去，定会成为朝廷的大患。钦宗听了密告虽然十分吃惊，但并没有怪罪李纲，但李纲为此愤然请求离朝廷，钦宗不予允许。

金兵虽然撤走汴梁，但李纲反复上奏钦宗，提醒宋朝廷应加强防边御敌，指出金人仍会再次侵犯，但耿南仲等朝中重臣根本不听，特别是在河东遭到金军的攻击时，竟提出了放弃三镇的主张。

投降派接二连三的打击李纲，他们借靖康元年（1126）种师道之弟在太原的失败为理由，说种师道年高有病，撤了他的职，让李纲前去接替河东宣抚使的职务，以解山西太原之围；这一着就是想陷害李纲，把排挤出朝廷。

李纲准备出发就任，他凑集了几千匹马、两万人的军队。六月底，李纲等数路兵马在太原附近与金作战，由于各路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被金兵各个击破，打了败仗。这一下，让投降派抓住了把柄，他们加了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罢知扬州，提举杭州洞霄宫，十月，又被放逐，充军建昌军

李纲被贬后，金军从九月起又开始大举进攻，攻破太原府、真定府，以两路重兵再一次包围了开封。钦宗在这危急时刻，忆起了忠心耿耿，抗金有功的李纲，他赶忙命人去任命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令开封府，让他领兵急速赶来，保卫开封。但是钦宗的诏书还没有到达李纲驻扎地，开封就于闰十一月初三被全军所破、废饮宗、徽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钦宗、徽宗被金人所掳北上。

山河残破　壮志难酬

建元元年（1127）五月一日，宋朝的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宋高宗为帝后，虽然任命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士，但他认为这二人不孚众望，述是想让李纲出任宰相辅政，他不顾一些朝臣的反对，于六月二日拜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任右相，这是南宋赵构政权的第一任宰相。

李纲在相位供职的时间里，面对着残破山河，他竭尽全力，为抗金救国而呕心沥血。他锐意改革，在刚刚上任时就向高宗上疏，提出十条意见（即十议书）；这十条意见的内容是：坚决抵御敌人的进攻，不能乞求讲和，走投降卖国之路，加强河北、河东的防务；调动民间武装力量，积极参加抗敌斗争；重视人才；修城池、整兵器、置造战船、健全编制军队和军法、挖掘兵源扩大兵力；严惩张邦昌等叛国之人；反对迁都建康（今南京市）等等。

宋高宗虽然拜李纲为相，但并不是真心地要起用他来抗金作出一番事业；

宋高宗骨子里还是对金兵害怕三分的。就在投降派黄潜善和汪伯彦屡屡在他面前诬告李纲、骂李纲为“国贼”之时，宋高宗就明显表示出对李纲的不相信，并有意疏远他。在此情况下，李纲只能以辞职来表示自己的愤慨。建炎元年（1127）八月十八日，高宗下令罢李纲宰相职务，李纲在位时的一切改革、备战措施也随之废除。太学生陈东、欧阳彻再一次上书请愿，要求复李纲的职，抨击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但高宗这次不仅不听，反对将二位太学生当众斩首。

李纲罢相之后，过了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形势很快发生恶化，金人攻陷了许多地区，宋高宗只得离开中原，乘船逃跑，直奔扬州而去。金人闻讯追击，离宗一行只好又逃往临安（今杭州），金兵继续南进攻击临安，高宗又慌忙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最后不得不乘船漂泊，狼狈地东躲西藏。金人由于不习水性，再加上岳飞、韩世忠部队的顽强抵抗，只得从南方撤军，回到了江北。为加强对黄河以南的统治，金人在撤军前，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刘豫，以大齐为国号。

李纲在罢相后的最初几年里，又接二连三地遭受了陷害，蒙受了不白之冤；他接连被贬、被逐，最后到了万安（今海南岛）。对于宋朝腐败的政治、北方的陷落、人民痛苦不堪的生活，他深感悲愤。

在金兵撤兵北方后，绍兴二年（1132），高宗回到临安，并召回李纲，任命他为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今湖南长沙）。李纲接受任命后，还是一如既往，积极准备抗金，收复失地。他聚拢各路的地方武装，组织起一支坚强的抗金队伍；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减轻人民的苟捐杂税；访贫问苦等等。同时他在金与刘豫伪政权准备共同南下时，又上疏高宗，提出乘敌之虚、收复失地的具体办法。但他的一番抗战建议，并没有被朝廷采纳，相反，他又一次地遭受迫害。绍兴二年（1132）李纲再次被罢免，直到绍兴五年（1135）十月张浚任宰相后才任李纲为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由于高宗始终站在主和派一边，所以李纲是不会得到重用、有所作为的。宋朝廷中对待是战是和，两派一直争论不休。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高宗最后同意了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意见。绍兴九年（1139）南宋与金达成和议，宋对金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对这种屈辱的媾和，李纲愤恨之极，但又无能为力，后来高宗又任命他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李纲悲愤交加，拒不接受朝廷的任命。

绍兴十年（1140）正月，南宋的第一任宰相、抗金英雄李纲逝世，终年58岁。

李纲一生写了很多诗、文，其中有《梁溪集》、《靖康传信录》等。李纲的一生是为世人赞颂的，朱熹评价他为”一世之伟人”，他是宋朝抗金救国的一位名相。

【宗泽】

宗泽（1059～1128年），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曾任大名府馆陶县（今山东馆陶县西南）县尉、莱州胶水县（今山东平度县）县令、衢州（今浙

江衢州）龙游县令和登州（今山东蓬莱）通判。在金军南侵、国难当头之际，许多官吏都托故不去河北前线担任地方官。他却认为："食禄而避难，不可也。"随后，毅然就任了磁州（今河北磁县）太守，并在那儿"缮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义勇"，积极开展抗金斗争。

宗泽年近70岁时被任命为宋军副元帅（元帅是时为康王的赵构）。不久，又兼任了东京留守和开封府尹。

施惠百姓

宗泽一向清廉无私，勤政爱民。无论在哪儿做官，他都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他就任馆陶县县尉那一年，适逢朝廷征发民工大开御河。因当时正值隆冬，御河冰冻三尺，根本无法动手。许多人冻卧道旁，身患重病，随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宗泽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请求上司将开工时间推迟到次年初春。由于他的极力争取，使当地百姓避免了一次灾难。

在担任胶水县令时，该县豪强势力极大。他们仗势欺人，百姓叫苦不迭。尤其是一位名叫温包的恶霸，仰仗莱州通判是他的姻亲，更是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宗泽到任后，迅速掌握了他的大量罪行，并准备依法惩处。这时，那位通判果然以上司的身份召见宗泽，要求他对温包网开一面。宗泽毫不为之动摇，仍然除去了这一祸害。

在龙游任上，宗泽发现老百姓大都不识字，其子弟也缺乏读书的环境和条件，便特地为他们建立了学校，鼓励大家入校学习。从此，当地人渐渐重视起教育来，考中科举的人也不断出现。

在登州，境内有官田数百顷，全是些不毛之地，但每年都要交税一万多缗。历任地方官都将这笔税金强加在当地百姓身上，致使百姓苦不堪言。宗泽又从实际出发，及时请求朝廷免除了这项征敛，从而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也正因此，无论宗泽在哪儿做官，都深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爱兵如子

宗泽担任副元帅之后，其爱兵如子的名声又广为流传。

宗泽虽然身居高位，却一向"自奉甚薄"，平日衣食与士兵几乎没有差别。他经常深入士兵之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训练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每次出兵作战之前，他总是谆谆告诫他们：既要敢战，又要善战，万不可麻痹大意。每当将士凯旋而归，他又亲自前去犒赏慰劳，并将缴获的金、帛、牛、马分赏给他们。对死难将士的家庭，他一一派人抚恤。部将张某在滑州战役牺牲后，他还亲自为其料理丧事。有关资料还记载道：他常常把自己的俸禄，用来接济那些家中贫困的士兵；他一生收养的抗金将士的遗孤，竟多达100多人！

宗泽还善于从部属中发现人才和提拔人才。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年轻时曾在相州节度使刘光世属下当差。刘光世很欣赏他的气度和才干，惟恐他在自己手下没有展现的广阔空间，便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书，让他去投奔宗泽麾下。宗泽基于当时盛行的受贿保举歪风，开始时误认为岳飞是位名门财主，而刘光世受了他的贿赂才写了这封推荐函。于是，很不高兴，一见面就给了岳飞一个下马威。但当他得知原委后，尤其是发现岳飞赤忠报国之志及其文韬武略，不

但高兴地将他收留下来，还委以官职，予以重用。不久岳飞犯法将刑，他又保释他立功赎罪。结果，岳飞带领500骑保卫汜水，大败金兵，名扬天下。并从此接连立下赫赫战功，迅速成为人人称道的常胜将军和民族英雄！

此外，著名的抗金将领杨再兴、李贵等人，也都受过宗泽的关爱和提携。

威震开封

宗泽担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时，开封已遭金兵洗劫，残破不堪，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宗泽到任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

首先，他迅速查明了那些私通金国的内奸，以及残害百姓的市井无赖恶棍，并将他们一一惩处。接着，重点打击那些哄抬物价的不法商人。

为主动起见，宗泽事先秘密派人调查了米面的价格，命厨师按市场规格做了一些笼饼，又令监库照市场标准制作了一些酒。经过论证、比较，确定了笼饼一枚价值6钱，酒每觚约为70钱。随后，他去市场检查，发现一枚笼饼竟卖20钱，每觚酒卖到200钱之多。于是，当众将笼饼作坊的老板叫出来，问他为什么卖得这么贵？笼饼老板胡乱编造了一通理由后，仍表示决不压低价格。宗泽当即揭穿了他的谎言，并将他斩首示众。接着又将酒店老板叫出来，令他降低价格，由于那老板态度较好，才留他带头降价，以观后效。

待开封秩序刚刚恢复正常，宗泽又开始致力军队建设。他鉴于当时驻扎在开封的宋朝军队数量少，又缺乏战斗力，便想方设法将北方义军和两河的“八字军”、“忠义军”等招纳集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支拥有上百万人的抗金队伍。与此同时，还带领军民加强了开封城防御工程的修建，使之成为抗金前线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建炎元年（1127年）年底，金军再次攻打开封，宗泽亲自指挥开封保卫战。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直杀得敌人丢盔卸甲，落花流水，口中不住地呼叫“宗爷爷”。从此，金兵不敢越过开封纵兵南侵，为南宋收复失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鞠躬尽瘁

开封保卫战之后，宗泽再接再厉，屡败金军，致使前方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他审时变势，又相机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出师计划。准备北渡黄河，去收复大面积的失地。

可是，躲在扬州城的南宋统治集团却只知道花天酒地，不管国家兴亡。他们对宗泽的声誉日益不放心，对宗泽的出师计划不理睬，尤其是对宗泽一连20多次上疏恳请高宗回开封以鼓舞抗金士气，更是百般挑剔，处处阻挠。宗泽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准备好的渡河作战计划难以实现，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即将错过，不禁悲愤交加，积怒成疾，疽发于背，病倒在床。诸将前来问候时，他无限感慨地对他们说：“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在场者无不感动得流下泪来。

宗泽临终前，一字一句地吟诵着杜甫《蜀相》诗中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随后，“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

宗泽以身殉职的消息传出后，东京军民失声痛哭。1000多名太学生还联名写祭文哀悼他，高度赞扬他至死不灭的爱国精神和胆略。

元朝宰相脱脱也在《宋史》中说：

当时“宗泽一呼，而河北义旅数十万众若响之赴声，实由泽之忠忱义气有以风动之”；宗泽爱国忧民，“虽处死生祸变之际，而犹不渝”。

【文天祥】

年少高中　誓学先贤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别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其父文仪是一个未登仕途的文人，喜欢读书藏书。生有三男四女，文天祥是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文天祥身材高大壮实，肤色洁白，眉清目秀，顾盼间炯炯有神。少时在孔庙看到乡先贤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的塑像，都谥曰“忠”，十分仰慕说：“我死后不配享于他们之中，非大丈夫。”

宝祐元年（1253），文天祥参加庐陵邑校“帘试”，结果名列榜首。两年后入学吉州著名的白鹭书院，同年选为吉州贡士，于岁末年初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应试，考试结果，二十岁的文天祥高中了进士第一名。他对策集英殿所作的《御试策》，针贬时弊，洋洋万言，没有起草，一挥而就，提出了“法天不息”的改革主张，被理宗认为是“切至之论”，愿意亲自听一听文天祥详细谈一下自己的见解。但就在文天祥中魁后还没有任职的时候，他的父亲病发逝于临安。文天祥随即扶柩还乡，在家治丧守制。

开庆元年（1259），文天祥守丧期满，年初陪弟弟文璧进京应试。到临安以后，文天祥被朝廷任命为承事郎，签书宁海军节度制官厅公事，自此开始了他光明正大而又艰难坎柯的仕途生涯。

从公元1259年出仕到1275年起兵勤王，整整十五年，文天祥屡遭当朝权臣的打击排挤，因而数度沉浮。

多次被斥　只缘忠刚

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蒙古军队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南宋朝野大为震惊，当时在朝中掌权的宦官董宋臣等人不是考虑如何稳定人心、认真部署抵抗，反而提出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的逃跑主张。相当多的官员也都认为这一提议是可耻的，但迫于权势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时为宁海节度判官的文天祥，不计个人得失安危，写了《己未上皇帝书》冒死进谏。他在上书申请求皇帝“悔悟”，并指出：“如果听从董宋臣的提议，则“六师一动，变生无方”，京畿便可能“为血为肉”，因此必须“斩董宋臣以谢宗庙神灵”。秦疏中还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建议，以求救亡图存。但文天祥的提议并没有被皇帝采纳。忧心忡忡的文天祥于景定元年（1260）坚辞了朝廷改授的签书镇南军



文天祥像

（今江西南昌）节度制官厅公事的职务，请求担任主管道观香火的“祠禄”，这是一种闲职。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出任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仙都观主管。

景定二年（1261）十月，朝廷任命文天祥为秘书省正字兼太子府教授，这一职务按惯例是由前科状元担任，文天祥两次提出辞职都没有得到批准，次年又充任殿试考官，不久又转任著作佐郎兼权型部郎官。此时朝廷决定重新启用被罢免的奸宦董宋臣，文天祥对此决定大为反感，考虑再三，又呈了《癸亥上皇帝书》，劝皇帝以史为鉴，不要宠信宦官，竭力劝阻起用董宋臣这种奸佞人物，然而他的建议仍然没有被采纳，文天祥愤而辞职，决心不和坏人共事。后来在朋友的斡旋下出知瑞州（今江西高安），以后又任江西提刑。在江西提刑任上，他因仗义平反冤狱遭人诬陷，于咸淳元年（1265）四月被弹劾罢官。郁郁不得志的文天祥返回老家，决意遁迹山林，隐居在文山，其“文山”的别号也是由此而来。

咸淳三年（1267）九月，朝廷重新起用文天祥为吏部尚书左司郎官，他又提出辞职未获批准；继任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但文天祥上任仅一个多月就遭忌被参弹，罢职再回文山。

贾似道以称病乞请归老，要挟天子，有诏不准。文天祥值班起草诏书，用语多讽喻贾似道。照当时宫内规定诏书草稿都要送给贾似道阅看，文天祥不这样做，贾似道很不高兴，要台臣张志立弹劾，罢文天祥的官。

公元成淳九年（1273）春，文天祥又复出任职湖南提刑。当年冬季文天祥以便于奉养祖母、母亲为名，要求调往江西，获准迁知赣州事。

万里奔波　一心抗元

忽必烈取得了汗位，稳定了蒙古内部，于公元1271年（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改国号为大元。公元1274年六月，忽必烈下诏要对南宋兴师“问罪”，再次大举进军南宋。二十万元军分东西两路，沿汉水运河南攻长江；十二月，西路元军攻克鄂州，南宋军情紧急。当月二十日，南宋主政的太皇太后发出《哀痛诏》，号召各地迅速组织勤王之师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

德祐元年（1275）正月，文天祥接到了《哀痛诏》以及朝廷令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士”的专旨，文天祥捧诏涕泣，首倡勤王，为组建勤王军呕心沥血。接诏三天后，他发布文告，在江西全省征集义士粮饷。他把家中老母送往惠州交弟弟奉养，并捐出全部家产充作义军费用。在师友百姓的支持努力下，江西一带各路英雄豪杰、少数民族纷纷来归。到了四月，一万多名义师已经集中在吉安整装待发。当时有友人劝阻说：“如今元军分三路进攻，破京郊，夺取内地，你以乌合之众一万余人赶去，无异驱羊群与猛虎博斗。”文天祥答道：“我也知道这样。但国家养育臣民三百余年，一旦有难，征召天下兵勤王，竟没有一人一骑而响应，我深以此为憾。所以不自量力，而以身许国，天下忠臣义士也许会闻风而动，如能做到这一点，则社稷还有保住的希望。”

由于种种原因，文天祥的勤王军很晚才遵旨从江西开拔，抵达临安时已经是八月下旬了。这时宋元两军对峙于常州一带，临安十分危急。文天祥到京后

被任命为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在向恭宗陛辞时，上奏疏说："朝廷姑息牵制的用意多，奋发进取的主张少，乞斩吕师孟（当时的投降派人物）以振作将士之气。"还说："宋朝鉴戒五代之乱，削藩镇，连郡县，一时虽足以矫正尾大掉之弊，但国势也固而衰弱不堪。所以一旦敌人进攻，到一州破一州，到一县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他建议天下分为四镇，这样做就能诸镇地域大，力量强，足以抵御敌人。约期进攻，有进无退，照这样下去，打败元兵并不困难。

文天祥率领军队到达平江时，元军已由建康兵分三路向前进攻临安。正当中路元军攻陷常州、平江危在旦夕之际，朝廷突然下命令让文天祥移师西线，保卫临安西北的独松关；而当文天祥的部队还在移军途中时，独松关、平江就都已相继失守。文天祥只得退回临安，元军也随即兵临城下。这时，以太皇太后为首的南宋皇室已决定投降。他们先后向元军提出称侄纳币、奉表称臣、乞存小国等投降方式，力图保存宋室宗庙。在对方的强硬态度下，最后只好奉送传国玉玺，派大员正式议降。

景炎元年（1276）正月二十日，文天祥受命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出使元营，他向元军统帅伯颜提出先撤军后议和的权宜之计。伯颜以死相威胁，逼文天祥代表南宋投降。文天祥毫不畏惧地说："我身为大宋状元宰相，至今只欠一死以报国，我誓与大宋共存亡，即便刀锯在前，鼎镬在后，也绝不皱一眉头。"元军扣留了文天祥。

当月文天祥被元军沿运押送前往元大都，路上在镇江停留时，文天祥一行人经过周密的策划，在当地百姓帮助下乘船从水路脱身，来到江北宋军治下的真州。文天祥本来打算在那里联络各方组织抗元斗争，但由于两淮制置使李庭误认为文天祥是来说降的，文天祥不得已又逃出真州。

文天祥到达永嘉时，广王已经抵达福安府（今福建福州），并被拥立为帝，即端宗。文天祥应召前往，被任命为同都督置府南剑州，他在那里招兵买马，再举义旗，计划以闽赣为基地恢复发展。不久，福安府行在命令文天祥移驻汀州。以后南剑州、福安府相继失陷，端宗皇帝在陆秀夫等人保护下随船入海。文天祥的督府军在闽赣又出师不利，军心动摇。文天祥处决了叛徒吴浚等，重新整顿军纪，稳定局势提高了督府军战斗力。第二年二月文天祥收复了梅州（今广东梅县）；五月再次入赣，收复了赣南十县、吉卅四县，军事形势为之一振，史称赣南大捷。文天祥的胜利引起了敌人的重视，元军调江西宣慰使李恒猛扑督府军。八月督府军在永丰县的空坑这个地方遭到元军的突袭，损失惨重。文天祥的家属也大都在此被俘，他本人在战友和百姓的掩护下再次脱险。

空坑兵败，宋军的元气大伤，但文天祥抗元的斗志与信心一如既往。他收拾残部，转战闽粤赣地区。景炎三年（1278），行朝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以示嘉奖，但对文天祥的军事计划并不十分赞同。

当年十二月，文天祥从俘虏的元军口中得知元军重兵将由闽南进攻粤东督府军；元水军将由秀州、明州南下，进攻南宋行朝。文天祥一面飞报行朝，一面率领都府军撤往南岭山脉。十二月二



广东汕头市的文天祥塑像

十日，元军在当地奸盗陈懿引导下，对正在海丰五坡岭吃饭的督府军进行了突袭。文天祥兵败被俘，他决心以身殉国，当场吞下了早已准备好的二两冰片，但因药力失效而没能成功。他随军的母亲、长子、三女、四女先后死于病乱之中。文天祥的军事失败，使元军最终摧毁了这支撑着南宋残局的东南一柱。

公元1279年正月初，元军水陆并举，扑向位于海岛的南宋行朝。文天祥随元舰被押前往。元军统帅张弘范令人给文天祥送去纸笔，要他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心潮起伏，抄录了自己所作的《过零丁洋》诗以明其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汀洋里叹零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公元1279年二月六日，元军与行朝军队进行了决战。文天祥被押在元舰观战。他亲眼目睹了南宋行朝的覆灭，心中"痛苦酷罚，无以胜堪"。当日陆秀夫背负九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而死；几天后已经突围出去的杨太后、张世杰等闻讯也纷纷投海殉国；到此宋朝最终灭亡。

忠贞不屈　舍身取义

行朝灭亡以后，文天祥为表明心迹，写了《言志》诗一首："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生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公元1279年四月，文天祥由广州被押送大都。途中他曾经八天不进饮食，求死未果。八月船过长江时，他深情地写下了"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留念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当年十月，文天祥抵达大都。元人最初把他安置在会同馆最好的房间，送上锦衣佳肴，以图感化文天祥。但文天祥不寐其床，不穿其衣，不食其粟。昼夜穿着宋朝的旧衣面南而坐，只吃友人送来的食物。以后元人又驱使南宋降相、废帝先后来说降，又曾示之骨肉亲人以图感化，最后又由元朝宰相亲自出马劝降，但文天祥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劝降不成，元人就给文天祥披带木枷链，迁入污秽不堪的牢房。那里的环境虽是"地狱何须问，人间见夜叉"，但文天祥反觉"朝夕淡薄神还爽，夜睡崎岖梦自安"。

文天祥忠贞不屈的精神使元统治者大为叹服。在如何处置文天祥的问题上他们犹豫不决：释放文天祥有放虎归山的危险；处死文天祥会大损自己名声；

只有劝降并使其服务于元朝是上策。因此，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八日，世祖忽必烈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刚一见面，文天祥就首先表明："宋朝已亡，我希望快些死去，不愿久生。"忽必烈示意要请他出任元朝宰相，文天祥正色道："天祥身受宋朝厚恩，担任宰相，怎能奉事二姓，赐我一死于愿已足。"当忽必烈问文天祥有何心愿时，文天祥干脆地回答："但愿一死足矣"。他的言行使元朝统治者最终打消了劝降的念头，决定处死他。

公元1282年十二月九日，四十七岁的文天祥被绑赴大都柴市处死。临刑前，他从容地对人说："我文天祥走完了该走的路"。朝南深情跪拜后英勇就义。死后，其妻欧阳氏收尸时，在其衣带中发现一篇早已写好赞言："孔日成仁，孟日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第二年文天祥的灵柩归葬吉州庐陵。文天祥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爱国诗篇被收入《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等集中；另有《集杜诗》传世。他所作的《过零丁洋》、《正气歌》、《衣带赞》等是人们世代传诵的佳作。

【耶律楚材】

辅佐太祖　建立功勋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是辽朝东丹王突欲的八世孙。其父耶律履，因为博学多才、品行高尚为金世宗效力，受到特殊的宠爱信任，官至尚书右丞。但耶律楚材三岁时，他的父亲不幸逝世，这对他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后幸得其母杨氏的良好书礼教育，加上他天资聪敏，自幼勤学苦读，博览群书，待至青年时期，不仅在天文、地理、律历、术数等方面颇有造诣，且深谙儒学，精于佛道、医卜之说。他还多才多艺，善抚琴，好吟咏。对汉文，他尤其精通，用汉文写作文章，文思敏捷，下笔成文，好像事先构思好的那样。

耶律楚材成长在一个动乱的阶段。当时，整个中国正处在元朝大一统之前的诸多政权纷争阶段，当时的中国北部以金国为最强，占据中原，统治着北中国，但到了耶律楚材时候，其鼎盛时期已过去，国势一年不如一年了。南宋王朝虽是偏安于江左，但时刻也不忘记北上收复失地，不时地向北方挑战；立国甘宁陕的西夏，也对称霸中原怀有野心，趁机与南宋结交，在西北方向侵扰。诸强对峙，战事频仍，就是当时中国的局面。此时，金国西北部的附庸部族蒙古族乘机崛起，铁木真自被本部族推举为首领后，经过连年的征战，此时已统一了蒙古族，在金章宗太和六年（1206）成为全蒙古的"汗"（皇帝），尊称成吉思汗，是为元太祖。这个新崛起的蒙古族，雄心勃勃，在北方不断地向金国发起进攻。

耶律楚材十七岁，按照金代的制度，丞相之子经考试合格可以任尚书省的掾史属官，但是他本人希望参加正规的进士科考试。金章宗本人认为旧的制度虽然不可更改，但是考试更可以发现人才，于是敕令他应期当面考试。考试时提问对几个疑难案件的看法，当时在一同参试的十七人中，只有楚材答得最为优秀。于是就征召他为尚书省的佐贰官。以后，他还曾任职开州同知。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事政权确立后，成吉思汗决定在攻金之前，先用兵西复。1205～1209年间，成吉思汗对西夏攻伐三次，大大地削弱了西夏的力量，使之没有出外征战的能力了。紧接着，经过周密部署后，从1211年起，成吉思汗便大举进兵金国。蒙军“所至都邑，皆一鼓而下”、“凡破九十余郡”，直到兵临金国中都燕京城下。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为了逃避蒙军南下的威胁，一面送女儿入蒙，企图以“和亲”争得金国恢复的时间。同时，决定把首都南迁至汴（今河南开封）。耶律楚材的全家也随之南下，而他本人则被任命为左右司员外郎，协助金国右丞相完颜福留守在中都燕京。

成吉思汗十年（1215）五月，围攻燕京年余的蒙军，一举攻克燕，右丞相完颜福自尽殉国，耶律楚材眼看金朝的大势已去，于是在城陷之后，便“将功名之心束之高阁”，空怀经天纬地的才智绝迹于世，弃俗投佛，在万松老人（行秀）门下钻研佛理三年。

成吉思汗平定了燕地，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这时他听说耶律楚材是位难得的人才，而且又是被金国所灭、与金国有世仇的原辽国宗室后裔，便遣人求之，询向治国大计。楚材即应召前往。

耶律楚材身高八尺，长着漂亮的胡子，回答成吉思汗的询问时，更是声音洪亮而流畅。成吉思汗很器重他，说道：“辽、金是世世代代的仇敌，我为你报仇雪恨。”耶律楚材的回答十分得体：“感谢大汗的知遇，但那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曾经委身归附了金朝，既然做了金朝的臣属，怎敢与君主有仇恨呢？”成吉思汗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认为这个人重君臣之情，又恪守信义，是值得信任的，便把他留在身边，以备顾问。耶律楚材学识渊博，很快受到成吉思汗的宠信，成吉思汗亲切地称他“吾图撒合里”，而不叫他的名字；“吾图撒合里”，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胡子很长的人。耶律楚材此时想的是历史上董仲舒辅佐武帝以“文治”，使得汉家气象恢宏。

成吉思汗十四年，蒙古军队在对自己的宗主国金国实施了一连串痛击之后，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于是，除了仅用小股兵勇继续对中原金地施用武力外，集中精锐之师进行了著名的西征，攻打回国。

在西征开始的前一年春天，成吉思汗特地派人到燕京，召请耶律楚材随军西征。出师的那一天，时值夏六月，却忽然狂风骤起，黑云密布，转瞬间大雪纷飞，下了三尺。成吉思汗有些疑虑，不知此为何兆。于是立即把耶律楚材召至帐前，卜问吉凶。耶律楚材毅然断言：“在最炎热的夏日，能看到水神散布的气流，这是克敌制胜的好兆头。”成吉思汗盼的就是这种吉相。于是发十万大军，离开也儿的失河（今额尔齐斯河），奔西南越过天山，向回回国杀去。1222年，蒙古军占领了整个回回国和中亚。

此次西征大胜，成吉思汗认为与耶律楚材的卜吉有关，从此，凡他出战总是必须有耶律楚材随侍身旁，预测吉凶成败，参赞军政大事。耶律楚材也正是利用这种机会，运用自己的文韬武略，阐发自己的真知灼见。庚辰年（1220）冬天，雷声大作，成吉思汗又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对答道：“回回国的君主应死于野外。”后来这些话都应验了。

成吉思汗这个十分勇悍的“一代天骄”，面对西征的赫赫战果，自然是崇武轻文。耶律楚材也深谙其特点，他认为要以文治国，那就应该不失时机地利用每一个的机会，向成吉思汗灌输不可藐视文士作用的道理。西夏人常八斤因善造弓弩而受成吉思汗的赏识，这更增添了这位武夫的骄傲。他不把文臣放在眼里，常常当着耶律楚材的面自夸说：“国家正是用武之际，像耶律楚材这种书生有什么用！”耶律楚材针锋相对地回敬他：“造弓尚且必须用弓匠，取天下的人难道不须用治理天下的匠人吗？”这机智的词锋，巧妙的辩诘，引起了成吉思汗内心的深思和对耶律楚材的赞赏。此后，他便常对其子窝阔台说：“（楚材）这个人是上天赐给我们家族的，以后军国的各种政务应当全部委托他来处理。”

甲申年（1223）年夏，成吉思汗到东印度，驻军铁门关。据传当地人送来一只怪兽。该兽独角，身状很像鹿，却又长着马的尾巴，浑身绿色，嘶鸣声咿唔又似人言。成吉思汗感到奇怪，询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借题发挥说：“这种兽名叫角端，它能讲四方的话，它好生而憎恶杀戮，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征兆。刚才的叫声意思是大汗你应该早点回国了。皇帝是上天的长子，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的子孙，愿大汗禀承上天的旨意，保全天下老百姓。”成吉思汗听罢，立即决定结束此次西征，班师回国。

1224年，成吉思汗仍取道原来的路线回归。在成吉思汗西征之前，曾向西夏征发军队协助西征，西夏拒不出兵，成吉思汗当时无暇与之计较，但发誓以后一定要给予惩罚。当西征归途中，又获悉西夏与金国缔结和约对抗蒙古。成吉思汗立即决定征讨西夏。1226年秋，成吉思汗开始了对西夏的征讨。蒙古军很快就攻下了甘州（张掖）、凉州（武威）、肃州（酒泉），当年冬天，攻克灵州（灵武）。灵州之战，西夏军事力量消耗殆尽。1227年六月，夏主请降，西夏至此灭亡。在攻打灵州这个西夏的军事重镇时，破城之后，蒙军众将士，无不争掠妇女、财物，独有耶律楚材在收集散佚的书籍和大黄等药材。同僚们对他的行为感到疑惑。不久，兵士们因为长期风餐露宿，疫病大作，幸得耶律楚材用大黄配制的药材救命，所活至万人。

整顿局面　订立礼仪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的冬天，耶律楚材终于回到了燕京。在此前蒙古军事帝国忙于西征战事，对那些业已归顺蒙古的州郡没有时间来制定有关制度加以管理，因而派往各州郡的长官，常常是任意杀人，强抢人家妻子女儿作为奴婢，夺取财物，兼并土地。其中，燕京留守石抹咸得卜更加贪婪残暴，所杀示众之人头挂满了市场。面对如此混乱的国情，耶律楚材十分焦急，他从巩固蒙古国长期统治的大计着眼，立即奏请成吉思汗下诏颁律，控制社会的混乱局面。当时颁布的应急禁令有：各州郡如果没有奉到盖有皇帝玉玺的文书，不得擅自向百姓征税；需判死刑的囚犯必须上呈朝廷批准；凡违命者，其罪当死。由于此法得体，且惩治条文分明，使贪婪暴虐之风才稍为收敛，社会秩序初步安定下来。

这一年，成吉思汗病逝。依照蒙古国的惯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获得其

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并且代理国政，是为元睿宗。

在睿宗以皇子身份监国期间，燕京城中社会秩序颇为动荡，有许多凶恶的盗贼天还没黑，动不动就拉着牛车闯人富家，拿走财物，不给就杀人。睿宗对此有所闻，认为只有耶律楚材可以处理好这件事。于是特遣耶律楚材和中使塔察儿前往究治。耶律楚材知道这些人如此猖狂，定有来头。经过细心察询，很快便弄清了这些强徒都是燕京留守的亲属及一些有势力人家的子弟。耶律楚材在掌握大量的证据基础上，毫不手软地将触禁者一一缉拿归案，将其中十六个罪大恶极、民愤最大的首犯，绑赴刑场处以极刑。从此巨盗绝迹，燕京百姓才得以安宁。

1229年，睿宗拖雷已监国两年，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命，帝位应传位太祖三子窝阔台，但此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拖雷将移权。作为一个有智谋的良辅，耶律楚材清醒地意识到，汗位虚悬或错置与国与民都不利。于是，耶律楚材与窝阔台面议，商量尽快召开“库里尔大会”决议汗位。成吉思汗曾有一条特立的法制：凡蒙古大汗，如当新旧交续之时，必须经王族诸将及所属各部酋长，召开公开会议确定之后，方可继登汗位。

当年秋天，成吉思汗本支亲王、亲族齐集克鲁伦河畔议定汗位的承继人。会议开了四十天，仍是议而未决。耶律楚材认为此事不可久拖了，便亲自力谏拖雷：“这是国家大事，应该及早定下来。”拖雷说：“事情还没有达成一致，另选个吉日可以吗?”楚材说：“过了这一天就没有吉利的日子了。”于是才决定下来，订立了登位的礼仪制度。

登基朝仪是耶律楚材精心拟制的。为了确保朝仪的顺利进行，事先耶律楚材选中了察合台亲王，作为带头执行者。楚材对他说：“大王您虽是兄长，但从职位上看仍是臣子，臣子的礼节就应当跪拜。您拜了，就没有人敢不拜了。”察合台认为此话有理，在正式的登基大典上，便率领众皇族和臣僚跪拜于廷下。这样，耶律楚材一举除掉了蒙古国众首领不相统属的旧习，制定了尊卑礼节，严肃了皇帝的威仪，盛典进行得很顺利。事后察合台深有感触，对耶律楚材赞道：“你真是国家的功臣啊!”

对于这些粗犷成性、散漫惯了的蒙古君臣，在日常的执行过程中，有许多人仍难以适应。为此，窝阔台准备惩治那些违制的臣子。耶律楚材上奏说：“陛下刚登帝位不久，对他们以宽恕为宜。”窝阔台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效果很好。这样恩威并举，反复整顿，耶律楚材维护并逐渐健全了朝廷礼制。

倡导文治　慎用武动

窝阔台三年（1231），蒙古国经过休养生息，国力更为强盛，窝阔台决定南征灭金，派遣大将速不台率领大军进围汴京。

次年正月，金国将领崔立发动汴京政变。汴京在蒙古军猛攻下城陷指日可待。这时速不台奏请窝阔台：“金人抗拒时间非常长，我军死伤了很多人，待城破之后宜尽屠戮。”窝阔台点头同意。耶律楚材听到屠城预谋，急忙驰骑赶来人奏说：“我国将士在野外征战数十年，所想到的是土地与人民。得到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又有什么用处呢!”可窝阔台仍然犹豫不决。楚材见以公论尚不足

使窝阔台速下决断，便施了假私济公的伎俩，巧借私欲来打动大汗，又说道："能工巧匠，富实之灾，都聚集在汴梁城中，如果全部杀了，我们将一无所获。"窝阔台才动了心，立刻准其所请，下令只把金国皇族完颜氏杀掉，其余一律赦免。自此以后援为定例，遂废屠城之法。

四月，蒙军入汴京。当时为逃避战乱留居汴京者凡一百四十七万人，皆得保全性命。

六月，蒙军攻取洛阳，金哀宗完颜绪走归蔡州（今河南省汝南）。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蒙、宋合兵攻入蔡州，完颜守绪自尽，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国遂告灭亡。

河南初平，蒙军俘获甚多。军队返回途中，逃走的俘虏十有七八。窝阔台汗下令：凡是收留逃民和供给他们衣食的人，一家都处死，同时乡亲邻里也要受到连坐。由此逃者不敢求舍，沿途不敢留宿，以致饿殍遍野。耶律楚材念及民心向背，又从容进谏："河南既然平定，那里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子民，他们还能走到哪里去呢！何必因为一个俘虏，让数百或几十人一同连坐处死。"窝阔台省悟，遂撤销此禁令。

金亡之后，西部秦、巩等二十条州久未能攻下。耶律楚材献计说："过去我们百姓中的逃犯，可能集中在这些地方，所以他们拼死抵抗，如果准许不杀他们，那么这几个州将会不攻自下的。"窝阔台下诏赦免逃亡旧罪，又宣布废弃杀降之法，由此诸城接连请降。

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参照中原礼数，确定了尊君抑臣的朝仪，并且经常向他宣传"周孔之法"的妙用，同时推荐了一批名儒到政府任职。

窝阔台汗五年四月，蒙军开进金都汴京，金亡在即，中原已在掌握之中，而偏安江南的南宋的消灭也是指日可待的。此时此际，力兴文教，崇奉儒术当是当务之急。耶律楚材在进入汴京后，赶忙遣人入城收求孔子后人，找到了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奏请袭封为"衍圣公"。又付予林田庙地，为之修孔庙，建林苑。又命令招收太常寺因战乱散亡的礼乐生，以及征召著名的儒生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人。叫他们把《九经》译成口头语，讲解给太子听。又带领大臣们的子孙，手捧着经书解释其中意义，使他们领会圣人的学说。他在燕京设立编修所，在平阳设置经籍所。正由于这样，文化事业兴旺发达起来了。

窝阔台汗九年，耶律楚材启奏并具体制定了校试办法，分为经义、词赋、论三科，还规定：儒者被俘为奴者，亦皆释放就试；倘有家主隐匿不放，以死处罪。这年一举得士子四千余人，其中四分之一是被赦免奴隶身份的儒者。

制定税制　解决财源

蒙古贵族崇尚武功，根本没有税制观念。耶律楚材深知如今的蒙古国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是行汉法，大力发展农业，如果保守地强调畜牧是狭隘的，不合国情的落后政策。他对太宗说："陛下您将南上征伐，军需物资应该及时供给，如果能合理地制定中原地区的地税、商税及盐、酒、铁冶和山林河泊等项上缴国家的税收，每年可以得到白银五十万两、帛绢八万匹和粮食四十余万石，足以满足军队的需要，这不远胜于变农为牧吗？"窝阔台经过认真考虑，认为很有道理，便命耶

律楚材全权筹划，实行征税制度。耶律楚材领旨后，立即在燕京等十路设立征收课使，凡是长官和次官都用读书人，如陈时可、赵昉等都是宽厚长者，是从全国选举出来的最拔尖人物，下面的属官全部用原金朝尚书省的旧人。辛卯年（1231）秋天，太宗来到云中，十路使者都呈了粮仓的簿册和黄金、帛绢，陈列在朝廷上，太宗笑着对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的身边，却能使国家费用充足，南方金国的大臣，还有像你这样的人吗?"楚材回答说："在那里的人都比我强，我才能不够，所以留在燕京，为陛下所用。"太宗为表彰他，升他为中书令，事无大小，都先向他通报。

窝阔台汗六年灭金之后，蒙古君臣计议编制中原民户，以便征收赋税。经过多次争议，终于按楚材的想法实行。这样，用老、幼牵制着青、壮，使初步编制的户口比较稳定地存在下来。

往年，蒙古将相大臣每俘获人户，往往留在自己所经营的州郡作为私产。耶律楚材奏请核实全国户口，使之隶属郡县管理；停止以往实行的把土地、人民分给蒙古贵族之法，禁止贵族匿占民户，违令者杀。

窝阔台汗八年秋，大臣忽都虎献上各地户籍。窝阔台一时忘乎所以，竟许诺把部分州县赐给各亲王和功臣。耶律楚材对此陈述了分封之害："分割土地和人民，容易产生彼此间的猜疑与矛盾，不如多赏赐给他的黄金和绢帛。"可是，窝阔台既已许诺，苦于不便食言，楚材便为之想了个变通办法："那就朝廷设置官吏，到各州县去收赋税，每年年终把赋税颁发给诸王功臣，使他们不能擅自科征，这样就行得通了。"窝阔台依计而行，遂确定了财政税收办法及数额。这样，税制初步健全，形成按户、地、丁三者并行科税的制度。

耶律楚材还着手制定了手工业、商业和借贷等项制度，划一度量衡，确立钱钞通行之法，定均输之制。

窝阔台汗八年，有个叫于元的人奏请民间交易使用吏钞（纸币）。耶律楚材说："金章宗时开始推行纸币，与铜钱同时通行，有关部门的官吏用发行纸币谋利，以回收钞票为忌，把纸币叫老钞，直到弄得万贯纸币只能换一张饼的结果。百姓财力贫困，国家经费缺乏，应当引以为戒。现在印造纸币，不要超过一万锭。"太宗都听从了他的话。

公忠体国　极言切谏

耶律楚材历仕成吉思汗、拖雷和窝阔台汗三朝，长达三十余年；三十年之间，他兢兢业业，为元朝的统治呕心沥血。

在成吉思汗时，耶律楚材是出入相随的得力大臣，尊宠至极。窝阔台汗继位，耶律楚材有顾命之义，拥立之功，更与仁宗形同鱼水。耶律楚材竭精殚虑为蒙古帝国运筹决策，定制度，使这个新生的宏大政权得以发展，巩固。他披肝沥胆的忠正气质，使蒙古君臣对他敬重有加。窝阔台汗把耶律材当作自己的偏得，国家的骄傲。早在他即位的第三年，就当面盛赞耶律楚材说："南国之臣，那还有像您这样的人呢?"窝阔台汗八年，即灭金后的第二年，蒙古诸亲王集会，大汗亲自给楚材奉觞赐酒，由衷地说："我之所以推诚置腹地信用你，这是因为先帝太祖的遗命。没有你，就没有中原的今天。我所以能够高枕无忧，都是你努力的结果。"

正由于这样的知遇之情，更由于耶律楚材的气质和胆略，使他能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

窝阔台汗八年，侍臣脱欢奏请：选拔全国未出嫁的女子进宫。窝阔台诏令依奏实行，耶律楚材阻拦拒不实行。窝阔台十分生气，严辞斥责楚材。楚材却乘机进谏说："以前已经挑选了美女二十八名，足够使唤她们的了。现在又要再作选拔，我怕会骚扰了百姓，正想向陛下您报告呢。"窝阔台沉思许久，点头答道："这件事可以免了。"

不久，窝阔台又欲向全国征用母马。中原一带素事农桑，如此不得不弃农就牧，难免使农牧诸业失调。为此，耶律楚材谏阻说："种田养蚕的地方，都不出产母马，现在如果推行这种办法，以后必定成为老百姓的祸害。"窝阔台又准其所奏。

蒙古大汗对于耶律楚材的奏议，言听计从者不乏其例，而不听不从者也比比皆是；遇到后者，他或者冒颜极诤，或者婉言进谏。耶律楚材的口头禅是"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

有一次，两个道士争当道长，彼此都结党营私。其中一个门派勾结宫中宦官和翻译大臣杨惟中，捕捉并虐杀另一门派的道徒。耶律楚材执法严明，不避亲贵，竟把杨惟中也收捕讯问。宦官畏忌在心，反而向窝阔台控告楚材擅捕大臣，又扯出另外一些违制之罪。窝阔台大怒，竟把楚材囚系治罪。但很快窝阔台自悔失策，下令释放楚材。楚材拒绝松绑，并进言道："我在宰相的位置上，掌管着国家大事。陛下开始命令把我捆绑起来，是以为我有罪，那么应当明白地向百官宣布我的罪行无法赦免。现在释放我，是我没有罪，怎么能如此轻易地反复，形同儿戏？"一番话既使朝中众臣大惊失色，又十分佩服。窝阔台竟也开明，当场认错说道："我虽是皇帝，难道就没有错误的举动了吗？"然后，再三用好言抚慰。楚材趁此机会陈奏时务十策："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这十件政事切合时务，窝阔台准令悉数施行。

蒙族饮酒之风甚盛，窝阔台更是嗜酒如命。登位之后竟然天天与大臣酣饮，不醉不休。耶律楚材屡谏不听。后来楚材拿着被酒浸泡腐蚀的酒器铁口启奏说："酒能够腐蚀器物，铁尚且如此，何况五脏！"这真是动之以情，使窝阔台幡然醒悟。他对着近臣夸赞说："你们尊爱君王为国忧虑的心，难道能像吾图撒合里一样吗？"于是一方面赏赐楚材金帛，一方面下令近臣，每日只能进酒三盅。

长此以往，耶律楚材与窝阔台结下了难解之缘、腹心之情。一次，楚材与诸亲王宴饮后醉卧车中。窝阔台亲临平坦的野地看望他，直接来到他的营帐，登车摇撼呼唤。楚材正沉沉熟睡，遇人打扰禁不住心中烦恼，口中竟吐不逊之辞。待他睁开惺松醉眼，见是大汗到来，惊得酒醒七分，翻身而起，叩拜谢罪。窝阔台说："你有酒独自喝醉，不愿与我一同快乐吗？"说完长笑而去。耶律楚材来不及穿戴齐整，便驰马赶赴行宫，窝阔台为他重新置酒，君臣尽欢始散。

窝阔台汗十三年（1241），窝阔台突然染病不起，医生说脉搏已经停止跳动。

皇后六神无主，召问耶律楚材。楚材说："现在用人不当，出卖官职，用钱办案，囚禁的人很多是无辜的。古人说一句好话，能使火星退回原来的地方，我请求赦免天下的囚徒。"皇后想立即去做这些事，楚材却怕窝阔台日后反悔，又说："不用皇帝的命令是不行的。"一会儿窝阔台稍稍苏醒，楚材同皇后一起入奏，请求赦免无辜罪人。窝阔台当即允准，其时他已口不能言，只是连连点头，表示首肯。楚材得时不怠，连夜去宣读赦书。当天夜里，医生测得他脉搏重新跳动。

不久，窝阔台渐渐痊愈。这年冬天十一月四日，性喜田猎的窝阔台又要骑马负弓，驾鹰牵犬，出郊竞射，耶律楚材念及大汗年事渐高，身体尚未复元，更担心游猎无度会妨碍政事，便借演太乙术数极言谏阻。左右侍臣却怂恿说："不骑马射箭，就得不到快乐。"结果窝阔台连续疯狂驰骋五日。死于外地行宫。

当初窝阔台留有遗诏，待他过世之后，以其孙失烈门为嗣。如今窝阔台一死，汗后乃马真氏立召耶律楚询问汗位承继之事。楚材知有先帝遗命，说道："这并不是外姓之臣所应该过问，自有先帝遣诏，望能遵嘱而行。"乃马真氏不从，竟然自己临朝称制。耶律楚材一时难以阻挠，只是徐图良策。

乃马真后崇信奸邪，擅作威福。回鹘巨商奥都剌合蛮用重贿买通乃马真氏，得以专政用事，权倾内外；朝廷大臣畏惧他的权势，或缄口不语，或附炎趋势。

朝政紊乱，所有的政事都被乃马真氏搞乱了。她把国家御宝大印交予奥都剌合蛮，并给他朝廷空白信笺，使他任意填写，擅发政令。耶律楚材抗议说："天下是先皇帝的天下，朝廷自有法律规章，现在想将它们搅乱，我不敢奉行这样的诏令。"经他强争，此事才告中止。

不久，乃马真后降旨："凡奥都剌合蛮的建议，令史倘若不记录下来，斩断其手。"耶律楚材又挺身而出，凛然谏诤说："国家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又有何责？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何惧断手！"乃马真后不悦。楚材辩论不已，竟朗声陈辞："我老臣为太祖、太宗干事三十多年，没有对不起国家的地方，皇后你也不能没有罪名而将我杀死吧。"乃马真后虽然饮恨在心，却因他是先朝有功的臣子，不能不敬畏三分。

耶律楚材终于愤悒成疾，于乃马真后三年（1244）抱恨长逝，卒年五十五岁。

耶律楚材当政之年，一向廉洁奉公，他死后，竟有人诬告说："楚材在相位日久，天下贡赋，半入其家。"正乃马真后命近臣检视其家，仅见十几把琴阮，另有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至此，人们更叹服其廉。由于耶律楚材死时遭到乃马真后和当政奸臣的忌恨，因此他死后没有得到应得的褒扬。一直到了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因耶律楚材有佐运经国立制之功，元代立国规模多由他奠定，追赠他为太师、上柱国，追封广宁王，谥号"文正"。

【刘秉忠】

元朝赞划重臣刘秉忠（1216～1274年），原名刘侃，字仲晦，法名子聪，赐名秉忠，自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

北邢台）人。他17岁时曾担任刑州节度使府的令史，负责管理文书等事。因自感怀才不遇，遂隐居武安山从僧学道。后受燕京（今北京）大庆寿寺高僧海云禅师的邀请，充当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藩王府顾问，并成为他最赏识、最信赖的人。

刘秉忠堪称元朝政体的总设计者：元朝的国号、年号、官制、国策，都是他一手谋划并说服世祖忽必烈采纳实行的；元朝的官吏选拔制度、俸禄制度、朝廷礼仪，都是他奉忽必烈之命，亲自主持制定的；元代的上都开平府和元大都（今日北京城的前身），也是他具体勘察、选址、设计并参与督建而成的。近800年来，人们一直公认他是元朝历史上继名相耶律楚材之后的又一个策划重臣。

刘秉忠一向认为：天子以天下为家，兆民为子，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相需如鱼水。因此，在他给忽必烈出谋划策时，无不首先想到百姓的利益。

早在元定宗贵由汗二年（1247年），忽必烈受封于刑州。当时，刑州地处蒙汉交错杂居之要冲，是蒙古控制漠南汉地的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然而，在此之前，该地的领主却因辖治无方，横征暴敛，致使1.5万户居民不堪重负，纷纷逃亡他乡。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百姓仅剩500多家。为此，刘秉忠建议忽必烈：择良吏而治理，并推荐了张耕、刘肃为邢州安抚正、副使。结果，由于张、刘二人同心协力，革弊布新，斥禁贪暴，全州户口很快增加了10倍之多。

基于刑州的巨大变化，忽必烈在欣喜之余，又虚心征求刘秉忠治理漠南的意见。于是，他又提出了以下六条措施：

一、选择开国功臣子孙，分为京府州郡监守，督责旧官遵行王法，并照其政绩确定升降。为防止百官作威作福，残害百姓，还要专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将现行的赋税徭役减去1/3～1/2。

三、禁止设置私狱，严禁酷刑。对犯有死罪者，奏请朝廷恩准后方可听断。

四、开放学校，尊奉孔子，实行王道。

五、兴礼乐，颁历法，修史书。

六、亲君子，远小人。广开言路，选拔谏臣。

刘秉忠曾随忽必烈多次南征北战，而在每次战役前后，他都不厌其烦地规劝忽必烈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对南北人民一视同仁，不可嗜杀。"忽必烈也总是慨然答应道："愿与卿等共守此言！"于是，命令诸将们痛改烧杀的恶习，并将所俘人员一律释放。

此外，刘秉忠还鼓励耕织，发展生产，提倡节俭，反对奢华；他甚至建议成立孤老院，给衣给粮为养等等。

刘秉忠自从投身漠北，时时随侍忽必烈左右，"凡有关国家大体者，知无不言"，一意"以天下为己任"。他鉴于蒙古贵族一向鄙视汉族儒生，而治国又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现实，告诫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并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渐渐使忽必烈认识到"人才乃治国之本"、"天下治乱系于用人"。后来，忽必烈为延揽治国安邦之士，甚至还"诏求山林隐逸名士，所在官司，具以奏闻"。一经发现，无论身系哪个民族，

都以重礼相待，或委以重任，或安置于“集贤馆”内。

与此同时，刘秉忠更以荐举人才为急务。曾一度官至参知政事的贾居贞、左丞张文谦、平章政事王文统等人，都是他亲自推荐的。中国历法史上的杰出人物王恂、郭守敬等，曾是他的得意门生，也是他推荐给忽必烈而得以施展才智的。天文星历专家田忠良、靳德进等，同样是他将他们推荐给忽必烈的，并将他们安排到能充分发挥其专长的职位上。在至元十年（1273年），他一次举荐清官廉吏就达38人之多。

刘秉忠在推贤使能时，非常注意回避“私亲”之嫌。据史载，他的胞弟刘秉恕也很有才干，而且为人清正，但他却没有推荐他。后来，由于其他人的选拔引荐，刘秉恕才受到忽必烈的重用，并历任礼部尚书、淮西宣慰使和湖州、平阳两路总管，政绩也分外显著。

刘秉忠虽然深受忽必烈的器重，为元朝的奠基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看待个人的官名利禄却清淡如水，一直是僧衣斋食，过着出家人的生活。同僚们实在过意不去，才奏请忽必烈“正其衣冠，崇以显秩”。忽必烈深以为然，即日赐名“刘秉忠”，令其还俗，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还下诏将翰林侍读学士窦默的女儿许给他作夫人，赐以府第，成立家室。

刘秉忠还俗做官后，位极人臣，但他仍“斋居蔬食，终日澹然，不异当昔”。有一次，忽必烈赏赐他千两白金，他却坚持不受，还说：“臣山野鄙人，侥幸遭际，服器悉出尚方，金无所用。”忽必烈坚决让他收下，他才不得不受领。不过，为时不久，他便将这千两白金全都分给了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和故乡父老。

至元五年（1268年），刘秉忠主持修建的元大都竣工后，毅然辞去了中书省的要职，以明志淡泊。数年后，他在市郊的南屏山筑造了一座庐舍，闲居其间，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娱。

刘秉忠早在当和尚时就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功底，不但精通《易》理、天文、历法和数学，还对诗、赋、书法极有研究。著有《藏春集》6卷、《藏春词》1卷、《诗集》22卷、《文集》10卷、《平沙玉尺》4卷、《玉尺新镜》2卷等。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八月，刘秉忠无疾端坐而逝，终年59岁。忽必烈闻耗，惊悼不已。他即命“出内府具棺殓，遣礼部侍郎赵秉温护其丧还葬大都”。随后，又追赠他为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元成宗铁穆耳时，赠官太师，改谥“文正”；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又进封为常山王。

【崔斌】

德材兼备　有勇有谋

崔斌（1301～1357），字仲文，马邑（今山西大同西）人。崔斌相貌堂堂，身材魁梧，善于骑射，武艺高强，其为人机警敏锐，足智多谋，并且酷爱文学，具有多方面的政治才干，是元初杰出的汉人地主阶级政治家。

崔斌对历代兴衰治乱的经验非常熟悉。元世祖忽必烈曾在府第召见崔斌，他对答如流，其主张完全符合元世祖的旨意。世祖命他辅佐大将卜怜吉带，因崔斌才略出众，卜怜吉带对他十分敬重。卜怜吉带军驻扬州本城，命崔斌率骑兵

侦察敌军形势。崔斌发现敌军阵脚已乱，马上派兵进行偷袭，杀获非常多。元世祖即往后，励精图治，大力推行汉法，采用汉族地方阶级的政治制度，大量吸收并重用一些汉人地主阶级中杰出人才，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世祖曾命杰出政治家安童给他举荐汉人中“识治体者”，安童推荐崔斌。晋见时崔斌尽情地陈述自己对时政得失的见解，既精辟又透彻，元世祖对他相当赏识。元世祖视察上都，召崔斌及朝廷近臣陪同。世祖与崔斌肩并肩地骑着马，世祖问崔斌：“治理国家首先应该抓什么?”崔斌回答说：“宰辅如何是最首先要考虑的。”世祖又请崔斌给他推荐理想的宰相人选，他向世祖举荐安童、史天泽。世祖考虑了很多，崔斌对世祖说：“陛下是否认为我为人猥鄙，所举未允公议，因而有所怀疑？今朝廷近臣都在，请允许我征求一下大家意见，再请上裁决。”世祖答应他的请求。崔斌立即对群臣说：“皇上有问安童为相，可否?”众人高呼“万岁”。世祖十分高兴，遂以安童，史天泽为相，并授崔斌左右司郎中之职。正因为崔斌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深得元世祖的信任。“每论事帝前，群言终日不决者，斌以数言决之。进见，必与近臣皆，其所献替，虽近密之臣，有不得与闻者，以此人多忌之。”

崔斌负有才略，且善于权变，具有很强的行政能力。至元四年，出守东京。第二年，大军南征，取道寿张。军中有士卒骚扰百姓，滥杀无辜，强占民房。崔斌了解这一情况，立即快马赶到军营，对军中主将说：“未至敌境，先杀吾民，国有常刑，你也跑不了。”于是，犯法的士卒被关进监狱，处以重罚。由此军纪肃然，再也不敢骚扰百姓了。这年正遇灾荒，朝廷征税仍然和往年一样。崔斌奏请给予减免。又请求朝廷“发币十万缗，以赈民饥”。至元十一年九月，元朝发动伐宋的襄樊战役。当时崔斌为河南行省佥事。当商议进攻鹿门山战斗方案时，崔斌提出：“自岘山西抵万山，北抵汉江，筑城浚堑，以绝饷援，那么襄阳就可以得到了。”这是一个可行性很好的计策。为支援襄樊前线，巩固后方基地，朝廷准备征调曹、濮民丁，屯田南阳。崔斌请求罢免曹、濮屯田，以近地兵多者补之。为筹集军饷，户部给滨、棣、清、沧盐券，崔斌决定招募农民以大米来进行盐米贸易，结果远近商贩争先恐后，络绎不绝，不仅远近农民得到实惠，增加收入，而且军饷很快就筹集到。世祖又下达旨意：“河南籍兵二万，以增加襄樊。”崔斌认为这一举措必将大大加重人民的兵役负担，马上上疏说：“河南户少，而调度繁多，实不堪命，应该减去一半。”世祖觉得崔斌的上奏有理，接受了他的请求。同年，世祖命丞相伯颜总兵南征，改河南行省为河南宣慰司，加崔斌为中奉大夫、充宣慰使。当时南征的襄阳、正阳诸军，皆取道河南，军需供应事务虽然千头万绪，十分繁忙，然而崔斌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一点也不缺失。伯颜大军既渡长江，即令阿里海牙进取湖南，世祖派崔斌作他的副手，并拜崔斌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至元十二年十月，元军围困潭州，守军在守臣李芾率领下顽强抵抗，元军三月攻之不下。崔斌率兵进攻铁坝，阿里海牙中箭负伤，不能指挥。在初战失利的情况下，诸将采纳了崔斌“焚烧敌人角楼，断绝敌人后援，堑城为三周，

如此则城可得”的计谋，猛攻铁坝，“布云梯鼓噪而上”，崔斌身先士卒，“挟盾先登”，一举攻克。阿里海牙持酒慰劳崔斌说：“取此城，这是您的力量啦。”铁坝既克，崔斌又向阿里海牙献计说：“潭人胆破矣。若敛兵不进，许其来降，则土地人民皆我有，自此以南连城数十，可传檄而定。若纵兵急攻，彼无噍类。得一空城何益？”阿里海牙虚心采纳了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策略。第二天，即张帖告示，晓以利害，陈述祸福。潭州城中军民纷纷争出投降。诸将怒其顽抗多时，对出城投降的军民想全部杀戮。崔斌则对诸将讲清“兴师本意”，在于拓地安民，而不能以屠杀为事。诸将又说：“编民当如公说，敌兵必诛之。”崔斌又解释说：“彼各为其主耳，宣旌之，以劝未附者，且杀降不祥。”经过一番仔细的思想教育，诸将才放弃了“欲屠其城”的打算。潭州“一城之人，赖以全活”。由此，湖南诸郡，闻风皆下。世祖得到潭州及湖南胜利的捷报，特别嘉奖崔斌，进他为资善大夫，行中书省左丞。潭州人民对崔斌非常感激，为他建立生祠，以表彰和纪念他为湖南人民所推行的德政。至元十三年，崔斌奉命抚谕广西以后，又回来湖南任职。当时，潭州属邑安化、湘乡、衡山以南，周龙、张唐、张虎等聚众在各地起义。为镇压起义，崔斌驻军南岳，为分化瓦解起义军，他力排众议，断然拒绝同僚们对来降者“议欲尽戮，以惩反侧”的建议，采取只“诛其首恶，胁从者尽释之”的英明政策，湖南的社会治安于是得到改善。

至元十五年，当时已升任中书左丞相的崔斌，随元世祖到察罕脑儿，世祖问崔斌：“江南各省抚治如何？”崔斌乘机借题发挥，阐述他对吏治和用人的主张。回答说：“治安之道在得人，现今用非得人，必须改革。”并历数权奸阿合马结党营私，安插亲信，致使吏治腐败的情况。世祖听后，立即命令御史大夫相威、枢密副使孛罗查问，并汰其冗员，黜其亲党，检核其不法，罢天下转运司，天下为此事感到欢欣鼓舞。不久，尚书留梦炎、谢昌元上奏：“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无一通文墨者。”世祖乃命崔斌为江淮行省左丞，以加强江淮行省的管理。崔斌到任后，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力除积弊，抚慰百姓，政绩卓然。

此外，崔斌还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过多剥削和压迫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他无论是任地方长官，还是为朝廷重臣，都尽力减轻人民的差役和赋税负担，实行比较宽缓的政策。

为官清廉　秉持公正

崔斌不仅有勇有谋，通晓为政之道，而且其秉性刚直不阿，为官清廉，疾恶如仇，敢与横行不法、蠹国渔民的权奸作坚决斗争。他当着元世祖的面，就能够敢于直面指斥奸党，并且有时也敢于指责皇上的过失。元世祖是一位励精图治、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但他在执政之初，为了巩固其统治，极力主张并支持采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加重对人民的盘剥和压榨来聚敛财富，充盈国库，以解决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财政支出。为满足自己嗜财贪利的欲望，元世祖终于找到了这种善于“理财”的所谓“人才”，这就是权奸阿合马。阿合马原是一位不见经传的小官，仅凭着善于玩弄权术，善于迎合元世祖嗜财贪利的心理，

而官运亨通。元统三年（1335），元世祖任命他领中书左丞，兼诸路转运使，独揽国家财赋大权。至元元年（1336）擢他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阿合马掌握了国家行政大权。至元三年，世祖设立制国使司，让阿合马兼领使职。至元七年设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录尚书省事。此时，阿合马大权在握，权倾朝野。他一方面极力采取追征赋税、官办矿冶、实行钱钞和盐法等一系列“理财”措施，对广大人民横征暴敛，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提拔其亲信，安插党羽到机要部门、收揽人心，把众多子侄，亲戚和心腹安插到朝廷各要害部门。就这样在朝廷上形成了一个以阿哈马为首的官商“理财派”集团，他们欺君罔上，专横独断，把持朝纲，并极力破坏和阻挠元世祖推行的汉法，压制、排挤和打击推行汉法派大臣。崔斌是汉族大臣中的重要成员，便挺身而出，与其他汉族大臣一起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崔斌愤怒指出：“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他在元世祖面前，多次指责阿合马的不法行为。

至元十三年，元灭南宋，江南初平，官制草创，由于权臣阿合马纳赂鬻爵，整个官僚机构臃肿，吏治腐败，江南官僚冗滥尤其严重。这些官吏加狼似虎，鱼肉百姓，人民遭受了臣大的压迫和剥削。当时出任镇国上将军、淮西宣慰使的昂吉儿入朝，把这些恶劣情况在元世祖面前痛说了一番，世祖听说这些情况，十分惊讶，即命平章哈伯、崔斌等人进行”减汰”，并发布诏书，告谕江淮军民，使之家喻户晓。哈伯、崔斌等人接受任务后，铁面无私，大刀阔步进行整顿，不仅使江南的吏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对阿合马的势力也是一次沉重打击与削弱。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以阿合马把自己的家人、亲戚全都安排进朝廷要职，便对世祖说：“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遂命阿里等澄汰之。今已显有征验，蔽不以闻，是为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轻，阿合马溺于私爱，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达鲁花赤，佩虎符，此岂量才授任之道?”崔斌又说：“阿合马先自己陈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为平章，而子侄或为行省参政，或为礼部尚书，或为将作院达鲁花赤，一门悉处要津，自背前言，有违公道。”崔斌的弹劾如重型的炮弹，击中了阿合马安插亲信、结党营私的要害，此时元世祖也感到阿合马做得太过分了，遂接受了崔斌的建议，一并罢免了阿合马家人及亲属的官职，这其中包括罢免被阿合马提拔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的长子忽辛。阿合马集团此时如坐冰山，危在旦夕。

奸臣狠毒　忠良遭害

像历史上许多奸臣一样，阿合马为了把持朝纲，谋取私利，他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结党营私，“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阿合马不仅本人身居高官要职，掌握国家财赋和行政大权，他的儿子、侄子虽因崔斌弹劾而一度被罢官，但不久又官复原职，甚至被晋升。真是“一门子弟，并为要官”！阿合马权高势重，气焰十分嚣张。他公然宣称：“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这也就是说他能够独断专行，而他人不得干涉。有许多大臣因畏惧其权势而依附于他。一些文人也纷纷为阿合马歌功颂德，更有许多商贾为谋取官职而向其大量行

贿。一时间，他在朝廷上下的同党竟多达七百一十多人。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贪赃枉法，坏事做绝。天下人一提起阿合马，无不咬牙切齿。

阿合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想尽办法，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动政策，以巩固自己的权势，维护既得利益。凡是反对他的汉族大臣，如史天泽、刘秉忠、许衡、廉希宪等，无不受到他的排挤、打击和陷害，甚至连元世祖忽必烈的亲戚、丞相安童也被他排挤出朝廷，到极北的边境地区达十年之久。因崔斌在元世祖面前屡斥其奸，阿合马对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一定要把他杀死才罢休。至元十五年秋七月，因江淮行省至关重要，崔斌被任为江淮行省左丞，以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管理。崔斌赴任后，阿合马心中有鬼，即以恶人先告状的惯用伎俩，罗织罪名，进行诬告，最后以擅自改任官吏、私铸铜印、擅支粮食等莫须有的罪名，把崔斌和阿里伯逮捕下狱。元世祖看到阿合马诬告崔斌等人的材料，有点怀疑，很想听听崔斌、阿里伯本人的申辩，便对阿合马说："阿里伯等说了什么吗?"阿合马当然不允许他们直接向元世祖申辩，也不会让元世祖直接听取他们的申辩。他在元世祖面前一口咬定，崔斌等人的所谓"犯罪"属实。阿合马一方面以假材料欺骗元世祖，另一方面又把崔斌等人的申辩截留不让它到达元世祖手里。最终元世祖听信了阿合马等人的谗言，下令将崔斌和阿里伯处死。至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元朝历史上一桩震动朝野的大冤案终于铸成，崔斌含冤被杀，终年五十六岁。

【李善长】

事朱元璋　屡献奇谋

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南直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李善长年少时读过一些书，很有智谋，熟习法家学说，谋划都能切中要害。明太祖朱元璋攻占滁州一带时，李善长前去拜见。太祖知道他是当地知名长者，留下他担任幕府书记的职务。一天太祖向其请教道："四面八方都在打仗，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李善长回答说："秦末大乱，汉高祖以一布衣平民起兵，心胸开阔，很有气度，知人善任，不喜欢乱杀人，因此五年成就了帝王的事业。如今元朝纲纪已经败坏，天下土崩瓦解。您出生在濠州，那里距离汉高祖的家乡沛地不远。山山水水呈现出的帝王气象，您是当然秉受了的。只要您效法刘邦的所作所为，天下不难以平定。"朱元璋听后称赞他说得好。从此把他当作心腹，参预机密谋议。李善长筹划粮饷，制定战略非常能干，因此更得朱元璋的信任。朱元璋的威名越来越大，众将前来投靠的，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干，荐举给朱元璋，又代朱元璋表达诚恳的心意，使众将都能安心。有因事互相闹意见发生不合时，他曲折耐心地为他们调解保护。郭子兴由于听信了流言蜚语，有一段时间对朱元璋起了疑心，夺去他的部分兵权，又想把李善长夺过去辅佐他，李善长坚决谢绝不去，因此朱元璋更是十分倚重他。朱元璋屯军和阳，亲自率领军队攻打鸡笼山寨，只留下少数兵士帮助李善长留守和阳，元朝大将探听到那里的情况前往袭击，李善长设下埋伏击败

了元军，朱元璋对他更是刮目相待。

朱元璋收编了元巢湖水军以后，李善长极力劝说他渡江攻占集庆（南京），以做为自己发展的根据地，朱元璋接受了建议先率军攻下采石，大军直逼太平，李善长事先书写好禁止军队掳掠的告示。并让将士们攻打下域池以后，马上张贴在大路两旁，因此朱元璋的军队纪律严明，没有人敢违反禁令。最后来元璋终于攻占集庆，从而确定了自己的基础。在要夺取镇江的时候，朱元璋担心众将不能约束部下，因此假装发怒，对以前有违反军纪的要重处他们，而李善长出面营救才得以赦免。所以占领镇江以后，军纪严明，百姓还不知道有大军到来。以后朱元璋成为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他任用李善长为参议。当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等人都为中书省的属官，然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大都由李善长决定。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后，李善长兼任大都督府司马，后又提升为行省参知政事。

得御制词　褒扬备至

来元璋当上了吴王后，授给李善长右相国的官职。李善长熟悉前朝的典章制度，处理政事很有效率，又习于往来报聘的言辞。朱元璋有要招纳收降的，就命令他撰写劝降的文书。朱元璋凡亲自率领军队征战的时候，都命李善长居守大本营，将领和官吏们都服服帖帖，听从他的领导，百姓安居，他转运调配军队的粮饷从来没有缺乏。李善长曾经请求官卖两淮产盐，制定茶法，都是反复衡量考虑元朝的制度，除去其弊端才制定出来的。后来又制定钱法，开矿冶炼，铸造铜钱，规定鱼税，朱元璋政权的资财日益充足起来，而且百姓的日子也比较好过了。吴元年（1367）九月，朱元璋论平定苏州张士诚的功劳，封李善长为宣国公。职官制度改变以后，左官高于右官，又任命李善长做左相国。朱元璋刚渡江时由于天下大乱，军纪也很难维护，因此许多的时候都用重法。有一天，他对李善长说：“法律中有三条，一人犯法，亲属等连带治罪的条文，是不是过分严重了？”李善长乘机请求除犯有叛逆大罪的人以外，都免除连坐，于是朱元璋命他和中丞刘基等人主持裁定法律条令，颁布朝野。

朱元璋即位做了皇帝，追尊自己的祖父母和父母、册立皇后妃嫔、太子、各王，都是由李善长充当大礼使；设置东宫太子的官员属下，以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其他的职衔仍像原来的一样。不久，他率领掌管礼仪的官员制定帝王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仪礼。李元璋巡幸汴梁的时候，李善长留守在南京，一切朝廷政事听凭他的酌情处理。不久李善长



韩国公李善长像

上奏制定了六部官制，提议规定官员和百姓服丧的装束以及百官朝贺东宫太子的礼仪。奉命监修《元史》，编辑《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确定全国高山大川神祇的封号，分封亲王，功臣封爵行赏等，事无巨细，全都委任李善长和各位儒臣谋划进行。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朱元璋说："李善长虽没有汗马战阵之劳，但是为我效劳很长时间了，军队粮饷的供给方面，功劳很大，应该给他进封大国。"于是授他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为韩国公，每年给俸禄四千石，子子孙孙世袭。赐给铁券，可免去他两次死罪，免去他的儿子一次死罪。当时封为公的人，有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和李善长六个人。而李善长位居第一，朱元璋把他比做汉代名相萧何，赞扬称颂达到了极点。

居功自傲　牵连见杀

李善长由于长期位高权重，因此慢慢也有了骄横之心，加上胸怀狭隘妒忌，对不同意见官员，多行排挤。如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有侵犯李善长的权力，他立即考察他们的过失，上奏免去了他们的官职。后来连老臣中丞刘基也因某一法律条文与他发生争辩且对骂。由于压力，自己感到不安，刘基就请求致仕回乡了。李善长位居人臣之首，富贵至极，也逐渐骄傲起来，朱元璋也开始暗暗讨厌他。洪武四年，李善长因病辞官，朱元璋赐给他临濠的田地若干顷，设置守坟户一百五十家，又给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隔了一年，李善长病愈，朱元璋任命他主持修建临濠的宫殿，迁徙江南一带的富有百姓十四万到濠州种田，让李善长经营管理，为此他留居在濠州几年。七年，提升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做太仆寺丞，存义的儿子李伸、李佑都做了郡牧所官。九年，朱元璋把长女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次子李祺，封李祺做驸马都尉。起初确定婚姻仪礼，公主遵行儿媳的规矩很恭敬，李善长一家光彩荣耀显赫高贵，很使当时满朝文武羡慕。李祺娶公主以后一个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疏说："李善长轻慢皇上宠信，骄傲放纵，陛下生病不能上朝理事将近十几天，也不问候，驸马李祺六天不朝见，把他叫到殿前，他又不知认罪自责，这是很大的罪过。"因此定罪削去李善长每年的俸禄一千八百石。不久任命他和曹国公李文忠掌管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共同议定军国大事，监督圜丘工程。

丞相胡惟庸，起初为宁国县知县，由于李善长的荐引，提升为太常寺少卿，后来成为丞相，因此两人互相很有交往。而李善长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是胡惟庸的侄女婿。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被杀，牵连为胡党而判罪被杀的人非常多，而李善长像以前一样未受什么牵连。御史台缺中丞，朱元璋还让李善长治理御史台的事情。但到了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实际上勾结胡惟庸，朱元璋下诏书免去他们的死罪，安置到崇明。李善长没有为此感谢恩典，朱元璋怀恨在心。又过了五年，李善长的年纪已经七十七岁，年老行为更不检点。他曾经想建自己的住宅，就向信国公汤和借三百名侍卫兵士，汤和秘密报告朱元璋。四月，京师有一批判罪应当迁徙到边地去，李善长的亲信丁斌等人也在其内，李善长几次请求不要迁徙他们。

朱元璋为此大为生气，审问丁斌。丁斌以前在胡惟庸家做事，因此说出李存义等人以前与胡惟庸交往情状。命令逮捕李存义父子审讯，他们供出的案情牵连到李善长，说："胡惟庸准备谋反的时候，派李存义暗地去劝说李善长。善长吃惊地大声呵斥说：'你说什么胡话，要是让人知道你干的事，这是要灭九族的。'后来，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部下杨文裕去游说李善长，说：'事情如果成功的话，当用淮西地方封他为王。'李善长惊骇没有答应，过了很久，胡惟庸再次派李存义前去游说，李善长长叹着气说：'我年纪大了。等我死以后，你们自己去干吧。"'又有人告发李善长说："大将军蓝玉领兵出塞外，到捕鱼儿海，捕获得胡惟庸勾结沙漠的使者，李善长将他藏匿起来不向上报告。"于是御史们不断上章弹劾李善长。而李善长的奴仆卢仲谦等人，也揭发李善长与胡惟庸互赠财物，交结私语。罪名于是成立，说李善长身为功臣元勋、皇亲国戚，知道谋反的阴谋而不告发，怀疑观望，心怀两端，真是大逆不道。正巧这时有人报告星象有异常变化，预示应当改换重臣应灾。于是李善长及其妻子、儿子、兄弟、子侄全家七十多人都被诛杀。而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关遇春、宜春侯黄彬、定南侯陆聚等人，都同时作为胡惟庸同党被杀。而已经死去的追加定罪的人也有许多。朱元璋亲手书写条列他们的罪状，附上供词，作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和公主被迁徙到江浦，过了很长时间死去，李祺的儿子李芳、李茂，因为公主的恩情没有定罪，李芳为留守中卫指挥，李茂为旗手卫镇抚，都免去了世袭。

李善长死去的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说："李善长和陛下同心，出生人死而取得天下，是功臣第一人。生前封为公，儿子娶了公主，亲戚都被任命了官职，作为大臣的名位到了顶点。假如说他自己想要图谋不轨，尚未可知，可是如今说他打算辅佐胡惟庸，那就大错特错了。爱自己的儿子必然超过兄弟的儿子，这是人之常情，安定地享受着万全富贵的人，必定不会怀着侥幸心理去追求那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的宝贵。李善长和胡惟庸是子侄辈之间的亲戚罢了，而他与皇上却是亲子女间的亲属。假使李善长辅佐胡惟庸谋反成功，他也不过是功臣第一人而已，太师国公封为王而已，儿子娶公主，女儿成为妃嫔而已，难道还会比今天更加富贵的吗？况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可以侥幸取得？元朝末年的时候，想要取得天下的人不知有多少，结果没有不粉身碎骨、灭绝宗祀的，能够保全脑袋的有几个人？李善长为什么亲眼见到这种情况，却又在衰老疲倦的年纪去蹈杀身灭宗之祸呢？凡是干这种事的人，一定有深重仇恨，激起变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父子之间或许互相挟制而希求逃脱灾祸。如今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完全是陛下的骨肉至亲，没有丝毫的仇怨，何苦忽然做这种事？如果说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了李善长以应上天的警示，那就更不应该了。我担心天下人知道这件事后，会说功劳大得像李善长那样尚且有这样下场，四方将会因此而瓦解。如今李善长已经死去多年，说也没有益处，我只是希望陛下将来以此作为鉴戒罢了"。朱

元璋得到这件奏疏，竟然没有怪罪他。

【于谦】

为官治政　克己奉公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祖先原是河南人，从金、元以来世代为朝廷大官。高祖于夔当过元朝的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于九思最后当了杭州路总管并死于杭州；祖父于文在明朝任兵部主事。只有其父于彦昭，职位低微，几近隐逸。

于谦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此时是明朝开国之初，政治上比较稳定。于谦小时聪慧机灵，为乡里称道。七岁那年，一位僧人兰古春遇到他，主动地为他相面，说道："此儿长得出奇，将来一定是个救时宰相。"加上他平时就为乡里人称道，因而，人们都戏称他为"救时宰相"。于谦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有位按察佥事视学很严厉，大家都讨厌他，一次众学子正和他吵闹之际，佥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学宫边的池塘里。在场的诸生很害怕，一个个都跑了，于谦上前把他拽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佥事老眼昏花，脑子也糊涂，他感到有失师道尊严，可又无处发泄，因此就想归罪于谦，以出心中的闷气。于谦一看这位主事抓住他不放，非诬他不可，就平心静气地对他说："跟先生吵闹的人早就走开了，没有和先生吵闹的人才敢留下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现在先生不怪罪于吵闹的人是可以的，但反过来要加罪于搭救先生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按察佥事一听这些话，就不好意思再往下追究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于谦因此更加出名了。

于谦在二十三岁时考中了进士。当时考取进士有严格限制，大多数人考到老也没能考上，二十三岁能考中属于科举中试的佼佼者。尤其重要的是于谦从小的时候起，就通过读书学习建立了他的志向：要做个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人物。

于谦踏上仕途之初，先是做多年地方官。在地方官任上他锐意兴革，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政绩斐然，一时为人称道。宣德时期，他升为江西道监察御史。于谦善谈吐，声音洪亮。每次进奏时，宣宗都倾耳静听。那时顾佐为都御史，为人威严，对属下要求极为严格。他上任以后罢免二十多名不称职的御史，但独独对于谦却另眼看待，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宣宗时发生一起藩王叛乱的事件。叛乱的头目是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汉王朱高煦，此人狡诈多变，早就想取代他的哥哥仁宗为皇帝。原先他封在云南，但嫌远在万里不去；改封山东青州，还是托故不想去，后来犯罪，强行让他居于山东乐安。他在地方上继续与朝廷对立，宣德元年（1433）八月终于起兵造反。宣宗亲自率兵前往镇压，于谦随驾前往。浩浩荡荡的大军进至山东，包围了乐安城，汉王朱高煦计无所施，出城降。宣宗当场命于谦宣布朱高煦所犯的罪行。于谦张口而成，滔滔不绝地数说了这位藩王犯下了各种不可饶恕的大罪，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无可辩驳。嚣张一时的朱高煦听了之后，俯首服罪，浑身发抖，只得说："臣罪万死，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事后赏赐的钞币与重臣们一样。

于谦在出使巡查江西时，办理刑狱，

为数百人平反了冤案。对为害市场正常购销的官商欺行霸市行为，于谦都予以严厉打击。在官河上，有些人夹带私盐贩卖，从中牟取暴利。于谦带领一帮人一一核查，坚决取缔。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权贵，决不回避和屈服，敢于和他们面对面斗争。时间长了，于谦越发得到朝廷信任。后来议论增补兵部右侍郎，负责管理各镇粮税兼训练士卒，抚安百姓，宣宗亲自写上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吏部根据皇帝的提名，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这年，他仅三十三岁。皇帝的信任使于谦感激涕零，他更加兢兢业业为朝廷出力，他更加勤奋努力，日夜想把地方治好。在任上，他带着少许的人马，走遍管辖的地方，访问当地的父老，了解当时需要改革的各项事情，他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一一上报给朝廷。一年之中，要报告几次，小有水旱，就及时上报。在这一任上近二十年，他前后兴革的业绩有以下几方面：

一、实行籴米制度。这是根据年成的丰歉而制定的。丰年多出官钱，买老百姓的粮食储存起来；歉年再把仓里存的粮食减价卖给老百姓，这样公私都得到处，尤其是遇到了水旱灾情，老百姓不用由于没粮食吃而流离失所。

二、召集流民垦种。当时经常有陕西和山东的饥民从东西两面向河南流动，多至二十余万。于谦下令，饥民所到之处，地方负责给田土，配给农具和种子，按照田土收成的多寡责令纳税。这项措施既使饥民得以安生，又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意义颇大。

三、维修黄河。河南靠近黄河之地，时常遭受河决之害。于谦提出厚筑堤坝，加强防讯。并在堤坝上多植榆树和柳树，加固堤坝；五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和小卒，让他们时时负责修补。

四、官道种树。以树荫来遮蔽走路的人，免去风吹日晒；官道上每隔一定距离凿井以井水来解决走路的人口渴的艰难。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

于谦对治理地方政事、民事非常精通，他能够时时发现问题，提出办法，而且重点放在整顿纪纲上。那时，朝政大权掌握在老成持重的“三杨”手里。他们都很器重于谦，凡有所奏请，朝至夕下，一一报可。这使于谦得遂其志，威名远播。一次他带领少数人马从太原过太行山，半路遇上强盗，他厉声呵斥，把那些人都吓跑了，强盗们说：“不知是于大人至此！”

于谦洁身自好。他每次入京议事，两手空空，不带任何礼物。有人提醒他说：“即使不带金钱，也应拿些土特产品，以便交通上下。”于谦举起两袖，笑着说：“吾惟有两袖清风而已。”

英宗正统末年，“三杨”相继老死，皇帝年幼无知，宦官王振专权，气焰嚣张，于谦由是遇到了麻烦。由于他不肯向王太监卑躬屈节，引起王振的愤恨，早想寻找时机给于谦一个下马威。恰好这时于谦入朝为兵部侍郎时，推荐参政孙原贞、王来代替自己的职务，通政使李锡因受王振唆使，无中生有的弹劾他，说他因久不升迁心生不满，擅自举人自代，无人臣之礼，应下法司论斩。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于谦被关押了三个月。这事引起朝臣公愤，河南士民也纷纷请愿，王振最后也觉得这个案子实在站不住脚，也就借口说：“我曾看见一位御

史，名字也叫于谦，专横得很，想要治他一下，现在的于谦不是那一个。”于谦于是获释，但由原来的兵部右侍郎、食二品俸，降为四品的大理寺少卿。于谦刚一出狱，山西、河南吏民上千人，跑到皇宫门外跪地上书，要求留任于谦，连周王、晋王也为他说好话。于是于谦以“少卿”的名义，再次为二地巡抚。至正统十三年，于谦才又以兵部左侍郎的头衔，被召回朝廷。当时正是明王朝多事之秋，于谦与兵部尚书配合，力挽狂澜，为保持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安定，不屈不挠地努力着。但由于大宦官王振的专权擅政，从中阻挠，于谦没办法尽展其雄才。

临危奉命　死保京师

于谦调任兵部左侍郎一年以后，蒙古瓦剌部大举进犯。蒙古的瓦剌部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这时的蒙古瓦剌部统治着西起阿尔泰山，东到辽河，北至贝加尔湖，南抵与明朝接壤的广大地区。野心勃勃的蒙古汗王一心想再建一个大元，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二千人，诈称三千人到明王朝贡马，宦官王振嫌他以少冒多（因要按人头赏赐）减其马价，也先本来就要入犯，这便有了借口。七月十一日，也先入侵明境，主力攻大同，明兵战守失利，不久塞外城堡皆失，最大的要塞大同频频告急。消息传到京城，王振主张皇上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力主不可，但没有被采纳。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十六日出发。

英宗亲征，于谦奉命留下以侍郎理部事。出征人马在路上，学士曹鼐与都御史等商议要杀掉宦官王振，停止亲征，但没有成功。十九日至居庸关，兵部尚书请圣驾回銮，王振不听，将其罚跪，并下令大军前进。二十三日至宣府，诸臣丈请由，王振大怒，命一批大臣跪于帐外的草中。人人危惧，不敢再提阻止进兵的话。八月初一至大同，王振还想北行，恰巧遇上前线败报传来，加上宦官郭敬将多次战败而谎报取胜的实情报告，王振听后知道了实情，才有了还意。初三，留下总兵官刘安镇大同，其余的人返回。王振的老家在山西蔚州，他原想从紫荆关经蔚州，让皇帝到他老家看看，后他又怕大军所过千军万马人吃马嚼骚扰了乡里，更怕正值夏季，践踏了那里的田禾，遂又命大军转而向东行。这一转耽误了几天时间。也先得知明帝亲征，迅速率军追来。得知也先追兵在后，明军忙派后队阻止，但连战连败，而王振又封锁军情。十四日到土木堡，尚未过年，离怀来只有二十里，本可直驱入城，但因王振的辎重车千余辆未至，他命停行等待。兵部尚书再次请求入关，遭王振一阵痛骂，于是决定驻土木堡。很快也先大兵攻来，四面合围。此地无水泉，掘井二丈不见水，其南十五里有河，也先早派兵占据了。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经过谈判，也先趁明军移动就水，大营阵脚混乱时，用万余骑兵发起冲锋。明军很快队伍大乱，敌骑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杀！”明朝军士赤身裸体践踏而死者漫山遍野，宦官及卫士被箭射中如刺猬一般，英宗与亲军突围不成，只得下马坐地被俘。皇帝当了俘虏，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土木之变”。这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公、侯、尚书、侍郎、内阁学士等以下共百余人遭难。罪魁祸首王振，也在这次事变中被乱兵所杀。

八月十七日，明军大败、皇帝被俘

的消息传到明廷，百官集于阙下，抱头痛哭。皇太子只有二岁，不能监国，命英宗之弟成王摄政。当时王振已死，人们仍恨不能吃他的肉，九卿科道官员纷纷要抄他的家，灭他的族。成王登临午门，还没有听完章奏，王振爪牙锦衣卫指挥马顺假传王振旨意，叱令众退。有一给事中擒其首，愤怒斥责他"过去为虎作伥，今日至此，尚不知惧！"众人一起争着来撕打他，当场把他打死，接着又打死两个小宦官，都是王振爪牙。然后将三人的尸首陈列到东安门，由此引起群众喧哗，朝班一片混乱。成王在此时不知如何是好，吓得只想早早还宫。当此关键时刻，于谦挺身而出，扯着成王的衣襟安慰他说："殿下不要动。"同时启发他下令：打死马顺及二宦官者是因为众人激于义愤，无罪；同时约众官请示皇太后族诛王振并籍没马顺等家。成王按照于谦说的做了，果然众人皆大欢喜，朝廷上的混乱迅速平静下来。在阻止成王回宫的撕扯中于谦袍袖都撕裂开了。事后走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是位忠厚老臣，他拉着于谦的手深情地说："朝廷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才！今天如果不是有你在，虽有上百个王直，无能为力！"不久，朝廷以太后之命命于谦任为兵部尚书。于谦就要完全承担起保卫北京的战斗来了。

面对着英宗被俘，也先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成王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有贞大声说："察看星象、历数，天命已定，只有南迁可以解难。"礼部尚书胡荧反对说："永乐帝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也。"于谦当时还是兵部侍郎，厉声说："宋朝南渡的教训，前车可鉴，请速召勤王兵马，誓死以守。"于谦的意见得到绝大多数文武百官赞同，坚决抗敌的主张遂定。

九月初六，成王即帝位，这就是景帝。作为兵部尚书的于谦，知道京师疲卒劣马不满十万，军资器械，十不存一。他晋见皇帝，流着眼泪提出，敌骑将长驱深入，而近来各营精锐，尽遣随征。当今之计，应急速派官召募官舍余丁义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让这些军队全部隶于神机等营，操练听用；令工部备足物料，内外局厂日夜赶制攻战器具；征南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陆畿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急赴京守备。

于谦一方面征集兵马、打造兵器，一方面加紧部署保卫北京的战备工作。他以都督孙镗等领兵出城守护京师九门，列营操练，以振军威。再选将分别出巡，不使敌人有机可乘。又把城外居民迁于城内，随地安插，以免被敌人掠去。当打算焚通州坝上仓粮，以绝寇资时，于谦听了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改为令在官者取之作为月粮，一举两得，诸厂所有饲草，亦听军队取之，余则焚之，毋以饱虏马。

"土木之变"，也先俘获明英宗，大喜过望，认为这是一块大肥肉，利用它可以要挟明朝。也先带英宗到宣府，传令开门，守城官兵坚决不纳，也先知道不可动，才退去。又挟持到大同，守将郭登仍不纳。也先说，给财货即放归英宗。但当大同拿去黄金二万并其他货物后，也先却食言。也先把英宗带到塞外。九月初一，又借口送回英宗，索取黄金百两、白银二百两、彩帛二百匹。于谦为打破也先的要挟，从国家全局着想，便拥护成王即帝位，而遥尊英宗为太上

皇。十月，也先急不可耐，以送回英宗为名，大举人寇。兵至大同，郭登不纳，派人对他说："我们国家已有皇帝了。"也先无计可施，又知有防，不敢强攻。郭登用蜡书把情况报明廷，京师即刻戒严。于谦奉命提督诸营，将士皆受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先斩后奏。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精骑，京师守城指挥石亨认为不应出城迎敌，尽闭九门。于谦反对说："敌人如此嚣张，我们示弱，是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使他们更加嚣张！"于是把现有的二十二万兵列阵九门外，自己身先士卒，身披甲胄，与石亨等列阵于德胜门，其余将领，各列阵于安定、东直、朝阳、西直、阜城、正阳、崇文，宣武等门都受节制。各城门全部关闭，以置之死地坚定士卒的决心。下令：临阵，将领不顾军先后退的，斩其将领；军不顾将领先退的，后队斩前队。将士这时都知道这是置诸死地而后生的策略，所以人人誓死保卫北京。

也先领兵，自大同至阳和，进陷白羊口，两天之内再陷紫荆关。十月十一日也先兵迫都城，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当天，明军在彰义门北打败了入侵之敌。也先仍想利用英宗，强使明朝议和、并指名要起决定作用的于谦等大臣出面。于谦的回答是："今日只知道有军旅，不知道其他！"也先见迫和不成，便加紧在京城周围抢掠。在攻城上，二十二万明军严阵以待，也先不敢轻举妄动。在德胜门，也先用骑试探，于谦设伏诱敌，待敌人万骑来攻，伏兵齐发，打得敌人大败；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俘敌前锋数人，但敌人进一步包围，他险些不支，得到给事中程信从西城上发箭炮相助，石亨也分兵来战，局势才为之一变，敌人后退；至彰义门，副总兵武兴奋起还击，但武兴也中流矢死；至土城，居民登到房顶上呼号，用砖瓦块争相击敌，声动天地，加上都督毛福寿、高礼率援兵至，敌人败走。原先，也先以为北京城唾手可得，至此他的幻想才化为泡影。相持五天，迫和不成，攻战不利，蒙军另一路人马攻居庸关也战败。也先只得带着英宗狼狈撤军。于谦探知英宗已移远处，令石亨夜里举火，发大炮攻敌营，击毙万余骑。敌人自良乡而西，所过州县，大肆焚掠。于谦又命杨洪部以所部二万兵追击残余的敌人。至此京城危险形势得以缓解，于谦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赞扬他的功劳，他却谦虚地说："四郊埋了那么多的死者，仅得不结城下之盟，有什么功可言。"

皇位之争　殃及忠臣

于谦为巩固已有成果，进一步御敌于国门之外，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保卫北京之战以后，又做了许多工作。如坚持派得力战将罗通、杨洪等驻守居庸、宣府等要害之地。在大同、宣府、山西及昌平、临清等镇，都做了重新军事部署，景泰元年三月，因为畿辅诸州县兵力单弱，奏遣都指挥陈旺、石端、王信等分屯涿鹿、真定、保定、易州等地方，全部由杨俊统帅；这些地方后来都成了拱卫京师的重镇。明成祖以来的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即所谓京师三大营，此时此地就形势要求已不能适应，于谦把他们改成团营，从其中选马步骁悍者十五万，分为十营，每营各以都督率领。五千人为一小营，以都指挥率领，团操以备警急。原来在近畿安置的许多"降虏"，有些与也先里应外合，

于谦建议朝廷派他们往西南地区，这样一来就消除了隐患。

景泰元年（1450）正月，也先因英宗捞不到好处，加上蒙古族内部这时发生内讧，想与明朝缓和关系，因此来信要求明廷派大臣迎接英宗还朝；廷议提出派遣使臣北上，景帝说必须找个认识太上皇的人去。群臣知道景帝对此事并不积极，这件事就拖下来了。大同参将许贵急着与也先议和，于谦驳斥说："不是我们不和，而是敌寇无诚意，何况也先是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可和。贵为介胄之臣，而急于和成显示怯懦，依法当诛。"于谦是景帝最为器重的，他这么一说，边将人人坚持战守。七月，也先又派五人代表团到京师请和，吏部尚书王直等提出可与也先议和，把太上皇迎归回来，以免再起战端。景帝很不愿听，说："我并非贪大位，是你们树立的，现在又这样议论，到底为什么？"无人能答对。于谦这时从容不迫地说："大位已定，谁敢胡说！对来使的求和，作为缓兵之计，战备不能放松。"景帝稍释虑说："听你的，听你的。"经过一番争议，明廷才以礼部右侍郎李实为正使，大理寺少卿罗绮为副使，与来使同往。李实等走后，蒙古瓦剌部的脱脱不花可汗也派人来请和，明朝又遣右都御史杨善等前往。一年以后，明英宗随杨善由也先营地回到了北京，安置于南宫居住。就迎接英宗回归这件事，于谦实际上是起了很大作用。

英宗回来以后，明朝一时出现了两个皇帝，朝廷上不能不产生混乱。礼部尚书等提出，景泰二年正月初一让百官朝太上皇，景帝不许。这种尴尬的局面，使于谦受到强大压力。他拥戴景帝，但景帝废英宗之子，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这使于谦感到突然。景帝之子立为皇太子一年半便死去，此后再也无子。于谦提出立英宗之子为皇太子，此人就是后来的宪宗，但是景帝不愿。景帝认为自己春秋鼎盛，今后不愁无子，一拖再拖。石亨等人认为与其立英宗之子，不如直接请太上皇复位，可以从中邀取功赏。石亨原是于谦从狱中将其放出，并在以后提升其为大将。但由于在推荐于谦儿子任官等问题上受了于谦斥责，从此怀恨在心，至此，一场以石亨为首拥立英宗复辟的政变便在暗中开始行动了。

景泰八年刚到正月，景帝便一病不起，这一天他召石亨到病榻前，嘱其代行郊祀事。石亨见皇帝病情严重，预料将有事情发生，出来后立即与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商议迎接英宗复辟。他们一起去找大常卿许彬。许彬以年老推辞，但建议与徐有贞商量。徐有贞由于主张南迁被于谦指斥后声誉扫地，对于谦一直心怀不满。正月十四日，这些人在徐有贞家聚会。徐有贞煽动说："太上皇帝出征，为的是国家。何况天下尚未离心，现在的皇帝置之不理，纷纷另求他人继大位，实在令人莫解。如公等所说，南宫亦知道了吗？"石亨等说："一天前已经秘密报告了。"又说："必须得到来自太上皇方面的赞同。"十六日晚这班人再次聚会，徐有贞当场提出："事在今夜，不可失。"正在此时，得报边境有警，徐有贞说："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派兵进入皇宫。"石亨、张軏表示赞同。尽管如此，徐有贞还是心怀恐惧，与家人告别说："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为鬼。"

接着，与石亨等约会赞同政变的数员文武大官并太监曹吉祥等，收各门钥匙。天亮之前，打开长安门，放进一千多士兵。宫内卫士当时看到士兵进来不知所措，后听石亨是加强宫中守卫，也就没留意，进去之后，徐有贞又把门锁上，隔绝宫内外的往来，以免遭到内外夹攻。此时，石亨等也还是怕政变破产。徐有贞对他壮胆说，“事已至此，切勿退缩。”他领这帮人去南宫，但幽禁英宗的南宫的钥匙在景帝处，碰了个闭门羹，叩之又不应。这时又听远远传来开门声，情势更加紧张。徐有贞感到事机紧迫不宜迟，成败在此一举，于是下令把大木悬起来，用数十人举着撞门，又命令勇士逾墙而入，里外联合，终于把宫门打开。石亨等人见英宗，徐有贞仅说了一句“请陛下登位”。即亲自动手连推带拉，让英宗登辇就走。月光之下，英宗问了他们的姓名。进皇宫后，大家把英宗推上了奉天殿。这班人又把御座从殿隅推到中央，并命马上站班朝贺。英宗再次成为皇帝。

十七日清晨，百官照常入宫等侯皇帝早朝，一进去，就听到南城及殿上的呼号声。众官正在疑惑，这时徐有贞出来向他们宣布：“太上皇复辟了！”并命他们马上站班朝贺，百官不胜惊骇，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就班祝贺。这时病中的景帝听到钟鼓声，非常惊讶，问左右：“于谦在哪儿？”当知道英宗已复位，连声说：“好，好。”

第二天，复辟的人首先下令逮捕于谦以及拥护景帝的重要臣僚。政变的主谋徐有贞，从副都御史一跃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值内阁，主管机务，后又晋兵部尚书。徐有贞得势以后，第一步就打算杀死于谦。原先议立英宗太子时，大学士王文曾主张迎立襄王世子。这时，徐有贞就指使言官弹劾王文立藩的意见，并且捎带诬蔑于谦。经过一番核查，没有什么证据。徐有贞仍不放过说：“虽无显迹，也有那种意思。”王文忿怒非常，据理辩论。于谦冷笑说：“辩什么？无用。他们是不管事实有无，必定让我死！”但英宗对处死于谦一直犹疑，他对复辟的众臣说：“于谦过去有过功劳。”徐有贞上前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今日的这场政变怎能够说是师出有名，”英宗下定决心，把于谦及王文等皆斩于东市，妻子戍边。

于谦拥立景帝，根据当时形势定国安民，抵御了异族入侵，这不但没有错，而且是非常正确的，是有功的。他为官清廉，死后仅留下书籍而已。于谦成为英宗复辟这场政变的牺牲品，这是一场冤案。事后西北有警，有人就说：“如果于谦在，不至于此。宪宗时，为于谦恢复了名誉。万历时，谥忠肃。

【李贞】

李贞（1318～1379年），山东盱眙人，明朝开国驸马、陇西王。他那富不忘贫、心系百姓、教子有方的动人事迹，多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着。

心系百姓

李贞原是一位普通农民，20岁时与朱元璋的姐姐结了婚，并生下一子“保儿”。6年后，由于旱蝗迭至，颗粒无收，不得已而去求助于从盱眙迁往濠州（今安徽凤阳）的岳父一家，不料濠州天灾比盱眙还重，其岳父、岳母和三位妻兄均在饥寒交迫中染病身亡，小弟弟

朱元璋初为皇觉寺僧人收留，后来又离乡出走，一去杳然无音。朱氏闻讯悲痛欲绝，终因劳苦忧伤过度而去世。临终前，嘱托丈夫两件事：一是拉扯好儿子，二是找到小弟弟的下落。

从此，李贞带着儿子离乡背井去讨饭，同时多方打听朱元璋的下落。一路上，兵荒马乱，难民成群，他见哀鸿遍野，不禁又联想起去世的亲人。为使人世间尽量减少一些悲剧，他尽管自己多次饥寒难忍，而一旦讨得食物、衣物，也总是分给一些更可怜的人。有时候，他们路过农民的庄稼地，见稀稀拉拉的玉米秆上有些可吃的，还总是劝儿子再忍耐一下，而不做损害老百姓的事。

两年后，李贞带着儿子经过千难万险，找到了驻扎在濠州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一打听，才知道朱元璋果然参加了郭子兴的队伍，并被郭子兴委任为镇抚，正守卫滁州。他欣喜万分，遂向200多里外的滁州奔赴。临行前，那支义军的头领还送给他一些散金碎银做盘缠。行至中途他们又遇到了一些贫病交加、濒临死亡的人。李贞又多次解囊相助，以至于未到滁州而囊中空空，不得不再次依赖乞讨。

富不忘贫

不久，李贞父子找到了朱元璋。双方见面，悲喜交集，自有一番说不尽的话。从此，朱元璋将对亡姐的思念之情，全都倾注在保儿身上，并让保儿改为朱姓，取名“文忠”，决心把他培育成一位文武全才。

朱文忠生性聪颖，加之勤学苦练，不出三年便长于写诗撰文，精于布阵斗兵，出落得一表人才。朱元璋十分喜欢他，经常在众人面前对他大加赞扬。而李贞却不时地将儿子叫到跟前，训导他如何为人处事，尤其是千万不要忘记贫贱之时。

有一次，朱元璋的贤内助马秀英带着两个使女过府来为李贞父子添置衣物，发现李贞仍用着讨饭时的破被子，大为不解。李贞则十分动情地说：“这是亡妻临终前亲手拆洗过的被子。虽然破旧，但它伴随我度过两年乞讨的日子。看见它，我就像看见妻子，就忘不掉已往！”马夫人十分感动，遂拿去亲自将被子拆洗干净，交给李贞。李贞再也舍不得盖它，竟将它放进箱子里珍藏起来。

朱文忠19岁时开始带兵打仗。在一次援助大将常遇春攻占池州时，表现得十分出色，致使元军苍惶出逃，青阳、石埭、太平等地全部收复。为此，很多人都对他刮目相看，加上他又是朱元璋的外甥，言过其实的奉承也愈来愈烈。涉世不深的朱文忠面对如此场面，不禁飘飘然忘乎所以。

李贞得知后极为不安。但他没有当面训斥儿子，而是打开箱子，取出旧被，重新盖了起来，朱文忠看到后心中一怔，随之理解了父亲的用意，主动向父亲承认了错误，并表示再也不敢忘本和自傲。李贞点点头，露出了笑容，遂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富贵而忘贫贱，君子不为也。”

为牢记父亲“富不忘贫”的教诲，朱文忠又基于读书人都有个字号的习惯，特地给自己起字为“思本”，意思是永不忘本。

教子爱民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升任义军大元帅，并很快夺取了应天。从此，他以应天为根据地，向江苏南部及浙江用兵。

朱文忠由于战功赫赫，也便任命为左副都指挥使，兼领元帅府事，守严州。朱元璋基于李贞谨慎持重，让他在严州帮助儿子料理军政大事。

在朱文忠每次出兵打仗之前，李贞都谆谆告诫他要时刻关心百姓的疾苦，不要践踏百姓的庄稼，不要伤害百姓的牛羊，不做任何有损于百姓的事。于是，朱文忠特地三令五申，严格要求所辖官兵绝不与民争利。他还明确规定：凡是私自进入民宅或私取民物的，一律处斩。有一次，一个士兵未经批准而私自用了百姓的一口锅去做饭，朱文忠得知后，当即将那个违令的士兵处以军法。随后，他又将此作为反面教材，通报全军。从此，他的军队更是秋毫无犯，深受百姓的欢迎和拥戴。

在个人生活上，李贞也常常要求儿子不忘当年的战乱之苦，处处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朱文忠也铭记在心，并时时严格要求自己。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文忠率大军攻下余杭后进逼杭州，杭州守将潘原明见大势已去，决定投降。在大军入驻杭州的第一天，潘原明组织女乐欢迎朱文忠。而朱文忠则令免去这一仪式，还将部队驻扎在城外的丽谯，保证了“城中帖然”。

朱元璋于1368年正月称帝。二月册封李贞为驸马都尉。

李贞死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冬，享年61岁。当时，朱元璋强忍悲痛令人将其葬于南京大平门外。紫金山麓，还册封他为陇西王，谥恭献。

【姚广孝】

姚广孝（1334～1418年），幼名天禧，字斯道，法名道衍，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是明朝初年“超凡脱俗”、“四大皆空”的和尚，也是积极用世、“竭精殚智”的谋臣。是他，最先识破建文帝削藩的用心，密劝燕王朱棣起兵夺取全国政权；是他，在燕王畏惧“天意”而发生动摇时，及时设法坚定了燕王的决心和信心，从而发动了“靖难”之役；是他，为燕王出谋划策、决胜千里，一举攻下石头城，辅其登上九五之尊，成了历史上颇负盛名的明成祖；也是他，为了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说服明成祖迁都北京。所以，《明史》中说：“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也正因此，明成祖登极后的第二年便“复其姓，赐名广孝”，官拜资善大夫，加封太子太师，甚至同他说话时也只“称少师而不呼其名，以示尊宠”。

姚广孝成为达官贵人后，仍过着往昔的僧人生活：住的是寺院，吃的是素食；除冠带而朝外，平时依旧穿着袈裟，手持念珠，口中不离“阿弥陀佛”。他还专此写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金陵战罢燕都定，仍是癯然老衲师。”

明成祖不忍心让这位“第一功臣”如此清苦，多次劝他蓄发还俗，尽享荣华富贵。还特地赐他一处豪华府第和两位漂亮的宫女，但是，他却一一谢绝了。

明成祖也曾多次赏赐姚广孝一些衣帛之类。姚广孝也总是推辞再三；实在不好再推辞，也只好收下。但他从不久存，更不享用，而是很快就将它们分赠给了那些贫苦人。

据说，姚广孝的父母皆死于贫病。之后，穷得连块墓地也没有。史书上也就此写道：“垅墓既无，祖业何在？岁

时祭扫，曾不可得。”姚广孝功成名就后，并没有为他们购置新的墓地，更没有为他们改葬，而是将他们的灵位放进了寺院里，每日为他们焚香、磕头、祷告。

即使在姚广孝71岁那年作为钦差大臣回原籍赈灾时，同样保持着自己一贯的作风。当时，许多人都期盼着一睹他那衣锦还乡的风采，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一不骑马，二不坐轿，三不前呼后拥，四不鸣锣开道，偏偏穿了件旧袈裟，不声不响地回到了苏州故里。

姚广孝抵达苏州赈灾时，苏、松、嘉、湖、杭五府刚刚遭受了一场大水灾。据《吴江县志》载：“永乐二年五月大雨、田禾尽没……男妇壮者，相率以糠杂菱、芡、藻、荇食之。老幼入城行乞，不能得，多投于河。”

姚广孝见此惨景，非常痛心。他不顾自己已是70多岁高龄，一天天冒着炎炎夏日，不停地奔走于灾区各地。他督促各地官府开仓发米，帮百姓渡过难关；同时，还要同地方官员核计蠲免赋税。对那些清正廉明，如实报灾并认真赈济的地方官，他都给予大力表彰和坚决支持；而对一些贪官污吏，则给予严厉惩处。

此间，姚广孝曾下令将数以万计的粮食分赈给了乡民，而自己却常常只吃随身带着的干粮。有一天，他独自外出，路过寒山寺，实在太累了，就坐在寺外小亭子中吃起干粮来。恰在这时，一位姓曹的县丞从此经过，见一个老和尚看到他的大轿不但不回避，还若无其事地吃东西，顿时大怒，即令左右衙役将他拿下，打了20皮鞭，投进县狱。姚广孝任其摆布，并不分辩。

第二天，人们发现钦差大臣姚少师一夜未归，急忙四处寻找，才在狱中找到了他。那曹县丞得知后，吓得屁滚尿流；其他地方官也都浑身颤抖。他们纷纷前来请罪，等候发落。姚广孝见此情势，让人拿来笔墨，在纸上写了几句话，交给了官员们。大家一看，原是一首诗：

敕使南来坐画船，
袈裟犹带御炉烟。
无端撞上曹县尹，
二十皮鞋了宿缘。

大家这才知道姚广孝看在众人面子上，没有计较这件事。接着，姚广孝严厉批评曹县丞：“野僧路边吃饭，碍汝何事！书生为官，不可张狂欺人！”曹县丞叩首如捣蒜，一再表示痛改前非；其他人也都频频点头，声称要牢记姚少师教诲。

姚广孝赈灾还朝后，明成祖又先后命他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工作。

姚广孝认为：这两部书都是“万世法则，是国家至重之事”。所以，他专门饲养了一只大公鸡，每晨闻鸣而起，将自己的有生之年全部献给了编纂事业。

《永乐大典》，最初是翰林学士解缙主持编辑成书的，当时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明成祖认为不理想，才令姚广孝重新修纂。姚广孝抽调了文苑名士、高僧、名医、书画家等共计2169人，辑录了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的书籍将近8000种，包罗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理、阴阳及医、十、僧、道、戏剧、小说、技艺诸多内容，用了3年时间，共编出11095册、22877卷，仅

书目便有900卷之多。当他将这部巨帙进呈给明成祖后，明成祖十分高兴，当即为该书定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序文。

《明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年初。明成祖即位后，曾将其中不利于自己的记述作了修改，但仍感到不满意，所以才令姚广孝再次重修。姚广孝再接再厉，又用了6年多的时间，出色地完成了皇上交办的又一要务。

姚广孝享年85岁。在他病重期间，明成祖曾多次到他居住的大庆寿寺去看他，并赐他金唾壶之类。明成祖还问他有何要求，他只说了一句话："僧溥洽系久，愿赦之。"

溥洽，原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明成祖当年打南京时，有人说建文帝死于大火，有人说为僧遁去，究竟如何，只有溥洽知道。甚至还有人说：是溥洽藏匿了建文帝。所以，明成祖夺位后，把溥洽一直关在大牢里。明成祖见姚广孝无一语及私，仅仅提出这么一项请求，百感交集，当即下令将溥洽释放。姚广孝激动得热泪盈眶，挣扎起来顿首致谢，接着便倒地而亡。

姚广孝之死，令明成祖十分悲痛。他下旨停止视朝两天，以示哀悼。接着，赐葬京郊房山东北青龙湖镇，命以僧礼隆重安葬；还追赠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溢恭靖，并亲制神道碑志其功。

【王翱】

王翱，字九泉，河北盐山县人，明永乐年间进士。最初，他被授任大理寺左寺正，由于办事踏实，业绩突出，很快被提升为御史。随后，他又相继担任右佥都御史、辽东提督、两广总都、左都御史，最后官至吏部尚书。

王翱担任吏部尚书时已年届古稀。此后，又在此任上连续干了15年。

当时，吏部为六部之首，至于吏部尚书，更是掌握着全国官吏的选拔、考核和升降。在腐败的封建官场上，那些投机钻营者无不将吏部视为行贿的重点。但王翱一身正气，从来不拿自己手中的权力做交易。无论任何人，只要到他那儿"走后门"，没有一个不碰钉子的。为防止别人登门请谒，他还常常在退朝后住在官署，很少回家。

王翱虽然位尊权重，却从不盛气凌人，更不打击报复。有一次，在他的荐举下，吏部主事曹恂升任江西参政。上任不久，因病回京治疗。王翱将此情报告给了皇帝，皇帝却误以为曹恂对调动不满，遂下旨免了他的参政之职，并要他返回原籍。曹恂一气之下，迁怒于王翱。他趁王翱上朝之时，在半路上截住了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连揪住他的衣领，打了他几个耳光。显然，对堂堂的二品尚书来说，这已属奇耻大辱。

皇帝获悉此情，大怒，当即传旨将曹恂投入了大牢。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一些平时嫉恨曹恂的、一些借机讨好王翱的，一个个粉墨登场，落井下石，恨不得将曹恂立刻斩首。王翱见此情势，急忙求见皇帝，说曹恂确实有病，还说他那日的异常行为可能与疾病的折磨有关，一再请求皇上免去他的诏狱之苦。皇帝见王翱情真意切，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王翱重义气而不重钱财。早在他担任了辽东提督时，有位太监任监军。他

们二人情投意合，关系非常融洽。后来，王翱改任两广总督。那太监在为他送行时，赠给他4颗西洋明珠。王翱再三谢绝，致使那太监急得流下泪来。他坦诚地告诉王翱：这西洋珠本是郑和下西洋时买回的，献给了皇上；皇上又分赐给了身边的侍臣。他本人一共受赐8颗同样的明珠，现将其一半送给好友留作纪念。王翱见太监诚恳又执著，何况这明珠又非受贿所得的赃物，才勉强收下，缝在了衣内。

时至王翱担任吏部尚书，那太监已经故去。王翱每想起明珠的事，心中就忐忑不安。他遍访太监的亲属，终于找到了太监的两个侄子。他关切地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并拆开衣服，将里面的4颗明珠全都送给了他们，让他们变换成现款做生意。

王翱一向十分节俭。尽管薪俸很高，皇帝也常常赐他一些金帛衣物，但他平时仍穿着破旧的衣衫。有一次，皇帝召他议事，见他的袍子上磨出了两个小洞，便问他为什么不穿件新的？他回答道：是他偶尔穿上了这件旧袍，突然得知皇上召见，来不及更换就进殿了。

王翱所住的房子30多年没有翻盖。有一天，皇帝微服在街上行走，有人指点道：那座破旧的宅院就是当朝吏部尚书府。皇帝走近一看，只见房上不少砖瓦都已碎裂，心中很不是滋味。一回皇宫，马上令人在盐山为他修建一座新宅。

王翱的夫人基于当时盛行的达官贵人纳妾风，也私下为夫君娶来一位漂亮的小妾。一直过了半年多，才将此事告诉他，以便造成事实，使他不得不接受。王翱获悉后，很生气，责怪夫人带头破坏了家法，还硬逼着她将那小妾送回了娘家。那小妾深为王翱的大恩大德所感动，从此没再嫁人。多年后，王翱病故，她还披麻戴孝去奔丧。

王翱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对亲属要求也十分严格。

王翱有位爱女嫁给了在京郊做官的贾杰。王夫人每思念女儿，总要派人将她接回城里。天长日久，夫人、女儿都颇感不便，很希望王翱能将贾杰调人京师。而贾杰也期盼着早日当京官。显然，这对身为吏部尚书的王翱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但他不同意这么做。有一次，王夫人准备了一桌美味佳肴，趁丈夫酒至半酣，又提出将女婿调京的事。王翱一听，顿时大怒，竟将餐桌给推翻了。

王翱有个孙子才华平庸，却因恩荫而进了太学。一年秋试，其孙从有关部门搞到了一份人场券，试图通过科举考试而金榜题名。王翱闻讯大惊，他认为：科举考试是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如果孙子确有才能，也不妨一试；但孙子的个人学识，实在太差。如果让他去赶考即便自己不出面，考官们也会为了迎合自己而高抬贵手。而让一个无能之辈中选，必然会埋没一个真才实学却无后台的人。于是，他劝孙子不去赶考。然而，孙子并不服，还搬来其他人为他说情。王翱十分生气，当即将那人场券撕得粉碎，扔进了火里。

王翱享年85岁。他死后，无论朝廷重臣还是普通百姓，都竞相为他送葬。史家也赞誉他“声实茂著”。

【况钟】

况钟（1381～1442年），字伯律，江西靖安人。据史料，他自幼酷爱读书，

却因家贫而没能进取功名，长大后也只是在县里谋了个“书吏”的差使。待9年任满，知县鉴于他办事公道、认真，又极有才干，便将他推荐给了吏部。吏部尚书吕震亲自对他考核后，确信他人才难得，遂奏请皇上恩准，让他在吏部当了一位小官。

明宣德五年（1430年），苏州郡守缺员。因为该郡雄距要地，却“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以往郡守也“悉由资格，多不称任”，所以宣宗皇帝朱瞻基决定让百官保举一位廉洁又能干的京官去任知府。时为吏部尚书的蹇义和礼部尚书的胡濙都推荐况钟，内阁大臣杨荣也从旁赞助。于是，宣宗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还特地给况钟一道诏书，允许他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斩后奏。

施行正吏

况钟在赴任之前，曾写了一篇《座右铭》：

> 卑而不可不牧者，民也；
> 迩而不可不察者，吏也；
> 严而不可不用者，刑也；
> 微而不可不崇者，德也。
> 不植其德，难施乎刑；
> 不施乎刑，难以正吏；
> 不正乎吏，民曷由安之。

上任后，况钟首先从“正吏”开始。他装作什么都不懂的样子，对围着让他批示文件的胥吏们一会问这件事该怎么办，一会又问哪件事该怎么办。他虽然有时也提出相反的意见，但总是以商榷的方式，并最终——“如吏所欲行止”。胥使们还真以为他愚笨无知，好对付，一个个偷着乐。如此过了没几天，况钟很快弄清了哪个吏安分守己，哪个吏奸猾难容，以及奸猾者过去是如何挟持官员贪赃枉法的。

待一切准备就绪，况钟令人在知府大堂上摆好香烛案，将府学的师生、府中的官吏、城乡的里长和乡亭中德高望重者统统请来，郑重地宣读皇上的诏书。当读到“官吏中有犯法者，可以先斩后奏”时，那些一向为非作歹的胥吏无不吓得浑身发抖。

随后，况钟又令几个污吏站出来，对他们厉声喝道：“前几天，什么事本来该办，你们却阻止我；什么事不该办，你们却硬要我办。看来，这种勾当你们干了许久了，真是罪大恶极！”说罢，叫了4个膀大腰圆的胥吏先将一位恶吏抬起来掷向空中，把他活活摔死。但这些胥吏过去都是些狐朋狗友，不肯用力往上抛，摔下来也死不了。况钟大怒道：“我为百姓杀贼，你们这些鼠辈还要为虎作伥么？若不再往高处扔，就叫你们替他死！”如此一来，那4条大汉才真的卖起力来，只扔了一下就要了那人的命。接着，况钟又以同样的方式一连摔死了6个最恶的奸吏。他让人将那6具尸体摆在繁华的大街上，派专人向观众们作介绍。随后，又相继将5个贪官和10多个办事不力的官吏革了职。从此，苏州一府七县的大小官员，再不敢胡作非为、因循苟且了。

抵制歪风

况钟就任苏州知府时，朝中是宦官专权。一些织造、采办太监凌驾地方之上，滥施淫威，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史书上还专此描写道：“郡佐，县正少放，则加捶挞。”显然，此属严重的恶风邪

气。

由于苏州繁华富庶，纺织业非常发达，奇光异鸟也很多，常常有太监前来骚扰。有一次，有个名叫来福的太监到了苏州所辖的吴县，不知哪条筋不对劲，对该县主簿吴清大打出手。况钟得知后，连忙赶至现场，抓住来福的两只手，怒斥道："你为什么打我的主簿？难道你让他什么公事都不干，专门伺奉你一个人吗？"来福还从来没见过有谁这么对待他的，不禁为之一惊。之后，还特地设下酒席，向况钟、吴清赔礼谢罪。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宦官殴打官员的事。

还有一次，一位老太监奉旨去苏州采办丝织品，下榻在一家驿馆里。他明目张胆地向地方官索贿，还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况钟闻讯后，率众官属前去见他。当况钟向他致礼时，他竟不还礼。况钟遂起身道："老太监固不喜拜，且长揖。"说罢，便坐了下来。那太监气不打一处来，遂说了些训斥的话。况钟寸步不让，也言辞俱厉。那太监一时气得发抖，正想如何恐吓他，他却站起身来，带领属下骑马回府了。事后，那老太监一打听，才知道他就是况钟，也只好敛起威风，硬咽下了这口气。

况钟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任用。在苏州，他看到府学房屋破旧，影响学子学习，便捐出自己的一部分俸银，重建了府学明伦堂、斋廊和学舍等建筑，还新造了一座名曰"道山"的小亭子。对贫苦好学的读书人，他常常予以资助；而对那些学业有成者，又尽力帮他们走上仕途。当时，他发现有个名叫邹亮的书生德才兼备，便决意荐他为官。不料，这时竟有人写匿名信诽谤邹亮。况钟认为：这也属于不正之风，便公开声明："这是要我尽快树立邹亮名声而已！"于是，立即书写并发出了保举他的奏章。不久，英宗朱祁镇亲自召见了邹亮，并授他吏、刑二部司务。后来，由于邹亮政绩卓著，又很快升为御史。

施惠百姓

苏州一带土地肥沃，经济发达。自南宋以来，一些官僚地主就千方百计在那儿兼并土地。到了明朝，随着宋、元相继灭亡，一连两朝的官僚地主都树倒猢狲散，其土地也全被朝廷收为"官田"。照明初规定，官田的田租按私租交纳，还要租户亲自交到南京甚至山东临清去。重租已使百姓难以承受，交租更成了一个大灾难。当时交通不便，无论陆运还是水运，都需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交到南京的，每1石运费高达6斗；交到临清的，1石运费高达4石。这些运费也需百姓自己承担。若逢途中遇上强盗或其他不测，百姓还得如数赔偿；交仓验收时，胥吏又往往刁难。百姓实在忍受不了，很多人家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外地。

况钟得悉后，立即向户部说明了情况，并请求官田减租、免除欠粮和交粮改为交钱。但是，户部没有同意。他不灰心，又一再申请，还上奏皇上予以明断。宣宗听取各方面意见后，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由于历史原因，苏州民户中充为军户者颇多。卫所驻军暴虐不仁，经常借此敲诈百姓，还动不动施以酷刑。况钟对其所为十分不满，坚决与之相抗，并奏报朝廷。结果，免去了160多户军籍，另有数以千计的民户免去了后代承袭军籍之役。

此外，况钟还扶助贫弱，对那些平

日期压良善、横行乡里的势家子弟进行了严惩。百姓若有冤枉，只要告到他那儿，他都仔细访查；即使是复杂的无头冤案，也总是下决心弄个水落石出。

深得民心

据史载，苏州府在况钟的治理下，未及几年，“民之疲者以兴，穷者以植，逃亡者以复，贪黠者屏息而不敢肆，油油然乐生送死，非复向来苦重赋而呼吁无门之象矣”；还说“民田有黍稻，土有桑麻，蝗不为灾，盗不入境，流亡来归者三万余家，郡遂大治”。也正因此，他深受百姓的尊崇和爱戴。

况钟在苏州任上曾遭母丧，按当时习惯应当回家守制。但苏州民众惟恐他服满后不能再回苏州，而被调往外地为官，便联名上书皇帝，请求留下他。同时，还编了一首歌，歌曰：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当时的皇帝英宗遂降下圣旨，命他“戴孝起复任”。

正统六年（1441 年），况钟任满，理当升迁，但所属 1 州 7 县的民众仍舍不得让他离开，2 万多人一起求见巡按御史张文昌，向他转交了 8 万多人的联名请愿书，乞求况钟连任苏州知府。有位老农还编了一首歌：“况青天，朝命宣，早归来，在明年”。皇帝被苏州民众的真诚所感动，特赐他为正三品俸禄，仍然治理苏州府的政事。

况钟于正统七年（1442 年）12 月死于苏州任上。噩耗传出，苏州官民哭声遍野，百姓罢市以示哀悼。出殡时，送丧的沿路、沿江络绎不绝。苏州和所属七县都建立了祠堂，画像祭祀；有的人家甚至将其画像供祀于自己家中。

后人根据况钟的所作所为，编出了不少戏。如《十五贯》、《胭脂》等等，歌颂他为政清廉，体恤百姓，大智大勇，善于断案，“民奉之若神”。不少史书上也评价说：况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及”。意思是，在他之前、之后担任苏州知府者，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

【陈寿】

陈寿，字本仁，原籍江西新淦（今新干），因祖父戍卫辽东，遂人籍宁远（今辽宁兴城）。他于成化八年（1472 年）中进士，授官户部给事中，从此登上仕途。曾先后担任左佥都御史、延绥巡抚、陕西巡抚、南京兵部侍郎、刑部尚书等。为官前后共达 40 年，自始至终清正刚直，深受世人的敬佩。

陈寿一生所遵循的信条，是为官“三不喜”，即：一不喜随意弹劾官吏，二不喜为子弟亲友争功或牟取私利，三不喜金钱财物。

在陈寿最初担任给事中时，虽然给事中是言官，纠劾百官是其本职工作，但他很少弹劾别人。有人不解，问他，他解释道：“我的父亲曾多次警告我不要作刑官，因为刑官容易冤枉人；而言官若是冤枉起人来，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不敢轻易上疏。”

话虽这么说，但他论及时弊，却毫无隐讳；即便涉及那些当朝权贵，也决不留情。

有一次，陈寿奉命巡视宣化、大同边防，发现派驻那儿的镇守太监狐假虎威，变着法儿尅扣军饷，中饱私囊。将士们对他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陈寿弄清原委后，毅然上疏，将那太监弹

劾罢免。

当时的宪宗皇帝朱见深迷信僧道，贪恋酒色。掌权大太监梁芳为投其所好，就向他推荐了一位名叫继晓的僧人，专门为他炼丹和制作春药。朱见深对继晓非常宠信，竟不惜耗费白银数十万两为他修建了一座寺院，供他尽情享乐。陈寿忍无可忍，遂会同刑部员外郎林俊、吏部给事中李俊一起上书，弹劾梁芳和继晓。不料，昏君鬼迷心窍，陈寿被下诏狱。

出狱后，陈寿基于朱见深在万贵妃的挑唆下而废黜了贤达的吴皇后，万贵妃的兄弟也随之更加专横跋扈，欺压百姓，又上疏弹劾这些红极一时的皇亲国戚。结果，昏君大怒，再一次把他打入了大牢。

数年后，陈寿出狱并官复原职。这时，镇守陕西的太监廖堂正在那儿为非作歹。由于廖堂暴虐成性，朝廷派去的官吏都不敢得罪他。吏部尚书杨一清认为，只有像陈寿这样刚强廉洁的官员才能制服他，便请旨陈寿为钦差大臣前去陕西巡抚。

陈寿一到陕西，几日内便查出了廖堂搜刮民财数万金的特大案件。他一面将这不义之财留作赈灾，一面下令追捕廖堂的帮凶和爪牙，随后奏明朝廷将廖堂押回了京城。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陈寿不喜随意弹劾官吏，决不包括那些贪赃枉法之流。

陈寿对其子弟亲友一向要求甚严，从不为他们牟取私利，也不许他们利用他的职权捞任何好处。

有一次，陈寿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延绥（今陕西北部一带），正遇到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率众人侵。那些人先是派出了少数骑兵，装模作样地窜到明军大营附近来诱敌。有些明朝将领不知是计，连忙准备出击；陈寿却不准。随后，陈寿独自来到帐外，同数10位骑士坐在小凳子上饮茶聊天。敌人一见，怕有埋伏，苍惶撤退。陈寿趁机下令出击，结果将那些人一网打尽。当他向朝廷报捷时，许多人都劝他在报功表上也写上他那随征子弟的名字，他却严肃地说："我的子弟即不习马骑射，更不会打仗，哪能欺骗朝廷呢！"

后来，朝廷为犒赏延绥将士，特地拨来了一批钱物，陈寿也不许自己的子弟与血战疆场的官兵同样受赏。

陈寿在边防多年，曾无数次打退敌军的进攻。其间，他的子弟虽未像其他将士那样冲锋陷阵，但在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等各方面也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但陈寿从来没有嘉奖他们。只是其他将领实在看不下去，才将他们的功绩悄悄上报朝廷，并受到朝廷的补赏。

陈寿小时候，有一次在路上捡到了几两银子。他不知失主是谁，又怕放在路上被别人捡走，竟坐在原地等候失主来找。一直等到深夜，终于将银子还给了失主。

当官后，陈寿更加注重清廉，不但从来不贪不占，还将自己的俸禄随时周济给了生活困难的亲友们。

有一次，由于他不肯向专权的大太监刘瑾折腰，致使刘瑾给了他一个罚米的处分。但他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拿不出米来。刘瑾获悉此情，也不得不收回成命。

陈寿83岁被进为一品尚书，为六部之首。但他自感年老体衰，很快便请求

退休了。

退休后，陈寿由于贫困而无家可归，只好流寓南京，住在一位朋友借给他的两间年久失修的房子中。他的老友杨一清为此感慨万千，说他“廉名为尤著。居常布素如寒士。老无所于归，诸子旅寓漂泊，环堵萧然。”

陈寿死后，家中无钱装殓，多亏了昔日的同事、尚书李充嗣和府尹寇天舒等人共同出钱，才为他办了丧事，将其尸骨临时埋在了南京郊外。

数年后，陈寿的亲友不忍心让他的遗骨葬在异地他乡，一起凑了笔钱，将他移葬到新淦老家。

【杨士奇】

供职东宫　惟谨惟慎

杨士奇（1365～1444），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今江西太和县）人。他从小死去父亲，跟随母亲嫁到罗家，后来恢复了原来的杨姓。家境很贫穷，但他努力学习，靠教授学生糊口自给。经常在湖南、湖北一带教书，其中以在湖北江夏教学馆的时间最长。建文帝初年，诏集各地儒生纂修《太祖实录》，杨士奇被推荐征用为教授。正要上任，王叔英因为他修史方面的才能推荐荐举了他。于是，他被召入翰林院，担任编纂官。不久皇帝命吏部考试评定史馆中儒生的等第，吏部尚书张骥看到杨士奇写的对策，说：“这不是平常儒生所能说出的话。”于是上奏他为第一名。朝廷由此任职他为吴王府副审理，但仍然让他在实录馆里供职。明成祖朱棣即位，改任编修。后来，选入内阁，掌管机密的军国大事，几个月后提升做了侍讲。

永乐二年（1404）入选为他为左中允东宫太子。永乐五年升为左谕德。杨士奇办事非常谨慎，家居时间从来不谈论公事，即使是最亲密友好的人都不能从他那里听到任何事情。在成祖面前，举止动作恭敬慎重，善于回答问题，而且他说的话常常能够符合成祖的心意。有人有小的过错，常常给他掩饰过去。广东布政使徐奇带了些岭南的土特产送给朝廷的官员们，有人把他送了东西的官员名单拿给皇帝看，皇帝看到上面没有杨士奇的名字，就把他召去询问。杨士奇回答说：“徐奇去广东上任的时候，群臣们作诗文赠给他送行，我正巧生病没有参加，因此没有送东西给我。现在名单上的官员是不是都接受了这些东西还不知道，而且东西很少，应当没有什么其他用意。”成祖就马上命令把礼品册焚烧。

永乐六年，皇帝巡幸北方，命杨士奇和蹇又、黄淮留在南京辅佐皇太子朱高炽。太子喜好文章诗词。赞善王汝玉把诗法呈献给他。杨士奇说：“殿下应当用心学习《六经》，有空闲的时候看看两汉的诏令。作诗是雕虫小技，不值得去研究。”太子认为很对，采纳了他的意见。

先前，成祖起兵的时候，汉王朱高煦多次拼死作战很有功劳，成租答应事情成功以后把他立为太子。但成祖即位后没有立他为太子，他心怀怨恨。成祖又怜惜赵王朱高燧年纪小，对他特别宠爱。因此两王联合起来离间太子，成祖心里很有些活动。永乐九年（1411）回南京，把杨士奇召去询问太子监国的情况。士奇回答太子孝顺恭敬，而且说：“殿下天资很高，即使有过错也一定能

知道，知道以后必定改正。心地好，待人仁爱，决不会辜负陛下对国家大事的托付。”成祖听了很高兴。永乐十一年（1413）正月初一，有日蚀出现，礼部尚书吕震请求不要停罢朝贺的仪式。侍郎仪智坚持认为不可以。士奇也引用宋仁宗处理天圣半间灾异的事例极力反对，于是停止了朝贺。第二年，皇帝北征，杨士奇仍然辅佐太子留守南京。汉王更是变本加利说太子的坏话。皇帝回来，因为太子迎接来迟，把太子的东宫官属黄淮等人全部投入监狱。杨士奇后来才到，皇帝饶恕了他。召他询问太子的情况。杨士奇叩头说：“太子孝顺恭敬像以前一样。凡是有耽搁迟缓，都是我们臣下的罪过。”皇帝的气消了。随从皇帝的行在各大臣纷纷上奏弹劾杨士奇，认为他不应当单独得到宽恕，于是把他也关进锦衣卫监狱，但不久就释放了他。

永乐十四年（1416），皇帝回到京师，对汉王夺嫡阴谋及各种不轨情状略有所闻，便问蹇义；蹇义不回答，于是又问杨士奇。他回答说；“我和蹇义都侍奉东宫太子，外人没有敢和我们两人说汉王的事的。但是两次让汉王到藩王分封的地方去，他都不肯走。现在知道陛下将要迁都北京，总是要求留守南京。只有陛下才能精细地观察他的意图。”成祖沉默着没有说话，起驾回宫了。过了几天，成祖完全知道了汉王的事情，削夺了两支隶属于他的护卫武装部队，最终把他安置到山东乐安去了。第二年提升杨士奇为翰林学士，仍然兼任原来的官职。永乐十九年（1421）改为左春坊大学士，仍旧兼翰林学士。次年又以辅导太子有过错为由，被关入锦衣卫监狱，十来天后才释放。

华盖学士　切言敢谏

仁宗朱高炽即位做了皇帝，擢任杨士奇做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一天，皇帝在便殿，蹇义、夏原吉奏事还没有退出。仁宗望见杨士奇，就对两人说：“新任华盖学士来了，必定有正直的言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讲些什么。”杨士奇进殿后说：“皇上开恩减少岁供的诏令刚下达两天，惜薪司就传圣旨征收枣八十万斤，这和前面所下的诏令是相矛盾的。”仁宗立即命令征收数字减去一半。成祖死后，按照丧服制度的规定，穿丧服的时间至二十七日期满，吕震请除丧服。杨士奇认为不可以，吕震厉声斥责他。蹇义把他们俩的意见都上报给皇帝，态度模棱两可。第二天。皇帝头戴素冠，身穿麻衣制的丧服扎着孝带出理朝政。朝廷大臣只有杨士奇和英国公张辅像他一样身着丧服。退朝以后，皇帝对左右的人说：“先帝的棺材还在停放着，做臣下的怎么能忍心说换上吉服，杨士奇坚持这一点是对的。”升他做少保，与同事杨荣、金幼孜一起被赐给刻有“绳愆纠缪”四个字的银印章，准许密封上奏事情。不久升为少傅。

当时各地藩司守令等地方官员进京朝见，尚书李庆建议把发给军队剩余的马匹给他们，每年向他们征收马驹。杨士奇说：“朝廷选举贤能对称职的人授给官职，现在却让他们养马，是看重牲畜而轻视士人，这怎么能够向天下和后世交待呢。”皇帝答应从宫中直接发圣旨罢停这一做法，但后来没有消息了。杨士奇再次极力申述自己的意见，又没有批复。不久，皇帝到思善门，召见杨士奇说：“朕难道真的忘记了这件事？听说吕震、李庆等人都不喜欢你，朕考

虑你孤立，恐怕被他们中伤，不想因为你的话而停止这件事罢了，现在有了可以说话的依据了。”随手拿出陕西按察使陈智讲养马不妥当奏疏，让杨士奇起草敕文罢除牧马。杨士奇感激而叩头拜谢。群臣练习正月初一日朝拜的仪式，吕震请求用乐，杨士奇和黄淮上疏请求停止。皇帝没有回答，士奇再次上奏，在庭院里一直等到夜深，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天，皇帝召见杨士奇，对他说：“吕震经常以错误的意见耽误朕的事，不是你们及时提出，将会后悔不及。”不久仁宗任命杨士奇兼兵部尚书，一起领三个职务的俸禄。但杨士奇坚辞尚书俸禄。

和睦皇亲　关心民生

仁宗做太子监国的时候，怀恨御史舒仲成，这时想要惩处他，杨士奇说：“陛下即位，下诏说凡是过去违背了圣旨的人都可以得到宽宥。如果惩治舒仲成，那就是诏书不讲信用，害怕的人就多了。就像汉景帝对待卫绾那样，不是也可以吗？”于是仁宗马上停止惩治舒仲成。又有人说大理卿虞谦讲事情不缜密，仁宗很生气，把虞谦降了一级。杨士奇为他辩白冤枉，说明并无其事，使他得以恢复原来的品级。还有大理少卿弋谦因为进谏朝事得罪。杨士奇说：“弋谦是响应诏书进言的，如果给加上罪名，那么群臣以后都不敢讲话了。”皇帝立即提升弋谦做副都御史，而且发下敕文承认自己的过错。

当时有人上书歌颂太平，仁宗拿出来给各位大臣看，都认为说得对。只有杨士奇说：“陛下虽然有恩泽于天下，但是流亡外乡的人还没有回归故乡，民生凋蔽还没有恢复，百姓还有挨饿的，还需要再休息几年，也许到那时可以期望达到太平。”皇帝说：“你的话说得对。”于是回头看着蹇义等人说：“朕坦诚对待你们，希望得到你们的辅助和纠正，只有杨士奇曾经五次上奏章，你们都没说一句话，难道真的是朝廷政治完美无缺，天下太平了吗？”各位大臣都惭愧认错。这一年四月，皇帝赐给杨士奇玺书说：“从前朕负有监国的使命，你侍奉在左右，同心同德，为了国事忘记了自己，屡次经历艰难忧患，都不曾改变志向。到朕即位以来，呈献良好的谋略，希望我治理，忠贞不渝，所有这些都记在朕的心里。现在创制‘杨贞一印’赐给你，还希望能够互相勉励，以达到明君贤良的美名。”不久纂修《太宗实录》，与黄淮、金幼孜、杨溥一起充当总裁官。没有多久，皇帝一病不起，召杨士奇和蹇义、黄淮、杨荣到思善门，命士奇书写敕书从南京召回皇太子。

宣宗朱瞻基即帝位，杨士奇纂修《仁宗实录》，仍然担任总裁。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皇帝亲自征讨，平息了叛乱。大军凯旋，驻扎在献县的单家桥，侍郎陈山迎谒，说汉王和赵王是一条心，请求乘势袭击彰德，捉住赵王。杨荣极力赞成。杨士奇说：“事情应当有真凭实据，天地鬼神是可以欺瞒的吗？”杨荣厉声地说：“你想要阻挠这重大的谋划吗！现在叛党说赵王实是与汉王同谋的，怎么说没有口供？”杨士奇说：“太宗皇帝有三个儿子，现在皇上只有二个叔父。有罪的不可以赦免，而没有罪的应该宽厚对待，有怀疑的话可以防备他，使不发生意外的事就是了。为什么突然发兵攻打他，伤害了皇祖在天的感情呢？”当时只有杨溥的

意见和杨士奇是相同的。他们打算到皇帝那里去进谏，杨荣先进去了，杨士奇随后进，守门的不让进去，不久宣宗召蹇义、夏原吉进去。二人把杨士奇说的话告诉了宣宗。宣宗起初没有加罪赵王的意图，所以调动军队攻打彰德的事得以停止。回到京师以后，宣宗考虑杨士奇说的话，对他说："现在人们议论赵王之事的很多，怎么办?"士奇说："赵王和陛下最亲，陛下应该保全他，不要被人们的话所迷惑。"宣宗说："我想把群臣上的奏章封起来送给赵王看，让他自行处理，怎么样?"杨士奇说："好，如果再有一封玺书就更好了。"于是皇帝派使者拜玺书去彰德见赵王，赵王得到玺书非常高兴。感激涕零地说："我有生路了。"立即上表谢恩，而且献出护卫武装部队，外面对他的议论才平息下来。皇帝对待赵王日益亲近而看不起陈山，他并对杨士奇说："赵王所以能够保全，都是靠了你的努力。"于是赐给他金币。

当时交趾几次叛乱。朝廷屡次发大军去征讨，都因失败而全军覆没。交趾王黎利派人假意请求立陈氏后人为国主，宣宗皇帝也讨厌进行战争，想要答应他。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以下的官员们，都说没有理由答应他，这样做是对天下显示出自己的软弱。皇帝召见杨士奇、杨荣和他们商议。两个人都极力说："陛下为了体恤百姓生命，安抚边远的地区，不是没有理由；汉朝放弃了珠崖，以前历史上都认为是好事，不能说是表示软弱，所以可以同意他的。"接着皇帝命令选择派往交趾的使臣，蹇义推荐伏伯安有口才。杨士奇说："说话不讲信用，虽然是蛮貊这样的地方也不能去。伯安是小人，派他前去会有失国体。"宣宗认为他说的对，另外派人去了。于是放弃交趾，停止战争，每年节省战争耗费巨万。

宣德五年（1430）春天，皇帝侍奉皇太后拜谒皇陵，召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和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在行殿朝见太后。太后慰劳他们。宣宗又对杨士奇说："太后对朕说起，先帝在东宫的时候，只有你不怕触忤，敢于直谏，先帝能够听从你的话，所以没有败事。又教导皇上应该接受正直的意见。"杨士奇回答说："这是皇太后大恩大德的话，愿陛下不要忘记。"不久，皇帝下敕书给鸿胪寺，说杨士奇年老有病，上朝有时会晚一些，不要弹劾他。宣宗曾经便服出宫，在晚上到了杨士奇的家里。士奇慌忙出来迎接，叩头说："陛下为什么把掌管社稷宗庙的身体看得这样轻?"皇帝说："朕想和你说句话，所以就来了。"几天以后，捉获了两个强盗，都图谋不轨。皇帝召见杨士奇，告诉他这件事。并且说："从今以后更知道你对朕的爱心了。"

宣宗因为各地屡次发生水旱灾害，召杨士奇拟写诏令抚恤，免去受灾地方的租税和养官马亏欠的数额。杨士奇乘机请求免除过去拖欠的赋役和柴薪草料钱，减少官田的租税，清理积压下来的冤狱，裁减工程役作，以扩大皇帝对百姓的恩德。百姓都很高兴，过了两年，宣宗对杨士奇说："抚恤百姓的诏谕颁布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还有需要宽恤的地方吗?"杨士奇说："从前下诏减少了官田的租税，可是户部却照旧征收。"皇帝很不高兴地说："现在开始实行，不实行或阻挠实行的按法律治罪。"杨

士奇再请示安抚逃亡的百姓，审察贪官污吏，推举有文才，精通武艺而又勇敢的士人，今被判死罪的人家的子孙有仕进的机会。又建议请朝廷大臣三品以上和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各自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准备充当地方官员的人选。宣宗都回答可以。在那个时候，宣宗励精图治，杨士奇等人同心辅佐，天下号称太平治世。宣宗于是仿效历史上帝王和臣下共同游乐的故事，每到年初，赐给百官十天休假。宣宗也时常到西苑万寿山，各位大学士都随从他去，赋诗唱和，从容地询问民间百姓的疾苦。大臣们有什么议论上奏，皇帝都能做到虚怀若谷，听取和采纳。

宣宗刚即位的时候，内阁大臣有七个人。陈山、张瑛是由于有在东宫供职的旧情而进入内阁的，不称职，调出去做其他的官了，黄淮因为生病退了休，金幼孜去世。内阁中只有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个人。杨荣豪放开阔，有决断、有毅力，遇到事情敢作敢为。多次随从明成祖北征，很熟悉边关将领德才的高低，要塞的险易远近，敌情归顺与叛逆。但是他却很喜欢接受礼物，边关将领每年都给他送好马，宣宗也知道这些事，就向杨士奇询问。士奇极力为杨荣辩白说："杨荣了解边防的事多，我们都比不上他，不应该把小毛病放在心上。"宣宗笑说："杨荣曾经讲你和夏原吉的坏话，你还为他说情吗"？杨士奇说："希望陛下像曲折周到地容忍我那样宽容杨荣。"宣宗的不快于是解除了。那以后，杨士奇说的话逐渐让杨荣知道了，杨荣觉得愧对杨士奇，因此以后，两人相互间相处得很好。宣宗也更加接近地对待杨士奇，先后赐给他珍奇果品、祭祀用的牺牲美酒、书籍器具无其数。

宣宗逝世以后，英宗即位做了皇帝，时年方九岁，国家的军政大事都要报告大皇太后。太皇太后推心置腹地信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个人。有事就派宫中宦官到内阁咨询商议，然后裁决。杨士奇等三人也很自信，理直气壮地推行自己的意见，积极治理国家。杨士奇首先请求训练士兵，加强边境的守备防御，设置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别派遣文武官员镇守巡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罢免进行侦事的校尉。又请求依次免除租税，慎重处理刑事案件，严格考核各部门的官员。英宗都答应实行。正统初年，朝廷政治清明，是杨士奇等人的功劳。正统三年（1438）《宣宗实录》纂修完成，升杨士奇做少师。正统四年（1439），他请求退休，没有得到同意，诏令让他回乡祭扫墓地。不久还朝。

宦官擅权　忧郁而终

当时太监王振为英宗所宠信，逐渐干预朝廷政务，诱导英宗用严酷的手段对待臣下，大臣们往往固小小过失而投人监狱。靖江王朱佐敬私自送给杨荣金银。杨莱先已经回乡祭扫墓地去了。回来并不知道这件事，王振想借这件事倾轧杨荣，杨士奇极力为他解释，得以作罢。杨荣不久去世，杨士奇、杨溥更加孤立。在王振的怂恿下，第二年便大举兴兵征讨麓川，耗费国库储藏，士兵马匹死去好几万。再过了二年，太皇太后去世，王振的势力更加大了，更加肆无忌惮，大小官员稍微有抵触违抗他的，马上被捉进监狱。朝廷大臣人人都心怀恐惧，杨士奇也不能够制止。

杨士奇年老以后，他的儿子杨稷骄横霸道，曾经侵害平民并用暴力杀人。

主管监察的官员纷纷上奏弹劾杨稷。朝臣议论并没有立即按法律治他的罪，而是把那些有关文件封起来给杨士奇看。后来又有人揭发扬稷蛮横暴虐的几十件事，于是把他捉进了大理寺狱。杨士奇因为年老生病休假在家，英宗恐怕伤害了他的感情，下诏予以安慰勉励。杨士奇感动得流泪，因为忧虑而使疾病加重卧床不起。正统九年（1444,）三月去世，享年八十岁。追赠大师，根据他生前的事迹给他“文贞”的称号。

原先在正统初年，杨士奇就说过蒙古瓦剌部渐渐强大，恐怕会成为边防的祸患，而边军缺马，恐不能抵御。请于附近大仆寺关领，西蕃贡马也都供给边防。杨士奇死后不久，也先果然入侵，发生了土木之变，有识之士不禁思念杨士奇所说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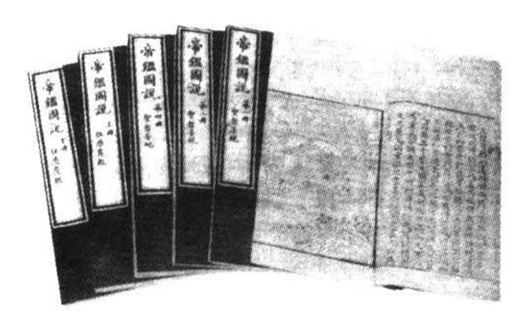
【张居正】

（1525～1582）明朝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得徐阶等器重。二十八年改授编修。同年上《论时政疏》，抨击宗室骄恣、庶政旷废、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和财用大匮等时弊。后因不满严嵩专权而托病家居。在家三年，潜心研究当时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三十六年返京，仍供职翰林院，颇不得志。四十一年，严嵩罢，徐阶任首辅，得晋升。隆庆元年（1567）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总裁《世宗实录》，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力主改革。隆庆二年至五年间，他与高拱、王崇古、谭纶、戚继光等一起整顿北边武备，并在此基础上同以俺答为首汗的蒙古右翼诸部建立封贡互市关系，使北方边塞数十年得无事。累加柱国、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职。



张居正像

明神宗朱翊钧　即位后，居正与太监冯保合谋，逐去高拱，自任首辅，掌握明廷大权，开始进行改革。万历元年（1573）六月，他提出以“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同时注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之士。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了行政效率。居正又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整饬学政，禁止讲学，查禁私立书院，因此巩固中央集权。随后，他陆续实施清通欠、省驿递、惩贪墨、汰冗官、省支出等项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又开始改革赋役制度。支持庞尚鹏和白栋在福建、山东行一条鞭法；又调张学颜任户部尚书，使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河南、北直隶等地区。由于居正的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得以基本确定。为清查隐漏土地和推行一条鞭法，又在福建开始清丈田亩；



张居正编著的《帝鉴图说》

并决定丈量南北直隶、山东、陕西各勋戚田庄。八年十一月，命户部拟订清丈条例八则，下令在全国实行。凡公开抗拒的勋戚，均夺爵革禄；凡迟缓怠工或册报多虚的官吏，均予夺俸。至万历十年末，在全国共丈出历年诡寄、隐漏及开垦未报的土地约一百四十七万余顷。与清丈并举的是查革冒免，即清查冒充优免的丁田，不许官僚假冒优免逃避赋役。居正还采取厚商措施，整顿钱法，严禁私铸，同时许银钱兼用，许商税纳钱；批准实施户部“速通关以甦商困”和“减税契，宽铺行，恤商人”之请。并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减轻了黄、淮下游的水患，漕运畅通。对周边民族，居正“外示羁縻，内修战守”，整饬边防，改善了民族关系。他以戚继光等主持蓟州防务，以李成梁镇守辽东，边防败坏局面得到扭转。七年，他还通过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

张居正曾镇压农民起义。他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从事的改革，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但改革对扫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好处。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政府收入增加，国家财政状况有很大好转，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强大地主势力的百般顽强阻挠。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遇父丧而未归里守制，官僚豪强即借“夺情”事劾，企图将其逐去，但未得逞。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几乎全行废止。他居相位十余年，多有建树，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寻以言官诬劾，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家被籍没。后因言者复攻不已，诏尽削居正官秩。其言论文章后由子懋编为《张太岳集》。清光绪年间重刊本称《张文忠公全集》，共四十五卷，传世较广。主要著作有《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海瑞】

（1514～1587）明朝大臣。字汝贤，一字国开，别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回族。祖宽，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四岁而孤，家境清寒。母谢氏矢志励节，教训惟严。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举；三十七年，任浙江淳安知县。他体察民情，革除弊政。时首辅严嵩之爪牙鄢懋卿，以总理盐法都御史巡行郡县，所到之处莫不竭力款待，至淳安，海瑞供给甚薄，因而得罪懋卿。时海瑞已任嘉兴府通判，鄢遂嗾其党劾之，仍以旧职改调兴国。四十三年，调任户部主事。时朝政腐败，赋役日增，百姓怨声载道，而皇帝却专意斋醮，妄图得道成仙。瑞遂市棺木，诀亲友，冒死上《治安疏》。指斥明世宗朱厚熜君道不正，迷信妖妄，致吏贪将弱，民不聊生。希其幡然悔悟，讲求治道。疏上，瑞之“直声震天下”，帝盛怒将其下狱论死。帝病死后，瑞获释



海瑞像

复官。隆庆三年（1569），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江南土地兼并严重，租债剥削颇残酷，加以水利失修，百姓痛苦不堪。瑞至，浚吴淞江与白茆河，限制租债剥削，实行均田均税，推行一条鞭法。裁抑兼并，雷厉风行。如致仕首辅徐阶，子弟家奴，横暴于其家乡松江等地，占田二十四万亩。百姓向海瑞投牒讼冤者日以千计，瑞遂按问其家，令其退产过半。徐阶之弟侍郎徐陟，武断残民，瑞辄逮治罪，尽夺还其侵田。不久，徐阶以重金嗾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劾瑞并罢其官。民闻讯，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海瑞闲居家乡十余年，至万历十三年（1585），以荐被任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寻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

海瑞一生刚直不阿，积极反对贪污和奢侈；挫抑豪强，清丈土地，退田予民，改革、佃仆、佃户的地位；禁止向城市居民滥派供应；清理驿传，禁馈赠，惩贪官；秉公执法，审理积抑，昭雪许多冤狱。他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清苦之行举朝第一。十五年卒于官。赠太子太保。死后仅余葛帏旧衣，赖同僚捐治葬具才得葬殓。故深得百姓拥戴，发丧之日，市民送者夹岸，酹酒而哭者百里不绝，被百姓呼为“海青天”。其著作收录于《海瑞集》中。

【洪承畴】

洪承畴（1593～1665），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初为明刑部官员，后外赴浙江、江西、陕西诸省，累次升迁。因镇压陕西农民起义有功，崇祯四年（1631）授陕西总督。三年后，代陈奇瑜任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五省总督。洪曾多次击败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崇祯十年初在陕西潼关附近大破李自成义军主力，李自成率少量部下逃脱，隐伏山中一年有余。当时，清军侵入直隶，威胁北京。洪承畴人卫京师，并于崇祯十一年初任蓟辽总督。崇祯十四年，清军围祖大寿于锦州，洪发兵往援，却被图于松山。崇祯十五年三月十九日，松山城破，为清军所俘。洪承畴投降清兵，隶属于汉军镶黄旗。而北京却接到了关于洪死难的误报，明毅宗朱由检遂命于京师建祠，以表彰这位误传中的忠臣。其祠紧邻正阳门，后被改作关羽庙。

洪受到了满洲首领皇太极即后来的太宗皇帝的厚待，但在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于1644年北京定都之前，未曾任官。洪在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年五十二岁时授大学士；顺治二年，洪授命以“招抚江南”衔往南京，但实际职

责是为勒克德浑及博洛及其他南征各军筹饷和供应粮草。顺治三年初，南明唐王政权的大学士兼领安徽各军的黄道周被清军俘虏并处以死刑，洪是主持者。有不少在江南领导抗清的明朝官吏和明朝宗室遭到他的镇压。但是洪承畴却经常受到满族官员的怀疑，多次被指控与明廷有秘密联系。在南京的三年间，他右目失明，顺治四年左目亦近失明。其时洪承畴父卒于福建原籍，洪承畴请奔丧获准。但守制期未满，又受命复任大学士，洪承畴遂于顺治五年偕母返京。顺治八年，曾兼理都察院数月。为了对该官署进行改革，他同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进行密议，结果三人皆被指为蓄意谋叛。洪承畴又因私送其母归里不曾奏报再受弹劾，尽管如此，洪承畴仍被准许留任。

顺治九年，洪承畴母亲卒于福建，但洪承畴未获准离任守制。同年，清军在广西、湖南、四川诸省与南明将领李定国和孙可望交战失利，北京朝廷颇为忧虑。孔有德的死讯使年轻的世祖皇帝决意派一强将出任南方清军的主帅。于是选中了洪承畴，授其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之职，统领五省文武官员，加太保，衙署设在长沙。不久南明内部内讧，孙可望为李定国所败，于顺治十四年末降洪，吴三桂自四川，赵良栋自广西，洪承畴亲领汉军组成第三路自湖南出发，并与各旗所部满洲军队会师。

清兵在数月之内便占领贵州并迅速开入云南，而洪承畴则驻守贵阳以筹措军饷，顺治十六年初，明桂王朝廷所在地——云南首府亦被攻克，桂王逃往缅甸。洪承畴似乎有意不愿听从清廷之命去穷追明军，而以年迈体弱和目力不济为借口乞请返京，所请获准。吴三桂遂受命去征剿最后一位明王。

洪承畴于顺治十七年抵北京，任大学士一年余。顺治十八年五月，即世祖皇帝驾崩后三个月，他获准致仕。尽管他是清朝征服中原最得力的干将之一，清廷却仅仅授予了他较低的世职——三等轻车都尉。有些史学家认为，对洪承畴的这种冷遇，如前所述，是由于他曾拒绝在云南继续进兵。洪承畴卒于康熙四年（1665），谥“文襄”。

【汤斌】

汤斌（1607～1687年），字孔伯，号荆岘，晚年又号游庵，河南睢州人。他于顺治九年（1652年）中进士，选作庶吉士，并被授为国史院检讨。此后，历任潼关道副使、翰林院侍讲、浙江乡试主考官、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著有《洛学编》、《潜庵语录等》。

心系百姓

汤斌就任江宁巡抚时，正遇淮安、扬州二府遭受水灾。前任巡抚余国柱曾上疏说：“水退，田可耕，明当征赋”。意思是：待水退之后，田还可以耕种，明年应当照例征收赋税。汤斌惟恐百姓承受不了，属下也难以交差，便派人重新勘察。结果，发现绝大部分灾区的积水并没退；即使个别地方的农田已露出水面，也根本无法耕种。于是，他上疏奏请皇帝废除余国柱的建议，实事求是地确定赋税数额。康熙帝览罢，当即恩准了他的奏请。

按照当时的规定，江苏的赋税在全

国是最多的，每年的本征和折征共计白银500万两。此外，皇上还命令分若干年附带征收以前的漕粮欠额。百姓无奈，不得不冒着杀头的危险而拖延上缴；各州官吏也明知完不成征税任务，宁愿降职甚至革职也希望卸掉负担。汤斌获悉此情，又大胆上疏，说："苏州、松江土地狭小，人口稠密，而条银、漕粮、白粮、正供、耗羡以及自粮经费、漕粮剩余等五米十银，还有杂项差役，无法统计。小小的两个府田地没有增加，而承担着相当于大省100多个州县的赋税，百姓实在不堪重负……恳请将苏州、松江钱粮粮照征收规程减少一二成。"康熙认为"所言极是"，也当即批户部讨论准行。

后来，淮安、扬州、徐州三府又闹水灾，几乎颗粒无收。汤斌仍及时地逐条列举免征及救灾事宜，并请求从国库中拿出5万两白银，到湖广一带购买大米。没等圣旨颁下，他又行文漕运总督、河道总管，请他们帮助救济淮安百姓；而自己则披星戴月地奔赴于清河、邳州，丰县等地视察救灾。

革弊布新

当时的江苏一带，照康熙帝的话说，是"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多，力田者寡"，亟须"去奢返朴"。也就是：崇尚虚华，安于享受，从商的人多，耕田的人少，迫切需要刹住奢侈之风，形成淳朴的习俗。

为此，汤斌首先从教育抓起。他命令各州县都要建立社学，大讲《孝经》、《小学》，向人们灌输忠孝仁爱的思想。同时，基于当地曾出现过不少历史名人的特殊情况，又令人修建太伯祠以及宋代贤相范仲淹祠、明代周顺昌祠，大力弘扬先贤们的风范，为时人树立光辉的榜样。接着，他又规定：官府小吏、卖唱跳舞者不得穿皮衣和丝织品，还没收并焚毁各类淫词小说之类，以净化社会风气。

在苏州城西的上方山，当时有座五通神祠，具有几百年的历史。据传说，那里的五通神特别灵验，从而招致了远近许多人前去朝拜、上贡。因此，上方山遂被称为"肉山"，山下的石湖被称为"酒海"。巫医们除利用它大发其财外，还残害了许多无辜百姓。诸如年轻貌美的女子一旦生病求神，巫师便说是五通神看上了她，要娶她为妇，致使她受尽熬煎而惨死。汤斌得悉此情，很快便严惩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巫师，并下令收缴了全部的五通神偶像。凡是木头做的，便烧掉；凡是泥土塑的，便扔进湖里。他还要求各州县：凡是类似的祠堂，一律拆掉，将原建筑物的砖瓦、木料统统用于修建学宫。

经过汤斌一番大刀阔斧的革弊布新，兴利除害，江苏风尚有了明显好转，百姓们无不心悦诚服，拍手称快。康熙南巡发现了这些新变化，很高兴，专门接见了汤斌，还赐他一幅亲笔写的字和一身狐腋做的绣蟒官服。

刚正不阿

汤斌就任江宁巡抚期间，正值贪官明珠在掌权。当朝廷免征江南赋税时，明珠的党羽余国柱曾让人告诉汤斌，说这是明珠的功劳，江南人应报答明珠的恩德。汤斌情知明珠在乘机索贿，余国柱也想捞一把，但他置若罔闻，根本不理那一套。

到考核天下官员时，各省官吏无不携带着大量金银财宝进京，竞相挤入明

球府邸。惟独汤斌管辖的江宁一带，没有一个官员前去送礼的。

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天下大旱，人心惶惶。康熙帝命有关人员查找原因，提出对策，钦天监灵台郎董汉臣表示：这是由于贪官乱政惹怒了上天的缘故。对此，明珠又怕又恨，遂指使党羽陷害他。结果，康熙帝听信谗言，决定将他斩首示众。恰在这时，汤斌进京述职。为了拉拢他，余国柱主动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料，汤斌却脱口而出："董汉臣根据诏旨议论朝政，没有死的理由。大臣们不讲而小臣敢讲，我们应当自省"。接着，在面君时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康熙帝认为他言之有理，也便免去了董汉臣的罪行。

汤斌一系列义举终于惹火了明珠、余国柱一党。为了打击报复他，他们摘录了他的一些言论上报，并找出他在苏州所发布告中的话"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作为对朝廷的诽谤和攻击，奏请康熙帝革去他的职务。好在康熙乃一代明君，仔细推敲后没把它当作一回事。

汤斌自江宁巡抚改任礼部尚书时，苏州百姓无不哭泣挽留，商人停市三天，满街巷都在烧香为他送行。在明珠一伙陷害他时，余国柱曾编造和散布了许多谣言，说皇上要将他降隶旗户籍。在京的江南人误以为真，很多人伤心得落下眼泪来。还有一些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准备去为他鸣冤，甚至告御状。后来发现根本没那回事，才散去。

汤斌病逝于康熙二十六年十月（1687 年 10 月），享年 81 岁。此后，清朝历代都视他为清官廉吏的典范。为示表彰，雍正年间，其牌位准入贤良祠；乾隆元年，获赠谥号"文正"；道光 3 年，又随从附祀孔子庙。

【于成龙】

于成龙（1617～1684 年），字北溟，号于山，晚年自号于山老人，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明朝末年为副贡生，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被选任广西罗城县（今广西仫佬族罗城自治县）知县。那时，他已 45 岁了。

立意济民

于成龙出身农家，家产尚可维持生计；而传说的广西蛮烟瘴雨，北方人不服水土，十有八九不能生还。为此，亲友们一听说委任他为罗城知县，大都劝他不要去。但他认为：我已立意修缮，为民造福，哪能知难而退？于是，变卖了部分家产，凑足路费，告别父老，留下妻儿，独自带着 3 位仆人，毅然登上了南下的路。

于成龙到达罗城后，只见那儿的环境比想像中的更恶劣：四面群山环绕，到处河流纵横，数里之内不见人烟。所谓的县城，没有城池街道，只有几处茅庐，住着数户人家。至于县衙，也无门墙，而是"插篱棘为门牖"。院内只有 3 间草屋，东边算是宾馆，西边是书吏舍。而且到处长满了荒草，即便大白天也常有野猴钻来嬉戏。于成龙见此情状，心中不免有些凄苦，但他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亲自"累土为几案"，又在柱子下支锅、铺床，开始了艰难的宦海生涯。

在于成龙到达罗城之初，当地还常有盗贼出没。他为防不测，晚上睡觉时，总在枕旁放把刀。但他认为：地方上的

盗贼，大都是些穷百姓。他们本来不愿为盗，只是饥寒刑罚所迫，才沦为盗贼。所以，他主张“勿戕民命”，“勿剥民肤”，而应该多方招抚。基于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很快便使不少人改邪归正。与此同时，他还常常光着头，赤着脚，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深入到附近居民中，同他们一起劳动，一起聊天，相机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并通过他们向更多的人宣传自己的施政要领。百姓们见这位“县太爷”如此平易近人，都亲切地称他为“阿爷”，乐于向他说些心里话。为时不久，因多年战乱和盗贼滋扰而外逃的百姓纷纷返回故里，竞相开荒种田，逐渐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于成龙十分珍视这一好的势头。每逢农忙，他都到田野四处巡视。遇到辛勤耕作的百姓，主动向前打招呼，进行慰问。一季下来，他见谁家收获丰盛，就命人在其门外树立标志以示表彰；对那些因懒惰而使田园荒芜者，就动员各方面力量给他做工作，帮他们改过自新。

几年之后，罗城嘉禾遍野，牛羊满山。百姓们不但不愁衣食，不少人家还盖起了新房。然而，于成龙从山西老家带来的那3位仆人，却有的病死，有的逃跑，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对此，他无怨无悔，一如当初。朝廷得知他政绩卓著，百姓爱戴，遂提升他为四川合州知州。

清正廉洁

于成龙在任罗城知县时，几乎天天喝粥，菜肴也只是一盘豆，一碟青菜。百姓们基于自家生活的好转，又见他的仆人们全都离他而去，十分不忍，几乎天天有人前去看望他，还不时地给他带些钱物。对此，他总是先道谢，再推辞。他说：“我一个人在此，用不了多少钱。请你们拿回去买些可口的食物侍奉你们的父母，就如同送我一般。”

有一次，于成龙的长子千里迢迢来看他，他十分高兴，空前地买来一只鸭，煮了半只拿给儿子吃，另半只腌了挂起来，留待过年用。待儿子回家时，百姓们争先恐后地凑了好多钱，执意送给于公子。于成龙又一再表示：“这儿离我家6000里，一个人带着钱，可是累赘啊！”说罢，坚决把钱退回去。百姓们感动得泪流满面，纷纷向他下跪叩首；他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于成龙调任四川合州后，仍然保持着他在罗城时期的好作风。当时，合州下属3个县，在籍百姓不过100户，国家每年收赋仅仅15两白银。但是，各级官吏却层层盘剥，害得百姓苦不堪言。于成龙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对属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制订了一些相关制度，自己首先做出榜样。诸如免除官员的随从之费，自己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等等。此外，还在自己的权限内，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税收；招集流民垦荒，贷给耕牛和种子，并明文规定3年之后被垦荒地归自己等等。因此，民心大快，仅1个月，当地户口就增至1000户。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赴闽之前，他命人买了许多萝卜。有人讥笑他说：“这东西很便宜，干吗买这么多？”他说：“我一路上佐餐，靠的就是它们呢！”后来，人们见他每日粗茶淡饭，所食也只是青菜一把，便为他起了个美称：“于青菜！”

福建自宋代以来，一直是市舶重地，在此任官者极易发财，但于成龙却例外。

当时，除属下官吏和一些豪门富户外，还有不少外国商人给他送礼，他都一一谢绝，真正做到了一尘不染。

不久，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成了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然而，在清正廉洁方面仍丝毫不减当年。他赴任之前，曾先请假回家葬母，而后雇了一驾骡车，与幼子同行。他们各自在袖筒里装有几十文钱，沿途住小店而不进公家的驿馆，悄悄地到了江宁任所。

为民除害

早在于成龙就任罗城知县时，他除了对一般盗贼进行招抚，还曾多次带兵入山，对那些匪首和顽固不化者，予以坚决打击。

在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时，虽然盗匪少见，但官家的“乱摊派”却成了百姓之大害。为此，他一面在自己权限内革弊布新。一面极力抵制上面刮来的歪风邪气。有一次，郡守派人送来一张帖子，令合州进献鲜鱼。于成龙当即表示：“民脂民膏都被搜刮尽了，哪还有人给他们送鱼！”说罢，写信予以拒绝，并详细陈述了百姓之苦。郡守接信后，自知理亏，又深为于成龙忧民之心所感动，遂下令免去合州10多项不合理的摊派。

当于成龙调任湖广黄冈同知时，所驻歧亭一带盗情严重。地方官惟恐上级知道后会影响自己的提升，总是遮遮掩掩。盗贼们抓住他们的这一心理，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闹得百姓鸡犬不宁。于成龙到任后，马上组织力量予以严打。为尽快摸清盗贼底细，他还自装成乞丐，混入贼穴，同盗贼巧妙周旋了10多天。然后，回到衙门，招抚个别盗头，令他戴罪立功。结果，很快便捕获了9个大盗首领，并当众活埋了7个。从此，岐亭地区社会治安焕然一新。

在于成龙先后担任武昌、黄州知府时，吴三桂等三藩叛军已占领南方5省，与清军争夺两湖要地。这时，云集湖北的八旗禁旅搅扰地方，漏网的盗贼卷土重来，又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成龙为确保百姓利益，亲自面见清军大将，迫使八旗恶少有所收敛；接着，又亲率招募来的乡勇人山剿匪。他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使乡勇备受鼓舞，从而彻底捣毁了贼窝。

于成龙死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68岁。史书上说，他死后，人们见他只有一件绨袍，几罐盐豉，“四壁萧然，无异寒士。将军僚属相哭失声”。即便“平时心惮成龙者，亦俱感动流涕”。康熙帝闻讯，也颇感忧伤。随后，谥清端，加赠太子太保衔，将他树为清官的楷模，称赞他为“古今第一廉吏”、“清官第一”，勉励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学习他、效法他。

【范文程】

太祖心腹　南征北战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宋朝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十七世孙，祖先在明初的时候因罪自江西被发配到沈阳，遂成为沈阳人，后又迁转到抚顺，其曾祖是明正德年间进士，曾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年少时极好读书，性格聪慧沉毅，与其兄文采同时考为沈阳县秀才，天命三年（1618），清太祖攻下抚顺，文程与其兄共同拜见太祖，太祖欣赏文程的气度不凡，与他谈过一番话之后，对他非常器重，后又得知他是明兵部尚书的曾孙，兴奋地对他身边的诸王贝勒

们说："这是名臣的后裔，你们都要好好的对待。"以后清太祖进攻明朝，攻取辽阳，占领广宁，范文程皆参与策划。

清太宗即位之后，范文程进一步受到重用，随时伴侍在太宗左右，天聪三年（1629），清太宗伐明，从蓟门攻入，打下遵化。命范文程率一支军队攻打潘家口、马兰峪、三屯营、马栏关、大安口等，连取五城。以后明军反攻，包围大安口，范文程用火器解围，给了明军重大打击。不久清太宗率军攻打永平，留范文程坚守遵化，明军又来偷袭，范文程率军力战，身先士卒将明军打败。范文程因这几次战功被提升三等轻车都尉。到天聪五年，清军包围明军营垒大凌河，但久攻不下。这时沈阳城中的蒙古降卒有阴谋叛乱倒戈的迹象，清太宗听后，十分愤怒，要尽杀这些降卒，范文程多次力劝，并用自己的身家力保，清太宗才终于宽恕了这五百降卒。这时明朝有一个将领坚守在大凌河旁边的西山山头之上，凭险坚守，清军久攻不下，范文程单人单骑驰至山下，向坚守的明军晓以利害，进行劝降，明军终于归顺。清太宗为此十分高兴，以全部投降的明军士兵都赐给了范文程。

天聪六年，范文程再次随清军攻打明边陲，出发之前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同时给太宗上书，认为此次出兵如果攻击宣化、大同不如攻击山海关。但太宗没有采纳，等到清军到了归化城，皇太极召集范文程等商议，范文程等再次上疏道："观察我军的情绪，志在对明朝腹地进行打击，因此应当直接攻击北京附近，然后攻取山海关而归，以宣扬我军威。如果考虑从何处进军，现在最好从雁门关而入，这样道路既方便没有险阻，附近的居民也十分富庶，可以解决粮草供应。如果怕这样做师出无名，可以宣告明朝的军民说，察哈尔汗逃跑，他的所领部属尽归于我，这些人随我们回到辽东不可能徒步远行，因此借道而行，而且我们是与你们来议和，并借马匹来帮助我国新附之部众。如果和议成，我国可以偿还马钱。如果明拒绝，我们就兴师问罪，你们国家土地都归我所有。当然因战争使你们受到骚扰，我们所经之处以后将免赋税数年，我们这样就是堂堂正正之师了。否则，可以作书送给明朝的守边将吏，让他们转达明朝的皇帝，关于我们请求和议的诚意，约期决定进止。明大臣在内阻挠，边将在外推诿，拖延过期，我军即乘衅而入。我们进入明境，利在深入，多得人畜财物，否则利在速归，如果像现在这样半途而返，将徒劳无益。"皇太极听后大为赞赏，清军依计而行。

到了天聪七年，明将孔有德派人到清要求投降，这时正好明朝军队对其围攻很急，皇太极命令范文程与诸王贝勒同率军队增援。范文程到后转送了皇太极的旨意，孔有德等遂率所部归降。从此之后的破旅顺，复皮岛，征朝鲜，定蒙古，范文程都参与谋划。

崇德元年，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并封其为二等参领。清王朝立国之初，设立八旗制度，每旗设旗主固山额真。当初许多大臣都推范文程为固山额真之一，皇太极对诸臣说："范章京才识过人，固山只管一旗，我把他作为心腹，将另有重用。"范文程以后所经管的都是军国机密大事，每次皇太极召问，都要几个钟头才结束，有时刚刚回来还没有来得

及吃饭休息，又被召入宫内。皇太极非常重视范文程的建议，每次议论军国大政的时候，总说："这件事范章京知道了吗?"如果有的事情商议不决，他就一定说："范章京知道吗?"如有不妥，就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议?"如果有人向皇太极报告说，范章京也这样认为，皇太极均马上表示同意。范文程曾经因为有病告假，才不多几日，就使政务受到影响，许多重大政务都只有等到范文程病后才能裁定。清王朝对各国的信札，都是范文程起草，开始的时候，皇太极还审阅一下，后来就不再看了，说："你起草的就没问题了。"范文程曾将其父范楠接到住所奉养，有一次他陪皇太极吃饭，席上有很多美味佳肴，他看到有许多是他父亲没有吃过的，犹豫几次都不肯下箸，皇太极明白了他的意思，当即命人将宴席撤掉，送到范文程家给他的父亲。范文程对此十分感激。

主张入关—出谋划策

清世祖即位之后，范文程因是两朝老臣被提升隶属镶黄旗。不久，李自成农民军开始进军北京，范文程立即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伐明以争夺中原天下，并上疏说："中原的百姓时遭离乱，极受荼毒，希望有明主出世，以安居乐业。我们以前攻入明境，曾经屠永平，以后又曾两次深入抢掠而返，因此他们必以为我们没有大志，只是希图金帛子女而已，因此对我们并不放心。此次我们出兵，应严申纪律，对明百姓秋毫不犯，宣布我们这次进取明中原之意。凡明朝官吏将官仍居其职，民仍安其业，如果这样做，黄河以北，传一纸檄文就可以平定。"范文程上书不久之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这一消息传到清王朝，范文程此时正在盖州温泉养病，多尔衮命快马将其立即召回。范文程一到就对摄政王说："李自成荼炭中原，戕害君后，这是必须声讨的贱寇。他现在虽拥众百万，但其必然失败，这有三点原因：一是，他逼死崇祯皇帝造成天怒，二是，刑辱乡绅，追拷财货，三是，掠人财物，淫人妇女，烧百姓屋舍，造成民恨。由此三条加上其骄傲无比，我军可一战将其击败。而我国军民上下同心，兵精将强，代天讨伐，拯救明朝百姓，兵以义动，师出有名，何愁大功不成?"他又对多尔衮进一步说："保护百姓是天之德也，从古至今没有靠杀戮而得天下者。如果我们只想在关外称王那就罢了。如果想统一华夏，非得安抚百姓不可。"第二天，范文程奉命以自己的名义，向明朝官吏宣布："我军兴义师是为报你朝君父之仇而来，不杀百姓，今所杀者只有闻贼乱军。凡来归降者，官吏归顺的可复原职，百姓征顺的可各安旧业。大军纪律严明，将秋毫不犯。"

清军攻入北京之后，百废待兴，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的意见，为收揽人心，为崇桢帝隆重发丧，任用大批明朝的降官，考定大批的律令，并广开言路，访求隐逸，考订文献。明朝末年赋税繁重，由于战乱赋役册籍，均毁于战火，当时只有明万历年的赋役册籍尚存。有人要求编定新的赋役册籍。范文程说："明晚年赋役繁重，万历年间的数额尚可，即以此为额，犹恐为百姓所苦，怎么能编制新册增加呢?"于是决定即以明万历年间赋税为额。

顺治二年（1645），清初步平定江南，范文程又上疏说："治天下者在得民心，文士是百姓中的精华，能得文士

心，则得民心，请立即举行乡、会试，广开仕途。”清随即开科举取士，在范文程建议下，考虑到各地战乱，交通信息不便，为此又特加开了几次乡、会试，仅几年之中，清即录取了进士一千余人，以后他们中许多成为清王朝前期的名臣。顺治五年正月，清定内三院为文臣的领班，命范文程及刚林、祁充格用珠顶、玉带分任三院大学士。顺治七年，睿亲王多尔衮死去，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党附睿亲王妄改《太祖实录》罪被处死。范文程罪本应当连坐，但世祖以范文程并未党附睿亲王，只命夺官来论赎。但很快又将其官复原职。到顺治九年又提升为一等子，并授议政大臣，负责监修太宗实录。

清入关之后，因久经战乱钱粮多不能按额征收，有时一年缺到四百万两，造成国库空虚，粮饷短缺。范文程为此上疏说：“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历经战乱居民稀少，请兴屯田道台二同知四，命督抚选廉洁能干的官吏任职，督促百姓垦荒复业，执行不力者，将惟督抚是问。”世祖对他的建议立即采纳。顺治十年，范文程又与同官一道上疏，请命令各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推举所知道的人才，不问满汉新旧，也不限官阶高下，亦不避亲疏恩怨，惟才是举，命其各上疏推荐，以备随时招用。”书上立即被批准实行。

归老还乡一宠遇愈厚

顺治勤于政事，经常亲自到内院视察，并就有关事情询问诸大臣，每次范文程都因为率先回奏，很称皇上心意。有一次，范文程恰好在端午节值班，诸臣均不在。顺治看后十分感动，对他说：“借此节日一图安乐，也是人之常情。只是逸必先劳，等国家大定，安乐方能长久。”范文程借这个机会，又向皇帝说道，君明臣良，必相互督促，始能得天之庆，共同尽国事。”顺治说：“自今以后，如果我有过都改，卿也应勤加提醒，毋忘其责。”

顺治十一年八月，顺治特加范文程荣衔太子太保，范文程上疏谢恩，同时自称年老多病乞求退休。九月，顺治特降诏旨挽留并进范文程为太子太师，不久同意他致仕退休。顺治因范文程是历经三朝的旧臣，有大功于国家，对他礼遇甚厚。范文程患病时，顺治不仅亲去探视，还亲自为其选药，甚而命画工到其家为他画像，藏之以宫内，至于赏赐御用之物更是多不胜数。如因范文程身材高大，顺治为此曾多次命人特制衣服鞋帽赏其服用。康熙即位之后，范文程曾受命回沈阳祭告太宗的陵，范文程想起与太宗朝夕相共的情形，哀痛不已，从此一病不起，康熙五年（166）八月去世，年七十。康熙皇帝亲自为其撰写了祭文，并遣礼部侍郎亲去祭祀，赐葬在怀柔红螺山，并立碑记绩，谥文肃，并赐御书匾额“元辅高风”。

【徐元文】

科举及第　效力清廷

徐元文（1634～1691），字公肃，号立斋。先祖原居江苏常熟，后九世祖徐良举家迁到昆山，因而徐家成了昆山望族。曾祖父为明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祖父、父亲均为明朝的贡生；母亲是昆山顾家的名门闺秀，舅父就是明末清初赫赫有名的爱国硕儒顾炎武。

徐元文从小沉静向学。他专攻六经，

旁涉百家。做学问力求明理致用，对"诸子百家之言"能通晓故实，刻意探索本原。其作文赋诗，清雅明达，从不粉辞饰章。他书写工整庄重，从无一字潦草，体现了他笃实的性格。当时，江浙继承东林、复社遗风，文人们喜欢结社，徐元文喜爱儒家理学，对才子雅士们的浓艳情词厌恶至极，不愿与他们为伍，于是和兄徐乾学、弟徐秉义也组织了文社，取名"慎交"，提倡三学，一时之间，博得了一些文人的赞赏。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但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并没有因明福王政权的败灭而消歇，反而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清统治者为了稳定江南地区这半壁江山，在武力镇压反清力量的同时，又从"文治"方面箝制反清思想，利用"开科取士"这一科举制度笼络江南汉族地主阶级，消弭他们的"反抗"之心。就在这年，清廷正式实行科举制度。

顺治五年，十四岁的徐元文获补诸生后，跟随兄长徐乾学赴南京参加省试，落榜后发奋读书。顺治十一年，徐元文再次参加省试，榜上有名，顺治十六年，徐元文参加殿试，殿试后，顺治皇帝认为徐元文才华出众，名字吉祥，仪表堂堂，特赐状元及第。于是徐元文便成为徐家第一位新科状元。其后，他的两位兄弟也先后高中探花，声名遐迩的"昆山三徐"从此踏入仕途。

清初对科举及第、愿意为新政权效力的汉族士大夫是恩宠有加的。徐元文的传胪典礼异常隆重，通常在太和殿举行的传胪典礼，这次特意改在御殿——乾清门举行；新科状元原是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朝冠进殿受封的，此次则恩赐冠带蟒服袭靴晋见。顺治皇帝召见徐元文后，对他非常欣赏，他得意洋洋地对孝庄皇太后说："今岁得一佳状元。"徐元文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后，深得顺治帝的恩宠，多次被召见，还曾被留膳宫内。有一次徐元文随顺治帝游南苑，顺治帝破例厚待他，竟"赐乘御马，命学士折公纳库为执"。徐元文受宠若惊，以"馆师不敢"有劳学士而婉拒，顺治皇帝方改派侍卫为他挽马。

徐元文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更加专心向学，他治学严谨，且多有独立见解，对儒家经籍从不循章守句、沿袭成说，即是对先儒的定论，也是以自己的观点去力求"举其要，畅其旨"。他治学态度又十分谦逊，不懂绝不装懂。有一次，他随顺治帝造访方丈，顺治帝向他询问佛家经籍，他坦诚地回答说，自己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学问。顺治帝也没有瞧不起他，反而说："此人大有见解"。顺治帝对徐元文的学问非常赏识，曾让他为自己的书房《孚斋》写篇文章，阐述读书之道。徐元文受命执笔，写了一篇《孚斋说》，顺治帝阅后点头称善，特命工匠刻印刊行。一时之间，诸生学子把这篇文章奉为读书之"知要"，纷纷抄录，挂于书房。

清除弊端　整顿学政

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除开科取士外，为重点培养人才，还明令地方学校向清廷最高学府——国子监贡献生员；这些生员，称之为"贡生"。当时向国子监选送的贡生有五种，五种贡生都是经过考试选上的，是入仕的正途。贡生们可以直接参加乡试，也可以经过铨选出任职官。及后，清王朝为了弥补因连年用兵而造成的国库不足，又推行了一系列捐纳或其他形式的政策。先是

允许生员捐资纳粟，换取贡生出身，称为“例贡；进而又允许那些尚未“进学”的童生也可以捐资，获得监生资格，称为“例监”；后来又允许八旗官子弟和文官四品、武官二品以上的子弟免试入学国子监，分别称为“恩监”和“荫监”。

捐纳等政策实行后，大批想参加乡试而又没有乡试资格的童生和想做官而又没有科名出身的生员，纷纷捐钱纳粮，搞上“例监”、“例贡”出身，用金钱去敲开科场和官场的大门。这些人既不必每天在国子监苦读，又免去科考的忧虑，整天呼朋唤友，花天酒地，败坏了地方学校的学风。那些”恩监”和“荫监”生均为富家子弟，他们倚仗父祖的权势，骄惰顽劣，无心向学，搅得国子监师道不立、正常教学难以进行，严重破坏了国子监的学政。面对几近废弛的学校和日薄的学风，徐元文感慨不已。他认为：“自古人才盛衰，视学校兴替”，汉唐以来，皆认真选拔，所以人才辈出，这并不是那时的人都是贤者，而是选拔精审、培养浓厚的结果。有感于此，徐元文毅然以师道自任，重教兴学，肃整学政。

康熙八年（1669），徐元文充任陕西乡试正考官，主持陕西乡试。他严防考场舞弊，注意选拔人才，那一年中榜者，大多数是出身贫寒，力学向上成绩优异的学子，对此，陕西反响很大，当地人士认为“学子奋厉读书，自此榜始”。

康熙九年，徐元文提升为国子监祭酒，充任经筵讲官，执掌国子监全部大权。当时，清廷急于筹饷平藩，滥开捐官纳监之例，每年入学国子监的学生，多数是靠金钱或官荫进来的，那些正途的贡生入监者为数甚少，并且多为年齿颓暮之人，难于培养成才。针对这种弊端，徐元文进行大力整顿。他首先奏请康熙帝恢复了“优贡”和“副贡”，又力陈捐资纳监四大弊端：一、捐纳造成冗滥。二、官贡各生所谓正途，期满考取，必历三科九年，而捐资入监者，则不计年限，从而形成了对正途者严，对杂途者宽的不公局面，势必“沮寒士攻苦之心，长富儿骄惰之气”。三、捐纳使得国子监生员混杂，而又无革除劣等生之例，造成课程难行，士风益薄。四、捐纳造成仕途积壅，补授无期，使朝政名器堪为可虑。他奏请平定三藩后停止捐纳政策，康熙帝同意了他的奏议，捐纳之例，“除河工外，得一切停止”。徐元文奏销了捐纳政策后，着手大力整肃国子监的学政。首先制订了严格的学规，要求学生尊师守纪，发奋攻读；其次作为人师，勤于教授，严于治学，端正教风。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讲授课业时词达而声宏，一丝不苟，学生们都敬服他。徐元文任国子监祭酒四年，广选优俊，严于教学，使国子监“学政大饬”，得到康熙帝嘉许。他离任后，康熙帝曾对大臣们说：“徐元文为祭酒，条规严肃，满洲子弟不率教者，辄加挞责，咸敬惮之，后人不能及也。”

整肃捏报　改善包衣

康熙十三年五月，徐元文被擢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重修《太宗实录》副总裁。第二年四月，改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日讲起居官，专为康熙帝讲学。原先，熊赐履负责经筵讲官时，规定“非尧舜之道不陈，非四书五经及宋诸大儒之言不言”。年轻的康熙皇帝对熊赐履进讲内容感到不能

满足，他让徐元文将《通鉴》与《四书》相互进讲，想从《通鉴》记载的历朝得失成败中探寻治国之道。徐元文使精选《通鉴纲目》中："关切君德，深裨治理"的有关篇章，撰成讲义，按期进讲。他讲解《通鉴》能"举其要，畅其旨"，徐元文这个阶段进讲《通鉴》里有关历史兴革内容，对康熙的行政治国有很大影响。因此，康熙帝赐他御书墨宝三幅，其中有一幅写的是"鸢飞鱼跃"，嘉奖他"讲筵之劳"。通过进讲，康熙对徐元文的政治才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徐元文先后被提升为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直到宰辅——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即使后来被降职，还被委任为《明史》监修总裁官、《大清一统志》副总裁、《三朝国史》总裁官。徐元文从此得以参与朝政大事，施展其振饬纪纲、澄清吏治的政治才能。

徐元文任左都御史期间，正值平三藩战争后期，吴三桂的几十万部众相继投降。降兵降将们要吃要饷，耗费巨大，使本来就吃紧的国库更显得入不敷出，军需更加显得吃紧。如何处理这些降众？有人主张把他们羁留云南；有的主张将他们调移他处；有人主张对他们进行整编；有的主张把他们划归各旗管束。徐元文认为这些主张皆不可取。他认为几十万降众羁留云南，绝非长久之计，弄不好会激起事变；调移他处，千里调动，耗费更大；换将整编，降众会疑心，终将留下隐患；划归各旗，降者人多势众，旗官如何管束？他上疏康熙帝，提出了独立有效的处理意见：第一，对胁从之众要恩许自新，以利瓦解三藩的军队。第二，安置恩许自新的胁从之众要区别对待，凡可留用者，应与绿旗将弁一例录用；不宜留用者一概分遣为民，由各道安插。这样一来，既可减少俸饷开支，又可充实军需。至于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旧隶将官，"尤宜解散，勿仍藩旗名目"。康熙帝采纳了徐元文的建议，利索地解决了这件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徐元文还疏请革除三藩在粤、闽、滇、黔诸省的虐政，如盐埠、渡税、鱼课、船捐、牙行、助庄、圈田等，他上疏奏道："今大兵势若雷霆，滇民望救水火。"请康熙帝"宜预敕将军督抚入境日即为蠲除"。康熙帝一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荡除了旧日三藩辖地的横征暴敛。

清初曾多次下令清查隐占田亩，以实国库，并订出奖励性的规定："凡查出者分别甄录"。那些知州知县为了升官提职，凭空捏造。一些州县一夜之间竟多出几十万亩"田地"。这些"田地"的税赋自然摊到昕在地农民的头上：三亩之家缴五亩税，五亩之户纳十亩粮。强摊硬派的作法，弄得许多交不出税赋的人家，有的被逼得卖田典地，倾家荡产；有的被迫卖儿鬻女，家破人亡；更多的是携老扶幼，逃亡他乡。清政府的清查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以实国库"的目的，相反，却更加破坏了农业生产，为造就一大批贪官污吏埋下祸患。

徐元文对这种清查政策的危害是深有感受的。当年的江南粮案徐元文也名列欠赋册中。他历经四年申诉、辩解，才得以申冤复职。江南有万余名因欠赋而被罢官、降职的文武官员，更有那些平头百姓，因官吏捏报田亩而陷入欠粮案中，身陷冤狱。旧冤未申，岂能让新冤又起！徐元文决心谏止捏报之风，严处贪污之吏。

徐元文知道，要严处贪官污吏，杜绝伪报之风，最重要的是掌握证据。徐元文上奏，力陈清查弊端。奏疏说："有些地亩，本无主名，原非隐占"，州县官吏"妄造诡户，谬托清厘，实则强派分赔，造成百姓不堪困苦，率多逃亡。"他还揭发一些督抚对属官捏报田亩之事，非但不查处，还"既共同欺妄于前，又为之掩盖于后"。他力请申严对捏报田亩的处罚条例："凡从前捏报，但行检举，姑予宽免。若始终掩盖遮蔽下情，应加等治罪。""安民在于察吏，而察吏当自大吏始。"因此，他又上奏时下督抚存在的四大问题：一是"不举其职"，二是"察吏不严"，三是"功过无准"，四是"心多侥幸"。康熙帝对他的奏议非常重视，转批给吏部讨论通过。从此以后，督抚和州县官吏心惊胆战，虚报田亩、损农害民之风才得以平息。

满清建国时期，在镇压农民起义、消灭南明政权及地方抗清武装的战争中，满清贵族掠夺大批百姓，把他们充为旗下奴仆，通过圈占田地，强迫失地农民投靠为奴。并且想方设法地逼迫民人卖身为奴。这些被称为"包衣"的家奴，被其主子强迫为他们耕田种地，放牛牧马，捕禽猎兽。包衣不仅要从事繁重劳动，缴纳高额地租，而且身份极为卑贱，经常遭受主子凌辱、鞭挞和转卖，每年被毒打致死和受辱自尽者数不胜数。广大包衣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野蛮的、落后的家奴制剥削和压迫，纷纷逃亡。

清统治者为了维护以"满洲籍家仆资生"的家奴制，虽施用严刑峻法，比如严惩窝主，重挞逃人等，但还是未能杜绝包衣逃亡。杭州将军马哈达认为地方缉捕逃人不力，疏请让八旗官兵自行缉拿，不必移交地方衙门处理。徐元文不同意马哈达的建议，他认为光靠严峻的"逃人法"是不行的。不禁止家主凌辱虐待，不废除奸人拐骗掠卖，包衣逃亡就不会杜绝。治病要治本，他上疏条陈对策：一、八旗家人投水或自尽者，经"验有伤痕及一家中前后死三者，酌定处分。"二、凡买卖家奴，"必由地方正印官验问，给印契为凭，否者坐之。"康熙帝赞同他的对策，马哈达的奏议作罢。此后，包衣的景况有所改善，掠卖平民为奴的案件也相应减少。

忠言切谏　无所畏惧

徐元文在朝为官三十年，谦虚谨慎，忠厚待人。与同僚相处，十分平和。但他遇事刚正不阿，无所顾忌，无论是任左都御史，还是贬领史局，他都以敢于直言争谏、敢于坚持正确意见著称。

有一次，九卿会推江西按察使一职，有人推举道员张仲举担任，御史唐朝彝反对。唐的意见是：张仲举既无才学，又无政绩，不宜担任。但是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并且起草了弹劾他的奏章。当时，副都御史李仙根、给事中李宗孔不愿在奏章上署名，于是被一并弹劾。康熙帝批转部议，结果二李被降五级调用，唐朝彝被革职。徐元文得知此事，马上上本奏道：九卿会推官员的目的，就是要求众人各抒己见，意见不一有什么可怕的？如此处分意见相发者，抑或所举不当，谁敢驳正？今科道公疏，不许一人不列名，若一二强有力者操纵廷议，众人只能随声附和，其后果不堪设想。康熙帝认为有理，答应免去诸人处分。

清初为用兵筹饷，实行捐纳授官政策，规定凡捐纳做官的，任满三年后，

称职的予以升转，不称职的罢黜。但在实行中罢黜一项等于是虚悬。后又规定三年期满再捐纳的，一律升转，因而造成仕途壅塞，官吏冗滥，吏治腐败。

徐元文任左都御史时，各部、寺、院有三千多笔帖式要求按照前例捐升官职，他坚决认为不能办。有些人害怕会酿成事变。主张让步。满族大臣也劝他不要触犯众怒。徐元文当然深知这些笔帖式不是好惹的，他们都是满族权贵子弟，都是负责翻译汉文书、整理簿籍的低级官吏，实际上是皇上委派的谍报人员，负有监督、考察各部军政大吏的特殊使命；得罪他们，等于是惹祸上身。但他还是坚决不让步，与同僚们争论了三天。后来，他对同僚们说："这件事当'独为一议'，由我一人上奏，责任也由我一人承担，决不连累大家。"最后，康熙帝认为徐元文的意见，有利于精简官员、澄清吏治，同意采纳。

平定三藩之乱后，群臣纷纷上疏康熙道："天下荡平，皆赖皇上一人功德所致。"请他登封泰山，荣受尊号。徐元文反对大臣们的建议。他认为三藩战争已使国家创痍累累，生灵荼炭，现在还未到歌功颂德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振纲纪"、"核名实"、"崇清议"、"历廉耻"。他建议，乘此武定功成之时，要严谕大小官员"崇大体"、"课吏材"、"定国是"、"正人心"，使国家的元气得以恢复。奏搞写成后，同僚们认为疏上言辞太直太切，会使皇上扫兴，劝他不要上奏。徐元文婉拒劝阻，毅然上奏。康熙帝看了徐元文的奏章后，十分赞同他的建议，登封泰山的大典终于停止。

康熙二十二年冬，徐元文因推举官员失当而受牵连，被降调史局，负责监修《明史》。当时史局已建立五年，修史工作进展缓慢。徐元文到任后，无暇旁顾，埋头修史。他取来史局诸人所写的纪传稿，参照百家之说，逐条考订史实。他治史态度严谨，每遇疑问，或写信，或送钱、送礼敬请熟知前朝典故的人解难释疑。在他的统领下，修史进度很快，一年之内，完成纪传十之六七，缮写本纪七卷、列传十五卷进呈康熙帝。

修史名义上是学术性工作，但在清代，却包含着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关于南明诸王及其大臣史事如何撰写，是《明史》编纂体例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会触怒皇上。历史上，由于秉笔直书而触犯皇上、遭致被革杀的史官，也不在少数。一些人出于顾虑，主张以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覆亡为断，南朝诸帝不必写人。徐元文不同意，他认为南明诸王是客观存在的史实，不写入他们，《明史》何以为史书。争论不决之后，他毅然上疏，提出了关于编纂南明诸王史事的意见。他认为：《明史》的编写，本纪可以崇祯帝终止，但南明福、唐、桂三王史迹，不可以不著，如何写人？请援用《宋史》益、卫二王和《辽史》耶律大石之例，将三王著人附传。至于明末诸臣尽忠前所事者，凡考之有据者，都应当采摭。康熙帝看了徐元文的奏本，一时也难以处置，他召见徐元文，详细询问原由。康熙帝沉思很久，点首同意徐元文的编纂意见。南明诸王及为其尽忠的大臣们的史事，由于徐元文的力谏，在《明史》中得以再现。

徐元文为人外和内刚，直言无忌。他为政不畏权贵，尊礼守法。然而由于家门子侄不贤，巧取豪夺，为恶乡里，

给政敌提供不少口实，使得徐元文一再遭劾。先是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他入阁拜相后，收受贺银五千两。康熙帝置之不究。不久两江总督傅拉塔纠劾他及其子侄家人："以官生理，公然受贿，扰害地方"。此次是满族封疆大臣的弹劾，康熙帝不能不问，追查结果，所讦各条虽多为徐元文子侄和家人所为，但他未能辞其咎。康熙帝法外加恩，让他致仕回籍，徐元文回乡后，昔日煊赫热闹的门庭变得门可罗雀。他感慨人情万端，官场险恶，终于抑愤成疾，一病不起。不到一年，在康熙三十七年闰七月二十七日，这位清代名臣便郁郁而终。

【张英】

张英（1637～1708年），字敦复，号乐圃，江南桐城（今属安徽）人。康熙年间中进士，曾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由于精明强干又清正廉洁，一直深受皇帝宠信。

张英在文坛上也颇负盛名，其《聪训斋语》、《恒产琐言》和《笃素堂文集》等书，曾一度广为流传。

节俭济贫

张英一向力求节俭，从不奢侈浪费。平时，每顿饭最多是两荤两素，而且只吃八成饱；穿的，也常常是那些旧衣衫。他认为，当时京城一桌酒席往往超过几十两金子，完全是为了讲排场、摆阔气，有百弊无一益，理应革除。所以，他几乎从不应邀赴宴，更不主动地设宴待人。对于时兴的看戏风，他也不感兴趣。他曾多次表示：与其把钱花在请客看戏上，倒不如拿去救济贫困急难的人，让别人也和自己分享其利、共享其乐。

对于过生日，张英也历来不讲究。但当他60岁大寿时，他的夫人却破例地费起心思来。照她的计划，是专门雇个戏班子，唱一场"堂会"，并设宴款待那些前来贺寿的亲朋好友。张英得知后，坚决不同意。他劝夫人取消这一计划，而用这笔费用做成100件丝棉衣裤，施舍给行走在路上的穷人们。结果，老伴依了他。当他看到饥寒交迫的陌生人那种喜从天降的欣喜样子，心中自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觉得，他这个生日过得最有意义、最愉快。

张英告老还乡后，仿照名人陆梭的方法，将一年的费用分成了12股，一月用1股。每天他都在食用方面尽力节省。到月末时，算出一月所剩余的钱，将它单独放在一个地方保存着。一旦发现谁家生活困难，或是遇有特殊情况急需用钱时，便主动地拿出来接济他们。

张英还深有体会地对人说：一个人每天多做一两件有益于他人的好事、实事，其乐趣要比每天享受丰厚的食物好得多。

注重修养

在张英生活的时代，无论达官贵族还是普通百姓，都非常重视吉日良辰。有一次，他偶尔在忌日的那一天穿了朝服出门去。刚走了不远，旁边有个人大声向他喊道："今日是忌日！"他一听，急忙转回家换掉了朝服。

事后，张英经常向其家人说：我虽然不认识那个人，但心里却很感激他。张英还就写道："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对自己没有丝毫损失，但对别人却是有益的。人们常说，同是鸟类，一听鸾凤的名字就欢喜，一听猫头鹰的声音就讨厌，这是因为鸾凤能给人带来福音，而

猫头鹰却给人带来灾祸；同是草木，人们见了毒草就避开，而见了人参茯苓则当成了宝贝。这是因为毒草能害人，而人参茯苓有益于人的健康。”由此，他得出结论：“一个人若能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益于人，彻底戒除有损于人的事，那么，人们就会盼望他如盼鸾凤，珍受他如同珍爱参苓。”

基于此，张英更加注重起自己的道德修养，几乎也做到了“每日三省吾身”。而且在博览群书中，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更加仰慕。白居易晚年时将官职、名利看得很淡，不论升迁、贬黜、留京、外放，都心平气和，处之泰然，尽其所能地多为他人谋利益，从而赢得了普天下一片赞扬声。张英鉴于白居易取字号为“乐天”，也特地为自己取号为“乐圃”，以示学习白居易。

立训育后

张英晚年曾立了一份家训。主要内容只有20个字，即：“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翻译成白话，则是“认真读书的人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尊敬；谨守田产的人永远都不会受到饥饿的威胁；为了求福而做好事的人一辈子不至于覆灭；而善于交朋友的人，则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利于“律身训子”，张英还围绕着这20个字做了一些论述。

首先，张英认为：读书可养身心。他引用《尚书·大禹谟》中的话，强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来说明人心很容易变坏，而良好的品德却不容易培养起来。他指出：人生碰到的不如意的事很多，即使白居易、苏东坡和陆游那样名传千古的人，也都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甚至受尽了折磨。所以，不要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怨天尤人，应当从读书中去增长见识，去陶冶情操，去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永葆愉悦的心态，并赢得世人的尊敬。

其次，张英主张将“耕读”作为长久之计。他说：一般讲来，人生最快乐的事有三个方面，即高贵、富裕、多子多孙。然而这三个方面，能够妥善处理就是幸福，不能妥善处理就完全会成为累赘，甚至被这种累赘所拖牵得精疲力尽。高位，令人迷恋，但同样也是遭人责备的处所，忌恨嫉妒的根源，利害得失的关卡，辛劳苦楚聚集的中心。富裕，必然招至亲戚的请求，穷人的怨望，仆人的奸骗和大小盗贼的算计；而多子多孙，一旦对他们教育不好，惹出的乱子则更大更多。接着，他列举了许多居乡耕读的好处，告诫子弟们不要思慕城里的繁华，不可妄求所谓的功名利禄，而应当在家边耕边读。这样，将无忧无虑，自得其乐。

在谈到“积德者不倾”时，张英勉励后辈们要做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并启发他们学习鸟中的鸾鸟和凤凰，草木中的人参和茯苓。还说：这样的人，必定受天地保佑，令鬼神敬佩。

对于“择交者不败”，张英论述得更为详尽。他说：一个人读完书，有了妻室，建立了家庭，渐渐远离了父母的教诲，离开了塾师的管束。这时，往往是交友的开始，也是同朋友打得火热的时候。然而，由于刚刚迈入社会，思想还不成熟，又缺乏各方面的经验，如果有行为不端的人插人进来，没有不被带坏的。一旦上了他们的圈套，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强调指出：“在选择朋友、交际往来这方面，我看到的和

亲身经历过的，最为深切。那些阴险毒辣的人如毒酒入口，如毒蛇咬人，千万不可深交，一与他们交上朋友就很难脱身，无法挽救，更是这四个方面最重要的问题。”

也许是张英教子有方，他的儿子张廷玉（1672～1755年）28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后来升为军机大臣；张廷玉的长子张若霭，也在20多岁参加殿试时，被雍正皇帝钦点为一甲三名，即探花，后来也任职南书房、军机处，并成为当时著名清官，颇有其祖、其父之遗风。

【张伯行】

张伯行（1651～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年更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他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进士，接着被任命为内阁中书。在此后的近40年宦海生涯中，曾先后担任过山东济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户部右侍郎、仓场总督和会试总裁等职。无论在哪儿，他都“力求有益于民生国计”，“贻千百世生民之福”，并做出了显著成绩。因此，素以居官清正而名扬朝野，被皇帝和百姓共同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心系百姓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张伯行被任命为山东济宁道。当时，济宁一带正闹饥荒，百姓背井离乡，四处乞讨，苦不堪言。张伯行在上任途中看到这番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让侍从将自己随身所带的钱物，不时地施舍给最困难的人。到任后，又立即下令开仓，赈济灾民。据史载，当时仅汶上、阳谷二县，就发放救济粮2万多石。他还让亲属从自己老家运来一些钱米，制作一些棉衣，送给那些饥寒交迫的灾民。但是，藩司却控告他擅动仓谷，理当撤职；他毫不悔恨，并坚信“仓谷为轻，民为重”，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朝廷核查后，并没给他任何处分。

张伯行升任福建巡抚后，除了继续关心民间疾苦，还虚心延访地方利弊，树立好的社会风尚。当他得知当地百姓视瘟神为“五帝”，并为之遍修庙宇，“祷祀昼夜不绝”时，立即下令将所有的瘟神塑像毁掉，还将祠庙改为义塾，供贫苦人家的孩子在里面念书。

多年后，张伯行从福建调任江苏巡抚，这时，大贪官噶礼正任两江总督。噶礼是满洲正红旗人，一直深受康熙帝的宠信。但他有恃无恐，贪污成性，甚至评价属下的优劣也以送礼多寡为标准，闹得百姓鸡犬不宁。张伯行针对噶礼的贪污行径，一上任便发布了禁止属员馈赠的檄文。文中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既冰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随后，他更加严于律己，从不取民一文。过去，府署所用的饮用水，全是无锡县专门送的惠泉水。他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也取消了这条不成文的规定，还明令今后一律不得再送。此外，他的日用所需也全都取自于家，致使他“家资日匮”。

刚正不阿

早在张伯行就任山东济宁道时，他曾因公务而专门进京朝见康熙帝。但负责引见的选司陈某，却想从他身上大捞

一把“引见礼”，没想到他却空手而来，连个铜块也没得到。陈某恼羞成怒，迟迟不与引见。张伯行明知就里，却毫不为之所动。在他看来，行贿受贿是件最卑鄙的事，自己宁可不做官，也决不送礼。将近两个月过后，康熙帝得知张伯行的到来，才降旨吏部，给了他面君的机会。

3年后，张伯行升任江苏按察使。照当时江苏的惯例，新官上任首先要给上司送币礼。具体到按察使，则需要给总督、巡抚馈送，礼金约合白银4000两。显然，这些钱全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张伯行得知此情，很生气，当即表示：“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于是，打破了盛行多年的这一恶习。

至于给张伯行本人送礼的，当然也有，但他总是一概拒绝。对那些不学无术而专靠溜须拍马、买官骗官者，则毫不留情地进行劾罢。

张伯行任江苏按察使期间，扬州曾有6名秀才赏花吟诗，诗中出现了讽刺昏庸官吏的句子。扬州知府自认为写的是他，便忌恨在心，命人将那6位秀才告到了巡抚处。巡抚出于官官相护，决定革去6秀才的功名。张伯行得知此事，马上了解有关情况，极力为6秀才辩解，终于使他们保住功名。

勇斗巨贪

张伯行就任江苏巡抚的第3年(1711年)秋，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江苏乡试舞弊案：由于两江总督噶礼受贿50万两白银，致使“平日不通文理”的两个人中了举，而真正的才子们却名落孙山。苏州数百名举子一气之下，将贡院门口匾额上的“贡院”二字改成了“卖完”；又把财神庙里的财神像抬入学宫，放在孔夫子圣像对面，以讽刺这次乡试为“惟财是举”。

张伯行迅速了解了有关情况，写上奏报给了康熙帝。康熙帝十分重视，即派户部尚书张鹏翮和侍郎赫寿会同噶礼、张伯行和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审此案。在审理过程中，一涉及噶礼时便进行不下去。张鹏翮、赫寿二人还想放过噶礼，而单单处理其他人。张伯行异常气愤，不顾一切地上疏弹劾噶礼，并要求停止会审，将噶礼革去官职，交大理寺审查。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张伯行的上疏还没送到朝廷，竟被噶礼以重金买了回来，紧接着他反咬一口，七拼八凑地捏造了张伯行7大罪状，告到了康熙帝那儿。康熙帝令人审讯，人人惧怕噶礼权势，无不曲意阿附噶礼，从而使案情趋于复杂。康熙帝出于多种原因，遂将张伯行和噶礼一并解职，同受审查。

然而，主审官们上奏的案审结果是：噶礼无罪，张伯行纯属诬告！幸亏康熙帝是位明智的君主，及时地驳回了他们的“妄议”，并表示：“朕自幼读书，研究性理，如此清官，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何所赖以自安?”那些主审官们这才转过舵来，拟恢复张伯行原职，罢黜噶礼。康熙闻奏，立即允准。

有口皆碑

当张伯行和噶礼一起被解职时，扬州百姓主动罢市，数千人围着他所居住的公馆痛哭失声。第二天，又有一些人拿着水果蔬菜献给他并哭着说：“大人在任，只饮江南一杯水；大人要走了，请收下我们的一点心意。”张伯行无奈，只好收下了一块豆腐和一束蔬菜。

当康熙帝宣布张伯行继续留任的消

息传到江南，江苏百姓欢声雷动，家家都在大门旁贴了一条红幅，上写："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士民还扶老携幼，一齐涌向圆妙观，焚香结彩，拜谢皇恩。与此同时，福建省的老百姓也"皆奔号呼吁"，以示庆祝。而那些身在京师的江南人，则主动集合，多达万人。他们拿着香，双膝跪地，启奏上苍：宁愿减去自己一年的阳寿，也祝愿明君康熙帝长寿万万年，以表达由衷地感激之意！

雍正三年（1725 年），张伯行病逝，享年 75 年。雍正帝鉴于他为官清正、恪勤供职，特赠他太子太保，谥号"清恪"。福建、江苏、山东的老百姓，还都为他立祠祭祀，并誉之为"天下第一清官"。

光绪初，清廷又将张伯行的牌位供奉于孔子庙。而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者，仅汤斌、陆陇其和张伯行 3 人而已。此外，张伯行的遗著《困学录》、《续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等，也畅销四海，几乎成了忠臣良将们的必读书目。

【明珠】

（1635～1708）清康熙时大臣。满洲正黄旗人。纳喇氏。字端范。祖父金台石（亦作锦台什）原为建州女真叶赫部贝勒，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叶赫城为努尔哈赤攻破，自焚受伤被缢杀。姑祖母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妃、清太宗皇太极生母，即孝慈高皇后。其家族被列为满洲"八大家"之一。顺治末，明珠以侍卫官内务府郎中，因精练能干，不断擢升。清圣祖玄烨亲政后，更受倚任。康熙七年（1668），擢刑部尚书。十年，调兵部。十二年，圣祖阅兵南苑，明珠先期预为演习。届期部伍整齐，军容甚威，为圣祖所称道。是年，平南王尚可喜疏请撤藩归老辽东，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也相继奏请撤藩以为试探。朝中大臣均知非三藩之本意，撤之必生祸乱，多数主张不撤。明珠与米思翰等少数大臣坚主撤藩。圣祖下令撤藩后，十一月，吴三桂首先叛乱，尚可喜子之信、耿精忠相继叛。明珠赞助圣祖处理平定三藩军事，著有劳绩。十六年，晋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傅、太师。先后充《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平定三逆方略》、《一统志》、《明史》诸书总裁，深为圣祖信任。然其结党营私，广收贿赂，并与另一圣祖宠信之大臣索额图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一说为圣祖授意）明珠与余国柱、佛伦等互为应援，卖官索贿，遂罢大学士，旋授内大臣。此后虽在三次对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用兵时从征，然不再重用。子纳兰性德，为清代著名词人。

【隆科多】

既富且贵　一门显赫

隆科多（？～1728），原姓佟，其族祖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明代所置奴儿干都司的指挥同知。隆科多的祖辈曾投奔后金统治者，与清皇室多有婚姻关系，成为几朝皇亲国戚，最终发展成清朝前期的世姓大族。隆科多祖父佟图赖官至都统，有二子即佟国纲、佟国维和一女即顺治妃，女就是康熙生母，后封为孝康章皇后。因是母后

之家，佟图赖在康熙年间被赠为一等公。隆科多的伯父佟国纲，为镶黄旗汉军都统，被康熙称为“舅舅佟国纲”，康熙二十八年与内大臣索俄图等人同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次年随大将军福全征讨噶尔丹，在乌兰布通遭伏击，死于此次战役。雍正初年，加赠为太傅。

隆科多父亲佟国维，是康熙时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死后于雍正元年(1723)赠太傅。佟国维有女为康熙孝懿仁皇后，隆科多是其第三子，是孝懿仁皇后的弟弟。至乾隆时期为止，隆科多一支佟姓女子有三女选为皇后，一女为妃，四男分别为三朝额附。康熙二十七年，隆科多由于显赫的门第在年轻时即成为一等侍卫，康熙三十二年由此升任銮仪卫銮仪使，两年后，兼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康熙四十三年，调任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康熙四十四年，因为部下违法，被康熙帝指责为不实心任事，遂罢去副都统、銮仪使之职，在侍卫处行走。康熙五十年，升任提督九门步军统领，掌握着京师万余名绿营禁军，并负有拱卫京师之职。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争夺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令康熙大为恼火。先是太子胤礽骄纵粗暴，屡立屡废，晚年的康熙遂不再立太子，改为“密储”。诸皇子竞起角逐，尤以皇八子胤禩据有有利之势，但他与康熙感情不合，互存介蒂。胤禩受挫以后，和他同党的皇十四子胤禵继起谋取储位，胤禵较能得到康熙赏识，此时正值西北边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之际，他被嘱以重任，授为抚远大将军。胤禵虽拥重兵，但远处边陲，对谋取皇太子之位其实也是不利的。

和胤禵抗衡匹敌者有皇四子胤禛。胤禛位手段阴柔，貌似轻快松弛，时常往来于寺宇僧人之间，实则暗中活动，随时迎合父皇意旨，博取欢心和信任。胤禛集团虽人数不多，也并非均居要津，但他外有藩邸旧人、川陕总督年羹尧可牵制在边陲的政敌皇十四子胤禵，内有步军统领隆科多掌握着京师兵权，为他日后取得皇位奠定了基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死于畅春园寝宫，终年六十九岁。康熙临终前，遗诏继统为谁，官私史书记载不一。按胤禛的叙说，康熙临终前，招诸子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留下遗言，以皇四子胤禛即皇帝位，隆科多是受末命众人惟一的顾命大臣。但是民间盛传胤禛之即位，是由于矫改遗诏才能“篡位”，康熙病中本欲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禵，但圣旨被隆科多所隐，康熙死时，胤禵未到，隆科多传旨遂立胤禛。隆科多是传遗诏之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后来给隆科多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有一条罪状即言隆科多自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也是说隆科多曾受先皇末命。然而，隆科多是如实传还是矫改遗诏擅立胤禛，这可能是千古之谜了。隆科多身为诸皇子之舅，受到康熙信任，又握有京城军队，无论谁继位，都会呵护着他，而隆科多在胤禛与胤禛这两个一母同胞之间更倾向于谁，又是否会从中做手脚，这也是不可知之事。不过雍正由亲王一步登上天子之位后，确实十分重视隆科多其人。

在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即以尚书隆科多、大学士马齐、十三阿哥允祥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诏令臣下所有奏事，交送四大臣办理，凡皇帝谕旨亦由

四大臣传出。康熙死去的第九天，雍正又把佟国维在第一次废太子中获罪而失去的爵位全部赏赐隆科多，袭一等公。不几日，又下令尊称隆科多为“舅舅”，将皇帝与臣下之间的甥舅关系重新加以确定，显示新皇上对隆科多的恩宠。同年十二月，隆科多被授为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之职；又总理事务有功，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也自侍卫擢为銮仪使。雍正元年三月，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雍正二年六月，隆科多又兼领理藩院事，并任《圣祖实录》和《大清会典》的总裁官、《明史》监修官。清廷统治者十分重视官修史书工作，常以德高望重之臣任总裁和监修官。隆科多还与年羹尧一道被赐给双眼花翎、赏穿四龙补服和鞍马紫辔。

雍正对隆科多的宠信和重用，也令人不难看出握有禁卫之师的隆科多在雍正继位中所起的作用。隆科多不比年羹尧，年不仅是胤禛的藩邸旧人，主仆二人一向过从甚密，而且年羹尧的妹妹在雍正为皇子时即为其侧福晋，而隆科多确是通过拥立胤禛，才与胤禛的关系方密切起来。雍正元年正月，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曰：“舅舅隆科多，朕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雍正向采不尚掩饰，对大臣宠信与厌恶常常溢于言辞之间，隆科多显然大受皇帝眷遇，雍正才有如此称誉之言语。雍正还在他的两位得力大臣之间做弭合嫌隙的工作。年羹尧既是藩邸元老，又是朝廷最看重的川陕封疆大吏，加上禀性高傲，并不看重有外戚身份的隆科多。雍正经常开导年羹尧，希望年能与隆科多妥为相处，还自作主张，将年的长子年熙过继“与舅舅隆科多作子”，年熙正病重，雍正以为将他过继给隆科多，会使其病情好转。隆科多闻命后也满心喜悦，将年熙更名得住，由于年熙病情太重，到底未能“得住”。皇帝的信任，使隆科多的个人权利在雍正元年之际达到了最高峰。

隆科多出自豪门大族，又是当今圣上的舅舅，受到特殊宠遇，难免就专横骄傲起来。他任吏部尚书时，对官员所进行的铨选人皆称为“佟选”，可见隆科多之大权在握，已是满朝皆知，而目空一切的嘴脸也令人渐渐生厌。

隆科多久在官场，耳濡目染，对雍正的为人也不是没有防备。雍正对获罪者常进行抄家，隆科多为防万一，把财产分藏到各亲友家和西山寺庙里。但如此做法，却有不打之招的嫌疑。雍正二年他又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之职，表明这一对君臣兼甥舅之间已有隔隙。这年，雍正在表扬河道总督齐苏勒“守法不杂，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时，捎带对隆科多某些“微词”：“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必积怨更多，难以保全。”但雍正从此对隆科多多有不信任感，也就难怪隆科多会生出戒备之心。以后雍正常常隆、年并提，对隆科多进行责备。一年前的“功臣”和“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的大臣”，大约也难逃雍正的“防微杜渐”了。

甥舅猜忌　死期已至

雍正三年正月，隆科多被解除步军统领任职，五月，雍正将隆、年之奸晓谕廷臣。六月，隆科多次子玉柱又以“行止甚劣”的罪名，被夺其乾清门头

等侍卫、銮仪卫使等官职，交隆科多管束。雍正谕曰："前因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营，赏给异数，以示鼓励，今二人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收缴赐给二人的四团龙补服，不许再用双眼花翎、黄带和紫辔。

当时，吏部正在议年羹尧妄参他人之罪，吏部前后提出了两个处理意见。但在雍正看来，前议仅罢年职，徇情庇护之意明显；后议又过当，必是隆科多有意扰乱对年案的处理。隆科多如此妄为岂非罪加一等，于是遂被下都察院议处，削其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但免革公爵，命往凉州、阿兰善山等处修理城池，开垦地亩。雍正并晓谕臣下："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他还意味深长地提醒隆、年二人不要重蹈康熙朝大臣明珠和索额图的覆辙，需痛改前非，方不至于自取灭亡。雍正表面上好像对隆、年二人有宽容之态，但他又对署理凉州总兵宋可进道："隆科多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恩，揽权树党，擅作威福"，着重指出他过去虽是他的上级，但这次到你处，对待这种"诳君背主小人，相见时不须丝毫致敬尽礼"，这一席隐含杀机的话，就注定了年、隆二人的末日已经快到了。

雍正决定在处理了年羹尧之后再处理隆科多。雍正三年十二月，朝廷以九十二款罪状赐年羹尧自裁，接下来就是隆科多了。雍正四年正月，隆科多家中两个叫牛伦、王五的仆人，挟主人之威到处勒索、接受贿财。当牛、王之劣迹被揭露后，隆科多也被牵涉其中。牛、王二人供出隆科多曾收受年羹尧、总督高世显、觉罗满保、巡抚甘国壁、苏克济、奉天府丞程光珠、道员张其仁及知府姚让等人贿赂的金银诸款，于是牛伦被斩，隆科多被罢去尚书一职，雍正令他去阿尔泰山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定准噶尔和喀尔喀游牧地界，然后等侯与即将到达中国的俄国使臣会谈。

雍正三年五月，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派萨瓦·拉古津斯基伯爵，以枢密官的头衔，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就中俄中段边界及两国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使团是经过精心筹划组建的，配有"中国通"的助手，还有一支包括一千三百名步兵、一百名龙骑兵的军队，另有地理学家、教士及其他官员随行。清廷则指定喀尔喀郡王、额附策凌以及隆科多为谈判成员。俄国使团从雍正三年九月出发，次年夏天与隆科多等相会于恰克图附近的布尔河。到了北京，雍正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人与沙俄使节谈判。

雍正五年，拉克津斯基回到布尔河后，继续与隆科多等人谈判。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的喀尔喀土地，俄使不答应，最后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而此时，隆科多私藏玉牒缮本之事被揭出，雍正降旨询问，隆科多并未从实具奏。朝廷诸大臣奏请等隆科多谈判完毕再行捕拿议处，但雍正认为勘议边界之事并非他莫属，况且这是最易解决之事，他说："俄罗斯事最易料理，朕前遣隆科多前去，非以不得不用其人，必须隆科多而使之也，特与效力之路，以赎罪耳，乃其去后所奏事件，不但不改伊之凶心逆心，且并不承认过失，将朕行查之事

降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于是在六月将隆科多逮捕回京。

雍正五年七月，中俄双方经过三十次谈判，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清朝为避免纠纷，继《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之后，此次又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在一段时期内遏制了俄国对华扩张的野心。俄使在条约签订后，急忙向沙皇报喜，认为新划边界非常有利于俄国。

同年十月，雍正命诸王大臣就隆科多一案议处。最终以四十一款大罪公布朝野，本议立即斩决，妻子为奴，财产没收入官，但雍正说：“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诛戮，虽于国法允当，而朕心则不忍”，便在畅春园外空地上造屋三间，将隆科多永远禁锢于此，其赃银数十万两，从家产中追补抵偿。隆科多的妻、子为人奴，夺其长子岳兴阿一等阿达哈哈番世爵，次子玉柱发配黑龙江当差。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朝廷赐银一千两治丧，其弟庆福袭一等公爵。隆科多的四十一款大罪中，大不敬之罪五条，欺罔之罪四条，紊乱朝政之罪三条，党奸之罪六条，不法之罪七条，贪婪之罪十六条。其中“交结阿灵阿、揆叙，邀结人心”，是其党奸罪之一。

“私藏玉牒”是隆科多大不敬罪状之一。玉牒是皇家宗谱，秘不示人，只有宗人府衙门有权披阅，而隆科多自辅国公阿布兰处得到玉牒底本，私藏于家，无疑冒犯了朝廷规矩。阿布兰因此也夺爵幽禁。又将康熙御书贴在厢房，“视为玩物，大不敬之罪二”，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大不敬之罪三。四十一款罪状中，尤以贪婪之罪条目最多，均为收受金银以及宝石之事。

【李光地】

（1642～1718）清康熙时大臣、理学家。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二年，耿精忠响应吴三桂于福建倡乱，李光地适值回籍省亲，向清廷密陈破敌之策，置腊丸中上达，得圣祖信任，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在官场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他善辨风向，知进退，历翰林院掌院学士、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要职。多次遭言官及臣僚参劾，攻之甚烈，因受宠信，得以安然为官。他钻研并笃信程朱理学，为清代著名理学家，圣祖常召入便殿与讲论。他思想顽固守旧，力主兴礼乐，厉海禁，限制与禁止发展矿业，对康熙晚年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四十五年，奉旨编修《朱子全书》以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在继承和传播封建文化中起过重要作用。他在家乡建有“榕村书屋”，晚年号“榕村老人”。康熙五十七年卒，谥文贞。圣祖称他“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著作有《榕村语录》、《榕村语录续集》、《榕村全集》等。

【张廷玉】

张廷玉（1672～1755），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张廷玉出生于京城时，父亲张英正任大学士兼翰林院编

修。张廷玉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习读满文，康熙四十二年授检讨。一年后入值南书房，几度升迁后升为刑部左侍郎，一年后以原官调吏部。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廷玉相当赏识，雍正元年（1723）初命为皇子师傅，擢礼部尚书。同年授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尚书。他还是纂修《明史》总裁官之一。修撰《明史》自顺治二年（1645）以来已肇其端，但时续时断，张廷玉雍正三年署理大学士，次年实授，他任此职直至致仕。与此同时他还身兼数项要职，多次出典会试及其他考试。雍正朝的多数诏谕规制均出其手。乾隆四年（1739）拟对厄鲁特部用兵，为了更好地、更直接地指挥战争，以及保密起见，朝廷特设了一个机构，后来被称为“军机处”，这一机构一直延续到清末。它是清廷中央政府权柄最重要的政务机构，分走了内阁在拟旨颁诏及向各省当局发送指令等方面的许多事权。第一批派充此职的大臣有张廷玉、胤祥和蒋廷锡，张任此职直到乾隆十四年致仕。

张廷玉深受雍正皇帝恩宠，赏赐极多。雍正元牟恩赐府邸一所，雍正七年又另赐较大府第一所。雍正三年以圆明园南面一座旧园赐之居住，以便皇帝移居夏宫小住时就近奉召。此园曾为索额图所有，张廷玉入居之后以“澄怀园”知名。张致仕后，入值南书房的官员入居其中。这座为众多文人赋诗赞誉的园林毁于1860年的英法联军。此外，皇帝还不时赏给银两，有一次赏他一所值三万五千两银的典铺。张还得到少保头衔及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此世职后由其子张若霭承袭。

张廷玉受命参议各项重大国事。当时雍正朝对厄鲁特用兵失利，致使平定西北之役受挫，当此之时，雍正皇帝向大臣商议对策，张廷玉率先主张停止用兵，因而有了雍正十二年的议和。雍正皇帝去世时，遗命张廷玉及鄂尔泰配事太庙，这是当时大臣所能享受到的最高荣典。

张廷玉也有好多年的时间颇得乾隆皇帝的宠信。乾隆元早（1736）高宗继位不久即晋升张廷玉为三等于爵。张廷玉作为顾命四大臣之一，在几年中协助处理国家政务，于乾隆三年初封世袭三等伯，第二年加太保。但是他后来却逐渐失宠。乾隆六年刘统勋上奏言张廷玉桐城亲朋做官的人过于多，张廷玉由此曾几次受到朝廷告诫应谨饬此事。乾隆八年免其伯爵世袭。由于张廷玉年事渐高，因此他一再乞休，皇上以其既奉遗命配享太庙，当于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故未批准。乾隆十五年一月一日，皇帝终于准其致仕之请，命待来春离京。一月十六张廷玉奏请陛见应对时，他对身后是否能配享一事颇有疑虑，乞皇帝一言为券。乾隆皇帝为释其疑虑，特颁手诏并制诗示意。一月十九日张廷玉本应人宫谢恩，但由于风雪严寒只能派其子代往。乾隆原已对张的公然不信任感到不满意，此时乃发怒气，且在几位大学士面前形之于色。次日张诣阙为前日的失礼举动谢罪，乾隆责怪大学士泄漏消息，同时也斥责张廷玉虚饰。几天后皇帝削去张四个月前晋封的勤宣伯爵位，同时宣谕：张廷玉虽实不当配享，仍准其所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请离京，适值几天前有皇长子之丧，皇帝因而诏责其不合礼仪并收回配享成命。他仅以原

任大学士头衔返回故里，推迟已久的致仕才得以实现。

张廷玉的麻烦还在后头。张廷玉有一婿系吕留良案内之人，而且在四川学政任上有枉法行为。乾隆十五年几乎籍没张的全部财产，后从轻改为罚金，并责令尽缴任官五十年来所得各项御赐物件。尽管如此，当他五年之后去世时，仍得以享受追求多年的配享太庙荣典，成为独一无二享此殊荣的汉族官员，谥“文和”。

【鄂尔泰】

鄂尔泰（1677～1745），字毅庵，隶满洲镶蓝旗，西林觉罗氏。其曾祖图门，于天聪年间在大凌河战役中受重伤于战场，赐世袭骑都尉世职。其父鄂拜曾任国子监祭酒。鄂尔泰精通满汉文字，在康熙三十四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5～1699）任本旗佐领。同年，授三等侍卫。由于他汉文知识功底深厚，康熙五十五年，擢内务府员外郎。在此任内，他以严格奉公、遵循各项规章著称。他曾谢绝当时尚为皇子的胤禛之私人召见，此举深得雍正的赏识，故当他登极后，即任命鄂尔泰为云南乡试主考。云南返回不久，授江苏布政使。他在此任上，极力奖励当地文士赋诗为文，并选辑优秀者，以及他本人的某些作品，编为《南邦黎献集》，十六卷刊行。

雍正三年（1725），鄂尔泰擢升广西巡抚，不久又改授云南巡抚，署云贵总督。雍正四年三月，他抵云南后即着手解决当地面临的许多政治问题。云贵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由各民族的土司头人统治，这些土司头人均为官方认可的世袭行政官员。但是他们往往是独立王国，胡作非为，因此经常给朝廷带来麻烦。鄂尔泰的政策，称之为“改土归流”。这种做法就是废除世袭土司，改行临时任命的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原先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已实行过。鄂尔泰向朝廷建议，废除世袭土司头人制，把各部族纳入省政系统，统一治理。他首先在贵州广顺土著部落中施行。该部落于雍正四年平定，当即将世袭土司废除。他又赴贵州亲自审理叛乱土司。雍正四年十一月，鄂尔泰实授云贵总督。此时，四川东南部乌蒙及镇雄之土司，由于忧惧自己的命运，想对抗朝廷。鄂尔泰返回云南途中，与四州总督岳钟琪协力合作，用武力迫使这些土司归顺朝廷。雍正五年，该地区即已平定，改归云南统辖。鄂尔泰为此蒙恩赐世袭骑都尉。同年末，由于他在贵州长寨地区又平定了一百八十四个苗族部落，晋世袭一等轻骑都尉。雍正五年，云南西南部爆发车里及其他部族之叛乱，鄂尔泰率军于雍正六年平定。鄂尔泰七年在大部原属刀姓土司之领地上设普洱府。

雍正六年，在俘获几名东川地区叛乱土司后，鄂尔泰另加授广西总督，因该省近贵州边境地区之土著已多次叛乱。身负三省之责，鄂尔泰于是下定决心，对归顺之土司进行抚慰工作，对顽抗者则以武力镇压，以期结束土著骚乱之局面。雍正七年，因平定之功晋三等世袭男爵。此时，鄂在张广泗协助下，又在贵州古州地区平定多处苗乱。为此，加太子太保。他对顽抗之土司或处死或流放，归顺者或给以年俸，或迁往其他省区。有几次地方骚乱，皆迅速平定。其中最严重者为雍正八年之乌蒙叛乱。鄂

尔泰任职云南六年有余，在削弱土司头人权力方面，颇具成效。鄂尔泰在原土司地区实行和汉族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如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编查户口、组织乡勇等；加强了边远地区和内地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中央对边远地区的统治。

鄂尔泰在云南政绩颇多，其中包括改进食盐及铜矿工业，并改组铸钱，凡此种种皆获实利。雍正十年初，他应召回京授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因其平苗有功，进世袭一等伯。雍正十年九月，他奉命督巡陕甘，经略军务，为征讨厄鲁特运军费。第二年，返京后，即上疏奏陈征讨厄鲁特一事劳民伤财，莫如议和。此奏获准，不久战事暂告平息。

雍正十三年，贵州台拱地区爆发一场动乱，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鄂尔泰奉命随同宝亲王、张廷玉及两位皇子，前往监督平乱。鄂尔泰以其本人在前总督任内未能预见有此大患，因奏请免其世袭封爵，所请获准，但仍保留其三等男爵。

雍正十三年，世宗病危弥留之际，诏谕鄂尔泰及张廷玉，立弘历为太子（即后来的乾隆）。并敕令鄂尔泰、张廷玉及其他两位亲王辅弼太子主持朝政；还诏谕，因鄂尔泰与张廷玉志秉忠贞，身后配享太庙。高宗皇帝即位不久，即赐鄂尔泰一等子爵，后晋三等伯。从此，鄂尔泰担任多项要职，并总裁编纂几部官修书籍。乾隆四年（1739），他奉命前往勘察黄河水利工程。乾隆十年，他因病奏请致仕回乡，但只获准留任自养。时隔不久，乾隆还亲临其家询问，赠太子太傅。鄂尔泰不久死去，身后谥“文端”，配享太庙，并入贤良祠。

鄂尔泰才能超人，政绩显著，深受雍正皇帝宠信。如此，他即逐渐成为百官之首。官吏当中，有其门生，其他皆为官场之拍捧者，张廷玉，亦权势显赫，深受恩宠，因此亦有一班朝臣追随其左右。由此，张、鄂二党的斗争，就在所难免了。这一斗争的苗头，乾隆初年即有所表露。张党中有张照、史贻直及汪由敦。鄂党中，不仅有满人，而且有汉人；汉人中有胡中藻。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中进士。他自称与鄂尔泰有师生之谊，并以此为荣，此外，他与鄂尔泰之侄鄂昌为莫逆之效。鄂昌曾任甘肃巡抚，胡中藻曾任陕西学政及广西学政，他的诗集名《坚磨生诗钞》刊行。

然而，乾隆二十年初，皇帝偶读胡中藻诗，即断言其中有侮辱满族之词句。遂下诏逮捕胡，审查胡的全部诗文。四月二十三日，皇帝下一道长诏，其中引有胡所写诗文，以此判定胡冒犯满族，侮谩圣上，并诽谤张廷玉及其一党。五月二十一日，判处斩首。为胡诗集付梓刊刻之人，或与胡有诗文唱和者，都遭到惩处。另又断言鄂昌写有反满诗文并有贪污行为，责其自尽。鄂尔泰亦因生前植党，死后受谴，被撤出贤良祠。

【田文镜】

田文镜（1662～1732 年），字抑光，祖居广宁（今辽宁北镇），后入汉军正蓝旗。雍正五年（1727 年），因功抬为正黄旗。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22 岁的田文镜以监生入仕，担任了福建长乐县

县丞。10年后，升任山西宁乡县知县；又过了8年，才官至直隶易州知州。直到他60岁时，虽然为官40载，也只是内阁侍读学士，为从四品官，相当于地方上的知府。但是，这一年雍正帝即位，并看上了他的忠直和才干。从此，他飞黄腾达，很快成为朝野闻名的能臣。雍正帝还将他同鄂尔泰、李卫一起，树立成当时的“三大清官”。

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很多州县都久旱不雨，颗粒不收，百姓啼饥号寒，纷纷外出乞讨。然而，该省巡抚德音和布政使森图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不但匿灾不报，反而向朝廷吹嘘这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他们还加紧催征钱粮，以致人怨沸腾。

正巧，身为内阁侍读学士的田文镜受命去告祭西岳华山。当他途经灾区时，亲眼看到了“黎民饥馑”的惨状，心中十分不安。尤其是听说德音和森图昧着良心搞浮夸，更是怒不可遏。他一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习俗，毅然将灾情做了详细记录，一回京便汇报给了雍正帝，并请求朝廷赈灾。雍正帝深信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是“直言无隐”，立即将德音、森图交吏部查议，同时派田文镜赴山西赈济灾民。

田文镜赶赴山西后，一面停止向百姓征收赋税，一面出官帑向邻省籴粮发给百姓。这时，山西的邻省陕西，其督抚主动送米上万石；而邻省直隶，却以山多田少为由禁止粜米。为解燃眉之急，田文镜再次上疏陈情，请雍正帝帮忙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雍正帝当即下谕直隶巡抚，命他以大局为重，“缓急共济”，积极支援灾区。同时，也将此情通报给了各省督抚。

从此，山西的赈灾事宜进展顺利，使灾民获救者计达80多万。田文镜不但受到百姓的拥戴，也受到了雍正帝的赏识和提拔。

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田文镜被调任河南布政使，接着又很快升为河南巡抚。

担任巡抚后，田文镜遵照雍正帝的旨意，首先开始清查亏空和整顿吏治，并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史书上说，他“查核豫省亏空”时，“不遗余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觉察，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其间，若发现贪污受贿或玩忽职守者，轻则“令其涤虑洗肠，痛改前非”；重则立即“揭参”，决不留情。据统计，在他任内前两年，就劾罢属员多达23人。显然，这一举措深受百姓乃至正直官员们的欢迎和拥护，但保守势力却对他恨之入骨。他们经常向雍正帝密奏他“刻薄”，并指使党羽对他进行诽谤和攻击。但他不怕挨骂，不怕孤立，一切照常进行。

早在田文镜抵豫之前，河南连年灾歉，百姓深受其苦。他上任后，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确认这与河堤长年失修相关：由于河堤几乎不起作用，所以无雨则旱，大雨成灾。于是，他决定由政府拨款兴工修堤，所用劳力由各州县分派。还提出“按照百姓地亩，或半顷或二顷出夫一名”，“绅衿里民，一体当差”。

田文镜的这一政策本来于国于民都有利，但却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只有地主才有田“半顷或二顷”。而地主富豪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地方上又一向享有特权，自然不愿和百姓等同起来“一体当差”。于是，他

们挑动了一些人赶赴巡抚衙门去控告，强烈要求维护儒户、官吏的特权。基于当时正值乡试的前夕，他们还发起学子们罢考，一时间搞得中原大地乌烟瘴气。在此严峻的情势下，河南的学臣却袖手旁观，“无一言严饬”；而负责司法、监察的按察使，简直还有些幸灾乐祸。他“将罢考一事置若罔闻”，声称“我只管人命盗案，余事非我职掌”。如此一来，田文镜也颇感“势甚孤危”。但是，为了把一体当差这项改革措施贯彻到底，他“捐弃身价，不避嫌怨”，毅然将带头闹事者捉拿严办，杀一儆百。闹事者见此，一个个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乱来。于是，考试照常进行，动乱迅速平息。而各处堤工，也均按原计划兴办，无一例外。

雍正帝得知此事的前前后后，非常高兴，他赞扬田文镜：“果能任怨任过，真实为国家竭力报效”。随后，授他为河南山东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接着，又加太子少师衔。

过去，在河南山东两省交界的地方，经常有盗匪出没，扰得百姓不得安宁。田文镜担任两省总督后，马上组织两省力量联合行动，很快便解决了当地治安问题。

接着，田文镜又发现山东省仓库全有亏空现象，而且大都是挪用新钱粮，掩盖旧亏空。对此，他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其中之一是：知府、知县离任时，务必将其所辖州、县仓库的钱粮全部补齐，差额部分由他们从其俸禄中赔偿，然后才能调到新的任所。

为利于综合治理，田文镜在详细了解山东各州县有关情况后，还建议朝廷对部分行政区域进行了新的划分。例如：将东昌府的属地高唐州划为直隶州，管辖济南府所属的禹城、平原、陵县、临邑4个县；濮州为直隶州，管辖东城、范县、朝城3个县；兖州府所属的东平州为直隶州，管辖陈阿、平阳、寿张、阳谷4个县；济宁州管辖的钜野、嘉祥县改属曹州等等。朝廷认为他设计合理，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施惠百姓，遂批准了他的方案。

田文镜享年71岁。死后，雍正帝特赐祭典将他安葬，谥号端肃，还下旨在河南省省城建立专祠祭祀他，并准许他入祀该省的贤良祠。

【李卫】

随着电视连续剧《李卫当官》的一再重播，李卫的鼎鼎大名几乎响遍了神州大地。

在历史上，也确有李卫其人。据《清史稿》，他生于1686年，死于1738年，字又玠，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虽然电视剧中的许多情节均系虚构，但他“不甚识字”，“粗率狂纵”及其整顿盐务、除暴安民等等，却与史实大致相符。雍正皇帝十分宠信他，并将他和鄂尔泰、田文镜一起树为地方督抚之楷模。

勤政廉政

李卫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以捐纳入仕，为兵部员外郎。2年后，调任户部郎中。雍正帝登基不久，任命他为云南驿盐道。随后，又相继提升他为布政使、巡抚和总督。

李卫一向勤政廉政。有一次，他为了办理一件要案，化装私访，徒步奔波，一连数日废寝忘食，终因劳累过度而吐

血。此事传到朝廷，雍正帝竟专门派人前去慰问，并劝他“量力而为，不可勉强”。

雍正七年（1729年）八月，李卫的母亲病故。为尽孝道，他遵照当时的惯例而离任还乡。然而，他仍念念不忘自己所管辖的浙江，曾在一日之内连上5道奏折，对那里的清理养廉银，捕捉盐枭及修筑海塘等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此，雍正帝也非常感动，当即在他的奏折上批示道：“卿之体国忠诚，自蒙上天，圣祖照鉴也，勉之。”

有人计算过：在今人刊行的《朱批谕旨》一书中，共收入雍正时期222位文官武将的奏折，其中，李卫的约占1/15。基于李卫非科举出身，且“不甚识字”，其奏折显然是靠人代笔。但是，这毕竟需要他口述，并最终经他本人认可签字。

历史上的李卫曾接受过他人的馈赠。但那些“他人”大都是他的亲朋好友，又出自对他的敬重所为，没有任何“拉关系”、“走后门”的意图。相反，对那些行贿者，他是不但不收礼，而且严加责斥并予以惩处的。此外，他身为封疆大吏，掌管的财物成千上万，他从不侵占分文。所以，雍正帝还赞扬他“操守廉洁”。

肃贪除暴

历史上的李卫个性极强。他敢作敢为，办事果断，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干出名堂来。

早在李卫初任云南驿盐道时，正值盐务废弛，百弊丛生。他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发现症结在于官吏的营私枉法，欺压良善。于是，毫不留情地了弹劾罢免了不少贪官污吏。接着，又革弊布新，严肃法纪。结果，取得了显著成效。

李卫升任浙江巡抚后，很快发现盐枭是朝廷和当地百姓的最大祸害。当时，浙江沿海地区所产的盐不仅自给，而且供往江苏。朝廷为增加税收，规定食盐不得私卖；而百姓为减轻繁重的赋税负担，也渴望杜绝私盐。但是，浙盐销往江苏，涉及两省，而两省官员遇到麻烦事往往互相推诿；有些贪官还乘机收受贿赂，致使大盐枭一再漏网，逍遥法外。鉴此，李卫下决心彻底整治，并将重点放在捕捉盐枭上。随后，他想方设法物色了一些行家里手，组织了专门的缉捕队，深入江浙两省的盐会、盐场、盐市，巧妙地同盐枭斗争，终于计擒了盐枭沈某。

李卫还以善于缉盗而闻名。为捉拿盗贼，他常常令手下的捕快乔装打扮，混入贼窝；也往往让那些改邪归正的原盗贼再混入贼群，暗中向他通风报信。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由于他派出的“情报人员”的努力，捕获了一个通缉多年的行凶杀人犯。李卫亲自审讯，迫使他一一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从而使20多年来数起重大凶杀案得以结案。消息传出，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雍正帝获悉此情，也盛赞道：“如斯远年旧案，悉能发摘，殊属可嘉之至!”

兴利安民

李卫在打击贪官、盐枭、盗贼的同时，还坚决同自然灾害做斗争。

浙江是全国最大的沿海省份之一，其海宁、海盐、萧山、钱塘、仁和等县，经常发生海潮成灾的现象。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有的还被迫迁移他乡。李卫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亲赴现场勘察，并找来有关人员认真论证。随后，发动各

县群众修筑海塘，防御海潮的侵袭。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地处江浙交界，虽有海塘，却年久失修；加之海潮来势迅猛，往往无济于事。对此，李卫又会同江南总督和江苏巡抚，改原土塘为石塘。从此，那儿的水害变成了水利，迁往他乡的百姓也重返故土，发展生产，安居乐业。

在浙江台州和温州之间有个玉环岛，地域辽阔，土地肥沃。许多年来，当地百姓一直要求上岛垦荒。但历任督抚都担心“防范难周”，所以“屡禁开垦”。为此，李卫又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实地勘查。当确认“其田可耕，且已有田三万余亩，尚可开五六万亩”时，李卫兴奋异常，马上上疏雍正帝，建议在那儿增设玉环厅，移民开垦。雍正帝分外欣喜，不但准奏，还赞扬他“兴自然之利，美事也；安无籍之民，善政也。能如是，方不愧封疆之寄”。

后来，李卫调任直隶总督。临别时，浙江百姓都感到恋恋不舍。雍正十二年（1734 年），身为直隶总督的李卫因公务需要，和户部尚书海望一起勘察海塘到了浙江。沿途百姓以为他重来任官，一个个高兴得奔走相告，竟出现了“额手迎者蚁屯数十里，欢声应天”的动人场面。

【阿桂】

阿桂（1717～1797），字广廷，号云岩，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阿克敦的独生子。曾在沈彤门下读书。凭借其父的功劳，于乾隆元年（1736）以荫生任大理寺丞，但他仍是努力进取，于乾隆三年中举，一年后任兵部主事。乾隆八年升户部郎中，三年后降为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三年初次被派往四川边界地区任职，在征讨金川军中担任幕僚。然而当他抵任时，适逢张广泗、讷亲因作战失败，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攻击而获罪。阿桂也与他们一起被指控而判处死刑。不过后来乾隆念其因阅历不足，又念及其父年迈，于乾隆十四年被宽免释放，乾隆十五年他复任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七年迁吏部郎中，不久奉派赴江西任按察使。第二年回京任内阁侍读学士，寻擢内阁学士。乾隆二十年奉命赴乌里雅苏台，在班第手下督办伊犁河谷地区驻军台站。第二年由于父丧返京，同年年中又被派往乌里雅苏台任参赞大臣。他及时赶到并参与征讨蒙古某王公的战役。蒙古某王公在阿睦尔撒纳伊犁叛乱之后，也企图在蒙古作乱。乾隆二十二阿睦尔撒纳叛乱平定之后，授阿桂为工部右侍郎，派赴科布多安抚西蒙古，以阻止厄鲁特部逃往西伯利亚。

乾隆二十三年阿桂因未能防止厄鲁特首领逃亡，乾隆老大不高兴，被召还京。这时新疆穆斯林首领发起动乱，被派往平乱的兆惠被围困在叶尔羌附近。阿桂奉命与富德同往解救。乾隆二十四年初围解，年内平定动乱。大军凯旋后，阿桂督责来自阿克苏以及其他城市的穆斯林屯垦伊犁河谷，以便为驻军提供军粮。由于土地肥沃，加以阿桂管理有方，头一年就获得大丰收。伊犁地区的屯民与驻军于是就能够以自给自足，安居乐业达百余年。乾隆二十八年阿桂返京，就任已于两年前受命的工部尚书，并在军机处任职。

乾隆二十九年阿桂一度署理四川总督，第二年奉命赴新疆镇压喀什穆斯林

动乱。经过半年围困，平定动乱。然而阿桂在这次战役中，乾隆责以未尽全力征战，令其协助伊犁将军明瑞统筹屯垦事宜。明瑞奉诏回京，派往云南统率一支征缅大军，阿桂继任伊犁将军。乾隆三十三年明瑞所部在缅甸遭到大败，清廷立即重组往缅大军，以傅恒为统帅，阿桂、阿里衮任副将军。乾隆三十三年年中，阿桂奉命急速返京即赴云南，并一度任云贵总督。乾隆三十四年，罢总督任，专办军务。尽管征缅失败，乾隆皇帝仍决心迫使缅甸就范。当年乾隆下诏任命三位将军统兵再征缅甸。但是当地气候和热带疾病对清军极为不利，虽然打了几次胜仗，最后还是被迫撤退。由于阿里衮身亡，傅恒亦染重病，阿桂理所当然地担任了最高统帅。后因缅甸同意进贡，双方停战言和，阿桂亦返回云南。但不久因阿桂派往收取贡赋的官员被缅甸扣押，协议被毁，阿桂对此负有责任，遂遭革职，受命在继任的温福属下任职，温福已奉派镇守云南边境。那时缅甸正耽心近邻泰国人，故而中缅边境相对平稳了一阶段。

在从缅甸撤军之前，四川西部的大、小金川已经发生动乱，金川地形险要，难以进入。当时土司又分外强悍，善于利用本地的有利条件，在山隘要道修筑石头碉堡，以抵抗官军。乾隆三十六年末，温福奉调率军从云南前往四川，证讨大小金川。阿桂亦随军前往，任温福的副手。温福从小金川东面进攻，阿桂率军自南面进攻。年底，攻下小金川，但动乱头目进入大金川，清军又挥师进攻大金川。乾隆三十八年年中，小金川土司再度发生动乱。温福所部在木果木几乎全军覆没，温及将领多人在战斗中丧生。阿桂撤至安全地带并放弃已经收复的大部分地区，只将少数精兵留驻战略要地，以为反攻基地。不久，他授为征西将军，统率全军，奉命从东面进兵。他在南路的旧部则留交富德和明亮指挥，年内收得小金川，而大金川虽只有数千叛乱守军，却坚守三年之久。每座山和每处要隘，清军都要经过数次反复酣战才能攻克。阿桂当时使用了在葡萄牙传教士指导下监造的大炮，把那些坚固的碉保攻克、炸毁。葡萄牙传教士付作霖是乾隆三十九年秋到达阿桂大营。乱军大营所在地最后被包围，大金川首领索若木投降，按照事前安排，挑出一批战俘解往北京，两个月后，阿桂率领凯旋大军浩浩荡荡回到北京，乾隆亲自出城迎接，并赐宴宫中。讨平金川之战持续五年才彻底结束，共耗军费白银七千万两，超过征服伊犁地区和南疆所耗军费总数的两倍，而新疆的面积则是金川的二十倍。清军只是凭借巨大的优势，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并切断对方粮食与弹药供应，才迫使叛乱土司投降。

阿桂因战功获得殊荣，乾隆四十一年初受封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另授协办大学士并兼吏部尚书。当年又被派抵云南，准备再次用兵缅甸，同时升任大学士。乾隆四十二年，奉诏返京。此时缅甸因有内乱并与泰国发生冲突，国势削弱，被迫从第二年起开始向清廷进贡，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886年缅甸被英国人吞并为止。

阿桂曾经两次率军镇压甘肃回民起义，两次动乱都是由于伊斯兰教新教派反对清廷所承认的旧教为导火线的。第一次起义在乾隆四十六年于河州和兰州地区爆发，在六个月之内即被平定。新

教残余于三年后再次起义，由于两次胜利，加授阿桂轻车都尉世职。

乾隆四十四年至乾隆五十四年间，阿桂的职务虽是军机大臣及大学士，但他仍然长年奔波在外，或负责修筑河南境内的黄河大堤，视察水利工程，或按察各省贪污案件，同时又督师镇压上述回民动乱。他在京时，每当皇帝巡幸热河或其他地方，照例都是阿桂主持京城政务。乾隆欣赏阿桂老成练达，故委以如此重任。当时权臣和珅或许出于个人的考虑，担心阿桂在乾隆身边会受宠对自己不利，故而总是想方设法把阿桂派往外地。尽管如此，阿桂直到八十岁因病去职前，却一直保有自己的地位和皇帝对他的信任。死后，追赠“太保”，谥“文成”，入祀贤良祠。

【刘统勋】

刘统勋（1700～1773年），字延清，号尔纯，山东诸城人。其父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由知县累迁至四川按察使（负责一省司法事务的官员），是当时以清廉闻名的少数官员之一。刘统勋受其父影响，自幼刻苦读书，注重品德修养。雍正二年（1724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都在中央机构任职，曾做过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军机大臣，还曾任协办大学士和大学士，兼管过数部衙门，并一度受命为上书房总师傅，是清朝名相之一。

自奉节俭

刘统勋任官数十年，一直是自奉节俭。即使做了大学士，也依旧省吃俭用。史书上说，他“所服朝珠无值十金以上者，故绠断即弃之，不更拾取”。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刘统勋奉旨前往开封视察。按照当时的惯例，像他这样身为大学士的钦差，都是鸣锣开道，卫士护从，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每到一处，地方官员还需接风洗尘，设宴饯行，不知花费多少银两。但是，他“所挈只二奴，用驿马不过六七匹”，还命令各级官吏不要迎送。这一举措，曾一度震惊朝野，传为佳话。大名鼎鼎的国史馆纂修官洪亮吉曾专此写道：“使皆如公挈二奴，用马六七，又事事不过令甲，则民生吏治困坏，岂至此哉?”

为节省迎送之花费，减去百姓负担，同时又便于了解民情，掌握第一手材料，刘统勋还特别喜欢微服私访。他曾数次奉派审理官员贪黩案，经常出典各省乡试，三次督修黄河溃堤，一次主持疏浚运河，还长期署理河道总督。其间，大都装扮过往各类行人深入百姓之中，和他们同甘共苦，帮他们分忧解难。

刘统勋死于上朝的途中，据史书记载，他在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的一天黎明，“至东华门，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乾隆帝闻讯，“亲奠其宅”，发现他家“门闾湫隘”；入室一看，“见其俭素，为之恸”。这也充分说明：刘统勋的节俭，是一贯的，时时事事皆如此。

为政清廉

刘统勋一向为政清廉，从不收受任何人财物之类。有一次，有个用钱买官当了“资郎”的人于深夜带着厚礼登门拜访刘统勋。守门人通报之后，刘统勋拒不接见，并让门人转告来者“明日再议”。第二天一早，刘统勋当着许多人的面，传那“资郎”入见。他说：“昨夜不见，是老夫之过。然而深夜叩门，

恐怕不是贤者所为吧！”那“资郎”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囫囵话。刘统勋遂又大声训斥道：“明人不做暗事。今后，有什么要说的话，就当着众人说清楚，决不许偷偷摸摸到家中搞名堂！”

刘统勋担任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期间，他的一位老友的儿子出任湖北巡抚。这位老友为利于儿子仕途亨通，让仆人给刘统勋送去了1000两白银。刘统勋十分理解老友的用意，但又不想驳老友的面子，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让人将那位来者叫到面前，正言厉色地说：“你家主人是我的至交，也是位十分重视节操的人。他让你来，一定是要你代他向我这个老朋友转达问候。你为何私自做主带这么多银子呢？何况我有那么多朝廷俸禄，用不着任何人资助。你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可将这笔钱施舍给那些贫寒的故亲旧友！”

那仆人带着礼金回去后，立即将其经过原汁原味地禀报给了主人。主人思忖片刻，突然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是一时糊涂，儿子将来如何，靠的是他自己的才学和品行啊！”

立朝侃然

刘统勋在严于律己的同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人。乾隆7年（1742年）初，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他就上疏说：安徽桐城张、姚二姓当官的人太多，今后3年内应停其升转，从而使其他官员得到更多的晋升机会。他所说的张姓，指的是皇上倚重的大臣张廷玉。在乾隆帝看来，张廷玉一家的势力并不像刘统勋所估计得那么大，但他敢于奏呈的精神还是值得赞许的。

至于对那些贪官污吏，刘统勋更是恨之入骨，从不宽容。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些大案、要案，如广东粮驿道明福、云贵总督恒文、云南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江西巡抚阿思哈等人贪污、受贿案，都是他外出审查处理的。他“皆论如律”，也大都被皇帝核准。所以，好几名满洲显要死于他的手下。

乾隆二十六年，刘统勋以大学士身份视察河南河工时，发现那儿的杨桥工程久拖未完，一问，河吏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刍茭收不上来的缘故。刘统勋半信半疑，又开始了微服私访。结果，发现“大小车载刍茭凡数百辆”，只因主事者索贿未遂，“置而不收也”。刘统勋大怒，立即更衣升堂，将那主事的县丞捉拿归案，还命他戴着枷锁去各工地游街、谢罪。随之而来的是：刍茭一夜之间便收纳完毕，杨桥工程一月之内也得以竣工。

【王杰】

王杰（1725～1805年），字伟人，号惺园，一号葆醇，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入值南书房。后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左都御使，兵部尚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任军机大臣；次年拜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嘉庆帝亲政后，又被委以首辅。史书上说他为官40余年，“受两朝知遇，始终无间”。

王杰曾督浙学三任，督闽学两任，三充会试正总裁，堪称“桃李满天下”。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徇私机会和条件。但是，王杰则不然。他不仅严

于律己，从不谋求私利，而且教育门生也要清正廉洁，一身正气。

有一次，王杰的一位得意门生调任回京，正遇上王杰过生日。于是，带上白银数百两，前去为他贺寿。师生久别重逢，自然分外欣喜。但王杰发现礼金后，顿时显出了不悦的神情。他诚恳地批评那位门生说：你还记得当年我是怎么教导你的吗？今天我若是收下你的礼金，不等于我说话不算话了么？那位门生非常感动，当即让人将银子收了回去。

王杰的儿子“工文艺，善书”，曾在京城为父代笔。由于他聪颖好学，又谦逊厚道，王杰的同僚们都非常喜欢他，关心他，希望他也能早日金榜题名；就连乾隆帝也多次问及他的有关情况。然而，王杰却认为他“豪于饮”，不适合做官；而且自己身居要职，他若参加考试，势必招致同僚的照顾。所以，每届考试时，总是先发出警告：“谁荐中吾子者，吾将劾之”。

后来，王杰的儿子无奈而回到陕西，又打算参加本省的乡试。当时，陕西巡抚正巧是王杰的门生。于是，王杰又给那位巡抚打招呼，“亟致仆，亦以是属之”。那巡抚基于王杰的恩德和威严，到底没敢将他的儿子录取上。

王杰生活简朴，从不铺张；而且嫉恶如仇，“耿直清介”。他和大贪官和珅共事多年，不仅不与之同流，而且多次指责、揭露和珅的丑恶面目。当时，尽管和珅位居首辅，事多擅决，但乾隆帝也非常信任王杰，以至于“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所以，每次议政之后，王杰对和珅不屑一顾，和珅却总要主动地同王杰套近乎。

有一次，和珅拿出一幅水墨画，请王杰一起观赏。王杰为讽刺和珅贪得无厌，便用双关语说：“贪墨之风，一至于此”。和珅听罢，无言以对，只好悻悻离开。还有一次，和珅为了讨好他，在议政后拉着他的手开玩笑地说：“状元宰相手果然好！”王杰却板着脸回答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顿时脸通红，而围观者无不感到分外开心。

和珅在忍受王杰嘲弄、批驳乃至弹劾的同时，也无时无处不在寻机报复他。有一次，和珅听说王杰在其家乡盖有三王府、四王府，立即如获至宝，得意忘形，顾不得弄清原委，便匆匆跑去告御状。说王杰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大奸似忠，欺君傲下，结党营私，罪当斩杀！乾隆帝虽未全信，但也没有不信，遂密令亲信到韩城，实地调查王杰在家乡的住宅。当那人来到王家住处一看，竟是“湫隘如寒土”。问起“三王府”、“四王府”事，才知道这是当地人就其姓氏及排行而作为一种开玩笑的称呼。待那人回京“以实密奏”后，乾隆帝不禁哈哈大笑。随后，特诏王杰、和珅进宫，并对王杰说：“卿为宰相，而家宅太陋”，随之“赏银三千两修之”。王杰至此都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但他还是谢绝了皇上的美意；而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的和珅，却在一旁又惊又怕又后悔，恨无地洞可钻。

嘉庆帝即位后，和珅很快便原形毕露，身败名裂。与此同时，王杰更为世人所公认，并被擢升为当朝首辅。

嘉庆帝非常敬重王杰。每逢大事，定要征求他的意见。可惜，这时的他已经 78 岁了。基于自己年迈体弱，腿脚不便，王杰在嘉庆五年（1800 年）提出了

致仕的申请。但嘉庆帝不希望他离开，并进行了多方挽留，还特许他在紫禁城乘轿，可拄着拐杖上朝，不必再去军机处值班等等。王杰不便再辞，只好硬着头皮又干了三年。

三年后，王杰又多次坚请致仕。嘉庆帝遂晋升他为太子太傅衔，恩准他以原职原俸回乡。当他离京前，又赠他拐杖一只，诗两首。其中一首道：

> 屡蒙恩旨秉文衡，
> 艺苑群瞻桃李荣。
> 直道一身立廊庙，
> 清风两袖返韩城。

时至嘉庆九年（1804 年），因王杰与其夫人均年过 80，嘉庆帝又特命陕西巡抚到其家祝贺生日，并赐御诗及其他许多珍物。此后，王杰到京谢恩，在京师去世。

王杰死后，嘉庆帝追赠其太子太师衔，入祀贤良祠，谥“文端”。

【刘墉】

刘墉（1720～1805），字崇如，号穆庵、石庵，山东诸城人，大学士刘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一年后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年，因为父亲以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因此本已屡获提升的刘墉，也遭到逮捕入狱。但是一个月以后就释放了，出狱降为编修。此后，历任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山西太原府知府及山西冀宁道道台。乾隆三十一年，因太原知府任内某知县贪侵公帑，他以失察坐罪革职拟死，朝廷下诏，免于一死，发伊犁军台效力。乾隆三十二年释还，命其在武英殿（即皇家修书处）行走。两年后，皇帝念其父年迈，授其江宁知府，明年迁江西盐驿道。乾隆三十七年，擢陕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逝世，归籍守制。

乾隆四十一年还京授内阁学士，充值文渊阁。越明年调江苏学政。在此任内，他劾举徐述夔著作悖逆，经鞫讯得实。因此案有功及督学政绩卓著升为湖南巡抚。乾隆四十六年底，迁左都御史，次年授工部尚书，同年充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八年，调吏部尚书，乾隆五十年，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四年某日，皇帝偶幸上书房，察知诸师傅及阿哥已有七八日不入书房，大发雷霆，于是下谕切责。刘墉身为总师傅，负有主要责任，降为侍郎衔，并夺去一切恩赏兼职，诸师傅阿哥亦相应惩处。他并没长久遭贬谪，旋又累迁至左都御史，升擢礼部尚书，并恢复所有恩赏。乾隆五十七年，调吏部尚书。嘉庆二年（1797）授大学士。嘉庆四年，加太子少保，虽年高还尚在位，从嘉庆八年后，一直提领文渊阁事，至嘉庆十年卒，谥“文清”。

刘墉为人正直，生活节俭，遵守礼法，在当时享有较高声誉。他以身作则，也要求家人这样做，他未曾公开弹劾和珅的专横跋扈、胡作非为，但在吏治方面他却敢于直率地反对和珅。乾隆四十七年在查办山东亏空案中，他与和珅及御史钱沣前往审察。钱所劾之该省巡抚藩司二人，皆系和珅私党。刘秉公详查此案，最终证实这两名官吏确曾贪污有罪，因此和珅只能眼睁睁听任其亲信被处决而一筹莫展。

刘墉善于书法，海内闻名。大量墨迹，至今犹存。其中部分曾由仁宗皇帝

赏予其侄刘猿之收藏，并以《爱清堂石刻》题名刻印刊行。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号伯涵，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一农民家庭，父亲曾麟书，于道光十二年（1821）考取秀才，仅早于曾国藩一年。曾国藩道光十八年成进士，同年六月，入翰林院，道光二十九年授礼部侍郎。此后历署各部侍郎，咸丰三年（1852），他前往江西，主持乡试。但当他南下时，其母逝世，遂获准还乡，丁忧守制。

道光三十年之后，太平军从广西迅速发展到湖南、湖北、沿江而下，直逼南京。清军自广西尾追太平军，一直追到南京郊外，前后达三年之久，但太平军却一点也没有受到损伤。当时由江忠源和罗泽南所组织之乡勇，却胜过正规军——在咸丰二年防守长沙的战役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太平军自解长沙之围后，曾国藩奉谕组建湖南乡勇。经过多方劝导，曾国藩于咸丰三年一日二十九日决定承担这一使命，并以“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作为军队的口号。



曾国藩像

曾国藩组建的湘南军，即“湘军”，也称“湘勇”，是由罗泽南之“湘勇”，江忠源之“楚勇”以及其他各部组成的。曾国藩制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计划，并着手整顿纪律，完备组织；这些措施对他最终取得胜利关系甚大。他设置集中训练营，把那些有过临战经验的乡勇的训练营接受进一步的训练；又在湖南各地广设招兵站，并对亲兵进行初步训练。在出省与太平军作战之前，他决定先派这支军队在省内剿灭土匪，这也是一种战前演习，以期取得作战经验。然而，他为此却受到那些曾经与太平军作战却老打败仗的人的责难；甚至当上疏详陈作战计划时，亦受到皇帝的训斥。但曾国藩坚持初衷，毫不动摇，不顾多方的拦阻、非议也不管外地如何催促求援，继续组织训练那些纪律散漫、缺乏作战经验的乡勇。湘军编练的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湖南官绅所提供的军费。但是在组建湘军初期，地方上是不予财政支持的，直到江忠源和罗泽南在衡山县打了胜仗，朝野震动，地方当局才认识到应该给曾国藩提供一定的军费。

曾国藩在初期的多次战斗中，地方官的不予支持使他处境倍感困难；这种情况直到后来他本人身兼数省督抚之职、有权掌管财政时的时期，情况才好转。不数月，曾国藩即接受江忠源和郭嵩焘的紧急建议，建造炮舰，训练水军，由杨岳斌及其他将领统辖，以便把太平军赶出长江。

太平军于咸丰三年攻占南京后分两路向清廷发起进攻：一路向华北进军；一路西进安徽、江西及湖北。当时，虽

然各方一再向曾国藩求援告急，但他确实无力派兵往救湖北。当时大部湘军已驰援江西，其余部分留在湖南对付地方起义，此时“水军”尚在筹建之中。几月后，太平军自湖北向湖南的湘军发起了攻击，曾国藩于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动用新建水师二百四十艘船只及五千水军，但是因为暴风雨的袭击，船舰无法行动，加之军队缺乏水战的经验，致使曾国藩在湖南两次打了败仗：一在岳州，一在靖港。曾国藩当时非常羞惭，竟欲自尽。幸而这年五月一日，塔齐布和彭玉麟在湘潭战胜，迫使太平军向岳州撤退，清军于当年七月二十五日攻克岳州，这一胜利鼓舞了曾国藩。太平军曾在咸丰二年一月十二日攻占武昌，这是太平军三次攻占武昌中的第一次。不过同年二月即为清军收复。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太平军再次攻占武昌；十月十四日，曾国藩部湘军在罗泽南及江忠源率领下，再次收复武昌。这是清军攻克武昌，也是对太平军征战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这年十二月二日，曾国藩又在田家镇战胜太平军的顽强抵抗，赢得了完全的胜利。与此同时，上海城亦于咸丰五年二月从被起义的小刀会手中收复，直到咸丰五年五月底，北伐的太平军也已基本宣告失败。

正当曾国藩部顺江而下进至九江时，遭到太平军将领林启容部之顽强阻击。林启容于太平军初建时即参加起义，是太平军中一员英勇善战的将领，曾国藩的一部分水军被太平军困于鄱阳湖；在长江另一部湘军水军也被击败，甚至曾国藩的座舰亦为太平军俘获；余下的舰只又大多毁于一场风暴之中。由于连连失利，曾国藩部士气低落。曾国藩为此



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激战

老了好多，曾经再次投水自杀但被人救起。经过一番整顿，咸丰五年四月三日，太平军为削弱清军对九江之攻击，发起攻势，第三次攻占武昌。此时曾国藩不顾武昌失守，只是命塔齐布继续攻打九江。同时另派罗泽南及胡林翼前往收复武昌，他自己则坐镇南昌，吸引太平军主力。但不久，塔齐布及罗泽南双双战死，曾国藩自己也遭到太平军无敌将领石达开的钳制。曾国藩此时已面临全盘崩溃的局面，幸亏曾国藩遇事还算冷静沉着，善于应付意外，加之知人善用，胡林翼与李续宾终于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最后一次收复武昌。由于彭玉麟之协同作战，其弟曾国荃又率军自湖南来援，曾国藩在南昌之困境，得到缓和。

太平军虽然在湖北江西失利，但在南京这时却大败向荣的大军。太平军内后来发生了惨烈的内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终于失去所取得的大部分地区。此时曾国藩的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也逝世，曾国藩只得暂时离职奔丧。不过，他那些才干出众的将领们，按照

他的计划，于咸丰八年五月十九日收复九江。然后进攻安庆，以便最后收复南京。为收复安庆，虽然有许多在太平军包围下的城池乞求他前去支援，但他一概不予理睬。为便于攻取安庆，曾国藩率部进驻皖南祁门。咸丰十年，曾国藩被授任两江总督，加授钦差大臣统领江南军事。至此，他已拥有处理军务的全权，其中包括筹集军饷等财政大权。

咸丰十年至十一年间，曾国藩处境又转入艰难。咸丰十年早些时候，太平军在南京附近击溃重整后的清军，在李秀成指挥之下，太平军又再度焕发青春，主动进攻清军。江苏及浙江大部地区，都落入太平军手中，仅上海一地未被太平军完全占领。但太平军对上海的多次进攻，均被李鸿章等击退。就在这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城，清帝及大臣俱逃往热河避难。各地纷纷呈请曾国藩派兵支援。然而自咸丰十年九月，曾国藩也在祁门被太平军围困，对驰援其他地方，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心有余而力不足。咸丰十一年四月，曾所处困境达于极点，但他下定决心誓死不退。直到左宗棠及其他部队增援祁门，形势才开始好转。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终于在咸丰十一年九月五日攻占安庆，此后，曾国藩即以安庆为基地，准备收复南京。为避免在南京一线集结过多的军队，并防止太平军趁机夺取清军后方地盘，曾国藩摆开了三个战区：一在江苏，由李鸿章统辖；另一在浙江，由左宗棠统辖；第三在安徽由他自己统辖。清军在这三个地区频频对太平军发起攻击，各地的太平军逐渐被围困，此时曾国荃，自请攻取南京。自咸丰三年三月十九日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京城以来，大量清军多次被击溃，尤其是在咸丰六年八月、咸丰九年十一月及咸丰十年八月围攻南京的清军伤亡特别惨重。当时虽然外国军队打算前来援助，但被曾国荃所拒绝。经过长期围困及殊死战斗，曾国荃于同治三年（1864）七月十六日终于攻克南京。不过太平军的余部，直到两年后才被完全剿灭。对于最终剿灭太平军论功首推曾国藩，清廷赐他一等“毅勇”侯封号，他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

太平军被平定之后，曾国藩继续任两江总督，驻留南京数月。此期间他致力于恢复江浙地区生产力工作，在饱受十五年战乱之苦的江南地区恢复学术活动。同治三年初，曾国藩就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书局，刊刻经史典籍。战乱平定以后，他延聘著名学者主持书局，事后他遣返大部分湘军回乡归农，军中某些文官则受雇担任书局校对。当年，他颁布条例，在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及武汉各建书局，此即“官办五局”。同时，当年十二月二十日恢复南京乡试。在太平军占领期间，这个地区的乡试中断多年。

同治四年六月，清政府下谕急令曾国藩前往山东征剿捻军。曾国藩受命统领山东、直隶及河南军事。但曾国藩北方剿捻一年多，不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战果，捻军日益壮大。李鸿章于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继任其职，曾国藩返回南京。

早在同治二年，容宏曾向曾国藩建议，在上海筹建铁工厂，此即后来的江南造船厂。容宏经曾国藩同意后从国外购进机器。同治五年江南制造局成立，

同治七年，该局建成中国第一艘轮船，并驶至南京请曾国藩验看。

同治六年，曾国藩拜大学士。同治七年九月，出任直隶总督，任内，曾国藩着手处理一大批长期悬而未决的案件，改进了办事效率，并制订出一项建立常备军的方案。同治九年，他奉令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此案即将结束，曾国藩因年老多病，于同治十年调回南京原任，不久直隶总督由李鸿章继任。八月十八日，曾与李联名上疏，建议派遣青年学生赴海外留学。这一项建议同治十一年实施。然而，就在学生启程出洋之前几日，曾国藩病逝。身后追赠“太傅”，谥“文正”。

【翁同和】

翁同和（1830～1904），字声甫，号叔平，晚年号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授翰林院编修，两年后典试陕西为副主考。同治五年（1865）被命在弘德殿行走，当穆宗皇帝载淳的老师，其职责包括给摄政和两宫皇太后进讲历史课《治平宝鉴》。在此期间他被擢升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光绪元年（1875）初，穆宗皇帝驾崩。同年底，翁被任命为年幼的新皇帝德宗（即光绪皇帝）的老师，头衔毓庆宫行走。他和孙家鼐教皇帝读经以及一些其他科目；另外一个老师夏同善教授皇帝书法。翁同和于光绪二年开始教这位年幼的皇帝，以后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直至其被逐退为止。他和光绪皇帝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对光绪皇帝来说，翁同和不但是老师，也是顾问、保护人，几乎成了他的父亲。翁同和不仅教授皇帝读书，还向他力陈政府改革的必要性。

从光绪二年到光绪十二年这十年间，翁同和担任过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在同俄国争伊犁期间，翁、潘祖荫以及亲王二奕组成了一个核心内阁来处理这场危机，每日在南书房看摺件电报，拟片进呈，以便太后决定进止，到中俄伊犁条约改定，才停止这项工作。翁还担任了两年的军机大臣，后虽被免职，但仍然保留包括皇帝老师在内的其他所有职务。

光绪十年（1884），因法国侵略越南事件，发生中法战争，翁同和主张一面进兵，一面议和，才能有所准备。光绪十二年初，翁同和任户部尚书，他担任此职长达十二年之久，直至其被逐为止。在此期间，他同时兼任过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和协办大学士。这个时期他的主要职责是筹划国家财政。他不同意张之洞随意开支进行改革的政策，如果不是亲王奕沂支持张之洞，他可能就要停止张对新式工业的引进。作为一个保守派的理财官员，翁同和想保持政府开支同数量很少的农业税收之间的平衡，这种小农经济的思想，使他反对那些从外国银行贷款进行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试验的地方官员。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封疆大员几乎成了独立的势力，翁同和与张之洞之间的争执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冲突。翁同和与李鸿章之间同样有隔阂，在1894年—1895年中日战争的问题上他们更是分成主战和主和两派，当时，李鸿章集团谋求避免战争，但翁同和等却要求一战。不过，在后来李鸿章因为中国方面战败而受指责时，据说翁同和则说服皇上宽恕他。中日之间的冲

突使翁觉悟到中国进行改革的必要，从此后他便开始向光绪皇帝推荐有关世界历史和其他方面的书籍，敦促皇帝推行改革政策。翁同和的权势日盛，逐渐引起那些以慈禧太后为靠山的保守党的不满。

光绪二十二年根据慈禧太后的命令，不得已免除了翁同和为皇帝授读的职务，但是，他作为一个官员仍然可以同皇帝接近。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帮助皇帝决定变法。同年六月十一日，皇帝命令地方官员向朝廷推荐贤能，同日向全国颁布准许变法的诏书。十四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等维新派领袖，其他维新派如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亦要求予以召见。这些举功吓坏了保守党，以致他们开始调动部队占据战略要地。光绪的行为也导致了翁同和被革职。十五日太后诏下，斥责翁同和贻误大政、冒犯天颜。正是这些含糊不明的罪状把翁同和解职并逐回原籍。这个诏书当然是慈禧太后草拟的，但光绪皇帝无力驳回，于是，光绪皇帝在刚刚开始获得成功时最重要的朋友和谋士便被逐退了。在翁离去后，光绪仍满怀希望地进行其改革。但三个月之后，保守派发动突然袭击，这次改革运动破产了。慈禧太后和保守党重新执政，一些维新派被处决或流放。一月四日翁同和因曾向皇帝推荐康有为而受谴责，并被剥夺去一切官衔，交由地方官看管。翁同和于 1904 年去世，1910 年即慈禧太后死后第二年江苏士绅上书朝廷，宣统元年（1909）诏复原职，恢复了翁的生前全部官衔并谥“文恭”。其著作有《翁文恭公日记》和《瓶庐诗文稿》传世。

【左宗棠】

自比诸葛　并非狂言

左宗棠（1812 ~ 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左观澜，是个禀生，有很好的学问及修养。左宗棠道光十二年中举，以后三次参加礼部的考试均没有考取，于是他断绝了在仕途上发展的打算，而专心致志地研究地理与兵法。他平时喜欢作豪言壮语一语惊人，在公卿士大夫中间享有声名。曾经自比为诸葛亮，人们都觉得他非常狂妄，但胡林翼却非常欣赏他，认为在举国之中，没有一个人才能超过左宗棠的。左宗棠快四十岁时，对身边的亲友说：“除非皇上一心想求得贤相，要不然的话，我这辈子大概是没什么指望了。”

咸丰初年，广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当时张亮基任湖南巡抚，他聘请左宗棠为僚幕，但左宗棠不应召，后经胡林翼诚恳相劝后，左宗棠才出来，做了长沙县知县。又由于守卫长沙有功，从知县提拔为直隶州同知。及后张亮基转任山东巡抚，左宗棠回到家乡隐居。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后，再次用计谋硬拉左宗棠出来辅助军务，依赖左宗棠如同自己的左右手。下属幕僚向骆秉章禀报军务，骆总是问：“李高先生的意见如何啊？”由于得到骆秉章如此倚重，忌恨左宗棠的人就越来越多，诽谤他的议论四起，但他的名声却越来越大了起来。左宗棠的同乡郭嵩焘在朝廷中任编修，一天，咸丰皇帝召见他，问道：“你认识有个叫左宗棠的举人吗？他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正式出外任职呢？年纪有多大了？

如果再这样拖下去精力就会衰退，你可以写信告诉他我的意思，应当赶紧出来为我剿灭贼寇。”胡林翼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非常地说：“皇上得贤相的日子到了！”

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攻克武昌，上疏奏朝廷左宗棠训练部队、筹济军饷等功劳，朝廷诏谕授予他兵部郎中听候调遣，不久又加四品卿衔。由于有人在湖广总督官文面前诬陷左宗棠，所传播的一些流言蜚语也被咸丰皇帝听到了，于是命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公堂。官文是满人，他对曾国藩、胡林翼等汉人，尤其是他们率领的湘军很瞧不起，而自己属下的八旗兵又总打败仗，因此恼羞成怒，想从重惩治左宗棠以让湘军将领丢丑。湖南巡抚骆秉章上疏为左极力辩护；胡林翼、曾国藩也都说左宗棠无罪，极力称赞推荐左宗棠出众才能。后来京官潘祖荫也站出来公开说官文是被别人的表面言辞所迷惑，种种舆论和说情，才使得左宗棠免遭逮问。不久朝廷下旨，命令左以四品京堂身份跟从曾国藩治理军务。曾国藩命他自己招募一支军队，从此左宗棠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施展的机会。左宗棠召募了五千人马，经过训练号称“楚军”，咸丰十年八月，楚军建成后挥师向东。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向四川挺进，朝廷命左部移师征讨四川。但曾国藩、胡林翼因为江西、安徽战事危急，联名上疏请求留下左宗棠。当时曾国藩进兵皖南，驻在祁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忠王李秀成正集数十万人猛攻祁门，当时左宗棠正率领楚军取道江西，转战前进，一路攻克德兴、婺源。左宗棠得到曾国藩命令后马上返师回击，在江西乐平、鄱阳一带与太平军展开激战，太平军最后被左军打败，死亡无数，侍王李世贤也不得不化装才逃走。从此以后，江西、安徽左宗棠所率军威大振。

咸丰十一年，朝廷因功授予左宗棠太常寺卿，并擢升他帮助曾国藩协办江南军务。左宗棠在曾国藩的命令下，率领楚军八千人向东援助浙江。此时曾国藩认为左军完全可以胜任节制浙江的事务。左宗棠部将中虽有名将刘典、刘松山、王文瑞、王沐等，但从总体力量看，这几个人所率的几支部队都很单薄，还不能满足浙江全省的作战防守等要求。左宗棠奏请从广西调蒋益澧、从湖南调刘培元、魏喻义增援，但此时各处都在太平军等起义军攻击下陷入困境，因而兵马没有调得到。但即便如此，左宗棠以几千人马应付七百余里防地，指挥若定，这不禁令曾国藩非常佩服他的军事才能。曾国藩再次上疏举荐左宗棠，朝廷于是任命其为浙江巡抚。

当时太平军正在奋力攻打浙江，全省地域只剩下湖州、衢州没有落到太平军手里。曾国藩与左宗棠商议，为确保浙江，左宗棠亲自指挥部队拼命抵抗，终于击败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正月，朝廷下诏催促左宗棠从衢州开始谋划整个浙江的收复，但左宗棠有一套自己的战略，他上疏说：“作战的法则，一定要避开对敌人的长期包围，防守好自己的后路。”

在左宗棠军队的进攻下，太平军在浙江的势力迅速瓦解。但当各支部队争相建议要乘胜收取太平军所占据的杭州时，左宗棠却不为之所动。左宗棠喜欢打攻坚战，认为皖南太平军的气势还很旺盛，要消灭太平军的主力，必须稳扎稳打，先去其枝叶，再折其主干，而不

要贪图近功。于是左宗棠率部从金华向严州进军。左宗棠命令刘典带领八千人会同王文瑞部防守徽州，命刘培元、王德榜部队驻守淳安、开化，让蒋益澧率部攻打富阳。左宗棠在此期间弹劾罢免了道府以及失守的将吏十七人，荐举浙江名士吴观礼等人赈济灾荒，招募老百姓垦田，保证军粮丰足供给。四月，朝廷任命左宗棠为浙闽总督兼巡抚事宜，不久左宗棠的部队遭到了军粮供应困难，刘典的部队到达皖南之后，便留在那里屯守。蒋益澧打入富阳，由于富阳太平军的顽强抵抗，军队损失很大。及后，左宗棠患了疟疾，困乏疲惫，富阳很长时间了都未能攻下。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集中兵力，从水陆两路大举进攻，终于将富阳攻克。蒋益澧等则长驱直入包围杭州，魏喻义、康国器进攻余杭。

左宗棠认为杭州的太平军倚恃余杭以为犄角，如果不先攻下余杭，收复海宁，则不能切断嘉兴、湖州对杭州的后援接应，因而左宗棠亲自到余杭督战。此时，太平军都城苏京受到曾国荃湘军越来越紧的围攻，洪秀全多次命令李秀成率江浙的太平军解围。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太平军守将陈炳文见形势不妙，约定献城投降。左宗棠担心时间一长会引起变化，于是乘大雨天发起紧急进攻，陈炳文深夜开城门遁逃了。杭州收复后，余杭的太平军将领汪海洋也往东逃跑了。咸丰皇帝得到捷报，下诏给左宗棠加授太子少保衔，赏赐黄马褂。

左宗棠军队进入杭州，申明军纪，招集商贾开门营业，停止征收杭州货物的关税，减征杭州、嘉兴、湖州三分之一的赋税，还大力招揽贤士，左宗棠的种种做法受到广泛称赞。不久大部太平军又聚结湖州，左宗棠马上调遣部队包围他们，使浙江太平军余部又受到沉重损失，三月，江苏太平军攻克常州。在江苏的太平军余部向浙江的徽州、婺源，然后又向江西靠拢。左宗棠把太平军进入江西认为是心腹之患，奏请清廷请曾国藩部杨岳斌督率江西、皖南部队，让刘典当副将围剿。六月，曾国荃攻克太平军都城天京，洪秀全服毒自杀，其子在太平军将士的护卫突围出去，左宗棠立即率部围击，洪秀全的儿子不久也被俘，在南昌被处以磔刑。七月左宗棠攻克湖州，浙江各地得以全部平定。评论军功，朝廷封左宗棠为一等恪靖伯。

及后残余的太平军流散到徽州、宁国、江西、广东等地，还打入了福建的汀州，福建方面惊慌失措。因而左宗棠奏请蒋益澧护卫巡抚，自己移镇福建并增调王德榜部到福建。同治四年三月，江苏淮军郭松林前来福建会师，太平军不得不放弃漳州，离开大埔。五月，太平军余部李世贤、汪海洋屡次战败后，精锐部队伤亡过半，投诚的有三万人。左宗棠部队地驻漳州、武平，这样一来太平军只好撤到广东的镇平，由是福建也平定下来。

接着左宗堂又下令调康国器、关镇平两支部队进入广东，王开琳的部队进入赣州防守江西，刘典的部队赴湘南防守湖南，留下高连升、黄少春的部队驻军武平，侦伺太平军的进退情况。六月，太平军又大举进攻武平，左宗棠指挥军队奋力击退太平军余部。后来，由于太平军内部发生了内讧，李世贤投靠汪海洋被汪所杀，这样太平军内部更加互相猜疑，人心惶惶不安。朝廷下诏让左宗棠统率三省各路部队，趁机迅速合围。

十月，左宗棠移师屯驻绩溪。王德榜担心主帅屯兵之处成孤悬之势，主动请命作为中路策应，刘典听说王德榜的部队开赴前线，也带领部队火速前进。刘典部队在路上突然遇上太平军伏击，措手不及，打了个败仗。太平军乘胜追击刘典，但又为王德榜军伏击包围，太平军死伤逾四万，据说太平军主要首领汪海洋也中炮死了，清军士气更为高涨。这时鲍超的部队也赶到了，太平军出战，又被打得大败。左宗棠汇合闽、浙、粤各路人马合围，太平军余部的最后根据地丧失，许多首领也牺牲了。太平军将士战死达一万六千多人。由于这一战功，朝廷下召赐予左宗棠双眼花翎。

督师西北　镇压义军

左宗棠由于广东太平军已经平息，因而向朝廷上疏建议裁兵减饷，减少团练的费用，又认为海关开禁，不制造装备船舰器械就不能图谋自强，于是在马尾山下创建船厂，举荐起用沈葆桢主持船厂事务。但不久因为朝廷军队征讨西部边陲回族叛乱长时间不能够得胜，皇帝下诏令左宗棠转赴陕西、甘肃督军。十月，左宗棠挑选了自己部下的三千名精兵，向西进发，令刘典另外再召募三个人，相约在汉口会合，不过行至中途，因为西捻军张宗禹挺进到陕西，又命令刘典先入陕西剿贼。

陕西、甘肃起义的回族民众多达上百万，与西捻军互相配合。左宗棠行军到达武昌时，分析了陕、甘的局势和应对之策，他上奏章说："臣下认为在东南作战用舟船方便，而在西北作战则应用战马为宜。捻军、回族的马队在平原驰骋，官兵用步军来抵挡他们，取胜的希望并不大。以马力而言，西城产的马不如北域产的马强健，捻军的战马多是北方产的，因此捻军的作战能力比回民更强悍。臣下的部队只有六千人，现打算购买口北的良马演习操练马队，兼造双轮炮车。从襄樊、邓县出紫荆关，直穿商州就可以到陕西。在陕西经营屯田，作长远的打算。所以未进兵陕西，一定先要清除紫荆关外的捻军，然后进兵甘肃，而要进兵甘肃，又一定先要清除陕西的捻军，然后驻兵兰州。如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胜利就大有把握，粮饷运输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部队行进就会没有遇到障碍。至于部队前进的快慢，就要视形势的发展而随机应变，我请求给我机动的权利，宽限一些时日，使得我能从容地谋划，以求得成功。"左宗棠战略计划受到朝廷的首肯，朝廷支持这一计划。

同治六年春，左宗棠带领一万二千士兵向西出发，他计划用炮车去制服捻军的马队，而以马队去对付捻军的步兵。捻军突然见到炮车，还没有开仗就狂奔而逃。当时陕西巡抚刘蓉已解任，而总督杨岳斌请求还乡的愿望也尤其急切。朝廷下诏让宁夏将军穆图善代理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军务。兵分三路入关，此时左宗棠又奏请皖南镇总兵刘松山率老湘军九千人援助陕西，并将这些部队都隶属自己指挥。刘松山屡次打败捻军之后，又会合蜀军将领黄鼎、皖军将领郭宝昌，大败捻军于富平。当时捻军进攻三原，然后沿渭水北岸向东进军，回族义军则分出一部分人马向西进攻。左宗棠分析捻军比回军强大，应当先制伏捻军。于是下令各路人马沿河安营扎寨，希望短时间内在泾水、洛水之间歼灭捻军。捻军乘官军尚未集结

完毕，又折向西渡过泾水和渭水，准备攻打河南、湖南。过了一个多月，清军大单向前进逼。捻军不能再向南前进，便奔赴西北。左宗棠为防止捻军和回军汇合的势头，并且又因为西北荒凉贫瘠，部队行军粮草接济不上，因此紧急扼守耀州。十月，捻军战败撤到宜川，不久汇合回军攻打铜川。留守耀州的清军抵挡不住，刘典、高连升急驰援助，大破围城捻军，左宗棠率各路清军拼命围剿捻军，各支部队将领虽然屡次打败捻军，但始终被回军牵扰，部队前进缓慢；在宜川的捻军大部队更是挥师奋进，进逼延长、绥德，直扑葭州，回军也从延安发兵攻陷绥德。左宗棠由于延长、绥德相继失陷，主动上书请罪，御台商议给予左宗棠革职处分。其时扶风、岐山、凤翔等地回民都纷纷响应。捻军从南向北，分散一千多里，回军从西向东，也有一千多里。陕西地方清军有作战能力的不足五万，然而回民义军与清军一旦交战总是赢不了。刘松山等攻克绥德，回军败走米脂，左宗棠一面派刘厚基出兵陕西东北追逐回军，同时下令刘松山等沿黄河西岸挟制捻军，阻击西捻军支援东捻军。然而西捻军取小道翻山到壶口，乘河面结冰偷渡过黄河，威胁了京师。左宗棠奉接朝廷旨今，亲率五千人马赶赴支援，让刘典代替自己统督陕甘官军。

当年十二月，西捻军从垣曲进入河南，不足一月时间又逼近定州，用游散的骑兵进犯保定，北京因此戒严。朝廷下诏严厉斥责督兵大臣，从左宗棠、李鸿章到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都均被革除职务。左宗棠到保定，刘松山等接连攻破捻军所占据的深县、祁州、饶阳、晋县等地。在这个时候，捻军在方圆数百里间来回奔波，先在直隶后又转战河南、山东，不久又渡运河，越吴桥，进犯天津。李鸿章提议四面包围以抵挡敌人。左宗棠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应当一边防守一边主动出击，运河西岸重点固守，东部就一定要有追击剿杀捻军的部队，这样才可以扼制捻军长驱直入的气势。同治皇帝同意左宗棠的建议。因此各地来护防京师的部队大规模集结，左宗棠率军驻扎吴桥，居中调度。捻军由于左宗棠、李鸿章的围剿计划，不得流动征战，只能在陵邑、济阳一带集结，左宗棠趁此机会，立即汇合淮军、豫军接连打败捻军。捻军首领张禹最后跳河自杀，于是西捻平息。由于左宗棠打败捻军的功劳，清廷特命他入朝拜见皇上，对左宗棠大加褒赞，并且询问西部边陲部队还有多久能取胜班师，左宗棠回答要五年，后来果然如左宗棠所预见的那样。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率领部队回陕西，到达西安。其时陕西东北的义军董福祥聚众多达十余万人，在延安、绥德，而陕西西南的回军首领白彦虎等号称有二十万人马，盘踞在甘肃一带。刘松山率部赶到，击溃董部，董福祥投降。此时回军却更加四处出击，和在西南一带活动的白彦虎等合力进攻秦川，黄鼎率部击败了他们。左宗棠进军乾州，侦察士卒报告回军将把总部迁到金积堡，左宗棠便派兵追击他们，终于接连克复镇原、庆阳，回军死伤多三万人。收复后，左宗棠亲自督促回民的壮丁耕作，教会他们区田、代田等法，并且给那里的流民发放巨额钱币，让官军收留的饥民及投降的十七万兵士全部

居住在那里。左宗棠于同治八年五月，挥师进军甘肃。

同治十年七月，左宗棠亲率大军从平凉移到静宁驻扎。八月，到安定。此时另一支回民义军聚集在河州，再往西都是险峻之地。左宗棠命诸将分头出击，攻破平定了这些地方。其时回民首领马朵三已死，马占鳌看到官军步步深入，西宁的回军又已归顺朝廷，去路已断，无奈也投降了，河州遂平定下来。

同治十一年七月，左宗棠率部移驻兰州。徐占彪在此之前由于伊犁之变领军向西，不过这时因肃州发生骚乱而使行军受阻。原先回族另一首领马文禄先已投降，听说新疆战事紧急，左宗棠要率部进军西去，认为此时机会来了，便又占据城池发起反叛。徐占彪的部队在肃州以西被围困，只得据城死守，并且向西宁发出求援信息。这时原左宗棠平定的西回民白彦虎、禹得彦也在暗中响应马文禄。等到刘锦棠率军向西增援时，西宁地方的回民及陕西回民又纷纷倒戈，推举马本源为元帅。

西宁东北有湟水为阻，两山对峙，这就是古时称之为湟中的地方。回军占险要之地屯兵。然而左宗棠不等回军立稳脚根立即派他所率的湘军精锐，携带大炮进攻，很快就把回军打得大败，遗弃的大批马骡辎重堆满了山谷。这时大通都司马寿又唆使向阳堡回民残杀汉民，背叛朝廷。同治十二年正月，刘锦棠进攻向阳堡，夺取城门而人，杀死马寿，接着攻破大通，又杀死马本源。于是黄河东、西众回军也纷纷向清军投降。

马文禄盘踞肃州，眼看左宗棠大军压境，知道形势不好，假装请求招抚，暗中却进一步招募城外回民人城协助防守，清军接连进攻都未能攻下。八月，左宗棠到前线视察部队，马文禄登上城头看见左宗棠的帅旗，感到沮丧。左宗棠命金顺、刘锦棠的部队大规模集结，并用大炮轰击，马文禄走投无路，出城投降，被处以磔刑。白彦虎逃跑到关外，肃州于是平定下来。同治皇帝下令褒奖左宗棠，任其为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加封一等轻车都尉。左宗棠上章奏请在甘肃开科兴考场，设立学政。同治十三年，晋升左宗棠为东阁大学士，留在陕西总督的治所。

从咸丰初年开始，天下大乱，先是广西而起的太平军，其次是捻军，再次是回军。左宗棠先后参加平定了他们，到此时陕西、甘肃全部安定；清政府感到左宗棠鞍马劳顿，劳苦功高，因而对他优渥恩幸。

挥军新疆　抗击沙俄

19 世纪 70 年代，浩罕国为沙俄所消灭，浩罕国流亡军官阿古柏，纠集一些亡命之徒窜人我国新疆，占据新疆喀什噶尔，后来逐渐占领了南部的八个城池，又攻败盘踞在乌鲁木齐的回族人妥明。妥明本是西宁的回人，当初以传播新教而来回于关外。同治初年，乘陕西、甘肃汉人、回民间有发生战事之机举兵发难，占据了乌鲁木齐，并兼并了北边的伊犁等城，收取那里的赋税收入。妥明不久被驱逐，在路上死了，但是另一个头目白彦虎逃到乌鲁木齐，他派使者同英、俄勾结，购买军械器具装备自己，而英国人又暗中帮助他，想让他另立一个国家，以挟制俄国。就在这时，俄国以回民多次扰乱其边境为由，突然发兵驱逐回民，占领了伊犁，并扬言要攻取乌鲁木齐。

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后，遵照清政府的命令，正准备率军出关，平定阿古柏的侵略。但正在此时清廷发生了海疆防守的争议。朝廷大多数大臣认为自清高宗乾隆平定新疆以来，每年要花费银两数百万，就像是一个无底的漏斗。现在竭尽天下的财力赡养西北官军，没有剩余力里来预防东部海疆的不测之需。他们认为，应该遵照英国人的建议，准许阿古柏自立为国，作为大清藩国，停止西征，专力于海防。当时军机大臣李鸿章更是力主应该如此。然而左宗棠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关、陇刚刚平定，不及时规划这些回归国家的旧有之地，放弃并使他们自立为国，这无疑是遗祸无穷。不是从西面被英国人所合并，就是向北归入俄罗斯的版图；我们的版图为什么要无缘无故缩小？边防险要为什么要尽皆散失？到那时，防守边疆的士兵不会比现在减少，粮饷费用也一如现在。这不仅无海防之益，挫伤国威，而且助长叛乱。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朝中只有军机大臣文祥非常赞赏左宗棠的建议。争论的结果是左宗棠意见占了上风，最后清廷通过决策，让左宗棠继续出塞，并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统督军事。

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举兵驻扎肃州。五月，刘锦棠向北翻过天山，会合金顺部队先攻打乌鲁木齐，乌城攻克后，白彦虎逃走到托克逊。九月，清军攻克玛纳斯南城，北路平息，于是谋划南路。左宗棠发布命令说：“回族各部被他们的头目所驱迫，厌烦战乱已经很久了。我们大军所到的地方，不要奸淫掠夺，不要残杀无辜，朝廷的仁义之师如及时之雨，现在正应是这么做的时候。”光绪三年三月，刘锦棠攻克达坂城，把所擒获的回民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家。次日，清军即收复托克逊城。徐占彪和孙金彪两支部队也接连攻破各个城隘，会合罗长祜等部队收复了吐鲁番，收降回民达一万余人。阿古柏最后走投无路服毒自杀，他的儿子伯克胡里杀害了自己的弟弟，逃往喀什噶尔。

白彦虎逃到开都河，左宗棠想一鼓作气擒获他，奏章还没上，恰遇库伦大臣上书声言本部边境现在正议定疆界。其时朝中大臣也认为西域征战费用巨大；乌鲁木齐、吐鲁番既然已经收复，可以休兵罢战了。左宗棠感叹道：“目今正是有利之时，怎么能作出划边界退缩防守的计策呢？”便上疏据理力争；光绪觉得左宗棠的意见正确。此时俄国正与土耳其开战，金顺请求乘虚袭击伊犁。左宗棠说：“不行，出师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他们就会抓住口实了。”八月，与刘锦棠在曲会会师，就由大道向开都河进发；正面部队余虎恩等从库尔勒出奇兵以助。白彦虎逃到库国，又到阿克苏，遭到刘锦棠的拦击，白彦虎只好转而窜逃喀什噶尔。左宗棠大军不久收复了南疆东部四座城池，何步云献喀什汉城向清军投降。伯克胡里接纳白彦虎后，就合力攻打汉城。清军大部队人马赶到，他们又逃往俄国。南疆西部四城相继攻下，左宗棠向朝廷报捷，皇上下诏晋升左宗棠为二等侯。至此在新疆的布鲁特蒙古十四部争相归附清朝。

光绪四年正月，左宗棠上疏奏叙有关在新疆建行省的事宜，同时请求派员和俄国谈判有关归还伊犁和交换战俘这两件事。朝廷派遣全仅大臣崇厚出使俄国。俄国用通商、划分国界和索要赔款

三件事相要挟。崇厚轻率地签订了条约，这不禁引起了朝廷有识之士的纷纷反对，议论好久都没有决定下来。左宗棠上书说："从俄国占据伊犁以来，蚕食侵占没有停止过，新疆已有每日缩地百里的势头。俄国把伊犁看成自己的外府，我们要讨回土地，他们就索要赔款卢布五百万元；俄国归还伊犁，对俄国方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而我们得回伊犁，只不过是一片荒野郊原。现在崇厚又提出给俄国霍尔果斯河和帖克斯河，这就是将伊犁西南的土地划归给俄国。在军事上打不过人家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割地求和这样的事；现今一箭未发，就马上送献战略要地，这种条约是万万不可以签的！俄国的商人目的想要进行贸易，他们的政府便在各地广设领事馆，想借通商之由深入腹地，这也是切不可准许的。臣下认为俄国人包藏祸心，他们猜测我国可能已厌倦兵事，用全权大臣谈判的办法来牵制边疆大臣。当今之计，应当先和俄国人谈判，委婉而运用计谋，另一方面，要准备在战场上和他们决一雌雄，坚忍而务求胜利。臣下虽然衰老平庸不成样子了，但哪里敢不勉力效忠啊！"光绪皇帝认为左宗棠的话大长了朝廷志气，命令把崇厚逮捕治罪，朝廷命曾纪泽出使俄国，更改前面的和约。这时左宗棠请求亲自出兵驻防哈密，策划收复伊犁。他命令金顺立即率军出发，作为东路；张曜率部沿特克斯河进兵作为中路；刘锦棠经布鲁特游牧地区作为西路。又分别派遣谭上连等各带兵驻守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等地作为后路声援。这几路部队总共有马兵、步兵四万多人。声势浩大，士气高昂，他们决心与俄军不惜决一死战，务必收复伊犁。

光绪六年四月，左宗棠坚决表示自己收复伊犁的决心，命人抬着棺材从肃州出发，五月抵达哈密。俄国人听说清军大兵出动，就增兵守卫伊犁、纳林河，另外派兵舰在海上巡弋，以震撼京师。此时天津、奉天、山东等地也同时告警。七月，朝廷下诏让左宗棠回京城任顾问，让刘锦棠代替他。俄国人也害怕清军的威武，担心事态发展后会引起决裂而挑起战端。次年正月，在中国在赔款上又做出让步后，清与沙俄终于达成了《中俄归还伊犁条约》，中国收复了伊犁的绝大部分地区。

入京出京　披甲领兵

左宗棠用兵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战机；筹措战事，更是注重节制兵丁人数，并且以保证粮饷充足为根本。当时刚开始西征，左宗棠担心各行省协助军饷不能按时到达，曾经上疏建议向外国借款。沈葆桢反对他的建议，光绪皇帝下诏说："左宗棠以西线战事为重，国家又何惜千万金，特拨给款银五百万两，再准允他向外国借贷五百万。"左宗棠部队出塞共二十个月，新疆南北各城能全部收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能够做到军饷及时供给充足。当初议论西部边防事务时，左宗棠主张发展屯田，听到的人都认为左宗棠迂腐。等看到左宗棠上奏论述关内外过去屯兵的利弊，以及论及将兵农划开为二，挑选精壮的人为兵丁，让老弱的人去屯田垦地，大家于是才佩服左宗棠老谋深算。新疆平定后，朝廷升调左宗棠为军机大臣。入朝觐见后，皇上赏赐左宗棠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可由内侍二人搀扶着上金銮殿。左宗棠在朝廷任高职，引起朝野上下的轰动。

很多读书人兴奋地议论说，中国相当长时间落后，非常脆弱，这次左宗棠打败了沙俄，中国有希望了。外国人也渐渐传说他的战功。他刚入京师时，内城有教堂高楼，在楼上可以俯瞰宫殿，民间老百姓传说左侯到，教堂高楼就要被捣毁。外国人为此也惶惶不安。左宗棠不得不公开贴出告示让大家放心，于是谣传停止了。左宗棠在军机处当值，因他长年在外征战并不熟悉朝中的礼节、掌故，因而屡屡受窘；他性格耿直，难免得罪人，因此就有许多同僚多厌烦埋怨他。宗棠本人也不乐意居住在京城之地，于是进京不久，便称病乞求引退。九月清廷命他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上任后出巡吴淞，路过上海时，洋人为左宗棠树龙旗，鸣礼炮，非常恭敬地欢迎他。

光绪九年，法国人攻打越南，左宗棠这时已七十有余，且身体多病，已致仕在家。但当他听知此消息时马上请求到云南指挥军队，并下令让旧部王德榜在永州招募军队，号称“恪靖定边军”。到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终于爆发，云南、越南官军溃败，左宗棠被召入京，再次任职军机处。不久法军大举向中国内地进犯，光绪皇帝诏令左宗棠到福建视察部队，左宗棠命王鑫之子王诗正暗中率军渡海到台湾，号称“恪靖援台军”。王诗正到台南，受到法兵阻击，他与台湾军民一道最终击败法军。而王德榜会合其他部队在谅山取得大捷。中法和议达成，左宗棠称疾请求告退，但尚未获准，七月在福州病逝，时年七十三岁，赠太傅，谥“文襄”。将其灵位入祀于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以及立有战功的各省建立专祠祭祀。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壶公、无竞居士、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曾祖父张怡熊，官浙江知县；祖父张廷琛，官福建知县，父亲为贵州道员。张之洞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咸丰二年（1852）直隶乡试以第一名中举；同治二年（1863）应礼部试，中进士。殿试时，他的文章侧重时政，且论述方式不落俗套，某些考官对此不欣赏，但某些考官却称赞他的文章。文章交由慈禧太后定夺后，张之洞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同治六年至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执掌文职。他此期间热心奖掖人才，在四川任学政时的作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在成都创办“酋经书院”，并设一书局刊行古代经典和各朝史籍；为学生们撰有一部有关提高学习和写作的读本，名为《轩语》二卷，于光绪四年刊行。同时刊行的还有一部中国要籍提要，名《书目答问》四卷。张之洞为《书目答问》作序言，上署日期为光绪元年。这是一部在中国古文献学上极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多次增补、修订再版。光绪四年，张之洞在四川任期届满返京。此后至光绪七年，主编《京畿地方志——舢匝天府志》全书凡一百三十一卷。

光绪五年，张之洞升国子监司业。他在这一职位上尽职尽力，授道传业，指斥流弊，因而获得太后的赏识，其声名也广为播扬。光绪五年，中俄伊犁之争进入高潮，这更是张之洞施展才能的

大好机会。光绪六年一月，清廷令廷臣会议使俄大臣崇厚与俄签订的伊犁条约等事宜。崇厚在此约中允诺付给俄国一大笔赔款，出让了所争议地区的大约三分之二领土。张之洞呈上一份措辞强烈的奏折，力主废除中俄伊犁条约并处死崇厚。他对中国实力持乐观态度，力主与俄国开战。由于这份奏折的呼吁，光绪六年二月令左宗棠率军西征，清与沙俄又重新签订了于中国较为有利的条约，张之洞因伊犁事件而声名鹊起，声望与日俱增，累累升迁，至光绪八年，提升为山西巡抚。

张之洞到了山西发现，由于饥荒和普遍存在的官吏贪污腐化，这个地区的情况相当糟糕。他惩办了作恶多端的祸首，并支持许多振兴措施，鼓励发展地方冶铁业，扶助书院和学者等等。他曾经制定了一个开拓内蒙古的方案，他也曾试图禁种罂粟，并令学者和官员戒掉吸食鸦片之恶习。这一切的努力都证明他是极力想挽救颓败的局面的。光绪十年他到广东就任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是当时越南危急的形势。他的策略是利用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攻击在越南的法军，以期牵制法军对台湾的进攻。他尽心竭力地为这次战事筹饷，其功劳是有目共睹的，当他的某些部下被劾渎职时，他并未受严罚。光绪十一年初，中法开始议和。三月二十九日冯子材（他是张推荐的）率中国军队出其不意获凉山大捷，但凉山之战并未对议和条款产生影响。条款仍以《李福协定》为蓝本，据此，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张屡次上疏反对议和条款，他强调指出中国在最后时刻之军事胜利，但皇帝不采纳他的意见。

在任两广总督的六年中，张之洞脑中装满了改革计划和方案。他试图在两广省内改革税收制度，他把增收的款项用在多项事业上。光绪十三年，他建立一座兵工厂，该厂最初造炮弹，后又制造小武器，他为在广东沿海巡逻的舰队增添多艘舰只，并于光绪十三年设立一所水陆师学堂，他还招请几位年轻的留学生做幕宾；光绪十五年，张在广东开设中国第一家近代钱庄；光绪十三年他创办“广雅书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书院之一。光绪十三年由他本人及几位官员和商人出资，设立“广雅书局”。许多学者受聘担任书局的编辑或校对。该书局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出版了约一百七十六种书。其中大部分为清代学者所撰述。除七种之外，这些著作于1920年均被收入《广雅书局丛书》再版。

广雅书院和书局的成就引人注目，而张之洞则因创办之功经常被称为张广雅。由于张之洞的努力，广东当时的财政情况有了好转，其后任李鸿章在光绪十五年任广州总督时，就有了这样的感受。在此期间，京师政坛上南北党争日趋激烈。当时掌管户部的南党首领翁同和极力反对属于北党的张之洞。但由于张之洞在广东留下一笔充实的库银和一些重大的改革成果，张之洞为他的北方同僚多少挽回一些因张佩纶在马尾战败而失掉的声誉。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从广东调往武昌任湖广总督，这是他提议修建京汉铁路的结果。中国的铁路建设始于李鸿章管辖下的直隶省。光绪十四年，计划把现有铁路从天津延至通州。许多御史和官员以为这样会有利于入侵者和引起村

民骚乱并使驿夫失业为理由，坚决反对延伸这条铁路。当征求各省督抚们的意见时，张之洞上书大力支持修筑内地铁路干线。他建议在内地修一条大铁路从北京西南的芦沟桥至汉口，而且他列举了御史们无法驳倒的这条铁路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好处，他的建议被批准。光绪十五年八月，他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以实现其计划。据预算，这条铁路将耗资三千万元。国库为此储备了二百万元。但第二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关系趋于紧张，这笔资金就被挪用来延长天津至唐山铁路东段的修建。修筑芦汉铁路的计划因之被搁置了。

张之洞对发展中国工业和他对修筑铁路一样有兴趣。他任湖广总督十八年，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主要事业之一是汉冶萍钢铁厂。离开广东之前，他订购了一套铸铁工厂的机器，光绪十六年他到武昌后不久，铸铁厂即在汉阳开工。光绪二十年，与汉阳铁厂配套的大冶铁矿开工。两年后，因资金不足，铁厂卖给私人股东，由大实业家盛宣怀经营。光绪三十四年，江西萍乡煤矿将上述两厂合并为汉冶萍公司。张之洞兴办了另一些企业，如棉纺厂、丝厂，制革厂。他还主持了一项精心设计的筑坝工程，为大批人提供就业机会。湖北还组建一支新式的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小型模范军队。他创办多所各种类型的学校，并送学生出国留学，主要前往日本。他的财政改革使湖北的岁人由光绪十五年的大约七百万两银增加到光绪三十三年他离开武昌时的一千五百万两，这使朝廷对他更为赏识。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原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北方指挥军队，张调往南京署理两江总督，他努力向北方发送给养和新兵。力主抗战，反对李鸿章的议和；和约缔结之后，他再一次极力敦促修筑京汉铁路。计划获准后，奉命回到武昌去监督计划的实施。他打算向中国投资者发行股票但没有成功；光绪二十二年末，盛宣怀获准借外资修筑铁路。光绪二十四年，芦保段建成，光绪二十六年延至北京，光绪三十二年京汉的铁路全线完工。

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响，至光绪二十四年，外国列强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使许多学者猛醒。光绪最终听从康有为的主张，开始“百日维新”。原先张之洞的态度是同情维新的，他向皇帝推荐一批思想开明的青年，其中就包括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期，他写下著名《劝学篇》二卷，光绪二十四年刊行，广厅下将它分发给所有官员和学者，这篇著作的真正目的是鼓吹一个先从教育着手、逐渐改良的方案，而不是皇帝和康有为正在尝试的大刀阔步的变革。文章大意是：中国的出路在于复兴儒家学说，并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不采用它的哲学，这就是的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重掌大权，张之洞致电慈禧，竭力主张惩办维新党人，尽管他与维新党中多人颇有来往。此外，他拒绝同刘坤一一同上书反对废黜皇帝。光绪二十四年之后，张之洞受到朝廷的怀疑，同时又为维新党人所憎恨，他们认为他胆小怕事而且背信弃义。他与维新派的最后决裂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当时一些维新党人聚集在汉口，准备在义和团起事的掩护下，秘密举行

武装起义以推翻慈禧政权，使光绪皇帝重新掌权，但计划为张之洞所得知，他下令逮捕并处死其领导人唐才常及他的十九名同谋。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义对张之洞的政治才能是一次考验。张之洞忠于慈禧太后，身为总督，他的职责要求他服从朝廷的命令，但他意识到一场排外运动的危险性。他和刘坤一所采取的做法，使他们在义和团起义中得以同时受到慈禧和外国人的信任。他一方面奉北京朝廷之命向北方调拨军队，但这些调出的军队是强征而来未经训练的，最精锐的军队他却留在身边。一方面他又向外国人表明他不完全排外的立场，上海外国领事团被告知，只要列强不派军队侵人长江流域，张和刘将保证长江流域外国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项建议被列强基本上接受了，并且为其他督抚所采纳；它使中南地区外国人的安全得到保障。

张之洞的政治才能应变能力使他在义和团起义之后，在朝中颇受宠信，加封太子太保。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下谕召询有关最需改革之事项，他和刘坤一合递了三份奏折。这三份奏折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建议设立现代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并鼓励学生去国外留学；第二、提倡依照西方国家行政和军事改革。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刘坤一去世，张之洞再次在南京署理两江总督。他任职五个月，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教育问题的朝议之后，他受命参与制订全国学制。有关学校体制的的建议书于光绪三十年一月送呈御览。上奏中的学校体制显然以日本模式为基础。为了推行新学制，张支持废除由来已久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于光绪三十一年终于被明令废除。

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奉召进京授大学士、军机大臣。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逝世，此时，张已是衰落的满清王朝仅存的著名人物，漫长而紧张的官僚生涯使他精疲力尽，他于宣统元年十月四日去世，谥“文襄”。

【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祖籍福建莆田，生于福州西门街。他4岁进私塾，7岁会作文，14岁考中秀才，20岁中举，26岁获赐进士出身，被选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跻身官场。

林则徐曾做过7年京官。其间，一次赴江西担任乡试副考官，一次赴云南担任乡试正考官。随后，开始到地方任职。他先任江南道监察御使、杭嘉湖道，继而任江苏按察使，接着任陕西按察使兼署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江苏巡抚，尔后升任湖广总督。

选贤任能

在《林则徐集·奏稿》中有句闪光的语言：“立政之道，察吏为先。”林则徐无论担任地方考官，还是后来身为钦差大臣，都十分注重对官吏的考察和任用。

当时，在科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正之风；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家为使自己的子弟出人头地，千方百计地拉关系、走后门。林则徐对此深恶痛绝，及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杜绝任何营私舞弊的发生，选拔了一大批忠君爱民又富有真才实学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林则徐也很注意对人才的物色和考察。《瞑庵杂识》一书中就记载着这么一段话：林则徐“每见客必先问其生平、技能、嗜好与所过山川风俗、所交豪杰。退即令记室籍之，四人专司其事。斋中置大柜、函子箱十八，分省以藏籍。凡所资考，按籍厘然”。在《林则徐年谱》中，也写道：林则徐“接见僚属绅士，必旁咨博采，屏后小吏备书其语，每日每人皆如是。公因互证其异同，以分其人之诚伪、事之是非”。

当时，南方籍的小京官们成立了一个“南诗社”，定期聚集在北京宣武门南一个四合院饮酒赋诗，纵谈古今。林则徐每有机会，也总是参加那儿的活动，籍以发现更多的人才。

此外，林则徐对其身边的人及其家属，也留心观察和培养。如老友龚丽正的儿子龚自珍、僚属魏邦鲁的儿子魏源，都受过他的教诲和扶持。后来，他们都考中了进士，多有建树。其中，龚自珍官至礼部主事，著有《龚自珍全集》，他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魏源官至高邮知州，著述更丰，尤其是他根据史志和林则徐所译西夷《四州志》编著而成的《海国图志》，曾一度风行朝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惠及四方

林则徐一生曾任经十省辖千县。无论在哪儿，他都坚持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在河南，他见洪水泛滥，成千上万的百姓无家可归，立即轻车简从，亲自赶到重灾区兰考现场办公，帮那些流离失所的灾民很快回到了故土。当他发现河南巡抚琦善督修河工的种种弊端，又马上建议朝廷查封料贩囤积的河工材料，平价收买，以供河工之需。结果，确保了一方安宁。

在江浙，他不仅带领百姓修海塘，兴水利，而且倡导改良稻种，更新技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他还针对实际情况，奏请朝廷减征漕赋，革除漕运弊政；并创造性地实行起“盐票”制度，从而打击了不法商人，增加了国家的盐税收入，大大方便了人民生活。尤其是江苏遭受严重的水灾后，饥寒交迫的老百姓曾一度包围了松江官府，强烈要求减免租赋，发放救济。时为江苏巡抚的韩文绮竟连夜调兵遣将，准备以武力予以镇压。林则徐闻讯后急忙前去劝阻，并亲赴松江安抚灾民，布置救灾，从而缓和了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使成千上万的饥民免遭杀戮。接着，他又组织起各种救灾活动。出钱收养了一些孤儿和孤寡老人；动员非灾区人民接济灾区贫困户；谕令米行、店铺平价售粮；而对趁火打劫的地痞恶霸和贪官污吏，则予以坚决打击。因此，百姓们一致称颂他有海瑞之严峻、周忱之干略、汤斌之公平，将他誉为“林青天”。

林则徐主政湖广之际，鉴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又挺身而出，奏请朝廷同意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演出了“虎门销烟”的壮烈一幕。遗憾的是，禁烟之举引起了“驰禁派”的嫉恨，英军的入侵也导致了道光皇帝的不满。不久，他被革职查办，谪戍新疆。

在新疆，林则徐仍竭尽全力为人民谋福利。他不顾60岁高龄，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穿行大山、丘陵和沙漠，长途

跋踄，遍行南疆三万里，勘丈屯田地亩，策划兴修水利；在吐鲁番，他推广坎儿井；在全疆，他推广纺车；他还精心绘制了《卡外舆图》，以防备北方敌人从边境入侵。

当林则徐被流放新疆三年后，在哈密奉旨释放。当了不足半年的陕甘总督，又被任命为陕西巡抚。由于陕西正遭受自然灾害，他又运用当年在江浙赈灾的经验，妥善完成了对陕西的赈灾事宜。

一年后，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他鉴于当地激烈的回汉互斗，又抱病处理这一棘手的民族矛盾。他反对他的前任贺长龄等所采取的助汉杀回政策，而主张无论回汉都应当分清良莠。凡奉公守法的良民，无论回汉，都要爱护；凡豪强恶霸，也不分回汉，一律惩治。结果，赢得了回汉百姓的一致拥戴。

也正因此，有人为林则徐写了一副对联："为政若作真书，绵密无间；爱民如保赤子，体贴入微。"这副对联，曾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清正廉洁

林则徐自幼节俭勤奋，替大人分忧。早在他少年时期，每天上学时便带些母亲和姐姐们做的纸花到街头去卖，来不及卖完的就放在花铺里寄售。放学回家后，立即将钱交给母亲。当官之后，仍保持着这种俭朴美德。衣食住行，从不铺张，更不纳妾。因此，深受同僚和百姓的称赞。

林则徐就任湖广总督时，一出京，立即向沿途各州、县、驿站发出传牌：随行只带跟丁、厨夫等十人，未带官员，严禁他官假冒滋扰；自顾船轿，不用地方迎送；自己住公馆，只用家常便饭，不必地方招待。这与过去钦差大臣出京时的豪华气派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在湖广总督任上，林则徐曾给夫人郑淑卿写过这么两封信。其一说：广东的饮食，与老家福建差不多，还能适合我的口味。只是开支太大，总怕入不敷出。但是，我发誓要清廉为政，决不在俸禄之外再取民间或下属的一分一毫。一定要使自己"上可以答君恩，下可以见祖父"。还表示："吾林氏素代清白，此种污手之钱，决不要一文也！"其二说：我明知禁烟会妨碍奸夷之大利，一定会有许多困难，而我仍旧毅然决然、毫不畏惧，是由于我已经以身许国，只求福国利民，为民除害，"自身生死且尚付诸度外，毁誉更不计及也"。

在林则徐被革职戍疆时，广州百姓纷纷自发地来到他的住处，向他表示慰问，并送他许多慰问品，诸如靴子、雨伞、香炉、明镜和颂牌等等。他含泪向百姓致谢，只收下了几十块颂牌，其余礼品全都谢绝了。

林则徐就任云贵总督时，在昆明总督署中，有小园、广庭、长廊，结构很像家乡闽式。有一年中秋之夜，他设席园中，一家人饮酒赏月，共度中秋节。林则徐从美观的角度，随便说了句"此间风物，佳则佳矣，若更得宫灯十盏，沿廊悬挂；素心兰十合，罗列其间，庶几尽美矣！"不料，第二天园中果然宫灯高悬，长廊中兰花溢香。林则徐大惊，方悔昨夜失言，立即令人将宫灯、兰花之类统统撤去。从此，他说话办事更加严谨。

林则徐清廉一生，晚年除了有一点点房产之外竟没有任何东西分给儿子。他在给儿子们写的家产分配书中说：

"田屋产业各按原置价值均分为三份，每份各值银一万两左右……"。在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年代，做了大半辈子高官的他，家产竟不如一个小小的知县！

教子有方

林则徐一向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早在他担任两广总督时，因次子聪彝随夫人住在老家，便特地给夫人写信说："务嘱次儿须千万谨慎，切勿恃有乃父之势，与官府妄相来往，更不可干预地方事务……次儿在家，实赖夫人教诲。"后来，他被发配新疆，其夫人和女儿、儿媳住在西安，他又给夫人写信，请夫人勿忘每日教他们读书写字。当夫人和女儿、儿媳从西安返回福建后，又常常给次子写信，向他提出自己的希望和要求。

有一次，林则徐给其次子写信说："你的哥哥在北京做官任职，我又被流放到边远的新疆，只剩下你侍奉你母亲和带领弟妹在家居住了。照顾家庭，责任是很重的。你应该认真遵守的事有5条：第一必须勤奋读书，尊敬老师；第二必须十分孝敬地侍奉母亲；第三必须对弟妹友爱；第四对于亲戚本家必须和睦相待；第五必须爱惜光阴，努力上进。"之后，他又写道："士、农、工、商四种人中，农民最重要，是世界上第一等高贵的人"；"你如果能够舍弃应科举，而改学种田作农夫，这是我最为高兴的事。"还劝他"长期住到乡下去，跟着长工学习种田技能，天刚明就起床，整天勤劳动。"

林则徐在家中还常常谈及幼子读书的事。他令聪彝督促弟弟爱惜光阴，并具体指出："除了读书作文以外，有空闲时要翻看一些历史书。不过每看一种，须从头到尾仔细看完，然后再换别的书看。最忌东拉西扯，一本看不完就换另一本。这样看过就忘，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还强调说："应准备一个看书笔记本，遇有心得收获，要随手摘录下来；如果有看不懂或疑问的地方，亦要摘记下来，去请姚先生给讲解一下。"

择婿佳话

关于林则徐择婿的事，也一度传为美谈。

据说，林则徐有位女儿，不但长得明眸皓齿，亭亭玉立，而且知书达理，贤淑勤快。一些达官贵人纷纷登门为其子弟求亲，林则徐皆不中意。

有一年腊月三十晚上，署中幕僚们全都匆匆回家过年了。林则徐草就一封奏章后，信步来到前庭，发现厢房中仿佛有人。他推门而进，只见青年书吏沈葆桢仍在专心地抄写文书，便问道："大年三十，你为何还不回家？"沈葆桢连忙起身致礼，并笑着说："今年之事不宜拖到明年，我想抄好再回家过年。"林则徐高兴地点了点头，示意让他接着抄，而自己则默默坐在一旁注视着他。待他刚抄写完毕，林则徐又说："我刚才起草了一封奏章，需要明日发出，既然你还没走，就烦你誊清吧！"说罢，即将他领进了大厅中。

那份奏稿洋洋千言，沈葆桢抄到三更时分才抄好。不料，林则徐略略看了看，却说："字迹潦草，须重抄！"沈葆桢不好意思地接过稿子，更加认真地抄起来，一直抄到大天亮。当他再次送给林则徐时，林则徐深情地对他说："我深知你的工楷和才干，今天又亲眼看到了你忠于职守，不以私废公，不躁不怨，

这实在难得，望今后永远保持这种作风。我还有事和你商量，请到后堂叙话。”而“后堂叙话”的结果，是沈葆桢成了林家的女婿！

消息传出，时人又为林则徐不讲门第而看中德才的做法深表敬意！

1849年，林则徐由于疝气病复发而辞官归养。第二年，广西爆发了天地会起义。新即位的咸丰帝惊恐不安，重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命他赶赴桂林任职。他不顾孱弱的病体，又星夜奔赴广西。由于一路辛劳，刚行至广东潮州附近的普宁县，便与世长辞了。时年66岁。

【彭玉麟】

彭玉麟（1816～1890年），字雪琴，湖南衡阳人。据史载，他16岁丧父，“族人夺其田产”，欺凌其孤儿寡母，万般无奈，母亲将他和弟弟彭玉麒叫到身边，含着眼泪说；“此乡不可居。你们都是男孩子，为了避祸，各自远走高飞吧！”从此，兄弟二人分别离家出走。

彭玉麟几经周折到了府城，一边给人做工，一边刻苦读书，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中了进士，做了官。于是，他将母亲接到身边尽心孝敬，同时多方打听弟弟的下落。但是，直到老母亲去世后，他才得到彭玉麒的消息。

除暴安良

彭玉麟越是思念弟弟，越增加了他对地痞流氓、贪官污吏的刻骨仇恨和对贫苦百姓的同情和爱抚。朝廷见他忠君爱民又聪敏精干，使其官职不断升迁。时至咸丰末年，已成为位尊权重的兵部尚书。

同治初年，彭玉麟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巡抚长江水师。其间，他整肃军纪，惩治贪顽，平反冤狱，曾经一天就罢免、关押、处死管带以上的水陆将领100多人，并由此而声震天下。

有一次，彭玉麟在晚饭后又微服私访。待走到一家门口时，忽然发现一位白发老人在痛哭。一问，才知道他的儿子因去茶馆听说书，管带令他让座位，他行动慢了点而遭毒打，抬回家不到两天就死了。老人基于那管带是当地一霸，又是附近最大的官，情知告状也没用，只好对天哭泣。彭玉麟听罢，立即给了他10两纹银，又问明那茶馆位置，独自走进茶馆中。接着，他捡正中一个最好的位置坐了下来。不一会，两个水兵各提一个大灯笼，一前一后地护送管带进了茶馆。当管带走到彭玉麟座位前，抓起茶壶往地上一扔，对两个水兵说：“把这个臭老头子赶出去！”话音刚落，彭玉麟便被拽着衣领推出门外。

第二天，彭玉麟下令召那管带前来听差。管带赶到后，一眼便认出这位钦差大老爷原来是被他赶出茶馆的“臭老头”，不禁大惊失色，连忙伏地请罪。彭玉麟冷笑一阵后，只说了一句话：“你一个小小的管带竟也如此作威作福，斩了！”那管带得到应有惩处。

彭玉麟巡视到合肥时，没有上岸，而是下榻于自己的坐船上。一天，一个乡民在岸上喊冤，彭玉麟将他叫进船中。一了解，原来是那人的妻子被合肥李公子抢去了。而这位李公子，正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侄子。彭玉麟略加思索，即令营官拿着自己的名帖去请李公子。李公子还以为彭玉麟看在自己伯父的面子上而给他特殊的关照，便兴高采烈地来到船上。彭玉麟先把那乡民叫到面前，

继而问李公子是否抢了他的妻子。李公子顿时大惊，但转念一想，彭玉麟与自己的伯父曾一度交往颇密，也就不在意地回答道："芝麻大的事，何劳世伯大人介意！"彭玉麟又问那人的妻子现在何处，李公子说："她没福气，三天前投井自尽了。"彭玉麟顿时拉下脸来，喝令左右："斩了！"

当刀斧手将李公子绑赴岸上即将行刑时，恰好被赶来参谒彭玉麟的合肥知府、知县们遇到。他们一边大喊"刀下留人！"一边上船求彭玉麟饶他不死。彭玉麟怒斥道："你们身为地方父母官，却不为民做主，还不回衙听参，等候治罪！"

知府、知县刚离开，安徽巡抚又来求见，彭玉麟清楚地知道，这巡抚是李鸿章的心腹干将，一定也会竭力求情的。于是，速令中军前去监斩，自己则出船去迎客。当宾主刚刚坐下，李公子的人头便被献了上来。

睦邻重友

彭玉麟一向执法如山，以"刚直之名满天下"。但史书上又说：他"然亦多情人也"。他的"多情"，集中表现在同乡亲、友人的交往上。

彭玉麟的老母去世后，他多次回乡祭扫母坟。每次回去，"皆布衣、青鞋，不设舆从"，没有一点"官架子"。见到家乡父老，也总是主动向前打招呼，并与他们亲切攀谈，就像故友久别重逢。

在善待他人的同时，彭玉麟还大力为家乡兴办慈善事业。据地方志，他资助本县学田合计白银二千两，宾兴费银合计二千两，育婴堂公费二千两，修县志银五千两，独建船山书院银一万二千两，衡清试馆银一万两。仅此6项，共计白银三万三千两。此外，京师或各省省直湖南衡水会馆，只要有募捐活动，他也资助，而且一出手即达千两白银之多。对本族年迈之人，他还经常给馈赠；对穷苦乡民，则计人口多寡定期关照。

为处理好亲友、邻居的关系，彭玉麟对其家丁要求甚严，不许他们败坏自己的名声。有一年过节，彭玉麟突然想吃鲜鲤鱼汤，便让厨师去购买。那厨师几乎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市场，也没找到一家卖活鲤的。恰巧，此事被一位姓洪的隐士发现，他便将自家养的一尾鲤鱼送给了那厨师。厨师欣喜异常，一边道谢，一边付钱，可是洪氏说什么也不收。厨师非常为难地对他说："彭大人有令，买东西不给钱者，斩。您要是不收钱，我只能把鱼退给您！"洪隐士一听，对彭玉麟更加敬佩，便说："请你回去禀报彭大人，洪某这条鱼不是送给彭钦差，而是送给彭义士的！"那厨师无奈，只好拿着鱼回到府中，将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彭玉麟当时欲言又止，而第二天一早，则派四位差官带着他的名片和重礼去洪家致谢。此事迅速传遍四邻，一时成为佳话。

挥泪打弟

咸丰十一年（1861年），彭玉麟时任安徽巡抚兼管当地驻军。有一天，一位壮年男子找到军中，声称自己是彭玉麟的弟弟。彭玉麟闻讯马上出迎，果然是20年未见面的弟弟彭玉麒。兄弟俩久别重逢，百感交集，不禁抱头痛苦。彭玉麟这才知道，弟弟经过千辛万苦后，流落到豫陕一带做买卖。从此，他对弟弟"护爱甚笃，与其共寝食"，彼此自有说不完的话。

然而，由于彭玉麒多年经商，接触

的人良莠不一，赚钱的道五花八门，虽然人还正派，但养成了两大毛病：一是挥霍，二是吸毒。基于他惯于挥霍，所以他对兄长十分简朴的生活很不理解，便问他为什么这样清苦？彭玉麟便耐心地给他讲其中的道理，还同他一起“忆苦思甜”，回顾少年时代的艰难。出于对胞兄的敬仰，彭玉麒也只好同哥哥过一样俭朴的生活。但他“久客州县，服洋烟成瘾”的毛病，却使他实在难以忍受，有时不得不躲到一处解解馋。

有一次，彭玉麒趁哥哥因公外出，又偷偷抽起鸦片来。正当他吞云吐雾昏昏然，没料到被仆人发现，报告给了彭玉麟。彭玉麟一听，勃然大怒。他认为：若不改掉这一恶习，将百弊俱来，谈何兴家立业？何况自己早已命令军中禁烟，而他却率先违令！于是，当即升堂，将彭玉麒押到阶下，挥去满面泪水，令手下人打了他40军棍。接着，又痛斥了一番，将他“斥出之”。临了，还严肃地警告他：“不断烟瘾，死无相见！”

彭玉麒经受一阵痛打，顿时遍体鳞伤。他连滚带爬地跑到一个存身处，不禁抚今追昔，左思右想。尽管浑身上下疼痛不止，他却一点也不怨恨哥哥。相反，他觉得哥哥无论表现出来的对他的爱，还是对他的恨，都源于为他好。因此，他“感愧自恨，卧三日夜，濒死，竟绝不更服”，终于彻底戒了毒。于是，他又来见哥哥，并主动承认了错误，还表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彭玉麟止不住热泪盈眶，遂向前与他再一次抱头痛哭，从此，“复好兄弟如初”。

又通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彭玉麟进一步发现并总结了弟弟的优缺点。他综合分析比较后，劝弟弟不可久留军营，而应该去继续做生意，以勤劳致富，还具体帮他选择了“行盐业”。彭玉麒言听计从，愉快地重返商场。

后来，彭玉麒在实践中研习理财之道，结果左右逢源。他贱买贵卖，薄利多销，讲究快速，与时争利，很快便“致赀巨万”。他发家致富后，想送哥哥一笔钱，但彭玉麟“一无所取”。于是，彭玉麒接济贫穷，“恤贫笃义，乡人流落江淮者，悉收恤资之，岁散万金”，并由此而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人。与此同时，彭玉麟也因教育弟弟走上正路而受到更高的评价。

四、乱世枭雄

【王莽】

（前45～23）西汉末年外戚，后为新朝皇帝。字巨君。父王曼，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庶弟。元后诸兄弟以外家封列侯，元成之世相继辅政，骄佚奢僭。王曼早死不得封侯，故王莽早年生活不如诸父兄弟。他折节恭俭，勤奋博学，谨事老母及寡嫂，抚养兄子，以德行著称。其伯父大将军王凤病，王莽侍疾，蓬首垢面，数月不解衣带。由于王凤临死前向元后和成帝推荐，王莽得拜黄门郎，迁射声校尉。永始元年（前16），封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倾家财赈施宾客，招纳名士，结交公卿大夫；又揭发外戚定陵侯淳于长的罪过，获取了忠直的名声。绥和元年（前8），王莽代替王根为大司马。他爵位愈尊，矫情伪饰愈甚。妻子见客，衣不曳地，布蔽膝，人以为使婢。哀帝即位，佞幸董贤与外戚丁、傅两家得势，王莽曾罢官就第，杜门自守。在国三岁，上书为他讼冤的官吏以百数。哀帝死后，年幼的平帝继位，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王莽复任大司马，总揽朝政。他迫令董贤自杀，拔擢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等亲信，树为党羽，竭力诛灭异己。元始元年（公元1），进位太傅，号安汉公，后加称宰衡。

王莽为了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授意公卿奏请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均由安汉公接见。又指使公卿大臣和吏民上书，要求立其女为皇后。为笼络人心，他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赋给贫民。还奏起明堂、辟雍、灵台，增加博士名额，广为儒生筑舍，网罗郡国能教授五经及通晓《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小学和医药方术的士人数千名，遣诣京师，令其改正前人乖谬，统一异说。由于王莽辞让新野田的封赏，吏民上书称颂其功德者竟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元始五年，王莽加九锡。平帝死后，他拥立两岁的孺子婴，自己仿效周公辅成王故事，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朝会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改元“居摄”。宗室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先后起兵声讨王莽，关中民赵明、霍鸿等也群起反抗，众至十余万，攻烧官府，但相继为王莽所镇压。其后，宗室刘京、梓橦人哀章等迎合王莽心意，伪造符命，宣称汉祚已终，“假皇帝应作真天子”。初始元年（公元8），王莽遂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为了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附会《周礼》，托古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凡男口不满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见王田私属）。此外，又实行五均赊贷和六筦（见五均六筦）。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实行过程中又遭到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抵制和反对。尽管法令严禁买卖土地和奴婢，犯令者罪至死，但土地、奴婢的买卖照样进行。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宣布买卖“王田”及私属者，勿拘以法。负责推行五均六筦的人员，大多是富商巨贾。他们与郡县官吏勾结，上下其手，牟取私利，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许多不便和痛苦。王莽还屡次改变币制，禁止使用五铢钱，另制各种各样的货币，名目既十分繁杂，换算比值又极不合理，甚至把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贝也拿来使用，造成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的以十万数。他们被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宫，罚作苦役，夫妇也被拆散重新婚配，因此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

王莽还任意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如改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改少府曰共工，改郡太守曰大尹，县令长曰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

在托古改制的同时，王莽派遣使者



王莽新王朝时的一个量器

四出，强迫各少数族的统治者更换原先汉朝封赠的印绶。他贬各族的王为侯，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因而引起各少数族的强烈不满。匈奴、高句丽和钩町王都起兵反抗，西域诸国也断绝与内地的联系而归附匈奴。王莽派兵远道征讨，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见赤眉、绿林起义）。西汉的官僚贵族和地方豪强也纷纷打出反莽旗帜。地皇三年（公元22），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大军讨伐赤眉军，在成昌被赤眉打败。次年，派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发州郡兵四十二万，包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又遭到绿林军内外夹击，全军覆没。绿林军乘胜分两路进军，一路北上攻洛阳，一路西向攻长安。这时，王莽众叛亲离，还继续玩弄符命，自欺欺人。卫将军王涉、国师刘歆和大司马董忠密谋劫持王莽投降更始政权。事败，董忠被戮，涉、歆自杀。当绿林军进抵长安附近时，王莽驱使京城的囚徒出城抵挡。但囚徒军一过渭桥，便立即哗变，掘毁王莽祖坟，焚烧九庙、明堂、辟雍。长安城中的人民也群起暴动，配合变兵攻入皇宫。王莽逃至渐台，

被商人杜吴所杀，新朝遂告灭亡。

【董卓】

（？～192）东汉末年权臣。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性粗猛而有谋断，早年与羌中豪帅相交往，以健侠知名当世。后为州兵马掾，驻守边塞。桓帝末年，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复拜郎中，累迁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后，北地先零羌、湟中义从胡和金城人边章、韩遂起兵响应。董卓先后以东中郎将、中郎将、破虏将军、前将军的身份奉命镇压，屡屡败北。

中平六年，董卓被征为少府，他拒不到职。灵帝病危时以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他驻屯河东，拥兵自重，坐待事变。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和司隶校尉袁绍合谋诛诸宦官，不顾朝臣反对，私召董卓人京。后因谋泄，何进兄弟被宦官所杀。袁绍勒兵人宫欲讨宦官，张让、段珪等劫持少帝及陈留王外逃。董卓闻讯，引兵驰抵京城，并领何氏所属部曲，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并吞其众。由此势力大盛，得以据兵擅政，废黜少帝，立陈留王为献帝，卓迁太尉领前将军事，更封为郿侯，进位相国。董卓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剽虏财物，淫掠妇女，称之为“搜牢”。又虐刑滥罚，睚眦必死，以致人心恐慌，内外官僚朝不保夕；与此同时，他又为党人恢复名誉，起用士大夫，企图笼络人心。初平元年（190）冀州刺史孙馥与袁绍、孙坚等人兴兵声讨董卓。黄巾余部也陆续起兵关东。董卓挟持献帝西都长安，并焚烧洛阳宫庙、官府和居家，强迫居民数百万口随迁，致使洛阳周围二百里内荒芜凋敝，无复人烟。次年，董卓又授意朝廷封他为太师，地位在诸侯王之上，车服仪饰拟于天子。他还拔擢亲信，广树党羽，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子孙年虽幼小，男皆封侯，女为邑君。又筑坞于郿（今陕西眉县东渭水北），号“万岁坞”，积谷可供三十年。后司徒王允与董卓义子吕布及仆射士孙瑞合谋诛卓。初平三年四月，献帝大会群臣于未央殿，董卓入朝时为吕布所杀。消息传开后，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士女争卖其珠玉衣装，置酒肉互相庆贺。董卓被陈尸街衢，其家族被夷灭。

【袁绍】

（？～202）东汉末军阀。字本初。河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出身名门大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少折节下士，知名当世。灵帝死，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合谋诛宦官，事泄，何进被杀，袁绍率军尽诛宦官。董卓专权，绍政见不同，逃奔冀州。董卓拜其为勃海太守。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牧守联合起兵以讨董卓，袁绍被椎为盟主，自号车骑将军，声势颇大。董卓畏惧，挟汉献帝西人关中，不久被杀。关东军内部开始互相兼并，袁绍夺取冀州牧韩馥地盘，自领冀州牧，此后又夺得青州、并州。初平四年进攻黑山起义军，杀数万人。建安四年（199），袁绍消灭幽州公孙瓒。至此，袁绍已跨据黄河下游的四州之地，领众数十万，成为当时最大割据势力。豪强为其社会支柱，恣意兼并；下民则贫困痛苦，倾

家不足交纳租赋。同年，袁绍准备向曹操发起进攻，直捣许都，劫夺汉帝。监军沮授、谋士田丰劝其进屯黎阳，据守黄河，以逸待劳。遣精骑以骚扰曹军，这样不出三年可击败曹操。而以郭图、审配为代表的一部分将领主张迅速决战。袁绍采纳后者的意见。五年，袁绍发布讨曹檄文，率十万大军，战马万匹，进军黎阳。当年与曹操决战于官渡（见官渡之战）。袁绍兵力虽数倍于对方，由于丧失民心，主骄将侈，又“有才而不能用”，故被曹操偷袭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火烧全部军粮，主力七万多人被消灭，只与其长子袁潭带八百多骑败回河北。两年后惭愤病死。诸子亦败灭，所据之地尽并于曹操。

【袁术】

（？～199）东汉末军阀。字公路。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袁绍从弟。自曾祖父起四世中有五人位居三公。举孝廉，除郎中，累迁至虎贲中郎将、后将军。避董卓之祸，由京师洛阳出奔南阳，割据其地。南阳户口数百万，手工业、商业较发达，袁术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他对袁绍充当关东牧守的盟主很不服气，远交幽州公孙瓒，而袁绍也联络荆州牧刘表以牵制袁术。初平四年（193），袁术进军陈留，与曹操交战正酣，刘表从襄阳进逼其根据地南阳，袁术被曹操击败，向襄邑（今河南睢县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一带退却。退至扬州九江郡，赶走刺史陈璃，自领其州，以寿春为根据地。袁术自负出身名门大族，以为海内鼎沸，乃英雄有为之时，不顾部下反对，于建安二年（197）在寿春称帝。称帝后，先为吕布所破，后为曹操所败。在他统治下，“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四年，袁术资实耗尽，众叛亲离，想前往青州投靠袁绍长子袁潭，又怕曹操邀击，愤惭呕血死。袁术一生，罪恶累累，后代史家称他“无毫芒之功，纤介之善”。

【刘表】

（142～208）东汉末军阀。字景升。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少知名，被目为人所宗仰的“八及”之一。灵帝时为北军中侯，献帝初平元年（190），迁荆州刺史。得到蒯越、蔡瑁等当地名士、大族的支持，平定长江中游的反抗力量，徙治襄阳。当时群雄并起，割据南阳的袁术使孙坚进袭刘表，坚军被其击败，孙坚中矢而死，袁术袭夺刘表地盘的企图未能实现。初平三年，授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因实力雄厚，据地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在全国兼并战争中保地自守，中立观望。官渡之战，对袁绍、曹操两不相助。建安六年（201），刘备被曹操击败后投奔刘表，此后刘备依托他，在荆州数年。荆州二十几年中政局稳定，战争破坏较少，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关中、兖、豫学士归者以千数。他还建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又广求遗书，形成“古典毕集，充于州闾”的盛况，起了保存文化的作用。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表病死。曹军到襄阳，刘表子刘琮举州降，刘备出逃，割据结束。

【袁世凯】

（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中华民国大总统。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叔祖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父保中系地方豪绅。叔父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次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吴长庆回国。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12月，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驻汉城公使馆支持下发动政变，捕杀事大党多人。袁世凯闻讯率领清军干涉，使事大党重掌政柄。日本政府借此要挟，袁被调回国。次年，复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1893年，升为浙江温处道，仍留在朝鲜。至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战争爆发后，被派赴东北前线，协助前敌营务处周馥，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

1895年12月，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时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开展，袁世凯捐资参加强学会，以示赞同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密谋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处境孤危，遂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世凯）以备不测”的建议，于9月16日召见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次日，维新派谭嗣同密访于法华寺，要求他统率新军进京，“除旧党，助行新政。。袁世凯当面应允，但随即回天津向慈禧太后的宠臣、直隶总督荣禄告密。21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宣布重新临朝“训政”。次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时山东境内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派兵到各州县残酷镇压。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权势更加显赫。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并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1902

年，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处心积虑扩张权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任用私人，甚至预言将步曹操、刘裕后尘。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次年初，袁世凯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汉阳、汉口相继被革命军攻占。载沣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于10月27日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11月1日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后，即进京组阁，并迫使摄政王载沣退回藩邸，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他又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迫使革命党人接受了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作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袁世凯借革命党人的声势，逼迫宣统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退位。次日，向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并议决请他到南京就职。但他以北京发生“兵变”为借口，拒绝南下。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旧照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从就职伊始便极力图谋专制独裁统治。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试图组织政党内阁，以对袁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袁把国民党视为

实行集权的最大障碍，策动北洋军警干涉政治，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裁减南方各省的革命军队，派人刺杀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同时，拉拢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立宪派，资助他们组成进步党，以此来与国民党人对抗。在外交方面，他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从五国银行团获得两千五百万英镑借款。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袁世凯于1913年7月公然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接着，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独裁统治的工具。1914年5月，宣布废除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迫使支持过他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不仅可以终身连任总统，还可以指定继承人。

1914年底，袁世凯以为做皇帝的条件已成熟，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制造舆论，声言共和制度行不通，只有改为帝制，国家才能富强。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帝制的支持，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不久，又唆使一些北洋官僚政客出面组织筹安会和请愿团，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至12月11日，御用的参政院以国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推戴他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在假意推辞之后，于次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准备于1916年元旦加冕登极（见洪宪帝制）。

但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的义愤。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袁世凯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5月下旬忧惧成疾，6月6日在举国声讨中死去。

五、巨贪大奸

【伯嚭】

伯嚭是晋国大臣伯宗之后。晋厉公五年（前576年），晋国的郤氏专权，陷害并杀死了伯宗。其子伯州犁逃到楚国，后来担任了楚国的太宰。楚昭王元年（前515年），楚国令尹子常杀郤宛，牵连伯氏。伯嚭为了求得一条生路，前去吴国投靠了旧友伍子胥，并在伍子胥的举荐下，一步步爬上了太宰的高位。

然而，伯嚭却是位贪钱财、好女色又以德报怨、卖主求荣的小人。他得势后却恩将仇报：不但害死了伍子胥，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葬送了称雄一时的吴国！

由于吴王阖闾在同越王勾践交战中受伤而死，从此，吴国对越国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吴王夫差继位后，经过三年的精心准备，遂拜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亲自率领全国水陆军队，从太湖出发，去攻打越国。勾践仓促迎敌，致使其大将灵姑浮在夫椒（今江苏吴县）会战中阵亡，水兵也几乎全军覆没。勾践无奈，只好带领500残兵逃到会稽山上躲了起来。眼看吴军将会稽山团团围困，勾践曾想过拼死再战，也曾想过拔剑自刎，但在重臣文种、范蠡及勾践夫人的劝说下，终于同意了文种等人提出的同吴王讲和的建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种等人早就知道伯嚭是位贪财好色的小人，又极善迎合夫差的心理爱好，并由此而深受夫差的信任。

当文种带着8名美女，12双白璧和1000两黄金连夜求见伯嚭时，先向他奉上了一份长长的礼单，对他说："我们的国君由于年幼无知，冒犯了贵国，现在非常后悔。为了赎罪，他情愿作为臣子侍奉吴国。为求得吴王同意，请您多加美言。这点薄礼，请您先收下；今后凡是您所需要的，我们大王一定尽力奉上！"伯嚭却冷笑道："你们越国眼看就要灭亡了，届时所有的财物都是我们吴国的。这些东西，我看就不必送了吧！"文种马上表示："您的话当然很有道理，但不知您想过没有，越国现在仍有五千精兵，还可以决一死战；即使战败，把我们的珍宝财富付之一炬，贵国又能得到什么呢？"接着，又强调指出："即使我国的珍宝财物都被贵国夺去，恐怕大部分也会送进王宫，您自己又能得到多少呢？我们大王要我转告您，如果您帮我们办成议和的事，今后每年给贵国供奉之前，一定首先报答您！"

伯嚭细细品味着文种的话，再看看那些美若天仙的少女，掂量着晶莹光洁的宝玉和耀眼的黄金，点头答应了文种的条件，并于第二天一早就找夫差去求情。起初，夫差并不同意，但经他如此这般地反复劝说，总算接受了他的建议。然而，伍子胥得知后却闯来阻拦，力劝

夫差收回成命。结果，也被伯嚭一派胡言顶了回去。伍子胥正想据理力争，夫差已拍板定案：勾践夫妇来吴国为奴，同时解围撤兵。

勾践夫妇和大夫范蠡来到吴国后，被罚住阖庐墓旁的石屋里，专管放马、驾车。他们吃的是糟糠野菜，穿的是破衣烂衫。如此一连三年，几乎天天如此，从未流露过半点怨恨。

其间，留在越国的大夫文种总是千方百计地搜罗一些美女和珠宝，悄悄派人送给伯嚭。伯嚭自然每次都“笑纳”，并相机在夫差面前为勾践美言一通。

有一次，夫差带着伯嚭登上高处，观察越国君臣的情况。他见勾践及其夫人、范蠡正坐在一堆马粪旁边休息，勾践夫妇坐上位，范蠡毕恭毕敬地坐下位，便对伯嚭说：“你看那勾践眼下只不过是个人质，而范蠡也只是个寻常的下人。在如此环境中，竟不失君臣礼节。我很同情他们！”伯嚭马上迎合道：“这是由于大王有圣人仁义的心肠，所以才哀怜孤苦穷困的人！”夫差听到“圣人”、“仁义”四个字非常高兴，又表示：“既然如此，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就赦免了他们吧！”伯嚭连忙谢恩，同时又说：“我听说善有善报。大王用仁义加恩德施惠于越，越人一定会竭诚报答您！”

随后，伯嚭立即将夫差同他谈话内容转告给了勾践君臣。勾践君臣再三拜谢之后，又提出伍子胥会从中阻挡的问题。伯嚭马上表示：他将见机行事，不会使事情逆转。

果然，伍子胥得知夫差打算释放勾践君臣的消息后，赶忙求见夫差说：“从前，夏桀因禁商汤而不杀，商纣王因禁周文王而放归，导致了桀被汤放逐而死、纣因文王身死国亡。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一定要避免桀纣之患啊！”而在场的伯嚭却马上插了话，吹捧夫差释放勾践是“义举”，将会“功冠于五霸，名越于前古”！因为夫差当时正因病卧床，所以他挥挥手，没让他们继续说下去。

接着，伯嚭又将此情原原本本地及时告诉了勾践君臣。范蠡为使勾践进一步取得夫差的信任，便说服他前去探视夫差的病，并通过尝夫差的粪便促使夫差早日放他们回国。待一切商妥，勾践通过伯嚭的通融走进了夫差的卧室，顺手从便盒内抠了一点屎放进口中，并装模作样地观察大便颜色，然后向夫差贺喜道：“囚臣勾践拜贺大王，龙体将会很快康复！”夫差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他曾学过辨识粪味以看病的方法。这时，伯嚭又连忙介绍说，勾践为弄清大王大便的味道，刚刚亲自尝了尝。夫差深为感动，当即对勾践说：“你真是位仁人君子！”

数日后，夫差痊愈。他不顾伍子胥的坚决反对，硬是将勾践夫妇和范蠡等人放归越国。为避免伍子胥中途谋害，他还亲自带着伯嚭和卫队将他们送到吴越两国交界的三津渡口。

勾践回到越国后，卧薪尝胆，誓报会稽之耻。为此，他采取了文种关于灭吴的“九术”之计。即：祭祀鬼神，保佑越国；贿赂吴国君臣，使其不疑越国；用高价收购吴国的粮食、草料，使其国无储粮；大施美人计，使其君臣迷乱；选送工匠和木料，使之大兴土木而致国力空虚；派些善于奉迎的人，骗取吴王信任；设法使吴国忠臣触犯国君，迫使他们自杀；随着越国的富裕，多多准备

兵器；待吴国疲敝，一举反攻并消灭它。

根据这“九术”，范蠡和文种又向伯嚭行贿了许多美女和金钱。同时，将苎罗山下（今浙江诸暨县南）打柴为生的西施、郑袖二姐妹送给了夫差。尤其是西施，堪称天下无双的绝代佳人。夫差曾公开对大臣们讲：“越王将如此美丽的两个女子献给我，足以证明他对我的无限忠诚！”从此，他无心理政，一味玩乐，致使吴国国势每况愈下。

在此期间，越国却规定7年不收赋税，以使民休养生息；号召青壮年参军，以增强战斗力；男至20岁，女至18岁不结婚者则受处罚等等，以迅速增加人口。由于实施了这“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国策，越国的国力日益强大。

伍子胥面对严重的现实，无数次规劝夫差悔过自新，但得到的无不是斥责和羞辱。万般无奈，他含着眼泪对儿子伍子封说：“我多次劝大王，但他都不听。看来，吴国很快就要亡国了。你同我一起死，不值得！”随后，趁出国到齐的机会，将儿子托付给了自己的朋友、齐国的大夫鲍牧。不料，伯嚭又借机发挥，在夫差面前诬告伍子胥里通外国。夫差大怒，遂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名为“属镂”的宝剑，逼他就地自杀了。

伍子胥死后，伯嚭独掌大权。文种又带着一些美女和珠宝前去为他贺喜，并乘机鼓动他挑起吴国与一些大国交战。伯嚭果然对夫差说：为取得吴国的霸主地位，应征服齐、鲁，打败楚国。夫差言听计从，便先后同齐、楚交战，结果造成了极大损失。夫差十四年（前482年），夫差又带领数千精兵到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去会盟晋、鲁等多国诸侯。夫差刚到黄池，勾践便亲率5万大军直捣吴国。经过3天激战，越军攻下了吴国都城，活捉了吴国太子友。夫差闻报，急忙带兵回国。但是，当他见太子友已被杀死，吴国的粮食物资已被越军运回国内，士卒经过长途跋涉而无力再战，只好求和安身。他对伯嚭说：“当年你力主求和，我们才有如此下场；今日你要像越国的文种那样，亲自前往越国去求和。”

伯嚭奉重礼到了越军营帐，面见勾践，请他赦免夫差当年困会稽之罪。勾践和范蠡经过商议，认为吴国还有相当的实力，一时难以消灭它，便答应了夫差求和的要求。

夫差二十二年（前474年），越国经过养精蓄锐，兵力已十分强大；而吴国已是民穷财尽，日薄西山。于是，勾践再度率师攻吴，并一举攻下吴都，将夫差围困在姑苏山上。

伯嚭见大势已去，率先投降了越国。夫差只好派公子雒作为特使裸衣匍匐前行，向勾践传达夫差的请求道：“兵败的臣属夫差斗胆向大王吐露衷肠，往年曾经在会稽山降罪了大王。如今大王兴兵伐我的罪过，希望依照当年旧例，赦免我这个败兵之臣吧！”勾践想起当年，不知怎的生了恻隐之心，竟欲允许求和。范蠡不失时机地奉劝道：“当年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吴不取；如今上天把吴国赐给越国，越国难道可以违背天意吗？大王忍辱负重22年，就如此轻易放弃吗？上天赐给而不取，会自食恶果的！”勾践幡然大悟，马上打消了议和的念头，并表示誓灭吴国而后止。

夫差见议和不成，决定自杀而死。临死前，他仰望天空，长叹道：“假如

人死后什么也不知道，那就好了；假如还真有灵魂存在，有知觉，我又有何脸面去见伍子胥啊！”随后，以手蒙面，拔刀自刎。

夫差死后，吴国余下的将士全都向越国投降。他们一个个提心吊胆，随时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只是伯嚭异乎寻常：他不但没有任何压力，还显得分外轻松得意。他认为：就凭自己当年对勾践君臣的庇护关照，不仅会平安无事，而且大小也能在越国捞个一官半职！正当他美滋滋地一心打着如意算盘时，勾践命人将他叫到面前，对他说：“你原是吴国太宰，我不敢收你做臣下，你还是追随你的君主去吧！”说罢，立即命人将他拉到殿外，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郭开】

郭开是战国时期赵王的宠臣。赵国之所以继韩国之后最先被秦国所灭，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行贿受贿，陷害忠良。

在《史记》中，描写郭开的文字并不多，只说他是“廉颇之仇”。在赵国“数困于秦兵”的紧要关头，他一再施展其鬼蜮伎俩，先后害死了廉颇、李牧这两位令秦人闻风丧胆的名将，致使赵国长城自毁，迅速灭亡。

郭开陷害廉颇，主要是在赵悼襄王元年（前 244 年）之后。当时，由于郭开等人屡进谗言，赵悼襄王让燕国降将乐乘取代廉颇而为赵国统帅。廉颇一怒之下，逃到魏国大梁。

赵悼襄王死后，赵王迁即位。这时，赵军在与秦军作战中，顶不住秦军的攻势，国家处于危急关头。廉颇闻讯，一再请求为国尽忠。赵王拿不定主意，便召集群臣共议，众皆曰：“昔年惟廉颇能御秦兵，庞氏、乐氏，亦称良将。今庞煖已死，而乐氏亦无人矣，惟廉颇尚在魏国，何不召之?”赵王迁也“思复得廉颇”，并准备拜他为帅。但是，郭开却恐其复用，从而威胁到自己的既得利益，便僭于赵王说：“廉将军年近七十，筋力衰矣。况前有乐乘之隙，若召而不用，益增怨望。大王姑使人觇视，倘其未衰，召之未晚。”赵王惑其言，遂遣内侍唐玖带着狻猊名甲一副、良马四匹去劳问，相机考察他的全面情况。

接着，郭开密邀唐玖到自己家中，设宴为他饯行，并赠他黄金 20 镒。唐玖见此厚礼，惊得不敢接受。郭开遂表示：“有一事相烦，必受此金，方敢启齿。”唐玖这才收下了重金，并问他有什么事。郭开说：“廉将军与某素不相能。足下此去，倘彼筋力衰颓，自不必言；万一尚壮，亦求足下增添几句，只说老迈不堪，赵王必不复召，此即足下之厚意也。”唐玖点头应允。

廉颇见到赵国的使者后，非常高兴，“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自己年老犹壮，仍可冲锋陷阵。然而，唐玖复命时却依照郭开的意志，隐瞒了真情，还编造谎言欺骗赵王说：“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将廉颇说成了一个只能吃不能干、不一会就拉了三回屎的老废物。赵王信以为真，便打消了召他回国的念头。结果，这位当代名将不能回国效力，在魏国又得不到重用，只好应邀到楚国为将。但他常常发出“我思用赵人”的感叹，最终郁郁不得志，含恨死于楚国的寿春。

近 1500 年过后，著名诗人辛弃疾在

其《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中，还无限感慨地写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里的"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说的都是那使者探视廉颇的故事。人们每读到这句词，无不缅怀廉老将军的丰功伟绩；同时，也切齿痛恨郭开这位千古罪人！

郭开害李牧，主要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八年（公元前229年）之后。当时，赵国接连发生大地震、大饥荒，国内一片混乱。秦王嬴政趁此机会，派大将王翦率师攻赵；赵王迁急令李牧和司马尚等人带兵去抵抗秦军。

李牧是当时赵国最著名的将领，被时人公认为"赵国之北边良将"。他曾一战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战功赫赫，令匈奴十几年间不敢靠近赵国的边境。还北破燕军，南拒韩、魏，数败秦军，令秦将王翦畏之如虎。鉴此，赵王迁在即位后的第三年（前233年），便将李牧由北边调回朝廷，擢升为大将军，封为武安君，食邑万户，还多次当众称赞他："牧乃吾之白起也！"然而，郭开却对他的功名十分嫉妒，更怕他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途，时时都在寻找机会加害他。

王翦遭遇李牧等人的抵抗后，士气大降，连连受挫。秦王嬴政闻报，深知强攻无望，决定改为智攻。正巧，秦国太尉尉缭也看中了郭开，遂向秦王嬴政献上了"离间其君臣"之计。于是，秦国暗中派人用重金贿赂郭开，"使为反间"。郭开见利忘义，心甘情愿地当了秦人的帮凶。从此之后，他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多次在赵王面前说：李牧和司马尚并不是真心保卫赵国，他们早就想要投降秦国了。听说他们已经和秦国谈妥，只要投降过去，秦王就给他们很多封地和黄金。如今他们在战场上的胜败，都是双方故意装出来的，并不是赵国真的打败了秦军。昏庸的赵王经不起他一再挑拨，便信以为真。于是，下令撤了李牧、司马尚的职务，另派赵葱、颜聚两个平庸之辈作将军。

李牧接到赵王的命令，不禁仰天长叹："两军对垒，国家安危，悬于一将，吾不敢从！"当他得知郭开从中作祟后，又忿然曰："开始谮廉颇，今复谮吾，吾当提兵入朝，先除君侧之恶，然后御秦可也！"还说："赵葱不堪代将，吾不可以将印授之。"但是，还没等他回朝清君侧，赵葱便抢先下手，将他逮捕杀害！为此，史臣有诗曰：

> 却秦守代著威名，
> 大厦全凭一木撑。
> 何事郭开贪外市？
> 致令一旦坏长城！

王翦得知秦国的反间计获得成功，很高兴，立即率军向赵国大举进攻。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很快攻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随之而来的是：赵葱被杀，颜聚被擒，赵王迁成了俘虏，赵国灭亡！其间，前后不过三个月！

秦灭赵后，赵国诸多大臣都惨遭杀害。郭开自以为对秦有功，满指望秦王会对他网开一面，甚至会对他大行赏赐，也便追随王翦到了秦都咸阳。由于他多年来贪污受贿，搜刮民财，积累了无数金银珠宝，不能随身携带，大都藏在了邯郸宅第的地窖中。待战乱稍微平息，他向秦王作了汇报，并请假回赵国搬取家财！秦王嬴政听罢，"笑而许之"。

郭开回到邯郸后，马上发窖取金，载以数车。正当他洋洋得意地赶往咸阳之际，不料中途冒出了一伙“强盗”，不但将他的所有钱财尽掠而去，还腰斩了他这个利欲熏心、卖国求荣的小人！

是谁杀了郭开？不少人说是李牧的宾客们。而批评《东周列国志》的清朝文学家蔡元放却认为：不是李牧的宾客，而是秦王政，即秦始皇。理由是：当郭开向秦始皇请假搬家时，秦始皇是“笑而许之”；“只看上面‘笑’字便知”。

【田蚡】

田蚡（？～前131年），西汉内史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由于他天资聪明，又很有口才，尤其是他的同母异父姐姐王娡后来成了汉景帝刘启的皇后并生下了太子刘彻，所以他飞黄腾达。建元二年（前140年），刘彻登基，为汉武帝。同年，田蚡被封为武安侯；五年后，又当了丞相。

得志便猖狂

早在田蚡担任郎官时，窦婴已是大将军，并因平定七国之乱战功卓著，受封为魏其侯；又因廉洁自律、爱兵如子，而誉满朝野。田蚡对窦婴异常恭顺，如对长辈一样。有时陪侍窦婴饮酒，还常常跪在地上，以示敬重。当窦婴担任丞相时，他升为太尉，尽管野心勃起，但表面上仍对窦婴毕恭毕敬。而当他登上相位之后，却很快不把窦婴放在了眼里，有时还甚至戏弄他。

有一天，窦婴的朋友、原燕相灌夫前去相府拜访田蚡。田蚡明知灌夫的姐姐刚刚去世，正在服中，却存心说：“我想和你一起去拜望魏其侯，可不巧，你正在服丧，去不成，真遗憾！”灌夫却表示：“丞相肯屈尊光临魏其侯家，我怎敢因为有服在身而推辞呢？请允许我去通报魏其侯，让他准备酒食，等待您明日光临。”田蚡点头应允。

窦婴听说田蚡要来宴叙，即嘱厨夫多买牛羊，连夜宰烹；又命仆役洒扫庭院，备办席面，足足忙活了一整夜。天刚亮，又令门下人在宅前伺候等待。然而，等来等去，一直等到中午，仍不见田蚡的踪影。窦婴焦急地问灌夫：“难道是丞相忘了此事？”灌夫不满地说：“我不嫌在服丧期间而请他践约，他哪能不来呢！”说罢，便驾车前去迎接他。出乎意料的是，当灌夫赶到丞相府，田蚡还在高卧未起。灌夫人见田蚡，说：“您昨日应许去窦婴家，窦婴亲自安排下酒席，已恭候多时了。”田蚡却装出困惑愕然的样子说：“也许，这是我昨天喝酒喝多了，忘记了向您说的话！”

随后，田蚡虽然也去了窦婴家，但一路上磨磨蹭蹭，又拖延了不少时间。尤其是在宴会上，始终表现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致使灌夫实在忍不住，终于说出了一些冒犯他的话。窦婴见情势不对，连忙拉开灌夫，亲自向田蚡致歉。

骄横又贪暴

早在景帝卧病期间，田蚡便开始利用某些王侯的特殊心理，向他们索贿收贿。当他发现淮南王刘安野心勃勃，便私下对他说：皇上无太子，而您是高祖之孙，又最有才干。一旦皇上驾崩，继承皇位的一定是您；并表示在皇上、皇太后那儿，自己将尽力为他美言。直说得淮南王心花怒放，当即送他许多钱物，后来又将他引为自己谋反的内线。

田蚡担任宰相后，利用自己手中的

权力，营私舞弊、侵吞公款，还竟然卖官纳贿，大饱私囊。据史载，只要谁肯向他送重金，便可由平民直接擢升为郡守或卿大夫；一些贪官污吏为了往上爬，都不惜血本地给他进贡。其中，仅诸侯送给他的金玉狗马之类，就不可胜数。

对于一般属僚或卸任旧臣的财产，田蚡几乎是明目张胆地去抢掠。有一次，他得知老臣窦婴在长安城南有一片良田，便派心腹籍福去游说，劝窦婴将田让给他。窦婴很恼火，当面对籍福说：我虽然年老体衰，已不为朝廷所用，但丞相也不该夺我的田地呀！在场的灌夫也为窦婴抱不平，说田蚡不应该仗势欺人。田蚡得知此情，顿时火冒三丈："过去，我服侍窦婴，真可谓无微不至；而他为什么如此吝啬，竟舍不得这几顷田地呢？再说，这跟灌夫有何相干，他为什么多嘴多舌！"从此，他对窦婴和灌夫怀恨在心。

害人终害己

田蚡心胸狭窄，骄横残暴，常常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开杀戒。灌夫一家和窦婴本人，最终也惨死在他的手中。

元光四年（前 131 年），田蚡娶燕王刘嘉之女为夫人，王太后诏令列侯及宗室都去祝贺。因窦婴尚为侯，当去贺，遂邀灌夫前往。灌夫推辞道："我屡因醉酒失礼而得罪丞相，丞相已与我结了仇，还是不去为好。"窦婴则认为："丞相今日有喜事，正可乘机修好。不然，丞相倒会怀疑您负气记仇！"说罢，便拉他一起去了。

宴会上，每当田蚡敬酒时，满座宾客都避席俯伏，表示不敢当；而窦婴获酒时，避席者只有他当年的旧交，其他人最多也不过是膝席示敬。灌夫看在眼里，气生心中。当他敬酒敬到田蚡面前，田蚡也是膝席相答，并声称自己不能喝满杯。灌夫强忍住怒火，嬉笑着说："您是贵人，我不敢相强；但这一杯，还是请您喝下去！"田蚡仍不肯喝。灌夫不便再争，而是继续敬酒。当他敬到临汝侯李广这儿时，只见李广若无其事地仍与程不识窃窃私议。灌夫更为恼火，遂大声骂道："你平时总说程不识不值一钱，现在长辈给你敬酒，你却像小女孩一样同他说起悄悄话来！"田蚡见此，又激他说："程不识、李广兼为东西宫卫尉，你当众侮辱程不识，难道就不为李将军考虑？"灌夫正在气头上，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今天什么也都不在乎，管他什么程、什么李！"来宾见此架势，纷纷托辞散去。窦婴也起身欲走，并示意灌夫赶快离开，但田蚡却命骑士将灌夫扣押起来。

第二天，田蚡上书皇帝，弹劾灌夫，说他在宴席上辱骂宾客，侮辱诏令，犯下了大不敬之罪；还说他早在颍川主政时，就犯了种种罪行。要求皇帝抄其家，灭其族。窦婴闻讯大惊，急忙上书皇帝，竭力为灌夫辩解。怎奈田蚡奸计丛生，又说服王太后出面干预，结果不但没有保住灌夫全家性命，他自己也被绑至渭城大街上斩首示众！

然而，就在这年春天，田蚡患了一种怪病：吃不下，睡不着，常常大喊大叫，还对着门窗谢罪不止。许多名医都治不好他的病，不得不求巫师前来消灾。巫师经过一番观察、了解，说是灌夫和窦婴之魂一起缠着他，向他索命。他得知后更加胆战心惊，坐卧不安，终于在惶恐和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不久，淮南王谋反事败露。武帝诏

令追究，获悉田蚡曾受了他的重金贿赂。武帝感慨万千，当众对人说：假若田蚡活到现在，他要受到灭族的惩处呢！

【淳于长】

淳于长，字子鸿，西汉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其父族虽无权势，但母族十分显赫：其姨娘王政君，是元帝刘奭的皇后，成帝刘骜的皇太后；其大舅王凤是大司马、大将军；二舅王谭、三舅王商、四舅王立、五舅王根和六舅王逢，也于同一天分别被封为平阿侯、成都侯、红阳侯、曲阳侯和商平侯，一时有"五侯"的盛名。基于此，他20来岁便当上了黄门郎，可以出入于宫廷之中，往来于显贵之间。从此，他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千方百计地接近和讨好成帝，渐渐取得了成帝的信任，很快升为卫尉，成为九卿之一。

助帝立后觅封侯

汉成帝刘骜，既无开疆拓域的韬略，也无治国安邦的才干，是个地地道道的游手好闲的昏君。有一天，他偶尔见到了阳阿公主的婢女赵飞燕（本名赵宜主，因舞姿优美，如同燕飞，所以人称赵飞燕），当即被她的美貌所迷惑，遂将她带回后宫，封为婕妤，并从此对她分外宠幸。然而，赵飞燕不但是位水性杨花的妖女，而且是位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她为了迎合成帝，又将胞妹合德荐入后宫，也封为婕妤。尔后，赵飞燕与合德狼狈为奸，共设奸计怂恿成王废黜了许皇后，为自己入主后宫做准备。

成帝也一心想封赵飞燕为皇后，但王太后却嫌她出身卑贱，坚决不同意。这时，淳于长虽然明知赵飞燕轻浮又狠毒，却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巴结成帝的好机会。于是，他一面为成帝出谋划策，一面连连跑到太后那儿夸成帝如何孝顺、赵飞燕如何贤惠；还一再说国家不可一日无皇后等等。经过他接二连三地多次游说，终于凭其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王太后。永始元年（前16年），赵飞燕被册封为皇后，戴上了她多年来朝思暮想的凤冠；同时，赵合德也由婕妤进封为仅次于皇后的昭仪。

进封之日，成帝不忘淳于长的说服之功，满足了他的欲望：降旨封他为定陵侯。

娶妾旨在骗废后

淳于长荒淫好色，妻妾成群。但他得知许废后的姐姐许孊颇有家资，却寡居在家；尤其是许废后有私财万贯，又不甘现状。为骗得她们的财产，他不顾许孊人老珠黄，开始与她私通，接着又纳她为妾。

许废后听说姐姐嫁给了淳于长，而淳于长而今又成了成帝的大红人，果然通过姐姐贿赂淳于长，求他在成帝面前多美言，以便让她重入后宫，哪怕当个婕妤也可以。淳于长收下厚礼之后，立即答应了许废后的要求，还说自己力争劝成帝立她为"左皇后"。许废后闻讯大喜，从此将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淳于长身上，接连不断地给他送厚礼。而淳于长，尽管始终未向成帝吐露这方面的一个字，却欺骗许废后说：皇上正在考虑复立她为皇后的事。这种不断地给予希望，却又总让希望既不破灭、又不成真的引诱，使许废后多年的积蓄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淳于长的金库。据史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先后骗取许废后的金银、珠宝，竟达"千余万"之多。

当然，除了许废后之外，淳于长还诱骗了其他一些达官贵人的钱财。而对于自己的同僚和属下，他则不用诈骗的方式，而是明目张胆地索贿受贿；对于公款，也是肆无忌惮地贪污窃取。凭着这些不义之财，淳于长广蓄姬妾，纵情声色，一天天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

贪得无厌死亦惨

绥和二年（前7年），在朝中辅政的大司马、骠骑将军、曲阳侯王根重病缠身，上书辞官养病。淳于长认为自己有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便开始加紧活动，争取顺利地占据这一要职。与此同时，另一位野心家王莽也觊觎着这一职务。王莽是王太后和王根的侄子，时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于是，淳于长和王莽心照不宣，都在暗中较劲。

在玩弄权术方面王莽还是棋高一筹：他派人暗暗窥伺淳于长的一举一动，并很快掌握了他与许废后来往的秘密。于是，如获至宝，立即上报给了王根、王太后和成帝。成帝得知此情，大怒，当即罢免了淳于长，并派廷尉孔光赐毒药给许废后，令她自杀。许废后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大当，在无限悲愤、怨恨中饮毒身亡。

然而，淳于长却仍在期盼着东山再起。为此，他利用诱贿得来的大量金银去行贿，并将行贿的重点定为红阳侯王立。王立倒不像淳于长诈骗许废后那样诈骗淳于长，还真的向成帝上疏，建议成帝起用淳于长。成帝深知王立和淳于长一向势不两立，而今见王立如此为他说情，感到很奇怪，便令人秘密调查。结果，将淳于长的一切罪恶全都弄得水落石出。于是，当即下诏，将淳于长投入大牢，随后又斩首示众！

【张让】

张让（？～189年），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东汉时期的大宦官。初在宫中供职，桓帝时任小黄门。灵帝刘宏登极后，升任中长侍，封列侯。不久，一跃而成为宦官集团的首领，控制了朝廷大权。

献媚取宠

汉灵帝刘宏，虽为皇室宗亲，但系远支旁系。在他很小的时候，家境已经衰败，加上其父死得早，所以日子并不好过。长期受挫和多方刺激，渐渐使他养成了贪婪而吝啬的习性。直至他12岁那年当了皇帝，一心想的还是如何腰缠万贯、富甲天下。

基于灵帝的这种变态心理，张让总是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以求宠信。然而，由于外戚、宦官多年的黑暗统治，这时的东汉王朝已经是“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有时甚至连中小官吏的俸禄都开不出来。于是，张让便建议灵帝卖官鬻爵，以广开财源。对此，昏庸的灵帝竟欣然接受。

光和元年（178年），张让怂恿灵帝开设了一个名叫西邸的园子，公开卖官。他们还明码标价，规定食禄2000石的官售价为2000万，400石的官卖400万。卖官得来的钱，专门存在“万金堂”仓库中，作为皇帝的私钱。与此同时，张让还和灵帝私下令左右卖公卿要职，并规定三公卖1000万，九卿卖500万。为了能多卖官，多收钱，他们经常无故调换官吏。甚至一个地方官，一个月内可以调换几个人；每调一次，便可捞到一

笔为数可观的收入。如此一来，官场完全变成了市场！

光和四年（181 年），张让为赢得皇上的欢心，又让人模仿街市的阁楼店铺，在后宫修了一条“商业街”。每天一早，一些宫娥采女便装扮成小商小贩，吆喝叫卖。灵帝则身着商人的服装，与几名亲信太监去观看那些摊贩们如何讨价还价、盗窃争斗，并由此而感到分外开心。

随着灵帝私钱的越来越多，玩得越来越尽兴，张让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他甚至多次向人说：“张常侍是我爹”，心甘情愿地听从张让的摆布！

排除异己

针对张让一伙的倒行逆施，朝中大臣乃至后宫太监也曾纷纷弹劾他，但都被他一一诬陷致死。

汉灵帝在封张让为列侯的同时，也曾封太监头领之一的吕强为都乡侯。但是，吕强认为自己无功于国，拒绝接受，并揭露了张让等人的奸行。黄巾起义爆发后，吕强又劝灵帝起用那些被张让陷害的“党人”，召还张让一伙在外地任官的父兄子弟。张让对他恨之入骨，遂联合赵忠、夏恽等大太监，诬告吕强与“党人”一起攻击朝廷，想效法西汉权臣霍光废旧立新。还说吕强的兄弟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恶名昭著等等。灵帝听信了他们的谗言，遂让张让带领太监们手持兵器，去召吕强进宫。吕强见此情势，愤怒地说：“我死了，大乱必起！大丈夫尽忠国家，岂能受狱吏之辱？”于是，当即自杀身亡。张让回宫后，又骗灵帝说：“吕强见陛下召问，还不知道所问之事，便吓得跑出门外，在草丛里自杀了。可见，他作贼心虚，有奸自明！”灵帝一听，又当即下令逮捕了吕强全家，并抄没了他的全部家产！

接着，侍中向栩又上书皇帝，揭露张让等人的罪恶行径。张让反咬一口，诬陷向栩私通黄巾军主帅张角，并打算作其内应。灵帝大怒，又将向栩逮捕入狱。随之而来的是，张让为了灭口，马上派人杀了他。

面对如火如荼的黄巾起义，郎中张钧也给灵帝上奏章，说张角之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乐附，是因为张让等“十常侍”放纵其亲属、宾客，各据州郡，贪残勒索，侵害百姓。百姓无处伸冤，只好铤而走险。还表示：“只要陛下砍下张让一伙的脑袋，挂在南门外示众，然后布告天下，我保证黄巾军一定会不攻自破！”张让获悉此情，一面向灵帝乞怜，一面从自家拿出一些钱捐作镇压黄巾起义的军费，从而打消了皇帝对他的猜忌。随后，在张让的授意下，御史诬告张钧学习太平道，与张角有牵连。张让借机将张钧打入天牢，活活将他折磨死。

从此，满朝文武及皇帝身边的人，几乎无人再敢说张让半个“不”字。而张让本人，也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贪赃枉法

张让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大贪官之一。为了敛财聚宝，无所不用其极。

首先，他派自己的弟兄、姻亲、心腹到富庶之地为官，教唆他们贪污受贿，鱼肉百姓。自己则心安理得地与他们分肥共利，大饱私囊。

第二，他假公济私，巧取豪夺。当时，由于灵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各地都将其异宝奇珍源源不断地献给朝廷。张让乘机大收“道行费”，

先于皇帝而得利。中平二年（185年），洛阳南宫被大火焚毁，灵帝诏令向各州郡征调建筑材料，以供修复工程之用。当大批贵重木料、石料等运抵京师后，张让示意负责验收的小宦官故意挑剔，迫使押送材料的地方官不得不折价贱卖。小宦官便以原价1/10的价格收购，随后转手以高价卖给朝廷。通过这种手段，张让又大获暴利。

第三，纳贿。《后汉书·张让传》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有位名叫孟佗的人，是扶风一带有名的富豪。有一次，他带着厚礼进京见张让，却因为“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老是轮不到自己。他不愿排队求见，决定“走后门”。于是，不惜代价地交给了张让府上一个管事的监奴。监奴感到自己无功而多次受厚贿，遂生恻隐之心，问孟佗有何要求。孟佗答道：我只是希望您和您的部下向我拜一拜。数日后，孟佗又来张府，故意排在求谒者队伍的最后面。那监奴一见，连忙带领着手下人穿过人群，迎拜于道，并与孟佗共车入门。众多的求谒者顿时惊得目瞪口呆，无不猜测孟佗与张让关系异常。从此，好多人开始贿赂起孟佗来。而孟佗每收到珍贵之物，则及时转赠给张让。张让大喜，不久便安排孟佗为凉州刺史。

第四，索贿。张让并不以坐收贿礼为满足，一有机会，还变着法儿去索贿。如皇帝颁发任官诏书时，他便派遣心腹之人以“中使”的名义向任官者索取贿礼，即使朝廷重臣也躲不了他的敲诈。左中郎将皇甫嵩，因军功被封槐里侯并迁官左车骑将军时，张让竟向他索贿5000万钱。皇甫嵩义愤填膺，没有给他。而他却恼羞成怒，多次在灵帝面前造谣诬蔑，终于将皇甫嵩罢官削封。

罪有应得

张让的胡作非为，给东汉王朝造成了重大祸乱，招致朝野切齿痛恨。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其子刘辩继承了皇位，是为少帝。中军校尉袁绍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纵兵捕杀张让一伙。张让见大势已去，急忙挟持少帝和他的弟弟陈留王刘协连夜逃窜。当逃至河南孟津东北的小平津，尚书卢植与河南中部椽闵贡指挥的大队军卒，已将张让等人团团围困。

张让见军卒们步步逼近，不禁仰天长叹：“事已至此，夫复何言？”随后，转身对卢植说：“卢大人，小的们自知罪孽深重，还望大人念上天有好生之德，看在我历事先帝的份上，见示一条生路如何！”卢植尚未答话，闵贡已怒不可遏。他右手仗剑，左手戟指，高声骂道：“张让，尔擅权乱政，荼毒生灵，危害宗庙，致使圣上蒙尘，万民涂炭。至今仍想活命，岂非痴人做梦？”张让闻听此言，随即大放悲声，涕泗横流。突然，他转身跑上高堤，一头扎进了滔滔黄水之中。其他几个太监，也紧随其后，纷纷投河自尽。

据史载，张让虽死，宦官们仍未躲过那场大劫难。在袁绍的指挥下，被杀者仍达2000多人。其中，有些人长得像宦官，也被当做宦官而惨遭杀害！

【王戎】

王戎（234～305年），字浚冲，琅邪郡临沂县人。其祖父王雄、父亲王浑，都官至刺史。

据史载，王戎小时候就颇有心计。

有一次，他和一群小朋友在路边玩耍，见旁边的李树上果实累累，大都争着去摘，他却不为所动。有人问他："你怎么不去摘?"他笑着说："树长在路边，树上却有这么多果实，一定是苦李。"那人摘下来一尝，果然苦涩难咽。

还有一次，他独自到宣武场去看表演。猛兽在槛内吼声震地，很多人都吓得四散奔逃，而他却一点也不怕。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些野兽都被关在铁栅栏里，出不来，怕什么!"

类似事例不胫而走，小小的王戎也便出了名。

弃贤趋势

王戎年轻的时候，正值司马集团打败曹氏集团不久。司马氏为了稳定局面，对文人采用了又拉又打的两面手法：依附曹氏集团的人大都被屠杀或排挤；拥护和投靠司马集团的人则受到提拔和重用。当时，阮籍、嵇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和王戎都属于颇负盛名的文人，又都不愿投靠司马集团，也不敢与之公开斗争，便常常聚在竹林里，弹琴赋诗，饮酒清谈。他们还故意不拘形迹，一个个披头散发，衣冠不整，以表示蔑视权贵，反对司马氏极力提倡的封建礼教。因此，被时人誉为"竹林七贤"。

当时，司马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对"竹林七贤"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首先，他们劝说阮籍去做官，结果遭到阮籍的拒绝。但他们并不甘心，仍千方百计地拉拢他。司马昭甚至提出与阮籍做亲家，让阮籍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司马炎，并专程前去阮家多次拜访。阮籍为了躲避他，故意喝得不省人事，装聋作哑，一直醉了60多天，致使司马昭没有机会与他商谈此事。接着，司马昭又派钟会前去拉拢嵇康。嵇康却对钟会不屑一顾，并有意奚落他，致使他自觉没趣，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而王戎却不然：他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惟恐自己将来会吃亏，更希望今后能发财，竟乖乖地被司马集团所收买。此后，他先是担任相国椽，继而担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到西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时，又先后当上了河南郡太守、荆州刺史、豫州刺史、侍中、光禄勋、吏部尚书、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等，成了当朝宰相。

贪财好利

王戎得势后，既不清，又不贤，而是能贪就贪，能占就占。早在他担任荆州刺史时，他便用自己的权力，廉价收购大量木料、石料和奇花异草之类，并派属吏当监工，动用公差衙役，为自己大修园林宅邸。正修得起劲，不料被人告发。按照当时的法律，论罪应被免官。但是，皇帝却对他网开一面：让他出钱赎罪，随后又将他调任豫州刺史。

在王戎担任侍中时，不少人为了讨好他，也纷纷向他送礼。对此，他总是无不"笑纳"。只是南郡太守刘肇向他行贿筒中细布50端，约合100丈，他鉴于刘肇名声太臭，树敌太多，犹豫再三，没敢当即收下。正巧，此事被司隶校尉发觉，并上奏朝廷。朝廷经过反复审查，终因王戎尚未接受而未对他判罪。

王戎任尚书左仆射兼领吏部时，创建了一种"甲午"制度，即选拔官吏时，先让官吏去做一段地方官，然后再拔任。那些地方官为了快些晋升，也竞相向王戎送礼。王戎收到谁的贿赂，便破格地将谁提拔到重要岗位。为此，司隶傅咸奏劾王戎道："《尚书》中称'三

年进行考绩。经过三次考绩，然后提升或降职’。如今内外各官，任职还不满一年，王戎就奏闻让他回来。这样，既无法考察他任职中的优劣，又频繁地送故迎新，被调迁的官员往来于道路，各种投机取巧的弊端也就乘机发生。如此以来，既损害了农业生产，又损害了政风，败坏了风俗。”因此，他主张“免去王戎的官职，以端正风气”。王戎闻言十分害怕，连忙请他的亲戚贾允设法到皇上那儿去求情。由于贾允系惠帝贾皇后的父亲，结果此事不了了之。

此外，王戎还利用职权在全国各地广置田园、水碓，从四面八方盘剥的钱财多得没数。但他仍不满足，每天晚上还亲自和夫人一起在灯下拿着筹码算账，挖空心思地盘算着如何才能聚敛更多的钱。

吝啬刻薄

据史载，王戎极其吝啬，不亚于戏剧舞台上的那个葛朗台。

王戎的女儿出嫁后，曾向他借过几万钱，在女儿没有还清之前，每次回娘家，他都显现出满脸的不高兴；直到女儿还清债，才看到了他的笑脸。

王戎的侄子结婚时，曾向他借了一件单衣。婚后没几天，王戎就硬催着让他还回来。

王戎有一个独生子，名叫王万，小时候过于肥胖。王戎不给他请医治病，而命他吃糠。结果越吃越胖，19 岁那年便一命归西。

即便对自己，王戎也不舍得多花钱。由于他长期营养不良，致使容貌憔悴，未待年老便用起了拄杖。为此，众人都说他患有膏肓之疾。

在当时，经商是件被人瞧不起的事。有关法令还专门规定：商人必须戴头巾，头巾上写明自己的姓名和所卖商品的名称；还要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爱钱如命的王戎却不顾这一切：他家种有一大片李树，品种很好，常常让家人拿到市上去卖钱。最为离奇的是：他怕别人得到他家的良种，上市前总是先将李核统统钻破！这一损招，受到了世人的普遍讥笑。

王戎生前，由于皇帝的偏爱和贾皇后的庇护，其贪赃枉法之事并未使他遭到应有的下场；但贪财好利的名声却广为流传，并一直传到而今。

【石崇】

石崇，字季伦，西晋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人。西晋开国功臣石苞之子。

石崇 20 多岁开始担任修武令。此后，历任散骑常侍、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等。因伐东吴有功，深受武帝司马炎的宠信。

敛财

据《晋书·石崇传》，石苞临死时将其财产分于诸子，惟独不给石崇。其妻为石崇求情，石苞说：“此儿虽小，后自能得。”

此话果然言中了：石崇长大后，不但“自能得”，而且获得了无数的钱财！

不过，他敛钱的手段却十分卑恶；除了公开抢劫，便是垄断商业经营。

石崇在做荆州刺史期间，经常派兵掠取往来商人的货物，包括外国客商的财物。有时候，外国派使节来中原进贡，他得知后，竟派人装扮成盗贼模样，也将他们所带的贡品劫夺归己。

在西晋，经商本是时人瞧不起的职业。当时的法令还明文规定：商人都须戴头巾，头巾上写明自己的姓名和所卖物品的名称；还要一只脚穿白鞋，一只脚穿黑鞋。石崇不管这一套，他凭借自己的权势，将劫夺的不少财物分门别类，拿到市上去卖；有时见某某商品走俏，又欺行霸市，进行垄断。

石崇还拥有水碓30多处。周围百姓要想把糙米舂成白米，必须使用他家的水碓；而每用一次，他就要扣下许多白米，作为“舂税”。

正由于这一系列的巧取豪夺，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珍宝、金钱无数，还占有奴隶800多名。

斗富

晋武帝司马炎本是一个荒淫无耻、纵情享乐的昏君。他原有宫女数千人，灭吴之后，又挑选吴宫美女5千人，整天宴饮作乐，挥金如土。在他的影响下，时人崇尚奢侈，常以显示自己的财富为荣。

时为骁骑将军的山都县公王恺，听说石崇十分富有，自恃晋武帝是其外甥，自己又有1800户的封地，便决心同他斗一斗，看谁究竟更阔气。于是，令家中用麦糖去洗锅，并以此向石崇吹嘘。石崇听罢，遂命家奴用白蜡当柴烧，从而压倒了王恺。王恺为了显威风，出门前先让人用紫丝布在道路两旁做成挡风墙，全长40里，用布近万匹。石崇得知后，也让人在他出门时预先做道挡风墙，不用丝布而用锦缎，长度不是40里而是50里！王恺不服气，又变换了新花样：用赤石脂抹墙，将家中房屋装饰得富丽堂皇。石崇一听说此事，又立即用香椒泥粉刷墙壁，使房屋日夜散发扑鼻的芳香。

王恺和石崇斗富的事传到晋武帝耳中，晋武帝不但不制止，竟随着凑热闹：他特赐王恺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希望王恺能以此将石崇斗败。王恺也自鸣得意，故意请石崇到家中来观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石崇看了一眼珊瑚树，哼了一声，便随手拿起铁如意将它打了个稀巴烂。王恺见状，先是大惊，继而大怒，一把揪住石崇，要他赔偿这一无价之宝。石崇却漫不经心地表示：可以马上赔他。说着，即令随从回家搬取他所收藏的珊瑚树。其中，高达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株，株株鲜艳夺目；像王恺那样二尺多高的，则更多。他让人把这些珊瑚树一字排开，任凭王恺挑选。王恺早已目瞪口呆，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蓄美

石崇除有成群的妻妾，还蓄有众多的美女。她们各司其职，而职责又五花八门。

有一次，右光禄大夫刘实应邀去石崇家做客。当他去厕所时，发现那儿不仅用甲煎粉、沉香汁等香料喷洒过，还有10来位花枝招展的婢女侍立于旁。再往里走，又见一顶绛纹帐，床上摆着华美的被褥，并有两个婢女手持香囊。刘实猛地一怔，随即慌慌张张地退了出来，连忙向石崇道歉说：实在对不起，我一不留神，竟走进了您的内室！石崇却哈哈大笑，告诉他：那不是内室，是厕所！

石崇请客人到自己府上去饮酒，还总让美女在一旁吹笛。如果稍有失韵走调，便命人将她们拉出去杀掉。他还令美女劝客饮酒，如果客人不乐意喝或者喝得不多，也命人将她们拉出去砍头。有一次，石崇请驸马都尉王敦来饮酒。

王郭为了看一看劝酒的美女惨死的景观，故意视杯而不饮。结果，三个美女当场惨死在屠刀之下！

惨死

石崇在洛阳金谷涧（今洛阳西站旁）建有一座别墅，称之金谷园。在金谷园诸多歌伎中，有一位名叫绿珠的少女最娇艳，又能歌舞，更擅吹笛。所以，备受石崇宠爱。

晋惠帝司马衷永康元年（300年），司马懿最小的儿子、赵王司马伦专擅朝政，威福自用。他听说石崇的歌伎绿珠举世无双，便命部将孙秀去索取。石崇情知惹不起司马伦，但又无意交出绿珠，只好唤出园中的数十名婢妾，请孙秀从中选择。孙秀认为自己受了欺侮，一气之下，伪造皇帝诏书，率兵逮捕了石崇，并将他押至东市去处斩。

石崇临死之前，仰天长叹："这些小人图的是我的家财啊！"负责行刑的官吏说："你既然知道因财被害，为什么不早散之？"石崇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接着，他与他全家老少共15人，同时命丧黄泉！

当然，那位一心想占有绿珠的司马伦和为虎作伥的孙秀也都没有好下场。后来，司马伦为独霸天下财富和美女，在孙秀的怂恿下，执政不久便奉惠帝为太上皇，同时自立为帝。但是，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却联合起兵攻杀他。满朝文武见此情势，也都想杀他和孙秀以谢天下。孙秀知道众怒难犯，吓得一天到晚不敢出门。但仍被闯入其家的将士砍成了肉泥。接着，司马伦被惠帝赐饮金屑苦酒以自裁。死前，他用布巾盖着脸，无限悔恨地惨叫着："孙秀误我！孙秀误我！"随后，七窍流血，直挺挺倒在了牢房里的脏地上！

【司马道子】

司马道子（364～402年），字道子，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儿子，孝武帝司马曜的弟弟。他10岁那年，便被封为琅玡王，食邑17651户；不到20岁，加开府，兼领司徒；此后，又相继担任骠骑将军、扬州牧、录尚书、丞相和太子太傅等职。

由于孝武帝嗜酒如命、不理朝政，其子安帝司马德宗又智力低下、软弱无能，所以，东晋两朝的大权全都落在了司马道子和其儿子司马元显手中。

贪赃宠奸

司马道子独掌朝纲后，朝野内外的奸佞小人纷纷归附他的名下。他恃权自傲，官因贿选，谁会拍马屁、送厚礼，就宠信谁、擢升谁。

钱塘县捕贼小吏茹千秋，朝思暮想的都是升官发财，但一直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后来，他蝇营狗苟，终于找到了贿赂司马道子的路子。经过再三再四地巴结奉承，总算打动了司马道子的贪婪之心。随后，他被破格任命为骠骑谘议参事，他的儿子茹寿龄也随之升为乐安县令。从此，茹家父子变本加厉地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聚积钱财累计上亿！

优倡赵牙为了当官，主动提出为司马道子大修东府第。他筑造假山，挖掘池塘，栽竹树木，耗资数万之举。司马道子很高兴，不久便委任他为魏郡太守。有一次，孝武帝光临司马道子的东府第，临别时对他说："你府内还有山，可以游览欣赏，真不错。只是装饰得太过分了，不能给天下人做出俭约的榜样！"

司马道子无言以对，只能唯唯诺诺。事后，他对赵牙说："假如皇上知道这山是人造的，你可就死定了!"赵牙竟卖乖地回答道："您在，我怎么敢死!"

中书令王国宝为人卑鄙奸邪，甚至为了个人的私利而诬告自己的亲舅舅中书郎范宁，时人无不憎恶他。但他极会巴结司马道子，被司马道子视为亲信，予以重用。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有人曾做了一首《云中诗》，揭露时为"相王"的司马道子的丑行。诗曰：

相王沉醉，轻出教命。
捕贼千秋，干预朝政。
王恺守常，国宝驰竞。
荆州大度，散诞难名。
盛德之流，法护、王宁；
仲堪、仙民，特有言咏；
东山安道，执操高抗。
何不征之，以为朝匠。

酒色误国

司马道子是一个酒色之徒。他妻妾成群，还嫌不足，又以崇信佛教的名义，收罗了一大批尼姑供他淫乐。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驾崩，安帝即位。司马道子徙为会稽王。安帝还特地颁诏：内外政事都要请示司马道子。

但是，司马道子却常常作通宵之饮，喝得酩酊大醉，蓬头散头，眼睛都睁不开。为维持这醉生梦死的生活，他将他16岁的儿子司马元显先后提拔为侍中、征讨都督、散骑常侍、中书令等。后来，干脆将军政大权全都交给了他。而司马元显却自命不凡，横征暴敛，积聚的财富超过了帝室。

有一次，大将桓温的儿子、南郡公桓玄登门拜访司马道子，正赶上司马道子喝得大醉。他指着桓玄向满座宾客说："桓温晚年要当贼，你们说应当怎么办?"桓玄一听，顿时吓得毛骨悚然，急忙伏在地上，连连叩首，不敢站起。亏得长史谢秉及时出来打圆场，说："过去，宣武公罢黜昏庸，选贤任能，功劳超过伊尹、霍光；道听途说，当作区分。"司马道子一边点头一边说："知道，知道!"同时朝桓玄举了举酒杯，桓玄这才站了起来。不过，他余悸未消，并从此对司马道子恨之入骨。

不久，兖州刺史王恭打着讨伐奸臣王国宝和司马尚之的名义，先后两次兴兵作乱。尤其是第二次，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广州刺史桓玄等都遥相呼应，致使司马道子心惊胆颤，不知所措。后来，王恭虽然败死，但军阀割据、彼此混战的情势更加严重。百姓不堪忍受，也纷纷揭竿而起。其中，以浙东孙恩起义最为著名。

孙恩的义军曾一度发展到几十万人，先后攻占了会稽、吴郡、临海、永嘉等江浙8郡，一直打到东晋首都建康近郊。后来，起义虽以失败而告终，却使东晋王朝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断子绝孙

在东晋王朝江河日下时，实力越来越大的桓玄开始向朝廷发难，要求除去司马道子父子。司马元显急忙组织残兵败将前去镇压，不料，桓玄的堂弟、骠骑长史桓石生又将军情秘密派人报告给了桓玄。结果，司马元显刚上阵就节节败退，接着众叛亲离，被桓玄逼进了宰相府。

在走投无路之际，司马元显曾向其父司马道子问计，司马道子只是哭。这时，桓玄派人冲进宰相府，将司马元显生擒而去。随后，公开宣布了他的一桩桩罪行，将他和他的6个儿子全部杀死。

接着，桓玄又向安帝上奏道："司马道子纵酒不孝，理当斩首。"安帝尽管不同意，却也别无良策，只好让司马道子迁移到安成郡，派御史杜竹林保护他。而杜竹林却遵照桓玄的旨意，将司马道子鸩杀了。

司马道子死时39岁，其子司马元显死时22岁。骄横一时的这父子二人，从此财产被抄，奴婢充公，落了个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的可悲又可耻下场！

其后，先是桓玄逼安帝退位，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为楚；继而刘裕推翻了桓玄，将安帝接回建康，重登皇位；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又废掉了晋恭帝司马德文，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

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晋政权是断送在司马道子父子手中的。

【刘义恭】

刘义恭（413～465年），是南北朝时期宋武帝刘裕的第五子，被封为江夏王。

永初三年（422年），刘裕病逝，太子刘义符继位，是为少帝。但是，少帝是个"非才之人"，只知吃喝玩乐，根本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顾命大臣中书令傅亮、司空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等人见他不可救药，遂发动政变，杀了他，另立刘裕的第三子、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做了皇帝，是为文帝。

元嘉六年（429年），16岁的刘义恭被文帝任命为都督、荆州刺史。三年后，迁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镇守广陵。元嘉十六年（439年）进位司空。第二年，升为侍中和教督扬、南徐、南兖三州及司徒、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元嘉二十九年，又被改授为大将军、南徐州刺史，还镇东府。

据史载，刘义恭幼年时长相俊美，又聪明好学，极受其父刘裕疼爱。刘裕生性俭朴，对儿子们的要求也很严格，甚至规定他们饮食不得超过五盏盘等等。但对刘义恭却网开一面：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要多少，给多少，从不限制。天长日久，刘义恭渐渐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恶习。

鉴此，宋文帝刘义隆在任命他为荆州刺史时，便于他赴任前专门下书告诫他"礼贤下士"，万不可"骄侈矜尚"，甚至还具体指出：你每月的日常花费不能超过三十万钱，若能节省一些更好。然而，刘义恭只是把它当成了耳旁风。

文帝在刘义恭领太子太傅期间，每年赐他的钱多达2000万，另有其他许多赐物。但他仍不满足，还要求再增拨1000万。结果，文帝答应了他，并将邻邦所献的500匹良马给了他。

刘义恭喜怒无常，嗜好也常常变化。在他的一生中，屡次搬迁住宅；与人交往，虽较热情但不长久；对周围的亲戚或亲信，一高兴就大肆赏赐，有时一天赏钱竟达100—200万；但一不高兴，又总要将赏赐出的钱再追回来。

刘义恭由于恣意挥霍，常常感到手头的钱不够用，为此而多次赊买老百姓的物品。当百姓传信让他还钱时，他就

在信的末尾写一个“原”字置之不理。

为了个人享乐，刘义恭一向不择手段。他为了修建个人府第，命人四处物色好木料。有人告诉他：鲁郡孔子旧庙内有24株大柏树，是汉、晋时代栽植的。那些树笔直粗壮，许多人拉起手才能抱过来。其中有两株已倒折在地，但当地人仍对它们分外崇拜，从来不敢去冒犯。刘义恭听后，根本不管那一套，硬是派人将其中22株古柏依次伐取。他所建成的楼宇，华丽非常，堪与王城相比美。

宋文帝刘义隆晚年，看不惯太子刘邵刚愎独断，决定废他而另立太子。但是，新太子人选尚未确定，他竟被刘邵所杀。随后，刘邵做了皇帝。

刘义恭对刘邵弑父篡位极为不满，但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仍装作一副分外顺从的样子。他还当着刘邵的面，一再请求辞去卫兵；凡是府中的兵仗，一并送还宫中，让他们为皇帝尽忠。为此，刘邵大悦，将他进位为太保。

当时，刘邵的三弟刘骏正统兵在外，刘邵怕他危及自己的地位，密写手书，令大将沈庆之将其杀害。不料，沈庆之背叛刘邵而投靠了刘骏，并帮刘骏起兵讨伐刘邵。一向多疑的刘邵这时又怀疑刘义恭对自己不忠，遂令他住到尚书下省，并将他的儿子们分遣到神兽门外侍中下省居住。

当刘骏的大军打到新亭时，刘邵命令刘义恭出战。刘义恭无奈，只好奉命。结果，其卫队被刘骏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他本人为了活命，只好独自骑马逃之夭夭。接着，他听到自己的10个儿子皆被刘邵所杀，一怒之下，投奔了刘骏，并为刘骏出谋划策，劝他争夺帝位。

孝建元年（454年），刘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孝武帝。孝武帝鉴于刘义恭在自己夺得皇位方面所起的作用，特授他为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假黄钺；随后，又进位为太傅，领大司马，增班剑为30人；还将自己做藩王时所佩戴的玉环大绶赐给了他。而刘义恭为图荣华富贵，也对刘骏百般献媚，卑辞附会，曲意逢承，以求崇信。例如大明元年（457年）有一个地方生出了一支三脊茅，他就大嚷祥瑞，极力为刘骏歌功颂德，还劝刘骏封禅。刘骏非常高兴，不久又擢升他为扬州刺史，并当众宣布：义恭入朝不用低头，不用传报，可直接佩戴宝剑上殿等等。

大明八年（464年），刘骏病死，太子刘子业继位。刘骏临终之前，惟恐16岁的太子刘子业难以驾驭群臣，特地立下遗嘱，由时为太宰的江夏王刘义恭和尚书令柳元景辅佐朝政，委以大小政事；军事上委托沈庆之，准其参决国家大事；尚书省委托仆射颜师伯；而外监所统则委托领军将军王玄谟。

然而，刘子业却是位狂妄无道的帝王。由于他在出生以来的十几年耳闻目睹的尽是君臣仇杀、骨肉相残，也渐渐养成了猜忌、狠毒的恶习。登极不久，他便杀掉了好几位先朝老臣。随后，又将颜师伯降职，并准备清除他。颜师伯与柳元景密谋，打算废掉刘子业，另立刘义恭为帝。刘义恭得知此情，自然由衷地高兴，并示意他们抓紧行动。不料，柳元景在找沈庆之商议时，沈庆之左思右想，总觉得自己和刘义恭个人关系一般般，远不如颜师伯和刘义恭那么密切；再就是颜师伯曾一度专断朝政，并没把

自己放在眼里。他思量再三，最终竟向刘子业告了密。

刘子业闻奏，惊怒异常，立即派人前去捉拿柳元景和颜师伯，而自己则亲率羽林军包围刘义恭府第。结果，柳元景及其8个儿子、6个弟弟和诸侄们均被斩首，颜师伯及其6个儿子也惨遭杀害；而刘义恭，则被斩其首，断其肢，掏出其肠胃。刘子业还命人将他的眼球用小刀挑出来，浸泡在蜜汁中，留作下酒小菜，并名之为“鬼目粽”。接着，又杀害了他的4个儿子。

【元晖】

元晖（？～519年），原名拓跋晖，鲜卑族，北魏皇家族人。由于高祖孝文帝拓跋宏自幼熟读儒家经典，仰慕汉族文化，登极后决定改鲜卑旧姓为汉姓；又由于“拓”、“土”同音，而土乃万物之元，所以易姓“拓跋”为“元”。从此，拓跋晖也改名为“元晖”，并取字“景袭”。

元晖在孝文帝时期官至给事黄门侍郎。孝文帝死后，其子元恪继位，是为宣武帝。宣武帝非常宠信元晖，很快便将他提升为侍中，兼领右卫将军，让他草拟诏令，掌管宫廷机密要事。不久，又将他擢升为吏部尚书，派他出任冀州刺史等要职。延昌四年（515年），宣武帝病死，其子元诩即位，是为孝明帝。从此，元晖又升至尚书左仆射，兼领吏部，成了满朝文武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蜕化变质

据《北史》载，元晖“少沉敏，颇涉文史”。在孝文帝时，虽然算不上“精忠报国”，但也勤于政事，不贪不占。宣武帝继位之初，依然一如既往，有时还能为宣武帝出些好主意。例如，当年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时，旧臣权贵都不愿迁徙。为平和他们的抵触情绪，孝文帝允许他们冬天在南边居住，夏天回北边居住。孝文帝死后，近臣们又鼓动宣武帝迁都平城。元晖见宣武帝拟采纳那些人的意见，便不顾个人得失，单独求见宣武帝，说：当年先帝之所以允许旧臣冬夏居于两地，完全是根据那时的特殊情况而定的，并非他的本意。而今定都洛阳已久，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再迁都有百弊而无一益。愿陛下继续遵照先帝意愿，不要相信邪臣不合情理的胡说。宣武帝顿开茅塞，遂取消了迁都的念头，从而节省了大量人才、物力和财力，并对东魏政权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

但是，宣武帝是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一天天忙于烧香磕头，对国家大事却不感兴趣。而受孝文帝遗命而辅政的宣武帝的叔父元禧、元祥等人，又都是十足的贪官污吏，只知道中饱私囊，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兴衰安危。元禧时为咸阳王，身居宰辅之首。他有良田千顷，还经营着盐铁产业，仍盘算着如何扩大自己的庄园，赚取更大的利润；他家中已有娇姬美妾数十人，仍差人四处搜求美女。元祥时为北海王，他大搞营运贩卖、侵剥远近的“官倒”生意。为了扩建自家府邸，肆无忌惮地强占民宅，致使怨声载道。“上行下效”，贪占成风，元晖也渐渐开始了受贿索贿，侵占公物，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最终发展到卖官鬻爵、巧取豪夺的地步。

人称“饿彪”

早在孝文帝时期，有位名叫卢昶的

人，曾以太子中书舍人的身份奉命出使南齐，由于奴颜婢膝被罢去官职。到宣武帝时，他见元晖备受皇帝宠信，便千方百计地巴结元晖，从而官复原职。此后，元晖和他朋比为奸，干了许多坏事。

元晖所主管的吏部，负责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权力极大。元晖在卢昶的鼓动和支持下，竟将官爵分等级出卖。并标价为：大郡 2000 匹绢，中郡 1000 匹绢，小郡 500 匹绢；县令、郡丞，也按地区的大小、贫富定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都争着花钱买官，然后再以官员的身份盘剥百姓，赚回投资。因此，人们将吏部衙门视为经营官爵的市场，称之为"市曹"。

在任冀州刺史期间，元晖基于当时饥荒连年，很多人四处逃难，发现不少人为了逃税而隐匿户口，增减年龄，随意乱注死亡流失，又伙同卢昶等人乘机巧立名目，对百姓乱收税、乱罚款、乱摊派，并将榨取的钱财归人私囊。据说，在他三年任满回京时，载运财物的车子竟从信都（今河北冀县）到汤阴（今属河南），一辆接一辆地排了数百里路。一路上，一旦车子坏了，缺少鳔胶，就拦劫当地百姓的牛，强行锯下牛角熬鳔胶合车子，致使百姓叫苦连天。

也正因此，时人暗地里给他这个将军和卢昶这个侍中各起了一个绰号："饿彪将军"和"饥鹰侍中"。

自作自受

宣武帝死后，其 6 岁的独生子元诩继承了皇位。元诩的生母胡充华和皇后高氏为争权夺利，随之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结果，胡氏害死了高氏，自己登上了皇太后的宝座，并开始临朝听政起来。

胡太后生活淫荡，极其迷信，又十分贪权。她以人划线，疯狂地排除异己，从而导致了多次宫廷政变。元晖为了避祸免灾，不敢再像以往那样贪赃枉法，也不敢多问政事。他凭着自己颇厚的文学功底，开始与崔鸿等人撰录自伏羲至晋朝共 14 代的百家史事，按类编排，取名《科录》，计 270 卷。其间，他既担心胡太后一伙算计自己，又害怕胡太后的对立面加害自己，还怕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军找自己算账，一天天提心吊胆，食而不知其味。久而久之，终于吓出了一场病，医治无效，于无限忧愁中一命归西。

元晖死后，虽然有《科录》一书留传于世，却并未抵消他那贪暴的罪恶。人们一提起他来，仍称之为"饿彪将军"。许多年过后，"饿彪将军"又渐渐衍变成了大赃官的泛称。

【元琛】

元琛，字昙宝，北魏宗室。他本是齐郡王元简之子，后过继给了河间王元若。《魏书》上说：他"幼而敏慧，高祖爱之"。由于他的妻子是宣武帝元恪舅舅的女儿，又是当朝高皇后的妹妹，"夫以妻贵"，年轻时便出任了定州刺史。

在定州，元琛凭恃内宠，大肆贪污受贿，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无财不贪，并由此劫夺了无数钱财。到他任满回京时，满载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的大小车辆列队而行，长达数里。他甚至还将公堂上的一些用具和饰物也当做自家的东西，装车运了回来。为此，时人议论纷纷，以致传到了临朝听政的胡太后耳中。胡太后非常生气，专此下诏说："琛在

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不至，何可更复叙用。”意思是：元琛从定州回来，除了那座中山宫没有带回，其他再没有什么未被他拿回来的东西了。这样的人，哪能再用？于是，元琛被革去了职务。

元琛被罢官后，为能继续巧取豪夺，不惜代价地四处活动，窥探机会，企图东山再起。不久，他得知6岁登极做皇帝的孝明帝元诩开始就学，赶忙找人用金粉写了一部《孝经》献给他。接着，又得知侍中刘腾极受灵太后宠信，又极力巴结刘腾，甚至拜他为义父，并送他各种金银珠宝，价值上亿万钱。

随之而来的是，元琛在刘腾等人的庇护、举荐下，又得到了都官尚书的职位。随后，出任了秦州刺史。

元琛一到秦州，便如饿虎扑食，不顾一切地聚敛财富。百姓们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一致将他比如猛兽。

元琛还利用秦州与西域交通比较方便的有利条件，派人到西域各国去求取产自波斯的追风赤兔千里马10多匹，尔后以银为槽，以金为锁环。他将这些名马视为自己手中的“王牌”，除了奉献皇上、刘腾以及自己欣赏外，还随时准备行贿朝中权臣。

由于元琛一心扑在敛财上，致使军政事务荒废，民怨沸腾。待附近氐、羌二族侵扰时，他奉命前去讨伐，结果“大被摧破，士卒死者千数，率众走还”。为此，遭到中尉的纠弹；照军法，当斩。因为刘腾等人从中疏通，才免他一死。不过，他却再次被削除了官职和继承来的河间王爵位。

元琛第二次被废于家后，刘腾已死。但他仍照上次罢官后的做法，用他贪赃枉法得到的钱财大肆行贿，另找靠山，终于在孝昌二年（526年）重新恢复了王爵。

这时，定州正爆发鲜于修礼领导的农民起义。朝廷遂命他再次率师镇压。但两军刚刚交战，他又大败而归。不过，这一次由于诸多因素，他没有受到削职的处分。

在北魏宗室与大臣中，不少人都以奢侈为荣。他们竞相在洛阳寿丘里一带修造豪华园宅，崇门丰室，高台芳树，花林曲池。为此，百姓们都将那儿叫做“王子坊”。而“王子坊”的豪首，就是元琛。

元琛为了同高阳王元雍比阔气，还模仿皇宫中的徽音殿，建造了一座文柏台，台旁掘有一眼水井，井口用黄金白玉镶边，取水的绳子用五色丝编织而成。台中有女伎300人，人人天姿国色，貌美非常。元琛住在台内，天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在元琛的后花园内，还建有一座迎风馆。馆中玉凤衔铃，金龙吐佩，素柰朱李，枝条入檐。元琛常常带着女伎们置身楼上，坐而摘食，其奢华较文柏台毫无逊色。

为了炫耀富有，元琛又将其金瓶、银瓮、水晶盘盒、玛瑙琉璃碗和赤玉卮等数百件珍物陈列在厅堂里，邀请元氏诸王侯前来参观，并让他们欣赏自己的名马和多年来积存的绫罗葛绢，随后洋洋得意地对章武王元融等人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元融本来妒忌元雍比自己富，而今见到元琛比元雍还富，不禁又气又恨，竟为此而一连病了三天。

元琛等人的贪暴无耻，招致天下百

姓的刻骨痛恨，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元琛在镇压山西、四川地区农民起义时，再一次连连失利，损兵折将。鉴于朝中风云变幻，人事变动对他越来越不利，他开始惶惶然不可终日。不久，死于军中。

【高澄】

高澄（521～549年），字子惠，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其父高欢，由于多次参加农民起义，又反过来镇压农民起义，权势迅速扩展，曾一度控制了北魏朝政。北魏皇帝元修不甘受制于他，遂于永熙三年（534年）西入关中；而他却另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并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

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时任大丞相、大将军和渤海王的高欢死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身为长子的高澄继承了他的所有职位。两年后，高澄又进位相国，受封齐王。孝静帝还赐给他三大特殊礼遇：一、入朝不趋（上朝时不必快走）；二、赞拜不名（朝见皇帝时可不传报姓名）；三、剑履上殿（上殿时可以不解佩剑、不脱鞋子）。可见，他的权位、荣誉均极人臣。

利令智昏

高澄获得这一切之后，仍不尽意，又开始妒忌起孝静帝来。

为随时掌握孝静帝的动向，高澄特将自己的心腹参军崔季舒擢升为中书侍郎，让他典掌诏令，并叮嘱他“宜用心检校”。从此，崔季舒身在朝廷，心归相府，天天将孝静帝的言行举止向高澄做汇报。

为严格限制孝静帝的行动，高澄甚至还对他公开辱骂和殴打。有一次，高澄侍宴时举杯劝他饮酒，他不想再饮，说了句“朕何以此为生”。高澄大怒，厉声骂道：“朕？朕？狗脚朕！”遂令崔季舒打了他三拳，接着离席而去。

时任散骑常侍、侍讲的荀济对高澄的做法实在看不下去，便与伺部郎中元瑾等人密密策划，准备诛除他。为此，荀济命人在宫中挖掘通往高府的地道，以便进行突然袭击。不料，此事竟被高澄发觉。接着，高澄率兵入宫，质问孝静帝为何造反。孝静帝忍无可忍，反驳道：自古以来，臣下反叛君主叫造反，哪有说君主反叛臣下的？并怒斥道：“王自欲反，何乃责我？”

没过三天，高澄便将孝静帝囚禁于含章殿，将参与此事的荀济等人一一烹杀。不久，他又怀疑自己府中的谘议参军温子乔事先知情而不报，遂将其投入大牢，活活饿死！

生活糜烂

高澄之妻是孝静帝的妹妹冯翊公主，她生得容貌秀美，妇德优良，并为高澄生下了一男二女。但高澄品行败坏，生活糜烂，毫不珍视冯翊公主的感情。

当时，高阳王元斌的庶妹元玉仪，因行为不轨而为家人所不齿。后来被一位名叫孙腾的人纳为女妓，不久又遗弃。有一天，高澄在路上遇见了她，竟然一见钟情，将她收为侧室，十分宠爱，还让孝静帝册封她为琅琊公主。元玉仪有位胞妹名叫元静仪，是黄门侍郎崔括之妻。高澄听说她颇有姿色，硬将她夺为己妾，也让孝静帝封她为公主。御史中尉高仲密的妻子聪明漂亮，高澄听说后又让人将她诱骗到自己府第。由于那妇人坚贞不屈，他竟将其衣服全都撕破、

强行奸污了她！

此外，高澄还令崔季舒等心腹之人四下为他找美女。在他初得元玉仪时，他还抱怨过崔季舒说："尔由来为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绝异者！"

更有甚者，高澄还强奸其弟媳、庶母，由此而被时人私下骂为禽兽不如！

被刺身亡

武定七年（549年），高澄从他的老巢晋阳来到京城，表面上是请求孝静帝册立皇太子，实际上是让他将帝位"禅让"自己。

高澄一进京，立刻赶往北城东部的柏堂，同崔季舒等人策划逼迫孝静帝退位的事。这时，一位名叫兰京的"膳奴"前去为他们献茶，却被高澄轰了出来。随后，高澄对人说：他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兰京持刀砍他，并命人尽快将兰京杀掉。

兰京，原是南方梁朝徐州刺史兰钦之子。在一次南北交战中，被虏到东魏。兰钦曾多次派人请求以重金赎回，高澄一直不允；兰京也一再请求赦免他，高澄也不同意。有一次，高澄还为此命人打了他几十棍，并警告说：如果今后再提此事，一定处死他！从此，兰京与6位要好的奴婢开始策划起谋刺高澄的方案来。

高澄说梦的话，正好被一旁窃听的兰京全部听到。在此紧急关头，他立即找来一把匕首，藏在了盘子底下。随后假装进食，重返厅堂。尽管高澄再一次对他斥责和驱赶，他全然当做没听见。突然，他猛地冲上前去，拔出匕首，照准高澄的胸膛猛刺。高澄还未反应过来，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倒行逆施、目空一世的高澄，就这样结束了他29岁的生命。

【和士开】

和士开（523～571年），字彦通，南北朝时清都临漳（今河北磁县）人。史书上说：他"幼而聪慧，解悟捷疾"，"倾巧便僻"。不仅精通一种名为"握槊"的游戏，又弹得一手好琵琶，还擅长舞蹈，20多岁便成为京师小有名气的帮闲浮浪之人。由于神武帝高欢的爱子长广王高湛贪玩好耍，尤其喜欢"握槊"，遂将和士开召为王府参军。从此，和士开"发言吐论，惟以谄媚自资"，从而进一步讨得了高湛的宠信。

太宁元年（561年），高湛登基做了皇帝，是为武成帝。和士开也随之飞黄腾达：先是由黄门侍郎升为侍中，继而加封为定州真定县子爵，不久又被封为伯爵、右仆射，成了威震朝野的宰相。

诱主行乐

和士开爬上相位之后，首先将诱主行乐当成了自己的头等大事。他认为，只有这样，皇帝才会无暇问及朝政，才能使自己独揽大权，以售其奸。为此，他除了经常陪高湛玩"握槊"、弹琵琶，还往往施以甜言蜜语或淫词秽谈。高湛本来就荒淫成性，如此一来，"弥加淫佚"。据《北齐书·和士开传》记载，他与和士开"言辞容止，极诸鄙亵，以夜继昼，无复君臣之礼"。

为防止高湛"迷途知返"，和士开还露骨地对他说："自古以来，帝王无数，尽为灰烬。贤德的尧舜与暴虐的桀纣，结局并未有什么不同。陛下应趁少壮之年，恣意作乐，纵横分享，放任情怀，这就是一日快活敌千年！至于国政

杂事，可吩咐大臣们去办，不必忧虑，更不要自找苦吃！”这些胡言乱语，却受到高湛的啧啧赞赏！

河清四年（565年），太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史官认为“天文有变”，“当有易主”。和士开又乘机劝高湛将皇位传给儿子高纬，让皇后胡氏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而自己退做太上皇，无忧无虑地尽情淫乐。结果，高湛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不过，这位昏君忘我行乐，没多久，便于当年年底一命呜呼了，时年32岁。

卖官鬻狱

和士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为维持花天酒地的日子，他多年来一直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

卖官，是和士开敛财的主要手段。他凭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将上至郡县、下至乡间的官职，一一明码标价。当时，不少豪门子弟、富商大贾，为买得一官半职，都纷纷投奔他的门下。他不论德才如何，总是收多少钱，给多大官。那些买得官职的人，一上任便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先将买官的钱挣回来。为此，《北齐书》上描写道：“所在征税，百端俱起”，老百姓怨声载道。

《北齐书》还说：“士开见人将加刑戮，多所营救，即得免罪，即命讽喻责其珍宝，谓之赎命物”。意思是：他还公然卖法！对那些犯有死罪的人，他让人责令其家属奉献金银珠宝，谓之“赎命物”；只要送他“赎命物”，他就代为说情，从而使犯人减刑或者当场释放。

鉴于和士开“威权日盛”，一些不知廉耻的人为了向上爬，也竞相以重金向他行贿，请他收为“假子”。他认为，这样既可敛财，又可结党，实属一举两得。于是，又在收认干儿子方面分外下起工夫来。

乱宫丧命

高湛为帝时，拥有三宫六院。由于他喜新厌旧，居无定所，很少与皇后胡氏相伴。而胡氏又是一位水性杨花、放纵淫荡之人，实在寂寞难捱时，竟“与诸阉人亵狎”。偏巧她也喜爱“握槊”之戏，高湛便将和士开推荐于她。从此，和士开得以经常出入皇后宫寝。

和士开深明“狡兔三窟”之理。他见胡皇后素爱干预朝政，就想拉她作为自己的奥援。于是，他投其所好，并很快与之勾搭成奸。所以，当史官谈及“天文有变”时，他出于不可告人的卑劣目的，极力劝高湛让位于幼子，并让胡太后临朝听政。

高湛死后，和士开淫乱后宫更加明目张胆。对此，满朝文武无不气愤填膺，赵郡王高睿与大臣娄定远等更是忍无可忍。有一次，胡太后在前殿摆酒招待众亲贵王侯，高睿就乘机陈词，大骂道：“和士开是先皇帝的一个弄臣，纯属城狐社鼠之辈。他大肆行贿受贿，秽乱宫掖，臣等不能袖手旁观！”胡太后却厉声斥责道：“和士开是先皇帝看重的。先皇帝在世时，你们为何不早说？现在这么讲，是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吗？”此后不久，高睿以“心怀不轨”的罪名被杀，娄定远则被贬为青州刺史。

高湛之三子、琅琊王高俨，眼看着朝政一天不如一天，决定冒死除去和士开这一祸患。他向他的姨父、侍中冯子琮说：“士开罪重，吾欲杀之。”冯子琮当即表示支持，并让御史王子宜具表弹劾和士开，请求收禁推鞠之。接着，冯子琮将此表杂于其他文书中上奏。一向

懒惰又昏庸的高纬未加细审便予以批准。随后，高俨拿着皇上的批复，让厍狄伏连征调京畿部队守卫在皇宫神武门和千秋门外，又让御史王子宜假传“诏令”将和士开诱至御史台，然后宣布了他的一桩桩滔天罪行。和士开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已经被人将脑袋砍了下来！

事后，高俨等人均被胡太后处斩。但满朝文武乃至天下百姓，都对高俨等为民除害的义举予以极高的评价！

【李义府】

李义府，原籍瀛州饶阳（今河南饶阳县），后迁剑南水泰（今四川射洪县）。他曾在唐高宗李治时两度为相。由于他表面上总是那么温和、恭顺、面带笑容，而内心却阴险狡诈，褊私嫉妒，常常出乎意料地陷害人，所以人们说他“心狠貌恭”、“笑里藏刀”，并将他称之为“人猫”、“李猫”。

原本并不坏

李义府出生于一个小官僚之家。自幼刻苦好学，成人后颇有文采。

贞观八年（634 年），剑南道巡查大使李大亮出巡，发现他才华出众，将他带回京城。经举荐，他当上了门下典仪。随后，他又受到黄门侍郎刘洎和侍御史马周的赏识，并由刘洎、马周联合举荐给了唐太宗李世民。太宗随即召见他，令他当场以《咏鸟》为题，赋诗一首。他脱口吟道：

日里扬朝彩，琴中闻夜啼。
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太宗听罢哈哈大笑，对他说：“与卿全树，何止一枝!”当即授他监察御史，并侍晋王李治。

不久，晋王被立为太子，李义府遂被授予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

其间，李义府曾写《承华箴》上献，在文中规劝太子“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还强调指出：“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太子将此箴上奏父皇，太宗非常高兴，特下诏赐李义府帛 40 匹，并令其参与撰写《晋书》。

贞观 23 年（649 年），太宗驾崩，太子李治继皇位，是为高宗，第二年更年号为“永徽”。

永徽元年（650 年），高宗擢升李义府为中书舍人。第二年，又命他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在许多人心目中，李义府堪称春风得意，青云直上。

渐生奸邪心

随着地位的变更，李义府接触的达官贵人越来越多。其中，有刘洎、马周这样的直臣，也有许敬宗、崔义玄之类的奸臣。忠奸分明，善恶不容，而李义府却谁也不得罪。时任宰相的长孙无忌认为他“虚美引恶”，“曲意逢迎”，两面讨好，便奏请高宗贬他到壁州（今四川通江）任司马。

诏令尚未下达，李义府却预先得到了消息。他急忙求见许敬宗的外甥、中书舍人王德俭，请他帮自己出主意。王德俭告诉他：昭仪武则天正受皇宠，皇上还打算立她为后，只是怕宰相长孙无忌、储遂良和侍中韩瑗等人反对，所以至今尚未正式提出来；还指出：“君若建白，转祸于福也。”对此，李义府心领神会。所以，他明知长孙无忌、储遂良等对大唐忠心耿耿，德高望重，而武

则天却心怀叵测，素有恶名，仍立即上表高宗，谎称立武昭仪为皇后乃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请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为后。高宗阅罢，正中下怀，马上召见李义府，赐他珠宝一斗，还将拟好的贬他的诏令扣下不发，让他继续担任原职务。接着，武则天也秘密派人去向他致谢，并示意将来重用他。

永徽六年（655 年）十月，王皇后被废为庶人，武则天当了皇后。不到一个月，李义府便拜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并赐爵广平县男。他暗自欣喜之余，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竟将善揣人意和施展诡计总结为向上爬的经验，从此开始大要阴谋。

血染升迁路

李义府悟出他的升官捷径后，几乎天天想的都是如何迎合皇上和武后的心理。后来，又发现皇上受制于武后，他又完全丧失了人格，变成了武后的一条狗：让他咬谁就咬谁。

在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前几个月，高宗曾就废立皇后事两次征求过宰相储遂良的意见，储遂良都坚决不同意。第一次，他说：王皇后“出身于名门望族，皇后并无过失，不可废黜！”第二次又说：“陛下如果一定要改立皇后，请在贵姓人中选择。武昭仪过去事先帝，没有不知道的，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还叩头流血，一再表示：如陛下非立昭仪不可，请将臣“乞放归田里！”躲在帘后的武则天气得浑身发抖，大叫道：“何不扑杀此獠！”李义府深知当了皇后的武则天一定要报复储遂良，便与许敬宗等勾结在一起，诬告储遂良图谋不轨，将他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并在那儿害死了他。

就立武则天为皇后之事，宰相长孙无忌也屡言不可。为此，高宗曾秘密遣使送他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还亲自登门造访；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也一再出面求情；至于许敬宗等，不知劝说过长孙无忌多少次，但长孙无忌生性刚直，每一次皆“厉色拒之”。还向高宗明确表示：“先帝付托遂良，愿陛下问遂良可否！”李义府也十分明白：入主后宫的武则天当然也会报复长孙无忌。于是，又和许敬宗联合起来，诬告他同监察御史李巢交结谋反，罢免了他的官爵，将他流放黔州（今四川彭水）。随后，又逼令他自杀，并籍没其家。

对侍中韩瑗等反对立武则天为后的人，李义府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将他们一一杀害。

正是通过这丧尽天良的卑劣行径，李义府的官职接连升迁，很快成了中书令、检校御史大夫，加太子宾客，改封河间郡公；接着兼王府长史、吏部尚书；后来又爬上了右相的高位。连他死去多年的父亲，也被追封为魏州刺史；他的三个儿子和女婿，乃至尚在襁褓中的孙子，也一个个封列为官。

卖官聚重金

随着荣宠日增，李义府贪赃的胃口和胆量也越来越大。

在他主管吏部时，他曾派长子李津将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叫到面前，说：我准备为你弄个官职。5 天后，长孙延果然当上了司津监。于是，他向长孙延索取谢金 700 贯。升任右丞相后，李义府竟“专以卖官为事”。一些贪婪之徒，富贵之家，只要肯给他送钱，就能身居高官要职。由于他“卖官鬻爵，其门如市”，前来行贿求官的人络绎不绝，他

自感忙不过来，又让其母亲、妻子及女婿等全都参与到卖官售爵的行列之中。

李义府的胡作非为，自然也会引起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于是，有人将此事报告给了高宗。高宗生性懦弱，惧怕武则天；而李义府又正是武则天面前数一数二的大红人，所以一直无人敢动毫发。但由于上疏者越来越多，高宗不得不召他进宫，告诉他："朕闻卿的儿子、女婿言行不谨慎，作恶甚多。朕一直为卿遮掩，从未对卿说过。卿回去后劝告他们一下，不要让他们继续如此。"不料，李义府竟勃然变色，反问道："是谁向陛下这么说的?"高宗虽然不高兴，也只是回答道："只要朕讲的是事实，你何须问朕从何处所知呢!"李义府见此，竟不与高宗打招呼，扭头而走出宫门。

生活更腐化

李义府凭借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在个人生活上，也分外腐化。

显庆元年（656年），洛州有一妖女淳于氏，因同他人通奸谋害亲夫，被押在大理寺的监狱中。李义府听说她容貌姣好，便让大理寺丞毕正义将她放了出来，自己把她带回家，天天同她寻欢作乐。为了长期占有她，李义府又密令毕正义免去她的罪责。大理寺卿获悉此情，奏报给了高宗。李义府惟恐事情闹大，竟逼令毕正义悬梁自尽。

不久，李义府又决定改葬他的祖父，大兴土木，在永康陵的旁边重建墓室，并示意附近各县都派丁夫、车牛参加修建。三原县（今陕西富平县）县令李孝节为了巴结他，首先征集人力、物力和财力，夜以继日地为他挖坑、运土。随后，高陵县、栎阳县、云阳县、华原县、同官县、泾阳县等7个县的县令，惟恐李义府怪罪，也不得不亲自带领人丁和车辆前去供役。其间，由于高陵县县令张敬业为人厚道，不愿给百姓带来更大的苦难，又不敢得罪李义府，只好自己事事操劳，结果累死在工地上。

据史载，在李义府这次迁葬中，自王公以下的各级官员都给他送了厚礼，"其羽仪、导从、轜辅、器服，并穷极奢侈。赶来送葬的车马，以及祭奠供帐等物，浩浩荡荡，从灞桥到三原七十多里之间，相继不绝"；以致"轜辅刍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典无与比者"，成了唐朝开国以来王公大臣们未曾有过的豪华葬礼。

在名誉上，李义府也是能捞就捞，能挤就挤。武则天得势后，深感贞观时所修的《氏族志》不载武氏族望，显得出身卑贱，决定重新修订，便将这一任务交给李义府主办。李义府也因为自己家庭未列名入志，有时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又勾结许敬宗，将所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并自言出于赵郡李氏，与当今皇上同宗同族。与此同时，由于他曾多次为其子向魏齐旧姓求婚而未成，出于报复心，又特地规定旧有七姓即崔、卢、李、郑、王等望族不得互为婚姻。

群鸦绕孤坟

李义府横行无忌，作恶多端，终于惹得天怒人怨，遭到了应有的惩罚。

龙朔三年（663年），左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忍无可忍，上表陈述李义府种种罪状。高宗也感到李义府眼里只有武后，并无皇上，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因此，诏令司刑太常伯刘祥道和御史共同审查此案，并由司空李勣督办。审查的结果，与杨行颖所揭发的完全一致。高宗又感到李义府已危及自己的统治，

下决心除去这一毒瘤。武则天得知后，也认为李义府胆大妄为，罪不可赦，不得不忍痛割爱。因此，李义府以“蓄邪黩货，实玷衣冠；稔恶嫉贤，载亏政道”的罪名，被削除一切官职，长期流放到巂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同时，他的长子李津、次子李洽、三子李洋和女婿柳元贞等人也均以仗其父权，贿赂无厌，为非作歹的罪名，被革去官职，长期流放。其中，李津被流放振州（今海南省崖县），李洽、李洋和柳元贞被流放到廷州（今广西天峨）。

人们听说李义府及其全家遭到惩处，无不高兴得奔走相告。大家都说：“今日巨唐年，还诛四凶族”。“四凶”，指的是李义府的三个儿子和女婿。有人还以民间的说唱形式，编写了一份《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张贴在一些通衢大街上。所谓“铜山大贼”，指的是李义府贪赃枉法、索贿受贿得来的铜钱堆积如山。

李义府早已臭名远扬，而今成为钦犯，孤零零被流放偏远地带，自然又受到千夫所指、万民唾弃。他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度日如年。支撑自己活下去的惟一的精神支柱，是妄图朝廷大赦时，武则天再为他美言一番，从而东山再起。然而，乾封元年（666 年）朝廷大赦时，却明文规定长期流放者不得回朝。他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希望却是犹如肥皂泡，顿时瘫倒在地，从此忧愤发病，惨死在巂州一处陋室中！

李义府临死之前，身边没有一位亲人；死后，也无人照管；腐尸停放了许久，才被扔进了一个土坑中。除了野狗对他的坟头感兴趣，还有一群群乌鸦时而绕着他的孤坟怪叫着。

【鱼朝恩】

鱼朝恩（722～770 年），泸州泸川（今四川纳溪）人。他于唐玄宗李隆基天宝（742～755 年）末年，以宦官的身份进入内侍省，初为品官，给事黄门；肃宗李亨至德年间（756～758 年），常监军事，并以功累加左监门卫大将军；到代宗李豫广德元年（763 年），又因军功而升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帅神策军。随后，又加判国子监事、进封郑国公，专宠擅权，位居朝臣之上。

献墅固宠

大历二年（767 年），鱼朝恩为进一步讨得代宗皇帝的欢心，以固恩宠，专门表奏道：愿将皇上先前赏赐他的一处别墅献出来，改作佛寺，并取名章敬寺，用以表示对代宗已故生母吴氏（即章敬皇太后）的纪念，以求冥福。当时，代宗正笃信佛事，对鱼朝恩的此举十分满意，当即予以赞许。于是，鱼朝恩大兴土木，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全都用在了章敬寺的工程建设上。为追求宏伟壮丽，他买尽长安市面上的建筑材料仍不够用，又奏毁曲江池的亭馆、华清宫的观楼，甚至百司的行廨和将相众官的故宅，总费用超过了万亿之多。尽管不少人上书指责他“劳民伤财”、“费财以求福”，但代宗通通当成了耳旁风，还为他加官晋级，“增封百户”。

与此同时，鱼朝恩惟恐别人受到的宠信超过自己，总是不断地挑剔大臣们的过错，在皇帝面前说三道四。尤其是对功高盖世的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更是又怕又恨。他曾多次在代宗面前诋毁他，但总也不见成效。于是，便趁郭

子仪镇守边关之际，暗中派人挖了郭父的坟墓，妄图破坏他家的“风水”，从根本上搞垮他。对这一卑劣的行径，朝野议论纷纷；代宗也怕引发意外，深以为忧。好在郭子仪以大局为重，又未抓住鱼朝恩其他把柄，才没有认真追究。

大发横财

鱼朝恩恃权怙宠，横行不法，肆无忌惮地捞钱、捞权、捞名利。

首先，他在他直接掌管的北军设置监狱，搜罗一批流氓无赖充当“捕贼吏”，命他们罗织城中富人罪状，将富人抓到狱中，施以严刑，逼他们服诬致死。接着，籍没其全部家产。为调动“捕贼吏”的“积极性”，他还以“奖赏”的名义给他们一定的“回扣”。据资料，自北军置狱，不仅长安城里的富人连遭毒手，就连进京赶考的举子也被如法炮制。京师万年县有个名叫贾明观的“捕贼吏”，仅得到的“回扣”便积下“家产巨万”；可见鱼朝恩暴敛之多！

鱼朝恩统帅的神策军成为禁军后，待遇比其他军队优厚，编制也得到了扩大。但他为了大揽军权，并使神策军更听命于他，又硬将京兆的好畤军、凤翔的麟游军和普润军统统隶属于神策军。

鱼朝恩有一养子，名令徽，十五六岁，在内侍省担任内给使。因为他年龄小、官品低，按唐制只能穿绿色的官服。有一次，他和同事发生争吵，结果没占到便宜，回家后告诉了鱼朝恩。鱼朝恩次日便带子见代宗，说：“臣之子官品卑下，为同辈凌辱，请陛下赐以紫衣。”代宗还未表态，却有人已将高级品官所穿的紫衣抱了过来，鱼令徽连忙跪拜谢恩。代宗虽然顺水推舟给了人情，但对鱼朝恩已经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不久，鱼朝恩又发现朝臣议事有时没让他参加，便气急败坏地叫嚷道：“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后来，这话传至代宗耳中，又引起了代宗的憎恶。

惨遭缢杀

大历五年（770 年）正月，时任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的元载窥测到代宗对鱼朝恩已生恶感，而鱼朝恩又一向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便密奏鱼朝恩专权不轨，请代宗除掉他。代宗虽然同意，但担心鱼朝恩军权在握，党羽众多，难以成事。元载连忙表示：只要陛下将此事全权交给我，我一定能办妥。代宗遂点头应允。

老谋深算的元载得到密旨后，先是不惜代价地收买了鱼朝恩的心腹干将周皓、皇甫温等人，从而掌握了鱼朝恩的一举一动；接着，表面上投鱼朝恩所好，加重其党羽权位，实际上调兵遣将，让周皓、皇甫温掌握了更大的权力；随后，利用代宗照惯例于寒食那天在宫禁设宴之机，提前让周皓率兵埋伏起来。待宴会散后，鱼朝恩刚要回军营，代宗却下诏要他留下议事。当他刚刚进门，只见代宗拉下脸来，劈头问道：“你为何图谋不轨？”鱼朝恩马上狡辩，而且态度强硬，言语悖慢。代宗一声令下，周皓等人一拥而上，将鱼朝恩按倒在地。接着，当场将他活活勒死了。

随之而来的是，鱼朝恩暴尸三日，籍没家产，其亲属、爪牙也都被杀的杀，关的关，无不受到惩治。

【安德海】

安德海出生于河北青县汤庄子一个贫苦人家，因生活所迫，少年时净身入宫。他见总管太监黄承恩深受皇上宠信，

便想方设法接近他，并拜他为师。从此，他不但学得了更多的讨主子欢心的招术，也渐渐有了接近皇子乃至皇帝的机会。

道光三十年（1850年）春，皇上着手选太子，皇子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安德海通过四皇子奕詝的老师杜受田，向奕詝屡屡献计，终于促成了奕詝人主东宫。不久，道光帝驾崩，奕詝登上了大宝，是为咸丰皇帝。咸丰帝念及安德海在关键时候立了大功，对他分外器重，特让他侍奉自己心爱的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

受宠西宫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31岁的咸丰帝病死于承德行宫，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即扶6岁的皇太子载淳在灵柩前即位，是为同治帝。

当时，肃顺等人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但不召在京的恭亲王奕訢到承德奔丧，而且掐断了离宫和京都的联系，以免慈禧太后和奕訢等人勾结起来反对自己；而慈禧太后为了垂帘听政，迫切需要取得奕訢的支持，渴望他能来承德秘谈。在此关键时刻，安德海劝慈禧重演“周瑜打黄盖”，故意顶撞慈禧太后，招致慈禧太后一顿毒打，并被押送京城，交内务府惩办。通过这一“苦肉计”，使奕訢了解了承德的局势和两太后的意图，遂潜赴承德，与慈禧面商了政变大计。结果，慈禧除掉了肃顺等八大臣，开始和慈安太后一起垂帘听政。

早在慈禧太后为宫女兰儿时，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接触皇上而犯愁。那时，安德海凭其乖巧伶俐已混出了个人模狗样。他基于自己对皇上的了解和对兰儿的判断，曾设法帮兰儿受到皇上的宠幸，使之一步步变成了而今的慈禧太后；这次又主动上演“苦肉计”，帮慈禧太后掌握了最高权力。从此，他自然备受慈禧太后的恩宠，成了她最信赖的人。

多方敛钱

安德海得势之后，马上露出了他那贪婪残暴的丑恶嘴脸。

在宫中，如果有人想要求见慈禧太后，必须先过他这一关。他总是乘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一旦在宫中住腻了，他就任意到外边去转游。每到一地，便让当地官吏接驾、送礼。所到之处，鸡犬不宁。

安德海利用丧母之机，大发横财的事，也足以看出他的狡猾和贪婪。

在安德海的母亲出殡的前一天，安德海先让人将青县的知县时启强叫到跟前，问道：“我母亲明天发丧出殡，你打算怎么办?”时启强一听，dh嗵一声跪在地上。他心想：这不是明明问我上礼的事吗？若上礼上少了，他肯定不痛快，说不定一怒之下会毁掉自己的前程；而上礼上多了，自己又拿不出来；若狠下心来刮地皮，自己管的可是他的家乡啊，万一有人向他禀报怎么办？于是，一边叩头一边说：“回老爷，卑职是两榜出身，十年寒窗，家中清贫，到任才一年多，这青县又是苦地方……”安德海没等他讲完，便说道：“罢了，罢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接着把话一转，说：“到我这儿吊祭的官，就数你小；到你随礼上账时，怕你给我家乡丢人，才提前叫你来，好早些做准备。”他见时启强莫名其妙，又吩咐道：“为了给我挡挡脸，又不让你做鳖子，你先从我这里拿去10个大元宝。到随礼的时候，你先上账，让他们看着。明白吗?”

时启强虽然不太明白，但只能照安

德海的布置办：次日，他一早便找到安德海的管家李莲英，并当着众多随礼的官员要求先上账，还动情地表示："为了悼念总管大老爷的太夫人归天，特奉献素绢十匹，素缎十匹，素绸十匹，百两一锭的大元宝十锭。礼物甚少，聊表寸心。"李莲英惟恐别人听不清楚，又把时知县的随礼朗声读了一遍。

如此一来，在场的官员顿时乱了营：一个小小的知县竟随千两白银、三十匹绸缎的厚礼，自己这三品、四品甚至一品、二品的高官又该上多少？然而，回京去取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从附近府县去借；所上的礼，也只能比时知县高得多。于是，数千两数千两的银子流进了安家大院，连权臣李鸿章也被抬得从天津急借白银来上礼。

据说，安德海仅此一事便赚了几十万两白银，另有数不清的绸缎布匹。后来，有人还编了一个顺口溜：

娘死发财几袋满，
将来爹死照此办。
总管的确招儿多，
随时随处辟财源！

惨死他乡

慈禧太后是位权势欲极强的人。在两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尽管慈安不贪权，性情又平和，但慈禧仍觉得她碍事，处处排挤她。对此，慈安心中也清楚。

为了进一步对付慈安，慈禧经常派安德海出宫去结纳外臣，从而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势力。但是，清宫有条祖训："内监不许私离京城四十里，违者由地方官就地正法。"因此，安德海每次外出，慈禧总是嘱咐他悄悄出去，暗暗回来。不过，骄横成性的安德海，并没有完全这么做。

有一次，安德海又奉慈禧密旨去山东。他出京不久，便命人在船上升起大旗，大肆张扬起来。船入山东德州境内后，德州知府不得不前去拜接，并送上银子 200 两。然而，安德海却嫌少，竟重重打了他几个耳光，还限他三天之内交足 5000 两白银；否则，要他的命。

德州知府正捂着脸不知所措，猛然想起了他的上司——山东巡抚丁宝桢，便连夜向他去哭诉。丁宝桢问他接没接到圣旨，对方说没有接到。丁宝桢马上意识到：这安德海没奉明诏，却一定是得了慈禧太后的暗许；慈禧太后不降明旨，正说明她与慈安太后有矛盾。根据"内监不许私离京城四十里"的清宫祖训，立即派亲信飞马入京去向慈安送奏章。与此同时，命德州知府马上回去，将安德海一行押送济南，还一再表示："一切后果由老夫承担！"

当德州知府将安德海一伙押到济南、并报告走漏一人时，丁宝桢很担心那人会回京报信。正为此而紧张，慈安降下了懿旨：着令丁宝桢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丁宝桢正准备将安德海推出去斩首，忽听人报：西太后传来懿旨。安德海闻听后喜出望外，顿时变得趾高气扬。他从地上蹦起来，怒吼道："姓丁的，看你如何收场！"而丁宝桢却冷笑一声，大声吩咐道："前门接旨，后门斩首！"

接着，安德海随着刽子手的一声怒吼，尸首分了家！

【李莲英】

李莲英（1847～1911 年），直隶大

城（今属河北）人，16岁自阉入宫。由于他精于梳妆又极会谄媚取宠，深受慈禧太后的宠爱，不久便被提升为梳头房总管；后来又升为内廷大总管，赏二品顶戴，成了权倾朝野的显赫人物。

浪子发迹

李莲英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他10多岁的时候，因为家乡连年发大水，全家人逃难到了北京城。为养家糊口，他的父亲曾一度摆摊修鞋，后来开了一家熟皮作坊。李莲英懒得在作坊搓硝揉皮，常常溜到天桥一带去赌博，或去八大胡同逛窑子。结果债台高筑，讨债人天天逼上门来，害得全家人东躲西藏，不得不迁回老家。而他本人，则被一群地痞流氓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躲在京西一座破庙里养伤。

此前，李莲英曾在天桥让一位老和尚算过命。那和尚吟出的偈语是：

> 阴反阳来阳反阴，阴阳二字定乾坤。
> 若要逢凶化为吉，不入空门入皇门。

李莲英向老和尚请教“空门”、“皇门”之所指，对方说：“‘空门’，就是像我这样出家为僧，吃斋念佛；而‘皇门’，指的则是紫禁城。”

接着，李莲英又亲眼见到一位老太监衣锦还乡的情景：吹鼓手前面开道，八个人抬着大轿，众奴仆紧随左右，地方官出迎讨好。看看人家的威风，想想自己的窘迫，李莲英第一次产生了自阉入“皇门”的念头。

在京西破庙中，时年16岁的李莲英又忆起当初老和尚的偈语和那位老太监威风凛凛的样子，进一步坚定了入“皇门”的决心。所以，伤势一好，他便慕名找到地安门方砖胡同专做太监净身营生的“小刀刘”，请他为自己净了身。接着，通过同乡、太监沈兰玉推荐进入宫中，被分到慈禧太后手下听差。

同治八年（1869年），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因私自出宫到山东，又在那儿胡作非为，被山东巡抚丁宝祯抓捕正法。从此，慈禧太后心烦意乱，常常拿手下人出气。尤其是她一向珍惜自己的容颜和秀发，每天早上梳妆时，如果掉下一根头发，便会将梳头太监痛打一通。身为长春宫主事兼梳头房太监的沈兰玉正为此犯愁，李莲英却自荐为西太后去梳头。随后，他请了10天假，重游八大胡同，拜妓女为师，学会了30多种发型的梳理。回宫后，他正式改为梳头太监，为慈禧太后一天梳一个式样，一月之内竟没有重样的，致使慈禧从心眼里高兴。

与此同时，李莲英还随时注意察言观色，揣摩慈禧太后的心思，千方百计地迎合她，并帮她除去了不顺从她的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帮她和昔日的情人荣禄幽会等等，所以地位连连升迁：从一个小太监变为梳头房领事兼敬事房头目，赏六品顶戴；又变为内廷副总管，赏四品顶戴；光绪七年，李莲英遵照慈禧太后的旨意为病中的慈安太后送去了一些点心，慈安太后食罢，于当天暴崩。而李莲英却随之升为内廷大总管，赏三品顶戴；不久，又受赏二品顶戴。

献媚固宠

李莲英身居高位后，为进一步巩固和加深慈禧太后对自己的宠信，仍挖空心思地巴结、逢迎她。慈禧太后闲来无

事，常到太监值班的房间里转一转，坐一会儿。慈禧太后一走，李莲英就把她坐过的凳子用黄缎子布包起来，从此再也无人敢用屁股去沾一沾这凳子。天长日久，房内的12张凳子竟有8个被包上了黄布。慈禧太后得知后，觉得李莲英既认真，又忠诚。

有一年久旱不雨，慈禧太后为表示自己关心百姓疾苦，一连三天都带着文武百官去天坛祭天求雨。说来也巧，到第三天时突然下起雨来。满朝文武正叩头庆贺，李莲英却用他那男不男、女不女的尖喉咙叫起来："诸位大人，你们看，咱们的太后可真了不起！太后求佛降雨，雨就到，太后就像天上的老佛爷一样！"慈禧一听，自然满心欢喜。但她却故作生气的样子喝道："李莲英，你知罪吗？我求雨是为了黎民百姓，如来佛降雨是为了拯救我的子民。大胆奴才，不许泄露天机！"李莲英一听便明白慈禧太后是在卖关子，赶忙跪倒在地，自责道："奴才不敢！奴才不敢！老佛爷——"他把"老佛爷"三个字叫得更高，"并非奴才泄露天机，要不是天上的佛爷听您的话，怎么会突然下雨呢？"话音未落，一班子拍马屁的大臣都纷纷跪拜高呼："老佛爷万寿无疆！洪福齐天！"从此，"老佛爷"成了慈禧太后的尊称和爱称。

既然获得"老佛爷"的称谓，慈禧太后自然要不断地做做"放生"行善的样子给人看看。在她六十大寿那一天，便按计划在颐和园佛香阁放鸟。当时，在李莲英事先筹措下，一笼笼小鸟并排摆着，由慈禧亲手抽开笼门。当放出最后一批鸟时，只见鸟儿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子，又唧唧喳喳地全都飞回鸟笼中。慈禧又惊又喜，问李莲英是怎么回事，李莲英跪禀道："奴才回老佛爷的话，这是老佛爷德威天地，泽及禽兽，鸟儿不舍得飞走！"

对此，慈禧虽然听得很顺耳，但怕别人笑话她昏昧，遂怒斥道："大胆怒才，竟拿驯熟了的鸟儿来骗我！"李莲英又连忙跪禀："奴才不敢！"随后，又说：天下确实有驯熟了的鸟，但恐怕谁也没听说过有驯熟了的鱼。如果老佛爷将这昆明湖畔的百桶鲤鱼放入湖中，它们也会不肯游走的。慈禧太后犹豫了一下，又命人将那一桶桶鲤鱼放生。果然，那些鱼游了一圈后，纷纷游回岸边，排成了一排，像是朝拜一样。原来，李莲英先让人把鱼虫放在纱笼里，固定在岸边，鱼虫慢慢从纱笼钻出来，致使放出的鲤鱼又都赶回来抢虫吃。而李莲英则对惊喜异常的慈禧太后及众大臣们说：鸟儿不肯飞去，鱼儿舍不得游走，可见"老佛爷德配天地！"说罢，高呼"万岁"！在场的太监、宫女、大臣，也随即跪倒，齐祝"老佛爷万寿无疆！"至于慈禧太后，虽然觉得其中有诈，但也弄不清究竟怎么回事。而对人、鱼、鸟共贺的热烈场面，她高高兴兴地摘下了脖子上挂的那一大串捻珠，当场赏给了李莲英。

生财有道

李莲英一生大量受贿于朝廷内外，但受贿的地点从不选在皇宫里。如白云观的后花园，就是他众多受贿处所之一。即便如此，他在皇宫仍有三间大屋存放着数百万两白银。慈禧死后，他怕如此多的财产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在自己离开皇宫前，全部将它们捐献给了朝廷。他在宫外的存款有多少，许多年来谁也

没弄清。

李莲英的生财之道极多，除一般贪官污吏常用的索贿受贿、贪污霸占，也还有自己独特的招术。如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前夕，他仅从一座台钟上便赚取了大笔银两。

当时，一些投机取巧的外国商人见清廷上下都争先恐后地给慈禧太后备寿礼，无不挖空心思地抢生意。其中，有一人不知从哪儿弄到一座玲珑奇巧的台钟：该钟每当报时的时候，随着一阵悠扬的乐曲声，钟上面的阁楼里会慢慢走出一位花枝招展的机器女郎，手里拿着一幅精美的卷轴；接着，卷轴缓缓展开，逐一亮出“万寿无疆”4个字！意大利驻华公使发现后，马上将这座台钟买了下来，随后以高价转卖给了一个极想巴结慈禧太后的御史。那御史如获至宝，兴冲冲捧着它求见李莲英。李莲英一看，也大吃一惊：自己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等宝贝！但是，他灵机一动，又很快收敛了笑容，阴阳怪气地说：“这玩意儿好是好，若万一机关失灵，条幅亮出时只露出三个字，变成‘万寿无’，恐怕会酿成大祸的！”御史顿时目瞪口呆，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告退，并将钟退回了原主。而那意大利公使，也只得自认晦气。数日后，李莲英探得那座钟身价骤减，遂派人低价买到手，并让一个能工巧匠将其中的“万寿无疆”改为了“寿寿寿寿”。经过反复试验，觉得万无一失，又派人将那御史找来。经过商谈，最后给以意大利公使卖钟价的二倍卖给了御史。

墓葬之谜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一命呜呼。李莲英犹如丧家之犬，在主子灵前大放悲声。随后，他参与料理了丧事就再也不见了。

有人说：李莲英自知仇人太多，怕遭报复，在慈禧出殡那天悄悄溜去，从此隐姓埋名，流落到他乡；有人说：由于李莲英多年来也一直乞讨隆裕皇后的欢心，所以被隆裕安排到南花园一个地方躲了起来，以免仇人跟踪、迫害；还有人说：他被仇人杀死，身首异处。而最为普遍的说法是：他采用“金蝉脱壳”之计，让一位老太监穿上他的服饰，在京郊将其杀死，割其首级，造成自己被杀的假相，然后逃之夭夭。究竟哪种说法为准，至今仍无定论。

在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西边二里多路，有个名叫“恩济庄”的地方，是专门埋葬清朝太监的墓地。据说，这是当年雍正帝“恩赐”万两白银修建而成的，先后葬有太监2700多名。慈禧没死之前，曾指定将李莲英的墓地也建于此，并特地为他拨去了大量银两，让他独葬在关帝庙北边一个虎皮石墙的院落里（今北京“六一”学校校园），并建有祠堂，还在关帝庙的偏殿里挂有他的画像。后来，有一孙姓父子为其守墓，直到1942年时仍香火不断。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六一学校的“造反派”们破“四旧”，让“牛鬼蛇神”把李莲英的坟砸开，从中取出了4颗“镇棺珠”，每颗大约有乒乓球那么大；另外还有金烟碟、翠扳指、花宝石镶钻石戒指，以及汉朝的青玉土浸剑、宋代的青玉褐浸环、清朝的钻石帽正（直径为1.6厘米，比英国女王戴的那颗钻石帽正还要大）等大小文物50多件。但棺材里面，除了一颗骷髅般的头颅外，身子、胳臂、腿，什么都没有。

那颗头颅被送上地面后，小学生们都感到挺好玩，把它当成了足球踢来踢去。

【奕劻】

奕劻，字辅廷，爱新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乾隆等17子永璘之孙。光绪十年（1884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封庆郡王；光绪二十年，封庆亲王；二十七年，任外务部总理大臣；二十九年，任军机大臣；三十三年，兼管陆军部，宣统三年（1911年），任“皇族内阁”总理大臣。

见钱眼开

清末，朝廷昏庸，官场腐败，渐渐兴起了一股地方官向京官馈赠的恶习。馈赠一般分“三节两寿”，即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和王爷、王妃的寿诞。馈赠的数量，并无定制，少则数金，多则百金、千金甚至万金。奕劻身为朝廷重臣，气焰熏灼，自然附者极多，向他馈送者难以计数。而他见钱眼开，不论来者送多少，一概收而不拒。因此，积攒了巨额钱财。据人透露，他仅存在英国汇丰银行里的私产就达120万！

奕劻选任官吏，也是量“财”录用。窃国大盗袁世凯还没得志时，听说奕劻即将入主军机，一次就向他送上白银10万两。奕劻从未见人一下子送来这么多，所以对袁世凯十分满意，“一见倾心”。从此，袁世凯成了他府上的常客。每逢过节、过生日、子女婚嫁甚至子孙满月等等，一切费用均由袁世凯预先安排。而袁世凯本人，也从此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很快便从一个无名小辈晋升为权位显赫的直隶总督。

奕劻还网罗和培植了一大帮子亲信、爪牙，肆无忌惮地卖官鬻爵。其中，吏部郎官王宪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史载，王宪章在奕劻的操纵下，每年经手卖出的州县官职数十上百。他将所得赃款分为三份：一份孝敬奕劻，占50%；一份自己私吞，占20%；另30%作为“小金库”，分发给有关同僚们，如此进行了好多年，终被朝中一些正直大臣所不容。他们首先拿王宪章开刀，企图引蛇出洞，籍以对奕劻进行纠劾。但王宪章求奕劻设法保护时，奕劻却说：牺牲你一个人，可以保住大家，也可以保住我的名誉；请你认命吧，我会厚待你的子孙的。于是，王宪章旋被正法，而奕劻却溜之大吉，继续作恶。

财迷心窍

袁世凯本是个奸诈狠毒的野心家，但奕劻财迷心窍，总是对他百般庇护和重用。

在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不久，就引起不少满族贵胄的猜忌与不满。尽管奕劻极力周旋，他还是被明升暗降：补授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但解除了他的直隶总督之职，剥夺了他的兵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病逝，其兄载沣的3岁儿子溥仪被立为嗣皇帝，入承大统；同时，载沣为摄政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

早在戊戌变法时，袁世凯为了向上爬曾出卖过光绪皇帝及其“帝党”；光绪之死，也传说是吃了他送去的一剂药所造成的。所以，光绪在临死前曾给载沣秘密写了一个字条：“杀袁世凯”。载沣执政后，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也上书强调：光绪之死乃袁世凯所为，请“杀贼臣袁世凯”。为此，载沣特地

召见满汉军机大臣宣示光绪遗诏，准备将袁世凯斩首示众。奕劻闻讯大惊，急忙为他寻求活路。恰巧重臣张之洞叩头道："国有大丧，不宜诛戮大臣"。奕劻立即附和，极力为袁世凯开脱，终于保住了袁世凯的脑袋。但是，载沣仍解除了袁世凯的职务，让他以"足疾"为名，"回籍养疴"去了。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也就是辛亥革命，革命党人迅速占领了武汉三镇。袁世凯得知后，无限欣喜，预感到投机钻营的又一良机已经到来。为东山再起，他立即向亲信做了一番布置，随后又派人向奕劻送去了一大笔钱。

奕劻接到贿赂，马上联络协理大臣徐世昌等人向载沣提议起用袁世凯。载沣大怒，当即将他们训斥了一通。数日后，载沣鉴于清政府面临的严峻形势，召集奕劻等研究对策，奕劻又乘机重申起用袁世凯，还保证袁世凯不会出问题。于是，载沣决定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然而，袁世凯却嫌官职太小，竟以足疾未愈为由而推辞。奕劻见此情势，再次劝谏载沣重用他。载沣迫于前方军情急如水火，遂答应了袁世凯提出的六个条件，委派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段祺瑞的军队以及水陆各军。不足一个月，袁世凯便以阴谋诡计和手中军权，先是担任了内阁总理大臣，继而组织责任内阁，全面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

养虎贻患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军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临时中央政府。有些人认为：清政府已名存实亡，今后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廷之间，而在于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若要避免更多的流血，最好是将袁世凯拉到革命阵营中来。袁世凯得知此情，马上让人放出风来，说"袁内阁亦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袁世凯据以告清廷，即可实行逊位"。其用意在于推迟选举，将来由他担任大总统。

1911年11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29日，各省代表一致推选他为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以大局为重，就职不久就通电宣布："袁世凯若表示赞成共和，当以总统相让。"随后，又亲自致电袁世凯以表诚意。袁世凯窃喜之余，立即催促清廷退位。隆裕太后急忙召集御前会议，但王公亲贵早已闻风丧胆，大都携带妻妾逃往天津、青岛、大连租界，到会的寥寥可数。她抱着溥仪，痛哭流涕；载沣本无主意，这时更不敢参与决策；而奕劻一心想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妻室财产，根本没想什么对策。万般无奈，隆裕做出了皇帝退位、颁布共和的决定，并于1912年2月12日以皇帝溥仪的名义颁布了退位诏书。至此，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王朝覆灭了。

袁世凯威逼清帝退位的当天，便给孙中山发了一封电报，表示赞成共和。同时，又要革命党人推举他为大总统。3天后，孙中山向临时政府递交了辞职咨文和荐袁咨文。随后，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但是，在袁世凯的心目中，当总统要讲民主，个人不能独断专行；同时，别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评头论足，任意褒贬，令人难以忍受。远远比不上封建帝王，终身掌权，说一不二；还可以代代世袭，享尽人间荣华。于是，他又大耍手腕，卖国求荣，

于 1916 年正式称起皇帝来。

至此，先是丧失职权，继而丢了爵位，最后不得不狼狈逃往天津的奕劻，才识袁世凯的庐山真面目。他抚今追昔，感慨万端，自恨养虎贻患，对不起列祖列宗。皇室宗亲对自己怎么看？世人对自己怎么评？史书上将对自己怎么写？他越想越羞，越想越怕，越想越气。不久，满怀忧愤地离开了人间。

六、祸世奸雄

【赵高】

（？～前207）秦朝宦官、权臣。原为赵国宗族远支。其母在秦国服刑，故兄弟数人皆生隐宫。赵高为内官厮役，因精明强干，通晓法律，被秦王政提拔为中车府令。他私事公子胡亥，教以法律。后因犯罪，秦王命蒙毅审理，被蒙毅依法判以死罪。秦王惜其才干，下令赦免，并恢复原来官爵。后以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始皇三十七年（前210），赵高和胡亥随从秦始皇出游会稽。还至平原津，始皇病危，乃为玺书赐长子扶苏，命其将兵权交给蒙恬，返咸阳主持丧葬。赵高得幸于胡亥，又考虑到蒙氏兄弟掌权对自己不利，遂与秦二世胡亥、李斯合谋，秘不发丧，诈受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更为书赐扶苏和蒙恬死。胡亥还至咸阳，立为二世皇帝，赵高任郎中令，常居宫中参与决策。他指使胡亥更改法律，诛戮宗室、大臣。群臣、诸公子触犯秦二世意旨的，都交赵高审治。蒙恬、蒙毅兄弟等秦始皇所亲近的大臣和诸公子、公主皆被处死，相连坐者不可胜数。赵高惟恐大臣入朝奏事告发他，又劝二世深居禁中，不朝见大臣，以此进一步专擅朝政。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后，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因谏说二世停止修造阿房宫，减省徭役赋税，结果被迫自杀。左丞相李斯则被赵高诬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市。章邯也因受到猜忌，在巨鹿一战失败后投降项羽。此后赵高拜为中丞相，事无大小皆取决于其意旨。他为了巩固权位，故意在二世面前指鹿为马，凡是不随声附和的大臣，就捏造罪名加以迫害。秦二世三年八月，刘邦攻下武关后，赵高恐诛罚及身，与其婿阎乐等人密谋，乘二世在望夷宫斋戒之机，诈诏发兵围宫，逼令二世自杀。赵高企图篡位自立，但因左右百官不从，只好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九月，赵高被子婴用计杀于斋宫，夷三族。

【梁冀】

（？～159）东汉外戚和权臣。字伯卓。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父梁商，顺帝时任大将军，两妹为顺帝、桓帝皇后。梁冀初任黄门侍郎，转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永和元年（136）拜河南尹。六年，梁商病死，冀继任大将军。他一手援立三帝，执政二十余年。东汉自和帝、安帝两代，外戚开始干政，至梁冀专权而达于极点。

冲帝夭死后，皇太后与梁冀定策禁

中，迎立质帝。质帝不满梁冀骄横，称之为“跋扈将军”。冀遂进鸩杀之。再立桓帝。以援立有功，一再增益封户，赏赐财物、甲第、奴婢无数。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人，平尚书事，机事大小，莫不听其决断，天子形同傀儡。宫卫近侍均为梁冀亲信，百官迁任先要向他晋见谢恩，然后才敢诣尚书。其妻孙寿同时诏封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人五千万，地位比长公主；子胤也封襄邑侯，食万户，拜河南尹；胤子桃封城父侯。甚至梁冀和孙寿宠幸的监奴秦宫也擅作威福，刺史、二千石都要登门拜谒。梁氏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势力遍布朝廷，一时穷极满盛。

梁冀夫妻生性贪恣，依仗权势多方搜括财物，当时，四方贡物必须先将上等的献送梁冀，皇帝御府仅得其次。又遣宾客出塞，广求异物，并大治第宅，多拓林苑。仅河南城西的兔苑，方圆即达数十里，百姓有误杀苑兔的，就被处死。梁冀还诬陷富人，乘机勒索财物，以至掠取良人为奴，达数千人之多，称为“自卖人”。

梁氏的专权自恣，使东汉朝政日趋腐败。因此引起封建地主阶级中比较正直的官僚士大夫的不满和反对。梁冀多方罗织罪名，极力诛除异己。辽东太守侯猛初任职时，没有向梁冀晋见谢恩，就被假托罪名腰斩。郎中袁著诣阙上书弹劾梁冀，竟被追捕笞杀。太原郝絜、胡武等因与著友善，被冀疑为袁党，于是命中都官移檄捕杀，仅胡武一家株连被杀即达六十余人。甚至位列三公的李固、杜乔因不同意梁冀立蠡吾侯刘志为帝，也被横加罪名，收捕处死。延熹元年（158），太史令陈授借日食之变，劾奏梁冀，冀即指使洛阳令将其拷掠致死。桓帝对梁冀专权素有不满，得知陈授死讯大怒；加以梁冀刺杀贵人邓猛姊婿邴尊事发，桓帝遂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密谋诛冀。次年，桓帝令黄门令具瑗和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包围梁冀府第，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梁冀即日与妻自杀，子胤及诸梁宗亲无长少皆弃市，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百姓称庆，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梁冀家财折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

【司马伦】

谋害太子　废逐贾后

司马伦（？～301），字子彝，司马师最小的儿子，其母柏夫人。他和晋武帝司马炎是同父异母兄弟。晋武帝登基后，封司马伦为琅邪郡王。司马伦的部将刘缉盗窃御裘，司马伦本应牵连治罪，但司马炎不顾群臣的进谏，不仅赦免他无罪，而且还委以重任，任东中郎将、宣武将军。咸宁中（275～289），司马伦改封为赵王；调任平北将军，都邺城守事，升安北将军。

元康初（292），司马伦调任征西将军，封开府仪同三司，镇守关中。由于司马伦赏罚不公，以至氐羌反叛，他被征回京师。不久，又任东骑将军、太子太傅。他深得贾太后的信任。曾提出要求担任录尚书，但遭到张华、裴颁坚决拒绝；他又要求当尚书令，张、裴二人仍然予以阻挠。

愍怀太子被废以后，司马伦任右军将军。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及常从督许超一起侍卫东宫。两人怜悯太子无罪，谋划废除贾后，拯救太子。他们认为张华、裴頠不会同意这样做，难与他们图谋；认为司马伦执有兵权，生性贪求，可以借助他的力量谋事。于是，他们二人对司马伦宠幸的人孙秀说："正宫凶妒无道，与贾谧等人共废太子。现在国无嫡嗣，社稷将危，大臣将起大事。而您名义上奉事中宫，与贾、郭亲善，太子的废除，都说您早已知道，一朝起事，祸灾必然波及到您。为何不先谋划呢?"孙秀答应了，告诉司马伦，司马伦也同意一起干。随后，通知通事令史张林和省事张衡、殿中侍御史殷浑、右卫司马督路始作为内应。事情准备完毕，准备开始行动，然而孙秀知道太子聪明，以后一旦登基，将和贤人图政，估计自己不会得志，于是又对司马伦说："太子为人刚猛，不可私请，知道您一直奉侍贾后，当时都议论您是贾后的死党。现在虽然可以为子立大功，太子对您早有私怨，一定不会加赏予您。现在应该暂缓废贾后，贾后必然害太子，待贾后废去太子之后，然后再废贾后，为太子报仇，也足以立功，还可以免除祸患。"司马伦听从孙秀的主意。孙秀不慎泄露了他们的计谋，贾谧等人听说了。司马伦、孙秀劝贾谧等早害太子，以绝众望。

太子既已被遇害，司马伦和孙秀更加专横跋扈。许超、司马雅害怕有难，后悔参与阴谋，于是均称有病。孙秀又告诉右卫次飞督闾和，闾和听从孙秀，约定四月三日夜，以鼓声为应，到时候，假传诏书给三部司马说："中宫与贾谧等杀我的太子，现在派车骑入废中宫，你等皆当从命，赐爵关内侯。如若不从，诛灭三族。"于是大家只能顺从。司马伦又传假诏连夜骗开宫门，陈兵道南，派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将三部司马百人排在宫门而入。华林让骆休作内应，迎接皇帝到东堂。于是废贾后为庶人，幽禁在建始殿。逮捕吴太妃、赵粲及韩寿妻贾午等，带到密室拷问，下诏书处理废后之事，收捕贾谧等。召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等连夜入殿，把张华、裴頠、杜斌等人在殿前杀害。尚书怀疑诏书有诈，司马伦认为沮众，将其斩杀。次日，司马伦坐在端门，屯兵北向，派尚书和郁持节送贯庶人到金墉，杀赵粲叔父中护军赵浚及散骑侍郎韩豫等，内外群官被其罢免者相当多。

不久，司马伦矫诏自封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赵王如故，一切都如同司马懿、司马昭辅魏那样。文武官员封侯者达数千，百官都对司马伦唯命是从。

结党营私　丧心病狂

司马伦是个平庸、无智无谋之辈，故而他一直受制于孙秀。孙秀是个狡黠小人、贪淫昧利，与他一起共事的人全都是奸佞之徒，只是一味追求荣华富贵，却无深谋远略。不过，他们勾结在一起，互补长短，威权于朝廷。孙秀借司马伦这棵大树，赢得高官厚禄。而司马伦的大事小谋也全依赖孙秀，孙秀也借此机会恣其奸谋，杀戮忠良，以求私欲。司隶从事游颢与殷浑有隔阂，殷浑伪告游颢有反叛朝廷之心。孙秀不进行详细调查，草率地杀了游颢和襄阳中正李迈。前卫尉石崇、黄门郎潘岳都与孙秀有嫌，孙秀把他们也都杀掉。于是京邑君子无不惶惶恐恐，大有朝不保夕之感。

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对司马伦和孙秀的骄横心怀不平。孙秀等人对他们也深为忌妒。于是派司马冏出京镇守许昌，夺去司马允的护军。这令司马允愤怒异常，发兵讨伐司马伦。最后，司马允兵败被灭。朝廷为伦加九锡，增封五万户。司马伦却表面装出一副推辞的样子，皇帝又下诏派百官到司马伦府上敦劝，侍中宣布诏书，然后司马伦才接受增封。他的几个儿子也随之升官，司马伦父子、孙秀父子都掌握重权，专横跋扈，但他们之间又各有私心，互相拆台。更可笑的是，孙秀三子孙会，二十岁为射声校尉。孙会短小丑陋，最初与富家子弟在城西贩马，他凭借父亲的权势，娶了皇帝之女河东公主，公主因丧期未到，便催聘礼。当百姓忽然听说孙会娶了公主，无不骇愕、瞠目结舌。

司马伦、孙秀他们广结朋党，为非作歹，已经达到无可复加的地步。

篡夺帝位　死有余辜

司马伦、孙秀都极为迷信，听信巫鬼邪说。孙秀指使牙门赵奉诈称司马懿的神语，说应让司马伦早入西宫，又说司马懿在北芒为赵王佐助。于是又在芒山另立司马懿庙。又说逆谋可以成功，以太子詹事裴劭、左军将士卞粹等二十人为从事中郎，掾属又有二十人。孙秀等部诸军各分布心腹。让散骑常侍、义阳王司马威兼侍中，出纳诏命，假作禅让诏令，指使使持节、尚书令满奋、仆射崔随为副，奉皇帝玺绶来禅位给司马伦。司马伦假装不受。于是宗室诸王、群公卿士都假称符瑞天文来劝司马伦，司马伦这才答应。左卫王舆和前军司马雅等率领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马，示以威赏，于是这班人都不敢违抗。当天夜里，又派张林等屯守各门，义阳王司马威和骆休等逼夺天子玺绶。天还没亮，内外百官都乘车迎驾司马伦。晋惠帝乘云母车，卤簿数百人，从华林西门出居金墉城。尚书和郁，兼侍中、散骑常侍、琅邪王司马睿、中书侍郎陆机等跟随，到城下而返。

司马伦带领五千名士兵，进入端门，登太极殿。满奋、乐广把玺绶进献给司马伦，于是司马伦僭夺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建始。当年，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均不考试；计吏以及四方使命的在京者；学生十六岁以上及在学二十年，均为吏；郡县三千石令长均封侯；郡纲纪并为孝廉，县纲纪为廉吏以世于司马荂为太子；司马馥为侍中、大司农、领护军、京兆王，司马虔为侍中，大将军领将军、广平王；司马诩为侍中、抚军将军、霸城王。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张林等诸党羽均登卿将之位，并列大封。其余同谋者都超阶越次，不可胜数，甚至奴卒厮役也加以爵位。每次朝会，以小恩小惠取悦人情，府库的储备远远不够赏赐，金银冶铸不够做印，因此此时就有白版之侯的笑话。百姓也知道司马伦的王朝不会太长久。

司马伦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诸王的不满。当时，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都拥有强兵，各据一方。孙秀知道司马冏等人必定有所动作，于是选派亲党和司马伦的老部下作为三王参佐及郡守。

三王开始起兵讨伐司马伦，发布檄文。司马伦、孙秀很害怕。派遣他们的心腹孙辅为上军将军、李严为折卫将军，率兵七千从延寿关出发，征虏张泓、左

军蔡璜、前军闾和等率九千人自鄂坂关出发；镇军司马雅、扬威莫厚等率八千人从成皋关出发，召东平王为使持节、卫将军、都督诸军抵抗义师。但最终先后失败。

自从三王讨伐司马伦开始，百官将士都想杀司马伦、孙秀以谢天下。孙秀知道众怒难犯，不敢走出府门。听说河北军都失败了，他吓得不知所措。义阳王司马威劝孙秀到尚书省与八坐讨论征战的准备工作，孙秀听从。让京城四品以上的子弟，凡十五岁以上都为司隶，随同司马伦出战。内外诸军都想杀孙秀，司马威很害怕，从崇礼小门回到下舍。许超、士猗、孙会等军师，与孙秀谋划，有的想收余兵出战；有的想焚烧宫室，诛杀不归附的人，挟司马伦南投孙旗、孟观等；有的想乘船东走入海。谋划未定，王舆已反，率营兵七百多人从南掖门攻入，命令宫中兵各守卫诸门，三部司兵为内应，王舆亲自攻取孙秀，孙秀紧闭中书南门。王舆放兵登墙烧屋，孙秀和许超、士猗才走出来，左卫将军赵泉斩孙秀等人。捕孙奇于右卫营，捕前将军谢惔、黄门令骆休、司马督王潜，都在殿中斩杀。三部司兵在宣化小门中斩杀孙弼。当时司马馥在孙秀的座位上，王舆命令将士把他囚在散骑省，用大戟守省阁。八坐都入殿中，坐在东阶树下。王舆屯兵云龙门，让司马伦下诏："吾被孙秀等所误，以怒三王，现在已经杀了孙秀，我们迎太子复位，我归老于乡野。"文武百官都出奔，没有敢在此居住的。黄门让司马伦从华林东门出去，到出一汶阳里的居所。从此，甲士数千人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均喊万岁。晋惠帝从端门入、升殿、御广室，送司马伦和马司阎等人到金墉城。

梁王表奏司马伦父子凶逆，应该诛杀，百官在朝堂举行会议，都同意梁王的意见。派尚书袁敞持节赐司马伦死，饮毒酒，司马伦死前深感惭愧，用巾盖脸说："孙秀误我！孙秀误我！"，司马伦的几个儿子也被诛杀。百官当中凡是司马伦所用的全部斥免，包括台省府卫仅存者。自兴兵六十多天，所杀害的人达十万之多。

【司马道子】

皇亲国戚　位高权重

司马道子（364～402），字道子，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之子，他的哥哥是晋孝武帝司马曜。他少年时崇尚清雅、淡泊，因而受到谢安的称道。十岁时被封为琅邪王，食邑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一户，兼会稽国五万九千一百四十户。后来他徙封为会稽文孝王。孝武帝在位时，司马道子任散骑常侍，中将军，晋升为骠骑将军。不久，公卿们上奏，称道司马道子既是亲贵又贤德，没有第二个人比得上他，他应该担任司徒。道子本人坚决推辞未被任命，但却让他录尚书六条事，不久加开府，兼领司徒之职。

公元385年，谢安去世，晋孝武帝下诏书说："贤哲的宰辅新近亡故，而南北又没有统一，不是贤明盛德的人不能安定、统率内外。司徒、琅邪王司马道子，顺应自然，见识高远，实在可以担任起如周朝辅成王的周公、召公那样的重任，适合于总理内外，可领扬州刺史、录尚书、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府的文武人员，完全配备骠骑将军府。"此时，司马道子年仅二十一岁，

他辞让不接受。过了数年，道子领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再次上奏："宜进位丞相、扬州牧、假黄钺，加乌羽装饰的华盖，仪仗中排列鼓吹。"道子对此一并辞让不予接受。

东晋世族的政治统治日益堕落腐朽，晋孝武帝身为一国之君，不亲理朝政，只同司马道子畅饮歌舞，共同娱乐。司马道子有机可乘，他特别亲近一些老婆子、和尚和尼姑，这些人一起和他把持权势。凡是他所亲近信任的人，都是一些出身低贱的小人，各地的郡守官吏也大多由道子委任。他自从担任了扬州刺史、录尚书以后，权倾天下，朝野内外的人士纷纷归附于他的名下。中书令王国宝，为人卑鄙奸佞，司马道子却十分宠信他、亲近他。刑狱谬乱，官因贿选。道子本人还特别崇信佛教，用度极为奢侈，百姓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常常作通宵之饮，酩酊大醉，蓬头散发，眼睛都睁不开，更谈不上处理政务。桓温的儿子南郡公桓玄曾经采拜候道子，正赶上他喝得大醉。当时宾客满座，他睁开眼睛向着众宾客说："桓温晚年要当贼，你们说怎么办?"桓玄一听，吓得伏在地上汗流浃背，不敢站起来。长史谢重举起手板替他打圆场说："过去宣武公罢黜昏庸，选拔圣贤，功劳超过伊、霍，道路上的议论，听了应作区分。"道子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随着向桓玄举酒，桓玄才敢站起来。从此，桓玄心里忐忑不安，同时对道子也痛恨万分。

专任卑佞　政刑谬乱

东晋朝政极紊乱，左卫领营将军许荣上疏说："如今中央政府的某些属吏、值卫的武官以及奴仆官婢儿子取母亲的姓为姓的，本来都是一些奴婢、刑徒、没有乡籍品第，都当了郡守、县令，或者得了官职却不去赴任而仍在京城。把政务委派给小吏去办；和尚、尼姑、奶妈，争着把自己的亲朋党属引进官府之中，又接受贿赂，动不动就以官员身份率领士兵，没有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才干，却自比古人，这是第一桩祸患。臣下听说，佛本来是清运玄虚的神，以五戒为律，尤其不准酗酒和淫欲。而今崇尚佛教的人，秽淫尼姑，嗜酒好色，这是第二桩违背正道的。大凡致人于死命的，不一定都要手握利刃去杀戮。如果政教纷乱，动辄残害无罪之人，也必定全致人于死，这是违背正道的第三桩。做强盗的，不一定要亲自去偷别人的财物，古代江乙的母亲丢失布匹，罪由令伊而起。如今禁令不明，以致劫盗公然横行于天下，这是违背正道的第四桩。在上位的要感化下面的老百姓，必须以诚信为根本。前几年下书，让制定完备的规章制度，而大家各种各样的建议都提出来了，但一点也没有采用，这是违背正道的第五桩。现在的和尚、尼姑成群结队，穿着僧尼服，这是依傍佛法，其实连最起码的五戒都做不到，还谈得到什么精妙的佛法！而流俗的迷惑之徒，又竞相敬事，侵鱼百姓，骗取钱财，实在不合布施的正道。"他又提出太子应该出来住到东宫，奖修德业。

奏章上疏以后，却没有被采纳。中书郎范宁也多次向孝武帝进言，指陈时政的得失。孝武帝因此渐渐不满道子，但在表面上仍要优待推崇他。中书令王国宝是范宁的外甥，经常向道子谄媚，范宁上奏请求罢黜他。王国宝害怕，就让袁悦之通过尼姑妙音带信给太子的母

亲陈淑媛，说王国宝忠心谨慎，应该得到信任。孝武帝知道了异常生气，杀了袁悦之。王国宝更加害怕，到皇帝那儿诬告范宁。孝武帝不得已，流着眼泪把范宁外放，当了豫章郡太守。

优倡赵牙成了司马道子的宠儿；茹千秋本来是钱塘县的一名捕贼小吏，现在却成了道子的亲信。他们都是靠那些卑劣的手段赢得司马道子的青睐。赵牙为道子修东府第，筑造假山挖掘池塘，栽竹树木，耗资巨万。赵牙也因此被道子任命为魏郡太守。道子让宫人在他的府城设酒摆宴，饮酒作乐。孝武帝也到过他的府第，对道子说："你府内还有山，可以游览，真不错。只是装修得太过分了，不能给天下人作出俭约的榜样。"道子无法对答，只是唯唯诺诺，右左的侍臣也吓得不敢说什么。皇帝回宫以后，道子对赵牙说："皇上若是知道这座山是人造的，你可就要死定了。"赵牙阿谀奏承地说："有您在，我怎么敢死！"

不甘心当小吏的茹千秋，想往上高升，但出于无门。后来他终于找到了靠山司马道子。他对司马道子进行大量贿赂，经常向道子巴结奉承，总算打动了道子的贪婪之心。于是道子任命茹千秋为骠骑咨议参事。茹千秋靠贿赂当上官以后，也大肆卖官贩爵，聚积钱财累计上亿。

生母皇太妃对司马道子宠护有加，对他从不摆出皇家的礼仪，道子恃宠而又嗜酒如命，也常常失去应有的礼敬。皇帝内心虽然十分不满，但碍于皇太妃的面子又无可奈何。不仅如此，皇帝还得对道子更是优礼有加，待遇丰厚。博平县令闻人奭曾上疏："骠骑咨议参事茹千秋出身微贱，却窃权炫威；辅助宰相，卖官聚财，其子茹寿龄为乐安县令，贪赃枉法，畏罪潜逃，竟然没有办他的罪，又傲然回县做官。而奶妈尼姑等人狼狈为奸，扰乱朝政。国家谷贱人饥，饥饿的流民遍地皆是，这是由于百姓贫弱，赋役苛刻的缘故。受到权宠的臣子，各开自己的衙门，设置佐吏僚属，这么多的冗散人员，无益于政府而有损于国家。还有，振武将军庾恒在京城饮酒大发牢骚话，结果有人告发因而被囚禁，差一点丧命。"

闻人奭上奏的这些情形，孝武帝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而他对道子更加不满。但因顾虑皇太妃，没有废黜他。只是任命王恭为兖州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王询为仆射，王雅为太子少傅，想用这个办法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以暗中抑制道子。司马道子也不甘示弱，他加紧扶植党羽、任用心腹，集结势力。他重用王国宝及其堂兄弟王绪。由此，道子和孝武帝之间兄弟的情谊早已名存实亡。皇太妃虽在他们之间尽力调解，但是道子还是我行我素，没有改变做法。

中书郎徐邈认为皇帝最亲近的人，应该是他的弟弟司马道子；彼此友爱和睦才是道理。他找个机会从容地向孝武帝说："过去汉文帝刘恒是一位明主。因为他的弟弟淮南王刘长谋反，把他拘捕谪徙，刘长在路上不食而死，文帝很后悔。晋武帝司马炎聪明通达，对于其弟齐王司马攸被逼愤怨疾发而死也深为抱愧。兄弟之间的关系，实在应该谨慎。"孝武帝觉得徐邈说得有道理，对道子又像过去一样信任委用。当时有人做了一首《云中诗》来指斥朝廷："相王沉醉，轻出教命。捕贼千秋，干预朝

政。王恺守常，国宝驰竞。荆州大度，散诞难名；盛德之流，法护、王宁；仲堪、仙民，特有言咏；东山安道，执操高抗，何不征之，以为朝匠。”相王为司马道子；荆州为王忱；法护即王珣；王宁即王恭；仙民是徐邈字；安道为戴逵字。这首诗把司马道子操纵朝政的情景入木三分的刻画了出来。

孝武帝死，安帝即位，皇子司马德文被立为琅邪王，司马道子徙为会稽王，并宣城为五万九千户。有司上奏：“道子宜进位太傅、扬州、中书监、假黄钺，享受特殊的礼仪。”道子坚决推辞，并解除徐州刺史的职务。皇帝颁诏，内外政事都要请示道子，方能施行。安帝成年后，司马道子把政权交归皇帝，势倾朝廷。兖州刺史王恭举兵讨伐王国宝，道子十分害怕，派人先收捕王国宝，连同他的堂弟琅邪内史王绪一并斩首，用来向王恭谢罪，王恭就因此而撤军了。道子请求免去中外都督、录尚书，来缓解各地方大员的不满。皇帝下诏书不予批准。

父子狼狈　祸国殃民

元显是道子的儿子，十六岁任侍中，他打从心里厌恶王恭，请求父亲发兵讨伐他。司马道子就任命他为征虏将军，将本府及徐州刺史府的文武官员等都配属给他。当时正赶上道子王妃去世，皇帝下诏书：“会稽王妃尊贵贤惠天下第一，朕理应视为骨肉。现在丧事应该加以特殊礼仪，一切都依琅邪穆太妃的样子办。”同时又下诏书对司马元显给予表彰：“元显早露才能，孝心天然，王妃去世，至痛难夺。然而不以家事辞王事，是《阳秋》宣扬的大义；不以私家的限制违背公制，是中代以来的变礼。因此，古代的闵子、山王就是这样。万分悲痛出自内心，在外仍保持着合乎礼法的容貌，遵循礼数而不要求时间，这是贤哲的做法。王妃安葬完毕，元显可居职如旧。”从诏书中就可看得出，司马父子的权势是多么的显赫，但他们一直害怕王恭在朝外的势力，他把谯王司马尚之当作自己的心腹，为他出谋划策。司马尚之给道子出主意说：“现在地方上刺史的力量强大，宰相的权轻，应该在地方上多树立亲信，以此来保卫自己。”道子觉得很有道理，他立即任命他的司马王愉任江州刺史以防备王恭，并与尚之日夜谋议，观察四方的动静，等待时机。

王恭知道了司马父子的谋划，于是，便打着征讨司马尚之的名义起兵。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广州刺史桓玄都起来响应他。道子派人游说庾楷：“我原来和你情同骨肉，过去在帐中一起喝酒，促膝交谈，难道可以忘了吗？你如今要丢弃我这个老朋友，去交结王恭，难道忘记了王恭过去凌侮你的耻辱，而仍要低声下气地臣服于他；如果王恭得志了，会以为你是反覆之人，必然不会信任你，那时你有什么富贵可以保得住，祸事也马上就来了。”庾楷大怒说：“当初王恭借参加孝武帝的葬事进京，你担忧害怕得无计可施。我知道事情紧急，就举兵而至，才使王恭不敢有所动作；去年，王恭以讨伐王国宝为名发兵，我也听你的命令而发兵，我没有做出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不能抵御王恭，反而杀了王国宝向他谢罪，从那以后，谁还敢再尽力替你办事呢！庾楷实在不能以我家百来口生命帮着别人来屠灭，我当与天下共举，诛灭奸臣，到时候还担忧

什么府不开、爵不至。”庾楷已经响应王恭，正在征集兵马。从而，朝廷忧虑，内外戒严。

面对四方的征讨，司马父子日夜焦虑不安，司马元显开始埋怨父亲，他揎臂捋袖慷慨地说：“去年没有讨伐王恭，才有今天王恭的出兵，若又放纵他的欲望，那你宰相的祸就到了。”道子每天只管喝酒，把政事都交给元显。元显虽然年纪不大，但是读过一些书，也很聪明，血气方刚，办事果断。司马尚之辅助他。当时依附他的人都说元显神武，有晋明帝之风。因而以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假节，统前将军王确、左将军谢琰及将军桓之才、毛泰、高素等讨伐王恭。

后来，杨佺期、桓玄、殷仲堪等率兵又到石头城，司马元显从竹里驰回京师，派遣丹阳尹王恺、鄱阳太守桓放之、新蔡内史何嗣、颍州太守温洋、新安太守孙泰等，征发京师士众数万人，倚仗石头城抵御。道子将出驻中堂，忽然有惊马窜入军中，因而发生骚乱，掉到长江淹死的人很多。仲堪知道王恭已经败死，狼狈西退，与桓玄屯兵在浔阳。朝廷整兵相拒，内外骚动。皇帝下诏司马元显带甲仗百人入殿，不久加散骑常侍、中书令，又领中领军，持节、都督依然如故。司马道子此时已经疾病缠身，天天喝酒，昏睡不醒，元显知道他父亲在朝廷的威望已经失去，就想夺父亲的权。他暗示皇帝免去司马道子扬州刺史、司徒的官职，这些情形，道子昏睡着还不知道。元显自认为年轻，一下子权太重了恐怕招来讥议，于是以安帝的弟弟琅邪王司马德文领司徒，元显自任扬州刺史。等到道子酒醒了，才知道自己丢了官，被儿子夺了权，虽然很气愤，但也无可奈何。

司马道子父子的倒行逆施、强征暴敛，引发了东晋统治集团割据混战，深受苦难的农民也揭竿而起，在多起农民起义中，以孙恩的起义最为著名。孙恩起义后，司马道子更加没夜没日地饮酒。政务不论大小，全都交给儿子元显。起义军攻陷洛阳以后，道子惟恐晋朝以前的许多皇帝陵墓受到辱没，因而他上疏送回金章紫绶，请求回到会稽王府藩邸，皇帝不批准。司马道子无计可施，每天只是到蒋侯庙求神祷念，希望神明能够阻止孙恩的进攻。后来，孙恩的起义军被刘牢之镇压，桓玄占据长江上流，他写信给道子说：“孙恩打到京师的近郊，因为受到风雨的阻遏和没有粮食吃才撤众离去，不是被打败的。过去杀王国宝以谢王恭，王恭没有乘此机会进入京师统掌朝政，可见他的用意并不是要污辱你，但你们却说他不忠。现在朝廷里最重要的官员，受到大家赞许的能有谁？怎么能说没有贤德的人才，只是不能信用罢了。重理的人，然后可以期望他能信守道义；求利之徒，哪里还能爱惜他而更加信任而委以大用呢？这样日积月累，才造成今日的祸害。宰相重任，谈何容易，求福则立至，犯了逆忤的事就会招致灾祸。在朝的仁人志士，哪有不担忧的，只是惧怕祸及自身罢了。我滥竽充数作了远离京城的地方官，所以写出事的真相。”元显读了这封信，害怕极了。

为桓玄杀　死有余辜

桓温的后代桓玄，兼并了殷仲堪、杨佺期的地方和力量，整个荆楚地方为他所控制。东晋朝廷所能控制的只是三

吴地区，孙恩的起义对东部地区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整个经济陷入危机，百姓忍饥受冻。桓玄打算在此时开始向朝廷发难。司马元显急忙召集谋士，商讨对策。

张法顺认为："桓玄最近刚刚占据荆州，人情还没有理顺，正在安抚，所以还来不及顾到其他方面。乘他还处在这种况下，先下手发兵诛灭他。可命令刘牢之担任先锋，而你以大军继进，桓玄的脑袋就一定会挂在你的旗帜下了。"元显认为有道理，派张法顺到京口和刘牢之商量，刘牢之犹疑不定。张法顺回来劝元显杀刘牢之，元显没答应。司马道子又拜任为侍中、太傅，署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举行隆重、盛大的仪式，他原来担任的骠骑将军的僚佐文武等人，也配属在太傅府。

司马元显率领的征讨桓玄大军将要开拔，桓玄的堂弟骠骑长史桓石生秘密派人送信通知桓玄，因此桓玄有所准备。桓玄率先进军到浔阳，发布檄文，传到京师，宣布元显的罪状。不久，桓玄的军队进到西阳，安帝穿上戎装在西池为元显出征饯行，刚登船不久，桓玄到了新亭。

元显的僚属纷纷散走。有人传言，桓玄已到大桁，刘牢之向桓玄投降。元显回进宣阳门，刘牢之的参军张畅之率兵追逐，元显的部众溃败。元显进入宰相府，只有张法顺随从。元显向父亲司马道子问计，道子只是对着他哭。桓玄派太傅从事中郎毛泰扣捕元显送到新亭，缚在船前数他罪。元显把罪归于王延、张法顺，于是把元显交付廷尉，元显和他的六儿子全部被杀。杀了司马元显父子后，桓玄又向晋安帝上奏："司马道子纵酒不孝，该当斩首。"皇帝下诏让司马道子迁移到安成郡，派御史杜竹林防卫，但杜竹林竟按照桓玄的旨意将道子鸩杀，时年三十九岁。安帝为他在西堂哭了三日。

【檀道济】

（？～436）南朝宋名将。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世居京口。少孤。东晋元兴三年（404），从刘裕起兵京口讨桓玄，又转战各地，所向摧破，为太尉参军。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进攻后秦，道济为前锋，与龙骧将军王镇恶率步军自淮水、肥水进攻许昌，所至克捷，收复洛阳，释放应戮俘囚四千余人，一时归附者众多，为中原人士所称道。不久，进兵潼关，平长安。宋朝建立，以元勋封永修县公，后又出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宋文帝刘义隆讨平谢晦后，任道济为江州刺史。元嘉七年（430）宋派右将军到彦之北进，与北魏交战，到彦之先胜后败，黄河以南土地尽失。道济遂任都督征讨诸军事，与魏军激战三十余次，多获胜利，至历城（今山东济南）粮尽，不敢进击，设计阻延魏军追逼，领全军而返，进位司空，还镇寻阳（今江西九江）。因道济功高，部下诸将身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为宋朝所疑忌。

十三年，宋文帝患重病，彭城王刘义康执政。义康怕文帝一死，道济不听命，矫诏召其入朝，与子八人并戮于建康。道济临刑怒吼："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北魏统治者闻之，说："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二十七年，魏军南侵，兵临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

宋文帝登石头城北望，甚有忧色，叹道："若道济在，岂至此！"

【杨素】

周隋大臣　每战有功

杨素（？～606），字处道，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杨素祖杨暄，西魏辅国将军、谏议大夫。父杨敷，北周汾州刺史，死于北齐。他年轻时心胸开阔，存有大志，不拘小节，当时众人都还不知道他，只有堂叔祖西魏尚书仆射杨宽对他深感惊异，常对子孙说："处道出类拔萃，并不是一般人的才器，也不是你们所能及的。"

后来杨素和牛弘志趣相同，好学习，孜孜不倦，涉猎广而通达。善于作文，工草隶，对兵法之书也很留意。他的须髯很美，有英雄豪杰的气概。北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记室，后转礼曹，加大都督。北周武帝宇文邕亲自总理各种政务，杨素因为父亲杨敷守节而陷于北齐，未蒙朝廷恩命，上表申理。武帝不许，表上至于再三。武帝大怒，命左右问斩。杨素临死求见，拼死力争："臣事无遭天子，死是应得的。"武帝欣赏他说话慷慨，因此赠杨敷为大将军，谥忠壮。拜杨素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逐渐加以礼遇。武帝命扬素起草诏书，杨素笔不加点，下笔成章，情文并茂，武帝对杨素说要重赏他。

与北齐的战役开始，杨素向武帝请求率领他父亲的旧部当先锋。武帝同意并赐他竹策，说："朕将要统大军征讨，所以将此策赐给你。"杨素随齐王宇文宪与北齐战于河阴，以功封清河县子，食邑五日户。这一年授司城大夫。第二年再次从宇文宪攻取晋州。宇文宪率军驻扎于鸡栖原，北齐主率大军杀来，宇文宪畏惧而乘夜逃遁，为齐兵追击，兵多溃散。杨素和勇将十多人尽力苦战，宇文宪仅以身免。

以后，杨素每战都立下功勋。北齐被平定，加开府，改封成安县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赐粟帛、奴婢、各种牲畜。弟杨慎被封为义安侯。陈将樊毅于洒口筑城抵御，杨素率军把他击走，将樊毅所筑之城夷为平地。北周宣帝即位，杨素袭父爵为临贞县公，以弟杨约为安成公。不久随韦孝宽攻占淮南，杨素别取于盱眙、锺离。

杨素和时为丞相的杨坚结交很深，杨坚对杨素也相当器重，任命他为汴州刺史。杨素到洛阳，恰逢尉迟迥作乱，荥州刺史宇文胄占据武牢响应尉迟迥，杨素不能前往。杨坚拜杨素为大将军，发河内兵打败宇文胄。因功迁徐州总管，进位柱国，封清河郡公，食邑两千户。以杨素弟杨岳为临贞公。杨坚受禅为隋文帝，加杨素上拄国。隋文帝开皇四年（584），拜御史大夫。杨素妻郑氏性格骄悍，杨素一时气愤地说："我假如作天子，你一定不配作皇后。"郑氏上奏朝廷，说杨素有篡逆之心，杨素因而免官。

隋文帝当时正谋取江南，在此之前，杨素曾屡次陈述攻陈的计谋。所以不久朝廷则拜杨素为信州总管，临行赐钱百万、锦千段、马二百匹。

伐陈伐叛　江南遂平

杨素驻扎永安，造大舰，取名五牙，上面再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根桅竿，各高五十尺，每舰可容战士八百人，舰上旗帜飘扬，次等的取

名黄龙，每舰可容兵卒一百人；自此以下则平乘、舴艋等各有等级。到大举伐陈时，以杨素为行军元帅，率领战舰驶向三峡。到达流头滩，陈朝将领戚欣以青龙舰百余艘，屯兵数千人，驻守狼尾滩，以阻止隋军进军通道。狼尾滩形势很险要，诸将都觉得很不好攻打。

杨素说："胜败大计，就在这一次了。假如白天出发，他们能看得见，滩流迅猛，舰船不由人控制，我们就会失利。"于是以夜色为掩护，杨素亲自率黄龙数千艘，令战士口中衔枚悄悄而下，派遣勇士领步兵从南岸攻击戚欣别栅，令大将军刘仁恩率骑兵向白沙北岸进发，天亮前发起攻击，戚欣败走。陈兵全被俘虏之后，加以慰劳后遣散，秋毫无犯，陈人很高兴。杨素率领水军东下，船舰布满江上，旌旗兵甲和阳光交相辉映。

杨素坐在平乘大船上，容貌魁梧，容光焕发，陈人望见他威风凛凛，说："清河公就是江神。"陈守江大将，从北岸凿岸石，系铁索三条，横截上流，以阻止战船通过。杨素和刘仁恩登陆，共同发兵攻打陈军的营栅。陈军队至夜溃败，杨素除去所设铁索。陈水军大将吕仲肃又占据荆门的延州，阻拦隋军。杨素派千人，乘五牙舰船四艘，以柏木桅竿击碎敌舰十余艘，大败敌军。俘获甲士二千余人，吕仲肃单身逃脱。后主陈叔宝遣信州刺史顾觉镇守安蜀城，荆州刺史陈纪镇守公安，他们都惧怕杨素而退走。巴陵以东，没有人敢据守。陈湘州刺史兵阳王陈叔也害怕了，派使者请求投降。

杨素顺流而下至汉口，和秦孝王杨俊会合，最后攻灭陈朝。杨素得胜返朝，拜荆州总管，进爵郢国公，食邑三千户，并食长寿县千户。以杨素子杨玄感为仪同，杨玄奖为清河郡公，赐绢千匹，粟万石，加以金宝，又赐陈后主的妹妹和女妓十四人，封越国公。不久拜纳言，一年以后，转内史令。后来江南人李棱等聚众作乱，大股的有数万人，小股的也有数千人，相互呼应，杀害长官。

隋文帝以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兵讨伐。朱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以大兵占据京口，杨素率领舟师从扬子津进攻，击败朱莫问；晋陵顾世兴自称太守，和他的都督鲍迁等又来抵抗，杨素予以迎头痛击，活捉鲍迁，俘虏三千余人；进而攻击无锡帅叶略，又将他平定。吴郡沈玄、玄杰等以兵围困苏州，刺史皇甫绩每战不利。杨素领兵救援，沈玄为势所迫，走投南沙帅陆孟孙。杨素击败陆孟孙于松江，生擒陆孟孙和沈玄。浙江叛帅高智慧自号东扬州刺史，有舰船千艘，屯据要害，兵势凶狠。

杨素发起攻击，自早晨至交后申时，浴血奋战，把他打败。高智慧逃奔入海，杨素紧追不舍，高智慧又战，杨素又把他战败，擒获数千人。汪文进自称天子，占据东阳，命他的同党蔡道人任司空，守东安。杨素进讨，都一一平定。又击破永嘉沈孝彻。于是率步兵向天台，直指临海郡，追逐搜捕遗漏逃逸的叛军。前后百余战，所向披靡。隋文帝认为杨素长久劳顿在外，诏令还朝。加杨素子玄感为上开府，赐彩绢三千段。杨素以为余贼未灭，恐为后患，又自动请缨。文帝诏令杨素为元帅，把东南军民事务全交他办。杨素再次乘胜到会稽。在这之前，南安豪族泉州人王国庆杀刺史刘弘，据州为乱，各处亡兵都去归附。王国庆自以为海路险阻，北方人不惯舟船，

因此不设兵防卫。杨素率舰船从海上来到，王国庆慌张仓猝之间弃州而逃，余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

杨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曾秘密令人对王国床说："你的罪状，死有余辜，只有斩送高智慧，还有可能得到赦免。"于是王国庆捕高智慧送交杨素，斩于泉州。余党都来归附，江南大定。隋文帝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到浚仪迎接和慰劳杨素。及到京师，慰问备至，拜杨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加银瓶，装满金钱，缣三千段，马二百匹，羊二千只，公田百顷，宅一区。代苏威为尚书右射，与高颎专掌朝政。杨素为人巧言令色，矫揉造作，谁要和他比个高下，他都很在意。朝臣之内人们很推重高颎。而杨素的才能优于高颎，至于推诚体国，处事妥善，有宰相的识见风度，他却远远不如高颎。

阿谀曲承　深得帝幸

文帝命杨素监造仁寿宫，杨素就平山填谷，督役严急，工匠死伤很多，据说宫旁时常听到鬼哭的声音。等到宫室建成，隋文帝命高颎去观看，回来奏称过于华丽，工匠死伤太多，隋文帝心中不高兴，杨素忧惧，没有办法，即于北门启奏独孤皇后说："帝王所居，历来就有离宫别馆，现在天下太平，造这么一个宫殿，何必节省费用！"皇后以这个道理劝谕文帝，文帝不高兴的心情才得以消除。于是赐杨素钱百万，锦绢三千段。

突厥达头可汗侵犯边塞，朝廷以杨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伐，赐帛二千段，黄金百斤。原先，诸将与突厥作战，常顾虑突厥骑兵突然袭击，所以都用战车步骑相参，用车载削尖的树枝为鹿角方阵，骑兵在内。杨素对人说："这是防御的方法，不是决胜的良策。"于是尽除旧法，命令诸军为骑。

达头听到后大大欣喜，说："这是老天爷赐给我好策略、好机会。"因而下马对天叩拜，率领精骑十余万而至。杨素奋起而击败达头，达兴遭到重创而遁逃，杀伤将士无数，突厥兵众号哭而去。隋文帝优诏褒扬，赐缣二万匹，以及万钉宝带。杨素多权略，在战争中，不守陈规，应变无常则，但是驾驭军队严整，有犯军令者，立即斩杀，从不宽恕。每次临战，就寻找人的过失而斩杀，多时百余人，少也不少十数人，流血满地，但他谈笑自若。等到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能陷阵便无事，如不能陷阵而回，不问多少，一概斩杀不论。又令三二百人继续冲阵，如果退回，依前法斩杀。因此将士畏惧，抱必死之心，战无不胜，称为名将。

当时杨素正贵幸，文帝对他言听计从，凡从杨素出征，微功必录，至于其他将，虽有大功，多为文官所掩没。所以杨素虽然严厉残忍，士卒却愿意追随他。开皇二十年（600），晋王杨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杨素为长史。杨广谦卑屈尊接交杨素。后杨广能够成为太子，也就是得力于杨素的筹谋。

不久，杨素代高颎为尚书左仆射，赐良马百匹，牝马二百匹，奴婢百口。这年，以杨素为行军元帅，出云州击突厥，屡战屡胜。突厥败走，杨素率军追击、直到夜间终于追上。恐突厥逃走，命令骑兵殿后，他自己则带领二骑和突厥降人二人，与突厥队伍并行而前，突厥并不知觉。当他们正在安顿宿营地时，催促后面的骑兵快速掩击，大败突厥。

从此突厥远遁，大漠以南再也没有突厥王庭。

杨素因为征突厥有功，进他的儿子玄感位为柱国，玄纵为淮南郡公，赏绢二万段，独孤皇后去世，陵墓的建造规格，多出于杨素，文帝很称赞。赐田三十顷，绢万段，米万石，金钵一，装满了金子，银钵一，装满了珠子，并绫锦五百段，当时贵宠无比，他的弟弟杨构，堂叔父杨文思、文纪，及族父杨异，都是尚书列卿。诸子即使没有汗马功劳，也都位至柱国、刺史。他的家僮数千，后庭妓妾以千数，都披罗带绮。第宅华丽奢侈，造得如同皇宫一样。

有个鲍亨善于写文章，又有个殷胄工于草隶书法，都是江南士人，因为高智慧反叛而籍没有杨素家奴。亲戚故吏布列显要，杨素的贵盛，古今所无。炀帝杨广刚为太子时，忌妒蜀王杨秀，和杨素一同谋划，诬构杨秀罪名，因此后来杨秀被废黜。朝臣有违忤他的意见的，虽然忠心耿耿，多有功劳，如贺若弼、史万岁、李纲、柳或等，杨素都暗中陷害他们。如果谁能附会迎合，以及有亲戚关系的，即使没有才能，也能升官。这样一来朝臣没有不畏惧而依附于他的。只有兵部尚书柳述，因是文帝之婿，屡次当着文帝百挫折杨素。大理卿梁毗，也上表诉说杨素作威作福。

文帝渐渐疏忌杨素，后来因而出敕说："仆射是国家的宰辅，不可躬亲细务。只三五日到尚书省一次，议论大事即可。"表面优崇他，实际上是夺了他的权。直到文帝仁寿末年，不再让杨素通判三省之事。文帝要王公以下比试谢箭，杨素第一，文帝亲手把外国所献金精盘赏赐给他，价值巨万。仁寿四年(604)，跟从文帝到仁寿宫，宴赐贵重物品极多。文帝有病，杨素和兵部尚书柳迷、黄门侍郎郎元岩等入阁侍疾。

此时皇太子杨广入居大宝殿，他担心文帝可能去世，便预为防备。于是亲笔写了书信，派人出宫询问杨素。杨素逐条录出须预防的事，以回答杨广。宫人误送给文帝，文帝看后大为恼火，所宠幸的陈贵人又说太子曾经对她无礼。文帝发怒，欲召原太子庶人杨勇。太子杨广谋于杨素，杨素就伪诏派东宫兵士宿卫，门禁出入概由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文帝就在当天去世。汉王杨谅造反，遣茹茹天保占据蒲州，烧断河桥。又遣王聃子率数万人合力拒守。

杨广杨素前去镇压，杨素率领轻骑五千袭击，暗中夜渡渭口，天亮出兵，天保败走，王聃子害怕，献城投降，有诏征还。当初杨素将出兵，计算破敌日期，结果都能如他所估计的那样。于是炀帝以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安抚大使，率兵数万讨代杨谅。

当时晋、绛、吕三州都为杨谅所有，杨谅派遣赵子开拥兵十多万，策划断绝通路，驻守高壁，布下五十里的阵势。杨素命诸将领兵攻打，自己暗中率奇兵潜入霍山，沿崖谷而进，直接到达赵子开营地，一战而破，杀伤数万。杨谅所委派的介州刺史梁修罗驻守介休，听到杨素引兵来偷袭，赶紧弃城逃走。杨素进至清源距井州三十里，杨谅率将领王世宗、赵子开、萧摩诃等近十万之众，前来迎战。又被杨素打败，擒获摩诃。杨谅退保并州，杨素进兵围攻，杨谅计穷力竭而降，其余党也被平定。杨素当月还京师。

随从炀帝到洛阳，以杨素领营建东京太监。以平杨谅之功，拜杨素子万石、仁行，侄玄挺，都为仪同三司。赐物五万段，绮罗千匹，杨谅的妓妾二十人。炀帝大业元年（605）迁尚书令，赐东京甲第一区，物二千段。不久拜太子太师，其余官衔如故。前后赏赐不可胜计。杨素晚年虽有拥戴之策和平杨谅之功，但也由此而炀帝所猜忌。炀帝表面上对他待遇特别隆重，实际上内情很薄。

杨素有病之日，炀帝常命名医诊候，赐给他上等药物，但又秘密向医生询问，担心杨素不死。杨素也知道自己名位已到达顶点，不肯服药，也不好好休养，常对他的弟弟杨约说："我难道还要再活下去吗?"杨素极喜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奢侈华丽，他的贪婪行为，受到时人的鄙薄。

【宇文化及】

恶少纨绔　乱中丞相

宇文化及（? ~619），祖姓破野头氏，代郡武川（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人，其宇文述北周时继承父爵为上柱国，隋朝初年任右卫大将军，隋炀帝即位后他又进升为左翊卫大将军。宇文化及生性凶恶阴险，不遵循法令制度，喜欢乘马挟弹，驰骤在道路上，长安城里的人们称其为轻薄公子。

隋炀帝杨广当皇太子时，常常带领卫士，出入于街市，与宇文化及相识并臭味相投，由是宇文化及逐渐提升为太子仆等职。他多次收受人家的礼物和金钱，又多次被罢免官职。但皇太子杨广作他的保护伞，不久又官复原职。再加上他的弟弟宇文士及迎娶了南阳公主，从此，宇文化及更加傲慢放纵，在朝臣百官面前，动不动就辱骂人家，对人欺压至甚。看到别人家的姑娘漂亮或狗马珍宝奇物，宇文化及必定千方百计搞到手。他常和屠夫、小贩们在一起游玩，谋求好处。隋炀帝即位以后，任命宇文化及为太仆少卿，他倚恃杨广的权势，贪婪放纵更厉害了。大业初年，隋炀帝巡幸榆林，宇文化及和他的弟弟宇文智及违反禁令，同突厥人进行贸易。

此事被隋炀帝所知，炀帝勃然大怒，把他俩关押了好几个月。回到西安城外，隋炀帝准备处死他们再进城，因将他们解衣辫发，但由于公主的缘故，考虑了许久才将他们释放，把宇文化及连同宇文智及赐给宇文述当奴仆。

宇文述死后，隋炀帝追忆以前的旧情，便又重新起用他们，任命宇文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宇文智及为将作少监。隋末，李密占领了洛口，隋炀帝很害怕，便滞留在江淮，不敢返回国都。

跟随着隋炀帝的精锐卫兵们大多是关中地区的人，在外客居时间长了，看到隋炀帝没有西行返回的意思，便准备密谋政变逃回北方。当时，武贲郎将司马德戡指挥着精锐的禁军，屯驻在东城，听说手下的士兵想叛逃，不知道其详细情形如何，派校尉元武达暗中询问兵士们，知道了他们想北返的心情，并商量策划政变。

司马德戡内心非常高兴，他和与他相好的武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等人商议着说："如今听说皇帝陛下准备在丹阳修筑宫城，看样子是不想回去了。我所统率的禁军没有一个人是不想回关中的，人人窃窃私语，都打算逃走。我想把这种情况通报给皇帝，但皇帝生性

猜忌，讨厌听见士兵逃亡的消息，生怕还没有事成就会被诛杀干净。现在我们知道士兵的想法却不直说，以后事发出来，又要尽灭我们全族。这事前后进退都要被诛戮，你们看看怎么办?”

裴虔通回答说：“你假若要把真实情况向上反映，我们确实是为你捏一把汗。”司马德戡对两人说：“我听说关中地区陷落时，华阴的李孝常叛变投降，皇帝收监了李孝常的两个弟，并全部处死他们。我们这些人家属都在西面，怎么能没有这个顾虑呢!”裴虔通回答说：“我的子弟们虽已经长大了，诚然不能自我保全，正担心一天之间被诛杀，没有什么好的计策。”司马德戡说：“我们的担心相同，应当共同商量取胜大计。禁军士兵果真逃走的话，我们大家可以和他们一起走。”

裴虔通等人说：“果真如你说的，谋取生存的计策，恐怕除了这个再也没有其他上策了。”于是，他们几人相互联系招诱他人。又转告给内史舍人元敏、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良、城门郎唐奉义等人。他们日夜聚会磋商，订立生死同盟，相互之间情同手足，说话无须回避，共同讨论有关政变的细节。

乐工之子赵行枢先前结交了宇文智及，把外面的风声报告给了宇文智及。宇文智及平素狂妄，听了赵行枢的话后很高兴，当即和司马德戡相见，约定在三月十五日起兵一起造反，劫夺十二卫的军马，抢掠居民的财物，结党西归关中。宇文智及说：“当今老天爷确实抛弃了隋朝，天下英雄揭竿而起，同心反叛朝廷的人已多达数万人，趁天行大事，这是建立帝王的基业啊。”司马德戡同意宇文智及的见解。

赵行枢请求推立宇文化及为主将，大家把政变的事商量好后才转告给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生性本来驽怯，刚听了政变的消息十分害怕，色变汗流，考虑了很长时间才同意参预他们的阴谋。义宁二年（618）三月一日，司马德戡打算把想法告诉部将们，但恐怕人心叵测误事。于是他另想出诡计来威逼禁卫军士兵参加起事。司马德戡对许弘仁等人说：“你们是医术高明的医生、国家的信使，你们说话去迷惑大家，大家肯定都会相信。你们可转告给认识的人，说皇帝陛下听到禁卫军企图叛逃，准备了相当数量的毒酒，想借宴饮的机会把骁勇士兵都毒死，只同南方人在此地留居。”

许弘仁等人马上广为散布这个谣言，禁卫军听说后，相互转告，谋叛的要求更加急迫，司马德戡知道计策已见成效了，于是在三月十月召集起部将卫士，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他们。大家听后都表示服从指挥，说：“只听从将军的命令。”这一天夜里，唐奉义关闭上城门，于是和裴虔通联系好，各个城门都拿钥匙。等到半夜三更，司马德戡在东城里纠集起士兵，身后有几万人跟随。司马德戡举火把同城外的人相接应。

隋炀帝听到外面有动静，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裴虔通假装说：“是草棚被烧着了，外面的人在救火，所以才有喧哗。”宫中与外界消息被封锁，隋炀帝听了信以为真，于是放心睡觉去了。孟秉、宇文智及在城外纠集了一千多人，共同调兵把守城外和街巷。到了五更天，司马德戡给了裴虔通一部分兵马，用来替换大门上的卫士。

裴虔通带着士兵，排于左阁，驰入宫中长巷。他问："皇帝在哪里？"正好有个美女出来，她用手指着西阁说："皇帝在西阁里。"于是，裴虔通带兵去捕捉隋炀帝。隋炀帝对裴虔通说："爱卿不是我的亲信吗？你有什么仇恨要起兵造反吗？"裴虔通回答说："臣子不敢造反，只是将士们打算返归关中，这不过是拥戴陛下返回京师罢了！"隋炀帝说："那好，我和你们一起回去。"裴虔通因此派兵严守隋炀帝。到了天明，孟秉带骑兵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不知道政变的结果是否成功，浑身哆嗦得说不出话来。有人来拜访，他只是低着头抚摸着马鞍，自语道："罪过！罪过！"

当时，宇文化及在公主的住宅里，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宇文智及派遣家僮庄桃树到公主的府第中去杀他们，庄桃树不忍心杀他们，就把他们抓到宇文智及那里，好长时间才将他们放开。宇文化及来到城门，司马德戡前来迎接，把宇文化及请到朝堂上，拥称他为丞相。让人们把隋炀帝拉出都城门以示众人，然后又送回宫里。派遣令孤行达把随炀帝杀死在宫中，又逮捕了与自己平时有嫌隙、持有不同意见的几十位朝臣、一些外戚，无论年纪小的还是老的，一并杀死，只留下了秦孝王杨浩，遂拥立杨浩为皇帝。十几天后，宇文化及抢夺江都人的船只，从水路西归。到显福宫时，宿公麦孟才、折冲郎将沈光等人企图谋杀宇文化及，结果反被宇文化及杀害。

穷途末路　身首分离

宇文化及于是入居六宫，自其奉养完全和隋炀帝时一模一样。每次宇文化及都在帐中面南端坐，有人来汇报政事时，他静静地听着，一声不吭。等到关闭衙门的时候，才收取启状，和唐奉仪、牛方裕、薛良等人商量议定。人马行进徐州时，水路不通，宇文化及又掠夺了当地的牛车，抢来二千辆，把宫女珍宝等物共同装车。他的戈甲兵器，全让军士背着。

由于道路遥远，疲惫不堪，三军将士怨声载道。司马德戡对宇文化及大所失望，于是偷偷对赵行枢说："你太耽误我的大事了。当今之时拨乱反正，必然要依靠英雄贤哲。宇文化及平庸愚笨，一群小人在他周围，必然会坏事，应当如何是好？"赵行枢回答说："关键取决于我们，废掉宇文化及有什么！"因此司马德戡、赵行枢和李本、尹正卿等人密谋，准备用后军一万多人袭杀宇文化及改为司马德戡为新主。

许弘仁知道了他们的阴谋，向宇文化及告密，宇文化先下手为强，把司马德戡及其同党十几人抓起来，全部杀死。然后带兵前往东郡，通守王轨投降，依附了宇文化及。元文都推举越王杨侗为君主，拜李密为太尉，让他率兵进攻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渡过黄河，占领黎阳县城，分兵包围黎阳仓。李密还驻扎在清淇，同黎阳仓用烽火联系，相互呼应。每当宇文化及进攻黎阳仓时，李密就率兵前往增援。宇文化及多次作战失利，他的将军于弘达被李密俘获，押送到杨侗那里，架鼎享杀了他。

宇文化及的军队已经没有粮食可吃尽，他只能带兵渡过永济渠，企图与李密在童山进行决战，并进入汲郡搜求军粮。接着又派使节拷掠东郡的官吏民众，责令他们送交米粟。王轨怨恨宇文化及，便把东郡城池献归李密。宇文化及此时已感觉极端恐惧，遂率领部众谋取汲郡

以北的州县。他的部将陈智略带领岭南的骁勇卫士一万多人、张童儿率领江东骁勇几千人都叛变投降了李密。这时宇文化及还有二万人，向北逃向魏县，但是他的部将陈伯图谋离开宇文化及，结果消息泄露，被宇文化及处死。

宇文化及的心腹亲信差不多快完了，军势也日益窘迫，宇文氏兄弟黔驴技穷，只是相聚在一起喝酒宴饮，演奏女乐。一次。宇文化及喝醉了，带着酒意埋怨宇文智及说："原先我不知道是由你为他们出主意的，强迫众人拥立我为主。如今大势已去，将士兵马一天天逃散，我背着弑杀隋炀的坏名声，天下的人们都不能容纳我。现在快要有灭族之灾了，难道不应该怨你吗？"宇文化及抱着他的两个儿子哭泣起来。宇文智及生气地说："事情成功那天，你从来不埋怨；等到面临失败了，却将罪过推给我。你为何不杀死我去投奔窦建德呢？"兄弟如此互相争吵打斗，说话没有长幼尊卑，但酒醒后又接着喝，以之为常事。

宇文化及的部下多数逃亡而去，他自己知道肯定要失败，于是，哀叹说："人生本来就应当一死，何不做一天皇帝呢？"因而宇文化及毒杀了杨浩，在魏县篡位称帝，建国号为大许，改元天寿，设置文武百官。宇文化及攻打元宝藏防守的魏州，几十天没能把魏州攻克，反而被元宝藏打败，部将亡失一千多人。没办法，宇文化及就带兵奔向东北的聊城，打算招诱海边的贼盗人伍。

当时，宇文化及被派到济北去搜求军粮。大唐王朝派淮安王李神通到山东安抚百姓，并招降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不肯投降，李神通遂带兵包围了宇文化及，围攻了十几天，由于没有击败宇文化及就退了兵。

窦军首领王薄听说宇文化及有许多宝物，伪装投降依附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信任了王薄，同他共同防守，到了这个时候，王薄指引窦建德进城，活捉了宇文化及，并俘虏了他的部众。先抓起宇文智及、元武达、孟秉、杨士览、许弘仁等人，把他们全部处死。

于是就把宇文化及装在囚车里押送到河间，列举了宇文化及杀君的罪行，连同他的二个儿子宇文承基、宇文承趾都杀死了，并把宇文化及的头颅送到突厥义成公主那里，首级悬挂在突厥王庭，一代奸雄就这样落得个身首分离的下场。

【来俊臣】

（651～697）唐朝武则天时酷吏。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任侍御史、左御史中丞。少时凶险，不事生产。因告密得武则天信任，成为武则天在政争中的鹰犬。俊臣和羽党共撰《罗织经》，作为告密的典范，网罗无辜，捏造罪状。凡罗织人罪，皆先进奏事状，敕令依奏，即籍没其家。每有赦令，则遣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当时法官竞用酷法讯囚，俊臣与周兴、索元礼尤为残虐。俊臣每讯囚，不论轻重，多以醋灌鼻，或将囚犯置于瓮中，用火环绕烧炙，或以铁圈束首而加楔，以至脑裂髓出，种种酷刑，备极苦毒。讯囚，又必先示以刑具，囚人畏惧，往往自诬。则天曾于洛阳丽景门置推事院，由俊臣主持，凡入此门者，百不存一，因此人称其门为"例竟门"。其时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谈，官员入朝，常密遭逮捕，家中再也不知道消息，因此官员

入朝，即与家人作别：“不知复相见否?”俊臣前后所破千余家，冤死者甚众，他自己又两次犯赃罪，种种不法，则天都加以庇护。万岁通天元年（696）俊臣迁升洛阳令、司农少卿。二年，因得罪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被诛。仇家瞰俊臣之肉，须臾而尽。士民称快，相贺于路，都说：“自今眠者背始贴席矣!”

【李林甫】

不学无术　奸佞谄媚

李林甫（?～751），小名哥奴，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父亲李思海曾为扬府参军，舅父是楚国公姜皎。李林甫从小游手好闲，斗鸡走狗，是个纨绔子弟，但深受舅父喜爱，并当了千牛直长的小官。

开元初年，升为太子中允。当时，担任侍中的源乾曜是李林甫的姻亲。李林甫便向他讨官，要求做司门郎中，源乾曜平素就看不上他，说：“郎官应当有才望的担任，哥奴那是做郎的材料?”不久升为谕德，这是规功太子官，不久又升迁为国子司业。开元十四年（726）李林甫做了御史中丞，以后又当过刑部侍郎和吏部侍郎。当时，玄宗宠信武惠妃，其儿子寿王李瑁和盛王李琦也特受宠信，而太子李瑛却渐见疏远。李林甫认为此时机有利可图，就向武惠妃献媚，表示愿意保护寿王，为他争取帝位，武惠妃十分感激，暗中处处帮助李林甫。李林甫还和侍中裴光廷的夫人（武三思的女儿）私相往来，巴结她。

开元二十一年（733）裴光庭去世，这位武三思的女儿，就请求宦官高力士推荐李林甫当侍中，但当时玄宗已决定用韩休。高力士把此消息泄漏给武氏，李林甫趁机向韩休献殷勤。后来，韩休任宰相后，在玄宗面前推荐李林甫说他有宰相的才能。不久，李林甫当了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三年，（735）五月，李林甫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加赐银青少禄大夫，登上相位，同时为相的有侍中裴耀卿和中书令张九龄。

起初，唐玄宗欲以李林甫为相，曾咨询过张九龄，张九龄回答说：“宰相的位子关系到国家安危，陛下用李林甫为相，恐将来危及国家安危。”玄宗不听张九龄的意见。李林甫虽怀恨在心，但张九龄是诗人，以其文学才华为玄宗所倚重。

李林甫无奈，只好对他曲意逢迎，以待时机整治他。李林甫为了实现政治上的野心，继续与宦官、妃嫔往来，他每次在奏请玄宗事之前，都要通过妃嫔，先摸清玄宗的旨意，所以每次奏对，都能称玄宗的心。开元十四年（736）十月，玄宗想提前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召集宰相商议。裴耀卿、张九龄建议说：“农夫的秋收未完，望陛下以农事为重，到冬天才可返回长安。”

李林甫早摸到了玄宗的意图，待裴、张离开后，留下来对玄宗说：“长安、洛阳是陛下的东西二宫，车驾往来，何必要等待时令?即使妨碍农民秋收，陛下可以单独赦免车驾路过地区的租赋就行了。我请皇上诏示百官，即日动身西还。”玄宗听后大喜，第二天便浩浩荡荡起驾西行。张九龄为人正直，遇事不论巨细皆力争之，渐渐不为玄宗所喜欢。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月，玄宗以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勤于工作，并有政

绩，欲以其为尚书，张九龄以为不可，他说："封赏大臣要等待有名臣大功，牛仙客是个边境小吏，不能担此重任。"李林甫趁机上奏说："牛仙客任官勤恳，是难得的相才，张九龄是一介书生，不识大体。天子用人，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的?"第二天，牛仙客便受爵陇西县公，食封三百户。而张九龄固执如初。玄宗十分不高兴，说："事皆由卿邪!"从此，李林甫在玄宗面前，日夜说九龄的坏话，玄宗逐渐疏远张九龄。

这一年十一月，武惠妃哭泣着对玄宗说："太子暗中勾结党羽，将害妾母子，并且有害陛下之心。"玄宗大怒，欲废太子。张九龄苦谏，并说："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玄宗十分不满。李林甫开初不说话，退下来对玄宗说："这是天子家里的私事，外人何必参预呢?"不久，李林甫推荐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平素不好学，曾将"伏腊"读为"伏猎"。中书侍郎严挺之对张九龄说："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因此萧炅被出为岐州刺史。对此李林甫大为不满，十分怀恨张九龄和严挺之。残害张、严的机会终于被李林甫找到了。

严挺之的前妻改嫁于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贪污罪下狱，严挺之为之说情，也受到牵连而获罪。张九龄为严挺之辩解，这引起了玄宗不满。李林甫立即上书，弹劾裴耀卿、张九龄为同党。于是玄宗免去了张、裴的相权，授予他们尚书左、右丞。与此同时，李林甫为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二十五年（737）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牛仙客不学无术，被流放到瀼州。李林甫趁势诬陷周子谅为张、严同党，是张所推举的人，于是，张九龄被贬为荆州刺史。李林甫当了中书令后，唐玄宗采纳了李林甫的意见，杀死了他的三个儿子。天下人为他们鸣不平。

大理少卿徐峤妄言上奏："大理寺监狱杀气较盛，鸟雀不敢栖息。现在刑部处理死囚，每年总共才五十八人，而乌鹊在狱中做窝，无人犯法，刑法搁置。"群臣纷纷上表称贺。于是，玄宗将功绩归于宰辅，下诏赐李林甫为晋国公，牛仙客为豳国公。

开元二十六年（738），李林甫兼领陇右节度使和河西节度使。从此，李林甫独柄枢衡，涉足武备，总管满朝文武选事，处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地位。

李林甫为人阴险狡猾，诛杀残忍，脸上喜怒无常，对上一味奉承，对不合他意的人，则设计害之，决不心慈手软。所以，当时人称他："口有蜜，腹有剑。"天宝元年（742）三月，兵部侍郎卢绚垂鞭按辔，从勤政殿下经过。

卢绚体貌优美，精神抖擞，雄姿英发，玄宗以目送之，赞不绝口，流露出了要委以重任的意思。唐玄宗的神情、心思，李林甫揣摩得一清二楚，他深怕重用卢绚会危及自己的权势。便立即召来卢绚的儿子，对他说："尊府素望，皇帝要派他去交州、广州任职，如果不想去，可以说自己老了，恐怕身体吃不消。"卢绚怕任命到广州这样的边远地区，急忙上书玄宗，诉说自己年老不堪重任。

结果，卢绚被罢去兵部侍郎之职，出为华州刺史。后又授太子员外詹事。卢绚就这样被李林甫排挤出了朝廷。绛州刺史严挺之，曾为尚书左丞，精于选举，因得罪李林甫被贬外任。天宝元年

(742) 玄宗问李林甫："严挺之何在？此人亦堪进用。"李林甫马上叫来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对他说："皇上要重用你哥哥了，你得设法让你哥哥进京与皇帝见面。"严损之感激李林甫的好意，马上找来一纸，写了请求让哥哥入京就医的文字，给了李林甫。李林甫拿着去见玄宗，说："挺之年高，近患风寒，须授闲散之官，便于在京城就医。"玄宗听后，叹息再三，感到非常遗憾。天宝六年（748）四月，授严挺之太子詹子，在东都洛阳养病。宰相李适之与李林甫不和，李林甫想尽办法诬害他。一次，李林甫对李适之说："华山有金矿，主上未知之也。"过了几天，李适之把此事奏上。玄宗征求李林甫的意见，李林甫说："臣早已知道，只是由于华山是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适合开采，故不敢言。"玄宗十分崇信道教，听了李林甫的话，就越加喜欢、信任，而讨厌起李适之来了。

继而李林甫又诬告适之结为朋党，其他被株连而被贬将达数十人，后又逼适之自杀身亡。李林甫对玄宗竭力阿谀奉承，唐玄宗对他十分宠信，政事无论巨细，都要和他商量。天宝三年(744)，唐玄宗对高力士说："现在天下无事，百姓安居乐业，我想把政事全部交给李林甫处理，你以为怎样？"高力士回答说："天子大权不可让他人掌握，李林甫权势咄咄逼人，一旦他大权在握，朝臣之中还有谁敢议论政事！"玄宗听后很不高兴，高力士急忙叩头谢罪，说自己是一时头脑发昏发热，口出胡言，罪该万死。

高力士是皇上极宠信的宦官，他尚且如此害怕，其他人再也不敢发表意见了。李林甫为了掩蔽玄宗耳目，竭力堵塞言路，他召集众谏官，向他们宣布说："当今皇上圣明，作为臣下应当只是顺从他的旨意，不必要去议论朝政。诸位没有看到立在那里的仗马，它的食料相当于三品官的俸禄，但它必须终日不叫，一旦嘶叫，就会被撵走，杀死，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李林甫不学无术，他尤其忌恨那些有才能的文人。

天宝六年（747），唐玄宗下诏广求天下有识之士，凡是有一技之长的都要到京城长安参加选拔。李林甫深怕士人对诏时有人会斥责自己，当即向玄宗建议说："士人都是草茅之人，不知道禁忌规矩，徒以狂言扰路圣德，请把这事全交到尚书省长官那里试路。"于是玄宗下令让御史中丞统一监督试问，结果没有一个符合要求的人。

李林甫因此上书向唐玄宗庆贺，认为朝野没有遗留人才。对于讨好自己，而又平庸无能的人，李林甫尽心提携，竭力培植成自己的爪牙。左相陈希烈，政绩平平，光会讲点老庄玄学，李林甫看到玄宗喜欢这一套，加上陈希烈柔弱易于控制，就奏请唐玄宗让陈希烈做了尚书左丞相。从此，政事全由李林甫决断，陈希烈只是唯唯诺诺，是地地道道的李林甫的应声虫。

唐朝的惯例，宰相每天午后六刻退朝回府，李林甫奏请玄宗批准，每天提前退朝回家，这样许多国家事务就在家里处理，然后再由陈希烈部署。玄宗不理朝政时，朝官们都到李林甫家中听候指示，右相陈希烈虽然坐在府中，但却没有一个人去看望他。

丧尽天良　遗臭万年

李林甫表面上给人们温柔的样子，

好像可以亲近，实际上犹如悬崖陷阱，深险难以得知。朝廷公卿如果不是由他门下进升的，必定会被定罪迁徙；凡是依附他的，虽然是小人奸佞也会被他引见重用。李林甫家中有中间厅堂，如同半弦月，称为“月堂”。每当他排挤大臣，就住进去思谋策划；当他得意洋洋走出来时，那就设计完成，不知哪一家又要遭殃了。

他在长安设立了推事院专治狱事。任用萧炅、吉温、罗希奭等一批酷史。吉温生性残酷，六亲不认，他常说：“如果遇上知己，即使南山白额虎也能为他缚得。”罗希奭是杭州人，以残忍著称，因为受到李林甫的赏识，由御史台主簿升为殿中侍御史。他们两人，互相配合，按李林甫的旨意行事，凡是酿成狱案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当时们称他们为“罗钳吉网”。李林甫善于利用对方矛盾，消除异己，拉一派打一派。户部尚书裴宽和刑部尚书裴敦复有矛盾。当裴宽有可能当宰相时，李林甫就和裴敦复交好，让他揭发裴宽，使裴宽被贬为睢阳太守。李林甫又趁势派人去杀裴宽，“宽叩头祈请，”才免于一死。后来，裴敦复因有战功受到朝廷嘉奖，这一来又引起李林甫对他的忌恨，诬害他，裴宽也因此而被贬到淄川。刑部尚书韦坚，其妻子是李林甫舅舅姜皎的女儿，他的妹妹还是太子李玙的妃子，为官很早，深得玄宗赏识，后来被提拔为陕州太守，水陆转运使。当韦坚有人相之望时，李林甫便开始算计他。天宝五年（746）春，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因破吐蕃有工，人京献捷。他看到李林甫专权横行，就气愤不平，上疏劝谏玄宗除掉李林甫，李林甫听说大吃一惊，暗使杨慎矜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们发现，元月十五日晚，太子出游和韦坚相见，他们又发现韦坚又和皇甫惟明会见于景龙观。于是李林甫参奏韦坚与皇甫惟明勾结，阴谋拥立太子为帝，把两人逮捕下狱，后分别贬为缙云太守和播州太守。

将作监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是韦坚的弟弟，上书为韦坚喊冤，并请求太子玙为之说情。玄宗十分气愤，太子见事不妙，为了摆脱干系，上表请与韦妃离婚，声称不要因为与韦氏有亲戚关系而殉私枉法。于是，玄宗下诏，再贬韦坚为江夏别驾，其弟韦兰、韦芝被贬到岭南，其他受到牵连而遭贬官、流放的达数十人。著名的是杨慎矜案，也是李林甫排斥异己的一个例子。

杨慎矜本是李林甫门下，因受玄宗重用，提升为户部侍郎。李林甫见他擢升，十分妒忌。他利用杨慎矜和王铁的矛盾，让王铁参奏杨慎矜，说：“杨慎矜是隋炀帝的玄孙，家中藏有谶书，阴谋复辟。”玄宗听后非常恼怒，把杨慎矜逮捕。太府少卿张瑄本因为由杨慎矜所荐，也同时受牵连被捕。杨慎矜屈打成招，但始终搜查不出谶书来。李林甫派卢铉再次人长安杨家搜书，他在袖中藏着谶书进人杨慎矜的书房。一会儿，手里拿着谶书走出来。杨慎矜看到后绝望地说：“我不曾藏此谶书，今天必死无疑！”不久，玄宗诏赐杨慎矜及其弟杨慎余、杨慎名自尽，妻子儿女流放岭南。这一案件涉及数十人。

李林甫在位期间，还做了一件事，史学家认为这是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原因。

唐玄宗在位前期，朝廷宰相有不少来自节度使。李林甫独掌大权后，为了

杜绝出将入相之源，向玄宗建议用少数民族将军为节度使。他说："文臣为将，害怕矢石弹雨，不身先士卒。现在不如用蕃将带兵，他们天生雄健，在马上长大，善于冲锋陷阵，天性这样，如果陛下使他们受到感动，觉得受重用，他们一定会报效国家，夷狄就不足为虑了。"而李林甫的目的，是使掌握军权的人不能入朝为相，这样他的地位也可长保无虞了。

李林甫恃权恃势，为非作歹，又长于拍马溜须，因而深得玄宗宠信。他在京城的府第楼台亭榭，十分奢华。晚年，他沉溺于声色，家中姬妾侍女不知有多少，然而他活得并不痛快。他自知结怨天下，常常惧怕刺客，每次出门总要有步骑百余人左右保护。住宅周围，岗哨林立。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睡觉，甚至连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天宝十一载（751）李林甫死了。在他死之前，杨国忠，陈希烈等开始揭发他们罪行。他刚死还没有来得及下葬，杨国忠就上奏玄宗，告他有异谋。于是朝廷下令全部削夺李林甫的官爵，剖棺剔取含殊金紫，更以小棺，用庶民的礼节将他入葬。他的几个儿子也被流放到岭南，众女婿们也被贬官。

【杨国忠】

无赖骗子　仗势擅权

杨国忠（？～755），原名杨钊，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县西南）人。舅舅张易之、张昌宗，是武则天的内宠。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兄，他自幼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喜欢聚众赌博，经常酗酒，向人乞求借钱，行为不检，为同宗族的人所瞧不起。他在家乡无法立足，就离乡来到四川，参加了州兵。因为参加屯田有功受到奖励，当上了新都县尉。但游手好闲惯了的杨国忠，无法承担这份清职，不久就辞官不做，而日子更加贫困，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于是他只能经常接受新都富豪鲜于仲通的资助。有了钱就重操旧业，参加赌博。过了一段时间，杨国忠被调任扶风县尉，但他仍是混不去，只得只身返蜀。

天宝四年（745）八月，唐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当时玄宗六十一岁，杨贵妃二十岁。贵妃得了宠，而且是"三千宠爱在一身"，于是"姊姊弟兄皆列上，可怜光彩生门户"的局面出现了。贵妃三个姊妹，分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并任命其堂兄杨铦为殿中少监，杨锜为驸马都尉。一时间杨氏兄妹恩宠富贵，显赫无比。满朝上下争先恐后地巴结、奉迎他们。

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与宰相李林甫不和，他恐怕为李所陷害。于是对鲜于仲通说："我被皇上宠信，如果宫中无内援，一定会被李林甫陷害，近来杨贵妃受皇上宠信，你如果能替我和她家结交，我将没有后患了。"因而，杨国忠被介绍给了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召见杨国忠，一见杨相貌堂堂，思路敏捷，还很有口才，就提升他为推官，让他到京城缴纳春贡。还为他准备了一份盘缠，这是一个精美的四川地方特产，价值万贯。到京城长安后，杨国忠把这些东西分别送给杨贵妃姐妹。杨氏姊妹日夜在玄宗面前称赞章仇兼琼和杨国忠。不久，唐玄宗下令任章仇兼琼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杨国忠也被提升为金吾兵曹参军，闲厩判官。不久

杨国忠人宫侍奉，专主财务，任职时计算筹划，丝毫不差。玄宗非常高兴地说："你是当度支郎的材料啊！"自此，杨国忠得到多次提升，做到了监察御史。

当时，玄宗以户部郎中王钻为户口色役使，杨国忠与王镭勾结，将各州多余的粮食粜出，换成钱币，将丁税、地租都征收布帛，全部运往京城。他们非法聚敛，每年收缴额外钱百亿万，全部藏于内库，供宫中宴乐赏赐。并且欺骗皇帝说："这些物品与租庸调无关，是天下的余财。"玄宗认为杨国忠能富国，提升他为给事中，兼监察御史，专度支事。至此，杨国忠宠幸日隆，已经担任十五个不同的职务。

天宝八年（749）二月，玄宗率诸司百官参观左藏财物，诏赐杨国忠紫衣金鱼，以示奖励。杨国忠为玄宗赏识之时，也是李林甫把持朝政之时。李林甫见杨国忠身为国戚，出人宫廷，得到玄宗宠信，就提拔他为御史，两人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先是合计陷害户部分封郎杨慎矜，紧接着又利用王铦对杨慎矜图谋陷害。

杨国忠探知玄宗皇帝对杨慎矜在家设道场不满，杨国忠将此事告诉王铦，李林甫与王铦趁此大兴冤狱，连坐几十人。随着杨国忠权势的膨胀，李林甫对杨国忠逐渐嫉恨起来，这样一来彼此就结下冤仇。吉温原是李林甫门下的一位酷吏，曾对李言听计从。他看到李林甫的权势日趋削弱，转而巴结杨国忠，为他出谋划策，以取代李林甫。不久，杨国忠升为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天宝八年（749）刑部尚书萧炅因贪污罪被贬为汝阴太守。接着，又发生了御史大夫宋浑的巨额受贿贪污案，被流放潮阳。萧炅、宋浑都是李林甫时的同党，杨国忠抓住时机，上书玄宗皇帝，把他们赶出朝廷，剪除了李林甫的心腹的杨国忠，开始实施替代李林甫执政的第一步。户部侍郎、御史大夫王铁，兼领二十余职，日益受到玄宗宠信。杨国忠很嫉妒王铁，便借邢縡，诬构王铁定成死罪，自己则取代他当了京兆尹。李林甫上书辩解，杨国忠又揭发李林甫与王铁私交事。玄宗将王家财产、土地、府第尽数没收。凡王铁所领各职，均由杨国忠代替。

这样，杨国忠又加领了御史大夫、京畿、关内采访使等职，威震天下。杨、李两人已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天宝十一年（752）十月，南诏犯边，西川要求杨国忠前往处理，李林甫奏请玄宗，派杨国忠出镇四川。临行前，杨国忠泣辞玄宗，言"必为林甫所害"。杨贵妃亦为之说情。玄宗说："卿暂到四川处理军务，待凯旋归来，还当人相。"杨国忠刚到四川，玄宗即遣使把他召回。

此时，李林甫病危。杨国忠前去谒见病榻的李林甫，李林甫感激流涕，对杨国忠说："我眼看要死了，你一定会代我为相，以后的事就托付给你了。"十一月，李林甫死，杨国忠继任右相，兼吏部尚书，总领四十余职。杨国忠当了宰相，独揽军政大事，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一手遮天，欺上瞒下。得志以后，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以酷吏吉温为御史中丞，兼京畿、关内采访使。

吉温是个两面三刀的人，早年为李林甫爪牙，见杨国忠势盛，即叛林甫而附国忠。这时候他又看到安禄山有宠，就与之结为兄弟。吉温到了长安，将朝廷动静，报告安禄山，成了安禄山在京

城的密探。他一鼓作气，彻底铲除李林甫集团，追究李林甫生前奸事、摧毁了他的家，他的近亲、党羽因此被贬者五十余人。

李林甫虽死，但未下葬，玄宗诏消其官爵，开棺取其含珠，夺其金紫，换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唐玄宗认为杨国忠立了功劳，册封他为魏国公，杨国忠坚辞不受，后改封卫国公。天宝十二年至十三年（753～754），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旱灾害，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京兆尹李岘把灾情如实上奏。杨国忠对李岘不依附于他早已经心怀不满，借机把灾害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李岘，把他贬为长沙太守。扶风太守房琯上书向玄宗报告当地灾情，杨国忠认为有损盛世之治的美名，派监察御史前往核查，弄得房琯也很狼狈。自此以后，各地再也不敢报告灾情了。

后来，长时间连续阴雨，引起了久居深宫的玄宗的担忧，他害怕水灾影响收成。杨国忠就派人设法弄来几株长得好的庄稼进呈玄宗，以此糊弄玄宗说："最近虽然下雨过多，但并未伤害庄稼。"玄宗还是放不下心，询问宦官高力士。高力士回答说："皇上把权力委托给宰相，朝廷赏罚没有规章，好恶不分，谁还敢向皇上进真言呢?"按照唐初的惯例，宰相均由德高望重的人担任，他们不擅威权，出入礼仪从简。但自从李林甫为相以后，出入前呼后拥，车骑塞街横巷，杨国忠任相，出入车骑仪仗更是浩浩荡荡，前后一百步由骑兵开道，连公卿大臣也要纷纷退避。

杨国忠一改唐初正确有效的行政制度，他同李林甫一样，在家里处理政务。每天提前退朝回府，机要政务在家处理好后，再派人由左相签字。杨国忠还改变了唐初文部选人的惯例，即六品以下官吏的选拔由吏部侍郎主持，每年春夏进行面试，再经门下省审核才能完成的制度。杨国忠担任左相兼任文部尚书后，每次选人之前，先让有关官员在自己家中秘密拟好名单，然后到尚书省选试，文部选人完全成了一种形式，选人以才德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杨国忠的徇私枉法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恶贯盈满　身首异处

杨国忠的宰相府第就在虢国夫人府第的旁边。每当杨国忠从宫廷回来，首先必到虢国夫人家中，郎官、御史有事也常到虢国夫人府第寻找杨国忠。两人自小私通，但现在更是肆无忌惮。他们同住一起，外出双马并骑，相互调笑，猥亵之状不堪入目，行人常常感到羞耻，他们反以为荣。玄宗经常在每年的十月，到华清宫游幸，到第二年春天才返回京城。杨氏诸人的汤沐馆建在华清宫的东垣，彼此相连。玄宗皇帝驾临时，必先走遍这五家，赏赐无数。

杨国忠从一个地痞而靠投机钻营、拍马奉承当了宰相，而且兼领四十余职。原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攻打南诏，唐军大败，六万多将士战死沙场，鲜于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不但极力为鲜于仲通掩饰败绩，还上表为鲜于仲通请功。后来，玄宗又任命杨国忠兼领剑南节度使，全权负责进讨南诏。天宝十三年（754）六月，杨国忠命侍御史李宓将兵七万进攻南诏，结果全军覆没。杨国忠又隐瞒败情，谎报获胜。

及后，杨国忠又几次征发中原之兵前往讨伐，先后死去二十余万人。但唐玄宗沉湎于酒色之中，"朝事付之宰相，

边事付之诸将”，外面天塌下来，他都不知道，照样歌舞升平，高枕无忧。

“渔阳鼙鼓动地来”，玄宗宠信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了。安禄山本是营州的胡人，后从军，因为作战骁勇，受到其养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的提拔、重用。安禄山生性狡诈，善于拍马，见杨氏兄弟深受玄宗宠爱，便尽心巴结杨贵妃，还恬不知耻地当了杨贵妃的干儿子。安禄山是个胖子，大腹便便，玄宗曾经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说：“你这里面装着什么东西，竟有这么大?”安禄山急忙奉承说：“我肚子里只有一颗对皇上忠诚无二的心。”安禄山每次朝见玄宗，若有杨贵妃在场，必定先拜贵妃再拜皇上。玄宗很奇怪，问他为何如此，安禄山说：“这是我们胡人的习惯，先拜母亲后拜父亲。”

安禄山于是日益受到玄宗的重用。到天宝十年（751），安禄山已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军事藩镇。他看到玄宗沉迷于声色犬马，不理朝政，早就心怀异志，私下里招兵买马，伺机准备起兵造反。杨国忠当了宰相，安禄山原先就看不起他。于是，杨国忠就仇恨安禄山。他多次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要谋反。

天宝十三年（754）元月，玄宗在华清宫召见安禄山。安禄山痛哭流涕地向玄宗诉说：“我是一个胡人，因受皇上恩宠才有今天，想不到引起杨国忠的嫉恨，我担心杨国忠会对我栽赃诬害。”玄宗见他动了感情，觉得十分可怜，一下子赏赐他上万金钱，而且对他愈加信任。

天宝十四年（755）二月，安禄山派副将何千年进京上奏，请求准许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玄宗即时批准。左相韦见素向玄宗进谏，说安禄山谋反的迹象已十分明显，不能批准他的要求，但玄宗听后反而很不高兴。

为此，杨国忠私下派何盈、骞昂，侦查安禄山，了解其谋反的情况。天宝十四年（755）四月，杨国忠指使京兆尹李岘派兵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府第，逮捕了安禄山的党徒李起、安岱、李方来、王岷诸人，并将他们处死，安禄山的同伙吉温也被流放到合浦。

安禄山闻讯大惊，急忙上书玄宗，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陈述杨国忠的二十条大罪。唐玄宗把责任归罪于李岘，将他贬为零陵太守。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起兵范阳（今北京大兴县），叛军南下，势如破竹。十二月，大军攻陷东都洛阳。玄宗起用哥舒翰，领兵二十万镇守潼关。当时有人劝哥舒翰，以三万精兵守关，率十七万精兵回师杀杨国忠。

此消息为杨国忠所知，他害怕哥舒翰重兵在握对自己不利。于是，上书玄宗，诬奏哥舒翰拥兵关内，拒不出战。哥舒翰在朝廷强大压力下引兵出战，结果被安禄山打得大败，自己也当了俘虏。二十万官军，只存八千余人。京城震动，士民惊扰奔走，惊恐万状。

杨国忠劝玄宗入蜀。十三日黎明，玄宗以亲征为名率杨贵妃姐妹、杨国忠、韦见素等数百人西行，逃出了京城。次日，车驾行到马嵬驿。随行将士饥寒交加，怨声载道。禁卫军首领陈玄礼害怕禁军哗变，召集将士们说：“现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这一切都是杨国忠所致，不杀杨国忠不足以谢天下!”于是，将杨国忠诛杀，以枪挑其首，悬于驿门

外面。杨国忠之子杨暄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虢国夫人以及杨贵妃等全部被处以极刑。

【高力士】

（684～762）唐玄宗时当权宦官。潘州（今广东高州）人，本姓冯。少年被阉，圣历元年（698）入宫。武则天以其聪慧，令给事左右。一度被逐，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遂冒姓高。高延福交结武三思，力士遂得复入宫，为宫闱丞。李隆基为藩王时，力士倾心附结，参与宫廷政变立功。后隆基即位（即唐玄宗李隆基），力士深得信任，擢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累授骠骑大将军，封渤海郡公。

力士常宿禁中，四方进奏文表，必先过目，小事便自行裁决。玄宗说“力士当上（值日），我寝乃安”。内外大臣如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等皆厚结之以取将相位。太子李亨（后为肃宗）呼之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之为阿翁，驸马辈呼之为爷。他的资产富过王侯。曾修佛寺铸钟，宴公卿，规定击钟一次须纳礼钱十万，谄媚他的人击至二十杵，少者亦至十杵。

力士平素谨慎，又善于观察时势，所以久受宠任，于朝廷内外亦无大恶名。但他对玄宗晚年用人行政有颇大影响，对天宝时政治腐败有一定的责任。安史之乱中，他随玄宗奔西川，西京长安收复后返回。肃宗上元元年（760），因保护禅位的玄宗，为当权的宦官李辅国所恶，被流放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南）。宝应元年（762）赦还，至朗州（今湖南常德）卒。

【李辅国】

李辅国（704～762），原名静忠。生于武则天长安四年，幼年被阉，体貌丑陋羸弱。原来是管理马匹的小太监，因巴结唐玄宗宠信的大宦官高力士，四十岁进升为掌管马厩簿籍的小官。后来荐之于东宫，为太子李亨近侍。天宝十四年（755），发生了安史之乱，李辅国随玄宗出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宰相杨国忠被诛。李辅国预算到以后形势不妙，向太子献上一计，劝太子不要继续跟唐玄宗逃奔蜀，而应分兵前往北方，以图复兴。太子听从其计，与玄宗分道北行，行至灵武（今宁夏），李辅国又劝太子即皇帝位。

天宝十五年（756）七月，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就是唐肃宗，年号至德，尊称玄宗李隆基为“上皇”。此举对平定“安史”之乱和稳定人心，有积极意义。肃宗即位后，对李辅国极为亲近信任，任命他为太子家令，判帅府行军司马，负责奏章军府，成为唐肃宗的心腹，赐名“护国”。

李辅国办事稳妥，谨慎小心。他“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因而“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肃宗“一以委之”。加之他信仰佛教，平日少言语，不吃荤，很少有人对他的专权进行猜忌。至德二年（757）二月，肃宗至凤翔，益加信任李辅国，拜太子詹事，改名辅国。十月，肃宗回长安，李辅国被拜为殿中监兼陇右郡牧、京畿铸钱，封成国公，实封五百户。专掌禁军，常住在皇宫，后又兼太仆卿。李辅国显赫一时，权倾朝野。他常在银台门主持决

定朝廷大事，并设置察事听儿数十人，用来监督文武官员，官员一旦哪有错误，就被审讯。对于州县的狱讼、官员的升降，李辅国常常自行决断，并且声称是皇帝的旨意。颁发诏书，只要有他的签署，就可施行，满朝文武大臣见后也不敢非议。

李辅国外出，有甲士数百人卫从，威风八面。宗室贵人不敢直呼其名，但呼“五郎”。李揆为宰相，也以子侄之礼相称，称李辅国为“五父”。肃宗还替他娶元擢女儿为妻，因此元擢也当了梁州刺史。至德二年（757），玄宗回到长安，居住在兴庆宫。李辅国担心玄宗复辟，对自己不利，尤其是玄宗宠信的高力士，对他很瞧不起，这些，都使李辅国心里很不安。

有一次，玄宗宴请宾客，李辅国便乘机对肃宗说，太上皇勾结外臣，阴谋复位。肃宗信以为真，就在李辅国的策划下，把玄宗迁到甘露，并派人严加看守。李辅国还把玄宗的心腹、专横跋扈一时的大宦官高力士也被流放到了巫州。当时，刑部尚书颜真卿，就因为上表问上皇玄宗起居，也遭到贬职处分。李岘是当朝宰相，对于李辅国用权，制诏不通过中书省等等行为，十分气愤，极力在肃宗面前说李辅国的恶劣行为，肃宗这才稍有醒悟，开始对李辅国加以检制。为此李辅国十分怨恨李岘。

有一次，凤翔七马坊押官盗掠他人财物，为天兴令谢夷甫依法捕杀。李辅国暗中怂恿押官妻上诉，肃宗诏监察御史孙蓥审讯，认为谢夷甫做得对，押官妻再次上诉，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共同审讯，也没有发现可疑之处。在李辅国的支持下，押官妻依然不服。肃宗令侍御史毛若虚复审。

毛若虚力讨好李辅国，把罪状统统推到谢夷甫身上，判御史用法不公。崔伯阳等大怒，质问毛若虚；并弹劾若虚讨好李辅国。结果，肃宗贬崔伯阳为高要尉，权献为杜阳尉，李晔被逐到岭南，孙蓥流放到了播州。李岘认为惩治太重，对肃宗说：“毛若虚按李辅国的意旨审理案件，破坏国法，陛下对他们却听信不疑。”肃宗听了很不高兴，于是找个借口把李岘贬为蜀州刺史。上元二年（761），李辅国以功迁兵部尚书，上任时，身穿军装的武士夹道护卫，太常派乐队演奏，宰相率文武百官前来庆贺，声势浩大，隆重非常。李辅国当了兵部尚书仍不满足，进一步向肃宗提出做宰相，肃宗很不情愿，就说：“以卿之功，何官不可为，其如朝望未允何！”

李辅国于是找仆射裴冕荐举。然而裴冕根本不买李辅国的账，他对宰相萧华说：“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肃宗听了很高兴，而李辅国却恨之入骨。次年三月，李辅国的亲信户部侍郎元载任京兆尹，但元载的野心却是想当宰相，因而对京兆尹一职极力推辞。李辅国支持元载，遂奏言：“萧华专权，请罢其相。”肃宗无奈，不得已而从之，以载代华，萧华改任礼部尚书。李辅国的专权，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和肃宗皇后张良娣互相勾结。张良娣是个工于心计，贪于权势的女人。当时，逃往四川的玄宗赐给她一个七宝鞍。大臣李泌劝肃宗说：“如今社会动乱，当以俭约示人，皇后不宜乘坐七宝鞍。”肃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他的儿子建宁王李倓把七宝鞍收藏起来。李辅国为讨好张良娣，在肃宗面

前说尽建宁王坏话，肃宗不辨真伪，把建宁王赐死。宝应六年（762），肃宗病重，太子李豫监国。此时，李辅国权势炙手可热，而张皇后却想独专大权，两人于是反目成仇。

张皇后召太子李豫谓曰：“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之出，擅逼迁圣皇，其罪甚大，今主上弥留，辅国阴与飞龙副使程元振谋作乱，不可不诛。”太子流着眼泪，不敢服从。张皇后于是召越王李倓入宫，谋曰：“太子仁弱，不能诛贼臣，汝能之乎?”李倓欣然从之。不久张后以肃宗之命召太子，将图废立，并诛辅国。

不料此事为程元振探知，密告李辅国，于是首先发难，率军士截留太子李豫，逮捕越王倓，囚禁张皇后。肃宗躺在病床上，听到发生政变，受惊而死。李辅国于是杀张皇后，拥立李豫为皇帝，是为唐代宗。代宗即位后，李辅国因策立有功，迁司空、中书令，正式坐上了宰相的座位。这一来，他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无所顾忌，公然谓代宗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

代宗听后感到很气愤，从而产生了除掉李辅国的念头，然而他又害怕惧怕他握有重兵，不敢妄动。只好尊为“尚父”，实封八百户，用以迷惑李辅国。朝中事无大小，都由李辅国作主，朝臣出入先拜访李辅国后，再朝见代宗。不久，程元振谋夺辅国权位，密言于代宗。于是代宗解除李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之职，让他迁居宫外。消息传出，人们纷纷庆贺，拍手称快。李辅国想递送谢表，被拦在宫门之外，愤而呜咽，说：“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李辅国失势后，亲信韩颖、刘烜也相继被流放岭南，赐死。代宗念李辅国有拥立之功，不打算公开杀他。于十月十八日夜，遣人入其家杀之，携首、臂而去。时年五十九。代宗令主管部门“捕刺客，刻木首葬之”，赠太傅，谥曰丑。

【元载】

元载（? ~777），字公辅。凤翔岐山（今陕西岐山）人。父景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州。载少孤，自幼好学，生性敏惠，博览群书，对道家书籍尤有研究，善作文，然多次赴考，皆不中。玄宗崇奉道教，下诏举庄、老、列、文四子之学问贤才，元载参加对策，被选入高科，授新平尉。监察御史韦镒和东京留守使苗晋卿先后引载为判官，于是元载的名气逐渐大起来，继迁大理司直。肃宗即位，令诸廉道使随才擢用，江东采访使李希言表请元载为副职，拜祠部员外郎，继迁洪都刺史。

至德二年（757），两京平定，入为度支郎中。载有口才，思路敏捷，尤善奏对，肃宗遂委以重任，充江淮转运使。时李辅国权倾海内，无敢违其意者。载与辅国关系密切，辅国之妻是元载的同宗亲戚。宝应元年（762），会京兆尹缺，辅国遂以载为之，而载属意于国柄，固辞。辅国知其意，遂以宰相萧华专权，奏请载代之。次日，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度支转运使如故。

代宗李豫即位，李辅国权势益重。他数称载其才，遂进拜中书侍郎。然度支工作繁琐，于是推荐刘晏代之。辅国目空一切，为所欲为，代宗恶之，遂以元载为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以代辅国。

继而代宗使暗杀李辅国于家中，元载曾参与其谋，由是载威权日重。元载又秘结宦官董秀，厚赂以金，使刺取密旨。代宗欲办何事，载必先知之，并预作准备，故言无不合。于是，代宗益爱之。永泰元年（765）华原令顾繇上书，揭发载子元伯和揽权受贿，载怒，流繇于锦州。为防止顾繇事件的再度出现，载乃奏请："凡百官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刑部尚书颜真卿上书反对，说："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奏事者先告知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还曰："则陛下所闻见者不过三数人耳。天下之士从此钳口结舌。"载闻而恨之，奏其诽谤之罪，贬为峡州别驾。大历四年（769）十月，载荐左仆射裴冕为同平章事。初载为新平尉，为晚所荐。现冕老弱易于控制，故载荐之，冕受命之际，蹈舞仆地，一副奴才相。时内侍监鱼朝恩权倾朝野，目空一切，与元载不和，元载时常感到畏惧，于是密奏鱼朝恩专权并图谋不轨，代宗早恨鱼朝恩之专权，也知为天下人所共怨。于是命令元载策划除鱼朝恩计。

大历五年（770），宫中宴罢，擒鱼朝恩杀之。鱼朝恩既诛，元载志得意满，以为自已有除恶之功，功超前贤，文武才略，一时无双，更加骄横。又舞权弄智，任用恶吏胡作非为，内听妇人之言，纵诸子关通货贿，京师要司，皆排挤忠良，进贪猥小人。城中两处宅第，富丽堂皇，冠绝当世。膏腴别墅，凡数十处，奴婢一百余人。其妻王氏及子、弟、党羽，争纳贿赂。士人欲要钻营求官，不结其子、弟、党徒，无由进达。代宗知载之所为，以其从政日久，欲全始终，遂单独召见，望其有所收敛。但载一意孤行，代宗决意除之。

大历十二年（777）三月，代宗遣金大将军吴凑到政事堂逮捕元载、王缙，分捕亲吏，诸子下狱。元载和王缙皆服罪，诏载自尽，其子及妻皆被诛，主管官员抄其家，光钟乳就有五百两，胡椒八百石，其他金银珠宝之物车载斗量。

【仇士良】

（781～843）唐文宗时当权宦官。字匡美。循州兴宁（今广东兴宁北）人。唐宪宗时，士良任内给事，数出为监军，复入为五坊使。文宗大和九年（835），为神策左军中尉。文宗与李训、郑注等谋诛宦官，因计划不周，未能成功（见甘露之变），仇士良与右军中尉鱼弘志（一作志弘）等遂大肆诛戮朝臣，挟持文宗。从此宦官更为专横。宰相李石为士良所忌，士良遣刺客刺之。李石幸得免，惧而辞职。文宗自叹"受制家奴"。开成五年（840），文宗郁郁而死。

唐武宗即位，李德裕为相，以士良有拥立功，表面尊宠，实抑其权。会昌三年（843）五月，迫士良以内侍监致仕。离朝时，士良叮嘱送行诸宦官，须诱使皇帝纵欢极乐，使其无暇读书和接见朝臣，以巩固宦官擅政的局面。六月，士良卒。次年，因家藏武器，诏削官爵，籍没其家。

【卢杞】

卢杞（生卒年不详），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人。祖父卢怀慎

是玄宗开元初的宰相，名重一时，生活省俭，所得俸禄随时分给亲朋故旧，家无积蓄，人们对他交口称赞。父亲卢奕，也是一位以俭朴而出名的人。卢杞小时候，吃粗茶淡饭，穿粗布旧衣，大有继承乃祖乃父家风。以父荫为清道率府兵曹，仆固怀恩辟为朔方府掌书记，后补鸿胪丞，出为忠州刺史。不久迁吏部郎中，虢州刺史。偶然机会，卢杞被唐德宗发现是个人才。

当时德宗在虢州巡视，百姓状告有官府养的三千头猪残害庄稼。德宗听后说："把它们赶到同州的沙苑吧。"卢杞说："同州的百姓也是陛下的百姓，猪到那里同样会祸害百姓，臣以为干脆把它们杀掉吃了算了。"德宗一听，惊喜地说："你管着虢州还想到他州，是宰相之才。"于是诏令把猪赐贫民百姓。

回到京城后，德宗马上就将其提拔为御史中丞。一年后，又当上御史大夫，不过十几天功夫，又擢升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上了宰相，与宰相杨炎共同辅政。卢杞得志，忌贤妒能，每有反对他的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杨炎体态魁梧，气宇轩昂，瞧不起相貌丑陋的卢杞，因而经常借病不愿在政事堂与卢杞共餐。卢杞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建中二年（781）七月，受命讨伐山南节度使梁崇义的李希烈，由于久雨没有进军，引起了德宗不满。卢杞乘机说李希烈的坏话："李希烈久留不进，是因为杨炎曾建议陛下不重用他的缘故；陛下何必为杨炎一个人而耽误讨伐梁崇义的大事呢？依臣之见，不如暂时免去杨炎宰相，等局势稳定后再起用他。"德宗觉得此话有理，就罢免了杨炎的宰相。

卢杞又利用杨炎家庙临近曲江，进谗言说："曲江附近王气很重，萧嵩曾在那里建家庙，玄宗即令他迁走；杨炎又重蹈覆辙，在那里建家庙，显然是有篡夺皇位的用心。"德宗听后，马上把杨炎由左仆射贬为崖州司马；杨炎快到崖州时，德宗又派人将他于途中勒死。卢杞在陷害杨炎时，把受杨炎排挤的严郢提升为御史大夫。

严郢受卢杞之命，竭力倾轧杨炎。然而，在杨炎被贬死后，卢杞又设计害死了严郢。建中二年（公元 781 年），巡官崔程受徐州刺史李洧委托，到朝中汇报，崔程向宰相张镒作汇报而没有向卢杞打招呼，卢杞心胸狭窄，无法忍受，于是起了把张镒排挤出朝廷的心思。建中三年（782）德宗为了向西部用兵，物色名臣取代朱泚，卢杞觉得这是将张镒逐出朝廷的好机会来到了。于是假惺惺地对德宗说："朱泚名高位重，凤翔军官个个骄横，不是重臣宰相，难以镇服他们，臣愿意前往。"德宗低头不语。卢杞马上接着说："陛下必以臣貌丑陋，不为三军所看重，那就请陛下自定人选。"德宗于是对张镒说："你文武双全，德高望重，是最合适的人选。"张镒心知肚明，这是卢杞排挤自己的圈套，但德宗已经开口，怎么能够拒绝？只好受命而去。张镒离开京都，卢杞就着手把张镒的好友、殿中侍御史郑詹整顿下去。在卢杞捏造罪名陷害忠良之时，郑詹是不敢与张镒公开往来的。每待午睡之际，悄悄来到张镒处，时间一长此事为卢杞发觉。

一天，卢杞假装熟睡，见郑詹来到张镒阁中，就突然来到张镒阁中，郑急忙躲避，卢杞假装不知，说是欲与张镒

商谈机密要事。张镒不得已，只好说："殿中郑侍御史在此。"卢杞假吃惊说："以前我们谈论的事，是其他人所不应该听到的。"这样，顺理成章地将郑詹加上偷听和泄露朝中机密的罪名。

当时，朱泚判官蔡廷玉畏罪自杀，卢杞乘机插手此案，他对办案的人说："郑詹派人监送蔡廷玉，郑詹是侍御史，受御史大夫严郢的旨意。"这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杖杀郑詹，把严郢贬为费州刺史，严郢受不住折磨，死于费州。卢杞一箭双雕，杀死了两人。张镒罢相后，卢杞推荐关播当了宰相。关播优柔寡断，完全受卢杞摆布。

一次，唐德宗和宰相讨论政事，卢杞滔滔不绝，关播不同意他的意见，准备发言。卢杞怒目而视，把关播吓了回去。回到中书省，卢杞对关播说："你平日沉默寡言，我才推荐你任宰相，今天你为什么要发言！"从此以后，关播在公开场合更是沉默寡言、一言不发。卢杞还仇恨太子太师颜真卿。颜真卿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正直敢言，深为卢杞所忌，他准备将颜真卿赶出朝廷。颜真卿是个老臣，知道卢杞心狠手毒。于是，在建中三年（782）八月的一天，颜真卿对卢杞说："我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人，现在我老了，希望得到你的庇护。你父亲遇害，头颅传至中原，我以舌舐面血，就凭这件事你也该对我包容一些。"卢杞听完，表面上客气一番，内心却对颜真颜更加痛恨。

建中四年（783）李希烈勾结叛军朱滔，攻陷汝州，德宗震惊，向卢杞寻问对策。卢杞就推荐颜真卿前去劝说。他说："李希烈年轻气盛，恃功骄傲，只有派德高望重的大臣劝说，他才会改悔。颜真卿历事三朝，忠直刚决，名重海内，是最合适的人选。"德宗认为卢杞所言有理，命颜真卿前往，结果颜真卿为李希烈所杀。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哗变，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不久，宰相崔宁也到了奉天，德宗对崔宁大难相随非常感激。崔宁私下对人说："德宗本来聪明英武，弄到如此地步，皆受卢杞所惑所致。"卢杞听说后，下决心陷害崔宁。崔宁有肾病，受惊必尿频。在逃离长安途中，因为老要下马解手，便落在最后。卢杞就诬崔宁，说崔宁与朱泚里应外合，因此老落在最后。最后，崔宁被宦官当场勒死。礼部尚书李揆，原为宰相。卢杞害怕他再次为相，派他出使吐蕃，当时李揆已七十三岁。他对德宗说："不怕远行，只怕到不了吐蕃就以后再不会见到陛下了。"但是卢杞还是坚持要李揆出使，李揆无奈，只好受命，第二年死于从吐蕃返回途中。大将李怀光，解德宗奉天之围，功劳巨大。他对人说："卢杞是天下大乱的根源，待我见到皇帝后一定请求杀掉他。"卢杞听到后十分恐惧，竭力阻止李怀光见到德宗。李怀光是一个武夫，自认为数千里赴难而见不到皇帝，心中十分不满，一怒之下，带兵来到咸阳，按兵不动。他多次上奏德宗揭露卢杞等人的罪行。

德宗为了安慰李怀光，于建宗四年（783）把卢杞贬为新州司马。一年后，国家大赦，卢杞升迁为吉州长史，不久又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上疏德宗，奏曰："杞穷凶极恶，群臣恨之人骨，六军思食其肉，怎么可以再用？"于是，德宗感到群臣反对，众怒难犯，就任卢杞为澧州别驾。并问众臣道："众人论

杞奸邪，朕何不知?”宰相李勉回答说：“卢杞奸邪，天下人人皆知，独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

贞元元年（785），卢杞死在澧州（湖南澧县）。

【牛僧孺】

（779～847）唐穆宗、文宗时宰相。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在著名的牛李党争中，是牛党的领袖。贞元二十一年（805）僧孺登进士第。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与李宗闵、皇甫湜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得高第。三人策文指斥时政，触犯宰相李吉甫。结果，主考官和复审官都被贬谪；僧孺授伊阙尉，在元和朝不得志。后来，僧孺、宗闵与李德裕（吉甫子）等纷争数十年，这次科场案是个起因。

穆宗即位，僧孺累迁户部侍郎，因拒绝宣武（今河南开封）节度使韩弘的贿赂，获得穆宗赏识。当时，李吉甫的政敌李逢吉为相，长庆二年（822），逢吉排挤翰林学士李德裕出任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引僧孺为同平章事。四年，敬宗即位，僧孺出任武昌军（今湖北武汉）节度使。文宗大和三年（829），僧孺再次入相，德裕出为郑滑（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五年，幽州（今北京）大将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文宗召宰相商议对策，僧孺认为此事无关大局，主张任命杨志诚继任节度使，为文宗采纳。同年，吐蕃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守将悉怛谋降唐，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并奏陈用兵事宜。僧孺认为唐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文宗从僧孺议，命德裕撤退驻兵，送还降将。其实，大和四年吐蕃已违约攻唐，此时，唐已可不受盟约拘束。僧孺对幽州和维州的决策，反映了他一贯妥协反战的思想。文宗后来对维州的处理不免后悔，僧孺也知文宗对他不满，便主动告退，出为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累迁东都留守、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当权，僧孺被罢为太子少师。会昌四年（844），又以交结泽潞（今山西长治）叛藩的罪名，贬为循州（今广东惠州）长史。宣宗即位后，李党尽被贬谪，大中元年（847），僧孺复原官太子少师。同年卒。僧孺好文学，著有传奇集《玄怪录》等。

【冯道】

（882～954）五代时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辽的大臣。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人。

唐末，冯道事幽州刘守光为参军。刘守光败后，冯道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掌书记。后唐庄宗李存勗即位，以冯道为翰林学士。明宗时，为端明殿学士。不久，任相。长兴四年（933），明宗死，闵帝即位。次年，潞王从珂（后为末帝）反，冯道率百官迎之。历闵帝、末帝，冯道并居相位。后晋灭后唐时，冯道为首相，奉石敬瑭命献徽号于契丹。后晋废枢密使，权归中书，大小政事均由冯道处理。石敬瑭曾独召他，欲其辅立幼子石重睿。天福七年（942）石敬瑭死，他改奉齐王石重贵，是为少帝（即出帝）。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契丹灭后晋（次年改国号辽），他为太

傅。历后汉、后周两朝，他皆为太师，后周时又兼中书令。冯道历五朝八姓十一帝，不离将、相、三公高位，容身保位，未尝谏诤。晚年自称“长乐老”，作《长乐老自序》，列叙官爵。他自谓一生中惟一“不足”事，是“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但当有志于统一的后周世宗柴荣于显德元年（954）二月亲征北汉时，他却极力谏阻。

冯道为官，尚无当时官吏贪暴放纵之风。曾对后唐明宗读聂夷中《伤田家》诗，表述农民的痛苦。在他的倡议下，长兴三年，后唐在国子监内校定“九经”文字，雕版印刷，至后周完成，后世称“五代监本”。官府大规模刻书自此始。

【蔡京】

见风使舵　反复无常

蔡京（1047～1126），字元长，福建仙游人。蔡京二十四岁时进士中举。先是做过钱塘尉、舒州（今安徽潜山）推官，以后到京师任职，作考功员外郎、起居郎，还曾经奉命使辽，返回宋朝以后，元丰六年（1083）蔡京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不久又改任为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公元1086年，哲宗赵煦即位，改元为“元祐”。由于哲宗当时年仅十岁，就由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听政。高太后起用了旧党派官僚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重臣执政。司马光等人执政以后，全力废除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全面恢复原来的政策法规，这就是被史学家所称的“元祐更化”。原枢密院知事章惇不同意这种作法，奋起争辩，结果被贬往汝州。蔡京当年也是跟随王安石变法的，此时看到风向已变，就倒向司马光一派。司马光曾经下令限各地要在五天之内将免役法改为差役法，同列大臣都感到时间太短，无法按期完成，只有蔡京在开封日夜催赶，把畿县的雇役改变，没有一人敢于违抗。为此他受到了司马光等人的赞赏，司马光高兴地说：“假使人人执行法令都像你这样地奉公守法，还有什么不可做的事情！”就想提升蔡京。台谏官员弹劾蔡京知开封府时挟邪不轨，破坏国家的法令，他便被贬出知成德军，后改知瀛州，又迁知成都。不久，谏官范祖禹申论蔡京为人不可重用，于是蔡京又被改当江、淮、荆、浙的发运使，以后又改任知扬州。然而司马光等还是认为蔡京可以重用，把他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再次知成都府事。

高太后病死后，哲宗开始亲政。哲宗有志继承神宗革新的事业，改元为“绍圣”，于是原“元祐”的被贬大臣纷纷得到起用，章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在“元祐更化”时被停止的青苗、免役等新法都一一予以恢复，并用蔡卞（蔡京的弟弟，也是王安石的女婿）、林希等人打击守旧派，甚至挖了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已经当上代行户部尚书的蔡京见变法派得势，又一次风云翻覆，竭力支持章惇变更免役法。当时章惇让各部商议怎样更改，讨论了很久还没决定，蔡京揣准哲宗的意图，就说：“只管取熙宁时期的旧法施行罢了，何必再要商议讨论呢？”就这样一句话，使章惇决心废差役而实行雇役。蔡京最初赞成王安石变法，以后又支持司马光恢复旧法，然后又反对司马光帮助章惇，其身手变化之快使朝臣瞠目，



蔡京像

也使有识之士看出了他的奸行。

由于蔡京钻营屡屡得手，被章惇推荐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并成为正式的户部尚书。他曾奉命追究“同文馆狱”，与其弟蔡卞勾结后族，诛杀政敌，受到迫害的有儿千人。当时曾布负责管理枢密院，对蔡京很是厌恶，不断上表告发蔡京的罪行，说他反复奸诈，不可重用。但由于章惇的保护，蔡京没被撤职。

宋徽宗赵佶即位以后，言官御史仍然不断上表弹劾蔡京。徽宗曾经下令将蔡京罢去端明、龙图两学士兼太原知州。蔡京听说以后，到太后面前跪地叩头，乞求不要让他离开朝廷。太后见他可怜，让徽宗留蔡京续修国史，但由于谏臣的竭力反对，徽宗不得已又将蔡京改知江宁。蔡京仍然迟迟不肯赴任，结果被夺职，命令他留居杭州。

结党营私　把持朝政

蔡京在留居杭州时，结识了宋徽宗的亲信宦官童贯。

童贯因巧媚善承，在徽宗面前很得宠。在他奉徽宗的命令以供奉官的身份到三吴地区搜刮书画、珍奇异物时，见到了蔡京。两个人见面以后，谈得十分投机。蔡京也不分昼夜地陪着童贯到处游玩。蔡京擅长书画，童贯就把他作的屏幛扇带回呈献给宋徽宗，得到宋徽宗的欢心，徽宗开始属意于蔡京，不久蔡京得到起用。

徽宗也曾打算有所作为，在拟修新政的时候，正逢左相韩忠颜与右相曾布不和，蔡京便唆使属下人大造舆论，说如果要推行先帝的事业，不是蔡京当宰相不会有所作为的。崇宁元年（1102），在蔡京精心策划的抨击下，韩忠颜和曾布先后被免去宰相职务，七月蔡京被提升为右仆射。徽宗召蔡京在延和殿问政时，赐予表示欲行父兄之志。蔡京表示愿为实现徽宗之志、推行新政的事业尽死效力。这态度使徽宗十分高兴。崇宁二年（1103）正月升为左仆射。

蔡京担任宰相以后，借用权拉培植奸党、安插亲信。童贯因为蔡京出过大力气，接连升为西北监军、观察使、节度使、检校太尉兼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领枢密院事。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同时蔡京又提升了另外两个佞宦梁师成、杨戬。梁师成当上了检校大尉，掌御书号令，他胡作非为，竟敢找人模仿徽宗字体伪造圣旨，就连蔡京父子也要讨好他，时人称梁师成是“隐相”；杨戬也当上了节度使。蔡京重用、勾结了这帮得宠、得势的宦官，也就使自己的宰相职位坐得更稳固。宫廷守卫也是蔡京收买的对象，有了宫廷守卫作亲信，他出入宫门就可以毫无阻挡。从朝内执政、侍从，

到朝外的帅臣、监司，蔡京到处安插、培养自己的亲信走卒。邓洵曾说过蔡京的好话，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中书侍郎（副相）；张康国为蔡京出过力，使让他任到升户部侍郎等等。宋代本来官僚机构就庞大臃肿，冗官、冗吏众多的弊病在蔡京执政时更加急剧膨胀。

为了把权力更集中在自己手中，蔡京在当上宰相的第七天就仿照王安石变法时的三司条例司旧例，设置了“讲议司”，自任提举，任用他的亲信同党吴居厚、王汉之等为僚属。全国的大政方针都由讲议司研究决定。每次商议时蔡京都派自己的僚属三人主办，凡国家的措施都是由这些人制定。蔡京还根据自己官爵的变化随时改变政府的权力结构。他当左相时，就将左右相改称为太宰、少宰；当三公时，便宣布三公为“真相之位”。他怕谏官向皇帝告发自己，就发明了“御避密进”的说法：让徽宗照抄自己起草的稿子，称为“御笔诏”；谁敢违诏议论，就以违旨论罪。这样一来，谏官们为了自身性命，谁还敢直言上谏?

蔡京为了巩固相权，把长子蔡攸安插在皇帝周围，以后升到三公的地位。他还将次子安排成礼部尚书，又将三子钻营成为徽宗的女婿，就这样蔡氏父子把持了整个朝政。蔡攸天天陪徽宗一起游玩嬉戏，并随时按照蔡京的意思用花卉怪石、笼禽槛兽来讨好皇帝。

蔡京的地位巩固后，便开始打击他仇敌。元祐年间他投靠过司马光，但自认为没有得到重用因而怀恨在心，上台后就将司马光、文彦博等一百二十人列为“奸党”，并让徽宗将“奸党的名字在文德殿门前树碑刻石示众。同时他又把哲宗时的旧臣按“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标准划分为正上、正中、正下以及邪上、邪中、邪下六等。结果有五百四十多人被列为邪等。元祐旧臣多被流贬、窜死、迁徙，所剩无几。可是蔡京觉得还是不开心，崇宁二年（1103），他又书写了党籍大碑，称作“元祐奸党碑”，命令各州县仿刻并且放在长吏的厅堂中。为防止自己的政敌互相之间串联，蔡京规定不准在同州居住，党人子弟与被列名的邪等人不准到京师及其附近任官；皇室不准与元祐党人通婚等。蔡京还不断寻找和自己过不去的官员的错误，把他们列名党籍，以便随时罢职远贬。

凡是反对自己的，蔡京都予以残酷迫害。有个名叫方轸的士人，因上告蔡京，被削籍流放到岭南，他与官吏刘逵有怨，就派开封府尹李孝寿为铸钱一案加害刘逵的亲戚，受株连者达千人以上。及后御史沈畸再次审理，秉公昭雪，释放了七百名无辜的人，并感叹地说：“作为天子的耳目，难道可以附全权要杀人以求富贵吗?”蔡京听到后大怒，就将沈畸贬官到信州（江西上饶）。

蔡京深知自己的前程全部取决于皇帝一己的好恶，因而巴结讨好宋徽宗就成了他第一要务。徽宗的所好都可在蔡京那里得到满足；徽宗自己想不到的蔡京也为他设计好了。

为讨好宋徽宗，蔡京提出“丰亨豫大”的说法。丰、亨、豫、大，取自《易经》卦名，意思是国家富，国运亨通，君臣可以快乐的享受。蔡京每次都对宋徽宗说，现在国家的钱币积贮了五千万，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就在蔡京入相的第二年，便开始大兴土木为徽宗

营造宫殿苑囿，几年中先后造成了景灵宫、延福宫、九成宫、元符殿、保和殿、福宁殿、明堂、艮岳山、曲江池等多项工程，其中尤以“艮岳”工程规模最为宏大。艮岳层峦叠峰，千奇百态，最高一峰高九十步，上有介亭，东西二岭，南邻南山，北接景龙江，山外造鞭蓉城，山北挖曲江池。在深山之中，林卉密布、麋鹿成群，花竹异石、楼阁台榭不可胜数。在施工期间，童贯等五人亲自分任工役，竞相以侈丽高广夸耀。不久蔡京又揣摸了宋徽宗的意旨，在朝廷设立了造作局，在苏州设立应奉局，征购全国的奇花异石以点缀皇室。奸臣朱勔父子在南方，不管见到谁家稍有奇石异木就指为御前用物，就这样把民间的巧石掠夺一空。有时石大门小，就拆门毁墙弄出。运送花石纲的役夫数以千计，沿着淮、汴两河北行，所经过的州县也都苦不堪言。运一块石头入京的费用是三十万贯，有多少民户为此倾家荡产。蔡京又别出心裁，让苑圃仿照江南村居野店，收集了各种珍禽异兽放养在内，一到了夜间，兽鸣邻惊，宛如身处在山林陂泽之间。

宋徽宗号称多才多艺，除了在治国方面一窍不通外，凡是声色狗马、琴棋书画无所不喜欢。蔡京因为皇帝喜好时乐，不喜欢旧乐，就让人把旧律旧乐进行了改造。徽宗听后非常高兴。从此又建立音乐机构“大晟府”，派蔡攸主事。

蔡京自己的生活也是挥霍无度、极为奢侈的，他姬妾成群，日有声色。蔡京喜欢吃鹌鹑羹，每吃一次要杀掉几百只鹌鹑。有一次蔡京请“讲义司”的几百名官吏吃饭，叫厨师做蟹黄馒头，每个成本就达一千三百多贯。蔡家的厨师分工很细，有的只管切葱花，有的只是报菜名。报菜名时叫到“菜羹”时，因发音与“蔡京”相近，要改叫羹菜。蔡京的豪华摆排，引得徽宗七次登门做客，花石纲虽然是打着皇帝的旗号，但实际入帝苑的花石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大部分成了蔡京、王黼等人的私产。蔡京的府第在城东，周围几十里，为建“西园”又毁掉了几百间民房。事后蔡京问西园与东园相比哪个最好？家仆焦德回说：“东园树木繁茂，望之如云；西园拆屋民苦，泪如雨下，可以称为东园如云，西园如雨。”

蔡京作生日，让天下州府都要进献金钱方物；因其数量过多，必须以每十船编为一纲，称作“生辰纲”。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说的就是此事。生辰纲、花石纲，吸尽了百姓脂膏，北宋统治者灭亡的日子为期不远这是毫不奇怪的。

宋徽宗、蔡京君臣上下大造人间乐园，大肆挥霍，钱从哪里来呢？这就是蔡京搜刮百姓为宋徽宗立的功。

蔡京为满足徽宗骄淫侈奢的需要，从民间巧取豪夺掠夺了大量的财富。蔡京当宰相以后，打着恢复王安石变法的幌子，但蔡京的目的是在为己聚敛财富，其变法与王安石是大相径庭的。如，蔡京恢复了方田法，原先是王安石增税的措施，蔡京论为它能“步亩高下，方丈不可隐”，有利于捞财，于是便托词是先帝“遗志”让民纳税，结果有的势力的人家借机瞒田，造成新税不均，地少的人家反而要负担起瞒田者的税款；王安石役法的本意是解决百姓的疾苦，蔡京却以此大刮民财，而且将官户所减收的钱均摊到平民百姓头上，加重了贫穷

百姓的负担。

蔡京执政时，铸钱十分混乱，当十钱、小平钱来回改变，铁钱、夹锡钱不断变动，吃亏者自然还是贫苦百姓。食盐自古都是由政府垄断专营。蔡京为了搜刮民财，频频改动盐钞法。他要盐商把钱交给中央，换取“盐钞”后再到地方买盐，这样盐的利润就归中央所有。但因盐钞经常更换，往往要多花几倍的钱，不仅是一些商人破产，许多贫苦百姓也深受其害，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蔡京却通过盐钞法增加了很多收入。此外还推行榷茶法、增价折纳法、和籴法等，都是要把钱财集中到朝廷手中；为了捞取钱财，甚至规定出官价，公开卖官鬻爵，“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北宋末年，社会相当黑暗。宋徽宗在位时，更是乌烟瘴气，他不信忠良，专佞蔡京、童贯、王辅、朱耐、梁师成、李彦六个奸贼，致使国家丧乱，黎民荼炭。当时有首民谣说：“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可见当时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

被贬儋州　恶贯满盈

蔡京在相位上曾有四次升贬：第一次是崇宁元年（1102）七月任右仆射，第二年（1103）年正月升为左仆射，崇宁五年（1106）二月被免职；第二次是大观元年（1107）正月任左仆射，大观三年（1109）六月第二次被免职；第三次是政和二年（1112）五月宋徽宗让他在家“知仕”，三天一次到都堂议事，宣和二年（1120）又勒令其退职；第四次是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徽宗又诏他负责三省政务，但上任不到四个月，宣和七年（1125）四月就被挤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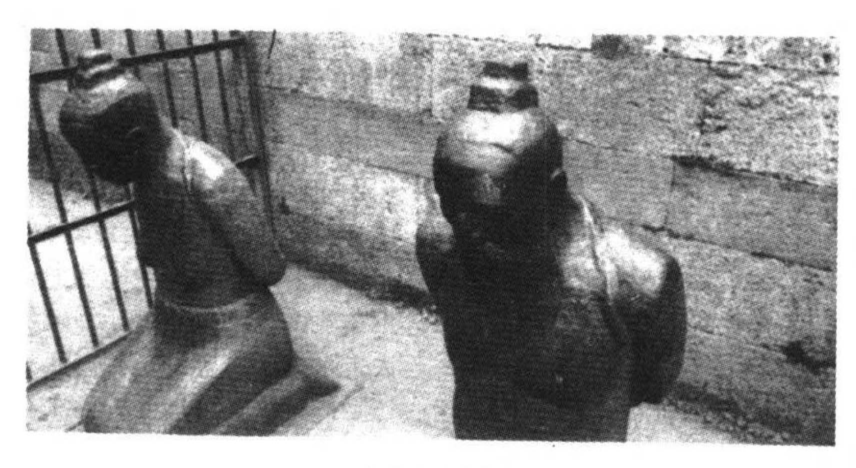
蔡京任相二十多年，坏事做尽。他既是徽宗的亲家，又是徽宗的宠臣，他使宋徽宗的进一步昏庸，不理朝政，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位期间，精心培植私党、安插亲信，使朝中各个要害部门执政的都是他的同党。每当他贬官或致仕（退休），总是有人为他讲话说情，不久就得以复职，而且每次复职都还扩大了权力。即使是一时离开相位，朝廷还是按照他的意思办事。在蔡京一伙的胡作非为之下，整个北宋政权濒临崩溃边缘，及后金兵进侵，如摧枯拉朽，也是不奇怪的了。宋钦宗即位以后，北宋政权边疆形势一天天地告急。蔡京把他的全家全部迁往南方，自为求全之计。天下之人把蔡京列为六贼之首，侍御史孙觌等人也开始严厉地陈述、声讨蔡京的奸恶作为。于是，朝廷就以秘书监分司南京，接连贬蔡京为崇信、庆运军节度副使，把他安置在衡州潭州时死去，时年八十岁。天下人因他未受到国法的制裁而扼腕痛恨。

【秦桧】

天资狡险　两面三刀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市）人。

少年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其父秦敏学作过县令。秦桧少年曾经拜汪伯彦为师，以后人大学就读。因他善于干一些跑腿的小事，同学每次出外游玩时都事先让秦桧筹划操办，因此得了“秦长脚”的绰号。政和五年（1115）二十五岁的秦桧考中进士，补密州（山东诸城县）教授，任太学学正。秦桧的妻子王氏是北宋名臣王珪的孙女，王氏的亲



秦桧夫妇跪像

姑夫就是曾任枢密使、又是徽宗郑妃堂兄的郑居中。夫以妻贵，尽管秦桧只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却和许多达官显宦有密切的往来。秦桧自小“天资狡险”，又从汪伯彦那里学得一套玩弄权术的本领，以致于在朝廷中很吃得开。

靖康元年（1126）初，金兵大举南侵，包围汴京，派出使节提出割占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的要求。当时朝内分别以李邦彦、张邦昌和李纲为首形成了主和、主战两派，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宋钦宗虽然迫于形势起用了李纲，但内心却倾向于割地求和，苟且偷安。善于观颜察色的秦桧见有机可乘，一面上书提出反对割地等主张，给自己加上抗金派的桂冠；一面又和掌握实权的主和派打得火热，以此博得了两派的好感。不久，李纲等人被排挤出朝，秦桧却步步高升，从职方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升到左司谏，并很快在投降派大臣李回等人的推荐下爬上了御史中丞的要职。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兵再度南侵，汴京失守，徽、钦二位皇帝被金朝军队俘虏而去。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军统帅让宋朝大臣推立异姓为主的命令。留守王时雍等人召集百官与军民共同商议推立张邦昌，于是张邦昌就成了金人的傀儡皇帝。金人的行径遭到许多人的抵制和反对，监察御史马伸慷慨激昂地对众同事说：“我们的职务就是谏官，岂能坐视而一言不发？我们应当共同提出奏状，要求保存赵氏为皇帝。”身为御史台头目的秦桧在下属们的要求下，便写了一封书信送到金营。他在书信中首先表白自己并非仅仅忠于赵宋王朝，此信的目的也是为金朝着想，指出宋朝建国已久，地域辽阔，号令一统，根深难拔，而张邦昌只是一个一名不见经传的庸人，本来就为天下人所憎恨，如果他当皇帝，人民必然共起而诛之。但如果金朝恢复钦宗的皇位，则对各方都是有利的。秦桧的这番举动使他得了赵宋王朝“忠臣”的称誉。书信送出不久，秦桧被押到了金营。

很显然，秦桧反割地、反张邦昌仅仅是一时无奈的冲动之举，当他沦为金兵的俘虏之时，很快就变节投降。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北宋俘虏都被囚禁、役使，甚至残暴惨杀，唯独秦桧不但未受一点折磨，反而得到重用，被赐给金

的左监军挞懒"任用"。蒙受如此殊遇，秦桧自然受宠若惊，感恩戴德，于是卖力效劳，从而换来主子的青睐，粘罕曾赐他钱万贯，绢万匹，金太祖的四太子兀术也专门宴请过秦桧。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兵再次攻南宋时，秦桧就已经成为挞懒部的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

内奸贼予　窃居相位

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申辰日，秦桧和妻子王氏以及婢女奴仆一家人从金军中夺取涟水军水寨的船从海返回宋高宗赵构的驻地。丙午这一天，秦桧拜见宋高宗。丁未日，秦桧被任命为南宋的礼部尚书，并接受皇帝赏赐给他的银帛。

秦桧返回南宋朝廷时，他自称是杀死了看守他的金人以后登船逃来的。朝臣们多数人都说秦桧同孙傅、司马朴等人一起被金军拘禁，而怀疑秦桧一个人独自归来；另外，他们又认为从燕地到楚地有二千八百里，跨越黄河大海，难道就没有责问秦桧的人？怎么会让他轻易杀死看守人而顺利南逃？即便秦桧被迫跟随挞懒从军，金人放他回来，他必定要把他的妻子亲属扣留为人质，怎么可能让秦桧和妻子王氏一起回来？对此秦桧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但他昔日的老相好宰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李回却极力为他辩说，既奏其忠又荐其才，宋高宗对秦桧也极为重视，第二天就亲自召见了他。秦桧一见高宗就首先提出："如果想求得天下安然无事，宋金二朝就要划归各自的领地，南自南，北自北，互不干扰。"同时首奏自己草拟的、送交挞懒的求和书。宋高宗说："秦桧朴实、忠诚超过了一般的人，我得到他后，高兴得晚上都睡不着觉。"高宗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不久擢参知政事。

以后秦桧的目标就是图谋相位，保证其议和投降阴谋的落实。当时的宰相范宗尹，秦桧表面上虽尊重他，暗地里却想方设法排挤他下台。范宗尹原来的宰相位缺空了一段时间，秦桧憋不住了，到处放出风声说："我有二条计策，可以轰动天下。"别人问他为何不讲，他露骨地回答说现在没有合适的宰相，因此无法实行。后来他干脆对高宗说："如果用我当宰相，我有耸动天下事。"秦桧所谓的两条妙计，其实就是南北的士大夫互相联系和将原来山东、河北的人送回北方，实际就是"南自南，北自北"投降方针的具体实施。宋高宗为早日达成和议，遂在绍兴元年(1131)八月任秦桧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也就是将国家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了他。

秦桧上台以后，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设法把左宰相吕颐浩排到镇江去建立起都督府，专掌军事，一面设置了"修政局"，自任提单，收罗党羽，安插其中，逐步培植自己的力量。秦桧刚担任宰相的时候，凭借过去所谓"存忠赵氏"的经历，欺世盗名，的确迷惑了不少人，人们以为他一定能够完成拯扶宋室的重任。然而，一年下来，秦桧除了一些行政事务以外，主要是不遗余力地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斥异己。他的所作所为激起朝官士人的强烈抨击，所谓二策也招致了广大军民的纷纷反对，连宋高宗也因和议并未迅速达成而对秦桧表示不满。于是，在吕颐浩的反击和御使黄龟年的弹劾之下，宋高宗迫于舆论，在绍兴二年(1132)八月罢免了秦

桧的宰相职位，把他贬为观文殿学士，负责江州的太平观里的事务。

秦桧被罢相位之后，人虽赋闲，但贼心不死，时刻图谋东山再起。绍兴二年之后，金兵在陕西中原战场上打了败仗，局势向有利于南宋的方向发展，金朝被迫又重弹和议老调，这也正中一向期望和议的宋高宗的下怀，在他心目中，秦桧始终是他“诚实可倚”的得力助手，于是秦桧又被重新重用，绍兴七年（1137）正月，拜秦桧为枢密使，又有了相当宰相的权力。

秦桧的再次出山，得益于右相张浚的牵引，但身为宰相又是抗金派的张浚自然又成了对秦桧的绊脚石，秦桧再次暗中捣鬼，使张浚因委任将帅措置失当引咎辞职。张浚原先对秦桧评价很高，认为他在靖康中建议立赵氏，忠诚可靠，有办事能力，可与共天下事。但经过几个月的共事使他看清了秦桧奸诈阴险的嘴脸。这时候高宗有意立秦桧为宰相，却又怕群臣反对，便试探地问张浚的意见，张浚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我与他在一起共事，始知秦桧的阴暗。”高宗只好改任赵鼎为相。张浚的态度更激起了秦桧的忌恨，当张浚被流放岭南时，赵鼎等人奋力营救，秦桧非但默不作声，反而以造谣诬陷的手法离间原本亲密的张赵关系，他对赵鼎说：“皇帝召见你为相，但张浚却从中进行阻挠。”一句话既使赵鼎不满于张浚，又改变了他素来讨厌秦桧为人的看法，收得一箭双雕之效。此后，秦桧表面上极力奉承赵鼎，一切都按赵的意思办理，骗取了赵的进一步信任，在赵鼎支持下，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再次被宋高宗任命为右相。几个月后秦桧就设法将赵鼎排挤出朝，这样朝政大权也就完全落入了秦桧手中。晚年赵鼎和张浚在福建相遇，谈及此事时，二人才知道当时他俩被秦桧出卖了。

残害忠良　惨杀岳飞

秦桧从再次任相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死去时为止，一直窃居相位达十八年之久，能够如此久居相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够迎合高宗苟且偷安的心理，坚决贯彻宋高宗一贯奉行的和议投降国策，倡行和议，卖国投降，并因此得到金朝主子的支持。

复相不久，秦桧就相机对高宗说：“朝廷臣僚畏首畏尾，多持两端，这些人不足以与他们决断国家大事。如果皇帝陛下决定想与金人讲和，乞求陛下专与我商议，不要允许其他群臣干预。”高宗虽当即表态同意，但秦桧还怕高宗以后会在人们的反对下变卦，就说等高宗考虑臣三天后两人再谈。三天以后，高宗表示求和的愿望非常坚决，秦桧还怕有变。而当高宗又考虑了三天，表示与金人讲和的思想已经确定不移了，于是掏出文书给宋高宗。要求皇帝决定同金朝讲和，不许朝廷群臣再进行干预。

绍兴八年（1138）十月，张通古、萧哲等使臣携带金熙宗的诏书来南宋议和。他们不仅要求沿途南宋的州县守臣对金朝的诏书以臣子的礼节来迎接他们，到了临安那天，而且要求宋高宗也要像金朝臣子一样“再拜亲爱之”。这遭到了南宋广大爱国臣民的强烈反对。秦桧生怕得罪金人，要求宋高宗同意行跪拜礼。消息一传出，京城内外民众群情激愤，军士甚至要兵变，夜间街头上贴出指责秦桧为金间谍的传单。迫于南宋军民的压力，金使也不得已接受了高宗、

秦桧的变通办法，由秦桧代理冢宰接受金朝的国书。秦桧便在三省、枢密院官员的陪同下，来到金人下榻的馆驿，跪拜在金使脚下叩头，接受了金朝诏书。这次宋金议和达成的条款规定：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纳银、绢各五十万两、匹；金则归还河南、陕西之地。根据这个和约，南宋实际变成了金的属国，宋高宗也做了金的儿皇帝。南宋军民遭此奇耻大辱，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但高宗和秦桧却大庆其功，命令百官进表称贺，大赦天下。

在南宋朝廷庆祝和约的欢呼声还未停歇的时候，金朝内部主战派首领兀术等人重掌实权，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他们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和约，兵分四路，大举南侵。金兵的进攻很快遭到了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刘琦、韩世忠等的猛烈还击，宋军在正面战场上连连得胜，而此时在北方敌后的义军也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金斗争；两者相互配合，形成了对南侵金兵的内外大包围，兀术惶惶不可终日准备撤兵北归了，抗金形势一派大好。

然而，抗金仅是高宗的权宜之计。当金南犯，对其统治构成威胁时，他就不得已而支持抗金；而当军民将士的浴血奋战维护了他的统治之后，他又担心这种抗金力量的壮大会使将领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对他形成另一种威胁，因而他时刻提心吊胆，加以限制。高宗的做法成了秦桧破坏抗金、迫害忠良的保护伞；随着抗金斗争的发展，秦桧的捣鬼也就更为残酷、不择手段了。

抗金战场上战斗力最强、最勇猛、战功最为卓著的是岳飞率领的“岳家军”，秦桧捣鬼的主要目标自然也就对准了岳飞。为削弱岳家军的力量，秦桧施出极为阴险毒辣的手法，首先唆使高宗下诏，命本来与岳飞协同作战的刘琦、张浚部调回淮南，使岳飞陷于孤军深入的境地，这是借刀杀人、假金兵之手消灭岳家军的阴险一着。岳飞的雄才大略未使这一阴谋得逞，即便是孤军奋战，岳家依然取得了郾城、颖昌大捷。秦桧一计不成又施一计，让高宗连降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班师南撤，使岳飞抗金的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秦桧深知，要想从根本上清除投降议和的障碍，必须除掉手握兵权的岳飞等抗金将领。绍兴十年（1140）四月，秦桧秘密奏请高宗把韩世忠、张浚、岳飞三人召到临安，名义上是认功行赏，分别授予三人枢密使、副使的职位，实上是剥夺了他们的军权。这一个人当中，抗金最奋力而且反对投降最坚决的是岳飞。岳飞自小献身抗金，驰骋半生，戎马倥偬，为抗金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岳飞像

他自然成了秦桧的眼中钉、肉中刺。秦桧认为岳飞不死，终将阻碍和议，对自己不利，必须杀之以后快。他首先指使党羽对岳飞进行造谣中伤，说他率次违抗诏旨、沮丧士气、妄自尊大，迫使岳飞上章辞职。紧接着又唆使张浚诬陷岳飞的旧将张宪谋反，并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收买了张宪的部将王俊，伪造张宪谋反的证据，最后将所谓“十恶不赦”的罪名硬加在岳飞头上，在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将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逮捕，下到大理寺狱中，刑讯逼供，百般折磨。最后终于在当年十二月将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狱中，岳云和张宪也被杀于都市。岳飞被害的噩耗一传出，天下人无不认为这是奇冤，为之痛哭流涕。

诛杀无辜　肆虐放纵

秦桧为巩固自己的权势，进一步控制南宋朝政，迫害异己，消灭政敌，就是他任相以后的主要目的。凡是不逢迎他，或对其职位构成威胁的人，都成为他打击陷害的对象。张浚被秦桧排挤出朝廷以后，依然持念国事，上疏揭露秦桧的阴谋伎俩，秦桧因此更为耿耿于怀，遂即免去张浚节度使的闲职，把他贬到连州（广东连县），又贬到永州（湖南零陵），此后一再加以迫害。赵鼎被贬之后，秦桧始终不放过他，找不到新罪状，就翻捡出赵鼎当年曾反对和议的旧账，让高宗降了让赵鼎永世不得翻身的旨意，不久又将赵鼎流放吉阳。秦桧还嫌不够，下令当地官吏每月报告一次赵鼎的一举一动，赵鼎被逼不过，绝食而死。当时在朝廷，人们那怕只言片语得罪了秦桧，秦桧就绝不轻饶，加以迫害。右武大夫白锷被刺配充军、胡舜陡被下狱致死、张九成的被贬等都是因不小心，话语之中得罪了秦桧。

秦桧诬陷的手法极其阴柔险恶，他有时通过自己操纵的台谏弹劾政敌，而证据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无有君心”，罪名是可以随心所欲捏造的。有时他还亲自书写奏疏交给爪牙出面代奏，人们一看便知这是秦桧的笔法。秦桧居心叵测，凡是和朝臣在高宗面前发生争执时，他往往并不极力辩解，而是最后以只言片语把对方一概打死。有一次，秦桧和李光有争持，李光说了许多针对秦桧的意见，秦桧沉默不语，等李光说完后，他才慢悠悠地摔出了一句“李光没有人臣之礼”，言外之意是不尊重皇帝。就这一句话使高宗对李光大为不满。秦桧还大搞恐怖政治，他的走卒布满京城，官吏百姓稍微说几句不满的话就有可能立即锒铛入狱。

在排斥异己钳制舆论的同时，秦桧还竭力培植党羽，搜罗亲信，凡是依附自己的人立即予以任用，即使是品德下流的不肖之徒，一言契合，立刻授与高官巨职。朝散郎王扬英会迎合秦桧的旨意上书举荐秦桧的儿子秦熺为相，秦桧就“报以桃李”，推荐王扬英知泰州。其他像孙近、詹大方等人都因卖身投靠而相继跻身政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秦桧处世的哲学。即便对于其亲信爪牙，也是生杀予夺，随心所欲，用得着时甜言蜜语，收买拢络，用不着或稍有猜忌时，狠下毒手，六亲不认。郑刚中曾因对秦桧歌功颂德被提拔为监察御史，后出任四川宣抚副使，只因处理一件事情未请示秦桧就直奏高宗，惹恼了秦桧，把郑刚中一贬再贬，最后凌虐而死。一

些亲信党羽为秦桧出谋划策，跑腿出力，被授与高官之后，在秦桧的威慑下，都不敢说话，成为秦桧的陪衬。即使这样，秦桧仍然不会让他们久在其位。在秦桧独相期间，先后用过二十八个执政副职，还企图让其子子孙孙永保富贵。绍兴十二年（1142），他指令科举考官将其儿子秦嬉录取为状元，及后秦熺步步高升，不出三年就当上了知枢密院事。秦桧还想让孙子秦埙也当状元，绍兴二十四年（1154），将其亲信魏师逊、汤思退任为主考官，这些人一看到秦埙的试卷就得意地说："这一下我们可以富贵了！"于是共同作弊，将秦埙定为第一名，只是到殿试时由于高宗看到秦埙策问试卷上的话语的都是秦桧和秦熺的语言，才将他降为第三名。秦桧姻党的的二个儿子周夤、沈兴杰也都在这次考试中得进士头衔。秦桧另外的几个孙子，大的不过九岁，小的尚在襁褓之中，也被赐为"三品服"。秦桧父子亲党就这样布满了朝廷，成为显要人物。

秦桧替金朝作内奸，实现了金人"以和议佐攻战"的目的，金人因此也十分感激他。绍兴十一年签订定和约时，金朝坚持要在盟书中写上"毋得擅易大臣"的条款，肆无忌惮地要求南宋王朝永远保住秦桧的地位。秦桧于是"外有女真以为援引，内有群奸以为佐命"，像只蜘蛛一样在朝野上下到处结满了他的专政之网。他暗中结纳了宫廷内侍以及医师王继先等，让他们留意和观察宋高宗的动静，将高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要求天下郡县所上的奏章必须先由他处理，没有一件能直接送到皇帝面前。有一次，高宗觉着不对头，就问秦桧："最近国中难道什么事情都没有？"



宋高宗赵构像

秦桧说："从您面前的奏章可以看到。"其实高宗面前已经见不到多少奏章了。高宗也慢慢地看出了秦桧欺君罔上的行为，他曾对人说过秦桧任意所为，不想让自己知道天下事，但明知被架空，高宗此时也只能作无可奈何之状了。当时衢州爆发了俞八领导的农民起义，秦桧没有报告高宗，而是擅自派兵前去镇压，高宗的儿子晋安郡王赵昚（即后来的宋孝宗）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高宗，高宗大惊，质问秦桧，秦桧回答说是这件事不足给皇帝添麻烦；等平以后会再报告。退朝后秦桧马上追查消息来源，知道是赵昚告密后，竟以居丧期不应当发给俸禄为由，用每月扣除赵昚二百缗的薪俸的办法来对其示威，高宗也没办法，只好用内帑进行补贴。一个宗室亲王尚且如此受到秦桧的威逼，一般人就更不敢轻议其非了。因而一时间献言者不是称颂秦桧的功德，就是攻讦秦桧的政敌。即使有所建议，也惟恐触犯秦桧的忌讳，畏言国事，只能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语了。

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高宗和秦桧把向金朝贡纳银、绢各五十万两、匹的负担全部强加到了南宋人民头上。秦桧的政敌在各地增加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如两浙州县百姓要缴绵、绸、税捐、茶捐、杂钱、白米等杂税，有的一亩地要缴纳到四五斗；湖南有土户钱、醋息钱、曲引钱等，各色不一。秦桧当相之后，又秘密要求各地暗增民税近一倍，南宋的老百姓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宋高宗实现了苟且偷安、偏安一隅的夙愿，为了表彰秦桧，对他步步加封。绍兴十一年六月，拜左相、封庆国公；次年九月加太师，进封魏国公。同年十月，又进封秦、魏两国公，只因秦桧觉着这两个封号与蔡京、童贯相同，不大光彩，就请改封其母为秦、魏国夫人。高宗对秦桧的物质赏赐更为优厚，金银财宝不可胜计，后来还把占田三顷，年收租三万石的永封圩赐给了他。

秦桧独霸朝政，在政治玩弄权术，在经济上大肆聚敛财富。他大发国难财，绍兴十年（1140），以为宋金战争中的将士预备犒赏为名，向百姓计库征钱，贫民也不能豁免。然而这批钱款全被秦桧自己中饱私囊。秦桧每逢生日，必然让各州县贡献财物为他祝寿，这笔钱每年多达几十万。地方官给他写信一般都要或多或少地捎上些礼物。秦桧还公开卖官鬻爵，监司帅守等大员进见时，都要送钱送物，没有几万贯是得不到新差事的。秦桧家门庭若市，各地运送贡献的黄金、白璧、明珠、大贝、象犀、锦绫等珍奇物品的车子塞满了街巷；各地来的送礼的车船首尾相连，水陆并进，昼夜不绝。外国进贡的珍宝，直到秦桧死后还在上门。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竟富可敌国。秦桧家搞一次宴会就花掉数万钱，一件衣服只穿几天就当废物扔掉，奢侈铺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秦桧贪得无厌的榜样的影响下，各地官吏除了盘剥百姓、媚奉秦桧以外，自己也纷纷效仿，各显神通，竞相聚敛搜刮。南宋赃官恣意横行，百姓日益贫困，就是当时严酷的现实。

作恶多端的秦桧激起了人民的仇恨和憎恶。绍兴十二年（1150）正月，在秦桧乘轿上朝的时候，殿前司后军小校施全手持斩马刀，埋伏在望仙桥下准备刺杀秦桧，可惜只砍断了桥柱。施全被捕后，慷慨激昂地怒斥秦桧："举国上下都与金为仇，只有你一个人想投降，所以我要杀你！"秦桧作贼心虚，此后每逢外出都要带五十名武装士兵保护自己。

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十月二十二日，六十六岁的秦桧因病结束了自己的罪恶生涯。

【贾似道】

无赖之徒　官运亨通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浙江临海）人。其父贾涉，秉性狡诈，生活腐败，善于阴谋诡计、挑拨离间。贾似道少年时，一度落魄，游荡放浪，饮酒赌博，不务正业，他秉承了其父的邪恶卑鄙奸诈，熟习权术，轻浮浪荡。后以父荫补为嘉兴司仓，当一名管仓库的小官。他的姐姐被选入宫后被理宗所宠爱，当上了贵妃，贾似道因为这一裙带关系，成了国舅爷。嘉熙二年（1238）贾似道应召赴临安廷对，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居然一举中了进士，被提拔为太常丞、军器监。以后贾似道更加"恃宠不检"，举措行止无异于市井无赖，每天纵情出没于妓院，有时到夜

里还与妓女燕游于西湖之上，常常通宵达旦，整夜不归。宋理宗有一天夜里登高远望时，见西湖中灯火通明，他告诉左右的侍从人员说："这必定是贾似道一行在游乐吧？"第二天一打听，果如所料。于是理宗派京尹史岩之前去劝戒。史岩之岂能不知道贾似道的身份地位？不但不敢得罪，还是替他美言回护，归报理宗说："似道虽有少年习气，但他的才能是可以重用的。"

品行不端，淫邪放荡，丝毫没有影响贾似道的亨通官运，他被派到澧州（湖南澧县）担任知州后不久，淳祐元年（1241 年），便改为湖广总领；三年（1243 年），加户部侍郎；五年（1245 年），以宝章阁直学士的身份担任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安抚使。一年之中，再迁任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而且"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九年（1249 年），加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十年（1250），又以端明殿学士身份移镇两淮，这时贾似道才刚刚三十多岁。宝祐二年（1254 年），他被召回朝廷，加知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威权日益炽盛。

贾似道当时的权势之大，从下面一件事就可以充分说明。孙子秀刚被朝廷任命为淮东总领，外面就有人传言，贾似道已密奏皇上说孙子秀不可当此大任。丞相董槐听到风声，不辨真假，心中忐忑不安，赶快向理宗核实此事，理宗说没有这回事，但董槐却终究不敢派遣孙子秀，最后代之以与贾似道关系不错的陆壑，才算了结此事。堂堂一个当朝宰相竟对身居自己的下属的贾似道畏惧到如此地步。宝祐四年（1256 年），贾似道当上了参知政事。五年（1257 年），又升为知枢密院事。六年（1258 年），改任两淮宣抚大使。几年间，出将入相，一个街痞无赖就达到如此显赫的地步。

议和称臣 "抗蒙功臣"

端平二年（1235 年），蒙古贵族灭亡金朝后，挥兵直指南宋。宝祐六年（1258）春，蒙哥汗亲镇四川，派其弟弟忽必烈进攻鄂州（今武汉附近），元帅兀良哈台由云南自交广北上，破湖南，准备与忽必烈会师鄂州，直奔杭州，消灭南宋。

宋理宗闻报大惊，命令赵葵驻扎在信州（江西上饶）抵御来自广西方面的蒙古兵，命令贾似道驻扎在汉阳进援鄂州，并在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鄂州的战斗十分激烈，开庆元年（1259）十月，城东南角被蒙军攻破，守军派人再次构筑工事，不久又被蒙古军队攻破，幸亏宋将高达率部拼死抵抗，才免于陷没。到十一月，城中宋军伤亡已达一万三千人，形势十分危急。在守城将士英勇战斗的时候，身为统帅的贾似道却被蒙军的声势吓破了胆，秘密派宋京前往蒙营请和称臣，纳帛币，遭到了忽必烈的拒绝。不久，蒙哥汗在合州（四川合川）钓鱼山被宋将王坚的炮石击中，重伤而死，王坚将这个好消息派人急流快船飞报鄂州，但胆小如鼠的贾似道不顾大好的抗蒙形势，再次遣使输币求和。此时忽必烈了为急于北归争夺汗位，便接受了贾似道的乞求：南宋称臣，割江南为界，岁奉银、绢各二十万两匹。这时兀良哈台也奉命北归，蒙将张杰在新生矶搭制浮桥接应兀良哈台。第二年正月蒙军主力安然北撤以后，贾似道才接受手下刘整的计策，派兵截断浮桥，袭杀了 170 多个蒙军的殿后士兵。

鄂州解围之后，贾似道隐瞒了议和称臣输币的经过，向朝廷献上几个俘虏，声称蒙古军队全被消灭。被蒙在鼓里的理宗还认为贾似道对宋朝社稷立下天大的再造之功，景定元年（1260）三月，以少傅、右丞相召贾似道回朝廷，命百官郊迎犒劳，就像过去宋朝对待文彦博时一样。四月又进封贾似道为少师、卫国公。贾似道还朝之后，一面授意新信廖莹中等撰写《福华编》大颂鄂州之功以标榜自己；一面又偷偷地将元朝派来递交国书、索要岁币的使臣郝经拘留在真州（江苏仪征）忠勇军的兵营中，进一步掩盖自己的乞和勾当，全国上下都还不知道贾似道已经暗中与蒙古政权讲和。

肆行威虐　权倾朝廷

贾似道坐上相位之后，大权在握，更加专横霸道，不可一世。他穷凶极恶，诬陷打击那些曾与自己有矛盾的人。原先他在汉阳的时候，蒙古军队曾攻到潭州（长沙市），江西大震，丞相吴潜采纳了监察御使饶应子的意见，把贾似道派往黄州（湖北黄冈）防守。黄州虽地处下流却是要冲重镇，贾似道在途中遇上一股蒙古兵，害怕得要死，他哀叹道：



宋理宗像

“这一下要死了，可惜死得窝窝囊囊。”这批蒙古兵都是些老弱病残，很快就被宋军歼灭，即使如此贾似道还认为这是吴潜在害他，要把他置于死地，从此便对吴潜怀恨在心。还朝以后，贾似道听说吴潜在事件紧急时常先斩后奏，理宗打算立荣王之子赵孟启为太子，吴潜曾经反对过，理宗已经对吴潜相当不满。贾似道趁此时机一面公开赞成理宗立储的作法，一面唆使爪牙沈炎弹劾吴潜措置无方，致使全、衡、永、桂四个地方全都被敌人攻破，朝廷下令，把吴潜泛到循州（广东龙川），并将所有追随吴潜的大臣都扣上“党人”的帽子，贬出朝廷。在鄂州时，将领曹世雄、向士璧曾经对贾似道的行径表示过轻视。贾似道就给他们加上“盗取官钱”的罪名，贬谪到边远穷困的地方去，最后迫害致死。贾似道为了独揽朝政，还设法将理宗向来宠信的宦官内侍董宋臣、卢允升及其党羽贬黜出朝，禁止他们干预朝政。贾似道还任意更改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用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从此，贾似道权倾中外，进用群小。取来先朝的旧有法制，任意改变，增加了吏部七司法。买公田以罢和籴，浙西地区有每亩价值一千缗的田地，贾似道均以每亩四十缗买来。台谏、布韦都上书奏请，说这公田不方便民众，导致民间愁怨。贾似道上书辩解，而且乞求罢政。宋理宗挽留了他。有太学生萧规、叶李等上书朝廷，揭露贾似道专横，贾似道命令京兆尹刘良贵收集他们的罪行，把他们刺字发配流放。后来，贾似道又实施推排法，江南地区的土地、尺寸都要上税，老百姓贫穷，破家荡产，妻离子散。有人写诗讽刺道：“三分天下二

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贾似道还发行了新纸币金银会子，以一比三的兑换率取代不断贬值的会子，以聚敛民财，结果搞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后来贾似道甚至曾下令禁止京城妇女佩饰珠翠，都要以琉璃来代替，当时传出民谣说：“满头都是假，无处不琉璃。”所谓“假”是暗指贾似道，“琉璃”即流离的意思；民谣充分反映了在贾似道的黑暗统治下南宋人民的悲惨遭遇。

景定五年（1264），宋理宗病死后，贾似道拥立宋度宗即位。度宗对贾似道感激涕零感恩戴德，两人相见，不行君臣之礼，每逢贾似道朝拜，度宗必定回拜，并且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师臣”；满朝文武大臣也跟着称贾似道为“周公”。贾似道从此更加目空一切，气势嚣张，甚至将皇帝把玩于手掌之间，如同玩偶，恣意戏弄。他动不动以辞职为名，要挟度宗。理宗刚埋葬，贾似道就一方面佯装要辞职，一方面又使吕文德谎报元军进攻的消息，朝中上下人心惶惶，度宗与太后急忙亲手下诏请他复职。贾似道回来后，想以经筵拜太师提高自己的地位。按宋朝的先例，受此职者必须先拜为节度使，度宗就要任贾似道为镇东军节度使。贾似道十分不满，恼怒地说：“节度使是最愚蠢的粗人！”度宗没办法，命令只实施出节仪式即可，不必当真，临安百姓都聚在街边观看。谁知节已出贾似道又说时辰不好，下令返回。宋代制度是节出后宁可撤宫坏屋，勇往直前，决没有倒节的道理。贾似道却傲然漠视，践踏公法，旁边的人无不为之瞠目结舌。

咸淳三年（1267），贾似道又要“乞骸”归家，度宗又慌了，一天四五趟地派大臣、侍从去传旨挽留，又派中使给他一天送几十趟赐品，甚至到夜里还派人守在贾似道家门外，直到加拜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赴中书堂治事，贾似道才留了下来。

咸淳五年（1269），贾似道称病要求归家，度宗竟然哭着挽留，允许令他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第二年又给他入朝不拜的特权。此后贾似道偶尔入朝，退下时度宗也必定要起立避席，行注目礼送他殿廷后才敢坐下。

咸淳八年（1272）九月，朝廷举行明堂大祭，由贾似道担任大礼使。祭祀典礼结束后天降大雨，度宗胡贵妃的哥哥胡显祖时任带御器械官，他请度宗换乘逍遥辇回宫，度宗问：“不知道平章（即贾似道）认为行不行？”显祖谎说贾似道已经同意了，度宗信以为真，这才放心回去。不料贾似道原为度宗会等雨停之后乘辂舆回宫，听到皇帝已乘逍遥辇起驾的消息后，大为光火，竟当面斥责度宗说：“我是大礼使，皇帝的举动我竟然不能预先知道，请免我的职！”说罢当天就出了景灵门。度宗苦苦哀求都留不住他，为了给贾似道出这口气，无奈只好罢免胡显祖，并痛哭流涕地将胡贵妃赶出宫去当了尼姑，贾似道这才消了消气回到朝廷。

咸淳十年（1274）正月，贾似道的母亲胡氏死去，度宗下诏举行隆重的葬礼，坟墓也比拟皇陵的规模。贾似道回越州（浙江绍兴）治丧，朝官贵戚为讨好贾似道，竞相比赛祭品的高度，有的层叠竟高达几丈。送葬时正碰上天降大雨，文武百官立在大雨之中，水深没及

腰膝，但整整一天没有一个敢擅自离去的，贾似道的威势就是如此逼人！

咸淳三年（1267年），度宗在西湖的葛岭特赐贾似道一处宅第，贾似道从此五天一次乘湖船入朝，不再赴都堂办公。官吏们抱着文书到贾似道的府第让他处理，大大小小的朝政诸事，一切都决定于他的馆客廖莹中和堂吏翁应龙二人，宰执只不过是在文书尾部充位签名罢了。当时有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贾似道虽然深居简出，但举凡台谏的弹劾、诸司的荐辟以及京尹、畿漕的一切事务，不禀报他就不敢执行。李芾、文天祥、陆文龙、陆达、杜渊、张仲微等人，稍违背贾似道的意愿就要遭到训斥，重则被朝廷摒弃，终身不再录用。那些为求美差官职的，争相向贾似道争献美玉，陈奕甚至像兄弟一样侍奉贾似道的玉工陈振民，以乞求进职。

贾似道胡作非为，也怕别人议论自己，便挖空心思地以权术驾驭上下。他一方面用官爵美差来拢络一些无耻士人，或者以增加太学生的饭钱、放宽科举考试的恩例等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又对反对他专权的人打击迫害。如大府寺主簿陈蒙曾在面见度宗时揭露贾似道为相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贾似道知道后就捏造贪污的罪名将陈蒙贬到建昌军（江西南城），并查抄没收陈蒙的家。

当时宋元战争正打得非常激烈，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南宋局势如风雨飘摇，贾似道却隐瞒军情，对度宗严密封锁消息，哪个敢于说出真情，必遭到贾似道的严厉的处罚。有一天，度宗问他："听说襄阳被围已三年了，怎么办？"贾似道说："蒙古军队已经退走了，陛下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消息？"度宗老实交待是一个妃子告诉他的，贾似道转眼间就找了个罪名，迫使度宗将这名妃子赐死。就这样，南宋朝廷言路断绝，贾似道更加威福肆行。

当时襄阳被元朝军队包围，城中军民告急，而贾似道每天坐在葛岭府第里，营造楼阁亭榭，取来宫女、娼妓、尼姑中最漂亮的当妾，和她们整日淫乐。只有那些旧日的博徒可到他那里纵博，别人都不敢窥视他的宅第。他有个妾的哥哥从外面来，站在贾似道的府门口，好像准备要进去，贾似道看见了他，命令手下的人把他捆绑起来扔到火里。贾似道还曾经和他的一群姬妾们蹲在地上玩斗蟋蟀，陪他玩耍的客人开玩笑说："这难道也是军国大事吗？"贾似道酷爱珍宝古玩，营建了宝阁，每天选择一个登临游玩。他听说余玠有个玉带，就前去索要玉带，但玉带已随余玠殉葬入土了，贾似道即命人发坟掘土把玉带取出。

真相毕露　可耻下场

咸淳九年（1273）初，被蒙元军队围攻达五年之久的南宋重镇襄阳终于失陷，南宋朝野大为震动。当初襄阳被围时，贾似道曾装模作样地要亲往救援，而暗地又指使党羽上书阻留，说什么如果贾似道亲自出兵则不能几方兼顾，不如留在朝中指挥。襄阳在弹尽援绝之后失守，贾似道又说："我曾多次要求前去，先帝（指理宗）都不同意；早让我去，肯定不会这样。"竟把责任全盘推到早就死去的理宗头上，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壮志难伸爱国志士。

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宋度宗死去，贾似道立年仅四岁的赵显为帝（即

宋恭宗)。元军政破鄂州，元丞相伯颜率军东下，直逼临安，沿江的宋将无力抵抗，或降或逃，局势危在旦夕。太学生群起纷言只有“师臣”贾似道亲自带兵出战才可以退敌。抽调各路精兵出发，路上光是携带金帛、辎重的船只舳舻前后相接就长达百余里。贾似道迤逦到了芜湖，又想故技重演，把军营里的战俘曾安抚放回，送给伯颜荔枝、黄柑等，并派遣宋京到元军兵营中，请求像开庆年间（1259）达成的盟约一样每年向元朝交纳岁币，结果元朝不答应宋京的要求，贾似道不得已才开始准备作战，命孙虎臣率精锐步兵七万余人驻扎在池州（安徽贵池）下游的丁家洲，命夏贵率战舰二千五百艘布列在江中，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伯颜水陆合击孙虎臣部队，宋军前锋刚刚接战孙虎臣就带着妻妾乘船舟逃走了，夏贵也不拒而逃，贾似道闻报后惊慌失措，鸣钲收兵，宋军被杀溺而死的不可胜数，把江水都染红了，军资器械全部被元军所缴获，宋军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贾似道乘一条船逃回了扬州。不久，南宋政府迫于舆论改任陈宜中为右丞相，罢了贾似道的官，杀了翁应龙，廖莹中等党羽也畏罪自杀。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要求严惩贾似道。有一位大臣对谢太后（理宗皇后）说：“本朝专横的大臣所造成的祸乱，没有更比贾似道厉害的了。在朝大臣、在野草民不知上了多少奏书，您都不予处理，对他们意见全然不顾，何以谢天下之人！”谢太后不得已才下令将贾似道安置到婺州（浙江金华）。婺州百姓听说后竞相张贴布告赶他走。又安置到建宁府（福建建瓯），有人说：“建宁百姓听说贾似道要来就已经呕吐恶心，怎么还能见这个人呢！”在朝臣不断的口诛笔伐之下，南宋政府最后决定谪贾似道为高州团练使，让他在循州安置。

福王赵与芮平素十分仇恨贾似道，他安排了与贾似道有仇的山阴（浙江绍兴）县尉郑虎臣负责押送。郑虎臣不负众望，上路后，先将贾似道所带的十个侍妾赶走，又把贾似道乘坐的轿子的轿顶撤去，让他暴晒在毒烈的秋阳之下，还让轿夫唱起杭州俚曲，指名道姓，百般奚落。途中在一所古寺中歇息时，墙壁上正好有被贾似道贬斥南行的吴潜的题字，郑虎臣将贾似道叫到面前，大声斥责道：“贾团练，你因为什么原因来到这里？”贾似道羞愧得无言以对。乘船行到南剑州黯淡滩（在今福建南平市)，郑虎臣说：“水很清，你为什么不死在这里？”贾似道贪恋余生，说：“太皇许我不死，一旦有诏，我就死。”德祐元年（1275）九月，走到漳州城南二十里的木棉庵，郑虎臣再次劝他自杀，贾似道仍然不肯，郑虎臣愤然说：“我为天下杀死贾似道，纵然被处死，我也死而无憾！”就动手将贾似道杀死，结束了这个一代权臣的狗命。贾似道死后不久，南宋都城临安被元军攻陷，四年后（1279）南宋灭亡。

【阿合马】

独霸朝纲　横行不法

阿合马（？～1282），回纥人，出生在花剌子模细浑河（前苏联锡尔河）畔的费纳克忒城。其家为蒙古弘吉那部按陈的属民。现在已经无法知道阿合马是怎样来到元朝的。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拥戴下，在

开平即大汗位；中统三年（1262），阿合马被任命为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元政府专门把国家的财赋的职权委托他进行管理。

阿合马一旦得势，狼子野心马上暴露。他居然将中书省摆在一边，有关财政方面的事，不让宰相过问。中书右丞张文谦对他这种专横跋扈的行为极为不满，对忽必烈说："分制财用，古有此理，作为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对国家的财政大事居然不能过问，难道是要把它们交给皇上直接处理吗?"张文谦长时间在忽必烈身边工作，早在忽心烈即帝以前，就在王府掌管教令，以直言敢谏闻名。忽必烈也认为阿合马做得太过分，于是责令阿合马马上改变做法。

阿合马脑子精明，长于智巧，在理财方面确实表现出一些能力。河南钧州、徐州等地都有铁铸冶炼，阿合马奏请朝廷授给宣牌，很快治铸业就获得了利益，每年输人的铁有1037000斤，铸造农具20万件，交换粟米输送官府共达四万石。又如，太原的老百姓煮盐，越境到邻近的解州贩卖，由于价钱便宜，当地百姓争相购买。阿合马提出增加卖盐赋，不论僧、道、军、匠等户，一律纳赋，至于民间通行的小盐就任其从便。解州岁人情况好转。那时元朝刚刚建立，江南仍在南宋政权的掌握之中，忽必烈要实现灭亡南宋的计划，需要大量的军费与物资，阿合马这两项进财计划，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不久，忽必烈就破格提拔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让他与左、右丞相同领宰相之职。至元三年（1266）忽必烈设置制国史使司，任命阿合马以平章政事兼领制国史使。阿合马在此期间，又提出发展银矿的开采，节省朝廷开支，并在各地推行扑买法、理算法，这些措施对于缓解当时的财政困难，起到相当的效果，得到忽必烈的称赞，阿合马自恃有功，更加横行无忌，不可一世。

至元六年，忽必烈采纳大臣建议仿前朝旧制，设立宪台，并在各路设立提刑司。阿合马认为这些机构的设立，对于他专权图谋不轨是绊脚石，于是上疏请求忽必烈罢御史台及诸路提刑司。中书右丞相廉希宪气愤非常，他当着阿合马的面质问道："宪台的设立，可以纠察、弹劾不法的官员，且可以了解地方官吏的奸情与民间疾苦，这于国于民都有益处。如果照你的意思裁掉，将会导致朝廷及各级官员贪纵不法的情况出现。"由于一些正直大臣的坚决反对，阿合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左丞相史天泽长于将略，不善言辞，阿合马抓住了他的这一弱点，经常当着忽心烈的面与他争辩，屡屡说得他理穷辞穷，忽必烈由是更加看重阿合马的才能，授予他朝廷重权，对阿合马言听计从，阿合马越来越专权和刚愎自用。

阿合马自担任中书平章政事之后，大量擢用亲信，命官不经过吏部拟定资品，也不征求中书省的意见。右丞相安童将这一情况奏闻忽必烈。忽必烈向阿合马询问此事。阿合马说："既然皇上大小事务都托付给我，我所用之人当然由我选择了。"忽必烈没有说什么，同意今后除了犯有重刑等待处理的官员及任命为路总管的官员外，其余均由阿合马自行安排。这样一来，吏部形同虚设，朝廷的人事大权几乎被阿合马一手把持了。

至元十五年正月，西京发生饥荒，

忽必烈下令调发粟米万石赈济灾区百姓。并告诉阿合马应该多贮粮食以备缺乏之用。阿合马趁机奏说："自今以后御史台非议中书省，不要擅自召仓库官员，也不要追究查验钱谷的数量。等到中书省开会议事时。凡有不到会的人，就给他定罪。"忽必烈为了让阿合马放手行使权力，同意了他这一无理要求。这样御史台的职能大大地削弱，实际上全是阿合马一人说了算了。不久，阿合马奏请成立江西榷茶运司、诸路转运盐使司、宣课提举司机构，仅宣课提单司一次就委任了五百多官员，至元十七年阿合马把死党郝祯、耿仁同升为中书左丞，这几人结成死党，"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阿合马并挟权经商，获取巨额财富，同时将大量近郊百姓良田占为已有，百姓怨声载道，人人共诛之。

结党营私　陷害忠良

对阿合马贪婪不法的罪行，一些大臣十分气愤，纷纷上书揭露，阿合马凭借忽必烈的宠信，对他们施以威胁与陷害。左丞相安童奏言大都路总管忽辛不称职，请朝廷将其撤换，并揭露阿合马挟权经商、荼毒百姓。阿合马闻讯很嚣张说道："这是谁说的？我要和他当庭对质。"宫廷宿卫秦长卿与朝官刘仲泽、亦麻都丁曾分别上书参劾阿合马。阿合马欲诬杀三人，便对兵部尚书张雄飞说："你如果能为我处死这三人，我将许你参政职位。"张雄飞回答说："杀人以求大官，这事我不能做！"阿合马马上将他贬为澧州安抚使。秦长卿最后竟被阿合马迫害打击，秦长卿因此而被他们在监狱中害死。

至元十五年湖南行省左丞崔斌觐见忽必烈。忽必烈向他询问江南各行省抚治情况，崔斌直言不讳地说："先前朝廷认为江南地区官员过多，委任非人，于是命令阿里等人前去澄汰冗员。现在已有明显迹象，掩蔽不上奏，这是欺骗皇帝。杭州地大，不应轻易委寄，阿合马溺子私爱，于是竟让他不成器的儿子抹速忽充任达鲁花赤，身佩虎符，这难道是朝廷规定的量才授职之道吗！"忽必烈于是颁旨将阿合马子侄官职尽行罢免，但没有追究阿合马本人的责任。忽必烈在全国统一以后，逐渐刚愎自用起来，加以好大喜功等消极因素有了明显的发展，长期以来，巧言令色的阿合马以他理财的能力与善于逢迎的本领骗取了对他的极端信任。在忽必烈的心眼中，越来越觉得只有阿合马才是最合格、最有本事的宰相。遭崔斌弹劾后，阿合马一直耿耿于怀，对崔斌痛恨不已，千方百计想进行报复。原先忽必烈要将崔斌留在朝中任职，阿合马以江淮急需通晓汉人的官员为借口，将他调任江淮行省左丞。两年后，阿合马派亲信不鲁哈达儿、刘思愈检核江南行省钱谷，诬陷崔斌与行省平章政事阿里布贪污官粮四十七万石，擅易朝廷命官八百余员，把阿里布、崔斌二人定为死罪。阿里布、崔斌原为元朝的开国功臣，两人在忽必烈的统一事业中都作过卓越的贡献。阿里布曾与阿合马同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至元十二年任行省左丞。皇太子真金对崔斌相当赏识十分器重，两人交谊甚厚。当崔斌定死罪的消息传到东宫时，真金正在进食，他放下筷子，急速派人，大骂阿合马残暴奸邪。按元朝制度，皇太子到一定年龄便要参决朝政，实领中书令职。凡中书省、枢密院、御

史台及各司政事皆先启禀皇太子，然后奏闻皇帝。真金于至元十年立为太子，至元十六年参决朝政，当时已经三十六岁。在理政期间他掌握了阿合马大量的不法材料。真金曾当着忽必烈的面痛斥过阿合马。阿合马对他既恼恨，又畏惧，两人势同水火。自崔斌等遇害以后，矛盾一天比一天加深。天下士民闻崔斌等人惨遭毒手的消息，人人大呼冤枉，同仇敌忾，指斥阿合马的凶残，他们希望有人来除掉忽必烈身边的这条恶狼。

恶贯满盈　脑袋开花

益都千户王著，平素视恶如仇，趁天下人心愤怒埋怨的机会，秘密地铸造了一个大铜锤，他发誓一定要砸碎阿合马的脑袋。

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忽必烈和皇子太子真金去上都开平，阿合马留守大都。王著认为这是除奸的好机会，经与高和尚密谋，制定了一个诱杀阿合马的计划。高和尚是一个著名的苦行僧，自称有神术。“以秘术行于军中”，他与枢密副使张易关系很好，张易曾将他荐于忽必烈，随边将和礼霍孙领兵赴北部边境御敌。

三月戊寅这一天，王著等人诈称皇太子从上都回到京师来做佛事，并纠集了八十多人趁夜幕的掩护进了北京城。次日一大早，王著派出两名和尚前往中书省，告诉中书省要置办做佛事的各种物品。中书省官员们对此事颇有怀疑，便查问，这两名和尚不承认，没有说出王著等人的密谋。等到三月十七日中午时分，王著又派遣崔总管假传皇太子的旨意，并让枢密副使张易派一些军兵，在晚上赶到东宫门前供使用。张易不能够识破王著的计策，深信崔总管矫传的太子令旨，遂即派指挥使颜义率兵前往皇太子的东宫。

就在此时，王著亲自骑着马去见阿合马，他谎称皇太子将从上都赶回北京，命令中书省官员全都到东宫门前恭候。阿合马派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等几个人骑马出城迎接太子，向北走了十几里路，碰上了王著等人早已安排好的人马，假扮皇太子的人斥责脱欢察儿等人无礼，把他们全都杀死了，抢夺了战马，从南面进入健德门。此时正是二鼓的深夜，没有人敢盘问他们，这一行人马直接来到东宫门前，其余的人下了马，只有装扮成元世祖皇太子的人骑在马上指挥，招呼中书省官员们到马前来听话，阿合马也乖乖来到“皇太子”面前，“皇太子”刚斥责了他几句话，王著马上把阿合马从马上拉了下来，掏出藏在袖子里的的大铜锤猛击阿合马的脑袋，阿合马的头颅被打碎，脑浆迸溅，当场毙命。继而，“皇太子”又叫左丞郝祯前来，也把他给杀了。王著等人接着囚禁了右丞张惠。

当时，枢密院、御史台以及留守官员都只能远远地观看着发生的这一幕，他们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变故。当尚书张九思在东宫里大喊大叫，惊呼皇太子有诈时，众人才恍然大悟，留守达鲁花赤博敦持挺冲到前面，把骑马的人击倒在地上。一时间弓矢乱发，王著等人马四下奔逃，不少人被俘虏。高和尚等人成功地逃走了，但王著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要求元军逮捕他。

中丞也先帖木儿当即飞马赶到上都，向元世祖忽必烈汇报京师的变故，当时正驻扎在察罕脑儿的忽必烈闻奏极为震惊，命令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

参政阿里等人赶奔大都镇压叛乱分子。三月庚辰这一天，在高梁河捕获了高和尚，不久就在京都的大街上杀死了王著和高和尚，都剁成肉酱，枢密副使张易也难逃一死。

王著临刑前毫无惧色，他大声地说："我王著为天下人民铲除奸佞，今天虽死，但有一天会有人为我记下诛杀阿合马的事。"

阿合马被王著处死后，元世祖还不怎么知道他恶劣罪迹，让中书省不要查问阿合马的妻子。后来等元世祖向孛罗询问，这才全部了解阿合马的奸行。忽必烈怒气冲冲地说："王著诛杀阿合马，实在是正义的举动！"于是，忽必烈命人掘开阿合马的坟墓，判开他的棺椁，在通玄门外对阿合马进行戮尸，让狗吃咬尸肉，朝廷百官以及平民老百姓们聚集围观，无不拍手称快。

此外，阿合马的儿子及侄辈了被抓处死，财产均被没入官府。在籍没阿合马的小妾的藏产时，居然在柜子里发现了二张熟人皮，两只耳朵都还存在，阿合马平时让一名阉人专门掌管钥匙，审讯他时，阉人也不知道这两张人皮原来是谁。只是供认："阿合马平常诅咒人时，就把人皮放在神座上面，这样诅咒应验得很快。"阿合马就是这样一个杀人魔鬼！

【桑哥】

奸商本性　取媚皇帝

桑哥（？～1291），出身于畏兀儿族，长于吐蕃。少年时代，曾拜吐蕃国胆巴为师，识字读经，还学会西域好几国种语言。年龄稍长以后，做过西蕃各国的译史。西蕃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商旅往来频繁，商贸兴盛。畏兀儿、吐蕃商人很多，他们的足迹遍于全国，远至中亚、西亚。蒙古征服吐蕃、畏兀儿后，这一带商贸如前一样火热。桑哥从小生活在这里，耳濡目染，学会经商牟利，并且深谙商道的门径，这使他步入仕途后，能够熟练地理财，并且时刻暴露出贪婪狡黠、好言财利的特征。至元年间，社会经济衰落，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元蒙统治者极需发展经济以摆脱困脱境。桑哥由于精通"发财"之术，因而迅速发迹。

桑哥是由佛教而发迹的。元王朝崇尚佛教，桑哥因懂得吐蕃以及其他很多种语言，被忽必烈从译史提升到总制院正院使，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兼治吐蕃政教。桑哥由此进入朝廷政教中心，开始有机会接触元世祖忽必烈。其实桑哥对于佛教事务并无多少兴趣，但这个地位却可以有机会向忽必烈言及财利之事，陈述如何"营利"求息的智术。这正好迎合了忽必烈聚财强兵的胃口。由此忽必烈开始重用桑哥。

有一次，中书省要为僧寺买一批灯油，派一名汉人官员李留判去经办。桑哥知道了，他要求中书省将油钱交给他，由他亲自去购买。司徒和礼霍孙不同意，说买油的事不是你所适宜去的，亲自办这种事情更不合适。桑哥不服气，两人争执起来直至互相殴打。桑哥要求自己去买油，目的是要用油钱去倒卖灯油营利求息。他不顾体统，一边殴打一边强辩说："与其让汉人侵盗官家的钱，还不如把钱交给寺庙及官府放贷收取利息。"最后桑哥终于从中书省领取了购买一万斤油的钱。他利用这笔钱在市场

上先以“和买”的方式，即以低廉的官价购买油，再高价卖出，获利丰厚，既买回了油，又以“所营息钱”进献朝廷。桑哥这次倒卖，虽然未敢将利润纳入私囊，但却因此捞取了政治资本。忽必烈听说了这件事，对桑哥理财本领更是刮目相看。

又有一次，元世祖忽必烈因要赏赐外地王爷一批银两、币帛，需要一批驴子运载，忽必烈并答应到达后可将官驴一并赏赐诸王。桑哥乘机建议说：“不如以官驴载玉而回，这样既可节约官费又捎回了财富。”忽必烈听了很是兴奋，下令按桑哥说的办。果然，以后桑哥用带回的西域玉石发了一大笔财，他将其中的一部分献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心中大悦。桑哥通过诸如此类小事，“以小利”博得了忽必烈的欢心，很快被忽必烈视为心腹人员。朝中各种大事，包括人事进退，忽必烈都不避桑哥，甚至经常要听听桑哥的意见，桑哥由此渐渐得宠于忽必烈。

安插亲信　贪赃成风

桑哥得宠以后，贪赃的嘴脸逐渐暴露出来，其手段也越来越放肆。

至元十九年，擅权朝政的奸相阿合马因侵盗财赋，强占民田被千户王著除掉后，受到处罚，家财全部藉没入官，祸及子侄。此时桑哥却幸灾乐祸。原来桑哥看中了阿合马一位美妾，早已垂涎三尺。阿合马倒台，妻妾皆贬为平民，桑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这位美妾据为己有，对她宠爱无比。这位美妾原是河间转运使张庸之女，张庸也因此与桑哥认为姻亲。桑哥乘此机会把张庸收为爪牙，利用姻亲关系，放手让张庸在外面利用职权，侵盗漕运官钱。数额多达三千一百万锭，这样，桑哥既得美女又得钱财。

桑哥身为总制院使，不管佛教事务，但却喜欢利用主管全国佛教事条的职权，大肆贪赃纳贿。他的下属，西蕃佛教官员杨琏真伽，早在桑哥任西蕃译史时，二人就是好朋友。桑哥接受了杨琏真伽的大批钱物，马上为杨琏真伽谋得佛教总摄一官，并让杨琏真伽去主管江南一带的佛教事务。扬琏真伽是出自佛门的一个贪得无厌的和尚。他到达江南临安后，托庇于桑哥的支持，借口修复寺庙，在江南大肆搜刮民财，而且为非作歹。杨琏真伽在杭州一带打着修庙的名义，盗掘宋朝皇陵及大臣墓穴 101 个，取其财宝无数；接受别人所献美女宝物无数；前后攘夺别人财物，计金 1700 两，白银 8600 两，玉带九条，玉器 110 件，杂宝 152 件，大珠 50 两，币钞 16200 锭；强夺民田 23000 亩；私下庇护平民不输公赋者 2300 户，租税皆占为己有；其他隐匿的财物更不计其数。

这位奉行“四大皆空”的佛教总摄官员，如此嗜财好色，不禁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愤怒，有人因此而上书朝廷，但桑哥充耳不闻，把奏书压下不报，只求从中渔利，接受馈遗。后来杨琏真伽事情被忽必烈知道，桑哥赶紧在忽必烈面前为这个贪僧千方百计开脱庇护，杨琏真伽最终还是免受重罚，长期逍遥法外。

由于经常接触忽必烈，桑哥也渐渐地摸到忽必烈嗜财重利的特点，于是，便进陈了许多敛财之术，迎合忽必烈的需要，以求升官揽权。忽必烈不知道桑哥使奸和他的罪恶目的竟事事放手让桑哥去办。

至元二十四后二月，元朝复置尚书

省，桑哥晋升为尚书省平章政事，主持财计大事，成为显赫一时的重臣。桑哥上台不久，即别出心裁，提出更换币钞，颁布新钞至元宝钞，原来的“中统旧钞”仍然通用。但是，调整了钞值，确定新钞一贯，相当于旧钞五贯。桑哥曾奉旨清查、核检中书省事务，国库“校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万，错钞一千三百四十五万锭”。仅此一项，就在发行新钞的戏法中，将五分之四的亏欠数目转嫁到社会上。至使社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桑哥采取贬值旧钞的伎俩，使官府得财，从而也使得忽必烈对其高度信任。

狡黠的桑哥又打着推行新制的名义，重新调整任用一批官员。他借此机买官纳贿，中饱私囊。同时也乘机起用了一批他的狐朋狗党；他的昆弟、故旧、妻族皆得到安插。“桑哥妻弟八吉由任为燕南宣慰使”，另一妻党“要束木任为湖广行省平章”，“江浙省臣乌马儿、蔑列、忻都、王济”等皆为桑哥“姻党”。被桑哥新任的一批死党及其一大批以赂得官的贪徒，上任以后，即拼命搜刮，公开收取贿赂，此时官场贪污成风，浊乱无比。

桑哥为了保护自己的一班朋党，也为了防止自己的劣迹暴露，又作出一条规定：凡百司百官收受贿赂，不须台宪官员审问，只须本衙了断。当时，各部衙门，官官相护。对于部下属员犯事自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就为当时的贪官污吏肆行贪赃不法的行为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如此，桑哥及其属吏的贪赃行为，仍然不断地受到大臣的奏劾。监察御史周祚劾桑党忙兀带、纳速剌丁来里等奸害百姓、贪赃不法。然而由于桑哥党人已经布满朝野，周祚的奏疏被桑党知道以后，桑哥马上组织材料，诬陷周祚，奏请忽必烈流放了周祚，并把他妻子家财皆没入官府。中书参政杨居宽、郭佑、台吏王良弼、江宁县达鲁花赤吴德等皆因同样情况或被诛，或被弃市。桑哥的疯狂迫害，使得朝中上下再也无人敢与桑哥作对，无人敢轻易奏劾桑哥及其同党。

桑哥占有了大量财赋，他又以财赋不断地向忽必烈邀功市宠，以求继续加官晋爵。当时，总制院所统属的西蕃各个宣慰司，主要掌管当地的军民钱谷，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机构。桑哥向忽必烈提出，应将宣慰司改为宣政院，级品提高为从一品，并且用三台银印。忽必烈问：“谁能肩此重任?”桑哥恬不知耻地回答，说：“臣最合适。”忽必烈一生“黩武嗜利”，谁能为他聚敛财富，他就可以慷慨封官。他马上满足了桑哥的要求，命他兼任宣政院使，并赐给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就这样，宣政司级别的提高，又为桑哥谋得一个更高级的职位。

桑哥每窃取一份权利都设法以权谋私，谋私取利。此时，他又利用新的权利来卖官纳贿，或者安插亲属。西蕃有一个巩昌府，原来是驻扎地方军队的一个区域，桑哥利用新得的职权，把巩昌府“特升为宣慰司”，从属于宣政院，这样一来巩昌府就与行省平级。然后他安排其弟答麻剌答思为使，掌管巩昌府宣慰司。通过这一环节，桑哥不仅安插了自己的亲属，并且进一步控制了陇西一带财谷大权。

罗甸，本是西南边陲一个小邑，原名普里，桑哥征滇时归附蒙古，隶属云南行省，设为普定府辖管的一个县。至

元二十七年，普定府的斡罗思、吕国瑞听说桑哥兼任宣政院使，便向桑哥及桑哥的妻党要束木等朝中要员送去大量礼物，请求增设罗甸宣慰司，桑哥收到贿赂以后，马上答应了这个要求，将罗甸小邑连升数级，置为罗甸宣慰司与行省平级，斡罗思、吕国瑞二人同被任为宣慰使。

桑哥的权利欲远远没有止境，他的贪婪之心远没有满足。至元二十七年年底，他又在忽必烈手中窃取了一部分封赏大权。他假惺惺地上奏说："有封地的大臣，都以土地贫瘠为理由，请求增加赏赐，但是财物并非是天地自然生出的，都取自于人民，假如征取不慎，恐怕国家的财用就不够了。"忽必烈信以为真，说"自今尔后，不该赏赐者由你划去，应当赏赐者由你奏报，最后我才来裁定。"这样，谁要得到赏赐，必须通过桑哥这一关，桑哥也因此也"广开财路"了。

接着，桑哥又把手伸向中书省，企图摘取中书省向外颁发和宣布皇帝"敕""诏"的大权，桑哥向忽必烈密商此事，果然如愿以偿，忽必烈下令："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即一切颁发命令的大权都由桑哥主管。至此桑哥不仅控制了财政大权，也控制了封赏大权和控制了官吏进退、黜陟大汉，"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同时又控制了宣诏大权，几乎控制全部朝政，不仅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而且也驾空了忽必烈。桑哥窃取上述大权以后，即"刑爵为货而贩之"，当时，凡是贪徒败类，"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人，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

横征暴敛　官逼民反

桑哥竭精殚态地敛财，但毕竟财有限而敛无度，地方仓廪可征者甚微，其效果亦一年不如一年。至元二十六年十月，桑哥又想出一个敛财新招：增值钞引，增加盐、茶赋税。此外，桑哥又上奏，加征迁移户的赋税。这些都迎合忽必烈的胃口，忽必烈自然开心，一切都按桑哥所说施行。

桑哥每次推行一项新的敛财之术，都故伎重演，出卖一批官职，网罗一批贪官污吏，让这些贪官污吏镇使四方。这些贪官污吏的贪赃不法，推行桑哥的敛财措施极为用心。当时增值钞引，增加赋税，他们也十分卖力地督办，借机从中勒索，大饱私囊。然而重重的苛捐杂税，逼得人民走投无路，一些正直官员也冒死上书揭露桑党的不法行为。京师地区更是首当其冲，桑党的贪酷行为很快被忽必烈知道，忽必烈为平息民愤，决定给负责在京师地区催征的官员萧仪重罚。但又念其多年聚敛有功，贷其不死，让他徙边淘金。桑哥不忍物伤其类，在桑哥的要求下，贪官萧仪又被忽必烈宽释。

桑哥不遗余力保护同类，而对于违忤他的人则给予残酷打击与排斥。早在钩考钱谷之初，就有少数御史曾冒死奏报朝廷，可是桑哥倚仗威势，鞭挞御史，压服大臣。同时，他又安插亲信赵国辅为御史中丞，控制台政，压抑下属，严禁揭露和奏劾桑哥及其党人。但是，桑哥越是想一手遮天，越是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御史台有一老臣赵世延曾率领同班御史五人，共同劾奏桑哥敛财乱政、奸贪不法的罪状，并当面质问赵国辅，要求赵国辅必须奏报忽必烈。赵国辅见

众人气势汹汹，只好表面上答应了。但他实际上却扣压奏章，并把赵世延等人情况密报桑哥。桑哥先发制人，罗织罪名参奏赵世延等五人，把他们全部黜至外地。当时，集贤院学士兼侍御史程巨大深受忽必烈赏识，眼看“桑哥专政，法令苛急，四方骚动”，便亲自向忽必烈参奏：“今权奸用事，尚书钩考钱谷，以剥割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强烈要求忽必烈制止、惩治桑党。桑哥听说这事恼恨万分，六奏忽必烈诛杀程巨大。忽必烈没有准奏。忽必烈虽然没有诛杀程巨夫，但是，他也并不重视程巨大的意见，更没有处治桑哥。

桑哥贪赃不法，残暴聚敛的各种倒行逆施，虽然受到大部分大臣的参奏弹劾，但由于忽必烈视若无睹，放任自流，致使桑哥越发有恃无恐。在残暴聚敛的政策统治下，各地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官逼民反，人民不得不揭竿而起，举行了反元大起义。至元十六年，全国起义多达四百余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江南畲民钟明亮起义。此外，广东的黄贤举，福建的丘老大，漳州的陈机察、建昌的丘元、泉州南安的陈师七、兴化的朱三十五、浙东台州的杨镇龙，婺州、处州的吕重仁、杨元六等，都先后举起反抗压迫的大旗。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给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严酷的事实迫使元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对策，不得不对引起农民起义的原因进行思索。也先帖木儿等相继参奏桑哥专术黜货、奸贪不法的种种罪恶勾当，语言皆无比犀利。忽必烈受到震动，数次遣召宠信的大臣不忽木询问症结，不忽木也奏曰：“桑哥欺上罔下，壅塞圣听，贪赃枉法，紊乱朝政，忠良受辱，小人见用……如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祸乱旦夕。桑哥不诛，遗患无穷。”

至元二十八年初，忽必烈下诏，罢免桑哥所有职务，停止钩考，清算桑哥旧帐，没收桑哥的家产。三百禁卫军包围了桑哥住宅，抄出金银财宝无数，几乎是皇家内府所藏之半，朝廷上下无不触目惊心。

身首分离　罪恶下场

桑哥被罢免抄家之后，各地揭露弹劾桑哥罪行的奏章就像雪片似飞向朝廷。

至元二十八年四月，中书省臣麦术督丁、崔或上奏曰：“桑哥专横四年，中外百官无不以贿赂而进身仕林，其兄弟、故旧、亲族，皆得高官美职。此等险恶之徒唯以欺蔽天下，贪剥百姓为能事，宜让中书、尚书严加考校。凡是桑哥党人，皆应籍除为民。”忽必烈接受了这个意见，开始清查桑党，桑哥党人自此纷纷落网。

五月，桑哥妻党要束木被下诏“械致湖广省诛之”。桑哥妻弟八吉由因“受贿积赃”，被罢免燕南宣慰司使职务，被诛身死。桑哥昆弟、巩昌宣慰司使答麻剌答思畏罪自杀。七月，扬州路学政李诠上言尚书右丞叶李妄举桑哥之罪“宜斩叶李以谢天下”。叶李未等到审判就死了。在朝野上下的强烈要求下，桑哥亦于当月在京师街市被砍头。十月，下诏捕桑哥党羽、佛教首领杨琏真伽、沙不丁、乌马儿回京师，十一月，查明“沙不丁、纳剌速丁来里、乌马儿、王巨齐、杨琏真伽、沙的、教化的皆桑哥党羽，受贿肆虐，使江淮之民悉怨声载路”，忽必烈下诏将其全部逮捕下狱。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纳刺速丁来里以盗取官民钞一十三万余锭，忻都以征收迫杀五百二十人，都被处以极刑。翰林院应奉使詹玉曾结党桑哥，被逮捕入狱。至元三十年十一月，上都同知孙民献，被籍其家财、妻奴，械送至湖广处死。至此，桑哥党羽中，除佛教头目杨琏真伽、沙不丁二人受到忽必烈的宽释以外，其余皆受刑严惩。

元朝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才推倒了桑党，诛杀了部分贪官污吏，但是，元王朝的政风并没有多少改变。正如时人王恽所言："贪图贿赂，蔚以成风，擅征横敛，无所不致。"明代叶子奇也指出，元代，贪污名目繁多："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得肥差曰'好地分'；得职近，曰'好窠窟'。"桑哥在执政期间，曾暗示手下人为其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于是在至元二十六年十月，制成了《桑哥辅政碑》，树立在尚书省前，在上面盖了一座楼，并涂以红漆；这块碑也就成了桑哥的耻辱碑。

【铁木迭儿】

为害一方　钻进"后党"

铁木迭儿（? ~1322），武宗至大元年（1308），他先后出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和云南省左丞相。铁木迭儿在云南期间，由于"贪暴擅诛杀"，受到安抚使法花鲁丁的监督与挟制，使他不能随心所欲，于是铁木迭儿就罗织法花鲁丁各种罪名，准备把他杀了。法花鲁丁是朝廷派来的安抚使，怎能够随意诛杀？云南廉访使朵儿赫闻讯大为吃惊，他亲自查明原由，并为法花鲁丁纠正，当面申斥铁木迭儿，身为地方官，无权"专杀"朝廷大臣，法花鲁丁于是才免于一死。

云南当时各少数民族之间经常发生矛盾，铁木迭儿作为地方长官不是调解矛盾，而是利用矛盾从中渔利。当各少数民族村寨经常相互仇杀时，双方酋长为了争取官府支持，都纷纷向衙门送礼行贿。铁木迭儿又向上"诈奏"，说蛮人叛乱，派出大批官兵镇压，并趁机大肆掠劫。这事以后也被廉访使朵儿赫巡察，奏劾于朝廷，云南行省官员全被罢免。铁木迭儿在云南待不下去，就偷偷溜到京城，买通后宫宦官失烈门联络皇太后，企图获得重用。但是他"擅离职赴阙"又被尚书省检举弹劾，皇上下旨"诘问"。

贪官的本性，就是聚敛财富，为了钻营发迹，获取政治资本，铁木迭儿不得不把自己的赃私先分出一部分去贿赂上面的贪官。

在铁木迭儿罪恶的仕途上，劣迹败露的关键时刻，他不顾廉耻地巴结了一个重要的人物，这就是当时的皇太后；有皇太后出面支持，铁木迭儿不仅度过了危险，而且仕途从此获得了新的转机。

元世祖忽必烈之子成宗死后，先后继位的武宗、仁宗和英宗时期，元朝的实际大权实际上是皇太后在左右着。铁木迭儿早在京城时就倾心巴结、奉谀和迎合后宫。此次在云南因贪致败，逃回京师，又不惜大肆贿赂后宫，深得皇太后的赏识。当皇上下旨"诘问"他时，皇太后的关节却被他打通了。皇太后直接从后宫中传旨：让铁木迭儿"贷罪还

职'。从此，他成了兴圣宫皇太后的亲信。这位皇太后是当时的铁腕女人，史书记载她"不事检饬"、"淫恣益甚"，身居宫中，不甘寂寞，企图操纵内外。时皇上年幼，她便玩弄权术，拉拢幸臣失烈门、纽邻等相互勾结。现在铁木迭儿又成了后党的人物，使皇太后"内有黑驴母亦烈失八用事，外则幸臣失烈门、纽邻，铁木迭儿相率为奸"，形成了一股黑暗势力。他们"浊乱朝政，无所不至"把元代昏暗的政治推向灭亡的深渊。

大肆敛财　天怨人怒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在位仅四年就病死了；幼子仁宗即位，大权当然还是掌握在皇太后手中。当时朝廷准备推用完泽、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但皇太后在宫中传旨："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

元代制度行政大权、军事大权、监察大权，各由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所执掌。铁木迭儿出任丞相后还想把持军权。于是他以退为进，"以病"辞职，背里又去活动皇太后，终于达到目的，"拜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复拜中书右相"，与左丞相共同分掌朝中军政大事。

铁木迭儿谋得称心如意的高位开府治事，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便打算从掠民敛财入手，来增加国用，以取悦朝廷上下。他向仁宗提出三条意见：一、征收蕃货贸易商税，举凡向诸蕃经商者须经国家统一实行"纲牒"管理；十舟一"纲"，发"牒"放行。回程一律按规定征税。当时规定"细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元朝实际上推行的是"关禁"政策，即"禁人下蕃"。然而铁木迭儿为了敛财媚上，不惜违禁，来弥补当时十分空虚的国库，二、预卖山东、河南第二年的"盐引及各冶铁货"。所谓"预卖"，即是提前征收明年的盐税和各种冶金税，"以足今岁之用"。三、"禁私匿民田"，"括田增税"。并按江浙、江西一带租税和田亩数制定征收标准。这一带人多地少粮食单产高。照此括田增税法推广到全国，朝廷当然会是财源滚滚。这几种办法，却是重重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本来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的元朝统治，更处在火山口上。仁宗不审国情，贸然批准了铁木迭儿的三个意见。铁木迭儿大为得意，立即派遣使者，分赴各省，推行他的一整套掠夺人民的措施。推行的结果，由于"括田增税，苛急烦扰"，引起社会动荡，江南一带受害最为严重。人民对野蛮落后的元王朝统治无比愤恨，终于导致武装斗争。赣民蔡五九举起了义旗，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元王朝统治。一时之间"南方骚动，远近惊惧"。

仁宗皇帝此时害怕极了，立即下令，停止在江南"经理及冒括田租"，并将逼死人命的张驴逮捕审问。同时，宣布废除铁木迭儿的三条措施。铁木迭儿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开府治事，开头就失败，不仅没有赢得仁宗皇帝和朝廷大臣的信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和偏狭。仁宗为了防止他继续胡作非为、倒行逆施，又拜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平章政事，以牵制铁木迭儿。

然而是狗总改不了吃屎的本性，铁木迭儿贪欲的本性不改，一有机会仍然勒索纳贿，不顾一切中饱私囊。上都有户张弼，其家奴杀人，嫁祸于主人，张弼被缉拿下狱。张弼喊冤，但铁木迭儿

接受其奴贿赂六万五千缗，不为他申冤，张弼无奈，贿赃款万万，铁木迭儿便要上都开平府尹贺伯颜放出张弼。

贺伯颜早就厌恶铁木迭儿贪暴卑劣的人品，不屑与之为伍，因而不肯答应铁木迭儿的要求。铁木迭儿恼恨不已，盛怒之下以官事为名，向贺伯颜兴师问罪。贺伯颜“持正不可挠”，坚持不放张弼，他一定要查清这桩杀人案。

贺伯颜知道自己势孤力单，敌不过铁木迭儿，就联合御史中丞杨朵儿只，杨朵儿只又联合监察御史玉龙帖木儿、徐元素二人，共同调查察访，于是得到了张弼及家奴贿赂铁木迭儿的犯罪事实，于是，杨朵儿只与贺伯颜又联合丞相萧拜住一起，上朝奏明皇上，揭露铁木迭儿的贪财纳贿，知法犯法。

朝廷大臣见铁木迭儿旧案未了，张弼案又发，无不愤慨。大家见萧拜住、杨朵儿只、贺伯颜公开站出来揭露铁木迭儿受贿鬻狱的罪行，胆气壮了，也都一个接一个跟着揭露铁木迭儿其余的各种贪污纳赃，巧取豪夺的事实。铁木迭儿上台时间并不长，却已赃迹累累。当场被揭发出来的贪赃受贿数十起“家私之蓄，在阿哈马、桑哥之上”。朝堂上顿时形成轩然大波，“内外监察御史凡四十余人，共劾铁木迭儿桀黠奸贪，阴贼险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仁宗闻奏“震怒”，发诏逮捕追查。

铁木迭儿见事不妙，慌忙躲入皇太后的兴圣宫；皇太后把他保护起来，公差无法搜捕。杨朵儿只紧密搜捕，却被皇太后召到宫门，斥责他违抗太后旨。仁宗无法不敢违抗皇太后的旨意，只好从轻发落，罢免了铁木迭儿的相位，仅仅“尽诛其大奴同恶数人。”

东山再起　大行杀戮

铁木迭儿并未甘心失败，他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被罢相后闲居在家不到半年，在皇太后的支持下，他又重新被起用为太子太师。此事传出，当时朝廷大臣无不惊骇。其实，铁木迭儿在家并未闲居，暗地里四处活动，早在他罢相之前，为了“固位取宠”，就曾经勾结“后党”失烈门等人在兴圣宫皇太后面前，谋划立仁宗的次子为太子，谋划时间很长，“侵润之久，其计前行”，获得皇太后的信任，此时，铁木迭儿“赋闲”，正好可以借助皇太后的暗中支持、援助，博得了太子太师的席位。

但是，朝廷大臣对铁木迭儿重新上台纷纷表示抗议。御史台首先发难，上奏，指控铁木迭儿“不法数十事”，不适合当太子的老师。接着又有内外大臣四十余人上表，激烈反对，但皇太后无视众怒，一意孤行。铁木迭儿在皇太后的庇护下，一直逍遥法外。第二年正月，年仅三十岁的仁宗皇帝死了。仁宗死后只有四天，铁木迭儿秉奉皇太后旨，重新进入中书省，出任首席右丞相。这时，英宗虽然继位，尚在东宫读书。铁木迭儿欺英宗年幼，又仗自己是英宗的老师，便勾结皇太后，大权独揽。宫廷的这种反反复复的斗争，使得铁木迭儿从中渔利，也使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铁木迭儿因为贪赃纳贿，在“张弼案”中栽了一个大筋斗，差点要了命，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他夺回相印后，首先第一步就是翻案；翻案不成，就试图报复。但他又慑于众怒难犯，便诡谲地玩弄各个击破的手段，利用既得的权势，频频大兴大狱，逐步地向自己的政敌发

起进攻。

第一个攻击的目标，是时刻和他作对的右丞相萧拜住和在“张弼案”中带头劾奏他的御史中丞杨朵儿只。

铁木迭儿知道皇太后在张弼案中不仅庇护过自己，而且曾指斥了萧拜住和杨朵儿只抗旨不尊的行为，便继续利用这一点，在皇太后面前挑唆，指控外面朝臣不忠，激怒皇太后。这一着很奏效，权力欲极强的皇太后对朝臣们动辄上书弹劾的举动感到恐惧，因而对铁木迭儿深信不疑。铁木迭儿使假借太后的名义，“宣太后旨，召萧拜住与杨朵儿只至徽政院问罪”，诬其“前违太后旨”，不忠不敬，罪该斩首。杨、萧不服，铁木迭儿又引出两名阿谀他的御史，“证成其狱”，准备即日“弃市”，杀之。但年仅十七岁的英宗皇帝虽羽翼未丰，头脑尚还清醒，当即反对说：“人命至重，刑杀非轻，不宜仓猝。二人罪状未明，当白太后，使详献之。若果无冤，诛之未晚。”铁木迭儿骄横无比。根本不把英宗放在眼里，“矫命”宣旨，强行把杨朵儿只载诸国门之外，与萧拜住一并杀害。

铁木迭儿攻击的第二个目标，即是不肯附从的上都留守贺伯颜。不久铁木迭儿又找到了贺伯颜的“过失”，诬奏他“以便服迎诏不敬”之罪，将贺伯颜“下五府杂治”，杀害后籍没其家，“家赀、田宅赐铁木迭儿”。铁木迭儿既泄心头之恨，又满足了贪财的欲望，一举两得。

铁木迭儿贪赃枉法之事暴露时，参加揭发劾奏的人很多，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炎也是其中主要人物之一。赵世炎还曾经单独上奏章，揭露铁木迭儿十三条罪状。铁木迭儿忌恨在心，当然不会放过他，他上奏英宗，阴谋加害，诬告赵世炎有罪，遣人逮捕赵世炎。赵世炎时在四川，被传赴京途中，因病留荆门就医，铁木迭儿“以违诏不敬”之罪，“今法司究治，请置极刑”。时逢皇上“大赦”，赵世炎因而免予一死。但铁木迭儿不甘罢休，又以别的罪名诬奏赵世炎，将赵世炎缉入刑府，严刑拷打，“逼令自裁”。赵世炎不肯自杀，于是被无辜囚禁两年。新任中书左丞相萧拜住仗义执言，多次向英宗申说赵世炎的冤情，终于使赵世炎“得旨出狱，就舍以养疾。”铁木迭儿后来知是左丞相萧拜住所为，十分忌恨。于是铁木迭儿引参知政事张思明为左丞，为自己党羽，广立朋党，企图打击萧拜住。萧拜住终于遭到铁木迭儿死党铁失等人的毒害。

铁木迭儿连连兴起大狱，打击政敌。萧拜住、扬朵儿只、贺伯颜、月鲁帖木儿、赵世炎等相继遭受陷害、屠戮之后，他并不愿就此敛手，继续恃其权宠，乘间肆毒，不管大大小小的仇恨他一概要报复到底，“日诛大臣不附己者，中外疑惊”。监察御史里帖木儿曾经揭露铁木迭儿贪暴，并“历诋其奸”。铁木迭儿此时也不放过。他借故山东受水灾，盐课大损，让里帖木出任山东转运使副使，逐出京城。

监察御史马祖常曾率领同僚弹劾过铁木迭儿的十条罪状，铁木迭儿就把马祖常迁为开平县尹，并打算以别的罪名加害于他。马祖常不得已，隐退逃亡，居光州不出。

户部尚书韩若愚不附铁木迭儿，铁木迭儿就罗织他的罪名上奏。“以旧憾

诬若愚罪，欲杀之，帝不从，复奏夺其官”，最终韩若愚被削职为民。

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韩国公李孟德高望重，因不附铁木迭儿，铁木迭儿即“谗构诬谤”，削去他所有的荣誉衔，把他降为集贤殿讲学士；如果李孟稍有不满怨愤言语，便以定他居功自傲的罪名，但李孟欣然受命，铁木迭儿才未得逞。

铁木迭儿恃势贪虐，肆意生杀予夺，整个朝政被笼罩着一片恐怖之中，人人道路侧目，内外大臣都心怀恐惧，思退思散。

国史院编修官王约见铁木迭儿专权，“辞职不出”；监察御史孛术鲁因“铁木迭儿专事刑戮”，也心寒胆惊，因而辞官归隐。最后连铁木迭儿的同党张思明也“惧祸”及己，多次上表辞职。铁木迭儿由此气恼，便无端诬告张思明“扣发蒙古子女口粮”，饿死四百人，遂废于家。“张思明顺势隐退居家，”杜门六年。

在铁木迭儿专横自恣的淫威下，整个朝廷睛无天日，无人敢言。所有不愿依铁木迭儿的大臣，无不被诛、被黜、被逐、被废，元王朝在此期间已是气息奄奄，朝不虑夕了。

身败名裂　死有余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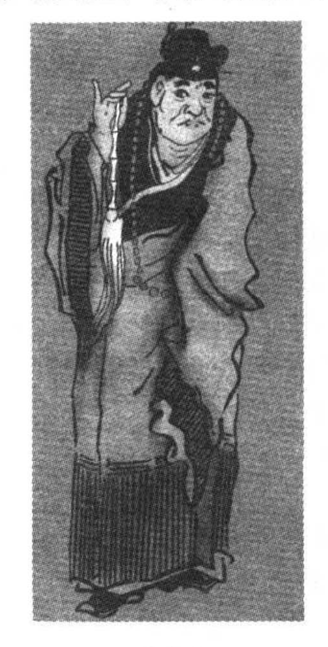
铁木迭儿疯狂横行，专权自恣，贪赃不已的恶劣行径，引起了英宗对他的强烈不满，尤其是许多元老旧臣被铁木迭儿谗毁杀害，有的接二连三地隐退，或杜门不出，因此英宗开始对铁木迭儿渐渐疏远，此时皇太后也“惊悔”莫及。铁木迭儿由是日不见用。英宗至正二年八月，铁木迭儿冷落地“疾死于家”。死后，御史大臣愤怒地奏劾了他的各种罪状。英宗下诏，毁掉他的功业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籍没其家”。

铁木迭儿的三个儿子也没有好下场，一个儿子八剌吉思在刘夔贪污集团案中被诛。另一个儿子班丹不久也固“赃败”，第三个儿子锁南后因叛逆被处死。英宗痛心疾首地告诫群臣说：“铁木迭儿贪蠹无厌，虽死宜籍其家，惩后也。”

铁木迭儿就是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宰相。他历元王朝五代君主（元世祖、元成宗、元武宗、元仁宗、元英宗），贪财有术，行贿有方，敛财聚货，中饱私囊，遇害忠良，最后名败身裂，实在是死有余辜。

【刘瑾】

（？~1510）明朝宦官。本姓谈。陕西兴平人。景泰年间自宫，依太监刘某进用，改刘姓。孝宗时选侍太子。武



刘瑾像



明彩塑太监像

宗即位后，历掌钟鼓司、五千营、团营，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并得宠，号称“八虎”。正德元年（1506）十月，诬阁臣刘健、谢迁为首的外廷官僚与司礼太监王岳等内外相结，欲挟制帝之出入，使武宗杀王岳等人，得任司礼太监。三年六月，刘瑾升任司礼秉笔太监，控制朝政。

刘瑾以侍东宫得幸于武宗，日导武宗游戏，使其怠于政事。在武宗宠任之下，刘瑾恣意打击反对派官僚，将大学士刘健、谢迁及尚书韩文和部曹李梦阳、王守仁等五十余人定为“奸党”，并与阁臣焦芳深相结纳，以陕西官僚张綵为吏部尚书，制约外朝。他还擅自增加陕西、河南乡试名额，以优焦芳、张綵乡土。为加强对宦官系统的监视，刘瑾创立内行厂，权力在东、西两厂之上（见厂卫）。利用秉笔之便，将草奏带回私寓批答。有司奏章必先投他再投通政司。当时，瑾“权擅天下”，有“刘皇帝”或“站皇帝”之称。素贪贿，入觐、出使官员皆须厚献。他还借增置皇庄、皇店之机，扩充自有庄田，仅天津附近所占庄田不下千顷。为巩固封建专制，缓解仓储不足和日益加深的统治危机，刘瑾又派官查盘各地钱粮，惩处失职官员；提出免征天下食盐税，巡盐御史亲自查验盐引。禁止私贩夹带，禁止使用过期作废盐引；正德四年八月起，派官清丈屯田，规定勋戚、武臣及守备太监等占田数量，并对官豪之家占种或典卖屯田事依律究问。

刘瑾的擅权专横，不仅激起民怨，也引起内廷和外廷的不满。正德五年四月，安化王朱寘鐇以除刘瑾为名，起兵反叛。武宗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监军讨伐。八月事变平息，张永用一清策利用报捷之机，密奏刘瑾诸不法事。刘瑾被逮，抄其家，得金银数百万，其他珠宝不可胜计，并查获玉带、衮衣等违禁物品，遂以谋叛罪被凌迟处死。

【夏言】

初敢切谏　恪尽职守

夏言（1481～1548），字公瑾，江西贵溪人。父亲夏鼐，曾做过临清知州。夏言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天资聪慧，善写文章，在正德十年（1515）三十七岁时考中进士。

授官行人，以后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身任言官，他正直敢谏，勇于负责。世宗继承皇位，夏言上疏说：“正德年间，朝廷阻塞雍蔽到了极点。现在陛下维新政务，请每日临朝视政，然后到文华殿审阅表章奏疏，宣召内阁大臣当面商议，

事或关大利大害，别下交朝廷大臣集体议决，不宜只同宠信之臣谋划，由宫中直接发出圣旨。圣上对臣下的赐予和削夺，也需须下交内阁商议而后施行，以便杜绝闭塞欺诈之弊。”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奉诏同御史郑本公、主事汪文盛核查亲军及京卫冗员，淘汰三千二百人，又条列九件政事上奏，一时京城为之整肃。

嘉靖初年，偕同御史林继祖等出京堪查庄田，把被侵占的民间的田产全部夺回，归还百姓。上疏弹劾宦官赵敞、建昌侯张延龄，奏疏一共上了七次。提议将后妃靠近京城的田庄改为少量举行皇后采桑养蚕典礼的亲蚕厂、公桑园；禁止皇亲贵戚求请赐田并禁止河南、山东等地奸人将百姓田产投献给王府。夏言以上诸疏都直言切谏，为人们所传阅诵读。后提升为兵科都给事中。孝宗弘治年间，朝廷曾下令吏部、兵部每季度开列京师、南京大臣及各地文武主要官员的履历上呈皇帝览阅，而到了正德年间此法却逐渐废弃，后因夏言提议，又予以恢复。嘉靖七年（1528）调任吏科都给事中。

曲顺帝心　入阁执辅

明世宗是明朝第十二代皇帝，《明史》上说他“性刚愎，好自用”，他的性格确是刚愎自用，擅作主张。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事件，就明显说明了他的这种性格。在这次事件中，他力排廷议，尊生父兴献王为兴献皇帝、生母为兴献皇后。及后，他又着力改革礼事，以制礼作乐自任。大约在嘉靖七年前后，对明朝的祭祀礼制提出了新的意见，借此时机，夏言开始受器重。

明朝初年，太祖曾筑“圜丘”于南郊以祀天，筑“方泽”于北以祀地。又沿袭汉唐故事，把天地合祀。以后天地合祀之制在明朝一直沿用了一个半世纪。世宗认为天地合礼不合乎“礼法”，想要重新分建天、地二郊，并日、月而成四。世宗首先征询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孚敬的看法。此事关系重大，张孚敬首鼠两端，不置可否。世宗又在明朝开国皇帝太祖牌位前占卜，显示的结果是“不吉”。世宗无可奈何，准备搁置这项改制。但就在此时，夏言瞅准机会，迎合世宗的心理上了一道《皇后亲蚕疏》，此疏的主旨是：农桑为天下之本，请皇帝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世宗觉得夏言的南北郊之说，与自己分建天地二郊的主张不谋而合，令张孚敬向夏言进一步颁旨，让他进一步说明。于是，夏言乘势再上疏，提出：以冬至祭天于南郊之圜丘，以夏至祭地于北郊之方泽；这种礼法，有《周礼》及高皇帝初即位诏为据；汉唐不足法。世宗读过夏言这道请分祀天地的奏疏后，如获至宝，他在宫中隆重地召见了夏言，迅速提升了他的官职，赐夏言玺书及四品官服，批准了夏言天地分祀之请。

不久，夏言又力排众议，在一系列事关国体的重大礼制问题上为世宗的主张寻摘章句，谋求依据，这更使他深得世宗恩宠。譬如，世宗提出改“太宗与太祖并配天”的旧制，变为“以太祖配天，而太宗祀大享殿”。对此，首辅张孚敬还是犯难，夏言便写了一道奏疏，发挥世宗的想法，并引据古礼论证。嘉靖十年三月，夏言被擢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在朝中地位日隆。世宗如此器重夏言，除了俩人在礼制问题上甚为投缘之外，还因为夏言的才貌均有过人之外，

史书记载，夏言长得眉目疏朗，美髯飘胸，声音洪亮，一口标准的官话，没有一点乡音。作为经筵日讲官，大获世宗欢心。

夏言受宠，无形中却得罪了首辅张孚敬。作为百官之长，张孚敬平时在朝中是趾高气扬，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百僚中无敢与之相抗者。现在夏言刚出道，恃世宗之恩宠，就多次顶撞张孚敬，不听其指使。夏、张俩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嘉靖十年秋，行人司正薛侃写了一道关于"皇嗣"的奏疏，准备上呈世宗。上奏之前，薛侃先将奏稿交太常寺卿彭泽审阅。彭泽预计薛侃此疏一上必会招来横祸，因为当时世宗十分忌讳廷臣谈这类事情。彭氏是张孚敬的亲信，他觉得可以借机打击夏言，帮张孚敬出口恶气，因而又把疏草交给张孚敬看。张串敬将疏草抄了下来。不久张孚敬求见世宗，将抄录的薛侃奏疏交给世宗，谎称："薛侃此疏，乃是夏言所指使。皇上先不要揭穿，等薛侃自己将奏疏上呈以后再说。"果然，不几日薛侃的奏疏就到了，世宗对疏中内容极为恼火，令将薛侃逮捕下狱，追究其主谋者。夏言受诬，遂被投入大牢。在刑讯薛侃过程中，彭泽软硬兼施，千方百计诱使薛侃攀诬夏言。不料，薛侃不肯顺从，将张孚敬、彭泽的圈套和盘托出。世宗得知事情真相，非常生气，令张孚敬退休。夏言出狱后史受重用，很快升礼部左侍郎，不久又坐上礼部尚书的交椅。

离开给事中之职不到一年，夏言便升官为六部尚书，这升迁的速度是空前的。当时士大夫凡厌恶张孚敬的，均依靠夏言与他相对抗。夏言既能以明达敏捷得到皇帝的信任，又能折节下士。御史喻希孔、石金请求宽大"大礼仪"得罪之诸臣，皇帝大怒，命令夏言弹劾。夏言说喻希礼、石金用心是良好的，请皇帝宽恕。皇帝逮捕二人入锦衣卫狱，流放到远方，并要夏言认罪，夏言承认罪过皇帝才消了气。这事使夏言在公卿间大得声誉。嘉靖皇帝制定的礼乐制度，大多是夏言做礼部尚书时议决的，内阁大臣李时、翟銮不过徒充其位而已。皇帝每次作诗，都赐给夏言，夏言全都酬答和诗进呈，并将诗刻在碑石上，皇帝益发赏识他。有时在禀奏对答中就命撰写诗文，夏言稍等片刻，即可完成。夏言善于暗中体察皇帝的旨意，因此所答多能顺应附和。赐银制图章一枚，令夏言用它钤印密封，上奏言事，图章所刻之文是"学博才优"。先后赐给麒麟服、玉带、金银、上等醇酒等。

张孚敬、方献夫后又相继入阁，二人知道皇帝此时正眷恋夏言，也就不敢再与他对抗了，后来他们都离官谢任。内阁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只剩霍韬在朝，仇视夏言的态度不变。嘉靖十五年，因顺天府尹刘淑相之事，霍韬、夏言相互攻击，霍韬终究不能扳倒他，夏言因此就专横擅权起来。郎中张元孝、李遂对他小有违背，夏言便奏准将他们降职。皇子诞生，皇帝奖赐夏言甚为厚重。初始加太子太保，不久又晋升少傅、太子太傅，闰十二月更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要重务。随从圣驾拜谒皇陵，回来的时候行至沙河，其庖厨之中失火，火势蔓延到郭勋、李时的行帐，皇帝交给夏言的六份奏章也被焚毁。夏言与郭勋等合在一起谢罪，遭到皇帝严厉地谴责。当时李时是内阁首席大学士，但政

务的裁决却多出自夏言。李时逝世，夏言为首辅。嘉靖十八年，加夏言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

权势之争　渐失宠幸

夏言与严嵩随从皇帝到承天，皇帝拜谒墓陵完毕，严嵩再次请求举行上表庆贺之礼，夏言则乞请立即还京，皇帝只好作罢，虽然返京，皇帝的心里可是老大不高兴。严嵩窥探了皇帝的意向，越发坚持请求表贺，皇帝于是说："礼乐之事由天子决定就可以了。"命令上表庆贺。皇帝从此不喜欢夏言。皇帝巡幸大峪山，夏言进呈居守敕稿迟慢，皇帝责备训斥说："夏言自下级官员，通过议郊礼之祀而提升，但却敢于怠慢不恭，进呈密疏不加盖所赐银章，着令全部归还历次所降赐给他的亲笔敕书。"夏言恐惧不可终日，上疏谢罪，请求不要追夺所赐银章及皇帝御笔敕书，以便作为子孙百世的荣耀，言词非常沉痛恳切。但是皇帝怒气未消，并且怀疑夏言将所赐银章、手敕等毁掉损失。于是急命礼部追缴取回，削去少师勋阶，以少保、尚书、大学士衔退休。夏言于是急将手敕四百余件及银章一起上呈。过了几天，皇帝怒火销歇，命他停止离京，又以太子太傅入值，夏言上疏谢恩。

夏言既然已经失去皇帝的宠幸，严嵩便日益以柔媚巧语得宠。夏言惧怕被斥退，唤来严嵩共同谋划。但此时严嵩已着手搞掉夏言而取代其位的计划，夏言知道后大怒，暗示言官屡次弹劾严嵩。皇帝正在怜爱严嵩因而不接受对他的弹劾，夏言、严嵩于是彻底破裂。六月，皇帝召见严嵩，严嵩叩头痛哭，控诉夏言欺凌他的种种情形。皇帝叫他详细陈述夏言之罪，严嵩趁机把夏言历来所犯过失，一一呈奏、张扬，皇帝大怒，向礼部降下敕令历数夏言之罪，正在这时出现日全蚀，皇帝下手诏说："日蚀过重，这正是对以下欺上罪过的惩戒，着令削夺夏言官职闲住。"皇帝又自责三项过失，布告天下，同时降职罢免十三人，严嵩由此便顺理成章地代替夏言进入内阁。

东山再起　被杀身亡

一旦失去权势，夏言悒悒独居，心中非常苦闷。每逢元旦或皇上、皇后生日，必定表贺，并自称"草土臣"。时间不长，世宗感到往日对夏言处分太过偏激，渐生怜意，因此后又复其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之职，仍致仕在家。是时严嵩最得世宗欢心，他恃宠跋扈，做了许多贪赃枉法的坏事。天长日久，世宗对严氏的劣迹有所耳闻，开始怀念前任首辅夏言。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世宗遣官召还夏言，且加少师勋号，位在严嵩之上。

再度出任首辅的夏言当然看不惯严嵩恶劣的小人品行，不肯与之握手言和。尽管严嵩还是世宗身边的红人，但夏言一点也不与之合作。他处理政务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见，从不同严嵩商量。严嵩掌权时所任用的亲信，夏言查清后尽行逐斥，当时朝中士大夫怨恨严嵩的贪横，见夏言能镇住严氏，都深感欣慰。然而就在官场形势十分有利于夏言之时，他未能把握机会，出现了许多不应该出现的舛误。

夏言复出之初，抑制严嵩的形势，励精图治，博得朝中士大夫的好感。但夏言却因"废弃久，务张权"，严厉处罚了一批官员，其中一部分确为严嵩党羽，但更多的只是偶有小过的官员。如

文选郎高简的流放，唐龙、许成名、崔桐、王用宾、黄佐的罢官，王杲、孙继鲁等的入狱，都是由他一手操办，处理有些过严，使朝中士大夫感到心冷，逐渐对他失去信任。廷臣们对他态度的变化，他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世宗经常派小太监出宫传达谕旨，夏言恃才傲气，见了这些小太监，不给一点好脸色看，视之如奴仆更谈不上笼络他们了。在这一点上，严嵩的做法与他截然相反，每次小太监到严府，严嵩必定牵着小太监的手，热情延坐款待，等小太监临去，又悄悄地在小太监们的兜中塞上沉甸甸的黄金。小太监们回宫后，自然在世宗耳边争着说严嵩的好处，并不时透露宫中一些消息给严嵩，而夏言对宫中情况则一无所知。

最初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得幸"。所谓"青词"就是在斋醮仪式上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丽体，因用朱笔写于青藤纸上，故称青词。嘉靖溺道，当然要经常有"青词"上达上帝，夏言文采奕奕，早年写出的青词艳丽华藻，极合世宗口味，但是复出后的夏言已倦怠其事。世宗有时半夜派人悄悄去夏府和严府，察看夏、严分别在干些什么。每回去夏府的探子回来报告说，夏言早已酣睡。这时期的夏言，所写青词都由幕客代草，而且自己没有仔细审阅就进呈世宗。世宗看后大不满意，常常怒气冲冲地掷在地上。而严嵩固有宫内情报相通，每次等世宗派人来察看，常常半夜仍坐在案前点灯琢磨青词，来人回去汇报世宗，世宗十分高兴。如此一怠一勤，严嵩的青词愈多愈精工，愈得世宗喜欢，而夏言面临的形势已相当严峻，再次下台已势在必然。

嘉靖二十五年，朝臣中出现"河套"之议。在这场大辩论中夏言遭严嵩暗算，终于为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遗恨的句号。

这年，陕西总督曾铣上疏世宗，提出收复河套的建议；曾铣的至交是江都人苏纲，苏纲是夏言的岳父。固有这层关系，苏纲在夏言面前极口称誉曾铣的主张和才干。夏言本心中赞同曾铣的建议，又得岳父的举荐，于是向世宗写了一折密疏，劝说世宗接受曾铣出兵收复河套的建议，并在疏中说："群臣中对陛下最赤胆忠心的，当首推曾铣！"但是正是由于这一密疏，成为夏言下台的祸根。

世宗阅过曾铣奏表及夏言密疏，开始也跃跃欲试，有收复河套的想法。他令夏言代为拟旨，对曾铣"优奖"。曾铣大喜，更加锐意出师，又上了第二道奏疏，提出尽快落实收复计划的想法和措施。不料就在曾铣上第二道疏这当儿，世宗忽然变得犹豫不决。他谕夏言等人说："河套之患，由来已久，此时计划收复，不知师出果有名否？兵果有余力否？兵食果有余积，成功可必否？"显然，世宗对打赢这场战争毫无把握。严嵩从这道谕旨看出机会，立即上疏说："敌方太强，取胜不易，河套恐难收复。此次师出无名，万一开战，所费不轻。"这几句话，正说中了世宗的心病，于是世宗一改初衷，开始反对收复河套。严嵩在疏中不仅提出反对意见，而且话锋还暗指夏言："廷臣多知收复河套不宜，只因朝廷中有人以威势压制，故而廷臣多不敢说话。"这里提到的"有人"，当然指夏言了。

夏言得知世宗的态度已大变，且严

嵩上疏中涉及到自己，遂上书世宗谢罪，并且辩护说："当初商议出兵，收复河套，严大人也曾参与其中，其并无异议。如今将所有责任全部推臣下一人，严大人仅想脱身事外罢了。"严嵩则再上疏，网罗罪名，攻击夏言，欲趁机将他扳倒。夏言自然不服严嵩所提，遂亦上书世宗，一面为自己辩护，一面攻击严嵩。此时世宗已厌倦夏言而听信严嵩，见夏言不肯认错，怒不可遏，不久，世宗下令罢停收复河套的准备工作，把首倡此事的总督曾铣逮捕。嘉靖二十七年正月，世宗以夏言"事为任意，迹涉强君"的罪名，尽夺其官阶，令以尚书职致仕。但世宗对夏言还留一丝怜意，虽令其告老还乡，尚不欲置之死地。

夏言离开京都后，灾祸并没有离他远去。严嵩党羽在京城中大放流言，说夏言临去时怨恨满腹，咒骂皇上，这些流言不久就传入宫中，世宗知道后，不辨真伪，对夏言恨意大生，杀意大起。严嵩与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人密谋，欲置夏言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找到身系囹圄的仇鸾，欲借仇鸾之口诬告夏言。仇鸾本是红极一时的边疆要员，因贪污不法，被总督曾铣告发，逮捕入狱。仇鸾对曾铣恨之入骨。严、仇两人一拍即合，商定由严嵩代仇鸾草疏一折，诬告夏言、曾铣两人相互勾结，贪赃枉法。不久，这道署仇鸾之名、实由严嵩起草的奏疏上达世宗手里。奏疏内容，一是言曾铣镇守边关，曾经隐瞒败绩；二是言曾铣以五千金贿赂夏言岳父苏纲，又让苏纲转交二万金贿赂夏言。世宗不经调查，对疏中揭发的"罪行"深信不疑，下曾铣、苏纲诏狱。在严嵩的主持下，曾铣被扣上"交结近侍"的罪名斩首，苏纲则被流放边地。同时，又从京城派出锦衣卫官校逮捕夏言。夏言到达通州时，听到曾铣所犯罪是"结交近侍"时，大吃一惊，一时之间从车上堕落，叹道："唉！我死定下了。"怀着一线希望，夏言再次上疏论冤，疏中反驳道：仇鸾已被逮入狱，何以还知道皇上前二日说的话？奏疏何以同严嵩的口气那样吻合？这分明是严嵩等人在合谋陷害我；严嵩奸巧弄权，父子专政。在内皆臣受其牢笼，只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在外诸臣受其箝制，亦只知道有嵩而不知有陛下。但正遇世宗盛怒之际，因而阅过奏疏后根本听不进他的辩解言语。结果，夏言之罪名成立，被投入大牢。一些大臣如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纷纷上疏要求另议，还是打动不了世宗的心。夏言妻苏氏发配广西，从子礼部主事克承、从孙尚宝司丞朝庆，皆夺职为编民。不久，严嵩再在世宗面前加谗言，终于使世宗下了杀心。当年十月，夏言被弃市，终年六十有七。

夏言死后，严嵩一手遮天，祸及天下。隆庆初，夏言家人上书诉说夏言冤状，要求昭雪。穆宗下诏，追复夏言原官，特赐祭葬，谥"文愍"。

【严嵩】

察言观色　媚上取宠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今江西分宜市）人。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后辞官回家，在家乡钤山读书十年，作诗古文辞，颇有清高的声名。还朝很久，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世宗嘉靖七年（1528），历礼部右

侍郎。

明世宗特别迷信鬼神，他幻想长生不老。即位后不久，就在宦官崔文等人的引诱下，成天打醮设斋。尽管朝中大臣一再劝谏，他都不听。他最初宠信的道士是龙虎山上清官的邵元节。邵元节自称可“炼童男、童女溲为秋石，服之延年。”世宗信以为真，将他封为“真人”。兵科给事中高金上疏请削去邵元节“真人”号，世宗非常生气，竟将高金下狱拷打。搞斋醮这类仪式需要“青词”。青词是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要求写成骈文的形式，并用笔写在一种特制的青藤纸上，“青词”这名，由此得来。由于世宗每天热心斋醮，所以许多大臣都精心研制，撰写“青词”。世宗性格特点刚愎自用，专横暴虐。他刚刚即位时还开点言路，但两三年后就听不进一点意见了。史书说他“厌恶言官，废黜相继”。中年“益恶言者”，乃至朝廷内外，“相戒无敢触忌讳”。世宗的嗜好与个性特点，被善于看风使舵的严嵩所掌握，他曲意逢迎，大售其奸，以善作“青词”，步步取得了这位昏君的宠信。

嘉靖七年严篙当时任礼部右侍郎。他奉世宗的命令去湖广安陆祭扫世宗生父的陵墓。事后严嵩煞有介事地向世宗献媚说：“我献上宝册及奉安神床时，都应时雨过天晴。另外，碑石产地枣阳，群鹤围绕飞翔，当载着石碑的船只进入汉水起运，河水骤然上涨。这些都是祥瑞之兆，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上天的眷顾。”这一番装神弄鬼的话博得了一向喜谈祥瑞的世宗的欢心，于是严嵩马上被升为吏部右侍郎。两年后他又被任命为南京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当年，礼部举行科举考试，严嵩主持这次考试。他向应试举子索取很高的贿赂。御史桑乔知道这一情况，上疏参劾，要求罢免严嵩。严嵩自知事泄，担心官职难保。上疏为自己曲意辩解同时又请求朝廷免去自己的职务。给事中胡汝霖，劾其“秽行既彰，招致论列，不得饰词自明，以伤大体”。但世宗对此事睁一眼闭一眼，不予深究，严嵩为此十分得意，以后更加竭尽全力地媚上取宠。

嘉靖十七年世宗准备将生父兴献王神主人太庙，遭到群臣的反对。严嵩开始也附和众议。后来他看到世宗很不高兴，马上改变主张，并精心策划兴献王神主入太庙的仪礼。世宗对这件事感到很满意，特意赐以金币以作为给他的奖赏。第二年皇城上空出现祥云，严嵩借此大作文章，请世宗入朝，受群臣朝贺。严篙精心制作齉齉《庆云赋》及《大礼告成颂》极尽献媚之能事。就在这不久，严嵩与大学士夏言，随世宗去安陆谒兴献王陵墓。谒陵完毕，夏言请求圣驾回京，世宗很不高兴。严篙则请世宗接受群臣贺拜的表章。好大喜功的世宗



严嵩像

欣然答应，说："礼乐白天子出，这样可以。"于是又行了一番群臣贺拜的仪礼。从此以后，世宗开始不满夏言，而宠幸严嵩。

嘉靖二十年，有人以金三千两贿赂严嵩及有关官员，被东厂人员发现，其他受贿的官员都被充军边疆，只有严嵩安然无事。后来，永寿王庶子与嫡孙争位，该庶子以黄金三千两贿赂严嵩，严嵩受贿后表态支持他继位。永寿王妃知道这件事后，派人进京击鼓鸣奏，御史叶经参劾严嵩有贪污罪。严嵩急忙进宫向世宗辩释。世宗一心偏袒严嵩，说道："继位之事应如何办，交有关部门处理，严嵩仍然安心任职，勿以介意。"严嵩受宠若惊，以后更是有恃无恐，一心想谋夏言的首辅位于。后来，叶经出监山东乡试，严嵩竟摘取试题中有所谓"讽刺皇上"的话，把叶逮至京都，杖毙宫殿之下。

严嵩与夏言是同乡，中进士早于夏言，但职位比他低。阴险狡猾的严嵩在夏言面前装得十分恭谨，为了讨好夏言。他一次特地备好丰盛的家宴，并亲自到夏府邀请夏言。夏言对严嵩的恶劣行径非常不满，故意推辞不见。严嵩竟然恬不知耻地在夏府摊开席子，拿出请帖跪读，夏言为他诚恳的样子所感动，由此对他深信不疑。严嵩表面上对夏言十分恭顺，但暗中却时刻在找机会算计他。

世宗沉溺道教，喜戴香叶冠。并命宫人仿制沉水香冠五顶赐给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认为，根据朝廷礼制，香叶冠非大臣所用之物，他公开表示不戴。严嵩为了讨好世宗，每次进宫都戴上香叶冠，上面再戴上官帽，并故意在帽外露出一截裹住香叶冠的轻纱。世宗见了，更加喜欢严嵩而疏远夏言。严嵩这种恶劣行为使夏言十分厌恶，他于是指使人弹劾严嵩。以后严嵩每当受到世宗召见时，都要泪流满面哭诉夏言对自己的攻击与欺凌，并诬告夏言有轻慢犯上之罪。心境偏狭、性情暴躁的世宗一怒之下，于嘉靖二十一年竟将夏言革职。八月，严嵩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这时的严嵩已六十多岁，但他精神焕发，如同少壮时一般。日夜值班西苑板房，从不回家，连洗个澡的时间也没有，世宗更加认为严嵩勤快。

严嵩入阁以后，地位仍在另一阁臣翟銮之下。因为在夏言去职之后，阁臣按资序以翟銮为首辅。严嵩又把翟銮视为他窃权的绊脚石，必欲去之。机会终于来了。嘉靖二十三年，翟銮的两个儿子翟汝俭、翟汝孝同举进士。严嵩诬其作弊，唆使给事中王交、王尧连日上疏参劾翟銮。世宗听信谗言，将翟銮罢去首辅，削职为民，这样严嵩自然而然地取代翟銮，坐上了首辅的交椅。

残杀忠良　贪赃枉法

严嵩重掌内阁大权之后，为了巩固地位，对敌对力量竭力打击，对敢于揭露自己罪行的大臣更是不择手段地予以扫荡，不少仗义执言参劾严嵩的官员纷纷落马，有的竟惨遭杀害。

嘉靖二十七年给事中厉汝进参劾严嵩父子横行不法，被贬为典史，不久又削籍为民；嘉靖二十八年给事中沈束上疏请求朝廷为多次立功边塞、积劳成疾而去世的大同总兵以恩恤，同时疏中指斥严嵩误国。严嵩大怒，将沈束廷杖后下狱。嘉靖三十年正月，锦衣卫经历沈炼针对蒙古族俺答部的骚扰，上疏请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粮库，联合

各路勤王的部队攻击俺答疲之师，此奏疏先达严嵩手中，他压着不报，沈炼知道后，怒火中烧，再次上疏，指斥严嵩父子把持朝政，揭露严嵩纳贿、檀权、陷害言官、嫉贤妬能等十大罪，要求世宗“去此蠹国害民之贼”。而一向偏袒严氏父子的世宗接疏后“龙颜大怒”，下诏将沈炼廷杖后贬谪保安。沈炼至保安后，当地老百姓知道他是因参劾严嵩而获罪，对他十分敬重，很多人都派出自己的子弟向他问学。沈炼向他们教以忠义大节，师生经常在一起咒骂严嵩这个奸贼，并扎了李林甫、秦桧、严嵩三个草人作为靶子练习射箭。严嵩听到后羞恼不已，指使党羽杨顺捏造罪名将沈炼杀害。这一年三月，朝廷对京官进行考察，严嵩授意吏部把反对他的大批官员削职。世宗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严嵩处置失当，曾令吏部保留他们的职务。但他后来见到严嵩也未向他提起过这件事。

原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对严嵩奸行早已痛恨，嘉靖三十二年他升任兵部武选司刚刚一个月，出于为国除奸的一片忠心，愤然参劾严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方今在外之贼为俺答，在内之贼为严嵩。必先除内贼然后外贼可除。”他在上书中数列了严篙的十大罪与五大奸。十大罪状是：明朝自太祖起即废除了丞相制，而严嵩一直以宰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将皇上善政尽归于己，掩主上之治功；纵子窃权；子孙未涉行伍，却冒领军功；纳贿营私，任用奸人；阻止抗击俺答，贻误国家军机；中伤、陷害言官；执柄以来，朝野上下贪污贿赂成风，以至失天下人心，坏天下风俗。五大奸罪状是：厚赂皇帝身边的太监，使之成为耳目；控制了负责向皇帝呈送奏章的通政司，使之成为玩弄阴谋的机构；勾结、拉拢厂卫官员，使之成为心腹；笼络言官，使之成为走狗；网罗官员，结成私党。此奏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严嵩种种恶行劣迹，忠愤之情，充溢字里行间。世宗此时已一意宠信严嵩，接疏后大怒，加之疏中有劝世宗“或召问二王，或询问阁臣”等语，认为这是杨继盛有意挑拨自己与诸王的关系。于是令锦衣卫将杨继盛逮捕，廷杖一百下狱。杨继盛因受廷杖重刑，入狱时伤期很重，经常夜半痛醒；疼痛难忍之时，敲碎瓷碗，用瓷片割去腐肉；腐肉割尽，再割腐烂的筋膜。狱卒见到此情状，执灯之手都直打颤。杨继盛每次出庭受审，内臣、士民都夹道围观，异口同声称赞他为了不起的义士。有人指着他戴的枷具说：“为什么不把它戴在严贼的头上?”扬继盛在狱中关了三年，世宗本来无意杀他，但严嵩认为如果饶他一死，无异养虎贻祸。后来在另一个重要案件中，又捏造事实，把杨继盛牵扯进去，使他惨遭杀害。杨继盛的妻子张氏得知丈夫被判死刑的消息，曾上书世宗，涕泣陈辞，请以己命代死，但这封信被严嵩扣压下来。

杨继盛壮烈死节的事迹使朝野士民感慨不已。王世贞曾向杨继盘问学，对杨继盛的学问与品德均十分景仰。杨继盛被捕后，他曾多方设法营救；杨继盛被杀后，他参与料理了杨的后事。严嵩知道后，授意御史捏造罪名将王逮捕，并立刻杀害。对嘉靖时代黑幕与严嵩奸行有着深深了解的王世贞后人后来写出了《鸣凤记》这个剧本，以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

在陷害忠良的同时，严嵩大肆结党营私，在重要部门遍插亲信。其子严世蕃身任工部右侍郎，因严嵩年老，大事均委他办理；严嵩义子赵文华任工部尚书，并控制负责向皇帝皇送奏章的通政司，凡官员呈给世宗的奏章，须由赵文华交副本给严嵩过目，经他批准的方能上奏。吏部文选郎与兵部职方郎也分别由严嵩的亲信把持；前者负责官吏的升迁，后者负责有关军制的具体事宜，他俩被人称为严嵩的文武管家。此外如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耀、许炝等都是严嵩的死党。由于严嵩有皇帝作后盾，严嵩又是这些人强硬的后台，这些人都一个个气焰嚣张、无法无天。司业赵贞吉在俺答入侵时，请兵抗敌，为赵文华所阻，赵贞吉气愤不过，骂了他一句“权门狗”。赵文华告到严嵩那里，结果赵贞吉遭廷杖后贬谪岭南。

严嵩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大肆谋取钱财。每当吏、兵二部选拔官员，严嵩都要亲自安排二十多个名额；每个名额索取贿赂数百两黄金。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篙一万三千两白银升迁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千二百两黄金被任命为山东临清知州；甘肃总兵仇鸾因罪下狱，后通过家人贿赂严世蕃三千两黄金即被释放并保荐为边将。每日到严嵩府上行贿的人可谓车水马龙，一些人为了见到严嵩父子，得先买通他的家人，其家人严年倚仗主子的权势索贿受贿，长年来积累家财达数十万金之多。至于严嵩父子贪污受贿积累起来的家产更是恒河沙之数。他们在北京附近就有庄田一百五十余所，袁州一府四县的田竟有70%是严府私田。至于鲸吞的金银财宝更是十分惊人。严府的金银人物有的高达二三尺，甚至溺器都是以金银铸造。严嵩父子担心自己的幂行有朝一日败露，曾将大量金银珍宝偷偷运往江西老家藏起来。严嵩垮台后被抄家，共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他珍宝价值白银数百万两。

寄食墓舍　恶贯满盈

尽管严嵩狡诈异常，手段隐蔽，但因多行不义，不断遭到仗义执言的大臣的参劾；加以年老，精力衰退，世宗开始疏远他，而此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徐阶却逐渐取得了世宗的信任。嘉靖三十七年三月的一天，刑部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董传策同时上书参劾严嵩。他们分别揭露了严嵩执柄以来的种种罪行，请求世宗“除恶务本”，“亟去严嵩父子”以谢天下。吴时来等为徐阶学生，董传策为徐阶同乡，严嵩怀疑徐阶是吴、董幕后主使，他密奏世宗：“三人同日构陷，必有人主使。”世宗于是下诏将二人下狱拷问，但他们都不承认有幕后主使，只说是“太祖神灵教臣等为此言”。迷信神灵的世宗由此而增加了对严嵩的反感。根据明代制度，凡朝廷重要文书，由内阁首辅先拟好，写于票签之上，然后送呈皇帝御批，这称为“票拟”。严嵩此时年老体衰，已不能胜任这一工作，往往要儿子严世蕃入内阁值房。但严世蕃又时常同诸妾在一起淫乐，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自己来干这事。但因老眼昏花，反应迟钝，所拟之辞，往往词不达意。有时送上去了，他又派人追回修改。就这样，世宗对严嵩的不满越来越加深。

嘉靖四十年，世宗所居永寿宫发生火灾，他于是移居玉熙殿。世宗对这个

地方不满意，想新建一所宫殿，他为此曾征询严嵩的意见，严嵩要他住到南城离宫去，南城离宫为当年英宗当太上皇时幽禁的地方。世宗听了很不高兴，转而问徐阶的看法，徐阶建议重修永寿宫，这正合世宗的心意。从此，世宗更加信任徐阶，凡军国大事都不让严嵩过问了。一次世宗问道士蓝道行："方今天下为何不大平?"蓝道行知道世宗这时已对严嵩不满，便假占卜之口列举严嵩父子的罪行。世宗说："倘若如此这样，上仙为什么不除掉他们?"蓝道行又用扶乩之口说："上仙要留待皇帝自己去除掉他们"御史邹应龙从太监那里了解这一情况，认为除奸的机会已到。他于是上疏，数列严嵩父子及严氏家族的种种罪恶，指出他们一家如此作恶"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竭，妖人灾警安得不迭至!"疏上，世宗令严嵩退休，严世蕃充军雷州。

严嵩去后不久，世宗追念他赞助修炼的功绩，心中郁郁不乐，传谕徐阶要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徐阶极力陈述不可。世宗说："卿等不要我传位，必须都奉君命，一同辅佐修炼才行。严嵩既退，他的儿子严世蕃已服刑，敢再劝说的和邹应龙一起斩杀。"严嵩知道世宗还想念自己，于是贿赂世宗左右，揭发蓝道行的隐私，押在刑部，以便他牵连徐阶。蓝道行不承认，论罪当死，后得以释放。严嵩当初回到南昌，正逢万寿节，他让道士蓝田玉建醮铁柱宫。蓝田玉善于招鹤，严嵩因而取了他的符篆和自己的祈鹤文进呈世宗，世宗优诏褒奖。严嵩因而又说："臣年八十有四，只有一子世蕃及孙鹄，都远戍边陲，乞陛下将他们转移到近地就养，终臣余年。"没有准许。次年，南京御史林润奏说："江洋巨盗多到逃成人罗龙文、严世蕃家。罗龙文居架山，乘轩车，衣蟒服，有凭恃山险而逞不臣之心。严世蕃得罪后，与罗龙文天天非谤时政。建造宅第役使四千人，还都传说他们通倭寇，恐发生不测之变。"下诏林润将二人逮捕，下法司论斩，皆伏诛。为此贬严嵩和诸孙为民。严嵩窃取政柄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人指为奸臣，坐严世蕃大逆不道之罪处死。又二年，严嵩老而病寄食墓舍而死。这个恶贯满盈的老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徐阶】

（1503～1583）明朝大臣。字子升。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为福建延平府推官、江西按察副使，屡进为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吏部尚书，三十一年入内阁，四十二年任首辅，隆庆二年（1568）七月致仕。

徐阶性颖敏，有权略，器量深沉。虽长期研习理道良知之学，但"以躬行



徐阶像

为实际，以经济为真诠”，业绩颇多。在延平府推官任中，创社学，毁淫祠，捕巨盗，清狱囚，无辜受害者，多得平反。在吏部任上，他一反过去接见庶官不数语的常规，见必咨以边腹要害、吏治民情，各官皆乐为用，又知人善任，所荐官员多谨厚长者，深得人们赞誉。任首辅之后，尽反严嵩弊政，注意选用与保护人才，先后引用高拱、张居正等入阁，谏止动辄捕杀边镇大臣现象，缇骑因此省减，诏狱渐少。他又力救户部主事海瑞，使免一死。明世宗朱厚熜死后，阶起草遗诏，将大礼议中因言事得罪诸臣全部平反，存者招用，死者优恤；同时起用有节行、恬退自守之士，以励忠义风节。故诏下之日，朝野号恸感激。徐阶执政期间，还减轻百姓负担，清理盐课，致流徙尽复，课额不亏。景王死后，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朱厚熜去世后，阶把斋醮、土木、珠宝、织作等统统罢除，为人民所拥护，朝野称之为“名相”。

徐阶为取得世宗信任，避免严嵩迫害，也“谨事嵩”。罢官乡居后，其家占夺土地仍达二十四万亩，子弟家奴，横暴乡里，致讼牒山积。应天巡抚海瑞、兵宪蔡国熙秉公按治，他以三万金贿给事戴凤翔，又通过张居正嗾使给事陈三谟论去海、蔡。当时人称：“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也有人把他比之为“权奸”。死后，赠太师。著有《世经堂集》二十六集。

【魏忠贤】

（？～1627）明朝宦官。肃宁（今河北肃宁）人。少无赖。万历时以赌博输光而自宫，易名李进忠入宫。因中官魏朝得识皇长孙乳媪客氏，深相勾结。光宗崩，皇长孙即位为熹宗，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进忠也自惜薪司擢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复魏姓，赐名忠贤。从此与客氏狼狈为奸，用司礼监太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为羽翼，日引熹宗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之乐，后更增置内操万人，着甲出入宫禁，并与客氏谋杀裕妃张氏，又以计堕皇后胎，所害宫嫔、太监等甚众。忠贤得势后，先以大学士沈潅为外援，继而引私人魏广微入阁。朝中除东林党外的官僚派别，如齐楚浙党等纷纷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天启三年（1623）他兼掌东厂事，明朝政治更加腐朽黑暗。东林党人杨涟首先发难，上疏劾其二十四大罪，忠贤为此切齿痛恨东林党人，仗势杖死工部郎中万燝，先后罢斥大学士叶尚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又在中央内阁、六部以至地方


魏忠贤像

遍置死党。五年，魏忠贤逮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章等六人，牵入熊廷弼案中处死。次年，又捕杀东林党人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昇等七人。在残酷镇压的同时，命阉党顾秉谦等修《三朝要典》，尽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极力诋毁东林党人及正直朝臣。又命拆毁全国书院，禁止讲学，压制言论。时朝中大权一归于忠贤，宫内有王体乾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有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五虎”、“五彪”，还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大小爪牙，地方的阉党爪牙为取悦忠贤，争相为之立祠，其生祠竟然遍布全国。他又诬杀边将，在边境重地安插亲信，伪冒边功，致其义子干孙及亲属均位列公侯。朝廷百司章奏须经他允许方可办理。每外出，华贵已极，随众万数，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首拜伏，献媚者甚至高呼九千岁。七年，熹宗死，其弟信王朱由俭即位，是为明思宗。思宗素知忠贤之恶，及即位，嘉兴贡生钱嘉徵劾忠贤十大罪，遂谪忠贤于凤阳，旋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畏罪自杀。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又处死客氏，结束了明代政治史上宦官专权最黑暗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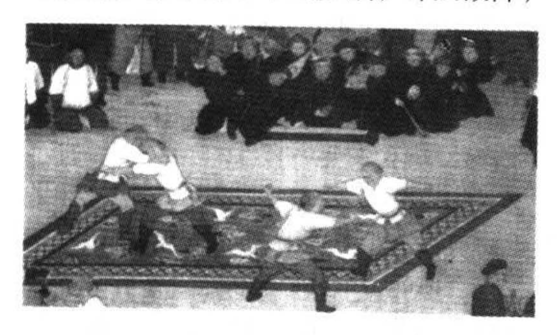
【鳌拜】

作战有功　屡受奖赏

鳌拜（？～1669），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他出身将门，祖父索尔果为苏完部酋长，明万历十三年(1585)，率所部五百余户投归清太祖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命隶镶黄旗。其父卫齐，清太宗皇太极时，任盛京八门提督。兄卓布泰，顺治时任镶黄旗固山额真，曾授征南将军。弟巴哈顺治时为领侍卫内大臣。鳌拜为卫齐第三个儿子，鳌拜从小就受到骑射训练，长大后，技艺超群，弓马娴熟，并且臂力过人。初任护军校尉，因功授甲喇章京世职，参领等职。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太宗皇太极率军第二次攻打朝鲜，鳌拜任职护卫，随侍皇太极左右。第二年正月，朝鲜投降，皇太极凯旋。临行皇太极命贝子硕托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攻取明军的皮岛。硕托军久攻不下。二月，皇太极命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往代硕托，鳌拜从征。明朝自天启元年（1621）就占据了皮岛，并在此开镇，驻以大将重兵，从后背威胁后金，时时乘虚袭击，与宁锦前线互为犄角，成为后金的心腹之患。努尔哈赤时曾几次派军攻取，但都未取得成功。皇太极为此日夜筹思，一定要把它攻打下来。阿济格奉命指挥攻岛，与诸将集议，决定分两路进攻。四月初八夜，清军一路排列巨舰，假装要攻打的样子，实际上是要吸引万余守岛明军；另一路乘船，轻舟疾进，攻皮岛北隅，实为主攻。可以看出，攻打北隅一路的责任最为艰巨。阿济格集诸将询问谁人能率军先登？鳌拜向阿济格立下军令状：“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誓必克岛而回。”于是约定登陆后举火为号。鳌拜与准塔乘舟渡海，但偷袭队伍还是为皮岛明军发现。明军立即炮矢齐发，清军冲了数次均未能靠岸，形势紧急。在这种情况下，鳌拜亲冒矢石，操舟射箭，到岸边

后，一跃而上，大呼陷阵，冒炮矢直前搏战，准塔继之，所部登上皮岛，然后举火让后继清军上来。由于鳌拜率部队占据了滩头阵地，所以其余清军蜂拥而上，遂攻克皮岛，守军一万余人被斩杀者甚众，守将总兵沈世奎被俘不屈身死。皇太极闻捷非常高兴，特撰文告祭努尔哈赤，以慰在天之灵，文曰："朝鲜既平，又率朝鲜水师，乘舟渡海，攻克明国毛文龙所居皮岛……数月之间两成功，此皆皇考在天之灵，默为保佑，故克臻此……谨告。"太宗以此岛可比大城，令从优议叙。鳌拜论首功，膺重赏，由牛录章京超擢为三等梅勒章京，皇太极还赐号给他"巴图鲁"，旋擢镶黄旗护军统领，位列大臣。

明清松锦之战，是关系到明清双方生死存亡的决战，崇德六年（1641）六月，鳌拜随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来援，立营松山西北，攻击清营，明锦州守将祖大寿亦遣兵出，夹击清军。济尔哈朗指挥右翼失利，"两红旗，镶蓝旗驻营之地，为敌所夺"。武英郡王阿济格指挥左翼，遣精锐护军助战。鳌拜统领镶黄旗护军，见明骑兵自松山出，奋力迎击，大败明军。遂后不等军令，乘胜追击，直抵明军兵列，命令部下下马步战，冲入敌阵，



布库·塞宴四事图

再败明军；鳌拜往来接战，辄当先陷阵，五战皆捷，因功由三等梅勒章京擢为一等梅勒章京。八月，皇太极倾全国之师，亲率援锦，夺明军笔架山军粮，断其归路。二十一日晚，洪承畴指挥明军分路突围。鳌拜奉命率清军左翼，截击突围明军，明总兵吴三桂、王朴、唐通等率马步兵沿海边突围，鳌拜率军追击，明军溃败，被全部驱赶人海溺死。经此一战，明军损失大半，败局已定。

崇德七年十一月，鳌拜又随饶馀贝勒阿巴泰，毁边墙人掠明境，他指挥本旗兵率先攻破明长城防线，然后，长驱直入，进逼燕京。不久随左翼攻掠至山东，攻陷兖州府及临清、汶山诸县，两路清军复会合于密云，再败吴三桂、范志完援军。崇德八年（1643）六月由墙子岭斩关而出。这一次战役，清军共攻陷明内地城池八十八座，生擒明鲁王朱衣佩等共六王，明宗室死者千余人，掠掳人口三十六万余口，牲畜数十万头，金银财物不计其数。明人说："清军壬午年（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之人，直走青齐，及淮而止，所至屠掠一空，祸为至剧……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十月，叙功，鳌拜由一等梅勒章京擢为三等昂邦章京，并受到皇太极非常优厚的赏赐。

功高受抑　幸免一死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清太宗皇太极突然病逝。满洲贵族内部因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意见，并引发了一场斗争。睿亲王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是皇位的主要争夺者。诸王兄弟有的人支持多尔衮，有的人拥立豪格。两黄旗大臣，坚决拥立豪格。镶黄旗护军统领鳌拜是主要的带兵将领，是

参与这场斗争的主要人物之一。

他和黄旗大臣索尼、图赖、图尔格、谭泰、塔瞻等八人，前往豪格家密谋计议，欲立肃王为君；又与索尼等人“共立盟誓，愿死生一处”。白旗诸王则力主立多尔衮，双方坚持不下，鳌拜等严加戒备，密令“兵丁守门”。八月十四日，多尔衮在崇政殿召集议立嗣君会议，当日一早，鳌拜与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誓立皇子，并下令精锐护军“张弓矢，环立宫殿，然后到崇政”，摆出兵戎相见的阵势。在会议过程中，当争论不决时鳌拜与皇太极手下两黄旗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辈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实则胁逼多尔衮拥立皇子。多尔衮逼于形势，折中提出拥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继位，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一方案遂为双方所接受。福临即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1644）。

多尔衮摄政后，数月之间集大权于一身，擅权自专，打击政敌豪格及其支持者。分化黄旗大臣，附己者加官进爵，重赏重用，其不附己者则遭到冷遇或压制。鳌拜不附多尔衮，因而屡遭摧抑。

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四月，多尔衮率大军入关，吴三桂开关迎降，五月初二，清军入北京。鳌拜本是骁将，却未参与入关之役，奉命与济尔哈朗留守盛京，九月鳌拜随顺治帝福临由沈阳至北京。十月初一，福临定鼎燕京，以鳌拜效忠朝廷、勤于政务和英勇杀敌之故，由三等昂邦章京擢为一等昂邦章京。同月，鳌拜随靖远大将军英王阿济格取道陕北，进攻退守西安的李自成大顺军；另一路清军，由豫亲王金铎率领由潼关攻西安，两路夹击。阿济格、鳌拜一路由内蒙进入陕北，攻下四城，逼降三十八城。第二年正月十二日，多铎攻破大顺军潼关防线，十八日进逼西安，当时，阿济格、鳌拜一军亦已南下，李自成乃弃西安。由商州经河南向湖广撤退。多尔衮命多铎“仍恪遵前旨，往定南京”；命阿济格“仍遵前旨，将流寇余孽，务期剿除。”阿济格奉命穷追大顺军。鳌拜等分翼出师，水陆并进，于河南邓州，湖北随州、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等地与农民军进行了十三次战斗，重创大顺军。六月，追及李自成于湖北通山县，李自成在九宫山遇害，大将刘宗闵被俘杀。明南宁侯左良玉子左梦庚率十二总兵，马步兵十万及大小船只四千余在九江投降。清军攻下河南、湖北、江西、南京所属六十三城。鳌拜虽屡战屡捷，但却并未因大功受赏，反而获罪受罚。

同年八月，阿济格因未遵旨立即班师，并且因奏报尽歼大顺军情形不实，命议处。阿济格是多尔衮之兄、顺治帝福临的叔父，为人粗暴专横，蔑视年幼的福临，称他为“孺子”。并且传令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会同护国统领鳌拜把英王“称上为孺子”的话向众人传布。谭泰徇王情面，并不集众传示。鳌拜听信谭泰之言，“不行集众传示谕辞”。法司议罪：“罚银一百两，此番大功不准议叙。”索尼憎恨谭泰背弃当年盟誓，党附多尔衮，讦告其“违旨背君”。谭泰革固山额真任，谭泰亦讦告索尼。鳌拜因庇护索尼，又一次获罪，几乎被革职。黄旗大臣从此矛盾加剧，鳌拜、索尼、图赖等与谭泰的嫌隙越来越深。

顺治三年正月，鳌拜、图赖讦告谭

泰于分道攻取西安时，曾遣人谓图赖曰："我军以道路远险，是以后至，南京可让我军取之。"谭泰为邀军功不择手段。鳌拜、图赖等认为应该把谭泰处死，多尔衮下谭泰于狱，意在庇护，而对不附己之鳌拜等则更加摧抑。

同年，鳌拜又随承靖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往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三月，豪格抵西安；五月，向汉中进发，当时原李自成部将后降清复叛的贺珍，有众二万余，围汉中府。鳌拜与多罗贝勒尼堪等大破贺珍，把他一直追到湖南。十一月，清军至四川南充县，时张献忠弃成都率全军北上抗清，列营凤凰山。鳌拜率精锐护军为先锋，由降清的张献忠部刘进忠作为向导，清军侦骑直抵大西军营前。张献忠于仓促中"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名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与清军侦骑遭遇，叛徒刘进忠"认明果是献忠，满兵即发箭射之"，大西军大乱。豪格奏报说："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臣至，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获战马一万二千二百余匹。"清军分路追击溃退的大西军。鳌拜与李国翰等追至遵义、夔州、茂州。四川荣昌、隆昌、富顺、内江、资阳……等州县均为清军攻占。大西军遗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退人云贵，继续抗清。

击破大西军，杀死张献忠，鳌拜又居首功。然而非但未受赏，却反而论死。有人说攻打张献忠大西军时有人冒功争赏，鳌拜坐军中详勘不实，"应革职，罚银一百两"。三月，贝子托齐讦告郑亲王济尔哈朗当年拥立豪格，后又庇护豪格诸罪状。鳌拜等人在皇太极死时拥立豪格及皇子的种种活动同时被揭发。多尔衮欲兴大狱，将牵连诸人齐集质询，定鳌拜与济尔哈朗以及诸人同谋，"曲徇肃王豪格"，应论死。但顺治帝颁诏赦免了他，允许他纳罚金赎罪。豪格亦论死，多尔衮将其幽系，不久死于幽所。四月，侍卫廓步梭又讦告鳌拜等在皇太极死时"擅发兵守门"再一次论死，改革职为民，得旨免革职。

时来运转　议政大臣

顺治五年十一月，鳌拜随英亲王阿济格统兵驻守大同。阿济格追逼粮草，任意杀戮。十二月初三，大同总兵姜骧乘机举兵反清，山西各州县多有响应者。其时，农民军联合南明永历政权抗清，在湖广、广西节节取得胜利，江西总兵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亦倒戈反清，中原大地再一次形成抗清高潮。大同反清威胁北京，多尔衮决定亲征。第二年三月，鳌拜与端重亲王博洛会攻大同，守军以锐卒直冲清阵，谋夺红衣大炮，鳌拜指挥部下击退敌兵。姜骧部将杨震威率万余人猛攻镶蓝旗营地，鳌拜率蓝旗军兵迎击，展开激战，杨震威被打败。又有援军五千由大同北山至，进逼清军，打算解大同之围。鳌拜率精兵破其一营，追奔逐北，姜骧闻援兵至，遂率千余骑出城接战，鳌拜复率军迎击姜骧，大同之围终莫能解。清军挖长壕围大同，同时分兵剿杀响应姜骧各城，鳌拜战于忻口，攻晋祠、汾州、克孝义县。九月，大同被围日久，城中"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姜骧部将杨震威等合谋斩姜骧，并其兄姜琳，弟姜有光，开城投降，以姜骧首级献于阿济格军前，大同的叛乱遂即平定。

顺治七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在患病之时，暗示内大臣锡翰让顺治帝到他宅第探视，锡翰领会他的意图，清顺治帝幸临。但多尔衮又以擅请皇上罪名论锡翰之罪。鳌拜了解其中情形但不敢多言。殊不料多尔衮又以鳌拜“见非不举”治其死罪，后免死罚赎，由一等精奇尼哈番降为一等阿思尼哈番。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死，顺治帝亲政。第二年正月，鳌拜与其弟巴哈并为议政大臣，复晋一等侯。鳌拜在多尔衮摄政期间，三次论死，有功不显。顺治八年二月，济尔哈朗等讦告多尔衮生前谋逆诸罪，顺治帝福临命“布告天下，咸使闻知”。多尔衮被削爵，党附诸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革职。被多尔衮长期摧抑者如遏必隆等人上书申诉冤枉。顺治九年二月，鳌拜也向皇帝控诉，“自陈劳绩，因忤睿亲王意，屡抑战功”。顺治帝认为，鳌拜“军绩颇多，且为国效力多年，其功甚懋”，应从优叙议，由一等侯升二等公。在审讯党附多尔衮的巩阿岱，锡翰等人时，鳌拜、索尼等人曾经盟誓“一心为主，生死与共”，为福临所闻知，鳌拜忠于幼主深得福临欢心，视为心腹。四月，“以鳌拜总管侍卫”，授领侍卫内大臣，遏必隆管銮仪卫，与索尼并为内大臣，诸人于是成为福临所倚重的黄旗元老重臣。

鳌拜既是议政大臣，又是领侍卫大臣，得参议大政，随侍帝侧，位列公爵，权势日增，成为清政权的核心人物。顺治十三年，鳌拜疏奏：“大阅讲武，国之至重也。自太祖、太宗以来举行已久。今请酌古准今，三年一次大阅。”鳌拜意欲使八旗劲旅保持传统，常备不懈，以确保江山社稷，故深得顺治赏识，“得旨允行，并著为令”。从此，“大阅”成为有清一代定制，以后各省督抚亦三年大阅营伍。同年十一月，鳌拜以前攻城时所受的战伤发作，卧床不起。顺治帝亲临探视慰问，十分关怀，被认为是殊劳。顺治十四年冬，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染病，福临晨夕省问侍候，鳌拜也昼夜半劳。博尔济吉特氏病愈之后，福临谕吏部：“皇太后圣体违和，朕晨昏省侍，鳌拜等近侍护卫，昼夜勤劳，食息不暇，朕所亲见。今皇太后圣体康宁，中外欢庆，鳌拜等同朕省侍，勤劳罔懈，深中嘉悦，宜分别嘉奖，以示鼓动。”加鳌拜少傅太子太保衔，因其弓马娴熟，命教习武进士，技艺精进优异者，或留充侍卫，或由兵部选授副将、参将等官职。

辅政擅权　身系囹圄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八，福临去世，遗诏以第三子八岁的玄烨嗣位，由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居辅政大臣之首的索尼历事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多经历内外大事，老谋深算，但已年迈多病。苏克萨哈与鳌拜本为姻亲，但二人意见多不合，并且由于苏克萨哈隶多尔衮所将正白旗，索尼对他很为厌恶。遏必隆懦弱平庸，遇事无主见。因此鳌拜虽居四辅政之末，却因以上种种原因得以擅权。鳌拜与内大臣费扬古有嫌隙，其子侍卫倭赫故而不尊敬鳌拜，鳌拜对此怀恨在心。康熙三年（1664）四月，倭赫在景山、瀛台擅骑御马，又用御弓射鹿，鳌拜论罪将倭赫斩首，其父费扬古也牵连，定费扬古“怨望”罪名，将其子尼侃、萨哈连处绞，籍没其家产给予鳌拜弟都统穆里玛。从此鳌拜专权妄为，网罗羽翼，朋

比结党，触犯自己者辄置之死地。顺治定圈地时，八旗土地各按左右翼次序分给。多尔衮专权时欲移驻永平，故将原属镶黄旗地给予正白旗，而给镶黄旗地于右翼之末，保定、河间、涿州等处，虽然因地有肥沃与贫瘠之分，但两旗之人二十余年来，对此已习惯，各安生业。康熙五年正月，鳌拜因与辅政大臣正白旗人苏克萨哈矛盾日深，以原镶黄旗地为正白旗所占，故立意更换。索尼因憎恶苏克萨哈支持鳌拜；昏庸透顶的遏必隆随声附和。鳌拜遂命户部及直隶总督、巡抚主持其事。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会同直隶巡抚王登联，实地勘测，旗人与民人都不愿意调换。王登联上疏云："臣同部臣东往丰润、平滦等地，看到荒凉极目。民地之待圈者，寸壤未耕，旗地之待圈者，半犁未下，恐明岁青黄不接，无从得食，此旗人与百姓并困之情形也。""百姓情形更有难于见闻进。自圈地之令一传，知旧业难守，有米粮者已粜卖矣，土民千百上书呈请停止圈换，旗人也因计较肥瘠不愿圈换。"总督朱昌祚也上疏说："京东各州县一闻圈丈，自本年秋收之后，周遭五百里，尽抛弃不耕……京东各州县合计旗民失业者不下数十万人，田荒粮竭，无以次生，岂无铤而走险者!?"二人上疏请示圈换两旗土地一事应予停止。户部尚书苏纳海亦"候明旨进止"，对圈地事不予办理。鳌拜听到他们的议论，大发雷霆，认为三人阻挠圈换，是有意违抗其命令。为此兴起大狱，杀大臣以立威。以苏纳海拔地迟误之罪，朱昌祚、王登联"纷更妄奏"将他们处死。康熙这时虽然尚幼，但很有主见，也明白这其中的许多事理，他知道鳌拜这样做是因为"苏纳海始终不阿其意"，朱昌祚、王登联疏奏旗民不愿圈换地亩，坚守不移，是阻挠其意，因此，一定要把他们置于死地。康熙认为这样一件事情杀三大臣太过分，因此就亲自召集四辅政大臣询问。然而鳌拜在康熙帝面前，欺他年少，大声咆哮，甚至攘臂挽袖地威吓，坚持将三人必置重典，索尼、遏必隆也同意，只有苏免萨哈一声不吭。但康熙坚持原则，始终未允所奏。谁知鳌拜胆大妄为，竟假传圣旨将三大臣绞杀，又追论已死之苏克萨哈旗人额附英武尔代罪，以泄其忿。而康熙知道后，只能暗恨在心，因大权掌在鳌拜手中也无可奈何。

康熙六年正月，康熙帝玄烨十四岁，索尼对鳌拜的专权看得一清二楚。但他年老多病，且鳌拜已将宫廷禁卫及京师卫戍掌在手中，因而对其也是没有办法。在万般无奈之中，他提出"世祖皇帝十四岁应亲政"。六月，索尼病故，由于十四岁亲政是清祖制所定，故此鳌拜也没办法阻拦，再则他认为自己大权在握，也无所谓。七月初七，康熙按祖制"躬亲大政"，辅政大臣"仍行佐理"。十三日，苏克萨哈上疏请解辅臣任，愿往守顺治陵寝。苏的提议如成立，鳌拜同样也要交出辅政之权。因此他大怒，指使党羽议决将苏克萨哈应凌迟处死，族诛。康熙"知鳌拜等怨苏克萨哈数与争是非，积以成仇，与其党羽班布尔善等构成其罪，必欲置之极刑，坚执不允所请"。鳌拜竟然气势汹汹，与康熙攘臂强争累日，最后竟强逼康熙同意，将苏克萨哈处绞，诛其旗。

鳌拜权势炎赫，与其弟都统穆里玛、侄侍卫塞木特、纳莫，大学士、内大臣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思哈、户部尚书

马尔赛、兵部尚书噶褚哈、吏部侍郎泰壁图、都统济世哈等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朝内外大事均在家中议定后施行，根本不把已亲政的康熙放在眼里。他甚且常常在康熙面前或高声质问，或呵斥部院大臣，施威震众。又将部院衙门各官于启奏之后，康熙已经签署同意的奏章再带往家另议另行。鳌拜恐有人弹劾，禁言官上书。有人窃其马，鳌拜捕杀盗者，竟然将御马群牧长同时斩首。鳌拜欺凌年轻的皇帝，气焰嚣张，康熙深感其“欺朕专权，恣意妄为”，决意清除鳌拜集团。但是鳌拜党羽遍布内外，若明降谕旨，外廷拿问，“恐不免激生事端”，不仅不能除掉他反而可能受其害。因而康熙不露声色，采用欲擒故纵，办法在底下加紧谋划。六年，命鳌拜于二等公外加赐一等公，以其子那摩佛袭二等公爵。七年，加太师，其子那摩佛加太子少师。鳌拜对康熙也并不放心。有一天，他假装得病，要康熙亲往问候。康熙临其府第，至被榻前，御前侍卫和公托见鳌拜脸色有变，乃急趋榻前，揭开卧席，见藏有利刃。康熙年少老成，怕鳌拜狗急跳墙，因而神色不变地笑曰：“刀不离身乃满洲故俗，不足异也。”但立即回宫。康熙决意早日擒拿鳌拜。但是鳌拜孔武有力，武艺精湛，久经战阵，捉拿他并非易事。于是选身强力壮之小内监和一批王公亲贵子弟，日习布库（即摔跤），训练了一支亲信卫队。鳌拜或人奏事，康熙与小内监相搏，并不回避，鳌拜以为少年皇帝贪玩好弄，不以为意。同时康熙在底下与其舅舅索额图等一批近臣密谋善后等事宜。一切计议停当，一日，康熙请鳌拜入内让习武少年将其擒之。鳌拜入内后康熙一声令下，十数小童一拥而上，将鳌拜摔倒在地，关进大狱。

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命议政王大臣勘问鳌拜罪行，大臣会议审实鳌拜罪状三十条，认为“逆恶种种，所犯重大，应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应斩，妻并孙为奴，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及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一百，披甲当差。”康熙召鳌拜至，问其有何话说。鳌拜自知罪孽深重，希冀不死，他恳请皇帝“看他为救他的祖父太宗留下的伤疤”。康熙看到鳌拜创伤，念其历事太宗、世祖，效力有年，战功颇著，不忍加诛，命革职，籍没拘禁，其子亦免死拘禁。同党内大臣班布尔善、尚书塞得本、阿思哈等多人处斩，鳌拜不久死在监狱中。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复念鳌拜战功卓著，追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以其弟巴哈孙苏赫袭爵，苏赫死，仍以鳌拜孙达福袭。雍正复赐鳌拜一等公，世袭罔替，加封曰：“超武”。

【和珅】

取宠皇帝　倚任极专

和珅（1750－1799），原名善保，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高祖尼雅哈纳曾以军功被赐“巴图鲁”称号，并赐封轻车都尉世职。他的父亲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封一等云骑尉。

和珅出身于一个有相当的地位的八旗官僚家庭，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在童年时代在就和弟弟和琳在家中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后兄弟二人一同选入北京咸安宫官学学习。这所学校最早是雍正帝提议创办的，主要是



和珅像

为了培养内务府的优秀子弟；到乾隆年间，除继续招收内务府子弟外，还招收了八旗官员优秀子弟入学。到这里来学习的学生都是经过严格的选拔，不但要品学兼优，而且长相要俊秀。和珅生性机灵，记忆力尤其好，在咸安宫官学学习期间，他不仅背熟了《四书》、《五经》，而且满、汉文字水平也提高得相当快。此外，还掌握了蒙文与藏文。当时的著名学者袁枚曾称赞和班兄弟二人知书达礼，聪慧机智。和珅虽然为中等官僚家庭子弟，但由于他父亲长年在外做官，开销较大，又因为他们兄弟俩与继母关系不很融洽，因此手头并不宽裕。为此在学习期间，兄弟二人曾与家人刘全四处借钱，以支撑他们在咸安官学数额不小的花销。

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正是弱冠之年，完成了咸安宫学业，这时的和珅风度翩翩，仪表非凡，他上学时就被身居高位的英廉看中了，英廉把他的孙女嫁给了他。英廉是内务府镶黄旗人，雍正十年（1732）中举，当时已是刑部尚书兼户部侍郎和正黄旗都统的高官，有了这样的姻亲靠山，和聊自然是仕途顺利了，也就在这一年，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

及后在英廉的帮助下，和珅被挑选去给乾隆皇帝当銮仪卫听差。这差事虽然品位不高，但能接近皇帝；如果能得皇帝的青睐，那以后的前途就无可估量了。正因为如此，和珅便处处留神，伺机博得皇帝的好感。

机会终于来了。乾隆四十年的一天，乾隆帝要外出，侍卫人员一时找不到“黄盖”。这惹得乾隆老大不愉快，他借用《论语》中的一句话问道：“是谁之过?”其他侍卫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只有和珅明白皇上的意思，他引用古书上的一句话回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见这个青年侍卫声音嘹亮，一表人才，于是怒气顿然消失，问他说：“你读过《论语》吧?”和珅恭敬地回答说：“读过。”乾隆帝又问了他的家世、年龄等情况，和珅一一作了回答。乾隆帝见他口齿伶俐，很是赏识，遂将和珅提升为侍卫。

和珅升为侍卫以后，和乾隆接近的机会更多了，他凭着自己的机灵，留神观察，对乾隆帝的脾气、心理、好恶等等，了如指掌。他费尽心机，想方设法使乾隆帝满意，对乾隆帝的心思真是看得准，摸得透。据说有一次顺天府乡试，题目照例由皇帝“钦命”。和珅通过宫内太监，了解到乾隆帝在命题时，信手翻《论语》，当第一本快翻完时，忽然似有所悟，立即提笔命题。根据这个情况，和珅揣摩一番，说：“这次肯定要

考《乞醯》这一章。”后来考题发下时，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原来这一年是乙酉年，“乞醯”两字中正好分别包含着“乙酉”两字。由于和珅生性乖巧，办事能干，深得乾隆帝的欢心。其职务从此也就迅速升迁。第二年正月升为户部侍郎；三月，升为军机大臣；四月，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

乾隆四十年，和珅受命赴云南处理李侍尧贪污案，这一次的办事进一步显示了他精明强干的能力，由此更加得到了乾隆帝的倚重。李侍尧是清初功臣李永芳的后裔，他的父亲曾任户部尚书，他自己曾任户部侍郎、广州将军、两广总督，案发时为云贵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由于出身显赫，加上位高权重，他把很多大臣都不放在眼里，对和珅自然也不屑一顾。这一年，云南粮道、曾任贵州按察使的海宁，被解职务，调任沈阳奉天府尹。海宁趁入京谢恩的机会向和珅揭发了李侍尧贪污的问题。和珅由于平素就看不惯李侍尧，因而趁此机会向乾隆帝加油添醋地把李贪污问题申述了一番。乾隆帝便委派他到云南查办此案。和珅一到云南，第一步就是把李的管家拘捕，严刑拷问，获得了李侍尧贪污营私的第一手材料，进而迫使李侍尧俯首认罪。在处理此案的过程中，和珅并了解到云贵两省吏治腐败，各府州县财政亏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在云南当即写了一份详细的奏折派人送呈乾隆帝。乾隆帝阅后，相当满意，在和珅回京的路上即任命他为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回京后，和珅又向乾隆面陈了云南盐务、钱法、边防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这一下，更使乾隆对他刮目相待，于是又授他御前大臣兼都统。

乾隆四十二年，和珅兼步兵统领。四十三年兼任崇文门税务总督，总管行营事务，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旋又授正白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四十四年乾隆帝亲赐和珅长子丰绅殷德，并把心爱的小女儿和孝固伦公主许配给他。固伦公主当时仅六岁，喜欢作男孩子打扮，每次见到和珅，就称他为丈人，和珅听后更是美不胜收。在这以后，乾隆帝对和珅更是宠信无比，各种殊荣纷纷落到他的头上。同年，授户部尚书，《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四十七年封太子太保，四十八年任国史馆正总裁；四十九年授一等男；五十一年授文华殿大学士；五十三年授三等忠襄伯，乾隆晚年、嘉庆初年任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刑三部；嘉庆三年封为一等公爵，成为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权倾朝野的权臣。

和珅“为人狡黠，善于逢迎”，作为皇帝的近臣与姻亲，他非常会投乾隆之所好，想乾隆之所想。乾隆喜欢作赋吟诗，和珅在闲暇时就经常作诗习字，奉和乾隆的诗作。他现存的集子《嘉乐堂诗集》中就有不少应制奉和的作品。清代诗歌评论家钱咏评论他的诗律妥切，颇有佳句。和珅不仅精通满、汉文，而且通晓蒙、藏文，并能用蒙、藏文为皇帝拟诏书，当时的满汉大臣中，像他这样通晓四种文字的并不多。乾隆好巡游，多次离京巡幸江南，东巡祭祖，朝拜孔庙，不管走到哪里和珅总是和他形影不离，随侍左右，借这些机会，曲意讨好乾隆。他还利用长期主管户部和内务府掌管钱财的大权，扩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供乾隆享乐。扩建后的圆明园方圆三十里，拥有一百五十多所精美的楼殿，

四十个风景区，是乾隆极为满意的游乐与休憩场所。至于平日对乾隆生活上的服务，那更是体贴到家，无微不至，乾隆年岁较高，偶感风寒便咳嗽。每当上朝遇到乾隆咳嗽，身任首辅之臣的和珅便当着文武大臣，为这位老迈的皇帝手捧唾盂。这种体贴与周到，使乾隆对和珅的信任与喜爱，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四位皇子。后来乾隆退位当太上皇，嘉庆这位新登基的皇帝对和珅也得退让几分，嘉庆“平居与临朝，沉默持重”，不喜不怒，谨小慎微，“凡于政令，唯是听，以示亲信之意”，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使和珅不起疑心。

植党营私　诬陷忠良

和珅官居高位之后，大肆培植亲信，树立私党。他的弟弟和琳是生员出身，只是由于和珅当朝，前后任过杭州织造、湖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工部尚书等职。乾隆六十年贵州、湖南两省爆发苗民起义，和琳任云贵总督前往镇压，于嘉庆元年病死于军中。死时身兼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都御史、四川总督数职。

和琳的亲家苏陵阿举人出身，为人贪赃无能，由于他是和琳的姻亲，和珅对他着意提拔，曾任兵部、工部、户部侍郎，后又升为户部尚书、两江总督。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公开贪污受贿，臭名昭著。接见属员时竟恬不知耻地说：“蒙皇上圣恩，命我这老头来捞点棺材钱。”嘉庆二年和珅公然把他荐举为东阁大学士。这时的苏陵阿已八十多岁，耳朵已聋、眼睛全花，连一举一动都需人携扶，被人称为“活傀儡”。和珅的老师吴省兰、舅父明保都安排担任要职。吴省兰曾为和珅塾师，因为和珅的关系，他被任命为学政，并担任乡试的考官，嘉庆初年被和珅安排到皇帝身边记录诗稿，充当和珅的密探。和珅的舅父明保既无资历又无学识，和珅竟把他安排当汉阳知府。明保凭借和珅这个外甥作靠山，气焰嚣张；当地官员对他又恨又怕。乾隆曾接见过他，对他那种窝囊样极瞧不上眼。一次他向和珅问起明保的出身，仕履等情况，和珅胡乱编造了一通，居然也把乾隆蒙骗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见和珅深得乾隆宠信，于是就卖身投靠，与他狼狈为奸。如乾隆孝圣皇后的侄子福长安。福长安的父亲曾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封为太子太保，死后赠郡王，是乾隆朝代的一位名臣。福长安本人也娶了皇族女为妻。由于他年轻貌美，深得乾隆喜欢，由侍卫逐渐升为军机处行走。他见和珅位重势高，使依附于他，甘心听从他的摆布，和珅曾荐他代理自己的户部尚书职务，两人在一起，干了不少伤天害理之事。和珅贪赃枉法的罪行他知道得最多也最清楚。和珅事发之后，嘉庆帝多次启发他揭发和珅的罪行，他充耳不闻，甘心充当和珅的死党。福长安的小舅子湛露，是个连满语都说不好的混混儿，因为福长安与和珅的特殊关系，湛露被和珅安排为广信知府，在一次考核政绩的“京察”中，和珅特意将他列为“保送一等”。

和珅独揽大权，胡作非为，一些忠直大臣由此倍感愤慨，有的甘冒风险对他进行弹劾。但和珅凭仗乾隆作后台，对谏臣进行打击、陷害。乾隆五十年监察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管家刘全仗势营私，衣服车马僭越朝廷礼制规定，当时和珅正在承德避暑山庄陪侍乾隆，他先

看到了奏疏，马上将刘全召来，安排他迅速将超制的房屋车马拆散，把有关衣物隐匿转移。然后由和珅向乾隆呈上一份奏疏，说他对刘全已进行审讯，曹锡宝所告之事都不符合实际，恳请朝廷派人查处。

乾隆阅疏后，便下了一道谕旨，说和珅家人刘全长期在崇文门为主人代办税务，他本人的收入也不菲，即便有些积蓄也属常理，至于盖造几十间房屋住，车马服用稍有润饰，也属人之常情。谕旨并指责“曹锡宝弹劾刘全是隐约其辞，对和珅旁敲侧击”。乾隆还令有关官员和曹锡宝本人一道到刘全家查验证实，不能徒作“无根之谈”。由于刘全住宅衣物已经转移和“加工”过，曹锡宝等人前往查验一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曹本人感到十分尴尬，面对乾隆的压力与和珅的淫威只得承认自己是道听途说，言语失当，请求治罪。乾隆命令他革职留用。曹锡宝受此打击，精神上从此一蹶不振，后郁郁而终。

监察御史谢振定对和珅的罪恶行径也耳闻能详，对他的爪牙倚仗和珅专横霸道，尤其深恶痛绝。一次他带着士兵巡视京城，见一辆高大华丽的马车在街道上横冲直闯，谢振定令车停下，一问知乘车的人原来是和珅的妾弟。谢振定大发雷霆，命士兵将他从车中拖出，用皮鞭痛加抽打，并当场将马车烧焚。围观的士民人人拍手称快，和珅闻讯后，对谢振定忌恨在心。几天后，便指使亲信捏造罪名对他参劾，并罢免了他的职务。

乾隆帝晚期，对和珅更是倚任极专。凡收到揭发和珅的材料统统都交给和珅自己处理。结果就是使上奏书的人遭来横祸。如陕西一个读书书人冒死给乾隆上书，揭发和珅贪赃枉法的罪行，乾隆将此信转给和珅，结果此人全家遭和珅党羽戕杀。

史称和勘“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默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府，皆出其门”。而纳贿谄附者，多得重要之职；中立不倚者，难免潦倒；敢于揭露、指陈其罪行的人则被其置于死地。

招权纳贿　蚕食鲸吞

和珅除总揽军政大权外，并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内务大臣等职，长期管理户部三库及崇文门关税关监督，他长期利用手中的大权，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大发横财。

和珅管辖的内务府负责宫廷服用、食物、武装守备等方面的事务，内廷和皇帝的一切开销都由内务府所供应。乾隆一生好大喜功，尤其喜好外出游玩。和耕作为内务府的负责官员，为了满足宫廷奢靡的开支，他借各种机会对各级官吏和豪绅大加敲诈勒索，和珅本人则借机掠夺。各地进贡的礼品或外国使臣朝贡的珍宝，首先都得经过和珅这一关。乾隆每次从中不过收取十之一二，大部分都被和劝吞占。时间久了，和珅家中的奇异珍宝比皇宫的还要多，如大宝石、珍珠串的数量，就是内宫的数倍。他家所藏的一颗大珠比乾隆御用的皇冠顶珠还大。至于户部、内务府的太宗钱财都是由和珅任意支配，这是一笔糊涂账，而乾隆对此也是从不过问。有一次，两广总督孙士毅出使安南回来，在宫门外等侯乾隆帝接见，被和珅撞见了，和珅问：“你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孙士毅回答：“是一个鼻烟壶。”和珅拿过来看了看，是用一个大如雀卵的明珠雕琢而

成的。和珅爱不释手，便说："你能否割爱……"孙士毅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很为难的说道："可惜昨天已奏知皇上了，待会就要敬呈，如何是好呢?"和珅脸色微微一变，冷冷地说："和你开个玩笑罢了，何必当真!"过了几天，和珅又碰见孙士毅，洋洋得意地说："昨天我也得到了一珠壶，你看看怎样?"说着就递将过去。孙士毅一看，正是他进献的那一个，就说："这是陛下将我进献的那个珠壶赏给大人了。"和珅哈哈一笑。事后，孙士毅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根本不是皇上赏给他的，而是他通过同党从宫内盗出来的。

和孝公主的异母兄弟七阿哥，有一次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碧玉盘，这是乾隆帝最喜爱的一件珍宝，直径有一尺多。七阿哥怕父皇怪罪，吓得惊慌失措，没了主意。七阿哥的弟弟成亲王让他快去找和珅商量想办法。于是哥俩同去和珅家。和珅听完了哥俩的诉说，假意装出为难的样子，说："此物人间稀有，我又有什么办法?"七阿哥更加害怕，竟痛哭了起来。后来和珅答应想法试试。过了一天，和珅一见面就拿出一个盘子，不但比打碎那一个大，而且更为精美。七阿哥和成亲王感激不尽。此时，他们也了解到四方所进珍品，上等的先入和珅的手中，次等的才送进宫去。据野史中的有关记载，乾隆末年，各省进贡呈献的东西，和珅私自侵吞了十之八九，只有十之一二进宫。所以后来嘉庆皇帝在宣布和珅罪状的上谕里非常气愤地说，和珅家中的珍珠有二百多串，比宫中的多好几倍；稀世的宝石有几十个，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都比宫里的好。并下旨将此列入和珅罪状之中。

和珅是乾隆皇帝身边的红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与阿桂同掌军机处大权十几年，但阿桂经常奉命到各省赈灾治河，巡察办案，或率军征战，这无疑给和珅独揽军机处大权造成机会。他行文各省，要各省凡给皇帝的奏折都要先向军机处提交副本，因而，各地大员向皇帝直接奏事的权利无形中被剥夺，全国都被掌握在和珅的手心里，人人不得不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听。两江总督书麟、闽浙总督觉罗长麟都曾因违忤和御，先后被遣戍新疆。从此以后，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各省督抚，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纷纷投入和珅门下，竞相进贡。和珅是典型的见钱眼开的人，例行公事时，他也要捞一把，他在兵部核算报销时，如不给贿赂，他就找碴不给报销。至于官员想晋升，更需要以钱开道。在和珅那里，大小官皆有定价，出什么价钱做什么官，例如盐政、河道总督，这是两个最大的肥缺，价码也最高，官员们必须先以"巨万纳其府库"，然后才能得到手。

和珅曾长期负责议罪银事务。清代的议罪银，实际是为皇帝聚财的措施，又称罚银或自行议罪银，其对象主要是各省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大员。这些人一旦犯了罪，就必须交出罚银，才能够免于或减轻查处。罚银的数额按罪状的轻重不等，但大都是数万或数十万。议罪银的绝大部分都缴入内务府银库，成为皇帝的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和珅作为议罪银的主要负责人，不仅可以很容易地使一部分议罪银落入己手，而且可以借此索贿受贿。由于相当一批官员都担心自己随时被议罪，与其被罚巨款，倒不如趁早向和珅行贿，因而一

旦获罪时，有和珅从中周旋，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这些，和珅从来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的。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案被揭发，和珅负责查处。国泰、于易简都是和珅的党羽，而且在事发前已用大批银两“进献”给和珅，故此和珅在查处时，处处敷衍其事，企图使他们蒙混过关；在检查该省库银时，预先通知国泰，叫国泰挪移别银充数。只是因为参加办案的另两位大臣紧追不舍，和珅才没能如愿。

和珅勒索百官，不仅肆无忌惮，胆大包天，而且价码越抬越高，单是两淮盐政征瑞一人，先后就贿赂和珅四十万银子。有的则不惜代价购买奇珍异宝，投其所好。江苏吴县有个珍珠商，在每个珠子外面用赤金包裹，增加了珠子的价值，大粒值二万金，次者万金，最便宜的也有八千金。即便如此昂贵，大部分官员还是争相购买，惟恐买不到；他们知道，和珅每天早晨都服用一粒珍珠，以延年益寿，增强记忆。

不过，向和珅行贿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曾经有一个山西巡抚巴结和珅，派他的部下带二十万两银子专程到京城上门献礼，但是进献无门，和府没有一个人来接见他。一打听个中原委，便用了五千两银子作“小费”求见，结果出来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奴仆，一开口便问“黄的还是白的?”口气倨傲得很。一听说是白的，年轻奴仆就告诉手下人收入外库，然后给了一纸便条，说：“拿这个回去为证吧”。说完扬长而去。这人一打听，原来那个年轻奴仆只是一个门子，便连声感叹：二十万两银子竟连和珅的面也难以见到，见一个门子倒要花上五千两，真是“侯门深似海，和府财如山”啊！

和珅贪财纳贿有一个很明显伎俩，就是经常打着皇帝和朝廷的招牌，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乾隆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风流皇帝，到处游山玩水，寻欢作乐，晚年更加有增无减。他曾数次南巡，登五台山，祭祀曲阜，东谒三陵，浏览天津，嵩山等地，至于避暑山庄，更是常来常往。他每次出巡，都穷奢极欲，尽情挥霍。再加之连年用兵，大兴土木，使得每年费用超过正常经费亿万之巨。这些事，他很多都交给和珅安排办理，没有钱支出，他也要和珅想办法筹措。于是便给和珅的贪污受贿带来很多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方便。

乾隆五十五年，皇上八十大寿，照例由和珅筹办庆典，这对于他无疑又是一个绝好的发财时机。他把皇宫内外和大小宫殿，均装饰一新。从京城至圆明园，楼台歌榭全部用金银珠翡装点，假山上还设有木偶和尚，开动机关，就自己活动，演出舞蹈。和珅还行文各省，让他们进献各种珍奇物品贺寿。这时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反对，说各省的库藏都已经亏空，不能浪费钱财。乾隆帝一方面对尹壮图的上疏很不满意，一方面也感到焦虑，和珅却说：“不会这样吧，何不派尹学士去各地察看一下呢?”乾隆帝当即准奏，派尹壮图前往各地勘察，和又奏请派他的爪牙庆成跟着去监视。在和珅的授意下，庆成每到一省都想方设法干扰和掣肘尹壮图；庆成先是派人送信，接着就是借故拖延时日，等地方官把府库挪移充足，再去开库检查。这样一来，所查之处府库充盈。于是，反映真实情况的尹壮图反而“以妄言坐

黜”，而和珅与庆成却暗中捞足了外快。仅仅是乾隆帝的这一次庆典，就牵动了多少人力，花费了多少资财，主持庆典的和珅又不知在暗中掠夺了多少！

和珅的贪婪无厌以及乾隆帝对他的故纵，使乾隆后期的吏治更加腐朽透顶。朝野上下各级官员，一方面畏惧和珅的生杀予夺大权，另一方面也借机大捞一把，就各自向下级摊派勒索。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样的一个无比贪酷的大官高高在上，下面的贪官污吏怎能不群起而仿效，更加放肆横行呢？他们层层索贿受贿，贪污腐化，贿赂公行，结成了互相包庇纵容的关系网。有的总督，不仅收受提升官员银两，而且向属员变卖珠子，然后又将珠子收回。山东巡抚国泰，勒索属员八万两，浙江巡抚福崧贪污盐商税银十一万五千两……举不胜举，多如牛毛。

当然，有时候朝廷也抓几个案件查处，但要根除贪官，这根本无济于事。结果，贪污事件越来越多，层出不穷，贪污方法越来越巧，不仅个人贪污，而且上下勾结，串通一气，集体分赃，甘肃被查出的全省官员合伙贪污案中，贪赃千两以上的就有六十六人之多，布政使王直望家，就抄出金银一百多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有个家人叫曹禄，从其家抄出的银子也有二万余两。甚至在奉命查抄王直望资财的查抄者们也从中抽梁换柱，以银换金，以贱抵贵。如查抄底册中列有金条、金锭四千七百四十八两，而交到内务府的册子中只列金九两三钱，送到内务府时竟连一钱也没有了。

官吏贪污的资财，除直接向百姓搜括外，还大量动用国库，使全国各省府库空虚日益严重。有的前任离职，后任不肯接收亏缺，只好由上司出面说合；有的虽然接收了前任亏空，到自己离任时，照旧亏欠，称作“原装原卸”；有的本来没有亏空，到离任时将库中银钱拿走，名曰“做亏空”。如此这般，不仅处处亏空，而且数字令人瞠目结舌。最后，这些负担都转嫁到人民头上，使国计民生受到严重影响。例如清代的盐政、河工历来是比较富足的，但在和珅及众多贪官的榨取下，也财政入不敷出，以致河道年久失修，常有洪涝灾害；川楚等地曾因食盐等问题激起民变。与各地财政告急，仓库亏空情况相反的是，和家的仓库却越来越吃紧，盖了一个又一个，仍然不够用，最后来了个“夹墙藏金”，“地窖藏银”。

纸醉金迷　灯红酒绿

和珅用贪污受贿得来的大量钱财，大肆进行挥霍，过着极其腐化糜烂的生活。从后来清查他的家产的帐单上看，单就衣服一项，就有貂皮一千五百多张，狐皮一千多张，其他各种上等皮毛不计其数，另有绸缎库二间，各种衣服五千三百多件……真可谓“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了。

和珅有三处花园供其玩乐，其中以淑春园为豪华，其装饰比皇宫有过之而无不及。淑春园约在乾隆初年开始修建的，遗址位于今北京西北郊海淀一带。乾隆帝晚年，和珅权力无比，原来位于城内的宅第尽管一再扩建，但毕竟不太符合其身份和要求了，故此，乾隆帝就把淑春园赐给了和珅。和珅成为淑春园的主人之后，将淑春园改名为“十笏园”，这其中寓含的意思就是怀揣十笏、手掌大权。和珅不惜重金，对全园进行了一次大改造。掘地为湖，叠石为山，

修建成了一座山水相间、风景宜人的园林。内部的建筑仿照圆明园的布局，据说和圆明园中的蓬岛、瑶台如出一辙。园内遍植名花异草，房屋式样均依照大内宁寿宫的建筑，富丽堂皇，雍容华贵。为了修建淑春园，花费的人力物力真是难以计算，仅是园内的一座太湖石，就花费了数千金才运来，后人发出“曾移奇石等黄金”的感慨，是一语中的。

和珅的妻子是英廉的孙女冯氏，死于嘉庆三年春，葬礼极其隆重，当时的王公大臣无不前往吊唁。除了正妻之外，和珅还拥有许多姬妾，姬妾到底有多少，数不胜数。据说有一次庆典，和珅单为姬妾们买花就用了数万两。在他众多的姬妾中，和珅最宠爱的有二个，一为长二姑，府中人称二夫人；一为吴卿怜，苏州女子，查办贪官浙江巡抚王亶望的部分财产里，就有这位吴卿怜。和珅大约非常迷恋这位吴小姐的绰约风姿，为了讨她欢心，专门给她建了一座小楼，起名迷楼。当和珅被抄家时，这位吴卿怜也引颈向环自尽了。

乾隆五十四年，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结了婚，新娘是早在十年前就已定婚的皇帝的公主。婚礼的排场当然非寻常人所能想像的。乾隆帝对这个最小的女儿很宠爱，陪送的嫁妆比以前的几个女儿都要多。和珅将丰绅殷德夫妇安排住在淑春园的西半部分，和珅自己和他的妻妾们则住在东半部分，好不荣耀。

和珅家有大量的家奴和婢女，并且利用职权，大量使用公役人员，这些人都为服侍这一家老小的。步军统领巡捕营在和珅私宅供役的就有一千余人。这些奴才们也和主子一样挥霍无度，平时也狗仗人势，欺压良民，勾结权贵，敛财纳贿。和府管家呼什图，时称内刘，和珅垮台后，内刘家也当然未能幸免，其家产也有十余万，而且替他的三个弟弟分别捐纳了知州、守备、州同等官衔。和府大总管刘全，造的房子有一百多间，和王公大臣的府邸相比美，很多士大夫都争着把女儿嫁给他，家产也有二十余万。

和珅对他的这种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并不感到十分惬意，虽然他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毕竟是臣属，与皇宫内廷的生活相比，还是相形见绌，还有很多皇帝能享用的东西他不能享用；如用，就是违制，罪名就是图谋不轨。对这一点和珅也是不甘心的。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一点愿望，每到夜深，他就在灯下穿戴皇帝的衣服，把窃取来的朝珠悬挂在脖子上，对着一面大镜子，往来迈步，边走边对着镜子说话、微笑。不过声音压得很低，生怕被人听见。过足了皇帝瘾他才把衣服、朝珠卸下来。

乾隆皇帝在平定回民起义后，曾命人用和阗玉凿了一匹高二尺、长三尺的玉马，存放在宫中。和珅对此御用宝物也是垂涎三尺，设法将玉马偷了出来，专供其与爱妾在洗澡时乘坐享用。

和珅给自己安排后事也跟皇帝相攀比。他在冀州城外选了一大块土地，为自己建造坟墓。在墓前立一石门楼，石门前一地下隧道，盖正房五间称为享殿；东西厢房各五间，称配殿，大门称宫门。墓外有围墙周长二百丈。人们都把和珅的墓称为“和陵”。在围墙的西侧还建有房屋二百一十九间。这套陈设和建筑，完全超越了规定，就连亲王墓地的周长也不过百丈，和曲比亲王的还长了一倍多，简直与皇帝不相上下了。但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尽管他如此苦心经营，他死后却没能备受到这份“哀荣”，白费了这一番苦心。

乾隆一死 和珅嗝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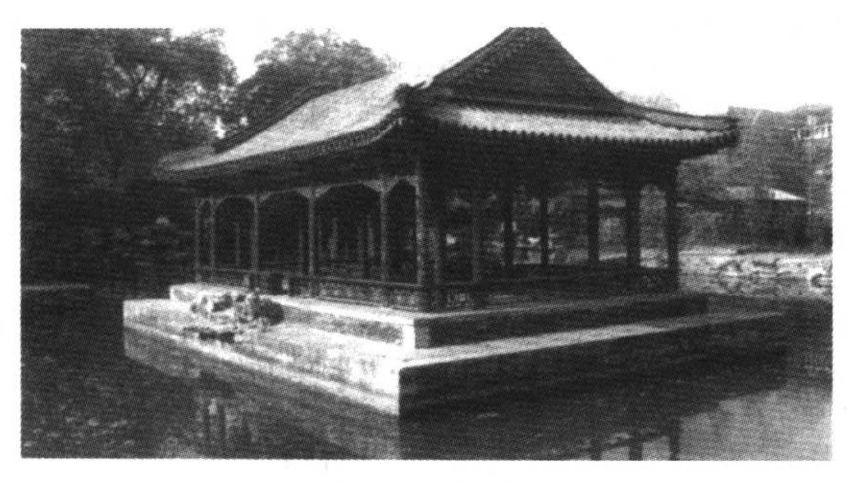
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曾焚香祷告上天，许下心愿说：“如果上天保佑，我能做六十年皇帝，一定传位皇子，归政退闲。”因而，当乾隆帝坐满六十年皇帝宝座时，决定让位给他的十四儿子，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不过他一直保守这个心里秘密，直到宣布的前夕，乾隆帝才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和珅一个人。和珅眼睛一亮，喜上眉梢，他心想，这下投机的机会又到了。因为事实很明显，老皇帝退位，他感到无所依恃，必须投向新皇帝的怀抱，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带了一柄表示吉祥嘉庆的如意，跑到嘉庆府上，呈献给他；这暗示天大的喜事就要降临，他是提前来表示祝贺的。和珅想通过泄露机密这一招，来取悦于未来的皇帝，博得个拥戴新皇登位的功劳，作为日后站稳脚跟的政治资本。果然，和珅刚刚暗送了这一消息，乾隆帝就向内外宣布三十六岁的十四子为他的继承人，并于第二年正式即帝位。和珅暗心高兴，并盘算着怎样进一步博得新皇帝的欢心。

但是，嘉庆早把和珅看透了。在当王子期间，嘉庆就了解到上下内外对和珅是多么愤恨，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奏及者”，表面上看，朝臣均担心乾隆帝“圣寿日高，不敢烦劳圣心”，“实则畏惧和珅，钳口结舌”。自己登基，如果继续重用此人，就会不得人心。和珅在朝廷大权在握，一呼百应，一手遮天，说不定还会出现逼位的事，这种危险性嘉庆是充分认识到的。还有，和珅的巨大财富也使他眼红，使他嫉妒，他怎能允许一个做臣子的富有超过皇室呢？所以，嘉庆下决心迟早要除掉和珅。然而，老父皇还活着，名为退位，可仍在掌权，并且仍然宠信和珅；太上皇的旨意，仍然经和珅向外传达。因此，嘉庆只好以隐忍的态度对待和珅，强压下愤恨的怒火免得投鼠忌器，引起种种变故，反而不妙。

老奸巨滑的和珅却摸不透新皇帝的心思。从表面上看，新皇帝对他既客气又尊重，有要奏请太上皇的事，他自己不去，还让和珅转奏。而对和珅的献媚讨好，新皇帝则不置可否。这使得和珅一直惴惴不安。于是，和珅就派自己的老师吴省兰去给新皇帝抄录诗草，其实是想摸新皇帝的心思。嘉庆十分谨慎，吟咏之中不露任何痕迹。左右的近臣有人批评和珅，他却说：“我正在依靠和相公处理国家大事，你怎么能这样非议他呢？”这些话，当然很快就能传到和珅耳中。和珅用尽了办法，观察一段时间后，见新皇帝没有对自己不友好的表示，于是才稍稍定下心来，也因此放松了对新皇帝的防备。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乾隆帝驾崩，嘉庆帝开始亲政。和珅的靠山倒了，他的官运和命运就快要走到尽头。初五，身着孝服的嘉庆首先向全国发布一道谕旨，对将帅懈怠、军事连连失利及官场中种种恶习，极为不满，诏谕要求从上到下重新振作精神，整顿纲纪，革除弊政。并下令内外大臣特别是负责监察的台监官员，指责朝政弊端，检举大臣不法行为。

嘉庆帝的表态得到不少朝廷大臣的响应，吏部给事中王念孙首先站出来检



和珅府花园湖心亭

举和珅。紧接着，御史胡季堂列举和珅的罪状，把嘉庆帝御旨中提出的几个问题统统归罪于和珅，主张给予严厉制裁。嘉庆帝看到时机已成熟，数天以后，就下令将和珅以及与和珅关系密切的户部尚书福长安革职拿问，并委派大员组成调查组，调查和珅的种种罪状。同时，凡属和珅的庄园财产，全部贴上封条，进行查抄。此时，和珅的同伙及党羽们也知道形势不妙，为避免自己受到牵连，纷纷反戈一击，揭发和珅的罪行。

嘉庆帝指令王公大臣联合审讯和珅，敦促其交代罪恶。他还亲自审讯和珅，责问道："你家中盖楠木房屋，木材是否目宫中窃出。""房屋均照宁寿宫的式样，是何居心?"

和珅不得不如实回答："楠木是奴才自己买的，曾派遣胡太监往宁寿宫画下图样仿造，所以与宫中一样，其中水晶柱系由宫中窃出。"

"你家所藏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多几倍，你的大珠比朕的帽顶上的还大，你拥有的宝石比内务府的多，这些难道不是你贪盗不洁的证据吗?"

嘉庆帝还问到和珅将出宫妇女选入家中、擅坐椅轿出入皇宫等罪恶，和珅都一一供认不讳。

在弄清了和珅的犯罪的根本事实后，嘉庆帝在正月十一日下诏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这些罪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泄露机密，拉拢皇太子，抢拥戴之功；对乾隆皇帝大不敬；欺瞒军机要事，隐匿边报；专断军机处，把持户部；任人唯亲，所举非人；称和珅墓为和陵，园林房屋僭制，有谋反之心；大珠、宝石、珍珠物串都超过御用，衣货千万，全银财产不计其数；开当铺、钱店，与民争利；纵容家奴到处勒索，广置财产；步军统领巡捕营一千余兵丁供和珅私宅役使……不一而足。

嘉庆帝在宣谕和珅罪状的诏书中，同时公布了和珅家产查抄清单，所见者无不瞪大了眼珠子，说不出话来，查抄结果是：

田土八千余顷，房屋二千余间。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金库内赤金五万八千两。银库内银元宝八百九十五万五千多个。珠宝库、绸缎库、人参库都充盈其中。

不过，公布的这些数字，并非是和

珅财的全部，由于这些只是短短几天内查抄记录下来的，而和珅转移、隐藏的财产并未包括在内。依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有个叫萨彬图的副都统，当时就对此提出过疑问，建议嘉庆帝应穷追不舍、继续清查，嘉庆帝知道他的话有道理，但却对此讳莫如深，不表态度，反而怪他多嘴。故此，世间对和氏到底有多少家产一直众说纷纭，因此使留下了许多和珅家产的清单，其中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载“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流传最广。

据薛福成的记载，和珅的家产，除房屋住宅花园之外，有田地八千顷，生沙金二百余万两，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金银元宝各一千个，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其他如珍珠、白玉、绸缎、珊瑚、玛瑙、宝石、瓷器、古鼎、人参、貂皮等不计其数。当时查抄和珅家产共有一百零九号，其中已估价的二六号，估价部分值银二亿二千多万两；如果依据梁启超的估计，和珅的全部家产，则有八亿两之巨，比清廷十年收入的总和还多。这些财产抄没后，嘉庆帝除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他的亲信和大臣外，其余的都为嘉庆帝所占有，因此民间广泛流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

给和珅定罪后，接着给其同党福长安定罪。经大臣会同各有关衙门，一致奏请皇上将和珅凌迟处死，福长安处以斩首。

但嘉庆皇帝考虑到，倘若把他父皇最亲信的和珅拉到大庭广众之中，一刀一刀凌迟处死，这对于已故的老皇帝的脸面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于是决定赐令和珅自尽，判福长安死刑。

正月十八日黄昏，在乾隆皇帝去世的半个月后，执法官员捧着嘉庆帝的圣旨，到监狱宣读，和珅跪在地上，听完后叩头谢恩。然后对他的儿子和福长安说：“我和你等服事先帝已经很久了，本来应当一道同归，现在皇上已有钟爱之臣，不再需要我们了，我就先走了！”说完，悬梁自尽。福长安等跪在一边看着和珅气绝身亡。

【琦善】

琦善（1790～1854），字静庵，博尔济古特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父亲成德当过热河都统，由于他祖先格得理尔率领所统属的部众归附清廷的缘故，也袭第一等侯爵，嘉庆十三年（1808），由荫生被授为刑部员外郎。几经升擢，嘉庆二十年授河南按察使，嘉庆二十四年授河南巡抚。第二年，因黄河泛滥被革职，但同年即获宽免，复任河南按察使，调往山东。道光元年（1821）任山东巡抚，道光三年初，父丧，袭侯爵。第二年，剿平临清动乱教派。道光五年初，道光皇帝褒扬其临危不惧，同年稍晚，授两江总督。皇帝已准其改进江苏北部航道的计划，但因施工方法不当造成严重损失，以至道光七年被革职，左迁内阁学士。数月后再授山东巡抚。道光九年至道光十一年他身居四川总督之要职，其后授直隶总督。道光十六年兼充协办大学士，道光十八年为大学士。道光十九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于广州，道光二十年清朝海防吃紧，英军攻占浙江定海，战争波及北方。琦善被调往天津筹办海防事务。英军海军舰队于八月十一、二日驶抵大沽口外，

琦善会见并宴请了英国的领事义律，以及英军将领，答应替洋人向皇上奏明情况。十六日收受巴麦尊勋爵致清帝信件，该信索求赔偿林则徐在广州销毁的鸦片烟价以及英军军费。信中还要求为义律所受之侮辱雪耻；香港岛割与英国作商埠；广州商行清偿其巨额债款；将泉中英官吏平等等。八月二十日道光命琦善同英人谈判，意在使其回广州商谈解决。琦善在大沽特设帐篷款待英使，并在那里举行谈判，琦善指责林则徐办事不妥，答应代为惩办，谈判成功，九月十七日英人应允返粤。琦善被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取代林则徐，不久署两广总督。

琦善抵粤不久，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向道光皇帝密奏林则徐引起冲突的原因是："林允诺赔偿英人由他所毁之鸦片烟价，但未兑现；林坚持出具甘结后方可继续贸易，从事鸦片贸易者格杀勿论。"琦善在广州，告谕沿海一带的清军将领只准防守要塞险隘，遇到英国兵舰时不得开炮还击。但英人的要求有增无减，要求惩处林则徐并割给英国一个新的贸易中心。道光二十一年（1841）一月七日，英人无意再拖延谈判，攻陷川鼻要塞。次日琦善首次奏报此战时称"不分胜负"，但十日获悉实情后即奏报要塞已陷，英军炮火难以抵挡。他主张将香港割与英国，迅速重开广州贸易以安抚英人，并使广州幸免于难。于是他开始同英人谈判，二十日达成《川鼻草约》。该约规定香港本岛割与英人，赔款六百万元，英人有权同中国官员直接交涉，立即重开广州贸易，不待中英两国政府任何一方之批准，义律就占领香港，并正式宣布它为大英国一部分。广东巡抚怡良马上将此奏报皇帝，同时公开表示《川鼻草约》的条款事前一无所知。怡良的奏报，使道光皇帝确信琦善阳奉阴违。道光皇帝命广东大量增兵加强防务，致使英人也疑心琦善对他们耍花招。琦善后来向皇帝辩解说，香港地势无险可守，兵械短缺，人力不足，民无斗志，北京当然难以为信，朝廷乃重申要剿灭英人。一月二十七日和二月十三日，琦善同义律的两次私人会谈已使国内反对派深信他在暗通英人。二月二十三日他未能阻止英人进攻虎门，二十六日虎门炮台失陷，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以身殉国，攻讦琦善之声尤甚。二十六日道光皇帝颁诏斥责琦善擅自把香港割让给英国，擅许与洋人议定通商，并以上述罪名免去琦善的官职，将其逮捕法办，籍没家产。并命将琦善革职逮捕回京，褫夺全部爵衔，他多年为官积蓄的万贯家财被籍没。奕山接替其军权，怡良暂取代其总督职位。三月十二日琦善被因解出广州，到了京师朝廷议定其罪为大辟之刑，不久又宽容了他，让他带罪到浙江清兵军营中效力。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琦善又被改派到军台。

道光二十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琦善东山再起，充叶尔羌参赞大臣。道光二十三年授热河都统，御史陈庆镛当即对此上疏指责，因而他未能就职。但道光二十三年末又被派充驻藏大臣，道光二十六年他在西藏命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和秦离藏。道光二十六年他们携带两只装满琦善财产的大箱子启程，琦善请他们把箱子存在四川成都以便他回京时带走。道光二十七年初琦善任四川总督，次年皇帝嘉奖其治理有方赏头品顶戴。道光二十八年末再授协办大学

土，同时留川督任。道光二十九年调为陕甘总督，因苛待该地及青海回部，咸丰元年（1851 年）他被革职并流放吉林。但数月后需他去河南阻击太平军，又将其召回。琦善受命署河南巡抚，督办楚、豫交界防务。咸丰三年春文宗皇帝命他在江苏协守江北大营，三月他在浦口和扬州附近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四年夏病死，朝廷赠予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称号，依照总督的惯例赐物抚恤，谥“文勤”。

【耆英】

耆英（1790～1858），字介春，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祖父炳文是乾隆朝中期御史，由于在一奏折中触犯皇帝被谪戍伊犁，父亲禄康，始为宗人府主事，后官至东阁大学士兼步军统领。嘉庆十六年，以放纵其家奴仆与他家大臣奴仆聚赌而遭弹劾、降职。嘉庆十八年，充正黄旗都统时，手下几个士兵加入攻打北京皇宫之匪伙，于是作为流放的宗室，他被发配盛京，后死在那里。

耆英与父亲一样，由供职宗人府步入仕途，先为主事，后为副理事官，迁理事官。在此期间，曾充山海关税关监督一年。嘉庆二十四年，擢内阁侍读学士，两年后为内阁学士。道光皇帝继位后，耆英历任理藩院、兵部右侍郎、工部、户部、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在此期间，还身兼多职，如总管内务大臣、步军统领和各旗都统。道光十六年（1836），曾赴江西按事，并赴广州审理案件。

但离京不久，有人弹劾他释放一名犯赌的宦官张道忠。因此于道光十六年降职为兵部侍郎。道光十七年初，再授兵部右侍郎，同年四月为热河都统。从道光十八年六月至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受命担任盛京将军。这些年，耆英忙于查禁鸦片走私，在辽东半岛沿海设防，以防当时正与中国交战之英舰的突然袭击。当璞鼎查所率之英国远征军占领浙江镇海后，北方各省沿海严加防卫，耆英更加严督东北沿海防务。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广东方面的战事紧急，琦善已经被道光撤职贬黜，朝廷下诏授耆英为广州将军，特授为钦差大臣，并且督办浙江方面的洋务。并令火速到任。后来耆英知道英吉利被邻国战败的事是讹传，所以就仍然留在了浙江，因为英军已连陷几城，正从宁波和镇海出发，故令耆英兼钦差大臣处理英人入侵事。五月十一日，耆英抵杭州，七天后英军陷沿海城镇乍浦，杭州受威胁。耆英赴嘉兴加强防务，与此同时，令另一宗室伊里布前往乍浦英军司令部协商交换俘虏事宜。五月二十五日，诏促耆英赴广州本任，但是六月五日，又令其留浙江专主与英人议和事宜。这时英军扩大侵略至江苏。六月十九日上海陷落。于是，耆英前往松江、苏州。此时道光皇帝仍希望抗敌下去，故拒绝牛鉴所请。牛鉴是 1841 年后的两江总督，他请示皇帝接受英国条款以结束战争。1842 年七月十五日，耆英奏陈军事抵抗已无望，速为前途定大计。耆英之奏报未及抵京，道光皇帝已知不得不议和，并于七月二十六日密谕耆英接受英国条款，十天后又重下此谕。与此同时，英舰入长江，七月二十日陷镇江，威胁南京。八月十一日，耆英以签约全权大臣身份抵南京，此日开始会商。结果于八

月十九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璞鼎查代表英国，耆英、伊里布和牛鉴代表中国。条约共十三款，允诺给予英国的如下：割让香港岛；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放五口通商；中英官员外交上平等。赔款项中，六百万元指明为赔偿英商，因林则徐收缴并销毁了他们的鸦片。耆英恳求璞鼎查停止在英国辖地上种植罂粟，但璞鼎查不接受，理由是假若英国停止出售鸦片，其他国家将接过这项贸易。璞鼎查指出，假如中国人停止吸食，假如中国官员廉洁正直，鸦片贸易将不禁自止。第一期赔款如数付清后，英舰撤离长江南下广州，在广州再举行进一步会商。朝廷下令伊里布为广州将军和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人商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耆英接牛鉴为两江总督。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五日，伊里布卒，诏令耆英赴广州继续协商。六月二十六日，耆英和璞鼎查在香港互换《南京条约》批准文本，并签署《过境税声明》。十月八日，签署附约《虎门条约》，此约包括实行《南京条约》的细则。《虎门条约》允给英国领事裁判权和其他治外法权，并包括“最惠国待遇”，根据“最惠国待遇”，中国允给一国任何特权，英国均也可以要求均沾。

与璞鼎查签约后，耆英回南京。道光二十四年二月，美国使臣顾盛抵澳门，告知署理总督，美国使团拟进京。为阻止顾盛进京，诏令耆英为两广总督迷离南京赴任，并授予办理五口外交全权。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耆英与顾盛开始会商，七月三日《望厦条约》签订。这一条约将英国所享之一切特权给予美国，包括外国人享受治外法权的明确规定。随后，耆英又签署其他两约：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与法国又签订了中法二黄埔条约。

作为这些条约的签署者，耆英完全不懂得条约对中国产生的恶劣影响。领事裁判权这一最关键的条款，可能被中国官员认为是最得意之计，借此可以避免审理洋人所带来的麻烦。甚至当道光皇帝议及《南京条约》时，似乎也仅关注赔款的偿付，并令耆英本人设法办理赔款事宜，耆英乃迫使先前之行商承担。道光二十五年，耆英虽驻广州，却提升为大学士。道光二十六年初，京察有功被议叙，可能是皇帝认为耆英在和英国议和上有功，从而使清王朝保存住力量以统治中国。

但是与外人之新磨擦又在酝酿之中。广州反对英人入城之情绪越发高涨，从前，粤人一直鄙夷外人，因而不能容忍英人入广州城。再则，道光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八年间，外人走出商馆漫游珠江时，已有骚乱发生。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三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率一支小舰队驶向广州以示反击，耆英被迫允诺英人两年后可以入城。但耆英未向北京详细奏报此事，因此继他之任的徐广缙以后不承认履行此诺言。耆英恼怒广东人生事，奏报闹事之人是受了无赖和歹徒之煽动，他还谴责在京官员妄想用暴民抵御外人。此年初，他处决四名罪犯，他们曾率一帮人杀死六名英国人。由于这些事情，耆英不仅遭致广东人反对，而且许多在京官员也参劾他抑民联夷。这些呼声也影响到宣宗。

耆英刚开始回京时，身受各种荣誉。始充协办大学士，兼肥缺崇文门税关监督一职。道光二十八年末，擢大学士。但不久宣宗崩，文宗继位，耆英及其一

派失宠。道光三十年（1850），清文宗咸丰皇帝即位，耆英应诏上书陈言道："要求得国家的大治，没有比用人、理财、行政等大事更应予以优先考虑的了。用人之道，在于明试以功。人有刚柔之分，才能也有长短之别。用人不按照他的才能情况使用，就是正人君子也会害怕误事；如果用人得当，小人也能担起事务。"等，但遭到咸丰皇帝的严斥。此后他称病在家。道光三十年一月三十日，帝手诏斥耆英抑民奉夷，面陈夷情，言过其实。同一诏内，还谴责穆彰阿欺瞒宣宗，压制林则徐等爱国者。事实是英人曾有书集给耆英和穆彰阿，此为他们被黜的原因之一，但诏书中未提此事。穆彰阿被革职，耆英降至五品官员，任兵部院员外郎。

咸丰二年（1852），耆英充工部员外郎。一年后，令供职于防御太平军之北京防城军统领绵愉衙门。咸丰三年初，广东太平军北上，国库空虚，诏令耆英、穆彰阿、卓秉恬和其他在京十五名富人捐饷助剿。据十五名捐饷人之一崇实所说，这三位老臣为绵愉和僧格林沁所迫，捐饷四万两。咸丰四年初，耆英以捐饷获四品顶戴。然而咸丰五年，其子庆锡，系一总兵，因向部属员借贷，又未经允准就在近京处设衙门和各营分配马匹而处谪戍。耆英亦被革职圈禁，因他通过该衙门传送过信件。他被关在宗人府空房内，但不久即获释。

咸丰八年英国军队纠集法国、美国、俄国等国兵舰进犯天津，直接威胁北京清廷，英法称如不速派全权大臣前去议和，即进兵北京，并强迫清政府修改以前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咸丰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桂良和花沙纳作为钦差大臣赴津。六月一日，诏示桂良、花沙纳允诺不伤中国大体之任何条款。次日，耆英奉命赴津协助他们与联军及美、俄公使协商。诏加耆英侍郎衔，授权办理外交。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曾签署先前之约，且为西人所知。耆英时已年老眼花，也许他希望藉此挽回声誉，因此他表示愿意力任其难。六月三日，皇上授权耆英用直隶总督印以调兵和发令，并希望如桂良和花沙纳会商遇困难时，耆英有权作更多让步以协助他们。清廷为三使臣各备特制印绶。英使怀疑耆英会给会商设置障碍，宁与经验较少之桂良和花沙纳商谈。六月十一日，英国使用翻译官威妥玛拜访三位使臣，要求他们同意英国之和平条款。此次会见，威妥玛和李泰国出示耆英十三年前所书之一份论述西洋人并如何对付他们的奏折。这份奏折与其他文件，系英军于咸丰七年攻陷广州时，得自叶名琛衙门。他们翻译出了耆英的奏章，发现内容多是掩饰，与事实不符合，英国人很痛恨他。及耆英到了天津，英国人拒不会见耆英。两名翻译官指责奏折中的某些评论，认为是对西洋人不友好的表现，也是他们担心耆英将使商谈受阻的理由。通过威胁恫吓，威妥玛和李泰国最后从中国使臣处获得一份实质上全部同意英国要求的书面保证。此为耆英最后之从政活动，威妥玛和李泰国的态度使他深感恐惧，次日便离津而去。桂良和花沙纳也许怀疑耆英是奉派来监视他们的，故上奏说耆英之出面对议和有利，咸丰览奏令耆英留津，但他不从。

耆英违命擅自离职回京在通州被捕，解京讯鞫。曾荐耆英出面的亲贵们亦遭到一定的惩罚。众多王公大员审理此案，

定耆英绞监候。另一些官员，特别是肃顺主张立绞耆英。六月二十八日，与英签订条约之奏报抵京。次日，咸丰颁一长谕谴责耆英违命，诿过于人，并无充分理由擅离职守，为“情法两全”，赐其自尽，耆英服毒而死。

【李鸿章】

剿灭义军　飞黄腾达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晚年自号仪叟。道光三年，生于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今安徽省合肥市）一个书香门第的官僚地主家庭，后人称之为“李合肥”即源于此。李鸿章排行第二，本名章铜，字渐甫。他从小聪慧好学，受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熏陶，希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跻身高官显贵的行列。他先后受业于他父亲李文安、堂伯父李仿仙、徐明经和曾国藩四位理学大师，在义理、经济之学和治世技巧方面有很大的体会。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达到“少年科第”的高峰，开始了仕途上的第一步。

咸丰元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咸丰三年三月，李鸿章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到安徽办团练。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不久就进行西征和北伐，并夹击安徽。李鸿章以一介书生回安徽，协助吕贤基、李嘉端等人办团练，开始时当然并不那么顺利，多次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但李鸿章凭着他人地熟悉和对农民起义的仇视，拼命阻止和打击太平军在安徽的进攻，在咸丰六年以前立有三次大功，被赏加至按察使衔。此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太平军在陈玉成的指挥下，连战连捷，基本上控制了的重要城镇，而李鸿章在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连吃败仗，并且和同事的关系也搞得相当紧张，似已穷途末路了。

咸丰九年一月，太平军攻入了李鸿章的家乡，李鸿章家破人亡，其父也死去。潦倒失意的李鸿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投奔正在江西南昌“围剿”太平军的恩师曾国藩，成为了曾国藩的亲信幕宾。同年十一月，曾国藩推荐他为福建延津道道员，但无缺可补；咸丰十年八月又被曾国藩推荐为两淮盐运使也未成，不得不继续留在曾国藩幕中。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曾国藩曾多次遭遇困境，很多次都是靠李鸿章出谋划策，才能够化险为夷。这样一来，李鸿章越来越受曾国藩的倚重，因为曾国藩有了节制四省军务与人事的权力，曾国藩命李鸿章四处招募人马，去上海作战，从此李鸿章终于可以独挡一面，有了崭露头角之日。

受曾国藩之命，李鸿章并没有返回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或通信等办法，召集原来在安徽的一些旧部下，如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张树声、吴长庆等部将。此时曾国藩又把太平天国安徽籍降将程学启等部拨给李鸿章。于是李鸿章共募得七千五百人，按湘军制度制订了营制；从此，中国近代继湘军，又有一支地主武装——淮军组成了。

同治元年三月底，上海士绅雇了七艘英轮溯江而上到安庆迎接李鸿章。四月上旬至六月上旬，十三营淮军全部到达上海。到上海不久，根据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提议，李鸿章由一个候补道员，破格授予署理江苏巡抚的职务，从此进

入朝廷上层，终于成为了清王朝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带着战斗力很脆弱的七千五百名淮军到达上海后，地方上面临着吏治败坏、时局动荡的现实；在军事上有太平军大兵压境。当时淮军的武器简陋而且破败。从重视经世致用的科举进士，到经过十年军旅生涯磨炼的李鸿章，已经成为一个性格倔强而又刚愎自用的人物，面对这一切困难他没有退缩，而是大胆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有了曾国藩作为外援，他大刀阔斧进行工作，首先撤换了江苏省一些庸碌无能、贪污腐败的官吏，整顿了吏治；同时结好外国势力和新兴买办阶层，广筹财源，迅速扩编了淮军并更新其装备，很快淮军就全部用洋枪洋炮武装了起来，并请洋人进行训练。这样淮军得到了根本的改观，不仅没有在两年多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中被消灭，反而在不长时间内发展成为牵制太平军东线战场一支不可忽视的劲旅。

同治二年，太平军的形势已经危在



李鸿章像

旦夕了，南京已处在湘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江浙根据地也仅剩杭州、苏州以西据点。李鸿章的淮军厚禄诱降太平军将领的策略在顺利地进行着，太平军也由此而分化瓦解。太平军后期的支柱忠王李秀成穷于东西应付，忙于救援，弄得焦头烂额。为了巩固江浙根据地，同治二年九月，太平军与淮军在苏州附近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几经反复，太平军渐渐不支。淮军依仗武器的优良，把包围圈逐渐缩小，最后兵临城下。苏州是太平天国在天京之外的又一中心根据地，忠王府就设在城内。李鸿章丧心病狂孤注一掷，调来二十多门巨大的洋炮，轰毁了苏州数段城墙。但李秀成、慕王谭绍光等指挥太平军却英勇顽强打退淮军多次进攻，把李鸿章牢牢地堵在城外。李鸿章在久攻不下时，又故伎重演，派人诱降城内纳王郜永宽以下八王。此时天京危急，李秀成奉命回援天京。十二月四日，叛徒郜永宽等人合谋刺杀了谭绍光，卑躬屈膝地向李鸿章投降。但是第二天李鸿章把乞降的八王全部杀掉。同时还有二千余名太平军将士死于李鸿章的屠刀之下。李鸿章克苏州有“功”，被赏加太子少保，赏穿黄马褂，从此李鸿章的名字在清廷响亮了起来。

同治二年底至同治三年初，李鸿章继克苏州之后，连连攻克了无锡、嘉善、嘉兴、宜光、溧阳、金坛、常州，进逼天京外围。考虑到与曾国藩恩师的关系，李鸿章没有直接参与同治三年七月湘军攻陷天京的战役，而是把这一能捞到大功的战役留给恩师的湘军，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灭下，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经历了十四年之后惨遭失败了。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但遵王赖

文光联合捻军还在北方继续战斗。山东曹州一战，他们以机智灵活的战术，杀死了前来镇压的钦差大臣、蒙古科尔沁亲王、咸丰帝表兄僧格林沁，顿时中外被压迫人民为之一振。清政府在震惊之余，急调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湘淮军主力北上，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负责镇压捻军；命令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后援军饷。捻军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以运动战为主，灵活机动、声东击西，统帅赖文光又对部队大加整顿，更加提高了战斗力。曾国藩围剿捻军一年多毫无建树，清廷对湘军的行为深感不满，因而在同治五年十一月，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率淮军镇压捻军，而命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原任。

当时的捻军为了战略上的需要，分为东西两支；因而西捻军由张宗禹率领，挺进西北；东捻军则由赖文光率领在中原活动。两支捻军成犄角之势，目的在开辟新战场，互相支援、分散清军兵力。老奸巨滑的李鸿章针对捻军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以限制捻军的流动，同时采用各个击破的方针，先集中兵力向东捻军进攻。同治六年底，东捻军被追迫在山东运河以东狭窄周旋，后来虽突破了淮军包围，但不久又被困于黄河以南、运河以东、六塘河以北与大海之间，陷入李鸿章的四面包围。使“以走制敌”的战略战术无法施展，因此屡屡受挫。同治七年一月赖文光被俘，不久在扬州惨遭杀害，东捻军彻底失败。东捻军在遭到李鸿章包围的时候，西捻军为了解救东捻之围，转战东来救援，在东捻军失败前夕，已到达直隶，谁知这却正中了李鸿章的圈套，不久西捻军又被李鸿章包围在黄河以南、运河以东、徒骇河以北之间的狭长地带。在重重的围困之中，张宗禹走投无路，跳了徒骇河自杀，下落不明，西捻军也被消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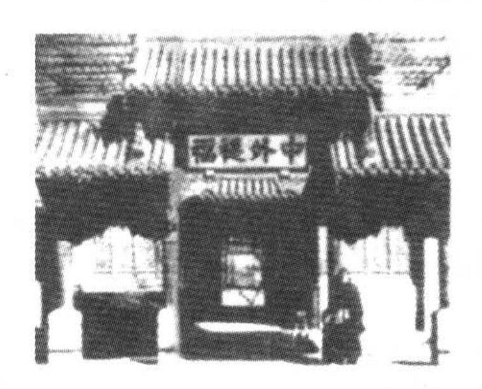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之内，李鸿章残酷剿杀了东西捻军，因“功”被清政府赐加太子太保衔，并实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当年秋，李鸿章奉召进京觐见皇帝和太后，被加赏上了紫禁城内骑马的荣誉。

李鸿章由一介儒生，靠镇压农民运动而青云直上。同治九年曾国藩从直隶总督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十一月又兼任北洋大臣。此时，李鸿章的淮军已发展到十来万人，驻防在京畿、辽东、山东、两江等地，几至半个中国，支撑着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李鸿章在这个高位上，稳稳当当地蹲了二十五年，这在清王朝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先例；李鸿章成为清末最有影响力的封疆大吏、中堂、大人。

洋务首领　功不可没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署理江苏巡抚兼通商大臣后，在上海与洋人展开了频繁的接触与联合。

同治二年，李鸿章曾在松江设立弹药厂；攻陷苏州后，把弹药厂迁到苏州，改为洋炮局；同治四年，署理两江总督时又搬到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专门生产枪、炮、子弹、火药，供应淮军及本省各防营。李鸿章在此基础上，搞了三十多年洋务。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成员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是最主动学习外国科学技术的。在洋务派中，李鸿章办的军工企业最多，规模也最大，除金陵制造局外，还有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同治四年，李鸿章购买了上海虹口的美商铁厂，很快又并入原属清政府的两个小炮厂，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若干年后经过发展成为洋务派最大的军工企业。这个兵工厂生产枪、炮、弹药、水雷等武器，其设备是从美国进口，并雇请英、美、德等国技师。同治五年，由厂址狭小，又从虹口迁到高昌庙。及后不断扩充，先后建了汽炉、轮船；枪炮、弹药、水雷、炼钢等十四个分厂和一个译书局；人员最多时达几万人。在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制造了不少武器，译书局也翻译了一批国外科技图书。在总局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徐寿、华衡芳等人，在数学、化学、机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造诣。

李鸿章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接手了天津机器局。他首先对原厂的人员进行调整，并做了扩充和整顿，换上了不少自己的亲信，又从香港请来很多技术工人。该厂主要生产枪、炮、水雷、子弹、开花弹等，设备购自英国；这个厂的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

由于军事工业筹措经费困难，洋务派就广开财源“求富”。他们办起了许多民用工业。在民用企业中，又以李鸿章经手兴办的为多，有许多企业是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没有得到清廷允准的条件下，擅自兴办起来的。

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在上海设轮船招商局，先后起用买办出身而又谙熟技术管理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主持局务。以后他还在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局。招商局的开办，虽然目的在于扩大财源，但却突破了外国势力对中国航业的垄断。开业的三年，招商局挤掉了外国轮船公司一千三百万两白银的利润的市场份额，迫使美国旗昌洋行退出竞争。

同治十三年，洋务派与顽固派继同治六年有关同文馆招生问题辩论后，又再一次展开大辩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制造洋船洋器和筹备海防问题。总理衙门先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措施。李鸿章是“六条”最有力的支持者与倡导者，他主张建立新式海军，各省配备近代武器，用西法采煤、建铁路，培养和选拔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两派经过一场激论斗争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的意见占了上风。当年李鸿章被授文华殿大学士。

光绪三年（1877），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开采直隶唐山地区的煤炭；光绪七年正式出煤，年产量三万多吨。当年，在奕䜣的暗中怂恿下，他先斩后奏修建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光绪十二年又向西延长到芦台，长八十五公里，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置铁路公司进行运营。第二年，李鸿章主持将铁路由芦台又向西延长至天津，光绪二十年，开滦煤矿年产量已发展到七十万吨，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型煤矿。这是洋务派所办煤矿中最大和成果最好的一个。这

个煤矿采用机器采煤，逐渐配备了铁路、运河、专用码头及货栈，在中国近代影响非常大。

另外，在工业、交通等方面李鸿章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光绪五年李鸿章设天津电报局，在国内设七个分局，经过数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能通达半个中国的电报网；光绪七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由郑观应负责，聘请美国人任教习，开中国人机器织布先河；光绪十四年，在黑龙江设漠河矿务局，在当地采金，年产量近两万两，挤走了沙俄抢掠全国黄金的“采矿事务所”。

基于“自强”、“求富”的需要，李鸿章在引进“制器之器”创办军工企业、民用工业企业的同时，还试图推进科举改革，培养“制器之人”，即大批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式人才。在同治六年的辩论中，他主张科举专设传授和学习各种制造技术一科，单独取士。虽未获准实行，但他在自己所设的上海广方言馆中，不仅让学生学外语，还开设了自然科学课程，这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无疑是一个突破。由此李鸿章大兴新式学校，先后创办了外国语学校、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军医学堂、天津电报学校；他还主持向欧美的几个国家派遣了少量留学生，这是中国派出留学生的先声。通过这些新式学校和留学，一大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被培养出来。

在军事上，李鸿章除用最先进的近代武器装备自己的淮军以外，最令举世瞩目的是创办了北洋海军，这是李鸿章兴办洋务的主要目的。同治十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口添置新式炮台，当年又调江南和福州船厂的两只船到天津巡海。同治十三年丁日昌建议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李鸿章予以坚决支持。光绪四年清政府决定先设北洋水师，以后再建东洋、南洋水师。年底，李鸿章向英国购买四条炮舰，报请由记名提督丁汝昌留北洋差遣，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以道员马建忠负责海军日常事务。次年，命人设计出黄地蓝龙红珠的长方形海军旗。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正式设海军衙门，由奕䜣任总理大臣，李鸿章任会办大臣；实权由李鸿章掌握。李鸿章凭借手中的权利几年中添置了十余艘新船。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舰队中有排水量达七千多吨的主力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还有各种巡洋舰、炮舰、练习舰、鱼雷艇及各种杂差船只近五十艘；力量在当时已经超过了日本。然而由于北洋海军建军以后，为筹备甲午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海军经费大部分被挪用修建颐和园，舰队没办法再加更换和扩充。而日本则针对中国的海军水平，组建了新舰队，在火力和速度等方面，不久就超过了北洋舰队。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淮军一败不可收拾，北洋舰队也全军覆没，李鸿章洋务运动妁军事目的宣告破产，李鸿章权倾朝野的日子也宣告从此结束。然而李鸿章在创办军用、民用工业企业、发展教育、交通、通讯等领域开中国近代化的功劳，却是不可磨灭的。

签订条约　丧权辱国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国内刚刚历经大规模农民起义和英法等联军的打击之后，国力相当虚弱，而此时外国资本主义已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

他们更加加紧对中国的武力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机一日比一日严重，六十年代清与外国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李鸿章等人，针对这种变化，审时度势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纲要。在一片黑暗的清朝统治者中，有这种认识的人真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李鸿章大声疾呼中国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抱残守缺，强调“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来举办洋务就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由之路。

同治九年，发生了天津教案，直隶总督曾国藩先受命处理，后由于受到各方面的责难而离开，清廷不得不又命李鸿章继续处理。在李鸿章主持下，天津教案最终以清政府杀人偿命、赔款道歉等结案。他在任期间，《天津会议专条》、《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或多或少和他有关系。

李鸿章秉承清慈禧等人的卖国保位意旨，在几十年的外交活动中，始终坚持一条对内镇压、对外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在他签订的各个条约中，除少数具有平等的以外，大部分是卖国条约。在签约的谈判中，他出卖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使外国侵略者的特权越来越多，使国家的半殖民地性质不断地加深。

李鸿章曾评价他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然而甲午战争却使他从权力顶峰上跌落下来，他仅留存文华殿大学士头衔，奉旨入阁办事。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只借住在贤良寺，既不能与闻朝政，又时受政敌攻击。为此他很少外出访亲问友，也不喜欢接待来访客人，“因而门户亦甚冷落”。但李鸿章并不甘心，他还时时刻刻企图东山再起。

光绪二十二年，机会终于来了，慈禧任命他为全权特使，参加俄皇加冕庆典，游历欧美，一路风光。李鸿章出访欧美，除了外交方面签中俄条约的失策外，在思想方面颇有收获。他过去的“耳闻”，经过亲自考察而有了“目睹”的实际感受，对欧美“立国政教”有了深刻认识，并进而与中国国情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欧美“上下一心”，中国“政杂言塞”的结论。因而李鸿章在觐见光绪和慈禧时，就“历陈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李鸿章原想借助出访欧美之机“再握大权”，还督直隶，重温“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旧梦，而欧美列强也迫切希望清廷对李鸿章能够“优加信任，重畀大权”，使之东山再起。但是终于还是事与愿违，李鸿章归国之后，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只奉命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等人在京组织“公车上书”，掀起维新运动，当年八月，由翰林院侍讲学士文廷式等，组织了“强学会”。一时一批清廷宫僚纷纷捐资加入，一些外国在华教士也解囊资助加入了该组织。李鸿章当然也想参加，他并且捐款二千两，但是由于他在马关刚刚签完条约，人皆指其为卖国贼，名声太臭，因而被拒绝入会。当年十月，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李鸿章捐款一千两。对维新运动的兴起、发展、变法和失败，李鸿章一直关注并暗中给予支持和同情，甚且还尽力保护维新派大臣、人士。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是与他的自强变法思想分不开的。但由于其看重功

名利禄，他的变法思想与维新派又有极大的距离。

光绪二十五年，年已七十六岁高龄的李鸿章，奉命到山东勘查山东黄河工程。他尽力查访，陈述了不少有效的主张，但最后由于清廷无法实施而告终。同年底李鸿章得任两广总督之职再次出山，在两广总督任上，他接到慈禧“剿杀康党”的旨令。他最后由于奉旨而行，逮捕了一些保皇会成员，也对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起义进行过镇压，然而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是尽力保康有为祖坟，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书信联系，并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也频繁接触。这些行为，表明他既不愿割掉赖以荣升的清王朝的脐带，又对变革自强存有希望。

光绪二十六年，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爆发。英、法、俄、日、美、德、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集结起数万人的八国联军，挑起了侵华战争。在清政府内部，展开了对义和团“剿”与“抚”，对八国联军“和”与“战”的争论。最后慈禧一派占据上风，他们主张利用义和团去打洋人，以求其两败俱伤。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联军宣战。正当朝廷“和”、“战”、“剿”、“抚”两派争论不休之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李鸿章虽未直接参加“东南互保”，但他是支持这个章程的。李鸿章一贯主张镇压人民革命，并靠镇压人民起家，这次也不例外。在洋务和外交活动中他从崇洋发展到惧洋，因此十分害怕八国的联合进攻，他对“东南互保”是积极支持的。

同年七月，慈禧太后见形势非常不妙，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向外国妥协做准备。此时李鸿章已听不进香港总督卜力、革命党人要他两广独立的主张，离开两广北上。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光绪和部分大臣仓皇出逃西安，途中下罪己诏，严令剿杀义和团，并授权李鸿章“便宜行事”，让他和帝国主义商谈投降议和。庆亲王和李鸿章被任为议和全权大臣，收拾残局。

慈禧太后在获知外国列强可以保证她最高权力、不把她作为战争祸首的前提下，下诏让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要他全部答应《议和大纲》十条要求。光绪二十七年，各国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条约的主要内容：惩办战犯；中国赔款四万五千万两白银，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本息总计九万八千万两；在北京东吏民巷设使馆区，外国驻兵把守，中国人不得入内；拆毁大沽至北京所有防御设施，并允许外国军队在十三处驻军；取缔一切反帝活动。这一条约使全中国和清王朝直接处于了列强的刺刀之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奉命署理新成立的外务部。由于战乱的恐吓和忙于议和活动，也由于卖国条约受到舆论的强烈指责，李鸿章终于一病不起，在《辛丑条约》签订不久后的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死去，终年七十八岁，正在从西安返京途中的慈禧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恭亲王溥伟前去祭奠，并下诏对李鸿章追谥文忠，晋封一等侯爵，赐太子太师，入贤良祠祭祀。

【荣禄】

效忠慈禧　剿灭顾命

荣禄（1836～1903），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族正白旗人，与慈禧太后有姻亲关系。咸丰二年（1852），荣禄由荫生补兵部主事，但此后仕途并不平坦。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热河，荣禄作为侍从跟随护驾，得以接近慈禧。在热河，他充任神机营翼长，受到慈禧的赏识。第二年七月，咸丰帝病死在热河，惟一的儿子、五岁的载淳继位，这就是同治皇帝。咸丰临终前，曾召户部尚书肃顺、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等八人接受顾命，嘱咐他们尽心竭力，辅佐幼君。肃顺是几人中最有权谋的，他一直对慈禧干预朝政、居心叵测不满，因而自受顾命以来，越发不把慈禧放在眼中，往往独断专行。当御史董元醇上奏请两宫垂帘训政时，肃顺大加斥责，并着手追查幕后主使人。这些顾命大臣们所做的一切，使荣禄深为慈禧的地位忧虑，他不时向慈禧打小报告，要她先下手为强。慈禧听了荣禄的话，更加惶惶不安。荣禄因平常与咸丰帝的胞弟恭亲王奕䜣有交情，便建议慈禧召奕䜣自京来热河商议对策。慈禧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不料，奕䜣来热河后，受到肃顺、端华等人以叔嫂避嫌为理由的阻挡，被拒之于宫外，无法与慈禧见面。后经荣禄策划，奕䜣男扮女妆混入宫中，遂得以与两宫太后密议，决定早日奉咸丰梓宫回京，并让奕䜣在京城准备兵力，发动政变，擒拿肃顺等人。

由于两宫太后一再催促回京，再加上关外已经天凉，肃顺等人最后无法阻



荣禄像

挡，便打算派亲信兵丁在奉送梓宫回京途中，刺杀慈禧。荣禄对此早已有所准备，一路上，他精心保护，使得肃顺、端华无从下手；等走到古北口，风沙骤起，大雨倾盆，正是下手的大好时机，偏偏荣禄机警非常，他不仅指挥军队更加精心照料两宫太后，自己也鞍前马后，自晨至夕，片刻不离开两位皇太后的左右，而且凡从外面送来的一切食物用具等供奉，都必须一一经过他亲自检验才能送达太后手中。由于荣禄的机警、练达和忠诚，两宫皇太后得以安全回到京城。

荣禄奉两宫太后及同治帝銮驾先行抵达北京后，便立刻行使权力，在京城要道设置好军队，只等随后护送咸丰帝梓宫的肃顺等人到来后即行事。当时，端华、载垣先行入城，二人见城内并无异常迹象，于是就放心入自己官府安歇。其实恭亲王奕䜣自到热河与慈禧密谋回京后，早做好了布置。第二天一早，怡亲王载垣刚刚起床，正准备入朝见驾，忽见恭亲王奕䜣带领侍卫数十名大步进

人府中，载垣惊讶不已，忙问何事，奕䜣正色道：“圣旨下，请怡王即刻解任！”载垣知大事不好，但仍然壮起胆子反问道：“我奉大行皇帝遗命，襄赞皇上，哪个能令我解任？”奕䜣道：“此乃皇太后及皇上圣谕！”正在此时，端华也来府中会同载垣一同上朝，奕䜣道“郑王来得正好，省得我去你家一道，现奉皇上谕旨着怡、郑二王立即解任！”端华仗着咸丰皇帝的顾命，根本不把奕䜣放在眼里，冷笑道：“你这是什么上谕？上谕需我们拟定的才算数。我等尚未上朝，这道谕旨从何而来，是何人拟定？”奕䜣便取出谕旨，二人一看，那上面果真盖着皇帝的御印，不禁面如土色，忙问此印从何处来？奕䜣道：“这是大行皇帝临终之际，亲手交给两宫皇太后的。”二人还是不服气，奕䜣即命随从卫士将他们拿下，交宗人府看管。慈禧得知端华、载垣已被擒拿，即命将他二人及肃顺革去官职、爵位，一面又下令逮捕肃顺。当时肃顺正护送咸丰梓宫回京，还在道路上，奉命逮捕的仁寿、荣禄等人出城后，在离京百余里的地方密云相遇，此时的肃顺正美滋滋地与两个爱妾睡大觉。荣禄等人冲入其寝室后，便喝道有圣旨命令将其逮捕。肃顺猝不及防，急忙奋起挣扎，说：“我乃先帝顾命大臣，你们这些那拉氏的走狗，凭什么来捉拿我！”荣禄不顾他的反抗，喝令卫士一拥而上，将其捆绑结实，迅速解押送京，投入刑部大牢。数日后，圣谕下达，将肃顺马上斩首，端华、载垣二人赐死，其余五位顾命大臣，一律革去职务，或流放或充军。至此，咸丰所谓的顾命大臣被一网打尽。慈禧在帝位更替的紧要关头，借助奕䜣、荣禄的帮助，既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地位，又向着掌握清廷实权更进了一步。

慈禧虽手握大权，但仍考虑到名分不合。因为六岁的幼主不能临朝独立处事，按祖宗制度，摄政王是必须要的。眼前，只有恭亲王奕䜣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咸丰之弟，是幼帝的亲叔叔，由他来担任摄政王是比较合适的，过去慈禧的一切谕令，都是由荣禄从中传给恭亲王，再由恭亲王出面去办的，这不仅有很多不便，而且长期下去，也极容易造成大权旁落。因而，慈禧便与荣禄商议，由荣禄在京四处活动，给那些京官们吹风，示意他们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经荣禄的活动，那些少廉寡耻的大小官吏们都认为这是升官发财的极好机会，于是纷纷上书请求两宫垂帘听政。慈禧得了这些奏折，征得慈安太后的同意，遂批道：该大臣等体国公忠，见识超卓，所有一切政务，当由皇上奉两宫裁决。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初一日，两宫太后正式于养心殿垂帘听政。就这样，大清政权名正言顺地归入慈禧这老太婆手里了。在这场生死搏斗之中，荣禄确实出尽了死力，慈禧听取了荣禄的计谋，并由荣禄出面活动，荣禄也不遗余力地尽忠报效于她。荣禄为慈禧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坐稳清廷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曲尽逢迎　东山再起

同治七年，三十二岁的荣禄提升为左翼总兵，授内务府大臣，赏赐头品顶戴，他更加死心踏地地报效慈禧。后来，恭亲王奕䜣因杀了慈禧最宠信的太监安得海得罪了慈禧，与慈禧渐生嫌隙，再加上奕䜣本来与慈安太后关系甚好，这对慈禧的统治肯定是个威胁。但是荣禄



光绪帝像

这时也正受到奕䜣的重用，因此他对慈禧与恭亲王之间的关系也深感忧虑。考虑再三，他决计采取对策，一方面拉拢奕䜣，另一方面在慈禧面前替奕䜣说好话。由于荣禄从中斡旋，恭亲王与慈禧的矛盾逐渐缓和下来。但奕䜣看到宦海波涛，官场险恶，不免灰心丧气，打算急流勇退，以全性命。

同治十三年，同治帝载淳病死。同治虽然没有子嗣，却留下了身怀有孕的孝哲皇后。慈禧看着儿子死了，并不十分伤心，她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地位会不会因此而动摇起来，因为只要孝哲皇后生下一个男儿，那自己的太后地位就保不住了，得让孝哲皇后来做太后，一切权力都得转让给她。于是慈禧便决定马上找一个与同治辈份相同的载字辈子侄来继承皇位，这样，她就可以依旧做皇太后，继续垂帘听政，继续掌握大权。主意拿定，她马上宣召恭亲王、醇亲王以及荣禄、魁龄、崇纶等人入见。在宣布皇帝晏驾的消息以后，慈禧命令诸王大臣立即议订立嗣之事。奕䜣道："现在皇后有孕，不如等到她分了娩以后再说。"慈禧反驳说："国岂可一日无君？岂能等到皇子诞生？"恭亲王又道："按承袭次序，可立溥伦为嗣。"慈禧最忌恨最害怕的就是立溥字辈的人，便说："溥伦族系太远，不宜嗣立。"她怕诸大臣另议别人，再生枝节，不等他们再开口便说："据我的意思，醇王之子载湉最为合适，此事就这样定了，不必再议。"载湉，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他不仅是同治的兄弟辈，而且是慈禧的姨侄，他的母亲就是慈禧的亲妹妹。光绪当时年仅四岁，不能亲政，慈禧当然又可以垂帘听政，再度掌握朝政。为了确保慈禧一手导演的"立嗣"戏能够顺利演下去，荣禄率领禁兵，层层布防，严加守卫，以防不测。众亲王大臣见宫廷内外侍卫森严，兵戈耀眼，哪个还敢开口说些与慈禧相悖的言语？只得依了慈禧之命。孝哲皇后听到消息，又受到慈禧的羞辱，又气又急，便饮恨自杀了。在慈禧确立光绪帝、再次垂帘听政、重掌大权的阴谋中，荣禄显而易见是立了头功的，从而更加受到慈禧的信任，得以荣升步军统领，并代表太后亲到醇王储迎接四岁的载湉入继大统。

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负责统管京城军队，城内一切军民人等，都得归其指挥辖制，权力之大，无可伦比，向来由朝廷最亲信的人物担任。荣禄担任此职，在感恩戴德的同时，也更加沾沾自喜，不可一世。

光绪四年（1879），荣禄由步军统领又升工部尚书。可就在这个时候，荣禄因事角蟋慈禧，被着令革职降级，逐出京城。关于荣禄被逐的原因，明面上的说法是因为贪污受贿被人告发；但据

野史大观等记载，则是与宫闱丑闻有关。荣禄因慈禧经常有要事相询，便召他入宫商议，久之得以自由出入宫禁，接触宫中人物。同治帝遗下的慧妃娘娘生得漂亮妩媚，荣禄见后曲尽逢迎之能事。他常常从宫外带些精巧玩物奉送给她，以博得她的欢心。久之二人眉来眼去，目逗言挑，渐渐有了情意。此情景被人发觉后，传到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那里，翁便密告太后，弹劾荣禄有秽乱宫闱之罪。慈禧先是不相信，后来派人在暗中侦查，果然有此胆大妄为之事，不禁暴跳如雷，立即将荣禄革去官职，逐出京城。而慧妃看到丑事败露，也觉无颜见人，于是自尽而死。此事是否小说家言虽未可知，但就荣禄为人一贯奸劣狡猾的秉性来看，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况且，荣禄一直是慈禧最亲信的得力助手，又为她多次立下大功，即便是贪污受贿，也不至于使慈禧极为恼怒而被革职逐出京城。荣禄出京后，又通过几年上下走动各处打点，至光绪十七年，又做到西安将军。

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其时内务府因库银不够，便示意朝廷内外大员，各捐俸银，作为祝寿的礼仪。荣禄得知此消息后，认为这是个能使自己时来运转的好机会，决不可随便放过。他火速来京，除奉上银两之外，又送上大量金银珍宝。贪图财货的慈禧一见，眉开眼笑，再加上恭亲王为其说情，便又起用了他，仍担任步军统领。荣禄好不容易回到慈禧身边，此时当然格外殷勤谨慎，更加小心翼翼。他自己不便深入宫闱运动、打点，于是让其妻子经常入宫陪伴慈禧聊天逗乐，又竭力巴结慈禧最亲信的总管太监李莲英，送了不少金银财宝。由于这两个人所起的作用，慈禧对荣禄的印象又渐渐好起来了。次年，便交给他一件复查慈禧陵寝雨损情况的差使。这个工程原先由一个大臣检查过，报称修缮费需银三十万两。据说这位大臣因考虑此工程是醇亲王监工督办完成的，不便低估原工程质量，因而对损毁程度报得并不严重。但荣禄摸透太后对别人督办陵寝工程并不放心的心理，他把毁损程度大大夸张了一番，报修缮费为银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奖赏荣禄办事认真细致，而把那位大臣臭骂了一顿。这件事，不仅使慈禧对已经死去的醇亲王的忠心发生怀疑，也对荣禄更加信任了。

再立“新功”镇压“维新”

荣禄复出后，为了邀功固宠，更加费尽心机揣摩慈禧心理。他的妻子和他一样，为人也很机警乖巧。她因经常出入宫禁，不仅摸透了慈禧的脾气，而且对慈禧与光绪帝母子不和的事情渐有所闻。老奸巨猾的荣禄了解到这些情形后，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当然更倾向于站在慈禧这一方。他认识到这又是一次为慈禧效力建功的绝好机会，他更愿意在这场内讧中给慈禧出主意，定计谋，取得慈禧的更大信任。当时，光绪帝已经开始亲政，他见中日甲午战争后，国家越来越积贫积弱，就决定听取维新派的意见，实行维新变法。面对光绪帝所发布的各种改革祖制的变法维新诏谕，那些顽固坚持封建统治的王公大臣都只知哭哭啼啼地向慈禧告状诉苦，但老谋深算的荣禄却处事不惊，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了计策。他最早打算是想联合六部九卿大臣上表，请慈禧太后废掉光绪帝，再度出来垂帘听政。但由于其时正是甲

午战争败后，故附和他这一议论者不多，荣禄只好作罢。

光绪二十一年，荣禄擢兵部尚书，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正式颁布“明定国事”的诏书，下令全国开始正式实行“维新变法”，这不禁引起了荣禄等人的极大恐惧与忌恨。当时人们把朝中跟随慈禧和光绪的两派人物分别称为“后党”和“帝党”，荣禄是为“后党”出谋划策的中坚人物，而光绪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则是“帝党”的中坚人物。维新派之所以能够和光绪帝接触联系，完全是由于翁同龢的推荐介绍。这样一来，荣禄反对维新一则可以铲除异己，二则可以报复翁氏曾弹劾过自己的旧仇。于是他向慈禧建议，应该赶快赶走翁同龢，以翦除光绪帝“变法维新”的羽翼。在慈禧的一再逼迫之下，光绪不得不下旨将翁免官回籍，同时按慈禧旨意，授予荣禄文渊阁大学士，令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于是，京城附近兵权就全部落入荣禄手中。也就在此时，口蜜腹剑、两面三刀的荣禄，按捺下满心的喜悦，又煞有介事地演出了一场悲悲切切的离别戏。他送给削职回乡的翁同龢相当多的银两，并拉着翁的手放声痛哭，假惺惺地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得罪了皇上，以致落到如此地步。其悲伤同情溢于言表，连翁氏本人也大受感动，更不用说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了。他们看了这些表演，都以为荣禄是“变法维新”的支持者。殊不知，荣禄这场离别戏只不过是猫哭老鼠式的假慈悲，洒下的也是几滴麻痹维新派、遮掩世人耳目的鳄鱼眼泪而已。

荣禄上任后，即抓紧操练新兵，培养爪牙亲信，建立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他邀请当时顽固派大臣怀塔布、杨崇伊等来天津，密谋策划，对付当时已大成气候的维新派。当时，有人曾问荣禄：“皇上听信新党之言，尽变祖宗法制，怎么办?”荣禄阴险地说：“大家不必担心，暂时让这帮新党猖狂几个月，等到恶贯满盈、罪状成立了，那时再下手不迟。”他又亲往颐和园谒见慈禧，试探慈禧对光绪帝的态度。荣禄说：“康有为尽变祖宗的规矩，皇上又一味听信他们，国家混乱不已，这样闹下去，恐怕要出事，眼睁睁看着祖宗的江山保不住了，如何是好?”慈禧心中已经非常恼恨光绪，但还是碍着母子情面，听荣禄一说，也乐得趁机行借刀杀人之事，就连声长叹说：“皇上虽是我一手抚养大的，但如今孩子大了，羽翼丰满，哪里还认得做娘的?他如果这样偏信他人之言，一意孤行，我哪有办法。再说，我还是不管为好。你荣禄忠心耿耿，我很信得过，你又身为总督，有职有权，你自己相机行事吧。”

荣禄得了慈禧旨意，心中有数，就更加抓紧部署镇压维新党人。他一边摩拳擦掌，一边在寻找机会，为了向光绪帝和维新派下毒手，他想出了一个引蛇出洞的阴谋。他先调聂士成五千兵驻扎天津，又调董福祥部队驻扎在距北京彰德门外四十里处的长辛店。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呈上奏折，请光绪帝和慈禧来天津检阅新军。他想等慈禧进入军营后，立即宣布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然后下令捕杀维新派，将他们全部剿灭。慈禧看到奏折，自然心领神会，非常高兴，就准备动身去天津。光绪深知荣禄是慈禧的忠实走狗，此番上奏请自己离开京城，其居心难以臆测。于是就赶紧来到

勤政殿与维新派诸谋士商量，大家都说其中一定有诈，极力阻止光绪帝去天津，然而由于慈禧一再催促，光绪不好公开表示不去。

此时形势真是危如危卵，顽固派势力掌握了军权，反扑迫在眉睫。光绪心急如焚，他连下两次密诏，令康有为等人设法救驾。当时维新派考虑到正在天津小站操练新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曾经参加过维新人士组成的团体“强学会”；翁同龢革职还乡路过天津时，袁不仅向他表示同情，而且还申述了自己对光绪皇帝的无限忠诚。袁氏手中又掌握有军队，如若他肯起兵反对荣禄，助行新政，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于是决定由光绪帝亲自召见他，奖掖他的忠心，并破格提升他为兵部侍郎。嗣后由谭嗣同连夜走访他的寓所，说出维新派的计划：命袁世凯速回天津，杀掉荣禄，然后带兵入京，包围颐和园，软禁慈禧，拥戴光绪，事成之后，由袁世凯接任荣禄一切职务。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满口应承，说“请转告皇上尽可放心，我杀掉荣禄就如同杀一条狗那么容易!”谭嗣同怕他不可靠，故意试探说：“你要不想干也可以，假如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照样有你的荣华富贵。”袁世凯听了，生气地瞪大眼睛说：“难道你们还不相信我袁世凯吗？你们把我看成了什么人!”谭嗣同见他态度这样坚决，便放心地走了。但等谭一走，袁世凯心中便犹豫起来，他想到此事非同小可，万一事机不密，不仅自己生命难保，而且还有灭族之灾。他思前想后，考虑再三，觉得“帝党”的力量，到底还是斗不过“后党”；投靠“帝党”肯定会要吃亏的。何况自己是荣禄一手栽培起来的，此人足智多谋，跟着他走迟早会有出人头地之日。看来今日之事，倒应该是自己为“后党”立功取信的极好机会。想到这，他决定火速去天津向荣告密，这是九月二十日的事情。

荣禄接到袁世凯的密报后，大惊失色，连声喊道：“冤枉！冤枉！我荣禄若有半点侵犯皇上之心，天诛地灭!”他命令袁世凯替他暂守天津，然后马上乘火车赶往北京来见慈禧。当时天色已晚，太监通报进去，回复说慈禧已经休息，有旨明日见驾。荣禄急得喊了起来，说：“这样紧急的事，那能等到明天吗?”执意硬要进去。正在争吵不休时，恰好有个慈禧面前的亲信太监出宫办事，一见是荣禄，就让他进去了。荣禄的脚本来有点跛，此时性急，一路上跌跌撞撞，摔了好几跤，才来到后宫。一到后宫，他就捶门捶户喊起太监，太监们睡得正香，听见如此急切的呼喊，猛然坐起，大家都以为是宫中着了火。等到出门来，只见荣禄没穿官服，一身普通百姓打扮，深更半夜地站在门外，大家更加惊诧万分，忙问何事，荣禄答道：“我要速见太后，有急事相告，刻不容缓。”当时慈禧也已经睡下，听见事情紧迫，急忙起了床，宣布即时传见，荣禄踉踉跄跄跑了进去，一见慈禧，便伏地放声大哭。慈禧见状大惊，忙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此紧急?”荣禄一面哭，一面将袁世凯告密的内容一一讲来。慈禧气得浑身颤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咬牙切齿地说：“这小子竟做得出这样忘恩负义的事来，看来我们不得不先下手了。”即命荣禄赶紧召集自己亲信的大臣们速来颐和园商议。

荣禄进宫时，行动虽然鬼鬼祟祟，

但神态慌里慌张，这时光绪帝的一位贴身心腹太监也正好在慈禧这边，他瞧见这一切，心想：这荣禄乃是直隶总督，驻军天津，为何轻易离开职守，深夜进宫呢？神态又如此慌张着急，想必一定有什么重大变故。他就悄悄跟在荣禄后面，只见荣禄见了太后，失声痛哭，心里便明白了几分，他想这事很可能与皇上有关。于是便躲在窗外窃听。荣禄与太后的谈话内容，他虽听不十分明白，但太后怒不可遏的情形，他却是看得一清二楚的。等荣禄一出来，这太监就连忙跑到光绪那里报告。光绪帝一听，情知大事不好，一定是袁世凯告密，事情被发觉了。光绪想，自己的性命问题倒还不大，只是那些维新党人物恐怕是难以保全了。当下派人火速通知康有为，叫他赶快逃走；康有为得知消息后，连行李也来不及收拾，只身逃出京城，乘轮船到天津，然后转往上海，亡命海外。

此时荣禄奉了慈禧之命，召集了刚毅、塔怀布、许应揆等一批保守派大臣来到慈禧殿前。这些大臣们听到消息，无不惊惶失色，面面相觑。大家痛骂维新党人之后，便请速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并请慈禧再度出来垂帘听政，以挽救颓局。慈禧准奏后，即命荣禄带兵保卫宫廷，荣禄答道："奴才恐事生不测，此次来京前已命数千亲兵随后，想必此时已经到达京城。"慈禧连忙称赞荣禄做事周全，想得周到。随即命令把宫中原有侍卫调出，一律换上荣禄的亲兵。次日，慈禧把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命荣禄派兵把守，自己则宣布再度训政。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捕杀维新党人。四天之后，将谭嗣同、杨深秀、康广仁等六君子斩于菜市口，将一大群与"变法维新"有关的大臣们充军的充军，革职的革职，降级的降级，一场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就在慈禧与荣禄的联合密谋中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在这场摧败"戊戌变法"的阴谋活动中，荣禄再次为慈禧立下头等功劳，得到慈禧更大的宠信。她将荣禄升任为军机大臣，同时执掌兵部大权，节制北洋海、陆各军。此时的荣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朝野"，以致"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细巨，常待一言决焉。"可以说，荣禄的发迹再起，升迁直到爬上高位，无不是靠他的权谋狡诈、心狠手辣的一系列卑鄙行为取得的。

两面讨好　一心卖国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慈禧原先是想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后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在这场斗争中，荣禄再一次表现出他不寻常的老奸巨猾。本来，慈禧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就着手确立皇储，以便伺机取代光绪皇帝。她选中了端王的儿子溥伦。但荣禄告诉她，此事不能操之太急，应首先取得洋人的同意才能行事。根据荣禄的主意，慈禧在元旦那天，邀请各国公使前来道贺，以征询对立储这件事的支持。但是，公使们纷纷拒绝参加宴会，原因很明白，他们反对废掉光绪皇帝。慈禧不能忍受外国人对她进行政治干预，她刚想发火时，荣禄劝告她，这事万万不可惹怒洋人，只能慢慢商量，小心谨慎，见机行事；关于皇储溥伦的名分，不要弄得太明显。慈禧听从了荣禄的意见，便改称溥伦为大阿哥。这样一来，溥伦的父亲可不干了，他认为是洋人作梗，才使得他的儿子当不上皇帝。他联合刚毅、徐

桐等一批大臣，上疏奏请慈禧利用“法力无边”的义和团反对洋人，以收两败俱伤之利。在此同时，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为代表的大臣则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惹怒了洋人一定会引来大麻烦。慈禧为出心中的恶气同意了端王、刚毅等人的主张，下诏“宣抚”义和团，命其进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并将一再进谏劝阻的徐用仪、尚书立山等三大臣杀了头。结果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很快就陷落了，慈禧只得仓皇逃往西安。在逃跑的路上，慈禧为了表示和洋人作对的是别人不是她本人，又下令将刚毅、徐桐等人杀头。在这一场翻手为云复手雨的宫廷斗争中，深于心计的老狐狸荣禄尽量不使自己卷入漩涡，而他心里是始终明白这些利害关系的。他在不忤逆慈禧意思的情况下，也给慈禧准备了后路。他奉承旨意调遣董福祥的部队进攻东交民巷外国兵营，却又不给他们发炮弹，而且暗地里还派人给洋人送去水果、食物，以示友好和慰问。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慈禧急得哇哇直哭，荣禄道：“事已至此，太后不必悲伤，速图善后事宜为要。”慈禧狼狈出走陕西，荣禄先是留京，后又赶赴西安。临走时，他授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与洋人谈判过程中必须掌握一条原则，即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于光绪，无论什么苛刻条件都可答应。在荣禄的授意下，李鸿章、奕劻和八国联军签订了连本带息近十亿两银子的赔款、允许外国军队在京城驻兵的《辛丑条约》。可见荣禄的企图只是要保全慈禧一个人，这样也就保全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对于国家的利益，他是置诸脑后的。

对于荣禄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保全自己的做法，慈禧当然感激涕零，因而对他也格外“宠礼有加”；不但赏赐他黄马褂，而且以“保护使馆，力主剿匪”有功，赏戴双眼花翎及紫貂皮袍，甚至还加封荣禄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头衔。除此之外，为了奖赏荣禄的一片忠诚，慈禧还将荣禄的女儿指婚给醇贤亲王的儿子载沣；载沣是光绪帝的弟弟。慈禧这样做，一来是为了表示对荣禄的特殊恩典，二来也是稳定光绪家人的心，使他们不致对自己造成不满。荣禄的女儿与载沣结婚后，即生下儿子溥仪；这个溥仪后来作了清朝最后一个皇帝，这就是宣统。

光绪二十九年，荣禄病死家中，终年六十七岁。慈禧听到消息，悲哀地说：“荣禄死了，今后还有谁能像他那样忠心耿耿、足智多谋呢？”旁人见慈禧过于伤感，赶快劝慰，慈禧说：“你们哪里知道，荣禄是我一生中最信赖的大臣，数十年来一直同我患难与共，好几次难关都全仗他的胆识谋略度过的，如今他这一死，令我想起无限往事，怎不叫我格外伤心呢？”

为了褒奖荣禄的忠诚，也为了鼓励别的奴才也效法荣禄忠于自己，慈禧诏谕对已死的荣禄格外优恤。除晋封一等男爵，赐予陀罗经被外，还特赏三千两银子治丧。又旌表其功绩，入贤良祠，并且把他的平生功绩，付与国史馆立传。复赐祭席一桌，派恭亲王溥伟前往祭奠，以示恩宠殊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历史百科全书　第２卷　政治人物卷　（图文互动版）
作者＝徐寒主编
页数＝５８９
ＳＳ号＝１１４８４９９４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沮渠蒙逊】
【慕容德】
【李暠】
【赫连勃勃】
【宋武帝刘裕】
【宋文帝刘义隆】
【梁武帝萧衍】
【梁元帝萧绎】
【陈高祖陈霸先】
【陈后主陈叔宝】
【魏道武帝拓跋圭】
【魏太武帝拓跋焘】
【魏孝文帝元宏】
【高欢】
【宇文泰】
【齐文宣帝高洋】
【周武帝宇文邕】
【宇文护】
【隋文帝杨坚】
【隋炀帝杨广】
【唐高祖李渊】
【唐太宗李世民】
【唐高宗李治】
【武则天】
【唐玄宗李隆基】
【唐代宗李豫】
【唐德宗李适】
【唐宪宗李纯】
【唐武宗李炎】
【后梁太祖朱晃】
【后唐庄宗李存勗】
【后晋高祖石敬瑭】
【后周太祖郭威】
【后周世宗柴荣】
【前蜀高祖王建】
【南唐前主李昪】
【吴越王钱镠】
【辽太祖耶律亿】
【辽太宗耶律德光】
【辽圣宗耶律隆绪】
【辽天祚帝耶律延禧】
【西辽德宗耶律大石】
【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宗赵炅】
【宋真宗赵恒】
【宋仁宗赵祯】
【宋神宗赵顼】

【子产】
【孙叔敖】
【西门豹】
【李悝】
【吴起】
【商鞅】
【苏秦】
【张仪】
【范雎】
【乐毅】
【蔺相如】
【李斯】
【吕不韦】
【张良】
【陈平】
【萧何】
【曹参】
【陆贾】
【周勃】
【晁错】
【黄霸】
【召信臣】
【霍光】
【魏相】
【班超】
【匡衡】
【第五伦】
【李膺】
【杨秉】
【班勇】
【张禹】
【邓禹】
【杨震】
【诸葛亮】
【毛玠】
【荀彧】
【华歆】
【王朗】
【陆逊】
【张华】
【高允】
【苏琼】
【王导】
【桓温】
【谢安】
【高颎】
【房玄龄】

【李靖】
【杜如晦】
【魏征】
【长孙无忌】
【裴行俭】
【狄仁杰】
【姚崇】
【宋璟】
【张九龄】
【刘晏】
【杨炎】
【李泌】
【陆贽】
【李绛】
【裴度】
【赵普】
【王安石】
【寇准】
【范仲淹】
【司马光】
【包拯】
【脱脱】
【李纲】
【宗泽】
【文天祥】
【耶律楚材】
【刘秉忠】
【崔斌】
【李善长】
【于谦】
【李贞】
【姚广孝】
【王翱】
【况钟】
【陈寿】
【杨士奇】
【张居正】
【海瑞】
【洪承畴】
【汤斌】
【于成龙】
【范文程】
【徐元文】
【张英】
【张伯行】
【明珠】
【隆科多】

【杨素】
【宇文化及】
【来俊臣】
【李林甫】
【杨国忠】
【高力士】
【李辅国】
【元载】
【仇士良】
【卢杞】
【牛僧孺】
【冯道】
【蔡京】
【秦桧】
【贾似道】
【阿合马】
【桑哥】
【铁木迭儿】
【刘瑾】
【夏言】
【严嵩】
【徐阶】
【魏忠贤】
【鳌拜】
【和 s e p e r a t o r】
【琦善】
【耆英】
【李鸿章】
【荣禄】